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革命起义全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天起，中国人民就踏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结论，也是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主要特点。为谋求自身的解放，中国人民在长达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众多的革命起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下，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和影响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策动下，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中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广大官兵，毅然走上正确道路，纷纷起义，投向人民，奔向革命。所有这些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起义者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将永载史册，成为鼓舞和激励后人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为了真实地记录和全景式地反映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国大陆解放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进行的历次革命起义的光辉历程，全面贯彻落实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指示，纪念和慰藉为创建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抛头颅、洒热血、屡建功勋的革命老前辈及革命先烈，庆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和香港回归伟大祖国的怀抱，为全军广大指战员、全国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提供生动、翔实的教材，为学习研究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提供清晰的线索和完整的史料，在总政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革命起义全集》一书。

本书所收革命起义的时间跨度，上限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下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的1950年全国大陆解放。总计收录革命起义近千次，其中写成纪实的800多次，约120万字。

本书内容涉及面宽，牵涉到众多历史事件与人物。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充分吸收近几年军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从总体上突出以下特点：

内容全本书不仅反映了大陆各省爆发的革命起义，而且对台湾、香港所发生过的革命起义也作了适当收录。其中写成纪实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0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608次，抗日战争时期41次，解放战争时期100次，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40次；有174次革命起义因史料不足等原因写纪实确有困难，则在一览表中作了简要反映；还有一些因规模很小、资料缺乏、影响不大的起义或反正，本书未予反映。书中写成纪实的革命起义，从组织领导上讲，既有共产党直接发动领导的起义，也有广大劳动群众自发组织的起义；从参加起义的人员成分上讲，既有工人、农民起义，也有国民党军进步官兵起义；从起义规模上讲，既有十几万至几十万人的起义，有几万几千人的起义，有几百几十人的起义，也有单人或少数人驾机、驾艇

的起义；等等。

成果新本书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了国内特别是全军各大单位近些年来编写的历史资料丛书所收集整理有关史料。在所选用的史料中，有些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些纠正了某些偏颇和错误看法；有些弄清了革命起义的地域分布、社会背景、爆发过程、成果、作用及经验教训。

史实准本书对征集的大量历史史料，采取军队编研部门与地方党史研究部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反复查证核实，有的还专访了曾亲身参加过革命起义的老前辈，有的请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和有关省、市档案馆予以核查。尽管本书大部分历史资料曾经历过几级编研部门的初审、复审、终审，但我们在精选的基础上对写成的书稿大样，仍再次聘请了深谙中共党史、军战史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最后审定，认真把好政治、史实和文字“三关”，并报总政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批准。

总政首长和总政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领导对编纂本书十分重视，在编写方案确定、书稿编写、审查到成书的全过程中，不仅及时批复有关请示报告，还亲自听取编撰此书的情况汇报，帮助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

编写过程中，许多革命老前辈提供了宝贵资料，并对该书的编辑出版寄予厚望；总政宣传部编研室给予积极支持；军事博物馆、解放军出版社给予很大帮助；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和有关省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军内外有关档案馆的专家对本书的大量资料做了卓有成效的核查工作；特别是参考了近几年有关单位编纂出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以及《革命起义录》等著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革命起义全录》一书冠以“全”字是比较而言的，是指就目前已出版的此类著作中，尚未有本书内容这样广泛、全面。但因起义过程复杂曲折，时间久远，有的资料难以收集或核实，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革命老前辈、有关专家、教授、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为今后修订的津梁，使之日臻完善。

编者

一九九七年三月

中国革命起义全录

鲁山起义

1922年6月初，贫苦农民张庆率领饥民为反对官绅盘剥在河南鲁山举行了武装起义，又称河南“老洋人”起义。

张庆，河南临汝人，因长相酷似西方人，人称“老洋人”。张庆曾随其大哥张林参加过白朗起义，起义失败后率部分人员回到家乡。1920年前后，河南连年天灾，饥民遍地，反动官绅乘机盘剥，加上各派军阀混战骚扰，逼得人民起来反抗。1922年6月初，受白朗起义熏陶的张庆，联合鲁山、郟县两县的饥民4000余人宣布起义，一举攻克鲁山县城。7月初，又率起义军向河南西部进军，中旬占领陕州城（今陕县），守城的丁宝成率部参加起义军，接着攻占灵宝和陕西潼关，极大地震撼了统治者。直系军阀吴佩孚急忙调集部队进剿起义军。9月中旬，起义军在潼关南部作战失利，退回河南鲁山整编，改称河南自治军，张庆任总司令，丁宝成任参谋长。下旬，吴佩孚兵分3路会剿起义军。为摆脱直军的围困，万余起义军不到10天的时间打到皖北的阜阳。在东进中，起义军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得到沿途人民的响应，又有万余人参加起义军。11月初，起义军在受到安徽反动武装攻击后，撤出阜阳，回师河南，月底到达鲁山、宝丰、郟县一带，声威越来越大，给直系军阀以极大的威胁。

吴佩孚在围歼难以奏效后，便实施剿抚兼施的两面手法，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军，一面以改编为诱饵进行招抚。年底，张庆接受了招抚条件，将起义军改编为河南游击队。改编后，大部分将士不满，要求再次起事和军阀作斗争。在此情况下，张庆一面应付官差，一面扩充和整训部队，准备再次起义。1923年4月中旬，张庆率部离开鲁、宝、郟地区，前往豫东永城、夏邑、鹿邑、柘城等县，释放了各县被关押的无辜群众，向地主豪绅筹饷，安抚饥民，控制了豫东一带。10月，吴佩孚一面令张庆率部前往四川；一面从苏、鲁、豫、皖调集4万兵力，企图在军阀混战和进军途中消灭起义军。张庆识破了吴的阴谋，率部以迅速行动，出其不意地冲出包围，越过京汉铁路到达郟县。起义军从豫西三出三进，牵制了军阀近10万兵力，使得豫、陕、皖、苏等省的统治者坐卧不安，在中原地区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11月，吴佩孚又调集2万精锐部队作为主力向起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为避免和军阀部队硬拼，张庆率主力突围南下，经叶县、方城、泌阳进入湖北，尔后沿鄂豫边西进，到陕南柞水被阻，又东出龙驹寨（今丹凤县），于1924年1月回到郟县。这次转战，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损失严重，部队仅剩3000余人。最后在老爷顶一战，起义军损失殆尽。丁宝成见大势已去，枪杀张庆后率20余人投降。

鲁山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继白朗起义后，在中原大地爆发的又一次大规模地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这一地区的反动统治，再现了中原各族人民不屈不挠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东兰农民起义

1923年7月1日至10月，广西东兰的壮、汉、瑶各族农民在韦拔群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又称东兰暴动。

1921年6月，受五四运动和革命思想熏陶的韦拔群回到东兰县武篆家乡，组织部分有识之士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号召广大群众“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实行社会革命”。1922年春，东兰农民在“同志会”的领导下，同桂系军阀旅长刘日福、大土豪杜琨选进行斗争，迫使他们撤销征收苛捐杂税的命令和退出侵吞的公款。因此，改造东兰同志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参加的人很多，组织发展很快。次年4月18日，“同志会”改组为“东兰公民会”，确定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为宗旨，提出“不交租，不还债”等口号，继续与军阀、土豪劣绅作斗争。

为了斗争的需要，韦拔群变卖了部分家产，购买枪支，并搜集民间武器，组织起一支国民自卫军，准备同时打倒土豪劣绅与反动军队。7月1日，韦拔群率领3000多名自卫军分4路进攻东兰县城。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眼看城池就要攻下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火药枪受潮，兼之城南九曲河河水暴涨，只得暂时撤回休整。31日，韦拔群率几百名自卫军再次攻打东兰县城，由于城内早有准备，攻城又没有奏效而被迫撤回。韦拔群和“东兰公民会”的同仁，认真总结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一面扩大武装，加紧训练，提高自卫军的战斗力；一面对土豪劣绅进行监视，封锁消息，孤立县城。10月18日，韦拔群趁城内部分武装调往百色之机，率自卫军1000余人第3次攻打东兰县城。自卫军在夜幕掩护下，占领3座炮台，次日拂晓攻入县城。下午2时，躲在县衙内顽抗的军政人员被迫投降，东兰县城获得解放。自卫军释放了被监禁的无辜群众，没收了罪大恶极的土豪韦龙甫的财产，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

由于对反动派的阴谋缺乏警惕，自卫军接受了桂系军阀旅长刘日福出面的“调停”，撤销县知事，成立了有“公民会”会员参加的所谓新参事会和议事会后，自卫军便撤出县城，各自返乡。在反动派反扑时，起义群众受到很大损失。韦拔群等领导人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为百色起义、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23日，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举行了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充分显示其强大威力。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以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与声援下，在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下，广东国民政府以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目的，以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打击对象的北伐战争开始后，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和罢工，声援北伐。9月，当北伐军向江西推进时，中共上海区委就开始准备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派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赵世炎负责工人武装的组织工作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区委书记罗亦农、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也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去做发动工作，并秘密举办武装训练班和组织起义的工人纠察队。

在北伐军沉重打击下，10月16日，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浙江自治，脱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并与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取得联系，准备攻取上海。当时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已西调江西，驻守上海的只有步兵1000余人、警察2000余人、内河小军舰两艘，其中一艘还站在革命一边。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正是发动起义的良机，尽管时间仓促，准备不够充分，掌握的武装力量不大（200多人的工人武装和2000多人没有武装的战斗队伍），只要夏超向上海进攻，国共两党共同配合，起义胜利是有把握的。为此，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以罗亦农、赵世炎为起义总指挥，并与钮永建合作发动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军进军。起义时间定在10月23日午夜至24日。具体行动计划是：先攻占南市和闸北。南市以攻取高昌庙制造局为目标，以钮永建部为主力，由工人纠察队配合；闸北以攻占北火车站为目标，由工人纠察队负责；其它各区由工人纠察队分途进攻警察署、所。不料，23日孙传芳部进攻杭州，夏超兵败丧生，起义的组织者对此一无所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命，直到天亮，只有闸北的几支工人纠察队与警察发生战斗，大部地区均未按时发动。孙传芳闻讯立即调兵开进上海进行镇压。中共上海区委于24日晨被迫下令停止行动。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10余人阵亡，100余人被捕、500余人失业。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遭致失败。

宁冈起义

1926年10月下旬，江西省宁冈县保卫团和千余名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为配合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举行了起义。

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为发动群众配合和迎接北伐军，派遣了一批共产党员回到原籍开展工作。8月，共产党员龙超清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宁冈，发动一些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成立了中共宁冈县支部，龙任书记。

当时在宁冈境内活动着一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绿林武装——马刀队。其领导人袁文才就是在反动军队杀害他母亲后“逼上梁山”的。该队经过中共宁冈县支部的大量工作后，改编为合法的宁冈县保卫团，袁任团长。保卫团成立后，袁文才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教育下，思想很快发生转变，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起义。10月，北伐军向江西进军，北洋军阀急调各地兵力固守南昌。下旬的一天晚上，中共宁冈支部趁宁冈城防空虚之际发动了宁冈起义。龙超清等领导人率1000余名农民奔向县城和袁文才率领的保卫团六七十人一起，捣毁了县政府，逮捕了县长沈清源和一些反动官吏、土豪劣绅。次日清晨，宁冈县召开规模空前的民众大会，宣布成立由龙超清为主席的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号召全县人民行动起来，开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宁冈保卫团改编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总指挥。同时，还成立了县工会、农会和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宁冈开展起来了。11月，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以龙超清为书记的中共宁冈县委。

同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主要当权者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宁冈逃亡各地的土豪劣绅也纷纷卷土重来。在白色恐怖下，龙超清、袁文才等率领革命武装继续坚持斗争。7月26日，他们根据中共吉安县委的指示，奔袭永新县城，解救了被反动派扣压的50余名共产党员和数百名群众。10月，龙超清、袁文才等率领宁冈农民自卫军加入了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从此，这支部队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的伟大斗争。

泸顺起义

1926年12月1日，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四川的泸州、顺庆（今南充）地区独立领导和策动部分四川军阀部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北伐战争前，四川省内大小军阀林立，主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他们拥兵数十万，盘踞于长江上游，对湖北、湖南等地也产生着相当的影响。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决定以国民政府名义，利用军阀内部矛盾，发动部分军队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及时将重心转向军事方面，在发展工农力量、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积极策动四川军阀武装倒戈易帜。派吴玉章、刘伯承、陈毅等人，利用过去与川军第1军的关系在川军中进行活动。他们和派进川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孟伉、邓作楷、吴季藩、黄直峰等人一起，在川军中发展了中共的力量。同时，中共中央还派朱德前往万县利用和杨森的关系到杨部工作。到1926年夏秋，中共重庆地委在川军各部中掌握和可能参加起义的部队有2万多人，为泸顺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0月初，正当北伐军直捣武汉三镇的时候，杨森为援助吴佩孚，派一部兵力沿长江东下，企图侧击武汉，因而在军阀“后院”四川组织武装起义显得刻不容缓。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执监委联系会议，决定刘伯承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抑止杨森出兵东下武汉，并策应冯玉祥部出陕与北伐军会师中原。11月中旬，成立了由杨闇公（中共四川省军事运动领导机关——特务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朱德、刘伯承3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任书记，全权负责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和具体领导四川的武装起义。随即举行第1次会议，拟以顺庆为根据地，发动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所部之江防军黄慕颜部和驻顺庆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所部之秦汉三、杜伯乾两旅首先起义，驻泸州的赖部袁昌文、陈兰亭两旅随即率部响应，并移师顺庆。由刘伯承任总指挥，并决定12月5日为起义开始时间。由于情况的突变，起义提前于12月1日首先在泸州开始。

泸州，地处长江、沱江交汇处。驻防泸州城内的是赖心辉部的基本部队第2旅，旅长李章甫思想反动，与驻在城外的袁昌文、陈兰亭两旅矛盾很大。袁、陈两旅在军事上占优势，李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要解决李旅必须智取。袁乃借旅军士训练学校举行毕业典礼之机邀李及其部下参加，待李到达后将其扣押，袁陈两旅宣布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胜利占领泸州城。3日下午5时，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指挥部队举行起义，消灭其师长何光烈及其亲信大部，次日晨占领顺庆。黄慕颜接到秦、杜的电报后即在合川举义，并按计划开到顺庆。10日3部起义军7000余人在顺庆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正式就任总指挥，黄慕颜就任副总指挥兼第1路司令，秦汉三、杜伯乾分任第2、第3路司令。

泸顺起义震撼了全川，许多部队纷纷改旗易帜，归服国民政府。同时，反动派也派人潜入起义军中进行策反并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13、14日，邓锡侯调罗译洲师万余人向顺庆发起猛烈围攻。由于泸州起义部队未能按时移师顺庆，顺庆起义军与围攻军激战三天后，于16日被迫撤至城外灯台场，

决定退往开江整顿。部队行至周口一带渡江时，又遭林翼如旅的袭击，损失惨重。到达开江时部队仅 2000 余人，在刘伯承率领下于 22 日改编为一个旅。1927 年夏，这支部队东下郊西，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 6 军。在顺庆方面艰苦战斗时，泸州方面的起义军也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局面。由于军阀的挑拨离间，袁、陈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陈部部分官兵又不愿意离开泸州，会师顺庆的计划落空。顺庆部队撤离后，泸州孤立无援，局势更加严重，1927 年 1 月，刘伯承在处理好顺庆的善后工作后到达泸州，采取果断措施：开展思想工作，加强起义军的团结；创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广泛发动群众，加强政权，改善经济，仅两个月，泸州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此时国民党右派活动日趋猖獗，军阀刘湘充当打手，杀害工人、学生、市民 500 余人及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杨阁公，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刘湘还纠集川黔两省大小军阀，由赖心辉任总指挥的“川黔联军”六七万人，从四面八方向泸州起义军发动进攻。当时泸州的起义军只有五六千人，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与军阀部队英勇作战，坚守一个多月，刘湘在长期攻城不下的情况下，一面调集重兵猛攻，一面用高官厚禄收买了起义部队一部分领导人，内部出现分裂，形势更加恶化。刘伯承被迫于 5 月 16 日晚突出重围。不久，袁昌文、陈兰亭等部为军阀所改编。

顺泸起义泸州地区虽然失败了，但它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向长江流域胜利进军，促进了川中工农运动的发展，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

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反对军阀统治，上海工人阶级曾于1926年2月举行了第1次武装起义，虽然由于军阀的镇压而失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却，而是以更大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迎接新的考验。中共上海区委认真总结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积极发动工人群众，准备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

首先由上海总工会出面，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倒孙拒张”（应直系军阀孙传芳的请求，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上海）运动；其次，中共上海区委组成由赵世炎、罗亦农负责的军事委员会，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18日，先头部队到达嘉兴。孙传芳部撤至沪宁一线，其防线由直鲁联军张宗昌部接替。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利用军阀换防之机发动第2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是日晚，上海市总工会向所属各工会发出《总同盟罢工令》和《罢工宣言》，得到上海工人的一致响应。19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5万。到22日，罢工人数增至36万以上，其范围遍及上海各行各业。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成立革命政权、保障市内人民集会，以及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撤退各国驻沪海陆军队、收回租界、颁布劳动法、组织人民武装等12条政纲，作为全市人民行动的目标。上海总工会也提出反帝反军阀、建立革命政权、保障工人工作和生活权利等17条政治经济要求。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勾结租界帝国主义工部局，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镇压。从19日到22日被打死、打伤和逮捕的工人达百人以上，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与军警展开激烈的战斗，罢工开始转变为武装斗争。22日下午6时，中共上海区委宣布武装起义开始。停泊在黄浦江上响应革命起义的“建威”、“建康”两舰，开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各区工人纠察队一起投入战斗，同军阀部队展开激烈巷战。

在此期间，组织了以共产党为主，联合国民党和上海社会各阶层参加的临时政权——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当上海工人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命令进占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停止向上海进攻，使军阀部队得以腾出手来勾结帝国主义对起义工人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工人和学生40余人英勇牺牲，300余人被捕。为保存实力，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起义停止。24日，上海总工会发布复工命令，第2次工人武装起义遂告结束。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3月初，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约3万人接替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驻防上海。对此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在上海举行第3次武装起义，并在总结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

教训后，对第三次起义进行了周密的准备。组织上组成了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为成员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决策机关。陈独秀负总责，成员有彭述之、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特委下设特别军委，周恩来负责特别军委工作，并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针对前两次起义发动群众不够的教训，花费大量精力在工人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在统一战线内部，加强同国民党左派人士杨杏佛等的联络，争取他们对起义的支持；并采取对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暂不触及，以孤立和消灭直鲁联军的策略。同时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级干部迅速恢复被打散的各级组织。上海市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28.9万余人，组织了5000多名工人武装纠察队，按地区组成若干大队和中队。

周恩来亲自抓纠察队的训练，并制定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武装起义计划。起义作战地点分为闸北、沪西、沪东、南市、虹口、浦东、吴淞7个区。根据情况，闸北确定为重点，并分别成立了领导机构，指定了指挥人员。成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负责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还发动铁路工人进行大罢工，断绝军阀部队的援兵来路。

3月20日，北伐军攻占上海近郊龙华。21日，中共江浙区委发出正午12时各行各业各厂举行总罢工，开始武装起义准备的指令；上海总工会也同时发出总同盟罢工令。在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并随即转入武装起义。当晚，除闸北区外的6个区和电话局、电报局等重要部门均被武装工人所占领。闸北区是直鲁联军主力所在地，有20多处军事据点和5000多名守军，并配有铁甲车、大炮作掩护。为攻占闸北，总指挥部决定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经一昼夜激战，于次日12时首先攻下天通庵火车站，守军300多人缴械投降。16时，商务印书馆被起义工人占领。18时，最后一个据点闸北火车站亦被占领。起义进行中，总指挥部曾派人与进抵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联系，但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秘令按兵不动，阴谋利用北洋军阀削弱上海工人力量，直至闸北战斗接近尾声时，才派薛岳率第1师进入闸北，协助进攻。上海工人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打败了军阀部队，占领了上海，取得了第3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起义中工人阵亡200余人，伤1000余人。23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上海市特别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1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

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有史以来第1次取得胜利的武装起义，在中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武装斗争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南昌四二起义

1927年4月2日，南昌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摧毁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了起义。

1926年8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江西省的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共党员发展到八九百人，在全省20个县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10多万人，在全省42个县中建立了工会组织；农会会员发展到30多万人，在全省54个县中建立了农会组织；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在全省蓬勃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设立总指挥部，率领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首先令其党羽秘密组织了一个小团体——“AB”团，随之在1927年元旦举行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圈选”形式使其成员担任了江西省党政要职，从而篡夺了江西省的党政大权；接着大肆摧残工农运动。1927年3月6日制造了以屠杀共产党人、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赣州惨案”，解散了由中共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南昌市党部，封闭了进步报纸《贯彻日报》。对国民党右派的篡权行动，中国共产党团结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坚决斗争。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圈选”；宣布脱离非法省党部；恢复由中共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南昌市党部的活动；《贯彻日报》也启封出版；并组织数万群众举行纪念“三一八”烈士暨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上述斗争，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均予以支持并否定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南昌的活动，派方志敏等8名特派员赴赣，代行江西省党部的职权，改组省党部和省政府。此时，蒋介石也离开南昌前往上海。“AB”团分子失去了依靠，但仍然企图暗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进行暴乱，挽回其失败的命运。

在此形势下，中共江西区委联合国民党左派决定发动群众举行起义，捣毁被“AB”团分子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朱德派军官教导团学员进行配合。4月2日下午，在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袁玉冰等人的率领下，2000多名群众手持木棍、梭标，浩浩荡荡地开向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并将其团团包围，“AB”团分子竟开枪顽抗，愤怒的群众不顾个人安危，像潮水般地冲进省党部大楼，缴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枪支，逮捕了“AB”团分子及其他反动首领程天放、罗时实等30余人。3日，南昌市召开了有3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并将程天放等“AB”团首要分子押上台示众。5日，中共特派员方志敏等到达南昌，开始行使省党部的职权。

南昌四二起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对以后江西革命斗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确山起义

1927年4月4日，河南确山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迎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在中共河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中共驻马店（确山县辖）特别支部，张家铎任书记，负责领导农民运动。后来确山县籍共青团员马尚德（杨靖宇）等，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从事农民运动。到1927年初，确山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万余人。在组织和发展农民的同时，争取了确山县东北乡红枪会（农村中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武装自卫组织）头人、自耕农张广汉和南乡的红枪会一部。这两支红枪会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的确山农民武装的基本力量。在此基础上，还积极争取了其它乡的红枪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这样，全县农民武装基本上被中共党组织所掌握，大部分农村被农民武装所控制。

3月，北伐军即将进入河南，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经与红枪会头人协商，决定4月4日举行武装示威。是日，各乡武装农民近3万人，在张家铎、张耀昶、马尚德的指挥下，集合在东关操场举行武装示威。张家铎任大会总指挥，向县政府提出惩办卫程曲、楚本固、何鸣一、田斐卿四大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反对拉夫派差等条件。县长王少渠当时为蒙混过关，口头上接受了农军所提条件，随即关闭城门纠集部分武装企图顽抗，并放走了四大劣绅。被激怒的农军由示威转向起义，占领火车站、截断城内外的电讯联系，把整个确山城团团围住，并不断用“九节雷”、土炮向城内轰击。到第3天，邻近各县的农军也赶来支援，围城农军增加到三四万人，长短枪200多支，土炮20余门。城内守军在农军的攻势下，招架不住，企图用谈判作为缓兵之计，以待援兵，被起义军识破。8日，农军从西门发动火攻，部分守军趁天黑之际弃城而逃，农军攻入城内，歼灭守军200余人，活捉县长王少渠，镇压了一个土豪劣绅，抄了四大劣绅的家，打开监狱解救了无辜的贫苦群众。不久，起义领导者从武装农民中挑选一批骨干编为农民自卫军，共200余人，分两个大队，由张耀昶负责领导，留城内维持秩序。其余红枪会成员和农军各回本乡。此时，北伐军进驻柳林镇，中共确山党组织派代表迎接。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员于树德（中共党员）代表政府赠给农军“革命先锋”锦旗一面。24日，于树德主持召开确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临时维护治安委员会，接管县政权。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后，为保存力量，起义领导机关率农民自卫军骨干力量撤离县城，在农村领导群众继续进行斗争。

澄海起义

1927年4月15日，广东澄海县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屠杀举行了起义。

1926年春，共产党员刘锡三等到广东澄海县同早已在该县开展工作的共产党人一起，深入各区乡发动与组织农民、整顿农会，积极开展抗捐抗税斗争。该县农会会员在很短的时间发展到2000多人。1927年2月21日，第7区右派势力逮捕了该区农会特派员；三四月间，又纠集一批人举行武装示威，无故殴打东里平民学校学生；更有甚者还纠集200多种武装人员突袭县农会，杀害农军教练彭丕，后来又逮捕了中共澄海县县委书记、农会委员、农军及师生20多人。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反共形势更加严重。

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屠杀，中共党组织于4月15日领导澄海农民举行起义，参加人数数千人，分东西两路攻打樟东和冠陇两个据点。计划攻破据点后，再联合攻打澄海县城。起义武装将上述据点围困近一个月。5月中旬，由于国民党右派从汕头派来援兵，形势对起义农民极端不利，遂停止围攻据点，及由刘锡三等率领100多名武装，转移到青岚山地区坚持斗争。到11月，澄海县中共党员发展到170多人，建立了24个农村党的支部，农会会员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海陆丰第一次起义

1927年4月26日，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屠杀，在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广东东江地区的海丰、陆丰、惠阳和紫金等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影响较大的地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右派势力也开始对革命力量实行大屠杀，东江地区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中共东江地区党的组织为了挽救革命，在汕头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共东江特委，由张善铭任书记，并决定在东江地区组织武装起义。4月21日晚，中共党的负责人派刘琴西秘密到紫金县同当地中共党人和进步分子刘乃宏、钟灵、钟子廉、钟乐善、傅森霖、缪冠、戴耀田等，研究组织起义问题。刘乃宏系国民党左派、国民党紫金县县党部书记，掌握着30多人的武装。刘乃宏以设在谭公祠内的县党部为起义指挥部，并派戴锡琪、陈运业、钟敬祖等分别深入群众，联络农民武装，配合武装起义。25日，国民党右派对起义有所觉察，紫金县县长郭民发派人到处搜捕刘琴西。刘等果断决定，将原计划于4月30日晚在海丰、陆丰、紫金3县同时起义的时间提前于26日深夜在紫金举行。是日深夜，各路农民武装1000多人，突然包围紫金县城，配合城内的刘琴西、刘乃宏率领的起义队伍顺利地缴了国民党右派掌握的军警全部武器，逮捕了县长郭民发等10多人，释放了被监禁的无辜群众。在海丰，以吴振民为起义总指挥，率起义群众于4月30日黎明进攻县城，收缴了国民党右派掌握的游击队及第1警察署的枪械，汕尾盐警队100多人也被缴械。同日，陆丰开始起义，县长李秀藩参加了起义，收缴了右派武装的枪械；与此同时，惠阳县革命武装在平山举行起义；五华、普林等地的群众也先后举行起义。东江地区第1次农民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5月1日，海丰、陆丰、紫金3县同时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各自成立了县人民政府。紫金县人民政府以刘琴西、戴耀田、钟乐善、陈鹤九等9人为政府委员。刘琴西、戴耀田兼任县工农革命指挥部正副指挥；海丰县人民政府由刘沛霖、陈舜仪、杨其删、刘志云等人组成；陆丰县人民政府由张威、林铁史、庄梦祥等人组成。3县还分别发表声讨蒋介石的文告。

东江地区第1次农民武装起义，使国民党右派十分惊慌，他们集中3个团的兵力配合当地民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部队与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了保存实力，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由刘琴西、林道文、张佐忠等率领海丰、陆丰、紫金、惠阳高谭区的起义军，转移到海、陆、惠、紫四县交界的中洞，整编为海陆惠紫工农救国军，刘琴西、林道文分任正副指挥，“七一五”汪精卫反共后，又改称工农讨逆军。

修水四月起义

1927年4月，中共江西修水县党组织在该县发动和领导农民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早在大革命时期，修水县的农民运动就开展得比较活跃。从1924年起，修水县各地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就日益频繁。1926年7月，中共修水支部干事会成立后，在修水县的西隐、仁乡、西乡、崇乡等地陆续建立了一批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并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骨干。是年9月，已建立了全县统一的农运组织。至1927年春，全县共建立了区农会10个，乡农会41个，有农会会员9000余人，为修水县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打下一个良好的组织基础。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江西各地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当地的地主恶霸封建势力相勾结，竭力反对和镇压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运动，激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极大愤慨。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中共修水党组织利用农民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因势利导，组织发动农民群众伺机举行起义。是月，修水县西隐乡农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瑞仁领导农会会员和农民群众，举行声讨当地恶霸地主的示威活动。不幸，陈瑞仁惨遭豪绅地主杀害。西隐乡的农民群众以极大的愤慨，纷纷组织起来，举行起义，将恶霸地主陈醉六和3名杀害陈瑞仁的凶手捉拿处死，并没收其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

在西隐农民起义取得胜利的影响和鼓舞下，修水县其他各地的农民群众纷纷举行起义。下衫、大桥、中段、黄龙、卢源等地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员朱积垣、樊弟安、樊仁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打土豪、除劣绅的斗争，没收恶霸地主财产，烧毁契约和债据，收缴枪支弹药。

修水四月起义，使全县从幕阜山麓到修江两岸燃起了熊熊的革命武装起义烈火，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地主恶霸反动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揭开了修水农民革命武装起义的序幕。

崇义五一起义

1927年5月1日，江西崇义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右派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横征暴敛，在中国共产党崇义支部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

崇义县，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山区，在长期的反动统治下，大批农民穷困破产，生活无着，阶级矛盾十分尖锐。1926年，中共崇义支部成立后，立即领导崇义人民开始新的斗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浙、两广被国民党右派势力控制。盛产纸张、木材的崇义，纸张、木材无法运出，粮食难以运进，人民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兼之当时崇义县县长蔡舒又决定恢复征收“石灰捐”，更加激起了人民的不满。4月底，中共崇义县党支部决定，通过纪念国际五一劳动节，组织工人、农民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右派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横征暴敛。

5月1日上午，崇义县四乡的农民和城里的工人约5000余人冲破国民党右派当局的戒严令，从四面八方来到县城大会会场，听取中共崇义县党支部书记陈赞雍以及邓子恢等关于声讨蒋介石的反共罪行和揭露蔡舒横征暴敛的罪行的讲话。与会群众随即在陈、邓的率领下向县政府进发，夺取县政府警卫人员的枪支，逮捕了县长蔡舒。2日，成立了崇义县行政委员会，陈赞雍为主任委员；同时宣布“二五减租”，取消苛捐杂税，并用缴获的枪支建立了工人纠察队。14日，国民党右派军准备前往镇压时，崇义县的反动分子与土匪胡凤章相互勾结，乘机袭占了县城，崇义县人民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崇义五一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以后湘赣边革命根据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饶平五月起义

1927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饶平县党组织领导发动农民武装在该县城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4月下旬，中共饶平县党组织在上饶新丰的丁坑村召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骨干会议，传达中共广东区委和潮梅地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右派屠杀政策的紧急指示，研究起义计划。丁坑村会议后，各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迅速行动起来，宣传发动群众，筹集和赶制武器，很快在上饶和饶平地区组织起一支近千人的农民武装队伍。群众热情高涨，反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屠杀政策的意愿和要求愈来愈强烈，起义条件基本成熟。5月5日凌晨，在中共饶平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上饶区农军七八百人和上饶城郊区、浮山区农军及农会会员1000多人，举行攻打饶平县城的武装起义。由于农军齐心协力，勇猛冲杀，很快攻占了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押群众，人民拍手称快。为保存实力，继续坚持同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当天下午，农军主动撤离饶平县城，分散隐蔽活动。

梅县五一二起义

1927年5月12日，广东梅县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屠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起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也向共产党发动进攻。“肃清共产党”、“解散赤色工会”、“拥护蒋委员长”等标语到处可见。对此，中共梅县党组织和团组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群众贴出和散发了“拥护孙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标语、传单，举行游行示威；同时决定组织工人进行武装起义，建立人民政府。为了加强领导，统一行动，党团组织联合组成了武装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中共梅县县委书记刘飘零为书记，团地委书记陈启昌为武装组织部长，地委组织部长任宣传部长。在“斗委”领导下，成立了以工人、学生为骨干130多人的武装大队，准备5月1日举行武装起义。

此时，中共广东区委计划要东江起义的主力 and 驻五华部队中的古怀营（古系中共党员、营长）进行配合，故推迟行动。后因种种原因，计划无法实施。“斗委”决定以梅县自身的工农武装力量为主，于5月12日举行起义。由城内的工人武装夺取县政府，畚江、松口、丙村、西阳等墟镇的工农武装各夺取当地警察所的武装。兴宁、五华等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行动，配合梅县起义。

是日，工人武装大队由梅县总工会出发，以各种形式伪装，分散隐蔽在县政府、警察局、保安队附近。5时，趁上述单位的人员开饭之机，武装大队的队员们突然夺下哨兵的枪支，冲进饭厅并投了几枚土制手榴弹，顺利地占领了县政府、警察局和保安队队部，缴获长短枪200多支。

当天晚上，畚江、松口、丙村、西阳等地的工农武装也同时起义，占领了团保局。第2天，在梅县东校场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梅县历史上第1个人民政府的诞生。

五一二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右派。17日，驻惠州的胡谦部宋世科团进抵五华，准备进攻梅县。为保存实力，“斗委”决定主动将政府和工农武装转移到梅北的石扇地区。右派部队重新占领梅县后，立即逮捕了尚未撤退的工人、学生五六百人。为营救被捕人员，工农武装于当天晚上分两路攻入城内。19日，再度向梅北山区撤退。

平阳农民起义

1927年5月18日，浙江平阳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摧残，举行了武装起义。

平阳县是浙江南部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较早的县份之一。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平阳地区的农民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1926年冬，中共中央派共产党员谢文锦到温州开展工作。谢在宣传组织群众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温州独立支部，领导平阳、永嘉、瑞安、乐清、青田等浙南地区的斗争。1927年春，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鼓舞下，浙南地区广大农民纷纷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与恶霸地主开展斗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南的农民运动遭到严重的摧残。在这种形势下，平阳农民举行起义。

5月18日晚，平阳宜山、白沙和钱库等地的农民群众300多人，分别在中共党员张培农、吴信植、林珍、叶挺鹏等组织领导下，隐藏刀矛、小火炮等武器，化装分路潜入平阳县城内，准备攻打警察局，占领平阳县城。不料被警察当局事先发觉，农民武装只得仓促起事。在警察局的强攻下，农民起义军且战且退，突围出城后分散回到了各地。

豫东起义

1927年5月25日，为迎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河南杞县为中心的豫东农民，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

国共合作的北伐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豫东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1926年9月，从广州毛泽东主持的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共产党员吴芝圃，接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更加积极地领导豫东农民运动和团结豫东群众组织红枪会。1927年3月，吴芝圃等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河南各地都要成立农民自卫军，发展武装力量，积极举行武装起义，响应北伐战争的重要指示。会后，吴芝圃等在杞县何寨村召开杞县、睢县、通许、陈留、太康等县的农民代表会议，从组织上统一了对农民武装的领导，宣布成立豫东农民自卫军，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是年初夏，北伐军到达河南漯河镇，吴佩孚率领的军阀部队集结于京汉铁路沿线进行阻击，造成豫东军阀势力的空虚，为起义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中共杞县县委决定，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组建河南革命军别动队第2纵队，积极扩大农民武装，准备夺取县城；5月初，原中共杞县特支书记张海峰等联合豫东一带的红枪会首领，商定共同响应北伐战争，支援豫东农民起义计划。

25日，全国农民协会委员、省农民协会主席肖仁鹄代表中共河南省委、军委，吴芝圃代表豫东农民武装组织，在何寨村联合宣布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武装包括杞县、睢县、通许和陈留等县的部分红枪会的成员共万余人。在肖仁鹄、吴芝圃、孔寅初等人的统一指挥下，向杞县县城进发。26日凌晨占领县城。随后建立了县农民革命政权，吴芝圃任县长，并邀请当地部分进步人士协商组成临时治安委员会，负责维持社会秩序，镇压反动分子，废除苛捐杂税，为起义军解决军粮、经费问题。睢县、通许和陈留的农民群众和农民武装，相互配合，在杞县农民起义军的支援下，3座县城相继得到解放，形成了以杞县为中心的豫东农民大起义的革命局面。遗憾的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下，中共河南省委又认为起义是过火行动，影响了国共合作，干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正常进行，强令解散了农民自卫军、农民协会和青年团的组织，有些地方连中共组织也被强令解散，致使豫东农民革命很快被反动势力所镇压。

沅山起义

1927年6月29日，为反对国民党反动军队许克祥部的“清剿”，湖南宁乡县农民自卫军在中国共产党宁乡县委领导下，在沅山举行了起义。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当时电报中以韵代日，“马日”即21日）后，许克祥部向长沙周围各县“清剿”，疯狂镇压革命力量。中共宁乡县委决定将全县的农民自卫军4000余人开进易守难攻的沅山为依托，与许部进行斗争。6月中旬，许部两个营进到宁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革命群众逃到宁乡西部重镇黄材，要求革命武装给予保护。在此形势下，中共宁乡县委书记严若乔、县农民自卫部部长喻东声和农民自卫队总队长谢南岭等率领农民自卫军500余人于29日在黄材宣布起义。接着，举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许克祥的旗帜，开上沅山。

起义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立即派张国威师的陈炳谦团开赴黄材，准备进攻沅山，消灭农民起义军。陈部不知起义军的底细，未敢贸然前进，先实行政治诱降，未成；后实行封锁包围，企图困死起义军。在起义军粮弹十分困难之时，谢南岭求战心切，与中队干部刘君侯等人未经县委同意，擅自带两个中队奔袭黄材，结果偷袭不成，反被迫到沅山山腰，暴露了实力。陈炳谦乃集结兵力向沅山发起猛攻。起义军虽给进攻者以沉重打击，终因弹药不济而失利，被迫撤到安化山区。不久，接连遭到安化、益阳团防武装的联合“围剿”，受到严重损失，被迫向西游击于东坪、烟漆、江南等山区，原定出益阳返宁乡的计划难以实现。就在起义军受到损失，艰苦转战之时，谢南岭等妄想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带起义军300余人接受了国民党湖南省新编独立第5师师长陈汉章的收编，开赴黔阳执行水、旱路押运任务。1928年8月，陈汉章在洪江市解散了收编的部队，谢南岭被押解长沙，受尽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仍坚贞不屈，于是年年底被害于浏阳。

陵水第一次起义

1927年7月11日，海南岛陵水县黎族、汉族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扑而举行了第一次起义。

陵水县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由于长期遭受封建剥削，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加之兵匪为患，广大黎、汉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5年春，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派党员陈贵清回陵水。次年1月，黎族党员黄振士也回到陵水。他们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成立国民党县党部，黄任书记，陈任秘书长。他们通过工人、农民和妇女运动，发展中共党员，到2月底，陵水县成立了第1个共产主义小组。6月23日，借陵水工人集会纪念省港罢工一周年之机，成立县总工会。不久，农民协会、青年团和妇女协会也相继成立。9月，中共党组织办起了陵水县农民训练所，第1批毕业的50多人大多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通过农民协会领导全县农民开展打击地主、奸商偷运粮食、哄抬粮价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后，广东右派势力也开始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反扑。陵水县革命政府及农民训练所撤离县城，在西区坡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并先后争取了七弓、坡村、马岭、花丛等10多个峒主（黎族首领）率领各自的武装加入革命行列。农民很快发展到七八百人，成立了陵水县农民自卫军。5月24日，农民击退了地主武装的进攻，取得了开展武装斗争以来第1次胜利。在胜利的鼓舞下，其它各区农军相继成立，自卫军发展到1000多人，改名为陵水县工农讨逆军。7月，中共陵水县委在坡村成立，黄振士任书记，陈贵清为组织委员，周文朝为宣传委员。县委为贯彻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指示，举行武装起义。7月11日，讨逆军七八百人开始攻打陵水县城。由于装备精良的守军顽抗，农民自卫军受损而暂时撤回。17日，农民自卫军趁守军调防之际，再度进攻县城。18日凌晨突进县城，击毙守军10余人，缴获军用物资一批。农民自卫军无一伤亡。21日，陵水县人民政府成立，欧赤任主席，委员有黄振士、王昭夷、陈贵清、陈来曾、谭玉连、何毅等。这是海南第一个人民政权。26日，国民党右派势力纠集各地民团武装1000余人，向陵水县城反扑，农民自卫军主动撤出县城，到西区、北区开展游击战争。

修水全丰起义

1927年7月23日和8月28日，中共江西修水县党组织发动和领导全丰地区的农民武装先后两次举行了以攻打当地恶霸地主“曹氏三霸”为主要标志的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十分猖狂，江西各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1927年6月6日，修水县国民党地方当局制了血腥的“六七”惨案，各地农民协会先后被解散，一些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农民运动领导人惨遭杀害。7月中旬，为了领导修水人民继续进行斗争，中共修水支部在乌坳北山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县城转入农村，将党的一些骨干分子派往各乡开展工作，将仁乡、西乡两乡的农军统一编成修水县农民自卫军，由共产党员丁长盛任队长，余经邦任党代表，并对仁乡、西乡等地的武装起义作了部署。

乌坳北山会议后，余经邦于7月20日回到西乡，与省委特派员丁健亚一起，在全丰余祠召开各乡农会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各乡农会会员攻打当地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曹氏三霸”。曹江陵、曹庆丰、曹礼成这三个恶霸地主在全丰上、下源各霸一方，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是全县有名的封建堡垒。7月23日，在余经邦的带领下，起义农军手持梭标、鸟铳，扛着自制土炮，杀向曹家。由于曹氏三霸早有准备，雇佣了80多名打手，凭借快枪固守，起义农军久攻不下，余经邦率农军队伍撤出战斗。此后，余经邦召集全丰乡沙坪、白岭、路口等地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会议，总结了一打曹家的教训，决定二打曹家，并分头发动群众铸造武器，整顿农民自卫军。8月28日，丁健亚率西乡、仁乡、崇乡的数千农民自卫军，在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1个营的支援下，兵分三路一举攻克曹家，缴获快枪12支、鸟铳64支、炮2门、马4匹，并将曹家的粮食、财物分发给贫苦农民。

修水除曹起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修水县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当地封建地主恶霸势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积极性，推动了修水县革命起义和武装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4月至7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政策，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7月，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组成了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实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中共中央准备聚集自己能掌握的武装，联合同共产党尚有合作关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现土地革命，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等到九江，与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的共产党员叶挺一起实施这一决策。李立三等到九江后，研究认为张发奎不可能同共产党合作，并开始第二方面军中“清党”。李立三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集中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部队，在南昌独立举行起义，再向广东进军，恢复广东根据地，再行北伐的决策。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同时派周恩来、恽代英到南昌，与李立三、彭湃组成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前委），周恩来任书记，领导这次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等到南昌，前委正式成立。同时，谭平山、刘伯承等也陆续赶到南昌。前委决定由周恩来、恽代英、叶挺负责组织驻南昌部队的起义工作；聂荣臻到马回岭组织第25师的起义工作；谭平山等负责筹备起义后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起义时间定于7月30日晚。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20军，第11军的第24师、第10师，第4军的第25师第73团、第75团，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保安队各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6日起，起义部队相继集中南昌。此时，南昌市区的守军只有第五方面军各部的留守人员及第6军先头部队1个团共3000余人。兵力对比，起义军占绝对优势。就在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共产国际来电要中共中央慎重行事，如无成功把握，则不可起义。中共中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把握，即派张国焘前往南昌向前委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后，前委即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前委委员外，还有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会上张国焘提出起义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能起义。他的主张受到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人的反对。31日晨，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当晚，由于一副营长向敌告密，前委遂决定将起义时间由凌晨4时提前到2时，并立即将作战命令下达到各起义部队。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起义开始。第20军在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的指挥下，先以一部兵力抢占旧藩台衙内附近的制高点鼓楼，掩护其主力从侧后突入守军指挥部，迫使守军缴械投降。第24师在叶挺指挥下，分别向松柏巷天主教堂、贡院、新老营房等处的守军发起突然进攻，全歼各处守军。同时，起义军还分别歼灭了百花洲、吕祖祠、高州巷、牛行车站等处的守军。战斗至拂晓胜利结束。起义军经几小时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大炮数门，子弹70余万发。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大部，在聂荣臻和第73团团团长周士第的率领下，也按预定计划起义，并于次日开到

南昌集中。

8月1日上午，谭平山按前委指示，以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周恩来、贺龙、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叶挺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任命了所属机关各委员会主席、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和保卫处长，并决定组成参谋团，刘伯承为参谋长。2日，中共前委在对起义部队进行初步整编后，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下辖3个军，第20军军长由贺龙兼，党代表廖乾语；第11军军长由叶挺兼，蔡廷锴任副军长，党代表聂荣臻；第9军军长韦杵（未到任），朱德任副军长，党代表朱克靖。全军共2万余人。

南昌起义胜利后，前委按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南下广东，以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3日至5日，起义军相继撤离南昌，沿抚河南进，途中第10师由进贤开往浙江，脱离了起义队伍。25日至9月2日，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先后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阻拦，共歼敌6000余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接着起义军由福建进入广东，其主力于9月23日进占潮安，次日占领汕头。26日，起义军主力以一部留守潮汕，集中6000余人经揭阳向汤坑（今丰顺县）西进，迎击来犯的广东国民党东路军的进攻。30日，起义军主力在白石与广东国民党东路军作战失利，被迫撤退，于10月3日与由汕头撤出的革命委员会在流沙（今普宁）会合。这时，起义军经两个月艰苦转战，消耗和损失严重，不仅无力实现夺取东江地区的计划，就连掩护革委会机关安全进入海陆丰也十分困难。据此，革委会决定疏散领导干部。起义军余部在乌石又遭东路军的截击，伤亡很大，无力再战。第24师1300余人在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投入当地武装斗争。留守三河坝的第25师余部和由潮汕退出的第3师一部共约2000多人，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由于没有就地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而是孤军南下，致使起义军主力在广东遭到失败。但它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梧村垌起义

1927年8月1日，为反击国民党的镇压，中共广东南路特委组织廉江工农革命军300余人发起了梧村垌武装起义。

1927年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廉江县蓬勃开展的农民运动遭到摧残。国民党廉江县长黄质文派兵查抄了中共廉江县支部和县农协会的办公地点迴龙寺，悬赏通缉中共廉江县党组织负责人周永杰、梁安成等，捣毁了县工会、学联合会等组织，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大地。7月上旬，中共广东特派委彭中英到南路，主持成立新的南路特委。新特委分析了南路各方面的情况，决定在廉江组织一起武装起义，并指派特委委员梁文琰到廉江担任起义的军事指挥。中共廉江党支部根据南路特委的指示，在西莲塘村老厅间召开会议，研究起义计划，并将参加起义的军农番号定为“南路讨逆军第2路第1支队”。7月30日晚，县工农革命军300余人按计划集结于梧村垌，召开起义誓师大会，准备攻打县城。不料，农军的行动计划被地主刘仁珊获知，向国民党廉江县长黄质文告密。黄质文立即串通国民党吴川驻军第31团1个连及反动军警共200余人，于8月1日一早，包围了梧村垌。农军在梁文琰的指挥下，沉着应战，英勇还击，毙敌10名，伤敌数十名。激战3小时后，农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留下刘锡寿等11名农军战士掩护，其余撤出战斗。11名农军坚守炮楼到第二天下午5时，完成掩护任务后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8月3日下午8时，撤退到城西大塘村的农军，联合绿林武装蔡乾初部袭击了国民党军一部，并准备攻打县城。不料，农军的行踪又被黄质文获知，调重兵于当日11时包围了大塘村，双方激战至黄昏。在强敌面前，农军突出重围，化整为零，转入隐蔽斗争。梧村垌起义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与高州沙田起义、信宜怀乡起义一起，被革命群众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路人民革命斗争的三把火炬”。

仑圩起义

1927年8月8日，中共广西恩（隆）、奉（议）特别支部书记余少杰和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二路总指挥黄治峰等，在奉议县仑圩乡领导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奉议县仑圩乡（今属田东县），位于桂西中部的右江东岸，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地主豪绅的剥削，农民糠菜半年粮，困苦不堪。1925年，黄治峰等进步青年参加了韦拔群在东兰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回乡后即发动本地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春，中共恩奉特支书记余少杰到仑圩领导革命斗争。3月，经过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校长俞作柏暗助奉议农民步枪100支、子弹50箱，武装了仑圩、甫圩两乡农军。

7月，中共恩奉特支在奉议县花茶村召开农军骨干会议，决定将各县农军编为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军，由韦拔群、黄治峰、余少杰分别任各路军总指挥。8月7日，黄治峰在余少杰的支持下，在花茶村庙堂里召开奉议县第二次农民运动骨干会议，对当时的广西形势作了分析。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趁敌人军事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将奉议仑圩团总黄锦升等反动头目一网打尽。

当晚，农民自卫军的两个连，悄悄地开到仑圩附近。农军分两路，并约定以吹牛角为号，统一行动。

8月8日（农历7月11日），是壮族传统中元节前的最后一个圩日。这天，仑圩街上十分热闹。一些土豪也按惯例前来摆赌摊。上午11点左右，黄锦升、黄静山、黄子贞等3人大摇大摆地来到了赌摊。参赌者、围观者，把赌摊围得水泄不通。农军战士黄嘉章、黄寿、洗老五和李治平等走进了黄锦升所在的赌场和他们一起赌钱。正在这时，牛角号声响了。黄嘉章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黄锦升腰间的驳壳枪，其他4人一齐动手，把黄锦升用绳子捆绑起来。与此同时，自卫军战士也抓住了黄子贞和黄静山。隐蔽在小学校内的农军也冲出来封锁了圩场街口，缴了几个团丁的枪。

仑圩起义旗开得胜，李汉生等率领农军押着黄家三个土豪直奔花茶村庙堂。黄治峰闻讯后，立即开始围攻韦宁屯。土豪黄曹山、黄子亮、黄石狮已闻讯逃跑。农军没收了黄家的财产，全部分给了穷苦农民。

8月9日，黄治峰在甫圩街召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黄锦升。接着，农军勒令黄曹山在10天内交出在曾伯龙处领取的枪支和光洋。然而，诡计多端的黄曹山，一面派人向农军表示愿如期交付枪和钱，一面却勾结驻百色的桂军旅长刘华堂和国民党奉议县长曾伯龙，要他们出兵镇压农军。刘华堂派李天实营和县保安团、民团共数百人直奔花茶村，妄想消灭农军。

8月21日，黄治峰接到报告后，马上动员农军准备迎战敌人。在余少杰、黄治峰指挥下，200多名农民自卫军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就地枪毙了黄子贞、黄静山等土豪。

仑圩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奉议县仑圩、甫圩的反动势力，鼓舞了革命人民，为广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武装起义拉开了序幕。

凤山起义

1927年8月15日，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总指挥韦拔群，根据中共广西恩奉特支的部署，在凤山县举行了一次时间较长的武装起义。

凤山位于广西西北部。1925年，在广西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领导下，东兰、凤山、凌云、百色等县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至1927年春，四县农会会员发展到10余万人，组建县区农军武装万余人。其中农军常备队有3000多人枪。同年7月上中旬，中共恩奉特别支部成立了以余少杰、韦拔群、陈守和、严敏等五人为常委的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右江各地农民暴动和武装斗争。

8月初，国民党第7军3旅5团黄明远营奉命由百色经凌云抢占凤山县城，以策应国民党龚寿仪团和林廷华营从田州、平马、河池、百色围攻东、凤、凌、百各县农军。为此，韦拔群在东兰县兰木召开东、凤、凌、百四县农会农军紧急军事会议，宣布右江第一路农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韦拔群任总指挥，下辖3个团和百色独立大队，并决定了发动凤山暴动的军事计划。8月10日，第3团农军指挥员黄松坚，带领30余人枪，由凤山县盘阳奔袭百色县甲篆圩，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百色县署驻甲篆武装征粮队，毙敌22人，缴枪20多支，拉开了凤山暴动的序幕。

8月15日，韦拔群率领右江第1路农军3000多人枪对凤山县城发起总攻。黄松坚和廖源芳率第3团主力进逼凤山县城，攻占凤山巴里等据点后，黄松坚率部攻占凤山城郊巴旁、巴烈、弄郎等外围据点。廖源芳率部分农军到额里、久架一线与黄明远营的一个连展开激战，毙敌连副以下数人。接着，韦拔群率第1、第3团主力在城郊与国民党黄明远营及凤山县警、团局鏖战18昼夜，迫敌龟缩县城。由于农军缺乏攻城重武器，遂由强攻改为长期围困。这时，其他各部农军在东兰、凤山、河池、南丹、凌云、百色、都安等县边界地区分别展开攻势，攻打土豪团局据点，策应主力作战。9月中旬，国民党一个营经凌云县逻楼、谋爱、平乐增援凤山县城。9月18日，黄大权、黄伯尧率第2团在平乐丢草坳伏击，毙伤敌80多人。

10月1日，桂系军阀黄绍竑委任刘日福、朱为珍为第五师正副师长兼田南“清乡”总办，训令朱为珍督率该师龚寿仪团和第7军直属部队之林廷华营及东兰、凤山、凌云、百色、河池、南丹等县团局数千人从百色、田州、河池三路猛扑东兰、凤山，以解凤山县城之围。局势起了变化，韦拔群命令第一路农军进行分兵阻击。各部农军在凌云平乐、巴轩、牙里，凤山盘阳、赐福、长里、芝山、巴盘，东兰江平、武篆、都邑、长江、兰木等地阻击，屡创敌军。作战10余天后，由于敌强我弱，农军防线先后被敌军突破，农军损失300余人枪，主动转移到地势险要的山区。10月中旬，敌占领东兰县城及武篆等圩镇后，即实行分区“清剿”。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韦拔群将农军总部迁至西山平峒，指示各地农军迅速改变战术抗击敌军，并采取阻击战、夜袭战、地雷战、伏击战等作战形式与敌周旋，灵活机动地歼敌小股武装，保存了农军的有生力量。经过半年的艰苦作战，终于打破了敌人的“清剿”计划。1928年3月12日，韦拔群调东兰农军100余人攻占兰泗团局，击毙曾任东兰县知事的团董韦钟璜，缴枪10多支。是年夏初，韦拔群指挥东兰农军攻占武篆、江平、太平等圩镇，进而围攻东兰县城，东兰农军重新控制了全县大部分圩镇和乡村，凤山起义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次起义的胜利，为后来的百色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宁远起义

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工作下，湖南宁远县农民武装于1927年8月16日在宁远县城举行起义。

1927年6月中旬，在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工作下，国民党第16军独立旅旅长周文和宁远县保安部连长陈光保等，在阳明山召开会议，决定举行起义，攻打宁远县城。并成立农民起义军，唐森任司令，周文、陈光保及贺玉湘、桂馥分任4个团团长。

8月16日，数千农军围攻县城。国民党宁远县县长杨定远、挨户团副主任姜宁率部拼死抵抗，同时派人乘夜出城乞援。农民武装在冷水阻击蓝山团防武装成功后，经过6个昼夜攻坚，最后攻占县城，团丁大部被歼，余部投降，杨定远和姜宁等均被击毙。

接着，农军挥戈北上，9月9日，攻占新田县城。

湖南省当局急向广西乞援。10月4日，桂军旅长罗霖统军直奔宁远县城，在五里桥被陈光保率农军击溃。10月下旬，起义军再次攻占宁远县城后，继又移师北上，攻占零陵县城。11月12日，陈光保部会同农军唐森、贺玉湘部共1万多人枪，围攻蓝山县城未克，遂移师南下，与广东连县绿林邓石喜部会合，攻占嘉禾县城。

1928年初，起义队伍改番号为中国共产党湘南区永属农民自卫军，周文为司令。

周文、陈光保两部分别在阳明山、九嶷山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8月，国民党派重兵“清剿”，陈光保部被包围，农军大部牺牲。陈光保身中两弹，仍坚持战斗，200农军冲出重围，转移到井冈山参加红4军。

周文部于1931年3月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下失败，周本人于1934年4月被捕牺牲。

乌坡南玖民团起义

1927年8月，在广东琼崖定安县第9区中共党员、农会主任陈贵忠的发动下，乌坡、南玖的民团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4月，国民党琼崖当局叛变革命后，中共定安第9区党小组遵照琼崖特委指示精神，以红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积极组织农民武装。8月中旬，党小组长陈贵忠说服家人，典当了祖田，买回1支驳壳枪。于是，定安第9区的农民便以一支驳壳枪起家，拉起了队伍。为了扩大武装队伍，陈贵忠决定争取民团倒戈。首先，他带领农军骨干高日诗、林所存、高日基等人到乌坡地区，对乌坡民团进行策反工作。在陈贵忠等人的启发教育下，乌坡民团班长蔡家秀率领两个班团丁携带17支枪宣布起义，投奔农军。

接着，陈贵忠又前往南玖村找南玖民团班长陈德胜。在他的说服下，陈德胜打死民团团董符开池，率领两个班的团丁，带着21支枪起义，投奔农军。随后，定安第9区的中共党组织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定安9区农民赤卫队，为深入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良好条件。

横岗起义

1927年8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杨永绍组织罗定县700多名农军，在横岗圩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广东省守备军第2团和县民团共500多人向罗定的生江、横岗发起“清剿”，农民运动遭受挫折。300余名农军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活动。5月间，中共广东特委派特派员杨永绍到罗定继续领导农民运动。杨永绍与原罗定农军总大队长李灿英、副大队长李钊春，在四区横岗、松木、大樟根一带，扩大农军队伍，筹集枪支弹药，加紧对农军进行军事训练。尔后，杨永绍于8月中旬带领各区农军到达大樟根元山顶集中，秘密召开农军骨干会议，准备在横岗圩举行起义。8月17日，杨永绍、李灿英、李钊春、张日熙按计划召集各区农军700多人，进行总动员。会后，农军分三路开往横岗圩附近。8月18日拂晓前，各路农军埋伏在横岗圩附近。4时许，各路农军按约定信号向横岗发起进攻。横岗圩内守敌治安会二三十人躲在炮楼内，凭借武器优势居高临下向农军射击。战斗打到上午9时许，农军派人从横岗圩尾一间商店取出煤油，准备放火烧炮楼。但因驻罗定之国民党军韩汉英守备团及陈镜轩民团1000余人从县城赶来横岗，农军趁敌人大部队未到之前从右翼边打边撤，至三家店转移到云致成立苏维埃政府，并在云致、罗平等地，与尾追的敌人激战6昼夜。后化整为零分散进行游击活动，李钊春、杨永绍先后被捕牺牲。

横岗起义，尽管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锻炼了革命武装，为后来的罗定县城起义打下了基础。

闹马圩民团起义

1927年8月，国民党文昌县闹马乡民团，在中共党员冯葵南的策动下，举行了起义。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琼崖当局叛变革命后，中共广东琼崖地委立即组织党员疏散回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7月间，中共党员冯葵南，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闹马乡民团，担任民团团长。他到任之后，秘密在民团中做策反工作，动员穷苦团丁倒戈，投奔共产党闹革命。8月中下旬，在南昌起义的鼓舞下，冯葵南带领20多名团丁宣布起义，成立闹马乡讨逆革命军，冯葵南任指挥兼党代表，黄月池任副指挥。尔后，冯葵南带领起义队伍联合赤卫队攻打潭牛湖炮楼，击毙当地民团团长蔡文轩和两名团丁，俘虏4人，缴枪8支。以后，他们又配合讨逆革命军第5路军攻打蛟塘圩、大致坡圩，没收大批官僚地主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

这次起义，使闹马乡及其周围地区为中共所控制，农民纷纷参加农会，进而组织农军，深入开展武装斗争。

通城秋收起义

在中共湖北通城县委统一组织领导下通城、崇阳两县的农民自卫军于1927年8月20日在通城举行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举成功占领县城，揭开了鄂南秋收起义的帷幕。

在大革命时期，通城县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通城只有地主武装和县反动团防局长刘秀波掌握的保卫团，但县政权掌握在县长王武扬等中共地下党员的手中。8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制定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中共通城县委为贯彻省委暴动计划，成立了以王武扬为主任、汪玉棠、赵世当为副主任，罗荣桓、黄云岸等人为委员的武装暴动委员会。分工汪玉棠、赵世当到农村向党员群众宣传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暴动计划；由罗荣桓、刘继宋等人加速对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整顿，黄云岸率领300余名农协骨干分子，装备200多条枪秘密驻在城外，等待时机；王武扬等人在城里准备粮草、枪械，在县政府内秘密开展思想组织工作，了解敌情。18日，崇阳农民自卫军在队长叶重开（中共党员、原县团防局长）的率领下，为避开崇阳县反动武装的“围剿”转移至通城，与王武扬、汪玉棠、罗荣桓秘密取得了联系。他们根据通城形势，商定了里应外合，智取通城的武装起义方案。8月20日清晨，叶重开身穿团防局长的官服，率领10多名农民自卫军装扮的“团丁”，佯称抓住了通城县的“共党要犯”，要亲自交给团防局“刘秀波团总”。赚开城门后，缴了哨兵的枪，即率部直奔县衙。此时王武扬按预订方案，以“商议要事”为名，邀约刘秀波到县政府开会。王武扬见叶部已到，当即缴了刘秀波及其护兵的枪，刘束手被擒。埋伏在团防局附近的通城农军迅速扑向团防局。与此同时，隐蔽在城外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汪玉棠、赵世当、罗荣桓的率领下迅速拥进县城。两军合一，全歼团防局，缴枪200余支，夺取了县城，武装起义一举成功。当日下午，正式成立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王武扬任总指挥，刘继宋任总参谋长，罗荣桓任书记兼管财务工作。下设两个大队，第1大队长肖力，第2大队长叶重开。并成立了通城县劳农政府，由朱春山任主席。21日成立了通城县农民协会，由汪玉棠任主席。通城武装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急令国民党军第13军陈嘉佑部和通城、崇阳两县反动武装向通城逼进，妄图消灭农民自卫军。中共通城县委鉴于形势紧迫，孤军无援，遂于9月4日由王武扬、罗荣桓、叶重开等率领农民自卫军约5百余人，移师修水。行至通城边境表市镇宿营时，遭到国民党军第13军某部及地主武装的包围袭击，王武扬及大部农军被打散。罗荣桓、叶重开率100余人拼力向东突围，到达修水后，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前身是卢德铭领导的原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备团）师部特务连。9月9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特务连，罗荣桓任党代表。此后，罗荣桓率部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通城秋收起义，是湖北第一个夺取县城，成立革命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农民起义，为鄂南及湖北各地农民起义提供了经验。

果德起义

1927年8月21日，在中共广西恩（隆）奉（仪）特支领导下，右江第3路军及革命群众在果德县城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广西西部的果德县（今属平果县），地势险要，是百色通往南宁的要道。在中共恩奉特支领导下，大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由支部书记余少杰兼右江农民自卫军第3路总指挥，黄书祥任副总指挥。

1927年初秋，当夏粮快要收割之际，国民党果德县县长黄庭玲（又名尧封），多次急电要求广西省政府派兵来果德镇压农民运动，并强迫农民上交军粮。这件事引起了全县农民的极大愤慨，纷纷派代表到感圩找农军领导人黄书祥，要求农军攻打县城，活捉黄庭玲，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

农军领导人黄书祥、李羨唐等，根据群众的要求，分析了国民党果德县的兵力情况，认为果德县城目前只有少量民团防守，力量比较薄弱，攻打县城，举行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们把进攻县城的计划向中共恩奉特支书记、右江农军第3路总指挥余少杰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随后，副总指挥黄书祥通知各区农会和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到感圩塘平村开会，布置和研究暴动方案。大家推选黄书祥为攻城农军总指挥。整个攻城农军编为7个队。

8月20日晚，黄书祥指挥各队农民自卫军（含思林县农军）共3000余人，向果德县城进发。出发前，他们派人封锁了交通要道，以防土豪劣绅进城报信。同时，切断果德通往隆安、武鸣的电话线，以免敌人闻讯增援，21日凌晨4点左右，各路农军陆续抵达果德县城城郊，控制了各个制高点，做好攻城准备。总攻前，负责指挥进攻敌县政府的第一队队长，组织10多名队员去摸哨，由于天黑路滑，有一位农军队员跌倒，发出了响声，惊动了敌人。敌哨兵听到响声就大声狂叫，炮楼里的敌人立即关上大门，并向农军开枪。农军战士马上组织还击。枪声把国民党县长黄庭玲惊醒，他马上率领县警凭着城高武器好的有利条件进行顽抗。双方激战数小时。到了中午，参战的群众越来越多，达数千人。由于武器质量较差，一时难以拿下敌炮楼。于是，黄书祥即组织农军向城里发动政治攻势。没料到，下午5时左右，黄庭玲见势不妙，派人点燃两堆柴草，趁滚滚浓烟带着部分民团乘混乱之际化装溜到江边，坐船逃往隆安。农军冲进城里，毙伤敌20多名，缴获枪20余支及部分弹药，还打开监狱释放了20多名被关押的群众，销毁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件档案，果德起义取得了胜利。

这次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果德县政府的嚣张气焰。

通山秋收起义

1927年8月30日，中共湖北通山县委和暴动委员会组织领导农民革命军及农民群众数千人在县城举行起义。

1927年8月中旬，中共通山县委为贯彻执行湖北省委《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成立了以夏桂林为主任的暴动委员会，将农民自卫军改称为农民革命军，由夏桂林、叶金波担任正副指挥。农民革命军在夏、叶的指挥下，8月下旬逐步占领了通山县城四周广大农村和一些重要集镇，对县城已形成包围之势。此时，唐生智集团又将驻通山1个营的兵力调走，县城只剩下县警备队及土劣组织的“治安党”百余人。县委和暴动委员会鉴于县城兵力空虚，暴动条件基本具备，决定8月30日起义，夺取县城，建立革命政权。8月30日清晨，在县暴动委员会的组织指挥下，各路农民革命军和农民数千人，手持各种武器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县城。县长何雄飞见县城已被包围，反抗无望，被迫交出政权。上午9时许，农民革命军和数千名群众在夏桂林、叶金波等率领下，占领了县城，拘捕了“治安党”头目，缴获县警备队长短枪30余支，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应广大群众要求，软禁了何雄飞等9名反动官吏。当日下午，农民代表民主推选夏桂林、叶金波、陈兆秀、阚禹平、涂宗夏等5人为工农政府委员会委员。31日，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由夏桂林任委员长，叶金波任副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工农政府随即组成20个小分队，到重点区、乡帮助恢复农协组织，建立基层政权；惩办土豪劣绅百余人；没收大中地主田地分给无田地的农民耕种；发动组织千余名青年农民参加革命军。农民革命军迅速扩建为两个团。同时，集谷千余担，集资数千元，以备战需。9月9日凌晨，工农政府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处决了何雄飞等9名反动官吏后，按中共鄂南特委的部署，由夏桂林率领千余名农民革命军出师咸宁，参加鄂南农民秋收起义。

通山秋收起义成功地夺取县城，消灭了县内的主要反动势力，建立了工农政府，扩大了农民革命军，为鄂南农民秋收起义建立了后方基地。

潮阳攻城起义

1927年8月31日，在中共东江特委委员杨石魂和中共潮阳、普宁两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潮阳、普宁数百农军举行了起义。

毗邻汕头市的潮阳、普宁两县，是国民党军进出汕头的交通要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潮阳、普宁两地农军曾发起大规模武装起义，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镇压，中共党组织和农军转入隐蔽斗争。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挺进东江之后，这一地区的农民群众深受鼓舞，党组织和农军很快恢复活动。东江特委派委员杨石魂来到潮阳，组织潮、普二县的农民武装，攻打潮阳县城，以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攻城之前，杨石魂首先组织潮阳县各乡农军负责人会议，研究攻打国民党潮阳县政府的计划。8月31日，潮阳县农军负责人马英俊、郑鉴光、姚少悟率100多名农军分三路直扑县衙。一路在衙后城墙上放土炮，另两路用土炮击毙两名守卫后，从正门直冲县衙大院。普宁县农军在方家悟、何石率领下，也按时赶到潮阳县城，和潮阳农军并肩作战。国民党潮阳县的官员和县中队见农军势力强大，仓皇出逃。激战中农军击毙国民党警长和汕头专署催粮员各1名，缴枪30多支，子弹、物资一批。同时释放被关押的革命群众100多人。翌日，汕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伍派兵反扑潮普农军，两县农军与敌激战数小时后主动撤出县城。

9月中旬，中共潮阳八区党组织负责人林国际、谢龙金乘攻城胜利之际，率农军惩办地主恶霸，剪断国民党军通往汕头、潮阳、揭阳的电话线，烧毁敌重要交通工具“大成轮”。这些行动为南昌起义军扫清了障碍，保证了南昌起义军顺利通过潮阳县境。

潮安起义

1927年8月底，为接应南昌起义军进驻潮州，中共广东省潮安县委组织数百名农民自卫军和群众，在该县登塘、浮洋、龙湖、庵埠一带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之后，起义军千里转战，向潮汕挺进。中共广东特委根据中央“在广东立即进行广大的暴动”的指示，成立潮汕各地起义的领导机构——汕头市革命委员会，并派林务农到潮安任县委书记。为迎接南昌起义军，县委立即分工许筹和，武装骨干许千英、黄心得到潮安西部地区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乡村，传递南昌起义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作起义准备。8月底，许筹率农民自卫军首先袭击国民党大和区警察署。接着攻打国民党归仁区警察署所在地的登塘圩，俘虏警察4名。在占领登塘4天期间，农民自卫军还到白茫洲村没收了富豪张亚齐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县农民自卫军于9月初转移到登荣区一带韩江沿岸武装斗争。

9月19日，南昌起义军进占大埔三河坝之后，国民党军王峻部撤离潮州，潮安县长王宇等党政要员相继逃离县城。在城内的中共党组织按照县委的部署，立即率领工会、学生骨干占领县城各要点，打开监狱，救出被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组织城乡群众和爱国人士，准备迎接南昌起义军。

9月23日，南昌起义军占领潮州城，第20军第3师设司令部于潮州西湖涵碧楼，宣布成立潮安县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起义军进驻潮州7天中（史称潮州七日红），县委协助南昌起义军开展各项工作，同时部署建立各区政府，恢复工农组织，发展工农武装。为了配合南昌起义军的军事行动，潮安县委又在韩江下游、铁路沿线不断发起武装起义。25日，许筹率县农民自卫军和各村赤卫队攻下洪巷民团。次日，许筹又率农民自卫军攻下国民党徐陇乡公所，拔除了两处民团把守的反动据点，为南昌起义军往返潮汕清除障碍。潮汕铁路沿线各区农民群众也纷纷起义。鹤剿乡赤卫队员80多人，查封龙湖盐厂，缴盐警枪数支，没收一大批食盐。庵埠镇的赤卫队攻占庵警署，缴获步枪11支和军用物资一批。厦里美、乌洋、斗门、仙庭、陈陀曾等村赤卫队联合起来，围埔庄西陇、圻村、厦里美、胶柏卢全村的国民党团和反动头子，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一时间，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无处藏身。在武装斗争中，潮安农民自卫军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0月，正式扩编为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独立第2团，许筹为团长，方方为党代表。下辖长枪队和短枪队。在南昌起义军失利撤离潮汕后，第2团带领群众继续与国民党军作战，几经挫折，最后转入山区进行隐蔽斗争。

潮安起义有力的配合了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的军事行动，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推动了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蛟塘起义

1927年8月，中共广东琼崖文昌县蛟塘区委领导农军和群众数千人，在蛟塘圩举行起义。

蛟塘圩位于文昌县东北部，是中共文昌县党组织最早活动的地区，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都开展得较好。

1927年夏，国民党文昌县当局为了加强对县东北地区的控制，派遣1个连的正规军进驻蛟塘圩，企图镇压当地的农民武装。该连官兵进驻蛟塘圩后，经常四出骚扰群众，抢掠民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中共蛟塘区委书记符溪南决定发动群众，举行起义。区委经过充分的准备，发动了该乡数千名群众协同农军，在8月一个漆黑的夜晚，包围了蛟塘圩，宣布起义。农军手持步枪，群众拿着长矛、大刀、扁担等，呐喊着向蛟塘圩中心冲击。经过一个晚上的战斗，农军和群众终于趁着夜暗秘密接近国民党军据点，破门而入，击毙国民党连长1名，排长2名，士兵10余名。守敌拼命突围，向海口方向溃逃。起义群众清理战场后，捣毁了一部分反动地主的店铺，然后，又用稻草将国民党军据点付之一炬。

这一起义鼓舞了当地农民的革命斗志，使蛟塘地区的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兴宁起义

1927年9月3日，在中共广东兴宁特支的组织领导下，兴宁县湖尾乡等地义勇军100多人在兴宁县城县立中学进步师生的配合下，成功地举行了攻城起义。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兴宁反动当局疯狂地向革命武装进行反扑。他们下令解散农会、工会和其它进步组织，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积极分子。4月中旬，中共梅县部委、团地委在梅县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武装斗争委员会”，决定马上组织工农武装，反击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实行暴动。中共兴宁特支按照这一会议精神，组织黄石乡、小洋乡、墨池乡农军200余人，并联合绿林武装张英部于5月18日一起攻打兴宁县城。此役由于准备仓促，激战一天，攻城不克。1927年9月1日，中共兴宁特支领导人蓝胜青、刘光夏、卢惊涛、曾不凡等，在兴宁福兴区梅子坑胡屋召开干部会议，吸取第一次攻城失败的教训，确定由湖尾乡、小洋乡、大城乡、茅塘乡、黄石乡和乐仙乡等农民义勇队员与城内学生联合行动，攻打兴宁县城。9月2日晚，蓝胜青集合参加攻城武装队伍100多人在梅子坑举行誓师大会。当晚12时，刘光夏、蓝胜青等率领农民义勇队搭云梯一举攻破城门，埋伏在城内的县立中学20多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燃放鞭炮佯作枪声，并高呼“贺叶军来了”！国民党县长及警察署长陈任甫闻声越墙逃命，起义队伍顺利攻占县城。暴动中缴获枪200余支，子弹1000多发，军用物资一批，县政府钢印一枚，筹军饷2000元，开监释放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100多人。攻占县城第二天，国民党县长纠合反动商团100多人进行反扑。为了保存力量，刘光夏等率农军连夜撤退到湖尾乡，并在盘古庵成立了“广东工农讨逆军”第15团（同年11月改为广东工农革命军第12团队），团长刘光夏，党代表蓝胜青。

此次起义，促进了兴宁各区乡武装斗争的发展，建立了工农红军队伍，为尔后建立五兴龙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镇结思林起义

1927年9月5日至7日，广西思林、恩隆、镇结、果德4县农军，在中共恩奉特支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镇结县（今属天等县），位于左右江连接的三角地带，与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接壤。1926年初，镇结县进步青年冯镜、赵维祺、黄雄以及进步人士张太宗等，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在学生和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1927年6月14日，国民党镇结县县长黄首儒在县署奸污了都结乡的两个少女，激起民愤。冯镜、张太宇、赵维祺等即组织镇结师范、县城附近中小学师生及农民自卫队战士和群众上街游行，并带人冲进国民党县署，赶走县长黄首儒。7月，镇结县农运领导人张太宇、冯镜、赵维祺等，在县城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张太宇任主任。黄被赶跑后，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又派郑金言接任镇结县长。郑到职后，于8月5日下令逮捕张太宇、冯镜等人。冯闻讯后带10多名农军转移到养利冯飞龙（1930年3月叛变）处。张太宇由于在农村开展农运来不及转移，在结安乡被捕。张太宇被捕后，其学生黄炎生前往思林，要求右江农军第三路副总指挥黄书祥派部队营救张太宇。当时，“三南总部”（即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领导人余少杰等正在思林指导工作，得悉张太宇被捕，即同农军领导人陈守和、黄永达等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镇结县长郑金言等镇压农民运动，逮捕农会领导人，气焰极为嚣张，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应因势利导，举行起义，同时营救张太宇。9月5日，中共恩奉特支书记、右江农军第3路总指挥余少杰，决定派思林农军总指挥黄永达率领思林、果德农军200多人，在冯镜、黄雄带领的镇结农军配合下，前去攻打国民党镇结县政府。国民党镇结县长郑金言闻讯后，扶持张太宇仓皇逃奔思林（后于9月23日在镇远将张太宇杀害），农军抵达镇结县城时，国民党县警已溃逃，农军随即占领了县城。思林农军总指挥黄永达了解敌人情况后，即决定率思林、恩隆、果德、镇结4县农军300多人返回，于9月7日围攻思林县城。恩林县城位于右江北岸。国民党县政府设于县城西部，大门朝着右江。总攻开始后，北面农军迅速占领了制高点，而后分4路进攻：第一路从第十二桥往城东打攻；第二路占领城中；第三路从上那烧屯控制城西。冲锋号声响起后，农军一起向敌炮台攻击。不久，第四路农军也从城南方向冲杀了过来，把敌县署包围得水泄不通，敌炮台也被打哑了，农军很快攻破了县署大门。由于农军四面包围，又是突然进攻，敌人没路可逃，县长黄懋森及县党部、团务局、教育局、商会的头目黄金丽、黄天元等数十人被活捉，缴枪30余支，光洋400多元，以及印信、文件等。农军占领县城后，桂军头目大为恐慌。次日，急调驻平马镇黄勋营的两个连反扑思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黄永达指挥农军主动撤出思林县城，转移到果德县新圩、感圩一带坚持斗争。

镇结、思林起义，大振农军声威，推动了两县农民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

海陆丰第二、第三次起义

在中共广东省委和海陆丰县委的领导下，继 1927 年 5 月 1 日举行第 1 次武装起义后，海陆丰起义军民在同年 9 月 7 日、10 月底又举行了第 2 次、第 3 次起义，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

海丰县和陆丰县，位于南海之滨，是广州、惠州通向汕头的交通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又是军阀陈炯明的巢穴，官僚和新兴地主众多，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农民深受压迫剥削，阶级斗争非常激烈。1922 年 10 月，彭湃在海陆丰组织农会，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两县有共产党员 4000 余人，有农民自卫军 400 余人枪，还有数以万计的农军。4 月 15 日，广东的国民党当局步蒋介石后尘，在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反革命大屠杀。4 月 20 日，中共海陆丰地委获悉反革命政变消息，随即决定武装起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5 月 1 日凌晨，海丰、陆丰两县同时举行起义，农军包围县、区公署，收缴了保安队和警察的枪支，逮捕反动派。当天上午，海丰、陆丰分别在县城举行庆祝“五一”群众大会，宣告成立县临时人民政府。东江特委将各县农军编为工农讨逆军两个团，由刘琴西、林道文任正、副总指挥。海陆丰地委亦改称为海陆丰县委，以后又成立海陆丰暴动委员会。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在东江组织起义，以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中共海陆丰县委根据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发动群众，扩大农军队伍，筹集枪械弹药，准备再次举行起义。9 月 7 日，海陆丰第 2 次武装起义打响。刘琴西率领工农讨逆军和工农群众，攻占陆丰县大安镇。8 日占领陆丰县城。林道文率领另一支工农讨逆军和工农群众，于 8 日攻下海丰县的青坑圩，接着占领梅陇。驻公平的国民党军一个排，开到黄羌向农军投诚。10 日，农军又攻下汕尾。从 10 日至 15 日，海陆丰起义队伍协同惠阳、紫金两县农军分三路围攻海丰县城，城内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民团，抵挡不住革命军民的攻击，于 16 日晚趁夜暗逃遁，起义队伍占领海丰。17 日，海丰、陆丰两县分别成立工农临时革命政府，区乡政权由农民协会接管。临时革命政府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镇压反革命，扩充革命武装。东江特委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作长期武装斗争，把缴获的重要物资运往山区，在海丰、陆丰、惠阳三县结合部的公平、黄羌、新田、激石溪、高潭、中峒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25 日，驻惠州的国民党军胡谦部派一个团伙同海陆丰保安大队进犯海陆丰县城，起义队伍主动撤出两县城，海陆丰县委迁驻黄羌。接着，东江革命委员会在黄羌成立。9 月 30 日，南昌起义军由于汤坑战斗失利，潮州失守，决定撤出汕头，向海陆丰转移。10 月 2 日，南昌起义军指挥部派员来海陆丰募兵，海陆丰县委迅速动员 700 人应募出发。3 日，南昌起义军指挥部转移到普宁县流沙镇，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领导人员分散转移，部队到海陆丰与农民结合。当天下午，部队在离开流沙不远的多年山遭敌截击，再次受挫。此后，周恩来、叶挺、贺龙、聂荣臻等先后到达陆丰县的甲子、金厢，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掩护下先后渡海去香港。叶挺部第 24 师 1300 多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与郑志云、张威取得联系，于 7 日进入农军根据地激石溪。9 日进入朝面山、中峒。随后按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2 师（简称红 2 师），辖两个团。董朗任师长兼第 4 团团团长，颜昌颐任师党代表兼第 4 团党代表，王备任师参谋长。由海陆丰工农革命军中挑选人员成立第 5 团，刘立道任团长，

张寿征任党代表。10月下旬，中共海陆丰党组织收到省委关于利用军阀矛盾开展暴动的指示，决定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即将来临之际举行第3次武装起义。为适应形势，海丰、陆丰分别建立县委，由东江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特委计划在10月底组织农军全面进攻，红2师第4团配合作战，先夺取区乡，后攻占县城。驻海陆丰的国民党军陈学顺团获悉农军企图，决定先发制人，于10月28日向根据地黄羌发起进攻。农军和红2师部队英勇反击，将敌击退。接着乘胜追击，向海丰的公平、梅陇、汕尾及陆丰的大安等地长驱直进。陈学顺团面对声势浩大的工农武装起义队伍，十分惊慌，于11月1日凌晨向惠阳逃窜，起义队伍当天收复海丰城。5日，收复陆丰县城。海陆丰第3次起义胜利后，11月10日，成立汕尾市苏维埃政府。13日至16日，陆丰县选举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海丰县于11月18日至21日选举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新政权成立后，积极筹集粮款，编练武装，建设后方基地。在红2师的配合下，19日，起义队伍攻克海丰县国民党军和保安队的顽固据点捷胜城。12月中旬，又先后拔除陆丰的碣石、河口两个堡垒。12月27日，一艘英舰窜入汕尾港。起义军立即加强戒备，封锁轮渡，制止舰上人员登岸。英舰见无隙可乘，诡称要载回英籍传教士。汕尾市苏维埃政府把违法的外籍传教士驱逐出境，复函严正警告英舰：“再擅越吾界自由出入本港”，“吾人自有相当对待，莫谓言之不预也！”一扫近代史上统治阶级丧权辱国、屈膝投降的历史陈迹，显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尊严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威力。

黄梅秋收起义

中共湖北黄梅县委在省委特派员指导下，1927年9月8日起，组织领导游击队和农民群众在农村举行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黄梅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中共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为组织秋收农民起义，把蕲（春）黄（梅）广（济）划为鄂东一个起义区，并先后派周为邦、张获伯、熊煜南、梅电夔等人赴黄梅县恢复党的组织，领导组织秋收起义。不久建立了中共黄梅县委，书记张获伯。并将全县划为东区、南区、上西区、下西区、北区、中心区。积极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来，省委鄂东特派员吴致民（铁汉）来到黄梅指导工作，根据中共湖北省委要求，黄梅县委决定：一、进攻县城，扩大影响；二、攻打各镇团防。其时，黄梅县城守军系国民党第33军一部，战斗力不强。吴致民等领导定于9月8日集中全县农民武装攻占县城。由于联系工作没有搞好，有的区没有组织好起义队伍，攻城计划未能实现。鉴于情况发生变化，吴致民等决定转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三杀四抗”（即杀土豪劣绅，杀贪官污吏，杀流氓地痞和抗债、抗捐、抗税、抗租）斗争，组织小规模起义。首先在沙岭岗、中路湾等地，惩办了数名反动劣绅。9月底，攻打10余人的独山团防，缴枪数支。接着由李德芳率领10余人攻打一天门团防，缴枪两支。吴致民率领北区三四百起义农民，攻打反动势力较强的大河铺，处决了大土豪翟太清。这几次起义规模虽小，但都取得了胜利，迅速打开了黄梅北区的斗争局面。

为了进一步扩大斗争，打开黄梅、广济两县交界处的邓家湾，以便两县斗争活动相互策应，遂派周为邦（此时任鄂东军委书记）率领10多人枪前往，反动团防闻讯逃窜，邓家湾不战而克，缴枪10余支。此后，全县农民秋收起义此起彼伏，迫使国民党第33军一部慌忙撤出黄梅。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由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于1927年9月9日，在湘东与赣西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工农武装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发出《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和《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等文件，确定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有计划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秋收时节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机，举行秋收暴动，要求把暴动的重点置于农民运动基础雄厚的湘鄂粤赣四省。

中共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继彭公达之后回到长沙，传达党中央指示，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8月16日，中共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书记。从18日开始，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一致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新军阀屠杀工农的工具，起义不能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而应公开以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有一支军事力量作骨干。应集中党的领导力量和军事力量，在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动起义。经过反复讨论，根据当时在长沙以东湘赣边界保存有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等条件，最后决定首先集中力量，组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宁乡和江西安源七县（镇）的起义，其他地区暂时不组织起义。

根据上述决定，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赶往湘赣边界地区，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全面领导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中共湖南省委同毛泽东商定的起义行动计划：9月9日开始破铁路，11日7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军进攻长沙，夺取省城。

9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旋即又赶赴铜鼓。当时这个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主要有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以及大革命后期建立的平江、浏阳两县工农义勇队。此外，这个地区还有安源工人武装和集中在安源的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农民自卫军；罗荣桓领导的鄂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也到了修水。毛泽东把这个地区的部队收集起来，多次召集各部队和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正式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部队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将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第1军第1师，约5000人，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余贻民任副师长。辖3个团：第1团近2000人，钟文章为团长；第2团1000余人，王新亚为团长；第3团1000余人，苏先骏为团长。起义前夕，余洒度还收编了流落在鄂南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为第4团。

秋收起义的部署是：第1团由修水出发，经渣津、长寿街进攻平江；第2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并同第3团协同攻取浏阳；第3团自铜鼓出发沿东门、达浒一线直逼浏阳，同第2团密切配合，南北夹击，夺取浏阳。毛泽东随第3团行动。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毛泽东在部署了起义的进攻路线后，便赶赴铜鼓指挥起义部队的作战行动。

9月9日，在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震撼全国的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的熊熊烈火，从安源山下烧到浏阳河畔，从幕阜山脉燃遍湘东、赣西的辽阔大地。

起义按预定计划，两支 60 余人的破路队伍分别从黄岳、长株路线出发，拆毁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部分铁路，切断了敌人交通运输的大动脉。

9 月 11 日，工农革命军第 1 师和湘赣边平江、浏阳、醴陵、安源等地的工农群众，在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同时起义。

第一路即第 2 团，于 11 日从安源出发进攻萍乡，因敌人早有准备，两度攻击不克。为了避强击弱，第 2 团挥戈西进，迅速攻克老关，俘敌人一部，缴获部分枪支；12 日下午攻克醴陵县城，击溃守军 1 个营，缴枪 60 余支，处决伪“清乡”大队长，并打开监狱，救出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4 日，国民党军队经株洲向醴陵进攻。第 2 团转向浏阳前进，在浏阳农民的紧密配合下，于 15 日攻占浏阳。后因疏于戒备，遭到由醴陵追来的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人员和枪支损失过半。

第二路即第 1 团，由修水出发，经渣津、龙门，首先向驻平江以东长寿街的反动武装 1 个营进攻。当先头部队同敌人接触时，主力遭到由余洒度收编的邱国轩部的袭击致腹背受敌，损失人员和枪支各 200 余，遂停止进攻，转向第 3 团靠拢。

第三路即第 3 团，由铜鼓出发，于 11 日一举攻克白沙市。12 日在白沙市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当日下午，第 3 团向浏阳东门进发，守敌望风而逃，起义军占领东门市，消灭反动武装一部。14 日，第 3 团遭到达浒反动地方武装的反攻，伤亡较大，即撤至上坪。鉴于三路进攻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于 17 日下达向浏阳文家市撤退的命令。

9 月 19 日，工农革命军第 3 团、第 1 团和第 2 团的少数人员，陆续集中到文家市。当晚前委召开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部队的任务、进军方向问题。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会攻长沙，迅速脱离靠近中心城市、反动力量强大的地区，改向罗霄山脉中段和南段转移，以寻求立足点保存革命力量的正确意见。

9 月 20 日，在文家市召开工农革命军大会。毛泽东根据前委会议精神作了重要讲话。他深刻地指出，目前的革命形势是低潮，敌强我弱，不能同敌人硬拚，我们保存了力量，革命高潮就一定会到来。要寻找个群众基础好的地方，积蓄力量，建立根据地。罗霄山脉中段，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都很好，在那里敌人几万人也无奈我何。只要依靠群众，团结奋斗，聚积力量，待机破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泽东的这番话，在起义部队遭到挫折的紧要关头，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的斗志，指明了胜利的前途。

毛泽东讲完话后，即率领工农革命军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原打算经萍乡去莲花，部队到达上栗市侦知萍乡有敌人重兵守卫，故绕道芦溪。9 月 24 日，部队从芦溪出发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工农革命军当即组织抵抗，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25 日，工农革命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莲花县城，摧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打开监狱，救出 7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9 月 27 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的三湾。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前委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

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建立了民主制度，规定长官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资遣了部队不愿留队的人员，将原来的3个团缩编成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辖第1、第3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全团不到1000人。

工农革命军通过三湾改编，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整顿，特别是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新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进抵宁冈的古城。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要执行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三项任务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团结教育、改造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同袁、王所部建立了联系，送给他们100余支枪，同时把一批伤员留在当地休养。在古城原第3团团团长苏先骏脱离了部队。此后工农革命军由古城南下，于10月中旬到达井冈山西麓湖南酃县的水口。

毛泽东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根据是：他在率领工农革命军转移过程中，通过沿途的调查和考察，逐步了解到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远离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反动统治势力较弱，该区群众基础好，有大革命的影响，还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各有60余支枪的农民自卫军，而且地势优越，有井冈山、九陇山等多处山险，进可攻，退可守，物产比较丰富，有利于建立军事根据地。

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从此，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实际，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相结合的典范。为发展革命军队和创建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鄂南秋收起义

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中共鄂南特委于1927年9月9日凌晨发起了以“中伙铺劫车”为起点,遍及鄂南各县的农民秋收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将咸宁、蒲圻、嘉鱼、通城、崇阳、通山及武昌共7个县划为鄂南起义区。中国共产党在鄂南地区有较强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到1927年8月,鄂南地区有共产党员2200余人,工会会员26256人,农民协会会员达24万之多,工农武装超过万人,拥有长短枪254支。当时省委认为,湖北的农民运动工作“以鄂南为最佳”。

中共湖北省委为组织领导秋收起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制定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提出鄂南的农民起义以蒲圻、咸宁为中心。成立了以吴德峰为书记的中共鄂南特委,负责全区起义的指挥。确定将起义日期定为9月10日,以配合湖南起义。组建了鄂南农民革命军,下辖5路指挥部,由聂鸿钧任总指挥,曹正常任副总指挥。通城、通山、嘉鱼、蒲圻等县都成立了农民革命军。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先后两次赴鄂南检查起义准备工作。

9月8日下午,鄂南特委得悉:当晚有一列从武昌开往长沙的军运火车,途经中伙铺。载有银饷、子弹,押运兵力约1个班。特委委员黄赤光指挥300余农军劫车。9日晨3时许,列车到达蒲圻中伙铺车站,黄赤光率全副武装农军八九人,假借国民党军第13军登车检查。上车后,鸣枪警告押运士兵缴枪,埋伏在铁路两旁的农军听到枪声蜂拥而上,俘获全部押运士兵,缴枪16支,子弹5箱,银元86块,纸币3.4万元。鄂南农民秋收起义从此全面爆发。9日,咸宁集中800余农军,按计划毁铁路,割电线,切断通讯、交通。蒲圻农军及起义群众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县城,因县城驻军增加,将农军分到农村,惩处土豪劣绅,撬铁路,毁电线,使羊楼司至汀泗桥200余公里铁路沿线陷于瘫痪。

12日,蒲圻县2万余暴动农民继续围困县城,使县城驻军不敢出城一步。通山县工农政府派夏桂林率农军千余出师咸宁。吴光浩率领咸通农军300余人,攻克重镇汀泗桥,击毙国民党驻军营长以下官兵20余人,缴枪20余支。嘉鱼农军亦举行起义,占领米埠镇,马桥国民党驻军在农军威慑下投诚。13日,农民革命军对咸宁县城已形成包围之势。与此同时,崇阳、通城、武昌及大冶、阳新、鄂城等县农民群众,纷纷响应而起,惩处土豪劣绅。15日,由刘镇一、曹正常担任正、副指挥,集中咸宁、通山、蒲圻、嘉鱼等县农军9000余人攻打咸宁县城,激战三四小时,未克。刘镇一见内应无动静,又悉国民党援军将到,决定撤退。咸宁县城未克,国民党派兵镇压。16日,攻打咸宁县城之农军退守马桥、柏墩一带,国民党军尾追而至,农军苦战3日,马桥失守,退至柏墩。23日,农军控制的柏墩、汀泗桥、白沙桥接连失陷,被迫撤至通山县境。10月初,国民党军“进剿”通山,各县农军亦遭“围剿”。嘉鱼农军由吕金城、李文卿等率领转入阮家山、大岩山、仙人洞等地坚持斗争。蒲圻部分农军撤至木兰寺山,转入地下斗争。中共通城县委兵运工作失败,咸通农军孤立无援,咸通军事委员会被迫解散。咸宁农军由曹正常率领在咸通边境之大埠山坚持斗争。通山农军组成3路游击队,分别进入沉水山、九宫山、消水山等地坚持游击斗争。

鄂南农民秋收起义,坚持40余日,遍及鄂南全区和鄂东3县,参加起义的农民革命军和农民群众达10万之众,处决土劣七八百人,是中共八七会议

后湖北第一个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虽然在国民党军重兵镇压下未能完全达到预定目的，但是，有力地推动了湖北各地的武装起义，紧密配合了湘赣边区的秋收起义。

文甲秋收起义

中共湖南常德文甲区党支部组织发动暴动队，于1927年9月10日，在文甲区（今长茅岭乡）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原常德地委组织部长张盛荣等联络地下党员80余人，组建了中共常德县委，领导群众进行秋收起义的准备。不久，文甲区地下党支部书记戴修文、区农会委员长徐炳初和二十二乡农会委员长潘振武，秘密联络隐蔽在山中的地下党员和农会骨干，筹划武装起义。经过串联，组建了三四百人的暴动队，潘振武任总指挥。

9月10日凌晨，暴动队在戴修文、徐炳初、潘振武率领下，举行武装起义。首先攻打洛伽寺区公所，击毙团防大队长张仕元，活捉印花局长张国政。随后，打击不法豪绅，没收3户大劣绅的家产分给穷苦农民。暴动队伍迅速扩大到上千人。起义成功后，戴修文等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张国政。会后，为了保存实力，起义队伍分散隐蔽斗争。

常德文甲起义是湘西地区最早发生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震撼了常德县内国民党反动统治，鼓舞了湘西人民的革命斗志。

沔阳秋收起义

为贯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秋收起义的指示和配合鄂南起义，中共鄂中南部特委组织领导沔阳南部农民于1927年9月10日在戴家场举行首次起义。

1927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秋收起义，将全省划分为鄂中等7个起义区，鄂中区指挥中心设在沔阳。随后，省委为便于分片领导，又将鄂中区分为南北两部，其中南部特委管辖沔阳、监利、潜江3县和新堤市，由肖仁鹄任特委书记，并指示鄂中南部特委集中力量于沔西地区，组织农民向监利发展，钳制长江水路交通。据此，中共沔阳县委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改组县委，选举刘金山任书记，下辖东、南、西、北4个区委，分别由姜宗望、刘绍南、胡幼松、陈师负责。新县委成立后，研究了武装暴动计划，要求各区从组织小股游击队入手，三五成群地惩处土豪劣绅，在斗争中恢复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而发动全县总暴动，建立革命政权。9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要求鄂中区于10日发动起义，配合鄂南暴动。鄂中南部特委分析了国民党军在沔阳兵力分散的情况，决定以沔南区委书记刘绍南的家乡戴家场作为首暴地点，拿人称“涂老虎”的大恶霸地主涂老五开刀。9月9日，中共鄂中南部特委从沔阳各区挑选农军骨干数十人组成暴动队。10月，秘密集结于陈家垸，当晚赶至戴家场，在三百多名暴动农民的支援下，包围涂老五住宅，撞开大门，消灭了团丁，涂老五爬楼逃跑时被击伤（后逃至新堤，因伤重毙命）。11日，沔南区委书记在王爷庙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成立以涂位云为委员长的戴家场农民协会。在戴家场暴动的影响下，沔阳各区纷纷举旗响应。9月中旬，邓赤中领导河北农民、渔民在白庙和张家场、排湖一带举行武装暴动，镇压地主、湖霸数人，随后攻打杨树峰、平家台、杨家洲、马口等地，消灭反动团练队。10月，胡幼松领导沔西北农民在坡段场、新沟坝、拖般埠举行暴动，歼灭“西霸天”刘昌骝及其护院武装。10月底至11月初，姜宗望领导沔东区农民在河家场举行暴动，处决湖霸、地主数人，成立农民协会。在此前后，监（利）沔（阳）边界的螺山等地也相继爆发数起不同规模的农民或渔民暴动，均取得胜利。为巩固和扩大秋收起义的胜利成果，中共鄂中南部特委将沔阳、监利秋暴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肖仁鹄任军长，下辖两个师，由邓赤中、熊传藻分任师长。戴家场暴动，揭开了鄂中区秋收起义的序幕，推动了各县武装起义的开展，为后来沔城起义提供了经验。

监利秋收起义

在中共湖北监利县委领导下，剅口地区农民武装于1927年9月10日举行了起义，并以此为起点，武装起义遍及全县。

1927年9月上旬，中共监利临时县委重建，陈步云为书记。为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临时县委对外称“洪湖月刊社”，各级领导干部均用化名。不久，临时县委迁至剅口南河寺。在省委特派员王大全、鄂中南部特委书记肖仁鹄的指导下，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把组织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将全县划分为剅口、白螺、分监、新沟4个起义区，拟定在中秋节前后首先在剅口发动起义，各区紧密配合，创造全县总起义的局面。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剅口武装农民在共产党员王尚武、郭花圃率领下，包围汴河郑家拐大土豪陈宝光住宅，处决了民愤极大的陈氏三兄弟，然后奔袭郭圃汤家竹林和下车湾两地，镇压恶霸地主数人。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群众的勇气和斗志。9月12日，共产党员刘名魁率领的“儿童团”，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夜袭展入口团防，驱逐反动团防数十人，火烧团防营地，缴获一批枪弹。10月4日夜晚，周何湾渔民数百人在共产党员熊传藻、刘崇龙、李铁青率领下，分乘100多只渔船，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渔民起义，连续攻克六屋墩、三屋墩和姚铺，公审处决“湖大王”等劣绅湖霸。一夜之间，转战百里，横扫洪湖沿岸反动势力。

参加监利秋收起义群众达万人之多，在起义中诞生了几支农民武装，其中由王尚武、郭花圃领导的监利游击队发展到50余人枪。这些武装后被鄂中南部特委编入工农革命军第4军（1928年1月改称第5军）。

鄂北秋收起义

中共鄂北特委于1927年9月上旬起，相继组织领导了枣阳、襄阳、随县的农民武装举行了一系列的起义，史称鄂北秋收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将枣阳、襄阳、随县等15个县划为鄂北起义区。8月中旬，中共鄂北特委成立后，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鄂北秋收暴动计划》及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做了一系列的起义准备工作。9月初，中共枣阳县委根据鄂北特委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以程克绳为书记的军事委员会。9月上旬，举行了以枣西为起点的枣阳农民武装起义，攻占了兴隆区署及团防局，缴枪10余支。接着枣南、枣北相继起义，接连获胜。襄阳县委组织东部地区农民武装参加枣阳起义后，3次组织万余人游行示威，并成立了6支游击队。中共随县县委成立工农自卫军随县独立大队和青苔、祝林农民自卫大队等武装，因敌情变化未能于9月20日按时起义。10月6日，随县祝林地区农民自卫队和农民群众千余人起义，毙伤团防局团总刘炳山以下60余人，俘虏警察分局局长吴竹如以下百余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竹林地区革命委员会。

此时，鄂北特委鉴于部分地区秋收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决定组成3县暴动总指挥部，发动以枣阳为中心，联合襄阳、随县农民武装，攻取枣阳县城的大暴动。10月12日晚，张抱朴率枣北农民武装袭击驻双河镇国民党1个团，击毙官兵11人，缴枪3支。该团撤往县城途中，在清凉寺又被省农协特派员王省率众截击，死伤官兵10余人。枣东农民武装亦杀了建国军官兵5人，缴无线电机1架。东南两乡和随县北乡集合三四万农民，手持各种武器，很快把县城包围起来，后因该县“建国军”陆续回防县城，加之枣西农民武装未到，围城的农民武装撤回各地开展打土豪的斗争。15日，随县青苔地区农军千余人，从枣阳返回途中，主动出击，一举攻克太山庙、青苔等地，歼灭“建国军”及团防武装一部。25日，成立青苔区革命委员会。12月中旬，中共随县县委领导独立大队及吴山地区农民武装举行起义，一举攻占吴山镇，团防武装全部缴枪投降。随后成立了吴山镇革命委员会。

鄂北地区以枣阳为中心的随县、襄阳联合大起义虽未达到夺取县城的目的，但对当地国民党驻军及反动势力是个打击，参加起义的农民武装回到各地后，积极开展了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的斗争，农民武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

高陂九月起义

1927年9月11日，在中共广东大埔县委的领导下，大埔县高陂爆发了一次有500多人参加的武装起义，史称八月起义。

1925年夏收间，中共大埔党支部在高陂建立。尔后，高陂地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民协会和窑业、蓬船、店员等工会，并组织了赤卫队。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月1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高陂工人、农民、市民、学生纷纷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8月中旬，为了迎接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暴动委员会再次筹划高陂暴动。大埔县部成立了暴动委员会，黄炎为主席，张土生等为委员。这次事先争取了国民党大埔县党部执委徐鹿琴（左派，住高陂）、高陂国民党区长徐加杰（左派）和徐守琴（左派）的支持，布置了内应。8月16日，桃源、澄坑、桃花、古野、三洲、三洲坑、平原等地的赤卫队在暴动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包围了高陂镇。由于有内线接应，未响一枪便占据了国民党高陂区党部和高陂国民党区署。俘获了国民党区长苏宝珊，处决了一批反动分子。接着成立了高陂区革命委员会，黄炎任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沙蒂任组织部长，张土生任宣传部长。但因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向起义农军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暴动队伍主动撤出了高陂，并返回各乡隐蔽进行地下武装斗争。

这次起义，牵制了国民党军围堵我南下的南昌起义军的兵力，锻炼了大埔县的工农武装，打击了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气焰，为大埔后来继续开展武装起义积累了斗争经验。

江美坪起义

1927年9月11日，在中共广宁县委的领导下，广宁县农民自卫军100多人在江美坪举行了武装起义。

广宁县是广东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1924年10月，广宁县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同时组建了县农民自卫军。县农民协会先后发出7次减租宣言，开展大规模的减租运动。地主劣绅为对抗减租运动，组织“业主维持会”和“保产大会”，组织民团武装，攻打农会。县农民协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挥农军反击民团的进攻。广东革命政府也派出大元帅铁甲车队和卫士队的各一连，前往广宁支援农军战斗，攻克了谭布、螺岗地主的炮楼，打击了民团的嚣张气焰。减租斗争一直坚持到1927年春。4月16日，广宁县国民党反动派在县长宁一白指挥下，以驻于四会的第5军周定宽团为主力，溯绥江而上，企图一举扑灭广宁革命力量。当天下午，他们分别突入第13区、第14区农会会所，收缴这两个区的农民自卫军武装。下午，中共广宁县委和县农民协会在白庙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避敌锋芒，保存力量。在县农军模范队20余人掩护下，县委机关和县农协人员撤离白庙，转移到江美乡水古坑，把农军武装组成小股部队，分散在荷木嘴、螺岗和第24区、第25区一带隐蔽开展武装斗争。中共广宁县委搬到水古坑后，驻扎于江美东祠的民团江拔湖部，严密监视着水古坑，曾派出两名奸细前往侦察，被农军识破捉获处决。基于这种情况，县委决定消灭驻于江美东祠的这股民团。8月间，县委派出农军骨干陈二奴、欧蛟等人，到各乡村联络，集结农军武装，准备起义。9月11日夜，农军100多人直抵江美坪，战斗在村边打响，农军十分英勇，战斗至深夜，把江拔湖部民团压缩回它的老巢——东祠。民团躲藏在坚固的房屋内，凭借四周厚实的围墙，进行顽抗。农军缺乏攻坚器械和炸药，虽奋力攻击，仍没能突破。后来，便用木制浪槌，冲击围墙，以期打开缺口，亦未能奏效。正当农军设法攻破东祠之际，忽然接到国民党当局调集武装，前来江美救援的情报。基于这一变化，为了保存实力，农军主动撤出战斗，转到上林一带山区，继续活动。县委机关也转到绥江下游的圩仔角。

醴陵秋收起义

1927年9月11日，中共湖南醴陵县委为配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组织醴陵东南西北四乡群众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9月初，中共醴陵县委机关从安源迁回醴陵县城，积极准备秋收起义，很快就有13个区恢复了中共党组织和工农武装。9月11日晚上，在醴陵县委的统一组织部署下，全县东、南、西、北四乡农民同时举行起义，捕杀土豪劣绅，攻打清乡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罗启厚、田礼成等率领暴动队在西乡镇压了豪绅唐步周、廖清玉等；张子意、旷家喜等率领暴动队在北二区捕杀了大恶霸刘先岩父子及张岳钦、陈南阶等；东二区暴动队围困了反动驻军罗定1个排；南三区暴动队杀了丁宴池、刘克山等土豪劣绅；南二区嘉树乡暴动队惩办了刘荣全、黄文岑等反动地主。此外还镇压了三星里乡血债累累的大土豪易萃轩和贺家桥劣绅贺勋臣。9月12日，各路暴动群众向县城进发，并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会合，攻占醴陵县城。随即成立醴陵县最早的革命政权——中国革命委员会醴陵分会，恢复了工会、农会、商会等革命群众团体。

9月14日，国民党湖南军阀调集重兵向醴陵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撤出县城，向浏阳进军，各路暴动队伍也随即撤出县城回乡，继续坚持斗争。醴陵秋收起义，为后来开展更大规模的年关暴动创造了条件。

长沙近郊秋收起义

1927年9月11日，为策应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攻长沙，中共长沙郊区区委书记滕代远等组织领导长沙郊区河西、河东农民武装，在长沙近郊举行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长沙郊区区委组织党员和农民自卫军成立复仇大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长沙河西地区农民运动领导人叶魁，收拢原农民纠察队主要成员，成立了30余人的复仇大队，并任大队长。不久，叶魁率部打着“清乡”的旗号，加入到国民党湘军军阀阎仲儒部，叶魁任营长。8月，中共湖南省委派余西迈到叶魁部指导武装暴动工作。叶魁、余西迈的行动引起了阎仲儒的注意，遂令叶魁部调防，企图在调防途中将其缴械。叶魁识破其阴谋，将计就计，于9月11日当部队行至长沙城外张公岭时，立即宣布武装起义，将随部督队的邹名霖处决。然后，偷渡湘江，袭击靳江河厘金局，缴获一批枪支和银元。接着，袭击国民党麓山镇团防局，击毙团兵数名。16日，又袭击三义厘金局和河西镇团防局。起义胜利后，复仇大队改称工农革命军长沙独立第1团，叶魁任团长，张义任副团长，下设3个营。

长沙近郊秋收起义，是全省秋收起义中较有影响的一次起义，它在长沙城郊坚持斗争两年多，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地方势力，配合了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

株洲秋收起义

中共株洲区委为配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组织领导株洲地区工农武装于1927年9月12日在株洲镇（今株洲市）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在赴安源召开军事会议途经株洲时，亲自召集株洲区委陈永清、朱少连等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精神，部署株洲暴动。9月初，毛泽东派安源市委委员涂正楚到株洲区委任军事委员，负责暴动指挥工作。

9月10日，中共株洲区委为了策应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2团攻打醴陵会攻长沙的行动，组织了300余人的工农武装，首先切断了株萍、株长铁路沿线的电线，烧毁了白关铺铁路桥，在易家湾、大托铺、猴子石等处拆除一部分铁轨螺丝。12日凌晨，暴动队伍分两路在株洲正式举行武装起义。一路由朱少连、涂正楚率领，攻打团防局，缴枪12支，将团防局守敌赶往河西；一路由区委书记陈永清率领，攻占了株洲火车站。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闻株洲、醴陵发生武装暴动，于13日急调一营兵力乘火车赶往株洲镇压，而工农革命军第2团攻下醴陵后，误闻株洲方向有敌人2个团来攻醴陵，遂放弃攻打株洲会攻长沙计划，改攻浏阳，致使株洲秋收起义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株洲区委只得将暴动武装分散到乡村坚持斗争。

文教圩起义

1927年9月12日，中共广东琼崖文昌县委领导县讨逆革命军和文教圩周围地区的农军及革命群众，在文教圩举行武装起义。

文昌县文教区，是革命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琼崖特委委员许侠夫曾在这一带建立党、团组织及农民协会。琼崖“四·二二”反革命事变，激起文教区各界群众极大愤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农民毁桥断路，抗议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文教地区的革命运动引起了国民党文昌县当局的恐慌，县长邢森洲专门成立了东路联防队，专驻他的家乡文教圩，图谋镇压这一带的革命力量。为了消灭这股反动势力，中共文昌县委决定建立起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装——革命讨逆军，以这支武装为骨干，在文教地区举行武装起义。1927年9月12日，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兼文昌县委书记许侠夫和讨逆革命军指挥谭明新带领讨逆革命军100多人，在周围地区的农军和革命群众数千人的配合下，把文教圩团团围住。被国民党遣返回文昌老家的原国民党儋县县长邢治局（中共党员）闻讯也赶来文教参加起义。战斗从早上持续到中午11点多钟。国民党文昌县长邢森洲率县兵连前来救援，被起义队伍击溃。被围困的国民党东路联队躲在符氏祠堂里，依仗着精良的装备进行顽抗。讨逆革命军战士身披浸湿的棉被做掩护，进行强攻。由于起义队伍装备差，久攻未克。在战斗中讨逆革命军连长翁世三和两名战士中弹牺牲，起义队伍只得撤出战斗。愤怒的群众直奔邢森洲家，查封了他的家产。

文教起义显示了农民群众的威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该地区的革命运动得以深入开展。

领村起义

1927年9月13日，广东高要县农民自卫军和群众共1000余人，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指导下，集结领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6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高要事变。30多名共产党员遭逮捕或被杀害，中共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县农协会秘书许其忠和中共广东区委派来的西江领导人黄学增、军事干部何遂等人，遵照中共广东区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指示精神，在禄步召集干部和农军骨干开会研究，决定重新组建农民自卫军，伍耀辉任大队长，聂文波、谢忠任副大队长，总部设在地势险要的领村。农民自卫军重新成立后，曾于7月中旬主动出击伍村反动民团，取得胜利。9月上旬，300多名农民自卫军和数百名农协会会员在领村集结，由黄学增传达广东关于武装暴动的指示和准备在领村举行起义的计划。国民党驻肇庆守备部队闻讯，派出一个营400多人的兵力纠合高要、广宁、德庆三县联防民团共数千人，围攻领村。1000多名起义军民依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护村河、护村墙，以及13座护村炮楼等有利地形，反击敌人的围攻。黄学增、何遂和农民自卫军领导一起指挥。一中队从正面炮楼反击敌人；二中队各守余下的三面；三中队作预备队；后勤队作好保障工作。9月13日，起义军毙伤30多名敌兵。14日、15日，农民自卫军多次挫败敌人企图。16日，敌人炮轰领村后，发起总攻，农民自卫军居高临下，顽强抗击。领村农民自卫军同国民党反动武装激战四昼夜，打死打伤敌人70多名。在敌我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农民自卫军最后巧妙突围转移到山区。

这支300多人的农军游击队，在中共高要县委成员许其忠率领下，活动于高要、广宁、四会县一带山区，坚持斗争到1929年底。

瓦仓起义

中共鄂西特委和当阳县委，根据湖北省委发动农民秋收起义的指示，于1927年9月14日，在当阳瓦仓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瓦仓地处当阳、远安、荆门、南漳4县交界处，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薄弱，中共当地组织还控制了1600余人的自卫团。1927年8月下旬，中共鄂西特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鉴于瓦仓的情况，决定在瓦仓首先发动武装起义。9月7日，瓦仓起义指挥部成立，李超然任总指挥，并以瓦仓自卫团为基础，充实党员骨干，组成“瓦仓农民自卫团”。全团200余人，汪效禹为自卫团团团长，傅丹湘、李勋臣为副团长，洪勋为自卫团政治指导员，傅恒之任参谋长，王怀之任总交通兼总后勤。为保证起义的成功，李超然利用与当地驻守的一支川军的指挥官秦汉三、杜伯乾、罗福祥等的私交关系，争取了该部保持中立，还暗地为农民自卫团提供步枪30多支和一批弹药。14日夜，瓦仓起义爆发。汪效禹率领自卫团第3营攻打驻石马槽区团防局，活捉团总汪和延。洪勋、傅恒之率自卫团第1、第2营在农协会会员的配合下，一举捉拿反动官吏和土劣80余人，并将罪大恶极的土劣雷声之等30多人处决。9月15日，李超然宣布成立瓦仓区工农革命政府（不久改称瓦仓区苏维埃政府），傅殿云任政府主席。按照指挥部统一部署，中共观音、九子山等地组织负责人傅子和、罗庆烈等人也领导农民起义，成立了观音五乡联合办事处。远安南乡农民亦响应而起，一个月之内，形成了以瓦仓为中心，连接当阳的观音、九子山、远安的南乡及南漳、荆门相邻地区在内的1500多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瓦仓起义胜利后，当阳反动头目曹静佛、尚信安等于10月中旬，纠合当阳、远安、南漳、荆门等地的反动武装1万多人，对瓦仓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起义部队抵抗失利，转移到杨家山坚守，后又陷入重围。10月24日，部队分散突围，傅丹湘、汪文化、黄冠柏率一部突围到远安南乡；洪勋、汪效禹先后被杀。敌人占领瓦仓后，杀人放火，屠杀共产党员、农民自卫团战士和农协会会员200余人。11月，傅丹湘、汪文化、黄冠柏等在远安南乡集合突围出来的农民自卫团战士100多人，组成工农革命军鄂西挺进大队，由汪文化、黄冠柏任正副大队长，采用游击战术与敌人斗争，队伍发展到400多人。1928年1月，为执行湖北省委关于当阳、宜昌等“七县总暴动”计划，当阳县委准备发动全县年关暴动。因徐永春被捕叛变，机密泄露而遭敌镇压，暴动未成。2月，李超然被叛徒出卖被捕，英勇就义于长板坡。不久，傅丹湘、李时新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又遭敌人杀害。5月，鄂西挺进大队在祠堂岗、涂家寨作战失利，伤亡惨重。黄冠柏率余部突围到荆门、宜昌等地坚持斗争，后发展成为荆（门）当（阳）游击第1大队。

从瓦仓起义到丧失瓦仓红色区域，历时8个月，积累了经验，也有血的教训，在鄂西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近邻地区的武装斗争。

浏阳沙市普迹秋收起义

中共浏阳县委为策应湖南省委关于会攻长沙的秋收起义计划，组织领导该县沙市、普迹两地农民武装于1927年9月14日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中共浏阳县委为执行省委关于会攻长沙的暴动指示，组织发动各区乡农民举行起义。9月14日，浏阳北乡沙市农民武装捣毁了沙市挨户团，然后向长沙方向进发。与此同时，浏阳西乡普迹农民数百人举行起义，攻占了普迹团防局，捣毁了普迹挨户团。接着，亦向长沙进军。但由于长沙地区敌人加强了防范，沙市、普迹两地暴动队伍在中途遭敌堵截，队伍被打散。进攻长沙失败后，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夏明翰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北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组织工农武装，举行起义。10月下旬，浏阳县委组织了一支80多人的起义队伍，在沙市召开起义誓师大会。誓师大会后，各区乡的农民武装迅速武装健全起来，沙市区委成立了东山里游击队，在沙市、永安和长沙县地区开展游击斗争。西乡共产党员黄俊民等将缴获国民党军溃散部队的100多支枪武装浏西游击队后，在浏（阳）长（沙）一带袭扰敌人。东乡共产党员张运鸿策动在高坪团防局当团兵的弟弟张运沂率领几名团兵起义，攻打团防局，后成立了高坪游击队。北乡浏北游击队建立后，处决了反动分子彭义国，罗书长等人。

安流起义

1927年9月14日，广东省五华县农军数百人在中共五华县委领导下，发起了攻打国民党地方武装“资本团”的武装起义。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五华县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并组建起农民武装。到1926年夏，五华县农军即有1千多人的规模。1927年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为反抗国民党的血腥镇压政策，县农军曾与国民党军进行过多次的激烈战斗。1927年5月，五华县农军曾夜袭安流，消灭国民党军500多人。之后不久，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主席李国光，军事部长古大存。8月，中共五华县特别支部改为五华县委会，曾天节为书记。同时，整顿健全革命委员会，改选古大存为主席。由于国民党地方武装残酷镇压农军，中共五华县委决定组织农军攻打国民党地方武装“资本团”。这支反动武装，是由低坑乡团董李寿眉等大地主出钱，纠合五华县警卫基干大队为基本武装组成的，李寿眉为团长。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李寿眉纠合“资本团”，妄图一举消灭五华县农军。同时，李寿眉用重金收买共产党内的叛徒张冠球、张访箕、张采文等，纠合叛徒武装三四百人建立据点，向五华县农军进攻，“扫荡”一个多月。

中共五华县委分析了敌人的情况，决定擒贼先擒王，首先铲除“资本团”头子李寿眉这个祸根。经过认真准备，9月14日，古大存率农军100余人深夜秘密包围了安流对镜窝，一举活捉“资本团”团长李寿眉等5人，押至安流，于16日将其处决。

处决“资本团”团长李寿眉，人心大快。9月21日，古大存和曾天节率领县农民武装和群众1000多人，乘胜向以张采文为首的叛徒武装盘踞的据点罗经坝发起进攻。由于事前对罗经坝的敌情地形了解得不够充分，先头部队到达天柱山，即遭到叛徒武装的阻击。在此情况下，古大存等沉着应战，果断指挥，与敌激战一整天，最后重创敌军，黄昏撤回安流。接着，古大存又率农军在安流、梅林、龙村、棉洋等地铲除“资本团”的残余势力，并与前来“清剿”的国民党军周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使“资本团”最终解体。

在与地主武装“资本团”的斗争中，五华县的农民武装组织进一步扩大，农军随之改称为工农讨逆军五华县大队，10月，正式改称为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7团，古大存为团长。全团武装人员从“四一五”时的600人增加到2000多人，枪600多支。

恩平起义

1927年9月15日，中共广东五邑地委组织恩平县1000多名农军发起了攻打恩平县城的武装起义。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后期，中共广东区党委农民运动委员会通过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和省农民协会派遣香港海员工人梁廉、梁振三、禩荣（即禩全光）等人在恩平县70多个村成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1万多人。1927年4月，广东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驻江门的国民党第13师师长徐景唐四出搜捕共产党人，查封了新会县总工会，江门党组织被迫转移到江门近郊。6月，中共五邑地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通知各地党组织转移到澳门。7月，禩荣在澳门向中共广东区党委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阮啸仙汇报恩平农民运动情况。阮啸仙指示禩荣返回恩平，组织恩平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8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在澳门召开有江门、海丰、陆丰和中山等地党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决定与全国各地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相呼应，加紧组织各地武装起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五邑地方委员会”（简称五邑地委），领导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5个县的工作。五邑地委由叶毓年任书记，王坚淮任宣传部长，李安、李冠南、李本华为委员。五邑地委在江口镇成立新会工农革命军指挥部，派王士杰、王坚淮到恩平协助禩荣组织恩平农民起义。

禩荣、王坚淮、王士烈从澳门回到恩平的塘皋后，在全县组织了1000多人的农军，并确定9月15日起义，攻打恩城，计划兵分3路。第一路为主力，由禩荣和王士烈兼任指挥。14日，各路农军按计划分头集合。东北路军早作准备，由长湾村农军用禾草掩盖着枪支弹药挑到长安村。是日黄昏，东北路农军300余人在塘皋村前集中，由禩荣作战斗动员。接着，农军一举包围了圣堂圩。尖兵排13人在梁茂洪、梁齐乐的带领下，冲到警察所门口，只花了十多分钟，就俘虏敌哨兵、圣堂区长何礼逢及职员3人，缴获步枪15支及弹药一批。

接着，农军向恩城进发。当时驻守城内的是被国民党收编的反动武装胡荣梓、吴汉荣两个中队，共100多人。第一路农军于黎明前抵恩平城附近的狮子石。清晨5时许，海员工人梁栋荣率领农军冲锋队直奔东门。城墙有3丈高，农军无攻城准备，又没有重武器，战斗多时，无法攻破城门。这时第二路军尚在离恩城4公里的公堂，而第三路军人数较多，也未及时赶到。由于无法联络，梁茂洪带领的突击班冲到警察局时，警察局空无一人。农军攻城与敌相持1个多小时，天已大亮，已有8位农军战士相继牺牲。为避免更大损失，农军主动撤出战斗。早已有计划做配合行动的开平县赤坎工农自卫军，也取消了配合行动的计划。

起义失败后，禩荣、王坚淮、王士烈往澳门，向五邑地委书记叶毓年汇报了起义经过。参加起义的农军分散隐蔽。

茶阳起义

1927年9月16日，中共广东大埔县部委为迎接南昌起义军入粤，领导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在大埔县城茶阳举行起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中共大埔县党组织和农会受到破坏。中共潮梅地委派郭瘦真回大埔领导梅埔丰各县，开展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的镇压政策。8月，中共大埔县部委组织了大埔县暴动委员会，发动群众积极筹备枪支，并将埔北太宁农军和埔南桃源农军整编为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9月初，中共广东党组织派赖玉润（赖先声）到汕头组织起义，派罗伯良前往闽西迎接南昌起义军。罗伯良经大埔向县部委饶龙光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的指令。大埔县部委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在发动埔南高陂起义的同时，发起县城茶阳起义，并派郭栋材赴埔北协助饶龙光具体组织指挥。

9月16日，在南昌起义军前锋由永定刚刚进入大埔边陲石下坝时，饶龙光、郭栋材、郭瘦真即与中共附城区委书记饶炳寰率领大埔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第1连及附城各乡农军100余人，从北门和西门两个方向攻入县城，直捣县府，解除了县警队武装，捕获县改组委员谢炬生，国民党县长刘耿超狼狈而逃。攻下茶阳后，正式宣布成立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迅即派江弼群赶赴石下坝向南昌起义军报告胜利消息，沟通联系。

18日下午，南昌起义军前锋在起义农军的引导下进驻县城。次日，起义军前委李立三、彭湃等出席中共大埔县举行的欢迎南昌起义军大会，委任饶龙光为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主席，郭瘦真、郭栋材为副主席，李卓寰为县公安局局长，并赠送步枪150支。为了给南昌起义胜利进军创造条件，中共大埔县委、工农革命政府，发动各区立即起义，摧毁国民党当地政权，建立高陂、石候、埔西、附城等区工农革命政府。同时，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支援南昌起义军。在此期间处决了一批反动分子。

10月4日，南昌起义军第25师于三河坝阻击国民党军钱大均、黄绍竑部，歼敌一部，向饶平撤退。之后，大埔商团军反扑县城，中共大埔县部委及独立第1团第1连指战员被迫撤至太宁，最后转入农村山区。农民自卫军及县委转移到埔南桃源的东瓜坪整训。11月根据广东省委决定，将大埔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整编为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5团。

第15团于1928年上半年，进行了埔西、埔南、埔东等多次战斗，初创了埔东游击区。这个团后来扩编为红军第6军第16师第46团及48团，成为闽粤边的主力部队。

长岭起义

1927年9月17日，在中共广东琼崖定安县委的领导下，聚集在石井园村的农会骨干、农民自卫军和群众歼灭了长岭圩国民党民团，史称长岭起义，亦称石井园起义。

1927年9月上旬，受中共琼崖特委的派遣，从省城回琼崖参加武装斗争的孙成达潜回定安县石井园村，与在那里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共定安县委领导人徐树芳等筹划武装起义。这时，琼山县16区青云乡的农军领导人冯建农等人也在石井园活动，准备攻打长岭圩国民党民团。9月17日晚，孙成达、徐树芳等召集各区乡及琼山县毛立村的中共党员和农会骨干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琼崖特委9月军事会议精神，决定立即举行起义，攻打长岭圩民团。会议推举孙成达、徐树芳、洪卓英、冯建农负责指挥这次行动。当夜，100余人的起义队伍悄悄来到长岭圩民团附近。几名农军战士首先杀死了哨兵，其余起义队员神速地越过围墙，冲进营房，一举俘获了20多名团丁。事后把作恶多端的团丁莫乃秋捕获处决。

起义结束后，孙成达、冯建农等带领农民自卫军携新缴获来的15支枪，连夜赶到琼山县双棍村，编入讨逆革命军，组成琼崖讨逆革命军第6路军，冯建农任司令。

莲花起义

1927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莲花县党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国共合作的北伐革命战争时期，莲花县受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工农运动轰轰烈烈，成立了一支有60支枪的工农自卫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民自卫军由县城退到上西山区打游击。1927年9月，农民自卫军主力离开莲花参加秋收起义，留下24支枪及小部分武装人员在上西山区坚持游击斗争。9月15日，中共莲花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陈竟进等在九都召开部分党员会议，决定加强革命武装，整顿和巩固工会和农会，利用时机偷袭县城，捉拿县城大土豪李成荫。18日下午，中共莲花党组织得知县城兵力空虚，只有李成荫掌握的保安队，有枪10支，决定由陈竟进和贺卓权负责，攻打莲花县城。

18日黄昏后，起义队伍从坊楼出发。晚9时到达田东附近茅仔坪，与南陂、九都等地群众会合，共700余人，分两路进攻县城。晚10时许，从县城北门攻入的农军，发现城内守军情况有变，当即停止进攻。陈竟进等带领起义队伍大部撤出县城，未及撤出的70余人牺牲，90人被捕，撤出县城的农军被敌人冲散。贺卓权率部分农军返回九都途中被捕，惨遭杀害。

天门秋收起义

在中共鄂中北部特委和天门临时县委领导下，天门游击队和东、北、西部农民群众以 1927 年 9 月 18 日天东卢市起义为起点，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1927 年 8 月，中共湖北省委为实现以鄂南为中心的全省秋收暴动计划，指定天门临时县委书记唐方九任鄂中特委负责人，指导该区武装斗争。9 月上旬，省委将鄂中 8 县（市）分为南北两部，派王平章任北部特委书记兼天门临时县委书记，管辖天门、汉川、京山、应城 4 县，并确定特委将工作重点放在天门东乡和汉川杨林一带，从组织农民、收编土匪、改造红枪会和策动驻军起义等方面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共天门临时县委遵照上级指示，首先重视恢复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很快建立芦市、天西两个区委和 10 余个支部，拥有党员 300 余人。同时，重视建立武装组织，组建天门县游击队。9 月上中旬，鄂中特委在芦市彭家垸组建了鄂中区游击大队，其中天门县游击队有 46 余人枪。同时，争取了天门西部土著武装六七十人，天门北部一部红枪会参加革命斗争。中旬，中共鄂中北部特委决定立即发动所属各县农民起义，建立农民政权，尽快与邻近暴动区联成一片。9 月 18 日，中共天门临时县委和芦市区委率先组织农民数百人起义，围攻大地主舒梅卿住宅，惩处胡泰顺、夏永存、何恒茂等土豪劣绅。共产党员邓巨昌、鄢泽孚领导天门西部农民于灰埠头附近起义，在万家新台、王家台公审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随后，县委成员姚普生、吴新武等领导 300 余农军连续攻打戴家台、宋家塔、罗家巷，处决土豪劣绅、团防头子、“清乡”委员 20 余人，收缴反动商团武器数十支。共产党员李国良在李家桥率领 300 余农民群众举行起义，后发展到 1400 余人，处决了土劣戴国保，击溃了岳口镇保卫团，缴枪 4 支，子弹 200 余发。10 月，天门县委成员杨其祥、吴新武、陈适华等人率领各区精干武装夜袭天东重镇净潭，消灭地保、土匪 10 余人，镇压了大恶霸严金官、严伏官等人，基本肃清了净潭周围的反动势力，扩大了武装力量。

天门秋收起义，使天门南部地区逐步成为鄂中北部特委控制的红色区域，和为后来的天（门）汉（川）起义打下了较好基础。

弥陀寺起义

在中共鄂西特委统一组织领导下，公安县人民自卫团和江陵县武装农民于1927年9月19日发动起义，占领江陵西部重镇弥陀寺，史称“弥陀寺暴动”。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公安县委成立。9月上旬，中共鄂西特委在公安召开军事会议，将所属各县划为两片，江南以公安为重点，江北以当阳为重点，分别起义，合取荆（州）沙（市）。11日，鄂西特委召开第二次军事扩大会议，作出以公安县人民自卫团为主力，发动公（安）江（陵）农民起义，首先攻打江陵弥陀寺的决定。为了统一指挥，指定刘植五（江陵县委书记）、胡竹铭（公安县委书记）、覃济川等组成暴动指挥部。中旬，暴动指挥部鉴于起义条件已基本成熟，发出了举行起义的命令。

9月19日，各路起义队伍按命令开始行动。第1区樊学赐部和第2区邹资生部300余人在郑公渡集结，20日顺利占领公安县城。22日，在暴动指挥部的率领下，各路起义大军向弥陀寺进发。23日清晨，各路起义部队在江陵西部数千农民的支援下，分左、中、右3路进攻弥陀寺。该镇反动保商团自料难敌，弃镇逃窜，农军顺利占领该镇。农军进镇后，没收了大地主、大奸商资财近200万元，弥陀寺由江陵县委派人接管，同时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中午，人民自卫团及暴动群众近万人从弥陀寺撤出，返回公安各区，开展打土豪、烧田契、抗租拒债、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下旬，公安县起义部队和澧县农民武装奉令合编，成立鄂西农民革命军，杨荣祥任总司令，下设3个师。10月初，改由刘伯承任总司令（未到职），杨荣祥任副总司令。弥陀寺起义和鄂西农民革命军的成立，震惊湘鄂边境。国民党中央电令湖北、湖南驻军联合镇压。10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发动总攻。樊学赐亲率所部在敌众我寡，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仍顽强阻击。经激战，农军伤亡严重，大部溃散，樊学赐转移湖南，后被缉捕，英勇牺牲。邹资生、杨荣祥两部亦相继遭受重大损失，后在6、7两区坚持斗争。中共公安县委以幸存武装为基础，组建湘鄂川边游击队，覃济川任总司令。22日，游击队在公安、澧县交界的齐家峪因叛徒出卖遭袭击，覃济川、胡竹铭等主要负责人遇害，一部分队员牺牲，一部分队员被俘，少数人突围幸存，史称“齐家峪惨案”。至此，公安县的武装斗争转入低潮。

铁石山起义

1927年9月16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德安县委在该县铁石山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德安，中共组织的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12月中旬，中共德安县委成立，并于1927年1月成立了德安县农民协会，何奎光任主席，辖3个区、26个乡农民协会，会员8500多人。正当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8月7日，国民党德安县当局逮捕了中共德安县委委员杨丕显和共产党员金文涛、陈正田及农协积极分子60余人。9日，杨、金、陈3人被杀害。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8月15日，县委书记杨超和县委委员何奎光、陈太康、郭家彬及永丰党支部书记杨济川等决定用原县农民自卫军的枪支组建一支武装。月底，德安农军成立，由杨济川负责。

9月上旬，中共德安县委杨超、何奎先、郭家彬、甘霖沛、杨济川等根据江西省委的部署，决定集中彭山、山万、丰林及乌石一带农民武装攻打县城。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德安农军及彭山、山万、中正、西源等地农民共4000余人，手持梭标、大刀，分两路直扑县城。守城警卫队见起义农民声势浩大，争先逃命。起义队伍乘机从北门、西门和火车站3个方向拥入县城，包围了县公署。江西军阀朱培德急调1个连的兵力前往镇压，该连刚到德安火车站，即被起义大军包围，败下阵来。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增派重兵驰援，起义队伍为保存实力，主动撤出县城。第二天，起义队伍又在县城东北的后田垄和铁路两侧集中，准备再攻县城，因遭到国民党军重兵阻击，相持3天未寻得战机，遂返回铁石山和各村。

9月16日，劣绅聂锡光、董立恒率领民团和被胁迫的群众近400人，围攻铁石山，妄图消灭农军。农军在杨济川和汪宗周率领下，经一天半时间，打退敌人4次冲锋，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农军的胜利引起敌人的恐慌，以德安县长严泽清为首的土豪劣绅联名向朱培德、金汉鼎求援。中旬末，九江浔湖司令金汉鼎派兵1个营，配合德安警卫大队，大举进攻铁石山农军。杨济川率农军乘夜晚分散秘密突围。突围出来的农军一部进入德安上西乡区石门陈村，另一部进入中正堡山湾土头垄。进入上西乡区的农军，与共产党员杨传柏、黄继美率领的农民武装汇合，继续坚持斗争，并袭击了上西乡王锡筹、季子美的靖卫团。以后，这支农民武装编入了赣北红军游击队。

汉川秋收起义

1927年9月中旬，中共湖北汉川县委组织发动了以榔头暴动为起点的秋收起义。

大革命时期，中共在汉川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到1927年6月以前，便建立了中共汉川县委和13个区委，有党员1000余人，农民协会会员达20余万，还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汉川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1929年9月，重新组建了以程棣华为书记的中共汉川县委。新县委成立后，集中力量整顿、恢复或重建基层党的组织，很快成立了南河、杨西、榔头、分水、马口5个区委，并积极筹建武装，准备起义。9月上旬，中共汉川县委工作基础较好的榔头、庙头、南河渡头和邱子垸等地组成了三五人或一二十人为单位的游击队，昼伏夜动，神出鬼没地惩处乡村土豪劣绅，袭击国民党乡村政权，全县革命形势又出现了好的局面。9月中旬，中共榔头区委，根据县委统一部署，组织暴动队及农民群众举行起义，处决大土豪何远钊、王大定、屈芹堂及爪牙8人，分发浮财，壮大武装，成立了“工农革命军榔头独立团”。接着，邱子垸、庙头、南河渡、杨林、分水等区暴动队及广大农民相继起义，攻打地主护院，收缴团防武装。9月下旬，中共汉川县委将各区暴动队集中，整编为汉川县义勇队（后改称游击队），王恒产、万吉甫任正、副大队长，拥有百余人枪。这支队伍为后来举行的天（门）汉（川）联合起义准备了武装力量。

石首秋收起义

在中共湖北石首县委的领导下,石首县农民武装于1927年9月中旬全县各地农民相继举行了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石首县委重建。根据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指示,县委决定,以县委委员吴先洲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为主体,重新组织发展工农武装,作为农民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县委委员分赴新厂、新码头、小河口、桃花山等地进行农运、兵运和武装组织工作。经过近1个月的努力,整顿、重建了大部分基层党支部,发展党团员100余人。石首县委成员吴先洲的农民自卫军发展到80余人枪,石首县委成员屈阳春的农民武装达数百人,还在江北、东山、来家铺等地设立了10余处秘密据点。9月上旬,中共石首县委决定集中农民武装,首先在石首、监利、华容3县交界地区的塔市驿发动起义,以扩大影响,推动全县农民起义。9月中旬的一天拂晓,吴先洲、屈阳春率领农民自卫军和300余名农民武装,兵分4路,包围了塔市驿。突然袭击了该镇团防,团总李竹山逃走,团丁20余人被俘,缴枪11支。首暴成功,士气大振,起义队伍得到了发展,成立了“石首农民革命军”。接着乘胜进攻袁家铺,捣毁了堤工局,缴获枪械10余支。当众处决了堤工局局长刘礼田和土劣数十人。塔市驿、袁家铺连战皆捷后,中共石首县委要求各地积极响应,发动农民、渔民、工人、驻军起义,齐头向县城发展,夺取政权。从9月下旬开始,江北新厂、新码头、柴码头和江南河口、焦山河、九佛岗等地又相继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捕杀地主、团防头子数十人,国民党在石首乡村的基层政权基本坍台,农协重新执掌乡村政权。11月15日,成立了以李兆龙为书记、段德昌为副书记的中共石首中心县委(石首县委撤销),负责联系和指导石首、公安、监利、江陵和湖南华容、南县、安乡等7县工作。下旬,石首中心县委指挥农民革命军和全县暴动农民连续在监利上车湾、下车湾、朱河,华容砖桥和石首调关、小河口等地组织军事进攻和武装起义,消灭了部分团防武装,农民起义烈火燃遍石首广大乡村。接着,石首农民革命军和起义农民又采取诱敌深入、中途设伏的战术,在杨波坦围歼国民党“清乡”军约1个连,迫使敌军龟缩于县城,从而使石首南、北两区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到年底,中共石首中心县委领导农民武装共达5支,计700余人,300余支枪,活跃于石首及其邻近各县边境。

惠来秋收起义

1927年9月中旬，为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中共广东惠来县委组织农军数百人发起了攻打隆江、神泉等地的秋收起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惠来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共惠来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撤离县城，活动于华湖一带。中共惠来党组织曾发动兵营乡数千名农军，一度攻占葵潭镇；集结坑仔乡数千名农军屡次攻打隆江镇的国民党警备队。国民党惠来当局为镇压惠来农军，紧急招募临时防勇400人专任守城。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伍则电令潮阳驻军赴惠驻守，并从汕头派巫剑雄率1个警备大队，由惠来县的主要港口神泉镇登陆，驻惠镇压农军。中共八七会议之后，中共惠来党组织响应中央关于秋收起义的号召，准备“马上夺取乡县政权”“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惠来后，中共惠来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县部委研究决定乘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的机会，首先发动各区乡起义，然后攻打县城。9月初，县部委委员方凤巢到惠城区发动群众，作攻打隆江镇的准备工作。上旬，方凤巢召集农军负责人在坑仔乡开会，宣布成立隆江区坑仔乡农民武装团队，吴梦龙任团队长，吴乃桐任指导员。队员80余人，长短枪10支。经过准备，坑仔乡农民武装团队于中旬的一天向隆江镇发起进攻。团队袭击了溪西桥头的国民党驻军，向区署开进。恰在这时，从县城调来的国民党数百名援军已抵达市尾山。农军团队只好撤回坑仔。

接着，方凤巢又亲自率领盐民赤卫队1000余人攻打神泉镇。为确保攻打神泉镇取得胜利，县部委还部署坑仔乡的农民武装团队箝制国民党军的行动，增援盐民赤卫队。国民党盐警队依仗较强的武器，负隅顽抗。赤卫队虽然武器粗劣，但组织有序，精神百倍，且熟悉敌情地形，战斗持续三昼夜。最后一晚激战通宵，盐警队在盐民赤卫队的强大攻势和压力下，终于全部缴械投降。神泉盐场官吏及区署人员逃走一空。拂晓，盐民赤卫队和坑仔农民武装团队增援队在神泉港胜利会师。

在攻打神泉镇之后，坑仔农民武装团队和神泉镇盐民赤卫队，曾一度活跃在惠来县的主要交通要道，直到南昌起义军失利撤离汕头，才分散到农村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三井起义

1927年9月中旬，中共广东梅县党组织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发动三井地区农民自卫军举行起义。

三井位于梅县东北部山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梅县党组织受到破坏，三井农军转入隐蔽斗争。7月，广东特委派李桃彝到梅县负责党的整顿和恢复工作，三井农民又活跃起来。并秘密召开会议，成立暴动委员会，选举沈春松等为暴动委员，沈休为暴委书记。南昌起义后，中共梅县党组织指示三井农军立即举行起义，组建部队，迎接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不久，南昌起义军来到大埔县的三河，三井农军派代表到三河迎接，并从朱德手里领取了20支手枪。农军代表回到三井，队员们受到鼓舞，经过周密的准备，于1927年9月中旬在上井竖起红旗，宣布起义。以农军为基础正式成立广东工农革命讨逆军第8团，不久改称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第8团，团长李啸，党代表王之伦。下辖一个大队，一个中队。大队长郑谷啸，副大队长沈享泉。朱德部队派来的方兴文为军事教官。第8团组建之后，即将团部移至中井青龙寺，成立三井工农革命政府，王之伦任主席。起义军民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开展宣传活动，打击土豪劣绅，处决了罪大恶极的黄建波、李景生等一批反动分子。还派出部队到松口的长山坝等地割断国民党军的电话线，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三井起义不久，国民党军驻松口的正规部队400人纠合福建丰市以及大埔的国民党军血洗三井。第8团率领群众巧妙地与敌人进行周旋达7个月之久。

三井起义在十余倍敌人的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锻炼教育了群众，留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后来建立梅（县）大（埔）丰（顺）、（大）埔永（定）梅（县）两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琼山起义

1927年9月中旬，在中共广东琼崖琼山县委的领导下，琼山县讨逆革命军、农军和民众，举行了一系列起义。

1927年9月上旬，中共琼崖特委在乐会县第4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于9月举行全琼武装总起义。为此，中共琼山县委书记冯白驹决定发动县内农民运动基础较好、农军力量较雄厚的区乡举行武装起义。9月12日，琼山第11区区委书记曾昌明组织农军100余人和群众几百人在演丰区集会，游行示威。起义队伍行至塔市将国民党盐警队重重包围起来。数十名农军队员带头冲入盐警队营房，将盐警队10多名队员缴械。起义群众蜂拥而入，将作恶多端的两名盐警队头目击毙。同一天，琼山第9区区委书记李俊庄带领农军30多人和群众1000多人，围攻国民党潭墨民团炮楼。该民团仗着坚固的碉堡负隅顽抗。起义群众在党员的带动下，从家中抬来八仙桌，桌子上面和两边围上湿棉被，排成一条进攻的通道。农军通过这条通道接近炮楼，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同一天，县委还组织群众100多人配合县讨逆革命军攻打了道统、岭后民团炮楼。在此期间，县委派冯安全等六七名短枪手，潜入三江市国民党部，打死“西山会议”派分子陈壮臣、陈继尊；还发动群众几千人连夜包围三江圩，逮捕反动分子，并召开民众大会，公审、处决了一批反动分子。

这些起义，进一步把农民群众发动组织起来，为后来创建琼(山)文(昌)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平江秋收起义

1927年9月20日，中共湖南平江县委为策应会攻长沙，组织农民武装，在县城及部分乡镇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制定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起义计划后，派省委委员夏明翰和李六如到平江作领导发动工作。夏、李到平江县后，鉴于当时的斗争形势，改组了县委，由毛简青任书记，成立平江县秋收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将全县分为5个乡，成立乡特委和暴动委员会。暴动委员会下建立敢死队、烧杀队、搬运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决定于9月20日举行武装起义。计划起义队伍分3路进攻县城，以县城善慧庵的钟声为信号，里应外合，一举攻占县城。20日上午，献钟、思村等地的农民武装首先起义，处决了3名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当晚，在毛简青、罗纳川的指挥下，献钟、思村、安定等乡农民和群众1000多人进入县城近郊，等待攻城信号。由于负责敲钟发信号的人被敌巡逻哨抓走，直到天将破晓，钟声仍未响，各路队伍便自动撤退。已摸入县城东门李家巷的一支队伍不忍撤离，攻进县杂税局，杀死了杂税局长。负责炸毁国民党县清乡司令部的工人邱康林也向清乡司令部大院投了一枚手榴弹后才撤退。9月21日，夏明翰、李六如、罗纳川率领农民暴动队400多人攻打献钟镇警察所，击毙警察头目1人，俘7人。接着，暴动队伍又冲进杂税所，抓捕了杂税所经理和段长，缴获步枪3支和一批银元。次日，在献钟镇的河滩上召开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将捕俘的警察等反动分子全部处决。随后，暴动队袭击泰安墩挨户团，处死挨户团主任刘洞王等一批反动分子，缴枪20多支。

平江秋收起义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反动统治，为以后的平江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

澄海九月起义

1927年9月20日，中共广东澄海县部委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领导工农武装三次攻占县城，建立澄海县工农革命政府。

在八一南昌起义军撤离南昌开始南下广东之际，中共中央即派广东省委书记赖先声赴汕，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成立汕头市革命委员会，部署各县起义。8月下旬，市革命委员会成员陈国威到澄海部署武装起义，与中共澄海县部委代书记黄琪和詹天锡一起，在饶属庵下村找到了上山的澄海农军队伍。之后，他们展开了一系列的暴动准备工作。随后，中共汕头地委派中共党员徐成章赴澄海县任起义总指挥。徐亲率澄海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军事训练，缴枪筹款，使队伍扩充至近百人枪，并设立小型兵工厂，制造土枪和弹药。9月18日，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抵达大埔县境。根据特委指示，澄海县部委在后沟召开会议，决定立即举行起义。20日，澄海县工农革命军大队和八、九区农军首先攻入了东浦村，打响澄海九月起义的枪声。21日，工农革命军大队配合六区农军攻下凤岭村。22日夜，配合七区农军围捕樟籍村劣绅许二秀等。还组织人员截获韩江火轮，破坏国民党当局的通讯设施。与此同时，在各区大造进攻澄城舆论。9月23日，南昌起义军抵达潮州城时，澄海县部委决定立即进攻县城。24日凌晨，县工农革命军大队及各區农军300多人枪，在徐成章等指挥下，从后沟出发，乘船经上中（六区）抵澄城北门。预先潜入澄城的地下组织的党员许泽藻、卢次宗等率领县城理发工会会员按约定信号打开城门，迎接起义队伍进城。起义军顺利攻占县警察局。在进攻县署时，遭县兵顽抗。正当相持不下时，徐成章闻悉西门乡民团准备进攻我方设在澄城北门帝爷庙的指挥部，切断起义队伍退路的消息，遂主动率起义队伍撤离县城，退回后沟村。当天，澄海县部委派邹克英、徐成章到汕头向南昌起义军指挥部联系增援。南昌起义军的刘营长带一个连兵力随邹回澄。此时，军威大振，许多群众加入工农革命军大队。在苏南，起义指挥部将澄海工农革命军大队扩编为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第4独立团，团长邹克英，党代表詹天锡。原澄属汕头市郊的工农武装编为第1独立团。26日，起义队伍在南昌起义军帮助下，再度攻占县城。是日下午，援澄的南昌起义军回汕，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队伍再次撤出县城。28日，为配合南昌起义军阻击国民党军队，澄海县部委率工农革命军第4团第三次攻占县城，成立澄海县工农革命政府，邹克英任县长，曾身章、许泽藻任副县长，黄承钧任公安局长。邹以县长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号召全县人民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抓获10余名反动分子。9月30日，南昌起义军在潮汕战斗失利，相继撤离潮州、汕头。中共澄海县部委按照省委指示，立即带领工农革命军第4团撤离县城，转移到七、八、九区等地，并先后在七区的南溪村、九区的西浦村，处决一批反动分子。尔后，澄海县部委机关转移到九区西浦村，以潮、澄、饶三县边区的七、八、九、十等区为活动中心，开辟莲花山游击区。

澄海九月起义有力地策应了南昌起义军进军潮汕的行动，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土劣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勇气。

汕头工农起义

1927年9月23日，在广东汕头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汕头市区工人与郊区农民举行了起义，以迎接南昌起义军入汕作战。

当八一南昌起义军挥师南下时，中共广东省委为策应起义军挺进潮汕，派秘书长赖先声到汕头组织起义。赖到汕后，即成立汕头市革命委员会，赖为委员长，汕头市委书记黄居仁、市委组织部长陈国威、工运领导人陈振韬、农运领导人黄焕芝为委员。市革委会组织起四五百人的工人武装和二三百人的农民武装。工农队伍以陈振韬为总队长，黄焕芝为副总队长。收集了过去罢工时纠察队秘密保存下来的一批枪支弹药和原农军的鸟枪长矛等作为武器。市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起义的具体计划。原汕头地委工委书记、汕头总工会委员长杨石魂从外地赶回汕头，参加领导起义。9月23日，当起义军进入潮州时，汕头工人武装早在各个秘密集结点，枕戈待旦。当日晚10时许，有些工人武装等不及了，提前放了几颗土炸弹。参加起义的武装队伍以为起义军已到，立即拿起武器冲向各自负责消灭的敌人据点。指挥起义的领导人当机立断，传令攻打各区警署。经过一番战斗，胜利占领各区警察署，夺得大批枪支弹药。接着，开始围攻汕头市警察总局。下半夜杨石魂从市郊率农军来汕参加战斗。24日一早，八一南昌起义军前锋已沿潮汕铁路进入市区，与工农军汇合，并肩作战，一举攻下警察总局，全部解除警察武装，救出了被拘捕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起义军进入汕头，立即成立汕头市革命委员会，任命赖先声为汕头市长，徐光英为市警察局长。

起义军占领汕头后，国民党即组织大军进行“围剿”。9月18日，工农武装队伍和留汕的起义军在周恩来指挥下，击退了敌人进攻，保住了汕头这个前沿阵地。9月30日，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揭阳汾水前线失利，潮州也因力量悬殊而失守。周恩来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汕头。起义军撤离汕头后，赖先声、黄居仁，陈振韬等妥善安置工农武装人员，掩藏武器，转入地下斗争。这些隐蔽下来的工农武装队伍，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蓄了力量。

全琼总起义

1927年9月23日，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琼崖特委发动了以乐会县椰子寨圩为爆发点的全琼武装总起义。

1927年9月上旬，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召集各县讨逆革命军的领导人在乐会县第4区召开军事会议，分析和总结琼崖地区两个月来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认为举行全琼武装总起义的时机已趋成熟，决定于9月下旬举行全琼武装总起义。

9月中旬，中共琼崖特委接到广东省委《关于琼崖暴动工作指示信》，特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积极进行总起义的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对起义的领导，特委除了充实军事委员会的力量外，各县成立暴动委员会，具体指导本县的起义。具体部署是：以进攻琼崖东路重镇嘉积为重点，先扫除嘉积外围的敌据点，后集中力量进攻嘉积。东路由杨善集和讨逆革命军副总司令陈永芹带领乐会、万宁两县的讨逆革命军，与琼崖肃反委员会主席王文明带领的琼山、定安两县的讨逆革命军协同作战；讨逆革命军总司令冯平在西路统一指挥和组织澄迈、临高、儋县3县的起义；各县起义同时举行，互相呼应。

9月中旬末，讨逆革命军司令部命令琼山县讨逆革命军1个连开赴定安县第7区，与王文明率领的定安县讨逆革命军会合；乐会、万宁两县各1个连的讨逆革命军开往特委驻地乐4区集中，待命行动；琼东县讨逆革命军负责破坏三发岭桥和里草桥，阻击从文昌、海口开往嘉积的敌援军，并组织群众封锁道路。

9月22日，杨善集、陈永芹、王文明率领的4个连的讨逆革命军分别从集结地出发，顶风冒雨向嘉积外围的椰子寨开进。

9月23日凌晨5时，王文明率部到达椰子寨附近，按原定时间向椰子寨守敌发起进攻。激战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守敌部分被歼，大部分溃逃。讨逆革命军一举占领了椰子寨，焚烧了敌人炮楼，摧毁了团局，首战告捷。当天上午8时，杨善集、王文明等率领两路队伍在椰子寨东门外会合。11时，国民党军黄镇球部营长廖尊一、嘉积商团队长颜植南率部反扑。杨善集站在双棺墓土堆上唱着《国际歌》指挥抗击；陈永芹和椰子寨战斗副指挥王天骏临危不惧，带领战士奋勇杀敌。激战了没多久，因讨逆革命军武器装备差，伤亡严重，杨善集即决定由他指挥20多名战士掩护部队撤退。撤退中，杨善集和陈永芹不幸先后牺牲。王天骏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受重伤。万宁县委书记谢育才等指挥战士背着王天骏，继续向椰子寨方向撤退。由于敌人用密集的火封锁大墩沟桥头，讨逆革命军最后只好下水泅渡，于黄昏时分与沿大墩沟西岸向上游驰援接应的留守椰子寨的部队会合。在椰子寨起义的同时，琼东县委员会（刘裔祺、王明业、冯世江、黄昂、黎竟民等）为了配合椰子寨主战场的起义，计划以在国民党琼东县府县兵中队当小队长的曾繁森（共产党员）策动士兵起义为内应，率领农军和群众举行起义。9月22日夜，由严英、林天柄、陈邦举、王孟明等率领的讨逆革命军第1、2、3连按照预定计划分头行动。23日拂晓，王孟明和陈邦兴所带的小分队乔装菜农挑菜潜入县城。8时许，曾繁森按照计划带领18名士兵起义接应，即刻占领县城。起义队伍占领县城后，立即张贴标语，开仓放粮。椰子寨起义受挫的消息传来后，起义队伍为避开敌军反扑，拆毁了三发岭、里草和沙浦岭3座

公路桥，然后从县城撤出，转移到原驻地。同一日，琼东6区区委书记冯振璠、5区区委书记符运华、4区区委书记符福卿，在接到县委下达的命令后，立即组织农民自卫军向福田、长坡、烟塘、牛角、排坡、草塘等敌人据点发起进攻。攻打福田一仗，击毙反动分子李义林，击伤民团团长苏锦蕃，缴枪4支，烧毁敌人炮楼1座；进攻排坡民团炮楼的农军，消灭了反动地主李文辉掌握的民团武装；攻打草塘炮楼的农军，活捉了作恶多端的大劣绅“十四两”。为了配合琼西讨逆革命军的行动，中共澄迈县委委员、西昌区委书记黄瑞三率领西昌农军攻打了西昌、下岭、孔水、桥头、花地等地反动民团。

全琼总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红色区域，使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桂汝秋收起义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1团为响应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于1927年9月26日和28日在湖南桂东、汝城两县城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到汝城整编农军，开展武装斗争。随即成立了中共驻汝特别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汝城地区的革命斗争。8月15日，汝城地主武装头目何其朗勾结国民党第16军围攻农军。突围出来的500余名农军由何举成等率领，转战湘赣边界。9月初，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农军在江西上犹营前圩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1团准备起义。9月24日，第2师第1团打着国民革命军第4军补充团的旗号，在团长何举成率领下，从江西营前进入桂东县城。26日夜，第1团以宴请为名，活捉县长谢宪章、挨户团团长沙俊良和土豪劣绅20余人，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宣布武装起义。随后，起义军向汝城进军，28日攻克汝城县城，活捉国民党县清党委员何沛霖，成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后不久，在强敌的反扑下，第1团被迫分路撤离县城，各路部队撤到宜章、资兴、汝城交界的瑶岭时，只剩下200人枪。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何举成率部开赴广东乐昌，接受了国民党第16军军部特务营番号。后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汇合。

桂汝秋收起义连克两座县城，并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权，对湘南地区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廖田秋收起义

中共湖南衡阳县委组织发动衡阳东乡一带农民武装，于1927年9月27日在廖田举行武装起义。1927年7月，中共衡阳县委派县农会组织部长资歌铗回东乡廖田圩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资歌铗来到东乡后，即召集当地共产党员开会，研究建立武装，开展对敌斗争问题。接着，资歌铗等人通过秘密串连，先后建立了廖田圩、小江口、东阳渡、郭门铺、桐梓山等村镇的5个武装支队共200余人。9月24日，资歌铗召开各支队负责人会议，决定在廖田举行武装起义。9月27日，资歌铗率武装支队趁土豪劣绅刘望卿、资朝芳在立本堂设宴之机发动围攻。起义军击毙一贯横行乡里的大恶霸刘望卿，活捉并镇压了大劣绅资金吾、李子龙等人。国民党县常备队得知廖田农民暴动消息后，立即派武装前往镇压。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农民武装支队因寡不敌众，很快被打散，资歌铗等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普宁秋收起义

1927年9月28日，在中共广东东江特委的指导下，普宁县农军和南昌起义军一部发动了围攻洪阳镇（县城所在地）的武装起义，亦称洪阳起义。

普宁县的农民运动发展较早。1926年1月曾爆发了有10万农民参加的武装围攻普宁县城的战斗。1927年4月，普宁各区农军4000多人，再次围攻普宁县城，取得胜利。尔后，普宁农军与海陆丰农军组成惠潮梅农工救党军北上武汉。返回后，又在大南山一带开展革命斗争。1927年秋，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普宁，中共普宁县党组织和广大农民受到极大鼓舞。根据中共中央、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东江特委委员杨石魂于8月下旬在普宁三都书院召开干部会议，部署重建农民武装，恢复农会，打击反动势力，举行秋收起义。三都会议后，中共普宁县委领导人方家悟、农军大队长何石调集各区农军300多人，开始了攻打县城洪阳镇的准备工作。9月2日，何石和方家悟、卢世光率农军100多人，攻陷大坝区署和警署，镇压一批反动分子。次日，何石又带领农军短枪班20人，到多年山抓获十八乡乡长陈侯爵，押至水供塘处决。9月24日，杨石魂到揭阳县与南昌起义军联系，请求派兵支援，起义军叶挺部当即派一个营300多人赶到普宁。9月28日，普宁各区、乡农军1000多人在叶挺部300多人的配合下，向洪阳镇发起猛攻。城内反动武装400多人，依仗城墙工事和炮楼负隅顽抗。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击毙地主武装20多人。地主武装于下午4时被迫投降。起义军进城缴获100多支枪和财物一批，并打开监狱释放了无辜被押群众。由于当时仍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29日，南昌起义军1个营奉命返回揭阳，农军也主动撤离县城至流沙白塔秦祠堂驻扎，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揭阳九月起义

1927年9月下旬，在中共广东揭阳地区党委组织的领导下，为迎接南昌起义军进军潮汕，发起了一次有数百人参加的武装起义。

1927年，国民党揭阳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揭阳地区党组织曾发动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但遭国民党军的重兵镇压。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抵达揭阳，揭阳县的革命力量很快得到复苏。中共揭阳县委决定利用迎接南昌起义军的机会，在全县发动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开展土地革命的暴动。县委一方面发动群众向反动分子写警告信，不准他们搜捕革命者，不准他们迫害革命家属和勒索钱财；另一方面调动武装队伍向国民党发动军事攻势。按照县委的部署，一区、官北一带的农军，与邻县农军联合起来，打下了国民党军地方武装盘踞的洋尾刘；在二区，一直坚持在桑浦山地区活动的游击队100多人多次攻打揭阳县通往汕头的要地炮台镇；四区的农民以消灭反动盐商为口号攻打当地的反动武装。一时间，打得国民党反动派魂飞胆丧。9月26日，南昌起义前卫营在曲溪一带渡河，进抵揭阳县城榕城。驻守在县城的国民党军工俊部一个营和地方反动武装，慌忙向新亨逃窜。揭阳军民立即在马牙渡架桥，迎接起义军，并和南昌起义军一起占领揭阳县城，当日晚揭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执行委员7人，主任委员林光耀；委员张秉刚、方针、林希明、朱希博、蔡步三。工农革命政权建立之后，明宗正义地宣布，她是工农利益的代表，维护工农利益，实行土地革命。

此后，由于南昌起义军在汾水与三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浴血奋战，遭到失败，国民党军复占揭阳，工农革命政权仅存在3天，便解散了。揭阳县各区的武装起义，也遭到国民党军的镇压。但是，揭阳的九月起义却鼓舞着军民继续为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斗争。两个月后的11月中旬，揭阳县党委召开党代会，作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当月中旬，第二区、第四区建立了区一级的苏维埃政权。翌年夏，在白色恐怖严重、县委机关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仍在桑浦山麓建立起了县级的苏维埃政权。这些县、区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以后揭阳人民建立新生革命政权作了准备。

湘潭东四区秋收起义

1927年9月，在中共湖南湘潭县委的组织领导下，湘潭县东四区农军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8月，在中共湖南省委制定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起义计划之后，相继派罗学瓚、肖晔等到湘潭县，发动和组织东四区农民武装起义，以策应会攻长沙的行动。罗学瓚等到湘潭后，首先成立了中共湘潭县委，罗学瓚任书记，肖晔等为委员。县委成立后，肖晔被派往东四区、涂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暴动。肖晔到东四区后，即和区农会委员长肖光海、副委员长傅岳祥等研究了秋收起义问题，制定了起义行动计划。随后，他们分头发动群众，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有数十人参加的农民自卫军。9月间，东四区起义爆发。农民自卫军联合衡山农民武装，在肖晔、肖光海等率领下，先后3次攻打王十万和坪上文家祠堂2个团防局，毙伤敌数名，缴枪50余支，农民自卫军发展到100多人枪。接着，肖光海率部与郭荪苏领导的一支农民武装会合，准备集中力量攻打龙凤团防局。不料，前往团防局的一个侦察员被敌察觉抓住，将其剖腹挖心。肖光海等闻讯，满腔怒火，率领队伍冲进龙凤团防局，捣毁团防局炮台，团兵溃逃。不久，起义军遭敌重兵“围剿”，伤亡较大，被迫分散转入隐蔽斗争。

星子起义

1927年10月3日，中共赣北特委和星子县委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12月，中共星子县支部委员会成立，书记欧阳毅然，同时成立了星子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此后，团县委、县妇女协会、县青年联合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工农革命运动日益兴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工会、农会组织被解散，中共党的组织转入地下。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江西省委在《秋收暴动计划》中明确指出：星子等县虽不能作夺取政权的总暴动，但“必须举行零碎的前仆后继、彼伏此起的暴动”。同年9月初，中共江西省委两次派人来星子指导工作。9月，中共赣东北特委成立，书记林修杰，开始实施省委暴动计划。中共星子县支部扩大为中共星子县委员会，卢英瑰任书记。中旬，林修杰到星子，在白鹿洞主持召开星子县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武装起义。会后，县委负责人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同时对农军进行了编组和训练。

10月2日，九江县马楚区起义先锋队8人赶到星子。上午，农军派人潜入星子县城，侦察攻城突破口和城内监狱等情况。下午，林修杰在白鹿洞召开动员会，成立起义指挥部，林修杰任总指挥，徐上达任前敌指挥。3日夜，徐上达率领300多武装农民从染家牌出发，向县城西门挺进，卢英瑰带领20余名起义队员潜入城内作内应。4日凌晨3时许，起义队伍冲入县城，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20余人，接着迅速攻入县衙，县长赵贺连夜逃往九江。拂晓，起义队伍主动撤出县城，大部分队员分散，少数骨干分子由卢英瑰等率领在河村钵盂山一带坚持斗争。九江县起义先锋队由林修杰、徐上达带领开赴岷山地区，与当地革命武装会合，组建了赣北第一支红军队伍，继续坚持斗争。

饶平起义

1927年10月4日，江西饶平农军在中共饶平党组织的领导下，为支援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举行武装起义，一举攻占了县城。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饶平当局纠集饶平地主武装，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饶平党组织、县总工会、县农会、新学生社的骨干从饶城先后撤入山区。为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和屠杀政策，中共饶平党组织曾于5月率上饶区农军七八百人及饶城郊区、浮山区农军及农会会员1000多人，攻进饶平县城，后主动撤离。此后，各区乡的农军赤卫队相继建立起来。是年7月，中共饶平委员会于大陂楼正式成立，县委书记杜式哲。同时成立共青团饶平县委，团委书记李仁华。9月初，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边境。饶平县委接上级指示，立即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以策应南昌起义军下潮汕。9月18日，南昌起义军进入大埔县。贺龙、叶挺率主力下潮汕，朱德率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导团3000多人留守三河坝。9月30日，饶平县委委员张碧光、刘瑞光率饶平农军进占高坡镇，缴获高坡反动商团20多支步枪后，即率农军到三河坝，迎接南昌起义军。朱德部发给农军46支步枪和一批子弹。

10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和南昌起义军领导人指示饶平农军，立即返回饶平县，举行起义。10月4日拂晓，饶平农军1000多人在杜式哲、张碧光等指挥下，分成两路从北门、东门向国民党守军发起猛攻。国民党饶平守军死命抵抗，双方激战数日，不克，农军只好暂时撤回新丰，准备第二天再战。5日晨，朱德率部分南昌起义军抵上饶二祠，即派周士第率第9军教导团300多人支援农军攻城。国民党饶平守军在伤亡50多人之后不支，从南门弃城逃跑，恰被埋伏在南门外的农军击毙几十人。农军乘胜攻占县城，砸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当晚，农军获悉黄绍竑部逼近饶城，农军主动返回上饶，南昌起义军撤到茂芝。当月，中共饶平县委从起义军中挑选100多名队员于下祠乡成立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4团，团长张碧光，副团长郭秩辉，下设两个连。经过短期训练，第14团配合各区打击土豪劣绅，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华容秋收起义

1927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华容县委组织发动全县农民武装举行起义。

1927年9月，华容县共产党员刘革非、涂国钦从湖北省监利县回到家乡开展武装斗争。此时，共产党员方之中也从外地回到华容县明碧山。刘革非、涂国钦与方之中等一批共产党员取得联络后，成立了中共华容县委，韩步骧任书记，刘革非、涂国钦、方之中、花才周、何民逸任委员。县委成立后，立即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举行秋收起义，并很快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农军游击队。10月10日，华容县委在明碧山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行动计划，决定以明碧山为暴动中心，在大旺厂、长堰塘、塔市、黄湖山等地暴动，方之中任暴动总指挥。10月10日午夜，起义开始，方之中率几百名暴动队员奔袭沉塌湖，将恶贯满盈的国民党县议会议长徐人凤从床上拖下来，当场处死。同时，范家岭的农民暴动队也举行起义，杀死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反动军官4人。文宣区暴动队严惩当地土豪，缴获了一批枪支。其他地区亦先后举行了起义。

华容秋收起义遍及全县大部分地区，给国民党华容县当局以有力打击，为进一步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临儋起义

1927年10月11日，广东琼崖临高、儋县的讨逆革命军、农军和群众，在中共临高县委和儋县县委的领导下，在儋县新州镇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早在1927年的7月下旬，中共临高县委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组织讨逆革命军200多人与县城内的群众里应外合，一举攻克县城临城镇，救出被囚禁的共产党员李春茂等人。9月上旬，中共琼崖特委在乐会县第4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发动全琼武装起义。为响应特委号召，临高县委决定再次发起临高起义。由于国民党临高当局事先打听到这一消息，包围并袭击了农军集结地点，临高县委放弃了此次行动计划。10月上旬，鉴于驻临高县城的国民党军大量增加且已有准备，而驻守在与临高相邻的儋县县城新州镇的国民党军只有政警队100多人，又缺乏戒备，时任琼崖讨逆革命军总司令的冯平便与临儋两县的县委领导人商量，决定在“双十节”前后集中两县的讨逆革命军和农军，联合进攻新州镇。

10月10日下午，临高讨逆革命军和农军200多人乘船从临高的调楼出发，于傍晚在儋县泊潮港登陆，与儋县农军400多人汇合。11日早，儋临两县领导人张兴、黄金容、王政平、黄振亚、王超、符英华等率领儋临两县革命武装700多人浩浩荡荡向新州进发，沿途许多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的行列，队伍骤增至1000多人。当日下午，讨逆革命军和农军乘敌不备，一举冲进城内。敌县长陈仲章命令政警队死命抵抗。12日拂晓，起义军组织攻坚队登梯越墙，突入县府大院，守敌挖墙钻洞而逃。起义军跟踪追击，前后毙敌数十人，缴获一批武器，并打开监狱，救出共产党员张炳辉、谢开琼及群众100多人。

起义军占领新州后，宣布成立儋县临时革命政府，以张兴为县长，符英华、倪有文分别任两县沿海要地新盈和光村的警察署署长。新州暴动胜利的消息传出后，敌人大为震惊。10月26日，驻澄迈县金江镇的国民党军倾巢出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临儋两县革命武装分别撤至泊潮、光村、新盈等地渔村坚持斗争。儋县临时革命政府维持县政15天，群众称为“新州半月红”。

清涧起义

1927年10月12日，在中共陕北军委的领导下，驻陕北国民党军阀井岳秀部所属第11旅第3营在陕西省清涧、延长、宜川等地举行了起义。

第11旅的前身为井岳秀部高双成师的第10团，石谦为团长。1926年上半年该团改编为第11旅，石谦为旅长。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史唯然到该旅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该旅第3营营长共产党员李象九介绍石谦加入中国共产党。各连均建有党支部，有共产党员120多名。为加强起事的领导，经中央陕西省委批准，于1927年10月初成立了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为书记，谢子长、李象九为委员。石谦旅长被井岳秀杀害后，激起该旅官兵极大愤慨。10月12日，唐澍、李象九等领导驻清涧的第3营首先起义，捣毁了国民党县政府，冲进公安局，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没收部分财产。接着，起义部队南进延川，驻守延川的第2营第4连也参加起义。17日，乘胜占领延长，处决了反动营长齐眉生，缴获部分枪支。27日到达宜川，除第1营营长、代11旅旅长康子祥逃跑外，其余官兵均参加起义，起义部队扩大为1700多人，有3000多支枪。起义后，因李象九拒绝对部队进行整编，后接受韩城驻军王保民的收编。起义军于12月30日以谢子长营为基础，整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1928年1月，部队攻打宜川受挫，以后几次战斗又接连失利，仅剩几十人，分散转入隐蔽斗争。

玉田起义

1927年10月18日，中共直隶省（今河北省）玉田中心县委发动和领导该县农民举行了起义。

玉田县位于河北省和北京的东部，是进出山海关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26年秋，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夺取全国政权，肆意榨取民脂民膏，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共玉田特别支部借机广泛发动群众，在500多个村庄成立农民协会，发展会员达五六万人。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1927年，玉田中心县委书记张明远广泛发动群众，使农会会员发展到10万多人，有长短枪300多支。10月18日，玉田县2万多农民协会会员举行起义。张明远、解学海率领东路起义队伍直逼玉田县城东门，拥入县城，解除警察和保安队全部武装，缴枪100多支。张洪、肖俊初率领西路起义队伍攻下西门。两支起义队伍迅速占领了县政府、县议会、警察所等部门。起义胜利后，中共京东特派员叶善枝从遵化赶来，强令解散起义队伍，撤出县城，使起义武装遭受重大损失。中共顺直省委派于方舟带领一些军事干部加强对起义队伍的领导，召集失散起义队员归队，成立京东人民革命军，决定再次夺取玉田县城，开展附近几个县的土地革命。同时，任命杨春林为京东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张明远为总指挥，刘自立为参谋长。经过短时间的整顿，队伍恢复到200多人。11月初，人民革命军从遵化北向玉田进发，沿途收缴警察和土豪劣绅的武器，队伍扩大到300多人。当起义部队去东峪村捉拿恶霸刘玉梨时，遭到被刘纠集的地主武装和民团的围攻，起义部队损失惨重。突围后，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率部行至丰润县沙流河附近时，被国民党俘获，不久被杀害，起义失败。

两衡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10月19日，中共湘南特委和衡阳县委组织发动以衡北游击师为主的农民武装，在衡阳与衡山交界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6月初，衡阳县农会执委萧觉先、戴今吾等人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回到衡阳北乡妙溪一带开展武装斗争。不久，恢复了妙溪、麻町两处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并建立起一支农民武装。10月初，正式宣布成立衡北游击师，萧觉先任师长，戴今吾任党支部书记。随后，游击师根据中共湖南特委和衡阳县委的部署，积极筹备武装起义。

10月中旬，衡北游击师在衡阳妙溪、麻町、月山、神皇、江柏堰、国清、界牌、石头桥及衡山南岳等方圆上百里的地区，发动贫苦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边界起义。19日夜，起义首先攻打衡阳石头桥团防局，夺取了团防局30多支步枪，起义队伍由200余人扩大到700多人。随后，暴动队四面出击，镇压恶霸、劣绅68人。当地团防局大为惊惶，立即向县署求援。国民党县署即派县清乡队、常备队、团防局前来“清剿”。衡北游击师奋勇抗击，与敌作战达1个多月。11月中旬，游击师在岫嵎峰与敌激战失利，戴今吾等壮烈牺牲，余部在萧觉先率领下继续坚持斗争。次年2月16日，游击师开赴界牌将军庙矮子岭，与朱克敏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9师第3团汇合，改编为衡阳工农革命军第7师，师长屈森澄，萧觉先和朱克敏分别任第4团和第3团团长。

都安第一次起义

1927年10月，广西都安县东区拉烈区自卫团和中区、西区农军及革命群众，在中共恩奉特支领导下，在都安东区八甫乡和西区组织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5年秋以后，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先后派中共党员陈铭玖、陈伯民、陈鼓涛、邓无畏、韩竹冬等来到都安古河、丹桂、拉烈等地指导和帮助开展农民运动，并于1926年春，建立了40多个乡、村的农会。为培养骨干，陈铭玖、陈伯民、陈鼓涛、邓无畏等先后在镇江、安阳、拉烈等地开办了3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了170多名农运和武装斗争骨干，使全县农运从点到面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初步形成了县、区、乡各级农会。各级农会都迅速组织了农民自卫军。都安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农民武装不断壮大，使都安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极为惊恐。国民党都安县长韦旦明勾结桂系军阀第8独立团团长吕谷贻，派兵镇压农军。1927年10月中旬，国民党都安县长韦旦明带部分军警民团武装直扑丹桂、古河一带，烧了西区劳农会主席覃道平等农运骨干和群众的房子30间；县团务总局长韦还甫率民团数百人包围大化农运领导人花联焄的房子杀害其大女儿，抓走了其妻儿；桂系军队第8独立团从宾阳、武鸣等地抽调了3个连，伙同都安县警团武装数百人，由都安县团统韦伯强作向导，直奔拉烈，企图“清剿”农民自卫团。陈伯民、陈鼓涛、陈铭玖、邓无畏等得知消息后，当即决定发动全县中区、东区、西区数十乡农军举行武装起义。陈伯民等农军领导人，首先率东区拉烈农民自卫团300多人枪和中区农民自卫军40多人枪直奔红水河边。当国民党军队开抵红水河边八甫渡口时，拉烈农民自卫团已将渡口的船只全部封锁，并凭借河岸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毙伤敌军数十人，无法过河，被迫绕道到那雉渡河。拉烈农民自卫团又在那料一带据险抗击。农军依靠有利地形，与敌激战数小时，待敌人冲上山时，农军又转移了。当敌人开进拉烈时，天色已晚。敌人在拉烈四处搜捕，由于农会骨干和农军均已转移或分散隐蔽，敌军一无所获。与此同时，都安县农会主席覃道平带领镇江农民自卫军150多人枪，在西部山区攻打土豪团局据点，配合东区、中区农军作战，形成了全县起义高潮。国民党广西省政府闻讯十分惊恐，于11月16日向全省通缉邓无畏等8名都安农运骨干。

都安起义挫败了国民党“清剿”农军镇压农运的阴谋，为以后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麻阳秋收起义

在中共湖南麻阳特别支部组织领导下，麻阳县农民自卫军和起义群众于1927年10月下旬在麻阳县城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中共麻阳特别支部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精神，决定举行秋收起义，攻打县城，夺取政权。此时，麻阳县城由黔军王家烈部一个连驻守。麻阳特别支部分析敌我力量，决定采用骚扰袭击的战法围攻县城。10月中旬，中共麻阳特别支部和农民自卫军向县长赵用章发出通牒，以一次县警察强行抢走一农民的耕牛和财产是非法为由，强烈要求县署严办。并提出：如不归还耕牛和财产，就交出30支步枪，否则，将率3000铁血健儿作殊死一战。同时，农民自卫军和群众3000人在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张祖恒的率领下，对县城形成包围之势，并在县城对河山上插满农民自卫军的红旗，不时居高临下从正面向县署射击。守城的黔军见县城四周都有农民自卫军，惊恐万状，便趁机撤离了县城。农民自卫军随即占领了县城，并追击黔军至湘黔边界，消灭了一批敌人。农民自卫军占领县城后，逮捕了团防局长黄铭，救出被关押的一批革命群众。接着，特别支部召开会议，决定“发展武装，巩固成果，随时警惕，准备战斗。”并任命张祖恒为县长。此时，湘西军阀陈渠珍派第2旅旅长顾家齐率部“清剿”。农民自卫军在县城西门外与敌激战，毙敌副营长以下官兵数人，然后撤出县城，转至西晃山地区。

顾家齐部占领县城后，任命大土豪聂汝谦之子聂斌斌为保安团长。特别支部利用保安团内队长陆显海与聂家父子的矛盾，开展策反陆显海的工作。不久，陆显海率部起义，将聂家父子处死，率团队武装共40多人枪参加农民自卫军，农民自卫军扩大到100余人枪。之后，农民自卫军以西晃山地区为游击区，坚持游击斗争。

安北起义

1927年10月下旬，在中共京汉路区特委领导下，由湖北安陆县接官厅区委组织发动安北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中旬，中共京汉路区特委指示原安陆县部委委员、县总工会委员长盛辅卿转入安陆北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盛到安北后，积极发展党员，恢复建立党组织，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在此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制订安北起义计划，决定以槎山、吉阳山为依托，以接官厅、赵家棚、会家寨为中心，组织农民起义。10月上旬，在中共京汉路区特委特派员林竹如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共接官区委和安陆第2游击支队，由盛辅卿任区委书记兼支队长，薛金吾专管军事，接官区大队，张承炼任接官区大队队长。下旬的一天，接官厅农民武装举行起义，由盛辅卿率领游击队冲进接官厅大地主张氏庄园，张杰民潜逃，没收了张氏部分财物。以此为起点，武装起义席卷安北。11月1日，盛辅卿率支队与农民群众相配合，夜袭莲花庵张爱湾，处决劣绅张植庭。1928年1月22日，在京汉路区特委统一领导下，由安陆第2游击队联合孝感、应山革命武装，击溃了左可畏团防，占领了左家河，缴获部分枪支弹药，有力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接着，又先后摧毁安北区保卫团，处决土劣侯振治、区保卫团书记苏伯端、安陆县第6区调查员刘子芳等一批反动分子。

正当安北革命深入发展之时，国民党安陆县县长肖觉天勾结国民党清乡军李纪才部，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对活动于安北的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安陆游击第2支队及农民群众虽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情乡”与“围剿”，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安北起义归于失败。

攸县北乡秋收起义

在中共湖南攸县地方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刘迪生、贺筱凤等的组织指挥下，攸县北乡农民武装于1927年10月至12月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8月，中共攸县党的组织在攸县县城、王背冲、桐梓坪、新塘冲等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员贺延年、刘迪生和农运骨干李寿寒、余桂生等以攸、醴边界的瓦子坪、荒田冲、木家冲为据点，发动群众，建立了攸北农民暴动队，刘迪生任总队长，贺延年任副总队长，有400多人。与此同时，大革命时期攸北大桥地区农运骨干贺筱凤、杨凤楼等，在中共醴陵南四区区委支持下，在攸、醴交界的乌石冲、凤头冲发动400多名群众，建立了大桥农民暴动队，贺筱凤任总指挥，杨凤楼任副总指挥。这两支农民武装建立后，积极收集各种武器，准备武装起义。10月间，刘迪生、贺延年率领攸北农民武装千余人在瓦子坪举行起义，首先奔赴皇图岭，抄没团防局长陈子海的家，又在坪阳庙镇压了大恶霸陈青嵩，并将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发给贫苦农民。随后，攸北农民暴动队又多次袭击坪阳庙、皇图岭之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贺筱凤、杨凤楼领导的北乡大桥农民暴动队，在醴陵南四区数百农民配合下，于12月攻占了大桥团防局，并四处打土豪，杀劣绅，成立了攸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六十三乡苏维埃政府。随后，农民暴动队又多次向攸北反动豪绅的巢穴严湖地区发动攻击，击毙“保产党”首领易长云。武装割据地区由大桥扩大到丫江桥、横山等地，与刘迪生、贺延年领导的活跃在皇图岭、坪阳庙地区的暴动队相呼应，攸县北乡大部分地区均处于农民武装控制之下。

1928年2月，湘东保安司令罗定率千余敌军向攸北农民武装反复“进剿”，领导人贺延年、刘迪生、贺筱凤、杨凤楼先后牺牲。不久，攸县北乡农民武装被打散，起义失败。

赣北起义

1927年10月至1930年4月，在中共江西省委和星子、九江、德安、永修等县县委的领导下，星子、九江、德安、永修4县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星子、九江、德安、永修等县位于江西省北部，是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群众就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用暴力手段进行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27年8月，聂荣臻、周士第领导国民革命军第25师在九江马回岭宣布起义，对这里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大。9月中旬，数千群众和农民自卫军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强行解散农民协会并捕杀农民的反革命行径，两度进攻县城，使反动县政府惊恐万状。星子县农民曾一度攻入县城，赶走了反动县长。接着，星子、九江县农民2000余人，携带长短枪8支和土枪、梭镖数百支，在中共九江地委书记林修杰、沈剑华和中共星子县委书记芦英魁及九江黄志门区委书记李上达的组织指挥下，乘夜攻入星子城。伪县长和其他反动官吏慌忙逃走。农民起义军进城后，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烧毁了租约和钱粮簿。但由于起义军没有解除伪警察局的武装，致使反动派进行疯狂反扑。起义军被迫撤出县城。

星子起义的第二天，林修杰、沈剑华率领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和中共九江县委派来的6位共产党员会合，开始进行游击战争。经过努力，扩充了实力，集中了12支步枪和4支短枪。后由于敌人的进攻，林修杰等在九江县的小阳铺不能立足，遂到金盘山上隐蔽。因给养困难，只有9人坚持斗争。

正当游击队面临困难之际，中共江西省委对赣北的武装斗争加强了领导力量。1927年11月，派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张源健到赣北任游击队长，李凌云任游击队党代表，沈剑华任副党代表，游击队转移到德安县岷山附近的彭山活动，收集分散的农民自卫军和武器，扩大游击队的力量，并于12月下旬，在九江、德安交界处的朱家垄朱村，正式成立了赣北工农游击队。

赣北工农游击队成立后，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1928年4月，游击队发展到百余人，并改编为赣北工农游击大队，张源健任大队长，欧阳端任副大队长。后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指示，游击大队开赴瑞昌县，在小源歼灭了敌靖卫团，缴获步枪十余支。接着回师德安，在赤卫队配合下，打垮了夏家铺的靖卫团，歼敌近20人。同年4月17日夜，游击大队配合德安县各区农民赤卫队，进攻邹桥王村，经1小时战斗，歼靖卫团数十人，缴获长短枪17支和军用物资一部。1928年8月，赣北工农游击大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赣北独立团，张源健任团长，欧阳端任副团长，共200余人。

赣北人民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引起敌人的恐惧，随之加紧镇压。1929年秋，敌人连续逮捕并杀害了九江港口共产党员张贤思和革命家属十余人，激起了群众的无比愤怒。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共港口区委于10月30日夜领导武装群众百余人进行起义。起义群众在地下党员和农民运动骨干的配合下，一举攻入地主豪绅的宅院，处决了5名地主豪绅，没收其全部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为了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九江县委立即以起义的革命群众和农民赤卫队为基本力量，建立了以赤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和赣北工农红军赤湖游击队。被吓坏的港口区的豪绅地主，密谋联合国民党第20军进攻起义军和游击队。为了打击敌人和巩固根据地，中共港口区委书记汪

仲屏率领 20 余名精干的游击队员，利用夜间处决了地方豪绅何先义、邓少锋和国民党第 20 军副官何武安。此后，地方反动势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1929 年 12 月初，中共江西省委将赣北独立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纵队第五支队。1930 年 3 月，德安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并领导全县广泛开展抗粮、抗税、抗捐、抗租运动。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区，红军第五支队派出一部分部队，协助中共湖口县委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4 月，中共湖口县委领导该县广大农民，配合游击队一举攻克湖口县城，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救出 200 多名被捕群众。接着，又在黄志门歼灭敌军 1 个排。从此，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又相继歼灭了德安和瑞昌、武宁、永修边界地方的反动武装，巩固和扩大了德安的游击根据地。

红军第九纵队第五支队和赤湖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 1930 年上半年，已发展到 1400 余人，七八百支枪，其中赤湖游击队由一个中队发展到五个支队。后来，这些游击武装分别编入红军第四方面军及第 10 军和第 16 军。

闹马乡第一、第二次起义

1927年10月，中共广东琼崖文昌县委在闹马乡组织几百名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翌年1月28日中共文昌县闹马区和潭牛区委又组织农民，在闹马乡举行了第2次武装起义。

1927年秋，中共文昌县委组建了闹马区委。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闹马乡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区委组织部长洪日清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蔡章云任赤卫队长。

同年10月，洪日清和蔡章云带领赤卫队20多人和几百名群众手持砍刀、锄头、棍棒，团团围住闹马墟民团驻扎的炮楼。民团慑于暴动队伍的威力，纷纷缴械投降。起义队伍俘虏团丁20多人，缴获长短枪20多支。接着起义队伍又攻下潭牛湖民团炮楼，俘虏民团头目蔡文轩，缴获步枪6支，短枪2支。赤卫队的声望大振，青年纷纷报名加入，迅速发展几百人，编为1个营。

农民赤卫队的迅速发展，震惊了文昌县国民党当局。1928年1月25日，文昌县西区土豪劣绅总头目冯日初和大昌乡民团头子符气紫，带领民团联防中队，妄图偷袭龙舌、广泰两个村庄。赤卫队闻讯立即出动，在蔡章云、云昌法的带领下，迅速赶到广泰村，一举击退了联防中队。洪日清、蔡章云等认为，冯日初、符气紫不会甘心失败，于是，他们一面部署赤卫队加强戒备，一面发动群众准备第二次起义。

1月28日凌晨，冯日初、符气紫又带领100多人，潜伏在大丰村张氏祠堂与潭牛湖间的灌木丛林中，企图诱出闹马乡赤卫队加以消灭。在广泰村砖瓦灶巡逻的蔡章云识破了敌人阴谋，立即鸣枪报警，团丁慌忙逃回大丰村张氏祠堂。赤卫队员们扛着荔枝木炮，拿着步枪、粉药枪等各种武器向潭牛湖赶来，周围各村群众听到枪声后，也从四面八方涌向鸣枪地点。几千人的群众队伍将大丰村张氏祠堂团团围住，然后发起进攻。这时，中共文昌县潭牛区委负责人曾泽春和坑尾、昌平、美雅等村的赤卫队也赶来助战。战斗一直相持到傍晚。团丁们仗着精良的武器装备，龟缩在张氏祠堂里负隅顽抗至天黑。由于赤卫队的武器装备差，未能攻破张氏祠堂。冯日初部趁着夜暗突围逃走。至此，各路赤卫队和群众也撤出阵地。

闹马乡两次起义，打破了反动民团在当地农村的“一统天下”，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促进了农民运动深入开展。

刘店起义

1927年11月1日，在中共驻马店办事处的领导下，河南省确山县刘店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确山地处豫南。早在大革命时期此地即是河南省农民运动的活跃地区。1926年秋，为迎接北伐军进军河南，确山县在外地读书和工作的张家铎、张耀昶、李鸣歧、马尚德（杨靖宇）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奉中共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2月16日，成立了以马尚德为委员长的确山县农民协会。4月，当北伐军即将进入河南之际，确山县农民协会领导数千武装农民举行起义，攻克确山县城，建立了农民自卫军。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确山也笼罩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之中。7月初，农民自卫军被迫撤出县城。李鸣歧、马尚德等共产党员先后转移到刘店一带坚持斗争。

1927年9月底，中共豫南特委在信阳成立，省委农民部长王克新任书记。特委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计划，选择中共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的豫南确山县为中心举行起义，并于10月初在确山县组建了中共驻马店办事处，主任李鸣歧，组织委员马尚德，具体负责确山武装起义的领导和发动工作。特委还先后派特委军事部长虞松如和懂军事的蔡训明等人前往确山加强指导。10月上旬，中共驻马店办事处在刘店双桥村召开会议，研究武装起义事宜。后在确山东部地区经过秘密惩办豪绅，筹集枪支弹药，建立起一支以共产党员、农民协会会员为骨干的农民武装，并决定以群众基础较好的刘店为中心，公开发动起义。同时，成立了由李鸣歧、马尚德、虞松如、张家铎、张耀昶等人组成的起义指挥部。10月底，起义指挥部在刘店北吴庄召开会议，对起义进行具体布置，商定起义首先攻打民愤极大的大劣绅、国民党反动民团团团长李广化。

1927年11月1日凌晨，马尚德、虞松如、张家铎、张耀昶、张立山等带领五六十名农民自卫军队员和部分农民群众在确山刘店举行起义，包围了李广化团部所住的大院，后在各乡起义的红枪会支援下，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战斗，消灭了确山县东部恶霸、反动民团团团长李广化的武装，缴枪10余支，一举攻下刘店镇，起义取得胜利。当天，起义军召开庆祝大会，号召广大贫苦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打倒土豪劣绅。3日，中共驻马店办事处在刘店召开确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1人组成的确山县革命委员会，并将起义队伍改编为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马尚德，党代表李鸣歧，大队长张耀昶。确山县革命委员会和农民革命军建立后，立即在刘店周围地区展开了镇压反革命和分粮抗捐斗争。起义的胜利，引起国民党统治阶级的震惊。6日晨，驻确山国民党南路军第3旅旅长张德枢和国民党确山县县长高子元纠集国民党正规军队和民团数百人，分两路向刘店农民革命军发起了进攻。农民革命军因早有准备，将敌击溃。但因力量悬殊，农民革命军主动撤离刘店，向确（山）、正（阳）、信（阳）边境地区转移。11月下旬，在中共特委书记王克新主持下，中共驻马店办事处、确山农民革命军指挥部、确山县革命委员会在张板桥召开联席会议，总结了刘店起义以来的工作，分析了形势。会后，确山农民革命军进行了整顿，成立了司令部和政治部，下辖4个支队。司令部由王克新、李鸣歧、马尚德等负责，马尚德任总指挥，李鸣歧任党代表，蔡训明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农民革命军进入信阳、明港一带活动，并

先后消灭了反动民团李文相部，重创了反动民国戴文甫部，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当地民团武装不甘心失败，贿请正阳县国民党军阀部队，对农民革命军进行“围剿”。农民革命军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战，北返刘店、王楼。进军途中，农民革命军除恶霸，打民团，开仓放粮，发动群众。经过月余斗争，开创了以刘店为中心，北起汝南水屯、洪庙沟，南到信阳北部重镇明港，东抵汝南申庄、马乡，西至（北）京汉（口）铁路，纵横约 50 公里的汝、确、信边红色游击区，农民革命军也发展到 300 余人枪。

汝、确、信边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动摇了国民党在豫南的统治基础。11 月 29 日，国民党确山县县长高子元、驻确山县国民党军旅长张德枢等人纠集反动武装 1000 余人，“围剿”农民革命军。农民革命军在王楼与敌激战，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打死打伤国民党军 30 余人，但本身也遭到重大损失。特委书记王克新牺牲，总指挥马尚德负伤，部队减员至 40 余人。

王楼战斗后，确山农民革命军由李鸣歧、张立山、蔡训明等带领转移至确山西北小乐山进行了整顿，后转移至汝南阎寨、大申庄一带坚持斗争。12 月中旬，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确山农民革命军南下信阳四望山，与王伯鲁领导的信阳农民革命军会合。1928 年 1 月 15 日，信阳、确山农民革命军合编为豫南工农革命军，张志刚为总队长，并成立了临时政权性质的豫南革命委员会。此后，在中共豫南特委的领导下，豫南工农革命军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宜兴起义

1927年11月1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宜兴县委领导下，宜兴农民举行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宜兴位于江苏省南端、苏浙皖三省交界处。这里地窄人稠，农民遭受地主残酷剥削，工人深受资本家压迫。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江浙区委派共 宜兴起义、无锡起义、江阴起义、崇明起义，历史上通称苏南起义。产党员潘梓年、李旸谷等从上海回宜兴工作，发展史曜宾等5人为党员。接着又派万益、宗益寿、史砚芬等来加强宜兴党组织的力量。9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将中共宜兴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宜兴县委员会，史曜宾任书记，下设5个党支部，党员30人。接着，又着重在教育界发展了一批党员。10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江南农运工作会议，史曜宾及万益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确定宜兴、无锡、常州、江阴、常熟等地在最短期间内发动农民起义，宜兴条件比较成熟，应首先发动，并派万益和段炎华（军事干部）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宜兴参加领导工作。起义前夕，团江苏省委又特派匡梦苏（即匡亚明）赴宜兴参加领导。宜兴县委很快制定了行动计划，成立了起义领导机构——“农民暴动行动委员会”，由万益、史砚芬、宗益寿、段炎华、匡梦苏等5人组成，万益任总指挥，并决定11月1日为起义日期。接着进行起义的组织、训练、宣传、调查工作。经过短期发动，受训农军达500余人，可随时召集的农民达3000余人。当时敌在宜兴没有驻军，地方反动势力有枪千余支，在城水警、商团仅200余人，其余散在各乡集镇。10月31日深夜，部分农军骨干潜入城中。11月1日10时左右，各路农军按计划陆续进城，分散隐蔽在饭店、茶馆内等待行动信号。此时，总指挥万益乘新任县公安局局长张大刚举行就职典礼之际，在蛟桥北面的中央台（县署前的高台，可通县署），向空中连发3枪。2000多人的起义队伍高举红旗，臂缠红布条，手持刀枪、锄耙、棍棒等武器，高呼“农民革命胜利万岁”、“杀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原计划是万益等解决商团，段炎华、肖世平（肖直）分别指挥攻县署前、后面，李鹏指挥攻公安局，由于肖、李临阵叛变，并携走手枪1支，遂改变计划，先攻占县署、公安局。12时许，起义队伍冲入县署、公安局，缴枪10余支，释放监犯30名，看守犯38名。看守管狱员兼所长胡绍德、看守所主任田幼和被拘禁。由于在起义前共青团领导人无意中泄露了秘密，城里市民都传言“乡下人要来打县署了”，“乡下人要来抢商团的枪了”，等等，致使县长与公安局局长及大劣绅闻风逃跑。攻下县署后，即攻商团，毙军官1名，获枪10余支。接着，一路农军搜缴分散在各商店里的枪支；另一路农军在城中搜捕漏网之敌，搜出土豪劣绅30余名，当即镇压其中罪大恶极者10余名。然后又到东门攻打水警，获枪20余支，小山炮2门，子弹、炮弹10余箱。起义队伍占领全城后，召开了群众大会。万益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宜兴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发布了《告全县人民书》，提出了政纲。接着，又召开了农军代表会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众会议，并由段炎华、陈伯祺等6人组成工农法庭，对捕获的土豪劣绅进行审判，当场处决民愤极大者4人，烧毁了借据、田契、租簿等剥削罪证，群众欢呼雀跃。宜兴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大为震惊，南京政府急派第13军2第师4团第1营等部，向宜兴开进。2日午后，工农革命委员会召开会议，认为不宜困守孤城，应主动撤离。3日黎明，万益、段炎华、宗益寿、

陈世明等率领断后的 100 余农军分 3 路由南门、小东门和水路撤退。万益率 20 余人掩护撤退。5 日，段炎华、万益、蒋三大等转移到浙江长兴隐蔽。由于坏人告密，万益、蒋三大和从监狱放出来的王龙庭、姚洪、彭鹤年、李金波、蒋振华等 7 人被反动地主武装张鸣皋部逮捕。从另一路走的陈伯祺、朱炳生也在合溪镇被捕。只有段炎华化装成农民脱险。万益等被捕后，宁危不惧。11 月 22 日凌晨 4 时左右，反动当局将万益等 3 人押赴宜兴体育场枪杀。

宜兴起义虽一度占领了县城，建立了革命政府，但由于敌强我弱，最后遭到失败。宜兴起义震动了江苏全省，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使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革命情绪，为今后的斗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广利起义

1927年11月5日，广东高要县广利区农会领导人陈进等联合永安区农军共300多人，发起了攻打国民党广利区署的武装起义。

高要县广利区地处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残酷的粤西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广利区区长兼大土豪梁印渠即采取大秤收租的办法，残酷剥削农民。广利区农民为反抗梁印渠的统治，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926年初，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西江农会办事处在肇庆成立。办事处首先在广利的沙浦村建立起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陈进为农会主席，陈福昌为自卫军大队长，并以沙浦为基地，向桃溪、典水、砚洲等村发展农会组织。此后，沙浦农军曾组织万余群众到广利区政府示威游行，要求实行“四六减租”、“取消苛刻虐待农民的行为”。但是，农民的正义行动，遭到梁印渠民团的镇压。同年8月9日，陈进率领农民自卫军70多人奋起袭击了梁印渠的民团，打死团丁2名。之后永安区也建立了农民协会。广利、永安两区的农军，曾联合作战，攻打永安区署，取得初步的胜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高要县党组织和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人被捕杀，激起了广大农军的义愤。陈进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号召广利、永安两区农军、农友联合起来，推翻广利国民党区署，建立革命政权。同时，派人将暴动计划报告县农民自卫军总部，得到批准。11月5日，高要县广利、永安等地农民自卫军300多人，兵分四路攻打国民党广利区署。陈福昌带领第1路攻击区署；冯三娣带领第2路攻击广利圩头；陈友带领第3路攻击广利圩尾；陈进带领预备队配合战斗。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利区长梁印渠纠合民团极力反抗。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陈友等7人阵亡，农民自卫军因弹药不足，下午一点钟撤出战斗。广利起义后，国民党广利区区长梁印渠勾结肇庆守备军黄营长率400余人，分两路袭击农卫军驻地桃溪、沙浦，农会正、副主席等54人被捕杀，广利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了。

高要广利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对国民党广利反动政权是一次沉重打击，显示了农民武装的威力。

邕鱼山起义

1927年11月，广西邕宁县农军大队在中共党员陈嘉良（即陈建安）和农军大队长唐光天等领导下，在邕鱼山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邕鱼山位于邕宁县苏圩区境内，距广西省会南宁20多公里。1926年夏，在广西农讲所任教的共产党员宁培璜的宣传鼓动下，吴苏圩成立了区农民协会，吴圩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唐光天任队长。9月5日，邕宁县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达7416人。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土豪劣绅大为恼火。国民党邕宁县政府派县警逮捕了唐光天、甘寿朋等5人。县农会领导人莫峻峰、陈嘉良等闻讯后，立即组织了8000多名农友，奔赴南宁请愿，要求释放唐光天等人。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害怕事态扩大，下令国民党邕宁县县长谢祖萃释放了唐光天等5人。这一斗争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农协会会员的斗争勇气。陈嘉良也在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邕宁县农运和武装斗争有了党的直接领导人。1927年6月，桂系头目黄绍竑令南宁卫戍司令部先后派出警团武装600多人，袭击了吴圩、苏圩等地农协会和农军，吴圩街也惨遭焚毁。为了反抗敌人的屠杀政策，同年11月1日，陈嘉良、唐光天、文树芝等在邕鱼山召集会议，决定将农民自卫队改编为农民赤卫军，并成立了邕宁县农民赤卫军大队，共800余人枪。唐光天为大队长，文树芝为总指挥，黄美臣、陈汉光为副大队长，陈嘉良、唐希贤为参谋。11月5日，正式举行起义。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得悉吴圩农赤军扩大后，非常恐慌，立即令南宁警备司令黄旭初派一个团的兵力对邕鱼山农赤军进行“清剿”，将唐光天等人包围在天利圩，乘机到各乡村抢劫财物。文树芝闻讯后，即调兵力将敌兵击溃，唐光天等脱险。唐脱险后即联络各路农军共870多人，集中到邕鱼山，反击驻天利圩之敌。当晚，分3路进攻，第一路由陈嘉良率领，在邕龙公路上大理江桥左右埋伏，堵截苏圩方面之援敌；第二路由唐希贤带领，在吴圩附近大斜江一带埋伏，阻击吴圩、南宁方面之援敌；第三路由陈汉光率领，从定文、坛蒙村一带包围攻击。其余人员由唐光天指挥。午夜时分，各支队伍到达指定地点。这时，敌人还在睡梦中，唐光天马上发出总攻信号，农军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敌人仓卒应战，乱作一团，开始还想负隅顽抗，当农军冲进天利圩后，敌人一下乱了阵脚，哭、喊连天，到处乱窜，当即被农军俘获100余人，缴枪100余支。逃散到各乡的敌军，又被各乡农军活捉了80多人，只有少部分从沙平方向逃回南宁。

攻打天利圩胜利后，农军建立了邕鱼山游击区。

无锡起义

1927年11月9日，江苏无锡东北乡万余农民在中共无锡县委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无锡是苏南水陆交通的枢纽。20世纪初叶，无锡广大农民除受地主豪绅年年有增无减的田租束缚外，还有种种额外的敲诈和剥削。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无锡制造了“四一四”反革命事变，各级中共党、团组织和农会、工会遭到破坏，农民运动受到摧残。设在城区的党、团和农会、工会等组织领导机构被迫分散转移到乡村。县委委员、县总工会总务部长严朴、县农会主席安友石、县农会组织部长杭果人等一起转移到东北乡坚持斗争。8月底，中共党组织和农会组织基本得到恢复，成为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10月上旬，无锡农民协会负责人杭果人（因安友石已在上海牺牲）收到江苏省委来信，要其立即去上海。杭到上海后，省委常委、农运部长王若飞向他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在宜兴、无锡、江阴等地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并要杭即在上海起草无锡起义计划。计划经省委审查批准后，杭回无锡。随即，省委派省委委员夏霖为省委特派员到无锡，加强起义的组织领导。中旬，中共无锡县委、县农民协会召开会议，分析农村情况，对起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统一了认识。31日，召开第二次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无锡农民革命军和农民革命委员会，推举杭果人为总司令、严朴为委员长。11月5日，王若飞由夏霖陪同，从上海来到无锡，商定11月9日举行起义。11月9日上午，无锡农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本军决定十一月九日晚上九时起，发动全军起义，各路革命军须遵照原定计划发动起义，其各毋违。”同时颁布了由总司令杭果人签署的《无锡农民革命军布告》、《无锡农民革命军临时军法军律》；颁布了由委员长严朴签署的《无锡农民革命委员会布告》，宣布即日起农民革命委员会正式行使权力。县农民革命委员会还发表《农民革命宣言》和《农民革命委员会告民众书》等文件，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是日晚9时，东北乡万余农民群众佩带红布领巾，手持锄头、铁棍、大刀、鸟枪、木棒等武器，以农军红旗为先导，分路向指定地点集中，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总司令杭果人率领太平桥以西、九里桥以东地区的农民2000余人，从钱家巷出发，向安镇、泽上两地进攻。农军总司令部按预定方案进驻安镇东街三善堂，安镇上空飘扬起农军的大旗。其余各路农军也按预定计划行动，起义后2小时占领了安镇、石埭桥、秦家水渠、陈四房、东湖塘等13个村镇。农军所到之处，地主豪绅的义庄、仓厅及住宅。被捣毁，其田单、契约、粮册、借据、租簿悉数焚毁，罪大恶极的地主及其帮凶走狗被镇压。但由于各路农军联络和协同不够，与省委、县委失去联系，无法按预定计划进攻县城。在这种情况下，总司令部下达了“分散转移、停止起义”的命令，随即撤往无锡、江阴、常熟三县交界的顾山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国民党无锡当局接到农民暴动的报警后，于次日清晨，派驻无锡陆军第13军第1师特务营的1个连，以县公安局侦缉队为向导下乡，经东亭、安镇等地，进驻严家桥。翌日，又加派师属工兵团第1营的1个连进驻东亭，作为后援。县警察队、保安队也尾随下乡，进驻安镇等地，在东北乡及顾山地区轮番进行“清剿”，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农运骨干。11日，县委机关被破坏，夏霖、乔心全、孙翔风等人被捕。13日，被农民起义吓得惶恐不安的国民党无锡当局，匆忙将夏霖、乔心全、孙选、张杏春、邵杏

泉、严寿鹤等 7 人在南校场杀害，并将烈士首级分悬在无锡 5 个城门口及火车站、东北乡等处，示众 3 天。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左派人士及无辜的工人、农民惨遭杀害或关押。

无锡起义，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广大农民这种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很大威胁。它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培养锻炼了革命骨干。

良田起义

1927年11月9日，中共湖南郴县县委领导暴动营，在良田等地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9月间，中共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向全县党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起义计划，决定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发动一次全县性的武装起义。随后，湘南特派军事特派员伍一仙到郴县，帮助组织武装起义队伍，先后在城区、良田、走马岭、保和圩等地组织了暴动队，并发动群众制造“土炮弹”、梭标、鸟铳。1927年10月7日，为了加强起义领导力量，中共湖南省委又派朱璜、何可来郴县，指导起义。10月中旬，郴县县委制定了郴县起义计划，正式成立郴县暴动营，营长万伦，党代表伍一仙。下辖城区、秀良区、秀贤区、凤鸣区、吉阳区等6个暴动连。10月底，县委根据湘南特派10月25日东华山会议制定的起义方案，决定先在良田等地开展武装起义，为全面起义创造有利条件。11月9日夜，良田起义打响。在县委书记夏明震、暴动营营长万伦、党代表伍一仙等指挥下，良田暴动队分四路包围了良田清乡委员会，随即破门而入，缴枪10余支，子弹200多发，打死敌人2名。第3天，暴动队又袭击良田乡挨户团，打死团兵16名，缴枪12支。18日，暴动营攻打良田税卡，缴枪4支、子弹600多发，并烧毁税卡房屋。接着，良田暴动队配合走马岭暴动队攻打折岭税卡，缴枪5支。

良田起义取得了胜利，为发动全县大规模的年关暴动打下了基础。

耒阳起义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湖南耒阳县委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在该县境内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派邓宗海回家乡耒阳恢复党组织。9月，中共耒阳县委重建，邓宗海任书记。耒阳县委重建后，制定了在全县起义的计划。11月上旬，邓宗海按计划率领农民武装200人举行起义。起义军首先在春江铺至郴县沿线砍电杆，割电线，张贴标语。尔后攻打了三顺洞、元子山挨户团，处决了首恶分子，起义队伍一直攻打到郴县。接着，共产党员刘泰和周鲂率一支农民武装趁白沙反动法官曹水生娶媳妇办酒席之机进行袭击，处决曹水生等土豪劣绅11名，缴获一批枪支。12月底，李振鹏，谢竹峰领导农民武装在哲口、东江口等地举行起义，杀死当地挨户团头目1名，随后转入常宁县境开展游击斗争。与此同时，张凤岗、罗涛领导的一支300人的农民武装在小水铺、黄泥坳等地袭击敌人。刘竹平率江头、龙塘农民武装处决了土豪劣绅5人。

耒阳起义，遍及全县十多个区乡，动摇了国民党政府在耒阳的统治基础，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斗争信心。

崇明西沙起义

1927年11月11日，崇明人民在中共崇明县委的领导下，爆发了反抗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武装起义。

崇明岛，是我国第三大岛，全域为崇明县，原归江苏省管辖，现属上海市领导。它位于长江入海口。早在1921年10月，崇明平安沙和协安沙等地就爆发过万余农民涌进县城，大闹县署的自发武装斗争。1926年4月，崇明县排衙镇的陆铁强、俞甫才由中共江浙区委派往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9月结业后，被分配回崇明做农运工作。从此，在黑暗中挣扎的崇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斗争。1926年秋，陆铁强和俞甫才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积极培养并吸收70多名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7个党支部。西沙的地主豪绅们看到农民运动声势浩大，惶惶不可终日，纷纷电请军阀孙传芳派兵镇压。崇明县长奚桐也迫不及待地带领数十名警察到凤阳镇对农民进行威胁。为了与“议租大会”作斗争，陆铁强等组织了近万名农民参加大会，迫使县长不得不接受“大租减半”（由500斤减至220斤），“小租取消”（给地主走狗的费用）的要求。在斗争中，广大农民越来越感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便纷纷加入农会。1926年12月在老海桥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推举黄廷相为会长。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斗争的烈火也波及到了崇明。4月11日，党组织动员了回乡农民参加在城东大校场举行的“军民示威游行大会”。10月间，中共八七会议精神陆续传达到各县，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组织全省起义计划紧急决议案的指示，崇明党组织积极准备举行起义。11月初成立了“崇明县工农革命军联军总司令部”，并确定11月15日为全面起义之日。崇明农民运动的不断高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并下令通缉陆铁强。为此，陆铁强被调往海门县任县委书记，崇明由俞甫才继任县委书记。陆铁强离开崇明后，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又嚣张起来。11月11日，西沙大地主朱德和派他的女婿沈耀忠等4人到佃农吴清郎家，一面监督群众甩稻，强行收租，一面窥探中共党组织的行动。他们强令农民当场按增租标准将租谷全部送到朱德和家。当地群众怒不可遏，在共产党员黄廷相、黄友明的带领下，将沈耀忠等4人抓了起来，押至永安镇海边处决。但沈耀忠未被击中要害，倒地装死，待执刑人员离开后，逃回家中，并纠合2个地主到县府报告，要求派兵镇压。反动军警到崇明后就四处搜捕抓人，放火烧房，并在刘士珍家搜出“崇明县工农革命军联军总司令部之印”及准备参加起义的骨干名单，使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1928年1月，中共崇明县委又计划在旧历年关举行起义，不料又为反动当局侦知，共产党员高士贤、黄廷相等相继被捕。崇明人民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反抗地主豪绅和反动当局的斗争，并取得一些胜利，充分体现了海岛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和顽强意志。

东固起义

1927年11月12日，中共江西省吉安县东龙支部在兴国、泰和、永丰、吉水、吉安五县边界的东固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共产党员赖经邦回到家乡东固，发展中共党的组织，先后吸收了汪云从、刘经化和李会凤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东固党小组。1927年2月，成立东固九区农协。不久，县农协发给东固九区农协9支枪和一些子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军驻吉安第8师师长朱世贵，在吉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吉安的革命运动转入低潮。1927年9月下旬，赖经邦等人在东固敖上秘密召开东固党员会议。会议决定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成立中共东龙支部（东固与南龙），支部书记赖经邦；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成立东固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债、抗租斗争；建立革命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10月，中共江西省委和赣西特委代表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中共东龙党支部，一方面成立了东固最早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由赖经邦任队长，30余人；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争取以段月泉为首领的“三点会”绿林武装的工作。经过艰苦工作，段月泉率领20余人，携带14条枪，参加了东固工农革命军。至此，东固工农革命军成为一支拥有100余人、30余支枪的革命武装队伍。1927年11月初，驻吉安县国民党军队调防，城内空虚。东龙党支部决定当即举行武装起义。11月12日，赖经邦、段月泉等率领工农革命军和暴动队员160余人，手持长枪、梭标、大刀、鸟铳，烧毁大恶霸王初曦住宅，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13日，起义队伍乘胜开进距吉安县城仅20里的永和圩，捉拿豪绅地主等8人，筹得军饷近万元。25日，又到吉水水南圩，收缴吉水豪绅枪支16支。26日，起义队伍返回富田。

东固起义的胜利，使赣西南各县的反动分子大为震惊。12月12日，富田、新安、新圩、陂头、值夏“五市联防”靖卫队和吉水靖卫团向东固进攻，企图一举消灭东固革命武装。为保存力量，东固工农革命军转移到永丰、吉水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东固工农革命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后与永（丰）吉（水）游击队合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赖经邦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吴江任队长，段月泉任副队长。到1928年春，在东起南龙、西到仰龙坑、南起罗坑、北到三彩纵横15公里地区，建立了东固革命根据地。

武汉工人起义

在中共湖北省委直接组织领导下,武汉工人于1927年11月12日举行了起义。

1927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爆发宁汉战争。下旬,唐生智政权顿呈动摇之势。10月26、27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武昌、汉口、汉阳工人立即开展经济、政治斗争,进而组织工人起义,夺取政权。会后,各级组织着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1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计划在唐军退出武汉时,组织工人积极分子占领工厂、机关、邮局、军工厂和交通要道,公开恢复各行业协会。12日,省委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然后组织武汉三镇工人武装进攻汉口友益街,公开恢复湖北全省总工会,暂时代行政权职能。中午,武汉国民党驻军采取突然行动,收缴了埋伏于友益街的工人武装队枪支;法租界当局也架设机枪、电网、路障,戒备森严。迫于形势,湖北省委只得取消攻占友益街的命令。但汉口二区区委因未接到命令,仍按原计划派工人前往参加起义,结果遭敌军警镇压,省委委员、工运领袖马得胜等人牺牲,80余名武装工人全部被捕。13日,中共武昌市委组织武胜门外纱厂工人围攻厂保安队,后惨遭国民党军警镇压。同时,武昌共青团市委组织部分青年攻击武昌监狱,救出被关押的革命群众百余人。15日,南京政府军队进驻武汉,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共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工人起义暂告结束。1928年1月11日,湖北省委决定利用除夕之夜(1月22日夜)发起年关起义,并请途经武汉的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起义前夕,国民党当局破获了起义计划,即令全市戒严,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年关前后共屠杀300余人,武汉三镇党的组织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失,年关起义被迫取消。

黄麻起义

在中共湖北省委和黄（安）麻（城）特委的组织领导下，1927年11月13日在湖北黄安麻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著名的黄麻起义。

黄安（今红安）、麻城，位于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南麓。1927年3月，中共麻城、黄安两县县委和两县农民自卫军相继成立，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自卫军牢牢地掌握在中共组织的手中。9月初，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中共湖北省委将鄂东起义区划分为大（冶）阳（新）、黄（梅）蕲（春）广（济）、黄（安）麻（城）3个特区。中旬，中共黄安县委代理书记郑位三、陈定侯等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的决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指示，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会后，大家分散到各区发动群众，进行起义的准备。下旬，省委派人先后两次在麻城县邱家畈和林家山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并决定与黄安共同行动。从9月26日起，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联合广大农民群众，相继起义，逮捕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仅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先后就有数十处近万农民起义，故称“九月暴动”。这次起义由于两县县委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群众发动不够充分，亦未建立工农革命军，又因国民党第30军的“进剿”，“九月暴动”陷于停滞，未能扩大战果。

10月下旬，中共湖北省委派符向一巡视黄麻区，继续发动组织起义。此后，省委又派吴光浩、王志仁到黄麻区参加领导起义。吴光浩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11月3日，省委代表召开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正式成立以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委和以刘镇一为负责人的鄂东革命委员会，同时改组了黄安县委，由王志仁任书记。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展组织，改造黄、麻党团，整顿农民自卫军，并加紧训练。会后，两县县委负责人和一批党团骨干分别到各区进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11日，黄麻农民自卫军进驻七里坪，打击豪绅地主，惩办反动派，举行游行示威。接着黄麻特委决定举行起义，夺取黄安县城。成立了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13日，黄麻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两个排，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锐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当夜10时，起义大军向黄安县城挺进。黄安七里、紫云、城区、桃花、高桥、二程等区农民群众分别在李先念等人的率领下，从四面八方黄安县城进发。参加起义的农民约有3万人。麻城农民自卫军另一个排在黄（安）光（山）麻（城）交界之北界河负责警戒，以防河南光山红枪会进犯。14日凌晨4时，攻城部队在城内群众的配合下，自卫军在前打先锋，义勇队继其后，由西北城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30余支，子弹90箱，活捉县长贺守忠和司法委员、改组委员等贪官污吏及土劣15名，并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没收了县署、改组委员会等一切财物。下午4时，处决了贺守忠等反动官吏。18日，正式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曹学楷为主席。麻城、黄陂、黄冈、罗田及河南的光山、商城等县纷纷派代表来祝贺。19、20日，黄安各区纷纷开庆贺大会，到会群众达7万多人。农民政府成立后，黄麻特委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为第1路，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2路。全军共300余人。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吴光浩、刘光烈为

副总指挥，汪奠川为参谋长，潘忠汝兼第1路司令，吴光浩兼第2路司令，戴克敏为第1路党代表，刘文蔚为第2路党代表。黄、麻两县的义勇队共有4万人，以区成立指挥部。11月26日，潘忠汝率领鄂东军主力部队，到南乡开辟工作。鄂东军在南乡农民配合下，歼灭八里湾红枪会50余人，缴枪50余支，掀起了南乡农民起义高潮。留守县城的起义武装同全城工农群众紧密配合，在刘镇一的指挥下，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了黄麻起义的革命旗帜。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12月初，国民党第12军教导师闻清霖部自豫南进攻麻城西张店，以图进犯黄安城，遭到乘马、顺河等地农民武装的抗击而未得逞。5日夜，取道宋埠、尹家河，奔袭黄安城。鄂东军和义勇队据城固守，与敌展开英勇的抗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到翌日4时，因敌众我寡，城门被敌攻破，鄂东军和义勇队同敌反复拼杀方突出重围，但伤亡很大，潘忠汝、王志仁牺牲。国民党军占领黄安县城后，8日进占麻城。黄麻两县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趁势还乡，勾国民党军进行报复，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鄂东军第2路党代表刘文蔚，麻城县农会委员长刘象明等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仅黄安北乡就有数千农民群众被屠杀。

12月中、下旬，从黄安城突围出来的鄂东军和义勇队，大部分于29日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区。1928年1月1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部队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经过艰苦的斗争，在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区域”。后来，红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逐渐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桃源西路起义

中共湖南桃源县委领导桃源县西路群众,于1927年11月15日在该县栖凤乡、中和乡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中共桃源县委成立。10月,中共湘西特委派刘纯则到桃源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湘西特委会议精神,决定成立桃源县武装暴动行动委员会,大力发展组织,集中力量,以群众基础较好的木塘、畚田为中心发动桃源西路起义。会后,刘纯则来到畚田,找到共产党员张祺等人,开会讨论了如何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明确提出“夺取敌人武装,迅速武装自己”的口号。张祺将本地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还找到了活动在漆家河一带的共产党员徐才益、周维城,与他们具体研究了起义的问题。徐才益等人根据县委的部署,立即来到栖凤乡,沟通了与中和乡、栖凤乡、长岭乡原农协会骨干的联系。11月15日,徐才益、周维城等10余人在栖凤乡举起武装起义大旗,杀了当地税吏;张祺等20余人也在中和乡青龙寺宣布起义。接着,两支队伍会聚中和乡的青龙寺。11月18日,中和、栖凤、长岭等桃源西路的9个乡镇、100多名代表在青龙寺开会,成立了湘西北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徐溶熙苏维埃政权,张祺任主席,下设3个区。同时还建立了有30余支枪、100余名队员的桃源第17游击大队,大队长徐才益,政委张祺。

徐溶熙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湘西特委和桃源县委领导下,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了破坏敌人通讯、惩办土豪劣绅、攻打团防局、建设政权等一系列活动,使徐溶熙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发展,游击队发展到100多支枪,近300余人,形成了东连常德,北毗临澧、石门、慈利的武装割据区域。1928年5月,国民党桃源县政府派一营兵力,并联合几支团防武装500余人,向徐溶熙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徐才益、张祺率游击队在青龙寺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游击队30余人牺牲,徐才益率余部转移到太浮山,并入湘西特委组建的革命武装。

后滕起义

1927年11月15日，在中共江苏江阴县委的领导下，江阴后滕农民举行了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

后滕是江阴城东北的大集镇，距城26公里，是通往沙洲（现张家港市）的咽喉要地，驻有国民党公安第3分局，有警察20多人、毛瑟枪10支，敌守备力量较弱，农民运动的基础较好。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派省委委员钱振标到江阴任中共江阴县委书记，指导农运工作。他向县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江苏农民运动计划》，计划在江阴发动秋收起义，以后滕为突破口，逐个攻打杨舍、华墅、顾山、长泾等乡，然后与无锡的东北乡联成一片。为加强组织指挥，县委组织了一支以后滕、周庄、云亭、长春等地的农民和长山采石工人为主体的近百人的江阴农民革命军，钱振标（化名高大鹏）任总司令，茅学勤（化名王天民）任副司令。11月15日晚，茅学勤、陈叔璇、朱松寿率领后滕、云亭、长泾、长寿农运骨干和采石工人共150多人，携带刀棍、长矛，埋伏在起义指挥所——后滕通兴桥北挽一间小屋左右，待机行动。深夜1时许，钱振标一声令下，起义队伍迅速割断了后滕到江阴的电话线，一部分人守住外围，钱振标和茅学勤带领突击队员悄悄向公安分局所在地——法水庵摸进。快至庵门时，岗哨发现有异，即鸣笛报警。茅学勤利用小学校长身份，佯称有事找局长，机智地解除了岗警的武装。钱振标当即率起义农民高喊口号冲进警察卧室，警察慑于起义农民的声势，不敢贸然开枪。起义农民砍伤了2名反抗的警察，缴获8支毛瑟枪和一批子弹、刺刀、警服等。在鸣枪40余响示威庆贺后，又冲进禁烟检验所，砍死1名值班的护缉队员，缴毛瑟枪1支。接着，包围乡行政委员、劣绅俞道聘家。俞进城未回，农民将其田契、债据、租簿及房屋一起烧毁。凌晨2时，队伍张贴农民委员会、农民革命军的布告和“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后撤离。后滕起义首战告捷，反动派一片慌乱。清晨，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长张品泉奉命率警察3个排，会同驻澄国民党第13军1师2团的2个连，赶往后滕、顾山等地“围剿”。11月27日晚，钱振标、茅学勤与朱松寿等率领云亭、长寿、周庄方面的农民在占文桥举行起义，镇压了土豪缪受之，烧去其田契和债票，并将财产分给农民。12月20日，为反击敌人的白色恐怖，县委果断决定再次举行后滕起义。钱振标、茅学勤等连夜调集沙洲、云亭、长寿、周庄、长泾等地农民及无锡、常熟方面的武装近3000人，乘月黑突击后滕镇。21日凌晨3时，担任主攻的100多个农民，分东西两路直取目标。公安分局长率警卫抵抗。激战1小时，农民未能攻入，警察数次冲出，也被击退。双方对峙良久。经过艰苦激战，终于攻入。这次起义共打死警察6名，密探2名，缴获毛瑟枪3支。两次后滕起义的胜利，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志，江阴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得到迅速发展。1928年1月上旬，召开了中共江阴县第一次党代会，选出了新的县委领导机构。新县委决定将农民革命军改为江阴红军，下设4个支队，统由县委军事委员茅学勤领导。1月13日凌晨，茅学勤率部分红军战士再次袭扰后滕公安分局。一阵战斗后，红军旋即转至善政桥处决了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反动圩长卢士荣。

后滕起义，使反动派大受震动。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县委决定举行新的农民起义。

雪峰山第一次起义

1927年11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第12团特务连副连长李杰在共产党员张伯伦等策动下，在宁乡与益阳、安化三县交界的雪峰山举行一次起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驻扎湖北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第12团特务连副连长李杰，在共产党员张伯伦等人的策动下，率部夺取了该团留守处所存的步枪60余支、子弹3000发后，即乘船到达蒲圻县，准备配合驻在该县的第13军文修信团2个营起义，由于计划不周，受国民党军镇压，未获成功。李杰和符葵率余部于1927年11月中旬到达雪峰山，正式举行起义。不久，张伯伦回湘，参与领导这支起义队伍，并与在沩山进行游击活动的宁乡县一支农民武装会合。此时，李杰率部出其不意截击国民党第44军叶开鑫部，迫使叶军一个营率部投诚，获得长短枪400多支，实力大增。中共湖南省委将李杰部编为工农革命军湘中游击总队，李杰任总队长，宋觉、何武、符葵等分别任大队长。省委派曾劲松任参谋长，赵赤心任政治副主任。

湘中游击总队成立后，以雪峰山为根据地，在宁乡、安化、益阳三县交界的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斗争，不断打击三县的反动势力，打了许多胜仗，多有缴获。

1928年春，屡遭败绩的大沕、望北、同文镇团防武装，与县团防总队蒋隆权部会合，“围剿”湘中游击总队。由于内部出现叛徒，李杰中计，结果在湘乡与宁乡交界的杉木坳被湘乡、宁乡两县团防武装包围，游击总队在突围中伤亡惨重，李杰被杀害，余下的游击队员大多战死，雪峰山起义终因领导内部不纯、投敌叛变而失败。

万安起义

1927年11月20日至1928年1月，中共赣西特委和万安县委在江西省西部万安县领导了武装起义。

1926年5月，万安部分乡村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千余人。7月，中共万安支部干事会正式组建。1927年6月，中共万安县委成立，张世熙任县委书记。这时，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曾天宇回万安工作。1927年，农协会会员骤增至5万余人，成立了县区各级农民协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军”占据万安县城，中共万安县委工作转入地下。9月中旬，万安县在罗塘至善小学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江西省委暴动计划，决定择时举行武装起义，攻打县城。10月，中共赣西特委在万安建立。中共长江局代表余球、省委代表汪群、团省委书记吴振鹏、赣西特委代表曾延生等先后奉命到万安指导工作。10月中旬，万安县委召开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汪群代表省委作了《江西政治形势和省委秋收暴动计划》的报告，要求革命基础较好的万安率先行动，夺取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会上宣布成立万安行动委员会，曾天宇任书记，作为赣西特委直接领导的万安暴动总指挥机关。会议还决定组建3支武装纵队，第一纵队总指挥张世熙，主攻县城东门；第二纵队总指挥刘兴汉，主攻县城北门；第三纵队总指挥刘光万，警戒县城西门和芙蓉门，协助攻打北门，并由曾天宇、张世熙、肖素民3人组成参谋部，具体负责策划攻城。会后，与会代表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发展和壮大中共党的组织。万安县委从各区、乡工农武装中选拔了一批青壮年，组成以杨德明为队长，陈正人为党代表的赣西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作为县直接指挥的地方武装。县委还将各区农协会会员编为工农革命军，按区大小分5个纵队，纵队以下分别组建了大炮队、快枪队、鸟枪队和马刀队。总数达1.1万余人。11月20日拂晓，万安县各路农军向县城发起猛烈的攻击。战斗持续了一天，由于农军缺乏攻城经验，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攻城未果。3天后，敌人从赣州派出两个连的兵力进驻万安县城。

首次攻城失利，万安县委改组，取消“万安行动委员会”，由县委直接领导起义，并决定万安农军协助泰和农军攻打泰和县城。11月25日，万安农军140余人在曾天宇、张世熙率领下智取了泰和县城，缴枪60余支，子弹6箱，救出被关押的群众100余人。

万安农军攻打万安和泰和县城的行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恐。国民党驻军和万安、泰和、遂川三县靖卫团联合向万安县的罗塘、通津等地大举进攻，妄图消灭农军。万安人民决心再次攻打县城。12月24日，万安县委集中农军及暴动群众近3000人，直捣县城。战斗持续半日，农军伤亡30余人。由于农军主力一时尚无法投入战斗，万安县委决定攻城农军撤出战斗。12月31日午夜，万安、泰和农军8000余人，集中快枪50支、土炮30门、土枪500支和大刀梭标等，分3路纵队6个大队第3次攻打万安县城。这次攻城战斗因未能按时发动总攻击，致使第2、第3纵队先后失利，伤亡10余人。第1纵队苦战7小时，毙敌30余人，缴枪6支，但因孤军奋战，不得不撤出战斗。1928年1月9日，万安县委领导农军和群众共4万余人，再次攻打万安县城。困守县城的国民党军刘士毅部1个团和遂川败逃来的王均部工兵连见农军声势浩大，不敢恋战，慌忙弃城分水陆两路向赣州逃窜。至此，万

安农军终于胜利地占领万安县城。11日，成立了江西第1个县苏维埃政府，选举刘光万为主席。

13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和卫戍司令王均抽调国民党第27师杨如轩部第81团和第79团1个营，开进泰和。22日，第81团进攻万安县城，国民党军第46军方鼎英部也调兵1个师驰援万安。23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万安农军分两路撤出县城，一路由张世熙率领前往河东，向兴国、吉安东固一带转移；一路由曾天宇率领前往河西，转战于遂川、万安边界，向井冈山靠拢。退往河西的农军连遭重创，起义领导人曾天宇不幸牺牲，余部分散隐蔽乡间。退往河东的农军则与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第9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转战于赣西南。

天汉起义

在中共鄂中北部特委统一领导下，天门、汉川两县游击队于 1927 年 11 月 22 日举行了以攻打汉川县分水咀镇为起点的武装起义。

1927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趁国民党宁汉战争开战、鄂中地区防卫空虚之机致信湖北省委，指示鄂中北部以秋收起义基础较好的天门、汉川为中心，再次组织农民起义，割据两县向周邻地区发展，创建一块独立割据区域。中共鄂中北部特委书记王平章主持召开天门、汉川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商定两县农民武装联合起义计划，决定 20 日合攻汉川县城。后因汉川县城增强了防守力量，鄂中北部特委改在反动势力较薄的分水、杨林等地发动武装起义，然后向重要城镇推进。20 日北部特委暨汉川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对联合起义作了部署，决定汉川县委负责人刘子谷、杨其祥速带汉川游击队前往天门净潭，与天门游击队会合，22 日正式举行起义。是日凌晨 2 时，天门、汉川两支游击队共 60 余人从净潭出发，分 3 路攻打汉川分水咀镇，处决公安局局长、禁烟局长和当地土豪 10 余人，起义首战告捷。然后乘胜奔袭杨家铺子、芦排两镇，镇压反动官吏、土豪劣绅数人，将他们的财产分发给贫苦农民。此时，起义队伍增至数百人。24 日，起义队伍顺利占领南河渡。28 日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地主、奸商、流氓 5 人。当晚，中共鄂中北部特委在庙头召开会议，通过分水、杨林起义宣言和告农民群众书，决定集中所有武装进攻汉川第一大镇系马口，进一步扩大起义的胜利成果和影响。12 月 1 日，天汉起义武装向系马口进发，途经屈王家台时，与前来镇压起义队伍的国民党部队遭遇。战斗中，2 名战士阵亡，多人负伤，汉川县委委员杨思盛等 5 人被俘，后被杀害。天汉起义严重受挫，农军被迫分散行动，汉川游击队在刘子谷、程棣华率领下转往庙头、榔头、南河渡头和邱子埡地区开展反“清乡”斗争；天门游击队一部移师沔阳，加入肖仁鹄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另一部在天北、天西地区坚持隐蔽斗争。

历时 9 天的天汉联合起义，镇压土劣、团防近百人，震动天汉，鼓舞了群众，锻炼了游击武装和农民群众，为以后开展武装斗争和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和乐起义

1927年11月22日，广东琼崖万宁县第3区以及盐墩、涛一、和乐、港北4个乡的农军和群众700余人，在东路工农革命总指挥徐成章带领的300多名武装人员协同下，在万宁县和乐镇举行了武装起义。

和乐镇，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1927年11月中旬，以徐成章为总指挥的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在万宁县第4区的孤村成立。鉴于和乐镇郑海宁、陆天祥、林茂森和李鼎元民团经常出兵镇压盐墩、涛一、和乐和港北4个乡的农民运动，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徐成章决定发动群众除掉这帮民团。11月22日，徐成章带领东路军300多人，中共万宁第3区委军事部长叶冬青带领万宁第3区一连农军70余人，组织盐墩、涛一、和乐、港北4个乡群众600多人，攻打和乐镇民团。中午时分，起义队伍兵分3路进行强攻，顿时枪声、军号声、冲杀声和群众的呐喊声、口号声响成一片。起义群众用斧头劈开民团据点的门窗、砍断栏杆，用铁锤、棍棒砸穿民团据点的墙壁，让工农革命军向内开枪射击、投掷手榴弹。民团官兵纷纷向镇北街道集结，利用铺店负隅顽抗。这时，工农革命军已攻破北门炮楼，直向正街冲过来。包围圈越来越小，民团抵挡不住，下午5点钟，从镇南突围而去。

这次起义，打死打伤团兵数人，缴获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一批，并烧毁民团营房数间。

澄海抗租起义

1927年11月25日，中共广东澄海县委领导数百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叶浩秀来到澄海，在叶的指导下，澄海县部委于同月在七区后沟村召开中共澄海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广东省委关于加紧各地暴动的指示。同时，选举产生了以詹天锡为书记的第一届中共澄海县委。县委成立后，先后建了3、7、8、9等4个区委会。为开展锄奸反霸及解决活动经费，还成立了一支2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队长张福海，活跃于莲花山附近一带乡村。隔不久，中共澄海县委接到中共广东省委要求各县开展抗租大暴动的指示，即召开县委会进行研究，确定先从群众基础较好的九区发起，以带动全县各。11月下旬，抗租暴动开始，县委首先令九区区委召集群众大会，发动农民拒绝向地主交租。接着，西浦、新楼等乡村积极响应。由于国民党澄海政府和地主武装“清乡”，抗租活动进展困难。为打开抗租暴动的局面，25日，县委命令在9月起义中建立起来的第4独立团60余人攻打盘踞在八区桂林寨的反动武装。因敌早有准备，激战一天不克，遂撤回九区驻地。同日晚，张福海率赤卫队10多人在地下交通员陈霸臣等带领下，秘密潜入八区石龟头启明学校，当场处决该区民团局局长陈梅友，劣绅陈驯窗、陈英敬等，并引导群众开展抗租运动，从而推动九区起义。两区起义群众1000多人先后共收缴反动派的枪40多支，弹药一批。随后，三、六、七等区也予以响应，并准备继续集结力量向各乡封建堡垒发起进攻。因反动派已有准备，八、九区的革命武装在进攻中遭受挫折。12月2日下午，国民党澄饶澳保安队会同潮安侯映澄保安队400多人，分3路包围了八、九区，县委即集合第4独立团和县农民赤卫队及八、九区农军四五百人应战，激战2天，因弹药不济，起义队伍被迫撤往六、七区等地。随后，保安队在樟东地主武装配合下，对八、九区乡村大肆进行劫掠，群众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劫，不少党支部遭受破坏。八、九区武装起义受到镇压，其他各区的行动不得不中止。

澄海抗租起义，虽然遭受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各地的武装起义，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后来澄海党组织进一步开辟潮澄饶边莲花山游击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陵水第二次起义

1927年11月25日，广东琼崖陵水县1000多农军和数以千计的群众在中共陵水县委的领导下，在陵城镇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6月，中共琼崖特委派特派员何毅和军政干部冯娥群、王志超等人带领一个短枪班到陵水帮助组建县委。7月初，中共陵水县委在坡村成立，黄振士（黎族）任书记、陈贵清、周文朝分别担任组织、宣传部长，并建立起一支以黎民为主体的陵水农民自卫军。7月11日，农军800人在黄振士率领下，攻打县城，因缺乏攻坚武器，未能攻克。农军领导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于17日再次组织1000多农军和数百名群众一举攻克了县城。21日成立陵水县人民政府，由欧赤任主席，黄振士、王昭夷、陈贵清、何毅等为委员。7天后因敌人反扑，农军主动撤离县城。11月中旬，中共陵水县委召开会议，决定于11月25日举行陵城起义。琼崖特委对于陵水县委作出的决定非常重视，派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徐成章率领东路军前往配合，并派陈垂斌、王业熹等人赴陵水指导工作。11月21日，徐成章率领东路军3个连从万宁县第4区孤村出发，进军陵水。25日拂晓，陵水1000多名农军和数以千计的群众，在县委书记黄振士、总指挥王昭夷率领下，包围陵城。国民党陵水县长邱海云及敌军闻风丧胆，弃城逃跑。陵水农军第2次占领县城。当天下午4时，徐成章率部赶到陵城配合农军追歼溃散的残敌。

12月16日，陵水县召开工农兵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宣告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王业熹为主席。苏维埃政府机构分别设军事、财政、民政、土地、宣传、交通、妇女等7个科。这是琼崖最早成立的县一级苏维埃政权。人民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尤其是长期受欺压的黎族同胞，翻身做主人的愿望更为强烈，纷纷投身革命运动，成为琼崖革命斗争的生力军。

泰和三十都起义

1927年11月26日，中共江西省泰和区委在该县三十都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7月，中共党员康纯回家乡泰和县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了翁德阶、胡运椿、彭昌士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中共泰和区委成立，康纯任书记。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泰和中共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向秘密，由县城转向农村，泰和区委转到河东三十都。三十都包括冠朝、上模两乡的10余个村，地处万安、泰和两县边界，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便于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扩大红色区域。康纯、翁德阶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发展中共党员350余名，建立了10多个党支部，在三十都周围40余公里的范围内都有共产党的活动。各地农民协会也相继建立。1927年秋成立第五区农民协会，肖拔群为主席。同时，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农民自卫军，肖南薰为大队长。为壮大革命声势，泰和区委组织农民自卫军攻打老四坑的标厂（即赌场）和莲塘、冠朝的烟场（鸦片烟）；在下坑、心田、平原、白竹、南舍、文塘、山田、东岭、坎头等村打击了多家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农民，并烧毁各种契约、债簿；还配合万安农军打击万安的中塘、土塘等村的土豪劣绅。

中共“八七”会议后，泰和区委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和赣西特委的指示，制定了三十都起义计划。11月中旬，在泰和县城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郭合和探得国民党县长高本初，从吉安领回一批枪支弹药，准备成立县靖卫团，即将这一消息转告中共泰和区委。康纯、肖拔群等区委领导人决定立即举行起义，攻打县城，夺取这批枪支武装农民。25日晚，泰和县三十都等地农军800余人带有来福枪10余支、土炮2门、鸟铳40余支及梭标、大刀等武器，在“喜庆堂”集合，由肖南薰带领开往县城。另由曾天宇、肖玉成率领的万安县农军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从百加乘船顺赣江而下。26日黎明，万泰两路农军会合水南，即分别从西门、南门两面攻城。暴动农军在郭合和率领的城内工人支援下，很快攻下泰和县城，缴获长短枪70余支，子弹6箱，打开监狱救出100余名革命者和无辜群众，农军随即撤离县城。27日清晨，泰和县三十都200余名农军再次进入县城，冲进县府，烧毁粮食，并没收一批银元和财物，随后撤离县城。之后，三十都农军还参加了万安起义。

珠湖起义

1927年11月28日，中共江西省鄱阳县委在珠湖乡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珠湖乡位于鄱阳（今波阳）县城北面约40公里处，是个半岛乡。1927年初，中共党员李新汉等人到珠湖乡发动农民向地主豪绅展开斗争，成立了农民协会。中共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江西省委为加强对鄱阳党组织的领导，派省委特派员刘士奇兼任鄱阳县委书记，9月下旬，刘士奇在距离县城七八里的风雨山召开党员大会，决定以珠湖地区为中心，把珠湖、肖岭、龙山、华山作为鄱阳的4个革命活动区，同时成立珠湖苏维埃政府，李遇臣任主席，曹仁德任副主席。会后，各级干部都深入到各乡村，为秋收起义做准备。10月，中共赣北特委书记林修杰调任鄱阳县委书记。林到鄱阳后，即在珠湖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林兼任主席。林修杰和周寂丞在鄱阳县城内还秘密组织了一支20余人的武装队伍，准备在城内策应起义。正当各项起义准备顺利进行时，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鄱阳县靖卫队突然包围县委机关驻地，县委主要领导人林修杰、周寂丞被捕牺牲，机关遭到破坏。针对这一突变，县苏维埃政府作出决定，发动珠湖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反击县靖卫队的破坏。

11月28日，珠湖5000余名农民，携带锄头、木棒、扁担、大刀，由周书经、刘维显、曹元德等人率领，以向土豪劣绅清算公款为名，分4路向珠湖反动势力的集中点——雨田村发起攻击。起义队伍打败了雨田村民团，烧毁土豪劣绅李衡山的房屋及账簿、田契，没收其300多担粮食，1300多担黄烟及一批钱财、衣物，分给穷苦农民。12月2日，鄱阳县靖卫队、土新区靖卫团等6000余人，分3路向珠湖反扑，镇压珠湖农民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农民武器缺乏，轰轰烈烈的珠湖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

丹阳起义

1927年11月下旬和1931年1月8日，中共江苏丹阳县委领导胡家桥农民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

丹阳是沪宁铁路上的一个县城，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只有30多公里。1927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制定了《江苏农民运动计划》。《计划》下发不久，省委常委、省农运部长王若飞向丹阳县委书记管文蔚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及省委关于组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的计划。指出，丹阳是江南江北的交通枢纽，起义可以影响沪宁线交通。他要求管文蔚回丹阳赶紧准备，把丹阳地区的武装起义尽快搞起来。管文蔚回丹阳后，立即召开县委会议，传达省委指示，然后分头到各乡去做宣传组织工作。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县委决定在胡家桥地区首先举万起义。胡家桥位于丹阳县城东北15华里，是一狭长的丘陵山区。这里的中共党支部战斗力较强，群众积极性高。11月20日左右，管文蔚去上海，把起义准备情况和县委的意见向王若飞作了汇报。王若飞同意县委意见。管回来后，立即与县委委员一起领导胡家桥地区农民三千人举行起义。这次起义，因事机不密，敌区公所主要人员事先逃遁，只抓住几个乡长，缴枪20余支。当时，群众情绪非常高涨。不一会，听说丹阳县保安队和镇江驻军向胡家桥扑来。县委认为，敌我力量对比众寡悬殊，难以对抗，决定群众立即解散，管文蔚带领二三十名起义骨干和缴获的枪支转移到丹（阳）、金（坛）边境的里庄一带隐蔽。几天后，他们又在里庄发动了千余人的起义，仍未成功。由于敌人大肆“围剿”，起义骨干难以集体立足，县委决定，掩埋枪支，疏散人员，以保存力量，待机再干。1931年1月8日，中共丹阳县委领导胡家桥农民再次举行起义。8日傍晚，300多农民冒着雨雪，悄悄到贺家庙汇集。县委书记颜辉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宣布了行动计划。半夜时分，起义人员分路直奔胡家桥，包围了解家祠堂。为摸清敌情，先派1人上屋轻轻掀开瓦片侦察，发现有4名警察在打麻将，其余都已睡觉。一部分年轻力壮的武装人员冲进屋内，农民群众则在周围呐喊助威。有两名警察负隅顽抗，当场被打死，缴枪2支，其余警察慑于群众威力，夺路而逃。接着，颜辉又带队奔向恶霸地主朱步清家。老奸巨滑的朱步清已闻风而逃，愤怒的起义农民一举烧毁朱步清的房屋。国民党丹阳县政府得报后，派警察前往兜捕，结果扑空而回。

丹阳胡家桥等地的两次起义，规模虽不大，但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望山起义

1927年11月下旬，中共豫南特委和四望山特别支部在信阳县四望山领导和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四望山位于河南、湖北两省的信阳、桐柏、随县、应山4县交界处。1927年7月，当地部分农民因不堪土豪张显卿的欺压，自发起事杀死张显卿及其亲信，并收缴了部分团丁的枪支，聚集四望山祖师顶山寨，形成了一支与地主豪绅相对抗的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隐居于四望山附近冯家庄的原信阳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共产党员王伯鲁，敏锐地意识到这支农民武装所蕴积的革命力量，遂与他们取得联系，并获得他们信任。不久，王伯鲁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王克新的指示，以教书为名进驻四望山，开始了对这支武装的争取、引导和改造工作。9月25日，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全省分豫南、豫中、豫北、豫东4区发动秋收起义，并在各区设立特别行动委员会，领导起义。豫南特委以王克新为书记，王伯鲁、龚逸情等为委员。河南省委对四望山的农民武装斗争很重视，指示信阳以四望山力量为基础，以农协旗帜发动斗争。豫南特委据此相继派龚逸情、朱业炳、刘家民和中共信阳县代理书记张志刚等人奔赴四望山，10月下旬，成立了中共四望山特别支部，龚逸情、王伯鲁任主要负责人，具体组织和领导四望山工作。中共四望山特支成立后，全面展开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四望山特支很快改造、掌握了这支农民武装，对其进行了扩充和整训，并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训练。11月初，将这支农民武装正式改编为信阳农民革命军，下设4个行动队，280余人，由王伯鲁任总指挥。

四望山农民武装声势的日渐扩大，引起当地反动势力的极度恐慌，他们密谋策划，妄图洗劫四望山。中共四望山特支结合斗争实际，决定首先拔掉直接威胁四望山安全的杨家寨反革命据点。11月下旬的一个风雪之夜，王伯鲁总指挥率领农军和四望山群众数百人，兵分两路，一举攻破杨家寨，打破了该寨与冯家庄、龙门新店的反动武装的联合。寨主杨氏3兄弟及其团丁仓皇逃走。农军抄没了其田地财产。接着，王伯鲁等率领农军乘胜追击，不断扩大战果，在黄龙寺击溃了反动民团千余人的军事进攻；不久，又夺取了信阳西南重镇冯家庄。12月中旬，确山农民革命军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南下四望山与信阳农军会合，大大加强了四望山的革命武装力量。此后，两支农军密切配合，频频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先是奇袭彭家湾车站，捣毁民国军1个营部，缴长短枪10余支；接着，又捕获附近芦家贩、董家岗四大劣绅，缴长短枪20余支；12月26日，攻打信阳北关，活捉民团军团长朱理亭，毙敌6名，缴枪十六七支；1928年1月12日，出师游河，伏击国民党南路军一部。1月15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在冯家庄召集信阳、确山等县活动分子会议，将四望山地区划为省属特别工作区，建立临时工农革命政权——豫南革命委员会，由蔡训明任主席，并将信阳、确山两支农军合并为豫南工农革命军，以张志刚为总队长，另以农协农民组成农民赤卫军。四望山农民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推动了信阳全县的武装斗争。1月20日，中共党员在信阳游河领导起义，攻打信阳西重镇游河，杀劣绅，开仓放粮，并组建了一支1500余人的农民赤卫队。1月22日，中共党员在信阳北部长台关发起起义，杀豪绅，分浮财，组成一支300余人、数十支枪的农民武装。1月下旬，中共党员在信阳县平昌关领导数百名武装农民一举打垮平昌关镇的反动

民团。与此同时，豫南工农革命军在广大农民的支持配合下，以破竹之势，又先后攻占了信阳县西南部的南王岗、杨柳河、骆驼店、屈山店、龙门新店等村镇。至1月底，形成了以四望山为中心，方圆五六十公里的红色游击区域。

四望山农民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豫南统治的政治中心信阳城。2月3日，以国民党民国军旅长熊绘鹵为总指挥，调集信阳、罗山数县民团1800余人，在国民党军方振武部1个团配合下，兵分3路，对四望山红色区域进行了疯狂的“围剿”。由于众寡悬殊，加之指挥不当，豫南工农革命军被打散，被迫分散隐蔽。

修水攻城起义

1927年11月，在中共江西修水县党组织的领导发动下，全县各地农会会员和农民自卫军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攻城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江西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修水成为赣北暴动的重点地区。为贯彻落实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中共修水党组织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和准备工作。中共修水党组织曾于1927年4月组织发动农会会员举行过四月起义，之后又于7月下旬和8月下旬发动了打击恶霸地主“曹氏三霸”的除曹起义，这两次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修水当局的反动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使修水县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振奋。中共修水县党组织决定抓紧时机，利用农民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农民群众再次举行起义，扩大起义规模，组织攻打县城。11月，中共修水支部组织各地农会会员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攻城起义。各路农军手持各种自制武器，从四面八方如潮般地向县城涌来，喊声震天，英勇攻城。

但由于农民队伍缺乏严密的组织指挥，武器装备低劣，又无攻城作战经验，在守敌的抗击下，农军牺牲1人，重伤数十人，攻城失败。中共赣北特委为加强对修水农民运动的领导，及时派特委书记刘士奇到修水指导工作，在赣北特委和修水党组织的领导下，又动员2万多农民准备第二次攻城。由于国民党第3军第9师进驻修水，遂放弃攻打县城的计划，将力量转入农村，发展农民运动，继续坚持斗争。

水南起义

1927年11月至1929年12月，中共江西省吉水县支部委员会在该县水南地区发动和领导了三次农民起义。

1927年8月下旬，中共党员田峻回家乡吉水恢复中共党的组织，秘密成立了中共吉水支部，田峻任书记。中共吉水支部在水南各乡、村秘密发展农民协会、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10月底，中共吉水支部召开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11月18日深夜，赖经帮带领东龙游击队和工农自卫军40余人，一举消灭地主武装“文昌自卫队”，缴枪47支。起义后，成立了吉水游击队，杨金芳任队长，活动在水南黄竹坪一带。

文昌自卫队被消灭后，水南伪公所和水南地方的土豪劣绅纠集反动土匪武装加紧对水南革命运动的镇压，田峻等被迫离开水南。1923年6月中旬，中共吉水支部负责人曾伯雄等人在上车、下车、周坑、西田、城上、水北等村，先后领导了近千人武装起义，镇压土豪劣绅。不久，起义群众遭到地主武装组织的保卫团和红枪会数百人的进攻。水南地区的革命力量，暂撤退到西田村后的山中开展斗争。

1928年7月下旬，中共赣西特委詹天龙到水南地区开展工作。月底，建立了水南区西田游击队，杨金芳任队长。10月，成立中共水南区委，张德辉任书记。中共水南区委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指示，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大力组建地方武装。1929年3月下旬，水南游击队成立，邱华辅任队长，曾文德任政治委员。5月，成立水南区革命委员会，曾宪永为革命委员会委员。水南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水南地方反动势力十分恐慌。水南反动靖卫团和红枪会经常袭击革命政权。中共水南区委决定举行起义。

1929年12月5日早晨，水南游击队，白沙游击队和上车、西田、松山等村赤卫军共2000余人，包围了水南圩，消灭抽税队30余人。

藤桥起义

1927年12月1日，在中共广东琼崖崖县（今三亚市）第三区委的领导下，崖县藤桥圩举行了工农武装起义。

1927年，在嘉积仲恺农工学校学习的张开泰、陈保甲、占行城、王植三4位中共党员，根据中共琼崖地委的指示精神，潜往黎汉杂居的藤桥地区发动群众。他们在军田、风塘、洪李3个村庄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起3个党支部和200多人的农军队伍。

10月，中共琼崖特委派李茂文、张良栋来到藤桥，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成立了以张良栋为书记的中共崖县第3区委员会，决定在藤桥组织起义。11月底，准备工作大体就绪。为获得武器，张开泰、陈保甲带领8人于30日到达榆林，在早已打入盐田实业团警卫队的农协会会员黎伯盖的接应下，缴获步枪12支。在回来的路上，在灶子袭击了欧九兴民团，缴枪6支。回到军田村，又集合农军100多人，分兵两路开赴椰子园和龙家坡村，处决土豪恶霸和民团团团长龙鸿标、朱仕拔。在这一系列行动后，区委开会讨论下一步计划，大家感到形势严峻，崖县的国民党必然会很快派兵来报复。会上决定，先下手为强，立即占领藤桥。

12月1日早上6时，区委调集农军300多人和群众800多人包围了藤桥，占领国民党崖3区警察署，俘获全部警兵30多人枪。警察署长邢诒炳和商团团团长王访秋乘乱逃跑。第2天，区委组织农会会员500余人，携带长矛大刀等武器到藤桥示威游行。起义后的第5天，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徐成章、副总指挥刘明夏率领第1营部队到达藤桥。当日下午3时，革命军协同农军包围商团，将其步枪50多支全部收缴。至此，农军全面占领藤桥。

起义胜利后，区委组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崖3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李茂文为主席。接着又成立区农会、妇女会、共青团区委和少年儿童先锋队等组织。起义队伍正式组建为1个90多人的红军补充连，张开泰任连长；还组建4个农军连，共计300多人；另成立50多人的工人赤卫队。

1928年1月，藤桥农军紧密配合东路工农革命军攻下三亚港。东路军北上后，农军撤回藤桥坚持斗争。2月末，国民党崖县县长兼南路“剿共”司令王鸣亚率大队人马围攻藤桥，农军被打散。1929年3月，张开泰奉命回到藤桥附近的仲田岭，黎汉人民又团结在中共党组织的周围，建立仲田岭革命根据地。

南田起义

1927年12月1日，广东琼崖西路工农革命军和澄迈县西昌（今属屯昌县）一带的农民赤卫队，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在澄迈县的南田村（今属屯昌县）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4月，中共琼崖地委委员、讨逆革命军总司令冯平被派往西路澄迈、临高、儋县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同年8月，冯平在澄迈县的孔水村小学主持成立中共澄迈县委，吴一清任书记。10月冯平在澄迈县的孔水村，建立起一支有近80人、60支枪的红军连。澄迈县委委员兼西昌区委书记黄瑞三，也在仁教乡建起一支有67人、23支枪的农民赤卫队。同年深秋，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返回琼崖组织农民暴动的王文宇，也在澄迈县他的家乡良田村一带组织起一支农民赤卫队。11月，冯平、符节和王文宇一起，组织成立了西路人民起义军司令部，冯平任司令，符节任参谋长，王文宇任大队长兼教官。起义军举办军事训练班，培训各村赤卫队骨干，为武装起义作准备。1927年12月1日，起义军和各村赤卫队编成的4个连共500多人，以及群众1000多人，手执梭镖、大刀，肩扛自制的土炮、土枪，在冯平、符节、王文宇的带领下，从南田村浩浩荡荡向西进发。一路上起义军拔据点，打民团，势如破竹，几天内席卷西昌、下水、仁教、海军、大坡一带，威慑澄迈、临高、儋县3县，起义取得了胜利。12月12日，工农革命军西路指挥部正式成立，冯平兼任总指挥，冯道南、黄善藩、黄开礼、刘青云任副总指挥，下辖一个营，共约400人。当天，群众报告国民党军在临高龙波村抢劫。冯平立即命令冯道南率领两个连前往攻击国民党军，歼敌一部，缴获长短枪22支。第2天，工农革命军又在澄迈的岭村迎击600多名驻临高、澄迈县的国民党军，打得敌人伤亡惨重，连夜撤退。12月18日，国民党澄迈县长王光伟带领3个连的正规军以及地方民团向西昌进犯。王文宇、冯道南率领工农革命军开到澄迈的鸡毛箭岭，截击敌军。王光伟部被工农革命军截成3段，顽抗两小时后，丢下20多具尸体逃回县城。工农革命军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两匹战马。

南田起义，震撼了国民党在琼西的反动统治，迎来了西路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建立起西昌革命根据地。

清远起义

1927年12月3日，在中共广东清远县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清远县、花县农军组成的清远县工农革命军独立团发动了攻打县城的起义。

清远县的农民运动发展较早。远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就在中共清远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起全县的农民自卫军。清远县农军成立时，设常备大队，大队长赖松柏，下设3个大队，12个中队，农军队伍达1200人。清远县农军同国民党反动民团进行过多次的激烈武装斗争。他们还派出农军武装支援过广宁、花县、英德等县农军抗击反动民团武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清远和全国各地一样，中共党组织和革命干部遭到摧残。此后有280名党员和农军骨干集结韶关，组成北江工农革命军北上湖南、武汉，最后抵达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而留下来的则被迫出走或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10月，为发动广州起义，中共广东省委第25号通告要求各县立即组织起义。此后广东省委派罗绮园向在香港活动的清远县农运骨干赖松柏、赖彦芳、汪耀、林焕文等人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并决定组织清远农军起义配合广州起义。11月25日，赖松柏、刘清、温锦成等在清远农民运动发源地——石板村召开全县党、团员和县、区、乡农会骨干、农军小队长参加的扩大会议，制定起义计划。并决定12月2日晚，在清远的东郊水葫芦岭村召开有清远的200多名农军和花县的160名农军参加的动员大会，宣布成立“清远县攻城暴动行动指挥部”，由赖松柏、刘清、宋华任总指挥。同时宣布成立“清远县工农革命军独立团”，赖松柏为独立团团长，刘清为攻城突击队指挥员，宋华为独立团参谋。1927年12月3日凌晨6点，刘清领导攻城突击队从兰水沿河直插猪行，沿上廓街运动。攻占水关口防哨位，随即直扑县城南门。攻城农军迅速打开城门，从西门、东门、北门直冲到原定集结点——学宫（孔庙），与团部汇合。刘清率部与花县农军刘绥华带领的6个人突击队攻入县署，俘县长陈守仁及其一批下属官员、差役，缴获县政府大印。正当县城军民欢庆胜利之际，敌县长和几个主要随从在县署后门逃脱，回到天湖塘纠合反动军警头子潘伯良、谢家齐由三码头、城隍庙向县署实行反扑，县署复为敌方所据，仍在署内的刘清、刘绥华等6名突击队员被捕。攻城农军总部闻讯，赖松柏亲赴前沿指挥进攻。但县署建筑高大坚固，农军虽人多势众，但地势不利，械差弹缺，虽经多次冲锋，未能奏效。这时，农军截获敌人的情报：国民党省政府已派出正规军一个团前往清远“平叛”，派往铁路的巡防军亦已回师抵江口、源潭。由于情况突变，暴动指挥部决定在敌援军未到之前，再一次发起攻击。此时已近黄昏，反动县署的军、政头子，惧怕县署再度被农军攻陷，便放出刘绥华6人。农军也在夜色来临之前，撤出战斗，并护送花县农军过了北江河。7天后赖德林等数十名农军赴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其中，郭金广、白金荣、唐明鉴、陈田、黄丽生、向景辉等6人在广州起义中光荣牺牲。赖松柏、刘清等工农革命军独立团领导人惨遭国民党杀害。

沔 城 起 义

中共鄂中特委领导工农革命军第4军和沔阳县农民暴动队，于1927年12月4日举行起义，攻占沔阳县。

1927年11月，国民党宁汉军阀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指示鄂中特委在秋收起义基础较好的沔阳、汉川等县伺机发动起义。11月下旬，沔西区委书记胡幼松和彭国材、郭风珍先后带领少量精干武装，以探亲、访友、求医治病、卖货购物作掩护混入县城，侦察到县警备大队外出“清乡”，守城兵力仅20余人。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据此决定立即举行起义，以里应外合夺取县城。

12月4日拂晓，潜入城内的暴动队员在城头点火，发出讯号，同时，打开城门。埋伏在城外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及农民武装300余人迅速冲入城内。由李良贵、谭翰藻、邓赤中、胡幼松、廖林基等人率领分头攻打国民党县党部、监狱、县政府等地。经过3个多小时的战斗，暴动队伍占领了县城，缴获长短枪27支、子弹2000余发。击毙县长胡宝琼、改组委员刘楚玉等数人，救出特委委员娄敏修及工农群众80余人。当日上午，工农革命军第4军及农民武装主动撤离县城，移师沔西新王家台。

1928年1月1日，中共鄂中特委按照省委颁布的军事编制和番号，正式成立沔阳工农革命军第5军，共100余人，40余支枪。同月上旬，成立了以胡幼松为主席的沔阳苏维埃政府。红5军成立后，以沔西拖船埠为后方基地，攻打沔（阳）监（利）边境各镇团防，缴获长短枪52支，迫使江陵部分团防投城。部队很快发展到400余人，100余枪，成为鄂中、鄂西地区的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

云梦“四维”起义

1927年12月5日，在中共湖北云梦南区区委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南乡地区的赤卫队和农民群众200余人举行了起义。

1927年10月中旬，中共云梦南区区委成立，金秉衡任书记。10月底，区委在隔蒲潭左家庄屋召开扩大会议，商讨武装起义问题。当时云梦南乡大土豪恶霸罗有光，霸占农田800余亩，在罗丝港水府庙设立了警察所，专门镇压人民，民愤极大。会议决定举行以消灭罗有光为主要目标的武装起义。由于“罗”字的繁体为“羅”，群众为了把罗有光斩为两截，故把这次起义的名称定为“四维”起义。

11月3日，区委决定，成立以徐文汉、刘光林等8人为骨干的起义突击队。25日，召开起义骨干会议，将起义时间定为12月5日。是日傍晚，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共200多人按时到达六姓台，王荣甲（原中共汉川县委书记）带来30余人和10余支枪同时到达。王荣甲作了简单扼要动员后，将起义队伍分为4组：第1组攻前门；第2组攻后门；第3组监视左右两侧；第4组监视水府庙警察所。大约三更时分，各小组到达指定位置，王荣甲举起手枪朝天开了两枪，起义开始。顿时，罗家住宅周围的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当晚，正在罗有光家中打牌的水府庙警察所长等人，一见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都吓得乱作一团。因罗宅前后门久撞不开，突击队员便采用火攻，不一会，罗有光的房屋被熊熊大火吞没了，烧死警察所长等8人，烧毁房屋14间，震动四周，群众拍手称快。

起义后，国民党云梦县政府派出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起义成员，中共云梦南区区委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汉寿年关起义

1927年12月7日，中共湖南汉寿县委组织农民群众举行进攻县城的起义。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湘西特委部署所属各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并将汉寿列为暴动重点区域之一。中共汉寿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决定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举行起义，并制定了起义计划。11月下旬，湘西特委派军事干部和农运干部到汉寿加强领导，调中共澧县县委负责人罗卜任汉寿县委书记。12月初，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2月7日举行起义，行动计划是：暴动队夺取商家山、毛家滩、护城3个团防局的枪支及攻打南乡两个大土豪，然后攻占县城。具体分工是：第一路由陈庆生、陈影然带领，攻打蔺家山团防局；第二路由刘文富带领，攻打护城团防局；第三路由罗卜率领，攻打南乡土豪和毛家滩团防局。行动代号为“十四”。12月7日夜，暴动打响。第一路一举拿下了蔺家山团防局，夺得步枪8支。第二路由于负责人刘文富见护城团防局紧挨县城，担心县城守敌增援，因此没有按计划采取行动。第三路在南乡处决土豪李宪垂后，迅速进攻毛家滩团防局。这时因叛徒王海波告密，敌人早有戒备，罗卜、毛德云、毛颖等5人在进攻途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年关起义遂告失败。

长沙灰日起义

1927年12月10日，中共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起义的指示，在省会长沙组织发动了一次城市武装暴动。因当时电报以韵目代日，“灰”即10日，故史称“灰日暴动”。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中共湖南省委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省委继续组织长沙暴动，并派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来湘督促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任弼时到长沙后，经过调查了解，接受省委意见，决定长沙暴动暂不举行，为此引起中央不满。1927年10月1日中央改派罗亦农、王一飞来湖南，执行中央既定方针。10月24日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彻底改组了省委领导机构，决定立即发动全省第二次暴动，迅速形成新的革命高潮。11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各地准备第二次全省武装暴动，并于12月1日发出第21号通知，号召长沙暴动，推动全省总暴动，接着又确定7日至10日为暴动日期。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部署，12月10日，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主持召开党和军事负责人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武装起义，以炸毁长沙市南门的湖南电灯公司和北门的光华电灯公司，使全城失去照明为全面举事的信号。布置第一纱厂支部欧阳燮领导工人200人组成敢死队，担任炸毁光华电灯公司的任务；泥木、人力车工会的会员负责炸毁湖南电灯公司；铁路工会支部组织工人破坏铁路；海员工会支部担任战时水上交通；叶魁领导的独立1团待全城电灯熄灭时，攻入市内；近郊各农村支部则领导各村赤卫队按指定地点投入战斗；在国民党军队和机关中潜伏的同志作内应，捕杀反动军官，处决国民党各机关反动官吏，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群众。

起义于当晚8时开始。由第一纱厂工人组成的敢死队，首先炸毁了北门光华电灯公司。接着，进攻新河警察署，毙伤巡警20余名。随后，进攻新河火车站，捣毁车站电话，炸毁了新河米捐分卡等处，进展比较顺利。但泥木、人力车工会爆炸湖南电灯公司没有成功，广大工人、农民、市民并未响应，加之敌人早有准备，防范甚严，叶魁独立团无法渡河入城，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和机关内的同志亦不敢轻易行动。当晚，国民党军又调1个师进驻长沙镇压革命，遂使起义失败。

起义失败后，敌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多名领导人被捕，1000多名干部群众先后遭杀害。

安源起义

1927年12月11日，中共江西省安源市委在安源路矿领导和发动了工人武装起义。

安源路矿位于江西省西部的萍乡境内，与湖南省毗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的安源，有共产党掌握的几百人的武装矿警队，有方冬生率领的衡山岳北农民自卫军100多人，以及王新亚领导的永新安福农民自卫军与萍乡农民自卫军100多人，形成了一支以安源工人为主的武装力量。共产党组织都受到革命武装力量的保护而未遭受损失。当时被共产党人称为“小莫斯科”。

中共“八七”会议后，安源特委改为中共安源市委，蔡以忱任书记，下设3个区委，17个直属支部，党员700多人，其中安源矿区工人500余人。9月9日，500多名路矿工人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受挫后，在萍乡地区，军阀和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对工农群众实行疯狂报复，中共安源市委和路矿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11月间，中共湖南省委派李运均到安源重组市委，改组工会，组织工人罢工，建立工人特务队，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引向武装起义。

12月9日，安源市委接到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总动员令。10日晚，工人特务队员到处张贴散发暴动宣传提纲和口号。11日晨，安源路矿工人开始起义。9时许，2000多名工人将总公司驻地包围，活捉矿警局长等30多名有关人员，国民党驻军派出军队阻止工人队伍进入市区，同时，抢走了被工人特务队关押的矿警局长等人。12日，市委书记郭炳昆被捕。

14日，矿主勾结国民党驻军，对革命分子和工人群众进行凶狠报复。郭炳昆和工会负责人晏文彬等4人被杀害，工人武装被解除，1000余名工人被开除，矿上中共党的基层干部大多数离开安源，致使暴动受挫。

安源矿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以后这批骨干分别去了湘东老关、上栗市等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发动工农兵举行了广州起义，建立了震惊中外的“广州公社”——广州苏维埃政府。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继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之后，又召开了八七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而有力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8月20日，主持南方局工作兼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在香港召开了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暴动委员会，配合南昌起义入粤部队一举夺取广州国民党政权。22日，中共中央致函南方局转广东省委，提出如叶（挺）、贺（龙）军“能早拿住东江两个星期”，则“可以进击敌军，夺取广州”。后因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党中央于10月12日向广东省委发出“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的指示。10月15日，张太雷与阮啸仙、杨殷等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召开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省委联席会议，分析了广东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在广东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应继续执行，不应停止，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常委会于11月17日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正式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决议案”还对广东目前的政治任务、宣传、组织、工运、农运和军队等方面作了具体指示。

11月26日晚，张太雷召集省委常委黄平、陈煜及吴毅、沈青、王强亚和国际代表纽曼等在广州举行会议，讨论党中央下达的广东工作计划，决定迅速组织广州起义。会后，张太雷写信给在香港的常委恽代英及张善铭、沈宝同，转给党中央。尔后，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总指挥机关，决定由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总指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还有黄平、周文雍，指定徐光英制定军事计划。广东省委军委派聂荣臻、黄锦辉、杨剑英参加起义筹备工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事参谋部，负责制定武装起义的计划和军事技术的指导。会后，即加紧瓦解、策反张发奎军队的工作，争取教导团、警卫团等武装参加起义。组织工人赤卫队，将“四一五”政变后按工会系统组织的工人秘密武装统一编为工人赤卫队。成立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由周文雍任总指挥。下辖7个联队、两个敢死队、消息局及汽车队。省委还指示在粤北活动的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兼程向广州进发；海陆丰红军向惠州南部的平山、淡水发展，直趋广九路，与东莞、宝安准备起义的农民联络；西江各县农军要起来暴动，牵制张发奎军队回师广州；南海县和花县的农军要与广州工人同时起义等。12月5日，党中央复函省委，赞成广州起义计划。

这时张发奎部的主力已调往西江和广州外围，驻广州的国民党军只有7000余人，其中有驻沙河的步兵团、驻燕塘的炮兵团、驻黄埔的黄慕楹团、驻陈家祠的新编第2师第3团；驻海幢寺的李福林第5军的一个营，驻北较场的步兵第4连；驻东山的步兵两连、4军军部、军事厅等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的警卫连以及公安局的警察和保安大队。这些反动武装虽然装备精良、武器弹药充足，但从数量上来看，市区的防卫是较为空虚的。12月7日，第4军军长黄琪翔以西路总指挥名义到肇庆督师，第4军后方事务由参谋长叶剑英（中共秘密党员）代拆代行，形成了对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中

共广东省委决定于12月12日发动武装起义。

广州工农兵革命情绪的高涨，引起了反动派的警觉。12月初，汪精卫派其妻陈璧君从上海回到广东，向张发奎等人转达关于解散教导团的指示，因叶剑英极力担保而作罢。嗣后，中共广东省委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武器转运站被发现，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等人于12月9、10两日连发四电，催促张发奎、陈公博、朱晖日等反动头目立即解散教导团，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封闭工会和禁止工人活动，搜查苏联驻穗领事馆。张发奎等人接到汪精卫的密电后，连日密议，作出了屠杀全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10日，朱晖日宣布特别戒严。在形势突变的关头，省委当机立断，决定将广州起义提前至12月11日凌晨举行。

12月10日晚7时许，张太雷召开军事会议，由参谋长徐光英向准备起义的军官和工人赤卫队干部分析敌我态势，宣布武装起义计划。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叶挺、徐光英、周文雍、恽代英和杨达夫（朝鲜籍的炮兵干部）同到北较场四标营教导团驻地，部署起义工作。任命教导团原第1营营长李云鹏为团长，叶镛为第1营营长，赵希杰为第2营营长，饶寿柏为第3营营长。处决了反动的代理团长朱勉芳，逮捕了各营连反动军官几十人，宣布了“暴动”和“夺取政权”的口令，枪毙了15名反动军官。教导团的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正式宣告广州工农兵起义。

教导团分3路出发，东路由叶挺、李云鹏率领第2营和炮兵连直奔沙河，消灭步兵团。中路叶镛率领第1营进攻东较场、广九车站和公安局。第1营第1连在工人赤卫队第1联队配合下，攻击公安局和保安大队部。公安局长朱晖日爬越围墙逃跑，保安大队长李作明被击毙。起义军民砸开公安局牢房，救出了800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北路由第3营攻占省长公署和观音山。警卫团则在处决了参谋长唐继元等反动军官后，第3营进攻驻肇庆会馆的第4军司令部、文德路仰忠街的第4军军械库和驻文德路的第12师后方留守处。第2营态度不明朗，团长梁秉枢命令其原地待命。第1营反对起义，梁秉枢前往解除其武装时，被叛兵击伤。工人赤卫队按预定时间出击，第1联队和敢死队攻打公安局。第2联队攻打第2、6、7区警署和广九车站。第3联队攻打驻太平戏院保安队、第5区警署。第4联队攻打驻大佛寺的保安队及第4区警署。第5联队攻打省长公署、德宣路的警署和观音山的敌军。第6联队攻打芳村警察局、石围塘的保安队和广三铁路车站。第7联队为机动联队，支援各处作战。在黄埔军校毕业的一批越南革命者和工人赤卫队并肩战斗。市郊西村的农民赤卫军协助工人攻击驻陈家祠的敌军，芳村、花地的农军协助工人进攻广三车站。花县的农军100多人、市郊聚龙村的农军30余人和横滘的农军几十人，先后进入广州支援观音山战斗。南海县农军在大沥等地起义，广九铁路沿线的农军拆毁铁轨，阻击国民党军往广州运兵。

11日天亮前，珠江北岸市区除第4军军部、中央银行、军械库等少数敌军据点外，都已为起义军占领。6时左右，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原广州市公安局内成立，宣布苏维埃政府政纲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主席苏兆征（未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内务兼外交委员黄平，肃反委员杨殷，土地委员彭湃（未到任前由赵自选代理），劳动委员周文雍，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何来，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徐光英。

苏维埃政府还设立财政处，秘书处和红军编导处；粮食队、救护队、宣

传队、交通队和运输队。工农红军指挥部亦设在公安局内，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黄锦辉亦在此协助指挥战斗。

上午7时，广州苏维埃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一切政权属于工农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10项决议。会后，发表《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苏维埃政府告民众》、《广州苏维埃追悼死难烈士宣言》。苏维埃政府编印《红旗》日报，并出版了《红旗》号外。当起义爆发时，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先后只身仓皇逃到珠江南岸的海幢寺第5军军部，与军长李福林策划调兵镇压起义。尔后，张发奎、黄琪翔乘宝璧号军舰赴肇庆，转江门调兵，先后调第5军驻韶关的陆满团和周定宽团，驻佛山的两个营，东江的第25师，西江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南路的教导第1师的两个团回广州。反动的广东机器总工会亦组织敢死队，在市内各处袭击起义军。

11日薄暮，红军清除西城敌军据点，击退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强行登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晚12时，起义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叶挺在会上分析了形势，指出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宜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坚持下去，主张在敌军大举反扑前把起义队伍撤出广州，转入海陆丰去开展长期的革命斗争。纽曼反对退却，认为叶挺的主张是想去“做土匪”。而张太雷不懂军事只得听国际代表的意见。会议决定次日的作战部署是先肃清长堤敌军，后进攻河南的第5军。

12月12日晨，李福林的第5军两个团，由“江大”、“宝璧”两舰掩护渡江，分两路进攻，一路攻东堤，一路攻西濠口。在韶关的周定宽团和陆满团于午后赶到，即增援莫雄团的第3营，猛扑城北制高点观音山。一股敌军突破观音山起义军阵地，绕道到了吉祥路，迫近起义指挥部。叶挺和叶剑英临危不惧，在起义指挥部门前指挥教导团战士和工人反击，打退敌军，尔后又派徐向前率工人赤卫队增援观音山起义军。同日，各国驻粤领事团在沙面举行会议，调英兵2000人、法兵400人、日兵300人驻守沙面，由英舰摩轩号、莫丽翁号，美舰沙克明号和日舰宇治号，掩护国民党军队渡江。是日中午，广东人民拥护苏维埃大会在丰宁路西瓜园举行。张太雷及各界代表演说后，大会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政纲以及致共产国际电。午后，张太雷因偕国际代表乘车到前线指挥作战，途中遇敌人袭击，中弹牺牲，使广州起义骤失指挥重心。黄昏，叶挺、聂荣臻在财政厅房顶观察战况，鉴于敌军已包围广州，决定立即组织撤退。此时，市内部分地区已开始巷战，敌我战线犬牙交错，起义军的指挥系统已乱，领导人之间失去联系，结果除教导团等少数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突围出去外，大部分工人赤卫队因没有接到命令而留在市区与敌人浴血奋战。

13日晨，黄埔军校特务营在王侃予指挥下，赶往沙河，在瘦狗岭与民团激战，由崔庸健（朝鲜籍）任连长的第2连在战斗中伤亡100多人。上午8时许，敌人四面包围广州。南线敌军分四路渡过珠江，分别进攻西濠口、黄沙车站、西堤石公祠和东堤。东线敌军进攻大东门。北线敌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攻观音山，一路夺黄沙车站。

反动武装以十数倍于起义军的兵力，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压向广州城。未撤离广州的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在群众援助下，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留守观音山掩护主力撤退的工人赤卫队员，沉着应战，枪筒打红了，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烂砖砸，受伤倒下了还扭住敌人用牙齿咬。工

人赤卫队第二联队大队长石喜在与敌人肉搏中用枪托一连砸死两个敌人后，中弹负伤，他忍痛扑向敌人，紧紧掐住敌人的喉咙，同敌人一起滚下山坡，同归于尽。工人赤卫队中队长冯苏在刺死3个敌人以后，身中数弹，仍挺立不倒，最后使尽全身力气将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守卫长堤的起义军指战员，也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的围攻。教导团女兵班战士们，在班长游曦率领下，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敌人拼刺刀，除一人回总部联络外，全部壮烈牺牲。执信中学十几位女同学秘密组织了“飞娥队”参加广州起义，在战斗中有8人不幸被俘。当敌人押解她们路过街道时，她们大声说明自己的身份，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视死如归，最后全部英勇就义。

下午3时，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陷落。反动派重占广州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仅14日至19日，就公开屠杀了5700多人。苏联驻穗领事馆5名工作人员惨遭杀害，一批朝鲜和越南的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撤出广州的工农红军，分别向东江、北江转移。教导团、警卫团、黄埔特务营和部分工人赤卫队共1000多人，经沙河到花县。12月16日各部的营连长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改编为工农红军第4师，推举叶镛为师长、袁裕为党代表。后经龙门、紫金到达海丰，为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另一部分起义军向北江退却，突破敌军重重封锁，到了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汇合，以后上了井冈山。还有一批起义者到了香港，后由中共广东省委派到广西，参加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广州起义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绝对领导的新型无产阶级军队的决心。毛泽东把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称为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南海起义

1927年12月12日，在中共广东南海县委的领导下，发起了有300多名农军参加的南海起义。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南海党组织及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等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同年，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南海县委员会，并陆续建立了显纲、隆庆等一批党支部。县委成立后，立即组织党员骨干深入各乡发动农民群众，恢复和发展武装组织。广州起义前夕，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南海县委先后成立了广州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下辖南海农民赤卫队第1团和第2团，由南海县委书记陈道周指挥。按照广州起义总指挥部的要求，1团负责攻占石围塘火车站和南海大沥圩，得手后再与2团配合攻占佛山，控制广三铁路沿线，巩固广州外围。南海县委受领任务后，立即制定了相应措施。12月11日，广州起义的战斗打响，黄谦即率领第1团第1营配合广三铁路工人赤卫队员攻占了石围塘火车站，后带领部分队员绕过国民党军李福林部封锁的黄沙，在牛牯沙附近分散渡河到广州市区参加战斗。另一部则留在石围塘，开始向芳村等地进攻。12日凌晨，谢颂雅带领30多名赤卫队员从龙溪出发，划小艇到大沥口，和汇集在那里等候的几十名赤卫队员一起向大沥圩进发；陈道周、周侠生等则于同一时间率领另一支200多人的赤卫队从松岗出发。两支队伍作钳形攻势夹击，当时在大沥圩内驻扎的国民党民团武装50人纷纷缴枪投降。12日晨，赤卫队进占大沥圩，接管了反动民团的四堡分局，在圩内开展宣传和扩大队伍等工作，大沥圩附近9区、2区、3区、5区等地的群众纷纷前来要求加入赤卫队。起义队伍很快组成了大刀队、长枪队及运输队、救护队等，准备配合吴勤团攻打佛山，并随时准备支援广州起义大军。

吴勤带领的第2团赤卫队驻扎在离佛山仅几公里的郊区。经研究，决定先攻打只有三四十名反动地主武装驻守的佛山大门普君圩，尔后再攻打佛山市区。当天晚上，第2团攻占了佛山外围的一个碉堡，接着消灭了五街公所敌人，随即占领普君圩。不久，广州起义失败。佛山市内反动势力比较强，第1团攻占大沥圩后前进受阻，第2团在攻打普君圩后被迫撤离，攻占南海县的计划未能实现。同时，南海县去支援石围塘的部分赤卫队员也于13日撤回大沥。此后，国民党佛山当局纠合2000余人的反动武装向农军进行反扑，陈道周、周侠生等县委领导人在率领农军撤退时，与敌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镇隆起义

1927年12月13日，在中共广东惠阳县委和惠阳县临时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惠阳县工农革命军发起了攻打镇隆圩和围困大山下地主武装的镇隆起义。

1927年4月至7月，广东东江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形成了东江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屠杀政策的第一个起义高潮。惠阳两次发动平山起义，由于敌强我弱，虽然先后遭到失败，但惠阳各地工农武装力量仍然顽强地隐蔽在农村坚持斗争。8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东江各县全力接应南昌起义军。下旬，中共惠州地委书记蓝璇坤由香港回到惠阳，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制订起义计划。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惠州地委改组为中共惠（阳）紫（金）河（源）博（罗）地委（又称特委），惠阳全县农民自卫军改编成讨逆军一个团，团部设在四大半围，由罗俊任团长，黄卓如任指挥。中共惠阳县委也在镇隆四大半围成立，由蓝璇坤兼书记。

镇隆圩位于惠州和惠阳之间，位置险要，特委决定先攻取镇隆圩，尔后创造条件再向惠州或惠阳发起进攻。1927年12月13日，中共惠紫河博地委、惠阳县委通知农民自卫军集中在镇隆四大半围，宣布成立“惠阳县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由蓝璇坤兼任，委员有何聪、李国英、戴罗天、余必得、罗汉珊、杨植棠、温毓明等，随即由黄卓如率领农民自卫军300人为起义主力，攻打镇隆圩和围困大山下地主武装。地主叶承源勾结镇隆地区十三乡土豪劣绅，纠集民团武装和国民党军队叶百信连，依靠大山下坚固炮楼和围墙，负隅顽抗。县临时军事委员会调集平山、白芒花、淡水、秋长、新圩、平潭、横沥等地农民武装300余人配合，经过数天围困和激战，农军直插敌人心脏，叶百信连被击退。叶承源见大势已去，带着几个马弁化装逃脱。农民自卫军接着没收地主浮财分给贫苦农民，收缴了民团枪支。一时，镇隆十三乡地主土豪纷纷潜逃，国民党军也闻风丧胆，镇隆广大农村成了贫苦农民的天下。

1928年1月，广州起义部队到达海丰与工农革命军第2师会师后，中共广东省委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由省委巡视员黄钊负责改组惠阳县委，直属省委领导，派黄居仁任县委书记。2月21日，黄居仁主持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惠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从此，惠阳工农武装走向创建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弋横起义

1927年12月13日，中共江西省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工作委员会在弋阳、横峰两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5年春，共产党人方志敏在家乡弋阳县湖塘村组织农民协会。同年夏，建立了中共弋阳县支部，邵式平、方志纯先后任支部书记。1926年秋，中共江西省委指示各地有条件的地方尽快发展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于是，在赣东北秘密活动的共产党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是年秋后，黄道、吴先民等建立中共横峰支部，黄道、邹秀峰先后任支部书记。之后，在姚家港边、青板桥、龙门等地建立党小组，并发展为支部。汪群、江宗海等以农民夜校为基地，吸收工农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入党，建立了中共贵溪支部。舒同建立了中共东乡支部。郑育民、李新汉建立了中共波阳支部。祝炎建立了中共德兴支部。方维夏、张樊德建立了中共浮梁支部。余干、乐平、铅山、上饶等县也有秘密的共产党员和党组织。

各县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1926年11月，中共弋阳支部和漆工支部将农民协会的200余名骨干分子组成暴动队，攻占了漆工镇的警察所，赶走了反动巡官，捣毁了警察所，用夺得的武器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在漆工镇起义的鼓舞下，横峰农民协会赶走了反动县官。由邵式平以江西省特派员的名义委任共产党员邹秀峰为横峰县县长，共产党员吴先民为横峰县警察局长，用缴获旧县政府的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烈钧在上饶成立伪江西省政府，与弋阳、横峰等地的封建势力相勾结，对赣东北的革命力量进行猖狂进攻，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环境恶化，中共弋阳支部退到弋阳九区，与漆工支部合并为弋阳特别支部。中共横峰支部也转移至乡村，并立即着手加强农民自卫军的建设。6月3日，弋阳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方远杰率领自卫军3000余人，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一举攻克弋阳县城，烧毁县衙门，击伤县长，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4日，横峰农民自卫军也攻克了横峰县城。弋横两县农民自卫军公开打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12日，国民党赣东省政府派出1个营的兵力进攻弋阳九区，方远杰率农民自卫军坚守漆工镇，击毙国民党军2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方远杰不幸牺牲，弋阳农军撤离漆工镇，转入山区。与此同时，横峰农军在国民党军的围攻下遭受挫折，队伍被打散，弋横农民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1927年8月，江西农委书记方志敏与中共江西省委失去联系后，只身秘密潜往弋阳。方志敏回到弋阳后，以第九区为中心，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9月，方志敏等人在九区组建了20多个中共支部，并在数十个村坊里组织起了半军事化的农民革命团。10月，方志敏在鄱阳听到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刘士奇传达中共“八七”会议决议后，立即返回弋阳，与在弋阳、横峰、贵溪等地坚持斗争的党的负责人及农民自卫军取得联系。

方志敏回到九区后，组建了隶属鄱阳县委的弋阳区委，并任区委书记。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弋阳区委制定了攻打弋阳县城的秋收暴动计划。随后，区委在湖塘村召开各村农民代表会议，讨论秋暴的具体行动，会议正进行时，因走漏风声，九区大劣绅张念诚带领1个营的国民党军围攻湖塘，会议中止。10月下旬，鄱阳县委调任方志敏为横峰区委书记，弋阳区委书记由黄道接任。不久，驻九区的国民党军全部调离。方志敏与弋阳区委决定

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举行起义。农民革命团 300 余人向土豪劣绅的巢穴烈桥镇进发，沿途农民不断加入，队伍很快发展到 3000 余人，一举攻占烈桥镇。几天内，九区的 71 个自然村中有 50 多个村成立起了农民革命团，农民起义席卷了九区全境。

1927 年 11 月中旬，中共鄱阳县委遭敌破坏，弋横两县与其失去了联系。为统一党的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11 月 25 日，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烈桥乡的窠头村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上饶、贵溪、铅山与县党员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共“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提出“深入发动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决定先在条件较好的弋阳、横峰两县举行起义。会议制定了宣传大纲，决定以农民革命团为暴动的组织形式，成立了由方志敏、黄道、邵式平、吴先民、邵棠、方远辉、方志纯等人组成的“中共五县工作委员会”和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方志敏任书记兼起义总指挥。会后，五县工作委员会立即分头发动群众，以村为单位，组建农民革命团，仅弋、横两县，就组建了 80 多个农民革命团，成员数千人。

1927 年 12 月 13 日（旧历年关前夕），农民革命团首先在横峰县娄底蓝家村解除了县政府警察的武装，揭开了弋横起义的序幕。当晚，方志敏以工委书记和起义总指挥的身份通令各地立即举行起义。二三天内，弋横两县参加起义的农民革命团达 6 万余人，他们没收地主、土豪的粮食、财物，烧毁契约，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农民革命团成为乡村政权组织，控制着两县绝大部分地区。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了中共弋阳中心县委，方志敏任书记。

弋横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政府。1 月下旬起，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调集国民党军第 3 军第 83 团进驻弋阳、横峰两县城，并纠集上饶、广丰、铅山、玉山、贵溪、横峰、弋阳等靖卫团，在铅山县的河口镇组成所谓“广信 7 县军民联合剿匪委员会”，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向弋横起义地区大举进攻，占领了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葛源。起义总指挥部集中万余起义军准备夺回葛源。进军途中，因消息泄漏，遭国民党军伏击，被迫撤出战斗。随后，起义总指挥部视情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遂挑选农民革命团中的骨干力量，组成土地革命军，转入弋横交界之磨盘山区，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桑植年关起义

中共湘西特委和桑植县党组织组织发动桑植农民武装，于1927年12月14日举行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中共湘西特委派特委委员陈协平到桑植县发展组织、建立武装，准备年关起义。他与共产党员贺联元、谷佑箴取得联系后，一起到南岔、陈家河、仓关峪等地秘密串连，组建了一支共500多人、200多支枪的农民武装与谷志龙领导的一支100多人、80多支枪的农民武装会合，成立农民起义军总指挥部，贺联元为总指挥。12月14日，起义队伍共600多人分三路从洪家关出发，向县城发起总攻。国民党县长陈策勋见起义队伍人多势众，来势很猛，一面命令陈黑（佑卿）阻击农军，自己则带着随从从东门逃跑了。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农军胜利地占领了县城，捣毁了县署。随即，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赍济穷人等活动。

12月19日，逃出县城的陈策勋联合各地反动武装进行反扑。农军指挥部为保存实力，率部主动撤出县城，分散转移到乡下，与敌继续坚持斗争。

深圳起义

1927年12月14日，在中共广东宝安县县委的领导下，为支援广州起义，宝安工农革命军发动了深圳起义。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1月，广东省委派候补委员赵自选在东莞常平周屋厦召集东莞、宝安两县党的负责人开会，成立“东（莞）宝（安）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赵自选为指挥部顾问，蔡如平为总指挥，郑式南为副总指挥。下设三个处室和四个大队，其中宝安建两个大队，麦福荣、陈义妹分别担任大队长。总人数2000人。同年11月下旬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指示“宝安、东莞亦应动作”。广州起义前夕，广东省委派傅大庆到宝安向县委传达省委指示，要求宝安工农革命军于12月13日前到罗湖车站会同铁路工人抢登火车，直趋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宝安县县委接受任务后，随即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骨干300余人，于12日集中在县委所在地的楼村待命，起义队伍编为两个大队。县委书记刘伯刚现场领导，工农革命军副总指挥郑式南直接指挥。决定12日夜两队同时出发，直扑深圳抢登火车。起义队伍按计划出发。第1大队由郑式南、麦福荣、陈义妹率领向深圳进发，第2大队由潘寿延和潘国华、陈绍芬率领向南头进发。不料，正在进军途中，皇岗的地方交通站传来消息：广州起义失败，省委令宝安工农革命军退回原地待命。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更加激起群众对国民党的愤怒，起义指挥部立即决定攻打国民党深圳区署。14日晨，刘伯刚率工农革命军第1大队突然袭击，四面包围了深圳镇，一举攻进了国民党区署和警察局，俘警察局长陈杰彬，击毙巡官江秀词和局员两名，10多名县兵缴械投降。攻击取得胜利后，为保存革命力量，第1大队遂撤到乌石岩。第2大队也按照县起义指挥部命令，攻打国民党在宝安的大本营——县城南头。由于国民党军防守严密，工农革命军久攻不下，于是按指挥命令退到乌石岩与第1大队汇合，再作计议。

深圳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宝安的反动统治，是宝安工农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初次尝试。

大新乡起义

1927年12月16日，广东琼崖万宁县大新乡农军和群众，在中共大新乡党支部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秋，大新乡党支部负责人王秀、文昌绪和林尤日等带领一批农会会员，在加冬园村夺取了外号叫“山猫”的土匪头子李成春的30多支枪。11月30日，大新乡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自卫军同时在龙堀坡村椰子园宣告成立。谢生明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秀和文昌绪任农军领导人，万宁县委委员李鼎新兼任农军党代表。12月16日晚上，手持刀、枪、渔叉、锄头等器械的农军和群众300余人，在李鼎新、王秀和文昌绪等人率领下，先后冲进美子林、南面塘仔、龙堀、盟村、七星仔村，把这些村里的地主豪绅的家团团围住，把林尤茂等10多名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枪决，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和土地契约。第2天，大新乡苏维埃政府在龙堀坡椰子园召开1000多人的群众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宣布实行土地革命。不久，王秀、文昌绪又带领农军及近千名群众，星夜奔袭流川李鼎源民团。途经西坡路时，遭到后安市翁必山民团和李鼎源民团的两面夹攻，起义队伍由于武器差，抵挡不住民团的攻击，便退回老优塘，战斗中王秀、文昌绪不幸牺牲，农军和起义群众被迫撤出战斗。

这次起义，狠狠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从而把群众进一步发动组织起来，使当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深入发展。

怀乡起义

1927年12月16日，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和信宜县委领导200多名信宜农军，为配合广州起义发动了怀乡起义。

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即派共产党员罗克明、梁本荣先后到信宜县开展农民运动。到1927年春，全县先后建立两个区农民协会，100多个乡农民协会，拥有会员4万多人。1927年4月，怀乡、东镇两区分别建立了中共区委组织，下设1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217人。此外，还建立了共青团支部数十个，有团员800多人。5月，中共南路特委派朱也赤到怀乡大路底村召开信宜党团骨干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信宜县委员会，罗克明任县委书记，朱也赤、陈业之为委员。同时，成立共青团信宜县委员会。县委决定在远离县城的山区、农运基础较好的怀乡圩举行起义。随即布置党团员筹粮筹枪，组织武装队伍，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号召暴动宣言》和“做好准备配合广州暴动”的指示。12月初，罗克明和朱也赤在怀乡附近的奎光小学召开县区干部会议，制订武装起义计划。为迷惑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决定起义队伍采用国民革命军护党军的名义。会上任命朱也赤为广东省信宜县国民革命军司令，罗克明为副司令兼信宜县长。此外，为了及时掌握县城（镇隆）和东镇的敌情，配合进攻县城，又指定梁泽增、赖伯全、邓世丰3名中共党员隐蔽在县城和东镇进行活动。12月15日晚，在朱也赤的统一指挥下，各路农军和部分绿林武装共200多人利用夜幕掩护，汇合到怀乡圩背的大营地集中，一部分潜入怀乡圩内隐蔽。次日凌晨1时，负责突袭七区团练局（文昌庙内）的基干队伍25人，在朱也赤、罗克明的指挥下，迅速包围团练局，击毙两名哨兵，一举攻入庙内。正在屋里打麻将的国民党区长周植盛和几名豪绅猝不及防，束手就擒。起义队伍押解周植盛叫开二区区署大门，冲入区署，俘团丁20多名，缴枪16支，子弹一大批。随即在区署的大门上贴出“怀乡区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额，在门旁挂起“广东省信宜县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牌子。16日清晨，起义队伍四出张贴安民告示，并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各项政策，打开国民党印金谷仓，平崇700多担存谷，兑得白银数百元，作为苏维埃政府的经费。当天中午，起义军司令部在怀乡大营地召开庆祝大会，朱也赤代表革命政府宣布：建立怀乡区苏维埃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并处决反动区长周植盛。

18日，罗克明接到内部情报，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国民党信宜县府将派大批兵力前来“围剿”。为避敌锋芒，19日晚，朱也赤和罗克明率领起义骨干40多人，撤至扶龙白泥。次日中午，国民党县兵民团近千人，在县警备大队长吴洋标率领下，气势汹汹赶到扶龙白泥，包围起义部队。起义军凭险据守，坚守阵地4昼夜。12月23日起义军安全冲出重围，转移到洪冠，留下。17名骨干在洪冠坚持斗争，其余分散隐蔽。

万宁第一次起义

1927年12月18日，广东琼崖万宁县各区农军和群众数万人，在中共万宁县委的领导下，举行了全县第1次武装起义。

1927年7月，万宁县暴动委员会成立。为响应中共琼崖特委关于举行全琼武装起义的号召，万宁县委书记谢育才等研究决定全县于12月18日举行武装起义。命令下达后，各区乡迅速行动。六连岭地区的农民将地主所有契约、字据烧毁，并没收地主的财产；盐墩、涛一、和乐和港北4乡群众组成5道防线与敌人周旋，数万群众情绪激昂地操着棍棒刀枪，将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第33团的1个连团团围住。起义群众代表，手持信函直找该连连长黄耀南，宣称：我是共产党和民众的代表，我命令你马上将枪械交给民众，不然，就与我们一战。黄耀南在数万起义群众面前，挖空心思拖延时间以待救兵。起义群众看到国民党兵不肯放下武器，便纷纷逼近敌军。黄耀南见势不妙，率部夺路而逃。起义群众围追堵截，俘获敌兵2名、战马1匹和一批物资。19日，万宁县委派特派员刘兴汉率领乐会县第3区的1个排农军开赴和乐乡，发动当地群众起义。和乐乡的枪声打响后，万3区的禄马乡、加道乡、赤民乡、赤原乡、新发乡、赤文乡、大新乡，万4区的赤坡乡、崇宁乡、赤光乡、南头乡、寮南乡的群众也相继举行起义，处决了两个作恶多端的地主豪绅。万2区的中兴乡、喇叭乡、化农乡、西农乡、深田乡、深塘乡等地的农民，于21日早上在深塘乡的锣鼓坡集会，游行示威后，烧毁了万宁县最大的地主韩焕畴等土豪劣绅的房屋。

万宁全县第1次起义，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各区、乡相继建立起苏维埃政府，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乐会第一、第二次起义

1927年12月19日和1928年1月28日,驻广东琼崖乐会(今属琼海市)的工农革命军第3营、县各区乡农民赤卫队和群众,在中共琼崖特委和乐会县委的领导下,分别举行了武装起义。

乐会县是琼崖早期的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椰子寨起义失利后,乐会人民继续组织力量与国民党作斗争。1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下辖的第3营驻乐会地区,营长符南强。12月19日,中共乐会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一致举行起义。下达命令后,县工农革命军领导人王绰余指挥各区群众数万人,举着大刀、长矛,分头冲向各村地主豪绅的住屋,杀死反共分子百余人。乐会县的反共势力不善罢甘休,他们纠集反共武装进行反扑,杀戮共产党人160多名,焚烧民房40余间,抢掠耕牛60多头。1928年1月9日,乐会县委决定,以中原圩为重点,再次举行全县武装起义。中原圩位于乐会县腹部,东靠万泉河,距县城10公里。琼崖国民党当局将拥有400多人枪的东路联防队驻扎于此。联防队经常骚扰乐4区,抢劫百姓财物,给革命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威胁。1月27日夜,乐会县委正式下达起义命令,符南强担任总指挥。参加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3营3个连和乐会县各区农民赤卫队、群众7000多人,赶到乐3区的新坡村集中。符南强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决定兵分3路行动。进攻目标是圩南部东路联防队中心据点城隍庙。28日黎明,起义爆发。第2路起义队伍2000多人越过圩外秧地,首先突进圩内,逼近城隍庙,以猛烈的火力将国民党联防队控制在据点内。跟随的赤卫队和武装群众5000人举着火把,手执长矛、大刀,自西向北冲进商业区。第1、3路起义队伍也同时挺进圩内。联防队龟缩庙中,困兽犹斗。符南强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负伤。战斗至天蒙蒙亮,双方人马隐约可见。由于起义队伍没有掩护,联防队又有固定营垒,且火力密集,符南强当机立断,指挥队伍撤出阵地。尾追而出的联防队遭第3路起义队伍的截击。敌人见南门坡上插着数面红旗,摸不清底细,不敢再追击,退回据点。3路起义队伍会合后,符南强根据无险可守的情况,决定撤回乐会4区。这次起义,击毙敌人10余名,捣毁了东路联防队巢穴。中原圩打响后,乐会县各区相继起义。1月31日,新石区200余名农民杀死反共分子10余名;2月1日,乐2区100余名农民焚烧民团营房10余间;2月5日早晨,乐2区300余名农民袭击土豪劣绅住宅,杀死反共分子10余人。

上述两次全县起义,打击了乐4区周围的反共势力,巩固了以乐4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西水起义

1927年12月22日，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欧日章，在曲江西水地区发动和领导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西水农民起义。

早在1924年冬，西水农民领袖欧日章在其家乡暖水村首先办起农会，并向其他村发展。至1925年春全县建立了10个乡农会，农会会员近千人。尔后组建了1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建立了中共西水党支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西水100多名农军在欧日章率领下，响应中共广东省委和北江地委号召，北上武汉支持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声讨蒋介石的罪行，并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同年秋，西水遇大旱灾，粮食欠收，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地主豪绅趁农军北上武汉之机，勾结反动民团，向农会进行反攻倒算，肆无忌惮地杀害农军家属，激起农民的极大愤慨。当部分北上农军陆续返回家乡时，正好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用国民党军第16军第140团的番号隐蔽驻扎在离西水10多公里的犁铺头。在朱德部一连官兵的协助下，12月22日上午，欧日章率领重阳欧屋、水心、乐夫、青水塘等村100多名农军和数百名农民群众手持步枪、鸟枪、大刀和锄头等，包围了大沙洲下村，向该村的地主武装突然发起进攻，打死地主1人，俘虏5人，缴获长枪10多支和财物一批。12月28日上午10时左右，国民党重阳乡乡长冯佩赞和民团头子雷丰霖纠集列村、芹村和黄沙岭等地的地主民团1000多人，围攻水心、暖水和青水塘3个村庄，向暴动的农军猖狂反扑。5名农军和农会会员牺牲，20多人受伤，农民撤到观音山的庙子阁村。地主民团进入水心村后，大肆洗劫并将房屋烧得精光。暖水和青水塘两村被敌围困，地主武装头子冯佩赞和雷丰霖率领1个连的兵力向青水塘村组织了4次冲锋，都被英勇的农军打退。中午，反动武装派地主朱乃昌去韶关请国民党正规军支援。朱乃昌在去韶关途中经过犁铺头，请求国民党军第16军第140团支援镇压起义，攻打青水塘。朱德将计就计，随即派遣1连人随朱乃昌赶往青水塘。下午4时左右，朱德部出敌不意地兵分两路包围暖水和青水塘民团，坚守在炮楼的农军与朱德部里外夹击，把国民党军反动武装打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毙敌10余人，伤敌1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又得到朱德部赠给一批枪支弹药。西水的地主民团受重创后，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团前来镇压起义。1928年1月6日，雷丰霖纠集反动地主民团数百人，伙同反动军队1个团共1000余人，再次攻击暖水和乐夫。这时，朱德部队已离开了犁铺头，开赴湘南。暖水军突出重围，撤到庙子阁山区。围困乐夫村的敌人在农军的坚决抵抗下，未能攻入。

15日上午，国民党军一部和民团1000余人，再次围攻乐夫及青水塘。敌人攻下乐夫以后，调集全部兵力围攻青水塘，并增调了一个迫击炮队前来助战。战斗到第7天，坚守在青水塘的军民已陷入粮尽弹绝的困境。除夕深夜，欧日章率农军从炮楼脚挖洞，突围上山，与乐夫的农军会合。此后，在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黄苏、海陆丰代表的协助下，改组了区委，打出“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6独立团第3营”的番号，退入龙归耙齿山开展游击斗争。

</PGN0105.TXT/PGN>

陵县起义

1927年12月下旬，中共山东省鲁北县委在山东省陵县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秋，中共山东省委将从广州农讲所回来的共产党员于佐舟，派回家乡陵县领导农民运动。当时陵县一带兵匪云集，捐税繁重；加上严重的旱灾，老百姓饥寒交迫，痛苦不堪，阶级矛盾十分尖锐。1927年夏，中共宋集党支部组织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进行革命斗争。中共山东省委和鲁北县委分析了军阀混战及鲁北56个县遭受自然灾害的形势后，要求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民夺取军阀张宗昌军警的武装，实行起义。1927年12月12日，中共鲁北县委作出《陵县暴动计划》上报省委，15日，省委对陵县起义作了明确指示。鲁北县委为加强陵县武装起义的领导，确定由鲁北县委书记李宗鲁亲自领导，并成立由于佐舟、于志良、宋建谋、宋清海、杨国英、王凤岐、李益事7人组成的党支部，统一领导陵县武装起义，于佐舟为起义总指挥。同时，调集宋集农协的力量参加陵县起义。

在中共鲁北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党支部秘密进行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发动工作。一方面在民众中进行打倒土豪劣绅、铲除旧军阀的思想教育，一方面赶制了大批标语传单，同时动员于集、魏家寨联庄会的力量参加起义。经过动员，形成了两个起义区域的两支力量：一支在城北5公里以外，10公里以内，东西长5公里，以于集为中心，共32个村，600余人；另一支在城南2.5公里以外，7.5公里以内，共30个村，200余人。中共鲁北县委决定，起义时，宋集、于集的人员在城北天齐庙集合，由于志良指挥攻打陵县城北门；魏家寨的人员在南门聚众支援；于佐舟利用城内关系打进城内做内应，实行南北夹攻，内外结合。

1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于志良身背大刀，敲响了于集街上的大鼓，暴动人员手执大刀、长矛、铁锹赶到城北天齐庙。城北起义人员很快集合了五六百人。但由于迟迟听不到城内的攻城信号，起义人员陆续撤回。魏家寨的起义人员接到攻城消息后，在大地主孙来仪的场院里放了十来把大火，后将队伍拉到城南，因城北未动，城南也未发起攻城。事后得知，因打入城内的于佐舟，被其担任国民党县政府局长的叔父关押在家中，与起义队伍失去联系，致使起义失败。

劳五起义

1927年12月下旬，平南县劳五区农民自卫军和革命群众，在中共广西地委、平南县委、劳五区委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劳五区位于平南县正南端。1927年，中共平南县委成立，由吴延亮负责领导。3月中旬，劳五区成立农民协会，并建立了有30多人枪的农民自卫军，队长李立名（即李达球）。8月中旬，中共广西地委委员宁培瑛（化名林平生）在容县10余名革命青年集中新隆。宁培瑛和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共党员陈平还在新隆先后发展了李修其、高鹏、李立名、陈孟武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劳五区委员会，陈平为区委负责人。9月中旬（中秋节前），宁培瑛、陈平、李修其等根据中共广西地委要求，决定将劳五区农协会改组为劳五区（新隆）苏维埃政府。李修其被选为主席，李荫阶为副主席。冬天，又把农民自卫军改组为红军。李立名任总队长，陈平任军事指导，宁培瑛任政治指导。总队下分为4个中队。为加强武装，陈孟武还从容县带来步枪9支，短枪5支，加上其他来源，新隆红军已发展为80多人枪的常备武装。1927年中共广西地委制定了响应广州起义的“冬暴”计划和暴动工作大纲，决定由地委委员宁培瑛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军事干部陈平组织平南劳五区起义。12月下旬（冬至前的一个圩日），由陈平和李立名率领12名战士，带手枪7支，乘圩日化装袭击了平山团局。小分队到平山后，立即派人守住圩口。陈平带战士向团局靠近，发现团局的大门是开着的，只有一名哨兵站岗。于是，派一名战士趁敌哨兵不注意，将一块破碗底塞进门坎里面，使敌哨兵不能马上关上大门，随后掏出手枪冲进团局院内。这一突然袭击，使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是役，共击毙敌5人，打伤2人，缴获枪4支，子弹4围。袭击平山团局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同时也震动了国民党平南县政府。1928年1月18日晨，国民党平南县长兼桂系第7军第2独立营营长马翼汉率一个营的兵力，纠集平南及附近县团丁共1200余人，开始围攻新隆圩。为反对敌人的进攻，新隆农军立即召开军事对策会议，成立了指挥部，陈平为军事总指挥，宁培瑛任副总指挥。指挥部指挥红军战士英勇顽强与敌战斗，并派出部分农军到各乡去联络各地农军，新隆只留下30余人。由于敌众我寡，敌人来得快，农军的援兵多未赶到，有的农军虽然赶到，但因数量少未能解围。激战三日，农军弹尽粮绝，敌人占领了新隆圩，攻进参赞庙，李修其受重伤牺牲，李立德等五六人阵亡，宁培瑛、周朝起、周惠生、陈孟武、高鹏、卢有权等人受伤被俘。敌人当场杀害了陈孟武、卢有权等人。次日，将宁培瑛、高鹏、周朝起、周朝明4人押到寺面河滩杀害。陈平突围后，也被敌人抓获，押到梧州杀害。

劳五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广大农军在强敌面前毫不畏惧，视死如归，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回龙山起义

1927年12月30日，在中共湖北黄冈县委的组织领导下，黄冈县回龙山地区农民武装举行了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以后，湖北省委于10月派罗四维、陈卫东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黄冈县指导工作。11月初，罗四维在烽火山翊明庵召开县区两级干部会议，改组中共黄冈县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有关指示，着重研究了组织农民起义问题。

省委为加强黄冈县武装起义的领导力量，又派王定洲、许适存等几名军事干部赴黄冈。12月29日，黄冈县委获悉回龙山保卫团团总梅朗如准备在30日晚召集反动头目在回龙山大庙开会，密谋屠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的计划。县委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决定组织二三百人的起义队伍，届时发动起义。30日晚，回龙山大庙里灯火辉煌。梅朗如等大小反动头目正在大摆筵席，众团丁也聚集在大庙西鼓楼里，饮酒作乐，抹牌赌博。起义队伍在罗四维、陈卫东的指挥下，一路由邓斌率领，到达大庙门前，另一路由赵洁清率领，堵住了大庙后围墙。按照部署，担负从庙后攻击的起义队员，在许适存的带领下，架起梯子，敏捷地翻过围墙，击毙了两个放哨的团丁。枪声一响，起义群众从前门和后门迅速攻入庙内，毫无戒备的反动头目及团丁，大都成了瓮中之鳖。梅朗如等7个反动头目被当场击毙，缴获步枪23支，子弹2箱。此战获胜，士气大振，起义群众乘胜攻打龙山“清乡委员会”，处决了该会主任刘新甫、大劣绅秦子明等几个反动头目。

回龙山起义胜利后，县委又组织杨鹰岭、三里畈两地举行近万农民示威游行，沿途高呼革命口号，捕杀土豪劣绅。1928年1月，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6军，王定洲任军长，许适存任副军长，罗四维任党代表，全军共四五十人，配有长短枪40多支。同时，建立了黄冈县临时苏维埃政权，主席赵洁清。第6军成立后，以烽火山为根据地，辗转各区及邻近之罗田、蕲水（今浠水）等县边境游击，镇压反动分子，在多次与当地反动保卫团缴战中，共歼敌100多人。

第6军频繁的游击活动，敌人大为恐慌，国民党湖北省反动武装会同黄冈地方保卫团千余人，向烽火山发动疯狂“围剿”。由于第6军缺乏作战经验，军长王定洲被捕叛变，全军虽艰苦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至1928年4月，中共黄冈县委、工农革命军第6军和县苏维临时政权相继解体。

普宁年关起义

1927年12月30日，中共广东普宁县委领导上万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年关起义。

1927年11月初，中共普宁县党组织集中农运骨干在大坝渔庄湖秦君平家召开会议，成立中共普宁县党的临时委员会，并划片分工负责各区工作。中旬，海陆丰工农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建立起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后，正是年关将至。为发展革命形势，广东省委派陈魁亚等人从海丰到普宁，正式成立中共普宁县委委员会，陈魁亚任县委书记。县以下各区设特派员，后改为区委。县农会相继恢复机构，各区、乡农会也恢复了组织活动。根据中共广东省委12月1日发出的各县立即起来组织起义的紧急指示，普宁县委决定组织全县农民举行年关起义。起义之前，普宁县委做了充分准备。11月28日，普宁农军大队长何石带农军到八乡处决了劣绅张日升等反革命分子；12月初，在县、区农军协助下，各区乡农会发起查封地主“当铺”及破仓济贫的活动。12月8日，县农军大队又攻打了对抗农军的果陇庄大泉民团，将其驱赶至果陇大寨娘宫边。12月中旬，普宁县委调集各区农军300多人，在流沙白塔秦祠堂成立东江工农革命军东路第6团队，何石任团长，邓宝珍任参谋长。各区、乡同时建立赤卫队。12月30日，普宁县年关起义爆发。成千上万农民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冲进各区乡官僚、地主的住宅，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没收了地主恶霸大批粮食和浮财，焚烧了数以百计的田契、租簿、债约。1928年1月3日，普宁县委率领第6团队，会合各区赤卫队、各乡尖串队共5000多人，攻打反动据点果陇。经激战，农军攻占果陇周围5个村庄，直逼果陇大寨。在陂乌堵击增援果陇之城内敌军的一、九区赤卫队，打得敌人狼狈逃窜。为了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2月3日和6日，普宁县第6团队和各区、乡赤卫队、尖串队，在彭湃、叶镛、徐向前带领的红4师第11团的协助下，拔除了果陇、和尚寮两个反动民团据点。2月13日，在大南山陂沟村举行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接着，以二区为中心，相继成立7个区苏维埃政府，并着手实行土地革命。普宁全县9个区（除贵屿区外）都建立了区委，辖55个支部，党员由起义前200多人发展到560人。年关起义胜利后，国民党军第11军军长陈铭枢先后派新编第11师第76团（颜鼎臣部）、77团（向卓然部）抵普，对起义队伍进行镇压。4月7日后，国民党军第7军第6师黄旭初、第5军徐景棠部先后率大军进攻潮、普、惠苏区。起义队伍在困难环境中不得不依次由陂沟、什石洋撤至灰寨、益岭，后又退至三坑、锡坑、樟树坪等纵深山区，与敌周旋。

普宁年关起义，狠狠打击了地主、豪绅反动势力，震撼了国民党在普宁的反动统治，推动了其后大南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谢家坝起义

1927年12月31日，中共安徽芜湖县委在南（陵）芜（湖）两县交界的谢家坝地区领导了农民起义。

1927年10月，中共党员俞昌准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省临时委员会的指示回到南陵，从事农民运动。月底，在芜湖出席中共芜湖县委召开的会议时，接受了省临委关于“大力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工农武装，发动广大农民起义”的任务。会后，即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南芜交界的谢家坝一带，与其他中共党员一道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党的支部，俞昌准任支部书记。11月，谢家坝地区林都圩、西村冯等地的900多名贫苦农民在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农民协会。随后，南陵的七连圩、金家阁、落弓桥、蒋塘戴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00余人。同时，芜湖白沙圩马坝陈村除两户地主、一户劣绅、一户半农半商外，其余家庭的青壮年都参加了农民协会。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为武装起义提供了条件。1927年12月，中共党员王心泉、俞昌准、陈家昆、胡济等人在南陵太丰圩沟沿张村召开有100多名农民参加的会议。会议认为，为了不受剥削和压迫，彻底推翻旧制度，就必须建立农民武装，成立苏维埃。当前，首先要准备武装起义。会后，俞昌准等积极筹集枪支，陈家昆等请铁匠打制刀剑等武器。很多农协会会员还做了红袖章，准备参加起义时使用。1927年12月31日，谢家坝地区的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接着，在谢家坝成立了南芜边区苏维埃政府，俞昌准任主席。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以农民协会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了农民赤卫队，俞昌准任赤卫队总指挥。不久，农民赤卫队改名为南芜边区红军游击队。1928年初，南芜边区苏维埃政府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在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先后在南陵草沟湾、浮城、邓村、陶村等地发动贫苦农民500多人，打开地主粮仓，分掉地主稻谷500余担。这些斗争鼓舞了贫苦农民斗争的热情，打击了地主土豪的威风。1928年1月20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从芜湖湾调集国民党军队一个营的兵力，约三四百人，对谢家坝地区南芜边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进行镇压。起义失败。

平江年关起义

在中共湖南平江县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区、乡党组织利用年关之际，组织指挥农民武装于1927年12月发动一系列起义。

根据中共平江县委关于组织年关起义的部署，各区、乡党组织纷纷行动。起义首先在长寿区开始。1927年12月的一天晚上，长寿区总工会会长、黄九区农民协会会长吴钦民带领农民自卫队悄悄地包围了警察所。自卫队员翻越围墙，点燃了警察所的侧屋。待火燃起来之后，几百名农民自卫队员大喊救火，装成救火的样子，一下子拥进了警察所。院内的警察见屋内起了火，有的慌忙提桶去打水，有的只管救自己的东西。农民自卫队趁混乱之机夺取了警察所的8支步枪，警察全部当了俘虏，大火烧毁了警察所和与之毗邻的挨户团主任方阜清的房屋。接着，中共思村区委书记邱平川在沙墩集中300多名农民自卫队员，并组织了一支50多人的敢死队夜袭挨户团驻地三爷庙。邱平川带领3个队员连摸两道哨卡，缴枪两支。接着，邱平川化装成挨户团士兵，假装慌慌张张向挨户团主任孔谷选报告“敌情”。孔谷选把门打开，就被邱平川等人捉住，当场处决。自卫队救出了被关押的“人质”，并趁挨户团士兵熟睡之机，缴获了20多支枪，并一举将挨户团击溃。

与此同时，县委领导人李宗白、农民游击队队长毛贲虎等组织虹桥地区2000多农民举行起义。农军包围了虹桥大土豪童柳林、童阜林的住宅，两个土豪闻声逃跑。农军遂将两个土豪的全部粮食和家产分给贫苦农民，并将土豪的房子付之一炬。随后李宗白又带领农民用同样的办法分了长庆土豪李海屏的粮食和家产，烧掉了李海屏和挨户团李了如、李平原的房屋。在思村，农民自卫队长邱训民率领自卫队举行武装起义，袭击挨户团。一天深夜，邱训民挑选了20多个自卫队员包围了挨户团驻地。在挨户团担任内应的同志密切配合下，队伍摸进了敌营房，敌人一个班还没有来得及反扑，就被自卫队员劈死好几个，其余的都当了俘虏，自卫队缴获了8支枪。

自卫队将挨户团击溃并放火烧掉了挨户团的营房。次日，邱训民派人送信给挨户团主任李次凡，强迫他释放了所有被抓来的群众。

黄金洞起义

在中共湖南平江县委策动下，黄金洞矿警队于1927年12月成功的举行了一次起义。黄金矿座落在平江县长寿街东南方向10多公里的黄金洞。该矿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的合作企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矿主为了防止工人起来斗争，购买了30多支枪，成立了一支矿警队，由侯金武任队长。侯金武家庭出身贫苦，1926年受革命运动的影响，同共产党有过一些接触。中共平江县委派李宗白到黄金洞做侯金武的策反工作。李宗白和中共长寿区委委员吴托胜首先做通了侯金武妻子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侯金武的妻子配合李宗白、吴托胜做侯金武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侯金武终于同意起义，并制定了起义计划，约定了起义的时间和暗号。

1927年12月的一天晚上，长寿、黄金两区梭标队200多人按计划将黄金洞矿局团团围住。梭标队高举着火把，高喊着“冲啊！”“杀啊！”的口号。侯金武闻声率领矿警队假装应战，边跑边朝天开枪，带着队伍投奔了梭标队。当晚，起义的矿警队在工人、农民、梭标队的配合下，把专门榨取工人血汗的金矿摧毁。随后，将起义队伍编入平江游击队，侯金武任游击大队长。之后这支游击队编入了湘鄂赣边独立师。

崇河起义

1927年12月，中共湖南常德县委组织农军举行一次摧毁国民党清党办事处的武装起义。

常德县崇河清党办事处由国民党常德县改组委员会头目之一的宁华国负责，配有两名清党特派员和1支武装分队，专门“清剿”崇孝、四贤、周士、成德等区的起义农军，对常德县委在这些地区开展武装起义威胁很大。中共常德县委派康序焕、三千祥等前往这些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准备进行崇河起义。不久，便组织起100多人的农民起义队。康序焕将暴动队编为4个分队，做好了暴动准备工作。

12月间的一天寒夜，暴动队伍首先到达株木山一带集结。接着，王千祥、丁瑚率领一部渡过小河，直扑崇河街北。康序焕和鹰湖党支部书记胡子敬率领一部过河后，直扑崇河西头，堵住崇河西街街口。当两支队伍到达预定地点后，一齐发起攻击，冲入清党办事处大院，击毙、砍死几个妄图反抗的反动分子，夺取了他们的枪支，随即又将两名特派员击毙，缴获了“清党”名册和所有文件。清党办事处头目宁华国因到县城未归而逃脱。此后，国民党当局再也没有在崇河设立所谓“清党办事处”了。

永新起义

1927年12月至1928年5月，中共江西省永新特别区委会在该县西乡、南乡、北乡和东乡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失败后，永新县共产党人王环、刘作述、贺敏学、贺子珍等转入宁冈、井冈一带山区。不久，在小江山区组建了中共永新特别区委。1927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3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毛泽东指示边界各县尽快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迅速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会后，刘真、王环、刘作述等返回永新，在小江山区的田西村召开了党的会议，制定了恢复党的工作，发动武装农民起义的计划。会后，与会代表分赴革命基础较好的西乡、南乡、北乡和东乡，积极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从此，武装起义在永新4乡不断兴起。

西乡起义。1927年11月底，刘作述、徐佩沂等回到西乡，先后秘密组织了鄱阳、梅花、泥金、高溪等村暴动队。12月，刘作述带领梅花暴动队率先起义，打了土豪彭民存，没收其财产分发给贫苦农民；1928年1月，高溪暴动队打了土豪段友南；不久，刘作述又指挥梅花、高溪、文竹、潞江等村暴动队联合攻打并焚烧了上西乡反动政治机关——崇贤书院，击败了反动团队。

2月，中共永新县委在小江区田西村成立，书记刘真，副书记王环、刘作述。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震惊了地主豪绅。反动地主武装保安队排长唐大头，带20多支枪从潞江调防高溪，驻扎在乌石，妄图镇压农民起义。永新县委决定由刘作述指挥上西乡农民暴动队消灭这股反动武装。刘作述指挥梅花、鄱阳、高溪附近的农民，在大屋下村山坡伏击该敌，击毙唐大头，俘保安队10余人，缴枪7支，将敌击败。与此同时，圪边、夏幽、沙市等地也组织了暴动队，开展打土豪的斗争。

3月初，中共永新县委组织攻打里田镇。起义开始，里田镇附近农民先在洋江烧毁地主刘思元、谭家瑞的住宅。接着里田周围几十里内的暴动队数百人一起行动，攻打里田镇。刘作述率领暴动队担任主攻，守镇的保安队不知虚实，仓皇逃跑。暴动队占领里田镇，赶走保安队，把没收的大豪绅龙镜泉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

南乡起义。象山庵会议后，尹铎、龙见田、贺敏学、刘洋等先后回到南乡。他们在辛田、见度、上畔田、下畔田，万年山区、绥源山区都秘密组织了农民暴动队，进行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永新南乡秋溪一带活动，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不久，成立了秋溪乡暴动队，拥有140余人。暴动队在各村打土豪，分浮财，并将打土豪罚得的款项全部支援了工农革命军。

北乡起义。在西、南乡农民起义的同时，北乡党的干部刘一奇、贺曙光、颜勇、曾静池、文庭梁、胡通等也在天龙山麓的源头、黄岗、花溪、象形、灌扩、心田等村广泛开展活动。不久，成立了中共天龙山临时特别区委，书记刘一奇。特别区委决定各乡村组织游击暴动队，由贺曙光任暴动队总队长，统一指挥北乡的游击斗争。1928年1月至3月，灌扩、礼坊、高田、万硕、丰陂等村联合暴动队、黄岗暴动队、铁镜山暴动队、天龙山暴动队先后建立。暴动队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除恶霸、开粮仓、分浮财。5月，根据县委指

示天龙山临时特别区委改为西北临时特别区委，并成立了西北临时特别区政府。

东乡起义。由于受南乡农民起义的影响，东乡的农民暴动队也先后成立。1928年2月，大小船、白银湖、上下茅坪、罗浮、茨坪等村都成立了乡工农兵政府和乡暴动队，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5月，以郭荣良为书记的中共东南临时特别区委在万年山区成立，整个东乡的农民起义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越来越高涨。

忠广起义

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中共福建省莆田县委在该县忠门、广业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2月，中共党员陈国柱回莆田建立了中共莆田党团混合支部，6月改称中共莆田支部，12月升建为莆田特区委，领导了大革命运动。1927年11月，中国福建临时省委巡视员陈国柱整顿莆田、仙游党组织，随后建立了莆田县委、仙游县委和两县县委联席会。1927年底，国民党海军林寿国部占据莆、仙后，将烟苗捐并入田赋课征，每亩高达20多元。莆田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用武装反抗烟苗捐以至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中共党员吴承斌领导300多名农会会员发起忠门反烟苗捐起义，击毙敌排长1人。后在敌军的“国剿”下牺牲21人。1928年1月，莆田县委在广业组建了20多人枪的莆田游击队。随后，莆田游击队与广业区委发动沃柄、夹际、东度三乡反烟苗捐起义，袭击民团造枪厂，缴机4支，在上官毙敌2人，缴枪2支。全县反烟苗捐斗争迅速发展。

1928年5月，仙游县反烟苗捐起义被镇压，仙游县党的负责人相继来到莆田。莆田仙游县委联席会议决定将莆田游击队扩建为莆仙游击队。

瑞安东区起义

1927年冬到1928年春，在中共浙江瑞安县县委的领导下，瑞安东区的帆游和驮山的农民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

肇平洋村，位于瑞安东区。这里三面环水，和邻村隔河相望。在河的西北面水平山脚下，有一座永瑞宫，是来往客商必经之路，这地方叫帆游。1927年间，国民党在这里设置了一个警察所，拦截行人，征收捐税，敲榨勒索，无所不为。同年冬，中共肇平洋支部书记李英才带领几十个党员和群众，化装成国民党部队，由一个身材魁梧的农民装成国民党“军官”。到达帆游后，先派人凭着竹竿，爬进围墙，然后打开大门，一拥而入，出其不意地俘捉了4个警察和缴获了所有的枪支弹药，然后胜利返回肇平洋。驮山在肇平洋的背后，地处永嘉和瑞安交界处。1928年春，驮山党组织负责人陈卓如，根据中共瑞安临时县委指示，成立了驮山农民赤卫队，300余人，他担任队长。

赤卫队成立后，陈卓如带了10几个人去缴帆游警察所的枪，先由一名队员冲进去，杀死一个警察。随后大家冲了进去，其他的伪警纷纷投降，缴获两支长枪和两支短枪，还有一部分子弹。3月，陈卓如和李英才等带领农民赤卫队，袭击了穗丰和长桥警察所，缴获长短枪10余支。下半年又先后袭击了平阳白沙四个盐务所，缴枪14支。接着，又攻下湖岭、溪坦警察所，缴获长短枪8支。就这样，武装不断扩大，人数逐渐增加，成为浙南地区一支有名的农民赤卫队。1930年5月，在农民赤卫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瑞安红军游击队。

东边道起义

1928年1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斗争的影响下，辽宁省东部东边道地区广大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东边道地区是指辽宁省东部之安东（今丹东）、新宾、通化、临江、辑安、长白、海龙、柳河、辉南、凤城、庄河等20个县。东边道地区的人民除受军阀、封建买办的统治和剥削外，还直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经济掠夺。东边道农民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增长。1927年秋，通化县八道江四道阻岔农民张宗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从山东莱州（今掖县）请来大刀会法师张树声、匡香圃，以神秘主义形式组织农民武装，在当地打击土匪，歼灭了在当地为害30余年的惯匪老得江。大刀会威震东边道各县，受到群众的拥护和尊敬。于是张树声便在东边道一带设坛办会，发展会员。经短短的几个月，便在通化、临江、辑安、柳河、浑江、全川、海龙等10余县，秘密发展会员2.5万余人，为东边道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

1927年底，通化县农民因交不起反动县政府的税收，与强行征收的反动警甲发生冲突。反动警甲逮捕了10余名农民运动骨干，并声称要对他们治罪。这激起了大刀会会员的极大愤慨，300多名大刀会会员在红土崖（今浑江市南）进行反抗，各乡村农民纷纷起来响应。在此情况下，张树声等决定乘机于1928年1月1日举行起义。

1928年1月1日下午，张树声等在各乡村大刀会会员集中后，即以一部分会员向临江方向出击，牵制临江之敌；以主力直捣通化县城，营救被捕的大刀会会员。大刀会主力先后击破了第二、第三区保甲队的堵截。2日凌晨4时，攻占了四道江街，缴获了第二、第五警甲队枪50余支。下午，进占热水河子街，烧毁警甲队伍所。当晚继续向通化前进。3日拂晓，围攻通化城。因通化城墙坚固，敌人防守严密，至傍晚尚未攻下，遂停止攻城。5日上午，张树声等率2500余名大刀会会员再次攻城。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突破东城门，攻入东大街，先后占领通化官银号、税捐局、巡警分署、商务会、禁烟局等14个反动机关，切断了各机关电话线，烧毁了各机关的反动文书档案，缴获巡警队枪70余支，并袭击和烧毁了赃官污吏的衙宅，捣毁了“日本贩卖军火的营业所”，吓坏了通化县县长和警察局长。敌人急忙调集大批反动军警对人城起义人员进行围攻。大刀会会员英勇奋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得不撤出通化城。

通化大刀会农民起义后，辑安、临江、金川等县的大刀会也相继举行起义。8日，辑安大刀会攻入县城，击毙了第二区警甲长韩炳义，缴获了一些武器。9日，临江大刀会和通化大刀会攻入临江县城，击毙军警60余人，占领县政府，烧毁反动文告表册，吓得县知事弃城而逃。10日，柳河大刀会会员五六百人围攻县城，虽未克，但在城外解除了前来镇压临江起义的反动军警1个连的武装。浑江、金川、宽甸、桓仁等地反动当局也都遭到了大刀会的袭击。

为继续坚持斗争，大刀会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将原分散的各大刀会进行了扩编，并分为四路，还在红土崖、八道江等地组织了联庄自治政权，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敌人。

中共中央对大刀会农民起义非常关注，指示满洲省委派人参加，领导他

们坚决斗争，使大刀会这一农民的原始组织，成为农民协会武装的组织。

东边道大刀会农民武装起义的消息，轰动了整个东三省，震惊了反动军阀统治者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各令两个骑兵团星夜驰援奉天；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亦带奉天巡警队，急速去东边道镇压大刀会农民起义。

1928年1月7日晚，齐恩铭率领巡警队，携带日式大炮和轻重机枪首先赶到通化，随即出城“清剿”。途中遭到大刀会的伏击，后慌忙退入通化城内，固守待援。13日，从关内调来的奉军两个骑兵团和吴俊升率领之黑龙江骑兵也相继到达通化，并组成“清剿”司令部，以吴俊升为司令，统一指挥，分兵“进剿”。14日晚，齐恩铭又率队向城东“进剿”，被大刀会打得溃不成军，逃回城内。16日，黑龙江骑兵在临江县林子头、三岔子等地“清剿”，遭到当地大刀会农民的袭击，伤亡惨重。27日后，在五道沟、七道沟等地“进剿”的反动军警同样遭到当地大刀会农民的痛击。敌军司令吴俊升见屡遭损失，急电吉林、黑龙江两省，要求迅速派兵“协剿”，并要各县警甲加以截堵。奉天警务厅亦向各县发出剿除大刀会农民的通告。但反动派的“围剿”和血腥屠杀，并没有扑灭大刀会的火焰，反而使起义的烽火燃烧到吉林的琿春、延吉和敦化等县。

敌人“围剿”不成，便玩弄“和谈”的阴谋。2月12日，敌在调兵遣将之后，由吴俊升亲自率领4000余名反动军警，在日本侵略者的帮助下，用重炮向红土崖和八道江等地轰击，企图一举消灭大刀会，占领起义根据地。大刀会会员为保卫根据地，与敌浴血奋战三昼夜，打死打伤敌七八百名，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过大。为保存实力，大刀会下令分散突围。在突围中，大刀会首领张树声和尹老道负伤被俘，后遭吴俊升杀害。敌人占领大刀会根据地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

大刀会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部分会员转入地下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又纷纷拿起武器加入抗日战争的行列，部分会员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

高陂年关起义

1928年1月1日，在中共广东大埔县委的领导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5团配合高陂工会、学联、农会等群众组织500余人，发起了高陂年关起义。

1927年南昌起义军撤离大埔后，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大埔县委成立，大埔县工农自卫军独立第1团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5团，饶龙光任县委书记、第15团团团长兼党代表。11月，中共大埔县委根据东江特委关于开展年关起义的指示，在桃源郭氏学校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决定发起高陂年关起义。12月下旬，大埔县委又在高陂留田李仁记家召开会议，进一步制订了高陂年关起义的具体计划，规定起义日期为1928年元旦，由罗欣然、饶龙光、李明光、罗德胜、黄让三、李西亭、李井泉等负责具体指挥，以工农革命军第15团为主力，组织岭东瓷业工人和农民赤卫队和部分学生配合行动。经过认真准备之后，1928年1月1日，贺遵道、李明光等率第15团2营5个连、团部特务连，及岭东工会瓷业工人、高陂学联部分学生，以及桃源、桃花、北坑、澄坑、王兰、竹园畲、逆流、五家畲等地农会、赤卫队共500多人，包围了高陂镇。一阵激战，攻下高陂国民党区署，活捉了区长苏宝珊，击毙警察5人，处决反动分子张作励。攻下区署后，即向反动分子收缴现金7000多元，开仓放粮，救济贫民，没收盐船20余只，并将全部食盐分给贫苦农民和市民。次日，即成立高陂区苏维埃政府，黄炎为主席。在高陂起义时，被起义军枪杀未死的国民党区长苏宝珊得以逃脱，不久即引来两个武装连，重组国民党联防，对起义军进行反扑。3日，起义军民撤出高陂，向光德澄坑转移。1月22日，中共大埔县委机关和工农革命军第15团团部在平原五家畲，遭国民党军包围。失利后，大埔县委在平原北坑召开会议，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选举贺遵道为县委书记，任命李明光为第15团团团长。

高陂起义，振奋了大埔各地军民的斗志。随即第15团转攻大麻、银江、桃源、洲瑞等地，处决了一批土豪，缴获民团一批枪弹。

小蒸、枫泾起义

1928年1月3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和松江县委领导下，青浦县的小蒸和松江县枫泾地区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

青浦地处苏州、嘉兴、上海三角地带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27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陈云到青浦县巡视工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委指示。会后，陈云到西乡小蒸、练塘地区，与吴志喜、陆铨生以及在枫泾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袁世钊、陆龙飞取得了联系。他们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农协骨干召集起来，鼓励他们去团结广大农民群众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在小蒸、练塘地区几十个村子里恢复和发展了农会组织，建立了青浦县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为小蒸地区农民起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各地农民纷纷起来抗租。地主豪绅们收不到租米，便勾结官府进行武装逼租，斗争日趋尖锐。为了对付敌人的武装逼租，1927年11月，陈云、吴志喜在小蒸地区组织了一支30余人的农民革命军，由吴志喜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

1928年1月2日夜，陈云、吴志喜等召开了小蒸党支部大会，决定次日由吴志喜指挥把催租船（枪船）打掉。1月3日晨，由于消息泄露，停在三官塘桥的催租船悄悄向练塘方向逃跑。陈云和吴志喜决定立即行动。一面派人到小蒸附近的曹家浜、姚渡浜等村庄发动群众，造成抗租的巨大声势，一面由陈云、吴志喜率农民在小蒸西北的殷庄头伏击“枪船”。当“枪船”进入伏击地段后，农军即向“枪船”射击。这时，各村示威的群众数百人也迅速汇集到殷庄头。水警队长袁伯祥吓得跳水逃跑，一个巡长在船上命令水警还击，火力很猛烈。为减少损失，陈云和吴志喜决定先掩护群众撤退，然后农军向塘南转移。队伍转移后，小蒸镇上的地主汪倾千、胡祖文等勾结水警队到处抓人、抢掠。农军决定镇压首恶，激励群众。1月5日晚，吴志喜率农军从西河山浜出发，越过沪杭铁路直奔小蒸，处决了汪倾千和胡祖文。

陈云、吴志喜、袁世钊、陆龙飞等从打“枪船”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决定夺取敌人的枪支，武装自己。1月9日晚，农军三四十人在吴志喜带领下，分乘2只快船来到范浜新镇（现蒸淀乡），包围了团防局，迫使团防局长吴章书把6支枪全部交出。农军以范洪新镇团防局缴枪不杀的例子扩大宣传，警告敌人只要向农军缴枪，就有活路。这样，农军先后缴获三四十支枪，力量得到加强。1月11日黄昏后，袁世钊、吴志喜、陆龙飞、顾桂龙率领农军30多人，在塘南一带村镇，先后处决了金海琴等7名恶霸地主，张贴了惩办土豪的布告、标语等。

1月15日，陈云和袁世钊在草场浜茶馆前召开有四五百名农协会会员参加的大会，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攻下枫泾，替穷苦百姓报仇伸冤。会后，陈云与袁世钊等商定举行枫泾起义，决定在1月21日夜行动。

国民党枫泾自卫团团总周清帆和商会会长吴迪藩得知大批农军要攻打枫泾的消息后，接连向江苏省民政厅、松江县政府及在浙江嘉兴驻防的第26军周凤岐部求援。第26军很快派了1个营进驻枫泾。敌人经过周密策划，于1928年1月18日以松江驻军团副薛蔚英为总指挥，“围剿”农民革命军。1月19日黎明，敌人分两路进犯。当地农民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到蒋家浜向农军报告。吴志喜和陆龙飞发现蒋家浜村前村后都有敌人在搜索，就向敌人

开枪，给附近村庄的农军报警。敌人听到枪声后，便蜂拥而来，吴志喜、陆龙飞两人用仅有的子弹向敌人射击，子弹打完了就用砖石与冲上来的敌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住在库浪的袁世钊、顾桂龙等听到蒋家浜的枪声，即率农军向西南方向撤退，突出了敌人的包围。1月26日，吴志喜在松江小校场被敌人杀害，陆龙飞在枫泾镇文昌阁英勇就义。

小蒸枫泾地区的农民起义，虽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在政治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起义播下的革命火种，始终燃烧在青浦、松江人民心中。

紫金年关起义

1928年1月3日，在中共广东紫金县委的领导下，紫金县洋头各乡赤卫队、工农革命军紫金县团队在红2师第5团的配合下，在紫金三区洋头、南岭、黄布等地举行了有3000多名农军参加的年关起义。

1927年12月，中共东江特委，发布了《中共东江特委紧急通告》，要求东江各级党组织利用年关地主豪绅催租逼债的机会，领导工农群众举行年关大暴动。根据东江特委的指示，中共紫金县委不失时机地做好年关起义的准备工作，及时发出了《年关暴动告紫金同胞书》和《紫金县年关暴动宣传大纲》，并在炮子举行了三期农军训练班，培训了100多名起义骨干，充实到工农革命军紫金县团队。12月31日，红4师计划智取紫金县城，为紫金年关起义创造了有利战机。年关起义的枪声首先在紫金三区洋头打响。从1928年1月3日开始，洋头各乡赤卫队700多人在红4师攻占了紫金县城的喜讯鼓舞下，勇敢围攻地主武装，焚烧地主钟关石的大屋及炮楼，在洋头圩召开大会，镇压反动分子，宣布土地革命政纲。洋头起义后，各乡村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月18日红2师第5团和工农革命军紫金县团队开赴南岭，协同农民军举行起义。南岭是紫金县大地主钟堃记的老巢，纵横50余里，地形险要，地主反动势力较强。红2师第5团和工农革命军紫金县团队发动南岭3000多名农民，一起围攻地主武装。最后，地主武装只好龟缩在5座石楼与红军对抗。由于石楼坚固，起义队伍缺乏重武器，石楼屡攻不下，不少战士中弹牺牲。后来，农军改变战术，采用挖地道爆破的方法，一直挖到大地主钟汉平“裕福楼”墙根底下。把装满炸药的棺材推进地道内，引火爆炸。“裕福楼”被炸毁，其余石楼守敌连夜弃楼逃窜。2月1日，起义队伍攻下南岭。是役，俘敌100多人，缴枪200余支，没收地主稻谷5万余担。南岭攻下后，红2师第5团和工农革命军紫金县团队乘胜攻打黄布民团。黄布大地主黄振云、廖翰臣等人逃到龙窝，引领国民党军第11军蔡廷锴部进剿礼坑、青溪、庄田等苏区，为黄布民团解围，均遭到三区各乡赤卫队的阻击。经3天战斗，毙敌90余人，缴获子弹200余发、迫击炮一门。此后，红2师第5团和工农革命军紫金县团队乘势攻打黄布，黄布民团只得退守天保楼。因为这座石楼坚固，不易攻破，农军再次采用打南岭的攻坚战术，挖地道爆破，经过7昼夜的战斗，胜利地攻下了天保楼，取得了紫金年关起义的胜利。紫金年关起义，是震撼东江地区的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为建设东江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新铺起义

1928年1月4日，在广东中共蕉岭县党组织的领导下，蕉岭的工农赤卫队600多人在该县新铺举行了起义。

1927年4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全省各地实行“清党”后，蕉岭县外出到各地求学的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到家乡，转入地下斗争。7月，徐持、钟占文、钟慕光3名共产党员在龙岭村建立了中共九岭党支部，并建立起九岭农民协会。9月间，为了迎接南昌起义军南下东江，中共梅县县委派杨雪如、萧敬君来到蕉岭，把九岭党支部改称为蕉岭特别支部。同时部署分散在各地乡村的党团员积极建立组织，发展党团员。不久，即建立了新铺、乌土、长江（狮山）、九岭等4个党支部，和新铺、蕉城两个团支部。同年12月，中共蕉岭县委正式成立，徐持为县委书记，赖德君等为委员。12月底，根据中共梅县党组织的部署，为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九龙嶂革命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计划举行新铺起义。起义前，筹备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4区团”，徐持为政治部主任，缝制了一面斧头镰刀旗作为标帜。为确保胜利，县委派徐持、陈杰等前往罗岗圩联络，争取了驻罗岗圩原陈炯明残部张徐光部（曾有与中共合作共同反蒋的愿望）下山参加起义。

1928年1月4日中午，徐持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4区团和革命群众600余人包围了新铺国民党商团和新铺警察所，消灭了国民党钱大钧部驻该地的部分武装，打死商团武装2人，缴枪40多支。然后张贴安民告示，散发传单，由徐持在新铺公学操场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同时还召集巨商开会，筹款1000银圆，没收反动奸商谢福源布匹店的布匹分发给群众。因获悉国民党部将对新铺实行反扑，1月6日，暴动队伍在达到目的之后撤出新铺圩，转移至蕉岭、平远边境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湘潭年关起义

中共湖南湘潭县委按照湖南省委关于进行年关起义的指示，发动全县人民群众于1928年1月初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中共湘潭县委派县委委员兼南二区区委书记陈永清和县委委员兼南三区区委书记张忠廉，分别到南二区、南三区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陈永清在南二区召集30多个党员开会，传达了县委指示精神，讨论并制定了起义计划。1928年1月初，南二区区委首先将罪行累累的原区团支部书记、投敌叛变分子刘泳尧诱骗进一个山坳，几十名暴动队员一齐将其围住抓获，宣布其反革命罪行后，当即处死，并贴出布告。随后，暴动队奔赴肖家山，包围了大恶霸地主、区都总欧阳啸岩的大院，翻墙入院，将欧阳啸岩父子从被窝里揪出来，宣布其反革命罪恶后立即处决。暴动队没收了欧阳啸岩家的财产，将其分发给贫苦的农民。与此同时，还捕杀了几名大恶霸。张忠廉到南三区后，利用中共湖南省委支援湘潭年关起义的武器，组建了一支以党团员和农会骨干为主的农民武装，并制定了年关起义计划，决定里应外合攻打易俗河挨户团。

在南二区起义的同时，南三区暴动队兵分两路，从银塘、鳧塘两地同时出发，突袭易俗河挨户团。由于挨户团侦知暴动队已提前转移至银塘驻扎，指挥起义的张忠廉果断决定暂时放弃攻打挨户团，改为严惩叛徒刘奎武。刘奎武在马日事变不久叛变投敌，供出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致使不少共产党员被捕牺牲。张忠廉率领暴动队奔赴刘奎武的家，将刘奎武处决。

此外，在南二区、南三区起义的影响下，肖晃还率领一支暴动队，在醴陵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攻打了泗汾团防局，毙团兵5人，缴枪5支。暴动队还镇压了一批反动豪绅，一些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

郴县年关起义

1928年1月8日,中共湖南郴县县委组织发动以良田起义为起点的全县性武装起义。

1928年1月5日,中共郴县县委在五盖山召开了县区党政干部扩大会议,分析总结了前段武装起义的形势和经验教训,决定组织全县年关起义。1月8日,起义正式开始。良田暴动连在县委书记夏明震指挥下,攻打良田国民党清乡委员会,活捉了良田高雅岭大土豪陈世泽夫妇,随后又在良田上冲处决了土豪陈文本。保和暴动连在伍一仙等率领下,攻打了保和挨户团,杀死大土豪邓传岳,捣毁保和乡公所和清乡委员会。丰乐区暴动连在王继武率领下,捣毁栖凤渡关帝庙国民党清乡委员会,缴获2支枪。接着,起义的枪声在全县各地打响。起义期间,共杀死土豪劣绅21人,摧毁国民党15个乡公所,12个清乡委员会和挨户团,缴获大批武器。

年关起义胜利后,县委将各地暴动连组成郴县赤色游击队,为以后的武装斗争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向都第一次起义

1928年1月8日，中共广西恩奉特支领导向都农军，在向都县城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7月间，在中共恩奉特支委员、镇南道革命领导人陈洪涛的领导下，由革命青年黄绍谦组织10余名进步青年，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同盟会》。同年8月，黄绍谦根据特支的指示，成立了向都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黄任主任。会后，以各委员所在村屯分片包干，建立村级农协会，组织农民武装。1928年1月3日，建立了向都县农民自卫军大队，共720余人、枪230多支，大队长黄绍谦、副大队长鲍海潭，下设12个中队，并制定了攻打向都县城的起义计划。7日，中共恩奉特支负责人之一的陈洪涛率30余人枪赶来指导起义工作。当晚，向都农军大队长黄绍谦，连夜调集农军500多人、200余支枪到巴麻村的架隆、远洞屯集中，召开誓师大会，作了攻打向都县城的作战动员。黄庆金、黄怀真率领南区19名武装人员赶来参战。8日凌晨，农军队伍从北区的巴麻村出发，直奔向都县城。农军先头部队在县城外抓获了国民党向都县政府的密探员黄日辉，审讯中得知城内敌兵力布防情况后，农军大队长黄绍谦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兵分三路进攻县城。一路由黄福君率领进攻县衙门，一路从下街方向进攻。另外，派20名农军组织火力较强的武装小分队，强迫被俘敌密探黄日辉带路，潜入向都县政府后山上，占领制高点控制全城。

一切准备就绪后，指挥员发出战斗信号。顿时，县城外围农军阵地上，步枪、火药枪、土炮、麻尾手榴弹响成一片。农军很快攻破城门，三路农军勇猛突入后，直逼国民党向都县政府大院，击毙了两名守门的卫兵，院内敌人乱作一团，四处逃窜。国民党向都县县长黄德珍见势不妙，急令民团向东突围，往金洞乡方向逃命，农军乘势追赶了几里路。这次起义共俘敌数人，伤敌10余人，缴获战马1匹，火药大炮1门，步枪20余支，驳壳枪4支，药品一批；生俘县财政科长黄清琪。农军打开监狱，释放在押的无辜群众30余人。

奉化起义

1928年1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和中共奉化区委，在象山港北岸的奉化和郭县领导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奉化因境内有座奉化山而得名。1927年12月3日，省委根据中央扩大会议，制定了《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接着，省委派沙文汉到奉化工作，并决定以卓兰芳为省委特派员，指挥农民武装起义。根据省委决定，卓兰芳、沙文汉等积极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12月下旬，中共奉化区委在松岙成立，沙文汉任区委书记，卓阿德等为委员，区委下属9个支部。区委定于1923年1月3日召开会议，制订起义行动大纲。与此同时，卓兰芳派卓阿位等2人送信到宁海樟树，调孙乃泰（曾任北伐军第19军1师独立1团团团长，后受排挤率部回乡）的武装100人（枪）乘船来策应。不料，消息泄露。1月4日，宁波当局派兵40余名“进剿”芦浦（罗浦），奉化区委委员1人和农民数人被捕，起义准备工作受挫。1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奉化起义事项，并派曹鸿塘（即王中）去松岙协助卓兰芳做军事工作。1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又召开会议，决定再派省委委员沈本厚前往松岙督促。曹鸿塘、沈本厚到达松岙后，积极为组织起义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月9日晚上，卓兰芳亲自主持召开区委领导会议，决定次日晚上召集各地农军干部和松岙支部全体党员，首先收缴驻马头的国民党省防军一个排的武器，约30余支枪。同时，在松岙发动起义。1月10日上午，卓兰芳、沙文汉派人把行动大纲分头送达各支部。可是，鄞东的3个支部和奉东的马头支部负责人没找到。晚上，卓兰芳主持召开农军干部和松岙党员会议，决定推迟一天行动。1月11日下午，区委交通员与农军干部联系中断，湖头渡一带消息隔绝。当晚9点，卓兰芳在松岙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停止起义，并派陈长林去海边把最新决定告诉从宁海乘船来的武装，以避免损失。沈本厚回宁波，沙文汉也渡象山港，经定海去上海。这天下午，由于与区委联系中断，农军负责人卓阿德率领农军干部23人仍按照10日晚上会议的决定，在湖头渡一带行动起来。他们高举农民起义的红旗，在五百岙庙召集100多群众参加的会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并把抓来的土豪劣绅当众进行斗争。傍晚，农军队伍经过湖头渡、芦浦、五百岙等村庄，沿途烧毁了几户豪绅地主的田契和房屋，吸收一些农民加入农军，队伍扩大到40余人，晚上10点钟队伍抵达松岙。当夜，卓兰芳到象山港边一个草棚里，找到隐蔽在那里的曹鸿塘，商量善后事宜。次日，曹鸿塘回宁波向省委汇报停止起义等情况；卓兰芳则返回松岙，与当地党员干部一起，部署保存未暴露力量等工作。

奉化起义虽因缺乏经验而失败，但它在这一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漳浦起义

1928年1月10日，中共福建闽南临时特委会在漳浦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4月，福建的国民党右派在全省进行“清党”，实行白色恐怖，在漳浦活动的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共产党员李联星等人被迫撤离县城，深入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乡村，继续领导农民斗争。8月中旬，中共中央派陈明到闽南，向闽南党组织传达中央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并组建了闽南临时特委，决定以秋收减租及反抗烟苗捐作为闽南农民公开斗争形式。根据中央和闽南临时特委制定的斗争方针，李联星同中共党员朱赞相、陈元宰等分赴丹井、马坪一带乡村，筹备开展农民抗捐抗税斗争。李联星等以丹井村“醒民”学校为活动据点，整顿农会，培养骨干，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丹井一带农会的成立，与马坪等地农会遥相呼应，使漳浦农民运动又活跃起来。

驻漳州国民党新编独立第一旅高义部，为掠夺军饷对民众横征暴敛，加重捐税，李联星等决定不失时机地组织农民实行请愿斗争。12月18日，近千名丹井农会会员组成请愿队伍，奔赴县城，呼吁全县人民起来反抗捐税，实行“二五”减租，惩办土豪劣绅等，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镇压。1928年1月初，国民党第11军向漳浦县派40万银元的烟苗捐。他们在各乡镇设立烟苗捐征收所，还派兵捕捉拷打抗捐的农民，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李联星、陈元宰等与马坪农会负责人决定，组织马坪农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烟苗捐请愿斗争。1月10日，千余名农会会员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高举马坪农会大旗，挥动着写有“农民协会万岁”，“反抗烟苗捐”等字的小旗，肩扛田刀、锄头柄、尖担及土枪、土炮，浩浩荡荡前往漳佛潭镇，包围了烟苗捐征收处。农会代表提出“烟苗有种有捐，无种无捐”，“减少捐款”等要求，遭到烟苗所头目的拒绝。中午，捐棍头目竟悍然命令士兵开枪，当即打死打伤数名群众，农会会员被迫退回。马坪农民的武装抗捐，得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高度重视。18日，省委派人到马坪，部署下一步的斗争。省委为此印发了《为反抗烟苗捐告民众书》，还与中共漳浦特支以县委名义印发了《漳浦县委告漳浦民众书》、《漳浦三十万农民告福建民众书》等传单，在全省范围广泛散发。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纷纷举行集会，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的罪行。国民党政府被迫将第11军撤出闽南，征收烟苗捐之事不了了之。

为使漳浦农民运动能在党的领导下更大规模的展开，在省委来函及来人指导下，中共漳浦临时县委于1、2月间成立。不久，中共中央特派员赵亦松也赶到漳浦视察，丹井、马坪、张坑蓝等处建立了农民武装，还成立了1个连农军。之后，这支队伍曾在丹井、象牙庄与国民党第11军余部交战，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

茶梓起义

1928年1月12日，中共江西省安远县茶梓圩支部委员会在茶梓圩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于都党组织派人到安远茶梓地区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到12月底，茶梓地区农民协会发展到10多个，会员近千名，并成立了中共茶梓圩支部委员会，钟文亮任支部书记。茶梓圩党支部发动党员深入附近各个村庄进行秘密宣传，积极发展农民协会，开展了减租减息的斗争。12月，中共安远党组织根据中共东江特委的指示和中共江西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决定由中共党员谢育山负责前往茶梓圩地区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伺机发动武装起义。

1928年1月3日，茶梓圩党支部召开会议，将起义时间定为1月12日晚。12日下午，钟文亮召开茶梓圩、冷水段等地参加起义的骨干分子会议。会上宣布了时间、纪律，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由钟文亮担任总指挥。会后，成立了茶梓游击队，由唐贤昌任游击队长，钟文亮任党代表。晚12时，1000多手持大刀、长矛、梭标、肩扛土枪、土炮的起义队伍兵分6路，一路由钟文亮率领，几百名群众包围并攻占了茶梓乡公所，当场击毙乡长，活捉乡丁10余人，缴枪10余支。另外5路队伍分别由唐贤昌、唐老二、钟金山、黄祥皋、刘相礼带领包围土豪劣绅的住宅，抓获2名土豪劣绅。接着，召开几千人的群众大会，正式成立农民协会，由唐老二担任农民协会主席。

1月13日，以重石赖良栋为首的安远北区联防队，纠集水东（今长沙）、长河、唐村、桂林江、仁枫和干部、会昌等地的国民党靖卫团几千人围攻茶梓圩。茶梓圩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在钟文亮、唐贤昌等人的领导下，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敌人。下午，国民党军抽调正规部队1个连的兵力镇压茶梓圩起义队伍。由于敌强我弱，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为保存实力，茶梓圩游击队和部分群众转移至深山老林，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湘南起义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军和中共湘南特委在湘南地区共同发动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27年6月，中共湘南特委在陈佑魁领导下，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发动群众、组织工农、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派陈芬、夏明震、向大复、邓宗海等人分赴衡山、耒阳、永兴、郴县等地恢复县委，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中共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曾准备在湘南以汝城为中心，发动桂东、郴县、宜章等县起义，后因情况变化，计划未能实现。中共湘南特委按照中央秋收起义总的布置和湖南省委在湘南开展起义的计划，于10月25日召开各县军事干部会议，讨论湘南斗争形势，制定武装起义行动计划，决定成立湘南总指挥部，各县建立游击大队。在中共湘南特委指导下，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初，郴县、耒阳、永兴、桂阳、宜章等县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并在起义中建立了农民武装，为发动统一指挥的大规模的湘南起义创造了条件。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转战闽、赣、湘、粤边境，于1927年11月中旬，进驻汝城。11月26日在汝城主持召开军队和地方党的联席会议，讨论湘南、粤北的起义问题，决定12月中旬举行湘南起义。后因朱德、陈毅率部南下参加广州起义，起义计划未能如期实现。但这次会议为湘南起义的发动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12月21日和27日，中共中央两次写信指示朱德所部：迅速与湘赣边界毛泽东部取得联系，共同发动群众，用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无法联络，则在湘南与当地党组织议议，发动群众举行起义。

1928年1月，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正酣，湘南驻军大部分调防，正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当月初，朱德、陈毅率部从韶关北上，准备去湘南发动起义，建立根据地。朱、陈率部进驻宜章西南的莽山洞后，与宜章县委书记（湘南特委委员）胡世俭等人，制订了智取宜章县城的行动计划。1月11日下午，按照预定计划，共产党员胡少海以国民党军140团副团长身份和保护桑梓为名率两个加强连进入宜章城，豪绅们闻讯出城迎接。第二天，朱德、陈毅率主力部队进城，利用国民党县长和地主豪绅设宴为部队洗尘的机会，将县长杨孝斌等20名官绅抓获。同时，顺利解除了警察局、团防局的武装，缴获步枪350支、手枪10支，俘虏警察及民团400余人；打开监狱，释放被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仓济贫。随后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新老县长和9名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智取宜章县城成功，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起义胜利后，朱、陈部经过整编，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参加暴动的宜章农军编为宜章独立团，胡少海任团长。2月6日，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建立，毛科文任主席；接着又在近城白沙、黄沙、栗源、赤石等5个区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革命浪潮席卷全县。

智取宜章的胜利，惊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独立第2师师长许克祥亲率6个团的兵力，由广东乐昌赶到宜章镇压。朱德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击溃许部两个团，并于2月1日在广东坪石将许部主力歼灭殆尽，俘虏官兵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火炮30多门，子弹和大批军用物资。

坪石大捷后，朱德在坪石皈塘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北上，支援郴（县）、永（兴）、耒（阳）等县起

义，扩大起义范围；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由师长胡少海率领，留守宜章，掩护主力北进，保卫革命果实。

2月4日，朱德率部在折岭、大铺桥、走马岭等战斗中歼灭国民党王东原部。郴县守敌望风北逃，朱、陈队伍进入郴县城。2月7日郴县苏维埃政府宣布建立，李才任主席。同时，以郴县赤色游击队为基础，成立工农革命军第7师，师长邓允庭，党代表夏明震。接着各区、乡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

宜、郴起义胜利消息很快传遍湘南，各地党组织奋起响应。2月9日，永兴县委领导江左、江右农民暴动队，在朱德派去的工农革命军一个加强连的支援下，攻占县城。随即成立水兴县苏维埃政府，全县有15个区137个乡相继建立苏维埃政府。永兴各路农军合编为永兴赤色警卫团。

2月10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主力向耒阳进军。16日，直逼县城。城内守军闻风撤往衡阳，只留团防队防守。朱德率部在起义群众配合下，一举歼灭守城团防武装，占领耒阳县城。19日，耒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泰任主席。紧接着，全县有37个区、325个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耒阳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师长邝庸，党代表邓宗海。这时，湘南特委机关也从衡阳迁到耒阳，与朱德共同领导起义，使湘南起义迅速出现高潮。在资兴，资兴农军在湘南特委派去的永兴、郴县两支农军援助下，第二次攻占县城，县苏维埃政府由三都迁入城内办公，资兴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资兴独立团。全县有9个区、1个特区、100多个乡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安仁，工农革命军第1师在安仁、永兴、耒阳农军配合下，于3月30日攻占安仁县城。接着成立了以唐时雍为主席的安仁县苏维埃政府和徐鹤为书记的中共安仁县委，全县有14个区、39个乡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桂阳，桂阳农民赤卫军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教导队和郴县农军支援下，曾于2月中旬和3月中旬两次攻打县城，并一度占领桂阳城。在这期间，桂东、汝城、酃县、攸县、衡阳及常宁水口山矿工人，也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临武、嘉禾、蓝山、江华、永明、道县、宁远等县也酝酿或准备起义。

3月16日至20日，中共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城太平寺主持召开了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陈佑魁、何长工、陈毅、朱德等21人为执行委员，组成了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陈佑魁为主席。大会作出“土地问题”决议，明确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会后，湘南各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插标分田运动为标志的土地革命。

1928年3月，湘桂军阀战争结束。下旬，蒋介石调集湘粤两省7个师“会剿”湘南起义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率领起义部队12000余人（其中主力2000多人，农军1万余人）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4月下旬，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随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湘南起义历时3个月，参加起义群众上百万，暴动烈火席卷十余县，声震湘、粤、赣三省，创造了用正规武装支持和推动广大农民起义，把武装起义、建立政权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的初步经验。

应山年关起义

中共湖北应山县委领导农民武装于1928年1月13日举行年关起义，攻打县城未克，后转入应山、安陆、孝感3县边界继续举行年关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后，应山的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群众发动工作也相继开展起来。1927年11月上旬，成立了中共应山县委，冯树功任书记。县委成立后，在原来农民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农民游击队，广泛开展了打击土豪劣绅和破坏交通的斗争。11月底，应山县委在陈巷街领导农民举行了三抗（抗租、抗税、抗捐）示威大游行。到年底，全县共建立中共支部11个，发展党员110余人，还建立了7个秘密据点，工农武装拥有长短枪130余支及大量的自制武器。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举行年关起义的指示，应山县委成立了县武装暴动指挥部，拟于1928年11月13日举行起义，里应外合，攻占县城，任命县委军事部长万平治任攻城总指挥。1月13日黄昏，1000多名起义人员按时来到县城四周埋伏起来，颜光第率孝感农民游击队一部前来支援。深夜时分，随着三声指挥枪声，埋伏在东、南城门外的起义武装高举火把，挥舞刀矛，向县城发起猛烈进攻。守城敌军凭借高大的城墙闭门坚守，以密集的火力封锁起义武装的前进道路。攻城突击队员涉过护城河，抵达东门外，放下了吊桥，由30多名突击队员抬着近千斤重的木头，反复撞击城门未能奏效。后来，又将十几副木肉案子堆在东门口，浇上煤油，点火燃烧。直至凌晨两点，东、南两门仍未攻下。暴动指挥部眼看攻城无望，下令撤退。撤退中，起义农军处死了劣绅朱月卿，烧毁了东关乡保卫团团总陈宝臣的住宅。

攻城未克，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曾传经被捕，英勇就义。县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乡村，以应（山）安（陆）孝（感）“三县执行委员会”名义，集中三县边界农民武装先后在左家河、马家畈、北小河、腊水河等乡村举行年关起义，继续坚持斗争。

坡里起义

1928年1月14日，中共山东省东昌县委在山东省阳谷县坡里庄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1927年间，中共东昌县委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并争取了以韩建德为首领的一支绿林武装，逐渐形成了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同年11、12月间，东昌县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坡里举行起义，首先占领德国在这里建造的天主教堂，然后建立工农政权。中共山东省委批准了起义计划，并派省委委员丁君羊指导起义工作。根据省委指示，东昌县委在梨园设立了起义联络站，在聂子政、杨耕心领导下，由50多名农会会员和韩建德的武装人员，组成了近百人的起义骨干队伍，决定于1928年1月14日下午发动武装起义。1月14日，韩建德、聂子政率领农会会员和韩部骨干30人左右，携带18支长短枪和腰刀、标枪、木棍等武器，悄悄运动到教堂北1里路远的金线河（今徒骇河）的河湾里埋伏起来。韩建德率领十几人的尖刀班，按预定计划靠近教堂大门，占领了教堂的中二门楼。埋伏在河湾里的起义队伍听到枪声，迅猛冲进教堂，将护院、打手等二三百人集中控制起来，并缴获长短枪近50支，子弹2万余发，银元2.7万元，以及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起义军占领教堂后，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王寅生和东昌县委书记张干民赶到教堂，成立了“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四五百人，建立了以韩建德为总司令、聂子政为政治委员的领导机构，辖4路起义军。起义军广泛张贴《告民众书》，发布了《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宣言》，打开教堂和地主的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的百姓。

随着起义军日渐扩大，国民党反动地方政府极为恐慌。1月26日，东临道伊陆元春调集所辖12个县的警备队四五千，向坡里教堂进攻。起义军奋起出击，击溃了警备队，俘其阳谷县警备队队长郭敬修和连长1名，缴获各种枪百余支。27日，反动军阀张宗昌，以装备有火炮等重兵器的1个旅2000余人，在各县警备队和大批民团武装的配合下，并得到河南督军寇英杰的支援，继续对坡里起义队伍进行围攻，用火炮、机枪向教堂猛烈射击。起义军以教堂为堡垒，凭借周围民房，英勇反击。2月7日战斗更趋激烈，8时，近千名敌人从东、南两面向教堂周围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起义军决定撤出教堂，转移至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当晚，起义军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向敌发起佯攻，并点燃了放在铁桶里的鞭炮，除留下20余人坚守教堂、迷惑敌人外，其余全部趁着夜暗向西北方向突围。起义队伍于午夜过了堂邑，到达寇县地区后，聂子政等前往聊城向县委汇报，韩建德率队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直隶督办褚玉璞接到张宗昌的通报后，对起义队伍进行堵截。起义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损失惨重，最后弹尽粮绝，被迫分散突围，起义遂告失败。突围出去的部分人员转入隐蔽斗争。

迈众起义

1928年1月15日，中共广东琼崖文昌县第19区委派共产党员陈大机打进迈众乡碑平民团，以里应外合手段，智取碑平炮楼，史称碑平起义。

1927年8月，中共文昌县第19区委在南阳成立。接着，组建农军连，连长陈世东。迈众乡的碑平炮楼是国民党在南阳地区的一个顽固堡垒，中共文昌县委决定拔除它。为此，第19区委派马来亚归侨、共产党员陈大机打进去，以便里应外合，端掉这座炮楼。陈大机以到碑平民团当差混顿饭吃为由，顺利打进了碑平炮楼。在民团里，他广交朋友，取得国民党文昌县当局的信任，不久被任命为碑平民团文书。他同团了一起吃宿在炮楼里，通过生活上的接触，博得了团丁们的好感。陈大机见条件成熟，便同第19区委联系，决定在“冬至”之夜行动。1928年1月15日“冬至”晚，陈大机买回1只狐狸，备了2桌酒菜，把上至民团队长、下至站岗的团丁，都灌得酩酊大醉。下半夜，他趁团丁酣睡之机，佯装肚子痛，说要到炮楼外去解手。他打开大门，用暗号接上早已埋伏在门外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在王逸齐的带领下，手持短枪，敏捷地闪进了炮楼。然后上2楼，分头到团丁床前，手电筒一亮，一枪一个，干脆利落地将醉在梦乡中的民团队长陈行创和10多名团丁全部击毙，缴获长短枪11支，财物一批。翌日，暴动队伍又袭击了中区土苑圩，焚毁了该圩的团局。

这次行动，消灭了一个民团和一个团局，工农革命军声威大振。

斑竹山起义

1928年1月16日，中共江西省安源市委在萍乡上栗区斑竹山发动和领导了工农武装起义。

中共党的“八七”会议后，安源市委依据湖南省委指示精神，特派共产党员贺近仁、张赤诚以农运专员身份来到上栗，恢复农村党的组织。不久，成立了中共安源市党部直属上栗区区党支部，由贺近仁任书记。基层有南源、秋江、山背、黎塘、主溪5个支部，党员发展到80余人。1928年1月15日，上栗区党支部在普庵山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于第二天起义。

1月16日晚，赤卫队以栗江小学为指挥起义的总机关。以过小年名义，由黄征泮出面，以他和胡启图（靖卫一队队长，驻守万寿宫）是黄埔同学关系宴请胡。宴后陪同胡打麻将时讨得当晚口令，并立即告诉了赤卫队。赤卫队50余人，分3路由南源向万寿宫进发，在靖卫队中共党的地下组织支援下，经30分钟战斗，靖卫队除10余人逃跑外，其余30余人纷纷倒戈。

夺枪获胜后，曾赤带领赤卫队退出上栗市来到南源，进驻斑竹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17日拂晓，起义军挺进斑竹山，成立湘鄂赣红军直辖第2团，团长曾赤、政治委员李希。斑竹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提出了“土地革命”、“杀尽土豪劣绅”等口号，开展年关斗争，以团长名义贴出告示，勒令地主恶霸停止向农民逼租、逼债，带领群众惩办了几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没收其全部财粮，分给贫苦农民，并筹建上栗市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1928年3月，萍乡、浏阳、醴陵3县反动势力联合调集“团防队”对斑竹山进行“围剿”。萍乡靖卫第4大队200余人枪驻扎在青溪。3月13日下午，红军直辖第2团，联合四个赤卫队共约四五千工农群众，在石视集合，16时开始向青溪进发，深夜将靖卫队全部包围。天亮后，赤卫军向敌发起进攻，被敌察觉、严密布防。赤卫军冒险派尖兵排冲入敌阵，被敌人重重包围，经10余小时鏖战，尖兵排12人大部牺牲，团长曾赤负重伤。

出击青溪失利后，斑竹赤卫军力量被削弱，而敌军包围形势却日益紧迫，遂决定将团部番号取消，改为第1、第2、第3三个暴动队，转移到萍浏交界的狮子坡、曹家庵一带开展游击战。3月22日，斑竹山赤卫军分两路离山，进驻浏阳、醴陵的沪塘、富里等地，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斑竹山赤卫军下山后，斗争极为艰苦。之后，一部分潜回乡村，进行地下斗争；一部分约30人在肖炳裕带领下，由曹家庵转入萍乡、宜春、万载交界的小洞山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刘显堃年关起义

1928年1月16日，在中共湖北阳（新）大（冶）县委领导下，刘显堃地区农民武装举行了年关起义。192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派胡朝柱、项升平到阳新开展工作，成立了中共阳（新）大（冶）县委，经过组织发动，阳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2月下旬，县委成立了武装工作队，待机组织起义。

1928年1月16日，县委通过内线得知国民党湖北省参议员兼阳新县清乡总团团长刘慧臣等在刘氏祠堂续定宗谱，团丁们正忙着准备过年的消息后，决定迅速组织白沙、赤马山、小箕铺、百福山等地的农民武装，与打入“清乡总团”的共产党员刘辉刚等人里应外合，举行起义，消灭“清乡总团”。入夜，各路起义农军按照县委的部署悄悄地包围了刘氏祠堂和“清乡总团”团部。晚10时许，在刘辉刚等人的接应下，起义农民冲进祠堂，抓获处决了刘慧臣。与此同时，共产党员刘全山、刘怀玉率领另一部分起义农军在内应配合下攻进“清乡总团”团部，大部分团丁在醉酒酣睡中被俘，少数亡命之徒企图顽抗，被起义农军当场击毙。这次起义共击毙刘慧臣等土劣6人，全歼阳新县“清乡总团”，缴枪30余支和大批物资。

刘显堃起义胜利后，中共阳新大冶县委领导农民武装和县委武装工作队又先后攻打大冶罗文进村、阳新黄连港等地民团，使阳新的福丰、金海、龙山和大冶的南山头等地连成一片，初步形成了阳（新）大（冶）边境的红色游击区。

栗源、碣石起义

1928年1月18日，在湘南起义胜利的影响下，中共湖南宜章县委统一组织发动栗源碣石两地农民武装，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部进占宜章县城后，中共宜章县委派陈东日到栗源，与原区农会干部陈光等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准备组织武装起义。1月18日，陈东日、陈仲章、陈光等领导栗源农民武装和群众举行起义。起义队伍首先处决了豪绅陈禄角，烧毁了豪绅的土地契约，捣毁了栗源税卡。接着，暴动队到龙沙坪、沙溪、石下、上田等地杀了劣绅文长生等人，建立了栗源区苏维埃政府。起义后，陈东日、陈光率领农民武装30人枪到达宜章县城，编入工农革命军宜章独立团。栗源群众则在陈仲章等领导下，开展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栗源农民起义的第2天，碣石农民也举行了起义。

19日清晨，碣石起义打响。中共碣石特支书记、公开身份为碣石团防武装副团长的彭晒，以商量捐款购枪为名，在玉公祠召集全村30多个豪绅开会，待豪绅全部到齐后，赤卫队员立即将所有豪绅捆起来，宣布召开群众大会，举行起义。会后，彭晒带领起义群众打开豪绅谷仓，将3000多担稻谷分给贫苦农民，并捕杀了大土豪李天保等人。第二天，恢复了村农会，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营，彭晒任营长，肖克任副营长，龚阶任党代表。此后，彭晒等人指挥独立营转战黄沙地区，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斗争。

衡阳年关起义

1928年1月20日，在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和衡阳市郊区党组织负责人的发动下，举行了数千人的农民武装起义。

为了配合朱德、陈毅部在湘南的武装起义，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与衡阳市郊区党组织的负责人一起制定了起义计划，决定1月20日组织衡阳市郊农民游击队攻打衡阳城。是日，数百名游击队员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一直冲到距市区10余里的地方，毙伤了一批敌人，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城内一些国民党军和豪绅见游击队攻势很猛，惊恐万状，纷纷逃离。但是，由于城内守敌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兵力多，武器好，火力猛，游击队与敌激战数小时，农军伤亡不小，仍未突破敌阵地，陈佑魁等只好下令撤退。这次起义尽管攻城失败，却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的湘南起义。

1月24日，中共湘南特委召开会议，总结了攻城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将湘南特委机关和湘南游击大队总指挥部从衡阳迁至郴州，继续发动各县农民武装和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道举行起义。

永兴年关起义

1928年1月20日，中共湖南永兴县党组织为响应湘南起义，领导全县各地群众举行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底，黄克诚经中共湖南省委介绍，从外地回到家乡永兴油麻圩，不久，便与中共特支书记向大复接上组织关系。12月初，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精神，在永兴县城召开特支扩大会议，讨论年关起义问题。会议决定将全县党员分成两部分：江左（永兴西部）由黄克诚负责，江右（永兴东部）及县城由向大复负责。会后，便深入各区、乡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相机举行起义。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的消息传到永兴后，永兴党组织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20日，黄克诚、尹子韶在江左地区组建的一支百余人的农民武装，首先在板梁起义，攻打土豪刘尧卿住处，抓获团丁18人。接着又攻打西部重要集镇油麻圩，驻守该镇的几十名团丁闻风而逃，暴动农军占领油麻圩，将没收的十几万斤粮食分给贫苦群众。板梁、油麻圩暴动打响后，共产党员刘木在车田发动农民起义，建立了第八区苏维埃政府和区赤卫大队。活动在江右地区的共产党员邓燮文、许王山组建了江右独立团，发动安福司农民举行起义，恢复第九区农民协会。陈伯诚、戴彦藻在城郊，李腾芳在二区，刘让三在七区，分别领导农民举行了起义。与此同时，刘木、刘水哉率八区赤卫队与陈伯诚等领导的城郊工农赤卫大队相配合，攻入永兴县城，因力量太弱，很快撤出。

永兴年关起义遍及全县各地，壮大了武装力量，为以后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沙田年关起义

1928年1月20日，中共湖南桂东县党组织根据朱德的指示在沙田圩组织发动了年关起义。

1927年11月26日，朱德在汝城主持召开湘南、粤北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后，派郭佑林、黄奇志回到桂东县沙田圩组织年关起义。郭、黄首先联络了有40余人枪，活动在江西上堡的刘雄、周文山部，又到汝城联络了原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1团驻濠头留守处的赖鉴冰等人，挖出埋藏的15支步枪，合编为汝桂边区赤卫队，作为起义的主力。随后串联沙田、东水、东洛、五花、壕头一带持土枪土炮的青年农民80余人，作为起义后备队。

根据上级关于年关起义的指示和积极响应湘南起义，沙田年关起义于1928年1月20日正式爆发。农军攻打的目标是家住沙田圩的桂东县挨户团副任何鉴。这天，各地暴动队汇集沙田圩附近的东水，在刘雄、郭佑林、赖鉴冰等率领下，兵分三路奔袭沙田圩，击毙挨户团团丁10余人，俘团丁10人，缴获步枪13支，子弹3箱，占领沙田圩。

公安年关起义

中共公安县委根据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的指示，于1928年1月20日发动了年关武装起义。

1928年初，中共公安县委根据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的指示精神，确定以7区为重点，以武装队为主要力量，发动年关起义。1月中旬，中共公安县委书记段德昌等领导人为了推动全县年关起义，决定消灭大土豪谢邦文为头子的保商团。1月20日，武装队突然将谢邦文、谢邦武兄弟俩拉到街上处决，保商团随之而垮台。随后，段德昌决定歼灭国民党国军第73师暂编营营长傅祖光所部。除夕之夜，80余名游击队员和近百名起义农民，身藏武器，三三两两从四面八方方向傅祖光营部驻地——桥头埠汇集，分别埋伏在四周群众家里。段德昌和武装队队长戴补天及县委委员胡方熙趁着黑夜，冒充是涂郭巷商会会长、傅祖光叔父派来送年货的。两个哨兵信以为真，一个进屋报告，另一个被段德昌卡住喉咙，缴了枪，被捆得结结实实地丢在一边。正在打牌的傅祖光，听说叔父派人送年货来了，便出来迎接，刚走几步便被段德昌一枪击毙。埋伏在四周的武装队员及起义群众，听到枪声，一齐呐喊地冲向营部，杀声震天。正在打牌和睡觉的士兵遭到突然袭击，个个蒙头转向，有的举手投降，有的慌忙逃窜。起义队伍全歼了傅祖光部，缴枪10余支。1月25日，起义队伍又处决了反动军官蓝天作，使蓝为头目的“武学堂”不攻自散。不久，段德昌、戴补天带领80余名武装队员，兵分三路，以长途奔袭，里应外合的战术，一枪未发便消灭了闸口团防武装，缴枪30余支。4月初，国民党县政府调集8个区的团防和县警备大队，企图一举消灭革命武装。7日晨，中共公安县委率起义队伍袭击驻在闸口的县警备队及团防，敌大部被歼，缴枪60余支。其他集结的团防闻风丧胆，慌忙收兵。

公安县的年关起义，持续了3个多月，斗争烈火燃遍全县，歼灭反动武装300余人，缴枪100余支，处死土豪劣绅40余人，公安县的革命武装得到了发展壮大。4月，国民党军队大举“清乡”。月底，段德昌、邹资生分别带领部分革命武装转移到洪湖地区及石首桃花山开展游击活动。

潭洞起义

1928年1月中旬，在中共广东英德县委领导下，英德农军1000余人在潭洞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打击英德国民党反动派，中共英德党组织王蔚垣、刘裕光等根据北江地委的指示，曾于4月25日凌晨，发动农军攻打国民党县署，逮捕代行县长职务的总务科长王镗沧、检察官谢豪等反动分子，搜出国民党县署公章，成立“英德县政府委员会”。广州国民党政府因此派出1万名反动军队沿铁路北上，疯狂进行镇压。英德党组织挑选120多名农军组成农军中队，北上韶关与北江工农自卫军挺进湖南、武汉，其中一部分参加南昌起义；大部分农军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南昌起义后，英德农民运动有较大发展。中共英德县委下属7、9区委，26个党支部，1、2、7、9区有区农会组织，还有113个乡农会，会员达8000人，农军有步枪800支。1927年12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准备发动广州起义的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各县应立即起来领导农民起义，夺取乡村县镇政权”。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刘裕光、梁金等计划率农民武装向潭洞地主武装发起进攻。潭洞是英德县黄岗乡的一个居民只有40多户、200余人的村庄，但它东接马岭，西连连滩，南靠古坑，北邻三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且该村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较好。中共英德县党组织领导人计划先在潭洞发起武装起义，然后再发动全县性的起义。潭洞地主武装闻知这一消息后纠集翁英商团及土匪等反动武装，于1月4日即向农民武装发起进攻。潭洞农民武装猝不及防，虽奋起抵抗，激战数天，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潭洞农民只好退守连滩山。潭洞为敌人所占领，村中财物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为了反击地主的进攻，夺回潭洞，支援潭洞农民，在北江农军负责人周其鉴、赵自选和英德县委负责人刘裕光等领导下，1928年1月中旬，文光、黄塘、石角、桥头等地的农民武装300余人开赴潭洞，向潭洞的地主恶霸发起进攻。地主武装依仗手中的优良武器和坚固的炮楼，死命顽抗，农军围困潭洞两昼夜，击毙团丁20多人，形成对峙局面。恶霸地主陈仁旺等纠集反动民团勾结国民党军第46师第137团第3营，赶来围攻农军。刘裕光等则调动第七、第九区的农军和佛冈农军共600多人，在潭洞附近的竹头山下等要地布阵，对敌形成夹攻；并调动涂光农军三四百人，占领金钗岭村进行支援，攻打国民党军第137团第3营。潭洞的农军乘机攻打地主陈仁福的炮楼。农军用棉被盖着头，连续向炮楼攻击。经过一连几天的艰苦奋战，打死打伤敌多人，但仍未能攻入潭洞。

此时，中共北江特委对当时形势作了分析，指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要攻下潭洞困难已经明显”，“应该设法退兵，把潭洞的武装转移到别乡去活动”。按照北江特委的指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农军在刘裕光指挥下，撤出战斗退出连滩山，坚持隐蔽斗争。

石首年关起义

中共湖北石首中心县委组织领导农民革命军和农民群众，于 1928 年 1 月 22 日在调关、新厂镇举行起义。

1927 年冬，石首地区经过秋收起义和反“清乡”斗争，中共石首地区党的组织有很大发展，农民群众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各地建起了农民游击队。1928 年初，中共石首中心县委根据湖北省委关于各地在国民党军阀湘鄂战争爆发之际，利用农历年关前后举行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决定在农历年关期间分别在江陵、石首、监利、华容、安乡 5 县发动起义。1928 年 1 月 22 日（农历年除夕）。在中共石首中心县委的统一组织下，农民革命军 100 余人攻打南部重镇调关，给陈家典团防队以沉重打击。随后，袭击了江北土匪李家未、张右堂、刘似茂等部，处决劣绅、把头及土匪数十人。与此同时，段玉林领导的游击队趁夜攻打新厂团防局，将地主豪绅的粮食、衣物、银元分给贫苦农民。2 月初，领导荆江两岸年关起义的贺龙、周逸群来到石首，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共同研究了起义实施方案，决定石首年关起义全面展开，并汇入荆江两岸年关起义的洪流之中。

2 月上旬，在贺龙统一指挥下，李兆龙、李良耀率领石首农民在湘鄂交界的东山、石华堰发动农民 1000 余人举行起义，镇压豪绅刘再义等数人，接着攻占调弦口、高基庙、九经佛岗，收缴团防枪械 30 余支。李恒久率领桃花山暴动队配合贺锦斋部攻占小河口和监利堤头，严惩地主，分发浮财，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屈阳春、冯世华等在东二区的河口、王海垸等地领导农民举行起义，攻打小河口团防局，击毙团防局长汤凤先，缴枪 20 余支。段玉林率领游击大队配合数百名农民再次攻占新厂镇，处决土劣多人。各路起义节节胜利，初步形成了江北、小河、来家铺、东山等数块游击区。2 月下旬，贺、周前往湘鄂边地区领导武装斗争，荆江两岸年关起义遂告结束，各路武装分散转入游击战争。

石门年关起义

中共湖南石门县委根据中共湘西特委指示，组织发动各乡群众于 1928 年 1 月 22 日开始举行了年关起义。

1927 年 11 月，中共石门县委根据湘西特委的指示，积极准备年关起义。1928 年 1 月，湘西特委派特委委员舒玉林、蔡以忱到石门县领导起义工作。蔡以忱到石门后，立即召集县委会议，传达了特委关于一般地区只发动群众、恢复组织，基础好的地区则于春节前后举行起义的指示，并决定由各区委领导农民起义。会后，将县委委员派往各区加强准备起义的领导。1 月 22 日（农历腊月三十日），县委委员曾庆轩派刘俊儒带领暴动队员杀死了到南岔办案的 3 个县法警。曾庆轩带领二三十人，将大土豪曾华廷的房子付之一炬，处决了反革命分子曾海清。与此同时，新关、南圻起义爆发。龙家泉、蔡以忱、曾庆轩带领暴动队员直抵南圻大土豪上官嗣西驻地。上官嗣西父子闻风而逃，暴动队员便放火烧毁其住宅。接着，暴动队还攻打了新关自治局，杀死了“亲爱党”头子廖喻先和挨户团区大队长熊清河，烧毁了区长喻云廷的住宅。1 月 30 日晚，磨岗隘农民举行起义，杀死了国民党区团总龚砥臣及一批土豪劣绅。南乡福田区和北乡泥沙区的游击队，也在此时揭竿而起，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年关起义的迅速发展和节节胜利，轰动了石门全县，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县政府立即派警察队进行镇压。他们还勾结国民党军，惨杀了苏清镐等 17 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制造了名震全省的“石中惨案”。石门年关起义，在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为以后举行更大规模的起义和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五华第一次年关起义

1928年1月22日，中共广东五华县委指挥“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7团”和区乡赤卫队等工农武装10万人，在五华全县举行了年关起义。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之后，五华县党组织于1927年8月间将特别支部改组为中共五华县委员会。接着，成立五华县革命委员会。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广东工农讨逆军第7团队”，古大存任团队长。不久又改称“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7团”，下辖3个大队、9个中队、1个模范中队、1个模范队区联队，及1个教导队，各乡的农民自卫军则改称赤卫队。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县农民武装与人民群众紧密配合，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先后攻占安流、半田、对镜窝、罗经坝等重镇，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地主压迫剥削、严厉镇压反革命的示威游行。12月中旬，五华县革委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古大存率领工农革命军干部、战士200余人到海丰苏区进行参观学习。此后，按照海丰的经验，五华县陆续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分田废债。12月23日，中共东江特委发出紧急通告，号召各县开展“年关大暴动”。根据东江特委的指示，五华县成立了“年关大暴动行动指挥部”，制定了行动计划。1928年1月20日，塘湖反动头子钟问陶，勾结地主武装组成“讨赤团”，向工农革命军据点龙村进犯。被当地农军打退后，又公然向工农革命军下战书，声称“本月二十八日（农历）与你决一胜负，你若不来，我去解决你农会的武装。”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22日古大存等率领工农革命军东路第7团和各区乡赤卫队共2000余人，分东、西、北3路向“讨赤团”的老巢塘湖发起进攻，打响了年关起义的第一枪。钟问陶率残部乘黑夜仓皇逃往上砂，工农革命军东路第7团即占领了塘湖。接着，在中共五华县委县革委和暴动指挥部的指挥下，一场有10万之众军民参加的年关起义，在全县大部分区、乡爆发。安流区农军逮捕、处决了贪婪无厌的大捐棍张玉波；没收了樟潭地主赖叔陶，以及龙颈地主刘俊山的家产，分给贫苦农民。龙村区洞口联乡办事处组织赤卫队，处决了反动地主温子彬。水寨区郭田乡在除夕那天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江公甫和陶菊等带领赤卫队抓获大地主江五养。接着又到布尾下，处决了地主陈火四、陈火五兄弟。肢区农会负责人魏育彬，组织黄坑乡赤卫队捕杀了地主陈亚成、范亚九。接着，又到伯公坳没收了地主李质先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县工农革命军大队长曾伯钦，发动农民群众，捕杀土豪劣绅、封建头子李蔼堂、曾吉孙、张阿济等。接着，五华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成千上万的群众动员起来，号召破除神权，捣毁神坛社庙，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国民党五华地方当局纠合反动武装进行反扑。五华县的农民武装1月底至2月初，先后在郭田、布尾一带击退了国民党正规军徐景唐部的进犯；在安流、万塘一带，打退了蔡廷锴部7000余兵力的窜扰；在横陂下阜坝，狠狠打击了魏汉周、魏灼寰的地主民团武装。2月17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增派反动军阀黄旭初率一个师的兵力“进剿”五华，加上原有蔡廷锴、徐景唐部，“进剿”五华的敌人达数万名之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达2000余人，被焚烧的村庄数以千计，五华革命转入低潮。古大存等带领6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于5月间奔上八乡山，进入开辟八乡山根据地的斗争。

五华县丁卯年关起义，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动员和锻炼了众多的工

农群众，为后来建立的八乡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上屯起义

1928年1月23日，中共福建建瓯县委员会在画锦乡（今小桥镇）将相里（今上屯村）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7月，在中共福州地委领导下，中共建瓯支部成立，在闽北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闽北党的工作逐渐转向农村。至6月，建瓯支部先后派出杨峻德等支委去西区、南区组织农会，开展农民斗争。8月，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在建瓯建立，建瓯支部扩大为县委。12月，福建全省各县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在漳州召开，决定发动工农起义，并将建瓯列为第4区。

上屯村在共产党人杨峻德和农运骨干陈金寿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发展很快，有百余人参加了农民协会。陈金寿和林积妹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把组织农会的活动扩展到邻近的登仙里（今阳泽村）和南才里（今玉山乡）。将相里民团团总称霸乡里，经常放纵团丁勾结土匪，坐地分赃。一次，上屯村一农户被匪绑架，要交4000斤稻谷作赎票。群众得知是团丁和土匪勾结所为后，找团总论理。团总借故推辞，群情愤然。当即，陈金寿、林积妹遵照县委指示，决定趁春节期间，民团团丁分散之际，揪斗民团团总。1月23日（正月初一），陈金寿等率数十名农民协会会员，手持梭标、大刀闯进团总家中（团总不在家），后占据民团团部，夺取民团枪支20余支。上屯起义后，将相里民团团总带领国民党军新编第2师第4旅一部包剿上屯村，陈金寿、林积妹等6人被捕，陈、林被害。建瓯县委曾计划召集四乡农民，以开追悼会名义，举行起义，占领县城。由于不慎，被国民党军第4旅抢先下手，查封了县工会和县农会，建瓯县委遭受严重损失，武装斗争转入低潮。

沙岗年关起义

1928年1月23日，中共湖北江陵县委根据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的指示，组织领导江陵农民武装在沙岗举行起义。

1927年冬，中共鄂西特委为贯彻湖北省关于举行全省总暴动的指示，作出由江陵等县首先发动的湖北西部地区年关起义计划。中共江陵县委决定把沙岗作为首先起义的地点。1928年1月，中共江陵县委为了加强对年关起义的具体领导，成立了由陈香波、彭之玉等人组成的年关暴动委员会，同时秘密整训全县农民武装。确定沙岗起义的主要打击目标为当地农民称为“三害”的国民党水警队、官办盐卡和大地主朱敬亭的鸦片馆，起义时间为农历年正月初一。1月23日（正月初一）凌晨，沙岗农民赤卫队分两路行动。邓诗福、陈兴发率领10余名赤卫队员包围朱敬亭住宅，焚烧了鸦片馆（朱逃走）。然后乘胜捣毁了国民党“盐卡”，将没收的食盐分给贫苦群众。陈香波、彭之玉率领另一路赤卫队30余人，直扑白鹭湖水警队，出其不意地发起袭击，当即俘官兵28人，缴获炮艇两艘、土炮1门、长短枪28支、子弹10箱。随后召开庆祝大会，公审处决大地主李安信和邦会头目孙福昌。宣布成立江陵县农协会，陈香波为委员长，将农民赤卫队总队改称为江陵县工农总大队，即白鹭湖游击队，大队长穆英。1月30日，中共江陵县委号召全县各地举行年关起义。2月5日，毗邻沙岗的龙湾区区委书记刘赤声率赤卫队和农民群众800余人起义，击退徐李寺保安队的进攻，歼灭了老新口团防武装，处决了团总徐友三和常练队长及土劣10余人。接着，荆江两岸年关起义正式爆发，白马区、普济区农民群众分别在共产党员张文松、王子香率领下举行起义，捕捉土豪劣绅，攻打当地团防和土匪武装，缴获长短枪46支。至此，初步形成以沙岗为中心，东至龙湾，西到白马，南接普济的联区割据局面。

2月中旬，国民党第18军派1个团的兵力进驻江陵县城、交通要道和重要集镇，大举“清乡”。14日夜，中共龙湾区委所在地刘家大湾遭到袭击，区委书记邓赤声及其妻子陶元柏等人被捕，惨遭杀害。2月底，监利县反动团防跨县袭击沙岗，工农兵大队大队长穆英中弹牺牲。部队由马子厚率领转战白鹭湖地区。后与其他游击队会合，开展水上游击战争，使以白鹭湖为中心的红色区域成为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左县起义

1928年1月23日，广西邕宁、养利、雷平县农军在中共吴圩党组织领导下，在左县县城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左县（今属崇左县），位于广西西南部的左江中游，是桂西南诸县的交通枢纽。1926年夏，养利县绿林武装头目冯飞龙曾组织了一支武装。国民党左派、广西省农民部特派员何绍贞与冯飞龙是挚友，在何的影响下，冯的思想开始倾向革命。经过酝酿，于1927年10月间开始组织了有4个支队200多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冯任总指挥。同年冬，冯飞龙派一个支队先后攻破同正县那隆团局（今属崇左县）和万承县大岑团局（今属大新县），用武力收缴了国民党县政府设在那里的金库、粮库。冯飞龙的这一举动，激怒了国民党广西省政府。随即派警备独立第5团团团长许辉主为总指挥，前往“清剿”。12月10日，许辉生派该团冯哲先营向冯飞龙的住地小偶屯进攻。冯飞龙命令农军把大门关上后，即分兵3路反击：一路由王文勇率领进入后山腰炮楼控制制高点；另一路由彭世光、温敬波、冯仁华带人坚守客厅，正面作战；再一路由冯飞龙带卫士队坚守靠近大厅的炮楼。经过激战，冯哲先丢下了40多具尸体和几十支枪败逃。冯飞龙预料桂系军阀不会就此罢休，于是派人四处联络各地农军加入农民自卫军。农军由800多人枪扩大到1200多人枪。12月下旬，驻守驮芦镇的国民党许辉生团，联合同正（今扶绥县）县民团共1000多人再次进攻小偶屯。冯飞龙率400多农军同邕宁县农赤军大队长唐光天、总指挥文树芝率队前往参战，两部农军会合后，将许辉生团赶回崇善县，占领驮芦镇。邕、养农军领导人分析认为许辉生团虽已被赶跑，但左县仍在敌人手中，左县是各县农军交通必经之地，只有攻下左县才能便于各县农军互相联络支援。会上决定乘胜举行左县起义，并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

1928年1月23日晨，养利、邕宁、雷平农军五六百人围攻左县县城，国民党左县县长李秀英率县警团局进行抵抗。由于农军动作神速，人多势众，很快突入县城。敌县长率部逃跑，农军击毙县总务科长等数人，缴枪22支，打开监狱救出被押的无辜群众13人，没收敌县署财产一批。接着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废除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解散国民党包办的农会、工会，起义取得胜利。

焦作起义

1928年1月24日，中共河南省焦作市委在该市领导和发动部分共产党员和群众骨干举行了武装起义。

焦作地处豫北黄河北岸，是个煤矿产区，系豫北重镇之一。早在1925年，焦作煤矿工人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大罢工，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的“五卅”运动。1927年，共产党又在数十个村庄发动农民运动，群众基础较好。192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为了声援豫南的革命斗争，尽快开辟豫西北革命游击根据地，造成河南境内从南到北革命局势的实现，派共产党员阎廷弼前往焦作任市委书记，加强对焦作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1928年初，中共河南省委又派省委常委张景曾（又名张和尚），亲往焦作加强指导。首先组建了新的中共焦作市委和共青团焦作市委，恢复了基层党，团组织。接着，在中共焦作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起义行动委员会。委员长由市委书记兼军事委员阎廷弼担任，副委员长由共青团焦作市委书记李正峰担任。起义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和训练工作。

1928年1月22日，焦作起义行动委员会得知国民党焦作市警察局从新乡购置一批手枪，准备装备地方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中共焦作市委决定，立即行动，赶在敌人分发手枪之前，夺取这批武器。24日晚，中共焦作市委在河南省委的指导下，组成由20多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及群众骨干的精干队伍，在阎廷弼、李正峰率领下直奔焦作市警察局。起义队员个个胳膊上扎着白毛巾，手持大刀，在警察局供职的中共党员密切配合下，夜袭成功，共毙敌3人，夺枪7支。随后，起义队伍转移到市区以北约20公里的山区，拟收缴山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后因情况不熟，局势恶化，未能达到目的，遂将枪支埋藏在薄壁山中，分散隐蔽，准备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

水口山起义

1928年1月26日，中共湖南常宁县水口山矿党组织为响应湘南起义，发动工人进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9月，中共湖南省委从衡山等地派共产党员李玉荣、张云贵到水口山，恢复党组织。很快，中共水口山矿特别支部建立，书记宋乔生。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武装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水口山党组织一面组织部分工农武装队伍转移到耒阳边境的桐梓山，开展游击活动，一面派人打入矿警队，发展党组织，设法筹集枪支弹药。湘南起义爆发后，水口山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共湘南特委号召，准备发动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当时，水口山党组织了解到国民党水口山矿警队有140多人、120支枪，遂决定由宋乔生担任总指挥，首先向矿警队实行突击夺枪，随即起义。1928年1月26日，宋乔生指挥800多名起义工人涌入矿警队驻地，在矿警队地下共产党员谢文彬策应下，从矿警手中夺得50多支长枪和数百发子弹，随后宣布起义。起义工人和300多名农民在宋乔生带领下，离开水口山，开赴耒衡边界的桐梓山，建立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宋乔生任队长，李玉荣任党代表（后为谢翰文）。此后工农游击队根据朱德的指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独立第3团。3月中旬，宋乔生率部撤离桐梓山，进入耒阳城，与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汇合。

水口山工人起义，是这一时期发生在湖南境内唯一的一次声势较大的工人独立的武装起义，它对城市、工矿的工人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醴陵年关起义

中共湘东特委和醴陵县委于1928年1月27日和2月27日接连组织了两次有数万农民参加的攻城行动，即著名的醴陵第一、第二次扑城，亦称醴陵年关起义。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中共醴陵县委继续在农村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准备起义。10月，在西一区建立醴陵游击营。同年底，醴陵东、南、北三乡相继成立了游击队、赤卫队。并在南乡建立了兵工厂，制造武器弹药。游击队发展到400多人枪，组成了醴陵工农革命军第1团，团长周云甫，党代表滕代远。由刘型领导的游击队与南三区游龙领导的游击队合编为萍醴游击营，营长游龙，党代表刘型。全县赤卫队发展到4万多人。醴陵农村初步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为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中共醴陵县委根据湖南省委年关起义指示精神，决定利用湘桂军阀混战之机，攻打醴陵县城。县委开始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确定以工农革命军第1团为主力，调萍醴游击营参战。成立了以潘疆爪为总指挥的攻城总指挥部。1月27日，醴陵农民武装和革命群众近万人，带着梭标、雷火枪、松树炮等武器向县城进逼，很快包围了县城。醴陵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凌晨，攻城总指挥部下达攻城命令，各路农军立即向前冲杀。西乡农军涌向渌江边，却无法过河；东乡农军在阳三石捣毁敌人军火库，冲到三宫殿、邓山塘、瓜畲坪一带，威逼城中心；南乡农军攻进了南门，涌向渌江南岸。渌江桥是进入县城中心的唯一通道，敌军在此防守严密，几经争夺，终因敌人火力猛烈，农军伤亡较大，攻城总指挥部被迫下达撤退命令。上午10时，各路农军全部撤离县城，返回原地，中共醴陵县委和攻城总指挥部总结上次攻城经验教训，决定2月27日再次攻打醴陵县城。首先组织农民破坏株萍铁路，切断敌人增援路线，将所有渡船集中到渌江西岸，供农军攻城使用。26日晚，各乡农军和群众之万余人，集中到达指定地点。27日凌晨，农军分四路向县城发动猛攻。西乡农军过河后，占领了刘家码头和金牛巷口；北乡农军冲过凤凰山，占领七眼塘、来龙门一带；东乡农军攻到东门渡口，占领了邓公塘一带，三路大军直逼守敌城防阵地，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南乡农军冲过南门、打到渌江桥时，遭敌人机枪火力的猛烈阻击，第1团多次强攻，未能奏效。攻城总指挥部分析了战斗形势，认为敌人火力太强，农军武器太差，再攻下去，于农军不利，于是下令农军撤退。下午2时，各乡农军全部撤出县城。

醴陵农军两次攻城虽都未获成功，但震动了湖南全省，显示了农民群众的力量。

万宁第二次起义

1928年1月29日，广东琼崖工农革命军第1营、第2营和万宁县农军、数万群众，在中共万宁县委的领导下，再次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12月18日万宁县第1次武装起义以后，国民党琼崖当局妄图用血腥屠杀政策来对付农民起义。1928年1月16日，国民党军第33团派一连兵力纠集地方民团到争来岭烧杀抢掠。1月20日，国民党又制造了震惊全琼的“盐（墩）、涛（一）、和（乐）、港（北）‘一甘’惨案”，万4区群众489人倒在血泊之中，被抓去的57人也被杀害。国民党的屠杀激怒了万宁县人民，为了替死难者报仇，中共万宁县委决定于1月29日再次举行全县起义，由县委书记兼东路工农革命军第2营营长谢育才任总指挥，计划攻打万宁县城及第1、2区的民团据点。县委对这次起义作了周密的部署，并严格起义纪律，规定党员、骨干带头，不准中途退却，计划起义后建立县苏维埃政权。1月29日夜，扛着长枪的工农革命军，手持大刀长矛的农军，以及一队队农民群众，形成数万人的起义队伍，纷纷从各村寨出发，奔赴万宁城下集结。工农革命军两营队伍原定在天快亮时同时发动进攻。由于负责交通的陈开达被捕，致使第1营和第2营失去联系，率领第1营的徐成章仍按原计划，从南门发起进攻。第1营干部战士与起义民众英勇奋战，攻进城内，毙伤敌人10余名，但由于没有内应和各路起义队伍的配合，只好退出城外。天刚亮时才赶到城下的第2营，在东门发起进攻，但由于不能与第1营及各路农军队伍协同动作，久攻未克。这时，天已大亮，起义队伍遭到守在城墙上的敌人密集火力射击，谢育才只得指挥士兵掩护群众撤退。上午，各路起义队伍全部撤离县城。

第2次起义，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延福起义

1928年1月30日，中共江西省延福党总支在吉安县北部延福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1月，中共党员罗石冰回吉安建立党团组织，先后介绍胡庭铨、郭家庆、李锦云、郭承祿等人加入共产党组织，建立了吉安县第一个农村支部——中共延福支部，书记胡庭铨。9月，李锦云回乡发展党员，恢复组织，开展农运，成立延福区农民协会，全区会员达1.2万余人。中共党的“八七”会议后，郭家庆、李锦云、郭承祿等先后在相坪、七星等地建立了支部，成立了中共延福党总支，总支书记郭承祿。各乡村农协迅速恢复，提出了抗债、抗租、抗粮、抗捐、抗税和杀土豪、杀劣绅、杀贪官污吏等革命口号。1927年6月，被减裁的滇军第8师排长李育青，率士兵21人，携枪19支流落九龙山，经李锦云多次教育，李育青及其部下愿意投向革命。10月，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组建了延福区油田游击队，队长李育青，指导员刘泽民。9月间，组建了延福塘东游击队。10月，郭家庆等又在新余购买了湘军程潜部下100余条步枪。延福党总支决定进攻吉水阜田靖卫团，举行起义。1928年1月30日，延福党总支集中革命武装奔袭阜田靖卫团。靖卫团毫无戒备，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缴械投降。游击队缴枪32支。起义胜利后，李锦云、郭承祿、李育青、刘泽民率队继续攻打附近反动势力。2月，北上分宜，生擒靖卫团1个班，缴枪10余支。接着攻打安福县靖卫队，占领县城，缴枪10余支，俘敌10余人，筹款400元。接连的胜利，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延福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军参战，驻萍乡的国民党军某部排长也带全排36人（枪）投诚。于是，赣西特委决定将这支农民武装组建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3师第9纵队，纵队长李育青，参谋长刘泽民，全纵队200余人，枪160余支。

3月，第9纵队奉命赴东固与第7纵队会师。吉安国民党军朱世贵部乘机派了一个营和靖卫团进攻延福，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李锦云不幸牺牲。8月，第7、第9纵队回师延福，途中于塘东洪塘伏击敌军，毙俘敌50余人，缴枪70余支。后在枫田、固江连打两仗，缴枪60余支。第7、第9纵队回到延福后，延福党总支改为中共延福区委，郭承祿任书记，管辖东水、油田等7个支部。不久，相继成立了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区苏维埃政府。

荆江两岸年关起义

1928年1月下旬，在贺龙、周逸群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49路军和鄂中、鄂西各县农民武装，在湖北荆江两岸举行了一次起义。

1927年12月31日，中共湖北省委制定了《全省总暴动计划》，号召各地利用年关时机，在城乡举行武装起义。1928年1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组成由周逸群、贺龙等为委员的中共鄂西南特委，前往公安、石首、监利、潜江等县组织领导荆江两岸武装起义。1月20日，周逸群、贺龙等10余人抵达新堤，贺龙以上岸“拜客”为名，突然收缴观音洲团防局长短枪10余支，子弹200余发。21日，抵监利，与贺锦斋所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总计170余人，100余支枪。27日，周逸群、贺龙主持召开了石首中心县委和监利、沔阳、华容等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商定监（利）、石（首）、华（容）、沔（阳）等县党组织带领农民举行起义。同时致函鄂中特委，并约请工农革命军第5军前来会合会攻监利县城。2月1日，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9路军，贺锦斋任军长，贺龙任总

沙溪起义

1928年1月、6月，中共江西省永丰县委在沙溪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沙溪位于永丰县南部，包括沙溪圩、北岸、王家前房等20个村庄，方圆10余公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在沙溪圩设立国民政府办事处和靖卫团。1927年11月底，袁振亚受中共赣西特委的指示回到永丰，任中共永丰区委书记。12月，袁振亚主持召开了中共永丰区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扩大党的组织，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成立县区革命委员会等项决定。会后，区委对沙溪地区的起义准备工作加强了指导，恢复了中共沙溪支部，李龙章任书记。1928年1月间，中共党员李春生、王辉党根据中共沙溪支部决定，召集北岸、王家前房等村的贫苦农民120余人，将靖卫团和国民党党部人员赶出了沙溪圩。沙溪支部趁此机会，以北岸、王家前房农民为骨干，成立了沙溪赤卫队，共有70余人，60余支枪。3月，沙溪反动派从吉安请来“五市联防”（即富田、新圩、新安、值夏、陂头）的反动军队300余人来沙溪镇镇压革命，沙溪赤卫队在江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支援下，打垮了“五市联防”队。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还先后在沙溪的北岸、南岸、河下李家等地建立了14个秘密农民协会，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为加强对农民起义的领导，还秘密成立了沙溪区革命委员会，王凤翔任主任。6月的一天晚上，北岸、王家前房的农协会会员和赤卫队员200余人，在赖经邦、李怀远等人率领下，又一次举行起义。起义农民先后打击了北岸、钟山下、水村、拱江背、艾家、王家等村的土豪劣绅，没收其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之后，沙溪革命委员会和各村农民协会由秘密转向公开，各村组织了农民赤卫军。不久，永丰、吉安、吉水3县靖卫团联合起来，进攻沙溪，中共党的组织和农民赤卫军遭到重大损失。

沙溪起义受挫后，坚持斗争的中共党员李龙章、李怀远等不断以江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的名义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1929年2月，恢复了沙溪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以北岸赤卫队为基础建立了沙溪游击队。3月中旬，沙溪游击队配合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赶跑了沙溪守桥的敌人。不久，建立了沙溪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沙溪区苏维埃政府。

安乡年关起义

在中共湖南南(县)华(容)安(乡)特委领导下，中共安乡特支于1928年1月组织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夏，中共南华安特委派邓必开赴安乡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在安乡成立了安乡特支，发展共产党员20余人。是年11月，安乡特支执行省委关于发动年关起义的指示，认真研究和布置了全县的年关起义工作。1928年1月的一天，100多名暴动队员在共产党员黄基诚的指挥下攻入县城，放火烧毁了县署、监狱，救出被关押的群众。同时，还烧毁了县团总杨亦秋的房子。然后，暴动队撤离县城。攻打县城后，黄基诚、郭理承等又率领暴动队在大鲸港、五合一带，切断了安乡、临澧之间的电话线，使两县的通讯联络中断。4月，安乡特支改组为安乡特区区委，黄基诚任书记。此后，安乡特区区委积极组织了反击敌人清乡和白色恐怖的斗争。

安乡年关起义规模虽然不大，但攻入县城，使得国民党县政府惊慌失措。特别在暴动之后，安乡党组织领导农民武装一直坚持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直接配合了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

南县年关起义

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和南县县委于 1928 年 1 月开始，组织发动南县农民群众举行了一次全县性的武装起义。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发动年关起义的指示，中共南华安特委决定在南县、华容、安乡三县组织发动年关起义。1928 年 1 月 10 日左右，南华安特委和南县县委首先在南县游港组织起义，打死游港的大土豪、堤工局局长曾汉生。游港起义后，南华安特委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举行南县年关起义。会后，特委书记杜修经等即按照会议的部署和预定的目标，率领两路起义队伍去灵官洲、中鱼口举行年关起义。由于敌情侦察不准，加上战术上的失误，两处起义均遭失败。特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四处点火的办法，发动各地起义。随后明山头、荷花嘴、浪拔湖、傅家咀、班咀、水仙庙以及县城城郊九都山等地相继爆发了规模不一的起义。1928 年 2 月 6 日（农历正月 15 日）晚上，共产党员陈刚、张紫照等带领 50 多名起义队员，以玩地花鼓为掩护，混入明山头团防局，乘敌不备，夺枪 20 余支。班咀、游港等 3 个党支部还联合组织发动了荷花咀大暴动，烧毁了当地团防局和一部分豪劣的房屋。随后，这支起义队又奔袭安乡三岔河豪劣李三爷的店铺。年关起义后，中共南华特委组建起特委游击队。不久，特委游击队扩充为“工农革命军洞庭区剿匪游击司令部”，陈刚任司令，在南咀山及洞庭湖一带实行武装割据。

南县年关起义遍及全县大部分地区，给国民党南县政府及土豪劣绅以沉重打击。起义后，党组织继续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建立了游击武装和游击根据地，支持了洪湖根据地斗争。

嘉积起义

1928年2月1日夜，中共琼东县委警卫连和嘉积地区工农群众，在中共琼东县委和中共嘉积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嘉积素有琼崖第2大城市之称。“四二二”琼崖事变后，国民党军派1个营常驻于此。国民党当局还组织以何清雅为团长的嘉积市商团，协助军队镇压革命运动。中共琼崖特委对夺取嘉积极其重视。椰子寨受挫后，特委派一批党员潜入嘉积市开展活动，成立了以王新安为书记的特别支部，直接受特委领导。1928年1月，特委要求嘉积市工人和市民，迅速发动起义。2月1日夜，靠近嘉积的1区集中群众从簪马村出发，开往后坡、内园一带村庄游行示威，虚张声势，作出要攻击琼东县城塔洋的样子，使城内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由农民赤卫队和农民群众组成的5区破坏队，协同陈邦兴带领的警卫连第2排，埋伏于嘉积至长坡路段的桥旁，阻击从文昌方向来的援敌。琼东县委警卫连的二三十名战士在王永瑞率领下，从良玖村出发，经1区的鳌头涌、龙寿村和2区的孟里村抵达嘉积，沿着阴沟潜入市区，与王新安带领的嘉积市工人队伍会合。随即兵分2路，分别进攻敌正规军营部和东路联防队驻地，向敌军宿舍投掷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数人，纵火焚烧了敌军营房。

嘉积起义，牵制了国民党在琼崖东部的兵力，策应了东路的乐会、万宁2县的农民武装起义。

常德年关起义

1928年2月3日，中共常德县委遵照湘西特委关于年关暴动的指示，发动各地农民武装就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年1月，中共湘西特委在常德和临澧交界的七姑山召开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开展年关暴动的指示，号召各县立即举行声势浩大的年关武装起义。会议之后，中共常德县委研究制订了全县年关起义计划。

2月3日，起义开始。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刘泽远率领常德县郊农民起义队，先后处决了土豪龙吉福、大恶霸刘彩清。农民暴动队一夜处决了3名土豪，震动了全县城乡。不久，同德区的农民亦举行了武装起义。1928年2月29日，共产党员牟运阶打听到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褚正昌准备乘轿从县城回乡，向农民逼租逼债，立即和蒋积善集中100多名持械的农民，埋伏在太平桥与牯牛桥交界的葛藤铺要道山口。当褚正昌在保镖的护卫下来到山口时，牟运阶一声令下，埋伏在两侧的农民一齐跃出，举起梭镖、大刀冲向褚正昌。几个护卫的保镖见农民暴动队人多，不敢迎战，各自逃命。褚正昌被暴动队员抓获，当场将其击毙。

同德挨户团获悉褚正昌在葛藤铺被农民暴动队围杀后，立即“围剿”农民暴动队。5月的一天夜晚，中共同德区党组织在太平庵内召开会议，突然被挨户团包围，牟运阶为掩护大家脱险，不幸落入敌手。农民纠察队长蔡文典和蒋积善连夜串联发动农民群众数百人，冲入挨户团驻地，救出牟运阶，袭击了挨户团团团长蒋福阶的家。逃匿在外的蒋福阶急忙请人出面向暴动队请罪，保证今后不再欺压农民，不抓捕共产党员和群众。

深溪起义

1928年2月4日，在中共潮阳县党组织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3团一部和深溪农军数百人，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夏，经过黄埔军校训练的中共党员刘大刚，回到潮阳县深溪乡，秘密串连青年农民刘明合等，兴办农民协会，开展练武、打击土豪劣绅等革命活动。入冬，深溪地主豪绅勾结国民党潮阳县第9区民团联防大队“围剿”农民协会。刘大刚、刘明合带领农会干部和赤卫队员，撤到大南山中，汇入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大南山游击武装。12月，潮阳党组织将大南山的武装队伍200多人，编为广东工农革命军第3团。县委委员黄道为第2营营长。不久，刘大刚等拟定深溪起义计划，得到了潮阳县党组织的批准，深溪，是大南山北麓的重镇，乡公所所在地。国民党第9区民团联防队长期盘踞在这里，四周修筑了4个大碉堡。为确保胜利，中共潮阳县党组织成立了以刘明合为队长的20多人的“敢死队”，反复进行攻打碉堡的演练，并确定由工农革命军第3团配合行动。2月4日，刘大刚、黄道率工农革命军第3团一部和深溪农军于拂晓前对敌据点发起攻击。他们先扫平了外围防线的守敌，然后分路直插深溪寨前寨后。攻寨时，队伍曾一度受阻。刘明合见此情况，即率10多名敢死队翻墙潜入老祠堡，将守敌缴械。工农革命军战士闻信号向敌民团联防总部发起冲击。霎时，火光炯炯，喊杀声连天。敌民团联防总队立即关闭大门，死命抵抗。敢死队员依计个个手提油罐，大喊：“不投降，就把你们全部烧死！”敌人见起义队伍人多势众，被迫缴枪投降。起义队伍军威大振，一齐冲向顶寨祠堡和水尾祠堡等其他3个碉堡。经两小时激战，4个碉堡全部夺下，不少守敌被俘。攻下深溪乡公所的第7天，起义军召开公审大会，对罪大恶极的刘文喜、刘达元、刘庆辽、刘亚添等“四霸”就地枪决，并宣布建立深溪乡苏维埃政府。此后，深溪乡革命群众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打击土豪劣绅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乡苏维埃政权一直维持了96天，后被国民党军“围剿”解体。起义农军被迫撤往大南山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潘田起义

1928年2月4日，在中共丰顺党组织与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联合组织下，丰顺赤卫队1000余人与第10团一部发起了攻占潘田的起义。

丰顺潘田圩位于县城与黄金、隍两区之间。潘田圩的地主恶霸依仗潘田乡民团、镇压当地人民十分凶残。乡民团勾结丰顺县城的国民党武装，变本加厉地欺压百姓。潘田农民多次要求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消灭潘田的国民党联防。丰顺赤卫队在1928年初春取得了攻打龙溪、黄金两处敌人的胜利后，潘田区的农军深受鼓舞，一致要求同东路第10团一起攻打潘田。中共丰顺党组织领导人黎凤翔与东路第10团团郑兴应潘田农军的要求，制订了攻打潘田的计划，并得到了东江特委的批准。由于驻潘田乡的民团人多，武器较好，所以攻打潘田是东路第10团建立以来遇到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事前经过了认真的准备，由农军中选出的1000多人经过动员训练，并预先布置人员秘密潜伏进潘田圩。1928年2月4日拂晓，东路第10团团郑兴亲自率领队伍，在当地1000多名农民群众的配合下，分两路向潘田乡团防发起进攻。国民党潘田乡团防的团丁们先是凭借炮楼抵挡一阵，随后即抱头鼠窜。起义队伍毙伤反动武装76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占领了潘田乡公所。并打开地主恶霸的粮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过元宵节。同时宣布：成立潘田乡苏维埃政府，黎凤翔、陈仕珍、陈英乔等6人为领导人。当天，由郑兴、蔡若愚签署第10团军事委员会第59号布告，宣布：“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其唯一目的即在举行土地革命。”群众欢欣鼓舞，随后各乡农会也陆续恢复。

在潘田起义中，建立起丰顺县第1个区乡苏维埃政府，鼓舞了全县人民向反动派进攻、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勇气。

汉川年关起义

1928年2月6日，中共汉川县委根据湖北省委关于举行年关起义的指示，首先在系马口举行起义，尔后各地起义相继爆发。

1927年12月31日，中共湖北省委制定了《全省总暴动计划》，要求各地利用旧历年关前后发动起义，特别指示环卫武汉的汉川等县立即行动，与武汉三镇工人起义相配合而汇成总暴动，夺取湖北省政权。随后，省委派黄赤光到汉川，以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1928年1月，中共汉川县委遵照湖北省委指示，将全县分为20个小区，指定了各区起义领导人，要求在春节前后分点起义，尔后向县城逼进。2月6日（阴历正月十五），程棣华、黄赤光率起义队员300余人首举义旗，攻打汉川军事要地系马口。起义队伍占领该镇后，镇压地主豪绅，没收反动分子财产。接着乘胜进攻瓦屋湾，摧毁了地主寨堡，消灭了团丁一部。中旬，汉川县委又领导三汉暴动队攻打仙女区景家湾。仙女区委书记李国烈率领农民在内策应，一举击破大地主黄介凡严密防守，取得胜利。这时，中共湖北省委致函汉川县委，指示在农民起义中注意建立政权和正规革命军队，开辟红色区域。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立即抽调各区武装骨干，组成工农革命军（汉川）第4军，由黄赤光任军长。3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地主武装配合下大举“清乡”，县委机关被打散，主要领导人被迫转移。5月，重新选举产生了以程棣华为书记的中共汉川临时县委，又开展了新的革命斗争。

宜昌西乡起义

1928年2月6日，宜昌西乡人民及农民武装，在中共湖北宜昌县委和西乡支部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后，共产党员段德昌、戴熙康、杨楚桥等奉命到西乡开展革命活动，恢复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西乡特别支部和120多人的赤卫队。为准备武装起义，赤卫队在联棚观音阁秘密进行军事训练。1928年2月6日，中共宜昌县委委员戴熙康、赤卫队长杨楚桥率120余名赤卫队举行了武装起义，袭击反动“富户党”头目李相柏、汪宪章住宅，当即处决李、汪两个地头蛇，使“富户党”土崩瓦解，武装起义首战告捷。接着，戴熙康、杨楚桥将赤卫队员化装成“清乡队”，突然袭击恶霸穆子静的巢穴，收缴枪支弹药后迅速撤离。西乡赤卫队的不断出击，使当地反动势力惶恐不安。3月，保董谭子雅在观音洞召开保甲长会议，拼凑反动保卫团。中共西乡特支得悉后，准备奇袭观音洞，并请求中共宜昌县委派武装支援行动。当天，县委同意了西乡特支的计划，并派武装人员60余人支援。县委组织的武装人员和西乡赤卫队，按预定计划兵分两路，奔袭观音洞，当场击毙保董谭子雅和“清乡”头目杨彦伯、团防代表谭启华等6人，伤敌10多人。

4月，驻宜昌国民党军出动两个连，伙同西乡反动团防向赤卫队武装和革命人民发动“清剿”。下旬，戴熙康等率部转移，途中被捕，后英勇就义。在敌人的“清乡”中，3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其他脱险人员转移松滋、宜都一带坚持斗争。

安化二月扑城

1928年2月6日，在中共安化县委领导下，安化县游击队举行了起义。

1927年8月，中共安化县委重建后，很快建立了4个区委、30多个支部，党员发展到250多人。12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年关暴动的指示，县委决定组织游击队。1928年1月12日，县委成立了以蒋晔为主任的“安化县游击军事委员会”，准备年关起义，并派共产党员李文荣等人打入驻新化的国民党新编独立第20师廖湘芸部。李文荣利用收编委员的职务，回到安化收编散兵扩编部队，掌握了国民党新编独立第20师第5团，李文荣任团长，裴南、李华甫任副团长。不久，蒋晔率后乡农民武装与李文荣部在栗林会合，成为暴动的主力。面对敌强我弱形势，中共安化县委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智取安化县城。首先在县城传出消息说：“廖湘芸在新化杀了团防局长，过几天廖部要到安化来筹给养。”新任县长林雯、团防局长陈似僧深恐廖部到县于己不利，便与各公法团体商定，派代表赴新化为廖湘芸祝寿，答应送廖部给养，意在挡驾。中共地下党员周洋乘机推荐倾向革命的二区小学校长蒋悟非作代表。蒋悟非到新化后，廖湘芸答应不来安化。第二天，蒋悟非向林雯发了火急电报，称“廖部坚持来安，建议县中枪兵暂离县城，以避不幸”。同时密电周洋，按原计划行事。2月5日，蒋晔派一支游击队化装成廖湘芸的先遣部队，在蒋悟非陪同下，来到安化县城，进谒林雯及各公法团体，声言“本部大军已抵马方溪，傍晚可以到县，请速备粮饱。”同时还在城内四处张贴标语，布置营房，各商店老板、富户纷纷下乡躲兵，闹得满城风雨。县长林雪、团防局长陈似僧于当晚带着团防队，撤离县城，躲到九渡水一带，仅留10余支破枪守城。中共安化县委认为条件成熟，决定立即起义，攻占县城，并确定由李文荣任攻城总指挥，蒋晔任政委。

2月6日凌晨，100余名起义队员分三路攻城。守城之敌，听到枪声，弃城涉水南窜。起义队伍胜利占领安化县城，打开监狱，救出12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火烧了全部案卷。敌人发觉上当，疯狂反扑。县委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将队伍迅速撤出县城，转入农村坚持斗争。

华容元宵节起义

1928年2月6日（农历正月15日），中共华容县委组织全县各地暴动队举行了武装起义。1928年1月，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研究部署了华容县武装起义工作。并派刘志刚到华容、安化两县具体指导起义。中共华容县委根据特委指示，积极着手起义准备，并定于元宵节开始行动。

2月6日（农历正月十五日），起义在华容东南西北四乡同时爆发。共产党员周介甫组织指挥华容县城暴动队，烧毁了省议员段峨及劣绅张文君的房屋，并在驻军和县长住处的门前张贴了标语。黎惠等组织指挥百余人的暴动队，处死了劣绅孙宝南、孙后坤父子。高文华、冯希廉等组织指挥的北景港暴动队采取里应外合，缴获北景港团防局20余支枪。西乡暴动队破坏了华容通往南县之间的通讯联络，并在注滋口、梅田湖、万庚、三封松木桥、莲花堰、墨山铺等地张贴了许多革命标语。华容元宵起义，得到当时正在荆江两岸领导年关暴动的以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西北特委的支持。2月7日，应华容县委的要求，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百余人，由监利跨江南下，冒雪奔袭正在砖桥一带作恶多端的华容团防队，全歼团防队，缴枪30余支。贺龙留下长短枪18支，武装华容游击队。

华容元宵起义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反动统治，配合了开辟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

大坡起义

1928年2月6日，琼崖工农红军、琼山县大坡地区农民赤卫队和群众1000多人，在中共大坡区委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4月，中共琼山县委在大坡区成立了大坡区委和农民赤卫队。为了获得武器，开展武装斗争，大坡区委决定发动大坡地区国民党民团兵变。

当时，大坡地区有白石溪乡、树德乡和大坡区3个国民党民团。1927年夏，中共地下党员、树德乡民团副团董林书宽，从团局带出10多支枪，交给树德乡农会，于是，树德乡农民赤卫队便拥有下一批武器。白石溪乡民团与树德乡民团联系密切，白石溪乡团团董谢振法、副团董刘宏太（刘益三）在大坡区委和农会领导人多次动员下，慑于农会的力量，也将该乡民团的10多人枪带出，改编为农民赤卫队。大坡区民团较为顽固，中共大坡区委决定发动群众拔除这个据点。1928年2月6日，区委组织大坡地区的赤卫队，并发动千余名手持铁棍、大刀、长矛的农民群众，在中路工农红军1个连（连长傅佑予）的配合下，向大坡区民团发起进攻。大坡区民团团长林拔卿带领三四十名团丁借助坚固的炮楼和良好的武器负隅顽抗。起义队伍包围了炮楼，断绝了敌人与外界的联系。民团慑于红军和赤卫队的力量，强行突围，向府城逃窜。

大坡起义后，国民党南阳团局派兵前来攻打中路工农红军和大坡地区农民赤卫队。军民团结奋战，活捉民团团长陈达三，起义取得胜利。

永兴扑城

中共永兴特别支部响应湘南起义，于1928年2月9日组织农军发动了一次攻城起义。

1928年1月20日，中共永兴特支组织发动了年关起义。2月初，中共永兴特支为响应湘南起义，派刘木前往郴县，向朱德汇报永兴年关起义情况，请求派正规部队协助攻城。朱德当即派副连长张山川率1个加强连前往永兴支援，并送给57支枪。2月9日，攻城战斗打响。刘木率五六百名农军与张山川率领的加强连在油榨圩会合后，立即进攻县城，沿途农民踊跃参战，队伍扩大到一千余人。农军到达县城河对岸的南门口后，因遭到守城敌军阻击，河面船只为敌控制，一时无法渡河入城。刘木分出部分兵力，绕道至便江下游的龙门渡，在陈伯诚率领的城郊工农赤卫队配合下，迅速攻入城内。与此同时，江右独立团一部由许郁等人率领，进逼北门和西门，城内码头工人乘势占领木江渡，将木船撑过河对岸，接应农军过河。守城敌军闻起义军赶到，仓皇逃出城外，起义农军胜利占领县城，打开监狱，救出30多名革命同志。接着，尹子韶带领农民武装进了城，中共永兴特别支部领导人向大复、黄克诚等也到达县城。2月10日，永兴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参加起义的农民组建成永兴红色警卫团，尹子韶任团长，黄克诚任党代表。在永兴特支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有15个区、137个乡镇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永兴农军再攻县城，胜利成功，并使永兴成为湘南起义的中心区域之一。

横沟寺起义

1928年2月10日，中共江苏淮安县委领导淮安北乡横沟寺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8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将淮安县作为涟、泗、沐、淮等县武装起义的“发动中心”。9月中旬，省委派共产党员陈治平（原名陈文正，淮安北乡人）回淮，进行宣传发动和秘密建党工作。不久，在横沟寺建立淮、盐地区第一个中共秘密支部——省委直属淮安特支，书记陈治平。面对国民党淮安当局用武装催捐催税和勾结地主豪绅逼租逼债的企图，特支遵照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何孟雄的指示，于12月23日以“牛头会”的名义，在钦工镇北圩门外，召开万人抗捐誓师大会。12月底，中共淮安县委在横沟寺宣布成立，书记陈治平。何孟雄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淮安农民起义的指示和意图。同时，提出整顿农民武装，将县御匪联庄会武装大队部改名为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指定赵心权、谷大涛兼任正副大队长。会议拟定起义日期为1928年2月15日。钦工镇万人武装示威大会后，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组织也迅猛发展。起义前夕，全县已有党支部60多个，党员1000多人，其中北乡党支部40多个，党员800余人。邻近的涟水、淮阴、阜宁等地的秘密党组织也纷纷着手筹建农民武装，准备响应淮安起义。地主豪绅纷纷躲进城内；国民党驻钦工镇常备连亦十分恐惧，不断请求县常备队加强驻防。2月9日，国民党县政府调集人马下乡，妄图先发制人，进攻农民自卫军。县委研究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提前实施起义。2月10日上午，3000农民集结横沟寺，陈治平说明提前起义的原因和意义，宣布成立起义总指挥部，陈治平为总指挥，赵心权为副总指挥，陈文瑞、何孟兰、陈文荣负责后勤供给和救护，另派遣谷大涛去钦工镇做常备连的策反工作。同时，整编队伍，明确分工。11日清晨，横沟寺学校上空飘扬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大门两侧张贴着用红纸书写的“淮安县苏维埃政府”和“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的牌子。参加起义的农民，臂缠红布条，在寺前广场上举行誓师大会。下午，起义队伍打着大旗，吹起铜号，手执钢枪、土枪、长矛、大刀等，高呼“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分别向贾庄、赵庄、黄庄、谷圩、紫马周和宋集等10多处目标进发，沿途冲进地主庄园，焚烧地契、租约和借据，开仓分粮，收缴枪支弹药。陈治平率领一支起义队伍包围了大董庄的地主卫队，搜缴了武器，并击毙了北乡大劣绅、团董董玉番，逮捕了恶霸地主陈步营。次日拂晓，国民党淮安县政府集中常备队所有兵力（4个步兵连和1个骑兵连，并以26军1个营为预备队），倾巢出动，抵达钦工镇，兵分南、东、西3路向横沟寺合围。起义总指挥部将武装力量编为2个大队，4个小队，分成3路，由陈治平、赵心权、谷大涛等分别带领，与敌人浴血奋战。谷大涛不幸头部中弹牺牲。独立中队队长章学廉腿部受重伤，仍顽强拚杀，壮烈献身。队员章仰芝、高怀堂、孙孝忠等亦英勇牺牲。队员家属谷曹氏、陈严氏和孙兰英惨遭敌人枪杀。午后，陈治平、汤汝贤及赵心权、厉石卿等所率武装分别突围，撤至茭陵汇合。敌人又重兵逼近，形势十分危急。他们迅速调整部署，并抢占废黄河南堤，与敌浴血鏖战1个多小时。傍晚，敌不敢恋战。起义队员在夜幕掩护下，渡过废黄河，撤退到涟水县境内休整。13日，敌人在横沟一带大肆烧杀抢掠，并在北乡各村搜捕农民领袖。横沟寺起义发生后，何孟雄从泗阳赶到涟水，与陈治平、赵心权等一起，总结了这

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尔后，赴沪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

淮安横沟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对淮安、涟水、淮阴、阜宁等地的武装起义产生了很大影响。

芹溪起义

1928年2月上旬，中共江西省吉安县东固党组织在永丰县潭头乡芹溪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中旬，东固农民武装起义的胜利给予一岭之隔的芹溪人民以极大鼓舞。此时，东固的中共东龙支部根据中共赣西特委和吉安县委的指示，为巩固和扩大东固革命根据地，派出党员到周边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共产党员姚振被派到芹溪后，利用各种形式对贫苦农民进行革命教育。1928年1月，共产党员郭梅率吉水白沙农民自卫军会同永丰、东固农军到潭头、沙溪一带活动，帮助芹溪农民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姚振等发展了一批党员，分别在芹菜坑、石陂、卧龙建立了党小组，同时在芹菜坑、石陂、会溪等地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1928年2月上旬的一天，秘密农协在芹菜坑召开贫苦农民大会，宣布成立公开的芹溪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选举叶宗骥、叶启雷、姚振、欧阳岳、叶宗元为农协执委，叶宗骥为执委常委。并组建了一支约90人的芹溪赤卫队，姚振任队长。大会决定以芹菜坑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第二天，姚振率芹溪赤卫队首先镇压了芹菜坑土豪叶宗林，后又到北坑、石陂、会溪镇压劣绅土豪，所罚款子和没收的家产，除留下部分金银准备购买武器装备赤卫队外，其余全部分给贫苦农民。

起义胜利后，芹溪赤卫队协同江西工农革命军第3师第7纵队前往兴国，打垮了南龙靖卫团。在第7纵队的帮助指导下，组建拥有40余人枪的较为精干的潭头游击队。此后，潭头游击队经常到卧龙、南溪、潭头等地活动，镇压土豪。至5月，先后帮助建立了石陂、官田、南溪、卧龙等地农民协会。

丰顺起义

1928年2月11日，在中共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军事委员会和团党部的组织下，广东丰顺县工农革命军8000余人举行了围攻县城的起义。

1927年4月21日和5月15日，为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丰顺县农民自卫军与农民群众曾先后发动了围攻县城的起义。第2次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农军退到九龙嶂等山区，并于10月间在九龙嶂成立了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1928年2月2日，根据中共东江特委关于举行年关大暴动的指示，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军委和团党部发出《告丰顺县吴姓的工农革命书》，号召吴姓工农群众团结起来，集中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同其他各姓群众一道向反动派发起进攻。2月11日，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和农民自卫军2000多人，以及6000多名农会会员在团长郑兴指挥下，高举党旗、工农革命军军旗和犁头旗，兵分四路向县城进发，并在良乡河岸筑起碉堡与县城对峙。当晚7时，各路农军分别由张之翰、张雪山、张百荣、张其坤、张弼伦等带领，配合郑兴、张泰元、蔡若愚、黎凤翔指挥的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开始攻城。夜9时许，农军摧毁了河对岸敌人的防御工事，然后向城内的敌人发起10多次冲锋。城内的敌人慌成一团，国民党县长冯熙周向汕头国民党政府求救。接着，冯熙周急调汤坑黄夺标率“工军”和田贝、章坡、桥背等乡吴姓保安队前来解围。12日，农军在良乡的火药库不慎爆炸，县城保安队乘机进攻暴动队伍在良乡的大本营，双方展开巷战。敌人放火烧毁农军营房，迫使农军向大堪等地撤退。13日，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北路、西路负责人召开战地会议，调集兵力于14日向县城反攻。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分别从县城的西路、北路组织进攻，并从各乡组织了500名“敢死队员”，从双螺口向县城反攻。农军虽毙伤敌10余人，但攻城未果。此时，国民党汤坑区长黄夺标已带领保安队、“工军”等反动武装数百人来援。国民党军第13军第2师副师长兼第五团团团长周济民，于15日也从梅县带领第5团赶到丰顺。国民党援军分头进攻各处农军据点。时逢县城一带流行鼠疫，人祸天灾一并降临。为了保存实力，郑兴召集各路领导人研究形势，决定分散撤退。不久，起义领导人集中九龙嶂总结经验教训，并于5月在九龙嶂重新成立了中共丰顺临时县委，后又于10月建立了丰顺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

司堂起义

1928年2月12日，中共河南省许昌县委在西北乡司堂村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秋，中共许昌县委根据河南省委指示，决定在农村搞武装起义。10月，县委书记李杜和其他领导人陈云登、薛朝立、胡子杰等先后来到许昌县城西北司堂村一带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司堂村距县城较远，群众基础较好，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就曾在这里建立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红枪会等组织。县委书记李杜等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司堂村及其周围的郑庄、蔡庄、谢庄等20多个村庄，纷纷建立起农民协会。西北乡一带农民协会会员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其中赤卫队员800多人，拥有长短枪100多支。中共豫中特委召开了郾城、临颖、许昌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于1928年4月，豫中沿京汉铁路的各县农民，同时举行起义。中共许昌县委立即加紧在农民中进行组织发动，建立农民武装，并制做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拟定了22条口号，印制了1000份《告劳苦大众书》，广为张贴散发。同时，还加强了与禹县、长葛、襄城、临颖、郾城、西华、商水、上蔡、遂平等县农民协会的联系。

1928年2月12日，中共许昌县委得知磨李村恶霸、保董余金池召集全保的地主、豪绅密谋破坏农民协会的消息，立即决定提前举行起义。组织100多名农协会会员在司堂村集合，在李杜、陈云登、薛朝立带领下，高举“工农革命军”大旗，手持大刀、长矛和枪支，颈系红布标志，首先包围了余金池的宅院。起义农民对余金池进行说理斗争，余不仅不听劝告，还恶言攻击农民协会。起义农民当场将余击毙，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司堂村起义的消息，大长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志气。蔡庄、杜庄、谢庄、郑庄、弯胡、肖庄等十几个村庄的农协会会员从四面八方前来助威，声势越来越大。下午，起义队伍先后到郑庄、蔡庄，捉拿恶霸，开仓分粮。到2月13日，起义队伍增加至2000多人，长短枪100多支，大刀、长矛、红缨枪1000多件。接着，起义队伍在禹县和许昌交界的阎庄、杜寨、弯胡、孟店等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打土豪，分钱粮，宣传土地革命。14日，起义领导人李杜、陈云登、薛朝立等分析研究了当时情况，认为以司堂为中心的西北乡农民起义虽已发动起来，但与附近的繁城、石固等地农民协会还未取得联系，若继续在当地活动，就有遭受失败的危险。决定迅速将队伍拉向禹县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待机再插入大别山。当日下午，起义队伍进到肖庄寨。

2月14日夜，国民党军第2集团军第15师师长孙桐萱率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司堂一带的村庄，并于15日凌晨逼近起义队伍所在的肖庄寨。为保存革命实力，起义队伍决定撤离。但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疯狂镇压下，120余名起义农民骨干被捕，10余人被杀害，起义队伍被迫分散隐蔽。

南雄起义

1928年2月13日，在中共广东南雄县委的领导下，南雄县爆发了历经一个多月、有3万多名农军参加的起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雄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县妇女解放协会等群众团体遭摧残，工会、农会的领导人惨遭杀害。为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同年11月7日，在曾昭秀主持下，中共南雄特别支部召开特支成员和农民协会骨干100多人参加的会议，作出举行南雄全县暴动的决定。12月1日，中共南雄县委成立，曾昭秀为书记。随即在党员和农会的积极分子中挑选100多人组成武装赤卫队，集中在和睦塘进行军事训练。12月15、16两日，县委组织了击毙大土豪、城乡国防局局长卢混、国民党县改组委员麦显荣、彭永福的斗争，并占领国民党县党部一星期。为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北江特委关于发动农民举行暴动的指示，1928年2月12日，中共南雄县委在灵潭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3日晚上举行全县农民起义。2月13日晚上8时，全县3万名农军按计划在同一时间内举行暴动。湖口、坪地、石坑、瑶坑等地的赤卫队袭击大城门税厂，灵潭、祇芜的赤卫队攻打中站税厂；和睦塘、上朔的赤卫队攻打河口税厂；锦陂一带的赤卫队攻打新田乡公所；弱过、园岭的赤卫队攻打水口乡公所；油山各村的赤卫队袭击黄地厘金税卡……起义农军似山洪暴发，汹涌地分头冲向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营垒，共摧毁18处厘金税卡，烧毁税册文件，没收厘金税卡的所有财物，处决了24个税厂反动分子，缴获了一大批枪支。2月18日，中共南雄县委在黄坑圩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南雄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曾昭秀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还成立了4个区苏维埃政府，并选出了各区苏维埃政府的常务委员。县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南雄的土地革命斗争更加迅猛地发展。2、3、5、6区进行“平田”、“平仓”运动，把地主豪绅的田地、财产分给广大贫苦农民。陈召南率领湖口、新迳一带的群众到邕溪、赤岭、矿岭、赤溪湖等地查封豪绅地主的仓谷20000多斤；彭显模、彭显伦率领上朔、夹河口的群众没收了大地主彭遵连的大批稻谷和财物；乌迳、胡坑等地群众也自发组织起来没收豪绅地主的稻谷，焚烧一批地契。南雄农民暴动的迅猛发展，大大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3月初，国民党军陈学顺的140团进驻南雄。陈学顺带800多人的正规部队向3区苏维埃进攻。曾昭秀等组织当地群众配合赤卫队主动出击，在祇芜十里岭将陈学顺部击退。国民党军进攻失败，恼羞成怒，复于3月13日向县苏维埃所在地的上朔进攻。面对强大敌人，赤卫队和上朔群众在曾昭秀等人指挥下，奋起抵抗，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上朔村被敌人攻陷，40多名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曾昭秀等率领县苏维埃人员和赤卫队退出上朔后，经锦陂、乌迳、朱黄塘转移到弱过村。国民党军立即尾追包围弱过村。农军与国民党军激战3昼夜。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持革命的有生力量，曾昭秀等率领苏维埃政府人员和赤卫队及一批群众退出弱过村，向桥背坑等地转移。

南雄农民起义遭国民党军镇压之后，中共南雄县委领导分散活动，曾昭秀等人转移到江西的社迳。同年8月，留在南雄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赤卫队员，通过秘密串联，奔赴油山，参加了后来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仁化起义

1928年2月13日，中共广东仁化县委领导仁化县农民武装500多人在南昌起义军一部配合下，发起了攻占仁化县城的起义。

仁化县地处大庾岭山脉南麓，是湘粤来往的要冲。中共仁化县党组织曾于1927年2月20日率领农民自卫军140多人参加北江北上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此后，由蔡卓文等率领部分农民自卫军转入撕溪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武装。6月29日，这支农民武装联合北上南回的曲江、乐昌和湖南汝城农民自卫军攻占仁化县城，砸开监狱救出农友60多人。这是仁化起义的前奏曲。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部进入仁化县境，打击土豪劣绅，帮助农民建立武装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总结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东江、北江和南路实行农村武装割据，派阮啸仙到仁化领导农民武装起义。1月23日，中共仁化县委成立，阮啸仙为书记。1月27日，仁化县委在董扩组织召开有23个乡、2000多农民参加的武装起义动员大会，号召工农兵“即刻大暴动起来”、“杀尽豪绅地主”、“组织我们工农政府”。接着，2月4日，在安岗把工农革命军独立第4团改编为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8独立团，团长滕代顺。下辖3个营，后调整由周三凤任团长，下辖4个营。同时，各乡成立赤卫队。会后，全县很快出现了一边组织、扩大革命武装、打击反动势力，一边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热潮。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县委决定举行仁化起义，攻下县城，“然后放弃仁（化）城，取夏富、岩头，与董圻、安岗成犄角之势，造成第二海陆丰”武装割据。1928年2月13日6时，团长周三凤率第8团1部30多人和赤卫队500多人从四面包围了仁化县城。枪声一响，早已恐慌的仁化县警队、民团，纷纷夺路溃逃。农军当即占领国民党仁化县政府，颁布《仁化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农军攻占仁化后，即遭到国民党军的“清剿”。暴动队伍击退了1000多名民团的多次进攻。

一直坚持到1928年7月的仁化起义，与武装精良的国民党军5个团和1000多名民团展开了长时间的英勇战斗，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队。

大埠起义

1928年2月18日，中共赣县南区委员会和赣县委员会在江西省赣县南部地区大埠乡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8月中旬，南昌起义部队抵达赣南，推动了赣县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9月，共产党人朱如红、赖传珠等人返回赣县大埠。10月初，中共江西省委任命的中共赣南特委书记汪群抵达赣州，并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要求各县加紧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武装起义。为贯彻中共赣南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共赣县县委决定在南区大埠乡率先举行起义。指派朱如红、赖传珠、黄世秦、钟正泉、彭学礼、李灿春等人负责组织领导。11月，成立了中共赣县南区委员会，由朱如红任区委书记。区委委员分赴各村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农民协会。到1927年底，农协会会员发展到1000余人。1928年初，共产党员发展到100余人，先后建立了下坑、里南、白石、韩村等4个党支部，在大埠建立了党总支，赖传珠任总支书记。同时，成立了大埠暴动总指挥部，总指挥黄世秦。2月18日，大埠农民武装2000余人，在赖传珠等人指挥下举行起义。起义群众分别攻打豪绅地主居住集中的赖村和上寨子，经过1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解除了豪绅地主的武装，控制了大埠一带农村。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以黄世秦为主席、赖传珠等为委员的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并建立了一支70余人的赤卫队，队长朱如红。

20日，驻赣州国民党军独立第7师刘士毅部1个连和靖卫团，分两路进攻起义队伍活动中心地——下坑村。起义队伍英勇阻击，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击毙靖卫团总等多人，缴枪7支。22日，起义队伍又击退独立第7师1个营对大埠的进攻。3月13日，起义队伍与第3次进攻大埠的国民党军1个团遭遇而被冲散，余部转至兴国、万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29年夏，大埠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与兴国、万安游击队合编成兴万赣游击大队，开辟了兴万赣游击区，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桂阳起义

桂阳农军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教导队和郴县农军配合下，于1928年2月中旬和3月中旬举行了两次攻打桂阳县城的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共产党员邓华棠、邓三雄在桂阳园林寺组织发动300多名贫苦农民，成立农民赤卫军，并进行了军事训练。11月24日，共产党员邓兆铭在佳阳车江组建了一支500余人的农民赤卫队。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进驻宜章后，中共桂阳特别支部派人前往宜章联系，并决定两支农军立即响应湘南起义。成立总指挥部，杨赤任总指挥。2月14日，杨赤率1000余农军，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教导队、宜章工农革命军第3师1个连和郴县工农革命军第7师第3团配合下，攻打桂阳县城。经过激战，打垮了守城民团，接着，宣布建立桂阳县苏维埃政府。但两天后，因逃出城外的县民团向县城疯狂反扑，农军力量太弱，被迫撤出县城，退到郴、桂边境。3月12日，桂阳农军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教导队和郴县、宜章县农军配合下，再次攻打桂阳城，攻城战斗只用几个小时，就把城内敌军打跑，再次占领县城。此时，不甘心失败的桂阳县长从新田、常宁搬来援兵，农军在守城战斗中伤亡较大。为保存实力，农军主力退出县城。

桂阳农军两次攻占县城，虽因力量弱而未在县城站稳脚跟，但给桂阳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沉重打击。在攻城起义的影响推动下，桂阳东乡、南乡地区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

永春东区起义

1928年2月至10月，中共福建省永春县委在该县东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冬，北伐军入闽以后，永春地区工农运动迅速兴起，在东区10多个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1927年11月，在中共永春特支领导下，在霞林村成立东区农民协会，颜步青、邱廉回等为领导人。东区农会成立后，队伍不断发展，拥有会员2000多人。农民中的进步组织“觉民社”发展到10个分社，280多人。1928年2月，在街尾后庙成立中共永春县委。中旬，在县委领导下，东区农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减租、抗饷、反迫害”示威游行。游行队伍2000多人，先环绕东区一周，后挺进县城。县委成立后，组建了第一支农民武装队伍——东区民团，县委书记邱廉回任团长，有枪20多支。9月24日，在街尾后庙召开了中共永春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省委巡视员吴亚鲁传达省委关于实施武装割据的方针，选举新的县委，并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永春革命的前途，是群众武装暴动，推翻现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10月18日，东区农会在东平的露林太平寺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破坏农运、欺压群众的反动分子。接着，水磨、大榜、霞丘、罗口、花石等各村农会都纷纷建立武装，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东区农民的斗争，触动了地主豪绅的根本利益。11月9日，湖洋民团与国民党军张贞所部勾结，包围东区农会所在地，强缴农协枪支，农协执委和骨干9人被捕，颜步青、邱廉回被押解漳州。后经托人保释，邱廉回出国避风，颜步青因受严刑酷打，出狱后死于厦门。东区农民武装斗争转入低潮。

潭口起义

1928年2月20日，中共江西省南康县临时委员会在潭口镇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潭口位于南康县的东部，处于赣南、粤北交通要道，这里曾驻有国民党地方武装靖卫团40余人。1927年9月，中共南康临时县委在潭口金银坪成立，廖贵潭任书记。在临时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展很快，仅潭口就有党员30余名。到1928年2月，农协会会员发展到500余人。1928年2月中旬，临时县委根据中共赣南特委关于组织各县武装起义的指示，决定在潭口举行起义。为此，成立了由廖贵潭、罗贵波、兰广孚、范成盛、钟肇先、陈铁生等7人组成的“潭口武装暴动委员会”，组织了一支100余人的农民武装队伍，由罗贵波、兰广孚任总指挥；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总目标是解除潭口靖卫团的武装，推翻旧政权，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2月20日深夜，起义队伍在罗贵波、兰广孚等率领下，兵分3路。其中两路迅速汇集到潭口靖卫团驻地真君庙，从正面冲击，一路埋伏在真君庙后截击，并组织数百名农协会会员在外围呼应。战斗到第二天黎明，消灭了部分靖卫团，缴获步枪10余支，占领了真君庙和潭口镇。当天，成立了南康县潭口工农革命委员会，廖贵潭任主席，并张贴了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标语。第二天上午，起义队伍就近打了几家土豪，并没收其财物分发给劳苦群众。下午，驻赣州的国民党军以1个营的兵力包围了潭口镇。为保存革命力量，廖贵潭等率领一部分队员突围转移，后到温田分散隐蔽活动。

南岳起义

在中共湖南衡山县委领导下，衡山游击队和工农革命军第7师，于1928年2月21日和5月5日，在南岳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中共衡山县委决定迅速发展壮大游击队，准备武装起义。同年12月，衡山县委根据湖南省委关于组织年关暴动的指示，制定了起义计划。12月底，县委在距南岳5里远的辖神坳建立了一支50多人的游击队。为做好起义准备，县委派游击队长刘定泽前往庙溪联络，要求屈森澄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7师进攻南岳，游击队就地举行起义，进行策应。1928年2月21日夜，工农革命军第7师主力500多人从庙溪赶到南岳，在李禁林、睦元勋等率领的南岳游击队接应下，迅速包围了整个南岳街。担负主攻任务的张级升营，配合南岳游击队直奔南岳团防局，出敌不意，毙伤敌军30多人，缴获步枪百余支，胜利占领南岳镇。22日，国民党衡山县铲共义勇队开赴南岳“清剿”，工农革命军第7师和游击队为避免伤亡，主动撤出南岳镇。起义后，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以工农革命军第7师4团为基础，吸收衡山各地青年农民参加，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10师，由萧觉先领导，在衡山县内坚持斗争。5月5日，萧觉先率工农革命军第10师举行第二次南岳起义，夺取了南岳团防局部分枪支。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调集军队进行镇压。第10师寡不敌众，被迫撤出南岳，不久，萧觉先壮烈牺牲，南岳起义失败。

屈森澄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7师一直在该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直到抗战爆发。

南乡寺起义

在中共湖南衡阳县南乡特委组织发动下，以衡阳工农革命军第8师为主，于1928年2月22日在衡阳县南乡寺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共产党员罗子平受中共湘南特委派遣回到故乡衡阳县南乡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不久，成立中共衡阳南乡特委，刘禹谟任书记，罗子平任副书记。9月，建立了一批党支部，培训了一批军事骨干，吸收了一批青年参加赤卫队。从外地购买了一批枪支，并夺取了国民党逃兵的一些枪支，罗子平还出资请人锻造了梭标、大刀、匕首共100多件，为武装起义作了准备。1928年2月22日，中共南乡特委成立衡阳工农革命军第8师，罗子平任师长，党代表刘禹谟，参谋长罗俊逸。下设两个团。司令部设南乡寺，全师共500多人枪。第8师成立后，立即宣布举行武装起义。一路由罗子平率领300余人攻打茅洞桥挨户团，收缴步枪两支。另一路由刘禹谟率领300余人攻打张弓桥，处决大恶霸张九芝，没收其全部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之后，第8师又开展了一系列的打土豪分财物斗争。24日，第8师奔赴榨树坳打土豪，放火烧毁了大土豪王承堂的住宅。接着又打击了苦楞堰、南乡堡等地的地主豪绅。

第8师的行动震惊了国民党县署。县署连夜调兵遣将围攻第8师。党代表刘禹谟等在掩护群众突围转移中，与部队失去联络，在松树井被捕牺牲。不久，师参谋长罗俊逸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罗子平为掩护战友突围，亦被捕遇害。随后，许多共产党员和第8师战士惨遭杀害。第8师余部一部分分散隐蔽；一部分由团长张九成带领与在衡阳西乡的衡阳工农革命军第7师会合。

信丰起义

1928年2月23日，中共江西省信丰县执委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信丰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1926年10月，建立了信丰县农民协会和县总工会、中共信丰支部。是年冬，县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提出“二五减租”的口号，并取得一些胜利。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信丰县反动统治者与赣州驻军钱大钧部勾结，镇压革命，党的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活动。1927年9月，在共产党的组织发动下，全县建立和恢复农协20多个，拥有8000多会员。上彭、仑前、川凤亭、源和、犀牛、中段、星村、大小窝、老虎岭背、游州、竹桥河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共有党员70余名。10月中旬，成立中共信丰特别区执行委员会，黄维汉任书记。1928年初，全县发展中共党员240余名，各区、乡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和暴动队。1928年2月初，中共信丰县执委会成立，肖凤鸣任书记。18日，执委会根据中共赣南特委的指示，作出发动群众，举行起义，攻打县城，夺取政权的决定。21日，成立了信丰具工农革命委员会和起义总指挥部，黄维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郭一清任总指挥，黄达任副总指挥，肖凤鸣任党代表。22日晚，东岗堡、星村、犀牛、新田等20多个村的农民赤卫队员共1200余人，组成攻城先锋队。与此同时，城郊、大小窝、川凤亭、营下等10几个村庄的五六万农民也参加了起义。23日凌晨，起义队伍1万余人，分4路攻打县城。由于守城保安队紧闭城门顽抗，暴动队缺乏攻坚武器，县城久攻不下，双方对峙近10天。后因各地民团和地主武装陆续赶到，驻赣州的国民党独立第7师也派1个营进入信丰，向暴动队进攻。起义队伍在腹背受威胁的情况下退出县城。其中一部分队员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其余队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斗争。

信丰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点燃的革命烈火没有熄灭。郭一清等率领一部分赤卫队员坚持在信丰、定南、安远三县边界进行游击战争，并于1928年10月组建了红26纵队，创建了信（丰）定（南）安（远）游击根据地。肖凤鸣、黄维汉、谢为都等率400余名赤卫队员在信丰、南康等县交界的山焦坑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螺岗起义

1928年2月25日，中共广宁县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部署，组织农民赤卫队在螺岗圩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西江、北江、南路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地方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态势。尔后又拟定《西江暴动工作计划》，要求以广宁、罗定为中心，向高要、德庆、四会发展，形成西江割据局面。广东省委派黄学增到广宁担任县委书记，把罗国杰从高要县委调回广宁，加强广宁县武装起义的领导。广宁县委按照省委的部署，于1928年1月在石涧召开历时3天的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决定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暴动指挥机构。会后把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共有300人的农民赤卫队，接着又进行改造土匪、争取民团的工作。说服在石涧、黄田一带活动的罗二股匪以及县民团第8中队中队长梁义等支持农民起义。2月14日，广宁县农民协会发表《告全体会员书》，号召全县农民起来起义，打倒地主豪绅，夺取区、乡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2月25日，隐蔽在螺岗、江美、富溪、上林狮村等地的农民赤卫队300人，在县委领导下攻占了螺岗圩，宣布起义。尔后在螺岗镇政府举行有3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广宁县苏维埃政府。大会推选罗国杰、谭洪翔、薛六、高玉山、欧蛟、高纪、伍学南等7人为委员，罗国杰任政府主席。2月28日国民党广宁县政府纠合以广宁、高要、德庆三县联防民团向螺岗进攻。赤卫队主动撤出，转移到江美、富溪一带，与敌激战两天后再转移到石涧，与当地农军会合，打死打伤敌人十余名。后因民团的大批援军赶到，赤卫队为避免重大损失，撤退到罗汶山区开展游击斗争。3月22日，广宁县的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大股力量，进攻石涧，破坏了设在涧塘仔的中共广宁县委领导机关。至此，螺岗起义失败。

杨舍起义

1928年2月26日，在中共江苏江阴县委的领导下，江阴杨舍民众因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举行了武装起义。

杨舍是江阴东乡最大的集镇（今属张家港市），筑有古城堡，有居民千余户，人口逾万，在西门设有公安分局。镇上商业繁盛，店铺和四周的田地大部分为20余家豪绅富户占有。1928年2月20日，中共江阴县委在杨舍街上贴出布告，着令镇上豪绅富户务必在7天内凑集现款3000元，赈济缺衣少食的农民度过春荒。然而豪绅富户仗着杨舍公安分局和缉私盐局的武装力量，傲然不予理睬。2月26日，县委按照预定计划，组织农民700余人，分别在杨舍西南的马嘶乡第六小学、杨舍北面的斜桥仲家场两地集中，由沙洲方面的200余人担任主力，于深夜11时分路出发。12时，茅学勤率领的北路行至公安分局附近，与敌步哨发生巷战。起义队伍抢占了有障碍物作掩护的一片荒场，一面猛掷土炸弹，一面晃动手电筒诱惑敌人。激战2小时，未能攻进公安分局，双方呈僵持状态。起义队伍随即采用火攻，呛得敌人难以支持。埋伏在西门的起义队伍看见火起，迅速从正面向公安分局发起攻击，击伤警察1人。敌人吓得携枪逃跑。农民缴到毛瑟枪1支、快枪子弹1箱，其它子弹50余发，并焚毁公安分局。与此同时，起义农民50多人冲进缉私盐局，砍伤3名盐警，收缴了枪支。随后，起义农民搜查了镇上20余家豪绅富户，将其租簿、田契、单据及房屋一起焚毁，还没收了典当的银元浮财。凌晨3时，起义队伍在街上集会，茅学勤进行小结。拂晓，队伍撤离杨舍时，用“江阴红军东北路司令部”的名义张贴了布告。

杨舍起义的胜利在沪宁沿线引起强烈反响。《申报》披露：“杨舍起义‘共党颇有组织，并用红布围领为记，手执三角小红旗，整队点名，当众演说，高呼‘苏维埃政府万岁！’四处张贴布告，与巡士战时，均用伏地野战法，指挥者颇具军事学说。’”

武定东乡起义

1928年2月26日，东乡区农民自卫军及革命群众，在中共广西武宣县委和东乡区委的领导下，在东乡圩举行了武装起义。

东乡区位于武宣县东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阶级的重租剥削，农民生活极为穷困。1926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派林培斌到武宣建党。林培斌到东乡后，吸收了翁尧年、潘业俊、朱文拔等10多名农协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建了中共武宣县党支部。1927年5月14日，东乡区农民协会成立，选出刘月高为东乡区农协会主席。1928年2月23日上午，农民自卫军队长刘铁民带几名队员来到设“众秤”的猪仔行，向两个团丁宣布：“‘众秤’从今天起归农民协会掌管，过去团局剥削我们农民，收费不合理，从现在起，每次交易由24个铜板改为收4个铜板，收的钱归农会办公和办学用。”并夺下了团丁手中的“众秤”。刘铁民的行动，得到在场群众热烈拥护。1928年2月26日，国民党武宣县长唐熙年和县团务总局局长王善征亲率团练60多人枪直扑东乡，将掌管“众秤”的黄亚苟和刘和隆2人抓起来关进了东乡团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野蛮行为，激起了全区农民的公愤。当天，中共武宣县委、东乡区委，以及东乡区农民协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因势利导，举行武装起义。于是，立即发动30余乡农民群众1000余人，由刘德明任总指挥，把唐熙年和60多名团丁包围在东乡团局内。要唐熙年立即释放被捕的两名农军，并把“众秤”交给农民协会管理。唐熙年知道60多名团丁敌不过几百名农军，只好在东乡团局内等待援兵。眼看包围的农军越来越多，于是，他只好派人释放两名农军，并急电报告国民党桂系头子黄绍竑，要求派桂军石化龙团紧急救援。3月1日，潘业俊获悉国民党梧州警备司令部直属第二团团团长石化龙率队从桂平开来，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农军分散隐蔽。3月3日，石化龙率一个营到东乡，围捕农协会领导人，打死了农协会会员刘木寿，并下令收缴东乡各农会旗印。4月20日，石化龙、唐熙年在东乡屠杀革命者，先后有农协骨干卢子文、罗子贤、刘新隆、黄亚苟、刘和隆、彭功甫、李荣山、翁尧年等被杀害。

东乡起义，虽然在强敌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势力和国民党武宣县的反动统治，为以后的武装起义积累了经验。

资兴起义

中共湖南资兴组织为响应湘南起义，在郴县永兴农军支援下，以本县农军和群众为主体，于1928年2月28日开始发动数次攻打县城的武装起义。

1928年1月，中共资兴三都临时党支部成立。朱德率部占领宜章的消息传到资兴后，中共三都临时支部积极动员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不久，成立了三都苏维埃政府。隐蔽在资兴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员汇集三都，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为响应湘南起义，中共资兴组织决定调集农民赤卫队攻打资兴县城。1928年2月28日下午，黄义藻、李奇中率资兴赤卫队400多人在黄时楷、胡隆彪率领的永兴农军配合下，由三都向资兴县城进攻。29日攻占县城，救出被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并处决了几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因敌强我弱，敌人反扑后，赤卫队和永兴农军当晚主动撤出县城。3月6日，资兴县苏维埃政府在三都成立。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和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委的指示，资兴农军决定再次进攻县城。为了配合资兴农军行动，尹子韶率永兴警卫团，蒙九龄率郴县工农革命军第7师1个团到达永兴城外。3月9日攻城战斗打响，三县农军3000多人兵分数路向县城进击，由黄义藻、李奇中指挥的资兴农军和尹子韶部担任主攻，蒙九龄团担负断敌后路任务。资兴县行政委员会主任李政权部在农军猛攻之下，弃城而逃，农军第二次占领县城。因逃出城外的李政权纠集汝城地主武装进行反扑，农军主动撤出城外。3月1日，农军又攻占县城。李政权部大败。随后，中共资兴县委宣布成立，资兴农军组建为资兴独立团。在资兴县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资兴起义经过多次攻打县城，推翻了国民党县政府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使资兴成为湘南起义的中心区域之一。

于都起义

1928年2月28日至3月2日，中共江西省雩都（今于都）县临时委员会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11月，中共于都县支部成立，丘倜任支部书记，并于翌年3月发展为于都县中心支部。后在里仁、罗凹、桥头等地发展党员50余名，成立了6个支部。同时，全县的工农运动也得到蓬勃发展，各地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5万余人，并于5月正式成立了于都县农民协会，丘芳洲任主席。县总工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等民众团体也相继成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一个营400余人和武装法警10余人进驻县城镇压工农运动，全县陷入白色恐怖。

1927年10月，中共赣南特委在赣县成立。12月，中共赣南特委特派员肖韶来到于都，向于都党组织领导人传达特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1928年1月，中共于都县中心支部改组为临时县委，丘倜任书记。2月下旬，临时县委根据中共赣南特委关于于都“立即暴动”的指示，成立了总指挥部，由肖韶、丘倜、李英等组成。29日晚，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南乡2000多农民首先在里仁举行起义，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土豪，没收其财产。3月2日，西乡罗凹、步前、柑子等地3000余农民也同样举行起义，没收了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收缴其土炮和枪支。南乡、西乡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后，县暴动指挥部立即集中兵力，分两路攻打县城。南路4000余人，于4日从里仁出发，由于连下大雨，贡水河猛涨，国民党军守城部队控制了河北岸，连续两天渡河未成，后遭守城部队反击，起义队伍退回里仁。西路2000余人，于5日开始攻打县城西门，遭守城部队包抄反扑，于当日傍晚撤回西乡。

攻城失利后，起义领导人相继转移到于都北乡桥头，继续组织农民起义。同时，派人前往东固，请求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前来支援。23日，桥头等地1000余农民举行起义，准备配合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再度攻打县城。攻城队伍在向于都进发途中，先后遭到上宝靖卫团和国民党增援部队的阻击，遭受很大损失。余部转入兴国、吉安、东固等地坚持斗争。前来增援的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也撤回东固。6月，中共赣南特委以桥头起义农民为基础，组成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钟声楼任纵队长，朱学玖任政治委员。

华王、龙海起义

1928年2月下旬至3月初，中共湖南安仁县党组织积极响应湘南起义，组织农军在华王、龙海两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下旬，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共产党员唐时雍（即唐天际）经中共长江局介绍，辗转返回安仁华王乡，与共产党员唐德丝、唐德级取得联系。接着，中共湘南特委派徐鹤到安仁，与唐时雍等讨论了发展组织，策划武装起义问题。至年底，建立了中共华王支部，唐时雍任书记。同时还组建了40余人的游击武装。1928年1月宜章年关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安仁后，华王乡党组织决定迅速举行武装起义。在唐时雍率领下，起义群众首先攻打大恶霸陈培芝住宅后四处出击，先后攻打了华王及周围地区十几家土豪，没收了30多户土豪劣绅的财产。2月26日，在华王庙正式成立了安仁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三区苏维埃政府，同时还将华王游击武装改编为第三区苏维埃赤色农民自卫军。下设3个中队。龙海是华王庙东南近邻，在华王起义影响下，共产党员侯岳生、刘加可带领龙海群众开始行动。3月1日，唐时雍、文鉴同、侯岳生召集龙海地区12名革命骨干在龙华庵开会，讨论了起义的组织领导和行动计划。会后分头到龙海所属的10个乡镇发动组织农民起义。3月4日，龙海几千农民聚集在万人坪，正式成立安仁第七区苏维埃政府。同时，组织了几千支梭镖和几十支鸟枪的农民武装，由侯岳生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农民武装总指挥。

华王、龙海起义的胜利，使安仁西南地区与永兴、耒阳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为后来安仁农军攻打县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龙门起义

1928年2月，中共福建省永定县溪南区委在该区龙门村（今属城郊乡）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冬，驻永定的国民党军张贞所部陈国华团向全县苛派军饷3万大洋。中共溪南区委负责人张鼎丞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斗争，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到1928年1月，溪南有共产党员200多人，农会会员3000余人，铁血团团员由10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2月，永定县国民党当局派出保安队6人到龙门敲竹杠，拘押农民。乡农会会员30多人当场收缴了保安队的枪支。为此，国民党地方当局纠集武装400余人，镇压龙门农民运动。张鼎丞组织铁血团30余人，在反动武装必经之路进行伏击，经半小时激战，铁血团毙敌数人，后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敌人进村后，烧毁民房，杀害群众，抢掠耕牛。不久，陈国华率部撤离县城，开赴陈东坑，遭到卢肇西、卢其中指挥的200多名农军和农会会员的包围袭击，被迫向漳州方向撤退。至此，国民党军向永定县的3万元大洋的派款未能得逞。

龙潭司起义

1928年3月6日，中共湖北施鹤临时特委领导施鹤农民自卫总队在咸丰龙潭司举行起义，后转战宣恩，攻入县城。

大革命失败后，担任咸丰县农民协会负责人的黄子全秘密回到龙潭司，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中共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派杨维藩等人赴施鹤，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12月底，中共施鹤临时特委成立，书记杨维藩，黄子全等为委员。1928年1月，施鹤农民自卫总队成立，黄子全任总队长，杨维藩任党代表，辖4个大队，300多人。2月，临时特委根据湖北省委关于举行年关暴动的指示，决定马上行动。并与黑洞神兵（反对军阀统治和地主剥削，带有封建色彩的农民群众武装组织）首领王锡九达成协议：举事时，王配合自卫总队行动。3月6日，黄子全带领自卫总队在龙潭司举行起义，接着向县城进发。3月7日，咸丰县长秦国达率4个团防武装在老里坝集结，一面派人劝降，一面将自卫总队包围。8日，农民自卫总队在黑洞、小关神兵没有到达的情况下，兵分3路同时出击，将秦国达围困在山堡上。后敌军援兵赶到，敌我力量悬殊，自卫总队分散突围。

3月底，杨维藩、黄子全、黄兴武等在鹤峰召开临时特委会议，决定将自卫总队改编为施鹤游击大队，黄子全负责指挥。不久，游击大队与“联英会神兵”联合，打败宣恩团阀曾栋廷，攻入县城，处决了宣恩县长施雨田。后被敌军反击所败，返回山中。5月，杨维藩在黑洞神兵中开展工作，并当上了“黑洞精灵神兵第1军第1路司令”，掌握了指挥权，活动在咸（丰）利（川）边界；黄子全率领施鹤游击大队在宣（恩）咸（丰）利（川）边界坚持斗争。11月底，施鹤游击大队及黑洞部分神兵编入了贺龙领导的红4军第3特科大队。

平和起义

1928年3月8日，中共福建省平和县委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共产党员朱积垒，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委派，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平和县开展农民运动。11月，在上坪乡建立了平和县第一个农民协会。不久，全县二十几个乡分别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发动工人、学生等组建工会、学生会、青年促进会等革命团体。同年冬，成立了中共平和支部，朱积垒任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平和县当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形势严峻。中共平和支部根据中共闽南特委的指示，将领导机构由县城九峰撤至城郊上坪乡。6月，闽南特委书记罗明到平和指导工作，将领导机构迁至远离县城的长乐乡。后特委又派秦文来到平和。不久，秀峰、洋半天、崎岭等乡的农民协会成立，形成了西、北、东三面包围县城的形势，党组织也发展到5个支部，党员80余人。9月，平和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平和县委（1928年2月，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改为临时县委），同时成立了平和县农民协会，朱积垒任书记兼会长。在罗明的帮助下，平和县委与饶平、大埔两县委取得联系，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八七”会议后，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对福建工作的指示，将福建分为4个区，确定平和、龙岩、永定为第一区，可先组织起义。10月，朱德等率领部分南昌起义军进入平和，占领县城，向县委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12月，省委派罗明到平和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介绍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情况，并与县委共同研究制定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为此，闽南特委一面与粤省委接洽，一面派人到各县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平和县委立即布置各乡农民协会组成工农自卫军，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年底，国民党第11军由闽入粤，途经平和，县吏豪绅互相勾结，任意增派、关押挑夫，敲榨勒索。1928年1月，朱积垒、陈彩琴等领导长乐等乡600多农民到县城示威请愿，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农民，减租减息，请愿斗争取得胜利。平和县委抓住时机，于同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利用长乐乡一年一度的庙会日，组织工农自卫军长备队武装游行示威。接着，组织工农自卫军在乡村拘捕土豪，购备枪械。2月12日，在秀峰召开第一区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第一区农民协会，组织了工农革命军第1团，团长朱积垒。会后，各乡农民纷纷组织起来，长乐乡编成5个大队，500多人，秀峰3个大队，崎岭1个大队，上坪、洋半天、象湖山等各组织1个中队。

2月24日，中共平和县委召开会议，决定2月28日（后改为3月8日）举行武装起义。同时，成立了暴动委员会，总指挥朱积垒，副总指挥罗育才；成立了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1团，团长朱积垒，参谋长王炳春，副官长朱思，下设10个大队。3月7日，在长乐庵边埔召开誓师大会，随后按计划把队伍分为东、西、北三路。东路由崎岭、洋半天和大埔农军组成，朱思、朱赞襄任指挥，主攻县城东门；西路由长乐、上坪、湖山和饶平农军组成，陈彩芹、徐光英任指挥，主攻县城西门。朱积垒随西路行动。北路由秀峰、长乐和永定农军组成，罗育才、叶锦章任指挥，攻县城北门。秦文随北路军行动。同时，派杨文元等带领一支突击队，提前潜入县城，作好破狱救人的准备和监视敌人。7日晚，东路军在崎岭南湖袭击土豪曾锦江的店铺，引敌出

城，西、北两路军乘夜分途出发到城郊预定地点埋伏待命。8日晨6时，总指挥朱积垒发出攻城命令，顿时，枪炮声、喊杀声震撼了整个山城。守城的反动力量仅有保安队五六十人，警备队二三十人，仓皇应战。西路军乘势首先从西门攻进县城，接着北路也攻入城内。西、北两路农军共歼敌10余人。东路军因交通失误，未及时赶到。守军从南门溃逃。

起义队伍攻入县城，救出被关群众20余人，烧毁监狱、县署教育局和土豪劣绅房屋三四处，没收地主豪绅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当日下午，溃逃的敌人纠集反动武装，进行反扑。起义队伍虽顽强抗击，但因鸟枪、土炮的火药被雨淋湿，失去作用，朱积垒手部中弹负伤，遂在饶平农军的阻击下，起义队伍撤回长乐等乡村。平和起义后，国民党军张贞部派出1个营的兵力于3月11日进抵县城九峰，洗劫了朱积垒、朱思等人的家乡。从3月16日至6月12日，国民党军先后4次进剿长乐赤色区域，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最后一次纠集1000多人，分6路进攻长乐乡，中共平和县委领导农军和民众英勇反击，后因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将起义队伍编成游击队，转到饶和埔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7月，中共平和县委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和闽西特委指示，将参加平和起义的工农革命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平和县独立营和特务营，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酃县起义

中共湖南酃县特别区委组织发动全县各地群众,于1928年3月9日开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史称酃县三月起义。

1927年10月中旬,中共湘南特委委员刘寅生受湖南省委派遣回到酃县,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1928年2月,中共酃县特别区委成立后,即决定夺取团防局枪支,建立工农武装,发动全县进行武装起义。随后,潘祖浩、周里、张平化、邝光前、朱才亮、周介甫在西乡、黄挪潭、石州、八都、水口、中村组织了暴动队,共有暴动队员近千人。3月上旬,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第1师3个团进军酃县,准备前往湘南策应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出发前,毛泽东派戴奇、邱笛先来酃县帮助组织武装起义,并指示酃县党组织将原定4月起义的时间提前在3月举行。中共酃县特别区委接到毛泽东的指示信后,区委成员随即分赴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暴动。3月9日晚,刘寅生、周里在黄挪潭首先带领农军,捕杀了大劣绅周炎卿父子,揭开了酃县3月暴动的序幕。接着,周里、张平化等在石洲安坑发动农民起义;邝光前、肖昌范、杨以达等在坳头成立下村暴动队,攻打了土豪肖昌其等人;朱才亮等在水口组织农民暴动,抄没劣绅李资的家产,成立了200多人的暴动队伍;潘祖浩在西乡组织成立了游击队总指挥部,分五路开展打土豪、围攻挨户团的斗争,起义人数达1600余人。为了支持酃县农民起义,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及时来到酃县,在下关组织农军捕杀了反动团总戴同德和土豪王可其。3月14日,工农革命军第1团打垮湘军1个团,攻占酃县县城。在工农革命军支持下,酃县农民暴动蓬勃发展,参加起义人数达3000余人。3月中下旬,各地暴动队伍随工农革命军集结在中村,组建了酃县赤卫大队,建立了区乡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酃县特别区委改为县委。

酃县三月起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建立了工农武装和工农兵政府,使酃县的东南乡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鹤市起义

1928年3月10日，中共广东龙川特支根据东江特委指示，组织近千名农军发起鹤市起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包围了龙川县农会，解除农军武装，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中共龙川特支为了保存力量，从县城转移到鹤市的仙寨等地。10月，东江特委巡视员刘琴西来到龙川县四甲，向特支领导成员黄觉群等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东江特委关于加强武装斗争的指示。不久，在特支领导下，仙寨乡苏维埃政府和农军成立，斗争浪潮很快波及到鹤市附近各乡村。12月下旬，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东江特委发出通告，要求东江各级党组织利用年关之机，领导工农实行年关大暴动。不久，龙川特支进行了改组，黄克任特支书记。改组后的特支全力投入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为扩大武装，他们改编了原陈炯明残部近百人的绿林武装。并请广州农讲所毕业生黄自强、黄鸿良以及黄埔军校生钟彪等分别到乡村担任农军教官。经过一段思想发动工作之后，龙川特支于1928年3月6日在四甲上邛隆重集会，成立龙川县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由东江特委刘琴西挂名军长，并设立总指挥部，由黄克任总指挥，总人数为400余人。下辖四个编队，由特支成员分工领导，每个编队按营、连、排、班编制。

之后，县特支、县苏维埃、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经过研究，认为鹤市群众基础好，又毗邻紫金、五华苏区，便于互相支援，决定首先在鹤市起义。随后，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指派钟彪往仙寨、芝野、东山等地向工农革命军各编队领导传达进军鹤市的命令。不料，3月7日，当钟彪向仙寨编队领导传达总指挥部作战计划后前往芝野、东山途中，被富户团的巡夜队抓获杀害，钟彪身上所带的工农革命军各编队的花名册以及进军鹤市的计划均落入敌手。国民党县长黄蔚文得此情报，即命县警大队长黄雨生坐镇鹤市，镇压起义农军。并派亲信分头率队按暴动花名册突然袭击搜捕准备参加暴动的骨干。工农革命军在不知机密尽泄的情况下仍按原计划组织实施。3月9日，四甲编队400余人在坪田分水坳召开誓师大会。于次日凌晨5时半向鹤市之敌发动进攻，遭已有准备之敌的反击。农军面对强敌，仍前赴后继，奋勇杀敌。前锋攻入市内与敌一阵巷战后，攻入区署，缴获长枪25支，俘虏一批警兵。黄雨生见农军势力强大，丢下坐骑，落荒而逃。接着农军四处张贴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的布告和标语，没收地主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上午9时许，黄克始得知钟彪被害，暴动计划已泄，其他编队和农军受挫，遂下令暴动队伍撤退。队伍刚退出街口，1000余名事前布置好的地主武装与县警便包围过来。农军且战且退，至芝野陂下，复遭黄雨生部的夹攻，农军伤亡10多人，经大半天冲杀方撤回四甲上邛寨。

惠来攻城起义

1928年3月12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2师与广东惠来、普宁、潮阳等县赤卫队共10万余人，联合发起了攻打惠来县城的武装起义。

1927年9月，中共惠来县委委员方凤巢等，在惠城区的五乡发动过策应南昌起义军进军潮汕的武装斗争，尔后又组织神泉区的赤卫队千余人，围攻惠来主要港口神泉镇的国民党区署和盐警队3昼夜。1928年2月，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了海陆丰。在东江区域面临白色恐怖的局势下，东江特委书记彭湃与红4师参谋长徐向前等研究决定发动惠来的农民，联合普宁、潮阳等县赤卫队举行起义，以援助海陆丰的斗争。3月上旬，彭湃、徐向前等带领红4师第11团到达惠来兵营乡。在兵营乡召开惠来县农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攻城指挥部。会后，红4师第10、第12团相继到达兵营乡，与第11团会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攻城指挥部。彭湃、徐向前为总指挥。3月6日，潮阳县赤卫队第3团和惠来华湖十八乡的赤卫队到达离惠来县城5公里的华湖乡。国民党军闻讯急调驻隆江的第2营回城，分头进攻华湖。下午，隆江守敌告急，国民党军又调一个连星夜驰援隆江。由于普宁赤卫队截断了盐岭一带敌军的交通，潮阳赤卫队第3团进攻敌人的背后，使敌人疲于奔命。7日，潮阳第3团和华湖十八乡的赤卫队在华湖佯攻敌军，分散敌人的兵力，红军及赤卫队四五千分4路进攻隆江镇，敌死伤甚多，退守离县城7公里多的总铺洋雨山。红军和赤卫队向雨亭山的敌军连续发起两昼夜的进攻。至9日中午，敌团部派援军反攻，被我诱入凤镇乡附近的山地。南山、东文、罗溪的赤卫队将敌截为两段，周围乡村的农民、妇女也加入围歼敌人的行列，敌损失惨重。10日，敌企图向县城逃窜，在离县城5公里的佛母庙又遭红军和赤卫队的伏击。当天，彭湃、徐向前等率攻城指挥部及红4师攻城指挥部和赤卫队、陆丰的粉枪队、少年先锋队等进驻离惠来城数里的苗海村，并在苗海村成立惠来县苏维埃政府。12日黎明前，攻城指挥部发出攻击惠来县城的命令，惠来有10万尖串队参加攻城。国民党驻汕第11军第26师师部派76团团长沙鼎臣带领独立营往惠来增援，沿途均受红军及赤卫队包围截击，至下午3时许方进入县城。沙鼎臣等进城后，知县城难守，于次日凌晨仓皇弃城逃跑。15日晨，红军和赤卫队攻占惠来县城。逃出县城的国民党军第76团与敌派来增援的第13军第77团与卓向然部会合，同地方反动武装一起反扑县城。红军、赤卫队主动退出县城，于城郊继续围困县城之敌。16日，潮阳第3团及惠来东区赤卫队奔袭敌留守关门山的77团独立营。红军赤卫队在虎头击退第77团的进攻，打伤敌第77团团长沙向然，收缴枪弹一批。接着，攻城指挥部用放风筝的方法，将传单送进城内，隐蔽于城内的人员则频繁骚扰敌人。不久，卓向然伤发毙命。21日，红军第2师从海丰到达惠来参加围攻惠来县城。守敌见大势已去，于23日凌晨弃城向潮阳逃窜。是日，暴动队伍第二次攻占惠来县城，并拆毁城墙。惠来县各区先后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区委，党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

这次起义有力地冲击了惠来城乡地主豪绅的封建势力，扩大了革命影响，为潮、普、惠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临吉巡检起义

1928年3月12日和4月5日，中共湖北南漳县委领导临吉、巡检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因临吉、巡检属于荆山山脉，故习称“荆山农民起义”。

1928年2月，中共南漳县临吉乡支部书记张道南，利用大刀会的形式组织农民协会，有会员430余人。在此基础上，挑选出刘光亭等32名骨干组成了暴动先锋队。3月上旬，县委书记李协一赶到临吉乡，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立即起义。3月12日下午，临吉乡暴动先锋队队员在张道南的率领下，捉拿并处决了民团团总陈南亭，缴枪2支，起义从此开始。13日晚，起义武装在南漳长坪、龙眼坪等地农民数千人的配合下，又连缴了两个团防的枪支，并分兵包围了7个土豪劣绅的家，除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当场处决。14日，县委在薛家坪成立薛坪农民政府，主席刘光亭。同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刘光亭兼任总指挥。3月下旬，薛坪农民政府掌握的武装力量已达1500余人。临吉乡农民起义胜利后，南漳县政府搬来樊钟秀的“建国军”，加上团防武装，向薛坪赤色区域反扑。县委和薛坪农民政府率农民自卫军与敌先后数次交战，均取得胜利。国民党南漳县政府见武装镇压失败，便实行经济封锁和断绝交通。为打破封锁，县委决定农民自卫军主力第1团南征。

总指挥刘光亭及蔡东生等率农民自卫军主力到达金镶坪与巡检农民武装会合后，于4月5日晚在巡检举行起义，处决王立勋等土豪劣绅。7日，成立巡检农民政府及农民协会和赤卫队。

4月17日，大刀会坛主詹志千、殷高元等人，不满取消其对各团指挥权的决定，趁农民自卫军主动远离薛坪之机，带领会众突然袭击苏维埃政府和工农革命军总政治部驻地，李协一、张道南等12名领导人当即牺牲。在巡检的工农革命军得悉后，大部分人员离队溃散。4月20日，金镶坪豪绅王本槐勾结恶霸邓子俊，带领团防及大刀会200余人向巡检苏维埃政府“围剿”，巡检赤卫队百余人血战失利，起义主要领导人及余部被迫四处隐蔽，起义遂告失败。

平江三月扑城

在中共湖南平江县委组织下，平江县工农武装和群众数万人于1928年3月16日举行了一次攻打县城的武装起义。

1927年9月，中共平江县委组织发动秋收起义后，一直坚持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并于12月组织了年关起义。1928年2月，中共平江县委在嘉义召开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决定于3月组织全县工农武装和群众攻打县城。并集中全县武装，成立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由余本健任总队长，罗纳川任党代表。总队下设5个大队。之后，各地普遍组织了暴动队。各大乡成立乡指挥部，区成立大队，乡成立中队，村成立班。3月15日，全县数万农民队伍按各乡的指定地点集中，分头进发县城。行军时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暴动队化装成送葬队，前面是铙炮队，接着是锣鼓队、旗队、舞狮队、彩龙船队、故事队、和尚队、道士队。敢死队员有的化装披麻戴孝，有的化装买卖人。16日天将拂晓时，各路队伍浩浩荡荡先后进入城郊。接着分四路攻城。东路敢死队首先冲过浮桥，杀进东街，缴获了敌人一些枪械。南路人马也冲到了黄沙滩。北睡由画桥冲进了北街，在拓树坪与东路敢死队会合。先行化装入城的暴动队员，与攻城的敢死队一道与敌人拼杀，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县城东南西三面紧靠汨罗江，河面宽近200米，水深齐颈，河上有浮桥通行。当东南面大队人马开进县城时，国民党军把浮桥中间的几节船拆掉了，致使东南八九万暴动群众受阻在三阳街一线。许多队员冒着弹雨涉水过河向对岸敌人冲锋，但因敌人火力猛烈，暴动队攻城火力弱，城东南的队伍无法冲进城去。围攻北门的暴动队，虽一度攻进城里，并缴获了敌人一批武器，但因敌人凭借工事阻击，最后不得不撤出城外。

这次攻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震撼了国民党平江县当局的反动统治，锻炼了人民。同时，对国民党军“围剿”上井冈山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巴东起义

1928年3月17日，在中共湖北巴东党组织领导下，利用神兵武装，在巴东县城发动了武装起义。

1927年夏，中共巴东特支为了利用神兵力量，组织武装起义，派共产党员打入神兵组织，分别担任神兵队长和神兵代表，逐渐掌握了神兵组织的领导权。到1927年底，中共巴东党组织已掌握了神兵2千多人。1928年2月9日，共产党员张华甫、廖景坤、宋一陶、武道生、黄亚先等以参加黄大鹏婚礼为名举行会议，讨论武装起义问题。会议决定在巴东县城举行起义。会后分头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准备。3月，巴东县长高安析（元藩）要在全县强征20万元的军饷，引起群众的愤怒。中共巴东党组织鉴于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决定3月17日举行武装起义。是日下午，起义神兵从江北乘船抵南岸的巴东城下。黄大鹏当即向高安析写信，佯称要过江打土匪，需在县城住一宿。高安析本来对土匪束手无策，又见神兵已抵城下，只好应允神兵住信陵小学。深夜，起义正式开始。陈宗培率第1路，除掉了守门县衙的哨兵，冲入县府院内，处决了县长，夺了县印；黄大鹏率第2路，攻占县邮政局，处决了邮政局长兼警察局副局长黄尚清；第3路由廖景坤带领，处决了团总马哲生。战斗经过两个多小时，处决县长以下反动官吏7人，起义队伍无一伤亡，一举成功。3月18日，成立了巴东县临时人民委员会。20日，宣告巴东县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华甫为主席。巴东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恐慌。5月，国民党川军独立第5师师长刘和鼎、副师长马馨亭（分别兼任鄂西“清乡”正副司令），派兵一部，加上地方反动武装2千多人，向巴东革命武装和人民委员会发动“清剿”。张华甫、廖景坤、黄大鹏及时将人民委员会和革命武装撤到江北山区，将军政素质较强的神兵组成工农革命军鄂西独立第1师，全师1000余人，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团防头目张家彩占领巴东县城，纠合1000多团防武装向江北进攻，被工农革命军鄂西独立第1师击败。后又在牛洞、甘坪、平阳一带，将敌人穿插分割，设下埋伏，毙伤国民党军及团防军百余人，缴枪80余支，敌副团长王馨荣被当场击毙。

“清乡”军在甘坪吃了败仗，马馨亭亲自率重兵进攻。鄂西独立第1师虽给敌以沉重打击，但终因敌我力量越来越悬殊，作战不断失利。马馨亭又使出“诱降”手段，致使独立第1师溃散，巴东县人民委员会被迫解体。张华甫、黄大鹏、廖景坤等领导人和一批革命骨干转移到巴（东）兴（山）（秭）归边界坚持斗争。

大荒坡起义

1928年3月18日，中共河南省南王县（潢川、固始、商城、光山、息县）特委在潢川县大荒坡领导和发动部分农民、南王县县委成员和农会干部举行了武装起义。

大荒坡位于固（始）、潢（川）、商（城）三县交界处，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1927年8月底，中共潢川县委派当地开明士绅张现贵的长子张相舟和次子张彦武（均是中共党员）回到大荒坡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9月，潢川县委派共产党员江梦霞、徐智雨、朱澍川先后回大荒坡，协助张相舟发动群众，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先后组建了7个农民协会。1927年底，中共潢川县委书记易宗邦邀请固始、商城两县党组织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大荒坡发动武装起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到1928年2月初，中共潢川县委已掌握长短枪14支。2月底，中共河南省委派汪厚云、范易、龚逸情、魏山先后来到潢川，正式组建了豫南五县特委，汪厚云任书记。3月16日夜，特委集中特委和固始、潢川、商城3县党的骨干30余人，召开起义动员大会。特委主要负责人宣布举行起义，夺取大荒坡张上楼反动劣绅张秋石和张下楼反动劣绅张重山的枪支，扩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并将起义队伍分为两路：一路为南王县特委和固始、潢川、商城3县各支部负责人以及潢川七中进步师生共30余人，负责攻打正面。并从中挑出14名骨干，由范易带领，组成突击队，担任攻打寨门的任务。另一路为冯家岗、徐家寨和大荒坡附近的农协会员及群众共80余人，负责攻打左右两翼。

3月17日夜，南王县特委率领的一路起义队伍从大荒坡以南六公里的红盆窑出发，进至高庄以东，与另一路起义队伍会合。18日凌晨，起义队伍将张上楼包围。特委委员范易率领的突击队几次向寨门攻击，都因寨门坚固而未能攻破。寨中敌人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向起义队伍疯狂射击。起义队伍虽经激烈战斗，奋力拼搏，终因准备不足、张家防备森严以及起义过程中遭到不明真相的枪会的误击，致使起义失败，特委书记汪厚云、委员范易、龚逸情等30余人被捕牺牲。

张家坊起义

1928年3月中旬，中共湖南浏东特委领导农民武装在浏阳东乡张家坊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中共浏东特委委员陈硕英根据特委的指示，在张家坊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准备武装起义。1928年3月，陈硕英获悉张家坊团防局从铜鼓买来一批枪支，决定立即组织农民起义，夺取团防局枪支。3月中旬的一天，陈硕英率领40多名暴动队员，在团防局内线的配合下，乘黑夜从后门打入团防局，杀死土豪陈信学等人，缴获了买来的全部新枪和原有的3支步枪。起后第3天，暴动队遭国民党地方武装偷袭，牺牲5人，陈硕英等多人被捕。浏东特委书记王首道通过关系，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释放暴动队员，敌人一面答应放人，一面将抓捕的暴动队员秘密押送县署，后全部杀害。王首道获悉，即率游击队袭击张家坊，处决5名反动分子。不久，游击队再次攻打了张家坊，缴获步枪8支，弹药一批。

杨祠起义

1928年3月中下旬，在中共江西修水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农民自卫军在杨祠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年1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成立后，中共修水县临时委员会在湘赣边特委的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组织发动工作，先后建立10个党支部，发展党员200多名，在此基础上成立了3个中共区委。3月1日，中共修水县临时委员会召开全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定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迅速扩大工农武装队伍，筹集武器，伺机在杨祠举行起义。为加强对起义的领导，成立了杨祠起义委员会，由余经邦任主任。同时派人与武宁、铜鼓的中共党组织联系，组建修武铜工农革命游击队，3月上旬，杨祠起义委员会即着手建立铁铸局，制造土枪土炮、梭标、马刀等武器。农民自卫军也由600人发展到1000余人。3月中下旬，杨祠起义正式举行。在余经邦等人的领导下，1000余农民自卫军分别在塘城、沙坪、全丰一带打土豪，收缴枪支，焚烧契约借据等，将没收的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杨祠起义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的极大恐慌。他们四处串连，互相勾结，组织起专门对付农民自卫军的一支反动武装力量，残酷镇压农民运动。4月3日夜，在西乡一带土豪劣绅的带引下，国民党武修铜靖卫大队大队长吴抚夷率部300余人，在当地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分两路包围了杨祠。当时，起义委员会领导人和农运骨干70余人正在杨祠开会，得知被敌人包围后即迅速组织突围，余经邦等部分人突围脱险，安全转移，其余人员在敌人的围攻下壮烈牺牲，杨祠起义失败。

峭岐起义

1928年3月21日，在中共江苏江阴县委的领导下，江阴峭岐农民在后滕、杨舍起义的鼓舞下，发动了武装起义。

峭岐是江阴东南乡一大集镇，分南北两条街。江阴各地豪绅在后滕、杨舍起义的震慑下，纷纷逃向城市，唯有峭岐镇例外，大地主把这里视为“安乐土”。地主阶级与反动政府勾结，购置枪械，建立民团，私设牢房，残酷压迫剥削农民。1928年3月初，中共江阴县委决定组织峭岐起义。

3月21日傍晚，茅学勤、陈叔璇、朱松寿率云亭、长寿、周庄方面的农民1000余人在昆山附近的水墩庵集合。茅学勤作动员，并将农民分成3队：第一队由张保华任队长，从正面进攻峭岐的东木桥守敌；第二队由那土根任队长，从北面袭击侧翼；炸弹队作机动配合。待攻克北峭岐后，再合力攻打南峭岐。3支队伍在暮色中向峭岐疾进，沿途有很多农民自动加入，抵达目的地时，竟达3000多人。19时左右，担任侧翼攻击的第二队与炸弹队同时接近街梢。警察先行鸣枪，茅学勤即令还击，周庄农民自造的土炮由赵德胜扛着第一次投入使用。杀声、枪声、夹着轰轰隆隆的土炮声震天撼地，吓得警察慌忙撤退，逃向南峭岐。当朱松寿率领队伍进攻东街大地主徐习五住宅时，遇其家丁的顽抗，一时无法攻入，便在围墙四周放火，徐慌忙携带家眷从后门逃走。起义农民打开数十间仓库，将米、麦、豆、棉纱、布匹等尽数运走。控制北峭岐后，茅学勤下令总攻南峭岐。南峭岐三面环水，凤泾河将南北峭岐隔开，仅有一座青龙桥可以通行。吴家的保卫团在桥上架放了铁丝网，并有警察协力防守。敌人用电筒照，盒子炮、快枪不停地扫射。起义农民火器不足，4次冲锋都未能过桥，弹药所剩无几，茅学勤只得下令撤退。到长寿十八亩桥时，将没收来的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

江阴农民起义的迅猛发展，吓得国民党江阴县长孙揆钧辞职而去。新上任的县长申炳炎急电上峰，请求加派正规部队。国民党遂增派1个营兵力，四出搜捕、杀害革命群众，色恐怖日趋严重。为回击敌人的血腥屠杀，江阴县委率领起义队伍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利。

信宜沙田起义

1928年3月21日，中共南路特委在广东信宜县沙田地区组织发动了一次有3000余名农军参加的武装起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茂名党组织在湛江召开了党团紧急会议和南路农民代表会议，研究发展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起义问题。茂名党支部书记朱也赤、关耀南，沙田农民代表李叔明等出席了会议。会后，李叔明、关耀南回到沙田圩，立即与中共党员李雅可、周君载等研究执行南路党的决议，决定在沙田地区组织武装起义。他们选派周肖陶、周泰楷等3人打进高州城驻军及招兵站内作策反工作；在莲水西乡、莲水东乡和玉堂乡的35个村庄中秘密恢复农会；成立筹粮筹款小组，挑选骨干，进行武装训练。1927年冬至1928年初，中共南路特委巡视员周颂年、共青团南路特委书记车振伦多次到沙田圩秘密召开会议，研究起义计划。车振伦从自卫军分队长、组长中挑选了一批人员，带到陈垌集训。在南路特委的具体帮助下，起义条件渐趋成熟。经研究，决定于1928年3月26日举行起义。车振伦带计划前往香港，请示省委批准。李雅度去信宜，周兆霖去化州，李雅可去广西，联系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力量，准备在占领沙田圩后，大家联手攻占高州城，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这时，周肖陶已争取到城内的敌军两个连，周泰楷率领的几十人的国民党武装也愿意接受农民军的领导，只等农民自卫军攻城，便可作内应。由于起义计划泄露，李雅度、周君载、李叔明等召集农民自卫军的分队长、筹款筹粮小组成员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起义日期由3月26日提前到21日夜间举行。21日夜，各村农民自卫军在木强等村集结完毕，共216人，步枪128支。李雅度自任临时军事指挥（原定李雅可任军事总指挥），宣布举行武装起义。农民自卫军高举大刀、长矛和步枪，佩带标志，手持火把，向周村堡进发。翌日凌晨，起义队伍占领了周村堡，竖起了斧头镰刀红旗。农民自卫军消灭了堡内的地主武装，烧毁了地主卢植三的田契，开仓分粮给贫苦农民。22日，李雅可从广西回来，对起义队伍重新进行部署。除留一部分力量据守周村堡和君载楼外，把主要力量分为几路。在李雅可指挥下，农军士气高涨，队伍分头并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起义队伍，很快由200多人迅速扩大到1000多人。化州合江的一些农民，也闻讯前来参加。当晚，农军按计划推进，分别占领了大口、大屋垌、狮子坡，夺取了地主的4个炮楼，缴获步枪10多支。夜里，又有2000多名群众高举火把，拿着大刀禾叉前来助战。

农民自卫军乘胜向沙田圩进击，恶霸豪绅一片惊慌，大地主周子坚化装跑到高州报信。县警队和国民党高雷警备区何春帆部一连人先后开到沙田。23日夜间，农军进入山背园村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伏击，农军英勇还击，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这时，信宜和化县方面的农军援兵均遭阻击，无法驰援。起义军弹药所剩无几，只好于25日夜撤至周村。26日追兵又至，起义军最后撤至六王山，在山上坚持斗争3个月后，遵照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化整为零，分散进行隐蔽斗争。

和舍、南宝起义

1928年3月22日和4月上旬，中共广东临高党组织在和舍圩和南宝圩分别发动了各有数百人参加的武装起义。

1928年2月6日，国民党临高县长林明伦携同县议员许汉章等，到和舍视察地主许亮丞办的垦殖场，并准备在和舍圩进行反共宣传。中共和舍党支部获悉这一情况后，即派和舍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刘青云、黄开礼等人率领农民自卫军10多人埋伏在和舍近郊公路旁。这天一大早，林明伦一伙进入伏击圈，自卫军一齐开火，许汉章等人当场毙命。林明伦搭乘汽车逃回县城。

3月19日，黄开礼指挥和舍自卫军击毙和舍土豪、团董赖鸿业。赖鸿业死后，和舍地区的反动头目李锦荣、王光浩等组织了维持会专门对付共产党。为了打击反动势力，刘青云、黄开礼、林桂芳、曾祈春、邱开封等领导300多名农民自卫军，携长短枪和长矛、大刀，于22日到和舍小学集会，宣布举行起义。农军系上红布袖章，上街游行示威，并在当天枪毙了作恶多端的两名团丁，惩处了3名土匪，把田契账单集中焚烧。林明伦请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叶肇派来军队，会同地方民团，镇压和舍起义队伍。为了保存力量，减少牺牲，起义队伍分成东、南两路撤退。南路由刘青云、黄开礼等率领一个中队向木排山方向撤退。途中与敌激战，伤亡较大。农军领导人黄开礼被捕，在和舍就义。东路由邱开封带领撤往澄迈境内继续坚持斗争。

和舍起义后不到一个月，临高县又爆发了南宝起义。南宝人民长期受土豪劣绅的压榨，他们较早接受革命宣传，成立农会。国民党临高当局在县城“清党”时，县农讲所学员符会运、符宗仁、谢明义等人脱险回到南宝，在郎基、道误一带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中共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以郎基为中心，农会会员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自卫军有400多人，枪100多支。1928年4月上旬的一天，农军从郎基出发攻打南宝圩。农军和群众数百人冲向土豪劣绅陈关球和陈玉高的家，打死这两个作恶多端的反共分子。尔后农军又抓住土豪劣绅庞成卿、王成玉当众宣布罪状，就地处决。

在国民党军蔡廷锴部大肆“围剿”琼崖革命力量的险恶形势下，临高县连续举行两次起义，给处于低潮的琼西革命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寻乌起义

1928年3月25日，中共江西寻乌特别区委员会在寻乌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寻乌就有中共组织和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古柏、刘维卢、刘维锷等共产党人根据中共东江特委的指示，回寻乌从事革命活动，并成立了中共寻乌县支部，潘叶煌任支部书记，刘维卢、古柏等为委员。为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中共寻乌支部派林金容等深入农村发展基层农会组织。到1927年冬，石圳、黄凹、河岭、牛斗光、廷岭、车头、吉潭、留车、余田、黄砂、大田等地均建立了农民协会，拥有会员上万人。1927年11月，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江西省委关于武装割据赣西南的计划，中共赣南特委要求各县党组织尽快组织起义。中共寻乌支部根据赣南特委的部署，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8年3月23日，成立了寻乌县起义总指挥部，以刘维卢任总指挥，古柏、仲锡球、何家常任副总指挥。25日，寻乌全县武装农民和中山中学的学生近5万人，分6路同时举行起义。这天黎明，攻打县城的一路率先开始。起义队员手持大刀、鸟枪等，浩浩荡荡冲进甫门。国民党县长和靖卫队弃城而逃。起义队伍一举攻克寻乌县城，捣毁国民党县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从监狱中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占领县城后，宣布成立中共寻乌县委员会和寻乌县革命委员会，潘丽任县委书记，刘维卢任县革委会主席。在县城起义的同时，留车、南桥、篁乡、吉潭、龙图等地各路武装农民也没收了地主豪绅财产，烧毁契约，摧毁国民党乡村政权。

第4天，寻乌地主武装勾结叶子峰土匪潘满山以及会昌、广东本远、兴宁的反动武装向起义队伍疯狂反扑。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起义队伍撤出县城，向城南方向转移。后由古柏等人组建起七八十人的赤卫队，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斗争中，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1纵队。

安仁起义

湖南安仁农军在来阳、永兴农军及工农革命军第 1 师支援下，于 1928 年 3 月 27 日攻占县城的武装起义。

1928 年 2 月下旬，中共华王支部书记唐时雍和共产党员侯岳生分别组织领导了华王起义、龙海起义。不久，国民党军分路“进剿”农军，许多农军干部及群众惨遭杀害。面对敌人的反扑，广大农军极为愤怒。3 月 26 日，唐时雍到达耒阳鳌山庙，向朱德报告了安仁的敌情。朱德立即决定派陈道明率部随唐时雍先行攻城，他则率主力随后行动。27 日，唐时雍指挥的安仁农军在工农革命军一个营的支援下，从华王庙出发，开始向县城进发。沿途群众听说攻打县城，纷纷参加。永兴、耒阳农军积极配合这次攻城行动。工农革命军和农军相互配合，先在石头坳给县警备队以迎头痛击，继在黄泥坳歼敌 1 个连。3 月 29 日兵临安仁城下，城内守军纷纷溃逃。3 月 30 日，朱德亲率工农革命军向安仁县城进军，早已攻入城内的农军立即组织 20 多条民船，迎接朱德大军入城。4 月 2 日，全县上万农军聚集南门洲，庆祝安仁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经朱德提名，选举唐时雍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后，处决了 8 名罪恶昭著的土豪劣绅。4 月 3 日，中共安仁县委员会成立，由徐鹤任书记。在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安仁 14 个区、89 个乡镇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惩治土豪劣绅 120 多人，组建农民武装 4500 多人。

安仁起义是湘南起义后期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为湘南起义军主力东撤铺平了道路。

靳家湖起义

在中共湖北荆门县委的领导下，靳家湖地区的农民武装于 1928 年 3 月 30 日举行了起义。1927 年冬，中共鄂西特委派李文宣、靳吉祥返回家乡——荆门靳家湖领导农民起义。1928 年初，中共靳家湖支部正式成立，先后由李文宣、李云程任书记。春节前后，党支部经过秘密串联宣传鼓动，组建了 6 个武装大队，共 6000 余人，靳吉祥任总队长，官昌林、李柏武、李纯斋等分任大队长。武装大队成立后，分区捕杀反动官吏、土豪劣绅，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3 月 30 日，靳家湖起义正式爆发。李云程、靳吉祥集中农民武装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攻打杨集、五里铺地主民团，捣毁国民党区公署和税务所。31 日，农军围歼大股土匪，又取得胜利，声势大震。靳家湖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起来惩处地主，焚烧债约、田契，开仓放粮。

4 月 4 日，中共荆门县委召开会议，研究靳家湖地区的斗争形势，指出要作好防止和迎击国民党“清乡”的准备。当晚，县委又派人到靳家湖，通报国民党县政府纠集大批武装即将反扑的消息。靳家湖农军领导人决定采取主动行动。4 月 5 日，正当农军分头准备的时候，国民党正规部队配合地主武装由南向北展开疯狂反扑，农军措手不及，遭受重大损失，靳吉祥等人被捕牺牲，李云程、李纯斋等农军主要负责人被迫离境，或转往江南地区，靳家湖农民起义失败。

涂岭起义

1928年3月，中共福建惠安县特别支部在涂岭领导和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6日，惠安县国民党当局进行“清党”活动。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惠安县临时委员会迅速转移到农村，临委负责人王德彰前往厦门向闽南特委汇报工作，临委成员吴敦仁和共产党员吴国珍回惠北涂岭继续开展农运。5月，中共闽南临委调派施岑依、许彩英前来惠安涂岭，指导工作。6月，在涂岭组织“互助团”，进而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惠安县第一支农民武装——涂岭农民自卫军。至八九月间，农协会会员发展到1200多人，农民自卫军500多人枪，其常备队21人枪，负责人施岑依（11月后，改为陈冬水）。8月12日，王德彰返回惠安涂岭，根据闽南特委指示，建立中共惠安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亦称涂岭区委），下辖涂岭、林角、泗洲3个党支部，党员12人，王德彰任特支书记。11月间，为加强农运和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共闽南临委调回施岑依、许彩英，指派林泽民、林树勋来惠工作。12月1日，涂岭农民自卫军改编为13个连队，改称为惠安工农革命军，扩展到1000左右人枪，林泽民、林树勋负责军事训练，王德彰负责政治训练。在此期间，农民自卫军曾打跑了县“田亩捐”局长陈民哀带领的1个排的征收军队，击退了泉州“田亩捐”总局长周俊烈派援的1个连的兵力，并捣毁陈田村土匪武装巢穴。慑于惠安北部农运的威力，国民党海军驻惠安陆战队林炳洲部补充团1个连兵力，于1928年1月11日夜突袭包围涂岭农民协会办公地（亦是中共惠安特支所在地）魁星楼。翌日凌晨，王德彰、林泽民、林树勋等4人被捕。数十名农协会会员、工农自卫军武装抢救未成。

3月，国民党驻惠安海军陆战队林寿国调遣所部杨献周（秋）营300多人枪，从仙游县园庄向涂岭西部山区包抄过来，企图一举消灭涂岭农民自卫军。中共惠安特支所属党支部的领导带领农民自卫军迎敌。王尚任带领农民自卫军迅速抢占泗洲溪东面山头有利地势，把反动军队阻止在溪底，以防敌人占领平原地带和福厦公路交通要道。吴国珍等带领西面的泗洲、红厝坑、小坝、南乾、甘蔗园等村自卫军，切断敌人西窜之路。林宝兴等带领南面的松园、赤土埔、东吴、西安、新桥等村的自卫军，阻击敌人沿溪向南逃窜。自卫军一边开枪射击，一边鸣锣、放火。敌人三面受阻，向北面虎鼻崎突围。自卫军立即冲入敌阵，敌人溃不成军。此仗，农民自卫军毙敌30余人，俘70余人，缴枪200多支，残敌向北逃入仙游枫亭。

萧山西乡起义

1928年3月间，中共浙江西乡区委领导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西乡位于浙赣铁路之西，西濒钱塘江。1927年七八月间，我党在西乡先后建立了长河、沿山、囊七房、汤家桥、孔家交、傅家峙、外沙等7个党支部，有党员80余人。9月，中共西乡区委成立。当时，反动政府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区委多次组织有几千农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为此，反动政府十分惊恐。1928年初，长河警察所贴布告、下禁令，无故逮捕农协委员，还肆意到农民家中敲榨勒索，并策划更大规模的镇压措施。为反抗长河警察所无故逮捕农民，区委决定发动贫苦农民针锋相对地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3月间，长河党支部书记来耀先率领数百农民，手持泥锹铁耙，涌向长河警察所，开始了农民反抗国民党警察所的武装起义。农民们在警察所门前高呼口号，反动警察鸣枪威吓，来耀先和党员们奋勇向前，农民们一涌而上，捣毁了警察所。警察们越窗而逃，奔赴县城告急。次日，国民党萧山县政府派出几十名武装军警赶到长河进行镇压，逮捕了来耀先。敌人害怕农民再次起义，连夜将来耀先用船押解萧山县城。中共西乡区委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组织营救，紧急动员了湖头陈等村数百渔民驾船出动，在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白马湖上进行拦截。是夜，待反动军警的驳船来到时，四周埋伏着的数十艘渔船迅速将其团团围住，军警们吓得发抖求饶，乖乖地放回了来耀先。

西乡农民革命斗争，使萧山反动当局胆战心惊，萧山县警察局纠集了全县200多名警察，到湖头陈、沿山一带进行武装搜捕，结果有5名党员被捕。但农民们没有被压服，仍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1928年4月初，西乡区委又一次组织农民数百人，捣毁了西乡警察所。

闽西地区起义

1928年3月至8月，在中共福建省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该省西部地区相继爆发了多次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向福建党组织指出：福建党组织的整个工作方针是要由我们的党组织直接组织宣传工农暴动，没收土地，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贫民的民权政治。还指出，在闽西各县依目前主客观条件应立即开始暴动起义。并要求福建党组织应建立省临时委员会。12月中旬，中共福建省临委建立后，确定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农民由抗租抗捐一直到实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夺取政权。并将全省划分为4个暴动区，其中永定、龙岩、平和为第一暴动区。闽西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省临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在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武装，为举行武装起义和开展武装斗争做准备。从1928年3月起，武装起义在闽西各地相继举行。3月4日，中共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等以龙岩白土区后田为基点，发动农民举行起义，捕捉镇压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收缴其武器，焚毁田契、借约、账簿等，起义后成立闽西第1支游击队，在龙岸、永定边界地区活动。8日，中共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领导平和县长乐乡及其附近1000多名农民举行起义，攻入平和县城，后转至平和西北山区坚持游击战争。6月25日，中共上杭县委负责人郭慕亮等在上杭蚊洋领导农民1000余人起义，给国民党军郭凤鸣部以有力打击。29日，中共永定县委负责人张鼎丞等领导永定溪南、湖雷、金丰等地5000农民举行起义，曾一度占领永定城。起义后，组织了1个营的正规红军，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在永定、平和县边境开展游击战争。8月，根据中共福建省委指示，永定、龙岩、上杭等县农民起义武装集中在永定溪南，合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第7军第19师，辖第55、第56、第57三个团。同时，成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张鼎丞任主席。后闽西工农红军第7军第19师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进攻下被打散，余部仍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后田起义

1928年3、4月间，在中共福建龙岩县委的领导下，该县后田乡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1月，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随北伐军回到龙岩的陈庆隆、郭滴人等共产党人，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机，组建了中共龙岩总支委员会。2月初，在文庙成立了县农民协会。9、10月间，国民党新军阀陈国辉部进驻龙岩后，借修岩水和岩漳公路，向各区、乡派捐、派工，勒索捐款达21万元，激起广大农民的义愤。龙岩党组织决定，以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担负公路捐作为发动农民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邓子恢、郭滴人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从9月到11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全县各区乡及城郊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近10万人。11月，在后田村成立了中共龙岩临时县委。这时，闽南特委派人到龙岩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布置武装起义。龙岩临时县委为执行特委决定，准备在后田发动起义。

3月4日，后田乡农会为了保护农民度过春荒，趁地主乡绅集合做传统民间节日“关帝福”之机，冲进祠堂，据理强行分了用集体公偿钱（公田收入）款买来的祭品，并且向地主豪绅索回钱据田契，要求废除租债。地主豪绅唆使走卒打伤农民，并密谋暗杀农会负责人。后田支部决定借机举行起义，得到县委的批准。同时，县委通知郑邦、龙聚坊、邓厝、孟头等支部一致行动。是夜，陈锦辉等率部分农民，镇压了企图暗杀农会干部的地主走卒，捣毁了地主乡绅的老人拳术馆。随后召开群众大会，收缴并当场烧毁地主田契、借约、帐册等，缴枪10余支，刀、矛30余把。翌日，党支部领导农会会员将地主粮仓1000多桶粮食分给贫苦农民。郑邦、龙聚坊、邓厝、孟头等村相继行动，缴枪3支、大洋300元，并烧毁部分田契、借约。

后田起义后，逃往龙岸县城的地主豪绅与陈国辉部相勾结，镇压农民起义。3月10日晚，陈部500余人，分两路包围后田村。当敌一路进到后田桥头时，遭到后田农会武装50余人的伏击。农会武装在罗怀盛、陈品三、陈锦辉的率领下，以步枪、鸟枪、刀矛等武器，与敌人相峙2小时，击毙2人。因发现另一路敌人从后侧包抄过来，遂撤出战斗，向东坑山上转移。后在邓子恢、罗怀盛、陈品三率领下，向龙岩与永定交界的文溪、大排公学前进。在大排公学成立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陈锦辉任队长，坚持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临澧起义

中共湖南临澧县委经过较长时间酝酿准备,于1928年春发动全县各地农民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8、9月间,中共湘西特委先后派刘继光、王谦祥、邱育之、邹墨池等到临澧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武装斗争。不久,中共临澧特别支部改组为临澧县委,共有党员120人,刘继光任书记。1928年2月,刘继光被敌发现遭通缉不得不离开临澧后,王谦祥接任书记,继续加紧准备武装起义。中共湘西特委又派汪毅夫、陈育南等回临澧协助县委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全县各地很快建立了暴动队,队伍达到数千人。1928年春,在中共临澧县委的组织领导下,各地农军和群众同时攻打当地团防武装,镇压土豪劣绅。颜泽民、邹墨池率领望城暴动队趁黑夜首先袭击了观音乡劣绅徐干廷住宅,抄了徐家。沈绪瑞率领高家坊暴动队抄了土豪杨献昌的家,随后又攻打南二区反动武装于干臣部,沈绪瑞在战斗中牺牲。其他各乡亦爆发了小规模

的起义。临澧起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清剿”的嚣张气焰,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湘鄂西红军开展的游击斗争创造了条件。

桑植起义

在中共湘西北特委的领导下，湘西北工农革命军于1928年4月2日在湖南桑植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总指挥贺龙由广东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到湘鄂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建议，并拟定了《湘鄂西暴动计划》。中共中央常委开会研究，同意了贺龙的暴动计划，派周逸群、贺龙等到湘鄂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并成立了以郭亮（后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北特委，加强党对起义工作的领导。1928年2月下旬，周逸群、贺龙等途经湖北，在鄂西、湘北一带领导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后，到达桑植县洪家关。

桑植县地处湘西北边睡，与鄂、川、黔三省毗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是进行武装斗争、武装割据的理想地方。湖南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贺龙回湘前，在湘西北一带进行了武装起义的许多准备工作。以周逸群、贺龙为核心的湘西北特委到达桑植县后，立即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准备起义。在贺龙等宣传发动下，贺龙的亲属即大姐贺英、胞妹贺满姑、贺绒姑、族兄弟贺炳南、贺沛卿等部，贺龙的旧部如王炳南、李云卿、钟慎吾等部，以及其他地方武装和部分贫苦农民，纷纷参加革命，队伍很快发展到3000余人枪。湘西北特委决定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贺锦斋任师长，下辖两个团，分别由贺桂如、李云卿任团长。此外，还编了几个支队。工农革命军的组建，为桑植武装起义作好了组织准备。4月2日，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从洪家关分三路进攻桑植县城。贺龙亲率中路大军经文家坝、蔡家峪、八斗溪直插县城北门；贺锦斋带领左路军由岩岗塔、风门坝、柏家冲杀向县城东门；李云卿统领右路军绕道南岔、汪家坪进至县城西门。11时，工农革命军向城内发起总攻。城内守敌陈策勋见势不妙，急令部属死命抵抗，自己则带着马弁逃出县城。攻打西门的部队与团防头子张东轩部经过一番激战，破入西门，杀向城中，张东轩率残部出逃。攻打东门的部队在守敌陈佑卿部的强大火力下受阻。这时，贺龙和李云卿各率部从陈佑卿左、右两侧突然发起攻击，陈佑卿奔逃出城。不到1个小时，工农革命军就攻克了桑植县城。次日，湘西北特委和工农革命军在县城举行庆祝大会，宣布成立桑植县革命委员会，李良耀为主任。中共桑植县委亦同时建立。

桑植武装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4月下旬，国民党军独立第19师两个团和第43军第3师第5旅龙毓仁部联合进攻桑植县城和洪家关。工农革命军奋起反击。但由于部队刚组建，未经过严格而系统的训练，战斗力不强，在双溪桥、梨树桠两战均失利，桑植县城和洪家关被敌占领。工农革命军退至凉水口、罗峪一带，又与追敌在苦竹坪激战，再次失利，队伍大部被打散。周逸群与贺龙失去联系后，转移到鄂西领导洪湖地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贺龙收拢失散部队400余人枪，与敌周旋。6月间，贺龙获悉国民党军龙毓仁旅西撤，即率部在龙部经过的小埠头伏击，歼敌参谋长以下150余人，缴枪百余支。接着，攻下洪家关，并收编了地方武装文南甫等部。工农革命军恢复到1500多人。5月间，湖南省委曾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加强统一指挥，决定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在工农革命军中成立湘西前敌委员会，管辖红军驻扎地的县委和特委。7月上旬，湘西特委派陈协平到洪家关后，立即成立湘西前委，贺龙为书记，贺锦斋、陈协平、张一鸣、李良耀为委员。

湘西前委成立后，在初步总结前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整顿和改编。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未到职），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下辖1个师，贺锦斋为师长，张一鸣为党代表。经过整顿后的工农革命军面貌一新，为后来部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8月，第4军执行湘西特委策应石门南乡暴动的指示，南下石门。此时，国民党军聚集上万兵力分三路向第4军进攻。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在指挥部队抗敌时相继不幸牺牲。不久，起义部队思想混乱，一些投机分子乘机叛变，不坚定分子纷纷离队，队伍只剩下近百人。

在这困难的时刻，湘西前委根据中共中央10月4日的来信对游击战争的任务、方针及前途等问题的具体指示，在湘鄂边的梅坪岩湾汪家屋场进行整军。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强了党的领导和部队的管理教育，遣散了一些动摇分子，吸收了一批农民青年入伍。整顿后，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为红4军，与井冈山的红4军番号相同。这次整顿，为把红4军建设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从此，红4军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整军不久，湘西前委改称湘鄂西前委。红4军先后攻占湖北的建始、鹤峰两县城，成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上半年，全军扩大到1000多人。6月中旬，红4军挥师南进，再克桑植县城。并组建了中共桑植临时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及县总工会、县农协和农民自卫军。桑植武装割据局面很快形成。接着，红4军击败进犯桑植县城之敌，共歼敌近3000人，获长短枪2000余支，红4军发展到4000余人，3000余支枪。桑植、鹤峰2县红色区域基本上连成一片。1930年7月，贺龙率部与中共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在鄂西领导的红6军胜利会师，组成红2军团。9、10月间，中共湘鄂西特委、湘鄂西前委以及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相继成立，湘鄂西根据地形成。

桑植武装起义是紧接湘南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它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策应和配合了湘南、湘东武装割据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攸县南乡起义

1928年4月4日，湖南攸县南乡农民在中共党组织发动下，为配合安仁农军进攻攸县县城而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3月底，湘南起义军攻占与攸县交界的安仁县后，攸县绿田、芷陂乡共产党员蔡阳和、徐元清等决定发动攸县南乡农民暴动，以策应湘南农军进攻攸县县城。4月4日，唐天际率安仁农军向攸县进军，攻打淶田和攸县县城。蔡阳和、徐元清立即带领千余名攸县南乡农军举行起义，配合唐天际部首先攻占淶田，并在淶田、芷陂、存养一带放火焚烧了蔡仁斋等土豪劣绅的房子，收缴100多户豪绅家中的衣物钱财和粮食。暴动农军从淶田到攸县县城的沿途，到处张贴革命标语。农军进到攸县城郊，因隔着水河，无法继续前进，攻城未能实现。安仁农军撤回安仁，攸县南乡暴动农军回到南乡坚持斗争。后因湘东保安司令罗定部猖狂反扑，除100多名暴动农军进入安仁加入湘南起义农军外，其余全部被打散。

南溪起义

1928年4月7日，在中共川南特委和南溪县委的领导下，以南溪牟平为中心的农民群众举行了起义。

南溪位于宜宾、泸州中间。广大农民为摆脱军阀和豪绅地主残酷剥削，不断掀起反压迫、求生存、抗暴斗争。192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李立三、张守恒等在南溪成立了中共南溪县第1个共产党支部。1927年10月，南溪牟平农民协会成立。11月，中共四川省委派人到南溪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1928年2月8日，在宋家乡川主庙成立了南溪县农民协会，张守恒为主席。不久，南溪县委在宋家、牟平一带发动几百人举行抗捐斗争，打死2名收捐兵痞，缴获民团10余支枪，逼迫牟平团总免去烟苗捐。与此同时，南溪县委派张守恒、张增元等人秘密打入民团，掌握了部分武装。南溪县委决定4月7日在全县举行起义，曾君杰为总指挥，赵之祥为副总指挥。7日上午起义开始，打死该县县团练局长洪汉宋及其侄子洪默深，收缴其全部武器。当晚，曾君杰、赵之祥率领起义队伍分路突击，8日攻入镇内。9日晚，县城东郊农民夜袭仙临，凌晨攻打刘家乡。10日，中共党员掌握的宋家乡民团中队起义，打死大队长李俊辉，并在牟平召开有2000余人参加的大会，公开打出川南工农革命军旗帜，斗争了土豪劣绅，郑则龙、曾君杰等在会上发表演讲。不久，国民党第24军徐光普旅出动1个营镇压起义武装。起义队伍虽经顽强抵抗，终因敌众我寡被打散，曾君杰等起义领导人被杀害，突围出来的起义人员转入隐蔽斗争。

阜阳起义

1928年4月9日，在中共安徽皖北特委的领导和策动下，驻阜阳的国民革命军第47军（原第19军改编）教导团和阜阳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赤卫队联合举行了武装起义。

阜阳是皖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来为战略要冲，兵家必争之地。1927年8月，原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地区委员会委员魏野畴到皖北太和开展工作。魏打入杨虎城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担任军政治部主任，并在该军成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军事委员会，魏任书记。这时，驻阜阳地区的还有高桂滋的第19军（1927年冬改编为第47军），河南肖之楚的第44师，皖北王金韬的一个师，这些国民党军内部均有中共党的组织。为了做好这些部队的军运工作，魏野畴和第19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党的特支书记曾晓渊取得联系，并于1927年11月在太和召开这4支部队党的领导人联席会，沟通了几支部队中的党组织关系。1928年1月，蒋介石派人到杨部逼杨“清党”，并要逮捕魏野畴等共产党员。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魏野畴在离开第10军以后，于2月9日夜在太和县城主持召开有70多名中共党员干部参加的紧急扩大会议，产生了临时皖北特委（下简称特委），执行“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的任务，特委由魏野畴（化名韦金）为书记，胡景陶、高望东（高原）、胡英初、昌绍先、刘仲华、李烈飞、李端甫、蔡甲午等为委员，下设太和、寿州、亳州三个分特委，直接领导各县县委。会议要求在农村宣传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差、抗租的“六抗”斗争，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2月21日，魏野畴给中央报告，指出：皖北党组织已经迅速壮大，农村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一致同意即刻发动土地革命，必能扩大至全皖北，破坏第10军及第19军，引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

阜阳农民运动，在阜阳县委恢复后得到迅速发展。方圆50余里百十个村庄农协会员发展到5万多人，赤卫队员发展到3000多人。

在特委的领导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第10军、第47军、肖之楚师、王金韬师以及各县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由100余人发展到近千人，第10军内部已有中共党员280多人，并组织了工作队到农村进行革命宣传。第47军教导团9个连，都有中共党的组织，绝大部分力量都为特委掌握。3月28日晚，特委又在阜阳城碾盘桥召开扩大会议，认为阜阳农民运动已出现高潮，中共在农村和高、杨两部中掌握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以第10军政治军事学校和第47军高建白教导团及农民赤卫队为骨干，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会议决定举行皖北工农兵武装起义，成立皖北工农红军，建立皖北苏维埃政府。4月5日，魏野畴在阜阳城贡院后街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决定于4月底或5月初在阜阳举行起义。

4月7日晚，特委在阜阳西湖“会老堂”召开了地方党委和中共设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党委联席会议，鉴于杨虎城部军特支代理书记宋树勋叛变，会议决定提前起义。成立了皖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魏野畴为武装起义总指挥。4月8日下午，特委委员李端甫、李烈飞等立即回到行流执行起义计划，解除了行流税兵的武装，缴获长枪18支，短枪1支。把3000名赤卫队员编为5个赤卫大队。

4月9日凌晨，阜阳起义爆发。敢死队队长申明甫将棉被浇上煤油，点燃武装起义的信号。随后，他立即率领队伍攻打警察局。由于所燃信号很快

熄灭，在城内外集结的各处起义人员，未能按计划配合攻城。这时，把守东城门的第六连排长、共产党员吉超，击毙了反动连长苗霞飞，占领了东门。驻三湾师范学校的教导团，在杜聿德的指挥下开始起义，击伤教导团团长高建白和侯团副，击毙反动官兵二三十人。杜聿德随即率起义部队赶到文峰塔下，但未见到魏野畴。这时，魏野畴在东门听到三里湾师范学校枪声大作，便派第6连去接应，他亲率少数起义部队把守东门与敌战斗。此时城内留守司令部枪声大作，梁文铁部向起义军反扑，并紧闭城门。为摆脱敌人的追击，昌绍先、杜聿德率领350多人，过颍河向行流、王官集方向挺进，魏野畴率领近200人的起义部队向阜阳西南转移。

4月9日上午，昌绍先、杜聿德等所率起义部队到达王官集和赤卫队会师。下午3时在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了皖北工农起义庆祝大会，到会群众2万多人。起义人员拥有长短枪500多支，长矛、大刀3000余件。会议由李端甫主持，宣布“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成立。大会选举了李端甫、李烈飞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昌绍先、杜聿德为皖北工农红军正副指挥。

11日晨，高桂滋部留守司令部王守义纠集梁文铁教导团和所属骑兵第一营及高建白教导团兵变未拉出来的3个半连，加上国民党县长康欣之的地方团队，约2000余人向刚诞生的苏维埃政府发起进攻。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起反击，激战三四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火力悬殊，且地处平原，掩护困难，弹尽粮绝，被敌打散。这时，昌绍先命令当地赤卫队员疏散隐蔽，外地群众战士由杜聿德、苗勃然两人率领突围。突围战士经太和县境时，又遭太和团总尚臣、练总尚泽普、警备营连长曹子壮等率领的反动武装的截击，经过激烈战斗，高望东、李端甫、李烈飞等在群众掩护下率领一部分起义人员突围脱险，昌绍先牺牲，胡英初、蔡甲午等20人被俘，其中有3人被敌惨杀在后王营东北大沟里，其余17人被敌人集体枪杀在草寺集西乱尸岗。杜聿德、苗勃然等被捕后于阜阳就义。

魏野畴所率起义部队，向西南转移经过新村集，被国民党第12军收编的土匪部队团长谭万国派兵尾追。起义部队经过连续作战，急行军90余里，于9日中午抵老集时，被尾追的谭万国部和地主武装包围，魏野畴、胡景陶、蔡乘波、胡怀西等被捕，起义武装被解除。魏野畴被枪杀在老集东边洼地里。

嘉定“五抗”起义

1928年4月10至18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江苏嘉定县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起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嘉定人民面对封建地主和反动政府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纷纷起来抗租抗税和地主作斗争。1927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浦、枫泾、宜兴等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嘉定县六里桥乡首先爆发了抗租事件。为了把农民的自发斗争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27年秋，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周慰农、嘉定县委书记沈金生来到嘉定，与中共嘉定特支成员毛品章、张吉人、张濂川、朱树仁、陆默深、廖家仍等一起发动农民进行武装起义。年底，发展党员30名，农会会员400多名，并成立了农民革命委员会，具体领导斗争。1928年春，为了帮助广大农民度过春荒，中共地下党组织于4月5日晚召集会议，决定抓住当前春荒严重，地主和农民矛盾激化的有利时机，组织农民举行起义。不料，这一消息被敌乡董傅企周探知，密报给县警察局长。地下党员顾羽丰和农会会员顾仲仁、赵阿江等被捕。当夜，会议转移到另外地方继续召开，对今后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作了严密部署。4月10日夜，嘉定农民武装起义首先在六里桥乡爆发。200余名农民在周慰农、沈金生、张濂川、陆默深、廖家仍、周慕陶、印武珍等共产党员带领下，分两路进攻薛家庙大地主朱铭侯、朱殿臣、朱群和六里桥乡大地主朱寿山、朱荣耀家，占领了这几家地主的院落，打开粮仓分粮，没收了金银财宝，并烧毁了地契帐本，起义取得初步胜利，鼓舞了农民群众的信心。起义浪潮迅速扩大到以六里桥乡为中心的黄渡、外岗、朱桥、娄圻、马陆、方泰等地区，参加的农民已达七、八百人。于是，4月11日夜，又发动了第二次起义。主要打击沙岗桥邱家宅大地主邱吉甫，将他家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并当众烧毁了地契和帐本。为了扩大斗争范围，中共党组织决定，进一步向放高利贷和盘剥农民的商贾进行斗争。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发动第三次起义。4月12日夜，8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分别从东市梢、南市梢和北市梢进入外岗镇。起义群众烧了镇上几家豪绅大户的房屋，并在北市梢吴兴寺前面的操场上，将搜缴的租债帐本烧掉，把金银财物分给贫苦农民。队伍稍事休整后，又开向葛隆镇，打下国民党葛隆镇公安支局，缴获4支长短枪和300余发子弹。

土豪劣绅急忙向国民党政府求援，国民党从上海调来了两个营的兵力下乡“围剿”。为了回击反动派的屠杀政策，4月15日、17日和18日3个夜晚，党组织又连续发动了第4次、第5次和第6次起义。后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中共党组织决定停止大规模的起义，疏散群众，掩护有关领导人员撤退。敌人又调集重兵来嘉定清乡，从5月初到6月初，周慰农、沈金生、周慕陶、陆默深、廖家仍、肖学生等起义领导人先后被捕牺牲。至此，前后持续两个月的“五抗”斗争被反动派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嘉定六里桥起义

1928年4月10日，中共嘉定县委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在该县水乡地区以六里桥为中心，先后发动傅家泾圈、外岗、葛隆、方太、安亭等地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嘉定农民受重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剥削日趋加重。为生存，农民们被迫起来抗租抗债。11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浦东分厂工会领导人沈金生担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廖家初为县团工委书记，周慰农为省委特派员，到嘉定开展农运工作。他们到嘉定后与原中共嘉定特支书记毛品章，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张吉人、张漱川、陆默深、朱树仁等积极发动群众，在扩大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发展党、团组织，壮大革命力量。至年底，发展了30多名党员，400多名农协会会员。1928年4月5日晚，沈金生、周慰农以及农协骨干在六里桥乡顾家村开会，商讨如何解决春荒问题。会上介绍了青浦小蒸和松江枫泾农民起义的情况，决定抓住当前时机举行武装起义，并作了具体部署。4月10日晚，周慰农、沈金生等在沙岗桥邵家祠堂召开起义誓师大会，队伍分二路出发。南路由周慰农、沈金生、周慕陶、印武珍率领约200人，攻打薛家庙大地主朱铭侯、朱屏臣、朱群同家，分了他们的粮食、布匹，焚烧了租债账册和房屋。中路由陆默深、廖家初、张漱川率领40多人，袭击六里桥乡中窑村地主朱寿山、朱荣墀家，缴其粮食、布匹和金银财物，烧毁朱荣墀家的租债账册和10余间房屋。接着，队伍赶到六里桥乡乡长傅企周家，不料傅已躲进县城，愤怒的群众焚烧了傅家的房屋。起义队伍又去处决了叶荣典夫妇等6名地主及其走狗。11日夜，在六里桥乡农协领导人侯文奎率领下，进行了第二次起义。在沙岗桥西头邱家宅，收缴地主邱吉甫的粮食和衣物，分给附近的贫苦农民，烧毁全部地契账册，将金银首饰没收归公。12日夜，800多名起义队员，有的手执火把、梭标，有的腰插菜刀，肩扛扁担、锄头，声势浩大，分3路开赴外岗镇。深夜12时许，3路人马在外岗镇会合后，以鸣放鞭炮为号，冲进外岗，打开了不法商贾的门，把粮食、布匹等物搬到外岗镇北面吴兴寺的庙场上，天亮后分给贫民百姓。镇上的地主、资本家因受前两次起义的威吓，早已逃遁一空。于是，起义队伍迅速冲向葛隆镇，突袭公安支局，收缴了4支枪和300多发步枪子弹，并烧毁了公安支局。3次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慌。4月14日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派驻扎在江湾的第1师第3团两个连前往镇压。为了回击反动派的镇压，4月15日夜，周慰农、沈金生等又发动了第四次起义。起义队员没收了六里桥西花神庙地主陈荣璋兄弟和陆家宅地主朱鹤汀、朱寿亭的粮食、布匹等物。4月16日，嘉定县侦缉队在肖家庙逮捕了县农协委员印武珍、朱阿土和顾祥生等11人送县关押。17日，反动当局将先后被捕的顾羽丰、顾仲仁、邵阿江、朱阿土4人杀害于嘉定县城西门外高僧桥西北义家，并枭首示众。针对敌人的血腥镇压，起义的农民于是日晚发动了第五次起义，焚烧了安亭镇地主张庆祥、范鹤鸣家的房子，没收其粮食、衣物。20日，驻昆山的国民党第32军1师3团1个营开往嘉定策划联防“清剿”，1师师长蔡熙盛赴嘉定“主办剿共事宜”。23日，嘉定、昆山、太仓、青浦、宝山5县的反动军政头目聚集嘉定召开联防会议，策划“清剿”行动。同日，张吉人、印武珍、陆阿祥惨遭敌人杀害。

不久，周慰农、沈金生、陆默深、廖家初等19人亦被捕惨遭杀害。至此，

轰轰烈烈的以“五抗”（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目标的嘉定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下失败了。

刘宋营起义

1928年4月上旬，中共河南省南阳县特别支部在刘宋营领导和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刘宋营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1927年8月，在刘宋营村恢复了中共南阳支部。9月，建立了中共南阳特别支部，刘支三任书记。到1927年底，中共党员已发展到42人，农协会员达100余人，掌握了60多支枪。1928年3月，成立了中共豫西南特委（又称南阳特委）。特委分析了南阳的形势，决定首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南阳县刘宋营、唐河县汉龙潭举行农民起义，以带动整个地区的武装起义，成立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4月初，特委委员刘福僧回到刘宋营，积极开展各项准备工作。1928年4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在南阳特委委员刘福僧和中共南阳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刘宋营的农民袭击了南（阳）唐（河）两县交界处的白秋镇烟税局。起义队员马振海首先翻过寨墙，打开寨门。起义队员们冲进烟税局，砸開箱柜，撕毁税票簿，赶走烟税局人员，缴获部分烟土和银元。队员们在街上张贴“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并高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来打烟税局是为群众除害的”。成功后，刘福僧、刘实中、刘协中等领导的另一部分起义人员，准备攻打乔庄村鱼肉乡民的徐九太太。经侦察，乔庄乡公所围墙高，防守森严。为避免伤亡，未施行。

4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刘福僧、刘实中、刘协中又率刘宋营百余名化装成驻南阳的国民党军攻打土寨乡公所。由于走漏消息，敌人戒备森严，起义队伍中止行动，撤退解散。刘宋营起义至此结束。

荥阳起义

1928年4月14日，中共河南省委直属郑（州）、荥（阳）、密（县）边境特别支部在荥阳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派共产党员贾守谦（又名贾益民），到郑（州）、荥（阳）、密（县）交界地区开展农运工作。12月初，建立了中共郑、荥、密党支部，贾守谦任书记。1928年2月，根据河南省委指示，郑、荥、密支部改建为“中共河南省委直属郑、荥、密边境特别支部”，简称“省委直属特支”，特支书记李品一，组织委员张国权，宣传委员张伯超和贾守谦，暴动委员张丙辰。特支成立后，一面发动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斗争；一面组织群众成立农民协会。通过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大长了穷人志气，大灭了地主恶霸的威风，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达250多人，党的组织也得到不断发展。为把斗争引向深入，特支结合斗争实际，制定了突袭杨寨区公署，活捉反动区长、大土豪宋千甫，废除预征粮款和食盐涨价令，把区公署征到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的起义计划。并组成以张丙辰为队长的暴动队伍。

1928年4月14日午夜，刘堂、高庙、窑沟、水磨、刘胡垌、时寨等村50余名农协会会员组成起义队伍，在特支书记李品一等率领下，高举红旗，向杨寨区公署进发。李品一带领一部分队员迅速缴了守卫区公署大门区丁的枪，并将正在睡梦中的东屋区丁的武器全部缴获。特支委员贾守谦带部分起义队员直扑宋千甫的住宅，击毙烟税局长宋子幕等3人。但宋千甫带人占据楼房据枪负隅顽抗，使起义队伍无法接近，为减少伤亡，特支临时决定停止进攻。后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和大肆搜捕下，起义领导人张丙辰和农协会会员张二来被捕入狱，特支成员被迫转移他乡。

罗定起义

1928年4月14日，在中共广东罗定县委的领导下，罗定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发动了攻打县城的起义。

1927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派罗定籍共产党员唐公强、李友芳等3人回罗定，领导农民运动。经过一段深入细致的工作，全县发展党团员45人。次年1月8日，中共罗定县委成立，各区乡党组织也迅速恢复活动。1928年2月29日，中共罗定县委接到广东省委关于积极创造西江暴动局面的指示信后，立即着手部署罗定武装起义。3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团省委又制定了《罗定暴动工作大纲》，由黄剑、赖金章、王欢、唐公强及3名农民党员组成西江上游特委。不久，工农革命军罗定独立团赤卫队成立，约700多人。罗定县委为便于组织，将全县划分为几个区域：第一区以罗城镇为中心；第二区以罗平竹围乡为中心；第四区以横江、泗纶圩为中心；第五区以素龙圩为中心；并决定以第四、第五区为全县的起义中心。各区在起义前破坏国民党的军事、交通设施。并派出农会骨干到革命力量较薄弱的第二、三区，协助攻打地主豪绅反动武装，废除田契、开仓分粮、征收土地给农民。3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团省委策动驻广西岑溪李艳春（国民党第7军中的一个营长）率部起义，参加罗定武装起义。4月14日，罗定起义正式爆发。起义总指挥部设在郁南西涌罗定县委机关内，总指挥为唐公强、唐木。头天晚上，李友芳率爆破队、手枪队潜入县城狗巷埋伏。14日上午，陈幡龙带领四区200多名赤卫队员由横江奔赴九条龙，攻打南门头敌保安队。唐公强带领五区300多名赤卫队员，从右翼攻打国民党县公署。王振强、王耀（即王文生）带领200多名赤卫队员，从左翼攻打国民党县公署。李友芳指挥爆破队、手枪队在城内策应。因郁南十一区混进奸细向国民党县公署告密，进城的爆破队员林向葵等7名队员被捕，县委指挥部被敌人包围，塔脚等处横水渡均被切断，东门岗联络点被敌人监视无法鸣炮，致使各路农军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起义指挥部决定当晚由十一区农军开赴东门，用大伐枪（火药枪）隔江扫射国民党县公署。因距离太远，未果。第二天指挥部通知第四、第五区农军再来参加攻城，因贻误时间，未攻。起义受挫后，罗定县委机关被破坏，西江特委委员唐公强和罗定县委书记唐木、县委委员王耀等同志先后被捕遇害。

黄龙垴起义

1928年4月16日，在中共湖北襄阳县委的领导下，黄龙区农民武装400余人举行起义，成立了农民指挥部和农民赤卫队。

1927年9月，中共襄阳县委派农民武装数千人配合枣阳西部农民起义，又在黄龙、双沟等地3次组织枪会武装万余人举行武装示威，襄阳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从此由隐蔽转向公开。1928年4月初，中共鄂北特委决定在襄阳地区组织几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襄阳县委根据特委的决定，把发动农民起义的地点选定在襄东的黄龙垴和襄南的尹集、竹条铺等地。根据特委、县委的起义决定，中共黄龙垴区委重新组织和训练了农民武装，从中挑选出400余名骨干分子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4月16日，是黄龙垴赶集日。在中共黄龙垴区委成员朱佑文、赵英的指挥下，赵歧周、谢耀武等人分别带领农民武装骨干400余人，携带各式武器混进黄龙街，隐蔽在各自的攻击目标附近。上午9时许，黄龙集市处于高潮，团丁们四处闲逛。此时，朱佑文发出了起义信号。枪声一响，满街的赶集群众，拥挤着向街外逃散，夹在人群的团丁们动弹不得，一一被起义农军缴械俘虏。隐蔽在团防局、盐行周围的农军乘机冲了进去，击毙负隅顽抗的团丁，活捉了团总朱奎九、盐商周华林及劣绅共17人，缴获长短枪18支及大批物资。

黄龙垴起义胜利后，中共襄阳县委在蒋家庙召开了群众大会，审判处决了朱奎九等反动劣绅，成立了黄龙区农民指挥部和农民赤卫队，由赵英、谢耀武分别担任指挥长和赤卫队长。

7月，国民党清乡军李纪才部偷袭了黄龙垴红色区域，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余人，领导人被迫转移外地坚持斗争。

谷城起义

1928年4月21日至8月4日，在中共湖北谷城县委的领导下，谷城县的茨河、石花、城关等地农民群众数万人连续举行起义。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以后，中共鄂北特委先后派高如松、李金铭、李实、李庭兰等共产党员来到谷城，恢复工会、农协和农民赤卫队。到1928年春，全县新发展党员400余人，农协会员和赤卫队员近万人。1928年春，鄂北地区发生严重的天旱，土豪劣绅不仅不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加紧收缴苛捐杂税。在谷城县委的领导下，各地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纷纷组织武装起义。4月21日，茨河地区300余名起义农军在县委书记高如松的率领下举行起义。翌日，当起义农军冲到茨河镇下街时，遭到国民党驻军的伏击，起义农军的土炮被雨淋湿不能点火还击。高如松鉴于这种情况，决定起义队伍撤出茨河镇，迅速转移。茨河农民起义后，国民党西北军岳维峻部伍月友旅进驻谷城县城，该旅彭怀玺团进驻石花镇。中共谷城县委决定集中全县的农民赤卫队，联合团会武装再次举行武装起义，集中兵力攻打石花镇驻军。为此，成立了暴动指挥部。由高如松任党代表，李麟、孟国夫任正副总指挥。5月18日深夜，起义队伍2万多人隐蔽进入指定位置埋伏。第二天拂晓，起义先头部队从东门摸进石花街内，干掉了驻军的哨兵，夺得迫击炮一门。起义农军当即调转炮口，向敌人驻地猛轰。镇内炮声一响，镇外伏兵四起，齐声呐喊，分别从西门、北门冲进了石花街。彭团首尾不能相顾，阵脚大乱，或跳墙逃走，或缴械投降，彭怀玺被暴动总指挥李麟砍死，余部逃往谷城县城。农军共毙伤彭团官兵300余人，缴迫击炮4门，长短枪200多支及大量弹药、粮食、衣物，农军仅伤亡20余人。石花起义胜利后，县委决定攻打谷城县城，成立了攻城指挥部。1928年6月19日，李实、高如松率领谷城各地赤卫队数千人，汇同周大贵、刘克明率领的团会武装共2万余人围攻县城，伍月友见起义队伍来势凶猛，即令所部撤进城内，凭借高大城墙坚守。起义队伍同城内守兵激战5昼夜，未克。7月26日，李实、高如松等再次率领2万多农民赤卫队和团会武装进攻县城，伍月友旅仍闭城坚守。起义队伍数次攻城未能奏效，但斗志不衰，愈战愈勇。8月3日，岳维峻部1个营从光化增援而至，守成驻军也倾巢而出，加上刘克明被李月友收买，率团会临阵叛变倒戈，致使起义农军四面受敌，死伤惨重，余部撤往老君山、绿洼一带。谷城县委吸取前两次攻城失利的教训，派人连夜和中共光化县委取得联系，请求他们牵制光化驻军，又派农军到庙滩、茨河一带阻击国民党军援兵。8月4日，以农民赤卫队和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约2万余人的起义农军，高呼“为烈士报仇”的口号，第三次分数路攻打县城。伍月友旅早已被农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所吓倒，急忙从东门突围，撤往光化地区。起义农军一部追歼残敌，一部冲进县城，来不及逃走的敌军和土劣束手被擒，国民党县长王信征仓皇逃走。起义农军砸开监狱，释放了被无辜关押的劳动群众。愤怒的群众还放火烧毁了县衙，拆毁了部分城墙。

8月中旬，桂系军阀马文德部和鄂北清乡军李纪才部先后窜犯谷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暴动群众，黄宗元、李麟等数百人惨遭杀害，李实、高如松等被迫转移外地。谷城起义军虽遭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但为后来建立以蕪山为中心的游击区创造了条件。

渐安起义

1928年4月22日，中共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组织发动渐安区农民就地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4月下旬，国民党常德县清乡委员会委员张芷青派遣短枪排到渐安区（今石板滩）搜捕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共产党员、县农民协会特派员廖训之正在渐安开展反清乡斗争，因坏人告密，被短枪排抓捕枪杀。中共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得知后，决定因势利导，举行武装起义。立即率数十名农民武装到达渐安，并召集当地农民协会会员100余人开会，宣布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包围了枪杀廖训之的短枪排住所，将敌排长刘雪堂当即击毙，其他人员逃散。起义队伍放火烧毁了刘雪堂的房子。紧接着，起义队伍又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其他土豪劣绅纷纷逃往县城和外地。

程溪起义

1928年4月26日，中共福建省闽南特委领导闽南游击支队和农民在南靖的程溪圩（今属龙海）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年2月下旬，蒋介石为镇压闽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浙江调国民党军第49师进驻闽南。程溪区的反动当局更加变本加厉，他们一方面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收取巨额鸦片捐；另一方面增辟土产品出口税，并由驻程溪区保安自卫分队长总揽其事。农民极为不满，怨声载道。闽南游击支队队长王占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区范围内积极开展抗捐斗争，要求减免捐税。反动当局不仅不减免，反借机抓走两个农民，激起民愤。4月24日，王占春召集南坑、后安、下叶等村农会组长会议，决定攻打程溪保安分驻所，砸烂捐税机构。

25日夜，南坑、东楼、后安、下叶村精选出100多名农民武装队员，集中到下星社。26日凌晨2时，队员们手执割笋刀、火药枪、单响枪、土炮等武器，在王占春带领下，悄悄包围了程溪保安分驻所。天将亮时，九湖邹塘武装农民30多人也赶来参加战斗。起义行动被一名哨兵发现，保安分驻所大门未打开，敌人的枪声即打响。在敌人密集火力的封锁下，起义农民一时难以接近。王占春加强政治攻势，不断向保安队员喊话。保安队员纷纷投降。起义农民很快占领了保安队住所，救出被关押的农友，缴枪7支，子弹一批，当农民武装加紧围攻程溪保安分驻所时，附近各村的农民武装和农会会员纷纷赶来支援，共达数百人，主动把守路口。程溪起义惊动了地方反动当局。27日，国民党军第49师派出1个连赶到程溪。28日，又派出1个团的兵力进驻程溪地区。起义军只好分散隐蔽。

宝安起义

1928年4月26日，中共广东宝安县委组织发动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年2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派巡视员阮峙恒到宝安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第一次起义的经验教训，选举了新的县委，调整了各区党的负责人，成立了士兵和工人运动委员会，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抗租、抗捐和抗税斗争。不少乡成立了赤卫队。4月初，省委派黄学增到宝安，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关于东江总暴动计划，作出马上起义的决定，并制定了《宝安暴动计划》。计划规定：响应东江各县起义，造成东江割据，先在一些区乡举行起义，然后进攻县城，形成全县总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起义时间原定为4月12日，因报省委未能及时得到指示而推迟。4月13日，中共广东省委致函同意宝安起义计划，要求宝安与海陆丰和惠阳同时起义。

由于起义时间推后，使得敌人有从容的时间进行防备。4月26日，6区的豪绅地主与国民党县兵包围了迳背，抓走区委、农会负责人钟永恩在县城南头杀害，并连续抓走我准备参加起义的人员，组织联团联乡，准备对付工农暴动。鉴于这种情况，县委、县农会于26日在丰和圩召开农民大会，宣布立即起义。各区农民武装先后行动起来杀土豪，没收地主土地，攻打国民党区乡政府。4区福永农民协会宣布没收全乡最大的反动豪绅潘乃昌的财物，潘闻声出逃；6区百余农民武装围攻迳背，击毙民团团丁4人，击伤2人。霎时间，各区乡的地主豪绅纷纷出逃，县长及地主豪绅纷纷到省城、虎门、深圳请兵。

中共宝安县委原计划把各乡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连续攻击福永、长圳、唐家村、唐尾围等地，再一鼓作气攻打县城，但由于事先发动的不够充分，原计划能够集中2000武装只集中了100多人。起义过程中队伍又有些伤亡，又未能得到惠阳、东莞等县的配合和声援，结果起义受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镇压而失散。

府海起义

1928年4月29日，府（城）海（口）地区的数千群众，在中共广东琼崖特委和海口市委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府海地区，是琼崖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昌起义后，特委先后派海明、李军委到海口指导工作。1927年8月17日，共产党员、红色工会会员潘子裕（潘绍昌）、郭仁蛟配合红军、赤卫队，在大街（今中山路）李香馆酒店门前击毙国民党军官1名。11月下旬，市委准备组织黄包车工人、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革命师生和爱国军人，发动府城起义。由于条件未成熟，特委于12月决定取消府城起义，并对市委进行改组，由蓝浚鋆接替柯嘉予市委书记的职务，周成钦、陈祖宪等为委员。1928年4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琼崖特委决定发动府海起义，要求海口市委加紧准备工作。4月29日，市委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然后又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数千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队伍从海口到府城，又从府城到海口，在近10公里的海府路两旁遍插各色旗子，高喊口号，散发传单。傍晚时分，起义工人在海口统一行动，放火焚烧国民党驻军营房六七间，并打死了数名前来干预的警察。驻扎在府城的国民党军蔡廷锴部两个营闻讯赶往海口镇压，刚到海口，府城又举行了起义。国民党军慌了手脚，乱作一团，两地不能相顾。当他们又匆匆赶回府城时，起义队伍已疏散。

在府海起义的同时，海口市郊党组织也发动工农群众配合市区行动。当晚，滨濂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兵分3路，一路拆除西线的清水桥，破坏敌人交通，阻敌援兵；一路到秀英炮台割断电线，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系；一路到附近村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打死了秀英地区4名反动分子。府城郊区的苍西、苍驿、仲凯等村的农民赤卫队枪毙了几名反动分子，并冲进当地最大的两个地主恶霸家，搜出其私藏的武器，将他们进行公审、处决。

答扬起义

1928年4月29日，中共广东琼崖定安县第6区委组织农军和农民群众2000多人，在琼崖红军一部的协同下举行起义。

1927年琼崖“四·二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第六师范学生、共产党员王明熹与魏邦义一起潜回家乡定安第6区，以位于岭口的母校答扬小学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中共定安县委派县东路讨逆革命军司令周典谟（又名周伯表）等到定安6区，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筹建区苏维埃政府。周等到任后，和王明高商量决定率领定安6区和7区农军攻打定安县城，由于受到岭口国民党程壁东民团的破坏，攻城计划未能实施。1928年1月，周典谟、王明熹决定在答扬小学召开庆祝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准备借会后“吃鸡粥”（海南岛风俗吃夜宵）之机，缴程壁东民团的枪械，除掉这一隐患。不料，这一行动计划被程壁东获知，会后他发动突然袭击，当场打死了周典谟，王明熹也身负重伤，不久，因医治无效身亡。此后，程壁东民团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狂，农军活动处于低潮。是年春末，中共琼崖特委派工业熹到定安6区恢复党组织和区苏维埃政权，开展武装斗争。由魏邦仪任区委书记，吴俊玉兼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祥德任农民赤卫队队长。1928年4月25日，严凤仪、张梦安等带领中路和西路的一部红军进驻定安6区，中共定安6区委决定组织赤卫队和群众在红军协助下举行起义，消灭岭口民团。29日凌晨2时，定安6区赤卫队和当地群众共2000多人兵分两路，在红军配合下，从南北两面包围了岭口民团的炮楼，敢死队悄悄地把事先准备好的柴草运到炮楼底下。鸡叫时分，红军开始喊话，劝程壁东投降。但程自恃炮楼坚固、武器精良，竭力负隅顽抗。于是敢死队员便把手榴弹投进柴草中，炮楼周围顿时燃起熊熊大火，里面的团丁乱作一团。由于炮楼系砖石建筑，火烧不透，炮楼还是攻不下来。于是，红军发起炮攻，轰塌了炮楼一角，炸死炸伤10多名团丁。敢死队准备从此洞口冲进炮楼，但由于民团火力猛烈，几次冲击未能奏效。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眼看炮楼快要被攻破时，岂料岭口山顶上赤卫队设立的作为联络信号的“消息树”被风刮倒，暴动队伍以为敌援军赶到，便决定收兵，民团乘机从后门遁逃。

答扬起义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把反动民团赶出岭口地区，拔掉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定安6区的一颗钉子，使区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

泰兴起义

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部署下，中共泰兴县委于1928年4月30日至5月3日，领导泰兴县黄桥镇东乡农民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3月初，中共泰兴县委在刁家网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县委书记沈毅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农民起义的指示精神。4月初，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偕省委特派员杭果人到如皋，传达省委发动农民起义的指示。4月中旬，如皋县委书记王盈朝在刁家网会见沈毅，两县商定在“五一”同时举行起义。泰兴以刁家网为中心，如皋以江安、卢港为中心，相互策应。随后，沈毅对起义事宜作了周密的安排。

4月30日下午，泰兴黄桥东乡的农民起义队伍，纷纷汇集于刁家网刁氏宗祠的广场。组成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农民武装，共有400多人，编为4个大队，由县委委员孟运怀、刁九善、戴奎、王庆生分别担任各大队的指挥员，沈毅任总指挥。每人各执武器1件，计有步枪5支、鸟枪、土枪几十支，余是大刀、长矛、单刀等，并配有土木炮1门。起义队伍列成四路纵队，各队前面都有几百大红旗迎风招展。沈毅腰插勃朗宁手枪，跳上用桌子搭成的“司令台”扼要地传达省委关于起义的决定和县委的起义计划。一声令下，起义队伍向龚家垛进发。突击队率先袭击了国民党古溪公安分局，缴获步枪6支，子弹500余发，并割断了各地通往黄桥的电话线。前往龚家垛的起义队伍和周围千余农民，包围了人称“大阎王”的刁智甫和“三强盗”的刁善甫2个恶霸地主住宅，高喊“拿阎王，抓强盗，今朝定要把仇报”的口号。狡黠的地主早已闻风逃逸。起义队伍当即分了两家的粮食和衣物，放火毁其宅第。至深夜，刘家空、东官垛、横家垛、东分界、西分界、杨何庄等处的20余户地主的房屋亦相继被烧毁。

5月1日，起义队伍兵分两路。所到之处农民们纷纷加入队伍，地主老财们见来势凶猛，早已逃之夭夭。起义队伍分了顾纬之、顾实家和古溪、周家庄、王家庄、野芹庄、秦家垛、西雁岭、谢家荡等地10余户地主的粮食和衣物。在钱家荡会师时，已达2万余人。

5月2日早晨，东乡的起义农民集结于分界。一路上，农民们群情激愤，在路过张厂、王厂时，放火烧了地主卢干卿、张钜卿、朱瑞芳、王仁甫、王重香、杨国卿等户。野庙垛的李吉庚、张玉山、张双山、张马山等人，率领当地农协会会员，用大刀砍死地主走狗张少泉后，又往蒋家庄烧了地主杨炳仁和赵家窑地主卢四儿的房子。至此，泰兴地区被烧的地主、土豪共86户，被分的粮食约100万斤以上。

5月3日，起义队伍准备去如泰交界的赵家庄与如皋的起义队伍会合。忽然如皋卢港市和泰兴震东市方向传来枪声，原来是国民党泰兴县公安局李亚东率1个中队警察奔袭耿家园。沈毅决定起义队伍立即转移。当敌人进至刁家网庄口时，起义队伍架在桥口的蛤蟆炮轰了一炮，后误将染料当火药，连发几炮不响，操炮人员因遭敌袭击而英勇牺牲，炮亦被敌人夺去。反动警察乘机进击，埋伏在村内的起义队伍予以英勇抵抗，双方激战数小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队伍不得不化整为零。当晚，沈毅等决定在敌人进行搜剿的险恶形势下，转移骨干，埋藏武器，待机再起。

泰兴起义震惊了反动当局，南通、如皋、泰州等地的公安大队齐集刁家网，先后枪杀群众200余人，逮捕数十名起义骨干和农民。6月25日凌晨，

沈毅在泰县北乡水荡花家舍被捕，28 日下午，被敌人杀害于泰州西教场刑
场。起义失败。

坝下起义

1928年4月下旬，中共福建省仙游县委领导和发动坝下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年春，仙游坝下农民在国民党政府、当地驻军及地方豪绅的层层勒索下，每亩烟苗捐高达20多银元，没有种烟苗的田亩也要勒收“田亩捐”。农民群众怨声载道，强烈要求取消烟苗捐。中共仙游县委决定由县委委员王于洁在仙游坝下率先组织农民抗烟苗捐起义。起义前，王于洁在坝下秘密召开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和部署抗捐行动，并成立了烟苗清算委员会。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坝下附近的象洋村公演莆仙戏，观众达数千人，这是发动起义的有利时机，于是党员和积极分子混入看戏的人群。戏开幕前，王于洁登上戏台，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烟苗捐。随即在台下的共产党员带领群众像潮水般涌向坝下捐税所，打砸捐税所的用具，要捐税员退回捐税款，并将捐税员押到坝下街、榜头街等地游街示众。几天之内，坝下各乡村掀起斗劣绅捐棍，清算烟苗捐款的浪潮，各捐税员纷纷退出浮收的捐款。坝下农民起义得到青年学生的热情支持。县城各校数千学生集会、游行，冲击莆仙烟苗捐局局长住宅和县署。

国民党仙游县政府对坝下农民起义极为恐慌，国民党海军陆战队驻莆田第2旅旅长林寿国下令镇压。5月10日，林寿国以1个连的兵力到坝下查缉惩办。王于洁、林步云等领导人转移到莆田县活动，中共仙游县委书记陈国柱也离开莆仙。

揭阳四月起义

1928年4月，在中共广东揭阳县委的领导下，揭阳县农军近千人发动了武装起义。

揭阳县农军在1927年4月和1927年底连续举行两次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之后，革命力量遭受很大损失。中共揭阳县委的3位领导人相继牺牲，县委领导机构陷于瘫痪。直到1928年3月间，揭阳县党组织才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当时，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中共潮梅特委将揭阳作为东江地区革命的斗争中心区域，并指示揭阳县委应用很大的力量去发动农民起义，以动摇敌人的后方，与潮阳、普宁、惠来的起义打成一片，并派员到揭阳县指导起义，为响应潮、普、惠总起义，中共揭阳县委经过研究，确定迅速组织在前两次起义中被打散的农军，在全县举行一次起义。并派人分头到革命活动开展得较好、群众基础较好的一、二、四区发动起义。

进入4月，起义接连爆发。在二区，县委组织工农武装几百人攻打炮台镇、登岗圩；在四区，县委组织几百名农军进攻新亨镇，烧毁国民党军驻地永顺楼及茂通街；在猴牯溜山、龙山等一带，参加过广州起义的田诗雁率领的一支武装队伍与当地革命武装结合，攻打当地民团，与敌苦战7昼夜，毙敌100多人；由颜汉章带领的游击队在桑浦山麓一带大力开展抗征、抗税、抗租活动，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一时间，打得敌人日夜不宁。一个月后，起义队伍被敌人打散，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

麟游起义

1928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麟游县发动和领导陕军甄寿珊部教导团一部举行了起义。

1927年7月，国民党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将部分共产党员派入尚未进行清党的甄寿珊部做兵运工作，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该团第1营营长王泰吉为党支部负责人。第1营3个中队的中队长和第2营第6中队的中队长均为共产党员。1928年3月，甄寿珊将教导团迁驻麟游县城。4月，王泰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指示，率第1营第1中队五六十人（其他中队有编制没有人）在麟游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击毙反动军官后，当晚离开麟游县城，经过崔木向礼泉县南坊镇方向急进，准备到陕南边境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当起义部队到达礼泉县五峰山下的南坊镇时，该镇地方民团100余人包围，有的被缴械，有的被打散，起义失败。

如皋起义

1928年5月1日至4日，江苏如皋西乡农民在中共如皋县委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是年1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制定了《江苏各县暴动计划》，规定上海近郊及南通、崇明、海门、如皋、泰兴等22个县要在年内准备起义。4月初，江苏省农委书记王若飞偕杭果人（化名张安志）到如皋视察，召集城乡负责干部，讨论举行武装起义问题。13日，如皋县委成立了起义委员会，主席团由王盈朝（县委书记）、顾仲起（南通特委军事委员）、杭果人（省委特派员）3人组成，为取得泰兴策应，王盈朝亲自前往泰兴联络。4月中旬，如皋、泰兴两县县委在泰兴县刁家网小学召开联席会议，确定起义时间为5月1日，起义地点泰兴以刁家网为中心，如皋以卢港、江安为中心。会后，两县县委分头发动群众，进行各项准备。起义前夕，如皋西乡农民在各地自发地发动了多次截夺地主田契、借据的斗争。5月1日，徐芳德率领四五百人，首先进攻驻文武殿的警察分队，毙伤警察5人，缴枪3支，并将文武殿焚毁。当晚，县委委员吴亚苏、苏德馨、顾仲起、王玉文等先后到达朝西庄，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如皋县起义总指挥部，顾仲起任总指挥。会后，起义队伍编成4个大队，分南北两路，南攻江安、北打卢港。南路约2000人，由顾仲起、徐芳德、杭果人、苏德馨等率领，先后攻下东燕庄和北小庄。北路起义队伍由王盈朝、朱恒敬、朱恒秀等人指挥，首攻蒋家埭，接着又打下了卢家庄，恶霸地主卢荫南闻风逃走。起义队伍打开地主的粮仓、橱柜，把粮食和衣服分给了贫苦农民。2日黎明，南北两路起义队伍在朝西庄福兴庵会师。县委决定：要与泰兴起义紧密呼应，继续扩大战果。于是又出击卢港，烧毁大恶霸地主卢锡三、卢植斋等8座庄园。3日上午，如皋县委召集在西乡的领导干部和农民协会的负责人以及群众骨干在起义指挥部孙严墩小学开会，研究如何进一步组织群众，联合泰兴农民西攻黄桥，得手后再与东乡农民夹攻县城，入城后成立如皋县苏维埃政权等问题。但是，卢庄与三十亩等地卢姓地主玩弄花招，3日下午，他们一面派人与起义指挥部接洽，假装愿意交出枪支，一面引来警察30多人偷袭指挥部。当时，指挥部正在开会，因事先缺乏准备被迫转移。当晚，起义队伍扫荡了三十亩等地的地主庄园。4日晚，起义队伍又东进申家

网、李家洋，烧毁3家地主巢穴。在4天的起义中，群众革命情绪高昂，先后参加起义的农民达二三人，计攻打敌据点两处，全歼地主“保卫团”1个，焚毁地主庄园27座，分了地主的粮食、衣物。但因国民党当局调动大批军警对如泰地区实行联合“清剿”，大肆烧杀淫掠，5日，县委决

定为保存革命力量、减少群众损失，暂时停止起义，已暴露的干部及农民骨干分散转移，未暴露的就地隐蔽。

这次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土地革命的方针深入人心，并在激烈的斗争中锻炼了干部和群众。

渭华起义

1928年5月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南、华县万余名农民和国民党西北军一部举行了起义。

192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武装起义的方针，派共产党员彭鸣、何云善、杨慰祖、张宗逊、王林、陈树功、陈树善、王子鼎到渭南、华县宣传武装起义的方针，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至1928年4月底以前，两县共建立了11个区委、94个共产党支部，有700多名共产党员。与此同时，为加强对国民党西北军的兵运工作，中共陕西省委还先后派共产党员刘志丹、唐澍、谢子兴、王泰吉等到国民党西北军新编第3旅许权中部开展兵运工作，在该旅秘密成立了中共党委，刘志丹任书记。3月，成立中共陕东特别委员会和陕东赤卫队。4月，决定发动渭华起义。下旬，刘志丹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利用陕西军阀李虎臣和冯玉祥交战之机，领导西北军第3旅和1000多名农民由潼关向华县高塘镇开进途中宣布起义。着，在华县高塘镇召开大会。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及刘志丹、唐澍、许权中和当地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宣布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将许权中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5月1日，渭南东原农民1万多人，在陕东特委领导和工农革命军支援下，于渭南崇凝集会，宣布起义，成立崇凝工农民主政府。随后，赤水、阳郭、三张、丰原、高塘等地农民立即响应，举行起义。6月上旬，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打退了国民党军两个旅的进攻。19日，又与前来进剿之国民党军3个师激战1天，后退出渭华地区，向洛南方向转移。7月初，在洛南城西北地区遭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唐澍牺牲。部队被打散，余部转入隐蔽斗争。

礼泉起义

1928年5月1日，在中共礼泉县委书记张秋月的领导下，礼泉县18000多名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7年1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礼泉县委书记张秋月以礼泉县城内的健行小学为基地，积极发动群众，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至11月底，建立了2个直属共产党支部和4个直属共产党小组及30多个农民协会组织。1928年4月，礼泉县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3万多人。5月1日，18000多名农民分3路包围攻打礼泉县城，一路攻打县城北门，有1500多名农民参加；一路攻打县城东门，有10000多名农民参加；一路攻打县城南门，有7000多名农民参加。经1天激战，起义农民伤亡很大，攻城未果。2日，国民党礼泉县县长朱家骥纠集县反动武装，在冯玉祥一位副官和100多名土匪武装的配合下，疯狂反扑，起义队伍被打散，余下的部分起义农民在中共礼泉县委的组织下，撤向礼泉县东乡开展隐蔽斗争。

百侯起义

1928年5月3日，中共广东大埔县委组织百侯缝业工人、各乡赤卫队、教师、学生与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5团共600多人举行了起义。

1928年，中共大埔县委发动年关起义后，国民党驻粤东军阀徐景棠派正规军进驻大埔，并通令各县组建民团。之后大埔县百侯区为镇压起义军，在杨竹史等人策划下，组建民团总部，并准备于5月3日召开百侯区民团总部成立庆祝大会。中共百侯区委将此消息上报中共大埔县委。县委决定调集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5团及百侯、石云各乡赤卫队，在国民党百侯民团总部成立庆祝会之际，举行百侯起义。5月2日，中共大埔县委在百侯砾下召开由第15团和各乡赤卫队干部4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起义计划。5月3日晨，在丘荣泉、李明光指挥下，工农革命军第15团及百侯缝业工会会员、赤卫队及上东区赤卫队、教师、学生联合会骨干共600多人，包围了民团指挥部——德记。反动民团以猛烈炮火阻击起义队伍，李明光当机立断，分兵两路，一路由连长丘宗海率领，直取团总杨竹史家；一路由区委军事委员丘荣泉率领，直扑警察所；赤卫队继续包围民团团部。丘宗海与一班手枪队在天亮之际，直冲杨竹史家大楼。杨竹史、杨大木等头目正筹划当天庆祝会安排，来不及反应即当了俘虏。杨大木企图反抗当场被击毙。暴动队伍在丘荣泉指挥下，冲进区警察所时，击毙团丁2名，将警察全部缴了械。在民团总部负隅顽抗的团丁见团总被捕，亦纷纷逃散。这次起义缴获长枪30多支，短枪4支，没收了杨竹史等土豪劣绅家产，暴动队伍无一伤亡。解决战斗后，东路第15团张贴安民告示，宣传土地革命政纲。群众欣喜若狂，“刷辉生、杀竹史、捉学甫、剥典承、枪毙杨翥修”的口号震响百侯街。中共大埔县委为进一步发动群众，于百侯、枫朗召开群众庆祝大会，处决了民团团总杨竹史，群情振奋。

石门南乡起义

1928年5月5日，中共湖南石门县委根据中共湘西特委的指示，组织农民武装在石门南乡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初，中共湘西特委和石门县委在“割据石门，巩固湘西暴动”计划中，把割据南乡作为重点，派县委委员袁任远到南乡秘密开展工作。先后成立了中共花藪等党支部，秘密组织训练了600多游击队员。2月28日，石门县委制定了南乡起义计划，并积极进行起义准备。5月5日，国民党石门县署派警备队8名士兵带着共产党员名单，来到花藪乡寺垭铺捉人。袁任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机举行起义。当晚9时，石门县委书记曾庆轩和袁任远、余策源等10余人从花藪樟木塌赶至寺垭铺，包围了警备队士兵的驻处，破门而入，砍死8名警备队士兵。接着，暴动队将列有县警备队罪状的布告和宣传标语张贴在大街上。

第2天，中共石门县委在南乡召开会议，决定举行南乡总起义，由曾庆轩担任起义总指挥，各区游击队配合行动。15日黄昏，余策源等率领几十名游击队员，分两路悄悄摸入南乡反动机关驻地夏家巷，砍死哨兵，打开反动分子集居的杜家饭店大门，击毙恶霸阎谷生，砍死乡团总梅春圃、清乡委员陈海秋和4名团兵，缴获步枪4支，手枪1支。在夏家巷暴动的同时，福田、白洋、磐石等地纷纷暴动，处决了一批反动豪绅。靠近石门南乡的一些边界地区也纷纷响应，举行暴动。

南乡起义胜利后，石门县委宣告组建湘西工农革命军第4支队，余策源任司令，袁任远任党代表（后陈昌厚），下设2个中队，共500多人枪。此时，福田、白洋、磐石、花藪、蒙泉等区也组建了游击中队。接着，第4支队通过开展策反工作，收编了在南乡势力最大的地方武装侯宗汉部和陈国衡部。到6月底，第4支队迅速发展成为900多人、600多支枪的强大队伍。与此同时，南乡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农民协会共21个。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级农民协会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兴办夜校，组建赤卫队等，支援和配合第4支队的武装斗争。

旬邑起义

1928年5月6日，在中共陕西省旬邑县委的领导下，旬邑县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7年冬，中共旬邑县委派共产党员吕佑乾、吕凤歧、王浪波、蒲允升等到该县郝村、蒲家堡等地宣传群众，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至起义前夕，建立了郝村、蒲家堡2个共产党支部，有30多名共产党员。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在全省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举行起义。5月6日，中共旬邑县中心党支部书记吕佑乾、许才升等领导140多名农民在该县群众基础较好的郝村、蒲社、班村、庄河、湾间等村庄举行起义，杀死恶霸地主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催粮员，没收地主土地、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调动了农民参加起义队伍的积极性，队伍扩大到300多人，遂成立起义总指挥部，许才升任总指挥。7日拂晓，起义队伍攻占旬邑县城，镇压该县县长李克选等，解救被关押的群众，开仓济贫。15日，吕佑乾召开党的中心支部会议，宣布成立旬邑县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主席，吕凤歧任秘书长。将部分起义队伍编为工农红军渭北支队，程永盛为支队总指挥，下辖3个连，程永延为第1连连长，程双邱为第2连连长，程子英为第3连连长。24日、25日，渭北支队遭到国民党旬邑县代理县长李涣章民团的围攻，加之起义队伍内部有人叛变，起义领导人许才升、吕佑乾，吕凤歧、王浪波、王延璧、程永盛、程国柱等7人被杀害，起义失败。

郎溪起义

1928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郎溪特别支部在郎溪地区领导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中共郎溪特别支部成立，夏雨初任支部书记。同年11月，中共江苏省宜兴县委领导的宜兴秋收起义失利后，即派宜兴中学葛琴（葛和声）、史济殷、范作禹（范迪斋）、季梅（史剑霞、又名史耀华）、吴懿君（潘丽华）等，到郎溪协助郎溪特支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共宜兴县委的帮助下，郎溪特支经过充分的酝酿，确定了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武装斗争，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的斗争方针。毕桥镇上有个陈文，因目睹连年军阀混战，经常有散兵游勇危害百姓，便带领当地群众自筹经费购买枪支，组成毕桥民众自卫队，多次击败军阀败兵的骚扰，深得地方民众拥护。到1927年6月，陈文率领的民众自卫队由开始时的几十人发展到300余人，并改名为自卫大队，陈文任大队长，下设四个中队。为了筹集暴动的武装力量，夏雨初等争取陈文参加武装起义。1928年4月下旬，中共郎溪特支对陈文的武装进行了整编，又挑选200名农会会员，组成500人的郎溪农民自卫团，陈文任团长，夏雨初任党代表，下设四个营，在毕桥一带秘密集结待命。同时，特支成立暴动指挥部，夏雨初担任总指挥。5月9日晨，陈文率领农民自卫团从敌人防守力量较弱的小南门发起进攻。这时，由程金鹿率领的工人突击队，里应外合，将锁在城门上的大锁击落，暴动队伍立即涌进城内。暴动队伍进城后，解除了县警察局和县商团的武装，缴获了数十支枪。随后，夏雨初、陈文即率领起义部队打垮了县政府大院前门的钟鼓楼国民党县政府常备队，县长粟伯龙和商团团长刘润泉仓皇潜逃，县教育局长周孝安束手被擒。暴动队伍攻克郎溪县城后，暴动指挥部改为工农委员会，夏雨初担任执行主席。工农委员会发表了《告全县同胞书》，提出不交租，不还债，不纳一切捐税；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推翻豪绅军阀国民党政府，杀豪绅地主，肃清封建势力；打倒奸商，打倒盐公堂，自由买卖；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创造自己的天下。为了庆祝胜利，扩大政治影响，工农委员会在县政府钟鼓楼广场召开庆祝大会，将民愤极大的县教育局长周孝安和劣绅卢小泉公审枪决。工农委员会打开国民党政府的“积谷仓”，将1000余担大米救济了贫农。同时，砸开了县监狱，释放“政治犯”和普通人犯100余名。县商会还为农民自卫团筹集了两万现洋的军饷。

5月17日，国民党驻芜湖的第37军一个营会同宣城石逢山所辖的一个营星夜开往郎溪，对农民自卫团进行“围剿”。第二天，广德、溧阳两县也派出武装，配合正规军合围郎溪城。夏雨初、陈文指挥农民自卫团击退敌人3次进攻，但寡不敌众，孤城难守，于5月19日夜从东门突围到宣（城）、郎（溪）、广（德）、宁（国）交界的鸦山。突围部队到达鸦山后，夏雨初去上海我党中央，陈文率领暴动队100余人在鸦山岭坚持斗争。9月中旬，国民党又派第9军一个旅，从高淳、溧阳、广德、宣城四县向鸦山合围。陈文率部在宣城的双桥、莲花塘和鸦山岭等地与敌激战数日，弹尽粮绝，伤亡惨重，起义失败。

淳化起义

1928年5月9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淳化县1万多名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7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王炳南到淳化县第1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在该中学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的支部。1928年3月，共产党员姜建平领导建立了中共淳化区委，发动农民抗粮、抗捐、抗税、反对拉夫的斗争。5月9日凌晨，淳化县东北乡、西北乡、北乡以及县城周围的十几个村庄的1万多名农民，在共产党员赵新三、郭天有的指挥下，在富平县农民自卫团团长田望秀所率40多人的支援下举行起义，分3路进攻县城南门、东门、北门，迫使县长段桂田答应减免粮款，但拒不打开城门和开仓放粮救济农民。在此情况下，中共淳化区委决定继续攻打县城。11日，攻占县城，县长段桂田带领部分亲信、随员仓皇逃走。接着，成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赵新三任主席。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极为震惊，急令国民党军田金凯部骑兵团团长过梦成，伙同新委派的淳化县县长石翊、保安队队长张合宽等七八百人，在起义队伍的叛徒杜恩聪的引导下包围了进攻淳化县城的起义农民。因寡不敌众，起义队员在突围中大部被打散，田望秀等3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

崇贤起义

1928年5月10日，在中共江西兴国区委的领导下，崇贤党组织领导人谢云龙等组织该地区的农民武装举行了武装起义。

兴国是江西革命运动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到1927年初，这里的农民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共党的组织也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大革命失败后，兴国地区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白色恐怖所吓倒，继续组织领导农民群众进行斗争。面对各地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兴国反动当局和各地反动地主武装势力相勾结，在各重要乡镇纷纷建立起靖卫团，妄图扑灭革命力量。1928年4月，中共兴国区委在冰心洞清静观台召开扩大会，传达中共江西省委关于武装割据赣西南的计划，会议决定在兴国举行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会后，与会代表返回各地，积极筹备起义的有关事宜。中共崇贤党组织领导人谢云龙等认为，崇贤农民群众基础较好，革命运动发展较快，应在崇贤地区首先举行起义，消灭崇贤靖卫团，打击兴国及崇贤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5月10日夜晚，谢云龙与李挺组织领导崇贤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在兴国红军第7纵队的支援下，在打入崇贤靖卫团内部的中共党员杨祝三的配合下，里应外合，首先击毙靖卫团团总曾文绚，接着一举全歼靖卫团，缴枪30余支。消灭崇贤靖卫团后，起义队伍士气大振，附近的农民群众纷纷前来参加，起义队伍达到500多人。随后，起义队伍将反动大土豪邹瑞淮的住宅围起来，火把通明，喊声大震，起义群众手执刀枪梭镖冲进土围子，邹瑞淮闻风丧胆，逃之夭夭。5月11日拂晓，起义队伍顺利占领了崇贤圩。接着，起义队伍在万寿宫门前的空坪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处决恶霸地主，并将没收的粮食、布匹、金银等分给贫苦农民，广大群众兴高采烈地分享到革命起义打土豪得来的胜利果实。当天，在邹瑞淮的当铺里公开宣布成立崇贤农民协会。

崇贤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兴国城乡反动势力，进一步推动了兴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

广福桥起义

1928年5月16日，共产党员张学阶等组织发动工农武装在湖南慈利广福桥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2月，贺龙由上海赴桑植途经石门县官渡桥时，致信慈利县广福桥共产党员张学阶，指示其秘密恢复该区农民协会，建立武装，待机举行起义。张学阶根据贺龙的指示和中共湘西特委的指示，与共产党员杨文林等取得联系，在4月初恢复了广福桥属区狮岩乡农民协会，张学阶任委员长。还成立了王渔堂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工农武装发展到50多人。经与湘西工农革命军第4支队联系，正式成立第3游击大队，张学阶任大队长，下辖4个中队。不久，游击大队发展到300多人，20多支枪。5月16日，第3游击大队在广福桥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夜袭击离广福桥不远的石门县官渡桥杜家湾，打死恶霸杜赤书，没收了其全部浮财。此后，游击大队又先后处决10余名反动分子，没收了50余户地主豪绅的财产，并对10余户地主豪绅处以罚款。第3游击大队的起义震怒了反革命势力。慈利县一都区团防头子张福斋、清乡队长朱仁楚率部配合县清乡队，对第3游击大队进行“围剿”。游击大队英勇抗击，毙伤部分敌人。但游击大队也伤亡不少，遂撤出广福桥转移至一都区。6至7月间，游击大队第3中队两次攻打慈利一都区大恶霸地主朱文甫院宅，缴枪一批，朱文甫逃跑。此后，游击大队又伏击了县挨户团和一都区挨户团，毙伤团兵数名，救出被关押的群众上千人。7月底，慈利反动当局出动保安团及保安队1000余人，兵分3路向广福桥取包围之势，在敌人残酷镇压下，大批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起义领导人张学阶英勇牺牲，广福桥起义失败。

舒溶溪起义

中共溆浦县委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指示，于1928年5月19日在舒溶溪发动农民武装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1月，中共溆浦县委成立，张子平任书记。县委成立后，一面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很快建立了一支近2000人的农民武装。1928年年初，根据中共湘西特委关于积极筹备暴动的指示，中共溆浦县委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4月中旬和5月上旬，中共溆浦县委两次召开会议，检查落实起义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研究制定具体起义计划。并决定于5月24日在舒溶溪、均坪等地首先起义，得手后便攻打县城，夺取县政权。后因情况发生变化，县委决定提前举行武装起义。5月18日晚，县团防局派人到舒溶溪抓共产党员，县委成员武德章见起义时机成熟，立即组织匡家坨及附近各村的农民武装300多人奔赴曹家溪，将敌人包围。经过一番激战，击毙敌11人，俘1人，缴枪11支、子弹1000余发，首战告捷。接着，武德章率百余武装奔赴舒溶溪大恶霸龙明汉家，将龙明汉处死；俘敌4人，获九箍炮1门，步枪4支。农民武装乘胜奔袭均坪第3区团防队，团兵溃败，俘团兵1人，缴枪1支。继又袭击了明家塘豪绅刘德侯家，缴枪2支。20日，农民武装在坐岩垵与当地团防队伍发生激战，因敌强我弱，农民武装伤亡30余人。

鉴于当时的紧急情况，中共溆浦县委决定，挑选100多名青壮年，组成精悍的游击队，由武德章任总指挥，谢家松、顿钦庭分别担任队长、副队长，转移至沅陵、辰溪、溆浦三县交界的九谷尖山坚持斗争。

亭旁起义

1928年5月22日，在中共浙江宁海县委领导下，以宁海县的亭旁（今属三门县）为中心的数千贫苦农民，举行了起义。

亭旁，位于宁海县南部边陲，地处宁海、临海、天台3县边界。1928年5月15日，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负责召集台属6县负责人会议）召开宁海县委扩大会议。会后，管容德和宁海县委特派员杨毅卿、县委常委包定等到亭旁了解情况。当管容德等看到亭旁农民的情绪和斗争积极性，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于5月20日夜，在谷仓岭集中亭旁、海游、珠吞、桑洲四区部分武装人员约250人，举行起义预备会议。会上决定设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拟订了起义的总纲领、口号；并要求亭旁、海游、珠吞、桑洲各区分头做好准备。管容德还亲自起草亭旁游击战争计划，打算于农历四月发动起义。5月22日下午3时许，任家支部负责人到亭旁区委报告，说要在当天晚上农会开平菜会时，准备把反对平菜最厉害的地主豪绅任禹玉、任友端诱入会场，将他们打死。区委和在亭旁的县委常委包定都认为这样做可以壮大声势，于是决定调集各村的农民武装协助执行这项计划。是晚，只集中武装人员12人，包定即率这12人先到任家。平菜会正在开，地主豪绅也来了，包定等考虑到武装人员太少，未曾下手。至夜9点半，向往家进发的武装农民有60余人，在离任家约半里地的路上，接到包定派人来说会已开过，地主豪绅已走了。于是，大家快然而回。当夜区委又决定于次日夜继续行动。23日夜11时，农民武装150余人先在丹邱寺集中，然后向任家进发。队伍首先包围了任升初家，任已逃避。接着，又包围了任禹玉家，准备收缴其武装，因任禹玉房屋高大坚固，又有武装防守，无法突破。包定除留下部分人员继续围困任禹玉家外，其余大部转攻地主任友端家，但他也跳窗潜逃，此时大家怒不可遏，就一把火烧了任友端的房子。5月24日上午，管容德、杨毅卿、包定在南溪召集亭旁区委会议，决定成立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及红军指挥部。由包定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指挥，梅法金、任畴任副总指挥。革命委员会下设5个部。5月26日拂晓，亭旁武装农民占领亭旁，上豪劣绅闻风逃遁。千余群众汇成一条洪流，齐集城隍殿。县委宣布解散所有反动机构，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面镰刀斧头大红旗，在原国民党亭旁区分部门前升起。革命委员会向群众出示布告，逮捕梅长恕、邵泳棠、杨雪亭等反动豪绅。接着，在亭旁街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这时，宁海县桥头胡、梅林一带也组织了六七百农民武装，准备参与起义，并派出交通员与亭旁联系。当亭旁农民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外逃的包子聪、任禹玉、任友端、杨雪亭等急忙向宁海县政府告急。宁海县长黄懿范即密饬驻南乡的军、警侦查追缉，同时电求国民党省政府、省防军司令部增兵，对亭旁农民起义队伍进行“围剿”。国民党省政府得悉后为之震动，省主席何应钦密令省民政厅暨省防军严缉围剿亭旁农军。5月26日，国民党驻海门的省防军第5团和临海县的国民党军集结临海的车口、东胜等地，准备进犯亭旁；宁海的省防军已向亭旁进发。亭旁处在国民党军夹击之中。下午4时，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总指挥部获悉情报，立即决定有计划地将部队撤至亭旁外围，拟待敌军窜入亭旁时再包围上去。27日，珠吞、桑洲、前童和天台县洪畴戴、欢吞、临海县的大田、两头门等地1000余人汇集于珠吞街，拟从背后袭击围攻亭旁的国民党军队，队伍走到洋顺（今

珠岙镇上胡村)，接到亭旁农军已撤出的消息，于是各路农民武装就地疏散。

28日黎明，郑俊彦连占领亭旁街后，强抢豪夺，喧嚣一时。下午，上模一部农军抵陌更、狮岭时，与从亭旁来的敌军接火。敌军见农军固守山头，只在下打枪，却不敢上山，直至天晚，旋退回亭旁。次日晨，敌军又来甫溪，向驻守在上马攀山头的农军进犯，亦未得逞。后来，临海方面的敌军由金坑岭抄袭亭旁起义军的后路。在敌人大举进攻之下，农军弹尽粮绝，指挥部决定武装人员化整为零，疏散隐蔽。

29日，撤到珠岙的管容德、包定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召开县委常委会，总结了亭旁起义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转入地下斗争的决定。

官田起义

1928年5月26日，中共江西省吉安县委在官田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11月，吉安党组织派梁忠林、王庭来官田地区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官田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群力”支部，刘生和任支部书记。1927年2月，官田周围的萍州、平田、林下等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中共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吉安县委派曾山到官田组织农民武装起义。曾山与“群力”党支部以及从武汉军校回家乡的中共党员肖世梅、肖之铎一起，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和农协组织，秘密开展“三杀五抗”的斗争（杀地主、杀劣绅、杀贪官污吏，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先后建立了萍州、淡江、芳井等16个党支部，并秘密成立了中共永福区委。为尽快发动群众组织起义，1927年12月间在官田淡江组织了一个大队，大队长肖世梅，副大队长杨世德，政治委员肖志铎。1928年5月26日晚，官田、安塘、永阳、敖城一带的各村农协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共700余人，在曾山、肖世梅、王庭等人率领下，分路包抄到下罗村进行抢劫活动的国民党军10余人，俘4人，缴枪4支，余敌逃跑。接着，起义农民镇压了东肢头村大地主刘玉山。

1928年7月，红军一个营途径敖城，帮助当地党组织成立了100多人的赤卫大队。赤卫大队在肖世梅等人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天宝寺起义

1928年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涪陵县委的领导下，涪陵天宝寺农民举行了起义。

早在大革命时期，该县新盛（今新妙）区的几个乡，在共产党员李蔚如的领导下，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有数千人，不断地进行抗捐抗税斗争。1928年初，为加强对涪陵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先后派皮斌、钟善辅到新盛，以教书作掩护，同教师郑益阳、陈竹筠等人组成共青团区委，皮斌任书记。他们领导农民开展抗丁、抗粮、抗捐、抗税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不久，涪陵县委决定以三合、大顺两乡的农民为骨干，联络蔡德芳的“绿林”队伍，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罗星樵、任锦竹等5人组成指挥组，负责起义的军事工作，皮斌、郑益阳负责联络工作。5月下旬的一天，天宝寺起义爆发，田致远、田良才等带领200余人在三合场抓捕恶霸地主戴松云、戴富州，火烧戴富州宅院，占领天宝寺，打出武装起义的旗帜。之后，起义军在强大敌人的镇压下被打散。

谷官屯起义

1928年5月，中共山东省鲁北特委在高唐县谷官屯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

北伐战争开始之后，中共鲁北县委在高塘、夏津一带开展农运工作，发展党团组织，建立了中共高唐县谷官屯党支部。党支部成立后，即对当地的群众组织“红枪会”进行了改造工作，将“红枪会”改名为“红团”。1928年春，在中共谷官屯党支部领导下，提出了“抗捐抗税”、“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开展了减租减息、镇压土豪劣绅的斗争。鲁北县委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将“红团”改为农民协会，并建立了高唐农民自卫团。自卫团设总团部，下辖两个分团，共1000余人。第1分团设在谷官屯，600余人，团长金谷兰，副团长姜殿甲、靳兴荣，下设7个大队。第2分团设在高塘县与恩县（今属平原县）交界的郑官屯、北镇一带。自卫团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政治主张，镇压了一批土匪恶霸、大地主，打击了罪恶多端的盐巡。

1928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指示鲁北县委抓紧利用军阀张宗昌的军队北撤、蒋介石的军队尚未到来之机，组织鲁北农民起义。4月28日，鲁北县委改为鲁北特委，李春荣任书记，李宗鲁、李剑池、赞玉国、金谷兰、杨瑞亭等为委员，特委机关设在谷官屯，并定于5月4日组织农民自卫团举行总起义，摧毁高唐县的反动势力，建立工农革命根据地。特委委员分别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但由于泄密，起义消息被敌人侦知。国民党高唐县长张振生连夜召集警备队长李长兴、土匪头子李彩题（又名李九）密谋，确定在自卫团起义之前，摧毁起义队伍。

5月3日晚，李彩题带领众土匪包围了自卫团一个大队的所在地范庄，解除了该大队的武装。4日凌晨，李长兴、李彩题带领配有马队的近千名军警和土匪，包围了自卫团总部所在地谷官屯，发起突然袭击。正在开会的特委书记李春荣、自卫团长金谷兰、副团长姜殿甲等主要领导人分头突围。金谷兰率大部分起义队伍保卫特委所在地，姜殿甲带一小队人到谷官屯东栅栏阻击敌人。自卫团战士用红缨枪、大刀、铁蒺藜锤和少量步枪毙伤敌几十人。但由于敌众我寡，加之自卫团员没有全部集中起来，未能有效地反击敌人，致使自卫团总部、特委所在地和金谷兰的住宅等被敌人烧毁。突围中，李春荣、姜殿甲等16人牺牲，金谷兰带领大部分群众冲出包围，后率部分人员转入地下斗争。

兴国起义

1928年5月至1929年2月，中共江西省兴国县区委在江西工农红军的配合下，在该县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中共兴国特支接到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后，召集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举行“羊山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研究会后行动方针，提出了“抗租、抗债、抗税、抗捐、抗息”的口号；派遣共产党员打入“靖卫团，分化、争取“三点会”武装。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有些中共党员担任了国民党县政府的要员；有些中共党员当上了各地靖卫团的团总、教官、中队长等。赣西南一带闻名的绿林武装“三点会”中的许多成员也倾向革命。革命的气氛弥漫了全县城乡。

1928年4月，中共兴国县区委在兴国具冈乡的冰心洞召开了区委扩大会，史称“冰心洞会议”。中共赣西特委委员、东固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西省委武装割据赣西南的计划，决定在兴国举行起义。会后，与会代表返回各地组织起义。

1928年5月10日夜，崇贤党组织领导人谢云龙等领导崇贤农民举行起义。是日夜，打入崇贤靖卫团当团总的共产党员杨祝三谎报军情，将靖卫团团总曾文绚骗出家门，在前往团部途中，被事先埋伏的游击队员当场击毙。红军第7纵队于11日拂晓顺利占领了崇贤圩。崇贤各村农民群众500多人，在农会的组织下，手持梭标、棍棒，涌上街头。当场处决了恶霸地主罗爵高、罗廉杨。随后收缴了恶霸邹瑞板的枪16支，将其家产没收分给群众。当天，成立了崇贤农民协会。

1928年10月25日，在中共党员余丕生、侯海藩、张汉超、石桂堂等人的领导下，鼎龙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时鼎龙靖卫团也宣布起义（团长张汉超是中共党员，团副吕德贤也倾向革命，靖卫团早已被共产党掌握）。10月25日，正逢鼎龙圩集市，鼎龙秘密农会会员数百人随着人群涌进圩镇。中午，70多名农会骨干分别控制了4条圩口，其余会员搜捕了正在圩中各茶楼酒馆吃喝玩乐的30余名土豪劣绅。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并将几名首恶分子处决示众，对其余土豪劣绅处以罚款罚谷，分给穷苦工农。

1929年2月6日，中共党员肖子成、钟能俊、钟能铜、钟瑞佳等率领300余名农民协会会员，包抄了大土豪钟瑞冰的住宅，收缴了钟家的长短枪支，罚谷100余担，罚款3000多银元，分给贫苦农民。次日，起义队伍进驻永丰，召开群众大会。此后，这支队伍转战林山、活龙等地，捕捉土豪劣绅。后转战兴国西北乡村，发展至700余人，改为赤卫军。

1928年10月初，共产党员黄家煌以中共兴国区委名义在燕子窝徐家祠召开了全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在兴国县城举行起义。12月19日下午，江西红军第2团和赣南红军第15纵队500余人、300余枪，在县城东30公里的东村圩街口集合，由团长李绍九宣布了奇袭兴国城的计划与行动命令。20日凌晨，起义队伍突然发起攻击，在打入靖卫团的中共党员及事先埋伏在城内的红军第2团20余名战士的协助下，迅速攻取东门，蜂涌入城。驻守城北瑶冈的靖卫团队一面仓卒抵抗，一面向赣州方向溃逃。县长黄健乘夜色逃出县城。起义队伍在陈奇涵、黄家煌、李绍九、李文林等人领导下，迅速控制了县城，逮捕了大批反动分子，收缴了大批枪支。清晨，各地农民协会会员和群众进入县城出席群众大会，大会处决了几名反动分子。起义队

伍砸开了县衙监狱，释放无辜群众 200 余人。第二天，又收缴了分散在各个团丁家中保管的商团枪支 110 余支。兴国县城起义的胜利，震撼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统治。国民党驻赣新编第 7 师刘士毅部急调 6 个连的兵力进攻兴国。为保存实力，起义队伍及时撤出兴国城。1929 年 2 月 9 日，江西红军独立第 2 团再度攻克兴国县城，后部队移至兴国的莲塘山村，于 15 日与赣南红军第 15、第 16 纵队会合。会合后，以第 15、第 16 纵队为基础，加上兴国、桥头一部分暴动赤卫队，从红军第 2 团中抽出部分骨干，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 4 团，由段起凤（段月泉）任团长，金万邦任政治委员。全团 400 余人，300 余支枪。不久，红 2 团留在东固，红 4 团返回兴国活动。

君埠起义

1928年5月，中共君埠支部在江西省永丰县西南部的君埠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成立了中共君埠支部，书记李超群。不久，即与中共永丰区委取得联系。中共永丰区委立即派区委委员吴江（化名胡志伯）来到君埠，传达了区委关于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指示。会后，党支部成员分别到君埠、田心、上田、安田、铁炉下、淮冠木等地秘密组织农民协会、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另外从赤卫军中挑选出20多个精悍队员组成武装常备队。

1928年5月，在中共君埠党支部的领导下，郑子能、毛光篮、陈策等率领常备队、赤卫军和农协会会员近百人举行起义。起义队伍迅速包围了君埠土豪陈先贞、陈继假、陈叶来的住宅，没收其粮食、财物等分给贫苦农民，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土豪的罪状，处以罚款。第二天，靖卫团团长李正全率该部捕捉革命群众。君埠党支部毛光篮等人组织力量帮助群众隐蔽。6月间，毛光篮率常备队到铁国、陂头、山岭、横坑等地捕捉了吴祖万等10余个地主豪绅，首要的予以处决，其余土豪给予罚款，并将其家财没收，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君埠的大田、银坑等地的农民也相继举行起义。7月，永丰靖卫团刘明德纠集宁都、兴国以及永丰藤田、沙溪等地的靖卫团，联合向君埠进攻，农民武装斗争遭受失败。

浙南起义

1928年5月至9月，中共永嘉、瑞安、平阳、温岭等县委员会在浙江省南部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多次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初，中共永嘉、瑞安、平阳、温岭等县委员会相继恢复和建立。5月，根据温州中心县委员会作出各县联合起义的决定，永嘉、瑞安、平阳等县的中共党组织先后领导本县农民举行起义。永嘉县1000余农民在中共党员雷高升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并向温州进军，准备袭击县城，因遭反动地主武装拦截，起义队伍撤回原地；26日，瑞安县1000余农民在中共党员林直斋率领下举行起义，烧毁恶霸地主住宅，缴获部分枪支；6月27日，平阳县1000余农民，在中共党员王国桢、叶挺鹏率领下，手执各种武器，兵分3路攻入平阳县城。为避免过大伤亡，起义农民主动撤回农村；29日夜，宜山区100余农民举行起义，袭击金乡警察所，缴枪22支。8月，永嘉县五村胡协和、胡振盛等20余人，在南溪沙头区霞渡潭举行起义，袭击当地警察所，击毙所长，缴枪20余支。9月，五岩、岩坦、南岸等地农民武装200余人，在永嘉县南溪成立两个大队（手枪及步枪大队），番号为“浙南红军”。瑞安、平阳等县又先后建立一些农民赤卫队，与浙南红军相呼应。12月，浙南红军遭到国民党保安第4团1个营“围剿”，红军被打散，余下100余人到五岩坚持斗争。

大堰埧起义

中共湖南澧县县委于 1928 年 5 月在大堰埧组织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8 年初，中共澧县县委在大堰埧发展了孙位东、张谦诚、游述益等 10 余名先进分子入党，建立了以张谦诚为书记的党支部。随后，县委派孙位东等共产党员打入团防局。不久，孙位东担任了团防局长。团防局武装实际成为中共澧县县委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1928 年 5 月的一天，在中共澧县县委委员李于组织发动下，数十名暴动队员在大堰埧举行起义，起义人员在街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此时，打入团防局担任局长的共产党员孙位东等人暗中配合，处死大恶霸和反动头目各一人之后，暴动队员分散隐蔽，在农村继续坚持斗争。

太浮山起义

1928年5月至6月，在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湘西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临澧县太浮山地区领导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8年2月下旬，中共湘西特委派陈昌厚、郭天明、袁任远、汪毅夫来太浮山地区开展武装起义工作，在临澧县大浮山地区的立龙岗成立中共第2区委和第2区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第2游击大队（后改称湘西革命军第4支队第2中队），共有游击队员96人，长短枪200余支。5月初，第2游击大队在临澧、石门边界地区，打土豪、杀劣绅、夺武器，至6月底，这支游击队发展到600余人枪，成为湘西革命军第4支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形成以太浮山为中心，纵横100余公里的武装割据的局面。6月，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到临澧，重组中共临澧县委，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员100余人，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以策应太浮山区的武装割据。7月，湖南省当局调集李云杰、李韞珩两师和附近5县地方武装5000余人进行大规模清剿。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和夜战偷袭等战术，打过一些胜仗。后因内缺给养，外绝援兵，收编的侯宗汉部叛变而遭失败。8月，张三烈、陈寿山等率数十名游击队员分别突围，到达湘鄂边与贺龙领导的红军会合。

澄城起义

1928年5月底，在中共陕西东府特委的领导下，澄城、大荔、朝邑、蒲城等县的农民和红枪会成员举行了起义。

1928年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成立中共东府特委后，即派共产党员参加改造红枪会。5月底，东府特委领导澄城、大荔、朝邑、蒲城等县的5000多名农民和红枪会会员，包围驻澄城、韦庄城的国民党军赵桂堂部，经激战，俘虏了赵桂堂部营长范子平以下20多名官兵，缴枪七八十支。被围困在韦庄城内的国民党军赵桂堂部拼命突围，在起义队伍的猛烈打击下，粉碎了敌人的突围，起义取得胜利。

潼南起义

1928年6月6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四川边防军第2混成旅的共产党秘密组织在潼南双江镇发动该旅2个团举行了起义。

1926年12月，刘伯承领导的沪顺起义失败后，川军第50师第20团被第28军师长李家钰改编，后扩大为四川边防军第2混成旅（瞿联承任旅长）。大革命时期，这支部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沪顺起义，该部受损失较小，共产党的组织也较完整。1928年曾在第20团任秘书的李鸣珂，奉中共中央指示回四川担任中共省委军委书记，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后被省委派回第2混成旅工作。李鸣珂派共产党员赵子文、范弘先、李载甫、李伯容到该旅，发展第10团团团长刘文仕、第11团团团长秦仲文为共产党员。中共四川省委派主要负责人张成熟和军委成员任巡犹等到该旅，帮助建立共产党支部和特支。同时对官兵进行革命教育，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起义的准备。6月6日晚9时，该旅的第10团、第11团举行起义，击毙李家钰派到该旅的基层军官，旅长瞿联承仓皇逃跑。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财物。起义后，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第2旅，刘文仕任司令员，秦仲文任副司令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赵子文任书记。四川军阀刘湘等极为震惊，以其主力一部防守长江，堵住起义军东去的道路，以何光烈部封锁嘉陵江渡口。面对严峻形势，起义军根据省委指示暂时投向刘湘。李鸣珂、赵子文等人撤离部队，转移到遂宁、射洪等地。8月，由刘湘将起义部队改编为第21军独立旅，秦仲文任旅长，刘文仕任副旅长。部队移驻重庆石桥铺。不久，何光烈奉刘湘密令，以邀刘文仕到城内开会为名，杀死刘文仕，罢免秦仲文，起义遂告失败。

藤田起义

1928年6月13日，中共江西省永丰县委在藤田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藤田位于永丰县中部，拥有藤田圩、曾坊、严坊、邱坊、田心、老圩等30多个大小村庄，方圆10余公里。1927年10月，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中共赣西特派共产党员袁振亚返回家乡永丰县开展革命活动。11月，恢复了中共永丰区委，袁振亚任书记。12月，中共永丰区委在藤田召开近百名中共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参加的“层山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迅速恢复和建立各地中共党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和永丰县革命委员会，发动各地农民起义。会后，工人纠察队改编为永丰县工农革命军，拥有80余人，近60支枪，队长吴江，指导员袁振亚。1928年1月22日，袁振亚、吴江等率永丰县工农革命军和层山、邱坊、田心、严坊等地的300名农民群众围攻县城。因敌强我弱，攻城未果，群众退回藤田，工农革命军撤至永丰边界的潭头，与吉水游击队会合，合编为永吉游击队，吴江任指导员，匡新民任队长，共110余人，60余支枪。1928年1月，区委书记袁振亚，区委委员吴江、严玉如等来到藤田，他们分别在群众基础较好的邱坊、田心、老圩、层山、南边、西门、东沙陂、严坊、杏塘等地办起了“贫民夜校”和“青年学会”，为起义培养、骨干。同时，收集枪支弹药，建立村游击队。以贫苦农民为骨干，先后在藤田的邱坊、田心等地建立20多个农民协会，会员达2000余人，成立了30多个游击队，共1000余人。他们带领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拉夫的斗争。并重建中共藤田支部，秘密成立永丰县革命委员会，选举吴立仁为主席。1928年6月9日，吴江、严玉如、郭用光等奉区委指示，秘密将田心、严坊、小岭、老圩、层山、谢坊、杏塘等地的游击队数百人，枪80余支，集结于田心。13日凌晨，起义队伍攻克驻扎在藤田圩的靖卫团和国民党乡政府，烧毁了文件，没收了财产。14日，靖卫团向起义队伍发起疯狂的反扑，起义队员英勇奋战，经1小时激战，打退了靖卫团的反扑。吴江、严玉如率队伍到田心、小岭、曾坊、中沙肢等村，没收了数十户土豪劣绅的财物。接着，成立了藤田区革命委员会，郭用光任主任。

数天后，中共永丰区委、县革命委员会和藤田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搬入田心。紧接着，周围一些村庄的农民也纷纷举行起义，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928年7月初，永丰县靖卫团团团长刘明练纠集吉水、乐安两县的地主武装600余人（枪）向藤田反扑，农民武装遭到严重损失，袁振亚、吴江、严玉如等分别转移至乐安、宁都、东固等地坚持斗争。

畚坑起义

1928年6月上旬，中共广东梅（县）兴（宁）五（华）（大）埔（丰）顺五县暴动委员会，于梅县的畚坑圩发起了有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7、第10、第12团和农民武装2000余人参加的武装起义。

1923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和潮梅特委遭受严重破坏之后，梅县、兴宁、五华、丰顺、大埔各县党组织与上级中断了联系。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对上述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各县党组织和工农武装遭受严重摧残，分别退却汇集在九龙嶂、铜鼓嶂和八乡山坚持斗争。5月，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团团长郑兴（郑天保）派交通员往八乡山，邀请工农革命军第7团团团长古大存来商谈。古大存到九龙嶂后，即与兴宁的刘光夏、丰顺的黎凤翔、大埔的李明光等取得联系，并在九龙嶂召开了五县工农武装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五县暴动委员会”，古大存为主席，郑兴、刘光夏、黎凤翔、张家骥为委员。同时，决定在梅县、兴宁、五华、丰顺四县交界的梅县重镇畚坑举行起义。并成立了梅兴五丰四县临时军委作为指挥机关。为取得胜利，五县“暴委”抓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一是派人侦察敌情、地形；二是从第7团、第10团、第12团抽调军事骨干近40人组成短枪突击队作为主力，同时把第10团分散隐蔽的长枪队集合起100余人作后备队；三是动员农民，秘密组织起一支近2000人的“没收队”随部队行动，以壮大声势。6月上旬，畚坑的一个圩日，由李斌、古宜权率领的突击队化装成赶圩的农民过渡到畚坑圩内；古大存、郑兴、刘光夏等率领长枪队和“没收队”分别来到河边隐蔽待机。上午10时许，突击队向敌发起突然袭击，一阵猛打，两处敌人便被缴了枪。原来由于侦察员工作疏忽，4处敌人只有2处作了侦察，另外两处未侦察到的敌人不久便从正面和侧面向突击队包围过来。李斌、古宜权一面指挥队员反击，一面派人向古大存报告。古大存即令长枪队迅速渡河投入战斗，“没收队”隔河摇旗呐喊。敌以为我后续大队来到，慌忙向北面高地退却，我乘机反击，敌落荒而逃。整个战斗历时2小时，击溃国民党驻军和民团300余人，缴长短枪数十支和弹药物资一批。

畚坑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并在报纸上大肆攻击谩骂。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从报上得悉九龙嶂仍有武装斗争活动，便于6月下旬派梁大慈到九龙嶂，与各县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失散在各地的农军成员200多人纷纷集结九龙嶂，壮大了革命队伍。揭阳、潮安两县工农武装负责人卢笃茂、张遇廉亦先后来到了九龙嶂，经商议撤销四县临时军委，将“五县暴委”扩大为“七县联委”，使各地党和武装组织在统一领导下得到较快发展。在“七县联委”领导和组织下，梅县、兴宁、五华、丰顺、大埔等县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秋收和年关起义。促进了以九龙嶂为中心的梅埔丰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为后来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罗云坝第一次起义

1928年6月17日，在中共四川涪陵县委的领导下，三四百名农民在涪陵罗云坝新场举行了起义。

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于1927年11月派共产党员曾君杰到涪陵任县委书记，派共产党员李仙舟、邵平阶到涪陵罗云乡协助共产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中共罗云党支部根据当地农民每年3月3日和9月9日要拜土地菩萨的习俗，以建立“土地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初，“土地会”组织已扩大到涪陵县东面的许多乡，会员达三四百人，有长枪60多支。中共罗云乡党支部原计划于农历5月联合周围各乡农民同时举行起义，因泄密，反动当局准备在6月21日在罗云“清乡”。为避免损失，党支部遂根据涪陵县委决定，于6月17日举行起义，李焕堂、罗星吉、刘伏洋等负责起义的具体组织领导，并规定以在文昌宫鸣枪为信号。6月17日中午，起义队员听到文昌宫枪声后，立即冲向罗云坝新场，镇压恶霸地主、土豪劣绅20多人。暴动枪声震惊了周围的反动武装，敌人纷纷向罗云坝扑来。为保存革命实力，当晚李焕堂召集起义人员开会，决定就地隐藏刀枪，分散人员。起义领导人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

九岭岗起义

在中共湖北松滋县委领导下，松滋县北部山区农民于1928年6月18日在九岭岗地区举行了起义。

1928年3月，中共松滋县委成立。4月，县委机关迁往群众基础较好、地理上易守难攻的北部山区——九岭岗。5、6月间，中共鄂西特委在九岭岗两次召开松滋、枝江、宜都县委联席会议，决定松（滋）枝（江）宜（都）3县同时于中秋节（9月28日）举行起义，将起义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然后向湘鄂边发展，与贺龙部队会师。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共松滋县委地下交通员王长永于6月17日被松滋县西斋团防局逮捕，被查获部分起义文件。接着，陈家沮农军负责人邹恒春亦遭逮捕。中共松滋县委鉴于形势突变，决定提前起义，6月18日中午，西斋团防局教练长傅生夏率领11名团丁进山抓人，当来到徐家台岩头大坵时，埋伏的起义农民以铙声为号，打出红旗，分头截杀，全歼团丁，缴获长短枪8支，战马1匹。首占告捷，群情振奋。到下午，参加起义的农民达千人。当晚，中共松滋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成立松滋县苏维埃政府、县红色自卫大队和起义指挥部。同时，决定乘势打击当地土劣，然后向西斋团防局进攻，以推动全县武装起义。19日，红色自卫大队分兵出击。第1大队在张维高、张波臣领导下，以九岭岗张家咀为中心，抢修工事，巩固后方；第2大队400余人在李海吾、周海涛率领下，攻打刘家冲，全歼团防武装；第3大队500余人在裴光月、冉承哉、周维新率领下，攻打清水冲、严家溪，均获胜利。20日，红色自卫大队1000余人乘胜进攻西斋镇，直捣团防局营地，附近农民踊跃参战，起义队伍增至1万余人。区长、团总雷新民闻讯而逃，前任区长雷子敬被处决。随后，又击溃了雷新民团防的反扑。九岭岗农民起义接连胜利，震慑全县。国民党松滋县长高季浦急调5个区的团防，并邀驻宜都县的国民党第43军派兵支援，准备围攻九岭岗。22日，团防局长雷新民首先率部进攻九岭岗，被严阵以待的红色自卫大队击溃。24日，高季浦纠集的5个区团防在国民党第43军200余人的支援下，分4路向九岭岗进剿，先后杀害共产党员和起义骨干55人，烧毁民房千间。中共松滋县委冷静分析敌我形势，决定疏散党员干部，隐蔽精干武装，转入地下斗争。

历时7天的九岭岗农民起义，曾一度取得胜利，诞生了革命政权，建立了革命军队，打击了反动势力。后遭敌镇压而失败，但保留下来的武装斗争骨干遍及全县，为后来开辟松（滋）枝（江）宜（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蛟洋起义

1928年6月25日，中共福建省上杭县委在该县北部的蛟洋村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上杭。起义军沿途宣传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苦难深重的蛟洋人民。此时，蛟洋村人傅柏翠经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介绍，加入了中共党组织。随后，傅柏翠即在北4区发展共产党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至1928年3月，发展共产党员100多人，成立了中共北4区区委。在区委的领导下，农民协会得到迅速发展。5月，农会会员已达1000余人，并成立了北4区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农民自卫军一面夺取当地民团枪支，一面筹款购枪造枪，武装自己，准备武装起义。随着北4区农会力量的壮大和斗争的不断深入，土豪劣绅恨之入骨，遂求援驻长汀县城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郭凤鸣部镇压农民协会。6月25日晨，郭凤鸣命令驻上杭具的钟铭清团两个营和刚收编的土匪补充团，分两路进攻蛟洋农民武装，并调丘坊、藏溪民团作向导。北4区农民自卫军1000多人，在中共上杭县委书记郭伯屏和傅柏翠等领导下，在黄泥岗和扩下圩设伏，击毙郭部排长1人，给郭凤鸣部以打击。但因农军多是土枪土炮，装药迟缓，加之未及很好训练，经半小时激战，便被迫撤出战斗。28日，蛟洋村失守。起义军在傅柏翠等领导下，转入巫坑、郭车一带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并不断出击，迫使郭部撤出蛟洋。

7月下旬，根据中共闽西特别委员会的指示，起义军编入闽西红军，转战于永定、龙岩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永定起义

1928年6月29日，中共福建省永定县委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永定在大革命初期就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1926年夏，中共厦门总干事会书记阮山在上湖雷建立闽西最早的中共永定支部。不久，第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在下洋建立中共金丰支部，张鼎丞在金沙建立中共溪南支部，陈祖康在文溪建立中共太平支部，各地党组织秘密领导农民斗争。1927年10月，中共永定县委在金沙公学成立。县委成立后，即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发展农民协会，组建“铁血团”，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在金沙、西溪、上湖雷和陈东坑等地秘密开办兵工厂、制造子弹、武器等。1928年1月旧历年关时节，中共溪南区委书记张鼎丞发动和领导了金沙1000多群众到永定县衙示威游行，中共党组织还发动了龙门、陈东坑的农军，上湖雷、高陂农协组织农民抗捐抗暴。全县各地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5月间，国民党军第49师调江湘支队（步兵4个连）进驻永定县城，并在县城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准备镇压各地农民的武装斗争。6月2日晚，江湘亲自督队100余人，包围了金沙公学，溪南区委委员等6人被捕。溪南区委率农军上山准备战斗，并联络城区附近农民。各乡地主逃往县城。中旬，永定县委在陈东岭头湖塘小学召开党员代表紧急会议，组成起义委员会，张鼎丞为总指挥，阮山、卢肇西为副总指挥，并部署：太平里按兵不动，东乡与上湖雷杀土劣地主，焚烧田契，引诱国民党军出城后，集中乡村起义队伍攻打永定县城。会议结束后，县委在溪南组织了一支以铁血团员为主的200余人、100余支枪的特务营，作为攻城第1梯队。金沙、西溪、东溪、高头、南溪、古洋、大平寨、石城坑等地农民武装按连编成，作为攻城第2、3梯队。29日凌晨，阮山首先率领打进上湖雷保安队的30名工农士兵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兵分两路，到凹背、戴洋捕捉土豪劣绅，收缴枪支和钱款。起义队伍乘胜集中水口庵，攻打下湖民团，由于民团早有准备，起义队伍撤出战斗。当日下午，起义队伍赶至陈东，汇合石成坑、南溪等地农军共500余人，举行金丰起义。起义队伍首先在陈东、岐岭等地收缴地主民团枪支，镇压土劣，焚烧田契、债据。7月1日，阮山、卢肇西率队伍开赴下洋，与下洋起义队伍汇合后，攻打下洋团防局。3日返回陈东。4日到上金丰，攻打水坑民团，经3小时激战，烧毁楼房13座，后开回陈东。驻守县城的江湘部获悉湖雷、金丰举行了起义，即抽调200余人前往镇压，城内只留100余人防守。张鼎丞决定攻打永定城。一面通知西溪、东溪等地队伍集中待命，一面集中金沙各乡村的队伍在苏竹凹待命。傍晚，溪南里起义队伍3000多人，肩扛土枪、土炮，手拿鸟枪、梭标，项系红布条，分3路包围了县城。

7月1日凌晨4时，张鼎丞亲自指挥攻城。西溪农军首登北门城楼后，各路队伍即发起猛攻，直逼县衙、监狱，经激战，守军被迫龟缩在县衙附近据点待援。此时，出城的敌军闻讯赶回援助，起义队伍于9时撤出县城，又围城3天。邓子恢此时来到永定，经与张鼎丞分析形势后，将农民武装撤口金沙、西溪、东溪等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4日，县委从攻城的特务营中挑选骨干200余人，在金沙金谷寺成立了闽西最早的一支红军队伍——溪南红军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辖3个连。上湖雷和金丰起义武装在陈东文圣庙整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永定农民自卫队，队长熊振声、党代表卢肇西、政治部主任江德贤，全队200余人。起义队伍撤回金沙后，溪

南党组织在各乡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废租、废债、抗捐、抗粮、抗税。并成立了双溪、漳园、赤半、太平、中金、三坊、秀溪、玉石、卓墩、秀山、西一、西二、中石等 13 个乡苏维埃政府。

永瑞平乐联合起义

1928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郑馨和浙南特区委员会书记林平海等人，在浙南的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等县组织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永、瑞、平、乐处于瓯江南北，是相连的四个县。1927年12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选定浙南温州为全省暴动中心地点之一。1928年2月，省委特派员郑馨来到温州，在瑞安城关秘密召开永、瑞、平、乐四县负责人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决定组织永、瑞、平、乐四县联合起义。3月，省委又派王屏周、林平海到浙南工作。6月，在平阳江南鲸头山成立了浙南特区军事委员会，林平海、王屏周任总指挥；商定了四县联合暴动的日期，推选林平海为浙南特区委员会书记。会后，各县分头准备，按期起事。永嘉起义由王屏周负责。王屏周根据四县联席会议精神，派雷高升、李振声到西捕溪组织农民武装。雷、李到达西捕溪后，利用同学、熟人关系，发展组织，建立武装。27日，雷高升、李振声在永嘉碧莲集中小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打温州城。但正当大雨之后，山洪爆发，石旋难走。整个小源地区的荆州、李茅、白洋、二十四垅等地，都被地主武装把守，无法突破。仅大源谷亨棉率部800余人，直抵瓯江北岸的洋湾地方，因与雷部接不上关系，绕道小源返回。平阳起义。1927年6月，中共农运特派员张培农、中共党员叶廷鹏等率领300多农盐民攻打平阳城，虽没有成功，但鼓励了革命群众，震慑了反动当局。第一次4县联席会议后，游侠、叶廷鹏等在万全区的练川乡下薛村建立平阳暴动指挥部，游侠为总指挥。1928年6月27日晚，平阳1000多人的农（盐）民和工人武装队伍，在叶廷鹏、吴信直、陈金姆、陈步全的率领下埋伏到平阳县城四门。暴动队员用红布系颈为标志，以“红师”为口令，约定事成后，立即在县城南门天主堂宣告成立平阳苏维埃政府。正当叶廷鹏率领的这支农民军，手持土枪、刀棒等武器，在练川迎学集中待命时，被当地劣绅余汝舟发觉告密。国民党县长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加强四周城门防守，派出巡警小分队出城巡查。敌人在东门外的柑园围墙上发现坐着一个颈系红布的农军，急忙开枪射击。枪声一响，震动了县城内外，西门外黄氏宗祠提前放火，发出攻城信号。埋伏在柑园内的暴动队员们，在叶廷鹏的率领下，一齐冲出去。布满城墙的国民党兵，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和精良的武器，向暴动队员猛烈射击。队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向城内冲去。激战1小时许，叶廷鹏左肩中弹，不得不退下火线。面对紧闭的城门，暴动队员虽经几次冲锋，均无法攻入县城。为避免过大的损失，林平海决定撤退。进攻西门和北门的队伍，得知东门主攻部队失利，亦立即撤离战区。翌日，暴动领导人林平海在指挥部驻地薛村被捕，后牺牲于温州紫福山下。瑞安起义前夕，中共瑞安县委派地下交通员胡牧之赶到永嘉找到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林去病同志，请示起义的有关事宜。林听了胡牧之汇报说：“永嘉方面未筹备妥善，瑞安不能发动。”于是胡牧之连夜赶回瑞安，传达林的决定。6月27日夜里，东区的农民赤卫队和城区各业工会会员五六百人集中在县总工会（即悟真寺，现改为瑞安剧院），接到胡的报告后，就临时通知分散回家，并派人去通知北区的暴动也暂停下来。6月28日上午，中共南区区委书记林直斋在仙降的纯一堂召集全区党的负责人和农民协会骨干会议，研究配合攻打瑞安县城的作战计划。下午集中全区赤卫队员1000多人，在白莲堂作战前动员。次日晚上，农民赤卫队从仙

降、西洋出发，向沙埠汇合。然后，分乘 16 只木船，顺流而下，准备夜攻瑞安城。当船只到达南岸码头，久等不见县城的暴动信号，时值大雨，潮水上涨。于是，林直斋等决定，将船只折回仙降，在经过上河地方时，乘势涌向恶霸地主伍籀蜚住宅，而伍已闻风潜逃县城，农民武装遂焚烧伍宅大院。林直斋、林正甫、陈兰平等坐船回仙降。待小船回到仙降埠头，林直斋等一上岸即被地主武装包围捕去。陈兰平在突围中投江壮烈牺牲。7 月 5 日，林直斋、林正甫在温州紫福山，英勇就义。乐清县没有按计划举行起义。永、瑞、平、乐 4 县联合起义，为后来党在浙南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一定基础。

绵竹起义

1928年7月3日，在中共四川省委和绵竹县委的领导下，绵竹县广大农民举行了起义。

大革命时期，绵竹县人民为反对地主豪绅及军阀的残酷压榨，举行过多次抗租、抗捐税的斗争。1927年，在四川省委派来的共产党员李晏蟠、刘仁俊等人的帮助下，张治成立了中共绵竹党支部。不久，建立了直属省委领导的中共绵竹特别支部，至1928年，全县有共产党员140多人，建立了4个区委，22个党支部。还建立了“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和“学生联合会”等组织。3月，中共四川省委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的要求，派黎冠英到绵竹建立了县委，积极筹备农民起义，制定了起义大纲，组成了行动委员会，黎冠英为主任，王干青、李晏蟠、周壁澄、丁毅、骆显光等为委员。由省委派出的范东浦任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王干青、张明宽任副总指挥，县委举办了特别训练班，训练了有三四十人的武装骨干。7月3日举行起义，西南路起义队伍由贺字生、张治、王干青指挥，东北路起义队伍由黎冠英、张明宽、范东浦、李晏蟠指挥。3日晚，西南路起义队伍攻打县城，击毙稽查员，缴获部分枪支，赶至城西诸葛庙，焚烧了蚕桑局数间房屋，遭到驻城国民党军曾起戎团伏击。与此同时，东北路起义队伍在城北也遭敌人伏击，两路起义队伍未取得联络。黎冠英、张明宽、李晏蟠等遭敌杀害，两路起义队伍被打散，仅有贺字生、张治、王干青等转移成都等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火炉铺起义

1928年7月4日，在中共四川涪陵县委的领导下，火炉铺（今武隆县）农民协会联络部分绿林武装在火炉铺举行了起义。

2月，共产党员邵平阶等到火炉铺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秘密收集武器，建立农民武装。4月，军阀杨森、郭汝栋部准备在下川东作战。涪陵县委决定趁机加速火炉铺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派县农民协会秘书长李仙舟到火炉铺加强领导。李仙舟利用其封建袍哥的关系，向当地土绅借枪10支，还利用土匪头子杨畅时与区长张明堪的矛盾，争取杨同意打张。县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7月4日晚举行起义。随即李仙舟主持召开农协干部会，制定了起义计划。4日晚，李仙舟、邵平阶带领农协会员30多人，进攻万峰，击毙民团区队长张寿光，俘虏2名团丁。杨畅时带领绿林队伍100多人冲进火炉铺，占领区公所，缴枪30多支。5日，土匪头子杨畅时不同意将起义队伍合并，并以武力相威胁。李仙舟、邵平阶为避免发生冲突，给革命力量造成损失，遂主动撤离，火炉铺起义失败。

尹集起义

1928年7月5日，在中共湖北襄阳县委的领导下，尹集地区农民武装百余人举行了起义。

1928年4月，中共襄阳县委根据鄂北特委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指示精神，决定在襄东黄龙垱、襄南尹集等地组织农民起义。4月中旬，中共尹集特支接到县委指示后，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6月21日，成立了以农协会员为骨干的“大刀会”，公开组织、训练农民武装。中共襄阳县委决定，尹集、泥沮、竹条铺等地于7月22日同时起义。7月初，泥沮、竹条铺的中共组织遭到破坏，起义无法举行。中共尹集特支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提前起义。县委同意了他们的计划，并派施文启作为县委特派员参加指挥。施到尹集后，成立了暴动指挥部，曾孟陶为总指挥，施文启为指导员，将起义队伍分成4个支队，起义时间定在7月5日。是日凌晨，各路起义队伍共100余人，直扑各自进攻的目标。第1路由李伯嘉率领直奔尹集，不料尹集团防已在前一天撤逃。起义队伍在尹集街张贴标语，宣传发动群众。第2路由曾少斌、尚志高率领到熊家庙，处死保董王兴若及县税收人员等8人，缴枪4支。第3路是主力，在施文启、曾孟陶率领下，直指主攻目标南漳县丁集镇民团，经过强攻，击毙团总尤树仁等数人，缴枪10余支。当晚，各路起义队伍到了集汇合，开仓分粮，发动群众。此时，起义队伍猛增到六七百人，后又连夜奔袭王家新街。

7月6日凌晨，欧庙“红枪会”反动头子陈贡川带会众来到王家新街，假说参加起义队伍，趁起义农民不备，突然发难。跟在“红枪会”后面的鄂北清乡军和南漳清乡团，迅速围了上来。起义领导人指挥队伍仓促应战，百余名起义农民壮烈牺牲，部队大部散失，最后剩下四五十人突出重围，转移到襄阳与南漳交界的仙女山地区坚持斗争。

英雅起义

1928年7月初，在中共广东大埔县委与中共三河区委的组织下，英雅乡赤卫队200余人发起了攻击反动民团的起义。

1927年11月，八一南昌起义军进军潮汕在普宁受挫后，国民党地方当局纠合各地地主武装到处清剿起义军民。1928年上半年大埔县三河区英雅乡土豪劣绅管愚村、谢灼卿、黎清渠等筹款买枪，招兵买马，于6月各自正式成立民团。之后便向英雅农会胁迫，要农会限期交出八一南昌起义军送给英雅农军的15支枪。农会主席赖春生、赤卫队长赖振东将此事向中共三河区委谢卓元汇报后，县委张士生与区委书记房明光研究，决定举行农军起义，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经过一段准备工作之后，英雅乡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重新成立，赖春生为农协会会长，赖振东为赤卫队长。接着，三河区委对赤卫队进行了编组训练，制订了起义计划。7月初的一天，区赤卫队200多人举行起义，攻打英雅乡民团，起义队伍挡兵分3路同时行动：区委书记房明光、农会主席赖春生率一路攻击管愚村民团；余勇文、赖谷泉率二路攻打谢灼卿民团；谢卓元、张超才率三路攻击黎清渠民团。由于英雅赤卫队人多势众，反动民团猝不及防，当场击毙谢灼卿、管愚村，击伤黎清渠。暴动成功后，起义军民张贴布告，成立英雅乡苏维埃政府，赖春生为主席。不久，大麻民团联合进剿英雅农军，谢卓元、赖谷泉等转到三河乌猛斗一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温岭西北区起义

1928年7月13日，在中共浙江温岭县委领导下，温岭西北区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温岭县属沿海丘陵平原区，其西区和北区为雁荡山脉延伸的丘陵山区。1928年5月2日，中共温岭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了当时温岭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首先在北区（包括今城北、大溪、泽国3个区）部署和发动农民起义。

6月22日，县委委员金正照、金良岳得知部读村地主王小梅强占公埠建楼房，群众意见很大。金正照即表示支持群众向王小梅开展斗争。一天深夜，共产党员罗德标带人把王小梅家新建成的房屋烧掉。次日，王小梅就向县政府告状。县政府派人逮捕了金良岳、滕清监、滕玉四等5人，将他们判刑入狱。金良岳等人的被捕，激起当地群众极大愤慨。7月13日，县委在石刺头一带组织发动了300多名农民，在银杏庙召开抗租大会。附近的农民及碗窑工人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把银杏庙挤得水泄不通。这次会议由县委常委金学河主持，县委书记曹廷祥在会上作报告，指出“我们农民要翻身根本出路就在于反帝反封建，把地主老爷手中的土地夺回来！”。银杏

杏庙抗租集会后，北乡农民的抗租斗争就迅速地开展起来。8月7日，由于琛山地主金石苏到冠城洋岙前陈修业家收租事，发生争执，国民党县政府派4名法警抓走陈修业。县委常委金学河、县委委员赵任知悉后，即召集当地村民追到石刺头把陈修业抢了回来，并在洋岙前逮住4名法警，将他们打死一人打伤一人。金学河、赵任带领群众抗租拒捕的消息一传开，念姆洋、新建、石刺头、横峰等地农民也随之奋起抗租反霸。地主豪绅在惊恐之中，联名上告县政府。国民党县政府派出大批巡警和团丁，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农运积极分子，北区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年冬，根据县委决定，常委柳苦民、叶景泰在西区坞根的寺基、街头、洋呈、小坞根等地宣传发动、筹建武装，很快发展了程顺昌、程小林、赵裕平等一批党员，建立了下王和前山头两个党支部。继而，又扩展到沙山、青屿、桐山、横山等地。他们以这些地方的党员为骨干，组建了一支坞根游击队，凭借坞根的有利地形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5月，柳苦民带领70余名游击

队员分两路进攻乐清县江山乡公所，击毙乡兵2人，缴获部分枪支。11月，柳苦民率领100余名游击队员攻打白壁村地主林雨楼的武装。还将鱼肉乡民、仇视共产党的坑潘土匪潘景调、潘景雨枪杀在坞根街头。坞根游击队的频繁出击，使当地和周围的地主豪绅非常害怕，他们纷纷要求上司派兵“围剿”。1930年2月20日，湖头、上王保卫团在横山乡西村包围坞根游击队一部，妄图一口吃掉游击队。柳苦民闻讯后，即率部火速前往增援，经激战，保卫团狼狈逃窜。游击队乘胜追击，直捣保卫团老巢，烧毁敌营房120多间，缴获部分枪支。湖头、上王之战告捷，游击队的声势越来越大。玉环县的清港、芳杜，乐清县的湖雾、西门等地，不断有人前来加入坞根游击队。3月，根据台州中心县委的指示，成立“坞根游击大队”，柳苦民任大队长，程顺昌任副大队长。游击大队下设分队，共有队员200多人，长短枪100多支。4月初，台州中心县委派黄岩县委委员叶勉秀到坞根游击大队工作，加强对游击大队的领导。叶到坞根后，了解到程方禄等7名游击队员，于3月18日晚上在雁荡山被乐清县大荆保卫团抓去，关押在乐清监狱等情况。他同

柳苦民、赵裕平等商议，设法组织武装越狱。决定派程方福以探监为名，组织越狱。4月18日，柳苦民率领100多名队员，分乘3条船到乐清慢桥接应。次日黄昏，几个游击队员偷偷隐进监狱，见机把牢头捆住并打开牢门，把狱中难友的脚镣手铐凿开。狱中三四十名难友一齐往外冲，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越狱取得了胜利。不久，台州中心县委委员赵胜又来到坞根。赵胜同柳苦民、程顺昌等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5月28日，游击大队200余人袭击环山、白溪保卫团，击毙团丁1人，缴枪30余支，并烧毁敌营房。6月7日，国民党温岭县政府调集驻地省保安队及各地保卫团，分4路对坞根游击大队所在地洋呈发动大“围剿”。柳苦民指挥部队埋伏在洋呈门口岙桥溪沉着应战，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9时。保卫团顽抗一阵后，发现白坦方向也有游击队包抄过来，就慌忙向茶头斜边的马鞍山头撤退。

7月24日，浙南特委军委决定温岭坞根游击大队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第2团。在浙南特委和红13军的直接领导下，温岭西区的农民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兴山起义

1928年7月起，中共湖北兴山县委和巴（东）兴（山）（秭）归县委利用和改造神兵，组织游击队，接连爆发武装起义，一直延续到1930年5月。

1928年2月，中共兴山县委成立了农民武装暴动指挥部，县委书记刘子和任总指挥。7月，县委领导全县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斗争，制定了起义计划。共产党员袁霭峰根据县委指示，打入棒子板神兵之中，掌管军事训练，秘密进行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7月17日夜，袁霭峰率神兵100余人，突然对棒子岭郭宝先团防发起进攻，缴枪10余支，揭开了兴山起义的序幕。10月，棒子神兵与保康神兵联合，组成兴（山）保（康）边游击大队（又称棒子游击大队），大队长袁霭峰。随后，黄粮、公坪两地游击大队分别成立。1928年11月，成立了以张华甫为书记的中共巴归县委员会。新县委成立后，总结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十分注重改造神兵和组织游击队的工作。到1929年秋，兴山县有了5支游击大队，共500余人。在中共巴兴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8月，由刘子和、陈宗培等率武装10余人，奔袭宜昌县乐天溪团防，在宜昌莲沱区赤卫队配合下，打垮了团防局，缴枪19支。9月6日晚，黄粮游击大队大队长张登殿率游击队战士100余人，突然包围了团总余伯屏住宅，击毙团丁3人，缴长枪12支。12月中旬，黄大鹏、陈宗培等人率神兵60余人，袭击了张家彩团防驻地，缴枪30余支。神兵队伍在共产党的改造和领导下，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壮大。12月底，成立了工农鄂西游击大队，共100余人，40余支枪，在巴兴归地区开展了打土豪、攻团防为主要目标的游击战争。

1930年5月16日晚，工农鄂西游击大队在刘子泉、黄大鹏的率领下，攻占了兴山县城，毙俘县保卫团20余人。缴枪40余支。6月，在甘埠成立了巴兴归革命委员会。接着将工农鄂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9师（后编入红3军教导师），师长刘子泉，政治委员黄大鹏。区、乡建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至此，以甘坪为中心的巴兴归苏区初步形成。

麻阳讨竿军起义

在中共湘西特委的领导下，中共湖南麻阳县委组织发动农民武装于 1928 年 7 月 20 日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 年初，中共麻阳县委成立后，即在西晃山地区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卫军。4 月，中共湘西特委派组织部长孙家信到麻阳领导武装斗争。6 月上中旬，麻阳县委在旋风寨召开党员扩大会议，决定尽快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麻阳县讨竿军司令部，刘百川任总司令，孙家信任政委。下旬，麻阳县委在西晃山召开起义誓师大会，决定 7 月中旬举行起义。7 月 20 日，武装起义爆发。讨竿军总部 100 多人攻打大桥江乡公所，守卫乡公所的乡兵班长因已被策反过来，立即率队起义，乡公所被攻占。接着，共同进攻顾家齐部刘耀卿营。因答应倒戈的李甫臣部迟迟未行动，讨竿军面对强敌，只得撤回西晃山。同时，原答应攻打尧市乡公所和顾家齐部某营的姚凤廷部亦没有按时行动，直至第 3 天才攻打尧市乡公所，击溃了乡公所乡兵，烧毁了乡公所。在进攻顾家齐部某营时，起义队伍失利，只好退至芒江、麻阳边界的米公山一带地区。

讨竿军起义后，国民党军派 3 个营的兵力“围剿”西晃山。鉴于形势严峻，孙家信便和刘百川率部辗转 to 广西，加入李明瑞部，坚持斗争。刘百川在途中壮烈牺牲。

麻阳讨竿军起义虽然未能实现原定攻占县城、武装割据麻阳全县的计划，但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反动统治，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化县起义

1928年7月中旬，中共广东化县委员会组织数百名农民武装，发动夏收起义。

1928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化县县委在交租的月余时间将群众发动起来举行起义，要求南路特委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化县工作。并决定派王公唯、邱九到六王嶂收编山上的绿林武装，争取一起参加化县起义。7月初，中共化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常委卢永炽、南路特委书记杨石魂与委员彭中英、朱也赤、陈信材等参加会议。会上，县委书记吴家槐传达上级关于组织夏收武装起义的指示，然后对化县可否马上举行起义问题展开讨论。彭中英、吴家槐、卢宝炫等人认为化城有国民党防军一个连，县府有县警大队，还有武装警察，加上附近地主反动武装近千人，枪械有三千多，而农军只有几百人，又缺乏训练，武器装备差，起义难以成功。卢永炽和杨石魂等人则认为敌人数虽多，装备比我们强，但他们是乌合之众，战斗力差，不堪一击。他们还分析了起义队伍的情况，一区情况极好，城北的北镇乡有党支部五六个，党员一百多人，活动能力强。城东岸的水尾、东岸等几个村，完全受我党控制。城西上郭、禾里群众基础好。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定能将县城包围。此外，在县城也发展了一些党员，可里应外合。讨论结果，决定立即组织武装起义。会后，县委立即从附近十多个乡挑选二百多名农军，组成青年先锋队。经过准备，县委即下令青年先锋队向县城集结，同时发动一区数百名农军配合，共同从南面下宝岭方向攻打县城。岂料城里的国民党军和警察事先已占领了下宝岭制高点，修好工事。起义群众向县城进攻时，敌人的机枪便不断向农军扫射。农军急忙还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农军见强攻不下，便撤出战斗。而路远不能及时赶到的四区永清乡30多名农民自卫军，走到禾化塘阴桥，知道赶不上参加战斗，便就地切断电线，炸毁桥梁，破坏敌人交通设施后撤走。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举“清剿”，大批共产党员、农会骨干惨遭捕杀。卢宝炫带领20多个党员骨干转移到杨梅竹儿山坚持斗争。

遂昌桃源起义

1928年7月，中共浙江遂昌县委在桃源山区发动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桃源地处浙南中山区，系仙霞岭山脉。1928年4月，遂昌县委遵照中共浙江省委通知精神，成立了遂昌县工农革命军，下设3个大队，9个中队，还有1个青年突击队和暗探队。4月24日，县委书记傅以和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以中队为单位，上山打猎为名，分头开展军事训练。7月20日，国民党乡警傅作龄察觉了农军的行动，即向国民党桃源区自治公所报告。桃源区长又连夜写信向县党部报告。次日夜，遂昌县警察局长金南带领县警察队开赴塘岭头村，搜捕傅以和与农军骨干。22日，当国民党警察押着农军骨干傅赠龄往县城去时，傅以和指挥农军在内花恋湾伏击。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傅以和首先指挥农军用抬枪轰击警察局长金南坐的轿子，一抬枪打了过去，掀掉了轿顶，击中了金南的左胳膊，随队的警察慌忙就地趴下。傅以和随即命令农军一齐开火。霎时间，内花恋湾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激战中，打死县警察队熊队长，打垮警察队，救回傅赠龄，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当日下午，农军在梭溪庙召开祝捷大会。会后，农军一举捣毁桃源区自治公所，镇压土豪恶霸，破仓分粮。驻里高的地主武装保卫团，慑于农军的势力，带着武器投诚。接着，农军又收缴了双溪口、湖山等地反动保卫团的枪支。8月3日，国民党浙江省部急调省防军和地方武装“合击进剿”农军。县委书记傅以和立即指挥农军上山隐蔽，伺机行动。8月4日上午，敌人从南北两路袭击塘岭头村，中午在塘岭头村大吃大喝。当敌人喝得酒意正浓时，农军悄悄下山，用抬枪猛轰敌群，打得敌人惊慌失措，乱窜乱叫。翌日，敌人又组织兵力围山搜捕，血洗桃源。农军在县委书记傅以和与总队长涂法寿的指挥下，英勇反击，坚持了一个月。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农军弹药、粮食不济，最终失利，数十人牺牲或被捕。县委书记傅以和突出重围。总队长涂法寿带领小部分人马隐蔽下来，一直坚持到1935年加入红军挺进师。

南新起义

1928年7月22日，中共湖北孝感县委率领南新地区赤卫队和农民群众在南新地区举行了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后，孝感县农民自卫军原总负责人卫祖圣秘密返回家乡，积极恢复党的组织。12月，成立了中共孝感县委，卫祖圣任书记。孝感县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以办红学会为名，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作好起义的准备。到1928年初，党组织掌握的红学会会员发展到100余人。4月，孝感县王店民团勾结花园国民党驻军袭击了孝感县委驻地南新街刘家营，县委3名成员当场牺牲。6月，王店民团又策划袭击赤卫队和农民协会活动中心黄家大堰。卫祖圣等得此情报后，马上召集各赤卫队负责人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决定，以红学点为基地，以红学会会员即赤卫队为骨干，发动广大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由卫祖圣兼任指挥，刘海苟，许立光、汪菊玉任副指挥。将赤卫队分为4个中队，任命了各中队负责人。起义以消灭王店区民团为首要目标，进而夺取武器，扩大赤卫队武装，建立革命政权。7月22日（农历6月6日）为当地红学会日。卫祖圣决定以做红学会日为名，通知各地赤卫队，于当晚在黄家大堰举行起义。这一行动被工店民团获悉，团总徐均弼率王店民团，并勾结花园国民党驻军1个连的兵力连夜向黄家大堰扑来，企图一举消灭革命武装。卫祖圣得此情报后，立即组织队伍分路出击：第1中队由南往北，第2中队由东向西，第3中队居中，第4中队由北向南，形成四面包围。当敌人疯狂冲向黄家大堰时，卫祖圣发出起义信号，顿时赤卫队的枪声、冲杀声四起，2000多名起义农民从四面八方将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军和民团不战自乱，各不相顾，四处逃命。经过赤卫队和农民群众的冲杀，除驻花园国民党军20余人逃窜外，全部被歼，反动团总徐均弼当场击毙，缴枪20余支，一举夺得了起义的胜利。3日后，国民党花园驻军派1个营的兵力扑向南新地区。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赤卫队主力转至小悟山开展斗争。不久，卫祖圣率领赤卫军骨干同小河地区、大小悟山赤卫队会合，继续坚持艰苦的武装斗争。

平江起义

国民党湘军独立第5师一部，在滕代远、彭德怀、黄公略的领导组织下，于1928年7月22日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总暴动和对平江问题的决议案》，写信给各地特委、县委，指示现时的重要任务是从“平江沿赣边到湘南”，“造成这一广大地区的割据”。随后，省委又发出通知，特别指出要发动平江等地的起义。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派李光、张荣生、邓萍、贺夷等人打入国民党湘军独立第5师开展策反工作，并和该师第1团团团长彭德怀秘密接头，发展其为中共党员，在第1团建立了党组织，彭德怀担任第1团的党委书记。还秘密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使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团结在党领导之下。彭德怀利用师长周磐扩大势力的野心，说服周磐办了一所师随营学校，推荐共产党员黄公略任学校校长，共产党员贺国中、黄纯一分别任教育长和大队长。随营学校成立了以黄公略为书记的党支部。不久，彭德怀又建议周磐，任命黄公略为第3团第3营营长。至此，独立第5师相当一部分武装由共产党掌握。不久，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抵平江县城，与第1团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7月19日，彭德怀从电报局截留了师长周磐命令副师长李慧根立即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的密电，向滕代远汇报。滕代远、彭德怀等商量，决定迅速举行武装起义。当晚，第1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22日下午1点乘敌人午睡时举行起义。会后，彭德怀派人通知此时已任驻嘉义第3团第3营营长的黄公略和驻岳阳的国民党独立第5师随营学校实际负责人贺国中，率部一道起义。滕代远则写信指示平江县委，立即组织全县武装力量和工农群众配合起义。

22日上午11时，第1团（欠第2营）全副武装，整队集合于城郊天岳书院广场，士兵委员会总代表李灿宣布起义，彭德怀作了动员讲话。全体官兵一致响应起义并进行了宣誓。下午1时，第1团攻打县城，起义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保安队哨兵和警察局的武装，占领了县政府，活捉了县长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刘作柱、警察局长黄夕度等反动分子；解除了看守人员的武装，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五六百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冲进清乡队住处，活捉了清乡队长，清乡队士兵放下武器投降。不到两小时，起义部队就解除城内敌人共约2000余人的武装，顺利地占领了县城，取得了起义的胜利。下午4时，第1团第2营从思村等处开回县城，参加了起义的行列。21日下午，第3团第3营提前起义。22日，随营学校100多人到达平江，与起义部队会合。此时，起义部队共2500余人。

起义部队会合后，士兵委员会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5军，下辖第13师，选举彭德怀为红5军军长兼第13师师长，邓萍为参谋长。同时建立中共红5军委员会，邓萍任书记。从军到连都建立中共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滕代远任军党代表，李灿任第1团党代表，黄公略任第4团党代表，贺国中任第7团党代表。红5军成立后，决定红5军军委和平江县委在城内月池塘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庆祝平江起义的胜利，宣布红5军和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大会宣布了全县的施政方针，公审和处决了刘作柱等10余名反革命首恶分子，随后，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平江起义的胜利震惊了敌人，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急调

共 8 个团的兵力，在湘鄂赣边界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分五路扑向平江。7 月 29 日，彭德怀率城内的第 1 团共 6 个连在城西门与敌激战，给敌以重创，红五军亦有很大伤亡。彭德怀率部迅速撤出平江县城，在龙门进行了短时间的整顿。整顿后，发展了一批党员，每个连都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从军到连都建立党代表制。

8 月下旬，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红 5 军将 3 个团改编为 5 个大队和 1 个特务连。彭德怀、滕代远率部几经辗转，于 12 月 11 日到达井冈山，与红 4 军会师。不久，彭德怀、滕代远率部和黄公略部会合，在湘鄂赣边境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割据区域不断扩大，到 1929 年底，湘鄂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地形成。

平江起义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平江起义及由此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对建立湘鄂赣边界根据地和巩固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实现从平江到湘南的边境武装割据，起了重大的作用。

水屯起义

1928年7月28日，中共河南省汝南县委在水屯镇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水屯是驻马店至汝南间的一个小镇，地处确山、汝南边境。1928年1月，在中共汝南县委和确山党组织领导下，汝确边区人民曾取得抗交军款的胜利。随着斗争的胜利，水屯地区中共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先后恢复、建立了孔庄、孟庄、小李庄等支部，成立了中共水屯区委。

1928年1月15日，中共河南省委召集汝确边区活动分子会议，指示开展武装起义。2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亲自到汝南、确山指导工作。同月下旬，豫南特委负责人蔡训明、李鸣歧以及马尚德、张家锋也来到汝确边区，发动群众，重新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同时，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周邦彩（化名王文彬）到汝南指导工作。3月，省委又派任作民到汝南、确山指导工作。至4月中旬，汝确边区农协会员已达1万余人。5月中旬，豫南特委领导汝确边区开展多次斗争，打击了地主武装。5月下旬，根据省委指示，豫南特委召开汝确边区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汝确特区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同时，建立了“妇女会”、“童子团”等群众组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在汝确边区迅速发展。汝确边区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震撼了国民党统治当局。6月，国民党统治当局急调信阳、确山、驻马店、汝南等驻军对汝确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中共汝南县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血洗水屯、孔庄等20余村，激起人民群众强烈反抗情绪的契机，以汝确特区苏维埃政府赤卫队为主，发动群众参加，在水屯镇举行武装起义，消灭国民党驻水屯羊世同部，夺取武装，开展汝（南）确（山）边游击战争。

7月中旬，中共汝南县委召开有周邦彩、张玉衡、贾子郁、王克勤、李达、温仁斋、孔繁益等10余人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了水屯起义。起义时间定于7月28日夜，由周邦彩任起义总指挥，张玉衡任政委，并制定了“围3留1”（即围着寨的3个门，留1个门）的起义计划。7月28日夜10时许，400多名赤卫队员、农民群众，在起义指挥部的指挥下，按照从镇南、北、西门进攻，在东门设伏，赶敌出镇，予以截击的部署，向水屯镇发起围攻。王克勤率一部进攻西门，孟庆彬带人进攻北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相继打开北门和西门。但由于埋伏在东门外的队伍歼敌心切，未等敌人出东门，就开枪射击，过早地暴露了作战意图。敌军见四面被围，遂又缩回寨内，凭借房屋负隅顽抗。起义队伍久攻不下，时近拂晓敌援兵又从驻马店逼近，且起义队伍的弹药已几乎用尽，周邦彩当即下令撤退。敌尾随追击，起义队伍被冲散。

高州起义

1928年7月29日，在中共广东南路特委的策动下，驻高州城的国民党军第11军第24师特务营官兵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国民党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发动了武装起义。

1928年4月，蒋桂军阀矛盾加剧。李济深为了巩固桂军控制广东的局势，将广东划分为四个善后区，委陈铭枢为高雷钦廉琼地方善后委员，将参加过南昌起义被打散重新收编而成的第11军从靠近省城的惠阳调到粤桂边地区，置于桂系军阀的严密监视之下。同年5月上旬，第11军第24师驻防于高雷钦廉地区。陈铭枢为了巩固地盘，一方面勾结旧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的残余势力抽丁勒税搜刮民财，扩充实力；另一方面勾结买办商人和地主豪绅，在城市恢复反动商团，解散工会，镇压罢工，在乡村扶助地主民团，解散农会，镇压农民运动。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也给第11军广大士兵带来极大痛苦。中共广东省委认为第11军曾参加过南昌起义，还保留有不少原属叶挺部下的工农同志，这部分人很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于是决定在南路开展对第11军士兵的策反工作，发动兵变。中共南路特委遵照省委的指示，于4月15日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南路特委兵委，具体负责兵运工作，并制订了兵士运动大纲。5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审查了南路特委兵委的兵运大纲要点，指示将第11军的兵士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在6月中旬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要求南路特委“坚决的有计划的去鼓励各地之兵变”。6月23日，在中共南路特委书记杨石魂的主持下，中共南路特委召开了第二次兵委会议，决定大力开展对第24师的兵运工作，并发动各县地方党组织，举行工农武装起义，配合第24师的兵变。7月中旬，驻高州的第24师特务营派人同特委负责兵运的同志联系，表示同意举行兵变。特委即派龚昌荣、何瑞两同志到高州设立兵运小组，直接领导特务营的兵变。国民党军第11军第24师特务营，下辖4个连队，共200多人。该营的士兵，大部分来自工农。他们经常受到长官的打骂虐待，吃不饱，穿不暖，渴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此，当该营进驻高州后，原在该部进行地下活动的邓施公，即派进步青年聂都山、谭天秘密同南路特委取得联系，准备举行兵变。南路特委听取了聂都山、谭天的报告后，为促进特务营的起义，指示负责募兵工作的何光，从茂名、吴川招募了数十名进步的农民青年，加以训练，安插到特务营和学兵连；另一方面又决定成立革命兵士委员会，以加强对特务营和学兵营兵变的领导。经过革命兵士委员会的组织发动，特务营的第3、第4连除连长、排长外，士兵都已组织起来，表示愿意在革命兵士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起义。7月下旬，传来了第72团第9连的士兵将队伍拉上灵山的消息，又进一步增加了特务营士兵举行兵变的信心。7月29日，特务营士兵在连续几个月没发饷的情况下，大家正准备派代表向营长请愿，要求补发所欠的月晌。恰在这时，传来师部存有十余万元军饷、长官扣住不发的消息。士兵们忍无可忍，于是决定马上举行起义。当天下午2时，特务营第3、第4连的士兵140多人，在邓施公、聂都山、谭天的指挥下，分两路向特务营和第24师司令部发起进攻。一路冲进特务营营部，枪杀了营长；另一路冲进第24师司令部，打死了师参谋长，并没收了师部所存的十余万元军饷。随后，起义队伍包围了学兵营，缴了学兵营的枪械，共获步枪400余支，机枪2挺，驳壳枪4支，左轮枪2支，子弹一大批。举行起义的特务营第3、第4连在

高州城停留半小时，为避免被国民党军队围歼，在邓施公的率领下撤出高州城，开往茂东农村活动。为取得与特委的联系，邓施公派聂都山和谭天前往湛江向南路特委报告兵变的经过和部队的动向。起义部队在茂东农村收缴了民团的枪支，没收了土豪劣绅的钱粮，共筹集到 8 万元的军饷。7 月 30 日，第 24 师从梅、化县抽调两个营的兵力，开往茂东农村追击兵变部队。8 月 3 日，中共南路特委在听取了聂都山、谭天的汇报后，指示兵委派人到雷州去发动第 24 师第 70 团的士兵举行兵变，以策应高州起义部队的斗争；立即用第 11 军革命兵士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十一军革命兵士委员会号召全军兵士兄弟举行兵变反对军阀宣言》及《十一军革命兵士委员会举行兵变暴动告工农贫农兄弟书》，扩大政治影响；命令聂都山和谭天迅速赶回部队，向邓施公传达特委的指示，尽快将兵变部队拉向化县，以配合化县、廉江的农民起义。聂都山、谭天在接受任务返回部队的途中，不幸遭国民党部队杀害。转移到云南普山的兵变部队，与南路特委失掉了联系。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邓施公将兵变部队拉上电白，阳江交界的双譬岭，并收编了山上的 100 多名绿林武装。8 月 2 日，中共广东省委派原在第 24 师当过团长的史书元前来南路，负责指挥高州起义的部队。以后，省委多次指示南路特委，对部队要求切实整理、保存好高州起义的队伍。但是，由于国民党军派重兵“围剿”，起义队伍被打散。其中一部分散到农村，进行地下斗争。

高州起义后，第 11 军中一些不满军阀黑暗统治的士兵，不仅同情特务营士兵的起义，而且产生了厌战情绪，战斗力衰退，使陈铭枢原要求带第 11 军往东江镇压农民运动的计划最终无法实现。

永杭岩起义

1928年8月5日，中共福建省闽西特委在永定、上杭、龙岩3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夏，中共永定支部成立，阮山、林心尧和王奎福在永定大力开展工农运动。1927年春，在坎市筹建篷船工会，并先后在孔夫、隘头、文溪、大排、平在、西肢、悠湾（今悠远）等地成立农民协会。9月，中共闽南特委特派员陈祖康（后叛变）及卢冠卿到太平地区（包括坎市、高陂、虎岗等3个乡镇）开展革命工作。10月，成立中共太平支部。当时，国民党军陈国辉部补充营盘跨坎市，借修龙岩坎市公路为名，强派公路捐2万元，引起农民不满。1928年春，太平支部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陈国辉马路捐的斗争，并火烧了团防局。斗争推动了党组织的发展，不久党员发展到200人，先后建立了孔夫、西陂、厦黄、悠远、文溪、平在，田心、白土和洪源等支部，并成立中共太平区委，书记林海汀。区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先后在培风、坎市、高陂和文馆等地建立4个农军连，500余人，并办起几个兵工厂，武装太平暴动队。7月中旬，省委特派员工王海萍来到太平区委驻地文溪，召集永定、龙岩、上杭、平和4县负责人会议，成立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王海萍。同时成立闽西暴动委员会，总指挥王海萍，副总指挥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会后，临时特委决定杭、永、岩3县农民武装集中太平里，举行闽西秋收起义。19日，太平区委在文溪村的西灵庙，成立了太平里暴动委员会，总指挥林一株。月底，傅柏翠率领蚊洋队伍70余人来到文溪，闽西临时特委集合杭、永、岩农民武装500余人，在孔夫村上林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闽西暴动总指挥部和起义计划。会后，队伍回到文溪集中。起义队伍准备先攻打坎市，因坎市驻有陈国辉的补充营和卢汉升的保安队，计划未执行。8月5日，王海萍、傅柏翠率领3县农民武装，开赴西肢岭。在当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围捕了“芳景堂”和“三益堂”两处的土豪劣绅，把没收来的衣物和布匹分给农民。接着，王海萍、傅柏翠率队到悠远。此时，龙岩军事部长陈品三也来到悠远，希望帮助龙岩地区白上农民的武装起义。队伍开到孔夫的隘头，与当地农民武装及龙岩后田的游击队汇合，讨论攻打白土的计划。6日，3县农民武装直指白上，打土豪，将其财产分给农民，烧毁地主民团住处等。起义指挥部决定乘机攻打龙岩城。但因众寡悬殊，进攻西门、南门的队伍先后受挫，牺牲10余人，被迫退回后田。后进攻坎市，又遭失败，撤出战斗。

不久，起义队伍编为红军第7军第19师，总指挥王海萍，下辖3个团。东肖和蚊洋的编为第55团，团长傅柏翠，党代表陈锦辉；金丰和上湖雷的编为第56团，团长熊振声，党代表卢肇西；金砂的编为第57团，团长张鼎丞，党代表邓子恢。

修水八月起义

1928年8月6日，中共江西修水县委组织领导农民武装万余人，在红5军的支援下举行起义，攻占县城，成立修水县苏维埃政府。

1928年7月下旬，平江起义的消息传到修水后，中共修水县委迅速作出了“发动群众，组织赤卫队，时刻准备配合红5军行动，建立革命政权”的决定。并委派县委负责人王铁猛前往平江龙门、长寿一带迎接红5军到修水。

中共修水县委于8月4日与红5军取得联系后，即共同商议了修水武装起义问题，拟定了攻城作战计划。根据计划安排，修水县委即派得力人员到仁乡、西乡等发动和组织农民赤卫队。同时，县委还指示在城内的共产党员陈秋光以烟酒局文书的合法身份，在城内发动手工业工人为内应，配合攻城行动。8月6日，在王铁猛、樊万祥等人的领导下，万余武装农民手持土枪土炮和梭标、马刀等武器，和红5军部队一起从朱溪向县城进发。黄昏，起义队伍分三路进入阵地。随着一声令下，枪声四起，杀声震天，各路起义队伍向县城发起猛攻。修水城内国民党驻军一个营和修（水）武（宁）铜（鼓）靖卫大队，依托城他负隅顽抗。这时，占领凤凰山制高点攻击北门的红军居高临下地向敌人实施压制射击，使守敌惊恐万状。城内的陈秋光带领十几名共产党员和手工业工人趁敌慌乱之际，悄悄迂回到西门换掉哨兵，打开西门，随即进攻西门的部队和农军一涌而进。主攻南门的部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的亲自指挥下攻破南门。国民党修水县长章力成和一批豪绅地主见大势已去，从东门出逃。战斗至晚9时许结束，全歼守敌1个正规营和靖卫大队共500余人，缴枪数百支。第二天，中共修水县委和红5军党委在县城召开隆重的祝捷大会，到会群众3万余人。彭德怀、滕代远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八月起义的胜利，把修水的革命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兰溪起义

1928年8月13日至19日，中共浙西特委书记卓兰芳、严汝清等人，在兰溪西南乡组织发动了农民秋收起义。

兰溪位于浙江省中西部，属金（华）衢（州）盆地北缘。1923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确定兰溪为全省6处暴动中心区域之一。4月中旬，省委特派员卓兰芳到兰溪后，即主持召开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会议决定加强甘溪、寿南等山区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对后陆村恶霸地主陆森林实行镇压等。同月22日，卓兰芳又主持召开浙西各县代表会议，并成立中共浙西特委，卓兰芳任书记，加强了对以兰溪为中心的浙西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5月下旬，卓兰芳回杭就任省委书记。6月上旬，浙西特委代理书记严汝清，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亲赴永昌、游埠等区巡视，同时指派特委和兰溪县委领导成员分头前往诸葛、水亭、从善、柱阳、甘溪等区，建立农军游击队，开展经济斗争和游击战。经过广泛深入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特委和县委拟订了兰溪起义计划。7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再次致信浙西特委，对当时兰溪的斗争计划提出了批评与纠正意见。省委在信中指出：“决不能幻想全县定期同时暴动”，同时对斗争中党的领导，群众的发动，农军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以及斗争的口号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7月中下旬，特委书记严汝清主持召开了浙西特委和兰溪县委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了兰溪的秋收起义问题。在此前后，全县各级党组织动员党员和群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8月上旬，兰溪农民秋收起义，在西乡永昌镇爆发。永昌镇离县城6公里，系兰溪西乡之重镇。国民党政府在这里设有警察分驻所，驻有警察20余人和省防军40人。为了夺取警察所和省防军的武器，特委和县委组织西乡农军攻打永昌镇。8月13日晚上，寿南、甘溪两区农军率先行动。徐柏清、李汝宾、邵根桂等率寿南区的100多名农军，在兰（溪）寿（昌）交界处的方染店、麻车岗一带烧毁地主的房屋及地契、帐册等。与此同时，姚鹤庭、黄佐华等率领甘溪区的农军100多名，在殿口村搜杀恶霸地主方如皋未成，收缴了他家的土枪，焚毁了田契凭据等。是日深夜，寿南、甘溪、柱阳、永昌等地农军，以及长乐石灰山、上方纸槽工人等1000余人齐集在红岩坪开会。县委委员徐玉衡、姚鹤庭和永昌区委书记徐柏清等号召大家勇敢地攻打永昌镇，争取多缴获国民党警察和省防军的枪支。8月14日下午，起义总指挥裘古怀等决定在当晚攻打永昌镇。入夜，寿南、甘溪、柱阳、诸葛、永昌等区的农军，和长乐石灰山、上方纸槽工人，共计800余人先后到达集结地点。裘古怀当即宣布起义队伍编为1个大队，下设3个中队，由姚鹤庭、徐柏清、李汝宾分任正副大队长，黄佐华、徐森有等任中队长。随后队伍经八石桥、桥下河向永昌镇挺进。为配合攻打永昌镇，14日晚上，严汝清坐镇兰溪城，指挥队伍策应西乡起义。西乡农军得知驻永昌之敌，已撤往一华里外的红店头村附近的小山头上，立刻向小山头逼进。接火后，由于农军的鸟枪硝受湿，武器不能全部发挥威力，敌人死守阵地一时攻不下来。时近拂晓，农军点燃了2个稻草堆，想以此扰乱敌人军心。但是不仅没有起到焚火扰敌的作用，反被敌人在火光中窥察了农军虚实，于是敌人就用机枪、步枪向农军猛烈扫射。经一夜奔袭的农军已很疲劳，队伍开始支持不住，裘古怀下令撤出阵地，分散隐蔽。8月16日，中共兰溪县从善区委获悉西乡农军攻打永昌镇，即按特委和县委的部署，组织发动南乡农民起来响应。下午，江边村

党支部书记聂新权获悉马达镇警察分驻所一股警察往殿下严村一带“巡查”，迅即向从善区委负责人郑根土报告，郑根土当即决定组织力量，进行打警夺枪。当该股警察进入殿下严村莲花殿时，郑根土、聂新权指挥由党员和农会骨干组成的一支 30 余人的队伍，对警察实行分割围攻，当场打伤警察 3 名，缴获步枪 4 支、子弹 30 余发。之后，郑根土、聂新权等趁势在殿下扳召集农军手持大刀、镢叉、竹叶枪等武器，先后到下傅、路塘、唐家、前吴、中吴、下包等村镇压恶霸地主，焚烧田契。在攻打永昌镇后，甘溪区 130 多名农军在区委书记朱树庭和黄佐华的带领，扎营于朱家村的幡山庙。8 月 18 日，严汝清亲临幡山庙农军驻地指挥。下午 2 时许，一股省防军 20 余人，途经朱家村的小岭。严汝清获悉后，决定伏击歼敌。农军抄小路迅速进入了鼓角蹄山制高处进行埋伏。当敌军进至杨岭桥头时，严汝清一声令下，农军居高临下，以火药炮向敌猛烈射击，敌人见农军人多势众，慌了手脚，急忙沿溪坑向建德县大洋方向逃窜。农军追击二、三公里，毙伤敌各 1 名，缴枪 1 支。

兰溪农民起义，震撼了整个浙西地区。省反动当局急调省防军两个连到兰溪，对农军进行“围剿”和镇压。省政府代主席、省防军司令蒋伯诚还亲自出马赶到兰溪坐镇。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党的领导人严汝清、邱福祥、陆确忠、陈子清等同志继续坚持斗争。12 月 28 日，严汝清不幸在兰溪城厢豆腐桥头被捕，翌年 6 月 9 日，被杀害于兰溪金钟岭。

稔田起义

1928年8月19日，中共福建省上杭县委在东南部的稔田乡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初，共产党员吴仰文和李立民等在稔田组织农民协会，有会员130多人。5月，李立民、丘伯琴、吴仰文深入稔田周围的农村，秘密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农民协会，并与永定县金沙等地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做起义的准备工作。1928年上半年，在张鼎丞、邓子恢的指导下，在稔田的官田、横岗、石碑前、连四、严坑等地都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组织了70余人的队伍。8月19日，在李立民、吴仰文的带领下，70余名起义队员和数百名农民协会会员在稔田举行起义。为策应这次起义，张鼎丞率领的金沙农民武装和傅柏翠带领的上杭蚊洋暴动队，也浩浩荡荡开到稔田。起义群众击毙民团团团长陈桂玉和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李集利、李凤、丘富全、李英、丘开华和丘永福等人，焚烧了地契、债约，开仓分粮，收缴民团枪支弹药。

起义胜利后，国民党上杭县当局十分恐惧。22日，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混成旅郭凤鸣部1个加强连和部分地主武装包围了稔田，大肆进行烧、杀、抢。因寡不敌众，李立民、丘伯琴组织起义队伍转移到永定与上杭县交界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霞渡潭起义

1928年8月,浙江永嘉西捕溪一带农民群众,在中共永嘉县委的领导下,在霞渡溪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3月,中共永嘉县委派李振声和雷高升到永嘉县小源、大源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并指示由胡振盛、胡协和等建立革命武装。8月,为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县委决定夺取霞渡潭国民党警察所的枪支,来武装自己。一天清晨,胡振盛、胡协和等带领20余名队员划船来到霞渡潭,用计闯进了警察所。他们用土制的“黄檀炮”,炸得警察个个趴在地上喊救命。这次战斗共缴敌人20多支毛瑟枪,还烧了警察所内全部档案,镇压了1个血债累累的警长。9月,他们又联合戴盛为的武装共140多人,去缴永嘉县枫林八湾1处祠堂内的浙保4团2连的枪。被敌人发觉,他们撤退到五尺山,打了1个下午,后来转移到黄南黄山。

八湾缴枪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豪绅勾结,联合对农民武装进行“清剿”。索性打起“招红军”的大旗,号召人们参加革命。不久,捕溪大小源一带的农民武装纷纷前来参加,部队迅速扩大到300余人,有步(火)枪200多支。这支队伍一直坚持到1930年3月,编入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胡协和担任3支队队长。

遂溪起义

1928年9月8日，遂溪县农军在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和遂溪县委的领导下，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发起了围攻遂溪县城的武装起义。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遂溪县党组织即以乐民区为中心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并在黄广渊、黄凌氏、陈光礼等中共党员领导下，建立起拥有200余人的农民自卫军。1927年5月14日，遂溪农民自卫军200余人包围了新圩仔，俘虏警兵7人。1928年8月，陈光礼等得知国民党遂溪县当局纠合安铺、遂溪等地近千人的兵力，准备围攻斜阳岛，将遂溪农民自卫军一举消灭的消息，随即作出了先发制人，进攻遂溪县城的决定。9月7日夜，遂溪农军100多人，由陈光礼、薛经辉率领，乘两只帆船由涸洲岛出发，第二天在介炮区的斗伦村上岸，与陈可章的武装会合（陈可章，原是南路军阀头子邓本殷部下团长。邓失势后，陈因不满国民党残暴统治，潜回安铺，组织队伍，暗助农军，后在香港被国民党捕杀），当晚开至廉江安铺。午夜，农军第1营第1连连长龙金贵带领短枪队10余人按计划到县城，从城西门爬墙潜入城内，向敌发起攻击。守城敌人从梦中惊醒，慌忙顽抗。这时，陈光礼、薛经辉率部赶到，与龙金贵里应外合，攻进城内，消灭了一批敌军，缴获60多支枪和一批子弹。国民党遂溪县长黄克，带着残兵败将，向着湛江赤坎方向溃退。农军一直追至麻章圩，才回师遂城。农军进驻遂城后，即打开监狱，释放共产党员、农会骨干和革命群众200多人。第二天张贴安民告示和宣传标语。10日，农军接到情报，得悉敌人从廉江开来进行反扑，遂主动撤离县城。遂溪县反动头子戴朝恩带一支人马尾随农军，在安铺后坡与农军接火，激战2小时。农军英勇战斗，把敌人击退。敌军退后，农军计划撤至徐闻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但因国民党顽军拼命阻拦追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农军再次撤回斜阳岛。一直坚持斗争到1932年11月。

金银乡起义

1928年9月14日，在中共四川涪陵县委的领导下，涪陵金银乡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8年7月，曾参加天宝寺农民起义的郑益阳回到家乡金银乡，被该县李渡地区民团大队长余测（共产党员）任命为金银乡联防队队长，张体仁（共产党员）为联防队指导员。郑益阳、张体仁发展工慎德、谭炳文等进步青年为联防队骨干力量，并请示县委同意曾参加过“天宝寺”起义的蔡德芳携带七八支枪到金银乡参加起义。经过精心策划，于9月14日晚举行起义，打死地主及地痞流氓数人，缴获银元1000多块。金银乡起义的枪声惊动附近的地主武装，他们向起义武装进攻。起义领导人考虑到联防队武装力量单薄，于当夜撤出战斗。因起义领导人皮若农不同意撤到敌人势力强的涪陵方向，而郑益阳坚持要去。由于意见分歧，虽然同意到涪陵城，但影响了战斗力，郑益阳牺牲，其余人员分散隐蔽。

崇德起义

1928年9月26日，在中共四川丰都县委的领导下，该县崇德乡农民举行了起义。

崇德地区（含今崇实、栗子、茶园等10多个乡）位于长江南岸的边远山区，山势险峻，土地贫瘠，农业收成很低，地主豪绅残酷剥削，使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对反动统治充满仇恨与反抗。中共组织因势利导，积极组织农民协会。至1928年6月，崇德地区有农民协会会员近万人。7月，中共四川省委派朱挹清回丰都清理党组织，召开了党代会，改选了丰都临时县委，甘禹疏任书记，朱挹清任副书记。县委改选后，把发动农民起义作为县委的首要任务。共产党员陈光鑫通过关系，打入崇德民团，并任民团队副，掌握250多支枪。9月26日，在甘禹疏的率领下，3000多名农民在崇德起义，第2天到达高桥，惩办了大土豪、团防头目冉子楨等7人，收了他们的土地、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周围群众受到鼓舞，纷纷参加起义队伍。28日，起义队伍到达五龙坝，与共产党员李文彬掌握的民团队200人枪会合，惩办了五龙场的土豪劣绅。10月1日，起义队伍抵进大月坝，焚毁团防局局长郎瑞丰庄园。4日，攻入栗子寨，起义队伍扩大到五六千人。7日，丰都县知事杨昭带领民团1个团围攻起义军，被起义军打垮。12日，驻四川万县的国民党第20军军长杨森派旅长龙焕章率部支援杨昭。在敌军强大火力攻击下，攻下栗子寨，起义军被打败，甘禹疏、陈光鑫等起义领导人英勇牺牲，剩余人员自行解散，起义失败。

崇浦起义

1928年9月28日，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崇安特支在福建省北部崇安、浦城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派遣熟悉当地情况的共产党员陈昭礼（陈豪人）、徐履峻从武汉回到崇安进行建党工作，两人几经周折，先后在崇安和建瓯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和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徐履峻为崇安特支书记，陈昭礼为闽北临时委员会书记，领导闽北地区的革命斗争。10月10日，崇安全县2000多农会会员，在徐履峻的带领下，在县城集会游行，并冲向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最甚的崇安土豪劣绅万钟棋家，捣毁他的住宅。这是崇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在崇安及其附近的建阳、浦城等县扩大了党的影响，成为农民武装起义的前奏。此后，崇安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年底，全县已有9个党支部和两个共青团支部。12月4日，闽北、闽南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并将崇安列为全省起义的第4区。

1928年1月，崇安特别支部扩大为崇安县委，徐履峻为书记。4月，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昭礼到崇安召开县委扩大会，传达了省委“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介绍了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要求闽北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会后，徐履峻、陈耿、徐福元等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将各乡农民协会改称为“民众会”，组织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斗争，同时，秘密准备武器，并以“防匪”为名，开展练武活动。崇安东、西、北乡近百个村庄，浦城西乡20多个村庄的农民都已发动起来。

9月28日7时许，利用中秋佳节、上梅圩期之机，徐履峻带领20多名武装农民，首先在上梅发动了起义。起义农民捣毁了日本买办牛焕书的松本厂办事处，逮捕了无恶不作的劣绅陈光盛，揭开了崇浦起义的序幕。10月1日，县委在上梅召开有4000人参加的暴动大会，会上宣布了纲领，成立了最高权力机构——崇安县民众局，局长徐履峻。会后，处决了两名反动分子，烧毁地契、债单，破仓分粮，减租两成。上梅起义后，在陈耿、徐福元、左诗赞等领导下，崇安、浦城等500多个村庄纷纷响应，起义地区纵横百余里。

崇浦起义震惊了国民党闽北军政当局。10月25日，在反动地主豪绅支持下，敌卢兴邦部1个团和驻浦城吴鼎元部，配合崇浦地方反动武装近千人，分4路进攻起义农民。农军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后被迫撤退。反动当局大肆屠杀起义农民，烧毁村庄20多个，民众局被摧垮，徐履峻在战斗中牺牲。其他各路起义军在陈耿、徐福元带领下，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崇浦第一次起义失败。

11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告崇安同志书》，并派杨峻德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来崇、浦地区指导工作，准备再次起义。1929年1月29日，各乡民众武装和农民群众千余人，在上梅下屯村万家庄举行第二次动员大会，恢复了起义总指挥部民众局，陈耿任总指挥。与此同时，在杨峻德、徐福元等领导下。先后以岗谷、浦城岱后和吴三地、大安源、坑口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

为巩固胜利，中共闽北党组织决定攻打反动民团团部所在地——五夫。2月13日晚，1000余名武装农民，在陈耿、杨峻德率领下，兵分两路，攻打

距上梅 15 公里的五夫，将数百守军击溃，并一度攻占了五夫。后因敌卢兴邦部 1 个团从建阳赶来，此时又正值大雨，起义军上枪用的

火药不能使用，150 多人牺牲，起义再次失败。分散在各乡镇的民众队员，在中共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并先后建立 16 支民众队 2000 余人。 10 月，崇安县委决定将 16 支民众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5 团，团长陈耿，副团长左诗赞，全团 1000 余人，下设 3 个营、9 个连和 1 个特务连。

武义起义

1928年10月10日至1930年10月，在中共浙江武义县委的领导下，武义举行了武装起义。

武义县地处山区，位于浙江中部。1928年3月，中共武义县委在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徐英和浙西特委邵博慈的指导下，召开县委扩大会，分析斗争形势，决定在东、西、南、北四乡建立区委，以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9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刘寄云主持召开永康武义联合起义会议，决定两县在10月10日夜联合举行秋收起义。会后，武义方面在徐英和县委书记邵李清的领导下，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10月10日晚上，集中在乾口塔山头坟庵的东区起义武装400余人，兵分几路，形成四面出击的态势。起义的枪声打响以后，地主豪绅纷纷逃往城里。为进一步打击国民党和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县委于1930年1月27日，在邵宅乡王村龙潭坑开会决定成立红军。定番号为“中国共产党浙武红军游击队”。同年3月，武义县委决定扩大红军活动范围，在金（华）武（义）交界的大公山建立了红军总指挥部，徐金才任总指挥，邵李清任党代表兼副总指挥。下按东、南、西、北四个乡设立四路红军指挥部。6月，又在白阳山一带建立了第五路红军指挥部，指挥何叶珍。红军队伍达到3000余人。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震惊了国民党当局。4月初，国民党政府调一个连的正规军、省保安队派二个连到武围剿红军。同时国民党武义县政府也派游緝队百余人，突然袭击大公山红军总指挥部的前沿阵地坞垄，由于红军事先转移未遭损失。4月16日拂晓，省保安队和金华县保安队300余人兵分3路，包围了大公山。当时红军总指挥部约200余人，利用险要地形在金坪岩、滴水岩居高临下，顽强坚守，战斗从黎明打到傍晚。敌人鉴于强攻艰难，采取四面封锁，进行围困。红军在李清的指挥下，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当夜派人到清塘山上给北路红军报信，北红军接到情报后，马上由副指挥刘增荣率领70余名战士赶到距离驻地15公里的县城，从西门集中火力袭击。国民党县长朱航珍惊慌失措，连夜下令调兵返回县城，使大公山的红军得到安全转移。西路红军得知敌人准备攻打从四保大山区仰天垄迁移到金公岩的红军驻地后，一方面昼夜建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派部分战士下山到下杨、王宅等地缴了国民党警察所、保卫团的枪支弹药，还收集太平天国时期散落在民间的大炮，准备迎击敌人。8月17日凌晨，国民党军100余人，在机枪的掩护下，沿着山间小道，向金公岩顶进攻。把守关口的红军凭借有利地形和事先架起的大炮、搭好的“千斤棚”，当敌接近时，即刻割断吊“千斤棚”的绳索，并以大炮轰击，顿时乱石飞滚而下，弹片横飞，打得敌人乱成一团，当场死伤8名。晚上，敌人一面重兵封锁通往岩顶的去路；一面从左侧悬崖攀藤爬上岩顶。指挥部决定采用“点灯诱敌计”，即在岩顶四周燃火把。敌人见岸顶火把密布，误以为红军准备正面突围，拼命开枪开炮。此时，部队从岩后老鼠梯、野猪坝攀枝而下，撤出阵地。次日黎明，敌才知红军已经撤离，只得狼狈回城。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11人。1930年8月，国民党省保安队又派出160余人，进驻后树一带。他们在董处、水阁、下徐宅等10多个村庄，强迫16岁至60岁的男劳力组织“保卫团”，设置岗哨，封锁武义红军与金华、宣平红军的联络通道。为拔除敌人的据点，武义红军与宣平、金华红军决定于10月7日，集中2000多人联合攻打后树。6日晚上，武义西路红军和宣平西营红军

分别按计划路线攻进长蛇形和西庙下村，当即烧毁了敌营房。但由于另两路红军尚未赶到，使敌人有了回旋、增援的余地，造成战斗失利。到了天将拂晓，红军被迫撤退。是役打死打伤敌兵 10 余人。

武义起义，红军全盛时期达 5000 人，他们转战南北，活动范围遍及全县 90% 的乡村，涉及金华、宣平、缙云等县的边境地区，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封建势力。

永康起义

1928年10月11日，浙江永康县游仙、长安、合德地区农民，在中共浙西特委指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永康县西邻武义，毗邻义乌，东北与东阳、磐安接壤，东南与缙云相连。1927年10月，中共永康县委正式成立。到年底，全县共建立了40个支部，党员达700余人。

1928年6月，浙西特委派姚鹤亭到永康组织武装起义。8月，省委又派刘寄云到永康、武义地区指导和督促起义工作。9月13日，刘寄云主持召开了永康、武义地区联合起义会议，成立了永武联合起义军事委员会，刘寄云任主席，并决定起义时间为10月10日，要求两县积极做好准备。会后，永康县委在游仙区南山沿本保殿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起义事宜。决定以游仙区为中心，成立永康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寄云、章会辰为正、副主席，下设指挥部和参谋部，胡思友任总指挥，章会辰兼参谋长。指挥部下辖1个大队4个中队，大队长由胡思友兼任。9月28日，中共长安区委决定首先处决恶霸倪瑞芝。10月5日，当倪瑞芝坐着轿耀武扬威地经过白云山脚长塘地方时，事先埋伏的暴动队员一拥而上，枪决了倪瑞芝，除了一霸，民心大快。10月11日晚，游仙区的400余农民革命军分别集中在派溪山、桐岭头、应南溪桥头等地，对芝英形成包围态势。合德、长安区委于当晚发动党员和群众割断了县城通往缙云、金华的电话线路。章正广带领突击队员，包围芝英省防军的驻地。正待发动攻击时，事先联络好的内线发生动摇，没有送出情报，加上荷枪实弹的省防军在四周加强巡逻警戒，起义队伍无法按计划进行，只得撤出战斗。面对变化了的情况，指挥部临时决定兵分3路杀豪绅恶霸：芝英中队打击儒堂卢德勋；胡库中队打击胡汝舟；溪岸中队打击陈安心。后胡库和溪岸2个中队未行动。芝英中队100多起义队员在刘寄云、章会辰带领下于深夜2时直抵儒堂，撞开大地主卢德勋家大门，杀了卢德勋，并把他的财物分给儒堂和胡堰街的贫苦农民。

永康起义保留下的农军骨干，为尔后建立红13军第3团奠定了基础。

袁州起义

1928年10月20日，在中共江西莲花县委联络站的策动和帮助下，国民党军第8路军第21军第1师第3团第3营营长张威率部在江西袁州城举行了起义。

1928年6月，国民党军进行缩编，军阀借机排除异己，扩大自己的势力。8月14日，国民党军第21军第1师受命调防赴鄂途经长河近郊时，被何键部队强令收缴武器，官兵就地解散。当时该师第3团第3营营长张威及其所部正在长沙东站一带待车赴鄂，得知先头部队被缴械解散的消息后，决定携械出走。18日，张威及其所部400余人由浏阳西乡转入南乡，于9月初进驻袁州。在国民党袁州县党部任文书的中共党员谢振兴了解张威所部情况后，主动接近张威，劝其弃暗投明。张威对共产党、红军早就有所了解，经谢振兴做工作，毅然决定起义参加红军。

10月20日晚11时许，在中共莲花县委袁州城南联络站的帮助下，张威率领全营官兵正式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党员谢振兴等人的带领下，迅速开出袁州城，星夜向莲花前进。在安福境内的武功山附近，与国民党第6军教导师彭子国部的1个团遭遇。由于匆忙迎战，敌强我弱，起义部队不敢恋战，撤往武功山。中共莲花县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交通员刘春元带领起义部队向莲花红色独立团驻地进发。途中，起义部队与莲花靖卫团交战，由于战斗伤亡和部分官兵开小差，最后只剩下120多人，96支枪。起义部队与莲花红色独立团会合后合编为3个连，张威所部编为第1、第2连，原独立团战士编为第3连，张威任团参谋长。11月，独立团进行改编，起义部队的两个连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独立营，张威任营长。

山巷里起义

1928年10月26日，国民党新编第8军第3师第8团第2营营长毕占云在共产党的影响和策反下，率部在湖南桂东县山巷里举行起义。

国民党新编第8军第3师第8团第2营是一支地方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倍受歧视和排挤，军饷经常被扣发，部队官兵很不满。1928年，营长毕占云因掩护被上级追查的该营2名共产党员离队，被降为连长，队伍亦被改编为1个连。军阀阎仲儒还准备要收缴他们的枪支，引起了官兵的强烈不满。团部1名副官是共产党员，他抓住时机做毕占云的工作，毕终于下定决心，投向革命。同年8月间，毕占云执行堵截红军入湘的命令，率部驻守桂东县沙田、寨前一带。他准备伺机起义，投奔红军。10月下旬，毕占云部移驻桂（东）酃（县）边界时，接到攻打红军的命令。毕占云立即派员与红4军联系，准备起义。25日晚，桂东县清乡总队10余人同国民党军某部的1个营出发至寒口。在山巷里，毕占云部抓获桂东县清乡总队小队长李胜良，缴到一封机密信函。毕占云等迅速除掉3个反动军官。次日，毕占云带领全连126人在桂东山巷里宣布起义。随即从山巷里出发经寒口、汤湖、左安到达井冈山。

毕占云率部到井冈山后，红4军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并讲了话。会后，将这支起义队伍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特务营（即警卫营），毕占云任营长。

沿溪桥起义

湘鄂赣边红 2 纵队与浏阳沿溪桥武装群众相配合，于 1928 年 11 月 15 日发动攻打沿溪桥的武装起义。

湖南浏阳县沿溪桥北靠大光山区，南依浏阳河水，是湘赣要道之一。1928 年秋，何金建派侯鹏飞带 1 个加强连驻守沿溪桥。由红 5 军的第 5 大队和平江、浏阳等地游击队统编的红 2 纵队，决定发动群众举行暴动，攻打沿溪桥，拔掉这颗“钉子”。11 月 15 日凌晨，红 2 纵队和当地暴动群众在浓雾的掩护下，兵分 3 路接近沿溪桥。中路由红 2 纵队党代表张启龙指挥，从马江口上水礁子直捣侯鹏飞住的肖家祠堂；右翼由大队长李石雄指挥，从磨盘岭、油榨坝、石路上直取桥西万寿宫，截住敌人逃往三口、古港的去路；左翼由浏阳县委交通员陈万福指挥，从石灰嘴横过大河，到汪家屋场、纸坊、堤上、洞子冲一线，截住敌人向永和逃窜的去路。整个行动由红 2 纵队长黄公略负责总指挥。兵临城下后，红 2 纵队先派尖兵魏绍昌等摸掉敌哨，然后，迅速潜入镇内，实施突然攻击。在梦中的侯鹏飞忽听枪响，知大事不好，即滚下床，转向后门逃遁。其他敌人乱作一团，当即被缴械。战斗约 1 小时胜利结束，缴获步枪 29 支，短枪 1 支，子弹 2 担，并捣毁沿溪桥挨户团办公处 1 所。

沿溪桥起义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志。为此，1930 年 4 月，浏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将这一天定为“浏阳农民武装暴动纪念日”。

德兴年关起义

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中共江西德兴县委发动和领导了数次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1月的弋（阳）横（峰）农民起义，推动了德兴土地革命运动的兴起。同年3月，中共德兴区委在应家秘密建立。5月，江西国民党军1个团进驻弋阳、横峰。为反对国民党军的武装镇压，中共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方志敏召开弋横两县党、团县委联席会议，部署对国民党军的军事斗争，同时派方远辉到德兴县组织年关起义。8月，中共德兴县委成立，书记方远辉，同时成立了团县委。县委成立后，立即把共产党的干部分成3路，深入到边区各个乡村宣传组织群众。与此同时，方志敏也多次到德兴举办共产党员训练班，培养干部。同时各村还组织了农民革命团。经过县委和党的干部一段时间的工作，德兴西南乡的三个区先后建立了几十个党支部，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加入了农民革命团。

11月中旬，国民党军第36旅周志群部向弋横苏区发起“围剿”。为配合反“围剿”斗争，中共德兴县委于11月23日夜召开各村支部联席会议，宣布成立起义指挥部，立即举行全县年关起义。11月26日，县委得知苏家村大地主马洪元准备到乐平搬兵前来与革命势力对抗，立即决定由第1区的苏家、大田、能家、董家、毛家贩等5个村子的农民革命团捉拿马洪元，并以此为信号，发起武装起义。当晚，农民革命团团员手持梭标、大刀，包围大地主马洪元住宅并将其捉拿。第2天，应家、磨角桥、徐家、大塘里、沙贩、洋源、罗家、潭口、邱家、吴家、周家、杨梅山、三元坞等村子也先后起义，镇压恶霸地主，没收土豪劣绅财物。18村起义成功后，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选举程乔禄为主席。区下辖6个乡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脱产的工农游击队，以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12月上旬，国民党军第36旅第1连前来德兴镇压18村农民革命团，该团官兵在苏区人民的政治攻势面前倒戈哗变，有60多人带枪投奔苏区。与此同时，县委在第2区的张村、梅溪贩、墩上等10几个村庄发动了起义。抓获了国民党区长洪观光和一批土豪劣绅，并将其首要分子处决。起义成功后，召开了德兴第2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

1929年1月，县委以第3区的重溪为中心，在绕二墩、花林、水口等几十个村子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各村农民革命团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打击本村的土豪劣绅，烧田契、分浮财、毁债据、废租约，摧毁了国民党的乡村政权。接着，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选举刘永视为主席，下辖8个乡苏维埃政府。

德兴年关起义后，形成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弋（阳）横（峰）德（兴）苏区。

盘古山起义

1928年11月到1930年4月，中共江西省赣南特委在于都县的盘古山地区领导工人和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盘古山又称仁凤山，位于于都县的南端，山下座落着经济、文化的聚集点——仁凤圩。乱石（今靖石）、茶梓、仁凤3个村落通称为盘古山地区。1928年6月，中共赣南临时特委移驻于都集前，随即派出一批有工农运动经验的骨干到盘古山地区，发动群众，扩大农民协会组织。同年冬，南康潭口农民领导人之一兰广孚到茶梓后，组建起一支由共产党员和农协骨干为主的茶梓农民赤卫队，钟文亮任队长。并在茶梓圩附近的村建立了贫农团。11月12日晚，茶梓农民起义队伍，在兰广孚、钟文亮等领导下包围了茶梓圩。起义队伍在群众的配合下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并将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15日，赣州的国民党军1个连和安远的靖卫团联合进攻茶梓圩，镇压农民起义。农民赤卫队奋起还击，但因寡不敌众，茶梓圩很快陷入敌手，赤卫队员数人牺牲，被俘20余人，兰广孚也中弹受伤。在此同时，靖石地区的革命力量也遭到禾丰、小溪等地反动武装的袭击，农协和党组织被破坏。整个盘古地区的农民运动转入低潮。

1929年6月，中共赣南特委为重新恢复发展盘古山地区的党组织，决定成立中共盘古山特区委员会，并委派徐复祖（化名刘义顺）担任特区书记、陈奇任副书记。徐、陈到盘古山后，深入到工棚、农家，发动群众，很快恢复了当地的中共党组织和农协组织。1930年4月，黄沙土豪叶居良仗着小溪、禾丰的反动势力撑腰，欺压农民。刘义顺当即召集党员和农协骨干分子会议，决定将茶梓、靖石的党员及农协骨干、盘古山矿工工会积极分子组成工农赤卫队举行起义。赤卫队队长谢海波，副队长钟元漳，党代表刘义顺，共300余人。手持各种武器分3路向黄沙进发。刘义顺指挥的中路在两侧赤卫队员的配合下，经与驻守在土围内的地主武装激战，冲进黄沙，敌人败逃。不几日，黄沙土豪搬来小溪、禾丰的两股反动势力“进剿”靖石，为保存革命力量，刘义顺率队转移至深山密林中。

4月中旬，刘义顺等率300余名群众到会昌投奔红4军。红4军前委遂决定将盘古山特区扩大为安（康）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区委，任命刘义顺为特委书记。同时，还决定在盘古山工农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赣南红军第22纵队，任命谢海波为纵队长，刘义顺为政治委员。为贯彻红4军前委关于目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农暴动消灭地方靖卫团和镇砂兵等白色武装，建立红色政权的指示精神，刘义顺召集了红22纵队的干部会议，决定攻打盘古山地区最强的仁凤靖卫团和盘古山国民党钨砂局。4月23日晚，红22纵队以小部兵力封锁靖石通往禾丰和丰田的通道，扼守仁凤通往小溪的要道，拦截败逃之敌；主力分为两路，一路攻打山上矿警所，另一路攻打山下的钨砂局和仁凤靖卫团。红22纵队在当地群众和矿工纠察队的配合下，冲向反动势力的巢穴。经激烈战斗，共毙伤靖卫团丁和矿警8人，俘吴子光、谢老三、钟一古等土豪恶霸，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翌日上午，红22纵队在竹山坪召开庆祝大会，宣布4县边界特区委和红22纵队成立，并同时成立4县边界特区总工会、矿工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此后，4县边界特委领导边区广大工农群众，率领红22纵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攻打了茶梓、龙布、桂林岗、计埠、长赖、丰田等地

的靖卫武装，在短短的几十天内，基本肃清了盘古山及其附近地区的反动势力。在战斗中，红 22 纵队得到发展壮大，由原来的 1 个中队扩大到 3 个中队。

5 月底，4 县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茶梓圩成立，设立了靖石、茶梓两个区苏维埃政府，建起了茶梓、靖石农民赤卫队和矿工赤卫队。从此，边区人民在 4 县边界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全面的土地革命运动。

金坛白塔起义

1928年12月上旬和1929年4月、5月，中共江苏金坛县委领导白塔地区的农民，先后举行3次武装起义。

白塔是金坛县城北边的一个小镇。1928年4月，中共金坛县委成立后，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以白塔地区为中心，对农民进行“地主为什么富，农民为什么穷”的革命思想教育，壮大党的力量。是年，适值天旱灾荒，粮食歉收，广大佃农缺吃、缺穿，抗租斗争不断涌起。就在这时，省委派人来金坛巡视工作，在县委委员艾小根家里，先后召开了几次县委会和小型骨干会议，认为佃农已发动起来了，起义时机已基本成熟，要县委迅速做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据此，县委研究决定成立起义委员会，由管文蔚任总指挥，蒋铁如、潘鸿仁任副指挥。接着，起义委员会又分头做了其他一些准备。11月的一天晚上，县委在白塔蒋庄吴家祠堂，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和佃联会会员共300余人参加的大会。大会历时4个多小时，会员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显示了佃农团结斗争的力量。

1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管文蔚、蒋铁如、潘鸿仁等组织共产党员、佃联会骨干50余人，身带武器，在白塔官塘桥西的一个佃农草棚里集合。管文蔚作了简短动员后，手握短枪，一马当先，带领手持枪支和长矛、大刀的队伍急奔水岔口，与当地积极参加起义的农民共700多人，包围了作恶多端的故乡长翟老二的家园。昔日如狼似虎的翟老二，吓得软瘫在地，叩头求饶，发誓不再与人民为敌、为地主收租粮，愿交出钱财，给农民军买武器。并以全家性命担保，决不告密。初战告捷：白塔周围的沈读、城塘、殷庄、东村、柘荡等地的佃农纷纷响应，加入佃联会，掀起了抗租抗粮的革命浪潮。为使抗租抗粮斗争坚持到底，管文蔚等人在孔庙前李小红客栈，印发了《抗租抗粮的暴动宣言》，并书写了数百份标语，四处散发、张贴。消息传出后，金坛、丹阳军警连夜出动，镇江的敌人也向白塔开来。县委研究决定，为保存有生力量，由管文蔚率30多名起义骨干及部分枪支向丹阳县境转移，其余人员分散隐蔽。敌人到达白塔后，疯狂地搜捕起义人员。艾小根等人被逮捕，蒋铁如遭通缉。

1929年4月，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夺取金坛西门外大地主陈梧刚的枪支弹药，来武装自己，开展武装斗争。在继任县委书记管文蔚的指挥下，由潘鸿仁率领管庄、蒋庄2个支部的党员王金寿、王义隆等30多人，以及白塔佃联会的100余名骨干，由陈梧刚的一个雇工引路，直奔清培桥陈梧刚的家。王金寿、王义隆等七八个青年悄悄翻墙入院，缴了守门及碉堡里保镖的枪。潘鸿仁带着起义队员冲进陈梧刚内室，对其晓明大义，要他交出全部枪支弹药和金银，陈梧刚拒不承认碉堡外还有枪支，只交出了金银、首饰1斤多，并立下“春荒借粮、减收租粮”的字据。潘鸿仁用枪点着陈梧刚的脑袋警告说：“你要去告密，当心你的狗头！”接着，队伍撤出大院，回到了管庄。当时，金坛广为流传一首民谣：“前管庄，后管庄，出了一班共产党；盒子炮，后膛枪，打击土豪陈梧刚”。5月初，县委又组织2000多人在白塔集合准备再次起义，因走漏风声，遭国民党军警重兵围剿而夭折。潘鸿仁、王金寿、王义隆被捕。

这几次起义，在敌人“围剿”下虽然失败了，但它震惊了国民党金坛县当局，打击了该地的地主豪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使广大农民群众认识

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与敌人进行斗争。

饮马起义

1928年12月25日，共产党员于培绪、黄复兴、黄世伍在山东省昌邑县饮马镇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

1927年秋，共产党员黄复兴和黄世伍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派遣，回家乡饮马镇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冬，山东省委又派于培绪回饮马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同黄复兴、黄世伍开始建立农民武装。在这前后，为了抗击军阀流寇的抢劫骚扰和名目繁多的捐税，昌邑各地先后成立了自发的农民武装——红枪会。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于培绪认为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成立“胶东行署农民协会”，对外称贫民会。1928年初夏，在饮马镇天齐庙前召开成立大会。随后，附近徐家庙子、刘家营子等许多村也都成立了贫民会，饮马一带的农民运动日趋活跃。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8年10月，成立了中共饮马党支部，书记黄世伍，委员于钦绪，于敦茂、于钦敬。党支部成立后，饮马一带的农民斗争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昌邑县党部对此非常恐惧，想方设法企图打击和消灭饮马的共产党组织和农会。为了掌握斗争的主动权，饮马党支部要求全县党员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并首先争取红枪会，以农会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饮马红枪会，会员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于培绪等经常到有红枪会组织的村庄开展工作，把附近各村自发的分散的红枪会联合起来，并与高密县的红枪会取得联系，成立了42个村庄的“联庄会”，拥有会员5000余人。饮马农民斗争的锋芒直指土豪劣绅和军阀土匪。11月底及12月初，手持长矛的红枪会员先后包围了恶霸地主于维清和张孟合的住宅，收缴枪支弹药，开仓分粮，烧毁帐本。土豪劣绅惊恐万状，暗地买通驻昌邑城的军阀黄凤歧，伺机镇压饮马的农民运动。于培绪获悉黄凤歧的部队要偷袭饮马的情报后，经同红枪会负责人研究，决定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12月25日，黄凤歧部团长王路全率300余人，扑向饮马。早已得到情报的饮马红枪会在镇北门安设了两门铁炮，将本镇的12个大门全部封屯牢固。后柳行、张家屯、杨家桥、坡子、白里等村的1000多名红枪会员也齐集饮马，严阵以待，准备同王路全部决战。10时许，王路全部包围了饮马，在北门外架起迫击炮和水压机枪准备进攻。但看到红枪会实力雄厚的阵式，未敢强攻。相持一段时间后，王便提出休兵讲和，双方进行谈判。

农会负责人于中田等私自开门放王路全带兵进入饮马。进村后，王路全假惺惺地当众指责饮马的豪绅，表示同情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傍晚，王带兵离开饮马。于培绪等未识破王路全设下的骗局，于当晚便让外村的红枪会员撤回。26日凌晨，王路全率部杀回饮马，村内反动豪绅作内应，进行了血腥屠杀。农会和红枪会负责人王聚堂、李天伦、于中田等被当场杀害。于培绪、黄复兴被捕，押至昌邑县城，当晚被杀害。起义失败。

萧山南乡砍竹起义

1928年冬，浙江萧山县云石乡上堡、沈村、丁村一带的贫苦农民和土纸工人，在中共萧山县委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打击封建剥削势力的砍竹起义，威震南乡。

1927年七八月间，中共萧山县委派党员瞿缙云以国民党县党部南乡农运指导员的身份，到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同地主、槽户进行斗争。在农民和纸工中发展钟阿马等一批骨干入党，建立了上堡、沈村、丁村党支部。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不久，钟阿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党员为核心建立上堡农民武装组织“铁血团”，拿起了土枪、长矛，公开领导农民和纸工同地主、槽主开展斗争。当时许多纸工因失业而没有饭吃，钟阿马就带领“铁血团”，组织贫苦农民和土纸工人纷纷拿起砍刀，上山砍竹自救。

1928年秋天，中共萧山县委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钟阿马当选为县委委员，决定将沈村、丁村的农民协会作为基础，以党员为骨干成立“铁血团”，由钟阿马任总指挥。至此，上堡、沈村和丁村农民武装力量进一步扩大。同年冬天，上堡大地主钟麟涛与义桥震泰钱庄老板相勾结，上门逼债，强迫负债户以仅有的微薄山产作抵押，如果在一个月内不能偿还债务，就要把抵押的山产拍卖抵债，这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为了保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县委指示钟阿马带领“铁血团”联络群众，不还债、不抵押。同时，掀起声势浩大的砍竹起义。“铁血团”数百人连夜上山大批大批地砍伐震泰钱庄和钟麟涛等地主山上的毛竹、树木，并将已经抵押的农民山田归还原主。这次砍竹暴动，共砍树100余株，毛竹4000多斤，还没收抵料35件。斗争的胜利，使长期受地主阶级压榨的贫苦农民和纸工扬眉吐气，他们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进一步鼓舞了斗

1929年4月，国民党萧山县政府向省政府请兵，要求镇压暴动。19日夜，浙江省保安队和萧山县警察70多人荷枪实弹奔赴上堡剿捕。钟阿马得知消息，即率“铁血团”携带土枪、板枪等土武器，退至山高峰险的乌龟石山，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农民军终被打散，钟阿马等10人被捕。1930年8月30日，钟阿马在临浦峙山脚下惨遭杀害。

湘阴起义

1929年1月1日，中共湖南湘阴县党组织发动洪源洞、向家洞、兰家洞群众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湘阴县党组织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秘密发展党员，组建农民武装，准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1927年9月，为响应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阴白水农军曾会合长沙县农民军准备进攻长沙城。同年冬，为响应中共省委年关暴动指示，湘阴县委决定在玉池山梓木洞、临资口等地发动武装暴动，后因情况变化而夭折。1928年冬，在平江县西四区区委书记陈跃华（即朱玉涛）领导下，湘阴共产党员左磊钦、聂次应、吴汉舟等发动洪源洞、向家洞、兰家洞100多名农民群众，组成三路敢死队，准备武装暴动。1929年1月1日，敢死队员首先处决了兰家洞反动地主8人，放火烧掉一土豪房屋，接着在洪源洞、向家洞处决地主豪绅15人。1月12日，攻打长乐乡挨户团派到兰家洞镇压农民运动的地主武装，缴获步枪21支，弹药一批。此后又配合平江县游击队攻打了平江县一地方挨户团，毙敌42人，缴枪60多支。

湘阴起义后，驻湘阴的国民党军纠合湘阴、平江两县挨户团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占领了洪源洞、向家洞、兰家洞，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起义失败。

庄行起义

1929年1月21日，中共江苏淞浦特委和中共奉贤县委领导和发动奉贤县庄镇周围的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庄行，亦称庄家行，是奉贤西乡的一个大集镇，又是奉贤、金山、松江三县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1926年，侯绍裘、林钧等共产党人就在奉贤开展革命活动，并在庄行及其邻近的戴家桥、叶榭、盛样庙、烟墩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协会会员。1927年春，农协会会员已发展到万余人。同年秋，中共奉贤县委正式成立，刘晓任书记，唐一新任中共奉西区委委员兼庄行党支部书记。1928年春，中共江苏省委派林钧到奉贤，在老城的曙光中学秘密召开了奉贤、南汇、川沙三县的党、团骨干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号召举行起义，实行土地革命。12月，奉贤县委向中共淞浦特委请示举行庄行起义。淞浦特委认为起义不符合党的六大精神，没有同意。

1929年1月5日，奉贤县委在庄行以北的邹家桥召开第四区非常代表会议，决定在庄行举行起义。会后，县委又向淞浦特委作了请示，得到同意。宣布成立了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即行动委员会，下设军事、政治宣传、交通4个部。后因淞浦特委直接参加，有关起义的军事、政治等方面，事实上已由特委负责。起义前几天，特委的杭果人、陈云、严朴、茅学勤，以及参加过江阴起义的高大生等6名红军到了庄行地区。

起义原定于1月20日晚举行，因下雨，遂改为21日晚举行。但21日雨仍不止，为防止走漏消息，县委决定不再延期。仅有的500余名起义队员颈系红布条为标记，手持长矛、大刀、铁叉、棍棒和土枪于晚7时半出发，约1个小时齐集庄行。按预定计划兵分3路，刘晓率领四路攻打公安支局；陈云领导中路直冲街中，以切断商团与公安队的联系；茅学勤、杭果人、严朴率领东路攻打公安队。刘晓队伍率先行动，击伤敌警士2人，击毙职员1人，余敌被缴械。公安支局长张同昆仓皇逃走。余部稍加抵抗即被缴械。全镇的反动武装不到1个小时被完全打垮，起义队伍占领了庄行镇。起义群众冲向豪绅地主及奸商家，焚烧田单、契票、债票等物。下半夜二三点钟，起义队员撤出庄行，凯旋而归。起义结束后，陈云、刘晓等连夜撤回上海，唐一新、冯银楼、吴大龙、吴三龙等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这次起义，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嚣张气焰，也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奉贤县政府一再请求派兵“驻县镇慑”。起义后的第3天，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派1个营进驻奉贤“弹压奉贤共党”。

江苏省民政厅得报后，即饬委员黄复兴、特务大队长刘潘，统率所部官兵五六百人，星夜出发，于27日夜抵南桥。大批反动军警进驻奉贤后，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起义群众。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冯银楼3月1日不幸被捕，5月23日被杀害于松江县叶树镇。但仍有不少领导成员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为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播下了革命火种。

南通东乡起义

在中共江苏南通县委领导下，南通东乡农民自1929年2月2日开始至1930年5月，连续举行了武装起义。

南通东乡，是指南通县的余东、余西、余中、三益、三余5个区，这里的土地全被地主豪绅占有，他们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剥削农民，农民的生活极端困苦。1929年1月，南通东乡的田赋正税、附加税剧增，捐税名目越来越多。为此，中共南通县委决定组织农民进行年关抗租斗争，提出了“不完租、不完粮、不还债、不交捐”的斗争口号。经过发动，一批积极分子和大胆的农民都向收租人“推三阻四”。这引起了恶霸地主的警觉，扬言不交租还债，就要派兵抓人。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根据群众的要求，于2月2日在俞家沟（今属海门王浩乡）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场镇压了恶霸地主俞兆歧、俞兆魁，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地主的嚣张气焰，农民第一次过上了一个没有地主追租逼债的快活年。在斗争胜利的形势下，县委于2月在仇家园召开了5000人的群众大会，成立了南通东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3月，又在原有武装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三益、余中、余西、余东4个武装小队，分别由仇建忠、唐楚云、陈宗恒、俞金秀领导，正式打起红军游击队的旗号。同时，在乡以下各行政单位、农民协会和妇女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也都纷纷建立起来。

10月下旬，中共南通县委组织发动东乡游击队和农民群众攻打汤家直的地主民团武装，由于敌凭借碉堡顽抗，久攻未克。游击队员和农民群众冲进汤家直地主住宅，烧毁田契、租约、债据，没收部分粮食和农场，处死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以后，南通东乡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游击队抓住敌人的薄弱点频频出击。11月，游击队首先插到通如（皋）边境，攻打二窠据点，缴到长枪30余支，争取7名敌军士兵反正。12月，游击队在农民群众配合下，攻克余东镇和北兴桥，歼灭实业警察一部，缴到部分武器。游击队连打胜仗，威信日高，每天都有农民要求参加游击队。到1929年底，通东红军游击队发展到四五百人，能经常集中行动的有200多人，拥有长短枪120支。1930年2月6日，南通县委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在南通东乡草蓬镇（今属海门四甲乡）附近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江苏1大队。同年4月，工农红军第14军成立，该大队改编为红14军第1支队。5月，1支队又改编为红14军第2师。

南通东乡的武装起义，特别是起义后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当局非常震惊，从1930年1月起，连续出动军警配合地主武装对东乡实行重点进攻。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游击队根据县委指示，采取声东击西，避强就弱的方法，与敌人周旋，打击敌人，保护群众。2月4日夜，游击队主动出击，一举歼灭地主“团练”30多人。3月21日夜，红军第1大队由俞金秀、仇建忠等率领，在农民群众配合下，又拔掉敌人对东乡加强军事“围剿”，设在四杨坝、四甲坝的两个据点，缴枪100多支，击毙敌区队长凌霄，活捉大地主、县委议员陈卜纬，救击被捕农民20多人。第二天，红军在四甲坝广场上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惩办了陈卜纬。为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红14军1支队队委会和地方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发动群众，二打汤家直。20日清晨，红军、赤卫队和群众共一万四五千，浩浩荡荡向汤家直进军。战斗打响不久，击毙白龙党头子汤虎臣，歼灭地主武装60余人。

二师师长秦超及 30 多名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此时间三余镇的敌军已经出动，为减少损失，起义队伍主动撤出战斗。这一仗，虽然没有攻下汤家苴，但它压下了当地反动组织——白龙党的凶焰，使他们不敢轻易下乡骚扰，同时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的威力。

松江新街起义

1929年2月6日，江苏中共浦南县委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在松江新街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

新街，又称北新街，系江苏省松江府的一个小镇（今上海市金山县朱行乡新华村）。金山县与松江县及浙江的平湖等地同属浦南地区，这里1927年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8年9月浦南县委建立，书记翁明哲，委员有李一谔、张善述、李新民。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县委成员积极在各地开展农运工作。同年10月，中共淞浦特委组织部长陈云到金山巡视工作，向浦南县委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配合工人大罢工，武装夺取政权。在陈云的直接帮助下，浦南县委增加了农民成份的领导成员，建立29个党支部，有党员400余人。为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县委增设了军事部，成立了武装斗争司令部，组建了一支称为“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浦南县委报告中称“红团”）的农民武装。同时，积极筹备武器弹药，准备举行起义。

1929年2月6日，起义队员从金山县的佣里庵、大石头、金山卫地区，松江府的甸山、马棚、官桥、平湖县的转角湾等地分别向新街镇附近的五坟庙集结，有300多人，其中中共党员百余人。当晚10时许，起义队员臂缠白布条为标记，以红旗为前导，冲向新街镇。镇上地主豪绅们豢养的保卫团不战自溃，逃避一空。县委派人扼守镇的东西两头，然后带队冲进恶霸地主张忍百家的前埭院宅。这时，张忍百已潜出后门乘船逃走。随后，没收张的浮财分给群众，放火焚烧帐册和房屋，并在镇上张贴宣传标语及张忍百的罪状书。当晚12时许，翁明哲、李一谔等人集合队伍，分路撤出，高唱凯歌而归。新街起义，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当地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为此，反动当局下令驻松江县山阳镇的水警缉私营4大队队长潘梅亭，率兵到甸山镇镇压。浦南县委决定一面避敌搜捕，一面进行反击。2月11日、12日先后处决了土豪陆百希和山阳缉私营第3中队长张吟泉。

从2月15日起，国民党江苏省省警大队、独立团机枪连及驻山阳的缉私营等大批反动军警，反复不断地向浦南地区共产党组织实行“围剿”、搜捕。2月27日，李一谔在陆家宅被敌发现被捕，3月10日被杀害于松江。李一谔牺牲后，县委领导成员暂时撤到上海，因白色恐怖严重，各自转移隐蔽。1929年6月12日，戚福根在平湖转角湾被捕，被杀害于八字桥。浦南地区的党组织和农民运动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汪洋店起义

1929年2月6日，在中共湖北鄂东特委的统一领导下，由汪洋店区委组织实施，以特务队、赤卫队为骨干，在孝感县汪洋店（今属大悟县）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年7月，中共汪洋店工委成立，工委为作好起义准备，开办了杂货商店和袜子商店，一方面作为党组织的指挥中心，一方面筹集资金购买枪支，9月，工委改为区委，张书田任书记。10月，区委拟定了在农历腊月三十举行起义的计划。不久，鄂东特委批准了汪洋店起义计划，并派特委巡视员徐宝珊到汪洋店，加强起义的领导。还派汪竹青等率领10余人的特务队支援武装起义。1929年2月5日，徐宝珊、汪竹青、张书田等在杂货店研究了行动方案，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由张书田任总指挥。决定这次起义首先拿破坏革命的汪洋店药店老板夏贻三开刀。区委为了防止意外，将起义的时间提前到2月6日（腊月27日）。这天，汪洋店正逢热集，张书田、汪竹青率领特务队、赤卫队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买卖人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药店老板夏贻三在店房内见势不好，慌忙从后门逃走。这时，特务队和赤卫队将夏贻三的全部家财分给贫苦农民。同日下午，起义队伍直奔邓家湾，镇压了恶霸地主邓连亨。翌日，起义队伍兵分三路：一路由张书田带领，到麻知府开了自家的粮仓，分给农民；一路由邱光美带领到汪洋店处决了土豪李宗方；另一路由陈文侯带领到城门坊，没收了地主余国陵的家产。2月8日，汪竹青、张书田、熊怀成又率领起义队伍300余人，携带10多支枪，到何家店、明家冲开大地主明句读、明乐秀的粮仓，明乐秀是张书田的表兄，顽固反抗，张书田令特务队将其处决。张书田大义灭亲的精神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

起义局面打开后，区委和起义指挥部在汪洋店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进一步打击反动势力，使汪洋店、麻知府到何家店一带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夏区年关起义

1929年2月9日，在中共湖北黄陂县委的组织领导下，由徐海东、丁彩光等率领农民自卫军在夏店地区（今属大悟县）举行了年关起义。

1928年7月，中共黄陂县委为了加强对夏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建立了中共夏区区委，由县委军事部长徐海东兼任区委书记。11月，黄陂县委发出举行年关起义的指示，任命徐海东为暴动总指挥。中共夏区区委根据县委指示，在段家畈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拟定了夏区年关暴动计划，成立了暴动指挥部，任命丁彩光、何再炳任正副指挥长。

1929年2月9日（农历腊月30日），夏区暴动农民和前来支援的鄂东特务队共300多人，在徐海东、丁彩光等率领下，向段家畈出发。到段家畈后，由丁彩光带领一部分起义队伍分守在穷家小户门前，一部分由徐海东、何再炳带领冲进地主吴文秀和反动讼师吴安德的家里。吴文秀、吴安德闻风而逃，起义队伍打开了他们的粮仓，没收了全部财产。接着起义队伍又冲进黄家湾、王家畈、张家田等村豪绅大院，打开粮仓，分粮给贫苦农民。没有跑掉的地主豪绅一个个被游村示众。参加起义的群众越来越多，整个夏区被起义农民闹得天翻地覆。

年关起义后，土豪劣绅搬来国民党军1个团的兵力，纠合反动民团疯狂反扑，农民自卫军严重受挫，徐海东领导5名自卫军奔上木兰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不久，徐再次返回黄陂，组建黄陂独立营，后扩建为补充师，徐海东任师长，一直在黄陂北乡坚持游击战争。后来，黄陂补充师在徐海东率领下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

小箕铺民团起义

1929年2月9日，在中共湖北阳新县委的组织策动和武装队伍的配合下，共产党员侯中英率领小箕铺民团部分团丁起义，击毙反动民团头目和团丁10余人，缴枪30余支。

1928年下半年，中共阳新县委决定组织策动民团起义，并选择小箕铺民团作为策动起义的突破口。因为小箕铺民团力量最强，是阳（新）大（冶）边境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撑点，控制着阳大两县交通的咽喉。为此，阳新县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手枪队员侯中英、黄腊子打入其内部。相机举行起义。侯中英、黄腊子打入民团后，积极活动，分别当上了民团小队队长和炊事员，掌握了部分团丁和军需仓库。

1929年1月底，中共中央军委派到阳（新）大（冶）负责军事工作的谢振亚和中共湖北省委巡视员吴致民及阳新县委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小箕铺民团起义问题，最后决定，侯中英加紧作好起义准备；县委手枪队、长枪队准备配合民团起义。起义时间定在2月9日晚。是日晚，黄腊子准备了丰盛的酒饭，侯中英则利用小队队长的身份，安排团丁和民团头目吃年夜饭，并频频向团总和大小头目敬酒，招呼团丁们吃好喝好。到晚上九时左右，阳新县委手枪队、长枪队按照县委计划将民团驻地紧紧包围，而民团头目、团丁已醉成一团。这时，侯中英见时机已到，忽地“叭叭”两枪，击毙两个反动小队队长。烂醉如泥的团总刚要反抗，就被“伺候”他的地下党员擒获。黄腊子迅速指挥起义团丁收缴了全部枪支弹药。与此同时，埋伏在外面的手枪队和长枪队，听到枪声立即发起进攻，在起义人员的配合下，反动团丁全部被俘。

小箕铺民团起义的胜利，使阳新、大冶两县的革命斗争连成一片。不久，阳新、大冶两县手枪队合并为阳大手枪队，阳新长枪队编为阳新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和创立阳大边境武装割据作出了贡献。

宿迁起义

1929年2月13日，在中共江苏宿迁县委的领导下，宿迁刀会会众和农协会会员举行了武装起义。

宿迁刀会是清末民初由山东传入的。在军阀混战时期，刀会打起防匪保家的旗帜，在各地安堂兴会，青壮年农民十之六七皆加入刀会，农忙耕作，农闲习武，成为一时风尚。由于刀会受宿命论思想束缚，只反土匪和乱兵，不反官府和地主，因此地主和官府多予支持，有的刀会并被地主豪绅所把持。为此，中共宿迁县委派遣张用琪、朱凤章加入刀会担任领导，并开展联络会首，争取会众工作，先后吸收会首张有万、刘兴举、陆敬礼、周汝贤及一部分会众入党，并以刀会中党员为基础建立龙虎山、管堤、卢集等支部。

1928年12月上旬，中共徐海蚌特委召开各县党代表会议，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提出“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和路线，确定宿迁为特委的工作中心区。

1929年2月初，国民党宿迁县政府会同宿迁县党部联合下文，通令废除阴历，禁止过阴历年。布告一出，城乡哗然，怨声四起。2月13日中午，刀会齐集校军场，声讨当局苛政扰民。上任仅2天的县长董锡坤率县队前来制止无效，慌忙逃回县城。此时，中共宿迁县委领导的大兴地区刀会在总指挥周鸿贤率领下赶到会场。会场顿时群情激昂，提出“党逼民反”和“打倒党部”的口号，于是会众拥到北关外，捣毁国民党县党部，捕捉县党部指导委员4人，带往古城看押。14日，刀会聚众已近数万人，继续搜查国民党人。当天午后2时，部分会众先行撤离县城。16日，国民党陆军第9师蒋鼎文部陈琦团应童锡坤之电请由新安镇（今属新沂市）开抵城郊，以示镇慑。中共宿迁县委认为，为避免与军队冲突，造成牺牲，遂与诸会首协商后暂时撤离城关。陈琦部乘机进驻城厢。童锡坤有恃无恐，开始镇压刀会，先后逮捕会首丁克兴、张汝高和极乐庵僧人约10余人。消息传出，刀会群众义愤填膺，在运河南乡刀会统领刘士龙号召下，3月1日晨，诸路刀会万余人在黑鱼汪聚会。2日，中共宿迁县委书记马伦，连夜发动运河东岸20个支部的党员及1000余农会会员，协助刀会二次进攻县城。童锡坤困守孤城，组织县队和1个营驻军，于4日晨出击。经过激战，双方死伤20余人。驻军撤退。

童锡坤见驻军撤走，遂于5日晨携县队逃往徐州。刀会闻讯，相约复来攻城。县委直接掌握的大兴、龙虎山、卢集、朱团庄、五滩等东乡刀会也赶来支援。共产党员沈光智高举“农民自卫团，解除农痛苦”的大旗，走在队伍前头。当时守城的仅为商团和少数警察，见刀会声势浩大不敢抵抗，拱手让出城关。

4月1日，刘昌言接任宿迁县长，携国民党省警备队2个连，会同新编第1师孙仲猷团来宿镇压刀会，整顿团练，加强控制。而东乡刀会仍继续坚持斗争。14日，省警队一部携练丁到运东永庆镇“清剿”刀会，党员刘兴举、张有万组织刀会伏击，击毙官军3人，伤3人，缴步枪6支，战马一匹。19日，原公安大队长汪公义率县队会同孙仲猷部1个连驻军，携煤油数十桶前往永庆镇剿捕刀会，拟焚烧前次闹事的村庄。消息传出，四乡震惊，东乡刀会紧急动员，迎战官军。经过数小时激战，官军大败，退回运河西岸，双方隔河对击。午后，刀会从东关口强渡运河，突入圩内，占领商业区东大街几座炮楼。当时，城门已闭，官军无法入城，双方展开巷战，互有伤亡。刀

会凭借炮楼向城内射击，官军恐城防有失，纵火焚烧炮楼，大火延及商店和民房 20 余家，损失惨重。当夜，大兴刀会总指挥周鸿贤率部攻打北炮楼商团时阵亡。20 日，国民党省警备队 1000 人由睢宁开抵宿迁，与驻军及县队配合，夹击刀会。刀会奋勇突围，撤出战斗。

7 月初，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以清剿刀会为名，率省保安团来宿镇压共产党。捕去县委委员蔡绍衡、党员陈通甫、施日亭、管汉卿、刘建清（大兴农协会主任）及马成义（马伦父亲）等人。7 月中旬，马伦、秦雅芬、蔡贡庭等县委委员及部分农协会首领撤往上海。宿迁农民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雅安起义

1929年2月中旬，在中共四川雅安特别支部的领导下，雅安南区、东区数百名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7年，成立了中共雅安特支，1928年发展共产党员20多人。雅安特支派共产党员到农村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发展了数百人的农民协会会员，1929年1月，雅安特支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指示，派特支委员黄煜、何学全、杨联升带领部分共产党员到农村，发动农民，组织武装力量，准备起义。是年，雅安闹春荒，国民党驻军和雅安县政府，不顾人民死活，派人下乡强制催收租捐，激起农民的强烈反抗。2月中旬，起义开始，孔坪乡农民杀死催租催捐人员数人，地方团总吴绍勾结驻军1个连镇压起义农民，南区、东区的数百名农民在黄煜、何学全、杨联升的率领下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黄煜、何学全、杨联升被敌人杀害。其余人员被拆散。起义失败。

松枝宜起义

在中共鄂西特委的组织领导下，湖北宜都县委和松(滋)枝(江)宜(都)县委在码瑙河两岸，以宜都安福寺地区(今属枝江县)为中心，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饥民起义，从1929年2月25日起，一直延续到1931年2月。

1928年7月，中共鄂西特委派段德昌带3支步枪和两名游击队员来到宜都安福寺，组织党团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武装起义。下旬，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到安福寺巡视指导工作，进一步加强起义的准备工作。1928年是个大旱年，宜都(今枝城市)、枝江等县成千上万的农民逃荒要饭。12月，中共鄂西特委再次派段德昌到安福寺向县委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提出了组织饥民“吃大户”，由经济斗争逐步转入武装斗争的计划，成立了饥民斗争委员会，由刘正万当主任。经过组织发动，组成了4支饥民队伍，由宜都县委书记徐国炎和王天鸿任总指挥。

1929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六)，饥民斗争开始。当饥民队伍到大土豪易吉吾院子时，遭到安福寺保卫团的弹压。饥民奋勇反抗，赶走了保安团，缴枪8支，团总陈汉铸弃枪而逃。斗争的胜利，更加鼓舞了群众。参加暴动的饥民发展到3万余人，持续10余日，遍及宜都、枝江、宜昌、当阳等县边境。土豪劣绅十分恐慌，拿600块钢洋买通马文德旅两个连及宜都警备队前往镇压，捕去群众20余人。5月，中共宜都县委、松滋临时县委和枝江特支合并为松枝宜县委，李圣文任书记。6月上旬，中共松枝宜县委决定再次举行饥民斗争，提出由饥民斗争转入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以李圣文为总指挥的松枝宜三县联合军事指挥部。6月21日，几支暴动饥民队伍相继而起。参加暴动群众达5000余人，走一地就掰一地地主地里的玉米，先后处决了阻拦掰玉米的3名土豪劣绅和团防侦探。国民党当局于25日调国民党军张发奎部第4师一部和宜都警备队及当地保卫团对饥民进行血腥镇压，有20余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杀害，100多名暴动群众被捕，饥民暴动又一次严重受挫。

1930年10月，中共宜都县委书记徐国炎，同公安县赤色警卫第9大队负责人孟伯平率10余名游击队员到安福寺杨家庙重新燃起了武装暴动的烈火。

1931年2月16日(除夕)夜，徐国炎、孟伯平率领20余名游击队员，连续包围了团总董湘池、副团总易吉吾、大土豪徐秉臣的家，董、易闻讯潜逃，处决了徐秉臣及1名团丁，缴步枪1支。接着，又镇压了团董陈海涛等人，其他土豪劣绅纷纷逃往县城或逃进团防据点。被破坏的党团组织得到恢复，建立了以张子明为队长的枝宜游击队和赤卫队等武装。7月，枝宜游击队改编为鄂西游击第2大队枝宜游击支队，张子明任队长。这支队伍为后来开辟以安福寺为中心的松枝宜苏区作出了贡献。

静山庙起义

1929年3月初，中共湖北黄陂县委组织领导农民自卫队、赤卫队及农民群众近万人，在塔耳岗静山庙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黄陂县塔耳岗区苏维埃政府。

中共“八七”会议后，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等遵照中共“八七”会议精神，首先组织了13人的革命武装，即黄陂县农民自卫军，陈金台兼任队长，后由徐海东任队长。1928年初，在桥边湾组建了28人的农民自卫队，由焦恒田任队长，后来发展为赤卫军。是年冬，陈金台在祠堂湾召集了塔耳岗区的党、政、军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暴动指挥部，陈金台兼任指挥长、焦恒田任副指挥长；集中各乡赤卫军编成一个团，陈金台兼任团长，李正清任政委；起义队伍集合点在静山庙；暴动时间定为1929年春节期间。会后，积极开展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9年3月初的一天拂晓，赤卫团、各乡赤卫队和农民群众近万人云集静山庙。陈金台向起义队伍作了简单的动员后，暴动队伍按预定计划捣毁了土豪陈佐泉的老巢后，迅速向柿子树店进军，强攻陈佐泉办的民团，团丁慑于人民武装的声威，不敢抵抗，一个个举手投降。赤卫队缴获步枪28支，子弹一批，俘团丁30余人。陈金台又指挥起义队伍兵分两路，迅速摧毁了陈家咀、新屋湾、姚家庙、喻家冲、椿树岗等地的反动会道门武装组织。之后，3次攻打反动堡垒铁石墩，击败大劣绅田庆昌办的红枪会及民团，打开田家当铺和粮仓，将粮物分给了农民。

静山庙起义队伍，在吴光浩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有力支援下，巩固了起义的胜利成果，建立了黄陂县塔耳岗区及8个乡苏维埃政府，成为黄陂北乡的革命根据地。

溪口起义

1929年春，中共福建省仙游县委在西区溪口村领导和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5月，仙游抗捐起义失败后，仙游革命斗争暂处低潮。从1928年8月以后，中共福建省委先后派特派员赵亦松和巡视员陈昭礼到仙游指导工作，并要求莆田县委加强对仙游县委的指导，以便更好地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在中共福建省委和莆田县委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共仙游临时县委和共青团组织。1929年春，红4军入闽后，仙游县委抓住形势好转的时机，发动群众以抗捐斗争促进武装起义，并开始筹集枪支，组建武装队伍。县委委员林植深入西区溪口各村，发动群众，张贴标语，逮捕、枪决了西区民愤最大的包捐包税头目。此后，林植又率领几名党员深入西区的中岳街（今度尾镇）一带发动群众，逮捕并处决了护路队头目。

溪口起义和中岳街的斗争，使西区的革命高潮迅速掀起。西区的群众在仙游县委的组织下行动起来，积极准备再次武装起义。国民党仙游当局极为恐慌，立即调遣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对西区进行大规模镇压。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仙游县委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斗争。

连南起义

1929年3月至7月，中共闽西特委在福建省连城县南部新泉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入闽后，中共连城县南部党组织负责人李云贵，接到中共新泉县党组织的指示，拟以新泉的小山村为据点，到农村去组织暴动队，慢慢扩大到全县。中旬，李云贵回到新泉，根据中共闽西特委的指示，利用他任国民党连城县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委员的合法身份，以筹办游城隍庙为名，领导农民趁机杀死地主豪绅，袭击民团，缴枪17支，打响了连南起义的第一枪。5月，连南农民武装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攻打龙岩得到发展。6月，连南农民武装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4纵队第7支队第19大队，共200余人，李云贵任第7支队党代表兼任第19大队队长，并成立了连南区革命委员会，张瑞明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从6月中旬至7月下旬，连南方圆几十里的连大坪、岭下、良坑、吕坊等13个乡的农民，先后举行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烧债契、毁借约，其势如暴风骤雨，很快席卷到连城中南部的朋口、营溪等地。

7月下旬，连南地区农民武装发展到130余人，并正式建立连南13个乡工农武装暴动队。8月底，改编成闽西红军连南游击总队。年底，连南游击总队改编为连城赤卫总队。1930年4月，连城赤卫总队扩编为连城赤卫独立第4团，以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3纵队的一部分。

丰顺起义

1929年4月7日，中共广东丰顺县委遵照东江特委的指示，率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第10团、第12团和农民赤卫队数千人发动了武装起义。

1929年1月1日，中共丰顺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黎凤翔为书记。之后新的县委在全县迅速发展组织，建立工农武装。不久，丰顺汤坑的反动武装“进剿”八乡山革命根据地，被古大存部击败。敌复于4月5日纠合反动势力围困八乡山。为解八乡山之围和在全县开展土地革命扫清障碍，县委决定：集中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0团、第12团和全县的农民赤卫队，在全县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前，丰顺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和丰顺县军事委员会组成联合总指挥部，由丰顺赤卫队总队长刘春任总指挥。共分5个暴动区：第1暴动区为东北片，分别攻打国民党区政府所在地黄金和 隍；第2暴动区为丰顺附城地区，各乡同时动作，攻打各乡国民党政权；第3暴动区为汤坑区，以游击斗争牵制八乡山的敌人不来增援；第4暴动区为潭江区，配合第1暴动区作战。4月6日，中共丰顺县委书记黎凤翔率第12团和第4区赤卫队和革命群众二三百人在潘田的铁坑集结。次日晨，即向黄金市发起攻击。起义队伍包围了国民党第4区治安会和警署，活抓国民党治安会主席、联防主任刘钦堂和3名警兵，缴长短枪20余支。与此同时，县军委负责人陈仕珍带领红军和赤卫队200余人，从潘田和黄金市出发，向 隍推进。12时抵达 隍，与敌激战半小时，即占领制高点 隍中学。然后分头搜索街道，守敌溃散。战斗中俘敌10名，缴枪20余支，镇压反动分子1名。在第2暴动区，下汤、马图、上林、过桥、叶畲等乡均同时暴动。7日晚，农军和群众1000多人攻进下汤国民党百美警卫队驻地，俘警卫队队长等9人，缴枪20余支。接着，起义队伍围攻国民党双溪警卫队，击毙警卫队队长张声。在马图，工农革命军派两名携驳壳枪的队员率农军和群众数百人，攻下乡治安会和警卫队，击毙警卫队员1名，俘治安主席和警卫队教官各1名，缴枪10余支。工农革命军第10团9名战士率农军和群众围攻上林乡治安会和警卫队，俘治安会主席朱介之和警卫队长朱华等9人，缴枪10余支。丰顺县城附近各乡农军向建桥发起攻击，俘获反动分子10余人，缴枪10余支。叶舍的农军和群众于6日晚，攻打乡治安会，毙敌1名，收缴枪80余支。马图乡的赤卫队在红军的配合下，打下了最顽固的银窟据点，缴枪30余支。在第3暴动区，工农革命军第7团和第3区农军击退了国民党军对八乡山的进攻，毙俘敌6人，缴枪20余支。

丰顺全县起义，共攻陷国民党区公所两个，以及13个乡公所，毙敌11人，俘敌174人，缴枪341支。这次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农村的斗争由抗租发展到没收分配土地，推翻豪绅地主政权。

黄岩西乡起义

1929年4月，中共浙江黄岩县委组织领导黄岩西乡农民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黄岩的西部山区，南邻乐清，西连永嘉、仙居，北与临海接壤。国民党黄岩县政府为了垄断食盐，专门设了官商“盐厂”，强令群众改吃“官盐”，使食盐价格一下子上涨了6倍。广大穷苦百姓苦不堪言。中共黄岩县委书记曹珍等认为，这是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于是县委决定：派乌岩区委委员戴元谱到西乡，发动群众；派县委委员李道明在东南乡组织群众，配合西乡农民行动，

4月7日，李道明到半岭堂村，在戴元谱家召开打盐厂筹备会议。会议决定，东南乡负责筹集200支枪，组织进攻县城的东门和小南门；西乡负责筹集100支枪，进攻西门和大南门。确定于4月18日夜，从东西两面同时夹攻县城。

4月12日，戴元谱在苍基寺召集50多名骨干开会，除西乡有30多人参加外，土著武装首领潘希堂也带领20余人到会。戴元谱对武装起义作了动员布置。为便于指挥，成立了总指挥部，总指挥为戴元谱，副总指挥为翁维英，下设3个大队。不料，第2天李道明派人通知戴元谱说，东乡一时准备不好，建议推迟攻城时间。另外得知，驻宁溪的缉私队（盐警）听说老百姓要攻打盐厂，已经逃往城里。面对这种情况，戴元谱当机立断，决定由西乡提前行动。戴元谱集合起义群众，汇成一支浩荡大军，向县城进发。沿途有许多青壮男子，义愤填膺，拿起棍棒刀枪，自动加入暴动行列，队伍到宁溪时已达千余人。15日，队伍由宁溪出发，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此时，国民党黄岩县政府十分紧张，城门紧闭，全城戒严。县长孙崇夏一面急电请求火速调集驻海门的保安队前来支援，一面派县商会的陈少白出城“谈判”，以拖延农民队伍进城的时间。16日上午，戴元谱率领数千人的起义队伍，很快来到距县城10多里的石柜吞山脚。这时，陈少白急急忙忙赶来声称他是政府的代表，提出：“只要农民不进城里，政府愿给10万元钱作为鞋费，慰劳大家，并在西门立碑为证永远取消官盐”。戴元谱认为这是敌人的缓兵之计，命令队伍继续前进。按照预定计划，起义队伍分西门、大南门两路攻城，并约定在西门放火为号，两路人马同时攻城。中午时分，两处先头部队已到了城关西门外的五洞桥前，潘希堂率领的南路队伍也已抵达大南门。而在这时，浙江保安第5团已从海门调集一个营的援兵，在城内部署就绪。正在这时，西门外的一间民房不慎失火烈焰冲天。而南路的潘希堂一见火光，误认为是戴元谱发出的攻城信号，即向南门发起进攻，顿时枪声大作。戴元谱得知南门已开始攻城，情况紧急，也只好率领队伍提前行动。起义的农民们冲过五洞桥，向西城门进攻。但由于敌人早有准备，紧闭了城门，加之他们武器精良，火力凶猛，起义队伍无法靠近。南门守敌也拼命用火力封锁住大道，潘希堂及农友们虽勇猛顽强，但都未能冲入城门。结果，在敌人疯狂射击下，10余名群众当场倒在血泊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避免更大伤亡，队伍撤离县城。

这次起义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迫使国民党黄岩县政府不得不解散“盐厂”，取消了“官盐”。

川东起义

1929年4月至1930年8月，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在该省东部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

1927年冬，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准备在川东地区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4月27日，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万源、宣汉、梁山（今梁平）、开江等县的工人、农民在万源县固军坝附近的龙潭河举行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1路，司令李家俊、副司令雷玉书，共300余人。起义后，游击军第1路袭击了万源县白羊庙，击溃国民党军1个连。翌年3月，建立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后遭到国民党军的进攻而失败。1930年春，中共四川军委在涪陵县发动川军第20军两个连举行起义，组成川东游击军第2路，司令赵启明，前委书记李鸣珂。起义后，游击军第2路转到丰都、石柱县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与第1路相互策应，后遭地主武装的伏击而失败。7月29日，中共梁山县委根据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和川东军委的决定，发动和领导川东虎城场、南岳场及其周围地区的农民起义，击溃国民党军驻军1个连。起义武装随后同梁山县委所掌握的另两支农民武装会合，在忠县黄钦坝编为川东游击军第3路，司令李光华，副司令王维舟，辖3个大队，共1000余人。同年3月至8月，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下，第1、第2、第3路游击军相继失败。仅第3路游击军一部数百人在王维舟带领下突出重围，转移至梁山、达县交界地区坚持斗争。

商南起义

1929年5月6日，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河南省商城南部地区（今属安徽省金寨县）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农民群众与民团士兵相结合的武装起义。

商城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1927年9至10月，中共河南省委两次派人到商城发动群众，恢复革命力量，到1928年先后恢复成立了中共商城县委、商南区委及部分党团支部。1928年1月18日，河南省委在《关于目前形势与斗争策略的通告》中就提出在鄂豫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指出：“豫南的暴动应更迅速的发展，尤其在南五区（指潢川、光山、固始、商城、息县）应用强大力量发动起来，与鄂北鄂东的暴动联络一致，建立苏维埃政权，造成一个县或几十个县的工农革命势力的割据。”2月，中共南五县特委在潢川成立。3月，特委委员范易到商城传达了省委、特委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指示，初步决定以商南地区为重点，组织发动武装起义。3月21日，中共商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商城地形险要，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可以作为起义重点。并分工县委委员李梯仁、廖炳国负责准备工作。5月，河南省委在向中央《关于目前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发动商城南乡的农民暴动，与固始及光山南部打成一片，先实现商城、固始两县的割据，并联络湖北黄安、罗田暴动势力”。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共南五县特委（1928年9月改为豫东南特委）和商城县委、区委作了多方面的准备。首先，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斗争，建立农民协会，到1929年初，全县党员人数发展到370余人，团员数百人，农协会会员400余人。其次，针对商南地区民团林立的实际，开展兵运工作，派遣党员或骨干打入民团，争取团丁，掌握民团武装。到起义前，全县民团中已有中共党员40余人，兄弟会成员六七十人，其中大部分在商南，使商南的民团武装基本掌握在中共党组织的手中。此外，商城县委领导的农民武装达100余人，约有长短枪50余支。

正当起义条件日渐成熟之际，中共豫东南特委和商城县委连遭破坏，特委书记余锡珍、委员张廷桂、杨桂芳，县委书记李惠民、委员马石生、丁树勋等先后被捕牺牲。1929年3月，鉴于商城县委遭受破坏，不便指挥的情况，豫东南特委和鄂东特委在柴山保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商南党组织暂归鄂东特委领导。会后，鄂东特委派遣曾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徐子清、徐其虚等人前往商南指导起义，并将河南商城南部与湖北罗田北部、麻城东部划归特别区，成立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徐其虚和李梯云、肖方、周维炯、廖炳国等为委员，加紧起义准备。

1929年5月初，鉴于国民党商城反动当局又一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革命力量随时有遭到破坏的紧急情况，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平头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5月6日（农历立夏节）发动武装起义。同时成立起义指挥部，由徐子清和肖方负责总的指挥，周维炯负责军事，廖炳国负责联络。

5月6日夜，丁家埠、汤家汇、南溪、斑竹园、牛食畈等地，在周维炯、肖方、毛月波、詹谷堂等领导下，部分团丁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瓦解了反动民团杨晋阶部，缴枪二三十支。白沙河、禅堂一带，在徐其虚、郑延青等领导下，攻打了郑齐玉民团，俘虏团丁20余人，缴枪10余支。关家店、竹叶庵等地，在廖业琪、汪永金等领导下，农民武装包围了当地反动民团柯守恒部，缴枪17支，该民团基本瓦解。此外，包畈、西河桥等地农民也都在当地

中共党支部领导下举行了起义。一夜间，共产党员控制的民团武装和农民武装等在商城南部 10 余个地点同时举行起义，一举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民团，摧垮了国民党在商城南部的统治，基本上控制了商城南部地区。

5 月 7 日，各地群众集会庆祝胜利，并成立农民委员会，代行临时革命政权，建立赤卫队，保卫起义成果，同时，掀起打上豪、杀劣绅、开仓分粮的高潮。5 月 9 日，各路起义队伍按计划会师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第 32 师，师长周维炯，党代表徐其虚，下辖两个团。红 32 师成立后，积极开展创建豫东南红色根据地的游击斗争。

固军坝起义

1929年5月12日，在中共四川达县、宣汉地委的领导下，万源固军坝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9年春，为充分利用万源固军坝山高林密、敌人力量薄弱的有利条件，中共达县、宣汉地委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为此，成立了万源起义指挥部，共产党员李家俊任总指挥，雷玉书任副总指挥，唐伯壮任政治委员。4月，唐伯壮、雷玉书率领宣汉、达县、大竹等地的革命骨干80多人，在万源龙潭河地区与当地的革命骨干会合并举行起义。5月7日，在干坝子截获万源县府委员张金五，缴获银元400块。驻万源的刘存厚部川陕边防军第3团团长刘志超派1个连进攻起义军。12日李家俊立即调动各地农军举行起义，在固军坝等地袭击刘志超的1连敌兵，不到1小时即打垮敌兵，缴枪50多支。但在战斗中副总指挥雷玉书、政治委员唐伯壮英勇牺牲。刘存厚急调团长廖雨辰代理第3路司令，统领刘志超等3个团，赴万源对起义军疯狂镇压，被李家俊率领的起义军打败，敌人损失惨重。1929年冬，中共四川省委派文强、王国梁赴万源加强对起义军的领导，成立了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部。李家俊任军事指挥部总指挥，文强任党代表。起义军扩大到2000多人。1930年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命名起义军为四川红军第1路游击队。3月，刘存厚调集各路国民党军全面“会剿”起义军。6月，李家俊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分路突围，掩埋枪弹，保存实力，待机再举。

六保联络自卫团起义

1929年5月19日，在中共安徽六安县六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六安六保（今金寨县）联络自卫团举行了起义。

1928年8月，六安县六区成立了农民协会，至年底发展了1000多名会员。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对此惶恐不安，纷纷扩大地主武装自卫团。六保（即六区的兴田、西槐、古碑、南畝、七上、七下）的自卫团联合组成六保联络自卫团，汪东阁任总董，有30多人枪。

1929年5月6日，中共六安六区党组织负责人桂伯炎、袁继安、袁皋甫、何子凡秘密协商组织六保联络自卫团起义问题，并赴商南地区找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师长周维炯研究起义计划，决定19日起义。19日清晨，六保联络自卫团举行起义。起义后，将30多人枪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32师补充团，袁皋甫任团长，何子凡任营长，汪庆值任营长，并成立了六区革命委员会和六区游击队。20日，补充团随红军第32师攻打金家寨，歼敌100多人，缴枪20多支。是日夜，周维炯决定补充团留驻绣球山，帮助地方组建农民协会，发展会员，继续开展土地革命。

流波疃起义

1929年5月21日，中共安徽省六安县党组织该县流波疃地区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8月，中共霍山县党组织派吴江回家乡流波疃一带开展党的活动。先后发展了余九江、周庆昌、江求瑞、蔡五二、高天栋等入党，建立了流波疃党支部。同年秋，在流波唐集子发展黄志南、陶光明、王作沛、修义存等10余人入党，建立了唐集子党支部。同年10月，又在流波疃附近的莲花河、李家坪一带发展了江求贵、江焕兰等10余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1929年春，在流波疃黄畈、苏口一带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至此，流波疃四周农村党组织先后建立，农民运动热火朝天。1929年1月，六安保安团第3团队朱孟公派部下李胡子连长率30余人来流波疃驻扎。李胡子来流波疃后经常以搜捕共产党为名，对群众敲诈勒索，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流波疃党组织负责人吴江、黄安仁、陶光明、袁大星等认为武装暴动的时机已成熟。5月20日，周维炯率工农红军第32师攻打金家寨胜利后，又从燕子河挥戈东向。5月21日，吴江、陶光明率暴动队伍举行起义，由苏口方向切入，配合红32师实行两面夹击，攻打流波疃。敌保安团连长李胡子受重伤，保安团向麻埠方向溃逃，刚逃到唐集子，又遭到黄安仁率领的暴动队迎头痛击，30多人的保安团死伤过半，余部逃向麻集。起义队伍缴枪10余支，活捉流波乡董陈云德。22日，在流波疃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罪恶累累的乡董陈云德，成立了乡农会。24日，在流波镇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流波疃游击队正式成立，吴江任游击队长，蔡五二任副队长，下设3个分队，60余人，20余支枪。

龙岩起义

1929年5月下旬，在红军第4军的支援下，中共福建省龙岩县委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在全县各地举行起义，并配合红军和赤卫队两次攻打县城。

5月22日，中共龙岩县小池区委领导人陈茂钟、吴春梅、邓海泉赴上杭古田迎接红4军到小池区。红军到小池后，在廖厝排召开千人大会。会后，在小池区委及红4军的直接领导下，小池、大池等区举行了农民起义，打垮了小池民团，击毙十几名土豪劣绅，缴枪12支。当日晚，300多名起义农民在大池小东坑起义，收缴了民团的枪支，焚烧田契，开仓分粮，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吴三仔。23日，中共龙岩县委委员张涌宾领导农民在董邦、东山社等地起义，杀死地主张开松，取得胜利。在此期间，县委还领导了东肖、黄坊、山后村、山塘、铜钵、前村、斜背、新田、大等村及条围乡、马坑之崎濑，适中之三坑、石门炉、大洋等村的农民起义。在农军的配合下，红4军23日攻占龙岩城后于当日主动撤离，中共龙岩县委将东肖、湖邦、董邦、铜钵、西山、小池、适中各区的农民暴动队编为地方赤卫队。从5月28日至6月初，郭滴人、张双铭、张涌宾、陈寄今等率领千余名赤卫队员包围了龙岩城，给国民党守城驻军陈国辉部以沉重打击。

龙岩起义，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全县性农民武装起义，震撼了国民党龙岩地方当局的统治，为配合红4军第二次攻打龙岩起了重要作用。

上杭起义

1929年5月至10月，在红4军第1、第4纵队的支援帮助下，中共福建省上杭县委发动和领导该县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春，成立了以郭柏屏为书记的中共上杭县委。3月，中共北四区区委成立，继6月的蛟洋起义和8月的稔田起义后，即酝酿着全县起义。1929年5月22日，红4军挺进上杭北五区右田镇，在红4军王觉和地下党员杨锦伍领导下，农民举行起义，成立了古田县革命委员会，打土豪，没收财产，建立农民协会、赤卫队等组织。在此前后，步云、石坪及溪口的石铭乡、大厚乡、大阳乡、大岭下12个乡农民都发动起来，成立了东二区革命委员会。6月7日，白砂农民在红4军武装配合下，一举歼灭驻白砂的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钟铭清团300多人，成立白砂革命委员会。之后，红4军第1、第4纵队前往上杭，帮助全县开展起义。7月间，在第1、第4纵队的帮助及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庐丰、安乡、横岗、蓝家渡、太拔、旧县、才溪、官庄、回龙、南阳等地也先后举行起义，成立了农民协会、赤卫队等组织。

9月20日，红4军攻下上杭城。在红4军第1纵队的支援下，10月2日，中都人民在邱造凡领导下举行起义，成立区苏维埃政府。这时，上杭除峰市仍为民团占据外，全境获得解放。10月2日，在上杭城关天主堂召开上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上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立民。同时还成立了上杭县赤卫总队，总队长傅柏翠。全县90%以上的区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诸佛庵民团起义

1929年5月，在中共安徽省霍山县委的领导下，霍山县诸佛庵民团举行了起义。

大革命以后，诸佛庵的豪绅富商为保护财产，集资购枪，成立有40人的民团。但该团基本上受共产党的控制，团长由中共霍山县委军事委员朱体仁担任。1929年春末，国民党陈调元部的第56师桂振远旅进驻霍山，扶植反共分子甘达用出任县长，扩充地方反动武装，阴谋收缴被共产党控制的民团枪支。5月6日商南起义后成立的工农红军第32师到霍山黄石河一带。中共霍山县委认为，霍山的农民运动已由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上升到武装冲突，决定发动诸佛庵民团起义，粉碎国民党霍山县政府的阴谋，建立自己的武装，配合红军第32师的军事行动。正当共产党员刘淠西等人积极组织民团起义时，恰逢六安红学会头目陈乾士带领30多人到霍山新店河开堂收徒，亦觊觎诸佛庵民团的枪支，给民团起义增加了困难。刘淠西当机立断，派朱体仁利用与陈乾士昔日师生的关系，趁宴请之际击毙了陈，并缴了陈部的枪支。县长甘达用得到新店河反动豪绅密报，决定借机解除刘淠西、朱体仁的兵权，派县自卫团胡月斋、秦纶阁、戴启明带领10几人前往诸佛庵调查，企图伺机逮捕刘淠西、朱体仁。刘淠西得到情报后，一面加紧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一面派人到霍山东北乡报告县委书记舒传贤。舒传贤决定诸佛庵民团立即举行起义，并派冯小山带领东北乡游击队10几名队员到诸佛庵策应起义。在东北乡游击队到达诸佛庵的同时，霍山县自卫队的一个班在胡月斋等带领下也来到了诸佛庵。刘淠西利用酒宴灌醉部分自卫队员，在冯小山带领的游击队配合下缴了自卫队的械。随后，刘淠西和朱体仁把诸佛庵民团以及东北乡游击队集合在民团驻地后树林中，宣布诸佛庵民团起义成功。这支有50多人枪的武装，后被编为霍山县委游击大队，在朱体仁的率领下，成为六（安）、霍（山）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城涵广起义

1929年6月至10月，中共福建省莆田县委在该县城关、涵江、广业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12月，由王子洁任县委书记的莆田县委根据中共福建省委指示，分赴各地发动群众，恢复党的组织。1929年6月，驻莆田的国民党海军林寿国部调往泉州，莆田兵力单薄。莆田县委乘机发动农民起义。5日，县委委员郑纪率莆田游击队20余人攻入阔口盐税局，缴枪10余支；6日，团县委负责人徐清霖率学生会会员100多人，在涵江游斗捐棍；21日，县委委员陈天章、吴梦泽率100余人捣毁江口海关；月底，中共党员陈博率100余人冲击西天尾盐税局，分发没收的捐款。

8月，省委常委吴亚鲁和特派员陈华等人到莆田指导工作。县委组建军委会与广业、北路、江口、涵江、城关、渚林6个区委会，将莆田游击队分为广业工农自卫队（队长王纪修，指导员陈华）和江口工农自卫队（队长郑纪、副队长林锦如、指导员陈天章），两队共200余人，进行了军事训练。中共莆田党组织在各地组织了1000多人次的集会示威。9月17日，陈天章等人在涵江率400多人冲击英商泰利公司的“泉州轮”，搜查军车，捣毁海关、税局与买办的“和丰公司”，连续3天在城区、涵江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郑纪等人在江口捣毁税局，毙敌1人。县委组建广业行动委员会，收缴反动派枪支，组织农民抗捐、抗税等。国民党地方当局惊慌失措，派1个连的海军围剿东度。广业工农自卫队在农民群众支援下毙敌1人，俘排长2人。

10月，国民党军以4个连的海军再次围剿东度达43天。广业工农自卫队转移。为配合东度的反“围剿”斗争，县委发动了笏石起义。县委委员陈北芳、吴承斌等人率队捣毁粮柜，毙敌1人，成立了沿海工农自卫队，队长陈北芳、副队长吴承斌和许景德。自卫队破坏桥梁及通讯设施。从此，莆田活跃着3支工农自卫队，斗争此起彼伏。

路下桥起义

1929年6月19日，中共福建省崇安县委在松溪县的路桥、塘边等村庄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4月，在崇安农民运动的影响下，路下桥农民伍弟奴等在西溪村发动群众，准备起义。6月19日，伍弟奴率17人，手拿大刀、长矛，捉拿税棍。后在中共崇安县委书记陈耿的指示下，成立民众会和民众队，民众队编为崇安民众队的1个排，伍弟奴任排长。8月11日，伍弟奴带7名战士，缴浦城水北街民团团长沙枪1支。11月3日，祖墩张枫廷民团40余人进驻路下桥。当夜，伍弟奴率6人企图偷袭张枫廷住宅未遂，后砍死2名卫兵，夺枪2支，起义队伍转移至浦城水尾丘。

1929年12月16日，中共松溪特支成立后，积极组织发展农民武装。至1930年3月，民众队发展到100余人。由于民众队在各地的影响和开展兵运工作，花桥民团、水吉樟墩民团及水吉回龙民团先后有数十名团丁投奔民众会。4月20日清晨，国民党军驻花桥的1个排和省保安团1个中队，配合张枫廷民团，进攻路下桥。民众队在敌人必经之路的下田村外的龟颈塘设伏，打死尖兵班4人，缴获长枪4支。随后避开张枫廷民团，收缴了建阳外屯民团步枪13支。同月，路下桥民众会发展到1000余人，民众队300余人，编为1个连，伍弟奴任连长，在松溪、政和、浦城、水吉（今建阳水吉镇）4县边界村庄打土豪、扩大游击队伍。1931年5月下旬，成立了路下桥苏维埃政府，在4县48个乡村中开展抗捐税、分田地斗争。

长汀南部起义

1929年6月19日至11月，中共福建省长汀县委在该县涂坊、南阳、塘背等地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12月，中共福建省临委将长汀县划分为4个工作区。各个工作区的负责人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1929年3月，中共长汀临时县委改为中共长汀县委，同时成立长汀县委革命委员会。县委书记段奋夫，县革委会主席丘潮保。

在中共长汀县委的领导下，首先在涂坊发动农民举行起义。6月19日清晨，中共涂坊党小组及农会会员80余人，手持步枪、鸟枪、长矛、大刀等，迅速包围了国民党乡政府及团防局，缴获20多支枪，占领乡政府和团防局。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处决罪大恶极的大土豪。并成立了涂坊乡农民协会，主席张景威，同时将暴动队改为赤卫队，80余人，涂凤初任队长。7月5日，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连城驻军马洪兴和南山土霸李士孜共300余人，进犯涂坊，赤卫队边打边撤出涂坊。

7月，为加强汀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共闽西特委决定建立直属特委领导的中共汀南特区委员会，7月25日，在中共闽西直特委长汀县委和汀南特委的组织发动下，南阳农民武装300余人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在红4军第1纵队和上杭才溪暴动队的策应下，包围了龙田韦院，击毙镇压农民运动的反动头子黄霞余等人。随后，起义队伍诱杀了大土匪曹发良等。起义胜利后即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并成立赤卫队。8月，成立南阳区革命委员会。9月初，中共南阳区委、南阳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赖福开为区委书记，黄金波为政府主席。并成立南阳区赤卫大队，罗承球为大队长。10月初，汀州、上杭、连城、武平4个赤卫支队约600人，在南阳改编为闽西红军独立第5团。不久，塘背农民协会组织100多人的暴动队，准备了长矛、鸟枪、大刀等武器。11月4日拂晓，塘背农会主席罗铭带领暴动队及广大农民700多人举行起义，捕捉土豪，缴获步枪12支、子弹数千发。当天下午，召开1000余人大会，宣布成立塘背赤卫队，罗铭任队长。会后，成立塘背农民协会，罗永权为农会主席，同时成立土地委员会，进行分田。不久，塘背农会改称为乡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中共塘背党小组。

在涂坊、南阳、塘背农民武装起义的推动下，汀南各村普遍举行了起义。汀南和连城南部13乡连成一片，逐步形成一块革命根据地。

宣成起义

1929年6月25日，中共福建省长汀县委在宣成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12月，中共福建省临委将长汀县划为4个工作区。其中汀南工作区由罗化成、张赤男负责，以宣成、南阳为据点，向涂坊、濯田一带发展，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张赤男回汀南后，曾在宣成畚心领导农会会员30余人及500多贫苦群众，取得反对土豪劣绅囤积、外运粮食斗争的胜利，拉开了汀南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6月25日，中共长汀县委委员张赤男在畚心的高坪召集农会骨干会议，成立了暴动队，布署了起义事宜。26日清晨，张赤男带领暴动队及农民群众300余人活捉土豪陈马三，破仓分粮，暴动队扩大到1000多人。7月1日，暴动队300余人在长丰一带开展打土豪的斗争。3日，当地土豪勾结水口马洪兴匪部100余人包围长丰村，暴动队转移到罗坑活动。中旬，暴动队活

捉了长桥团防局长刘瑞书，缴枪8支。不久，宣成区的中畚、下畚、畚心、寨背、溪源、上五、丘坑、迳口、长兰、张尾埔等自然村在张赤男领导下先后举行起义，各村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后改为乡苏维埃政府），分配了田地。8月，宣成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曹清新。不久，成立区委，书记张良何。

头蓬起义

1929年6月29日，头蓬农民协会负责人陈风笠、沈阿标等，在中共浙江萧山县委领导下，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9年春夏，全县灾害频繁，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国民党萧山县政府无视人民的困苦，在头蓬镇设立了浙江省沙田局事务所，增加种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以加紧对人民的盘剥。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中共萧山县委组织各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斗争。

头蓬农民协会负责人陈风笠、沈阿标等，根据县委指示，决定发动农民反抗沙田局的敲诈勒索。6月26日，他们首先在头蓬元帅庙以演戏为名，召集附近农民，控诉反动政府的剥削和沙田局的罪行，号召农民起来反抗。同时，他们又在戏台周围和头蓬街头张贴标语，进行宣传鼓动。27日，国民党萧山县政府从西兴等处调集两个排的警察进驻头蓬，还贴出布告，禁止农民演戏。广大农民没有被反动派的淫威吓倒，坚持演戏。但反动警察捣毁了戏台，进一步激怒了农民。28日，农民协会举起大旗，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在沙田局门前高呼口号，反对土地清丈，反对苛捐杂税，抗议反动警察的暴行。29日，农民协会率领100多农民再次到沙田局，要求体恤人民疾苦，停止土地清丈，停止摊派捐税。不料，警察逮捕了杨世茂等3人。农民协会抓住这一时机，以鸣敲煤油箱为号，汇集愤怒的农民2000多人，将沙田局层层包围。反动警察鸣枪威吓，并继续逮捕农民。起义农民怒不可遏，他们用农具狠狠砸向警察。在起义队伍的洪流冲击下，沙田局被捣毁，反动警察狼狈逃跑。

遂蓬边界起义

1929年6月29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川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所属江防军第7混成旅，由代旅长旷继勋（共产党员）发动，在遂宁、蓬溪边界牛角沟举行了起义。江防军第7混成旅，是中共四川省委兵运工作的重点。该部共产党的组织建立较早。1926年旷继勋任该旅第2团团团长时，中共川西特委派一些共产党员到该旅从事兵运工作，成立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第7混成旅委员会，团、营、连都建有共产党组织，多数连队的政治指导员由共产党员担任。1929年初夏，旷继勋代旅长针对邓锡侯、黄隐、李家钰等反动军官停发该旅官兵粮饷，官兵生活困难的形势，决定立即举行起义。中共四川省委派邹进贤、罗世文到该旅帮助工作，制定了起义计划，成立了共产党的特委会，邹进贤为特委书记，罗世文为党代表，旷继勋为总指挥，王金铭为参谋长。同时组成以邹进贤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6月29日下午，部队在旷继勋等的率领下，向遂宁、蓬溪交界的牛角沟移动，宣布起义，打出“四川红军第1路”的旗帜。全旅官兵3000多人，起义后编为2个师。起义部队连夜向蓬溪城进发，打垮李家钰部一个骑兵团，攻入县城，惩办土豪劣绅，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当起义部队经南部、营山、渠县、达县到达梁山（今梁平）猫儿寨时，因寨内中共组织已遭破坏，失去策应，加之酷暑连续行军，起义部队很疲乏，因而数次进攻猫儿寨未果，部队伤亡较大。起义部队撤退到开江马鞍峡槽沟时，被国民党军包围、击溃。

大冶刘仁八起义

1929年6月30日，在中共湖北大冶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大冶县委武装及邻县农民群众1万余人在刘仁八举行起义，消灭刘仁八常练队，缴枪40余支。

1928年底，在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员的帮助下，中共大冶县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拥有党员460多人。不久，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手枪队。此后，便以手枪队为基础，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税斗争，镇压土豪劣绅，反动当局及土豪劣绅对此恨之入骨，纷纷办起保卫团、常练队等地主武装，殷林区的大土豪刘西岩（武昌总商会会长）拼凑了40余人枪的常练队，到处侦察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捕杀革命干部，鱼肉农民群众。中共大冶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早就想消灭刘西岩的这支常练队。

1929年6月，中共大冶中心县委书记吴致民主持召开大冶、阳新、通山、鄂城、咸宁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商讨武装起义等问题。27日，为会议做掩护工作的万云山等3名共产党员被刘仁八常练队逮捕，刘西岩指使常练队长刘维敬将万云山等3人就地杀害，引起与会负责人和农民群众的极大愤怒，一致要求为万云山等烈士报仇。大冶中心县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提前组织大冶、阳新、鄂城等地农民群众举行起义，消灭刘仁八常练队。

6月30日拂晓，吴致民、徐宁甲等人率领大冶手枪队及阳（新）大（冶）鄂（城）等县农民群众1万多人，将常练队驻地刘仁八祠堂团团围住，在内应的配合下，起义队伍很快攻进了刘仁八的祠堂，40余名常练队员缴械投降，常练队长刘维敬被处死。起义队伍还将没收刘西岩等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了周围的穷苦群众。

刘仁八起义胜利后，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将大冶、阳新两县武装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军长谢振亚。为开辟以大冶南山头为中心的大（冶）阳（新）边界武装割据区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余万起义

1929年6月至1930年6月，中共江西省贵溪县委在贵(溪)、余(江)、万(年)3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6年8月，中共党员汪群奉中共江西地委指示，回家乡建立了中共贵溪支部。同年12月和翌年1月，中共党员胡完生、郭燕台分别建立了中共万年支部和中共余江支部。1927年春，贵余万3县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向地主豪绅展开猛烈的攻击。尤其是贵溪的工人、农民，在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邵式平的领导下，大闹上清宫，活捉大恶霸张天师，这一怒潮席卷了贵余万3县广大农村。1927年春，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贵余万3县工农运动遭到镇压，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1927年11月25日，方志敏在弋阳窖头村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会上成立了五县工作委员会和起义总指挥部。方志敏当选为五县工委书记和起义总指挥。1928年5月，在周坊成立了中共贵溪特区委员会，邵棠为书记，下辖6个支部。6月25日，方志敏在方胜峰主持召开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议，决定派黄道去贵溪固坊，开辟贵余万新区，以打破敌人对弋横区域的包围。7月初，黄道来到周坊，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贵余万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到10月，贵溪的神前、长圻、皇桥、湖扩、泗沥、陈坊、横山、际旗、裴源等村，余江的鸿鹤嘴、鲁家嘴、胡马头等村，万年的葛茅坞等村，都建立了党的支部。1929年5月，在周坊成立中共贵溪县委，黄道为书记，辖中共贵溪区委、万年特别支部和余江支部，同时成立了贵、余、万边区起义总指挥部，黄道兼总指挥。在中共贵溪县委的领导下，各地秘密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农民革命团，开办武装训练班，为举行起义作准备。

1929年6月6日，由中共贵溪县委统一领导的贵、余、万起义首先在贵溪县周坊发起。这天夜里，黄道率领红军游击队和农民革命团数百人，打垮周坊地主武装“挨户团”，镇压当地恶霸地主，没收地主财物。周坊起义胜利后，召开群众大会，焚烧了地主豪绅的田契、借据、账簿，建立起神前村苏维埃政权。周坊起义后不到两个月，贵溪县100多个村庄先后由经济斗争转为夺取乡村政权的秋收起义，建立起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并以贵溪游击队为基础，组成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第7连，连长匡龙海。8月，中共贵溪县首次代表大会在周坊举行，公推李上达为贵溪县委书记。贵溪县委下辖贵溪7个区委和余江区委、万年特支，接着，在周坊召开贵溪县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贵溪县苏维埃政府，邵忠当选为县苏维埃主席。是月，国民党军第18师第52旅第6连占据周坊关王殿，并纠集贵、余、万三县靖卫团，大举进剿革命区域。为粉碎敌人的“进剿”，中共信江特委派方志敏任贵溪县委书记。不久，红军独立第1团第1、第3、第7连来贵溪，在农民武装的配合下，激战不到1小时，全歼敌第6连，俘敌24人，缴枪60余支，机枪1挺。关王殿战斗的胜利，不仅巩固了老区，而且开辟了山背、流岭、金沙等30余个村的新区，即第8区，至此，贵溪县城成了一个孤城。

为扩大胜利，中共贵溪县委选派一批干部分赴万年、余江两县各地。分赴万年的干部和当地共产党员一起，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1929年8月29日下午，坞头、乐家、叶家店等村农民团，在红7连的支援下，一举暴动成功，镇压土豪，焚烧契约、借据，成立村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嘴背

夏家、松岗岭、富林等 10 几个村又先后取得起义的胜利。 11 月下旬，在乐家厂成立了万年特委，郑心德为书记，辖 19 个党支部。 12 月下旬，在方志敏的指导下，很快掀起年关斗争高潮。梨树坞、东源、裴梅、黄墩等 48 个村农民团，在红 7 连的支援下，先后起义成功。1930 年 2 月 6 日，在年关斗争高潮中，中共万年县委成立，书记郑心德。不久，万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吴泽元。

余江的农民革命团在贵溪县委派来的干部和当地中共党员的领导下，在各村相继举行起义。1929 年 10 月成立了中共余江县委，书记黄灿。 12 月，在方志敏的指导和中共余江县委的领导下，鸿鹤嘴、狮马源、象鼻湾等村开展了以抗租、抗债、抗苛捐杂税为内容的年关斗争。到 1930 年春，遍及贵溪县信江以北和余江、万年县周围 60 公里的村庄相继起义成功，并先后击退了国民党军 1 个加强连和贵、余、万 3 县靖卫团的“围剿”，从而扩大了以弋阳九区为中心的赣东北苏区。贵、余、万起义是继弋（阳）、横（峰）起义之后，赣东北地区又一次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起义，对赣东北苏区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白沙关起义

1929年7月1日，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在白沙关领导和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白沙关位于光山南部（今新县陡山河乡），为鄂豫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27年11月，鄂豫边人民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8年4月，黄麻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后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并创建了以河南光山柴山保（今新县陈店、郭家河一带）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柴山保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周围豪绅地主的恐慌。盘踞在根据地北部边缘白沙关附近的反动地主豪绅，操纵着一伙约400余人的民团，在关上筑寨扎营，据关把守，并经常到根据地边缘骚扰群众，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此，中共鄂东特委和光山县委决定发动白沙关附近的郭家河、莲花堰、油榨河、罗家冲等地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拔掉这颗钉子，进一步推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白沙关山高关固，易守难攻。为了有把握地取得胜利，中共鄂东特委和光山县委进行了组织发动工作，注意了对白沙关及其附近郭家河等地“红枪会”的争取工作，并以红枪会为掩护，铸刀造枪，练兵习武，秘密进行夺关演习。经过半年多的组织发动，鄂东特委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于1929年7月1日拂晓举行起义，由红31师参谋长曹学楷任总指挥。

6月30日，各地参加起义的革命武装和农民群众万余人，秘密在戴岗、王湾、箭厂河、郭家河、莲花堰等地集中后，于当夜兵分3路向白沙关进发，西路由郭家河部分革命红学会和箭厂河农民赤卫队及部分群众组成，由曹学楷和箭厂河农民赤卫队负责人吴焕先带领。东路由红11军第31师第3大队和柴山保东半部革命红学会和农民武装及部分群众组成，由红11军第31师第3大队队员倪志亮、党代表吴先筹带领。中路分左、右两股，由郭家河、柴山保西部革命红学会武装及红11军第31师第5大队组成。右股由红学会司令郭步仪带领，左股由红11军第31师第5大队队长吴行信和党代表郑行瑞带领。1929年7月1日清晨，担任正面进攻的第5大队和数百名红学会会员与农民群众，首先扑向白沙关南门，在关内预作内应的红学会会员接应下，夺取了南寨门。其他各路队伍也很快杀进关内。经1个多小时战斗，一举攻克白沙关，消灭反动民团100余人。

7月6日，起义队伍在白沙关的望风尖召开万人大会，庆祝起义成功。同时宣布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并惩办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红枪会”反动头目和反动民团首领。白沙关起义的成功，使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向北扩展了10余公里。

西湾起义

1929年7月9日，在中共湘鄂西前委、鄂西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湖北长阳县委组织地下党员李勋率保卫团在西湾起义。

1928年9月中旬，中共鄂西特委决定在长阳组织起义，派罗正品为特派员协助中共长阳特支开展工作。下旬，湘西前委书记贺龙派共产党员陈寿山到长阳组织武装暴动，以策应桑植、石门工农革命军。

10月中旬，成立了长阳人民自卫团，由中共长阳北区区委书记陈泽南和中共党员向泉山为总负责人，共500余人。中共都镇湾区委委员李步云也组建起了一支30余人的游击队。1929年1月，中共长阳县委成立，革命武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月下旬，贺龙指挥红4军进驻长阳都镇湾，在茅坪召开会议指示长阳必须迅速建立统一的革命武装，并派陈寿山作为湘鄂西前委代表留长阳指导武装斗争，任命李步云为长阳游击指挥。

5月上旬，陈寿山在偏岩召开军事会议。会议认为，长阳已无国民党军主力，县保卫团的指挥权已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县保卫团副团长李勋手里。据此决定，组织全县革命武装起义。此时，李步云的游击队已发展到200余人。6月上旬，湘鄂西前委书记贺龙指示：长阳的武装起义由陈寿山、李勋、陈泽南3人指挥，李勋总负责。起义部署是：先打县城，占资丘，再向桑植靠拢。20日，李勋以出兵“剿匪”为由，将县保卫团常练队500余人带到资丘、西湾驻训。县委决定，乘保卫团离开县城之机，攻取县城，然后会师西湾。22日晚，陈泽南、向泉山、李步云率长阳人民自卫团和游击队500余人，奔袭县城，击毙县长方云藻，营救在押的共产党员陈兴垣和群众40多人，缴获长枪10多支。次日，处决豪绅刘光耀等12人，部队撤离县城。7月8日，根据贺龙的指示，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6军和第6军前敌委员会，由罗正品代理书记，陈泽南为前敌指挥。9日，李勋、陈泽南、向泉山、李步云分别率长阳县保卫团、长阳人民自卫团和游击队在西湾大沙坝集结，召开有3000多人的军民大会。李勋宣布长阳县保卫团起义，并与县农民武装合编，正式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6军，军长李勋，副军长陈寿山。全军共1100多人，枪400余支，辖1个师、3个团。

7月底，红6军攻打沿头溪邓甲山团防武装，邓甲山越墙逃跑，团丁100多人逃散，红6军缴枪30余支、炮2门。红6军在准备攻打县东团防的转移途中，在王家棚与国民党张发奎部陈凤诏团遭遇，因陈团装备良好，红6军不敌，遂向火烧坪转移。8月初，红6军在资丘遭陈凤诏团的突然袭击，参谋长李子骏等20多人壮烈牺牲，陈泽南、向泉山等80多人弹尽被俘，6日遭敌集体杀害。副军长陈寿山突围后，在李田窖遭地方反动武装杀害。军长李勋率60多人突围到鹤峰乌阳关，与当地革命武装陈连振部会合，建立起工农革命军第6军38团。

9月，李勋等16人在长阳榔坪因叛徒出卖惨遭杀害。

10月下旬，贺龙在都镇湾召开湘鄂西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长阳游击队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6军第1师。同时，健全中共长阳县委，由李小成任书记。11月21日晚，第1师奔袭十五溪和都镇湾，杀了团防头子李尔先和土豪曹远生、肖绍衡。次日上午，部队在棕木岭召开军民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6军第1师，师长黄超群、党代表李步云。全师辖3个营，500余人，长短枪30多支，在湘鄂西前委和鄂西特委领导下，在长阳地区坚持斗争。

那马起义

1929年7月9日，那马（今属马山县）和果德两县农民武装，在中共广西田南临时特委领导下，在那马县城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4月，中共党员黄书祥以广西省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到那马县卅圩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相继建立农协会和农民协会小组。翌年5月，黄书祥在卅圩山城村江庄小学主持召开了有180多名代表参加的那马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选举李凤彰为主席，并决定组建那马县农民自卫军，下设12个中队和一个宣传队。全大队共700多人枪。

1928年底和1929年初，广西各县农民相继发动武装起义。经李凤彰、韦成篇等研究后，认为那马起义条件基本成熟，决定发动农民武装摧毁国民党在那马的反动政权。并决定由李凤彰负责全面工作，韦成篇任指挥长、徐千福任副指挥长负责军事指挥。定于7月9日举行起义，明确了联络信号等。

1929年7月8日黄昏，右江农民自卫军第3路军副总指挥黄韦祥率领农民自卫军500多人（其中包括果德县农民自卫军）集中在卅圩街，由黄书祥进行动员。9日拂晓，农民自卫军兵分东北、东南、北面三路攻打国民党那马县政府驻地——周鹿镇。国民党县长黄之胄见势不妙，乘夜色弃城潜逃。农民自卫军很快就攻进了国民党那马县政府，击毙国民党那马县政府财务科长黄绍科，俘国民党团防局团丁10余人，缴获步枪10支，弹药一部分和大量银元。从监狱中释放无辜群众40多人，销毁反动政府的全部档案。农民自卫军在国民党县政府牌楼上竖起“农民协会”的鲜红大旗。第二天，黄书祥宣布成立那马县临时革命工作委员会，李凤彰任主席，韦成篇任军事委员，徐泽长任宣传委员。

国民党那马县长黄之胄不甘心失败，纠集散兵惯匪1000多人枪向驻周鹿镇的那马农民自卫军反扑。农协负责人李凤彰、韦成篇在掌握了敌人的兵力情况后，主动出击，将黄之胄的残部堵截于周鹿镇郊外。经过激战，把敌人击退后，农军主动撤出县城。那马县临时革命工作委员会也转移到卅圩乡坡马屯。

这次起义，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龙 茗 起 义

1929年7月10日，广西龙茗、养利等数县农军，在中共田南临时特委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龙茗县（今属天等县）位于广西西南部，与万承、养利县（今属大新县）交界。

1928年初，中共“三南”（田南、镇南、南宁道）总部派陈天丙、周述、黎安等到龙茗协助汤学礼在天等圩“龙蟠山”组建起龙茗县第一支农民起义军，共30多人，汤学礼负责指挥。在汤学礼的教育帮助下，龙茗县进步青年马镇武与其弟马臣烈，在全茗、茗盈、顿周等乡拉起了160多人的农民起义大队，后改为农民自卫军大队，马镇武任大队长，辖2个中队，6个小队。

1929年6月，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在中共广西党组织影响下，执行了开放工农运动的政策，并委任原养利农军总指挥冯飞龙（后叛变）为广西游击第一路司令。在中共代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西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龙茗县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也出现了高潮。

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1929年7月10日，全茗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马镇武，联络冯飞龙部共20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攻打龙茗县城。农军分三路进攻。第一路由马镇武、黄日清带领300多人，由西面攻打县城；第二路由冯飞龙带领1000多人，由北面攻打县城；第三路由黄玉祥率300多人从东面攻打县城。国民党龙茗县长林叔勤闻讯后逃往龙州。县衙的大小头目慌忙纠集警备队、义勇队、团务局以及土豪武装300多人负隅顽抗。负责西面阻击农军的国民党龙茗县警备队长赵奉达思想较进步，倾向农军，当马镇武带领农军过其防区时，他只命令部队朝天开了几枪，便佯装败退，让农军顺利通过。国民党龙茗县团务局长苏华昌和义勇队队长黄万文率义勇队、龙英团练和龙英、三北、西北土豪武装以及上映、三加等地团练共200多人，妄图阻挡冯飞龙部的北面进攻。冯部控制了制高点，以猛烈的火力把义勇队压了下去，其余团局武装纷纷败退逃窜。冯飞龙、马镇武两路农军当天攻入县城。东路黄玉祥部因受阻第二天才进入县城。

农军攻入县城后，打开牢房，释放无辜被关押群众10多人，还委任梁斌为龙茗县县长。

这次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扩大了政治影响，为后来的龙州起义创造了条件。

吉水白沙起义

1929年8月中旬，中共江西省吉水县白沙区委在白沙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7月，中共赣西特派詹天龙到水南、白沙地区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不久，郭梅、鄢发等人在白沙、金滩、芳坑、沪沅等村恢复建立了中共支部和中共小组。是年冬，中共白沙区委成立，胡珍任书记。1929年初，中共白沙区委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精神，在广泛开展农运工作的同时，组建了白沙区游击队，由郭国昭任队长（后改为胡志堂），鄢发任指导员，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8月中旬，鄢开帧、郭梅、胡志堂、鄢发等人率领白沙区游击队各村农协会员300余人，包围了“挨户团”住地新万寿宫，并发起进攻。但因“挨户团”早有准备，起义队员牺牲10余人，后撤出战斗。受挫后，中共白沙区委总结了教训，成立指挥部，由郭梅任总指挥。并派人联络东固红军第2团教导队和水南游击队支援，9月8日，白沙区游击队和300多名农民赤卫军、少先队，在游击队长胡志堂等人的带领下，手持长枪、鸟枪、长矛、梭标等武器，并有红2团教导队和水南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一举消灭了白沙“挨户团”地主武装，占领了新万寿宫，缴获了一批粮食、衣物和枪支弹药。

起义胜利后，中共白沙区委公审处决了七八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成立了白沙区革命委员会，由罗秀禄任委员长。会后，白沙区各地成立了乡、村革命委员会，领导贫苦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

罗南起义

1929年8月15日，中共河南省罗南工委在罗山县南部宣化店（今属湖北省大悟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底，中共罗山党组织在宣化店地区创办黄学会，借其名义组织革命武装。1928年7月，中共罗山党组织在宣化店建立了罗南工委和黄学会指挥部，由中共党员郑新民任工委书记兼黄学会指挥长。工委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实行“五抗”（抗租、抗税、抗捐、抗债、抗粮），巩固、发展农民武装，捣毁敌人税卡，镇压反动保正（即保长），捕杀商团团长，摧垮敌人的统治机构。到1929年5月，共产党领导的黄学会已发展到2000余人。起义条件基本成熟。

1929年8月15日，罗南工委利用王家河贫苦农民到地主李启胜田里拾谷子，遭到李启胜及其帮凶殴打，激起农民义愤之机，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工委书记郑新民当众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罗山人民起义了！我们工农大众要当家作主，决不许豪绅捣乱破坏！”同时，批斗了恶霸地主，并处以罚款，以赔偿被打伤农民的医药及生活费用。

8月19日晚，罗山县保安团头目刘善甫带领百余人前来宣化店镇镇压起义。罗南工委得知保安团出发的消息后，连夜集合了1500余人，分别埋伏在宣化店镇外通往县城的道路拐弯的几个山岗上，准备伏击来犯之敌。20日拂晓，当保安团到达宣化店镇外的银山顶、佛爷顶、全山岗时，埋伏在四周的黄学队员高举红旗，手握大刀、长矛、土铳、梭标，从四面八方猛冲过来，吓得保安团员夺路而逃，起义队伍缴获战马1匹，步枪2支。之后，罗南工委领导起义农民赶走了宣化店及其附近的地主豪绅，开仓分粮，同时将黄学会整编为农民赤卫军，并选拔精干人员组成罗山游击队和特务营。接着又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选举产生了红色政权“罗南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军事指挥部，郑新民任指挥长。不久即将罗南与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连成一片，使鄂豫边根据地向西扩大数十里。

饶平起义

1929年8月27日，在中共广东饶平县委兵运政策的感召下，驻饶平县城的国民党第11军教导团第3营第13连，在排长杨福华等人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投奔红军。

1929年1月，中共饶平县委组织饶平县游击队，在上饶区惩处地主豪绅和民团头子，狠狠打击了反动势力，使革命局面逐步打开。至五六月间，上饶赤色乡村的农会、赤卫队等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饶平县革命斗争的再度兴起，使国民党饶平当局惊恐万状，饶平县长黄安福即向汕头驻军告急，驻汕国民党第11军派遣教导团第3营第13连进驻饶城“清剿”农军。5月29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准备夏收总暴动的第8号通告。饶平县委认真贯彻通告精神，决定通过兵运工作，分化瓦解这股敌人。县委派人在国民党军“清剿”农军经过的路上和潜入县城到处贴标语，宣传红军胜利消息，号召国民党士兵起来闹饷，杀长官，投奔红军。驻饶平城的国民党军第13连有部分士兵是原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时被收编的。他们经常受到官长的毒打虐待，反抗压迫之心日益加剧。到饶城后，听到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赣南进击闽西节节胜利；进剿上饶根据地时，又亲眼看到赤色乡村壮大的革命形势，更加向往革命队伍。原南昌起义军战士、副排长赖华山等在中共党的兵变政策的感召下，决心举行兵变。他们暗中在士兵中串连，约定俟机起义投奔红军。8月27日，该连连长往汕头开会。当日深夜，全连80多名士兵在排长杨福华、副排长赖华山的带领下，分头枪杀了副连长和两名排长，高喊“土匪来了！”佯作追击，冲出饶城北门，直奔上饶苏区，准备上闽西投奔红军。因摸不清方向，在双善山里辗转一天。双善乡农会发觉后即派人接洽，宰猪造饭款待他们。中共饶平县委委员詹瑞兰、连半天把该连带到岩下村隐蔽，起义士兵在岩下成立红军独立连，由杨福华、赖华山分任正、副连长。该连起义时有80多人，往上饶一路上离队10人，实存70多人，带有粤造七九步枪68支，俄式手榴弹35枚，子弹近2万发。10月11日，驻平和县城的国民党张贞部10名士兵哗变，到独立连投诚。至此，全连共有80多人枪，是当年饶平和大埔边区一支武器装备较精良的队伍。

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东江特委派李光宗来饶平，负责对这支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并从饶平、大埔抽调一批武装骨干编入，扩充队伍，组建为红军第6军第16师第48团（后改称为红11军48团），团长罗时元，党代表李光宗，转战饶平和大埔边区。

郎车起义

1929年9月2日，中共福建省永福县郎车支部在郎车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郎车位于永福西部，（龙）岩、南（靖）、漳（平）三县交界处，地势险要，战略地位重要，有“闽西的铁门槛”之称。1928年7月下旬，闽西暴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郭滴人，在龙岩的新山左外围主持召开了（龙）岩、漳（平）边界扩大红军秘密会议，提出迅速组织并扩大红军。中共党员陈世隆等人返乡后，在中共郎车支部领导下，秘密组成60余人的郎车赤卫队，队长陈世监；并秘密成立郎车暴动指挥部，总指挥陈世隆，副总指挥陈春芳、陈清桂。1929年9月1日，中共郎车支部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迎接红4军入村。

9月2日凌晨5时，起义队伍600余人手执大刀、长矛、鸟枪等武器，冲向国民党郎车乡公所和民团。前来支援的龙岩、蕉坑、适中的赤卫队200余人，分两路向郎车乡公所发起进攻。乡公所团丁在腹背夹击下，缴械投降。起义队员当场俘虏民团团团长1人，恶霸地主2人，团丁29人，缴获部分枪支弹药。陈世监于战斗中牺牲。当天，农民开仓分粮，烧毁田契债约等。下午，召开千人庆祝大会，闽西特委和红4军派员参加。6日早，红军和龙岩赤卫队离开郎车。

大塔起义

1929年9月3日,在中共宜宾县委的领导下,大塔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大塔乡位于宜宾县城北,距城约40公里,是该县开展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1928年5月曾举行过农民起义,但被敌人镇压下去。1929年6月,中共宜宾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决定组织赤卫军,带领群众开展减租斗争。7月,赤卫军和农民群众抓到大地主张国凡的大儿子,强迫地主减租未成,群情激愤,强烈要求举行起义。8月中旬,大塔赤卫军负责人张海云兄弟俩和刘心太未经请示县委同意,即决定于9月3日举行起义。县委即派余宏文、曾特生、傅谦谟等人组成起义临时指挥部,余宏文任指挥长,负责起义领导工作。9月2日,数百名农民手持长矛、明火枪、牛角叉等武器,从四面八方集中于大塔。3日,起义开始,大塔全街罢市,驻军躲进营房不敢出来。起义军打土豪,收缴枪支,开仓分粮。4日,当地驻军和民团进行反扑,赤卫军牺牲七、八人。5日,反动武装分两路向赤卫队合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指挥部决定起义队伍分散隐蔽。

象洞起义

1929年9月7日，中共福建省武平县委在象洞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在中共福建省委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共武平县象洞区委。1928年冬，中共武平临时县委在象洞张天堂成立。1929年春，象洞区委根据武平临时县委指示，在象洞的洋贝、岗背、官坑、东寨等乡村发动农民协会会员进行“救荒”斗争，把地主的稻谷分给或低价卖给农民。他们在“救荒”斗争胜利的同时，广泛收集枪支弹药，发展农民武装。中共武平县委根据闽西特委的指示，决定首先在象洞的沾阳起义。沾阳是国民党象洞乡政权所在地，又是反动势力较强的据点。

9月7日拂晓，总指挥练宝桢率领300多名起义队员，沿洋贝、罗坑、张坑3路向沾阳进发，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战，占领沾阳，击毙恶霸钟福来，活捉地主练通茂，摧毁乡公所，烧毁田契、借约，成立了洋贝乡苏维埃政府。各乡也继续收缴和购买武器，组建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象洞区组建赤卫军，枪40余支。

11日，国民党汀属救乡团团团长钟绍葵率1个团的兵力向起义队伍猛烈反扑，象洞赤卫军被迫撤出沾阳，后在红4军主力的支援下，于26日又重新占领沾阳，并成立了象洞区革命委员会，练宝桢为主席。

汪家墩起义

1929年9月15日，中共江西省都昌县临时委员会在该县汪家墩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亦称都昌起义。

1928年9月，中共赣东北特委特派员谭和来到都昌，恢复党的组织，建立了中共都昌临时区委。1929年上半年，中共都昌临时区委改为临时县委。8月，周建屏受中共中央派遣，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赣北工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9月8日，周建屏在汪家墩王滚拢主持召开都昌、湖口两县负责人联席会议，通过了首先夺取汪家墩靖卫团枪支，然后奇袭都昌县城，夺取自卫大队武器的行动计划。9月15日夜，谭和、周赓年率领由中共湖口县委组织的60多名武装农民到达汪家墩，在中共都昌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手持菜刀、匕首等，夺取汪家墩靖卫团枪支10余支，取得初战胜利，但因时至拂晓，起义军改变原定奇袭都昌县城的计划，起义部队回到湖口。16日，在湖口城山乡成立了赣东北游击队第1大队，周赓年任大队长，全大队60余人，20余支枪。第1大队在周赓年等人率领下开展游击战争，并一度围攻县城。

华林山起义

1929年9月27日，中共党员张科元、都封爵在江西省高安县西北部的华林山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华林山地处高（安）、奉（新）、宜（丰）3县交界处，方圆近50公里。1929年初，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为进一步扩大游击区，巩固平（江）浏（阳）根据地，派出一批中共党员深入高安、奉新边界开展革命活动。中共党员张科元回到家乡华林张坊村，组织群众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建立了有100多人的张坊农会。后又联络由中共党员都封爵率领，在华林山东面伍侨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一支100多人的农民武装，组成起义总指挥部，下设两个分队、四个小队。张科元任总指挥，都封爵任副总指挥。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29年9月27日晚，张科元、都封爵率领250多名起义队员从瑞相院出发，高举红旗，手持步枪、鸟铳、长矛、大刀等武器，查抄了官僚地主何祖烈的家。何祖烈闻讯逃到民团团总李敬焕家里，并急忙搬来县保安团，妄想借保安团的力量来扑灭华林山的革命烈火。29日拂晓，张科元、都封爵率起义队伍在泉水洞伏击县保安团，战斗到天黑，击毙保安团20余人，击伤数十人。30日，高安、奉新两县保安团400余人，分别从燕山、石背向农民武装的驻地瑞相院进行前后夹击。经激战，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加之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战斗失利，起义队伍遭到很大损失，都封爵、张科元先后被捕，张被杀害，部分起义人员分散转移到山区坚持斗争。

包家河起义

1929年9月底，中共安徽霍山县委员会在霍山包家河（今属岳西县）地区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包家河原为霍山十三保辖区。包家河农民群众深受地主宗法统治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生活十分贫困。为发动包家河地区的武装起义，中共霍山县委委员兼南乡区委书记高维奇派遣王仕斌、汪洋回等共青团员回家乡包家河宣传发动群众。1929年9月，王仕斌、汪洋回回到包家河，深入宣传农民群众，准备农民起义，组织农民准备刀矛兵器，组织猎户修整猎枪，准备火枪弹药，组织妇女绣红旗等。为加强起义力量，还派人到霍山龙门寻找红军第32师请求协助。为便于组织领导起义，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王仕斌任总指挥，汪洋回任副总指挥。9月底，红32师一个小分队来到包家河。王仕斌、汪洋回立即组织包家河附近的300余名农民聚集到王家祠堂，宣布举行起义，成立农民协会。红军走后，起义指挥部召开会议，推选王仕斌任农会书记，陈远长为农会主席。随后成立了有100余人参加的赤卫大队，王仕斌为大队长，汪洋回为副大队长，下设3个中队，9个小队。方启全、丁凯、汪全安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中队队长。

赤卫队成立后，立即收集枪支，武装自己。包家河地处深山，野兽出没无常，豪富之家备枪自卫，穷苦人家持枪打猎谋生。指挥部通令，凡豪绅拥有枪支者，一律交出，否则严惩不贷；贫苦农民枪支自愿交出，参加赤卫队者带枪支。不到三天，共收集枪支、大刀、长矛等武器150余件。随后，开展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筹粮罚款，没收武器，区别不同情况分别给予惩办。

包家河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震惊了当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霍山县国民党当局与从包家河逃跑的上豪劣绅勾结，多次派兵围剿，都被赤卫队队员和群众击退。12月下旬，又组织霍山来榜河商团“围剿”。为打破敌人的“围剿”，总指挥王仕斌赴红32师求援，但王仕斌还未返回，敌人已经开进。为避强敌，副指挥汪洋回指挥赤卫队100余人撤离包家河，当撤至杨家河时，被敌包围，损失惨重，只有40多名赤卫队员突出包围，来到霍山龙门冲，以后编入红32师。

乐安起义

1929年10月2日，江西省乐安靖卫队在中共党员张英等组织策动下举行了起义。

1928年8月，为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中共乐安县大金竹党支部书记张英，以“地方自治”为由，办起大金竹“团练局”，共12人，8支枪。12月13日，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攻克乐安县城。1929年1月，张英等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红21团领导人的决定，以“人少枪少，难以自卫”为借口，解散团练局，派中共党员廖杰文、廖维城等带领团练局全部人枪打入乐安靖卫队。乐安靖卫队原系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失散的官兵，大多数出身贫苦，受革命影响较深。靖卫队内部有中共党的组织——特别支部。不久，张英也打入靖卫队，并担任了代理大队长。经与大金竹党支部和红2团商定，借靖卫队外出执行任务之机，相机举行起义。

10月2日早饭后，张英以开赴招携“追剿”小股红军为由，率领110多名官兵向招携进发。中午，队伍到达马家附近的南岭山拗时，预先埋伏在山腰的红2团对空鸣枪，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并立即开展政治攻势，张英乘机宣布起义。

靖卫队起义后，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特务连。张英、廖杰文、廖维城在本县继续坚持斗争。

杨山起义

1929年10月5日，中共河南省商城县委在杨山煤矿（今属固始县）发动和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不久，中共商城县委派共产党员李悌云等到商城县、固始县交界的二道河、杨山等地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同年冬，建立了杨山煤矿党支部，由张泽礼任书记。杨山煤矿党支部建立后，确定了“从经济斗争入手，充分发动矿工群众，抓紧培养骨干，举行工人暴动”的方针。领导矿工和反动矿主进行斗争。同时，杨山煤矿党支部领导工人逐步由经济斗争转上了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1929年7月，杨山煤矿党支部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起义的准备工作上。煤矿党支部除在矿山上继续开展合法斗争，进一步争取矿工，扩大力量外，同时选派矿工骨干与附近农民赤卫队取得联系，以便在起义时给予配合。9月底，中共商城县委决定在杨山煤矿举行起义，并研究制定起义了计划，成立了起义指挥部，张泽礼任总指挥，雷长友、吴雪桥任副总指挥，并通知苏仙石、二道河、峡口等地党组织，发动农民，配合工人起义。

1929年10月5日，中共杨山煤矿党支部领导数百名矿工和前来支援的周围农民在北矿起义，张泽礼代表杨山煤矿党支部做了动员，然后兵分3路，挥舞长矛大刀，奔袭曹黑楼、徐下楼和桥头店，收缴土豪劣绅土枪60余支。当晚，成立了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共80余人，由张泽礼任队长兼党代表。后又连夜奇袭了樟柏岭，缴步枪3支。不久，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两次围攻反动矿主老巢高家楼，在红11军第32师一部的支援下，攻克其围寨，赶走反动矿主，没收其财产。接着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杨山煤矿总工会，雷长友为委员长，宣布一切权力归工会。同时建立了杨山煤矿生产指挥部，负责煤矿的管理与生产。

在杨山煤矿工人起义的影响下，附近的农民也纷纷举行起义，成立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11月，伏子岭的农民600多人举行起义，成立了100余人的赤卫大队。12月6日，二道河1000余农民举行起义，攻下吴上楼，缴步枪12支，成立了100余人的赤卫队。之后，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和当地农民赤卫队并肩作战，又连续攻下郭家楼、洪下楼、李家寨、秦北围子、姚老家、凌家楼等10多个地主围寨，镇压了一批豪绅，开辟了以杨山为中心纵横数十里的红色区域，有力地促进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这支工人武装在豫东南地区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编入新四军第4支队。

永新北乡起义

1929年10月5日，中共湘赣边特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县北乡与县城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黄门坊北乡是一个约有七八百户人家的大村庄，位于天龙山、桃花山通往永新县城和九陇山的必经道上，是永新县城北面的一个重要门户。永新县保安大队长旷志斌带领200多人枪，驻守黄门坊，并以此为中心，联合黄门坊的豪绅地主、挨户团，在固塘、钱溪、双溪、高市一带布下东西长15里的封锁线，妄图割断天龙山、桃花山和九陇山等红色区域的联系，消灭活动在这些区域的革命力量。活动在九陇山、天龙山区的中共湘赣边特委、永新县委以及赣西北特区早就想摧毁黄门坊、固塘、钱溪这三个反动据点。1929年9月，军阀张发奎发动了反蒋战争，蒋介石为讨伐张，将金汉鼎驻赣西第50师调入福建。中共湘赣边特委和永新县委决定抓住敌正规部队撤离的有利时机，发动永新北乡起义，并以永新赤卫大队和暴动队为主，对黄门坊、固塘、钱溪发动总攻击，摧毁黄门坊反动据点。

9月中下旬，中共永新县委、赤卫大队和中共赣西北特区一批干部秘密深入北乡各乡村恢复党的组织，传达边界特委举行起义的决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乡村很快秘密成立了暴动队、少先队和妇女队。

这次北乡起义由县赤卫大队党代表刘作述、大队长徐彦刚和中共赣西北特区委书记刘一奇、赣西北特区赤卫中队党代表刘家贤、中队长贺曙光领导并指挥，刘作述任总指挥。10月5日晚9时，各路赤卫队、暴动队和武装群众向黄门坊一带进发。6日凌晨后，3路队伍开始进攻。刘作述指挥一路进攻黄门坊；徐彦刚、贺曙光率西北特区赤卫中队、暴动队的一部分武装群众进攻固塘、钱溪。固塘、钱溪两个反动据点很快被攻破，3路队伍一起向黄门坊发起猛攻。经两个多小时激战，保安队和挨户团大部被消灭，小部缴械投降。起义队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银元和其他物资，处决了李日辉等几个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

北乡农民起义成功，摧毁了反动派“围剿”革命根据地而设置的封锁线，使九陇山根据地和天龙山、桃花山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把敌人的统治局限在永新县城附近10公里内。县城只有少量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反动武装及豪绅地主。中共湘赣边特委决定乘北乡起义的胜利，实行全县总起义，攻克县城。10月下旬，永新县委书记朱昌偕主持召开了“进攻县城紧急军事会议”。会议详细讨论了攻打县城问题，并制定了具体的攻城方案。会议决定由北、西、南3路攻打县城。刘家贤、贺曙光率领西北特区赤卫中队、工农暴动队和武装群众埋伏在虚皇山和茅坪一带堵截来自安福、吉安之敌，并接应攻城战斗；贺敏学、贺忠良率东南特区赤卫中队、工农暴动队和武装群众埋伏于城东南的东华岭一带，堵击吉安增援之敌并断敌退路；徐彦刚、刘作述率领县直属赤卫中队、工农暴动队和武装群众从城西的江畔方向直扑县城。会议决定由刘作述任攻城总指挥。为保证攻城战斗的胜利，中共湘赣特委还决定宁冈、莲花两县抽派一定武装参加。

11月1日清晨，攻城战斗打响。赤卫队、暴动队和武装群众向永新县城守敌发起猛攻。经几小时激战，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和保安队抵挡不住，大部分缴械投降，小部分弃城逃跑，全县起义胜利。至此，除东乡的拿山、吴背一小块地方仍被反动地主武装占据外，永新全县解放。随后，中共湘赣边特

委和永新县委机关由九陇山根据地迁入县城，实现了特委指挥中心的转移。

同阜起义

1929年10月，中共江西省吉水县委在同水、阜田两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中共赣西特委成立后，即派员到吉水，同当地中共党员一起恢复吉水党的组织。1928年4月，成立中共吉水区委，易尔士任书记，胡竹青任副书记。5月，恢复了同水、同登、金滩、仁寿等党支部。6月，赣西特委派曾山来到吉水，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曾山等采取秘密的组织斗争方式，迅速打开了吉水革命斗争的局面。到10月，全县相继建立了仁寿、同水、金滩和同登4个区委及县城支部、中鹄特别支部。11月，全县中共党员发展到290余人。月底，曾山调中共赣西特委，高启接任县委书记。1929年2月，国民党吉水县政府纠集了靖卫团、封枪会等土豪武装，破坏党的组织。3月，中共赣西特委指派刘作抚来吉水任县委书记。刘作抚等决心以革命武装打击反革命武装，他带领县农民协会，在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的支持下，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抗债和镇压土豪劣绅的斗争，发展了中共党的组织。到7月，建立了5个区委和3个特支，党员发展到700余人。在恢复党团组织和农协会的同时，还积极筹建革命武装，先后建立两支游击队，由周益棠、刘承禄分别任队长。

1929年9月15日，中共吉水县委在阜田区召开全县党、团书记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三大任务：组织全县农民大暴动和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继续发展和健全各级党团和群众组织；实行分配土地，推翻封建土地制。会议宣告吉水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选举刘生元为委员长。接着，同水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杨清海为委员长。9月下旬，中共阜田区委和区革命委员会在洋狮坳成立，徐光华和周宝文分别任书记和委员长。

在中共吉水县委领导下，同水、阜田两区首先举行起义。目标直指阜田的封枪会、保卫团和国民党6县（即吉水、吉安、安福、峡江、新余、分宜）“剿匪”办事处。10月初，中共吉水县委组织两区赤卫军、少先队共2000余人，在游击队的配合下，首先击败了阜田街上的封枪会，当场击毙封枪会头目王凤鸣，焚烧了会堂，活捉大地主王蔼如。对阜田保卫团，采取外攻内应的策略，起义队伍一枪未放，保卫团即全部被缴械。在强大的革命声势震慑下，驻扎在阜田的6县“剿匪”办事处的反动势力，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起义胜利后，两支游击队继续攻打附近的反动势力。1930年1月，在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的配合下，于金滩街击败吉水反动靖卫团及封枪会，缴枪100余支，烧毁靖卫团的巢穴。盘踞在金滩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逃往吉安、南昌等地。

沱起义

1929年10月6日，湖北省宜昌县北乡莲沱地区的农民赤卫队在中共莲沱区委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9年7月1日，在中共鄂西特委统一领导下，中共宜昌北乡（莲沱）区委组织数十名赤卫队员，配合巴兴归县委武装人员袭击了乐天溪团防武装，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揭开了莲沱地区武装起义的序幕。7月30日，共产党员、赤卫队队长屈林道率领赤卫队队员又处死了邓村团总卢少达及团丁4人，缴枪5支。宜昌反动当局为扑灭莲沱地区的革命火焰，下令通缉中共莲沱区委书记杨继平等人。中共莲沱区委认为事不宜迟，经请示中共鄂西特委和宜昌县委批准，决定于10月6日举行起义。同时争取驻宜昌国民党新编第1师某团参加起义。10月5日，国民党军新编第1师某团起义失败。10月6日晚，莲沱地区赤卫队及起义农民在杨继平、赵德昌、朴光全指挥下，正式发起起义。杨继平率领第1路70多名赤卫队员，打垮了乐天溪刘朝云团防，镇压了土豪朱其治。朴光全率领第2路100名赤卫队员，攻打路溪坪，处决土豪望茂盛等5人。赵德昌率领第3路100多名赤卫队员向九山挺进，在孙家坡遭陈吉武团防伏击受阻。朴光全率赤卫队赶来增援，一举击溃了团防，赤卫队牺牲40多人。国民党宜昌县政府闻讯，派驻军1个营的兵力，加上地方团防武装将赤卫队包围于古城、沙坪地区。因敌我力量悬殊，赤卫队分开突围，转移到地势险要的郑家洞子赶修工事，坚守待援。17日晨，团防头子张南亭纠集近1千人的团防武装，将郑家洞子层层包围，一次又一次地向坚守郑家洞子的赤卫队进攻，赤卫队员血战一日，终因寡不敌众，阵地被攻陷。60余名赤卫队队员和农协会会员被敌杀害，其中共产党员12人。

与此同时，杨继平、赵德昌率领的赤卫队在梨子冲也遭到国民党重兵进攻，遂将队伍撤退到云雾山坚守，并派人去宜昌向县委求援，因派出的人被敌杀害，赤卫队孤军无援，杨继平下令起义队伍突围。突围中70多人被俘，后全部英勇就义。莲沱起义遂告失败。

武平起义

1929年10月7日，在中共武平县委的领导下，福建省武平县上峰、小兰、武西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上峰位于武平西部，距县城10多公里。早在1928年春，共产党员陈道率领江西寻邬部分起义农民来到武平上峰、上坑一带，与武平县共产党员梁心田等一起组织和发动群众，秘密组建农民协会，开展抗租减息、抗粮抗税等斗争。同年冬，中共武平临时县委成立后，尤其是在红4军首次入闽途经武平西部部分地区的影响下，上峰党支部领导上坑、下村、岭下、长窖、中地等地乡村农民组织起贫农团，并在贫农团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为配合红军直取武平县城，中共武平县委指示上峰、上坑举行农民起义，攻打距县城11公里的武所（今中山）。起义前夜，陈道、梁心田等在上峰的楼背主持召开上峰地区党支部成员和各村农会、贫民团骨干会议，决定立即起义，并认真研究了起义计划。

1929年10月7日拂晓，400多人的起义队伍打着红旗，手持步枪、土铳、刀矛等武器向武所发起攻击。龟缩在武所的民团仓皇夺路逃窜。起义队伍攻占武所后，直奔武平。上午9时，起义队伍在县城南门外与红4军第3纵队会合。第3纵队在各区赤卫队和上峰地区起义队伍的紧密配合下，攻克武平县城。随即成立了武平县革命委员会。中旬，又在县城睦族祠（钟家祠）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练宝桢。全县掀起了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组建农民武装等为中心的土地革命高潮。

10月下旬，红军出击东江，县苏维埃政府机关由睦族祠暂迁象洞。县赤卫大队在大队长朱发古率领下赴武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同时开展筹粮筹款，扩大武装，没收土豪财产等活动，深受贫苦农民的欢迎。

12月3日，位于开平北部的小兰积极准备起义。这天，武平县委委员张涤心等利用小兰圩日和小兰张余两姓迎神打醮节日，调集亭头、湘洋、莼秀、店下、七里、浩甲等地180余人，于当晚集中在小兰的育英学校，准备起义，指挥部设在墩子背，张涤心任总指挥。

4日晨，起义开始。起义队伍兵分3路，一路奔袭五里店的民团；一路直捣圳头恶霸巢穴；一路在街上收缴枪支和拦阻逃匪。由于各路指挥得当，仅1个多小时即捉拿土豪数人，击溃民团，缴枪10余支，没收土豪谷子数百担，起义取得成功。3天后，召开了庆祝大会，并成立了小兰乡革命委员会和公开的农民协会、贫农团等组织。不久，小兰附近的乡村以及汀南八乡一带相继举行起义，革命局势蓬勃发展。

1930年6月，毛泽东、朱德等两次率部到武平活动，武西地区的上坑、上岭、中地等地农民为配合红军攻克武所和县城，与赤卫队一道，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队伍配合红军攻克了武所和武平县城，并在县城进行了整训，同时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检阅。

1931年，国民党军对上峰苏区大肆烧杀抢掠，革命群众受到严重摧残，县赤卫队长朱发古不幸被捕，牺牲于武平城。但上峰、上坑一带农民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温福操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并于1932年2月在红12军攻打武平之际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规模空前，人数达到近千人，在攻打驻武所的民团后，配合红军在县城北门外击溃敌人两个营，击伤敌副旅长

钟冠勋，缴枪百余支、子弹万余发，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再次攻克武平。

申家埭镇涛起义

中共如（皋）泰（兴）中心县委，领导如泰红军会同农民群众于 1929 年 10 月 9 日和 11 月 16 日，分别在如皋申家埭和镇涛两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 年 5 月 1 日，如皋、泰兴两县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江苏省委召集转移到上海的两县县委负责人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并对两县的恢复工作做了具体部署。是年下半年，这些领导人陆续回到如皋、泰兴，到没有举行过武装起义的地区，发动农民，建立组织。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被破坏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妇女会等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农民群众的斗争情绪也开始高涨，这时有人提出，再次进行武装起义，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但是，县委吸取了“五一”起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学习了中共六大决议，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盲动，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以游击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因此，他们想方设法筹集枪支，建立游击小组。经过不到一年的工作，如泰地区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党所领导的游击小组在许多地方建立。为了统一组织和领导这些小型游击武装，中共如泰中心县委（1929 年春成立）于 1929 年 8 月 28 日，在如皋西乡宝庆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如泰工农红军”，由如泰中心县委书记兼泰兴县委书记王玉文和如皋县委书记韩铁心统一指挥，下设两个分队，共有 100 多人，60 多支枪。

如泰工农红军成立后，连续与敌进行小型战斗，屡战屡捷，红军的人枪不断增加。为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中心县委研究决定，在申家埭和镇涛举行武装起义。10 月 9 日，如泰红军会同农民群众，在王玉文、韩铁心领导下，分 3 路围攻申家埭。申家埭是如泰边境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据点之一，是恶霸地主周松平的老巢。起义队伍与敌激战 1 天 2 夜，用土炮轰开炮楼，活捉了周松平，缴枪 40 余支。接着，召开了 1000 多人的群众大会，公布了他的累累血债，坚决镇压了这个反动透顶的刽子手，并把他家的三四万斤粮食全部分给农民。随后，红军安全转移。

10 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派薛衡竟到如泰加强领导。薛到如泰后，把如泰红军整编为 1 个大队，薛任大队长，下设两个中队，由如皋军委委员于咸和泰兴军委委员戴奎分任中队长。

11 月 16 日，如泰红军大队会同数百农民举行了镇涛起义。起义队伍首先向镇涛大桥口的守桥警察发起攻击，并迅速占领了大桥口，接着，又冲进国民党区公所和警察分局，打死书记、警长各 1 人，警士 2 人，缴获长短枪 27 支，子弹 5 箱，烧毁了区公所和警察分局，并在大街上张贴标语，高呼革命口号。

这两次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大大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志，如泰红军也进一步得到发展。11 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派黎昌盛（黎时中）到如泰地区，将如泰红军大队扩编为 1 个总队，黎任总队长。这支队伍在次年春，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14 军第 2 支队，转战于如泰地区。

前黄起义

1929年10月10日，中共武进（常州）县委领导天宁寺农民在前黄地区举行以抗租斗争为主的武装起义。

天宁寺在武进县东南，有佃户700多，4000多人口。由于官、绅、僧相互勾结，佃农们遭受剥削压迫，数辈积怨，忍无可忍。1927年10月12日，在共产党员陆景焯、何寒莺的具体帮助和支持下，佃户徐秀文、徐永昌向武进当局呈文控告天宁寺“冒粮收租、压迫农民”，要求清算浮收，并按南京当局颁布的《惩办土豪劣绅条例》，惩处天宁寺首恶分子。控告虽未获准，但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当年冬租大部分未缴。

1928年8月初，县委在都家桥附近的猛将庙召开佃农大会，到会200多人，县委书记恽长安、宣传部长王听楼、农运部长蒋何畏到会讲话，鼓励佃农们团结起来斗争。11月中旬，天宁寺钦峰到塘洋桥强行收租，佃农们在蒋何畏等人领导下，鸣锣集合，包围了收租船，怒斥钦峰，砸碎船窗玻璃，并扬言要烧船。钦峰吓得连忙开船逃走。11月19日蒋何畏被捕。翌晨，县委发动700多名佃农进城示威请愿。反动政府慑于群众声势，加上地方势力与天宁寺的矛盾等等，县长朱只得下令释放蒋何畏。

随着东南乡抗租斗争的发展，中共党的组织也逐步扩大，到1929年春，已建有7个支部，党员60多人，为了加强对抗租斗争的领导，成立了中共武进（常州）县东南区委，书记徐炳全。9月12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江苏省委致常州县委信》，接着，又派省农委书记陈云抵武进（常州）视察并指导工作。陈云抵常后，到前黄、都家桥一带实地视察。陈云肯定了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大有可为，认为只要加强领导，这里也会成为“海陆丰”，并对今后工作作了指示。10月3日，县委领导成立了“武进县升西、从政、太平三乡（后改东南各乡）清算天宁寺浮收田租联合委员会”，主任黄仁荣。10月9日，已升任天宁寺都监的钦峰，带领慧融、皓澄等和尚前往太平乡官庄（今属漕桥乡）收租，船泊殷墅桥。蒋何畏领导升西、从政、太平三乡佃农积极分子约500多人，于10日下午4时许，怒砸收租船，并痛打收租和尚。斗争中，佃农们还当众撕毁了县政府、县党部的联合布告。次日，武进反动当局先后捕去县委委员、谭庄党支部书记徐祖英等3人。14日中午，蒋何畏、徐炳全在鸣凰镇集中了300多名请愿农民，拿着写有“农民解放”、“清算天宁寺浮收田租”、“释放被捕农民”等口号的小纸旗，浩浩荡荡，直奔县城，沿途参加的农民达数百人。反动政府惊恐万状，严加警备。请愿队伍拥向县政府，县长朱荷儒吓得躲进内室，派第一科

指彭湃领导的广东省海丰、陆丰农民起义。科长王兰胜出面，哄骗农民代表进去谈判。佃农坚持要县长出来答复请愿条件。僵持之下，蒋何畏、徐炳全率领佃农拥进大门，直入大堂，捣毁了部分办公室的玻璃窗及办公用品，扭伤警士宋元珍等2人。此时反动当局下令警察开枪，当场打死13岁佃农胡永春，打伤多人。蒋何畏等8人被捕，隐蔽在群众中指挥斗争的县委书记顾志鹤也被殴伤。示威群众被迫连夜回乡。16日，反动军警又逮捕了中共前黄公学支部书记陈枕白，教员傅一星、胡观榆、宗友琴及中共党农小学支部书记周华。抗租斗争受到了挫折，但斗争仍未止息。县委利用反动阵营内的矛盾，发动农民拒不交租。

中共武进（常州）县委领导的天宁寺佃户的抗租斗争，在国民党统治的

中心地区持续近 3 年之久，使天宁寺不得任意收租，这在当时苏南农运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池溪起义

1929年10月13日，中共福建省连城县池溪党支部在池溪区（今朋口镇池溪村）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3月，红4军入闽解放长汀城后，中共党员傅铁人（原名傅开业）在池溪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池溪支部。随后在黄岗、上村、小鱼潭、瑶里、金龙山、畚部、林国山、南岭各村组织起秘密农会，进行抗租减息斗争。7月，连城南部河乡起义，长汀起义也发展到池溪毗邻的长汀宣城、涂坊、南阳。傅铁人指示各村要积极发展农会会员和赤卫队员，做好起义准备。几天内，池溪、小鱼潭、上村、瑶里、林国山、南岭、金鸡山等村各发展了三四十人的农会会员或赤卫队员。

10月13日，成立汀连特别区革命委员会和池溪乡苏维埃政府，建立区特务中队、赤卫队、区少年先锋队。中共池溪党支部带领400多名农会会员、赤卫队员和群众分几路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焚烧契约、账本，开仓分粮。池溪起义后10余天，周围10多个村庄都先后起义，共收缴地主和民团枪支30余支，镇压11名地主豪绅。各乡村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使连城、长汀、上杭、龙岩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东兰起义

1929年10月17日——11月10日，在中共广西省东兰县委领导下，由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主任韦拔群直接指挥东兰农军，在该县的太平、武篆、县城等地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9年8月，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宁成立，韦拔群当选为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副主任。他通过中共广西党组织与广西省主席俞作柏联系，使俞同意了以护商大队的名义，给东兰农军装备一个营的武器装备（长短枪300支、子弹5万多发），韦拔群用这些武器迅速装备了东兰农军3个连。

9月10日，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广西特委。特委决定重建东兰县委，并派中共党员严敏到东兰筹备。

10月中旬，成立了中共东兰县委，严敏任书记。会后，根据县委关于举行东兰起义的决定，立即组织农军攻打太平区和武篆区。10月17日，攻克了国民党太平区团局和武篆区团局，击毙武篆区的大土豪陈舜裔。残敌均逃往东兰县城。

11月9日，中共东兰县委分析了形势后，决定立即攻打东兰县城。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主任韦拔群即向农军发出攻打东兰县城的命令，具体作战部署分3路实施攻击。

10日拂晓，农民自卫军发起攻击。驻在县城内的国民党县长邹尘曼及县警、民团共1000余人。在韦拔群的指挥下，农军先以优势火力压制住敌人。黄玉温则率全连战士向守城民团压过来，迫击炮连看准时机开炮。大约激战近一个小时，敌狼狈向益寿桥方向逃跑。陈恩深连马上率部转向板磨村方向堵击逃敌。在那亨村待命的黄日、农伯烈两个连也左右包抄，敌人受到多面夹击，伤亡惨重，丢弃了大量行李装备。最后，国民党县长邹尘曼率残部向三旺、长老等地逃窜。东兰县城被攻克。

次日，韦拔群在县城召开祝捷大会。对俘获的大地主恶霸韦鸿登，反动分子陈有思、黄鸿龙等进行了公审。会后，组织军民游行示威。并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入县城，颁布了《广西东兰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

东兰起义是在百色起义前右江农民自卫军独立进行的一次武装行动，它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为以后的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汤家苴起义

1929年10月26日，中共江苏省南通县委在该县汤家苴组织发动农民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9年初，中共南通县委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和中共南通特委的指示，在各县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了4个武装游击小队，并成立了东乡苏维埃政府，逐步建立起东五区和中五区一块游击根据地。这引起了国民党南通县当局和当地地主豪绅的极度恐慌，他们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民团，企图扑灭革命力量。

汤家苴大地主汤廉臣组织地主民团武装，与西边东社大地主陈又奇相勾结，肆意残害群众。游击队员仇福余、袁士扬不幸在石头镇被民团抓住，解到汤家苴后被杀害并切成碎片喂狗。为坚决打击地主民团的反动气焰，中共南通县委决定首先打击汤廉臣。10月26日，游击队在王灶河渡口活捉了罪恶滔天的祸首汤廉臣。游击队令其交出全部枪支，争取宽大处理。汤满口答应，并写了一封劝降信给汤家苴恶霸汤大宗。当红军游击队派人凭信去汤家苴缴枪时，地主汤大宗拒不缴枪，并开枪打死游击队员姜锦山，激起了游击队员和农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当日晚，5000多群众举着大刀，铁叉等器械，从四面八方拥来，配合游击队攻打汤家苴。由于敌人龟缩在碉堡里凭坚顽抗，火力很强，战斗至深夜未能攻克。部分队员和群众冲进了汤家苴地主的住宅，烧毁了田契、租约、债据，没收了部分粮食和衣服。次日，根据群众要求，游击队处死了恶霸地主汤廉臣。此后，游击队在南通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广济起义

1929年10月28日，中共湖北省黄梅中心县委和广济县委领导广济农民举行起义。

1928年11月开始，国民党县政府逼迫农民修筑广（济）武（穴）公路，毁压农田600多亩，使公路两旁的农民无偿丢失土地，生活没有出路，自发地进行毁路斗争。1929年5月，中共广济县委召开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引导农民从反对修筑广武公路斗争转化为武装起义。9月26日，黄梅中心县委在广济郑公塔召开了黄梅、广济、蕲春3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在秋收之际发动起义，正式组建鄂东游击队。会后，中心县委委员潘丹桂在大金、石佛寺地区带领农民割电线，锯电线杆，挖公路，石佛寺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杨少丹带领100余人，把杨家麟到石佛寺一段5华里的公路全部挖毁，使公路一度不能通车。愤怒的农民还放火烧毁汽车1辆，处决国民党武穴公安局密探和国民党省政府财政厅巡视专员各1名。国民党县政府恼羞成怒，派军队沿公路两侧抓人，将40多名群众关进了梅川监狱。

根据形势发展，中共湖北省委鄂东办事处和广济县委决定于10月下旬举行武装起义，攻打广济县城，营救被关押的群众，推翻国民党广济县政府。27日晚，潘丹桂和县委成员刘汝翼、宋振东、周祥麟、余壮飞等率领游击队、赤卫队和县中部的农民群众2000余人，带着40多条长枪和两门土炮及刀矛、土铳沿公路向县城进发。于深夜到达指定地点。这时，县东部和西部参加起义的农民约有2000多人。也按时赶到城下会合。28日凌晨5点多钟，起义大军从东、西、南3门同时攻城。顿时，枪声、呐喊声惊天动地。攻城战斗相持了近两个小时，守敌便弃城从北门夺路而逃。起义队伍迅速攻入城内，收缴了20多支枪，烧毁了县衙，砸开监狱大门，解救出80多名无辜被关押的农民群众，将28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就地镇压。

起义胜利后，起义队伍撤出县城，将全县游击队、赤卫队统一整编，成立了广济县游击大队。翌年，广济县成立中心县委，建立了县、区、乡、村4级苏维埃政权。后来，黄梅、广济两县联成一片的赤色区域，先后成为湘鄂赣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组成部分之一。

濯水起义

1929年10月、12月，在红4军和闽西红军独立第5团的帮助下，福建省长汀县南部的濯田、水口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5月，红4军主力第二次入闽，并先后到达长汀的濯田、水口。在红军的帮助下，濯田、水口农民要求红军领导闹革命。雇农出身的兰永昌、兰勇成为水口农民革命的领头人。红军走后，他们找到了闽西红军独立第5团，在团长张赤男的指导下，在水口组织农会，秘密购买武器，准备起义。

10月22日，红军二进濯田。在红4军第1纵队第1、第2支队的帮助下，濯田镇成立闻下方、上方、中方、苍头4个农民协会，组织了4支暴动队，由王学田、王克诚负责。在红军支队的带领下，农民协会和暴动队没收24户地主的1000多担谷子，救济贫苦农民；在毗邻濯田的升平、南安一带打土豪，将濯田暴动队改为赤卫队，王学田任队长。还先后在各村成立农民协会，乡苏维埃政府。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濯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新夫；成立了中共濯田区委，书记廖连胜。

11月上旬，距水口仅二、三公里的涂坊乡塘背村暴动队在闽西红军独立第5团1个连的支援下举行起义。国民党水口乡乡长、土豪劣绅坐立不安，乡丁军心动摇。水口乡农民运动领导人兰永昌、兰勇成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12月22日清晨，带领60多人一举攻占水口乡公所，成立了水口乡苏维埃政府和乡贫雇农协会，兰永昌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贫雇农协会会长。接着，附近各村的刘坊、巫坊、梅迳、兰南、连湖、露潭、陈屋等地农民也相继起义。不久，水口乡苏维埃政府改为水口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邓洪盛。

思林起义

1929年10月，思林农民武装，在中共广西特委、中共恩林县党支部领导下，再次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9年8月中旬，广西各县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黄永达被选为委员。9月10日，思林农军总指挥黄永达根据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积极组织农军开展武装斗争。当时，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到右江来筹划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工作。按照雷经天的布置，黄永达马上组织数百农军，成立农军大队，黄永达任大队长，下辖3个连，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为提高农军战斗力，黄永达把农军拉到离思林100多里的那海、梧圩一带进行短期整训，为举行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黄永达和张震球、梁维祯等组织农军700多人，举行思林起义。这次，他们采取了近战夜战的战术，以敌人敲起床钟为号，发起拂晓攻击。农军在天亮之前就秘密地将县城包围起来，并将事前赶制的云梯搭放在城墙外待命。天刚麻亮，敌人敲响了起床钟，黄永达立即发出了总攻信号。农军听到进攻信号，一个个猛虎般的顺梯而上，翻过城墙，跳进城内，举枪向敌人射击。城内敌人毫无准备，有的还在床上穿衣服，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惊惶失措，仓促应战。农军迅速冲进了敌人县署，国民党思林县长陈献汤、县团务总局长凌利堂从乱枪声中率部分警团企图逃命。刚到河边就被农军抓获，凌利堂因民愤极大，被农军处决。农军共缴获长短枪50余支，子弹6箱。

这次起义，由于农军采用了突然袭击的战术，很快摧毁了国民党思林县政府，为建立革命政权和后来的百色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上饶起义

1929年11月1日，中共江西省上饶临时县委在该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7月，横峰县委派黄南山到上饶领导人民开展斗争，很快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7月23日成立中共湖村支部。8月，建立中共上饶特区委。在特区委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分别到茗洋、碧霞、大畈、济腰、庙湾等地活动，发展党的组织。1929年1月，成立中共上饶临时县委，黄开湘任书记。4月，临时县委召开党员会议，根据中共信江特委指示，决定组织年关起义。为此，将全县划为三个革命活动区，党员分头负责。同年10月底，上饶县基本形成了以湖村、茗洋、石城为中心的年关起义局面，信江特委并决定派红军支援上饶的年关起义。11月1日晚，信江红军独立团一部80余人，在湖村、库前、碧霞等地的2000多暴动农军的配合下，兵分3路，进攻驻守潭头舒家祠的上饶靖卫团，击毙敌团总张学林以下官兵26名，俘13名，缴枪33支。

1929年冬，中共上饶临时县委在信江红军独立团的支援下，茗洋、湖村、双溪三个暴动区先后举行武装起义，消灭了上饶靖卫团和十都挨户团，取得了年关起义的胜利。之后，3个暴动区建立起区、乡苏维埃政府。党的秘密组织和革命活动扩展到信江北岸的重团、大地。仅1个月时间，上饶县的西北乡各村就建立起3个区、几十个乡苏维埃政府，总面积纵横50余公里，人口9万多，并建立了500余人的赤卫队。

1930年初，国民党派出正规部队对信江苏区进行“围剿”，大举进犯信江特委机关驻地磨盘山。方志敏等领导人率红军独立团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直扑上饶县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2月22日，上饶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饶县苏维埃政府。上饶苏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为赣东北苏区的形成及后来的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霍起义

1929年11月8日，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安徽省六安的独山、霍山的西镇等地发动和领导了以农民暴动为主体与民团兵变相结合的武装起义。

六安、霍山位于安徽西部，是大别山的重要门户。1927年10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决定以六安为中心，划六安、霍山、霍丘、英山、寿县5个县为第一暴动区，同时成立皖中特别委员会，周范文为书记，领导这一地区的暴动工作。省临委要求尽可能夺取六安300支枪，秘密组织工农武装，即刻发起零星暴动，在二三个月内发生大暴动。11月，皖中特委在六安县白浒圩召开党团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贯彻省临委交给暴动区的任务。1928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巡视员尹宽（又名王竞博）到达六安，召开会议，决定撤销皖中特委，将六安、霍山、霍丘三县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六霍县委（又称六安县委），王逸常为书记，周范文、周涓之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工作。

中共六霍县委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领导农协较广泛开展了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夫的斗争，农协得到迅速发展。到1928年11月，在六安城郊成立了六霍县农民协会，下辖5个区农会，150个分会。在斗争中，六霍县委还由共产党员和农协积极分子，组成秘密武装小组，购买枪支和夺取敌人枪支武装自己，并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皖西大刀会和土匪。还趁敌人扩充地方武装之机，选派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进民团内部，控制敌人武装。

六霍县委在做好农协、工运、刀会土匪和民团工作的同时，加强了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到1928年底，党员发展到347人，建立了八个区委，26个支部。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1929年1月，六安、霍山两县分别成立县委，邹克其（即邹同初）为六安县委书记，舒传贤为霍山县委书记。

1929年8月5日，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英在六安、霍山交界的豪猪岭召开了六安县第3次党的代表大会，霍山、霍丘、寿县的党组织均派代表参加，会议确定不失时机地在各地发动秋收武装起义，组建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大会决定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推选舒传贤任书记。会议要求各级党团组织积极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0月初，方英在六安县郝家集召开六安、霍山、霍丘、寿县、英山、合肥六县党的代表会议，传达党的六大决议及二中全会关于目前革命阶段新任务的指示，宣布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舒传贤任书记，领导上述6个县的工作。会议检查全面发动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认为六霍地区秋收不好，引起经济恐慌；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广大农村；六霍西部多山，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河南红军已到金家寨，并继续东进麻埠游击；六霍县委已掌握了百余支枪和3000人的武装群众。会议认为六霍地区秋收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决定于11月15日首先在六安独山举行起义。

1929年11月7日晚，六安县三区二乡农民协会常委兼秘书何寿全等3人，被独山自卫团逮捕。何寿全带在身上的农协会员花名册也被搜去。在三区工作的六安中心县委负责人得知消息后，立即一面派人报告六安中心县委，一面派人保释。舒传贤、周涓之获悉何寿全等被捕消息后，决定提前举行起义。8日晨，独山周围十五个乡的数千农协会员，手持钢叉、大刀、长矛和钢枪等武器，从四面八方涌向独山镇，包围了自卫团魏祝三部驻地马氏

祠。周狷之使巧计，在门前缴了哨兵的枪。敌人慑于起义群众的强大声威，释放了何寿全，交了 10 几支枪，但拒不交出全部枪支。起义队伍奋起抗击，激战一个多小时，毙敌 4 人。敌人胆怯，纵火烧民房，乘群众救火之机，带残部在援敌的掩护下仓皇逃命。起义群众占领独山。

11 月 9 日，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赶到独山镇，随即召开会议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六安县各区和邻近各县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援助独山起义。独山附近的西河口、龙门冲、郝家集等地农民迅速揭杆而起，响应独山起义。12 日上午 9 时，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及六安县三区区委、区农协在独山镇召开 2 万余人的群众大会，追悼死难烈士，会后游行示威。独山起义成功后，成立了六安县三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内设总指挥部，鲍益三（即朱雅清）任总指挥，高钟灵（即方英）任党代表，组建了 6 支游击队，直接受总指挥部指挥，并挑选 2300 名农协会员、积极分子组成了赤卫队。

为建立独山至西河口这一带山区革命根据地，联合商南起义的红 32 师进攻苏家埠和六安，扩大党的影响和苏维埃区域，六安中心县委决定组织六安县三区游击队和赤卫队，攻打麻埠。11 月 17 日下午，总指挥鲍益三等率领游击队和赤卫队分三路围攻麻埠，因敌强我弱，虽经激战，终未攻克。18 日上午，游击队撤出，打开龙门冲张汉卿土豪家，开仓分粮济贫；下午，游击队和赤卫队又打麻埠。直到 21 日国民党军独 1 旅以驻霍山的一个团增援麻埠，六安的一个团进驻独山，游击队才被迫撤出战斗。

独山起义后，各地根据六安中心县委的通知，纷纷组织起义。11 月 16 日，中共六安六区区委领导古碑冲、南庄畈、七邻湾一带的农民起义，并以区游击队为主力，击溃汪东阁的反动民团，缴枪 40 余支。与此同时，区游击队扩建为游击大队，成立了行使政权职能的六区农民协会。

为使六霍起义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霍山县委书记喻石泉，霍山县委委员吴仲孚等人到燕子河部署西镇地区起义。11 月 19 日，200 多名农民赤卫队在中国工农红军第 32 师师长周维炯带领的 80 余名红军支援下，一举攻下闻家店，将当地自卫团歼灭，俘敌官兵 20 多人，缴枪 32 支。击溃楼房湾豪绅地主余良池家反动武装，缴枪 20 多支，接着攻下燕子河、长山冲、漫水河等村镇。在漫水河俘敌自卫团官兵 70 多人，捣毁了西镇事务所和经济维持会。西镇起义获得全胜。红 32 师回师丁家埠时，途中又攻打 3 个保安团。起义队伍深得民心，起义烈火愈烧愈烈，起义范围由闻家店、燕子河扩大到深沟铺、黄栗杪、上土市、杨家河、包家河、高山铺、太平畈等地，方圆百里全被农民武装占领，各乡都建立苏维埃政权。西镇起义胜利后，在漫水河成立了五区苏维埃政府，燕子河成立了六区苏维埃政府。整个西镇地区建立了西镇革命委员会和军事指挥部，徐育三任总指挥，组建了有 360 多人的西镇游击队。游击队成立不久，便 3 次击退西镇自卫团残部和英山自卫团的联合进攻，并在道士冲打退了霍山县自卫团。

独山、西镇起义后，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又发动桃源河起义。12 月 16 日，徐育三带领西镇游击队 100 余人到达桃源河，当晚在蔡家山打了熊家大土豪，第二天攻打桃源河一带的 8 个土豪劣绅，缴枪 40 余支，组织了 340 多人的赤卫队。桃源河起义后，诸佛庵共产党员陈德宏等领导 100 余人的赤卫队立即响应，赶走了诸佛庵的民团。新店河的共产党员郝修德等人将名为团练实为赤卫队的 300 多人集中起来，参加了龙门冲起义。接着在诸佛庵成立七区苏维埃政府，使六安，霍山红色区域基本连接起来。

12月25日，按照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的事先安排，中心县委常委周狷之带领10几名游击队员和原六安县徐集民团队长、共产党员毛正初一起，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击毙徐集民团队长朱晴川。徐集民团起义后，和赶来接应的农协会员汇合，成立了300多人的河西红军游击大队，毛正初任大队长，并成立六安第四区革命委员会。当夜，起义队伍西进，配合江店民团队长、共产党员李野樵领导江店民团起义，缴获20余人枪，随即一同开往南岳庙、真人庙、王祠堂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王桥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独山、西镇等地武装起义不断胜利，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政府集结以陈耀汉独立第1旅和地方反动武装近千人，于12月中旬进攻革命起义区域，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吴才干、军委主任朱体仁和三区区委书记许希孟等被捕牺牲，基层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遭到很大破坏，大批革命群众被捕杀。为粉碎敌人的进攻，1930年1月6日，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六安县横旦岗九里冲召开会议，讨论了军事组织的原则，决定调合肥徐百川（又名张开泰）来负责军事。接着县委第10次常委会议决定，把独山起义武装编为安徽红军第1游击纵队，冯晓山任纵队长；西镇起义武装编为安徽红军第2游击纵队，徐育三任纵队长。20日，游击纵队和六安县六区游击大队在霍山县流波疃集结。不久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又召开有县委常委、游击纵队、游击大队党团负责人会议，决定由舒传贤负责，将各游击纵队、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3师，徐百川为师长，朱亚清任党代表，张建民为政治部主任（数日后为姜镜堂）。全师3个团：第1游击纵队和六安县六区游击大队编为第106团，冯晓山为团长，余爱民为党代表，高天栋为副团长。第2游击纵队编为第107团，徐育三为团长，孙能武为党代表，李锡三为副团长。六安县四区游击大队编为第108团，王仲廉为团长，毛正初为副团长。

六霍起义的胜利，开辟了皖西革命根据地，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33师成为鄂豫皖边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港口起义

1929年11月12日，中共江西省九江县委在该县港口地区发动和领导了数次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5月，中共九江县委调甘西区委书记徐上达到港口开展工作，恢复港口区的原有党组织，利用赤湖地区的武装基础和地理条件，建立赤湖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与发动，建立了中共港口区委，徐上达任书记，并于当年秋冬组织了几次起义斗争。

港口地区总起义。1929年深秋的一天，中共港口区委召开党员紧急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定。会后，中共党员分散到各个村庄，组织发动群众，11月12日晚，港口区委书记徐上达和区委军事委员汪仲屏率领30多名中共党员和100余名赤卫队员，手持梭标、大刀、棍棒等武器，在白虎寺集中后，兵分几路，同时行动。一路进发港口下街头坝里，包围了民愤极大的恶霸徐巨轩的住宅，并当场将其击毙。另一路进发筒家村，处决了恶霸地主筒襄伯。其他几路镇压了土豪劣绅后，一齐向港口镇进发。起义队伍在汪仲屏的指挥下攻占了区公所，击毙罪恶多端的反动区长。驻守区公所的十几个靖卫团团丁，有的被俘，顽抗的当场毙命。胜利后，将反动区长和恶霸豪绅的财产分给了贫苦群众。不久，九江县委决定以港口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赤湖游击队（后称港口特务队），程世旺为队长，汪仲屏为指导员。以后，赤湖赤卫队开辟了以赤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夜袭码头缉私局。从1929年6月起，国民党反动派为扼杀各地苏区的革命斗争，配合军事进攻，实行经济封锁，在长江南岸的瑞昌码头设立缉私局，企图控制长江南北的贸易通道，断绝苏区军民的粮食、食盐等物资来源。一天傍晚，汪仲屏率30余名游击队员，分乘6只小船，逆江而上，午夜抵达瑞昌码头，偷袭缉私局，毙伤缉私局长，缴枪8支，子弹两箱。

围歼白涉渡垦荒局。1929年，以反动头子李安禄为首，为镇压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屯集粮草充作军需，在赤湖岸边白涉渡开办了一个垦荒局。局内驻有数十名匪军，经常骚扰百姓，群众恨之入骨。赤湖游击队夜袭缉私局后，决定拔除垦荒局。阴历年底，汪仲屏率领赤湖游击队80余人，乘垦荒局驻军一部回家过年之机，深夜围攻垦荒局。匪军除2人被击毙外，其余当了俘虏。游击队缴枪10余支，子弹2000余发及部分财产。

值夏起义

1929年11月15日，在中共江西省赣西特委领导下，共产党员罗炳辉率领吉安靖卫大队在该县值夏镇举行了起义。

1929年春，驻吉安的国民党滇军第12师师长金汉鼎将吉安8乡联防靖卫队改编为吉安靖卫大队，罗炳辉任大队长。罗炳辉曾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具有进步思想。他就任大队长后，利用职务之便暗中了解与帮助共产党和红军。为此，引起中共江西省委和赣西特委的关注。省委指派隐蔽在国民党第9军第27师任上校副官长的中共党员赵醒吾利用其与罗炳辉的同乡关系，前往吉安进行策反。9月间，经赵醒吾介绍，罗炳辉化名罗南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遵照赣西特委的指示，罗炳辉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1月8日，国民党军警突然对吉安市进行大搜捕，致使中共赣西特委被破坏，起义计划暴露，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罗炳辉决定立即举行起义。恰在此时，师部以补发欠饷为诱饵，命令罗炳辉回城，企图乘机一网打尽。罗炳辉将计就计，一面集中部队，佯装准备入城；一面选派可靠人员控制各中队，并秘密将吉安城内的枪弹和饷银偷运出城，他本人也趁机带大队部可靠人员离开吉安撤到值夏驻地。15日凌晨，罗炳辉集合第1、第2、第4中队缴了由当地势力组成的第3中队武装，宣布起义。起义部队180余人，携枪250余支，日夜兼程，向东固革命根据地开进，当晚到达新圩，与专程赶来迎接起义部队的赣西特委委员曾炳春会面。16日，起义部队顺利到达富田。起义部队在富田短期整训后，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5团，罗炳辉任团长。此后，部队不断扩充和调整。1930年1月，罗炳辉所部编入红6军（后改称红3军）第2纵队，罗炳辉任纵队司令员。

中鹄起义

1929年11月17日，中共江西省赣西特委委员毛泽覃在吉水县城南部中鹄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到达东固螺坑与江西红军第2、第4团会师。红4军留下了毛泽覃、谢唯俊等一批干部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不久，毛泽覃秘密来到中鹄区。毛泽覃为贯彻中共赣西特委以“夺取吉安”为中心的斗争口号，与当地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梁德金一起，积极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一是在各村扩大农民协会，组建少先队，发展党、团组织。1929年6月，在中鹄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中共中鹄区委；二是组建革命武装。同年，中鹄区游击队成立，队长郭春，政治委员王甲天（后蔡拔萍）。游击队成立后，经常到水东和吉安县的新圩、陂头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土豪劣绅；三是派人打进值夏“五市联防”靖卫大队中做兵运工作，争取靖卫大队起义。1929年11月中旬，毛泽覃在中鹄区召开动员大会，宣布举行中鹄区农民武装起义。

11月17日夜，蔡拔萍、王甲天等率领中鹄区游击队100余人和梁德金、李辉才、易道生等人率领的南团等村的少先队、农协会会员等400余人于棋盘石会合。第二天凌晨，各路队伍到达固山村，捉拿土豪劣绅王协锦，随后又到江头村，捉拿地主姚明池，没收了他们的财产，19日，指挥部在中鹄区沉头村召开了数千人的动员大会，号召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起义胜利后，中鹄区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改选了各级党、团组织，选举蔡拔萍任中共中鹄区委书记，易道生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鹄区委还举办了工农干部训练班，培养干部60余人。从此，中鹄区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不断高涨。

青溪起义

1929年11月中旬，广东省紫金工农武装在中共紫河特区委的领导下，在青溪举行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武装起义。

1928年春，国民党派重兵“围剿”海（丰）陆（丰）惠（阳）紫（金）革命根据地，镇压各地农军。国民党军黄旭初部由老隆经河原进攻紫金，血洗炮子苏区。紫金县苏维埃政府及党、政、军机关在白色恐怖中撤出炮子，与红2、4师一起，在海陆惠紫边区开展游击斗争。1929年11月，根据中共东江特委关于扩大苏区、发展新区，转移敌人视线，保卫海陆惠紫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青溪成立中共紫河特区委（书记庄羲）和紫河游击队（队长蓝蔚林）。紫河特区委决定，利用秋收斗争的机会，组织青溪起义，围攻区、乡国民党政权，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为加强青溪起义的领导，成立了中共青溪区委，蓝蔚林兼任书记。起义前，紫河特区委从县内各乡调武装力量，组成起义队伍，由紫河游击队统一指挥。共有兵力200人左右。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拂晓，起义队伍分成4路，星夜包围了青溪圩，集中火力向乡公所炮楼猛烈射击。驻守在青溪乡公所的国民党军有10多人，反动民团50多人，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精良，武器、弹药充足，又凭借炮楼进行顽抗，战斗直打到下午3时，敌弃楼而逃，起义队伍收缴了各炮楼的武器，占领了青溪圩。第二天，起义队伍在撤出青溪圩时，与国民党军100多人遭遇，在战斗中蓝蔚林队长不幸落入敌手。值得庆幸的是在西门坝刑场，当敌监斩官下令对蓝蔚林行刑时，具有正义感的敌排长击毙监斩官，与蓝蔚林一道进入炮子苏区。不久，紫河游击队转移到海惠边境活动。

长汀古城起义

1929年11月22日，中共福建省长汀县委在古城镇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3月，中共长汀特别支部书记段奋夫在古城金丰山召开中共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汀西党委会，李国玉为书记。8月，中共汀西党委提出：“发动群众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的革命口号。1929年3月，中共长汀县委在汀城成立，书记段奋夫。9月，红4军攻克上杭县，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同月，中共长汀县委加紧准备古城起义。11月初，中共闽西特委指示长汀县委成立“古城暴动行动委员会”，县委书记段奋夫兼行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继烈，中共地下党员刘宜辉等为行委委员。

22日晚，农民暴动队200余人秘密到离古城镇约3公里的高岭坑集结。段奋夫当众宣布“汀西革命委员会”成立，并组成指挥部、参谋部和支队部，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是夜10时许，起义队伍从高坑岭出发，手持步枪、梭镖、大刀等武器，在段奋夫等率领下包围了团防局，经激烈战斗，40多名团丁放下武器投诚。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起义胜利后，起义队伍包围了县城，镇压了县长邱耀骊，击毙和捕获了反动头目和地主豪绅100多人。在古城起义影响下，周围乡村下都、元坑、胡竹坝、大东坑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并取得胜利。古城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拥有100多支枪，成立了汀西游击大队，刘宜辉任大队长，黄继烈兼党代表。

周户兴起义

1929年11月间，在中共陕西省关中西府区委的领导下，周至、户县、兴平等县的数百名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9年，陕西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广大农民群众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悲惨生活。加之陕西军阀和反对政府、地方豪绅抓壮丁，派粮款，催租逼债，农民群众忍无可忍，被迫纷纷起义反抗。中共陕西省委为了推动周、户、兴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于同年4月，派共产党员陈云樵任中共关中西府区委书记。陈以国民党周至县党部委员的身份到周至开展活动，恢复和发展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4个党支部。还争取一些秘密农民武装的首领，如武功县的陈其武、黄产文，兴平县的朱佐洲等参加起义。

11月，陈云樵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这期间，周至县临川寺的警察下乡催款，吊打农民，引起公愤。贫农周七率领农民数十人，打跑了警察，首先举旗造反。从此，农民武装起义的火炬开始燃烧起来。起义武装很快发展到百余人，他们拿着梭镖、大刀、木棍，一举攻进了终南镇，砸烂了乡公所，痛打了乡吏豪绅。起义队伍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乘势向周至县城发动进攻。第二天拂晓，起义农民攻入县城。国民党周至县县长率武装警察20多名仓皇逃走。农民军收缴长枪10余支，短枪数支，俘虏警察10余人。他们还捣毁了国民党党政机关，打开监狱放出无辜群众，开仓放粮，赈济城乡灾民。第三天，起义军攻打户县县城。国民党户县守军与政府官员闻风而逃。起义军破城而入，将国民党县党部、政府、法院、税所等机关全部捣毁，释放监狱人犯；开仓济贫，饥民笑逐颜开。

周至、户县的农民起义震动了国民党陕西省统治当局。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将一个旅调到户县进行镇压。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伤亡惨重，队伍被打败。

中共陕西省委急让陈云樵回到周、户、兴地区指导起义。陈云樵立即通知各县秘密农民武装和起义农民到兴平县的尼空寺镇集合。很快便聚集了约2000多人，200条枪。陈云樵主持召开了各队负责人会议，确定了领导机构和作战计划。会议决定成立总指挥部，陈云樵任总指挥兼政委，牛汉臣任副总指挥，并成立了由张辉、吴焕然、李特生等组成的政治部。

起义队伍于当夜包围了周至县城，由于屡攻不下，伤亡很重，黎明时分，便向眉县方向转移。当队伍到达眉县横水地区时，受到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的前后夹击，起义队伍被打散。陈云樵率少数起义人员北渡渭河，撤往礼泉县继续坚持斗争。

百色起义

192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邓小平、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广西警备第4大队会合右江农军，在百色举行了武装起义。

百色位于右江上游，是滇、黔、桂3省边境的交通要道，也是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同年6月，蒋介石委任俞作柏、李明瑞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

俞作柏和李明瑞是国民党左派，原在桂系军队中担任要职。他们主政广西后，想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干一番事业，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先后派出邓小平（化名邓斌）、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陈昭礼）、龚鹤村（化名龚楚，后叛变）等40多名党员干部，先后到达广西，与原先参加过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一起，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

7月，邓小平带着中共“六大”决议案，在龚饮冰等陪同下，秘密从上海来到南宁。根据广西的情况，他把党中央的指示与广西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开展对桂系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在广西与国民党左派重建合作关系。

其次，开展兵运工作，掌握军队的领导权。通过内部关系活动，由中共党员张云逸、俞作豫、李谦、史书元分别担任了广西警备第4、5大队长和副大队长。使这两支各1000多人的武装，都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里。

第三，加强对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工农运动的领导。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细致工作，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全省已健全的中共县委和县特支有9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5个。党员共420人，团员有130人。全省的工农革命运动也有较快的发展。

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改组派头子汪精卫派人到南宁，游说俞、李反蒋，加上当时蒋介石对俞、李的进步倾向很不满，企图除掉他们。迫于形势，俞、李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蒋。中共党组织闻讯后，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时间不长，立足未稳，仓促反蒋，必然失败，也会打乱中共党组织原来的工作部署。因此决定一方面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另一方面，作出应变决策。决定把中共广西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农村，把党掌握的武装开赴到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10月1日，俞、李出兵参加反蒋战争。中共以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4、5大队未训练好，后方需要保卫为理由，建议俞、李将这3支部队留守南宁。俞、李同意这一建议，并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

俞、李出兵后不到10天，因其部下的师长吕焕炎、杨腾辉和旅长黄权等都被蒋介石以重金收买，倒戈投蒋而败退回南宁。军阀陈济棠以3个师兵力入桂逼近南宁。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广西党组织按照事先制订的应变计划，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3支部队，于10月中旬分别由水陆两路向左右江地区挺进。

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广西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部分

学员到达百色后，立即召开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分析形势，制定今后的斗争策略和措施，决定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缜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做好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并决定暂时打着俞作柏的旗号，利用旧督办机构，宣布由张云逸担任右江督办，指挥各县地方政府，通令各县上缴税款，稳定各县局势。

按照这次党委会议的部署，一方面对从南宁带来的部队继续进行整顿、教育、改造工作；另一方面大量吸收工农青年入伍。1 个多月时间，共吸收了 1000 多名新战士；再一方面，把从南宁运来的武器、弹药发给农民自卫军和工人赤卫队，增强农军战斗力。

10 月 28 日，为了扫除武装起义的阻碍，广西警备第 4 大队在右江地区农军的配合下，胜利围歼了反动的广西警备第 3 大队 1000 余人，缴枪 700 余支。至此，右江两岸已成为中共控制的红色区域，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0 月 30 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起义后改为红七军前委），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和部队，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

11 月初，原从南宁派往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来中央关于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研究贯彻中央的指示，决定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前委根据准备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于 12 月 11 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那天举行百色武装起义。邓小平在布置好起义工作后按中共中央电示，于 12 月初经龙州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2 月 10 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和士兵代表大会。晚上，前委又邀请百色、奉议两县县长和百色商会要员赴宴，向他们说明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政策。同时，收缴了百色公署公安局、禁烟局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共 300 多支。

12 月 11 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镇东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数千各族工人、农民、战士和市民参加了大会。大会宣布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红军第 7 军正式诞生。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任红 7 军前委书记（1930 年 3 月 2 日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全军辖 3 个纵队，共 4000 多人。军部设在粤东会馆。

同一天，中共广西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关于红 7 军实施政纲、实行土地革命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雷经天为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为委员的右江苏维埃政府。这是右江各族人民第一次翻身做主人的重要标志。

第二天，前委在平马镇举行有 1 万多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张云逸代表前委出席大会，号召全体军民为巩固苏维埃政府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而奋斗。

在红 7 军帮助下，东兰、凤山、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恩阳、凌云、那马、都安、那地等 15 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河池有部分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创建了拥有 100 余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一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它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谱写了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新篇章。

大冶阳新起义

1929年12月14日，在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中共湖北大冶中心县委、红5军第5纵队的密切配合下，由中共地下党员程子华等在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组织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起义，史称大冶兵暴。

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原系西北军第2军（岳维峻部）。蒋介石为了兼并异己，将五六万人的岳部缩编为新编第1师，岳维峻降为师长。后改编为独立第15旅，任命唐云山为旅长。早在大革命时期，第2军即建有中共组织。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还秘密地保存着。1928年冬，该部成立了中共支部，并在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兵运工作。不久，共产党员发展到70余人。有十四五连建立了党支部。为了加强该部党组织的领导，上级又派郭子明、季步高、耿卓吾到该部工作。1929年夏，新编第1师驻宜昌、沙市、秭归时，该部中共组织密议了起义计划，组织了起义司令部。起义领导人耿卓吾、季步高想与第5团团团长王俊杰共同发动兵变。王却另怀野心，抢先在宜昌发动了哗变，杀害耿卓吾、季步高，宜昌起义失败。

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鄂东南的革命火焰，决定将独立第15旅调到大冶、阳新“进剿”红军。中共地下党员、该旅第5连排长程子华获此情报后，即向在武昌教书的地下党员赵品山通报了情况，商议准备起义。此时，中央军委派石钟伟、柯乃康（庆施）、邓乾元到武汉找程子华联系。共同商议，决定在大冶、阳新伺机举行起义。1929年10月下旬，独立第15旅开赴鄂东南。旅部驻黄石石灰窑，1营驻阳新，2营驻大冶，3营驻江北团凤。12月初，中央军委派刘振山向程子华传达了“里应外合”举行起义的指示。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和第5纵队党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在阳新县曹家堍（今大冶曹家堍）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决定12月14日夜12时举行起义，并详细研究了策应兵暴，夺取大冶县城的具体计划。会后，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和红5纵队领导分头进行准备工作。

12月14日晚11时半，程子华集合第5连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士兵，号召起义，参加工农红军，全连士兵积极响应，拘捕了第5连的反动军官。接着，程子华命令2个班解决营部；两个班协助第6连解决该连的反动军官；1个排去解决第7连连部。派1个班看守拘捕的反动军官。半小时以后，第6连顺利地解决了反动军官，全连士兵参加了起义。但在第7连方向响起了枪声，引起营部及第7连的戒备。程子华鉴于情况紧急，便将起义的第5、6连拉出了大冶县城，隐蔽在城郊的山上。

15日，红5纵队歼灭第7连，俘获守城营长，并乘胜攻入大冶城内，其余守军全部缴枪投降。此役，红军共俘敌军千余人，缴枪900余支，活捉大冶县长伍屏垓。正午时分，程子华率起义队伍与红5纵队在大冶县城胜利会合，起义一举成功。大冶起义胜利后，驻阳新第1营1连的中共地下党员、该连4班班长白玉杰立即召开了党员紧急会议，决定15日晚起义。由白玉杰负责全面指挥。15日深夜，按照分工，刘发和等顺利解决了反动班排长后，便带第1、2连出城。白玉杰在处决反动连长后遭到暗算，不幸牺牲。刘发和等带着第1、2连约80余名士兵奔向苏区。大冶、阳新连续起义成功，唐云山于12月27日亲自率领旅部及第3营开进大冶县城，妄图对红军施加报复。同时，加强了对部队的防范。第3营的共产党员王愚、田雅文等通过宣传组织工作，团结了第9班班长邢长发，第3班班长白文志及大部分士兵。 29

日晚，王愚等鉴于部队翌日要调往武汉，决定当晚起义，拉出 90 余人，经几天辗转，找到了红 5 纵队。参加大冶、阳新起义的部队共 5 个连，约有七八百人，起义后分别编入红 5 纵队第 2 支队和纵队教导队，由程子华任第 2 支队支队长，陈奇任第 2 支队政治委员，邢长发任纵队教导队大队长，王愚任教导队党代表。1930 年 6 月，红 5 纵队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8 军。

大冶、阳新起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鄂东南的反动势力，扩大了红军队伍，为巩固和发展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同时，创造了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起义的成功经验，被中共中央誉为“模范式的兵变”。

谷花洲起义

1929年12月17日，湖南临湘谷花洲农民武装在共产党员组织带领下，就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谷花洲地处临湘县北部，原属湖北省嘉鱼县管辖。这里有天然的河湖港汊，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1929年秋，与谷花洲接壤的中共湖北蒲圻中心县委派共产党员李平阶、徐敬之、祝志清到谷花洲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以配合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斗争。不到2个月，就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建立了100余人的农民武装——敢死队，代号“古发初”（谷花洲）。

12月17日晚，谷花洲武装起义爆发。100多名敢死队员在负责人李子才等率领下，臂戴袖章，腰扎彩带，手持梭镖等武器，分成4路，分别奔袭谷花洲、叶家墩、彭家墩、鸭栏矶等地反动武装和土豪劣绅，处决警察局巡官、稽查长和大恶霸等6人。农民起义震撼了各乡，未抓获的土豪劣绅慌忙逃往县城。几天后，县团防局派兵镇压。农民敢死队奋起还击，但因枪少弹缺，敢死队员牺牲数十人，余部后辗转到洪湖地区参加周逸群领导的红6军。

冷家湾起义

1929年12月19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先遣队的支援下，中共湖北应山县委领导农民赤卫队于冷家湾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9年9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派王平章在冷家湾主持召开应山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研究武装夺取县城的起义计划。12月中旬，特委又派张振威率红11军先遣队40余人到达应山支援起义。县委与先遣队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以张振威为总指挥的起义指挥部；联络安陆、孝感两县中共党的组织和赤卫队，先夺取区乡反动团防的枪支，尔后到冷家湾集中，攻占县城。会后，派人到县城与地下党员、县警备队队长李正杞和城内地下联络站取得联系，准备内应。

19日晚，应山赤卫队在红军先遣队和安陆、孝感部分赤卫队的支援下，连续攻克张扬、骆店、陈巷、季家店等地团防据点，缴枪数十支。随后，按原定计划，起义队伍开往冷家湾集结，一边开会布置攻城计划，一边等候其他农民武装的到来。

国民党应山县长宋继成获悉共产党在组织农民起义，急令县警备队队长李正杞率部和各区民团以及反动红枪会前往镇压。

25日夜，县警备队和关庙、杨家岗民团共1000余人向冷家湾包抄而来。李正杞率县警备队走在最前面，当走到离冷家湾只有二、三里路时，李正杞以作好战斗准备为由，命令团丁检查武器弹药。这时，他有意朝天开了一枪，说：“不小心，子弹走火了。”正在冷家湾集结待命的起义队伍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总指挥张振威率队出村阻击。因敌众我寡，久战不利，张振威和中共应山县委书记刘特森果断决定分别率部转移。第二天，国民党县署在全县戒严、搜捕共产党人和起义队员，先后有李修身、邹云朗、邹华顺、冷坤、李正杞等人被捕，应山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活动转入低潮。

白大畈起义

1929年12月20日，中共安徽霍丘县委在该县白大畈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白大畈位于霍丘南端，距商南起义地丁家埠较近，中国工农红军第32师经常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当时霍丘县除国民党军一个守备营孙培基部300多人外，其他只有地主和民团武装。由于白大畈经常有红军游击，国民党县守备营不敢到这个地方活动。中共霍丘县委决定集中力量，在白大畈组织农会，夺取地主武装，准备武装起义。白大畈的王家老楼地主王敬斋家有250余支枪，成为起义夺取武器的主要对象。白大畈党组织领导人潘荣初遂利用亲戚关系，搬进王家老楼，秘密将王家老楼内的长工发展为农会会员，准备作起义时的内应。1929年12月2日，潘荣初率领白大畈300余农民，打起红旗，用长矛、大刀武装队伍，进驻沙家湾汪神庙，准备起义。19日，潘荣初派万起昌到王家老楼送信，约定20日举行起义，里应外合夺取王家老楼地方武装的枪支弹药。19日晚，潘荣初妻子储素珍把圩内的土枪筒里全部浇上水，使之不能发火。深夜，趁内应的长工打开大门之机，早已等候在大门外的起义队员，在潘荣初的指挥下涌进圩子，活捉了王敬斋的父亲，缴获了圩内的50余支枪和18箱子弹。随后，起义队伍又攻占了马家畈，缴获了地主金耀山的枪支弹药。接着，乘胜出击打下了七八个地主庄园，并打败了秋家楼的民团，缴获了一部分武器。起义后经过整顿，组建了有百余支枪的红军游击队，后又成立了霍丘县游击大队，有队员300多人，张伯甫任大队长。成立了霍丘县第一区（白大畈区）苏维埃政府。

花太起义

1929年12月20日和1930年1月12日，在中共赣西特委和新余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江西省新余县花桥、太子庙地区的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早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中共江西地方组织就指派党员到新余县从事秘密活动，并建立了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1927年冬，原北伐军20余人在与新余县为邻的吉安延福地区举起革命旗帜，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9纵队。随后，工农革命军第9纵队到新余、吉安边界地区开展群众工作。1928年5、6月间，中共赣西特委为加强新余县的领导，派夏侯达才、谢邦金等到新余县境内九龙山活动。夏侯达才和谢邦金与中共当地组织的负责人罗日光研究分析了花桥地区的革命形势后，召开有10余名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开办树木厂，并以此作为活动站，宣传群众，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不久，成立了中共新余县花桥党支部，罗日光任书记。同年冬，花桥党支部在九龙山地区开展秘密“上名子”运动（即登记名子，表示参加革命）。不久，上名子的人数已达数十人。

1929年6月，中共赣西特委又派廖子清到树木厂指导工作，并成立了中共新余县特别支部，罗日光任书记，下辖花桥、瑞元、信安、昌梅、泉田、下苑六个党支部，每个支部下面成立一个农民协会，支部以农民协会的名义进行活动。特别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农民协会和广大农民进行“五抗”（抗租、抗粮、抗债、抗捐、抗税）、“三杀”（杀土豪、杀劣绅、杀地痞流氓）斗争，为起义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9年12月20日，在中共新余县特别支部书记罗日光的领导下，位于九龙山下的花桥地区首先举行了农民起义。这次起义，除事前派人到中共赣西特委请来5名红军战士外，广大群众手持梭镖、鸟枪、大刀、棍子和扁担，高呼“打倒国民党”、“向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进行斗争”等口号。当晚，起义农民处决了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刘进寿。第二天，又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张才德和流氓头子丁俊达。

为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在沙汾成立了新余县第一支游击队，刘子云任队长。游击队成立后，先后在周守村、花桥、罗坊等地捉拿地主，根据其罪恶，有的处决，有的罚款，有的烧毁其文契帐簿，并将搜出的枪支、弹药武装了游击队。

花桥起义胜利后，中共新余县特别支部于1930年1月12日，又在洋田太子庙领导农民群众举行了起义。这天，洋田农民百余人，在袁福秀等领导下，手持大刀、梭镖、鸟枪等武器，聚集在太子庙召开起义大会。起义群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起义后组成60余人的赤卫队，刘才仁任队长。不久，赤卫队与新余的游击队汇集一起，在新余县特别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更广泛的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

花桥、太子庙起义后，为了迅速建立革命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根据中共赣西特委的指示，于4月上旬，成立了中共新余县委，曾梅春任书记。5月，成立了新余县苏维埃政府，罗日光任主席，同时成立了县总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等群众组织。7月，将南区游击队扩大为游击大队，刘龙盛任大队长，罗日光任政委。

黄余田起义

1929年12月22日，由中共浙江缙云县委领导，在永康、仙居、磐安县党组织的配合下，黄余田农民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黄余田地区位于磐安、东阳、缙云、永康、仙居5个县（市）的结合部。黄余田村位居其中，且是货物集散地，故这一带习惯称黄田地区。

1929年7月和9月，中共党员杨兆星从上海带来了上级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枪支，建立革命武装的指示。11月，中共永康党组织派李立卓到缙云，具体商谈帮助建立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府问题，表示武器问题可与永康工农军司令吕师堂联系。中共黄余田区委书记卢湛派杨思廉和卢玉标前往永康。在永康县峡坑找到了吕师堂，谈了准备建立革命武装的打算。吕随即派李岩丁、杨明可等3人携带5支手枪，赴黄余田帮助建立革命武装。

12月19日晚上，由卢湛主持，杨岩溪、杨玉水、杨思廉、杨兆星、杨金保、杨继兴、宋桓、卢玉标、卢保龙、厉志寅、杨加楼、杨义贵等10余人集中在黄余田下坑真因寺召开秘密会议，上级党组织派李立卓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全面地研究了缙云党的各项工作，并推选卢湛任中共缙云县委书记，杨金保任组织委员、杨岩溪任武装委员；建立缙云县苏维埃政府；建立“浙西工农革命军司令部第x支队”，由包得胜（化名）任总司令，杨岩溪任支队长，卢湛兼任政委。会上，李立卓代表上级党组织交给卢湛两方长铃，一方是“缙云县苏维埃政府”，另一方是“浙西工农革命军司令部”。会后，大家立即分头活动。李立卓返回永康，通知吕师堂工农军配合这次起义。卢湛等人在黄余田写布告、标语，派党员分头张贴到黄余田、冷水、西宅、大溪、胡庄等村庄。广大贫苦农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土豪劣绅惊恐万分。在杨岩溪带领下，仙居的30多人也带上鸟枪、大刀、长矛，于20日傍晚到达黄余田“杨氏宗祠”。是日夜，仙居来的30多人连同本地百余人各带武器聚集到真因寺。卢湛当众宣布：浙西工农革命军司令部第x支队正式成立！接着进行编队分工：支队下设2个中队，中队下设3个分队，分队下设3个班。每班12人。卢湛又宣布了革命军纪律。最后，给每人发革命军符号，符号是用白布做的，盖上工农革命军的长铃红印，套在左手臂上。

原计划永康吕师堂的工农军也要来，因途中遭国民党省保安队拦阻未能按时到达。浙西工农革命军130余人于子夜时分向新渥进发。卢湛、杨岩溪率部队翻过黄余田岭，东方吐白时冲进新渥村，砸开国民党县参议、劣绅陈达夫家大门，发觉陈达夫已带保卫团逃跑了，金银细软一无剩余，只搜缴到两支破旧土枪。

22日下午，起义队伍集中在后塘村，准备开往仙居山头，休整扩充，以作再战。不料，国民党壶镇公安分局局长袁鸿业带县保安队和陈达夫、羊其祥地主保卫团共400余人，突然将起义队伍包围。杨岩溪、卢湛等领导沉着勇敢，指挥部队突出重围后，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继续坚持斗争。

嘎达梅林起义

1929年至1931年间，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草原上的蒙、汉各族贫苦农牧民，不满达尔罕王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剥削和压迫，在嘎达梅林的带领下举行了起义。

嘎达梅林，本名那达木德，生于科尔沁左翼中旗的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是一个嫉恶如仇，富于正义感的人。1928年，国民党军阀势力伸向达尔罕旗，抢占牧场、草原，而蒙古王公贵族见此有利可图，便为虎作帐，利用买卖土地榨取民财。为了阻止军阀垦荒，1929年初，达尔罕旗的舍伯吐、古力本芝哈的数百名群众举行集会，选派嘎达梅林等4人前往奉天向国民党省政府和王爷请愿，要求禁止买卖土地和破坏牧场，保障农牧民生活。这一合理要求竟遭拒绝，将嘎达梅林等4位代表逮捕，打进达尔罕旗王爷的监牢。

正当王府策划加害嘎达梅林的时候，嘎达梅林的妻子和好友冒危将他救出。嘎达梅林出狱后，开始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后来，他与汉族农民白龙率领的一支起义队伍会合，形成了以蒙汉贫苦农牧民为核心的起义队伍。他们打出“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口号诏示世人，英勇地与国民党军阀的垦荒军战斗，拔除测量标志和地界牌子，赶走了买卖土地的地主、恶霸和奸商。1930年春，起义队伍达到六、七百人，曾先后在驾马吐、舍伯吐、白音太等地多次打败了垦荒军和前来“围剿”的军警。到1930年秋，起义队伍发展到了1000余人。面对嘎达梅林起义，达尔罕王爷曾采取剿抚两手政策，均遭失败，最后只得向国民党奉天省政府求救。1930年底，奉天省政府和达尔罕王爷共调集几千兵力向起义军发动“围剿”。经过大小几十次战斗，由于兵力悬殊，起义军终因武器弹药缺乏，战斗失利，仅剩80余人。

1931年3月30日，嘎达梅林率队在达尔罕境内的舍伯吐东北的黄花敖包脚下，与前来追击的国民党军第17旅34团遭遇。嘎达梅林在指挥起义军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起义最后失败。嘎达梅林起义持续长达两年，对以后科尔沁草原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小河年关起义

1930年1月28日，中共湖北孝感县委组织领导农民赤卫军在该县小河地区举行了年关武装起义。

1929年2月，中共湖北省委派徐宝珊到孝感，组建了中共孝感中心县委，徐宝珊任书记。4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派方思法带30余人为骨干，组建孝感特务营，加强了孝感的革命武装力量。5月，成立孝感县革命委员会，卫祖圣任主席。12月初，中共孝感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在小河涂家冲毛家璠召开会议，研究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决定开展“五抗”（抗粮、抗租、抗捐、抗债、抗税）斗争。12月下旬，因军阀混战，孝感国民党驻军调走，小河地区只剩下地方反动武装“建国军”。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根据全县形势，决定以小河市为中心，在小河地区举行年关起义。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由卫祖圣任总指挥。将各地赤卫队联合组成赤卫军，设总司令部，由张伟松任总指挥。起义口号为“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开仓分粮，过好新年”。

1930年1月上旬，各地“五抗”斗争掀起高潮。27日晚，起义指挥部定于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趁“建国军”准备过年之机举行起义，28日黄昏，卫祖圣、方思法等带着手枪队、特务营和赤卫军合围了“建国军”驻地小河北街会馆。卫祖圣率领手枪队袭击会馆后门，方思法率特务营袭击会馆前门；张伟松率赤卫军负责接应。由于袭击突然，一枪未发，缴枪40余支，活捉团总叶开文，占领了小河市。起义胜利后，便在孝感北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开仓放粮”活动。2月2

日，召开庆祝大会，正式宣布了孝感县和五店、小河、汪洋区委及革命委员会、县赤卫军主要领导人名单。

小河起义后，当地土豪劣绅不甘心失败，继续组织“建国军”、“铲共团”、“清乡团”等反动武装几千人，于16日向小河市一带发起进攻。孝感特务营、手枪队及县赤卫军奋力抗击失利，赤卫军总指挥张伟松等英勇牺牲。不久，红1军出击京汉线，孝感特务营，手枪队和赤卫军乘机赶走了“铲共团”、“清乡团”等反动武装，各级革命政权和武装力量日益发展。不久，在小河成立了孝感县苏维埃政府和红色补充军第7师，卫祖圣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第7师师长。从4月开始，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孝感北部之王店、小河、汪洋等区进行土地改革，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五华第二次年关起义

1930年1月28日，在中共广东东江五县暴动委员会的领导下，五华县8万军民又一次发起了全县年关武装起义。

1928年1月五华年关起义之后，国民党五华地方反动当局纠合国民党军反复“清剿”起义军民，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中共党组织和农军转入隐蔽斗争。1930年1月16日，中共五华县第6区区委委员刘伯青叛变投敌，向国民党的乡长魏吉门告密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情况。魏吉门立即纠合国民党军袭击了联合、溪口、东升等乡镇，并捕捉了魏耀明等16名共产党员，押至横陂长岗岭杀害。国民党的暴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向地主国民党讨还血债。中共五华县委将这一情况向东江五县（五华、兴宁、梅县、大埔、丰顺）暴动委员会书记古大存作了报告。古大存立即召集五华县委及红军第46团团团长古宜权等领导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分析形势。最后他们决定利用年关地主豪绅催租逼债之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给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一次沉重打击。会后，中共五华县委根据五县“暴委”的计划，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第4、第6、第7、第8等4个区发动赤卫队和革命群众8万余人，秘密进行起义准备。1月28日，五县暴委指挥8万名起义群众在红军第46团的配合下，手执各种武器，同时向10余个乡的国民党治安委员会发起攻击。击毙国民党团丁多人，俘虏多人。随后，在几天的时间里，8万多起义群众涌向地主豪绅的宅院，没收他们的财产，焚烧契约，废除债务，宣布土地革命的政纲。在4区蕉洲，没收了大地主黄调元的家产几百担；在7区欧塘没收了捐棍黄文思的全部家产；在6区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冯亚仁、冯亚成；在8区处决了反动分子古家松。一时间，地主豪绅纷纷逃往他乡。五华年关起义，狠狠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革命气焰，促进了东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安地起义

1930年1月至年底，中共金华安地总支书记蒋宝贤等人，在浙江金华安地一带领导农民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安地位于金华南山，与永康、武义、宣平交界。1928年2月，中共宣平县委派江山区委委员陈玉川到安地进行革命活动。随之，中共金华安地支部在安地雅傅村成立。不久，陈玉川回宣平，党的工作由蒋宝贤接任。翌年4月，中共安地党支部升为党总支，蒋宝贤任总支书记，共有党员30余人，下设2个支部。随后又建立了2个支部，新增党员25人。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对浙西各县的要求，1929年7月，蒋宝贤在蒋里溪滩田里召开党总支会议，商议组织红军、举行武装暴动等事宜。并确定由富户鲍锦文暂垫银圆200元作为活动经费。鲍锦文表面答应，暗中向国民党金华县政府告密。三日后，国民党省防军前来搜捕，幸好党组织预先得到情报，事先分散隐蔽，没有造成损失。蒋宝贤等人避居汤溪农村。

1930年1月28日，蒋宝贤等人返回安地，在蒋里宁宗祠堂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军北路军游击队，自任总指挥，邵积善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蒋祥址为书记。游击队主要负责人分头深入各地发动群众，所到之处，贫雇农青年纷纷报名参加游击队。到5月份队伍已发展到1500多人。

红军北路军游击队成立后，武器装备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总指挥蒋宝贤带领红军战士，收缴了新屋村大地主洪炳松的一支短枪。除了向敌人收缴枪支外，游击队还派人去外地购买军火，并在杨村横塘猎户雷凤富家办起了“兵工厂”。2月，党总支在安地红军活动中心建立了农会和清算委员会，向财主派粮派款，筹集经费，用以接济贫苦农民。

5月，红军北路军游击队经过充分准备，由蒋宝贤率领首先攻打了雅贩警察局，缴获了7支步枪和大批财物。

1930年夏，蒋宝贤接到中共宣平县委关于配合邻县起义、伺机攻打金华城的指示。6月，蒋宝贤召开党总支紧急会议，定于7月1日攻打金华城。

正当红军北路军游击队为攻打金华城作准备时，武义、建德、宣平等县农军先期举行起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金华县长派便衣警察、特务四出活动，到处张贴通缉令，并急电上司请求派兵增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调集省防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很快对安地寺姑坪红军活动区域实行“清剿”。蒋宝贤带领红军战士进行了顽强抵抗，突出重围后，转入隐蔽活动。

8月初，安地红军游击队再次攻打国民党雅贩警察局，缴获步枪4支，打伤警察2名，10日，又配合武义红军攻打了武义柳滩警察局，缴枪2支。16日晚，又协同武义西营红军、东营红军，围攻驻宣平后树的国民党省防军和保卫团，并攻打宣平县城。

安地武装坚持斗争近一年，不仅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和封建势力，而且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该地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

荆钟地区起义

1930年1月至9月,在中共鄂西特委的统一领导下,中共湖北荆门县委、钟祥县委组织领导农民武装在荆钟地区举行起义。

1929年冬,中共鄂西特委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决定在荆门钟祥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举行起义。

1930年初,为扩大荆钟地区革命武装,中共鄂西特委决定收编活动于荆门南部一带的土匪武装李凤山部,指示钟祥县委选派得力人员前往该部工作。钟祥县委派谢香庭到荆南,同时致信荆门县委,请求予以协助。在荆门县委的精心安排下,谢以给土匪送款赎票为名,进入匪司令部,与在司令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庆春、李赤春取得联系,传达了中共鄂西特委伺机发动兵变的精神。李赤春又与特务连长李庆玉等人共同商议,决定将部队拉往钟祥红色区域,然后正式宣布起义。不久,李庆春等率一部分士兵以外出“打草”(即抢劫粮饷)为名开出荆南,从马良过河到达钟祥红色区域后,李庆春召开士兵大会,宣布起义,接受共产党领导,得到全体士兵的拥护。起义士兵即与钟祥赤卫队合并,改为京(山)钟(祥)荆(门)游击纵队,共100余人枪。李庆春任司令员,李赤春任副司令员,张继襄任政委,林新培任政治部主任。接着,中共鄂西特委派罗正品到纵队领导整建工作和开展反“清乡”斗争。成立了党的暴动委员会(后改为前敌委会),领导部队开展了思想教育和练兵运动,惩处了顽固反共的死硬分子原营长等7人。同时将京荆游击纵队改编为京(山)钟(祥)荆(门)潜(江)天(门)游击纵队,后来编入了红6军。

1930年8月下旬,贺龙、周逸群率领红2军团东征,进入荆(门)钟(祥),连克沙洋、旧口、石牌等地。中共钟祥、荆门县委决定趁机发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派钟祥县委委员谢威赶赴石牌,请求红军支援农民起义,攻打县城。贺龙等领导人指出,红2军团将马上回师鄂中,另有任务,荆钟地区不宜即刻举行农民起义。位于荆门、钟祥结合部之邓家湖农民武装,由于没有及时得到这一指示精神,在共产党员邓念银、邓秉纯的领导下,于28日发动了起义。队伍由1000多人发展到几万人。以邓家湖为中心,南起小蕲湖,北到石牌,西到瓦瓷滩,东到襄河边,方圆六七十里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捕捉土豪劣绅。谢威返回后,虽然传达了红2军团前委指示,采取措施转移。但是,起义群众情绪已难控制,转移缓慢。9月8日,邓家湖大地主赵廷华纠集荆门、钟祥两县团防,联合李凤山匪部及国民党江防局1个正规大队疯狂围攻起义军。起义群众分路撤退,有一部分群众因撤退不及,就地躲入茂密苇林中。反动军队发现后,在芦苇丛中烧起大火,邓念银等90余名起义骨干和群众全部牺牲,谢威带领部分农军突围,转战到钟祥南区。

中共钟祥县委认真总结邓家湖起义失败的教训,又领导县属襄河以东谢马湾、老孙集、魏家集、郑集等地1000余名武装农民起义,活捉反动区长刘辉宜、大恶霸孔铸金,驱逐殷少集区长王隆盛、熊冠卿,击伤铲共义勇队长张耀廷,然后直捣旧口团防局,转攻高刘集和长滩埠。

在起义连捷的大好形势下,县委领导人未能将起义队伍转入乡村。这时,旧口、郑集、石牌、长滩埠民团勾结国民党驻京山曹振武团和驻钟祥王家本团联合围攻,迫使起义武装大部分散回家。只有一部分起义武装经过苦战,突围至冷水铺以东西干沟一带,参加京(山)钟(祥)游击根据地的反“围

剿”斗争。

南圣起义

1930年1月，投靠国民党的黎族武装王昭夷部的排长王德祥，在中共陵水县委兵运工作的感召下，带领10多名士兵，在广东琼崖陵水县南圣乡（今属保亭县）举行了起义。

陵水县是黎、苗少数民族集居的地方。这里驻扎着一支由黎族首领王昭夷、吴中育带领的黎民武装队伍。这支队伍曾在1927年间参加过3次以攻打陵水县城为主要目标的武装暴动。1928年春，王昭夷、吴中育叛变投敌。1929年2月24日，黎族共产党员、中共琼崖特委特派员黄振士带领小分队潜入国民党陵水县民团，将吴中育秘密处决。国民党陵水县县长黄世治因此怀疑民团团董胡必明私通共产党，便以开会为名将其诱杀。这一行动使矛盾进一步激化。黄振士趁机深入民团开展策反工作。此后，黎族各团董先后拉起队伍，参加农军。这些行动在王昭夷的黎族队伍中引起极大反响，对于分化王昭夷部起了积极作用。

同年5月，在黄振士主持下，以林宏祥为书记的中共陵水县委、以曾宪成为主席的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恢复活动。县委针对当时的实际，多次派人潜入陵水县城开展革命活动。12月，县委派陈世珍前往南圣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1月，在中共陵水县委兵运工作的感召下，王昭夷部排长王德祥带领10多名士兵，携带20多支长短枪起义。事前，王德祥与南圣地区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该区党组织及时派马大廷率领30余名战士前往接应。起义士兵到达六弓土眉村后，与县赤卫队合编为1个连，王德祥任连长，胡亚任副连长。

南圣兵变，在国民党军和民团中引起很大震动，也促进了中共琼崖各级党组织兵运工作的开展。

龙州起义

1930年2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邓小平、左江军委委员俞作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明瑞等，领导广西警备第5大队、会合左江农军在龙州举行了武装起义。

龙州位于左江上游，与越南接壤，是左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1929年9月下旬，中共广西特委派中共党员干部何建南、麦锦汉等前往龙州，成立“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加强广西党组织对该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

10月中旬，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中共广西党组织按照原定的应变决策和计划，由中共党员、广西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俞作豫率领该大队1500多人挺进龙州，以开辟左江地区。俞作柏、李明瑞随该大队到达龙州后，俞作柏见大势已去，遂决定出走香港。李明瑞仍留龙州。

在龙州，俞作豫根据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邓小平的部署，积极进行了武装起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首先，仍打着俞作柏、李明瑞的旗号，由俞作豫就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公署督办兼龙州关关监，收编了督办公署直辖的13个武装巡缉队和原留守龙州的国民党吕焕炎师的教导队400人，并在龙州、凭祥、明江、宁明等县招募了一批工农青年和学生入伍，使广西警备第5大队从原来的3个营1500多人扩大到6个营2000多人。

在收编、扩大部队的同时，俞作豫还派出干部，深入农村、城镇，宣传、发动各族工农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工农武装组织。至龙州起义前，左江地区有11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3万人，各县建立的工农赤卫队共有5000余人。

11月中旬，李明瑞与俞作豫商定，想趁粤桂军阀混战，南宁守敌空虚之机，联合驻右江的广西警备第4大队攻打南宁。这时，因警备第5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被新桂系军阀所收买而叛变。俞作豫闻讯后，立即放弃了进攻南宁的打算，率队从陆路日夜兼程回师平叛。

11月29日，俞作豫率队恰遇李明瑞率卫士队和一个步兵连从右江回来，他们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订平叛计划。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击毙叛军营长潘益和参谋长王国连等100多人。蒙志仁率残部溃逃南宁。12月4日，光复龙州城。

平定蒙志仁叛乱后不久，邓小平率何世昌、严敏等一批中共党员干部从百色来到龙州，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广西前委会议精神，分析了龙州的形势，检查和部署了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由何世昌担任中共左江军委书记。前委原要求龙州于12月11日与百色一起举行武装起义，因龙州发生蒙志仁叛变事件，遂决定推迟起义日期，等条件成熟时再宣布举行武装起义。

邓小平部署好龙州起义工作后，便于12月上旬由龙州经越南、香港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中共左江军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加紧对警备第5大队的改造工作。

为了加强对左江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同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派王逸、林礼等党员干部到龙州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12月15日建立了中共龙州

县委。接着，中共左江军委派党员干部到凭祥、崇善、养利等县建立了中共党的支部或小组。

1930年1月下旬，中共左江军委和龙州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商定武装起义的日期和建立红军等问题，并征得了中共广东省委和红7军前委同意。2月1日，中共左江军委在龙州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何世昌在会上正式宣布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广西警备第5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于2月23或24日就职兼任军政委，何世昌兼任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李明瑞任红7军、红8军总指挥。红8军下辖2个纵队，共2000多人，分别由何家荣、宛旦平任第1、2纵队司令，大会还颁布了《中国红军第8军目前实施政纲》，并宣布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由王逸任主席。

同一天，中共左江军委改组为中共红8军委员会，书记何世昌。同时，以中共龙州县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左江特委，推选王逸为书记。红8军党委和左江特委直属中共红7军前委和广东省委领导。

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随即召开左江特委、军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会议决定改军委为中共红8军临时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并决定邓不在时由何世昌代理书记，中共左江特委改组，涂镜吾（振农）任书记。

随着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龙州、上金、凭祥、崇善、龙茗、养利、左县等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雷平、宁明、明江、恩乐、万承、邕宁、上思等县为游击区，建立了一个拥有70万人口的左江革命根据地，并与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龙州起义，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在左江地区的反动势力。没收了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内窝藏的反动豪绅的财产，驱逐了7个违法的帝国主义分子出境。不久，法帝国主义派飞机入侵挑衅，左江军民给予还击，其中一架敌机坠落在宁明县境内。

龙州起义，不仅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翻了封建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和工农革命政权，创立了拥有70多万人口的左江革命根据地。并能高举反帝斗争旗帜，沉重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在左江地区的反动势力，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尤其在“反帝运动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熊家河民团起义

1930年2月2日，在中共湖北省江陵熊家河区委的组织策动下，国民党江陵县熊家河常练分队官兵举行起义，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

1929年夏秋，中共鄂西特委指示江陵县委加紧对位于县境东南部的熊家河常练分队的工作，争取他们早日起义，以拔除横梗在根据地内的联系障碍，拓宽白鹭湖和洪湖两块红色区域的通道。

熊家河常练分队有长枪27支，短枪3支。队长谢锡章，系湖南湘潭县人，曾在北伐军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受到恽代英等共产党员的熏陶和影响。1928年应故友之约，就任国民党江陵县熊家河常练分队长。由于谢锡章对国民党现实不满，又饱受当地团总的排挤，思想徘徊苦闷。中共熊家河区委针对这一情况，确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谢锡章的身上。区委书记熊经斌亲自做工作，向谢宣传中共土地革命的主张和率部起义的前途。谢锡章接受了熊的教育，并由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1月，工农红军独立第1师第2纵队以江陵为中心发动攻势，连续占领普济、黄彩列、沙岗等重要集镇，江陵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中共熊家河区委根据鄂西特委和江陵县委立即发动起义的指示，经研究决定趁反动军事教官汪谦之回家之际，由县赤卫队前往佯攻，谢锡章则乘机率部起义。

2月2日深夜，中共江陵县委书记彭之玉率领县赤卫队100余人悄悄包围熊家河，封锁各条路口。拂晓时分，发起了佯攻。此时，谢锡章集合全队官兵，号召起义。大多数士兵积极响应，但反动教官汪谦之的亲信徐班长拒不听令，强迫他带的班进行反抗，并开枪打死了两个主张起义的士兵，谢锡章当机立断，将徐击毙，率领全队起义，会同镇内要求加入红军的青年共60余人，30支步枪，连夜取道吴家桥开往砖桥，与接应起义的红1师第2纵队会合。

2月5日，红军独立第1师整编为工农红军第6军，熊家河起义官兵整编为第2纵队第1大队第1中队，谢锡章任中队长。

请水寨起义

1930年2月4日,中共安徽潜山县委在该县后北乡天堂地区的请水寨(今属岳西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2月,中共潜山特别支部迁至后北乡汤池山区,由王效亭任特支书记。特支在茶园庵召开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待机起义。会后,王效亭、刘中一、吴介富等深入农村,利用当地农民乐于接受的关帝会、同心会、穷人自救会、平民联合会等组织,吸收农民中的革命分子为会员,引导他们投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至1928年6月,在山区响肠、沙村、衙前、和尚庄、槎林河、山外老岭头、许家畈、白水湾等地都建立了秘密的农会组织。

1929年11月,六霍起义胜利,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立即指示潜山县委响应。中共潜山县委根据指示精神,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在距离县城较远而农运基础较好的第六区组织武装起义,并划出潜山二区、三区各一半,以及五区一半、六区全部为起义中心区,由王效亭任总指挥,胡绍璠、陈履谦负责调动各区干部前来支援。会后,王效亭在汤池召开了中共衙前中心区区委会议,布置各区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将农会会员与秘密武装分编成3个游击大队,各大队设持枪小组,四出打击敌人。为加强潜山武装起义的领导和军事干部力量,中共安徽省临委、安庆中心县委先后派遣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中共党员干部金赤、凌霄、操球等到后北乡。潜山县委亦将中共党员干部梅竹松、陈斯举、汪旭升等10人调到北乡,协助王效亭工作。与此同时,省临委还指示英山县委、六霍县委加强同潜山党组织的联系,积极准备军事力量,支援潜山起义。这时,年关将近,稻米奇缺,贫苦农民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些土豪劣绅继续抬高稻价,特别是响肠河大地主、大土豪方廷献,不仅抬高稻价,而且拉拢其他中小地主与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抗衡。中共响肠区委即派响肠、无愁两支“摸瓜队”(即暗杀恶霸、豪绅地主的队伍),于1930年元月1日趁方廷献深夜归家之机,在响肠“惜字亭”旁予以镇压,后又在无愁枪杀了为方廷献鸣不平的陈晓初父子。第二天,陈晓初的大孙子陈述庸跑到潜山,要县长崔树龙派兵镇压。元月29日,崔树龙趁着农民忙于过除夕之际,派县保卫团20余人潜入后北乡逮捕农会会员,同时又悬赏缉拿共产党的领导人。鉴于当时的斗争形势,王效亭等领导决定提前举行武装起义,回击敌人的进攻。通知各区把农会会员组织起来,把埋藏的枪支挖出来,约定3日内到请水寨集中。于是,响肠、湖响、无愁、浒漕、天堂、沙村、五河、菖蒲、来榜、石关等地的游击队员、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以提糖糕拜年的方式,互相通知到请水寨集中,数日内上寨人数近千人。2月4日,王效亭、王德跃、汪樾、储文朗、刘中一、金赤、凌霄等数十名领导赶至请水寨,召开大会宣布武装起义,并将原秘密组织的3个大队,公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王效亭(化名洪朗光)任师长,陈履谦任党代表,严宽(原名凌霄)任参谋长。下设3个大队,湖响大队编为第1大队,大队长方振伍;响肠、无愁大队为第2大队,大队长王焰青、方乔南;天堂、石关大队为第3队,大队长李亚。全师100多人,钢枪16支,土枪百余支,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4个工农红军师。

国民党反动派得知请水寨起义的消息,急令潜山县县长崔树龙率县保卫团前往“围剿”。红军得到情报,决定先发制人。10日,王效亭率独立师

和赤卫队 700 人分三路向水吼岭进军，攻占水吼岭，崔树龙战败逃回县城。3 月 6 日，敌又出动县保卫团和省保安队千余人，分三路向天堂地区进犯。独立师为避敌锋芒，向霍山苏区转移，中旬到达霍山闻家店与中国工农红军第 3 师会师，改名为潜山工农革命军。4 月 8 日与红 33 师联合攻入英山县城。12 日，协同中国工农红军第 32 师、第 33 师攻克霍山县城，将霍山县自卫团第 2 队全部歼灭。下旬，红 32 师、红 33 师各抽调部队，支援潜山工农革命军从霍山打回潜山，沿途摧毁了各地民团。26 日收复衙前镇（今岳西县城），稍事休整，即挥师直捣水吼岭，激战半天，击溃敌军。

潜山工农革命军打回衙前以后，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34 师，仍由王效亭任师长，严宽任副师长，储余任党委书记，下辖 4 个团，全师约 700 人，长枪 90 余支，手枪数十支，土枪 500 余支，师部设立了医院和修械室。

随着红军作战的胜利与革命根据地的迅速扩大，5 月 3 日，潜山县革命委员会在衙前镇成立，推选王焰才任主席，王子成任副主席，陈九任秘书长。在红军控制的区域迅速建立和健全起临时政权作用的区乡农会，到 6 月中旬，先后建立了 16 个区农会，40 余个乡农会，会员达 1 万余人，赤卫队队员 9400 多人。

请水寨起义后开辟了以天堂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东窥桐城，西接英山，南至野寨，北与六霍苏区毗连，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东南屏障，为扩大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都安第二次起义

1930年2月7日，广西都安县农民赤卫军和革命群众，在中共东兰县委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

都安县位于广西西部，红水河中下游。1929年冬，中共东兰县委派黄大权、黄宗到都安指导苏维埃政府的筹建工作。12月底，在达默乡召开了各区、乡农会、自卫队负责人会议，选举产生了都安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党员覃道平任主席，黄梓英任副主席。各区乡农会也改为苏维埃政府，县组建了赤卫营，覃道平任营长。革命政权的建立，使反动当局和土豪劣绅极为仇视，于是，他们调集军警“围剿”农军，妄图扑灭革命火种。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在都安县的反动统治，在中共党员陈伯民、陈铭玖、花联焄、覃道平等领导下，决定调集东区、大化、镇江、都阳等区的农赤军，举行起义，攻打都安县城。

1930年1月下旬，都安县赤卫营从都阳出发，解放了古河、丹桂。打通了从都阳至都安县城的通道。

2月7日，县赤卫营和西区部分赤卫队以及东区拉烈赤卫团共2000多人，在陈伯民的统一指挥下，兵分3路向县城进发。当3路农军逼近县城之际，国民党县长王文翰和县团务总局长韦还甫仓惶逃往那马县。农军一举攻克都安县城。几天后，国民党都安县长王文翰及县团务总局长韦还甫勾结武鸣、那马县民团司令陆东海部，分两路反扑县城。一路从红渡回头反攻驻都安县城的农赤军，另一路进犯大化，企图切断赤卫营退回西区之路。县赤卫营主动撤回西部山区，县苏维埃政府迁回达默，据险固守。

都安第二次起义，是在百色起义之后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它检验了都安农民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培养了骨干，扩大了影响。

八寨起义

1930年2月12日，在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马关县八寨等40多个村寨的千余名农民举行了起义。

马寨是马关城西的一个大寨，聚居着多种民族，群众遭受地主豪绅压迫剥削根深，迫切要求反抗封建统治。中共云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结合云南的实际，把工作重点放在抓滇越铁路两侧工矿和农村的群众发动工作上，组织武装力量，准备起义。1929年4月，中共云南省委派共产党员到马关开展工作。共产党员李国定以教书作掩护，回家乡马关八寨开展宣传教育，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八寨周围几十个村寨的近万名群众踊跃参加农民协会，农民运动方兴未艾。八寨共产党支部在中共云南临时委员会委员吴少默的领导下，于1930年2月11日晚，召开有农民代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布置了起义的行动方案。连夜串连组织了八寨等40个村寨的1000多人，于12日举行起义，攻下距马寨10多公里的腻科街，包围文山、西畴、马关3县民团首领曹仁恭驻地。曹纠集八寨周围的地主武装数百人，向起义队伍反攻。起义队伍进行了顽强抗击，但由于敌我武器装备悬殊，起义队伍终被打散，起义失败。

山门起义

1930年2月25日，浙江平阳县农民在中共党员郑玉平和农军司令朱德讯的领导下，在该县山门举行了武装起义。

山门属平阳县，位于浙南地区中部山区。

1929年，浙南地区遭受历史上空前的自然灾害，农民处于饥饿交迫的境地。

1930年2月，共产党员郑玉平率领200多人的农民武装队伍，开进平阳山门，驻扎在溪心宫（现山门中学校址）。同时，驻文成、平阳边界的农民武装领导人朱德讯和周大伟等，也汇集于平阳的水口村。为便于统一领导起义工作，成立了武装起义司令部，朱德讯、周大伟为正副司令，下设大队、中队（连）、分队（排），徐阿崔、张阿佐分别任大队长，徐圣山任参谋长。事后，起义领导人分头到西区各地，联络农民武装到平阳南山集中，准备进驻山门，再出水头、敖江，攻打平阳县城。

23日，西区龙川、孔徐等地的农民队伍，由赵廷衣、张明管等带领，纷纷赶到平阳南山、晓坑汇集。24日傍晚，平阳水口农民武装1000余人，集结到晓坑洪宫。25日上午，汇集于晓坑的农民队伍统一由朱德讯、周大伟率领，向山门进发。分驻在畴溪小学和附近的溪心宫、上羊宫。此时，暴动队伍人数猛增到2000多人。

队伍进驻平阳县山门后，国民党平阳县当局一面“快邮”求援，一面纠集驻平阳保安队、盐务缉私队、敖江公安分局200多人，于25日集中水头街，准备包围山门，歼灭农民武装。26日凌晨，毫无防备的农民武装队伍，被敌人的突然袭击打散，只有驻司令部的一连战士仓促奋起阻击，但未能抵挡住敌人的猛烈进攻，只得边打边撤。驻扎在上羊宫、溪心宫的起义队伍，听到枪声后即向原路晓坑、溪源方向撤离。

事后，敌人进行了大搜捕，起义领导人朱德讯、周大伟等40余人，先后殉难。安全撤离的郑玉平、郑贤塘等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继续组织农军进行武装斗争。

杜家北楼起义

1930年2月28日，中共安徽霍丘县委在该县杜家北楼领导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1930年初，中共霍丘县委决定在杜家北楼发动武装起义。根据县委的决定，于2月28日，由杜红光率领1000余贫苦农民在杜家北楼举行武装起义，在县游击大队司仲超、潘根和率领的50人的支援下，攻开了杜家北楼，缴枪7支，随后建立了霍丘县第4区苏维埃政府，王金田任主席。同时成立了有50多人参加的第4区游击队，队长夏凤城。同年4月20日，中共霍丘县委领导了河口集起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杜红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蔡简等率领游击队200多人与赤卫队1000余人，从长集北攻岔路，火烧田家楼，打下邢家楼和宋老庄，毙伤敌田仲宏民团20余人，缴枪12支。21日，打下赵小圩，卢太昌圩，击溃敌孙庚三常备队1个排。22日，攻开王东圩，缴枪80多支。建立了第5区苏维埃政府，朱守本任主席。同时成立了中共第5区区委，区委书记阮仲肃。1931年2月16日，中共霍丘县委又领导了张集起义，在张正雨的带领下，100余名起义队员持土枪、竹杆枪等武器，连夜攻打了甘家圩子及保长甘俊亭的住宅。

霍丘南乡经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南起白大畈，北至张集百余里范围之内，建立了5个区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有500余人的县、区游击大队，同时在各乡还建立了赤卫队，全县共有枪800余支，这些武装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初创作出了贡献。

楚门起义

1930年2月，在中共浙南巡视员金贯真和玉环县党组织领导下，楚门10余支农民武装游击队，举行了武装起义。

楚门属浙江省玉环县，系沿海丘陵平原区。1929年上半年，玉环县发生了严重灾荒，地主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阶级矛盾加剧。

1930年初，浙南巡视员金贯真到楚门、清港等地巡视工作，先后成立了以郑伯永、张子会为首的外塘游击队、以应保寿为首的芳杜游击队、以吴逊歪为首的桐丽游击队、以蔡育土为首的芦浦游击队、以赵明金为首的凡塘游击队、以林小花和滕伯龙为首的楚门游击队、以刘启财为首的沙鳝游击队、以徐万林为首的干江游击队、以应万春为首的田马游击队和以黄樟顺为首的普青游击队等10余支农民武装。

这些农民武装以党员为核心健全组织，以收缴地主的枪支不断发展壮大。田马乡游击队在楚门游击队的配合下，公开处决了胡作非为的国民党田吞乡乡长保卫团团总冯云南、团丁冯永树；凡塘乡游击队镇压了反动顽固的村长；桐丽乡游击队镇压了大同恶霸许斌国、特务陈寿卿，逮捕了乡保卫团团团长黄其哲。在游击队的打击下，玉环楚门等地的地主豪绅惊恐万状，纷纷弃家避居城里。

面对游击队的频繁活动，国民党玉环县政府调兵遣将，积极扶持地主民团来对付游击队，企图扑灭已经点燃了的革命之火。玉环各支游击队和温岭坞根游击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0年2月，得悉芳杜乡茶头保卫团去温岭领取军需物资，扩大反动武装，芳杜游击队在应保寿率领下埋伏在竹坑岭头阻击敌人，凡塘乡游击队闻讯赶来增援，双方激战近两个小时，打得敌人狼狈逃窜。20日，应保寿部在坞根游击队的支援下，捣毁温岭县湖头、上旺保卫团老巢，缴获部分枪械。不久，又乘胜袭击横山保卫团，收缴了全部枪支和一批军用物资。3月，外塘游击队在楚门、田吞游击队的配合下，夜袭驻外塘乡黑虎庙的盐警队，缴获全部枪支。接着，又伏击一股从县城来外塘乡征督盐税的县保卫团，生擒敌领队。县境内其他一些保卫团也不断被缴械。清港保卫团和苔山民团反戈一击，全部参加了游击队。

1930年3月，中共台州中心县委指示玉环各支游击队与温岭游击队合并，成立坞根游击大队，实行统一指挥。游击队经过整顿、训练，战斗力日益增强，最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

五庙起义

1930年3月7日，中共安徽潜山县五庙特别支部在该县五庙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五庙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潜（山）、太（和）、岳（西）三县边境。1929年春成立了中共五庙特支。1930年2月，请水寨起义后，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师长王效亭根据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的指示，派曾任中共潜山县委员、潜山县革命委员会裁判肃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胡绍元和陈时熔到五庙，帮助领导农民武装起义。胡绍元、陈时熔到五庙后，与五庙特支的负责人一起，在五庙、程冲、朱河等地动员300多人报名参加起义。然后由程之风通知起义骨干到胡绍元家开会，宣布成立“红军第2团”，储茂高任团长，储全章任副团长。3月7日，起义队伍利用五庙大王会，组织十几个队员，携带土枪、大刀进行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等口号，接着，又先后找当地大地主“下票”收钱征粮，供红军食用。3月8日，查抄了大地主程玉恒的住宅，将其家具和店里的货物分给贫苦农民。红军还多次去捉大地主程仿先，程虽逃脱，但给当地农民以极大鼓舞。

随着红军队伍的不断扩大，斗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地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要求国民党潜山当局出兵镇压。3月24日，国民党潜山县县长崔树龙派县中队化装进山，窜到五庙八斗村，突然包围了起义指挥所。此时，红军第2团正准备上林山寨杀大地主储金奎，不料被突然而来的敌人包围。红军没有准备，只好仓促应战。由于敌强我弱，激战几小时后遭到重大损失，储茂高、储全章等16人被捕。秦成积从大地主汪声甲家征米回到驻地，当场牺牲。被捕16人除2人释放外，其余14人于3月27日在潜山梅城牺牲。起义失败。

北黄江起义

1930年3月12日，中共福建省莆田县委在该县北高、黄石、江口三镇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0年1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指示莆田县委要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建立“正式红军”。莆田县委立即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海军林寿国部拉扶增捐，组织沿海工农自卫队举行坂尾起义。2月，中共福建省委军委书记王海萍，巡视员练文澜相继到莆田指导工作。

3月4日，中共莆田县委、团县委联席会议决定：在涵江镇缴枪起义后转到沿海诸林进行土地革命。后因涵江国民党驻军增加兵力而改为诸请林起义，又因林焕章等13人被捕致诸林起义流产。12日，陈北芳、吴承斌率沿海工农自卫队四五十人及群众二三百人发动起义，攻进北高、黄石两个镇的粮柜，毙敌6人，缴枪1支。随后，队伍开赴沙堤乡，迫使民团释放了林焕章等13人。24日，陈天章、张如琦率全县3支工农自卫队骨干及群众300多人，在江口举行起义，袭击盐兵留守处、粮柜、消费局和国民党区分部，缴枪30支，毙敌5人。起义队伍随后转移至福清风迹的黄社村，整编为莆田工农游击队。

4月初，陈天章、陈北芳、王纪修等人在东度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以沃柄、东度、夹际三乡为根据地，创建产业红色区域后再攻打涵江镇。接着，召开了有200多产业区农民代表参加的动员大会。会后，陈天章、张如琦率游击队袭击沃柄岭民团税卡，毙敌5人，缴枪30多支。国民党地方当局派1个营的缉私队对游击队“围剿”。不久，游击队在陈北芳率领下，夜袭城关后，转移至有4万多盐工的沿海一带，准备发动盐民起义。

四都起义

1930年3月18日，中共福建省长汀县委在该县四都（包括红都、同仁两村）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1928年冬，中共长汀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深入四都，发动群众，先后在同仁、红都、琉璃各村组织秘密农会，组织群众抗捐、抗税、抗租、抗债。1929年3月，红4军首次入闽途经四都。在红军的帮助下，农民打土豪，分浮财，筹集资金，购制了大刀、长矛、土铳等武器。1930年3月18日，在段奋夫领导下，由廖鸿林、温必权指挥，四都附近10个自然村的3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汇集四都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包围了国民党乡政府，经半个多小时战斗，乡政府人员及20多个乡丁全部被抓获，缴步枪10余支、子弹300多发及一批财物。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共四都党支部、四都乡苏维埃政府，温必权任支部书记兼乡主席；组建了赤卫队，共300多人，赖兴银任队长；决定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深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5月4日，中共四都区委、四都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陈村任区委书记，赖兴银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龙回起义

1930年3月22日，中共江西省南康特委在龙回圩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江西信丰、南康，在龙回歧岭一带休整。中共龙回党组织配合起义部队，打垮了龙回靖卫团，缴枪数支。1928年2月，在龙回建立了中共南康特区委，下辖18个党支部。1929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来到龙回圩。中共龙回党组织密切配合，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到5月底，建立了5个党支部，有党员130多人，农民协会组织普遍得到恢复和发展。12月22日，中共赣南特委召开南康、信丰等县党员干部会议，研究了在各县举行农民武装起义的问题，并决定成立西河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丘达三，政治委员曾人超。1930年2月，南康县第1支工农武装——赤卫队正式成立，队长朱伯璜。

3月20日，西河暴动委员会政委曾人超，南康县赤卫队长朱伯璜率县赤卫队、龙回暴动队配合红4军第2纵队攻克南康县城。21日，红2纵队1个分队与县赤卫队从县城开赴龙回圩。当夜，在龙回圩召开干部会议，对龙回起义的时间、地点、计划和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等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和部署。22日，龙回武装起义按预定时间举行。这天正逢圩日，龙回地区及邻区乡的赤卫队员、群众，共计2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拥向龙回。西河暴动委员会在龙回圩真君庙圩坪上举行大会，号召劳苦大众行动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会上宣布南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朱伯璜任主席，宣布龙回靖卫团起义，改编为县赤卫队。会后，起义队员将龙回土豪林培河游街示众并当场处决。

龙回武装起义的胜利，震动了南康县广大乡村。接着，三益、浮石、赤土等区乡先后举行了起义。到1930年底，全县有20多个乡举行了农民起义，建立了区、乡革命政权，并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天台桐柏山区起义

1930年3月29日，中共浙江天台特支领导40多支农民赤卫队，在桐柏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

桐柏属天台县，地处浙东盆地低山区。1929年大旱，米价飞涨，富户乘机囤积居奇，百姓怨声载道。9月13日，中共天台特支决定开展闹荒斗争，派杨敬燮与群众首领夏汝木商议闹荒计划。9月17日天台县城集市，夏汝木便在小西门当众大声疾呼要求平糶。中共天台特支派人同时进行宣传发动，沿途许多饥民陆续加入行列。夏汝木率领着这支闹荒饥民顺西大街直下，最后涌到县政府。他们冲破警察阻拦，闯进去敲掉仪门，要县长下令平米价。闹荒斗争展开后，中共台州中心县委立即指示天台扩大平糶斗争成果，继续进行秋收斗争。天台特支根据这个指示，派人深入到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到1930年春，天台已组织起40多支农民赤卫队和武装小分队。

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金贯真巡视浙南（温州和台州地区）。2月，袁存生、周传帽等30多人在螺溪周庵开会，研究筹款购买枪支弹药，扩大武装斗争力量。

3月初，中共中央军委派胡公冕来浙南领导武装斗争，建立了浙南红军总指挥部。中旬，中共台州中心县委委员杨敬燮、中共浙南特委书记王逸仙到天台组织起义，建立红军。杨敬燮选择栖霞乡的蓝田村为立足点，派周传帽、王庆三、梁人泉等通知各地武装到蓝田集中。

3月26日，天台境内各路武装460多人先后到达蓝田后，杨敬燮、王逸仙、老康、老丁、陈天保、袁存生、周传帽、周振三、许万枝等人开会，研究起义事宜。

3月28日，浙江工农红军第2纵队正式建立，杨敬燮为总指挥，陈天保任副总指挥。

第2天，指挥部移驻桐柏宫，参谋处忙着编造花名册和分发印有“浙江工农红军”的红色布质符号。编队结束，对第1支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由总指挥杨敬燮讲政治形势，王逸仙和老康讲军事知识。

桐柏山上战旗猎猎，天台县城里的国民党政府对此惊恐万状，他们一面火急向省政府求援，一面加修城防，紧闭城门，并令驻防天台的省保安队5团1营4连出战。敌连长杜荣芳于3月29日率全连出了西门。指挥部得悉后，马上作出了前后夹攻的歼敌部署，令袁存生和周传帽率队从桐柏岭和蓝田岭分兵两路下山夹击。战斗开始后，敌人抵挡不住前后夹击，丢盔弃甲败退回城。次日，杜荣芳又硬着头皮再度率兵出城。“2纵”指挥部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据险把守，伺机歼敌。敌人见山上没有红军动静，便壮起胆子，缓缓进抵桐柏山脚的落皇桥扎营，欲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周传帽率特工中队悄悄下山，趁敌扎营未定，连夜偷袭敌营，敌大败而逃。

两次战斗的胜利，红军士气大振。总指挥杨敬燮考虑到我军力量单薄，虽两次获得胜利，但未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于是决定转移。

1930年7月，新改组的中共天台县委书记朱渭滨和县委委员王金地、周传帽，根据中共浙南特委军事会议的部署，把在北山坚持斗争的“2纵”第1支和特工中队余部，编为红13军第2团天台北区游击队，由天台县委直接领导。

广德起义

1930年3月，中共安徽广德县委在该县花鼓塘附近地区领导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9年冬，中共广德县委成立，邓国安为书记，王金林等为委员。县委鉴于当时农民饥寒交迫，自发到富户家“吃大户”的现象，决定把农民的自发行动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斗争，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12月1日，县委以王金林母亲做寿为名，召开秘密会议，筹集活动经费，讨论起义问题。会后，县委书记邓国安去上海购买了4支手枪，组建了一支小型武装。与此同时，王金林、邓国安等深入群众，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提出“打死比饿死强”的口号，号召农民起来同地主豪绅作斗争。1930年3月，王金林、邓国安领导花鼓塘一带的农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分粮斗争，先后分掉董家冲、六家埔、戈村等大地主的粮食10万余斤，缴获地主武装的步枪、土枪数十支。每次分粮斗争，参加农民少则100多人，多则1000多人。分粮斗争的胜利揭开了广德农民武装起义的序幕。分粮斗争中涌现的一批积极分子，县委将其组成赤卫队。不久，以赤卫队为基础成立了以王金林为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向集镇及乡游击，广泛发动群众。4月，王金林率部到独树街一带活动，当地农民纷纷参加起义队伍。游击队在独树地区收集散失的一部分枪支弹药，武装了参加起义队伍的农民。驻独树的民团马忠海部30余人，经王金林派王大亚前往策反成功，携带枪支起义，加入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的成立及其活动，震惊了广德的反动势力，也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惶恐不安，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派首都卫戍团团副李元凯率领1个营，并纠集了广德反动武装自卫队共1000余人，进攻红军游击队。面对强大的敌人，王金林率游击队采取避敌主力，待机出击的方针，以日蔽夜行，分散活动的战术，东打西扰，使敌晕头转向，疲于奔走，毫无所获。5月，龚守德率领红军游击队队员20余人，埋伏在郎溪、广德之间的要道路口，截获了杨杆大地主运往县城的粮食6万余斤。6月23日，王金林率领红军游击队300余人和赤卫队700余人，乘敌不备，袭击了东冲地主武装，缴枪4支，获粮100余担，就地镇压了地主陈二老板等12人。县委利用分粮斗争，不断打击敌人，教育团结贫苦农民，壮大武装起义队伍，使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广（德）郎（溪）宣（城）3个区的苏维埃政府和建立皖南红军独立团的指示，在广德独树街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皖南独立团，王金林任团长，邱宏毅任政治委员，李邦兴任副团长兼参谋长。独立团下辖1个营3个连，300余人，长短枪180余支。皖南红军独立团是中共在皖南成立的第一支工农红军。

红军皖南独立团成立后，立即驰骋在皖南地区，发动和依靠贫苦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反击敌人“清剿”。到1930年10月，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击毙敌人50余人，铲除恶霸地主40余人，消灭了郎溪毕家桥沈云山、毕小田为首的土匪武装及其他地主、土匪武装200余人，红军独立团扩编为两个营7个连，600余人，长短枪260余支；活动范围发展到西坞、独树、铜沟、梨壁山等150多个大小村庄；红色区域扩大到广德西乡、南乡、东乡的一部分，以及郎溪、宣城、宁国、孝丰的边缘，面积达600多平方公里，人口5万多人。随着武装起义的胜利，10月中旬广郎宣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成立。广德西、南乡等地也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了农会、妇协、赤卫队、

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平阳白沙起义

1930年3月，浙江平阳宜山区缪家桥的穷苦盐民，在中共平阳县委书记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平阳白沙一带，住着千余家盐民，他们依靠卖盐为生。过去，他们可以自己晒盐、卖盐。1924年，平阳县盐局在白沙路设立了18个盐堆，盐民的晒盐、卖盐，都要受到限制，还收取税金。盐警们经常为非作歹，欺压盐民。

1926年秋，中共中央派特派员张培农到平阳宜山组织农（盐）民协会。当地盐民吴信直被选为农会会长。他们以农会为核心，发动农民、盐民，斗争了江南宜山最大的恶霸地主兼盐民局局长胡振木，烧了胡家的田契债券，把胡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吴信直在斗争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平阳县委书记开会研究，为了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必须开展武装斗争。为了革命，吴信直卖了自己亲生的女儿，换钱买了两支手枪和300发子弹。

1930年3月间，吴信直按照县委书记指示，派人通过多种关系，打入白沙10多个盐堆当盐警。一天深夜，吴信直率领10余人，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举行起义，武装偷袭盐堆。袭击第1个盐堆。他们先叫一个派进去的盐警喊门，等门一开，大家冲进去，俘虏了“师爷”和盐兵，缴获1支长枪和2支手枪，顺利拿下第1个盐堆。接着赶到第2个盐堆，命1个俘虏叫门，门开后，吴信直用枪顶着盐兵们，又夺来枪支。就这样，一夜之间，袭击了17个盐堆，共缴获30多支长、短枪。后来，吴信直用这批武器组织了40多人的武装队伍，战斗在灵溪大玉苍山一带。

永嘉西楠溪起义

1930年3月到5月，在中共浙江永嘉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由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胡公冕和参谋长刘蜚雄等人，于永嘉西楠溪地区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

浙南人民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4年，就建立了隶属于中共上海区委的中共温州独立支部。1926年秋，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的工国桢和张培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浙南，从事农民运动。

1928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郑馨到温州、台州各县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民开展武装起义。中共永嘉、瑞安、平阳等县委先后成立。

1929年，浙南一带风虫为虐，水旱并至，穷苦农民靠挖草根、剥树皮艰难度日，阶级矛盾激化。浙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

11月13日，永嘉西楠溪84个村的4000多农军，手持步枪、鸟枪、梭标，臂缠红布，鸣锣为号，向驻地国民党省防军反动民团发起进攻，捣毁昆阳公安局，打死团丁7人，伤多人，烧毁地主豪绅房屋9间。面对急风暴雨式的农民武装起义，中共永嘉中心县委决定因势利导，派永嘉中心县委委员雷高升、李振声赶赴西内区，加强对起义农军的组织领导。

19日，雷高升、李振升在溪下将农军骨干360人组成一支武装队伍，编为4个中队。24日，同从温州赶来“围剿”的国民党浙江保安第4团3个连在黄南展开激战，毙敌19人，伤敌数十人，红军游击队也遭受一定伤亡。战斗结束后，红军游击队进入黄（岩）、仙（居）边区的黄山开展活动。与此同时，在温州的瑞安、平阳，台州的温岭、仙居、临海、天台、黄岩等地，先后爆发农民武装起义。

浙南农民起义，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关注。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金贯真为浙南巡视员到温州。他抵温之后，深感农民武装斗争的继续发展，急需加强军事领导，遂向在上海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提议，派胡公冕来浙南负责军事指挥。2月初，金在瑞安县肇平洋召开了永嘉中心县委第2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永嘉西楠溪和平阳江南一带统一将各地起义农军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2月，永嘉中心县委派王国桢、雷高升、李振声等3人到达西楠溪，集中当地队伍，组成一支几百人的红军队伍。

同年3月初，中共中央军委派胡公冕来浙南领导武装斗争，同来的有刘蜚雄、金国祥等。3月7日在永嘉县白岩与王国桢等会合。3月9日，各地武装集中到永（嘉）、仙（居）两县交界的黄皮寺，成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胡公冕任总指挥，刘蜚雄任参谋长，王国桢、李振声负责政治工作，并将红军游击队400余人（拥有步枪100多支）整编为3个支队、41个分队。支队长分别由雷高升、胡协和、谢文候担任。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的成立，使原来分散的农民武装有了统一的指挥。

3月中旬，中共永嘉中心县委召开第3次扩大会议，决定由胡公冕率领浙南红军攻打处州（丽水）城。3月18日子夜发起攻击，先围歼国民党省保安队，然后攻打警察局。胡公冕率领四五百人的队伍，从永嘉黄皮寺出发，过缙云县境，直取处州。不料行军途中，遇上滂沱大雨、山洪爆发，部队行动受阻，至19日3时才进入处州。此时，因负责攻打省保安队驻地的队伍未到，而袭击警察局的一路红军已先与敌接火，虽缴获步枪30支、机枪2挺，

但部署已乱。敌人主力省保安队沿街反击，驻城隍庙的保卫团（地主武装）也开火助战。巷战3个小时，天将破晓，红军游击队弹药不济，撤出战斗。红军这次攻打处州城，使国民党浙江当局大为震惊。3月22日，攻打处州的红军退至青田海溪。翌日，在当地群众大力支援下，打退了数倍于红军的追敌，击毙敌连长1名、士兵23名，我军无一伤亡。然后回师永嘉五尺等地。

同年3月底，浙南红军游击队胜利袭击了乐清虹桥镇。

那晚，红军游击队星夜行军，到达虹桥。他们兵分3路，一路由当地农民起义队伍对付“自卫团”；另两路由红军集中力量消灭警察局和盐警队。战斗打响了，那些警察、盐兵从梦中惊醒，个个晕头转向，做了俘虏，红军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

3月下旬，金贯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根据温、台武装斗争的情况，于3月31日发出《致浙南党的信》，决定成立浙南特委和组织红13军。

5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成立，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红13军在浙南坚持武装斗争长达4年之久，她的旗帜插遍浙南各地。

永福起义

1930年春，中共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区委在该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9月1日，红4军第2、第3纵队进驻永福镇。在红军的帮助下，永福区苏维埃政府与所属东河区、南河区和北河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陈士荣、陈志科为永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月，在永福成立由邓克明任书记，陈士荣、陈志科等任委员的中共永福区委。在中共永福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李庄、西山、田美、清源、石牌等20多个村庄都计划举行起义。

红4军主力部队离开永福、郎车后，永福、官田地方民团纠集200余人，妄图一举摧垮永福区所属区、乡、村的苏维埃政权。邓克明、胡阿泗带领郎车赤卫队120余人驰援永福，击溃了永福、官田民团的进攻。为抓紧举行永福全区起义，中共永福区委决定成立总起义指挥部，陈士荣任总指挥。筹划起义不久，永福、官田民团又勾结安溪民团进犯永福地区各乡、村。

1930年春，闽西红军团长邓毅刚带领龙岩红1团、永定红3团等地方红军武装在郎车赤卫队和漳平游击队配合下，向盘踞在永福的安溪民团发起进攻，消灭民团300余人，缴枪300余支。永福起义指挥部决定在永福各地举行起义。陈士荣带领南河区100多名赤卫队员，从西山、田美、清源、李庄等地向永福圩集中；东河区、北河区、龙永区的赤卫队也都从四面八方涌向永福圩。起义武装推翻了国民党永福区公署，成立了以陈士荣为主席、陈志科为副主席的永福区苏维埃政府，下设东河区、南河区、北河区和龙永区苏维埃政府。同时，还成立了以邓克明任总队长、胡阿泗为副总队长的永福赤卫队。接着，西山、李庄、田美、上林、霄坑、岭下、赤水、和丰、新坑、石牌、内洪、洪坑、吕坊、后孟、陈村、仙宫、秋苑、同村、封侯、雷石等几十乡村的群众纷纷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农会和赤卫队等革命组织。

头陀河黄尾河起义

1930年4月2日、18日，中共安徽霍山县南乡区委在霍山头陀河、黄尾河（今均属岳西县）领导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头陀河、黄尾河位于霍山县南乡（1936年划入岳西县）。1928年底就建立了中共头陀河支部。1929年1月中共霍山县委成立后，组建了中共霍山南乡区委，下辖头陀河、黄尾河等5个支部。1929年，头陀河、黄尾河地区夏荒严重，农民生活苦不堪言。中共南乡区委因势利导领导农会开展斗争，区委书记蔡世钊、委员黄祥仁领导数百穷苦农民肩扛扁担，涌到豪绅地主石家珠家，开仓借粮。这年，由于虫旱灾害和地主残酷剥削，秋收后农民仍十室九空，地主却乘机抬高粮价。中共南乡区委领导农民开展了一场抗抬高粮价的斗争，迫使地主不得不按照低价卖稻或借稻。抗粮斗争的胜利，使头陀河、黄尾河农会会员发展到900余人。1929年10月，中共南乡区委在仙人山观音庵召开农会骨干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头陀河、黄尾河、石盆3个赤卫队，做起义的准备。六霍起义后，中共潜山衙前区委书记王效亭按照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的指示，到头陀河与中共霍山南乡区委蔡世钊、胡祥仁，以及舒城西乡共产党员朱四丰、储春贯等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舒城、霍山、潜山三县边区武装总起义。会议决定，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准备起义，使三县边区起义连成一片。继六霍起义后，1930年2月请水寨起义爆发，使地处起义边缘的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妄图联合起来对付刚刚兴起的革命。头陀河的恶霸地主胡锡文、胡锡祐，与东邻的六安县东西溪团练、南邻的潜山县马家畈团防队，西邻的霍山县五区联防队勾结起来，着手操办头陀河团防队，阻止头陀河的农民革命。中共霍山南乡区委决定立即举行起义。4月1日夜，对胡锡文和胡锡祐等人进行了镇压。第二天召开大会，宣布头陀河起义，成立南乡第1苏维埃政府和第1、第3赤卫大队。储春畔为苏维埃主席，胡祥先为第1赤卫大队大队长，胡代连、沈道平、徐大才分任中队长，许虎为第3赤卫大队大队长。此时，赤卫队员已发展到300多人。

中共霍山南乡区委书记蔡世钊负责黄尾河起义。他们在头陀河起义的同时，组建了黄尾河赤卫大队。4月15日，胡祥仁率领头陀河赤卫大队一部来到黄尾河。此时，王效亭也率领潜山红军来到黄尾河。当即召开会议决定举行黄尾河起义。4月18日，在黄尾的莲花地召开千人大会，宣布成立霍山县南乡第2苏维埃政府和第2赤卫大队，蔡荣周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蔡世钊为赤卫大队大队长，朱竟义为副大队长，赤卫大队下设3个分队，郑道寅、李中堂、蔡国柱分任中队长。全队有300人，其中赤卫队员占十分之一，有机枪一挺，钢枪14支，土枪80支，刀矛200余件。

4月25日，胡祥仁、蔡世钊率赤卫队和扁担队共1000多人，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32、33师一部和潜山红军击溃盘驻在青天畈、河口等一带的国民党霍山县五区联防队。4月28日，奉中共霍山县委指示，在头陀河老庙基街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霍山县第4区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徐坤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胡祥仁为赤卫军总指挥，蔡世钊为赤卫军副总指挥，第4区苏维埃政府辖乐道冲、黄尾河、石盆、青天畈等10个乡苏维埃，至此，六霍苏区和潜山苏区连成一片。

霍山东北乡起义

1930年4月7日，中共安徽六安中心县委在霍山县下符桥、舒家庙一带东北乡领导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3月，中共霍山县委根据六安中心县委会议精神，决定进一步加强军事准备和对群众的军事训练，集款购买枪支，以游击队去解除敌人的武装，积极准备在群众基础好、赤卫队力量较强的东北乡发动一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4月6日，国民党六安县自卫团到霍山下符桥一带搜捕农协会员，并抄了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的家。东北乡赤卫队奋起反击，数千群众将自卫团紧紧围住，激战数小时，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根据这一紧急情况，中共霍山县委与东北乡区委研究决定，由区委动员全东北乡人民实行总起义；由县委派人到中国工农红军第32、33师请求援助。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闻讯后，决定派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亲临指挥。舒传贤立即组织东北乡农民起义，并通知3、4、7区响应，总计达四五万人参加。4月7日，起义首先从舒家庙开始，提出了北边打到六安城，西边打到霍山城的起义口号。赤卫队打垮了民团的数次进攻，打掉了青山街的反动局子，并一直打到苏家埠的马家庵。与此同时，下符桥300多名农协会员由刘介成、陈祖燕指挥发动起义，将六安县民团围困4天，没收了地主刘有勤、黄跃轩的粮食，枪决了地痞刘守义。

红军在红1军军长许继慎、红32师师长周维炯、红33师师长徐百川率领下，将霍山县城团团围住。参加东北乡起义的游击队和赤卫队也参加了围攻霍山县城的战斗。4月12日6时，红军和暴动队伍开始攻城战斗，激战至12时，遂将敌全部赶出县城。县长甘达用率领残部在向六安逃窜途中，在下符桥、三尖铺、青山一带又遇东北乡游击队堵击，毙伤甚多。此役，击毙自卫队200人，缴获钢枪80多支。由于红军和起义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县城，县长甘达用在逃窜时，连县政府大印、公文密件、省密私章和库存现洋4000余元全部丢失。

红军和起义队伍攻克霍山县城后，乘胜进兵下符桥、三尖铺、青山，全歼六安县2个民团。至此，东北乡起义获得全胜。霍山县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13日，在城关成立霍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曹品三（又名汪正发），内设土地、经济、赤卫等委员会。这是安徽省最早的县级苏维埃政府。东北乡起义后的游击队，一部除坚持原地武装斗争外，一部编入红11军。

罗云坝第二次起义

1930年4月7日，在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的领导下，涪陵县罗云坝举行了第二次起义。

1928年夏天，罗云坝第1次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培养了革命骨干。涪陵是川军新20军郭汝栋部防区，中共四川省委在这个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很有成绩。1930年3月，李鸣珂利用郭部官兵对蒋介石调该部到湖北省“剿共”的不满情绪，先后两次发动涪陵城内郭部驻军起义，均未果。郭部朱团第3营第1连连长、共产党员赵启民，借部队打野外为名，率2个排到罗云坝，与当地共产党员严觐阳等领导的农民赤卫军会合，共有300多人。于4月7日举行起义，打出“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旗帜。李鸣珂任总指挥，赵启民为副总指挥，中共涪陵县委书记苟良歌为党代表。起义后，得到丰都、石柱等地数百革命武装的支援。为开辟涪陵、武隆、彭水、忠县边界革命根据地，游击队向武隆进发。5月中旬，到达丰都，攻占军事要地栗子寨，游击队扩大到2000多人，建立了以栗子寨、回龙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5月底，游击队撤出栗子寨转移到回龙地区。6月下旬，遭到千余名反动武装进攻，游击队伤亡很大，仅剩几十名游击队员，有的返回四川省委，有的找到四川红军第3路游击队，继续在川东一带坚持斗争。

殷区起义

1930年4月10日，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在殷区（今殷棚、马畈、南河店乡的各一部分）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中国共产党很早即在殷区开展革命活动，到1927年秋，先后建立了中共殷区区委和15个农民协会，会员达1000余人。1929年3月，中共光山县委成立。同年春，中共光山县委委员熊少山在殷区大朱湾建立农民自卫军司令部，秘密组织并训练了一支农民自卫军，采取日散夜袭的方式在殷区一带与地主豪绅展开斗争，很快发展到100余人。10月，盘踞在殷区北部马畈的反动民团头目易本应，与殷区恶霸相勾结，带领100余人到殷区“清乡”，被农民自卫军击退。1930年4月上旬，易本应带领民团武装300余人，两次“清剿”殷区，对殷区革命群众大肆进行烧杀抢掠，搜捕共产党员。广大群众要求举行武装起义，打击敌人。中共光山县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同时派出中共党员分头准备，一方面向红1军汇报，请求支援；另一方面到附近的柳林河、殷湾、刘林冲等地发动群众。经过深入宣传，农民起义军迅速扩展至五六百人。

1930年4月10日8时，殷区3000余名农民和自卫军，在中共光山县委和殷区区委的领导及红1军一部的支援下，举行武装起义，攻打殷家棚易本应反动民团。经过激烈战斗，农民起义军歼灭易本应反动民团3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起义胜利后，中共殷区区委在殷家棚集南头的青龙河畔召开庆祝大会，成立了殷区苏维埃政府，熊古如任主席。区苏维埃政府下辖4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武装力量为游击大队，各乡均成立了赤卫队。同时开展了打土豪分钱粮的斗争，没收反动劣绅的财产，分给穷苦农民，并镇压了部分罪大恶极的反动劣绅。

4月底，在殷家棚惨败的易本应，重整残部，纠集殷区南部苏河民团头目、殷区逃亡恶霸，对殷区实行南北夹击。殷区农民起义军在中共殷区区委的领导和光山县特务营一部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5月初，反动势力又纠集3000人再次进攻殷区。起义军暂撤退到殷区东南部的钱小寨固守，并先后两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终因众寡悬殊，6月21日晚，敌人攻进了钱小寨，起义军30余人冲出重围，200余人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太湖大石岭起义

1930年4月14日，中共安徽太湖县委领导太湖、宿松、望江三县交界处的大石岭地区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年二三月间，太湖先后建立起中共党支部和特别区委。1930年3月，中共太湖县委成立，甘信元为书记，陈大虎、殷幼堂为常委，叶仁山、叶义山、卓金和、张祖元、孙敬纯为委员，下辖5个特支、15个支部，有120名党员。太湖党组织建立以后，通过办农民夜校，利用太湖县城举行“灯会”之机，张贴革命标语，向群众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成立“抗租抗债委员会”；组建农民协会；收集枪支弹药，建立秘密武装，组织和引导农民向地主豪绅开展经济斗争并转向政治斗争，为起义作准备。到起义前，太湖县委组织的赤卫队已发展到60人，有长短枪30支。4月，中共太湖县委在大石岭召开会议，决定利用春荒之机，组织农民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4月14日，在县委书记甘信元统一指挥下，陈大虎、殷幼堂等率领赤卫队员和数百名农民群众冲进李家新屋大土豪李贯珍家，开仓分粮，缴获了李家的枪支弹药。李贯珍负隅顽抗，被当场镇压。4月18日，县委在太湖县蔡家田埠召开会议，决定缴望江县长岭铺自卫团的武器。后因自卫团已经开走，即指挥队伍抄了大石岭土豪韦大衍、杨和义、韦晓山的家，镇压了韦大衍，缴获了枪支，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县委从开仓分粮入手，大得民心，农民群众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赤卫队员很快发展到120余人，农会会员发展到2000余人。4月20日，中共太湖县委在大石岭五显庙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太望赤卫队，陈大虎、殷幼堂任正、副队长，甘信元、叶仁山任正副指导员。太望赤卫队成立后乘胜出击。5月16日，奔袭了太湖县财政局局长、劣绅李伯超在五羊贩的家，缴了李家的枪支。

大石岭的农民起义，引起国民党太湖县政府的极度恐慌，急忙派兵镇压。当太望赤卫队返回金鸡岭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太湖县自卫团、县商团500多人的袭击。为保存革命火种，县委书记甘信元决定组织突围。赤卫队长陈大虎等挺身而出，掩护县委和赤卫队转移。激战中因寡不敌众，陈大虎、殷幼堂、杨水连、孙大朵、孙能勒、陈姓恒、徐月进等被俘。敌人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第二天在太湖县城北门外英勇就义。国民党自卫团在金鸡岭战斗得利后，气焰更加嚣张，除太湖县自卫团继续“围剿”外，望江县县长马吉悦也率领自卫团赶来“围剿”，宿松也派出“清剿队”。他们集结在大石岭周围，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太湖县委、太望赤卫队处境十分艰险。县委书记甘信元被迫出走，太望赤卫队亦被打散。起义失败。

鸣山起义

1930年4月16日，在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的支援下，中共鸣山煤矿支部组织发动了一次煤矿工人武装起义。

1929年冬，乐安江干涸，船不通航，煤运不出去。矿长张文通以此为由，扣发了工人3个多月工资，致使全矿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无以为继，革命情绪空前高涨。1930年1月19日晚，中共鸣山煤矿党支部书记王乃太等人秘密召开党员大会，研究决定利用农历除夕之夜，矿长、矿警队长和大小工头都在家里过年的时机举行起义，并派人到信江苏区求援。信江苏区确定其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亲自率红军支援，同时建议起义时间推迟到1930年4月，待红军在弋阳方家墩整训后进行。煤矿中共党支部一面安定工人情绪，一面进行准备。4月12日前后，王乃太连续获悉矿长张文通发出请贴，于4月16日晚上宴请周围各村土豪劣绅，图谋进一步加强勾结，利用宗族关系，分化和压制工人。这一巧合，为工人起义提供了最佳时机。

4月16日傍晚，方志敏率领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和弋阳、万年的部分赤卫队员进入矿区埋伏。晚上8时许，王乃太拉响气笛，发出了起义信号。鸣山、虎山、扁担山、灰山、狮子山、回源岭、大春岭的工人，从矿井、工棚、家里奔出来，燃着火把，挥着铁镐、大刀、长矛、鸟铳等，按预定目标，分别奔向煤矿金库、兵工厂和各个岗楼；红军和赤卫队分别扑向矿警宿舍、宴会厅、河栈房。晚10时左右，起义结束，除矿长带几名随从逃脱外，俘煤矿头目、土豪劣绅等23人和矿警70余人，缴枪30余支、银元9万多两和大批纸钞、子弹及制造枪支弹药的材料。

4月17日，召开了有3000余人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王乃太在会上宣布：一，成立鸣山煤矿工人委员会，管理矿山一切事宜；二，立即将缴获的全部钞票分给工人，解决目前的生活困难。会后有100多名矿工参加红军。这次起义，扩大了信江苏区的红军队伍，并为创办赣东北兵工厂获得了一批资金、材料和技术人才。

浦江北乡起义

1930年4月17日，中共浙江诸暨县委在浦江县北乡地区组织发动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浦江北乡，位于龙门山脉南北伸展的中段，诸暨、富阳、桐庐、浦江四县交界地区。早在1928年，中共诸暨县委就派党员宣侠父、金昌福到浦江北乡开辟工作，并建立了党组织。1930年初，党员金焕善等到平湖、寺前、潘周一带组织农民武装。

4月初，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到诸暨，并派共产党员金树东、金炳禄到浦江北乡，与沈家党支部书记沈振标一起，在青山、马剑等地积极发动群众，建立了一支100多人的武装队伍。4月17日，根据中共诸暨县委的指示，举行起义。当晚，金树东、金炳禄在青山庙集合起义农军100余人，经简短动员后，连夜攻打草塔镇。18日凌晨，起义队伍扛着土枪、长矛、木棍和缴来的武器，翻过杨塘岭，天黑到达狮象弄，一举攻下了驻扎在狮象弄的警察分驻所，缴获步枪3支。接着，农军又占领了十四都村。队伍进村时，地主早已闻风而逃，农军连夜组织当地农民“破仓分粮”，把地主家的谷米、衣服分给贫苦农民。19日晨，躲在山上的狮象弄分驻所警察突然下山向起义队伍反扑。金树东一面收拢队伍，一面边打边撤。深夜时分，农军撤到了诸暨、浦江、富阳3县交界的五汇寺。经整编，这支农军被正式命名为“浙东农民革命军第1大队”，沈振标任大队长，金树东任政委。下编3个分队。

4月下旬，“浙东农民革命军第1大队”，由相公殿出发，再次攻打草塔镇。当行进到杨塘岭附近的黄泥垅小山口时，与国民党省保安队正面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农军打得非常勇敢，与敌人相持了1个多小时，发起了几次冲锋，终因武器太差，又缺乏战斗经验，队伍被打散。起义领导人金树东、金炳禄经富阳紫阆返回诸暨大西。

黄泥垅战斗后，驻扎在浦江、诸暨和富阳3县的国民党省保安队对青山、马剑、平湖一带联合围剿，不少农军战士被捕和惨遭杀害。

6月初，陆续转移到上海的起义领导人向卓兰芳作了汇报。10月，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张以民、寿松涛等在义北白峰岭成立诸（暨）义（乌）浦（江）工农革命委员会，张以民为总负责人兼政治部长，寿松涛任军事部长，马乃松、何竟华任交通部长，许尚谦任经济部长，邱焕章等为委员。同时，组织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由寿松涛负责。计划半月后以看戏为名，夺取警察局枪支。后因坑西地主告密和省保安队搜捕，刚成立的武装队伍被迫解散。

鳌峰起义

1930年4月18日，中共福建省永德县委在永春县鳌峰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9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将永春、德化党的组织合并为中共永德县委。11月，永德县委传达贯彻省委关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准备起义的指示，决定以鳌峰乡农会为基础，建立鳌峰农民武装，并调陈其辉回鳌峰，进行组织准备。12月15日，军阀陈国辉率部占领永春，强征“烟苗捐”30万银元，民众怨声载道。1930年1月间，中共永德县委决定派林菁（林秀明）到鳌峰协助陈其辉工作。2月，中共福建省委指示泉州、永春等地3、4月间发动“五抗”运动，适时举行武装起义。3月间，永德县委立即在各村组织农民赤卫队，收集武器，准备起义。月底，陈国辉派兵5人到鳌峰催收烟苗捐，被鳌峰农民武装拘捕缴械。

4月18日夜，陈国辉派兵500余人，分两路进攻鳌峰，其中一路包围了东林的枪楼。已有准备的鳌峰农民武装，利用黑夜掩护和有利地形，分3路向敌人进行反包围。敌不知虚实，向逢壶方向溃退。另一路向亭仔口枪楼逼进的敌人，在农民武装的夹击之下溃退。农民武装乘胜追击，消灭敌人10余人。5月3日凌晨，陈国辉纠集1000多兵力，分3路再次进犯鳌峰。农民武装与敌相持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被迫向德化边境转移。敌人占领鳌峰，起义失败。

1930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派许侠夫任中共永春县委书记。永春县委吸取鳌峰起义的经验教训，组建游击队，开辟了安（溪）南（靖）永（春）三县边界游击区，转入游击战争。

株林河起义

1930年4月19日，在中共湖北蕲春县委的组织领导下，株林河地区首次举行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春夏之交，中共蕲春特别支部建立后，即在株林河地区恢复、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

1929年4月，中共蕲春特别支部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地下活动，开展“三杀四抗”斗争；筹款购买枪支弹药；派人打入民团，相机夺取枪械，准备武装起义等四项计划。是年9月，中共蕲春县委成立，张觉仁任书记，汪晚峰等8人为委员。

中共蕲春县委鉴于株林河地区共产党组织较强，群众基础好，而反动武装只驻一队团防，仅20余人，18条步枪和1支短枪等情况，决定在株林河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团防枪支，推动全县的武装起义。为此，县委作了精心的部署：一是派中共党员张天佑打入株林河民团，掌握情况，作好内应（1930年初，张天佑当了民团团总，为后来的起义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二是县委书记，张觉仁亲赴广济，请鄂东游击队支援。三是由汪晚峰组织附近4个党支部的青壮年党员，秘密准备土铳、刀矛。

4月18日，张觉仁在叶家湾召开起义骨干会议。决定：张天佑以团总身份采取内应措施，起义队伍分成3路先包围，后袭击，坚决消灭民团。

4月19日，3路起义队伍约七八十人，按计划从叶家湾向团防驻地——株林河老街头陈氏祖祠急进。张觉仁率刀矛队从株林河上游涉河，由上向下压，汪晚峰率土铳队从下首过河，侧翼包围，潘栋铭率20余名鄂东游击队员从街上过桥，担任正面主攻。由于情报准确，行动保密、迅速，当3路起义队伍对团防驻地实施包围时，大部分团丁还在街上闲逛，枪支弹药都挂在墙壁上。此时，潘栋铭率领游击队员潜往民团驻地门首，出其不意地打死了守门哨兵，游击队员迅猛冲进陈氏祠堂，取下挂在墙上的全部枪支弹药，团丁束手就擒。在街上闲逛的团丁闻讯四散逃命。

起义胜利后，县委立即挑选30余名起义骨干，组建了蕲春县游击大队，由潘栋铭任大队长，汪少斌任副大队长。此后，武装斗争便在全县各地相继开展起来。

会昌起义

1930年4月中旬至9月，江西省会昌西部和北部边界地区的农民在中共党员刘义长、宋名侃等组织发动下，先后在晓龙、石门和莲石等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晓龙，位于会昌县城西南40公里处。1929年冬，在盘古山（即仁风山）地区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会昌边界地区的乱石、茶梓（现属于都县）等地，秘密组织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1930年3月，茶梓农民赤卫队长、共产党员谢海波领导农民举行了起义，建立了区、乡革命政权。茶梓起义后不久，仁风山党组织派中共党员陈林来到晓龙圩，秘密进行党的地下工作。4月中旬，晓龙、田尾正式成立农民赤卫队。刘义长、刘新民为晓龙农民赤卫队正副队长，陈本材，谢发标为田尾农民赤卫队正副队长。

石门、莲石位于会昌县城北部40公里处。1930年4、5月间，正是春荒时节，石门的宋名侃、莲石的宋治法等一批农民，准备组织农民群众夺取地主豪绅的粮食。他们在超田等地赤卫队的帮助下，经分头秘密串联发动，不到1个月，赤卫队发展到50余人。5月，石门农民赤卫队正式成立，宋名侃为队长，宋名春为指导员。与此同时，莲石农民在梅岗、陂下赤卫队的帮助下，建立了莲石赤卫队，宋治法为队长，宋兆连为指导员。

1930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刘义长率晓龙、田尾农民赤卫队员100多人举行起义。茶梓的谢海波带领100多名赤卫队员前来支援。刘义长率300余名赤卫队员，捉拿土豪，开仓分粮，烧毁地契、借据。下午，赤卫队攻打珠兰的地主武装靖卫团，击毙3名，余敌逃窜。5月18日，晓龙、田尾、高兰等地的赤卫队在刘义长等的指挥下，联合攻打高排靖卫团。赤卫队分3路从东、西、北三面发起进攻。激战1小时，毙敌8人，俘4人，缴枪10支。赤卫队攻下高排后，彻底捣毁了高排靖卫团的老巢，没收了高排大地主家产，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晓龙等地农民赤卫队在刘义长的率领下，乘胜向四面出击，6月攻打安远长河；7月进攻于半田；8月，出击安远五龙营，血战庄埠。9月，会昌县“维持会”反动头目欧阳莘，纠集全县反动武装700余人，分别开往晓龙、西江等边界地区，镇压农民革命运动。靖卫团头目郑宗材带领300余人，向晓龙赤卫队进攻。晓龙赤卫队被打散。刘义长率部分队员转移到安远县境内的山区。不久，因叛徒出卖，刘义长被捕，惨遭杀害。

1930年6月，石门、莲石的农民赤卫队，在刘远宽、宋名侃、宋治法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他们高举红旗，手持大刀、梭镖、鸟铳和步枪，到处捕捉土豪劣绅，开仓分粮。月底，刘远宽、刘名侃带领石门、莲石、梅岗、超田等地农民赤卫队300余人及上千名群众，准备攻打西江靖卫团，由于行动计划泄露，西江靖卫团已预先作好准备，赤卫队受到前后夹击，战斗失利。后在瑞金武阳赤卫队长杨斗文率领的200多名赤卫队员的支援下，再度攻打西江。西江靖卫团和土豪劣绅，看到赤卫队来势凶猛，仓惶向洛口方向逃窜。赤卫队占领西江后，先后在千工、河背、南门段等地搜捕土豪劣绅，烧毁田契和借据，将他们的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石门、莲石农民赤卫队攻打西江的胜利，引起地主豪绅的极度恐慌。会昌、瑞金的“维持会”和欧阳江的“五区联防队”联合围攻石门、莲石、梅岗等地农民赤卫队。农民赤卫队在作战中屡受挫折。1930年11月，宋名侃带领部分赤卫队员转移到福建山区，刘远宽和部分赤卫队员转移到瑞金安

治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诸暨起义

1930年4月22日，在中共浙江诸暨县委领导下，该县举行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7月和1929年8月，诸暨县连续发生两次大水灾，庄稼颗粒无收，土豪劣绅残酷压榨，人民生活极度艰难，阶级矛盾日益加剧。

1930年4月5日，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化名李品三，到诸暨县组织农民起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诸暨的工作基础较好，县委下辖7个区委、70余个党支部，有党员约800名。卓兰芳在西斗门村小学内，召集中共诸暨临时县委、北区区委和各村党支部书记会议，决定在全县发动破仓分粮斗争。

4月16日，卓兰芳召集中共诸暨临时县委会议，提出了起义计划。同时决定撤销临时县委，重建了以何达人为书记，金树望、张文谦为委员的中共诸暨县委。新县委通过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确定了各区的负责人。

大规模的诸暨农民武装起义，最早是从西乡开始的。22日，西乡起义队伍分两路行动：一路，由中共小西区委委员金昌福、陈葵南发动金村、范家坞等村百余农民，进攻三都镇国民党警察分驻所，击毙警察1人，其余溃逃。另一路，由诸暨县委金树东等去浦江县沈家等村组织农军，攻下诸暨狮象弄警察分驻所，缴步枪3支。

24日，中共诸暨县委委员金树望等组织上南区丽坞底、茶院寺等村农民约200人，进攻牌头镇。农军冲进国民党警察分驻所，缴步枪10余支。当日，中共下南区委书记何竞华等组织何村埠等村农民300多人，冲进五家井国民党警察分驻所，缴步枪2支，打开3家米店，分米给贫民。

25日上午，北区、东区农民同时起义。中共下北区委领导大宣村党支部，发动农民破了地主的粮仓，烧了田契。中午，组织大宣、西斗门、何家山头等村数百农民去阮家埠、白浦、黄村等地破仓分粮，从地主家缴来10多支步枪。下午，中共下北、上北区委在阮家埠育婴堂，宣布成立“诸暨县北区苏维埃政府”，选举詹克俊为主席，骆子钊为组织部长，魏沛然为宣传部长，魏非然为财政部长，詹立波为武装部长兼农军总指挥。诸暨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革命政权，个个雀跃欢呼。同日拂晓，中共诸暨县委书记何达人等组织东区农民，分3路进攻枫桥镇，攻下了国民党枫桥警察分驻所、缉私营和区署，打死警察2人，缴枪10余支，子弹2箱，烧了商会帐册，打开几家米店、南货店和布店，分米、布、食品和铜钱给贫民。次日，东、北两区农军千余人在包村会合，成立东北区农军，由何达人、陈伯清任正副指挥。农军烧掉豪绅地主的田契与借票等，还烧了虞村豪绅王育凡的茧行。这时，由枫桥大地主、商会会长陈仲默等请来的国民党省防军已占领枫桥，“民团”与警察也重新拿起武器。东北区农军决定发动第2次进攻，把枫桥夺回。由于国民党县政府派基干队同省防军一起，在诸暨大肆逮捕和镇压，许多参加过起义的骨干和农民，被迫转移外地。5月底至6月初，领导起义的何达人、金树望、金树东和陈伯清等陆续到了上海。他们找到卓兰芳后，在新闻路池浜桥3号裁缝师傅边春霆家，召开县委会，总结了经验教训。

湖口起义

1930年4月28日，中共江西省委在湖口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9月、10月间，中共江西省委改组后，确定了发动吉安和湖口两地起义的计划，后因省委机关和赣东北特委相继遭到破坏，计划未能立即实行。1930年初，省委机关在九江重建。4月初，省委对湖口起义等工作做了若干具体规定，并派中共中央特派员徐德到湖口实施。徐到湖口后，组织湖口游击队先后攻打都昌徐家埠和湖口县城，均未成功。后调赣北游击队前来援助。

4月28日夜，赣北游击队和湖口第1游击大队在兰亭岭集中后，冒雨向湖口县城进发。途中，都昌、湖口各地农民赤卫队和群众陆续加入，共达3000余人。拂晓，起义队伍冲进城内，从狱中救出了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黄光等20余人，并烧毁了国民党县政府的钱粮券。很快，国民党县团兵和地主武装发起反击，黄光和游击队被迫撤出县城，转入赣北山区坚持斗争。

高河埠起义

1930年4月29日，中共安徽省安庆中心县委在怀宁县高河埠组织发动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底，中共怀宁临时县委派遣共产党员操球到怀宁，秘密进行党的活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准备武装斗争。1928年春，操球回到家乡高河埠，在操氏宗祠开办私塾，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建党和农运工作。9月，中共高河区委成立，操球任区委书记。操球在高河镇附近扩大农民协会，发展会员1000余名；积极收买国民党方振武部逃兵出卖的武器；组织农民生产自救，实行“抗租”、“抗债”。1929年前后，高河埠地区连年遭灾，粮食歉收，加之兵灾匪患，苛捐杂税，农民债台高筑，纷纷破产，无法生存。1930年春，高河埠地区粮荒严重，米价猛涨。粮商张光中等趁机勾结国民党反动军队，囤积上万担大米，准备外运，造成有钱无米，春荒加剧，激起农民和市民的极大愤恨，高河埠党组织决定因势利导，发劝群众武装斗争。1930年3月，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派员到高河埠召开了区委及活动积极分子会议，并组织市民禁运委员会，指导起义斗争。4月29日，操球率领1700多名农民群众在高河埠举行起义，封锁交通要道、切断电话通讯、监视安庆国民党军的活动，并带领群众高呼“反对军阀战争”、“打倒制造米荒的国民党”、“要饭吃，要土地，要工作”等口号，遂即占领张光中米行一上街、中街等米店。破仓分粮四五百担。

高河埠起义斗争的胜利，震动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省府主席陈调元，急调保安团、独立旅和地主豪绅武装进行镇压，包围了起义队伍，血腥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为保存革命力量，操球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和农协会会员冲出敌人包围，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4师第3团，操球任团长。

圩角大生起义

1930年4月30日，中共江苏启东县委为配合纪念“五一”节发动春荒斗争，组织大生二厂工人和圩角一带农民同时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春，由于上年夏天蝗灾严重，粮食欠收，再加上人间“两脚蝗虫”（即恶霸地主）的敲骨吸髓，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濒于死亡的边缘。为帮助农民度过春荒，4月29日晚，中共启东县委在袁国昌宅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县委领导成员江眠天、赵克明、杨思公等人外，还有来自全县各地的数十名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要求各地开展反饥饿斗争，迅速举行春荒起义。起义的攻击目标是圩角等3个区公所及粮行。会议决定第二天在圩角、大生二厂两地举行起义，得手后，合兵一处，再夺取北新镇。随即组建红14军启东大队，县委委员杨思公兼任大队长，刘志成任政委，陆尚贤为参谋长，下辖3个中队，并成立了启东农会、泥木工会、商会、少年先锋队、士兵委员会等一系列组织，县委委员赵克明兼农会会长。

4月30日早6时，大生二厂近3000工人在中共通海特委委员张辛领导下举行罢工，包围黄色工会，并围攻久隆镇公安分局，冲击资本家米行。国民党当局调军警镇压，但罢工仍坚持1星期，迫使厂方答应每天增加3分钱工资。是日下午，圩角起义队伍兵分两路攻打区公所和协和泰粮行。刘志成、陆尚贤率领第一路起义群众，冲进三区区公所，缴获手枪1支，捣毁门窗、家具，烧毁文件档案。第二路人多势大，一路高呼口号，冲向协和泰粮行，痛打粮行经理，并将账册抛到街上，付之一炬，银元、铜板散在街上任穷人拣拾。起义领导人宣布协和泰粮食财物全部没收，分给穷人。圩角镇四周农民闻讯结队而来，将协和泰粮行几百石大米、麦子、玉米等一分而光。接着，起义队伍又向西袭击合隆镇地主朱有义宅，缴手枪1支，银元数百。正准备没收财产分给穷人，闻国民党县公安局已派警察前来镇压，县委领导遂指挥起义人员转移，敌警察大队扑空而归。5月1日，县警察队由队长朱昌茂督率，再次前往“征剿”，非但一无所获，反被炸伤2名队员。

圩角起义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它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勇气。

瑞金起义

1930年4月30日，中共江西省瑞金县党组织在瑞金县城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春，中共赣西南特委和闽西特委先后多次派干部到瑞金县各地发展中共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和农军，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1930年春，黄柏、武阳、安治、九堡、黄沙、仰山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4月下旬，共产党员鄢寰、兰夏桥、邓希平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组成瑞金总起义指挥部，联合武阳、黄沙、九堡、黄柏、仰山等地起义队，攻打瑞金县城。

4月30日，各路起义队共1200余人集结于瑞金城下。拂晓，安治、武阳起义队首先打响第一枪，率先攻城。守城“靖卫团”300余人弃城向双清桥、沙洲坝等方向逃窜。起义队伍乘胜追击，活捉团总和县长，击毙击伤和俘虏团丁数十人，缴获步枪10余支，驳壳枪2支，烧毁文件，释放被关押的群众，解放瑞金县城。起义胜利后，第2天在县城召开庆祝大会，成立了瑞金县革命委员会，邓希平为主席。此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县，起义队员7000余人活跃在各地乡村。6月，瑞金县革命委员会根据赣西南特委指示，在全县具备工农武装队伍中抽调精干人员组建为地方红军第24纵队，司令员杨子光，政治委员鄢寰，副司令员兰夏桥。

马厂起义

1930年5月1日，中共江苏省沭阳县县委利用该县马厂街逢集之时，组织800余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因参加起义的人员都以扁担作武器，故又称为马厂800条扁担大游行。

1930年2月8日，沭阳共产党组织在中共徐海蚌特委和东海中心县委直接指导下，于北龙王庙召开各区委书记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大搞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和农民起义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徐通甫任县委书记的中共沭阳县县委，至4月，全县共建立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和城区5个区委，57个支部，共420多名党员。4月中旬，沭阳县县委在郑庄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5月1日在东区马厂镇搞一次游行示威。

4月27日、28日两夜，县委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计策，由城区区委武同儒率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沭阳城大街小巷，遍散传单，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果然，国民党县政府将分驻在各重要市镇的县大队调回沭城，维持“治安”，致使马厂无敌守卫。5月1日，正值马厂逢集。县委组织了数百名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化装成挑葱、卖菜的，随赶街的人群一起，拥进马厂街。9时左右，一声令下，起义队员纷纷抽出了扁担，组成队伍，进行游行。顿时，摊贩停业，商店关门，全街罢市。游行队伍中，由共产党员领头高呼“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在敌乡长徐三勇（徐执中）、土豪徐鲁川、徐再余等家门上张贴标语。马厂大街扁担林立，传单飞舞。中午时分，参加游行的队伍及围观的群众把马厂北街围得水泄不通。反动乡长徐三勇带乡队企图镇压，起义队伍高呼口号，挥动扁担，冲向反动乡队。乡队看群众势大，吓得自动撤退。徐三勇无计可施，只好答应废除部分苛捐杂税。游行示威取得预期的胜利。

岳城起义

1930年5月1日，在中共直南特委领导下，河北省磁县岳城工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1930年春，岳城一带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员王子青、苑志连等人的组织下，成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清查没收恶霸地主粮食和财物，深得农民群众的拥护。中共磁县委员会总结推广岳城的经验和做法。4月，中共直南特委在磁县成立后，根据磁县斗争的有利形势，决定组织岳城起义，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中共河北省军委委员张兆丰任总指挥，王子青、李相虞、张学礼、吕鸿安、唐寿山等为委员。制定了起义计划。5月1日黎明，王子青、唐寿山带领2000多工人和农民协会会员在岳城举行起义，打垮国民党岳城民团，缴获一部分枪支。随后，中共直南特委在彭城召开会议，总结起义经验教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0军，张兆丰任军长，王世英、张志清任副军长，侯健如任参谋长，唐寿山任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支队。

茅垄起义

1930年5月5日，中共江西省都昌县委在该县茅垄村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10月，中共都昌县委书记刘梦松出席赣东北特委在景德镇市郊召开的浮（梁）乐（平）都（阳）都（昌）湖（口）5县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讨论了组织武装起义，建立游击队，把赣东北地区的武装斗争连成一片的战略问题。会后，特委派中共党员刘迁显、刘经虎、刘经魁等回都昌开展武装斗争。12月，都昌县委遭破坏。

1930年1月，江西省委派向先鹏（化名杨济民）回都昌恢复县委，向先鹏任书记。县委委员分别到茅垄、老屋、后垄、向家山等周围30里的村庄，发动群众，先后恢复了茅垄、后垄、徐家埠区委、刘家山特支和10个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1月中旬，成立秘密武装组织特务队，刘龙嗣任队长。县委还秘密组织赤卫大队，200余人，下设5个中队8个分队。4月18日，向先鹏召开有20余人参加的会议，决定发动以春荒斗争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5月5日早晨，汪家墩周围30余里的农民汇集成一支1000多人的起义队伍向茅垄进发，包围了茅垄村，谭家“五老虎”除1人逃走外，无一漏网。起义群众烧毁债据，废除契约，开仓分粮。在魏家港镇压了罪恶多端的豪绅3人。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都昌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由向先鹏兼任，特务队改为游击队。茅垄附近的排门、陈家湾、汉暹等村也先后举行起义，打土豪，废债契，建立苏维埃政权。

5月7日，国民党都昌自卫队大队长陆思郊调动1个分队进攻茅垄。县委发动1000余名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扛着土铳、梭镖、大刀，配合游击队伏击敌人，敌人败逃。敌进攻茅垄失败后，在各大村庄组织土枪队，同时调动全县自卫队，先后向起义地区发动4次进攻。为保存革命力量，向先鹏带领游击队转移到都湖边境。

6月12日，向先鹏率游击队返回茅垄，不久，部队向杨储山转移。6月23日，游击队于战斗中失利，茅垄、老屋又陷于敌手。游击队长刘龙嗣率10余名游击队员突围后，向湖口转移，与赣东北游击队第1大队汇合，转战彭（泽）鄱（阳）边境，最后冲出都（昌）湖（口）彭（泽）3县反动派的“围剿”，与信江红军独立团会合，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黄柏起义

1930年5月初,中共安徽省潜山县黄柏地区党组织在中国工农红军第34师的协助下,在黄柏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3月,潜山逆水成立了中共党支部,金在荣任支部书记。1930年2月请水寨起义后,金在荣、金汉青等中共党员在黄柏、逆水、陆河等地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4月初,红34师政委陈礼谦、第2团团团长金赤、副团长方乔南(又名方赤)等带领80余人的钢枪队来到逆水,并缴获了黄柏区公所的14支枪。黄柏地区党组织利用这有利时机,发动农民起义,组织农会和赤卫队,到5月4日,成立逆水、黄柏、槎水3个区农会和13个乡农会。农会成立后,很快建立了赤卫队,计有13个中队,560余人。农会和赤卫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实行“耕者有其田”。逆水农会在地主的田里插上旗子,把田里的青稞连田分给了贫苦农民,并镇压了土豪仰天文及其走狗储复元,罚了十几个劣绅的款子,征收了劣绅的粮食。槎水农会镇压了当地的土豪,把有钱人的粮食分给了群众。黄柏人民的革命斗争极大地威胁着当地的反动统治,土豪劣绅纷纷勾结在一起组织反动团练,搔扰农会和赤卫队。黄柏官庄的土豪劣绅在余谊密(曾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的支持下,组织了100余人的反动团练。5月30日,黄柏地区数百名赤卫队员在金在荣、金赤、方赤的指挥下,配合红34师直逼官庄。当日,赤卫队在五星庙首战反动团练,将残敌赶至舒城县境内。6月18日,黄柏地区赤卫队和农民扁担队等千余人在红2团率领下攻打了潜山县梅城,随后又组织300多人到青草壩(属桐城)、源潭等地打粮,袭击坂区的大粮商,打开粮商的仓库,将粮食分给饥饿农民。黄柏地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7月底,当地劣绅储有本、储进川组织的团练,配合国民党安徽省保安队及各县联防队共千余人,分头进攻黄柏地区,大肆屠杀赤卫队、农会领导人及其家属。由于敌强我弱,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赤卫队即随红军转移到霍山苏区,参加了红34师。

梅寨起义

1930年5月初，中共安徽省潜山县石河地区党组织在潜山梅寨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0年2月，潜山工农革命军独立师初战水吼岭，打击国民党潜山县县长崔树龙率领的省、县团防军，使梅寨人民受到极大鼓舞。不久，潜山工农革命军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34师。师长兼政委王效亭根据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的指示，派共产党员梅竹松等人到梅寨领导起义。5月初，梅竹松、梅魁北、李凤吾等在梅寨组织农民起义，吸收40多个贫苦农民为会员，成立了石河乡农会，并推选梅竹松为主席，李凤吾为副主席。下设赤卫、经济、土地等9个委员。农会成立后，又成立了石河乡赤卫队，有100多名农会会员参加，由梅魁北任队长，李焰遵为副队长兼军事教练长，梅枝红为副教练。下设2个分队：第1分队队长金神发，第2分队队长李兴旺。下分为6个班，班长有徐先来、李润枝等。赤卫队员身穿蓝衣，戴红袖章，主要武器有土枪、大刀、土炸弹等。赤卫队成立后进行了射击、刺杀等基本技术战术训练。不久，在赤卫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游击队第1营，下辖2个连，6个排，有游击队员300余人，梅竹松兼任营长，梅魁北任副营长，李凤吾任指导员。6月19日，梅竹松在大栗树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00余人。会上梅竹松号召农民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倒土豪劣绅。会后镇压了余老六、余仁和等9个劣绅。

梅寨的农民起义，使五庙、水吼、天堂等地的一些土豪劣绅惊恐万状，他们携带家财，逃往潜山西部的王家牌楼躲避。县长崔树龙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驻在那里。7月13日，游击队配合红34师攻打王家牌楼。参战的红军、赤卫队员、游击队员、农会会员共2000多人。经十几个小时激战，游击队蒙受重大损失。红34师曹营长和游击队金连长、梅魁北、时关保、陈时熔等牺牲，突围出来的部分游击队员加入红34师，后转战岳西、霍山等地。

清湖起义

1930年5月6日，中共赣南西河行委和上（犹）崇（义）县委组织领导了以清湖为中心的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中共赣南特委先后派黄达、钟正泉、幸垂明等人到上犹进行党的活动。同年夏，成立了以何翊奎为书记的中共上犹县委。1930年春，先后建立了上犹县城、清湖、中稍、营削、上寨、鹅形、社溪、蓝田等8个党支部。上犹有清湖和社溪2个区委，周德任中共清湖区委书记，刘亚昆任中共社溪区委书记。3月下旬，毛泽东在大余召开6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实现一年赤化江西。会后，中共西河行动委员会决定在赣南西河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分两个爆发点，以清湖为中心的上犹起义为第2个爆发点。

5月6日正值清湖逢圩。上午参加起义的人员以赶圩为名，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清湖的河边真君庙。时近中午，起义队员手持梭标、大刀、棍棒举行起义，中共上犹县委书记何翊奎宣布成立清中区和清湖乡革命委员会，周德、刘世晋分别任区和乡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即把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分发给劳苦大众。

清湖起义后，上犹县的江口、窑下、具城、中稍、社溪、油石、广田、感坑、园鱼及崇义县的茶滩、长潭等12个爆发点也相继举行了起义，都建立了乡革命委员会和农民武装队伍。5月8日，各地暴动队负责人在上犹县城开会，为统一领导，决定成立上犹县革命委员会，张书杜为主席，并决定在各起义爆发点建立乡、村革命委员会。

清湖起义胜利后，以国民党上犹县长刘凯为首的反动势力，纠集地主武装、地痞流氓组织“清剿”委员会，刘凯任主任兼靖卫团长，下辖3个中队，并用钱收买了驻唐江钨砂警卫队，开始向起义队伍疯狂反扑。5月21日，起义队伍利用土枪、鸟铳打退靖卫团的进攻，击毙2人，俘虏10余人，缴枪4支，取得初战胜利。25日，靖卫团再次组织向县城进攻。暴动队埋伏在县城的两翼，右翼占领水南山，以控制南门；左翼占领城西北的凤凰山制高点，以控制西门、北门和东门。黎明时分，靖卫团从东面向县城逼近，刚到东门口附近，暴动队一齐开火，敌人惊慌应战，被暴动队打退。

敌人屡次进攻失败，士气日渐低落。27日，国民党上犹县县长刘凯以重金悬赏，下令限期攻占上犹县城。暴动队虽经英勇战斗，终因武器简陋、弹药无法补给，战斗失利。30日，上犹城被敌人攻占。社溪暴动队也遭到南康下埠豪绅刘传钱率领的以地痞流氓组成的民团的袭击而失败。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夺回县城，6月3日，暴动队和群众千余人，在赖绍尧、何翊奎、张书杜等人指挥下进攻上犹县城。由于一路暴动队未及时赶到攻击位置，加之暴动队缺乏后援、弹药不足而失利。暴动队被迫撤出战斗，退到清湖、陡水一带深山密林中隐蔽，以保存实力。为重振队伍，坚持长期斗争，上、崇两县领导人在陆水石角寺召开会议，总结失利的教训，并重新组成犹崇游击大队，大队长古达，政治委员周炎。国民党上犹县县长刘凯派出靖卫团、民团到清湖、陡水，搜山“围剿”暴动队。起义领导人谢发明、幸垂明在战斗中牺牲；何翊奎、张书杜、蔡伟等人被捕后惨遭敌人杀害。至此，坚持了1个多月、以清湖为中心的农民武装起义失败。

平江红五月起义

在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和平江县委的领导下，湖南省平江县工农武装和红5军及湘鄂赣独立团，于1930年5月6日举行了攻占县城的武装起义。

1930年春，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指示所属各县举行“红五月暴动”，并提出以平江为总暴动中心。中共平江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确定以攻打县城为全县红五月起义的中心任务。5月1日，平江县委与进入县境的红5军党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了攻打县城的作战计划，并决定6日攻城。是日上午，平江县工农武装数千人在红5军以及湘鄂赣独立团强有力的支援下，发起进攻。由于守敌凭借着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顽抗，起义部队多次冲锋，均未攻下。攻城总指挥彭德怀遂改变战术，一面佯攻北门，一面派李灿率第2纵队从五龙山后绕到小西门外猛攻。第2纵队很快击溃守敌，攻入城内，并分数路向敌北门阵地背后发起攻击。守敌主力腹背受击，只得弃守西窠，红5军主力从北门攻入县城。佯攻东门的独立团和平江县工农武装亦渡过阳罗江，攻入东门。另一部歼灭西门守敌，亦攻入城内。这次攻城，救出被关押的革命群众200多人，毙、伤、俘敌400多人，缴长短枪700多支，机枪11挺，子弹等军用物资一批。5月13日，平江县暴动委员会正式成立，朱平为主席。在暴动胜利的影响下，全县群众武装迅猛发展，赤卫队激增至10余万人，县成立了赤卫军，区成立了赤卫团，全县三分之二的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红5军配合地方武装攻克平江县城后，部队开往浏(阳)修(水)铜(鼓)万(载)边境地区。国民党反动派趁机纠集地主武装反扑，占领了县城。6月28日，湘鄂赣独立团和平江赤卫军、赤卫队再次攻占了县城。7月中旬，平江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张怀一任主席。平江县委和湘鄂赣边境特委还研究拟订了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法、劳动法、土地法，并交全县工农兵大会通过，正式公布执行。此外，为了实现工农武装化，还正式作出了《赤卫问题决议案》。平江红五月暴动促进了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壮大了武装力量，为后来胜利攻占长沙作出了贡献。

黄梅立夏节起义

1930年5月6日，中共黄梅县委领导游击武装——特务队，在内应和农民群众配合下，一举歼灭一天门六镇团防。因是日为农历4月初8，时值立夏，故称黄梅立夏节起义。

1927年9月，中共黄梅县委组织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以后所进行的“三杀四抗”斗争受到挫折后，党的骨干和游击队员由公开转入隐蔽活动，一方面打入敌团防内部伺机暴动；一方面继续发动农民群众组建革命武装。1930年4月，组建了由中共黄梅县委直接领导的特务队。18日，黄梅县委在多云镇双凤林召开东、北两区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5月6日举行起义，攻打一天门六镇团防。

一天门六镇团防成立时，东区中共组织派共产党员何介仁打入其内部，担任了团防教官。双凤林会议后，要求他作好起义内应工作。立夏节这一天，何介仁以过节为名，让团丁都回家过节，枪支弹药集中存放。只有团总潘友三和伺候他的团丁留下。中共黄梅县委分管军事的柳步月亲自率领特务队，化装来到一天门团防附近，按预定的时间，特务队和起义群众一齐冲进团防，击毙潘友三，缴机枪1挺，长枪20支，子弹一箱。由于武器装备得到加强，中共黄梅县委将特务队改编为黄梅第4中队，队长柳步月，共40余人枪。

东、北两区消灭一天门团防后，除古角山一带外，均在游击队控制之内。古角团防共20余人枪。团丁王宗秀是共产党员，他自幼擅长武术，经当地中共组织负责人同意，当了团防头目的保镖，后又到团防当了班长。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撤换坏团丁，换上党组织派去的人接替。5月29日，中共黄梅县委会议确定，为了使东、北两区联成一片，决定运用内线关系，消灭古角团防。团丁张殿球（中共党员）秘密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返回古角团防向王宗秀传达了县委的决定及行动计划。按照县委指示，王宗秀我团总王海周说：团丁因两个月未领到薪金而闹事，建议召集古角有名的绅士开会，筹派款项。此建议，实际上是中共黄梅县委拟定的，意在集中后一网打尽。行动时间定在6月8日。后因情况有变，开会时间提前了两天，王宗秀派人连夜向县委报告了情况和提前行动的建议。

6月6日，土豪劣绅集中到团防开会。此时中共黄梅县委第4中队和东、北区赤卫队200余人已经把团防包围起来了。午饭后，王宗秀把大门一关，另外两个团丁（党员）立即堵住后门。一名劣绅见势不妙，拔腿往外跑，被王宗秀一枪击毙。第4中队听到枪响，冲进团防，活捉了11名土豪劣绅，另1名劣绅在去团防途中也被游击队截获。中共黄梅县委在古角召开群众大会，宣判12名土豪劣绅的罪状，就地处决。这一胜利，使黄东、黄北、黄南的革命斗争猛烈开展起来，广大群众自发地积极报名参加农会和赤卫队。

1930年6月5日，驻武穴国民党军约1个连的官兵，在班长万顺康的率领下起义，改编为黄梅第5中队。6月9日，共产党员王仲甫将国民党军第20军郭汝栋部溃军六七十人枪诱到痢痢岩宿营，并迅速派人报告中共黄梅县委。县委立即带领第4中队和东北两区赤卫队几千人包围了痢痢岩，采取军事威逼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劝其投降，终于迫使该部在6月10日下午下山接受收编，县委宣布该部编入黄梅县5中队，后赴阳新整训，被编到红8军第4纵队。

黄梅县第4中队在斗争中发展到100多人枪，后与开赴黄梅的鄂东游击

大队会合，编入了红 8 军第 4 纵队，使黄梅地区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增强，游击根据地也不断扩大发展。

太平店起义

1930年5月7日，在中共湖北省谷城县委的领导下，太平店（今属襄阳县）地区百余名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9年2月，中共谷城特别区委成立。翌年4月，在特别区委的基础上重建谷城县委，由高如松担任县委书记。县委重建后，认真总结了过去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商讨组建游击队，领导农民群众再次起义，创建以蕪山为中心的谷城红色根据地的计划。5月，高如松等谷城县委领导人来到太平店，同肖元铎商议决定，以太平店农民自卫军为主力，各地游击队配合举行起义，时间定在5月8日凌晨。5月7日，举义之事被国民党当局察觉，肖元凯等来不及与外出安排工作的高如松商议，果断决定提前起义。起义队伍首先袭击了大冲联保处，活捉了联保主任傅光宗等人，缴枪5支。8日清晨进军太平店，包围了区民团总部驻地江西会馆，一枪未发，缴获长短枪20多支。起义队伍为扩大战果，继而攻打太平店团防局。由于被派到太平店作内应的王富民叛变，供出了起义计划，使团防局早有准备，故起义队伍久攻不克，出现伤亡。大冲团防局及太平店附近的地主武装闻讯赶来，使起义队伍腹背受敌。在此紧要时刻，高如松、李庭兰等人率游击队40余人赶来参加战斗，中共老河口区委书记熊玉珩率领10余名共产党员赶来参战。3路农军合力奋战，击溃了民团的包围，缴枪20余支及物资一部，起义告捷。

翌日，肖元凯、熊平珩等在太平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起义胜利。地主团练及反动红枪会趁机向起义农军发起了突然袭击，肖元凯、肖元铎在率队突围中先后牺牲，熊玉珩在战斗中被俘遇害，自卫军大部战死，余部解体，起义终告失败。

浏阳红五月起义

1930年5月7日，在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和浏阳县委的领导下，浏阳县工农武装和红6军一部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30年4月12日，浏阳县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执行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的指示，准备在全县发动红五月总起义，攻打县城。为了统一组织指挥，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将各地的游击队、赤卫队合编为浏阳县赤卫军，下辖6个师。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还在高坪镇万寿宫召开了红五月总起义群众大会。此时，红6军军长黄公略率该军一部在浏阳、万载边界地区活动，得知浏阳县准备发动红五月总起义，立即率部予以支援和配合。5月7日下午1时，进攻县城的战斗打响。赤卫军和红6军一部以县城北的麻衣庙作为突破口，向敌发动猛攻。由于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实施阻击，激战至黄昏城北还未攻下。这时，驻县城不远的敌军从唐家洲方向向县城增援。中共浏阳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命令部队撤至距县城10多里的乌立树下待命。敌人见攻城部队撤退，以为大胜，连夜庆功，直至次晨。浏阳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决定乘此机会，再次攻城，并重新制定了攻城具体计划。天刚拂晓，赤卫军和红6军一部分为数路，直逼县城。此时敌人庆功活动刚结束，正睡觉，突然遭到攻城部队的两面夹击，顿时乱作一团，不知所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捉，大多数慌忙逃出县城，攻城部队迅速占领了县城。随军入城的县苏维埃政府当日便发布镇压反革命，没收反动派的财产，保护商人，人民各安其业的安民告示，城内秩序很快恢复。

浏阳红五月起义夺取了县城，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扩大了工农革命武装力量。

杭县西镇起义

1930年5月19日，浙江杭县西镇区40多个村的2000多农民，在中共杭县县委及西镇区委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到杭州改组了杭州市委并组成杭州市行动委员会，由郑馨任书记，统一领导杭州、杭县、德清等地斗争。会上，部署了以诸暨为中心的浙西起义和省城杭州的总起义计划。

5月12日，杭州市行动委员会在拱宸桥附近茶汤桥召开了西镇区、德清县代表会议，研究部署两地的起义计划。会议决定：将西镇划为塘板村、汤家坝、林家兜3处集结地，然后会合于汤家坝，入瓶窑而余杭、临安或富阳，推动沿途群众起来参加分粮和加资斗争，以对付前来镇压的军警和扩大群众基础。

5月13日晚，中共西镇区委在林家兜召开了约60余人参加的各党支部和农民协会负责人会议，部署了行动时间、路线、打击对象、汇合地点，规定了起义口号和标记等。然后，领导分头深入各地做各项起义准备工作。

5月19日至21日，西镇区40多个村的2000多农民，分4路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各路大军佩戴着统一制发的“实行土地革命”的红袖章，手持猎枪、马刀、锄头、木棍，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

19日，塘板村党支部书记沈老虎率领总管堂、周家埭、吴家库、郭家库、王家门、库头兜和毛家里等10余个村的600多农民，率先开始行动。队伍在谢尚书庙集结后，迅速包围了驻新佛寺的地主武装“保卫团”。愤怒的农民把“保卫团”头子打得躺在地上嚎叫，10多名团丁吓得弃械逃命。首战告捷，缴获了3支步枪、2把马刀。接着又转向毛家里，围住大地主毛阿堂、毛阿有、毛阿高的住宅。毛氏3兄弟，因事先得到情报，逃到杭州去了。沈老虎率众打开3户地主的粮仓，将全部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并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和大量文契帐册。嗣后，起义队伍再开到吴家库，打击了吴心田、张益林两户地主。22日凌晨，起义队伍开往勾庄途中，在小洋坝元庆桥边，与从城村庙赶来镇压的巡察队遭遇，起义队伍被打散。

同日，汤家坝党支部书记俞和尚和农会负责人费善宝率领汤家坝、吴家桥、费家埭、孟家湾、丁家里、孙家角等14个村的400多农民，在汤家坝集结，先后清算了汤家坝的李大富、李宝昌，费家埭的费德彩，东阳村的沈学平、沈学寿，库头兜的俞松春等6户地主罪行，烧毁了大量地契、帐册，开仓分粮2500公斤。

21日深夜，林家兜、栅庄桥也举行了起义。

林家兜党支部书记林杏松率领林家兜、上坝儿、陈家坝、朗家坝、计家兜、陈家角等村的600多农民，先到行宫塘打警察所，因警察闻讯早已逃跑，扑了空。起义队伍旋即折向陈家角，对丁香泉、丁馥泉、丁其寿、丁同寿等4户地主开展清算斗争，烧了大量田契、帐册，开仓分了大批粮食。

栅庄桥党支部书记唐阿毛和袁金毛率领李家桥、徐家坝、南陈家角、盛家墩、洪家塘、朱家角等村的600多农民，由王美泉以吹“嘟嘟儿”（毛竹筒）为号，到姚家圩集结后，对这个村的大地主沈天禄进行了清算斗争，烧文契，分粮给农民。

西镇农民起义，使杭州城内统治阶级惊慌失措，下令全城戒严，晚上9

时起禁止通行。省政府派保安大队、巡警队 800 余人，开到西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者 82 人，其中共产党员 57 名，唐阿毛、袁金毛、沈老虎等领导人也先后被捕，西镇区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起义失败。

漳州北乡起义

1930年5月29日，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漳州北乡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6年冬，漳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1927年1月和12月，中共闽南特委和福建临时省委也先后在漳州成立。在党的领导下，漳州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到1929年初，北乡农民运动已从浦里、吾苍、乌石、金沙等地发展到华安县以南地带，各地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至数千人，并建立了一支农民赤卫队。尤其是乌石等村农会和赤卫队在郑华等人带领下，积极开展斗地主、反征税斗争，影响很大。1930年3月初，王占春、冯翼飞来北乡指导农运，恰遇国民党联团无理刁难和殴打农民。王占春即召集各村农会领导人紧急会议，决定打击国民党联团的嚣张气焰。27日，王占春带领北乡农民赤卫队埋伏在丰乐村附近的公路边，袭击从石亭圩收税回漳州的国民党联团6人，击毙1人，俘5人，缴枪6支。这一行动鼓舞了北乡人民的革命斗志。5月中旬，郑华等人召集北乡、华安县南部的丰山等地的负责人会议，研究武装起义事宜。会议决定成立指挥部，由郑华、高渭南任正副总指挥；5月29日举行起义。

5月29日拂晓，各路队伍陆续进入乌石亭。由高渭南、王汝士带领的乌石、浦尾、塘边、顶高坑、后塘、凤园、山尾、茶铺、后巷等村的农民队伍最先到达，负责放哨和监视联防民团；由郑华、李妙率领的霞苍、竹仔围、丰乐等村的农民队伍和由杨文德、杨文生率领的金砂、吉洋、后林、鳌门、南山、白秋坑等村的农民队伍以及由杨欲德率领的丰山一带的赤卫队员、农协会员也相继到达。起义队伍达3000人，在指挥部的指挥下，立即占领了乌石亭民团团部，并召开群众大会。会后，起义农民在郑华、高渭南率领下游行示威。队伍途经浦尾、乌石、塘边、顶高坑、庵下、仙景、新厝、下高坑、香亭坂、浮山亭、霞苍等村庄，沿途高呼口号，发动与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地主。

北乡起义使国民党反动当局大为惊恐，当天下午即令国民党军第4师杨逢年旅出兵“清乡”。16时，敌军进抵北乡。起义队伍在长岭埔与敌激战后，退至天宝大山梅仔埕。战斗中，赤卫队领导人杨文生不幸被捕，4名赤卫队员牺牲。后这支农民赤卫队集中到吉洋村一带，编为工农游击队，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赣西北红五月起义

1930年5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江西省宜春、万载、铜鼓、宜丰等县发动和领导了工农武装起义。

1929年12月上旬，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决定统一改编边境赤卫队，铜鼓、万载、宜春、宜丰等县分别编成第3、第5、第6、第8等4个赤卫大队。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第1、第2两个湘鄂赣边赤卫军总指挥部。中共湘鄂赣边特委适时提出了开展秋收斗争、年关斗争和春荒斗争的口号，提出了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政策和策略，将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引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1930年2月，铜鼓、万载、宜丰、宜春等县根据特委指示，相继成立工农兵暴动委员会或武装起义指挥部，具体布置起义工作。

在特委的统一组织下，于巴黎公社诞生纪念日——3月18日，赣西北各县举行了武装大示威，史称“3·18”武装示威。3月18日，万载的武装示威按原计划分4路进行。第1路攻击王玉山靖卫团，占领高村。第2路围攻辛拱臣靖卫团。第3路攻进高城，消灭了驻在高城的靖卫团。第4路攻占黄茅，全歼反动武装靖卫团，缴枪90余支。宜春县的武装示威是在县暴动委员会指挥下进行的，数万群众捣毁区、乡反动政权，先后建立58个乡苏维埃，并于3月24日攻克宜春县城，成立了宜春县苏维埃政府。铜鼓在“3·18”武装示威中，组织1万余群众，打垮了竹山六合团，赶走了游扬靖卫队，烧毁了反动团防局的住所和哨所。经过“3·18”武装大示威，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增强了党的力量，起义条件日臻成熟。4月10日，特委在湖南平江黄九区召开边境各县民众团体联席会议，部署“红五月”武装起义工作。

5月间，宜春、铜鼓、万载、宜丰等县先后有数十万工农群众参加了武装起义。

宜春。“3·18”示威之后，地主武装“宜北各乡联合剿匪办事处”和“西路民众联合剿匪队”纠集在一起，企图从北、东、南三面包抄苏区。4月20日，市、新田等地地主武装近万人，分3路直扑飞剑潭。分5道防线严阵以待的宜春5区工农武装和红6大队共2000余人，以诱敌深入战术伏击敌人，毙伤200余人。5月13日，金瑞、洪塘等地地主武装又向盘田苏区进攻。红6大队和各乡镇群众英勇作战，毙敌100余人，缴获步枪6支，鸟铳、梭标100余件，并摧毁设在盘田文昌宫的反动据点“宜北剿匪总部”。

铜鼓。铜鼓的1、2、3区1万多名武装工农参加起义。5月1日，由汤九伦率领的铜1区暴动队2000余人从梁段出发，3日进入浏阳白沙，打击了团防武装，活捉白沙民团团总廖甘桂，打垮了千秋段、黄花洞、石子庵等处的挨户团。5日，抵达白沙镇，镇压了恶霸地主，帮助一些地方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到8日，起义队伍肃清了铜1区境内的反动残余势力。铜2区暴动队打击了棋坪游扬靖卫队。铜3区武装工农5000余人，从曾公庙出发向丰田和县城方向前进。盘据在县城的国民党军第5师独立第1团和警察大队，在全县武装大暴动的威胁下向大段方向逃遁。

万载。万载县工农兵暴动委员会于5月1日发表《为建立苏维埃政府告工农兵贫苦群众书》。这一天，全县除县城和卢家洲外，其他各地均召开了群众大会，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各地豪绅地主纷纷逃往县城、南昌和上海等地。中共万载临时县委决定组织全县工农武装直捣万载县城。5月23日，以红5军和4、5区工农武装为一路，以红5大队和1、2、3、6区的

赤卫队、少先队为另一路，两路共计9万余人直扑县城。28日黄昏激战开始，踞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第5师独立团的1个营，在起义队伍前后夹攻下伤亡甚多，且战且退。8时许，起义队伍占领县城。第2天拂晓，敌军重整残部从东门反扑。红5军和赤卫队奋起抗击，在红6大队的支援下，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歼敌400余名，缴步枪400余支，机枪4挺，七星炮6门，敌营长林振东、靖卫团分队长王宝山等均被击毙。随后，暴动队打开监狱，释放了70余名无辜群众，并将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贫苦群众。6月1日，红军和赤卫队相继撤离县城。

宜丰。4月下旬，中共宜丰特区委部署了“红五月”起义的任务。5月7日晚，在刘小青、管仁义率领下，天宝、潭山、逍遥、找桥、石桥、李家坪一带工农群众1000余人，分路向黄岗进发。8日凌晨，起义队伍从东、西两面向黄岗夹攻。由于叛徒告密，驻守黄岗的靖卫队事先逃走，起义未达预期目的。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宜丰特区委于5月中旬从修水的麻洞、祥云，铜鼓的高岭、龙门，奉新的长坪、西塔、百丈，挑选赤卫队员1400余人，在找桥集中整编，正式成立宜丰特别区赤卫军总队，并以原宜丰游击队为基础，成立特务队，向修水、铜鼓、宜丰、奉新4县边界反动势力进击。30日，宜丰特务队、红8大队、赤卫军总队2000余人，分3路向陈雪率领的天宝民团进攻，陈雪闻讯逃跑，队伍随即打进潭山，活捉大土豪刘作宾。

从“3·18”武装示威到“红五月”武装起义，是赣西北地区当时群众发动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行动，有力地推动了赣西北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

南平民团起义

1930年5月，在中共广东琼崖特委和乐会县委的策动下，国民党乐会县第6区南平民团团团长蔡太初率领100多名官兵举行了起义。

1930年初，中共乐会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恢复乐会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针对当时国民党民团活动猖獗，革命根据地受到威胁的情况，一方面采取武装打击的方法，寻机消灭；一方面采取思想教育和组织渗透相结合的方法分化瓦解。2月20日，乐会县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合团兵书》，号召国民党民团的团丁“倒戈哗变，响应工农，携械来与工农合作”。4月3日，乐会县苏维埃政府又发表了《敬告兵士团丁书》，希望国民党军士兵团丁“走革命的正确路线，在镰斧旗帜下，共同奋斗”。在中共乐会县委兵运工作的影响下，一些国民党民团团丁倾向革命，希望投奔红军。

5月，中共琼崖特委常务委员冯国卿受特委的派遣，前往乐会县开展兵运工作，组织兵暴。乐会县委多次派人与乐会县6区南平民团团团长蔡太初秘密接触，启发他弃暗投明。经过反复动员教育，蔡太初于5月的一天，率民团100多名官兵，携带36支步枪，举行起义，投奔红军。

这次起义，削弱了乐会县国民党军的武装力量，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对于恢复乐会县各区乡苏维埃政府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襄枣宜起义

1930年5、6月间，在中共鄂北特委的领导下，枣阳、襄阳、宜城等县农民自卫队及农民武装相继举行了多次起义。

1930年2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聂洪钧主持召开了鄂北临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恢复和重建一些县的党组织和准备武装起义。3月底，中共襄阳、枣阳、光化、均县、谷城等县委均已建立起来。4月7日，临时特委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北特委，聂洪钧任书记。同时决定襄、枣、光、均、谷等5县同时举行起义，时间定在5月5日。

1930年4月，中共鄂北特委派特委委员杨秀阡去枣阳指挥起义事宜。中旬，中共枣阳县委决定，首先在枣阳西部重镇蔡阳铺举行起义，从团防局开刀。中共鄂北特委同意了这一行动计划，并要求邻近各县密切配合。

襄、枣、光、均、谷联合起义总指挥袁恕堂、中共鄂北特委军委书记张履中等人，于5月5日起义前夕，在光化袁恕堂家召开指挥部会议，商议起义具体计划，遭到民团的突然袭击，袁恕堂等领导人当场牺牲，因而5县联合起义未能按期举行。5月7日，中共谷城县委在太平店组织了农民起义，一度占领了太平店。后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下失败。此后，特委又派人赴各县督促起义。

蔡阳铺是枣阳的最大反动据点，有5个班的兵力，且沟深墙高，易守难攻。5月13日，蔡阳铺民团内应徐朝龙、吴成林给中共枣阳县委送来情报：团防局刚从外地运回了一批准办商团的枪支弹药，有2个班随团总外出未归，寨内兵力空虚。县委当即告各党支部迅速带自卫队到解家畈集中，并派人到襄阳黄龙请求支援，决定第二天举行起义，攻打蔡阳铺团防局。14日上午，枣阳农民自卫队和赵英、谢耀武带领的襄阳县黄龙农民武装数百人，暗藏各种武器，随同赶集的人流混进了蔡阳铺，在杨秀阡、余益庵、赵英、谢耀武等人的率领下直扑团防局驻地及各自预定的攻击目标。杨秀阡率人在团防局门口干掉了站岗的团丁，冲进团防局，徐朝龙、吴成林见农军已到，即大声嚷道：“共产党来了，快跑！”团丁们顾不得进屋取枪，纷纷夺路而逃或举手投降。余益庵率人围攻团总余继良的住宅，余已闻讯逃走，缴得手枪1支及商团枪支登记册。守候在寨外的农民自卫队员听到枪声，纷纷从四面八方冲进寨内，捉拿散兵，按枪支登记册逐户收缴枪支，安定秩序。

蔡阳铺起义，共缴获长短枪43支，子弹万余发及大批物资。当天下午，起义队伍又乘胜攻克翟家古城、踞家湾两个团防据点，取得“日克三镇”的胜利。5月15日，农民自卫军在高桥铺休整，改编为枣阳农民自卫军总队，杨秀阡兼任总队长，余益庵任党代表，下辖第13、14、15大队，共170余人，160余支枪。

蔡阳铺大捷，部队士气十分高涨，四周的中共组织和群众纷纷要求起义。自卫军总队领导为了继续向襄、枣、宜边区发展，答应了中共黄龙挡组织的要求，决定攻打襄阳县黄龙挡团防局。5月16日晚，自卫军总队即向黄龙挡开进。总队在黄龙中共组织和起义群众的配合下，分成4路把黄龙挡团团包围起来。拂晓时分，总队下达攻击命令，部队便一齐向黄龙挡发起进攻，经激战4小时，歼灭大部分团防武装，缴枪100余支。战斗中，总队长杨秀阡不幸牺牲。

黄龙挡起义胜利后，枣阳农民自卫军总队发展到500多人，400多支枪。

根据中共鄂北特委的指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9军鄂北第5总队”，谢耀武任司令员，余益庵为党代表。第5总队为了建立巩固后方，先后歼灭蔡阳铺、据家湾、翟家古城等残余民团武装，击溃襄阳、枣阳、钟祥县大小团防武装千余人的反扑，使枣西、襄东联成了一片。

6月，中共鄂北特委派张香山到第5总队负责军事工作，决定部队向南挺进。此时，襄（阳）宜（城）边界的王家集地区的农民群众，在中共地下党员王全成等领导下，准备发起起义。第5总队领导人和王家集中共组织负责人共同商议后，决定先智取王家集，后集中兵力攻打胡家营。6月21日夜，第5总队一部在王家集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占领了王家集。时任王家集团防局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全芳，带着部分战士收缴步枪30余支。与此同时，第5总队主力和起义农民已将胡家营团团围住。王家集得手后，一声枪响，发起了连续的猛烈攻击，22日凌晨，攻占了胡家营，活捉了胡子清等大小反动头目6人，缴枪50余支。

6月25日，第5总队在陶山庙整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第26师，张香山任师长，余益庵任党代表。全师800余人，600多支枪。下辖5个总队（旋即改为4个团），1个手枪队。部队整编后，乘胜向南挺进，连续摧毁了宜东、枣阳、钟北等地区的大小反动据点，开辟了襄枣宜苏区。

罗家咀起义

1930年6月6日，中共安徽桐城县委在庐南罗家咀组织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

1929年6月间，中共桐城县委作出了《发展党的组织与发展军事组织齐头并进》的决议。为了武装自己，陈雪吾、王淀华、张顺卿等18人，在中共孔城镇党支部书记章德高的配合下，于1930年2月1日的晚上，缴了孔城商团18支长枪及其他军用物资，连夜运往方家仓藏起来，为武装起义作了准备。1930年5月初，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在桐城县会宫堂石村（今属机阳县）的疏小娘家，召开了怀宁、桐城、庐江、潜山、太湖、宿松、贵池等8县联席会议，决定6月组织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会上还决定将桐城起义武装编为鄂豫皖边区红军独立第3师第2团。这年5月，桐城县委在城内汪家试馆召开了军事扩大会议，会上陈雪吾宣布省委指示：成立皖中工农红军独立团，团长陈雪吾，政委章逐明，副团长朱锦明，副团长兼参谋长张顺卿，副政委吴克正，政治处主任刘子丹。会议决定在庐南举行起义。

1930年6月6日，起义人员分3路向庐南罗家咀起义点集中。陈雪吾、张顺卿、陶国器、朱锦明、吴克正、邢炳坤等40余人从观堰隔对过唐家湾黄土岗取出隐藏的武器，乘渡船经麻布河上游到府君庙，因风向不顺，迟到了两个多小时；吴大章、周正超、孔城镇的北三队、桐城县高木匠8人先到了府君庙；胡芳远从桐东七家山集中了中共党员30多人，因吴西胜驳壳枪走火打伤了腿，延误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府君庙。当晚，共集中了70多人，都是党团员，有长短枪29支。队伍组编后由府君庙塾师郑良模当向导，越过母子坟，向庐南罗家咀进发。按原计划，拟赶到七桥，夜间围歼慈善庙张晏清民团，但到了李家石桥天就亮了，部队只好在罗家咀村隐蔽休息。罗家咀的地主李静甫，表面装得老实，暗地里却派人溜出去报告了张晏清、张栋才两个商团。二张联合，纠集了地主武装百余人，于7日上午8时许，包围了罗家咀，陈雪吾组织突围，且战且走，打死打伤敌人20多人，还抓了5个俘虏。在突围中，王靖江不幸牺牲，村里留下掩护的人员终因弹药告尽，又无援兵，张孟卿、吴大章、周正超、高木匠、北三队等8人被俘，后张孟卿英勇就义。陈雪吾突出重围后回到红军独立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淮北三乡起义

1930年6月13日，中共安徽徐海蚌特委和宿县中心县委在宿县百善、临涣两区（今属淮北市）的胡楼、徐楼、叶湖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1924年以后，宿县临涣、百善一带就有了党的组织。1926年初，建立了临涣独立党支部，随后又建立了中共临涣、百善区委，下属十几个支部。这一带农民运动轰轰烈烈，仅临涣区农民协会的会员，就曾发展到四五千人。中共皖北特委和徐海蚌特委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农民运动，决定以胡楼、徐楼为中心发动农民起义。1930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宿县时属江苏省委领导）军事委员李英（当时都叫他李军委）和宿县中心县委的丁禹畴等到百善西南的胡楼村，与当地党的负责人陈钦盘等人，研究举行起义问题。他们计划在宿西、宿东同时举行起义，准备在起义前搞起1个武装暴动营，掌握起几百条枪。起义时间定在6月15日。6月12日下午，国民党宿县县卫队2人、百善团防队10个团丁和地保，突然窜到胡楼逼缴烟款。组织起义的陈钦盘等人认为时机已到，当即组织暴动队员，将他们13人捆绑起来，缴获钢枪9支。事发后，临时研究决定，提前2天起义。6月13清晨，几十名起义农民联合起来成立了第1排，排长陈宜谦。然后向前赵营村前进。到了前赵营村，参加起义的几十名农民群众，又成立了第2排，排长赵殿章。两排起义农民一起汇集到寨外的场上，宣布成立了工农红军第15军第8团第1连，李英任代理连长，陈钦盘任指导员。近百名起义农民中有六七十名手持长短枪，其余的拿着大刀、长矛、棍棒。起义队伍向百善进发，攻打百善区团防局。由于敌团防兵在炮楼上拼命扫射，起义队伍又撤向徐楼。这时，起义队伍已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为防止临涣民团的偷袭，起义队伍转移到叶湖。14日拂晓，敌团防队将叶湖村团团围住。李英、陈钦盘等带领队伍进入村中的炮楼迎击来犯的敌人。由于起义队伍枪弹有限，为了保存力量，待机再起，起义队伍分别从各处突出重围。由于白色恐怖笼罩，突围出来的队员各自分散，起义失败。

东坑起义

1930年6月13日，在中共信江特委的领导和闽北民众会的支持下，江西省铅山南境的东坑农民举行了一次历时百余天的武装起义。

1930年1月，已加入闽北民众会的余水发、黄凤防、周茂祯回到家乡东坑开展革命活动，动员贫苦农民参加民众会组织。不到两个月时间，仅在东坑至石垅一带，就从农民和手工业者中发展民众会会员100余人。6月，将民众会会员编为1个连，余水发和闽北民众会的夏幼盛被推为正副连长，同时，成立了起义指挥机关——农民革命团。

6月13日上午，余水发、夏幼盛、黄凤防、周茂祯等率领民众会和前来支援的闽北民众会会员共100余人，手持大刀、长矛、雷火枪，高举红旗，集合于东坑。会员们高喊着“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向篁村涌去，首先捉拿了被人们称为强盗的地主程翰，当场筹了他的款，拉开了起义的序幕。下午，起义队伍奔向石垅，没收了杨村大地主秦鹤年在曹家设立的粮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第2天，起义队伍向天柱山方向进发，并在美景庵买下国民党逃兵丢下的一条长枪。第3天，起义队伍又折回由紫溪向杨村方向挺进。他们所到之处，惩恶霸、斗地主、缴浮财。在杨村高际杀了罪恶多端的地主刘仁和，在陈家寨横溪捉拿了豪绅余天发。群众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有的土豪劣绅为了赎罪，主动交了现洋和其他物资。为了取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7月9日，余水发、夏幼盛等10余人前往中共信江特委汇报请示工作。信江特委领导人方志敏、黄道等一面与余、夏研究组建红军事宜，一面派中共党员陈其富等人随周茂华前往铅山南部了解情况，建立了中共东坑党支部，周茂华任支部书记。这期间，起义队伍在丁良富、林芳祥等人指挥下已挺进篁碧，矛头直指国民党铅山保安团第3支队（篁碧祝诗泉守安队），守安队溃不成军，四处逃散。暴动队缴枪5支。接着，起义队伍又捣毁了国民党杨林乡公所，缴枪4支。

农民起义后，国民党靖卫团和当地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起来，对暴动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7月14日，吴仰山靖卫团200多人丧心病狂地举着火把，从石垅一直烧到东坑，数百名群众无家可归。月底，起义队伍回兵石垅，将敌击退。

8月7日，方志敏指派陈其富带30余支枪的红军队伍，随余水发、夏幼盛等回铅南，增援暴动区；并批准东坑起义武装组建红军连，由余水发、夏幼盛任正副连长；同时授命陈其富等前往石垅成立中共南岸特别支部。余水发等8日抵铅山，重率一支队伍返至石垅，途中与国民党重碧守安队遭遇，经近一天战斗，毙敌百余人，余部逃命。起义队伍乘胜追击，又打垮港东守安队，缴枪20余支。接着，又追敌至湖坊，摧垮了正拟出动增援的湖坊守安队，缴枪30余支。至此，起义队伍歼敌近2个连，缴枪百余支，起义队伍武器倍增，人员发展到400多。

正当起义队伍分头出击时，8月9日，混入民众组织的坏分子谢金苞假借开会名义将起义发起人余水发骗至刘家山葛仙庙杀害。湖坊获胜的起义队伍闻讯后，迅速回兵石位，被敌加强的守军封锁，起义受挫。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起义队伍不得不分散隐蔽，陈真富率中共南岸特支工作人员撤回信江北岸。此时，中共赣东北特委派出中共党员汤维新、黄怀仁前往新滩西贩一带活动，于8月中旬在西贩的新湖塘成立了中共铅山临时县委、铅山县苏

维埃临时政府，将革命推向铅山、横峰边界地区。

为巩固铅山方面的起义成果，加强对起义区域的领导，建立起以石垅为中心的信江南岸革命根据地，中共赣东北特委于9月初先后派出赵伯友、朱凤山带领一支有20多支枪的游击队，协同周茂祯、黄凤防、林芳祥、王贵等率领的起义队伍从信江北岸回到东坑和石垅。他们回到东坑后，立即召拢了四处分散隐蔽的起义人员，宣布成立了南岸革命委员会，朱凤山任主席，赵伯友、陈其富等5人为委员。接着，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同时，在东盘、乌石等地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织。

不久，铅山境内的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光泽等地的反动武装千余人攻打石垅。但南岸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早有准备，几百军民埋伏在青山两岸伏击敌人，毙敌200余人，缴枪百余支，并就地枪决了杀害余水发的叛徒谢金苞。

10月上旬，闽北游击队与赣东北游击队在东盘会合，歼灭了吴仰山靖卫团的梭标队。此后，铅山暴动区由南而北从武夷山经由杨林到新滩一线成了闽赣革命根据地通道。不久，南岸游击队编入了红10军。南岸革命委员会在起义中又重新组建了一支游击队。从此，石垅及其附近的暴动区成为信江南岸第一块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中共铅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由信江北岸横峰境内的港西迁入石垅。这里成了铅山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在中共铅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加强了暴动区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先后建立了12个区委和100多个支部，党员发展到2100余人，成立了3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

长汀东部起义

1930年6月14日，中共福建省长汀县委在该县东部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3月，红4军首次攻占长汀。在红4军前委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共长汀县委，王仰颜为委员。1930年2月26日，汀东游击队正式成立，队长王仰颜。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汀东游击根据地，王仰颜率领汀东游击队于4月攻打与汀东毗邻的清流县城，活捉了县长，缴枪40余支。

汀东游击队从清流回到新桥后，王仰颜于6月14日领导新桥、彭坊、馆前、淮土、根竹、曹坊、滑石等地农民2000多人，集中于新桥大岗坪举行武装起义。大会上，王仰颜当众烧了自己家里的田契、债据。会后，王带领队伍攻打了彭文富、严洪盛等10余户土豪的住宅，开仓分粮，分浮财。后成立了汀东革命委员会，汀东各乡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将汀东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5团，后又整编为闽西红军第20军第5纵队，王仰颜任纵队司令，罗化成任政治委员。

蕪北起义

1930年6月21日，湖北省蕪春县北部一批共产党员，在田家桥、何家铺等地组织领导“皖西游击师第8大队”和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9年3月25日，蕪北第一个中共支部在詹家山成立，由詹文卿任支部书记。1930年初，秘密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300余人的群众武装。不久，被红11军第33师（后改为红1军第3师）授予“皖西游击师第8大队”的番号。委任詹文卿为大队长。5月31日，詹文卿主持召开了各路起义军的领导骨干会议，商讨了武装起义计划。决定起义时间为7月10日左右；将游击大队按地区划分为5个分队，指定了分队负责人；成立火药局，负责制造火药和铤子。届时在田家桥、何家铺同时举行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由于情况有变，决定提前于6月21日发动起义。

是日清晨，起义队伍兵分两路，詹文卿率领第1路游击队包围桥上湾民团，团丁闻讯逃跑，游击队没收了土豪劣绅的粮食、钱财，搜缴手枪1支。何寿堂将第2路游击队分为两队行动。一队由柯有为率领埋伏于何家铺东面之矮子山；另一队由何寿堂率领直插唐山。民团团总陈少仁见势不妙，便率领10余名团丁逃出何家铺，企图抢占矮子山据险顽抗。刚到山下，便遭到柯有为游击队的伏击，陈少仁慌忙逃往国民党张塋区署。起义队伍迅速占领了何家铺。23日，两路起义队伍会师何家铺。此时参加起义的群众甚多，从中挑选了精干的武装350余人。24日、25日，两次击溃了张塋区署宋滇民团的进攻。

团防连连受挫，全县为之震动。26日，国民党蕪春县政府急派县保卫团1个中队会同宋琪团防共300余人，分3路“围剿”。起义队伍因武器简陋，只得且战且走，血战7昼夜，退至詹家山。7月3日，在火岗尖被保卫团和民团包围。詹文卿果断决定，由他负责带队掩护，命何寿堂、田南村率游击大队突围去英山与红军会合。经过拚死激战，队伍伤亡严重，柯有为牺牲，所剩人员趁黑夜分散突围。詹文卿前往大湖，途中被俘，于7月19日英勇就义于张塋。

何寿堂、田南村等突围到英山后，重新组建了蕪北第8游击大队（亦称纵队），田南村任大（纵）队长，何寿堂任政治委员，余赤存任政治部主任，宋献庭任后勤部主任，下辖5个大队。后与英山县第4游击大队合编为工农红军独立第1师第5团。后来，何寿堂、田南村率“红5团”蕪春籍战士返回蕪北，成立了大同区革命委员会（时属中共英山县委领导），何寿堂任主席。“红5团”迅速发展到了700余人，开辟了蕪北苏区。

宁化起义

1930年6月23日，中共福建省宁化县党组织在该县西南部的曹坊、城关、禾口等乡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3月，红4军解放长汀。中共长汀县委派共产党员徐赤生回宁化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徐赤生发展了王子谦、吴祖宽、曹国昂、谢芳辉等进步学生加入共产党。尔后，王子谦回西乡的禾口、淮土，吴祖宽在宁化城关、城郊李七坑，谢芳辉回泉上乡，徐赤生和曹国昂返曹坊秘密发展党组织，建立农会。1930年春，红4军进入宁化县城，推动了宁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当年春，宁化各支部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组织起义，并决定首先在曹坊发起。曹坊与长汀毗邻，受长汀、龙岩革命形势的影响大，便于取得长汀党的领导和红军接应，同时，国民党曹坊民团已被争取，可以起义。

6月23日，曹坊起义队员70余人，在徐赤生等人领导下，分两路到燕子凹、彭家庄迎接红4军。在红军帮助下，起义队员手拿枪支、鸟铳、梭镖、大刀等包围了土豪的住宅，筹款废约，破仓分谷，并在曹坊成立了南乡革命委员会，曹廷勋任主席。

25日，城关、禾口、淮土、李七坑等地农民在红4军第2纵队的帮助下，也分别举行了起义。禾口起义队员在红军的支持下，分两路打土豪筹款，收缴禾口民团和大土豪的枪支弹药，并建立了西乡革命委员会，张馥任主席。城关百余名队员举行了示威游行，然后分几路收缴民团枪支，没收土豪财产，破开国民党县政府的几个大粮仓，分谷救贫。淮土的凤山、水东一带农民也举行了起义。

27日，宁化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志农任主席。7月1日，中共宁化特区委成立，书记徐赤生。5日，各路队伍集中于曹坊小罗溪，徐赤生主持召开特区委扩大会，决定成立宁化赤卫大队，罗世耀任大队长，徐赤生兼任政治委员，下辖城关、禾口、淮土、曹坊4个中队，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保卫起义成果。

陆良起义

1930年7月3日，在中共云南省陆良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旧州、三岔河、马街等地千余名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9年初，云南省军阀在昆明制造白色恐怖。中共云南临时委员会根据这一形势，决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并先后派共产党员吴永康、康建侯、徐文烈、王启瑞、赵光明等到陆良县加强党组织的领导，使该县先后组织了禁烟会、学生会、狮子灯团等群众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农运、学运和兵运工作以及抗粮、抗捐斗争的发展。1930年春，中共陆良中心县委成立，吴永康任书记，李希白、王启瑞、赵光明、徐文烈等任委员。在旧州建立了兵委会，吴永康任主席，康建侯、方鹤鸣任委员。至6月，中共陆良中心县委已掌握了1000多人的武装力量，具备了起义的条件。经云南临时省委同意，转将这支武装力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8军，吴永康任军长，军下设政治部。陆良中心县委决定7月3日起义。3日晚，康建侯率领西路300多人，击毙板桥警察分局局长卢永庆等4人，解除警察所的武装。接着进攻旧州，打死民团首领李兰亭后，向县城进发。吴永康率领东路700多人攻打团防大队，因泄漏消息，遂中止行动，未能按计划进攻县城，使西路攻城的康建侯撤出战斗，转移到白鹤铺山。这时，曲靖、沾益等地的反动民团200多人包围白鹤铺，起义军被打垮，方鹤鸣等7名起义领导人惨遭敌人杀害。

建德起义

1930年7月6日，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领导浙江省建德县农民，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30年2月，中共浙西特委委员姚鹤庭到建德，改组县委，姚任书记。会后，姚鹤庭亲赴上海请原县委书记童祖愷回县参加领导起义，童祖愷于5月9日回到大洋。接着，县委在唐家埠召开骨干会议，决定举行起义。

5月下旬，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来建德组织领导起义。6月初，由卓兰芳主持在大洋行台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中旬，卓兰芳又在童祖愷家召开有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近百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提前举行起义，30日左右，卓兰芳传达中央文件，宣布撤销县委，改为“行动委员会”。

6月中旬，正值青黄不接，春荒严重，地主囤积居奇。“行动委员会”抓住时机，积极发动农民开展分粮斗争。童祖愷、徐海定等人假借麻车埠大地主徐金涛名义，写了告示，四处张贴，说是有谷出售。几百农民见了告示，纷纷挑着箩担，背着布袋，从四面八方涌到徐金涛谷仓附近。徐金涛见此情势，只好叫弟弟徐金喜来量谷。开始量谷付钱，后来群众见徐金喜丈量不足，怒从心起，干脆就自装自挑，满满1仓数百担稻谷当天全被分完。此后，分粮斗争势如破竹，很快波及东区、南区、西区各地，全县参加分粮群众达万余人，分粮千余担。分粮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奠定了起义的思想基础。

7月5日，卓兰芳主持召开了起义前的紧急动员会议，作了部署和分工。并成立起义指挥部，卓兰芳、童祖愷、姚鹤庭为总负责。下设洋尾、大洋、麻车、三都4个大队。

起义首先从南区的洋尾开始。7月6日拂晓，洋程、荷畝桥、外蔡、深坞、洋尾埠、唐家埠、上坞、下坞、王村等地170余人，加上麻车、三都的暴动队员共300多人，臂缠红布，手执竹叶枪、大刀、木棍，肩扛土枪、土炮，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汇集洋尾埠白石殿。会上，卓兰芳、陈昌荣作了简短讲话，部署战斗。起义开始，房森仪等人首先砍断洋尾对岸的电话线，切断敌人通讯联络；禁止江上船只来往，封锁建德和兰溪之间的水上交通。接着，农军抄了洋尾埠大地主陈润德开的“陈仁和”店铺，没收其粮食、钱财和衣物，发给穷苦农民。里童农军30多人，由吴树立、童有根带领，先到高楼厦收缴了地主徐成钧家的1支土枪，焚烧了其全部土地陈报清册，继之缴了该村保卫团40多支土枪。下午3时许，在洋尾埠抓获从大洋乘船外逃的恶霸地主谢汉昌、谢章照，其随身所带的两皮箱文书、田契、借条等，当场被付之一炬。其后谢汉昌、谢章照被处决在洋尾埠码头柏树下。4时许，从下游深坞窜来二三十个警察，向洋尾埠开枪，农军当即向敌人还击，警察溃逃。晚饭后，农军派出4个队，每队20多人，分别到金沙岭、九龙湾、深坞、江背等地驻守。

7月10日，卓兰芳和100多农军，在血岭遇到国民党省保安队1个连，双方开枪打了1仗后，农军撤退。下午，从洋尾上游摇来两只蓬船，快靠洋尾岸时，从船里跳出100多敌人打排枪，火力凶猛，农军撤到同佳桥坚持战斗，终因敌我力量和武器优劣悬殊，战斗失利，被迫撤退。这一天敌人到处搜捕农军，一直到天黑才离去。卓兰芳遂于7月16日辗转至梅城，后由房森林护送去义乌。

与洋尾农军起义的同日晚上，大洋、麻车、三都相继举行起义。大洋起义，由童祖恺指挥。7月6日晚上，大洋、小洋、突沙、杨村、里王、徐店、胡店、西坞、南山、行台、塘下等村共三四百人，携带武器，扛着红旗，汇集于胡公庙召开大会，童祖恺讲了话。次日凌晨，大洋公安局10来个警察闻风而逃，农军未发一弹，缴获全部枪支弹药，并把分局里的所有物件搬出烧掉。然后，在童家祠堂集合，由童祖恺宣布编队、布防。

7日，大洋镇上的农军在黄梅、涂火林的带领下，抄了镇上“严裕丰”等4家布店，没收了店内的布匹、衣物等，并当场烧掉了帐册。8时许，兰溪方向开来1只敌人汽艇，农军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汽艇被土炮打中后逃逸。

8日上午，麻车方向发现敌人，要求支援。童祖恺即派部分农军，由谢樟荣等带领前往。农军赶到乌淇头，即与对岸麻车埠的军警接火，战斗了20分钟，农军的土炮一炮轰了过去，掀掉土房一个屋角，吓坏了军警，便沿江逃去。对岸麻车农军紧密配合，夹追逃敌。农军追至三河，见敌人已从对面将军岩逃回兰溪，即到三河镇街上烧了“朱同丰”“倪悄泰”等几家商店的帐册，然后返回大洋。下午三四点钟，县保安队1个连，分3路“围剿”大洋农军，农军在童祖恺和姚鹤庭带领下进行顽强抵抗，尔后，往上源撤退。

7月6日晚，麻车农军，有高垣、麻车等地100余人，在徐海定指挥下，在高垣祠堂集中。夜9时许，农军在高垣村鸣枪起义。先将恶霸地主吴遂良5间楼房和地主吴竹清3间楼户放火烧掉。接着，奔袭江山村，缴大地主徐金涛的枪。徐已闻讯逃遁，遂将徐金涛家的36间楼房全部烧了。

7日，农军先到麻车埠广济庙门口集合，由队长吴颐生整队分配任务，农军分成3路。下午三四点钟，支援大洋的农军百余人，返回麻车烧掉大地主徐金涛开设在麻车埠的油坊屋14间。

7月6日，三都农军有三都、下二都、塘下山、宋村山、下塘、郑家垄、松口、小里埠等村八九十人，先到洋尾参加起义。后由鲍宝晶和朱增球带领，于晚上七八点钟返回三都，攻打三都公安分驻所，打死警察1名，缴获全部武器并烧了分驻所。

第2天早上9时许，农军30多人途经马宅，把财主李相湖的房子烧掉。此时，县保安队30多人尾追上来，到马宅外的上姚村开始打枪。农军即埋伏在马宅村前溪坑里，等保安队进入伏击圈时，农军开枪射击。7月8日傍晚，国民党建德县武装军警100多人赶到三都镇压，农军早已转移，扑了个空。

7月13日晚，西区的郭村、西洪、樟村、昂畈、高岭、屋基畈、坑口等村200余人，在郭村外白云庵集中。农军首先冲进郭村，将土豪许免卿家里的田契、帐册和部分家具焚烧。并烧毁了许家大楼。接着，童祖恺、姚鹤庭率百余人向洋溪发起进攻，顿时枪声大作，喊声震天。洋溪公安分驻所警察闻声，丢下全部枪支仓皇逃命。

全县各地的连续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国民党建德县政府和县党部，急忙向省政府和省党部乞讨救兵。7月15日，省保安队第3团第2营到建德伙同当地军警镇压农军。建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40余人被捕，30余人惨遭杀害。

景德镇起义

1930年7月6日，中共赣东北特委和浮梁县委在景德镇组织发动了工人武装起义。

景德镇地处江西省东北部，是连接皖赣两省的咽喉要地。景德镇各行各业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有组织的工人达4.5万人，工人运动轰轰烈烈。仅1928年和1929年的两年内，在中共赣东北特委和浮梁县委的领导下，工人罢工斗争达20余次，参加者少则数百人，多则几万人。1929年12月中旬，由于赣东北特委遭到破坏，景德镇的工人运动受到挫折。

1930年6月，重建的中共赣东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恢复中共浮梁县委的同时，成立了景德镇总工会筹备会和工人纠察大队。恢复和发展党员80余人，召开了各行业工友代表大会和党的活动分子会，加紧筹划景德镇工人武装起义。景德镇地方党组织一面派人赴信江苏区，向方志敏等报告夺取景德镇的计划，一面抓紧部署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7月4日凌晨，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率领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主力从弋阳芳家墩向景德镇进发，于6日拂晓前赶到了景德镇的东郊里村。这天早晨，红军独立团和工人纠察队兵分5路由马鞍山经杉树巷向市区中心推进。一路从单栅门经苏家弄直插国民党浮梁县政府；一路从周路口插到吉安会馆（今戴家上弄）、广肇会馆（今五间头上弄），以堵截右警察分驻所；一路从莲花炉插到宁国会馆以控制左警察分驻所；一路从莲花坊分道经龙缸弄插向设在“龙珠阁”的浮梁县公安局及其消防队；一路从彭家弄直插驻扎在湖北书院（今彭家下弄）的浮梁县保安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红军独立团和工人纠察队先后占领了国民党浮梁县政府、县党部和公安局、电报局等机关，全部解除了县保安队和警察的武装，俘县保安队等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10余支，子弹数千发和大批军用物资。并打开监狱，释放300多名被关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

起义胜利后，中共浮梁县委召开了全镇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总工会。7月7日，全镇工农群众在莲花扩广场举行集会，庆祝胜利。中共景德镇市委宣告成立，李杰三任书记。中共浮梁县委书记另由刘惠民担任，县委下辖7个区委。与此同时，在市、县、区、乡各级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市苏维埃政府主席余金德。浮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陈元调。县苏维埃政府下设里村、晚田埠、柿家湾、旧城、麻石亭、罗家桥等7个区苏维埃政府。此外，还成立了镇总工会和浮梁县农民协会。不久，方志敏率红军独立团和景德镇参军的1000余名瓷业工人和其他劳苦群众回师弋阳苏区，并于7月22日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

景德镇起义的胜利，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红四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黄林起义

1930年7月8日，中共京东特委和玉田县委领导发动了玉田黄林起义。史称玉田第2次起义。

自1928年开始，玉田连续3年遭受旱涝灾害，粮棉严重减产，农民生活极为困苦，国民党反动政府和豪绅地主趁机加收捐税和地租，广大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共玉田县委领导农民开始减租、减息、减税斗争，斗争的胜利促进了共产党与共青团组织的发展。至1930年夏，全县组建了中共区委3个，特支3个，有170多名共产党员，80多名共青团员，工会、农民协会组织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共京东特委和玉田县委决定“全党行动，立即暴动”，并拟定了首先夺取玉田县警察局武器的起义计划，从全县党团员中挑选48名政治可靠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红军，玉田县委委员张茂廷为总指挥，刘铭阁为副总指挥。7月8日，乘县警察局成员在玉田庙会看戏的机会，张茂廷率领20多名红军战士突然冲进警察局，缴枪7支，子弹200多发，尔后撤出县城。10日拂晓，京东特委书记叶善枝，顺直省委军事委员章肇熙与张茂廷、刘铭阁指挥以48名红军战士为骨干组成的100多人的起义队伍，在玉田黄林起义。经激战，活捉地主张楷等人。但由于起义队伍缺乏战斗经验，加之枪支弹药少，在反动武装的反扑下被打散，刘铭阁被捕后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旧州起义

1930年7月9日，由中共江苏省邓县县委领导，在旧州举行武装起义。

旧州，地处邳（县）、睢（宁）交界处（今属睢宁县，称古邳）。1930年5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徐海蚌特委；要求“坚决的去领导和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发动罢工、兵变、农民暴动，发动到地方暴动。”6月13日，省委又发出第23号通告，要求“徐海、通海两区要以徐州、南通为中心布置地方暴动。”7月6日，中共邳县县委在旧州北边炬山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宣布县委改为行委，王树璜任书记兼起义总指挥。将300余人的农民武装组成3个起义大队。起义定于7月7日在旧州土山镇举行。因连降暴雨，县委于8日夜在许党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起义时间改为7月9日，地点改在旧州，以在敌区公所做内应的乔庆环（中共党员，敌区长卢印堂的亲戚）鸣枪为令。

7月9日拂晓，起义队伍兵分3路，陆续化装进城。8时左右，董秀生率领的第3路50多名起义队员在向区公所逼近时引起敌哨兵怀疑，敌区队长下令开枪。队员许文藻（中共党员）等为先发制人，击毙敌班长王占元及一哨兵，起义队伍随即冲进区公所。正在同敌区长卢印堂聊天的乔庆环听到枪声后，迅速夺下卢挂在墙上的手枪，把卢击倒在地。石岐山、王恒大带领第1路队伍攻占镇公所，因反动武装人员外出吃饭，队员们逮捕了留在屋里的敌队长及吃饭返回的几个人，缴获13支枪和全部弹药，随后赶至区公所与董秀生会合。这时，未被打死的卢印堂乘机逃跑，并纠集敌乡练土匪武装进行反扑，驻扎在西街的睢宁县7区保安队也派1个连前来镇压。余耀海、张渠川率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2路队伍，因缺乏武器弹药及作战经验被迫撤退。王树璜在战斗中牺牲。在敌强我弱的险恶形势下，张渠川、石岐山带领队伍占领区公所东南角的中炮楼，敌人遂包围炮楼并将其点燃，起义队伍又撤至结构坚固的车马号炮楼据险死守。为摆脱险境，张渠川等人冲出重围到许党村，又联络了百余名党员和群众增援解围。起义队伍撤到炬山，并将红旗插到山顶。10日，敌人从西、南、北三面围攻炬山，起义队伍在只有3支枪的情况下挤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接着，反动武装进行残酷的大搜捕，许多队员和群众惨遭屠杀，旧州起义遂告失败。

这次起义，虽然牺牲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给党组织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它震惊了徐海蚌地区的国民党当局，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黄口起义

1930年7月10日，中共安徽萧县党组织在该县黄口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工农武装起义。

黄口位于徐州以西约100里的铁路线上，是陇海路中段的一个大站。1930年6月底，中共徐海蚌特委委员、宣传部长陈履真到萧县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萧县立即掌握武器，夺取政权。萧县行动委员会在李老庄李祥龄的家中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于7月10日在黄口、王寨、永固3个地区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由张圣和、李祥龄、谢光亚领导黄口起义，戴蕴山、胡文清领导王寨起义，纵翰民、萧雅忱领导永固起义。萧县行委会会议后，黄口地区党支部书记李祥龄组织起义骨干200多人，其中半数编为突击队，又经过农民协会秘密串连，动员了2000多工农群众参加，另外，还串连了一部分有战斗胆识的流氓无产者参加。共有短枪2支，土造炸弹48枚。同时做好了国民党黄口区队的起义准备。该区区长张永祥是共产党员，基本上掌握了区队的武装。当时，黄口驻有国民党第3军第27师的1个连，约140人。在黄口火车站东面、西面各驻1个排，连部带1个排驻在火车站北面；此外，镇上还驻有黄口区队和商务团的1个班，总计约200人枪。黄口党组织将起义队员分成3队，分别同时袭击3个排的敌人。7月10日上午10时，起义人员分头到达进攻目标附近。车站西面首先响起了枪声。共产党员程瑞凯用枪打倒了敌营房哨兵，又朝营房接连扔了几个土造炸弹。趁着弥漫的硝烟，20多名突击队员一齐冲了进去，敌人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缴枪投降。驻防在车站东面的一排敌人，听见四面枪响，又见一群青年小伙子逼近营房，便夺路向东逃窜。起义队伍奋起直追，这股敌人逃到黄口东北三里张寨附近，就被当地群众截住，乖乖地放下了武器。近午时分，盘踞在车站北面的敌连部和一排敌人还在据险顽抗。李祥龄鉴于战斗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仍不能取胜，遂当机立断，决定在坚持围攻敌连部的同时，加强政治攻势。他派人把商务会会长刘德印、唐秉五找来到敌人营房后门去喊话，这股敌人终于缴械投降，这时，在区行政局大院里的区队武装，在共产党员、区队长张永祥的带领下，全部交了枪。至下午3时，起义队伍缴获长短枪近200支，并在火车站北面出口处以“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第1师独立营”的番号贴出布告。布告的署名是师长张达生（张圣和）、政治委员纵甸之（纵翰民）、独立营营长李祥龄。

下午4时左右，武装起来的起义队员200多人沿着萧黄公路向东南挺进，威逼萧县城。盘踞在萧城的敌人惊慌万状，5个城门紧闭，不准通行，也有借故逃往徐州的。尽管蒋、冯、阎大战正胶着于亳县、兰封（今兰考）、菏泽一线，军用物资的运输十分繁忙，而徐州至南商邱的交通，竟因起义而中断3天。

7月13日，黄口起义队伍回师曲里铺。国民党萧县县长率县警备大队紧跟追击。由于王寨、永固等地因条件不成熟起义没有发动起来，黄口起义队伍孤军作战，在强敌面前以任爱斯为首的一部分流氓无产者乘机哗变，把装备最好的1个连部分人员偷偷拉走，造成一些人情绪低落，感到势单力薄，在本县回旋困难，外走又无出路，最后不得已决定分散隐蔽，起义失败。

茶园起义

1930年7月13日，茶园农民在中共浙江建德中心县委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茶园地处新安江北岸，依山傍水，是当时淳安县东部地区的要镇。早在茶园农民起义之前，已有以贫苦农民董公来为首的10多人的队伍，在淳安与建德交界的大山里自发地开展劫富济贫斗争。在斗争中，董公来结识了在建德莲花乡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建德县委书记陈一文，接受了党的领导和教育。1930年7月初的一天，陈一文根据中心县委指示，主持召开了有关组织武装起义的会议。会上，陈一文作了武装斗争的报告，并进行了分工，决定由董公来具体领导茶园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9日，建德农民起义领导人徐海定带领部分队员到了建德洋溪，和陈一文、董公来领导的30余人的农军队伍会合。经研究，决定7月13日举行起义，攻打茶园。同时决定成立武装起义大队，由徐海定担任大队长，董公来为副大队长。12日下午，起义队伍按预定计划出发，当夜到达茶园附近的芹坑，并做好战前准备。

13日凌晨4点，徐海定、董公来率领起义队伍突然地进入茶园镇。徐海定派人砍断电话线，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起义队伍分头行动，第一队由董公来带领攻打保安队。另一队由大老李带领攻打警察局，打死3名警察和1名基干队员，缴获步枪20支、土枪12支，其余警察逃走。镇内的一些地主也纷纷逃跑。起义队伍打开地主豪绅的商店、米店，分衣、分粮给贫苦群众。

起义队伍攻占茶园后又往项宅、湖下、淡竹方向前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开仓济贫，深得群众拥护，沿途不断有人加入起义队伍。到达郭村时，起义队伍已发展到300多人。

起义队伍的节节胜利，使反动当局惊慌失措，匆忙向省政府讨兵求救。7月21日，当队伍到达建德的许村时，当晚就遭到了国民党浙江保天团的3路包围，起义队伍被打散，当场牺牲50多人。起义失败。

饶平攻城起义

1930年7月13日，中共饶平县委率领工农革命军第48团和各区联队、赤卫队1000多人，发起了一次攻打县城的武装起义。

1929年9月，中共饶平县委以饶平兵暴中的骨干为主体，以及从各乡赤卫队中选出部分人员，组成工农革命军第48团，团长罗时元，政委温仰春。国民党军一个营的兵力纠合四乡地主武装疯狂“围剿”上饶。红军第48团汇合双善、埔坪、岭寮等乡赤卫队，在岭素、北坑、背杨山一带，打退敌军多次进犯，并拔除了周围一批反动据点。10月，上饶地区农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成立了分田委员会。1930年5月，饶平县出席东江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回来以后，中共饶平县委即着手筹建县、区两级苏维埃政府。不久，饶平县革命委员会在石井乡大门口祖祠成立，主席刘金丹。同时，浮山区革命委员会也宣告成立，主席詹广州。在饶平县革命形势发展的时候，国民党驻县城的反动武装则派兵四处“清乡”，破坏土地革命。中共饶平县委决定，攻打县城，拔掉反动堡垒。

7月13日，中共饶平县委组织工农革命军第48团与各区联队、各乡赤卫队共1000多人于凌晨5点开始攻打县城。战斗打响后，起义队伍高呼口号冲向国民党县政府机关。国民党地方武装抵抗一阵后，慌忙溃逃。起义队伍攻占县衙，打开监狱释放革命群众，烧毁文书账簿，处决地主恶霸10余人。攻城胜利后，起义队伍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决定主动撤回上饶革命根据地。途经新丰时，农军乘胜歼灭了新丰民团，缴枪10余支。路过横岭村，遭该村地主乡团阻击，党代表李光宗牺牲。第48团随即消灭了横岭守敌。之后这支队伍便活动于闽粤边境，继续开辟革命根据地。

引羊寺起义

1930年7月14日，中共江苏灌云县委在引羊寺组织了有1000余农民参加的武装起义。

引羊寺座落在今灌南县城新安镇北边六七里的地方。1930年4月16日，中共灌云县委根据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关于组织起义的指示，灌云县委书记管作霖、新安区委书记管海平、县农协委员孟祥贞，在引羊寺东南角的界圩召开“八排五庄联庄会”，号召与会的贫雇农代表、共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以“联庄会”的名义，抗捐抗税，发动农民起义，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

7月，中共灌云县委改为灌云县行动委员会。根据江苏总行委给徐海蚌总行委的指示精神，县行委决定：7月14日在引羊寺举行农民起义。是日上午，灌云行委派人在引羊寺擂鼓发出起义信号。周围八排五庄的群众1000余人高举大旗，扛着土炮、长矛、刀斧、叉棍等武器，从四面八方云集引羊寺。管作霖、管海平先后登台讲话，号召以联庄会的名义进行抗债抗租，攻占新安镇。随后开始行动，反动地主劣绅一片惊慌，纷纷躲进炮楼。

新安镇税警团独立营营长郭希文接到报告后，立即率领1、2、4连赶来镇压。他们直接从圩门外的水沟里扑过来，起义队伍与荷枪实弹的敌人激战了1小时。管作霖在指挥作战时不幸被捕。因敌强我弱，起义队伍只得且战且退，分散隐蔽。

引羊寺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到处搜查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当地的地主劣绅也乘机进行报复。参加起义的李文学、周德功、惠厚彭、汪树嘉、崔有德等人先后被捕，使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受到很大影响。

大福基起义

1930年7月14日，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浙江遂安的大福基（今淳安县汾口乡大福基村）一带的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这年5月，在大福基余海法家里，程彩琪、洪水树等贫苦农民，召开了碰头会。会议决定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武装起义，并取名为“大汉农民革命军”，还制作了一面大旗和符号。

6月下旬，中共上级党组织派两名党员到淳安的茶园和遂安的汾口一带活动，以加强对当地农民运动的指导。他们俩很快与洪水树取得了联系，并分头到邻近村庄进行发动。经过宣传教育，大福基、霞沅山、湖塘村一带约有200多人踊跃报名参加起义。

“大汉农民革命军”计划8月30日正式举行起义，并打算和淳安茶园的农民队伍联合起来，进攻城镇。计划首先攻打霞沅山和湖塘村的保安队，夺取武器；然后将地主家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队伍扩大之后，再攻打狮城镇（原遂安县狮城镇）；最后，转到江西磨盘山去会合红军队伍。由于淳安茶园农民起义于7月13日提前开始了，因此大福基起义便于7月14日匆忙举行。

这一天，贫苦农民200多人，从四面八方集合到大福基。每人手臂上均戴有特制的符号，手里拿着柴刀、锄头，还有几支土枪、几把马刀。在洪水树等带领下，队伍高举着写有“大汉农民革命军”七个大字的旗帜，浩浩荡荡地朝霞沅山进发。不料，就在起义队伍在大福基集合时，被地主周芳陞发现并立即报告了国民党遂安县政府。县政府派自卫队前往霞沅山村进行围攻，遂安县长周权美亲自坐镇指挥。农民起义队伍由于缺乏训练，加上准备不充分，匆忙上阵，一经激战队伍就被打散，起义队员有的被捕，有的牺牲，伤亡惨重，起义失败。

新河起义

1930年7月16日，中共江苏沭阳县委领导该县新河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新河街大地主胡经国家筑有水圩、土圩、墙头圩，设有炮楼。他残酷剥削租犁佃户，作恶多端，百姓恨之入骨。为此，中共沭阳县委决定先拿胡家开刀，并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起义前夕，中共沭西区委委员兼陈楼（现新沂市王庄镇）支部书记陈辅增带领20多人来参加。

7月16日（农历6月21日），新河街逢集。上午，100余名起义队员分3路出击。中共沭阳县委委员兼西区区委书记胡寿彭等率领起义人员化装成赶集的买卖人进入集市。在胡家练勇王立业、方怀有2人的接应下，迅速冲进胡家圩子，将胡经国父子俩当场击毙，缴获长枪10余支，短枪2支，接着攻入内院收浮财分粮食。附近地主武装见农民声势较大，不敢贸然进犯。

国民党沭阳县大队得到报告后纠集反动地主武装进行围剿。胡寿彭闻报，迅速带领队伍撤到陈楼，并在陈楼插起红旗。后遭县大队袭击，坚持了2天，起义人员陆续散去。

白狗庙起义

1930年7月18日,中共河南省京汉特委和信(阳)北区委在豫南确(山)信(阳)正(阳)边境的白狗庙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白狗庙位于河南省确山、信阳、正阳三县连接部,属确山县政区。早在1927年冬,这里的农民群众即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1930年初,中共京汉特委(由中共信阳中心县委改建)派共产党员朱群等以在确山第三小学教书为名,发动群众,同时在学校建立了中共信北区委,由朱群任书记,申耀东任副书记。在中共京汉特委的领导下,信北区委积极发动群众,组织了鞭杆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儿童团和农民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经过数月发动,信北区委组织起农会会员1000余人,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100余人,建立起6个党、团支部,为开展确、信、正边境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1930年6月,中共京汉特委决定以白狗庙为爆发点,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委常委孔文彬(孔健吾)和执委贾子郁先后到白狗庙指导工作,并派特委委员潘石钦和金克清先后兼任信北区委书记,负责领导。区委还动员了一大批进步人士,捐助100余支枪支援起义。组建和训练了一支农民和学生自卫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共京汉特委决定于暑假期间在白狗庙举行武装起义。

1930年7月18日黄昏,中共京汉特委委员、信(阳)北区委书记金克清、副书记朱群和当地进步人士郑立钊等带领150余名农民、学生举行武装起义,攻打张板桥的豪绅地主张朝卿。原计划里应外合,但由于内外协同和联络不好,起义队伍未等里面行动就冲进院子,缴了门岗的枪支,直闯张朝卿住房。致使张趁天黑带领其地主武装钻进炮楼负隅顽抗,起义队伍久攻不克,转而撤向正阳梁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7月下旬,中共京汉特委常委孔文彬在正阳召集朱群和正阳县委副书记胡功威等人开会,决定利用国民党军新编第12师袁英部扩编之机和当时兵匪混杂的形势,将起义武装人员隐蔽身份,暂并入其陡沟补充团,单独成立一个营。10月初,鄂豫皖苏区红1军奔袭正阳陡沟镇时,隐蔽于补充团的游击队员里应外合,配合红1军歼灭补充团,加入红1军。

泰和起义

1930年7月19日，在中共赣西南特委的领导下，杨超（中共党员）率沙圪靖卫团在泰和县境内举行了起义。

1930年夏，江西省泰和县中共党组织逐渐恢复和发展，多数区、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万合罗家为中心的河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在党的领导下，苏区人民多次打垮了靖卫团的进攻，地主武装和土豪劣绅龟缩在县城伺机反扑。6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20军在县独立营的配合下，集合二三千人从印霞江渡河向县城进发。部队在离城不远的山东王家、文田、东岳府、杏岑等村驻扎，积极准备攻城器械，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中共泰和县委派人潜入城内，发动群众张贴“欢迎红军进城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标语。

红军进攻县城的消息震动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官吏。反动县长陈水如派大恶霸王璋川率领沙圪靖卫团火速增援。沙圪靖卫团是河东的一支地主武装，有百余人，40多条枪。王璋川贪生怕死，借故推辞，被撤销团长职务。杨超接任靖卫团团长。

杨超，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连司务长。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下，投身革命。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6月，杨超以抵御红军和兴国游击队的进攻为幌子率沙圪靖卫团进驻沙村真君岩。在这期间，中共赣西南特委派人和杨超秘密联系，筹划靖卫团起义事项。

7月19日晚，红20军向泰和县城进发，杨超率领沙圪靖卫团50余人，40余支枪按计划举行起义。20日，杨超率起义官兵进入沙村，后到达万合罗家圩，中共泰和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军民大会，热烈欢迎起义官兵。21日，起义的靖卫团被改编为红20军第58师第172团，杨超任团参谋长。22日，杨超率第172团渡过赣江，和城北的红20军主力南北呼应，合力夹攻县城。23日晚，泰和县城被攻占，反动县长陈水如率残部向马家州方向窜逃。红军进入县城，中共泰和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从万合农村迁入县城内。此后，杨超随红20军转战赣西的遂川、永新、莲花、安福等地，不久被提升为团长。

李口起义

1930年7月20日，中共淮盐行委和泗阳县委在江苏省泗阳县的李口地区组织发动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也是淮盐总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淮盐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创建于1927年秋，经过近3年的艰苦斗争，到1930年上半年，已有较大发展。1930年7月中旬，淮盐区行动委员会（简称淮盐行委）在淮阴成立，王金培任行委书记，下辖淮阴、淮安、涟水、泗阳、盐城、阜宁6个县。接着，淮盐行委在涟水西乡六塘河畔的金庄召开6县负责人会议（也称金庄会议），决定在全区发动武装起义，并确定泗阳李口、涟水金城庵、五港等地为主要起义地区，涟水为起义重点。全区起义日期统一为8月1日。

1930年春，国民党泗阳县政府决定开辟泗阳至新袁的公路，因无偿占用农民土地，并沿路征工而不给报酬，从而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中共泗阳县委抓住这个机会，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反对征工筑路。国民党泗阳县政府为了缓和矛盾，决定公路改道，沿废黄河南堤筑路。为此，影响河滩排水，庄稼被淹。县委再次发动农民游行示威。恶霸地主、国民党二区“游击队”队长沈志高和县公安局接报后，蓄谋镇压。加上国民党县政府的苛捐杂税，农民苦不堪言，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对此，中共泗阳县委分析了当时形势，并征得中共淮盐行委同意后，决定抓住这一契机提前于7月20日举行起义，以揭开淮盐总起义的序幕。淮盐行委派来了2名干部加强领导。7月19日，连夜作了布置。7月20日晨，王沛、李成英、杨叔贤（县委委员）、杨富田等10多人，带领各地起义群众1000多人，扛着钢枪、土炮，拿着大刀、长矛等武器在翟码头南、川形庄北地点集合，进行动员。王沛、杨叔贤和淮盐行委派来的干部讲了话。会后，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向李口进发，一路高呼口号。沈志高吓得紧闭圩门，不敢露面。起义队伍将李口围得水泄不通。下午3时左右，沈志高施用诡计，要起义队伍派出代表谈判，以便拖延时间，等待泗阳城援兵。起义领导人未料到沈的缓兵之计，遂派王沛、杨叔贤等5人为代表，前往谈判。当谈判代表从李口出来后，沈志高估计援兵将到，即令区“游击队”向起义队伍进攻。交火不久，国民党县政府派来的步兵、骑兵300余人赶到李口。起义队伍英勇抵抗，战斗到晚上7时，孟继扬带领100多名起义群众从李口南面赶来支援。南北两路队伍会合后，又和敌人恶战一场。因敌强我弱，行委决定将起义队伍中的群众遣散回家，领导成员和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到荒柴地里。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县政府把第二区划为赤化区，派军警对东河滩进行“围剿”。王沛等7人因暴露身份被迫隐蔽，中共淮盐行委派潘鸿烈任中共泗阳县委书记，继续领导武装斗争。

桐柏起义

1930年7月23日，中共河南省南阳中心县委在桐柏县领导部分农民和警察局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南阳中心县委会同杨虎城部的中共地下军委，发动杨部兵暴和桐柏、邓县农民起义，6月15日，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决定举行桐柏武装起义，以支援湖北枣阳和豫东南的革命斗争。同时，成立以南阳中心县委委员刘福僧任总指挥的起义委员会。刘福僧等到桐柏后，研究制定了具体起义计划：第一步夺取枪支，占领县城；第二步里应外合，打下金桥镇；第三步将部队开赴西区鸿仪河一带，扩大队伍，创建革命根据地。

7月23日，150余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起义委员会领导下，在桐柏县城举行起义。起义人员按照预定计划在国民党县政府、警察局、县保安大队、城关东同时展开行动，向各自的目标进攻。城东关的起义队伍在桂仲锦、叶维斋的带领下，分为3个战斗小组，先后夺取5座炮楼，缴获10余支步枪和2支驳壳枪。县城内参加起义的警察局部分士兵和群众，在刘福僧和刘景林的带领下，先后攻打了警察局和保安大队，缴枪110余支，接着，打开东城门和城关东起义队伍会合。24日下午，当起义队伍进到金桥西南的杨家祠堂，准备实施第二步计划攻打金桥时，因天降暴雨，河水陡涨，起义队伍遂就地宿营，并在此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5师第1大队，大队长刘福僧，指导员张化先。

起义队伍因未及时转移，遭到敌人的“追剿”。7月26日，国民党桐柏县政府纠集保安大队及1、4、5区民团等600余人，抢占了红军休整地杨家祠堂附近的制高点，起义队伍与敌激战1个多小时，牺牲20余人，最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被迫突围。在突围中，起义队伍大部被打散，只有21人（枪）冲出重围，后与湖北枣阳北部张慕騫领导的游击队汇合。

吴窑起义

1930年7月23日，江苏省铜山吴窑地区的农民在中共徐海蚌总行动委员会和铜山县行委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吴窑位于铜山县的东北面，驻有国民党的1个乡公所。村内有10余户地主，依仗其地多、枪多，又有保卫团，任意欺凌百姓。为反抗反动统治的剥削和压迫，中共党组织早在1927年就派鹿周继、鹿卓继、鹿世昭等中共党员在该地区发展组织、开展斗争。先后成立了群众性斗争组织“白布会”和“租地会”，为起义奠定了基础。

1930年7月初，中共徐海蚌特委根据省委指示，两次给中共铜山县委发出有关起义的指示信。铜山县委研究决定：在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吴窑举行起义。7月20日左右，为适应起义的需要，中共徐海蚌特委改为徐海蚌总行委，由王洪（阮啸仙）、陈履真负责。铜山县委亦改为县行委。起义前夕，王洪、陈履真到吴窑具体指导。原共青团徐海蚌特委书记万众一，还在吴窑召集党员及积极分子，进行起义动员。县行委对起义也作了周密的研究，先后开了4次党员骨干会议，统一思想、制定计划、筹备武器。并确定鹿世昭为起义总指挥。

23日下午5时，鹿世昭、鹿卓继率领100余名起义队员，以给国民党乡公所头目杨怀山吊孝为名向吴窑进发。队伍进入吴窑后分成两路，一路由鹿卓继率领攻打乡公所及保卫团的碉堡，缴枪10余支。随后冲进地主鹿国继、鹿惠继、鹿良继等家，将这些恶霸全部关押起来，缴枪10余支。黄昏时，敌乡长鹿世任在回乡路上，被鹿卓继开枪击中，两天后死去。另一路由鹿世昭率领，包围地主鹿世新家。接着赶至曾杀死7位农民的地主鹿金唐家，鹿假装投降并乘机取枪击伤1名起义队员后逃跑。24日，起义队伍攻占石蒋圩和小南庄之后，转移至泉河头、罗家圩一带活动。

吴窑起义使反动当局和恶霸地主极为恐慌。国民党铜山县政府一面张贴布告悬赏缉拿鹿世昭等人；一面派宪兵队、各乡地主保卫团、联庄会等反动势力进行残酷镇压。他们连无辜儿童也不放过，鹿世昭年仅3个月的小儿子被地主鹿岑继的弟媳活活摔死。为保存骨干，积蓄力量，县行委决定，起义领导人分散隐蔽。

数月后，鹿世昭与起义队员魏家治秘密回吴窑开展工作。1931年2月23日夜，因坏人告密，鹿世昭、魏家治遭地主武装偷袭而牺牲。

仙居南乡起义

1930年7月25日，浙江仙居南乡农民，在中共仙居中心支部南乡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带领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20年代末，仙居县风、虫、水、旱灾害并臻，百姓苦不堪言。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广大农民怨声载道。

1928年，中共仙居县中心支部在丰南乡的溪上、柯恩等地发展党员，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在党的影响下，第17乡（今寺前乡）下塘村贫农朱福真，拉起10多人的队伍在仙（居）永（嘉）黄（岩）边境“打富济贫”。1929年11月被编入永嘉红军游击队。朱福真在仙居的上张、柯思、十三都地区使游击队扩大到二三十人，并与上岙村的杨老海结为朋友。此时，永嘉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徐定魁、泮善琴也来到上岙村，动员杨老海发展武装力量，与国民党政府作斗争。

1930年3月9日，受中共中央指派到浙南领导武装斗争的胡公冕等，集中永嘉、仙居、黄岩等县边境的农民武装，在黄皮寺（当时属仙居，现属永嘉县）进行整编，成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活动在仙居西乡的“浙西工农革命军”金永洪领导的队伍，和朱福真、杨老海领导的农民武装，均被编入该指挥部的第1、2支队。杨老海、朱福真领导的游击队计有130多人，在黄皮寺整编后，返回永、仙、黄边境坚持斗争。

6月，国民党仙居县政府再度派员到二十乡催缴田粮，刚到达上张村，农民陈春等带着近百人蜂拥而上，夺下土地陈报单和“田粮册”，当场烧毁。还迫使“催粮官”检讨认错。从此，国民党在南乡的村、里政权全部瘫痪。国民党仙居县当局无可奈何，把杨、朱游击队的控制区称之为“匪区”，声言“要调大军荡平”。在党组织和杨老海、朱福真、程小俄等人的发动下，各地农民纷纷请来铁匠制造武器，仅姚岸、塘园两村，就制造了土炮4门，火药枪35支。

同月底，南乡党组织向杨老海等传达中共浙南第1次代表大会精神。红13军所属的永嘉游击队负责人徐定魁、泮善琴也向杨老海介绍了红13军的情况，并鼓励他们发动农民，夺取政权。杨老海、朱福真、程小俄等深受鼓舞，分析了敌我态势，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攻占仙居县城。他们分头进行了发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响应，踊跃报名参加起义。杨老海还去永嘉、黄岩联系，寻求支援。徐定魁、泮善琴等表示全力支持。

南乡农民反对土地陈报的斗争和浙南红军仙居独立中队在西乡的活动，使国民党仙居当局大为恐慌。县长韦隼明哀叹：“出城五里都是共匪天下”。并“要求省府飞派大队剿办、救援。”浙江省政府即饬保安队第五团“负责剿办”。7月下旬，县长韦隼明得悉杨老海、程小俄欲攻县城，即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由县商会筹集经费，招收“乡勇”协助驻城的保安队5团2营6连守城，命皤滩保卫团团总王良喜、王元清待命来援；并派郑天英、郑云赶赴临海，向“浙保”5团求救，招收起“乡勇”100余人，加固了城防。

杨老海为夺取县城，命令各支农民武装于7月24日到塔木岭十方堂（在今大洪乡，系一座寺院）集中，到会者约1450人。永嘉泮善琴、黄岩戴元谱领导的队伍100余人也按时到达。是日晚，举行攻打县城誓师大会，发给参加者每人1条红布作为标志。25日，程小俄率领的临海农军近200人也赶到。参加起义的队伍加上沿途跟随来的农民，总数约2000人。起义领导人在

研究确定攻城方案、明确分工后，即率领起义队伍连夜向仙居县城开进。

7月26日凌晨，队伍抵达县东岭，占领了各个山头。拂晓，队伍迅即冲向城东门。城内守敌鸣枪报警，关闭城门，拔掉吊桥，据险固守，激烈的战斗随之展开。领头的1名旗手中弹牺牲，后续者擎起红旗，涉水前进，包围了县城。但城墙系条石垒成，高6米有余，城脚内外各有一条3米多宽、水深过人的护城河。农军没有渡河和攀城的工具，只能在城脚迂迴。对峙了一天，仍不能破城。27日中午，驻海门（今椒江）的省保安队第5团2营赶到东门，驻皤滩的保卫团赶到西门，农军腹背受击。在此情况下，杨老海下令撤出战斗，退回南乡山区。接着，敌人就在城郊各村疯狂搜捕，先后20余农军被杀害。

渔行口起义

1930年7月25日，中共福建省行动委员会在厦门港民生路渔行口广场发动和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福建成立了省行动委员会。7月23日，省行委在厦门的筭高石召开各支部领导人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于7月25日在厦门港举行起义，组织工人攻打盐税局。会后，总行委组织了五六名武装人员，又从漳州、同安调来枪支，并从中共漳州市委调来曾炎（又名曾浴沂）担任这次行动的现场总指挥。

25日晨，罗明、曾炎和各支部起义人员陆续到达厦门港民生路渔行口广场。当总指挥发出行动信号后，起义武装队员立即持枪冲入盐税局。但此时渔行口广场警笛长鸣，枪声大作，冲进盐税局的武装队员知道情况不好，当即退了回来。

由于这次行动计划在事先散发的传单上已经泄露，所以行动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厦门港被反动军警团团围住，并断绝了交通。反动军警用机关枪、驳壳枪向群众扫射，进行残酷屠杀。起义队伍与80多名敌侦探队展开肉搏战和巷战，持续达1小时30分钟。在战斗中，总指挥曾炎等3人壮烈牺牲，2人被捕。起义失败。

虎南起义

1930年7月26日，在中共四川梁山县（今梁平县）委领导下，虎城、南岳地区的农民举行了起义。

虎城、南岳分属梁山、达县。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失败后，梁山建立了中共特支。1929年建立了中共梁山县委。县委派共产党员深入农村，举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共产党员李光华、李次华在民团中开展兵运工作，掌握了数百名武装人员。共产党员金治平等在南岳乡开展农民运动，至1929年冬，发展了千余名农民协会会员。中共四川省委派军委委员覃文、巡视员周三元等到梁山、达县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培训革命骨干，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1930年初，虎城人民打死恶霸石文蛟，6月迫使国民党梁山县县长关押了劣绅石玉楼。与此同时，南岳成立了“南岳人民抗捐大同盟”，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7月26日，千余名农民协会会员，集中百余支长短枪，在李云程、杨勃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向围寨的敌军发起攻击，在周围村庄革命群众的支援下，打败敌军，虎南起义成功。29日，起义队伍离开虎南，向龙沙、太平和忠县黄钦坝转移。此时，四川省委书记牛大鸣代表省委宣布成立四川红军第3路游击队，李光华任总指挥，王维舟任副总指挥，覃文任政治部主任。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牛大鸣、覃文、王炎离、蔡奎、李维为委员，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8月初，起义部队进入石柱县城，与四川红军第2路游击队会合，击溃来犯的数百名民团武装。后遭刘湘军陈兰亭部1个团包围，伤亡较大，李光华、李次华不幸牺牲。前委为保存实力，决定起义人员分散返回原籍，继续坚持斗争。

下澧河起义

1930年7月29日，国民党军杨虎城部部分官兵在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和“杨部军委”的组织领导下，于河南省舞阳县下澧河店举行了起义。

1930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及河南省委数次向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和驻南阳杨虎城部党的军运工作委员会（简称“杨部军委”）秘密派出人员，发出进行兵暴的指示。根据这些精神，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和杨部军委共同研究决定，发动杨部起义。6月，中共中央军委武汉长江局办事处派白玉文以特派员身份到南阳具体领导起义。白到南阳后，召开了有杨部军委和南阳中心县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了起义计划。决定在党的组织基础较好的杨部第1旅首先发动起义，然后由南阳城内教导大队响应，攻占南阳，与鄂北红26师会师，建立鄂豫边革命根据地。6月下旬，白玉文来到第1旅驻地，并组建了以“杨部军委”委员孙永康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7月，第1旅奉命移防舞阳县下澧河店。恰在这时，该旅旅长冯饮哉因事离开部队去南阳，前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提前发动起义，并将提前行动计划通报了南阳中心县委。

7月29日夜，在前委指挥下，第1旅的手枪连、密查队首先起义，接着控制了卫队营。随即对旅部进行袭击，打死打伤副旅长、参谋主任、军需处长以下17人，缴获军饷银洋数千元。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了700余人，步枪200余支，手枪100余支，手提冲锋枪20余支，还有部分弹药、马匹等物资。当夜，部队即按预定计划南下。30日，到达叶县和方城县交界的望夫石山南坡，在此对部队进行整编，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司令员张焕民，政治委员孙永康。

队伍整编后，继续向南阳方向进发。由于起义部队在沿途大量张贴标语，敌追击部队顺着这些标语，很快追上并包围了起义队伍。起义队伍与优势追军激战1个多小时，除少数人突出重围，转到唐河县境外，大部被打散。中共中央长江局特派员白玉文及红9军司令员张焕民、副司令员刘焯等被杀害。

石梁河起义

1930年7月30日，中共安徽泗县县委在该县石梁河地区领导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1930年7月20日，中共泗县县委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总行委的指示，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发动武装起义问题。会议确定把群众基础较好的石梁河地区作为起义的主要爆发点。并决定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合并，成立泗县行动委员会，丁超伍任书记。并决定成立工农红军独立师，何凤池（李宝璋）为司令，魏正斌、丁超伍为副司令。下设3个大队。起义日期定于8月1日。会后，行委一方面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抗租抗税，用算细帐的方法，揭发地主、豪绅和国民党政府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激发农民的仇恨，为武装起义做好思想准备。另一方面还发动党团员和农民骨干，采取凑钱买枪，找关系借枪，收编土匪武装，收缴地主枪支等方法，筹备枪支弹药。同时挑选农会积极分子，组织农民赤卫队，进行军事训练。7月28日，由宿县东三铺起义组织起来的红军几十人（那里起义较早，因失败而冲出来的），在戴文生率领下，转移到泗县，也加入了石梁河起义的行列。当县行委得知国民党泗县县长余念慈命令团防局和县自卫队即将前来镇压的消息后，决定起义提前到7月30日举行。7月29日，魏正斌带领李荣萍、萧长理等9人，智取了墩集团练局20支枪和5排子弹。当夜11时，魏正斌带领40余名起义队员夜袭霸王城团练局，一枪未发，俘虏了几十个团兵，缴枪25支，子弹400多发，捣毁了该团练局。7月30日起义开始，城南各地农民起义队伍，向石梁河东的大、小魏庄集中。整个起义队伍400余人，枪近百支。石梁河农民起义后，国民党县政府急遣张汉兴、高树萍带领县自卫队，勾结恶霸地主张继航前往镇压。魏正斌立即集合队伍迎击敌人，缴枪40余支，并一鼓作气，追到泗城附近。县长余念慈当晚逃出泗城。起义队伍乘胜出击，攻打上了塘集团练局，缴获长枪35支，手枪2支，盒子枪1支和部分子弹、手榴弹。随后，又驰援大庄集，解救被地主武装包围了的农民协会会员。大庄集的农协会会员加入了石梁河农民起义的行列。晚上，起义领导人在陈吕庄开会整编队伍，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何凤池为司令，丁超伍、魏正斌为副司令。8月1日上午，红军在泗县朱圩南头的大场上召开大会，宣布了红军的建制，公开打出了“工农红军独立师”的旗帜。红军乘胜出击，打击地主武装，并袭击了国民党新任泗县县长张海舟前来上任的汽车。

红军在泗县境内南北转战，所向无敌，引起敌人一片恐慌。新任县长张海舟经过一番紧张的密谋策划，命令县自卫队张汉兴、高树萍带领两个中队200多人倾巢而出，并命令各区团练千余人协助，围攻红军。红军在强敌面前缺乏应变能力，采取了分兵应战的战术，但敌人越战越多，从四面包围上来。红军300余人撤到唐沟，战至天黑，终因天降大雨，遍地泥水，弹尽粮绝，孤军无援，除一部突出重围外，其余被敌打散。

长沙起义

1930年7月下旬，红军第3军团和湘鄂赣边境工农武装共20万军民，在红3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的组织发动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占长沙的武装起义。

1930年7月上旬，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提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案》，发动边境总起义的中心任务，并要求在8月1日前后开始起义。接着，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和转战至平江的红3军团前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乘长沙防守空虚之机，于8月1日举行长沙起义，然后进逼武汉。并成立了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赖汝樵任总指挥。之后，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发出《为实行湖南总暴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边境各县紧急动员，集中武装，进攻长沙，实现湘省总起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边境各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迅速行动，为攻打长沙进行紧急准备。21日，边境各县游击队、赤卫军（队）、工人纠察队、少年先锋队、湘鄂赣独立师以及各种支前群众组织共约20万人，聚集平江。22日，红3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在平江县召开攻打长沙誓师大会。赖汝樵和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等负责人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动员讲话。此时，反动军阀何键委任危宿钟为“剿匪”指挥官，率王东原、罗树甲两旅主动进击平江。彭德怀、赖汝樵等决定提前起义。7月25日，红3军团和工农武装在圣挂尖遇敌，激战后歼敌一个团，活捉团长侯鹏飞。危宿钟连忙命令部队后撤，退至金井布防。红3军团和工农武装首战告捷，士气大振，遂全面出击，突破敌人的纵深阵地。危宿钟部整个防线全面崩溃，红军部队和工农武装很快占领金井。随即，红3军团和工农武装乘胜追击，进至长沙城附近。

何键见红军部队兵临城下，亲自出马指挥、督战。此时红3军团和工农武装越战越勇。27日黄昏，先头部队攻入长沙城的小吴门、浏阳门。当晚9时，红3军团和工农武装占领长沙城。何键见势不妙，仓皇潜逃。29日，长沙市10万多工农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庆祝长沙起义胜利。次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立三任主席（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彭德怀、杨幼麟、李宗白等13人为委员。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宣布了苏维埃政纲，颁布了《暂行劳动法》、《暂行土地法》，创办了《苏维埃日报》。同时，成立了肃反总司令部，镇压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组织了没收委员会，没收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绅的财产，共筹款40万银元；恢复和组织建立了市内各行各业工会共50多个；召集郊区农会负责人开会研究了分田等问题。这些措施和行动，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4000多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长沙起义胜利，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蒋介石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从武汉抽出一批军队和军舰、飞机支援何键夺取长沙。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也将军舰驶入湘江援助何键。何键立即调集各地部队强渡湘江，由南北两路向长沙城发起进攻。红3军团和工农武装在黄土岭、阿弥岭等地与敌激战，歼敌1个整团，但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彭德怀等率部撤离长沙，向浏阳方向转移。8月6日，红军部队和工农武装全部撤出长沙城。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起义委员会和红3军团此次组织攻打并占领长沙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鼓舞了红军和工农武装的斗志，提高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勇气和信心。

后洋里起义

1930年7月间，浙江瑞安南区农民，在中共瑞安县委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后洋里位于瑞安南边的仙降。瑞安县一些反动官僚地主如有名的恶霸地主李伯襄和反动豪绅李秀旺等都住在这里，他们相互勾结，横行乡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阶级矛盾激化。1930年7月，中共瑞安县委决定在南区组织一次攻打后洋里的武装起义，打击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鼓舞群众的斗争热情。起义时间定为7月底，并决定由县委书记郑贤塘到仙降红堂后村指挥起义。后因当地青帮头子叶阿云，派人抓走了洋坑党支部书记朱阿琴，中共瑞安县委决定提前举行起义，一面派人去抓叶阿云，救回朱阿琴；一面命令各地农民赤卫队到下屿宫集中，统一行动，攻打后洋里。

当日晚，下屿宫集中了3000多名赤卫队员。他们带的武器除步枪、长矛、大刀以外，还有各地集中的“大红衣”、“九节”、“猪娘”等几十门土炮和300多支土枪。10时左右，队伍悄悄出发，很快到了后洋里村外。起义队伍首先攻打恶霸地主李伯襄的住宅。“民团”放枪回击，双方展开了枪战。最后，农民赤卫队采取火攻的办法，用长竹竿挑着浸满煤油的棉花，点着火烧着了堆在房子边的稻草堆。一会，房子就着火了。几十人组成的突击队，趁机划着船，冲到对岸围墙旁。大家一上岸，就向墙里攻击，不到10分钟，共俘虏“民团”士兵和李伯襄20多人，打死7人，缴获长短枪17支。当国民党平阳县政府的援军赶到后洋里时，起义队伍已安全撤离。不久，这支驻扎在梅吞的农民起义队伍，全部补充到红13军。

云溪起义

1930年7月，湖南临湘云溪农民暴动队在红军干部带领下，就地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师参谋长彭国才等到临湘云溪一带组织发动农民暴动。通过短时间的宣传发动，很快就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农民暴动队，称红军暴动队，负责人彭国才、张飞舞、杨少青、何凤初、田金龙、马炳耀等。

红军暴动队成立后，宣布了武装起义的目的和计划，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夺取枪支武装自己，打倒土豪劣绅，为民除害。7月的一天晚上，云溪武装起义爆发。红军暴动队1000多人分4路攻打云溪团防局。团防局团兵听到枪声和喊声，不知虚实，慌忙逃跑。起义不久，云溪团防队返回，疯狂进行报复，实施残酷的烧杀，一大批参加过起义的农民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龙滚民团起义

1930年7月，中共琼崖万宁县第4区委派人策动龙滚民团小队长李日辉、李日正率部举行了起义。

1930年春天，万宁县第4区区委书记何国川和区苏维埃主席符英民经过研究，决定策动出身贫苦的民团小队长李日辉、李日正率部起义。于是，派中共党员杨树坤、共青团员谢国姬执行这项任务。

杨树坤、谢国姬利用李日辉、李日正带领团丁下村的机会，逐步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希望他们深明大义，不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跟共产党走。经过反复启发、规劝，李日辉、李日正逐渐觉悟，终于答应组织团丁起义。

此后，中共万宁县党委委员林光华又和何国川一道找李日辉、李日正面谈话，使他们思想更加坚定，并约定了起义日期，规定了联络信号。

7月的一天夜晚，红军连长陈颖端率领全连星夜开赴龙滚，何国川也率领几百名赤卫队和群众，由杨树坤、谢国姬作向导，赶到龙滚圩附近的光荣岭埋伏下来。大约深夜12时许，光荣岭上燃起火炬，李日辉也在碉堡里连擦3根火柴。陈颖端看见火柴亮光后，立即命令红军赤卫队和群众冲锋。这时，李日辉、李日正带领起义团丁向李澄明指挥部冲去。李澄明发觉后，立即指挥团丁向外疯狂扫射。红军、赤卫队和群众冒着密集的枪弹逼近碉堡，同李日辉等人会合，集中火力反击，放火焚烧李澄明指挥部。李澄明和一部分团丁被烧伤后，狼狈逃命，余者投降。尔后，李日辉、李日正带领起义人员加入革命队伍。

龙滚起义，是中共万宁县党组织策划的一次比较成功的民团起义，它对于分化、瓦解敌军起到了积极作用。

鲁洪山起义

1930年7月，中共安徽桐城鲁洪区委在该地区组织150多名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桐城鲁洪山位于大别山东麓，处于桐（城）、潜（山）、庐（江）、舒（城）边境。1929年7月，中共鲁洪区委成立，区委书记黄少庭。同年12月底，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员发展到300余人。1930年6月初，中共鲁洪区委召开会议，决定立即进行农民暴动的宣传；搜集枪支弹药，组织农民赤卫队。经过近1个月的努力，组成了由中共地下党员和农协骨干为主体的赤卫队，有150余人，20余支枪。黄少庭任赤卫队队长，后来编为一个连，黄少庭任连长。

7月初，区委接到中共桐城县委关于在鲁洪山组织农民起义的指示。县委书记吴克正、县委委员王定华亲临领导。黄少庭召开有赤卫队参加的暴动动员大会，许多农民拿着猎枪也自动前来参加。会议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向土顽宣战。打倒一切阶级敌人，上欧家岭，配合欧家岭红军建立和扩大皖中根据地。会议正在进行时，桐城县自卫团团团长王纯青带着30多人突然包围了会场，顿时枪声大作。由于会前疏于警戒和部署，临时又未能很好地组织与指挥，以致群众听到枪声阵容大乱，经过很短时间战斗，起义队伍溃散。起义领导人吴克正、王定华不幸壮烈牺牲。

涟水起义

1930年8月1日，中共江苏涟水县委领导涟水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7月下旬，中共涟水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书记吴长来传达了省委、淮盐行委关于举行“八一”起义的指示精神，研究了本县起义计划，成立了县行委和起义总指挥部，吴长来任行委书记和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金城庵（今涟水县浅集乡）。下设军事委员会，县委副书记赵秉衡（赵心权）兼书记，张伯英、薛味五为委员。会后，县行委成员分头赴金城庵、柴市、五港、下营等地，传达指示，组织队伍，研究计划。“八一”前夕，县行委又在十二堡召开各区负责人会议，决定吴长来负责盐河以西地区，赵秉衡负责盐河以东地区。

7月31日夜，由于起义消息泄露，县行委委员王岫华、张伯英和城区区委书记刘其生在柴市率先行动，至天明，缴枪30余支，连同长矛、大刀，武装了六七十人的起义队伍。接着，占领了地主胡少德的炮楼，封锁盐河渡口要道，盘查来往行人，准备还击县警备队和地主武装的反扑。赵秉衡和大程集区行委书记陈秀生、区行委委员郭保真等率领的起义队伍也于7月31日晚开始行动。至翌日凌晨，收缴步枪110支，驳壳枪10支，然后郭保真等将起义队伍带到涟、阜（宁）交界的淮河堆隐蔽待命。

8月1日，吴长来等领导金城庵地区的党团员、农协会会员70多人，分片收缴了地主、富农数十支枪，逮捕了不肯交枪的反动地主冯中尧，并进行了公审。县行委委员张雨霖、林士钧和五港区委罗运银、薛桂清等在五港领导收枪。8月1日午后分头在李桃园、文万庄、孙小舍开始行动。后在李桃园集合，计收枪40余支。张雨霖等即率起义队伍于当晚开到集中地点章化寺（今涟水县胡集乡）驻扎。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收枪300多支，参加起义的约1000人。

起义开始后，国民党涟水县警备队和地主武装纷纷出动，实行镇压。8月1日，以金中大为头子的地主武装（联庄会）纠集约200人，对金城庵进行反扑，打散起义队伍，逮捕了领导起义的王广志等多人，并疯狂搜捕已分散隐蔽的起义人员。

鄂城起义

中共湖北鄂城县委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3周年，于1930年8月1日组织1万多农民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5月，中共鄂城县委组织发动农民开展反“清乡”斗争，在部分地区组织了农民赤卫队。是年夏，鄂城县委根据湘鄂赣边特委和鄂东特委的指示，决定于8月1日在符石区举行工农群众武装起义，主要攻击目标是灵溪区民团局。为组织好这次起义，县委主要成员汪洋（盛浩如）、王炯（鲁毓藻）、候功同以及符石区委书记魏利民等人分头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8月1日，各路农民起义队伍在紫坛李家庄集中，召开誓师大会。县委书记林明炯作了动员讲话，宣布了起义命令。接着1万多人的农民起义大军，手持长矛、大刀，浩浩荡荡向民团局驻地毛铺进发。由于武装起义的情报被土豪劣绅夏连成等人探悉，即纠集民团、清乡团共400多人，80多支枪，埋伏在农民起义队伍必经之地的谢埠桥。当农民起义先头部队刚过桥头，便遭到了反动武装的伏击，在桥南与民团作战的是赤卫队，有枪20多支，经过激战，不少赤卫队员和群众英勇牺牲。被截在桥北的起义农民所持武器都是长矛大刀、木棍，且首尾不能相顾，又没有作战经验，万人起义大军被打散，起义遂告失败。

黄桥起义

1930年8月3日，在中共通海特委的直接领导下，江苏泰兴县黄桥镇农民和红14军第1师部队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1930年7月29日，中共通海特委根据省委“实行武装大暴动”的要求，召开如泰地区红军联席会议。会议认为，黄桥是如(皋)、泰(兴)、泰(县)、靖(江)四县的交汇点，交通发达，商业繁荣，在军事上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党在黄桥设立了“苏北剿共总指挥部”，驻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决定于8月3日在黄桥举行总起义，与反革命政权进行最后决战。为统一指挥起义，成立了起义委员会。

3日凌晨，四五万农民，胸前别着“共产军”、“共产赤卫军”等字样的红布标记，浩浩荡荡，拥向黄桥。红军主力部队则在军长兼政委李超时和省委军事特派员徐德的指挥下，分四路进攻黄桥，同时分兵佯攻古溪、蒋垛、季家市、卢庄、老叶庄等据点，准备打击出援黄桥的敌人。在红军和赤卫队的猛烈攻击下，北路已进入黄桥北关桥，西路突进街口的西寺桥。就在快要拿下黄桥的关键时刻，红军内部的奸细李吉庚（特务队队长）、李治平（特务连连长）突然分别从南路、东路的阵地上撤出部队，故意让路给黄桥的敌军包抄红军主力，使北关桥正向纵深发展的红军腹背受敌，造成较大伤亡而被迫撤出战斗。至中午，驻黄桥的反动军队害怕红军反攻，遂全部退出黄桥，转入广陵镇。

黄桥起义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于28日召开南通、海门、如皋、泰兴、泰县和靖江6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协剿”计划。决定先从泰兴入手，次及各县，并派省保安处长赴黄桥“督剿”。在敌重兵猖狂进攻下，到9月底，在如泰地区转战了6个多月的红14军第1师主力部队被打散，许多指战员壮烈牺牲，部分领导骨干被迫转移他地。

启东起义

1930年8月8日，中共江苏启东县行动委员会率领红军战士及群众240余人，在启东县城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6月13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告，要求以徐州、南通为中心举行起义，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爆发。7月中下旬，启东县委为适应起义的需要，将县委改为行动委员会（简称县行委），江眠天任书记，委员有顾南洲、杨思公等。县行委成立后，即着手进行秋收起义的各项组织准备。8月7日下午，获悉国民党县政府要在第二天杀害被关押的县委组织委员、县农民协会会长赵克明。县行委当即决定，提前起义，攻打县政府，救出赵克明。是日夜11时，来自永兴地区及其周围的80多名红军战士和160多名农协会会员，汇集顾南洲家。江眠天等作战斗员。8日凌晨1时，三路队伍分别由江眠天、顾南洲、杨思公指挥到达各自预定的攻击点。红14军启东中队队长施友礼在县政府正门前点燃火把，发出攻击信号，三路队伍同时发起攻击。杨思公指挥的一路队伍由正门攻打县政府，县长夏钺青吓得连忙剪掉胡须，化妆混在一部分公务人员中从后门逃出。起义队员烧毁县政府房屋数间和部分行政案卷。另一路从西侧攻击公安局，一名警官欲举枪顽抗，被起义队员用菜刀砍倒。红军战士朱廷佐冲入屋内，射伤警察队长朱昌茂，其余警察狼狈逃窜，公安局被占领。负责劫狱的一路队伍，砸开监狱，救出赵克明及其他四五十名“犯人”。与此同时，北新、庙桥和黄仓等地的中共党员焚烧新港和久隆北两座大桥，割断电线，以阻敌增援。随后，在县城张贴布告及宣传标语，号召人民起来和反动派斗争。此次战斗计毙敌5名，俘6名，投诚的7名；缴手提式机枪1挺，长短枪21支。至天明，国民党启东县政府勾结恶霸地主，一面实行全城戒严搜捕；一面电请省保安队1个中队赴启镇压。赵芝兰、姚炳、宋廷宰等9名中共党员惨遭杀害，许多起义队员的家被抄被烧。鉴于白色恐怖严重，江眠天等人被迫转移隐蔽。

起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表现了启东县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敢于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英勇气概。

大村起义

1930年8月8日，中共江苏东海县委在灌云县云台山区（今属连云港市），领导当地山民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举行了武装起义。

云台山一带的山民自古就靠“一条扁担两根绳”，进山拾草打柴，采集药草，赖以维持生计。然而历代的统治者总是制定许多山规山禁，严禁山民进山拾草打柴，山民们怨声载道。1926年，灌云县板浦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学生、云台山武庄人武同儒，在新文化、新思潮影响下，与乡亲好友范培林、徐恒隆等联络山民，组织了“穷人会”，推范培林为会长。1928年秋，武同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3月武同儒参加竞选，成为国民党县党部执委。之后，武同儒利用合法身份与中共东海县委派来的共产党员娄子珍、毛汝楠、王芷项（女）、仲衡（女）等在大村办平民夜校，积极培养“穷人会”成员中的骨干分子徐恒隆、徐佃喜等10多人入党，并建立了中共大村支部。

1930年7月中旬，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徐海蚌特委改为徐海蚌总行动委员会，所属各县委均改为行委。东海行委根据总行委的指示，决定在大村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武同儒利用自己在山民中的威望，发动“穷人会”的骨干和党员进行筹集枪支弹药等准备工作，又通过关系与灌云县龙王荡徐文浩领导的地方武装取得联系。原东海县委军事委员李少堂，利用在盐防营当杂役的身份，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从盐防营弄到长短枪30余支，子弹300余发。徐佃喜等人在五道沟、开泰、中正等地盐防营强行夺枪数十支。根据筹集到的枪支，东海县行委决定将计划参加起义的500余骨干按军事组织编成1个武装团，团长徐文浩，下辖3个营，起义指挥部设在阿育王塔。

8月8日，武装团及参加起义的山民1000余人，从四面八方蜂拥上山，将红旗插在鸡鸣山山顶，一举占据了山林。随后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山霸仇东山家进发。骨干分子张才一马当先，从东侧用“鬼头刀”砍倒铁丝档，但因仇家大院坚固，设有炮楼，加之起义队伍缺乏攻坚武器和炸药，几度强攻，终未奏效，双方相持10多天。这时仇东山亲信以重金贿赂灌云县反动当局。国民党县党部遂请徐州国民党第26师1个团前来镇压。由于带路人仇益堂暗中协助，带领军队绕道行进。临近大村时，故意敲响大村街南大档门的铁锁，以通知住南庙起义队伍的哨兵。起义队伍得到报告便迅即向南山撤退。第26师部队对起义队伍呈扇形追剿，起义队伍分散撤离。后在李少堂、徐佃喜、王同朝率领下转战赣榆地区。

陵水八月起义

1930年8月8日，潜伏在驻广东琼崖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5连连任排长的中共党员陈平和思想倾向进步的副连长陈国霖，在5连驻地陵水县城发动了武装起义。

1930年夏，驻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调离海南，接防的海军陆战队与地方保安团在海口曾多次发生火拼。驻陵水的陆战队第5连连长鱼肉士兵，克扣军饷，士兵不满情绪日增。中共陵水县委抓住这一时机派黄光焘、李亚光潜入县城，开展兵运工作。

8月7日，该连连长毒打偷卖子弹的几名士兵，并把他们禁闭，准备送上司治罪，引起士兵们的愤慨。中共地下党员、该连排长陈平抓住这个机会，秘密发动副连长陈国霖和20多位心腹兄弟，下半夜举行起义。次日凌晨2点，陈平、陈国霖带领几名起义士兵悄悄来到连长住处，陈国霖谎称有紧急军情报告，陈平趁反动连长开门的瞬间，将其击毙。枪声惊醒了全连士兵。陈国霖马上集合全连开会。会上陈平激动地说：反动连长已被我们打死了，我们都是贫苦人民的子弟，不要再为国民党反动派和财主老爷们卖命了，只有投奔红军才有出路。陈国霖接着说：我支持起义行动。愿意起义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放下武器回老家去也可以。全连士兵在陈平和陈国霖的动员下，纷纷表示愿意起义，投奔红军。5连起义官兵在陈平和陈国霖的指挥下，随即包围了中区秀峰民团，缴获长短枪40余支。然后包围国民党陵水县政府，俘获县长黄少怀，并打开监狱救出兰家成等共产党员。在北区和南区民团企图阻击起义军的情况下，陈平马上组织队伍迅速撤离县城。陈国霖带领一部分官兵从西北方向撤离；陈平带领另一部分官兵从西南方向撤离。两路人马都在下午1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在坡村根据地，起义官兵受到中共陵水县领导人黄振士、林宏梓、王白伦等的热烈欢迎。之后，黄振士代表当地党组织宣布将红军和起义军合编为1个红军营，并指定陈平任营长，陈国霖任副营长，黄振士兼任党代表。

泥城起义

1930年8月9日，中共江苏南汇县委（今属上海市）在泥城地区发动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南汇县位于黄浦江以东，西接上海，东临东海。泥城为该县东南角一小镇，又称“泥城角”。泥城地区群众多为农民、盐民和渔民。反动当局在横港设有泥城警察分局，实行强征暴敛。

1927年，南汇县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起初，与川沙、奉贤三县合为浦东县委。1928年8月正式建立中共南汇县委，周大根任县委书记。1929年1月，周大根调往松江，杨杏春接任县委书记。5月间，杨杏春被捕，由吴仲超代理县委书记，同年8月，县委改组，吴仲超任书记。1930年7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黄理文到南汇县巡视。区委书记沈千祥等人汇报了泥城地区党组织建设和农民、盐民运动的情况。黄理文分析讲述了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情况，认为泥城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应立即组织农民、盐民举行起义。区委会议同意黄理文的看法和主张，并决定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7日，黄理文回到南汇县大团镇，因未见到吴仲超，第二天赶到泥城。当晚即与沈千祥召开了区委扩大会议。黄理文传达了省委指示，提出第二天晚上就举行起义。沈千祥等认为事关重大，要等吴仲超来后确定举事日期，但遭到黄的拒绝。

8月9日晚9时许，黄理文、沈千祥先后对1000余群众作了简短动员。将起义队伍分2个大队，由宋根生、顾亚光分别担任大队负责人。由沈千祥、黄理文率领，向懒港盐廐进发。接近盐廐时，在煤油箱内燃放鞭炮充作机枪，冲过小桥占领盐廐。接着冲进地主叶冬生家，分了叶家的衣服、布匹等物。时值后半夜，沈千祥、黄理文率领队伍奔袭横港的泥城警察分局。敌人毫无准备，宋根生、顾亚光、姜文奎等冲进警察分局与敌人短兵相接。激战半小时，毙敌7名，俘敌1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银元、纸币600多元。10日凌晨，起义队伍又到横港，收缴了朱心田埋藏的3支短枪，将抄出的钱财和衣服、粮食等物分给群众，焚烧田契、借约、账册。起义指挥部临时设在朱家大院，在大门前升起红旗，张贴标语和布告。10日上午，沈千祥、姜文奎向群众演讲，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影响，准备下午召开庆祝泥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第18军第1师正式成立大会。但在中午，抓到一名敌探，得知国民党反动政府已调集驻周浦镇警备第2师的2个团前来镇压。起义指挥部决定大会推迟，疏散群众。下午3时，指挥部撤到海边，留下100多名起义骨干准备对付敌人。傍晚，沈千祥又率起义队伍攻打外三灶保卫团，敌人得到消息已经逃跑。接着又去万祥镇抓敌大队长徐家杰，徐也逃走。12日晚，起义队伍转移到奉城边的老白露宿营，此时敌人已实行戒严和巡逻，起义队伍活动非常困难。沈千祥决定，队伍分散隐蔽，留下有武器的20多人在海滩芦苇丛中，昼伏夜出。坚持到14日，沈千祥到大团镇找到县委书记吴仲超，两人研究决定：起义队伍暂时埋藏武器分散隐蔽。当晚，队伍分散后，沈千祥、姜文奎、宋根生分头去上海。

姚北起义

1930年8月11日，在中共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余姚县委的领导下，浙江余姚北部农民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余姚北部，为钱塘江和杭州湾冲积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

1930年7月，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计划在浙东三北地区（余姚、慈溪、镇海3县之北部地区）组织武装起义，并派党员史济勋来余姚具体帮助指导。史济勋和费德昭（曾任余姚县工农纠察队队长，在姚北一带声望很高）在大革命时期已有交往。史接受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交给的任务后，即写信约费赴沪会晤，共商义举。费德昭收到史济勋的信后，即派其子费永思赴沪。史济勋简要地向费永思提出了在三北组织起义，准备请其父出面领导等计划。费永恩答应向父禀报后再予答复。于是史、费相偕回姚。抵达余姚后，费永思回家向父禀告，史济勋则与中共余姚县委书记朱亚之取得了联系，向县委传达了中央决议精神，提出要在浙东三北地区组织农民、盐民起义，以费德昭的力量为基础，并加以补充，然后攻打余姚、宁波等城市。中共余姚县委对此作出决定：由县委副书记洪传扃和县委委员胡尧田等前往坎墩，协助史济勋组织三北起义。随后，史、洪来到姚北坎墩，与费德昭商谈。费完全赞同起义主张。同时，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派罗希三、王连英、徐云千等人，携带枪支、经费抵达坎墩，与史、洪汇合。人员到齐后，成立了“军事行动委员会”，由史济勋、洪传扃、费德昭、罗希三、徐云千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确定了三北起义的大致行动计划。

8月初，江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以江南省委的名义，命名起义队伍为“浙东工农红军第1师”（以下简称“红1师”），任命费德昭为师长，史济勋为党代表，洪传扃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分工罗希三担任组织部长，徐云千任宣传部长，胡尧田为农运部长，费永思任联络参谋并兼总务。“红1师”内部还建立党团组织，由史济勋兼任党支部书记，王连英负责青年团工作。当时“红1师”在编人员约百余人，分设为两个营，营以下按连、排、班的序列编组，计配有长枪40余支，短枪若干。师部设在坎墩六灶庵。“红1师”成立后，主要目标是打击一些集镇上的警察所及地主武装，捕捉零星敌人，缴获他们的武器，装备自己。8月上旬，“红1师”首次作战行动是奔袭姚西黄家埠的地主武装，但因该处环境复杂，四周均为河流，再加上内中保卫团戒备甚严，未能突破，只好撤回。第2次行动是慈西蜀山的蔡宅缴枪（今为余姚市双河乡同兴村）。宅主蔡伯均系慈西一带大地主，也是洪传扃的舅父。蔡多年来自设保卫团，还请了1个“老干军务，人颇干练”的王义才任保卫团什长（相当于班长）。8月11日夜，洪传扃、郑尧炳等13人分为两组：洪带2名战士为一组，以探访舅父为名，进宅借枪，见机行事；郑率余部为另一组，隐匿蔡宅周围接应。蔡伯均拒绝借枪，什长王义才便乘洪等不备，实施偷袭，红军战士里外呼应，发起战斗，当场击毙王义才，枪伤蔡伯均，并缴得长枪7支，短枪4支，凯旋而归。“红1师”还先后在横河、丈亭、道路头和上虞、百官、宁波郊区等地袭击警察所及缉私盐兵，多次打击地主武装，取得了一些胜利。“红1师”日益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宣传活动，威振姚北。惊恐万状的反动当局急忙调遣重兵，实行镇压。8月20日，国民党省防军第6团陈鹏华营由杭州海运到姚北，会同罗三元为首的地主保卫团，“围剿”“红1师”。面对强敌，“红1师”采取灵活的战术，与敌

周旋。将部队兵分两路，以转移敌军视线，一路由郑尧炳率领部分战士，跳出敌军“围剿”圈，在外线流动，寻机作战，迷惑和牵制敌人。该部曾成功地袭击了鄞西黄古林警察所，毙巡官1名，缴长短枪6支。另一路则疏散隐蔽于附近田野，昼伏夜出，伺机扰乱敌军。10月深秋，田间作物收割殆尽，气候也日趋寒冷，旷野已失去了藏身之处，国民党军队便乘机加紧对红军的“围剿”。“红1师”的处境和行动日显艰难。在此情况下，“红1师”军事行动委员会决定暂缓组织起义，已暴露的领导人员暂退避上海，红军战士则分散隐蔽。

李坊起义

1930年8月12日，福建西部清流县李坊乡农民在共产党员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6月，与李坊乡毗邻的宁化曹坊等5个乡爆发了农民起义。群众打垮了国民党民团武装，建立了工农政权，李坊乡革命群众深受鼓舞。8月，中共党员曹登昂、李光耀串连了一批贫苦农民，秘密酝酿举行武装起义。12日，李坊、黄竹潭、杨坊等5个村的群众200余人聚集于杨坊东岳庙，李光耀向到会的群众宣布举行武装起义及打土豪，开仓赈济贫苦百姓，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纲领。会后，曹登昂、李光耀带领暴动队冲进洋背大土豪罗启水的住宅，缴获步枪数支，并破仓分粮。其余各村，也在暴动队的带领下，攻下了土豪的土楼，缴获了枪支，烧毁契约，没收了粮食及财产。

起义后，李坊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李光耀任乡革命委员会主席，曹登昂任乡工作团组长。半年后，在里田成立了区革命委员会，加强了对李坊、里田、田头、荷坑等乡苏维埃政权的领导。

五里岗起义

1930年8月21日，中共保属特委和完县中心县委领导农民在该县五里岗举行了武装起义。

五里岗位于河北省完县城西5华里，西靠太行山。全村160户农民，在大地主葛洛殿等的压榨剥削下，四处逃荒要饭。1926年，成立了中共完县特支。1927年成立完县县委，韩永禄任书记。完县特支和县委成立后，努力宣传革命道理，教育群众，发展共产党员。至1930年上半年，完县、满城、唐县、易县、望都中心县委组建了30多个共产党支部，有700多名共产党员。在此形势下，中共完县中心县委于8月14日，召集有20多个村庄的党支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以五里岗为中心的起义计划，并决定组建农民武装司令部，成立红22军，县委书记韩永禄任司令员兼军长，下辖3个大队12个小队，共500多人。在完县县委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下，8月21日，起义农军分3路冒雨攻打完县县城。经两天多的激烈战斗，因遭国民党1个团的正规军与地主武装的疯狂反扑未果。完县县委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决定撤出战斗，转移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撤退中，虽多次击退反动武装的包围与堵截，但伤亡较大。为保存革命力量，部分分散隐蔽，继续坚持斗争。

沃柄起义

1930年8月，中共福建省莆田县委在该县沃柄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0年6月底，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发动漳属、闽北、莆田、泉州四处的农民举行起义。省委书记罗明到莆田视察后，决定调曾一真任莆田县委书记，以加强莆田起义的领导力量。这时，莆田沿海农民革命情绪甚好，游击队已达百余人。8月，中共莆田县委、共青团县委在秋芦的共度村开会，决定：党、团县委合并成立莆田总行委；莆田工农济南队改编为红军第23军第217团，团长黄琬、政治委员陈天章；先于沃柄布置地方起义、于荔城组织海军的士兵起义等。会后，总行委通知各地游击队到沃柄集中，召开200多人的广业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第217团（50余人）、广业区苏维埃政府、广业区赤卫队。接着，斗争地主恶霸陈西安等5人，缴枪6支，烧毁田契，实行土地革命。

8月中旬，驻田城的国民党海军林寿国部以4个连的兵力，兵分3路合围沃柄。因浓雾弥漫，敌人进到沃柄桥头时红军哨兵才发现。驻在沃柄宫的黄琬团长亲自断后，掩护40多名红军战士撤退，后因弹尽受伤被俘。住在下茹山的红军团政委陈天章和王纪修、陈蒲川迅速集合红军、赤卫队还击，弹尽后撤往山上。红军、赤卫队牺牲6人。

9月，省总行委调惠安干部杨伟继任第217团团长，与政委陈天章整顿第217团，队伍恢复到60余人，继续举行沃柄起义。不久，在沃柄宫召开群众大会，镇压地主恶霸2人。随后袭击沃柄税卡，缴枪7支；截击常备队的巡逻队，毙、伤敌各1人。此后，驻荔城的国民党海军和驻白沙带的广业民团、常备队合围沃柄。杨伟、陈天章率领第217团转移至莆田、仙游两县交界的黄龙、月天安地区。后又遭驻莆田海军1个营的“围剿”，第217团隐蔽撤离。

江津起义

1930年9月3日，在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国民党军第24军驻江津之第1师第2混成旅3个连官兵举行了起义。

江津是四川省建立中共党组织较早的县之一，1926年建立第1个党支部。1927年，共产党组织在驻江津第1师第2混成旅的兵运工作有很大发展，副师长兼混成旅旅长张清平是共产党员。至1929年春，该旅有共产党员200多人。1930年7月，中共四川省军委会把江津列入发动起义的重点地区。8月29日，四川省临委派项鼎到江津，与该旅共产党负责人李克俊研究决定于9月5日起义，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项鼎、于渊、李克俊、龚慰农和曹泽芝为行委成员。因泄露，当局对部队采取防范，对士兵的枪支和被服集中保管。项鼎等人针对这一情况，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9月3日。3日下午，李克俊发动机枪连官兵首先起义，夺取了机枪，该旅第1营第1、第3连官兵也响应起义，击毙营长王文德。然后，起义官兵冲向国民党江津县政府，遭到警卫县政府的连队顽强阻击，参加起义的第2营第6连1个排向警卫部队攻击，但未能得手。混成旅第4团团团长魏鸿钧与城防司令陈子卿率队镇压起义官兵，40多名起义官兵被杀害。起义领导人项鼎、于渊在群众掩护下回到重庆。

牛头山起义

1930年9月5日，在中共浙江宣平县委的领导下，遂昌、宣平（今属武义县）、松阳三个县的30多个村庄的农民在牛头山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

牛头山地处遂昌、宣平、松阳三县地区，形似牛头，横卧在遂昌县的东乡。

1927年10月，中共宣平县委委员吴谦到宣遂边境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

1930年初到5月，共产党员许樟林、刘关明、陈呈根、张根祥等相继在去峰乡的白沙、濂竹乡的千义坑、马头乡的弦头弄、云峰乡的祥川村发动农民，他们以组织青帮为掩护，成立了遂昌农军东、南、西、北营，在云峰乡天堂村设立农军总营。各营分别由徐水太、陈呈根、吴樟土、郑火松负责，许樟林任四营总指挥。各营下设连、排、班组织，规定了联络暗号。后来，遂昌农军改称为遂昌红军游击队。

为了武装这支革命队伍，县委一面让遂昌红军广泛收集山区农民用的鸟枪、土铳、大刀、长矛等武器，一面组织人员自制土枪、火药。1930年9月4日，吴谦带了3000余元银洋，以采购中草药为掩护，从宣平出发，拟经金华、兰溪赴杭州购买枪支并向在杭的宣平县委书记曾志达汇报情况。不幸，吴谦去杭州的行动计划，被宣平大河源的恶霸鲍益丰和大河源的药店老板徐寿寿识破，鲍、徐立即合谋向驻兰溪的浙江保安第3团告密，致使吴谦一到兰溪就被捕，9月6日被枪杀在兰溪南门外。

这支300余人的遂昌红军游击队武装一建立，即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当时红军旗帜上的图案是镰刀、斧头），以推翻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推翻剥削和压迫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穷苦农民翻身求解放为目的。

1930年9月2日，遂昌红军游击队与宣平红军汇合后，决定队伍稍事整训后，于9月5日举行起义。是日凌晨，起义队伍开赴宣平县的樊岭脚，伏击国民党宣平地方部队。敌人在受到我军伏击后，十分惊恐，准备沿小溪逃窜。敌人发现我军所用的武器是土货后，立即疯狂反扑，红军排长鲍连兴等当即阵亡。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敌人溜进了宣平县城。

战斗结束后，遂昌、宣平两县红军返回各自驻地。途中，遂昌红军徐腾正、张正富、王樟根三人与部队失散，途经门阵村附近，被门阵地主武装保卫团拦截，徐、张两人被捕。9月9日，徐、张两人被门阵保卫团的正副团长张大金、张仁贵砍断足筋活埋。12日，我军指战员怀着满腔仇恨，手执大刀长矛，肩扛土枪土炮，在许樟林、郑汝良（宣平红军西营指挥）的率领下，直奔门阵，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武器优势，顽固反抗，双方相持不下。我军指战员再次猛攻，杀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余者狼狈逃窜。

门阵之战结束，遂昌、宣平两县红军领导人在旧处村召开会议，一致认为，经过这次战斗，敌人会更加疯狂地围剿我军，决定马上转移。

13日，按郑来德的建议，遂昌、宣平两县红军转移到遂昌县天堂村。是日，卢子敬、陈凤山率松阳红军也抵达天堂村。于是，遂昌、宣平、松阳三县红军千余人会师天堂村，军威大振，指战员们斗志昂扬，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三县红军会师天堂村，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分，地

主恶霸、土豪劣绅纷纷向县政府请求从速派兵镇压。9月中旬，遂（昌）宣（平）汤（溪）松（阳）四县反动武装向红军开展了联合“围剿”。三县红军面临敌人的疯狂围剿，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郑汝良等率领宣平红军游击队向宣平上坦方向转移；另一路由许樟林等率领遂昌、松阳红军游击队转移到牛头山的天师殿驻扎。

9月25日，浙江省政府派出保安第1团，开赴牛头山区镇压红军，屠杀革命群众。遂昌红军有24人被杀害，18人被捕入狱。

长坡起义

1930年9月15日，驻广东琼东国民党军海军陆战队第3营第9连排长蓝周清，在中共兵运政策感召下，带领全连官兵在琼东县长坡圩举行武装起义。

1930年夏天，中共琼崖特委在第4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关于发动“红五月”攻势的决定。中共琼东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兵运活动。

驻琼东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9连受命镇压起义农军。该连排长蓝周清，在中共党的兵运政策感召下，不愿意再替国民党卖命。在“清剿”农军时，他经常朝天放枪，示意农军躲避，还经常将子弹丢在路上送给农军。蓝周清的行动，被其连长韩镇疆发现。韩镇疆以蓝周清“剿匪不力”为由，撤销了他的排长职务，降为上士班长。蓝周清决定发动全连倒戈，投奔红军。

9月15日，琼东县第5区团防局团董孔厚甫拟在次日集市上，公开处决几天前被捕获的中共琼东县第5区区委书记杨绍蓉（女）。蓝周清决定在15日晚发动起义，救出杨绍蓉。

15日晚10时，蓝周清组织人员首先开枪打死连长韩镇疆和连队文书，又处决团董孔厚甫，接着集合全连正式宣布起义。尔后砸开监狱救出杨绍蓉，请她带路，把起义队伍开往红军驻地。经过一夜的艰难跋涉，起义队伍于翌日9时到达红军独立师第1团第1营驻地高原村。红军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国民党当局得悉第9连起义后，当即派海军陆战队第2营向高原村红军驻地发起进攻。红军、赤卫队和起义官兵奋起抗击，把敌人赶回县城。此后，起义队伍编入红军独立师第1团第2营，蓝周清任第4连连长。

惠安起义

1930年9月16日，中共福建省泉州特委和惠安县委在惠安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0年2月，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决定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强调要加强惠安所在的泉州地区的工作。7月下旬，省委书记罗明到泉州、惠安巡视检查工作，经与泉州特委研究，决定成立福建红军惠安指挥部，陈平山任总指挥，蓝飞风（林啸南）任政治委员，加紧惠安全县起义准备工作。同时，省委又派苏阿德来惠安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

8月，泉州特委和惠安县委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起义计划和具体任务。下旬，前林村妇女缝制起义红旗、袖章时被该村反动分子探知而泄密，反动民团加强戒备，形势紧迫。为先发制人，惠安县委决定起义日期提前于9月15日拂晓，惠东、惠北同时起义。

14日夜，惠东红军第2团全部集结在后洋村。由于作战方案迟迟不统一，致使起义日期推迟了1天。16日清晨，红2团200余人枪，在团长蓝飞鹤、政治委员陈琨率领下，包围了五陈乡民团所在地山柄村，在民团内部进步士兵接应下，攻克碉堡，击毙民团团长陈鸣周、恶霸地主陈奕昭，成立了五陈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春木。17日，红2团进驻胡埭头村，成立村苏维埃政府。18日，红2团占领前林村，镇压了反革命分子陈孝纯、林亮川。后起义队伍在距县城很近的屿头村宿营时遭到国民党军的进攻，红2团转移至大吴。

惠北红军第1团，在团长兼政治委员陈平山的率领下，在围攻涂岭反动分子陈建生住宅时，因久攻不下，遂撤出战斗。尔后，惠安起义武装在三坪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又遭国民党军重兵的进攻，主要领导人陈平山、蓝飞鹤等先后牺牲，斗争受挫，革命转入低潮。

宣平起义

1930年9月中旬，中共宣平县委根据中共浙西特委的部署，在宣平县曳岭区和遂昌县门阵等地组织领导了武装起义。

1928年，中共宣平县委根据浙西特委的部署，先后组织了多次农民起义，查抄地主豪绅的浮财，焚毁田契，斗土豪，分田地。

1930年5月，在县委领导下，邱金隆等在吴宅慈仁寺建立了宣平红军的第1支部队—宣平北营红军，并设指挥部于羊虎坪，邱金隆任指挥，邹高水任副指挥，主要活动于北乡一带。6月上旬，宣平西营红军也在大河源成立，郑汝良任指挥，活动区域迅速扩展到宣平的整个西乡及邻近的松阳、遂昌等县边境，他们收缴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动群众抗租、抗缴苛捐杂税，人数达千余人。6月下旬，宣平南营红军成立，潘成波任指挥，朱生民、姜云龙任副指挥，指挥部设在张大山、三岩寺一带。7月中旬，北营红军指挥部派陈祖训、潘土法率领150余人，在东世、上周一带又建立了宣平东营红军，陈祖训任指挥，潘土法任副指挥。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全县建立了东、南、西、北4个红军营，参加人数达2000余人。此时，中共宣平县委为了加强领导，于7月底成立了有县委常委、执委和各营指挥参加的红军军事委员会，由县委书记曾志达担任军事委员会的总指挥，陈俊、吴谦、王湘、阮芝唐、邱金隆、郑汝良等为委员，同时指派了陈俊、王湘、吴谦分别为南、西、北3个红军营的党代表，定番号为“红军第13军浙西第3纵队”。

9月中旬，遂昌县驻门阵的保卫团，经常到宣平境内上水雅坑、观音寺一带“围剿”红军。为了打击其反动气焰，宣平西营红军决定主动出击，攻打门阵保卫团。一天，西营红军指挥郑汝良率领300多名红军战士，星夜出发，第2天拂晓，包围了保卫团的驻地，集中火力，当场打死打伤敌军近10人，胜利攻克门阵。

门阵保卫团溃败，西营红军乘胜追击，又打死打伤敌军数人。然后，直奔遂昌县的天堂，与松阳、遂昌两县的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3支红军队伍一面开展抗租、抗税、抗粮斗争，惩办豪绅地主和恶霸；一面收集民间武器，加强武装力量的准备。

南营红军建立后，活动于南乡与丽水边境。这支有200多人的红军，战斗力比较强。队伍到达高水村时，与丽水朱生民率领的百余名红军汇合，成立了南营红军军事委员会，王湘为党代表，潘成波任指挥，朱生民、姜云龙为副指挥。9月3日，他们集中兵力袭击了国民党宣平县曳岭区署。

9月15日，丽水保安队一个连，由地主陈依廉当向导，兵分两路向驻三岩寺的红军进犯。他们一路经太平、世溪，偷袭驻西畈小学的红军；一路经张村街、周坦，袭击三岩寺的红军，妄想一口把南营红军吃掉。

这天凌晨，偷袭西畈小学的敌军，被红军哨兵发现，开枪报警。朱生民立即指挥红军迅速投入战斗。虽然敌强我弱，但是红军机智勇敢，一面坚强奋战，一面向西畈后山撤退，一直打到刘岗岭，把敌人击退，安全转移。袭击三岩寺红军的另一支国民党保安队，沿着小溪向三岩寺逼近，把守头门的黄檀炮手听到枪声后，急忙点火开炮，但由于导火线受潮，一时点不燃，被敌人开枪击中，壮烈牺牲。敌人乘机集中火力，占领了头门，几挺机枪一齐向寺内的红军扫射。由于通往寺内的唯一出口被敌军封锁，红军只能在洞内展开激战。顿时，全洞硝烟弥漫。战斗延续了6个小时之久，待红军弹药

殆尽，敌人涌进山洞，战士们宁死不屈，与敌血战，潘成波与 50 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其余百余名战士在王湘、姜云龙的指挥下，攀着枝藤、毛竹顺悬崖而下，冲出包围，与北营红军会合。

蕪中起义

1930年9月20日，在红8军的支援下，中共湖北省蕪春县委组织领导群众在蕪春中部举行了武装起义。

从1930年5月起，蕪春县委和桐梓河区委领导谈家沟、唐家山、白水畈、盖天庙等地的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秘密筹集土铳、刀矛，组织赤卫队。9月中旬，在桐梓河成立了蕪春县暴动委员会，由胡维庆任总指挥。县暴动委员会决定消灭桐梓河吴楼下吴翰香指挥的县自卫团第5中队及民团共70余人的反动武装，以打开蕪中的局面。并派人赴黄梅县请红8军支援。9月19日，红8军一部奉命进抵桐梓河地区。20日拂晓，当地暴动群众在红8军的大力支援下，一举击溃了县保卫团第5中队及民团，击毙20余人，俘虏10余人，缴枪50余支，吴翰香化装逃走。红8军为了支援地方起义，留下一部分骨干。县委书记张觉仁和胡维庆等领导人，连夜召开蕪中各地起义负责人紧急会议，对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作了部署。从21日起，蕪中各地起义纷纷而起。谈家沟支部书记谈松山率领起义队伍处决了恶霸地主张惕斋；白水畈支部书记张镇亚和吴基富率领起义队伍击溃了王星恒民团后，会同郑少波率领的赤卫队全歼盖天庙陈家花屋陈子忠民团，共产党员吴幼团率领起义队伍在边街打了几家土豪劣绅。几路起义队伍共缴步枪13支，没收了10余家土豪劣绅的财物，当即分给了贫苦农民。

蕪中武装起义胜利后，县委从起义队伍中挑选了300多名精干分子，组成第9游击大队，吴基富任大队长，张镇亚任政治委员，詹春波任副大队长。蕪春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县赤卫队指挥部亦在桐梓河宣告成立。11月，武装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革命武装包括赤卫队共达3000余人，相继建立了4个区、12个乡、71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蕪中苏区形成。

监利起义

国民党新编第3师教导团第1营两个连的官兵在共产党员杨嘉瑞领导下，于1930年9月22日在湖北省监利县城举行起义。

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为实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战略上的统一，扫除洪湖与湘鄂边两块根据地联系的障碍，决定夺取监利县城。9月中旬，红2军团前委在周逸群、贺龙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监利县城发起进攻，并指示县城驻军中的共产党员杨嘉瑞乘机组织士兵起义。

杨嘉瑞时任国民党新编第3师教导团第1营第9连连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隐蔽从事兵运工作，在该部团结了一批倾向共产党的士兵，为起义打下了良好基础。9月21日晚，杨嘉瑞秘密召集9连和10连思想进步的班、排长开会，利用士兵悲观情绪，结合当时军事、政治形势进行宣传动员教育，参加人员一致表示愿意弃暗投明，乘红军进攻时举行火线起义。9月22日拂晓，红2军团在当地农民武装的支援配合下，冒雨对监利县城发起了总攻，很快肃清外围据点，冲入城内，进行巷战。守军且战且退，撤至城南江堤，居高临下拼死抵抗，战局呈胶着僵持状态。杨嘉瑞果断发出信号，9连和10连士兵调转枪口，集中火力，向国民党军猛烈扫射，红军乘势发动猛烈攻击，国民党军腹背受敌，分两路向东西方向逃窜，多被红军俘获。是役，共歼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迫击炮5门。红军攻克监利县城后，起义官兵被编为红6军第49团2营，杨嘉瑞任营长。

通山第二次起义

1930年9月23日，中共鄂南行动委员会和通山县行动委员会在通山县组织2万余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

中共湖北通山县委曾于1927年8月30日组织秋收起义。因而该县有良好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1930年上半年，通山县大部分区、乡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县工农游击大队发展到200余人枪，赤卫队、少先队发展到万余人，形成了以大畈地区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局面。此时，通山县城驻有国民党第75师1个营，还有县警备队。并在通山县西北边境的南林桥、山口铺派重兵把守，与咸宁、崇阳等驻军联系密切，企图进犯苏区。9月上旬，鄂南行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意图，确定在通山组织大暴动，夺取县城。同时，成立了以叶金波（时任中共通山县委书记）为主任的通山县行委，具体组织指挥武装起义。9月20日，县行委召开各路农军负责人会议，讨论了攻打县城的具体方案，将起义时间定为23日拂晓。

22日夜，各路农民群众约2万余人从四面八方集结隐蔽于南门城外。23日6时许，攻击开始，突击队首先攻破了南北城门，工农游击大队勇猛冲入城内，接着各路农民群众蜂拥而入。守城驻军及县长从东门逃窜。农军迅速占领了县城，搜捕民团及土豪劣绅，缴获机枪1挺，步枪8支，手枪1支，俘获侦探1名。没收了一批财物，动员商户捐款一批。上午10时，城西北白鹤山之国民党军队百余人，组织反攻，农军及群众伤亡百余人。叶金波等领导人为避免更大伤亡，下令工农游击大队撤至大畈苏区，其他农军及群众回原地待命。

鄂东行委得悉通山起义得城复失，即派红军独立第3师（又称鄂东师）第7团到通山支援。29日，鄂南行委、通山县行委与红7团团长刘振山、政委郭子明等在大畈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再次攻城。30日上午10时，攻城部队攻破南门，第2次占领了县城，消灭了县警备队，抓获民团及土豪劣绅等数人。

国民党军第75师师长罗霖得悉通山县城失守，令原驻通山部队联合大刀会攻占县城，调1个团的兵力为后援。国民党军及大刀会成员百余人化装成红军混入城内，突然向农军发起攻击，农军措手不及，伤亡较大。刘振山指挥部队还击，终于将混入城内的国民党军及大刀会击溃。俘虏大刀会会员数人。鄂南行委、红7团和农军在国民党军后援部队到达之前撤离县城，返回苏区。10月上旬，红7团返回鄂东。

南澳渔工起义

1930年9月25日，在中共广东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澄海工农革命军一部和南澳县渔民共300多人，一举攻占南澳县城，史称南澳渔工起义。

南澳是广东东部的一个海岛县，陆地面积109平方公里。岛上渔民长期受渔业资本家和渔霸的压迫剥削。1928年秋，中共东江特委派党员林奕明等到南澳县的山顶村宣传组织渔民反对渔业资本家与渔霸的斗争。不久，中共南澳县党支部在县城隆澳成立，林奕明任支部书记。渔民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召开群众大会，建立工会组织，反剥削、争自由的斗争蓬勃开展起来。然而不久，渔工的斗争即遭到国民党的镇压，林奕明被逮捕入狱。1930年6月23日早晨，共产党员蔡盖清、陈戊等发动渔民二三百人手拿竹槌、桨棍来到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林奕明。国民党县长见渔民越聚越多，被迫于当天释放了林奕明。林奕明回到渔民中间后，立即和蔡盖清等组织渔民骨干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渔工进行武装斗争。7月，蔡盖清、陈戊等在前江埔成立南澳渔民公馆执行委员会，提出给渔民增加工资。然而，渔民的斗争又一次遭到国民党的镇压。8月10日下午，国民党南澳县当局在新市逮捕了蔡盖清。党支部决定派陈戊回大陆，向上级组织报告情况，并请红军到南澳岛协助渔民举行起义，营救蔡盖清。东江特委接到报告后，决定派曾担任潮安县委书记的杨少岳为总指挥，率澄海县工农革命军大队长张福海等武装人员12人潜入南澳，协同南澳党支部举行起义。杨少岳等上岛后，积极协同岛上渔民进行起义准备。9月23日，国民党南澳当局将蔡盖清秘密杀害。渔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忍无可忍。杨少岳和陈戊决定利用渔民愤怒的机会，因势利导举行起义。他们召开渔民骨干会议，研究了具体计划。9月25日，杨少岳、陈戊等率领红军武装人员和100多名渔民，分三路袭击云澳妈宫的国民党军警卫小部队。敌人在渔民的打击下，弃枪狼狈逃窜，起义队伍缴枪29支，弹药一批。翌日，起义队伍乘胜分三路袭击隆澳，恰逢驻守县城的国民党守军警卫队到云澳救援，只留20余名勤杂人员留守。起义人员一举攻入县城，附近渔民纷纷响应，队伍增至300余人。

不料，在云澳扑空的国民党军县警卫队很快返回县城，与起义队伍激战数小时，因力量悬殊，起义队伍失利，只好从县城撤向鲤鱼山，准备再战。27日，国民党军一个连及“海虎号”等三艘军舰增援南澳，围攻起义队伍。撤退中，红军6人及渔民干部8人牺牲，其余人员分散隐蔽。

宿松起义

1930年9月26日，在中共鄂东特委和蕪黄广中心县委的领导与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的配合下，中共安徽宿松县委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宿松起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中共黄梅县委的帮助下，宿松县建立了中共支部。1929年7月，宿松县革命委员会在东林寺小学成立。8月，南北冲、长溪山、邱家山、陈汉沟、二郎河等地的赤卫队、乡村苏维埃纷纷建立，赤卫队员发展到3000余人。1930年5月，因旱灾严重，山区群众闹饥荒，宿松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祝汝昌抓住时机，发动贫苦农民开仓分粮，与地主老财进行斗争。7月，新的中共宿松县委在黄梅北山寺成立，书记王新儒。9月，又在北山寺成立了宿松县暴动委员会，祝汝昌任主席，吴贵兴任县苏维埃赤卫队总指挥。

为了打击敌人，粉碎敌人对古角苏区的封锁，恢复和扩大宿松苏维埃区域，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中共宿松县委、宿松县暴动委员会在鄂东特委和蕪黄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决定由红8军第4、第5纵队协助，发起攻打宿松县城的武装暴动。9月25日，宿松县暴动委员会和宿、黄边区赤卫队及红8军第4、第5纵队共1000多人从黄梅小溪移师宿松县亭前。暴动领导人在亭前召开会议，决定由红8军第4、第5纵队和宿、黄边区赤卫队承担主攻任务，地方群众担任运输、救护等工作。考虑到攻城大军必经之地——宿松二郎河，有国民党自卫团一个中队驻防，时任宿松县赤卫队大队长的吴祖保，以二郎团防秘书吴郁之家兄的身份，深入团防驻所，利用调虎离山之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26日清晨，暴动队伍悄悄靠近县城，占据座落于县城东北的钱家山、鲤鱼山两块高地，并挑选小东门至北门一段城墙为突破口，向城内守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宿松县长周崇颐及东区自卫团团长叶中全、中区自卫团董事会主席桂毓梅等组织自卫团和商民戈矛队300余人严守四门，凭借坚固城墙进行顽抗。

上午9时，战斗仍处于对峙状态，敌我双方均有人员伤亡。攻城指挥人员重新调整了攻城部署。宿松赤卫队大队长吴祖保肩扛云梯，与陈金钰等3名红军战士一道，从城墙西北角强行登城取得成功。正午时分，北、西城门被打开，守城之敌纷纷举枪投降。县长周崇颐等见大势已去，慌忙打开南门，逃奔南乡坝头镇。起义队伍击毙自卫队8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迫击炮2门，子弹千余发。暴动队伍进城以后，宿松赤卫队打开监狱，救出被囚禁的革命者，搜查并逮捕了宿松及外籍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50余人，没收了当地几大财主商店的官盐5万余斤，白糖2万余斤，还有布匹、粮食、药品。

27日，宿松县暴动委员会主席祝尔昌等组织宿松民众数千人，齐集老厅广场，召开庆祝大会和公审大会，对逮捕的犯人进行宣判，枪毙了罪大恶极者26人。宿松暴动后，宿松赤卫队总指挥吴贵兴，挑选70余名赤卫队员加入了红军，与宿松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3师第9团，继续坚持斗争。

新城起义

1930年9月下旬，驻江西省赣州的国民党军第34旅第68团第2营一部在该营中共地下支部的策动领导下，于新城举行了起义。

1930年9月，红军攻打吉安后，切断了驻宁赣州城的国民党军第34旅马昆部与南昌的联系，兵饷给养日趋困难，早已涣散的军心更加动荡。早在1928年冬，中央军委即派彭加伦随王透到国民党驻赣州部队做兵运工作。他们很快在第34旅第68团中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彭加伦任支部书记。在中共地下支部的领导下，第68团官兵先后进行了年关闹饷、拒绝与红军作战等斗争，取得一些胜利，为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0年9月下旬，第34旅旅长马昆派第68团第2营到大余接广东军阀转送来的军饷，大余城由马旅第67团驻防。第2营到大余后，奉命休息两天。中共地下党员、第7连中尉排长蒿新胜和第8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陈正湘等，利用这个机会，分头到各连“串联”，约定在返赣途中的新城举行起义。新城距大余城40公里，距赣州60公里，国民党军追赶不及。此处又是赤区交界地，东南有南康的龙回苏区；西北有上犹苏区，驻有陈毅领导的红22军。如投奔红军，路途不远，且无梗阻。

接解军饷回赣州的第二天，大家走得很快，半天多就走了40公里，到达新城圩。部队沿街道两旁的店住下。晚饭后，中共地下支部决定，由陈正湘率领第8连“士兵互济会”骨干，于午夜12时打死该连汪连长的枪声为号，各连响应，收缴武器弹药后到圩西边的小山岗集中，然后投奔上杭苏区。是夜11时，陈正湘等4人接班上岗。近12时，将汪击毙。陈正湘、张春华等人率20余人，到集合地点后，未见其他连起义动静，即率队往上杭方向开进。中共地下党员、第7连中尉排长蒿新胜，听得第8连枪声，立即指挥党员和积极分子，分头召集投奔红军的官兵整装集合。随后率领第2营起义人员130多人向上杭进发。天明时，起义队伍抵达距上犹二三十公里的杨眉寺，随即派出代表去上杭与红军联系。早饭时，另一支起义队伍也赶到了杨眉寺。

红22军军长陈毅得讯后，立即派原在第68团做兵运工作的彭加伦和王透赶到离上杭县城不远的营前迎接。起义部队到达上犹县苏维埃政府住地后，受到军民热烈欢迎。不久，新城起义人员与红22军军部特务连合并扩编为特务团，下辖3个连和1个重机枪排。王透任团长，彭加伦任政治委员，蒿新胜任副团长。

土桥起义

1930年10月2日，在中共四川省铜梁县委的领导下，土桥工人、农民举行了起义。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失败后，铜梁的共产党员吴建庄、牛大鸣、赖鸣柯、杨其生等20多人，以教书作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在青年学生中发展了濮文昶、陈世邦、李思纯等为共产党员，在学校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和小组。1929年春，中共铜梁县委负责人，为贯彻党的六大精神，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929年底到1930年初，该县土桥、平滩等乡建立了中共区委，雷汝维任书记，党团组织有较大发展，各地农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1930年夏天，成立了铜梁行动委员会。9月，县行委召开秘密扩大会议，决定10月6日举行起义；成立土桥武装起义指挥部，万平任司令员，濮文昶任政治委员，雷汝维任副政治委员。因起义消息走漏，起义指挥部决定提前到2日。是日晚，万平、濮文昶打出了“四川红军第7路军川东游击队”大红旗，并率领300多名工农武装在土桥起义。击毙团总夏作舟，俘虏团丁20多人，缴枪20多支，攻占土桥乡公所，没收了20多户地主豪绅的金银财物，将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起义队伍占领土桥后，县警备队向土桥扑来。起义队伍遂转向玉龙，攻占玉龙乡公所后，遭到驻军和民团1个团的兵力的围攻，60多名起义人员被杀。为保存革命力量，万平、濮文昶将起义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荣县起义

1930年10月4日，在中共四川省荣县县委的领导下，该县农民举行了起义。

荣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清末民初，荣县人民就在该县革命党人吴玉章等的领导下，进行过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1926年，荣县建立了中共基层组织。1928年春，建立了中共荣县县委。1930年全县有共产党员2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数万人，参加赤卫队的有数千人。这时，中共四川省委派何之、李觉民、刘曼等共产党员到荣县筹划武装起义。8月，省行委派共产党员梅子乾、熊灼微到荣县加强领导。县委根据省行委指示，决定10月4日晚全县起义；成立县行动委员会领导起义，计划首先进攻县城，得手后再夺取自贡，然后东下重庆；把农民赤卫队整编为四川红军第13路第2纵队，梅子乾任纵队总指挥，熊灼微任副总指挥。4日深夜，纵队领导人向集中于高山铺的500多名起义队员进行动员，宣布起义。起义军攻打高山铺、雅雀冲、梧桐等地，夺取团防局长短枪400多支，镇压了团正刘泽昭。次日拂晓，起义队伍到达李晏时，不见各地农民武装来会合，即向南区进发。由于南路区委的命令迟下，李晏、鼎新起义队伍分别在14日、15日才开始行动。14日晚，南区区委委员、李晏支部书记罗文俊率领100多人，捣毁了李晏团防局，缴枪90多支，子弹2000多发，镇压了恶霸张明哲，然后率队追赶纵队，15日晚到达老龙场与团防队展开战斗，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后被董佳地区敌军1个营打垮。15日拂晓，鼎新一带的起义队伍由县委派来的熊思友、范光岑带领向黑屋城出发。途中得知总指挥率领的纵队损失很大，为保存革命力量，将队伍分散隐蔽。总指挥部率领的纵队在由李晏向西转移时，于19日被县西北的团防局包围，队伍被打散。纵队领导人梅子乾、熊灼微回到成都，其余起义人员分散返回原地。

雪峰山第二次起义

1930年10月6日，中共湖南省宁乡县委负责人组织工农武装在雪峰山举行起义。由于1927年11月在这里组织策动过一次兵暴，故这次起义亦称雪峰山第二次武装起义。1930年5月，中共宁乡县委负责人严岳乔和徐上达发动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组建起一支游击队，钟杰任队长，蔡海涛任指导员，在乌牛山一带进行游击斗争。8月中旬，雪峰山工农武装领导人符鹏到乌牛山，会见了严岳乔、徐上达和钟杰、蔡海涛等，双方商定举行联合起义，并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攻打横市望北乡团防局。

起义开始后，包围横市的游击队分散打冷枪，大声喊杀，虚张声势。

国民党黄材驻军获悉游击队围攻横市的消息后，立即赶来增援。当进入了游击队的伏击圈，钟杰率领游击队员猛烈开火，黄材援军四处乱窜，敌队长中弹落马，游击队共缴获步枪13支。

两支游击武装攻打横市后，开往雪峰山，又收编了地方一支绿林武装。10月6日，正式宣布起义。按照中共长江局的指示，起义队伍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第2师，严岳乔任师长，徐上达任政委，下编3个团，钟杰、蔡俄（蔡正标）、符鹏分别任团长，全师共200余人枪。此后，红2师以雪峰山为根据地，在宁乡望北、洋泉、龙从、石潭等地区活动，开展游击斗争。翌年11月，益阳、宁乡、安化、湘乡四县保安队等地主武装3000余人，会剿红2师所在地洪家大山。红2师与敌激战，部队伤亡很大。严岳乔和钟杰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后，红2师负责人邓桃生和梅重冬等先后叛变自首，大批干部战士被杀，使红2师遭到失败。

善化起义

1930年10月14日，中共福建省仙游县临时县委在善化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1930年9月，中共仙游临时县委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有枪10余支。10月，中共福建省委派邓子恢到闽中指导工作。邓子恢传达了省委关于闽中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闽中特委，统一领导莆田、仙游、福清和惠安等县的革命斗争。接着，仙游临时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又对全局有影响的善化举行起义。10月14日，善化的土豪劣绅迎神唱戏，民团的团丁刀枪入库。中共仙游临时县委决定乘机举行起义，并成立了指挥部，对整个起义进行周密安排。14日中午，事先发动的溪头、三会、上梧、翁都、溪口等村500多名群众以看戏为由，陆续到达善化街。14时许，20余名游击队员和100余名群众开始起义。游击队在黄英率领下包围了善化的反动民团。经过短促的战斗，击毙、在当地民愤极大的民团头目林冠三、林新甫等4人，缴枪20余支，子弹1000余发，捣毁了民团团部，起义取得胜利。下午，起义队伍向仙游北区进发，与派往仙游善化“围剿”游击队的国民党军遭遇。激战中，游击队领导人黄英接到县委指示，撤出战斗，转移到麦斜岩后，建立了工农红军第108团，在麦斜岩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毕浦起义

1930年10月17日，中共浙江省永安区委领导毕浦农民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毕浦，位于分水江北岸，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是原分水县东部的最大集镇。

1930年5月，中共建德中心县委派县委委员陈一文到毕浦联络当时任国民党分水第二区区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祝光焘，筹备枪支弹药，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陈一文和祝光焘接上头后，即着手在当地进行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不久就在毕浦成立了隶属于中共建德中心县委的永安特支，祝光焘任支书。7月，永安特支升格为区委，书记祝光焘。

中共永安区委建立后，先后建立了方吴支部、儒桥支部、长前支部和大五管支部，党员98人。

10月上旬，赵坤和朱增球受上级党的派遣，先后来毕浦领导起义。中共永安区委接连几个晚上在戴家边村召开会议，研究起义计划、措施及组建浙西红军等事项。会议结束后，即分赴各地贯彻会议精神和发动群众。

10月15日，永安区委又在戴家边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从原定的10月19日提前到10月17日，同时确定以毕浦为突破口。方案确定后，区委派江起虹和吴光明立即分赴儒桥和江山岭庙向各地负责人进行传达。赵坤、朱增球、祝光焘、王光林等则在大溪口独山庙召开了有大五管、王家、方吴、糝源等村30多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祝光焘传达区委的决定后，赵坤作了简短动员。

10月17日上午，150多名起义农军集中在糝源，王光林宣布了暴动总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由赵坤任总指挥，朱增球任大队长。同时按部队建制将农军编为2个中队5个排，公布了中队长和排长的名单，向全体人员分发了红军臂章，举行了树旗仪式。

当起义已到剑拔弩张的时刻，毕浦大商号源隆店的经理俞秉衡探知了这一消息，即派人赶往分水向反动政府告急求援，余行至龙潭时被红军捉住。豪绅盛沁香心急如焚，慌忙去找祝光焘区长（中共永安区委书记）商量，要祝加强防范。同时，他又通知毕浦的各大商店老板20多人，到警察所共商对策。此时，祝光焘为了麻痹敌人，镇定自若。他一面假意批评盛沁香不该风声鹤唳，弄得人心惶惶；一面又以开会的名义将警察牵制住。

10月17日下午7时许，暴动队员在赵坤、朱增球、江起虹、王光林等率领下冲向毕浦，到村口兵分两路，分别攻打豪绅盛家大房、汾盛盐栈和警察所。王光林率领的一路包围警察所后，发现屋里空无一人。正当红军在警察所内外进行搜索时，突然遭到逃伏在船上的豪绅、地方保卫团团总盛沁香的冷枪袭击，方吴党支部书记张启荣腹部中弹，肠子外流。战友们目睹此状，悲愤填膺，点燃警察所后，便汇合主力去攻打豪绅盛家。盛家长子盛人龙等凭借高楼负隅顽抗，向红军开枪射击。旗手夏德泉被击中当场牺牲，总指挥赵坤亦背部受伤。晚上10时许，部队撤离毕浦时，将平日高利盘剥农民的大商号“源隆”付之一炬。

红军撤至王家，稍事休整。赵坤、朱增球、江起虹、王光林等决定部队马上西进，会合各地的红军进攻分水。兵分两路：一路从海岛山渡天日溪经龙潭，攻打分水城南门；另一路主力部队则走大路从东门发起正面进攻。当

部队经过逻浦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分水县警察的堵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只得撤回王家。

本应按规定时间统一行动的儒桥浙西红军，由于县委特派员江起虹未在17日这天亲自赶到儒桥作部署，而是将儒桥负责人叫到龙潭叶祥茂家进行传达，往返耽搁了时间，当晚来不及召集队伍，于第2天集合了100多人，收缴了当地豪绅地主的武器，并焚烧了恶霸地主王天喜的房屋。19日又将队伍分别拉到六管（今东辉乡）和七管（今罗山乡）一带活动。在城内负责接应红军入城的地下党员李莹、冯芝珊等，于18日晚上探知红军尚未攻城，又加当晚雷雨，故而未采取行动。大五管浙西红军除17日派出部分人员参加毕浦突破点的军事行动外，其余的几十人整装待发，准备按计划翻越设峰岭，配合主力攻打分水城，后见分水城里始终没有动静，便各自回家待命。

10月17日，毕浦地方保卫团团总盛沁香乘船赶到桐庐，通过桐庐县警察局电请省政府派兵前来镇压。18日，国民党省防军两个连乘船赶到桐庐，第2天中午步行至毕浦，旋即进驻分水各地。

盛沁香在省防军进驻毕浦后，便杀气腾腾地带保卫团到处搜捕起义队员。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陈有生被捕后，当即被枪杀在毕浦石桥下的沙滩上。当时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永安区委书记祝光焘也因盛沁香之侄盛人龙的检举而被捕。祝与大五管党支书王兰祥和桐山村的地下党员、红军战士王光烈同被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先后都被折磨致死。

毕浦起义虽遭失败，但打击了地主封建势力，在分水这块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

广汉起义

1930年10月25日，在中共四川省川西特委军委的领导下，驻广汉的国民党军两个团举行了起义。

广汉县位于川西平原，距成都40余公里。1928年建立了中共广汉县特别支部。1930年先后建立了工人、农民、中小学、城区贫民、店员等中共党支部，在城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委和川西特委派共产党员到广汉工作，并在驻广汉的国民党军邓锡侯第28军所属第2混成旅开展兵运工作，同倾向共产党的该旅旅长陈离保持密切联系，在该旅发展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数团、营都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还建立了有陈离旅长参加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五育社”。这些组织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决定对该旅进行清理、整顿。中共四川省委得此情况后，决定发动驻广汉的两个团举行起义。为此，召开了士兵代表会议，制定了起义计划，成立了由廖思波、刘连波、曹狄秋、徐昭骏、廖宗泽等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0月25日夜11时开始，占领了电话局和电灯公司，砸开武器库，夺取了枪械弹药，扣押了军官中一些可疑人员，处决了该旅旅部军需处长，原广汉县长雷雨膏。26日，起义士兵逮捕一批官僚、豪绅，销毁县政府征帐册，开仓济贫，解救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加入起义队伍。中午，前委召开大会，将参加起义的原第2混成旅的第1、第2团改编为红军第26军第1路，徐昭骏任司令员（后叛变），刘连波任政治委员，雷润侯任参谋长。下午4时，起义军向绵竹进发。27日到绵竹新市镇。这时，国民党军第28军在第29军的支援下，以五六个团的兵力，在德阳、什邡、绵竹等县民团的配合下“围剿”起义军。虽经顽强奋战，但起义军伤亡较大，处境危险。前委审时度势，指挥起义队伍撤向汉旺，途中遭国民党正规军、民团、土匪武装的截击，部队伤亡很大。前委决定外来的干部就地分散隐蔽，起义士兵发给路费返回各自的家乡。

台湾高山族雾社起义

1930年10月27日，台湾高山族人民于雾社举行了反抗日本侵略行径的武装起义。

台湾高山族占全台湾人口的2/3左右。甲午战争后，台湾及其所属岛屿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进行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日本警察遍布全岛，平均不到30个台湾人中就有一名警察。这些日本警察横行乡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人民更是倍受欺侮，经常遭毒打，妇女被强奸、侮辱。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压得高山族人民喘不过气来。因此，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强烈的反日情绪。

雾社位于台中州的能高郡，是高山族的主要聚居地区。日本侵略者为了祭奠侵台头目北白川官能久亲王，每年10月28日，举办“台湾神社祭”。1930年，雾社地区的日本官吏，准备于10月27日举行运动会，以示纪念。日本警察强迫高山族民工赶修运动场，劳动强度很大，不但不增加工钱，日本监工还要扣除民工每日工资的50%中饱私囊。一位民工因不堪虐待，提出抗议，结果被日本警察倒悬在树上毒打致死。日警的暴行，使人民群众极为愤慨。高山族人民在雾社首领摩那·罗达奥及花冈兄弟领导下，联合毗邻的6个社的高山族同胞，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0月26日晚，起义武装分路袭击了雾社附近的几个日本警察所，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并割断电话线，切断雾社与外界的联系。随后，把队伍隐蔽在雾社公学校四周待命。10月27日上午9时许，运动会开始不久，起义武装向运动场突然发起袭击，把能高郡守及手下人员全部杀死。接着起义武装又攻打雾社分室、邮局、警察所、日本官员宿舍，日本学校等，共杀死日本人134人，被杀人数为在雾社日本人的60%，缴获枪支180支，子弹2.3万发。而起义者无一伤亡。

这次起义得到许多方面的支持。台湾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于10月28日上午，在全省展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屠杀高山族人民的斗争。祖国大陆人民也纷纷声援这次起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雾社起义，震惊了日本统治者。10月29日，侵略者调动大批军队和武装警察，出动飞机、大炮，对雾社高山族人民进行镇压。起义者毫无惧色，凭险据守，战斗持续了半月之久，打死许多日本警察和日军。11月中旬，日军对起义者施放毒气，起义战士多数中毒牺牲，但无一人投降。为保存力量，部分起义武装转移到深山中与敌周旋，坚持了数月之久。

日军对起义者及其家属实行惨无人道的屠杀，把负伤的战士全部杀死，因怕传出起义和屠杀真象，又迫使老弱妇孺三四人一起集体自缢身死。摩那·罗达奥和花冈兄弟，与雾社及附近高山族群众约1200人，几乎全部殉难。

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统治，充分反映了台湾各族人民坚决反抗外来侵略，反对强暴统治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的意志与决心。

牛山起义

1930年10月中下旬，中共江苏省东海县委领导该县牛山周围的郇圩、吴庄等20多个村庄的500多名农会会员，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1月14日，东海县委根据省委巡视员的指示，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牛山斗争和年关斗争两个决议。春节期间，郇圩支部遵照县委关于牛山斗争的决议，领导牛山附近的十几个村庄的农会会员几百人高举铁叉、土枪示威游行。当地地主豪绅万分惊慌，他们一面向国民党县政府告状，一面纠集反动武装拘捕群众，收缴武器，使年关斗争受挫。3月，县委委员李聚春，白塔区委书记冯硕仁及郇圩支部负责人张涂清、郇立学等人在牛山一带继续开展斗争。3月18日，李聚春、张涂清、孙秉衡聚集郇圩、蔡塘、汤庄、吴庄等地农会会员近200人，在牛山顶上大庙里发誓：要生死同心，打土豪，分田地，闹共产！19日，徐以忠、冯硕仁等人召集房山、林疃几百名农友举着棍棒、铁叉、梭标、大刀、土枪进行示威，拆毁吴庄恶霸地主吴德轩的土圩子，将其粮食、耕牛、农具等分给贫苦农民。

7月25日，中共徐海蚌总行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各级指导机关从县委到支部一律改组为行委会。”东海县委遵照指示，成立了东海行委，由东海中心县委书记蒋培（化名老周）负责，成员有刘秀文（化名老刘）、李聚春、冯硕仁、徐以忠、张涂清、郇立学、孙秉衡、吴德香等人。10月，东海行委在海州洪门召开牛山起义预备会议。农委书记刘秀文对起义事宜进行布置，不料，会议正在进行时遭地主武装包围。刘秀文命令迅速撤离，分头进行准备。

10月中下旬，东海行委以郇圩支部为中心，发动牛山周围20多个村庄约500多名农协会会员，聚集牛山，树起红旗。行委成员徐以忠等分别登台讲演，号召团结起来，夺取武器，打倒土豪，建立苏维埃。县行委原计划牛山树大旗后，领导农民下山打土豪、分田地。由于走漏消息，起义遭到吴庄恶霸地主吴德轩、霍一林的反动武装和城头霍大麻子的联庄会以及国民党地方武装的血腥镇压，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

公义场起义

1930年11月2日，在中共四川省彭山县委的领导下，该县公义场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8年，中共彭山县委建立后，即在该县组织领导建立了“青年学生会”、“彭山新益学会”、“青年互助社”、“少年俱乐部”等群众组织。1928年初，县委书记刘单如和农民协会负责人郭祝山等领导人民开展拒绝交军饷的斗争。同年冬天，公义场农民取得抗捐斗争的胜利。1930年7月，中共彭山县委根据四川省委的部署，决定发动全县农民举行起义。9月下旬，县委书记郭祝山召开会议，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省委派来的张俊生任总指挥，王文倩负责宣传，马义生负责后勤，定于11月2日起义。同时还分工做好以下各项准备：以“青年互助社”社员为骨干组成赤卫队，发动县中师生罢课，做好争取公义场民团保持中立的工作，切断新津与彭山县之间的通讯联络。11月2日，彭山县各地的1000多名农民在公义场举行起义，捣毁了区长袁子成的店铺，焚烧了征粮处的粮薄，逮捕了一些土豪劣绅。此时，公义场上袍哥首领万晓楼和武装土匪方青云等突然袭击起义队伍，起义领导人洪文渊、陈少卿、文吉武等被敌人杀害，不少起义人员被俘。起义指挥部在危险之时，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更大损失，将起义人员疏散隐蔽，并派总指挥张俊生向四川省委报告，起义遂告失败。

大兴庄起义

1930年11月3日，中共江苏省淮阴县委领导大兴庄一带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7月，中共淮阴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及时召开扩大会议，将县委改为县行委，县委书记王伯谦任行委书记。会后，行委即着手进行“八一”起义的各项准备，在大兴庄、三尖、老张集等地召开党、团员和农民协会会员会议，落实行动计划。同时，在党、团员和农协会会员中等集枪支。

“八一”前夕，县行委召开会议，认为准备工作明显不足，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到10月底，后又决定于11月3日在大兴庄举行起义，并成立了总指挥部，王伯谦任总指挥。

11月3日清晨5时，王伯谦、陈霞林等人率领四五百人的农民武装，手执武器，臂带红袖章，从南路分多股奔向大兴庄；靳又朋、高洪学、高泽夫等则带领队伍从北路奔向大兴庄东北角的炮楼。在大兴庄党支部和赤色农会的配合下，隐蔽在地主武装“保家勇”中的“内线”及时打开了圩门，起义队伍打着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拥进圩内，通过保卫团班长郭景春迅速缴了商会保安团、公安队的枪，收缴了吴有池等地主的武器，共收缴枪四五十支，子弹1000余发。上午10时许，在大兴庄西庵小学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恶霸地主吴竹修、吴有池、吴子亭、鲁大朋、孙寿玉和一些字号店的老板。同时，起义队员打开了地主吴子亭等的粮仓，当众烧毁地契和债券，群

下午3时，突然响起枪声，国民党驻老张集的保卫团和警备队，纠集五里庄的保卫团，从西、北两个方向猛扑过来。赤卫队员开枪阻击，双方展开激战。鉴于情况紧急，起义指挥部决定边抵抗边撤退。但敌人很快逼近圩外，不断向圩内开枪，赤卫队则利用圩墙为依托向敌还击，双方相持约半个小时。敌人察觉起义队伍缺乏军事素质，不会打仗，便发起冲锋。赤卫队员抵挡不住，纷纷向圩外撤退。傍晚，起义队伍陆续撤出，各自分散隐蔽。收缴的枪支大部分未能带走，突击队员唐竹良在战斗中阵亡，起义遭到失败。

白塘庙起义

1930年11月7日，中共安徽凤台县委在该县白塘庙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白塘庙是凤台城西北一个集镇。1928年2月，中共寿凤临时县委在白塘庙建立了凤台特支。同年冬，特支利用白塘庙小学开办了平民夜校，吸收了100多名贫苦青年入学，以夜校为阵地宣传革命道理，并以夜校学员为主体成立了白塘庙地区农民互助会，将方圆40多华里27个村庄的300余互助会员编成大队和小队，大队长由党的负责人吕少培担任。1930年8月间，中共凤台县委书记程东方在白塘庙传达了凤台县委关于在11月7日举行白塘庙起义的决定，并作了部署。10月底，吕少培召开支委会议，决定：一、暴动时间定于11月7日下午，组织4000名互助会员参加；二、吕少培为暴动总负责人，并组织10个暴动大队（龚文卿负责龚家大队；王振殿负责王桃园大队；桂永亮负责桂集大队；冯金书负责大冯家大队；吴家魁、吴家林、吴学山负责白塘庙大队；岳文奎、岳俊英负责福镇集大队；胡学品负责后胡大队；陈怀义、赵书策负责东陈家大队；吴家卿、吴学好负责宋家岗大队；刘金节负责注刘大队）。

11月7日下午，参加暴动的30多个村庄的1500多名互助会员，手持大刀、红樱枪结集白塘庙。国民党风台县政府得知白塘庙举行武装暴动的消息后非常恐慌，急忙派县常备队300多人前往镇压。面对荷枪实弹、步步紧逼的敌人，暴动领导人缺乏必要的应付敌人的方案，指挥暴动队伍向敌人开了枪。敌人见暴动队人多枪少，立即向暴动队进行猛烈射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减少损失，吕少培当即决定暴动队伍向西南撤退，分散隐蔽。

外坑起义

1930年11月25日，在中共福建省总行委和中共莆田特委领导下，莆田第2支队于外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10月初，中共福建省总行委巡视员邓子恢根据省总行委要其负责指挥莆田所属地区的起义、建立苏区的指示，在莆田壶公山下的中和寺召开莆田总行委扩大会，决定对沃柄起义后建立的207团进行整顿，并在沃柄乡恢复广业区苏维埃政府。还要求仙游县行委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108团和农村根据地。会后，207团和广业区赤卫队加紧整顿。

10月中旬，省总行委常委扩大会决定，莆田放弃在沃柄恢复苏维埃政府，转到广业区与福清县交界的外坑乡建立苏维埃政府；仙游108团要以麦斜岩为根据地，开辟与永泰、莆田两县交界的兴泰游击区。

10月下旬，王海萍、邓子恢在后坑村召开莆田总行委与207团领导人扩大会。决定207团立即进军外坑，建立贫农团，开展经济斗争；广业区赤卫队要巩固沃柄、东度、侠际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外坑的斗争。会后，207团突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向外坑进军。

11月初，207团进驻外坑乡和白方乡安乐村。该地与福清交界，距莆田县城百里。9日，省委秘书长蔡协民到外坑，召开莆田总行委会议，决定分别成立中共莆田特委，书记由邓子恢兼任；团莆属特委，负责人韩永、徐元昌。并布置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3周年纪念日，分别在游击区和白色区，开展宣传苏维埃、扩大红军、恢复原有群众组织、选举外坑苏维埃政府、斗争地主恶霸等五项工作。

会后，在莆田白色区恢复了中共涵江区委和荔城特支等党的组织；印发了1000多张传单；招收了几名红军战士。12日，敌调集500余人袭击外坑，张威等率207团进行反击，打破敌之第二次“围剿”。

11月中旬，中共莆田特委和207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一，将207团改编为福建红军游击队第2支队，支队长张威，政委王于洁；二、举行外坑起义。18日，第2支队50人在外坑乡宣德宫举行了成立典礼。

11月25日，第2支队举行起义。起义队伍攻下洪里村，缴枪8支。随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乡贫农团，选举了以蔡全清为主席的5人常委会，通过了不缴租、分配土地、组织赤卫队、婚姻自由等土地革命的四项纲领。会后，在各村纷纷开展了斗争地主恶霸、分发浮财、收缴枪支和烧毁田契借据的活动。第2支队发展到七八十人。

12月9日，外坑乡苏维埃政府及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救护队在宣德宫成立，并实行土地革命。形成了一块纵横10多里的外坑苏区。根据省委指示，特委决定赤卫队40多人留守外坑，第2支队向外扩大苏区。

12月中旬，第2支队举行外坑边缘区起义，在广业区白云、泗洋两乡，二区南坛、洪里两乡及福清县全芝乡，开展斗霸分粮，追杀股匪等斗争，并打退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方圆百里内组织了1000人以上的贫农团、赤卫队，形成了外坑苏区的边缘区，红军也扩大到160多人。但由于第2支队在打击各地反动力量时，未能大量消灭敌人，外坑边缘区未能得以巩固。

12月下旬，敌800余人“围剿”第108团。108团兵分两路，主力突围到游洋隐蔽；小分队被敌打散。此时，王海萍、邓子恢立即召开特委会，决定第2支队主力转到惠北扩大游击区。邓子恢与张威等率第2支队主力去惠

北，陈天章、王纪修率第2支队一部及赤卫队坚持在外坑苏区及边缘区（包括东度、沃柄、头际三乡）进行斗争。第2支队主力150余人开赴白云乡芦尾村时陷入敌1000余人的包围，40余人牺牲，少数人突围回到外坑乡，其余失散。救援部队40余人途中被阻，其余20多人由邓子恢带领撤出外坑。

1931年1月，敌在莆田、仙游、惠安疯狂清乡，群众遭受重大损失。邓子恢在赤卫队员护送下转到地下联络站省三小学。108团在强敌“迫剿”下失散。

1月下旬，邓子恢在省三小学召开特委和2支队主要领导人会议，认为莆属革命已转入低潮，决定撤销第2支队、108团和涂冷区团防，领导人及骨干分别到莆田、仙游、惠安三县隐蔽工作；邓子恢、张威等4人到省委汇报工作。2月26日，省委在召集特委负责人王于洁、徐清霖、郭寿莹等人总结莆属起义经验教训后，发出《关于莆仙目前的形势与会后工作方针》，决定撤销特委，由莆田县委指导仙游县委的工作，惠安为泉州特支领导。

湘东南起义

在中共湘东特委（后改为湘东南特委）的组织领导下，湘东独立师（后改为湘东南独立师）于1930年11月举行了一次湘东南边境起义。

1930年8月5日，中共湘东特委在江西萍乡建立。9月，湘东独立师在萍乡大安里正式成立，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委，陈韶任政治部主任。全师共800多人，500多支枪。同时，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亦成立，袁德生任主席。不久，中共湘东特委和湘东苏维埃政府合并为湘东南行动委员会，准备发动湘东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即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训练部队，提出“夺取攸县城，赤化攸、醴、萍，巩固扩大湘东南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并号召“湘东南工农兵组织起来，举行总暴动”。各县党组织迅速行动，成立行动委员会和暴动委员会，建立扩大武装，准备起义。11月，湘东南起义爆发。湘东独立师1个团在莲花县第4纵队的配合下，由莲花进至攸县老漕泊，和攸县工农武装一起，消灭了界江等地两个挨户团。而后，进攻攸县县城。但由于河水太深，加之敌人火力很猛，攻城部队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战斗从上午持续到黄昏，几次强攻，均未攻入，伤亡300多人。刘沛云、谭思聪便下令撤出。独立师进攻攸县县城失败后，决定攻打醴陵。部队开至攸县皇图岭附近，遭到醴陵、攸县、衡山三县保安团和皇图岭守望队共700多敌人的阻击。独立师和地方工农武装与敌激战，歼灭了一部分敌人。鉴于前有阻敌，攻打醴陵的计划难以实现，独立师遂撤回。不久，独立师在茶陵农民武装的配合下，攻打茶陵县城，未克。不久，守城的敌军正规团开往衡阳，独立师获悉后再次攻城，并很快占领了县城。并乘胜追击，毙伤敌一批。接着，独立师攻打酃县县城。随后进攻永兴县城，由于敌早有防备，防守严密，攻城失败。1931年4月，湘东南特委指示独立师和红7军、红20军各一部联合行动，先后击溃敌第230旅和歼灭第154旅大部，毙俘敌700多人，缴枪数百支。6月10日击败敌9县联防挨户团，占领茶陵县城。13日至16日，又先后攻占了安仁、攸县、酃县县城。

湘东南起义有力的配合了湘赣根据地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为保卫湘赣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庙埠起义

1930年12月9日，中共安徽省宣城县临时委员会在宣城县庙埠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巡视员王步文到宣城帮助建立了中共宣城县临时委员会，史泗群为书记。到1930年7月，全县共建有5个区委，15个支部，200多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1930年8月，中共芜湖特委派何冰心来宣城，提出以武装暴动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据此，宣城县临委把武装起义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此后，在宣城西北乡团山、独山、庙埠、后村一带，农民协会异常活跃，积极进行起义准备。

庙埠，在宣城北门外，距城10华里，东临水阳江，西傍敬亭山。国民党宣城县自卫团第13支队徐炳钩部即驻在中街头“广王殿”内，县商会会长陈任亭在镇上设有“裕隆祥”分店。徐与陈相互勾结，对庙埠一带群众进行残酷剥削、压迫，加上连年灾荒，贫苦农民和小市民生活饥寒交迫。1930年11月，芜湖特委何冰心、张宅中、牛文三等3人在宣城县检查工作时决定留下张宅中组织起义。宣城临委在庙埠附近的双塔寺召开起义筹备会议，决定在庙埠举行起义，起义指挥部由张宅中、胡兴奎、陈应笙3人组成，起义时间定为12月15日。双塔寺会议后，起义准备工作全面展开。陈应笙和万亚新分别前往南陵和广德联络皖南红军。大部分人前往庙埠农村，发动组织农协会员。一部分人去组织县城党团员，准备配合庙埠起义。准备参加起义的江南汽车公司驾驶员郑前裘，为国民党部队运送军火，当车辆行驶到团山附近时，故意把汽车开歪，预先埋伏的农协会员乘机而上，夺取了车上10几支枪和部分子弹。12月8日晚，参加起义的已有500余人，并有少量枪支，大多数队员以土枪、刀矛、棍棒为武器。这时，指挥部获悉敌已察觉起义意图，遂决定提前行动。指挥部把500多人分成五个赤色先锋队，决定用主要力量攻打驻在“广王殿”的国民党自卫团第13支队。

9日凌晨3时起义开始。起义队伍首先攻打敌第13支队，击倒1名团丁。敌第13支队受突袭而惊恐，匆忙窜进山林。起义队伍占领“广王殿”，缴获步枪3支和部分弹药，并将“广王殿”付之一炬。随后，起义队伍分成几路，割断电话线，拆毁宣芜公路独山车站附近的公路桥，攻占了独山车站。在混乱中，“裕隆祥”分店起火。“广王殿”和“裕隆祥”两处冲天大火，引起县城守军的注意。国民党县长段永新急调特务队长周云龙率队增援。潜逃的第13支队见援军到达，立即进行反扑。起义队伍多数队员无枪，加之指挥失灵，跑散了大部分。总指挥张宅中因人地生疏，在混乱中无法指挥而只身逃脱。县临委书记胡兴奎带领黄克卓等百余名党团骨干沿敬亭山北麓向芜湖方向且战且退。县城党团组织听到激烈枪声，就分头散发事先在庙埠赶印的标语、传单、宣言。在高坝头街散发传单的胡健、张中一、杨久三等3名中学生当场被国民党“围剿”部队抓获，其余的也很快被镇压。10日清晨，起义队伍退经麒麟乡，打垮麒麟乡自卫团后备队，击伤团丁2名，缴枪2支。8时到达岗林，冲进竹棵村土豪陈宝祥家，搜到来福枪5支，子弹1箱，并烧毁其田契。中午，第13支队尾追而来，胡兴奎等抢占竹棵土山，击毙团丁2名，缴步枪2支。午后，驻团山的自卫团第2支队、湾址的防卫队、县特务队等反动武装沿宣芜公路麇集而至，向据守土山的起义队员射击。起义队员激战两小时，邵世坤等人中弹牺牲，另有10余人负伤。战至傍晚，起义队员

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向西北方向散去。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疯狂报复。 10日下午，在竹棵土山因伤被俘的10名起义人员全被杀害。起义骨干葛家才在团山被害后，人头被拿到县城示众。参加起义被捕者数十人，除胡兴奎、黄克卓少数人被押送安庆监狱外，大多数惨遭杀害。

上思起义

1931年1月1日，广西上思县那琴圩农军和革命群众，在中共邕宁县苏吴圩党支部领导下，在上思县城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上思县位于广西西南部。1926年冬，进步青年黄名山、刘福善、孙兆祯等成立了“上思县第六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开始进行农民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7年3月28日，上思县第六区农民协会成立，并组织了农民自卫军。1928年3月，中共邕宁苏、吴圩党支部派党员唐光天、唐希贤、廖光华先后到那琴指导农运工作。

1928年，国民党上思县盐税局在平吉（今东屏圩），设立盐卡，每担盐税高达2元（桂币），重税盘剥盐民，群众意见很大。区农会知道后，派孙兆祯、陈岐山带30多名农军20支枪来到盐卡，缴了税警的枪，并处决了一名很坏的盐卡税警，掀起了全县抗捐、抗税斗争高潮。1929年12月21日，区农会执委黄名山又率那琴区农民武装枪决了作恶多端的那琴乡团总黄景春，焚烧了他的地契。

对于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残酷的镇压。1930年5月26日，国民党上思县长梁熙德，调民团包围了那琴农会，农民自卫军战士孙体忠被抓去剖腹挖肝。7月15日，梁熙德探知邕宁县农军大队长唐光天等在黄名山家组织农军开会，即勾结敌军头目陈文波，配合民团数百人包围了黄名山的住房。唐光天、黄名山等突围后，黄名山的7口家人及两名农军战士被杀害。敌人的疯狂残杀，使农军忍无可忍。同年冬，第六区农协会在驮桃召开各乡农协执委会，决定举行起义，攻打上思县城。

12月31日晚，刘福善率领农民自卫军，连同绿林武装共200多人，绕过上思县政府设在板回村的岗哨，直奔县城。1931年元旦凌晨，农民自卫军架起云梯首先攻下东门。事先化装成客商分散隐蔽在城内的苏彩利、林国栋、冯鸣龙等10多名农民自卫军战士打开城门接应。自卫军拥入县城。县长梁熙德、保安司令黄鲁惊醒后措手不及，仓促应战。经过几小时战斗，梁熙德、黄鲁率民团向西门附近的高岸、停料等村溃逃，只有一部分民团在钟鼓楼和黄宫负隅顽抗。农民自卫军进城后，打开监狱，放出被捕农友200多人。第二天，黄鲁、梁熙德乘城内混乱之时，组织民团反扑，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农民自卫军撤出县城。

上思起义，虽然占领县城的时间不长，但显示了上思人民求解放的革命斗争精神。

仙人渡起义

1931年1月14日，在中共豫鄂边特委和谷城县委的领导下，中共党员李自修、薛斌等率领民团400余人举行起义。

1929年冬，共产党员李自修、薛斌等人以“保家护院”为名组建了汉北农民自卫军。为取得合法身份以便开展革命工作，李自修、薛斌根据上级指示，率农民自卫军接受了西北军的收编，李自修被委任为民团第3团副团长，薛斌为第3营营长，张星若为副官。到1930年底，队伍发展到800多人，拥有土炮10余门，机枪两挺及300多支长短枪。1931年初，中共豫鄂边特委和老河口中心县委指示李自修的农民自卫军向西发展，与党领导的蕪山游击队汇合，创建以蕪山为中心的谷城红色割据区域。李自修接到指示后，立即与特委联系人李德五、陈文增和薛斌等人研究，认为要向西发展，必须首先攻下通往蕪山的交通咽喉——仙人渡。1931年1月14日下午，李自修等集合部队400多人，在石桥西门外召开起义誓师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27师”，由李自修任师长，薛斌任副师长。同时，宣布了攻打仙人渡的计划。随后，起义队伍身披红布条标记，连夜向仙人渡挺进。

15日拂晓，起义队伍迅速消灭了驻仙人渡团防局，活捉团总茹树堂等人，缴枪20多支。天亮后，谷城县铲共义勇军大队及附近团防武装会同国民党汉江防务司令张恒全部从四面八方起义队伍袭来，李自修率部队撤出仙人渡。途中遭到民团袭击，部队大部伤亡，部分战士溃散。李自修、薛斌率百余名骨干队伍一面阻击，一面撤退。李自修、薛斌等人为掩护张星若率部突围，不幸负伤被俘，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张星若率80余名战士突围到上川地区时，中了民团团总赵子秉“交枪放行”的诡计，于当天下午全部被反动民团杀害。至此，仙人渡起义即告失败。

六安起义

1931年2月15日,国民党军第46师一部在该师共产党员的组织策动下,在安徽六安城内举行了起义。

1930年冬,国民党第46师进驻皖西,参加对鄂豫皖红军的第二次“围剿”。该师有3个正规旅,两个警备旅。师长范熙绩因公离职,为统一指挥,命第138旅旅长陈众罕为前线指挥,指挥部及第272团驻六安城,团长杨慕铭兼任城防司令;警备第2旅旅部亦在六安城内。1930年12月,国民党第46师分3路向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主力集中地麻埠进犯。红1军集中主力,歼其3个多团,给敌以毁灭性打击。其残部退守六安、霍山城内,不敢复出。

退守六安城的第46师余部,在红军不断胜利和共产党对待敌军的正确政策的影响下,军心日益动摇。尤其是第138旅,几个月没有发饷,更引起士兵的强烈不满。这时,中共派入该师工作并在第138旅第272团担任第2营营长的共产党员魏孟贤,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动兵变。1931年1月,红1军将与红军作战负伤的46师官兵,请老百姓抬到六安城内就医。伤兵回来医治的消息,成了驻军的议论中心,人心浮动。魏孟贤利用这一机会,与本营第6连连长、共产党员蔡凤玉一起,制订了起义计划,秘密召集共产党员开会,进行周密布置。随后联络第1营副营长李继武等进步军官,决定乘农历年关之际,发动士兵以闹饷为名举行武装起义。行动计划确定后,魏孟贤立即派人去苏区联系,争取红军的支援。2月15日(农历腊月廿八日),魏孟贤通知第1、第2营军官到南门紧急集合宣布起义。部队立即冒雪兵分两路:一路由魏孟贤率第2营冲进和平巷小公馆第272团团部,刺死团长杨慕铭,捆绑了团副,然后又直扑潘家拐子第138旅旅部;另一路由蔡凤玉、李继武带领,率第1营缴了第3营的械,捣毁了县政府,打开了监狱,然后又冲进警备第2旅旅部,干掉了旅长陈孝思,卫兵开枪还击,蔡凤玉腿部负伤。起义士兵用手榴弹炸死旅参谋长。此时,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惊动了第138旅旅部,第2营还未赶到,旅部卫队就抢先占领要道进行抵抗。魏孟贤率领起义士兵猛冲上去,卫队溃散,被击伤的138旅旅长陈众孚在贴身卫士的护卫下,夺门而逃。驻在火星庙台子的六安混合营营长朱灿光企图率兵镇压,但起义官兵已冲向南门,因是黑夜,不摸底细,未敢追赶。

第二天清晨,敌人援兵先头部队已接近六安。魏孟贤按原计划,立即把起义部队撤出六安城,直奔鄂豫皖苏区麻埠。在麻埠,起义部队受到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第2师师长肖方的热烈欢迎。起义部队编入教导第2师,魏孟贤任师参谋长,李继武、蔡凤玉分别任第1团第1营和第3营营长。

万承起义

1931年2月20日，广西万承县的农军和革命群众，在中共右江特委领导下，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万承县（今属大新县），位于广西左右江的中间地带。1929年11月中旬，中共党员、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俞作豫派何焜（共青团员）回万承县开展农民运动，并给何焜28支枪运到钦龙（今昌明乡）与其堂兄何以奎组织成立了万承九甲农民协会，何以奎任委员长，农冠三任副委员长，并成立了警卫连，共60人，何以宽任连长。他们在刘家街和布泉组织了两个农军连，合编为一个营，发展到300多人枪，何焜任统领。

1930年2月上旬，中共右江特委、右江苏维埃政府派陈天丙、周达等到万承协助何焜开展农运工作，并串联养利、龙茗、镇结一带农军联合起来，组成镇南游击编遣大队，下辖8个农军营。

同年8月，何以奎、何焜、陈天丙等决定利用国民党省政府为调解万承各方势力的矛盾，实行民选县长之机，由何以奎出面活动，请国民党左派人士何绍贞推荐他做候选人，参加竞选万承县县长。最后竞选成功，何以奎就任万承县县长，何焜任农军独立营营长。新政府成立后，原打算打出革命委员会的牌子，但考虑时机不成熟而作罢，只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策。

1931年2月16日（农历1930年腊月29日），以原土州官张宏能为首的国民党民团及匪徒趁农军放假回家过春节之机，设计暗杀了何焜，并袭击了县政府，何以奎和中共党员李杏锦等人在突围中牺牲，敌人占领了万承县城。

县农协会副委员长农冠三、警卫连长何以宽闻讯后，立即决定发动农协会会员举行起义，将县政权夺回来。

20日，县农会召集各甲农军和农协会会员2000多人，进行起义动员，农冠三把敌人杀害何焜、何以奎等人的罪行和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打算向农军和农协会会员说明后，大家一致表示：打进县城去消灭土匪和民团，重建人民政权。会后，农军队伍分路向县城前进。农军和农会会员手持长枪、大刀、长矛等武器，来到州街，把州街围得水泄不通。由于土州官、民团毫无准备，农军攻进县城，敌人弃城逃跑。县农协副委员长农冠三、连长何以宽带领农军冲入县政府，抢回了何焜、何以奎、李杏锦等人的尸体，并四出寻找代表土州官府利益的土豪劣绅。在新民、营班、平良、良泮等地，逮捕了团总汤珍荣和杀害农军领导人的奸细许华方、许修盈等人，当场给予枪决，并夺取了万承县城。

这次起义，是在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广西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进行的，体现了万承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瓦埠起义

1931年3月30日，中共皖北中心县委在寿县瓦埠发动了农民起义。

1931年3月27日，中共巡视员高中林（原名方运炽，一名方英）到寿县，在瓦埠上奠寺召集寿（县）、凤（台）、阜（阳）三县联席会议，宣布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并以寿县正阳关为皖北中心县委根据地，管理寿县、凤台、阜阳、颍上、太和、沈丘、固始、新蔡、息县9个县的工作。会议将要结束时，瓦埠党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寿县县长带七八十军警到了瓦埠。会议认为，这是夺取敌人武器，发动游击战争的机会，决定缴县政府的枪。成立了行动委员会，书记曹鼎，委员杨盟山、魏化祥，薛骞负责军事指挥。计划先捉双庙区区长路奎汉，缴保卫团和地主豪绅的枪支。3月29日夜，起义队伍在瓦埠泰山庙集中。由于负责军事指挥的薛骞贪生怕死，迟迟不敢行动，又因叛徒泄密，双庙区区长路奎汉逃往寿县县城，保卫团分散潜逃。游击队追击时仅缴枪两支。经会议研究，决定继续起义，同时撤销薛骞的指挥职务，成立皖北红军游击大队，方和平任大队长，宋天觉任副大队长，曹鼎任政治委员，魏化祥任参谋长。下设三个中队，戚连雨、杨守先、孟宪钦等任中队干部。

3月30日，3400多名起义队员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馆店门口竖起了镰刀斧头大旗，逮捕了10多名地主豪绅，一些未被捉住的地主豪绅则纷纷前来缴械。与此同时，中心县委还发动群众收地主家粮食。这次起义共缴获长短枪130余支，收粮200余石。起义震惊了附近的地主武装联庄会，他们纷纷联合起来，向皖北红军游击大队发起进攻。游击大队在劣势的情况下，为缓和矛盾，把逮捕起来的地主豪绅全部释放。敌人见状，气焰更加嚣张。寿县县长张相昆和县自卫大队袁少义带着县大队直奔瓦埠镇压。游击大队昼夜坚守三面靠水的张家嘴，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因敌众我寡，无法突围。此时，高中林因事又到苏区去了。瓦埠支部便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私人关系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借枪支子弹，以“小甸集联庄会”的旗号，从圩子的东边“袭击”，掩护游击队夜间突围。突围出来的游击队化整为零，各回原地。并派宋德渊送信通知游击队负责人，不料宋在送信途中被敌捉住，宋坚贞不屈，敌人查不出证据，便放他回鲁城。接着瓦埠支部又派曹云峙化装成货郎担，把信送到。傍晚时分，游击大队见圩子东边出现“小甸集联庄会”的旗帜信号后，顺利突出重围。游击大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家嘴一带几个村庄的数百间民房。在这次起义中，第二中队队长戚连雨及17名战士英勇牺牲。

六安河西起义

1931年5月2日，中共安徽省六（安）霍（丘）前方办事处在六安县河西地区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

六安县淠河以西的新安、陈集、桑家庙、小刘集、徐集、江店、莲花庵等地曾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掀起一场反剥削、反捐税、反民团的斗争。1931年4月24日，中共六霍前方办事处在六安县尚家庙召开共产党、共青团骨干分子和六安游击师、赤卫队负责人会议，研究六安县淠河西武装起义问题，决定在5月2日攻占新安集，举行河西起义。六霍前方办事处为确保起义的胜利，一面派人送信给游击师司令毛正初，要其前来参加起义，一面于4月27日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具体部署。5月1日，毛正初率领游击师100余人，在蔡老庄子与赤卫队会合，成立了起义指挥部，毛正初任总指挥。根据会议决定，起义队伍分3路进攻新安集。第1路由毛正初率领从陈桥出发，攻打新安集正面；第2路由丁宗福率领，从史家洼出发，攻打右翼；第3路由王秀峰、王克彪率领，从谢店子出发攻打左翼。5月2日晨，起义队伍按计划进入战斗位置，500余名游击战士和赤卫队员隐蔽在村庄、麻田、麦陇间。毛正初枪一响，各路起义队伍向敌压去。新安守敌徐华章顽固抵抗，后得其女婿杨晓山部驰援，向淠河东逃去，新安集遂获解放。在毛正初指挥下，起义队伍三天内连续解放了火星庙、丁家集、郭店子、马头集、王家集等地，打垮了新安的徐华章、王家集的王小六子、火星庙的丁锡庭、西桥头集的杨士中、徐集的杨晓山等反动民团武装，镇压了民团头子龚子彬，缴枪20余支。至此，河西起义获得全胜。随后成立了六安八区、九区苏维埃政府。

正当河西起义时，中共皖西北特委于5月2日在麻埠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决定红12师第34团、第36团和军委会特务连开赴六安南岳庙、徐家集一带，支援河西起义，同第12师第35团霍邱苏区打成一片。红12师相继打下六安、霍邱边界的松岗集、吴阳集、储渡口、固县寺、夏店、花果园、三刘集等地，开辟了新苏区，与六安河西起义创建的八区（新集）、九区（丁家集）连成一片。至此，六安以淠河为界，上自西两河口，下抵马头集，西与霍邱苏区相连，全部成为苏区，并成立了六安县苏维埃政府。

沔阳起义

1931年5月4日至是月中旬，在红军的凌厉攻势和中共沔阳地方组织的策动下，国民党军第34师部分官兵连续举行3次起义。

国民党军第34师原属西北军，基本部队为岳维峻所率的第1军团。1930年蒋介石为削弱异己，将第1军团缩编为第34师，引起广大官兵的不满。1931年3月，第34师奉令参加“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进至孝感双桥镇地区时，遭到红4军主力的沉重打击，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被俘。4月，第34师所剩部队约3个团移驻沔阳，作为对洪湖苏区“围剿”的预备队。由于大败之后，军心动摇，又经中共沔阳地方党组织的策反，第34师部分营连连举行了起义。5月4日，第34师驻沔阳杨树峰1个营集体哗变。因被反动官长发现，进行武装弹压，只有在外围担任警戒任务的1个连，投奔到沔阳县苏维埃政府。中旬，第34师驻仙桃的3个连举行起义，携带大批枪支弹药来到沔阳四区苏维埃政府，受到欢迎。与此同时，第34师驻沔城的2个连也举行起义。

上述6个连官兵的连续起义，对国民党“围剿”部队是个沉重打击和极大震动，第34师剩余部队很快被调往他地“整肃”。起义官兵后编入工农红军第3军，壮大了红军队伍，增加了反“围剿”的力量。

鸡麻湖起义

1931年6月3日，中共广东北江特委组织部长刘裕光等率领100多名农军攻占丰霖乡的鸡麻湖村，举行了鸡麻湖起义。

1928年1月的潭洞暴动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参加武装斗争的群众。中共英德县委再次转入地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931年春，北江特委组织部长刘裕光亲自到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工作。省委指示北江特委：要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的武装暴动，以革命武装打击反革命武装，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刘裕光被派回英德后，向特支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特支便决定伺机发起暴动。首先成立了五道坛临时办事处，由刘裕光兼办事处主任，领导篷船工人和数百农民开展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当时，鱼湾圩附近的丰霖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个乡的鸡麻湖村土豪劣绅邓尚醮欺压群众，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特支研究了鱼湾圩的情况，决定从鸡麻湖开刀，引发全县的武装暴动高潮。6月3日，刘裕光、彭金华、梁展如等人到鸡麻湖等地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队伍。他们把乡里的步枪、鸟枪、短剑、大刀、梭标等各种武器秘密收集起来，武装了农军100多人，成立赤卫队，由特支书记李业任队长。当晚，刘裕光和彭金华带领农军突然包围了邓尚醮的家，准备把邓尚醮抓来正法。不料邓尚醮当时外出还没回来。第二天，特支就在丰霖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林栋材任主席。为了准备反击敌人的反扑，刘裕光等根据上级指示在丰霖乡积极健全和发展武装队伍，把参加过暴动的100多名农民组建成一个武装中队，委蓝田为中队长，李业任指导员，由邓尚娥、张文延、陈监清3人分别任小队长。时隔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便纠集黄塘、溪板、门园太、洪象、文光、桥头等地反动武装600多人分三路向鸡麻湖进攻。鸡麻湖农军采取了分兵对付、各个击破的办法狠狠打击敌人。中队长蓝田带领武装中队到庵下设伏，把从门园太、洪象来的敌人打得大败而逃，其他两路农军也胜利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遭到打击的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调来了正规军一个团的兵力，伙同当地的反动武装向丰霖乡革命政权发起进攻。他们把鸡麻湖包围得水泄不通，连续攻打。鸡麻湖农军奋起抗击，与敌人激战一昼夜，打死打伤敌人20多名。后来中队长蓝田和指导员李业带领部分农军冲出重围，退守到三山坚持斗争。坚守在鸡麻湖炮楼等处的30多名农军因受到敌人的重重包围冲不出来，最后有3人被烧死，10多人被俘虏。敌人攻下鸡麻湖之后，大肆烧杀抢掠，周围村庄的家家户户都被洗劫一空。

永安起义

1931年6月初，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驻山西省汾阳县永安镇国民党军赵协中部第3营第3排官兵发动兵变，举行起义。

1930年冬，中共山西省委为实施中共中央北方局天津扩大会议关于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新苏区的指示，决定在吕梁山区举行起义。为此，从太原兵工厂抽调30多名工人，从驻陕国民党军高桂滋部调派共产党员拓克宽、杨重远、吴岱峰等先后到汾阳、离石、柳林一带创建游击队，做起义的准备。次年5月上旬，根据中共山西省委指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1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拓克宽任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黄子文任政治委员，杨重远任共产党支部书记，下辖两个中队。杨重远利用老乡关系，调查了解驻汾阳永安镇赵协中部第3营第8连人员和武器装备情况，秘密发展该连第3排牟排长和冯班长为中共党员。各种准备工作日臻成熟后，于6月上旬，晋西游击队副大队长阎红彦和共产党员白锡林、胡廷俊等到永安镇发动起义，顺利将第3排的30多名官兵带出永安镇，编为晋西游击队第3中队，牟、冯分别任正副中队长。

平定起义

1931年7月4日，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谷雄一等人的领导下，驻山西省平定县的国民党军第11师高桂滋部第1团7个连共1200余人举行了起义。

国民党军第11师高桂滋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也不是阎锡山的晋军，属陕西杂牌军。该部驻山西平定后，因军官降职降薪和长期拖欠士兵的薪饷，官兵怨声载道，斗志涣散。据此，山西省委认真抓了该部的兵运工作，加强宣传教育，发展共产党员。早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该部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有几十名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军委曾指示中共山西省委在该部适时组织兵变。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该部中共秘密组织于1931年7月4日，秘密集合第1团7个连共1200余人的队伍，由谷雄一宣布正式脱离高桂滋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着由高桂滋部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和该部连长赫光指挥第2营攻打团部，处决了反动军官，几次攻打高部驻上城司令部，未果，遂撤出平定城。起义部队冒雨急行军经阳泉以东白洋墅车站，于次日拂晓到达盂县清城村休整。与此同时，高部第3团部分官兵在中共党员牛清玉、蒲子华带领下，借了解情况为名离开驻地，赶往平定参加起义。后得知第1团已经转移，遂夺取师部马匹后赶上第1团的起义队伍。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在盂县城成立，赫光任军长，谷雄一任政治委员，窦宗融任副军长，刘明德任参谋长，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中队。8日，起义军在盂县上社镇歼灭了敌保安团。18日占领了阜平县城。26日建立华北第1个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牛曦任主席，刘应融任副主席，委员5人。后转战晋、冀、绥、陕等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殊死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军长赫光和政治部主任刘子祥等领导人不幸牺牲，部队伤亡惨重。剩余的少数起义人员之后参加了陕北的红26军和渭河游击队。

向都第二次起义

1931年7月11日，向都农民赤卫军和思林、果德部分农军，在中共广西果德县委领导下，在向都县城举行了第二次起义。

向都县地处桂西山区，是左右两江的交通要道。1928年1月8日，曾发生过一次农军攻打县城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向都县人民政府。1931年春，以黄绍竑为首的桂系军阀，乘红七军北上之机，卷土重来，控制了右江沿岸的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县城。并向东兰、凤山大举进犯。在桂系军阀的扶植下，沿岸各县的反动势力纷纷复辟，占领乡镇。向都人民再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1年7月初，果德、思林、向都三县的中共党组织领导人黄书祥、赵世同、陈鼓涛、林柏在果德县弄那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向都县城敌军大部分外出“扫荡”之机，集中三县农军和红21师独立团部分武装再次举行起义，攻打向都县城，重建革命政权。7月10日，三县农赤军和独立团共2400多人，集中巴麻编队，由中共果德县委书记（兼独立团团团长）黄书祥担任总指挥，决定分兵四路进攻县城。

7月10日晚，准备工作就绪后，农赤军和独立团按计划从巴麻出发，向向都县城进发。因冒雨行军，影响了速度，没有按时到达集结地点，结果敌县长农树葵、民团副司令黄清一闻讯逃跑，有部分后撤民团被农赤军先遣队包围歼灭。11日，农军冲进县城，砸开监狱，救出黄显禄等11名战士和20多名群众，缴获49支步枪，子弹1000余发。国民党县长农树葵不甘心失败，又纠集民团和土豪武装共1000多人进行反扑，双方激战十多分钟，农军打死民团团丁10多名，缴获步枪1支，敌见势不妙慌忙溃逃，起义取得了胜利。

向都第二次起义，是向都、思林、果德三县农军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行的一次联合起义，它不仅是重建革命政权的行动，也是对国民党桂系军阀镇压革命力量的一次有力还击。

定远吴圩起义

1931年8月20日，中共安徽定远县委在该县吴圩领导农民武装举行了起义。

吴圩位于定远、肥东、寿县（今属长丰）3县交界处。1929年，共产党在这里成立了党小组。1931年3月，中共吴圩区委成立。至7月，发展到8个支部，180多名党员。吴圩及周围的站岗、卜店、九子都建立了农民协会。为了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吴圩党组织在农协会会员中吸收青年骨干，组织赤卫队。从1931年1月开始，他们以保家防匪的名义，在民间收集枪支、刀矛等武器，组织赤卫队。四个月的时间，组织赤卫队员近千人，为武装起义准备了骨干队伍。

1931年夏，吴圩地区先遭特大洪灾，后又遇大旱，粮食歉收，加之兵灾匪患，苛捐杂税，压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来。吴圩党组织适时领导农民进行抗捐税、反高利贷、反行业霸权和借粮、扒粮斗争。

1931年8月19日，中共吴圩区委召开会议，区委书记朱阶平宣布中共长淮特别委员会关于成立中共定远县委的决定，朱阶平任县委书记。会议开始不久，接到报告，国民党定远县警队以捕捉土匪为名要去早香庙捕捉农协会会员。县委立即派刘朝富率领赤卫队携带10余支钢枪，星夜赶往早香庙营救。在当地农民支持下，赤卫队奋起抗击，毙俘县警各1人，缴枪3支，马1匹和数发子弹。早香庙战斗的胜利，激发了农民革命的热情。8月20日，县委决定举行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这天，县委领导的多名赤卫队员，在农民群众配合下，在吴圩、站岗、九子一带的集镇村庄举行起义，打垮地主武装，分了地主的粮食和财产。8月23日晚，县委在吴圩的山人刘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红军司令部，戴国兴任总指挥兼政委，刘朝富任副总指挥。同时宣布成立“长淮特委游击大队”，刘朝富兼任大队长，直属司令部。随后起义队伍在刘朝富率领下攻打恶霸地主张再贵，不料张已带领家人和枪支逃跑。

吴圩农民起义，使土豪劣绅惶惶不安，纷纷向上求援派兵镇压。8月26日，张再贵的儿子张恭韩带领地主武装1000多人，从东、南、北三面包剿县委所在地山人刘，游击队分散活动未能及时集中，红军寡不敌众，只好撤退。县委和红军撤退时，因队伍内有人叛变投敌，总指挥兼政委戴国兴牺牲，县委书记朱阶平负伤被俘，起义遂告失败。

鱼湾起义

1931年8月28日，中共广东北江特委组织部长刘裕光率领数百名农军，发起了攻占国民党英德鱼湾区署的起义。

1931年6月鸡麻湖起义失败后，退守到三山等地的农军继续发动群众，坚持开展武装斗争。是年7月，中共英东特支在中共北江特委组织部长刘裕光、宣传部长梁展如、特委巡视员彭金华领导下，准备在国民党在英德统治中心的鱼湾再次发动武装起义。当时，英德县境内暴雨成灾，流离失所的灾民饥寒交迫，惨不忍睹。国民党当地政府仍不顾人民群众死活加紧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因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恰逢这时国民党鱼湾区署与商人闹矛盾，国民党鱼湾区区长陈炳文在纠纷中被刺受伤。中共鱼湾区党组织认为这是在鱼湾发起武装起义的好机会，便派人送信给刘裕光等领导，请求赶快派农军到鱼湾来。北江特委组织部长刘裕光及待支书记李业接到情报后，于8月27日指挥三山等地的农军向鱼湾集结。刘裕光分析了当前的敌情：鱼湾区署旁边有座全昌当铺作遮挡的炮楼，十分坚固，又有20多个团丁和一个班的政警队防守。农军武器落后，要强攻区署不易，最好的办法是智取。恰逢28日凌晨，警戒哨兵活捉两名县警队队员。经审问，得知他俩是奉区长之命送信前往县府告急求援的。其中一位曾经当过花县农军战士，大革命失败之后被迫到县警队当差。经过教育，他当即表示：愿意站在农军一边，去叫开区署大门。于是刘裕光和蓝田等决定立即攻打区署。刘裕光、蓝田带上几十名农军战士，荷枪实弹悄悄地跟在两个县兵后面。结果县兵一叫开大门，农军立即一涌而进。敌哨兵还没清醒过来就当了俘虏。陈炳文企图顽抗被当场击毙。区长一死，剩下的敌兵全都缴械投降。这次行动共俘敌30多人，缴获长短枪20多支。解放区署后，农军立即猛攻盘踞在区署对门的全昌当铺炮楼。农军先后发起几次冲锋，都没奏效。鱼湾周围的许多革命群众听到了枪声都拿着大刀、长矛、鸟枪等武器前来参战。在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农军终于攻占全昌当铺炮楼及整个鱼湾，还顺利地接管了文光乡公所，抓获作恶多端的大地主胡祖枫、胡朗轩、胡克勋3人，并收缴步枪10多支，驳壳枪3支，子弹一批。一时间，暴动的烈火燃遍了鱼湾区所属7个乡，国民党乡公所一个个被农军占领，许多村寨都插上了鲜红的犁头旗。8月29日，特支召集鱼湾区所属7个乡的近万名革命群众，在鱼湾圩隆重集会，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廖光禄任主席，由邓强、邓尚娥、刘承尚、范深利、黄杰夫、陈开咸、蓝醒奎、蓝秋初等人任委员。由邬汉英（邬强）任文书，胡克甸管理财经。大会还宣布将参加暴动的500名农民武装编成两个工农赤卫大队。第1大队长蓝田，党代表李业；第2大队长胡曙东，党代表彭金华。会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内容的文告。8月30日中午，国民党军两个团伙同潭头乡数百名地主武装疯狂进攻鱼湾。面对优势的敌人，赤卫队抵挡一阵后于9月1日退入山区坚持斗争。

英德鱼湾起义，是在广东革命斗争处于低潮时期爆发的。它再一次显示了英德人民不屈不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风貌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山城镇起义

1931年9月21日，中共闽南特委在福建省南靖县山城镇，发动和领导驻山城镇的国民党军第49师一部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2月，国民党军张贞部改编为陆军第49师，张任师长兼福建“剿匪”司令，派独立团第1营营部及第3、第4连驻防南靖县山城镇，妄图扼杀闽南共产党地下组织及其武装部队。1931年春，中共闽南特委书记陶铸派中共永春县委委员颜国泰打进国民党军做兵运工作。颜国泰改名颜长标，化名陈秀，通过老乡关系在独立第1营第4连任班长。根据陶铸的指示，颜长标在第3、第4连广交朋友，提出士兵拥护的“发清军饷”、“反对长官打骂士兵”的口号，组织士兵委员会，开展合法斗争。至8月，有100多名士兵参加了士兵委员会，并成立中共第3、第4连地下党支部。

1931年9月，正当第3、第4连党支部紧锣密鼓地进行兵变准备的时候，情况突然起了变化，张贞部杨逢年旅屡犯苏区受挫，为扭转闽西败局，张贞决定于9月22日进攻闽南工农游击队。9月20日，独立团第1营开始部署，并企图趁机将第3、第4连中的“不可靠”分子分化到第1、第2连。颜长标立即召开党支部紧急会议，决定抓住时机，举行兵变，牵制敌人对游击队的进攻，并将起义时间定为21日凌晨4时。

9月21日凌晨4时，颜长标根据闽南特委的指示，在山城镇举行了有士兵205人参加的起义，携枪180余支。起义士兵在颜长标的率领下，刺死反动连、排长，割断电线，当日在山城镇中山公园开会，宣读了《国民党十大罪状》讨檄书。后起义队伍改编为闽南工农游击队第2支队第2大队，颜长标任大队长，陈炳辉为副大队长。

张贞得悉山城镇兵变后，急调第146旅主力，并配合其他驻军和民团，对起义部队发起全面“围剿”。起义部队由于受到敌军两架飞机的轮番轰炸、扫射和重兵的围追堵截，遭受严重挫折和伤亡，除尖兵排部分突围和小部分士兵被冲散外，绝大部分士兵在战斗中牺牲。身受重伤的颜长标被俘，不久在漳州北郊被杀害。

山城镇起义，牵制了国民党军第49师的兵力，减轻了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队的压力，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长官店起义

1931年9月26日，中共安徽阜阳中心县委在阜阳县西三镇长官店（今属临泉县）领导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秋，阜阳“四·九”起义领导者之一的李力果到寿（县）凤（台）一带开展工作，恢复了皖北特别委员会。随后派遣张蕴华、曹国勋到阜阳西南乡开辟以长官店、曹寨、沈邱集为中心的党的地下工作，成立了长官店党支部，张蕴华为书记。1929年秋，张蕴华利用担任国民党阜阳县政府财政局局长的身分推荐曹国勋任阜阳西三镇保安大队长，以掌握地方武装。张还利用关系在阜阳城借枪18支，又购买了部分枪支，为长官店暴动准备武器。为推动长官店农民运动的开展，长官店党支部组织党员在长官店、曹寨、沈邱集等各小学开办农民夜校和贫民子弟学校，以学校为阵地，向广大农民和青少年宣传革命道理，发展穷人会员2000余人，妇女会员300余人。同时，长官店党组织发动农民向土豪劣绅开展经济斗争。张蕴华凭借县财政局长的权力，带领贫苦农民勒缴了阜阳8个地主豪绅多年拖欠的银粮，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长官店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引起阜阳城乡地主豪绅的恐慌和仇恨，他们千方百计收买、逮捕共产党员。张蕴华为应付突然事变，把原计划于1931年3月25日举行起义的时间改为同年中秋节夜举行，同时指示曹国勋辞去西三镇保安大队长职务，回长官学校任军事教员，立即开展童子军和赤卫队的训练。当时长官店、曹寨一带赤卫队已发展到2500余人，拥有步枪36支，短枪30支，土炮18门，自制炸弹数百枚，斧头、镰刀、长矛千余把，自制红军帽徽千余个和一面带有镰刀、锤子的红旗。为便于对起义的领导和联络，张蕴华在长官店、曹寨、沈邱集建立了3个中心联络站，在各集镇和较大的村庄建立了18个秘密联络点，成立了以曹国勋为首的指挥机构，拟定了起义计划。1931年9月26日，交通员曹殿安、曹殿清两人去阜阳向张蕴华汇报情况，不料途中被捕，搜出传单和标语，暴露了暴动秘密。阜阳国民党当局立即在城内增派了兵力，切断了阜阳与长官店的电话联系。为此，张蕴华与长官店失去联系。9月26日晚，各路赤卫队按照原定计划，带着枪支和长矛、大刀分别向长官店集聚，长官店暴动开始。与此同时，在阜阳城里的阜阳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指导长官店暴动后的行动事宜。

国民党阜阳反动当局为镇压长官店暴动，调动县保安大队全部人马，围攻长官店暴动集结地。面对强大的敌人，曹国勋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将集中起来的赤卫队员遣散回家，自己转移到邻省河南大杨集。长官店暴动震惊了阜阳县政府，他们一面急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安徽省政府派兵“围剿”，一面调集县武装，对长官店、曹寨、沈邱集一带大小集镇和村庄，进行大搜捕。张蕴华、韦登杰、曹殿国等6人被捕，张蕴华被捕后解往安庆监狱，受尽酷刑，英勇就义。

孔家湾起义

1931年10月7日，中共湖北宜城孔家湾党组织发动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数十人举行了起义。

1931年春，宜城西部孔家湾地区共产党的组织有较大发展，并组织了暴动队，准备伺机暴动。9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第9师在接应红3军主力回师洪湖地区时，在孔家湾地区停留了几天。在此期间，该军派人上街进行革命宣传，惩办了民愤极大的劣绅马大生等人，并对宜西地区共产党组织作了一些具体指示和物资支援。

10月5日，人称“二县长”的劣绅王烈武、王伯藩由县城回到孔家湾，以看租为名侦察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密谋一举消灭共产党。在王烈武家当雇工的地下党员朱天才得此情报后，即向党支部书记张克发作了汇报。张立即召开党员会议，决定举行起义，处决“二王”，由李毓兰为起义队长，同时将起义计划报告上级组织。

7日凌晨，张克发等率孔家湾地区的党员和农民群众数十人携带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突然冲进了王伯藩的家，将王烈武、王伯藩抓获，尔后押着“二王”上了八万山。国民党宜城县长得知孔家湾农民起义消息后，派出县中队进攻据守八万山的农民起义队伍。农民起义队伍凭险据守，浴血奋战，但因敌强我弱，逐渐不支，遂于10日将“二王”处决后分散隐蔽，孔家湾起义至此结束。

黄家坝起义

1931年11月3日，中共安徽凤台县委领导该县黄家坝（今属颖上县）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凤台县黄家坝是个小集镇，位于淮河与颖上汇流处的左侧。1931年2月，中共凤台县委派县委委员到黄家坝帮助指导党的工作，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农协会员，使黄家坝农协会员发展到1300多人。随后黄家坝成立了农民协会和红军中心联络站，黄家坝党支部书记黄子贞兼任农协主席和联络站书记。1931年夏，颖上、凤台等淮北地区发生了40年来未有的大水，地处低洼地区的黄家坝周围10多个村庄被大水冲毁，广大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地主豪绅却步步逼债，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日日加重，致使阶级矛盾激化。凤台县委把握时机，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发动农民起义问题。凤台县委书记、游击队负责人唐志远到黄家坝，召开黄家坝党支部委员会，决定11月5日举行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寿县游击队也计划于同日到黄家坝，协助起义。黄家坝附近的鲁口子集中了30多支枪，江口集中了20多支枪，待黄家坝起义后立即响应。11月3日，寿县游击队140余人提前到达黄家坝，并立即在黄家坝周围设岗警戒，并逮捕了四个地主，缴获长短枪各一支。鉴此，黄家坝支部提前进行起义动员，准备参加红军的农协会员也都佩上了红布条，投入游击队行列。这时，游击队员增加到170多人，有长短枪80余支，机关枪两挺。由于寿县游击队提前到达，唐志远在黄家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举行起义。午饭后召开了附近6个村5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起义。会后，起义农民在游击队的带领下，分头涌向前黄店、吕店两个村的4家地主，打开他们的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午后2时许，逃跑的地主吕华三和红枪会头目杨诚轩纠集2000多会匪及地主武装，先后从西北、西南和北面3路围攻起义队伍。唐志远迅速把起义队伍组织起来，与敌展开激战。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起义队伍孤立无援，腹背受敌，游击队领导人曹鼎、李英、唐志远、程东方和黄家坝党支部书记黄子贞等先后牺牲，起义失败。

飞竹起义

1931年11月25日，中共福州市委在罗源县西南部的飞竹村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飞竹村是国民党区公署所在地。村中200多户人家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佃户，农民群众过着悲惨的生活。1930年冬，中共连江县委书记杨而菴到飞竹村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不久，中共福州市委派宣传部长黄孝敏到飞竹村组织农民武装，很快在飞竹村周围10多个村庄发展了6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

1931年11月，黄孝敏又一次来到飞竹村，传达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开展武装起义的指示，介绍了福安县赛歧和连江县透堡农民起义的经验。经过发动，农民参加起义的积极性提高。25日晚，飞竹村等10多个村的100多名农民赤卫队队员，在黄孝敏的带领下，包围了区公署民团团部，击溃了民团，缴枪10多支、子弹700多发。飞竹起义的成功，使罗源县人民受到鼓舞，工农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为闽东北地区工农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26路军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指导和在该路军秘密开展工作的中共特别支部的组织发动下，于江西省宁都城举行了武装起义。

国民党第26路军原系冯玉祥西北军之一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冯邀请中共派人去该部开展工作，对其官兵产生了深刻的革命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在该军的组织遭到“清洗”，大部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这支部队，少数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仍在该部队秘密开展工作。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与蒋介石混战失败，冯部第5路军被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次年1月，蒋介石将该路军从山东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9月，国民党军第3次“围剿”失败后，该路军被留下在宁都驻守，其他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该路军对孤军驻守极为不满。加之蒋介石对该路军的歧视，不仅战斗减员和武器弹药的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就连军饷也时常发不出来。该路军官兵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排除异己”的用心。“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的高潮，第26路军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又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更加深了该路军官兵同蒋介石的矛盾。

鉴于以上情况，在该路军秘密工作的以刘振亚为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团结争取该部进步军官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并因势利导，积极发展党员。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秘密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2月5日，中共特别支部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共产党员的紧急情报后，立即与赵博生商定，乘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之机，举行起义，并派袁汉澄等到瑞金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准备起义的计划，并取得指示：以联合红军抗

日为发动起义的政治口号，由赵博生争取旅长董振堂、季振同支持起义。经过赵博生做工作，董、季二位爱国将领同意参加起义，还争取了团长黄中岳参加。这为起义奠定了基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东南的固村就近联络指导，并令红军第4军第12师进至宁都、广昌之间的会同地区箝制国民党第6路军，支援宁都起义。

12月14日，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及黄中岳等率领第26路军1.7万人在宁都举行起义，拘留了少数抗拒起义的军官和国民党宁都县长。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政治委员肖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辖第13、第14、第15三个军。第13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第14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第15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重要的、成功的武装起义，它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而且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对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透堡起义

1931年冬，福建省连江县透堡乡农民在中共透堡支部书记、农民自卫队长杨而菴的率领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要求福州邻近的长乐、连江等县工作从群众斗争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5月，中共党员杨而菴回透堡，秘密成立中共透堡支部并任书记，同时成立了农夫会。至10月底，会员发展到130多人。1931年10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邓子恢和张铁到连江巡视。杨而菴根据市委指示，领导农夫会开展减租斗争，经10多天时间，田租减80%多，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为防地主反扑，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130多人，杨而菴任队长。

透堡镇地主一面利用封建宗族关系分化瓦解农夫会，一面筹措武器准备镇压。1931年12月21日夜，横行乡里的地主“五虎一豹”纠集200余人冲击农夫会，经激烈搏斗，农夫会击退了地主武装的进攻。接着，地主武装又纠集200余人，在陇柄村地主武装的支援下，再次向农夫会发起进攻。杨而菴率自卫队及农夫会会员与地主武装进行了艰苦的拉锯式巷战，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后因地主武装不断增加，杨而菴率队撤出战斗。透堡起义失利后，杨而菴率队伍一直坚持斗争。1932年6月后，在连江合山成立了闽中游击第1支队，到1933年12月，发展到170多人，建立了透堡苏维埃政权。

墨江起义

1931年底，中共云南墨江县工作委员会领导该县人民群众举行了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武装起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墨江县党组织的活动从未停止过。1929年，成立了中共墨江县工作委员会，熊文和任书记，陈家麟、卫秉礼、王继周、孙德齐、秦树声、李子忠等为委员。随后，又建立了漫婆，卜左、赖蚌、那雷、妈木、麻栗树等6个支部。1929年以后，墨江各地相继建立了近30个农会，拥有会员3000多人。1930年冬，墨江工委在卜左的墩头寨子开办了为起义作准备的训练班。

1931年8月7日（农历6月24日，火把节），中共墨江县工委在卜左墩头召开了县工委委员、区委书记、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农会骨干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1931年冬至节举行起义。不料，由于叛徒的出卖，11月22日晚，国民党县政府借召开抗日救国会执委会为名，将工委负责人熊文和、陈家麟2人逮捕。随后，孙德齐、秦树声、曾福先等7人也相继被捕（后来熊文和、陈家麟、孙德齐、秦树声和曾福先5人英勇就义）。由于情况突变，工委立即决定提前举行起义，并推举李光鼎为起义总队长，王继周为参谋。漫婆队由郑克昌指挥，赖蚌队由马白文指挥，麻栗树队由李文新指挥。起义武装本打算进攻墨江县城，但由于反动武装保商大队在县城戒严，起义计划未能实现，随即转入农村坚持斗争。

1932年，活动在农村的起义农民武装不断打击敌人。在漫婆寨附近的只密夺和，与保商大队打了一场遭遇仗，敌被击溃分散逃窜回城。在金厂梁子扎营，敌企图偷袭李文新率领的麻栗树武装，结果中了埋伏，被打死4人，其余溃逃。是年秋末冬初，敌保商大队等八、九十人，在队长刘春培率领下，在白土村附近设埋伏，企图消灭起义队伍。起义武装得到情报，对敌人实行反包围，活捉敌队长刘春培，打死打伤敌人数名，其余敌人逃回墨江县城。

为了对付革命武装，敌人增派了国民党驻军，扩编了保商队，不时对农村进行扫荡。中共墨江工委认为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武装既无外援，又缺粮饷。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于1932年冬至节（12月22日），在金厂大本营召开大会，决定部队分散活动。墨江起义至此结束。

小山城起义

1931年底，中共福建漳州县委在小山城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1年12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派邓子恢到漳州接替陶铸的工作，并要求中共漳州县委和游击队要迅速建立游击根据地。漳州县委决定全力以赴领导小山城农民进行抗捐斗争。小山城经过发动群众，农会力量迅速壮大，农民协会会员由四五人发展到四五十人。为支援小山城农民斗争，邓子恢、王占春带领闽南红军游击队来到小山城。小山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秘密农会公开了，并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队，周围4个村庄也成立了农会组织。随着革命斗争热情的不断高涨，邓子恢不失时机地领导小山城农会会员和农民自卫队举行起义，发动群众起来废除各种捐税，开展减租和禁止粮食外运等斗争。周围乡村农民也仿效小山城的作法，掀起抗捐、退租等斗争热潮。

1932年2月29日和3月4日，国民党地方当局先后调遣(南)靖、(平)和、(漳)浦三县民团对小山城进行“围剿”，红军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与数十倍的敌人进行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游击队撤出小山城。3月6日，敌人撤离，游击队又重返小山城。

4月20日，红4军攻克漳州后，漳浦广大农村掀起土地革命热潮。小山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不久，漳州红军游击队、小山城农民自卫队和其他县游击队合并，在县城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3团。

下陈民团起义

1932年2月12日，在中共福建省委派员邓子恢和闽南游击支队政委李金发的领导策动下，漳州南乡下陈民团举行了起义。

1931年10月，中秋节后的一个晚上，闽南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金发带领30多人的武装队伍，准备收缴下陈民团枪械，因被觉察，计划落空。不久，中共福建省委派邓子恢来到漳州。邓子恢即与李金发一起，决定对下陈民团采取分化瓦解工作。李金发派李狮去该团，争取了其弟李跃（民团团丁）和班长洪振隆。

1932年2月12日，这是南乡最大的村庄古县的迎神赛会日。游击队决定利用这一天策动民团起义。是日夜，下陈民团队长、副队长、护兵等民团主要骨干分子都回古县赴宴会。邓子恢、李金发率游击队员集中在田下村口白灰墓，决定利用班长洪振隆站岗时间于晚12时行动。晚11时，洪振隆带领游击队到达下陈民团团部，剪断电线，收缴了武器，处决民团书记官。起义后绝大多数人员参加了闽南红军游击支队。

大贯庄起义

1932年2月26日，江苏东海西乡地区的农民在中共海州特委和东海县委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徐海游击队”。

1929年3月至1932年初，中共东海大贯庄支部书记孙秉衡、鲁兰支部书记焦奎在本地坚持活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农协会会员。

1931年12月18日，中共海州特委根据《江苏省委对徐海蚌各县发展游击与军事工作的指示信》中关于“开展群众斗争，在这些基础上，大胆地建立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西乡大贯庄一带举行农民武装起义。1932年初，省委派曹甦接替朱秋白任海州特委书记。曹与特委宣传部长刘秀文、大贯庄支部书记孙秉衡、鲁兰支部书记焦奎等党员，在农民中广泛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争取了青年学生、农民长工等五六十人参加了革命，并弄到10余支枪。是年春节期间，曹甦、刘秀文、孙秉衡在大贯庄召开会议，研究了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问题。决定：曹甦为总指挥，孙秉衡、焦奎为政委，孙秉权负责武装，李铮负责情报，李东泗负责交通路线。

1932年2月26日晚，孙秉权带领大贯庄精干农民60余人，冒雪冲进地主孙玉乔、孙秉忠、周建玉家，缴枪（10余支）分粮。白塔埠前营支部书记张继武带领部分党员群众，在包埠至白塔埠间破坏了3段铁路后连夜赶到大贯庄。起义队伍当夜在大贯庄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誓师大会。曹甦、孙秉衡作了动员，宣布“打土豪，救穷人，闹共产”。会后，起义队伍向鲁兰开进。这时地主焦广珍家的长工李开殿、李金生已按密约将焦拘留，起义队伍趁夜幕直入焦家圩宿营。27日，大贯庄起义队伍与焦奎组织的鲁兰农民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徐海游击队，有30多人枪。是日晚，游击队发动农民分了几家地主的粮食，烧毁其田契债约。

游击队的公开活动，引起各村地主的仇恨。他们勾结官府密谋镇压。3月1日，游击队移驻车庄以东20里的蔷薇村时，遭到地主武装围攻。因游击队缺乏斗争经验，又缺乏补给，被迫分散撤退。起义失败后，反动武装乘机进行疯狂报复。为此，坚持原地斗争的孙秉权、李东泗组织李开殿等7名游击队员，偷袭刘湾庄地主刘凤翹，并将其击毙。

大贯庄起义，是东海人民继牛山起义之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又一壮举。

惠北起义

1932年3月14日，中共福建省惠安县委在该县北部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1年3月，中共惠安县委成立，书记者杨（真名沈玉泉，化名马路杨称老杨）。5月，为贯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的指示，惠安县委决定迅速恢复涂岭、普安、三朱、山腰等地共产党组织，开辟以三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同年秋，老杨奉命返厦门，李文端接任县委书记。至11月，三朱、前黄、瓦厝、山腰等36个乡村均建立了党的组织，全县有党员100多人，农会会员300多人。12月，中共惠安县委发动下九乡农民自卫军围缴下乡征收税捐的国民党军20余人的枪械。

1932年2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蔡协民抵惠指导抗捐斗争，漳州工农红军游击队参谋长庄毓吴回惠安工作。惠安县委相继召开8次会议，研究抗捐斗争。不久，惠北抗捐大同盟在三朱昆山寺成立，领导人唐言福。3月4日，驻惠安国民党军队200余人借“认捐”为名，进驻惠北党组织活动中心——三朱，分驻于溪朝村、后木村。6日夜，逮捕三朱开明乡绅4人。这一事件发生后，县委在三朱后宅村建立了抗捐斗争指挥部，蔡协民任总指挥，分头联络各乡村，准备举行起义，围歼国民党驻军。

3月14日午前，惠北党组织直接掌握和指挥的武装骨干队伍30余人和抗捐群众1000余人，在三朱都巡村召开抗捐誓师大会。会后，抗捐大军在蔡协民、李文端、唐言福等人的率领下，兵分3路围攻驻防在坝头仔和朝林的敌驻军，经3小时激战，毙敌3人，投诚2人，缴枪20余支，攻占了“田亩捐办事处”，救出被抓4名开明乡绅。15日晨，敌增调部分兵力再次侵占坝头、山腰、十八乡等地。抗捐大军与敌展开激战，至下午三四点钟，向敌发起冲击，敌军不支，退守朝林。抗捐队伍俘敌1人，缴枪10余支。16日9时，抗捐队伍分别集结于虎遇山、前埔岭等敌驻地附近的小山头，采取“车轮”战术，轮番对敌发起攻击，敌被迫退守朝林村，凭借坚固楼房、围墙顽抗。入夜，敌军乘武装队伍连续作战疲劳之机，组织“敢死队”分3路突围，逃回县城。此战，敌死伤10余人，抗捐队伍牺牲1人，伤3人。

河溶起义

1932年3月18日，中共湖北省当阳县委组织领导农民武装于该县河溶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2年1月18日，中共当阳县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提出争取当阳在宜昌上游首先胜利的口号。下旬，国民党当阳县政府在全县组织2.7万人“铲共义勇团”，以配合正规军和县保安大队围剿当阳苏区。3月18日，中共当阳县委获悉两个保安中队200余人于20日出发到苏区进剿的情报后，决定乘机发动武装起义，消灭保安队，进攻河溶镇。县委书记傅子和率县特务队、肃反队和区赤卫队在杨家山包围一个保安中队，经过政治争取，该保卫中队缴械投降。另一路游击队和赤卫队在陈家港击溃李元超率领的保安中队，缴枪10余支，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占河溶镇，“铲共义勇团”随保安中队向县城逃跑，农军砸开监狱释放被关群众，没收土豪劣绅财物分给贫民。不久，国民党当阳县长陈秉政率保安大队和“铲共义勇团”1500余人，配合川军李成林营向中共县委机关、游击大队驻地进攻。由于力量悬殊和叛徒出卖，县委机关被打散，农军损失严重，傅子和被捕遇害，起义失败，当阳县苏区大部丧失。

两当起义

1932年4月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驻甘肃省两当县的国民党军第17路军警备第3旅第2团第1营举行了起义。

1929年到1930年秋，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等到国民党陕西省骑兵第3旅第2团第2营做兵运工作。经过1年多的工作，在该营发展共产党员50多人，建立了中共地下党委。1931年春，该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警备第3旅第2团第1营。“九·一八”事变后，该部由陕西凤翔县进驻陕西甘肃两省边界的两当县和凤县。1932年3月，该部奉命去甘肃省徽县驻防。第1营官兵不愿离开陕西省，中共地下党委于4月2日领导该营第1连、第2连和第3连共200多人在两当举行起义。起义部队与顽抗的机枪连进行激烈战斗，击毙该连连长。因国民党援军逼近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便主动撤出两当县城，转至陕西省境内。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5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当起义部队北上到达永寿县岳御寺时，遭到当地土匪武装包围，虽经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在撤退时被打散。

双河集起义

1932年4月7日和12日,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以合肥北乡的双河集(今属长丰县)为中心,发动赤卫队和农民群众先后两次举行武装起义。

1926年,双河集成立了中共合肥北乡党支部,后又扩建为肥北区委。1930年秋,以崔筱斋为书记的肥北区委,继成立北区农民协会之后,又建立了区青年团组织、双河妇女协会及农民赤卫队。

1931年秋,双河集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庄稼颗粒无收。1932年又发生了大春荒。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决定趁农村青黄不接、断粮断炊之际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了加强对这次起义的领导,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决定派军委书记李星三(即张志一)及徐梦观、王平等到北乡,协助崔筱斋组织起义。李星三等到北乡后,召开了区委委员、各支部书记、赤卫队长、群众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组成了以崔筱斋、李星三为首的起义指挥部,并将三县交界地区的赤卫队合编为一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共200余人,100余支枪。此外,区委还选派可靠党员打入地主控制的红枪会,进行瓦解工作。到起义前,已有数百红枪会员表示愿意参加起义。

4月7日,由200余名赤卫队员、1000余名农会会员和500名红枪会员组成的起义队伍,手持步枪、大刀、长矛,包围了双河集国民党联保办事处和团防局,缴枪12支。接着又开始了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起义后第三天,北乡下塘集国民党团防局局长叶奋九,纠集杨家庙恶霸地主张焕亭的联庄会武装千余人前来镇压,抢劫财物,焚烧房屋,逮捕群众。起义队伍被迫撤退,斗争遭到挫折。4月12日,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再次组织双河集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北乡游击队,刘宏勋任队长。数千名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扒粮斗争,持续三天三夜,扒出地主粮食2000多担,并夺取了地主武装的枪支。

国民党合肥县政府调集合肥、寿县正规军,纠集白龙厂、元疃庙、埠里和下塘集乡民团“围剿”。在李星三、崔筱斋的指挥下,游击队、赤卫队奋起抵抗。4月20日,游击队和赤卫队与叶奋九率领的地主武装激战于寿县松树岗。面对反动武装的攻势,许多原来参加起义的红枪会员纷纷逃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游击队、赤卫队撤退到陶家湖以北的万家户庄。第二天,叶奋九部包围了庄子,游击队队长刘宏勋中弹牺牲,崔筱斋被捕后被敌人杀害。起义失败。

凤翔路口起义

1932年4月13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国民党军第17路军一部在甘肃省泾川县凤翔路口举行了起义。

1932年4月，国民党第17路军潼关行营附设干部教导队300多人毕业于西安。该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决定将毕业学员全部送给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营主任邓宝珊。在该队开展兵运工作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陆子江、曹定侯等决定把这批学员带到陕北参加红军，并在行军途中伺机举行起义。4月初，教导队大队长杨干丞带领学员从西安出发，12月到达陕西省长武县时，中共地下组织秘密召开会议，决定第2天举行起义。13日，教导队到达陕西长武县与甘肃泾川县交界的凤翔路口，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率队起义，缴了大队长杨干丞等几个反动头

目的枪。起义成功后，中共地下组织率部分学员向东北方向挺进，在途中被国民党军杨子恒部骑兵营包围。在突围中伤亡很大，起义队伍被迫撤到泾河以西地区。当起义队伍到达灵台县上

良镇时，又遭杨子恒部骑兵营包围，经浴血奋战，突出重围后，由允希贤队长率领到达固关峡，仅有30多人，后上山开展游击战争。

西高庙起义

1932年4月16日，中共江苏长淮特委和盱眙县委在西高庙地区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组建了盱眙县工农红军游击队。

西高庙地处盱（眙）、嘉（山）、来（安）、天（长）四县交界的丘陵山区，西接大别山脉，北临洪泽湖。这里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农民受尽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压迫与剥削。1929年秋，共产党员杜仲和等人在西高庙女子小学成立了直属中共徐海蚌特委领导的中共党支部，利用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同年秋，共产党员李桂五（又名李联芳，大地主李冠庭之子）受党的委派，从上海回到家乡西高庙。李以地主大少爷的身份，秘密做党的工作，于同年9月与共产党员刘明溪组织了以贫雇农为主的“工农革命互济会”，还秘密发展党员。在这基础上，于1931年6月，成立了中共西高庙支部（书记刘明溪），9月，成立了中共盱眙县委（书记李桂五）和中共谢家港支部（书记万秀楠），使“工农革命互济会”成为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密切配合党的革命斗争开展活动，为武装起义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至1932年初，盱眙县委已建立了6个支部，党员120多人。互济会发展到500多人，拥有长短枪约30支。

为配合第四次反“围剿”，支援鄂皖苏区，中共长淮特委和盱眙县委遵照江苏省委指示，确定在西高庙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并组建盱眙红军游击队。为此，1932年2月，特委派民运特派员武飞（原名许绍生）和军事特派员徐德文赴盱眙加强起义的领导。起义前，中共盱眙县委成立了“西高庙农民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武飞任总指挥，李桂五任副总指挥，徐德文任参谋长。

4月16日晚9时，起义队员在李桂五等率领下，攻入西高庙附近的李郢，收缴地主武装40多支枪。晚10时，攻打西高庙国民党西区区公所，缴获盒子枪4支、步枪14支，俘虏14人。17日，李桂五等将队伍拉到刁营，进行休整和改编。为了壮大红军力量，李桂五与武飞、徐德文共同研究，于4月23日将队伍扩编为盱眙县工农红军游击队，下设2个中队，6个分队，有队员300余人，枪近200支，武飞任司令员，李桂五任副司令员，徐德文任参谋长。至7月，游击队扩充到700余人，拥有300多条枪，扩编为4个中队，14个分队。

西高庙起义成功及不断壮大的红军游击队，使敌人非常震惊。8月中旬，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遣骑兵第11旅（旅长蒋侃如）进驻古城、旧铺、西高庙一线；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派遣1个独立旅和1个水警大队，从明光向盱眙水陆并进。此外，天（长）、来（安）、盱（眙）三县联防队也全部出动。三股敌人共约五六千兵力，将以水冲港为中心的盱眙县红军游击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8月15日，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战斗中，徐德文及1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武飞受伤后转移。敌军伤亡40余人。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红军游击队人数锐减，损失惨重。8月17日下午，游击队第3中队长喻传根及部分战士被俘，8月26日遭敌杀害。同日，李桂五被捕。8月30日，李在西高庙刑场惨遭杀害。

西高庙起义在牵制国民党兵力、支援鄂豫皖红军反“围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曲头马浅起义

1932年4月17日，中共睢宁县委根据江苏省委和徐州特委的指示，领导该县曲头、马浅农民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曲头、马浅地处睢宁县西北苏塘乡境内。这里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加之反动政府横征暴敛，地主豪绅残酷压榨，当地百姓生活异常贫苦。1929年夏，睢宁县中师学校学生、中共党员刘瑞林利用暑假在家乡曲头发展了一批党员，随之建立了党、团组织。在革命斗争的影响下，曲头大地主周成武的孙子周斌毅然与家庭决裂，于1930年3月加入共产党，1931年初调至凤阳县负责工运工作，同年10月又被党组织派回家乡曲头开展革命活动。周返乡后，腾出自家5间房屋重建曲头小学，自任校长，党组织派去的党员吴鸿基、王宜善和进步女青年魏碧如等担任教员。他们在学生和农民中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积极开展增资、减租斗争。

1932年春，中共江苏省委派巡视员刘瑞龙赴徐州传达省委指示。睢宁县委按照江苏省委和宿迁中心县委的指示，多次秘密开会研究开展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问题。

根据县委决议，周斌立即召集本地党员、骨干开会，组织了60多名起义队员和80多名赤色群众，编成3个中队，确定了行动计划。之后，大家分头准备。周斌取出自家守院的2支步枪和1支短枪，其他队员也设法搞来16支步枪；魏碧如缝制了一面斧头镰刀红旗。16日晚，起义队员秘密汇集到曲头村外的大柳树下，因大队长王继宗没有来到，临时决定由周斌担任起义总指挥。

4月17日清晨，周斌按计划派人去请当地几个反动士绅到曲头小学开董事会。当曾担任国民党乡长的朱守洪等到来时，埋伏在学校四周的起义队员，将朱守洪等反动地主捆了起来。随即与吴鸿基、李荣圣等人迅速赶到大地主梁德中家，梁家守院的家人见起义队伍人多势众，只得投降缴械。周斌率队员焚烧房地产契，开仓分粮。接着，起义队伍又冲进朱守洪家。朱家老老实实交出了枪支、地契，队员们烧毁地契文书，砸仓分粮分衣。之后，周斌又亲自带队到自己家中分粮分衣。上午10时左右，周斌重新集合队伍，向马浅乡公所进发。抵达马浅时，周斌突然疝气病复发，决定由吴鸿基指挥。吴先派人到村南村北两头放上岗哨，自己带队冲向圩墙。因事先潜伏在马浅做内应的周道古叛变，没能及时打开圩墙大门。起义队伍在砸开圩墙西大门时，突然遭到四周炮楼上地主乡练的射击。这时混在人群中的反动地主周维龙弟兄3个，突然向起义队员开枪。队员们只好退出大门，仓促还击。此时，在曲头被押的朱守洪装作上厕所乘机逃跑，并带国民党王集区队，从东、南两面包围了上来。起义队伍腹背受敌，被迫撤退。

当天，曲头、马浅农民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睢宁城乡。国民党睢宁县长李寒秋亲率保安队、警察队和民团，四处搜捕抓人。国民党铜山、邳县、灵璧、宿迁县政府还联合发出对组织和领导曲头、马浅起义的主要领导成员鹿周继（县委书记）、周斌、吴鸿基等18人为期一年的通缉令。徐州特委为保护他们的安全，相继把他们调离睢宁，安排到周围各县工作。

冇牛岗起义

1932年4月25日，中共安徽六霍县委领导六安县曹坯塘、埠塔寺、九十铺、陈家河、施家桥和舒城县张母桥、稻场岗、三井等地农民，发动了冇牛岗起义。

1932年3月苏家埠战役期间，皖西北道委指示，凡是白区有条件进行起义的，应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以配合主力红军，争取第三次反围剿获得彻底胜利。中共六霍县委当即研究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冇牛岗一带发动农民起义；起义由六霍县委委员汪孝芝领导。3月6日，汪孝芝、李少伯等，在过龙圪陈九宏村上，召开各地赤卫军大会，决定于4月25日进行武装起义，并决定抽调青年赤卫队200人组成战斗队。

4月25日，汪孝芝等率领特务队20余人、青年赤卫队200余人及草皮塘、埠塔寺、九十铺、陈家河、施家桥等农协会会员2000余人，集合于冇牛岗，宣布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二区苏维埃政府，由朱怀德任主席，下辖六个乡苏维埃。此时，舒城张母桥党支部，组织150余人参加冇牛岗起义。会议正在进行时，九十铺反共队刘散之、埠塔寺李宾如、双河施汉三等率领数百人，分三路包围冇牛岗会场。敌人由于未摸清起义农民的武装实力，未敢冒然进攻。双方相持到二更时分，起义领导人决定：汪孝芝、陈羽成率领部分赤卫军和农协会会员向西南方向突围；指导员宋仁宏率领特务队、青年赤卫队200余人掩护撤退。待群众安全转移后，宋仁宏命令储德胜率领特务队、青年赤卫队200余人突围去青山霍一区，向皖西北道委汇报起义经过。宋依托有利地形用手榴弹为转移部队开路，并掩护他们转移，最后壮烈牺牲。敌人见起义队伍安全转移，恼羞成怒，烧毁了冇牛岗附近九十铺至观音庙43个村庄。

皖西北道委在冇牛岗起义后，立即派储德胜带120支钢枪，在月牙塘和汪孝芝会合，将起义部队改为六霍游击大队，开展打土豪斗争，先后攻打了张母桥的土豪集中据点绿豆庵和左家大桥的徐家油坊。游击大队后又打开了张家店，把二区苏维埃政府设在张家店。随后六霍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六霍游击大队改为六霍独立营，有钢枪200余支，陈羽成任营长，陈明义任教导员。后编入红军第25军第74师，在六霍地区开展游击战。

向都起义

1932年4月，广西左右两江赤卫军第一路，在中共有江临时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在驻守向都县城的国民党桂军黄镇国团韦子登营内组织发动了一次士兵起义。

1930年春，国民党桂系军阀派黄镇国团韦子登营进驻向都县和天保县的两南地区，与当地国民党民团互相勾结，对革命武装疯狂进行镇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右两江农赤军第一路总指挥黄庆金、政委黄怀贞，于1931年3月召开农赤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派农赤军第6连连长曹元科等二人打入敌军内部组织士兵起义。曹元科利用与天保南路团务分局局长董黄十是侄舅的关系，打入团局，并取得了黄十的信任。黄委任曹元科为那怀街长，后又提升曹为那怀乡乡长等职。

韦子登营驻龙光街的一个连，连长叫岑邦金，是镇压当地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共右江临委指示让曹元科设法将这个连队瓦解。曹元科以关心这些官兵的物质生活为名，接近了这个连队。并通过龙光土豪黄日良给连长岑邦金送去了一些大烟土。岑令其弟把大烟拿到镇结、隆安等地出卖。结果被国民党向都县政府以卖大烟接济“共匪”的罪名将其弟枪毙了。岑得知后，即率连队到向都县政府问罪。向都县长黄祖瑜出光洋一千元作为偿命钱才平息此事。事后，黄祖瑜将此事汇报给营长韦子登，韦怀疑岑与共产党领导的农军有联系，使岑受到通缉。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曹元科求救，曹指点其投奔农军。农历9月的一个夜晚，岑邦金带警卫员岑光代、黄本堂到农军所在地楞念屯投诚。其连队被桂系定为“造反军”而遭到改编、遣散。

岑邦金连被瓦解后，韦子登又派罗伯连进驻龙光街。中共右江临委分析情况后，决定在罗伯连组织一次士兵起义。曹元科接到任务后，便利用一切机会和罗伯交“朋友”。曹元科在同士兵混熟后，开始用革命思想启发他们。通过教育，许多士兵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前途。1931年11月的一个晚上，该连文书李荣光、班长曾荣飞等带领13名士兵携带机枪一挺，步枪12支，投向了农军。

李、曾事件发生后，韦子登急令罗伯把连队拉到向都县城进行整训。整训中，罗伯要在连队中查出李荣光、曾荣飞的“同党”。该连排长方英等早就对罗伯虐待下级不满。这次自然成了挨整的对象。罗伯正想利用这个机会将方英等人除掉。方英等人也知道了罗伯的打算。曹元科了解到这一情况，即启发方英的革命觉悟，引导他组织起义，参加革命。之后，方英在连队动员了几个较好的朋友，决心和他一起举行起义，请农军派兵支援。曹元科将此情况报告了农赤军领导，黄庆金即带40多人枪从驻地开赴县城进行支援。1932年4月的一天凌晨，方英带起义士兵15人，分兵把守要口。当时罗伯正在梦中，方英跑进连长住房一枪打死了罗伯，并宣布正式起义，枪声一响，吓懵了的敌兵乱作一团，纷纷夺门逃跑。经方英等人喊话，绝大多数国民党兵放下武器，有两名连长的心腹想负隅顽抗，当场被农军击毙。起义结束后，15名起义人员加入了农军，不愿参加农军的人遣散回家。这次起义，共缴获长短枪数十支、弹药30箱和一批军用物资。

向都起义，瓦解了桂系军队两个连，先后有31人携带部分武器投奔农军。不仅消灭了部分国民党反动武装，而且壮大了农军的力量。

蛤蚂河子反日起义

1932年5月7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和磐石中心县委领导下，吉林省蛤蚂河子4000多农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者举行了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向东北三省大举进攻，11月，占领了除辽西以外的东北三省大片国土。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进行坚决的反对。在全国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共满洲省委和磐石中心县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各种形势的抗日斗争。1932年5月7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林的指导下，由李红光组织和领导，在蛤蚂河子召开了有1000多名朝鲜族、汉族农民参加的群众反日大会。会后，进行了示威游行。并将没收地主的1000多担粮食分给了农民；处决了50多名罪大恶极的汉奸。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了4000多人。接着，拆毁了吉海铁路老岭段数里长的铁轨，破坏了桥梁，中断通车十几天。后来，日军纠集了1000名伪军前来镇压，李红光带领宣传队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迫使伪军撤回。

蛤蚂河子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参与起义的一些骨干，后来参加了由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组织的满洲工农义勇军第4军第1纵队（通称磐石反日游击队，又叫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李红光任队长，杨君武任政委。这支队伍坚持斗争，抗击日伪军，不断壮大发展，后来成为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独立师的基础。

靖远起义

1932年5月5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驻甘肃省靖远县的国民党警备第3旅一部举行了起义。

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派中共党员到驻宁夏盐池的国民党军第8旅第15团（1931年该团扩升为警备第3旅）做兵运工作。1932年5月5日晚，在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谢子长等的领导下，该旅1个营又2个连在靖远县举行起义。次日拂晓，起义部队到达拉池，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4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炽任政治委员，下辖2个大队，共200多人。整编后，起义部队在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2个骑兵连的追击，伤亡较大。后到达靖远以北水泉，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仍以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炽任政治委员。此后，游击队在以靖远为中心的周围5个县同国民党转战2个多月，宣传和发动群众，由200多人扩大到400多人。后遭到国民党军第105旅的围攻，游击队弹尽粮绝，伤亡很大。为保存有生力量，遂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开展革命活动。

官坂起义

1932年6月6日，在共产党员杨而菖的发动率领下，福建省连江县官坂乡农民举行了起义。

1931年底，连江透堡农民起义失利后，曾领导该次起义的中共透堡支部书记、农民自卫队队长杨而菖率10余人前往福州。在中共福州市委的帮助下，购买枪支、弹药，等待时机。1932年5月，根据市委指示，杨而菖秘密潜回连江，召开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会议，研究武装起义问题。并成立了一支10余人的特务队，杨而菖为队长。会议决定攻打官坂契税局和民团。

6月6日晚，杨而菖率10多名特务队员，持手枪、大刀、梭标包围契税局和民团驻地。在民团内应的帮助下，杨而菖带几名队员首先冲进契税局头目住所，将其击毙。埋伏在外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冲进契税局和民团住处，经1个多小时战斗，毙伤10多名捐丁、团丁，缴枪5支，并将田契、债单全部焚烧。

颍上三十铺起义

1932年6月27日晚，中共安徽颍上县委领导该县西卅铺等地的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2年6月24日，中共颍上县委根据皖西苏区的来信，立即在卅铺学校召开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扩大会议，研究建立红军游击队，打垮反动派，扩大苏区根据地。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书记黄伯安，县委委员詹定远、吴子才、崔显光及各支部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同意举行起义，并作出5点决议：（1）组织两千人，集中步枪200支，其余每人1根红樱枪。（2）成立一支游击队，下分新集、西化桥、十字沟、城镇、庙台5个中队。（3）行动信号是点火，先从新集开始，接着西化桥、十字沟、庙台等地陆续点火。从开会之日起准备三天。（4）攻克县城后，在庙台会合，迎接红25军后，到颍上东片一带打游击。（5）游击队队长吴子才，政治教导员黄伯安，政治处主任詹定远，军事指挥吴仲诚，参谋吴体元。游击队下辖五个中队。

6月27日晚，游击队员崔鹤修按照队长吴子才把地保王家训逮走的指示，带了12个队员，处死了王家训，起义开始。当晚除大店子外，各路人马到达马家湖集合。县委委员詹定远宣布了队伍的编排：黄庄子为第一队，队长崔显光，队副崔鹤修；崔老家为第二队，队长崔茂清，队副崔培光；刘园子为第三队，队长吴子才，队副吴子备。三队约二三百人。队伍编好后，詹定远部署3个队都去攻打十字沟区公所。西化桥中队，由卜蕴伯、崔民修带到卅铺学校，但由于卅铺未行动，队伍都散了。庙台集中队，集中了200多人。城镇中队，集中了30多人，由于卅铺的队伍始终未到，也就没有行动。

6月28日晨，区公所调集当地武装倾巢出动，扑向卅铺的黄庄、大店子等地搜捕红军游击

队，抄了游击队黄庄队队副崔鹤修等人的家，杀害了部分游击队员；黄庄子200口人几乎跑光，东西被抢光。由此全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起义领导人崔显光、崔鹤修等人只身外逃他乡，黄伯安等隐于乡下。起义遂告失败。

慈峪起义

1932年6月和8月，在中共河北灵寿县委的组织领导下，红军游击队在灵寿县的慈峪举行了起义。

灵寿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岗峦连绵，河流纵横。中共灵寿县委曾广泛发动贫苦农民参加反封建剥削和反兵匪侵扰的斗争，吸收阶级觉悟高的农民加入共产党。至1930年6月，灵寿县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展，有共产党员近千名。1932年4月15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与创建红军苏维埃的计划》。据此，灵寿县委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慈峪举行起义。6月中旬，决定由中共慈峪党组织负责人马文耀任红军游击队团长，负责组织起义事宜。6月23日晚，500多名起义人员在马文耀的领导下迅速包围慈峪保卫团。为配合慈峪起义，灵寿县各村六七百名农民包围县城，并断绝敌人通讯联系；陈庄三四百农民群众包围了当地保卫团，因敌人早有准备，久攻不下，被迫撤退分散隐蔽。7月上旬，中共灵寿县委组织了300多人的敢死队，马文耀任队长，负责起义的军事指挥，郭自修（即郭强）负责交通。下辖5个小队，有30多支枪，几十枚手榴弹和大批大刀、长矛，准备在8月21日举行第二次慈峪起义。但因打入保卫团的共产党员班长张昌瑞叛变，敌人已早有准备，遂改变起义计划，分路行动，收缴10余个村庄地主的枪支弹药，没收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25日，保卫团疯狂围剿起义队伍，在情况十分危急，又得不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游击队于26日自行解散，转入隐蔽斗争。

西华池起义

1932年7月8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驻甘肃省警备第11旅第1团第1连在甘肃省合水县西华池举行了起义。

1932年7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谢子长派中共党员杨林、苏建如等4人向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军甘肃警备第11旅第1团第1连连长高鹏飞传达相机起义的指示。恰于此时,旅部令该营去庆阳。根据省委指示,该连中共地下党支部研究决定利用换防之机发动该连起义,并派人与陕甘游击队联系。7日,陕甘游击队回信,说有把握即举行起义,红军在宁县盘客塬策应。8日,起义部队收缴了第2连全部武器,逮捕了第3营潘副营长,起义不到1小时便取得胜利。当晚,起义队伍撤出西华池,9日到达盘客源,与陕甘游击队会合,编为陕甘游击第3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全队500多人。

永兴七月起义

中共湖南永兴县委组织发动农民武装，于1932年7月14日举行一次武装起义。

1932年春，中共永兴县委曾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端午节后，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到永兴指导工作，与永兴县委一起研究了暴动计划，决定分四路出击，在安福司会合，然后一起攻打永兴县城，夺取政权。并决定由县委委员、黄埔军校毕业生朱辉汉任暴动总指挥。7月14日（农历6月11日）暴动开始。暴动队数百人分成四路行动：第1路由蒋越率领，经墨坑直奔牛头下大村，抓获了刚由南京返乡探亲的南京政府官员何祈，并将其处决。第2路由曹连生、陈国学率领，从燕窝进攻铺头冲，击毙土豪曹章清和曹章扬。第3路由李宝贵率领，从将军冲出发，奔往欧山冲，击毙反共头子李先便。第4路由邓介夫率领，经石桥、冷水塘到达安福司，准备消灭国民党县大队，县大队闻讯早已逃回县城。各路暴动队伍会合安福司后，总指挥朱辉汉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讨论第二步行动计划问题。鉴于国民党县大队逃回县城，敌人在县城的力量有了加强，而我方因武器低劣，战斗力弱，执行原定攻打县城的计划很困难。会议决定停止进攻县城的行动，改派一部兵力袭击上架桥盐卡和安仁县龙海塘盐卡。会后，蒋越、邓介夫各挑选身强力壮的暴动队员共二三十人，分别奔袭了上架桥盐卡和龙海塘盐卡，毙伤敌一部，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这次起义，打击了当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气焰，为湘南游击斗争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口起义

1932年7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驻甘肃省定西县 口地区的国民党军第17路军一部分举行了起义。早在起义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在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17师第50旅补充第2团第1营建立了地下组织。第1营营长马济人、排长赵丕烈、石庆德等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地下组织利用补充第2团黄展云团长与第1营营长何冠五之间的矛盾，向对现实不满的何冠五营长宣传革命道理，促使其与反动团长黄展云进行斗争，并加强对第1营官兵的教育，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为组织起义打下思想基础。1932年7月的一天，第1营官兵在 口举行起义，逮捕了第2、第3连和机枪连连长，收缴了武器，封锁了定西县至兰州的公路，切断了通讯联系。当晚，起义队伍离开 口，准备与靖远起义队伍会合。第2天拂晓，到达会宁城南郭城驿，将起义武装整编为1个团，马济人任团长，卢继民任副团长，下辖两个营。石庆德任第1营营长，赵丕烈任第2营营长，每个营编4个连，共500多人。由于靖远起义失利和国民党军会剿，起义队伍决定到陕西、甘肃边界的旬邑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并改称人民革命军，马济人任司令员，卢继民任副司令员，下辖两个支队。部队行进途中，多次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1000多人的围追堵截，部队伤亡很大。9月初，人民革命军在清水县关山，被国民党骑兵100多人包围，几经突围，未获成功，大部战死，起义失败。

安溪起义

1932年8月1日，中共福建省安溪县委在该县的东溪、佛仔格、蓬莱等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冬，安溪县的东溪、佛仔格、蓬莱等地区，为发动农民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29年冬，中共东溪支部领导农民协会会员袭击了东溪民团。1930年10月，中共佛仔格支部带领30多名武装队员在东溪祠堂镇压数名反动豪绅。同年冬，中共安(溪)南(安)永(春)特委在东溪成立。1932年4月初，闽南工农游击队第2支队在佛仔格成立，支队长陈凤伍，党代表庄毓英。4月8日，陈凤伍带领第2支队和2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袭击金谷护路局，缴获5支枪和部分物资。月底，中共安溪县委成立。

8月1日，中共安溪县委领导600多名赤卫队员和部分农民群众，在蓬莱区举行起义。起义队员手持钢枪、鸟铳、柴刀等分3路围攻蓬莱区公所，激战3小时，烧毁一恶霸地主的房屋，缴获了一些物资。由于驻安溪县城的国民党军赶来支援地主武装，起义队伍遂撤出战斗。9月1日，安溪县委在蓬莱溪仔埔召开大会，公审土匪连长苏山水，会后予以枪毙。接着举行有

1000多农民群众参加的游行示威，沿途张贴标语，高呼革命口号，给当地国民党政府很大打击。

1933年5月30日，安南永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府——官桥区革命委员会(又称安南永苏维埃政府)在东溪成立，开辟了纵横数百里、包括数十万人口的安(溪)南(安)永(春)德(化)红色区域。

博兴起义

1932年8月4日，中共山东省博兴县委在该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0年秋，中共党员张静源、刘顺源等先后回到家乡博兴县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员。1931年秋，全县党员发展到12名，并建立了中共博兴特别支部。1932年3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中共博兴县委在高渡村成立，由张仿任书记，王醒九（王延津）任组织部长，张次钦任宣传部长，马千里任军事部长，郑志祥任民运部长。县委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捐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并派马千里打入全县国民党武装力量最强的兴福联庄会任教练，并任党的支部书记，掌握了四区联庄会的100多支枪和骑兵团。5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派军委书记张鸿礼来博兴向县委传达省委指示，发动游击战争。7月下旬至8月初，县委召开两次会议，研究决定武装起义的行动问题。决定于8月4日晚四、五、六区同时举行武装起义，并指令马千里和王若之为军事领导人民

8月4日晚，武装起义在高渡和兴福两个地点同时爆发。22时许，县委书记张仿率领高渡等村的30多名党员和群众，手持土枪、长矛、镰刀等武器，在内线李建功的接应下，袭击了第六区联庄会的驻地龙河镇，俘联庄会武装人员3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支。与此同时，县委军事部长马千里等率领兴福等村的起义队伍，先后袭击了兴福联庄会、韩复榘所属的民团24分队驻地三宫庙，捣毁了第四、第五区公所，缴获长短枪70余支、子弹数千发和10多匹战马。5日拂晓，两支队伍在刘家圈会合，共300余人。马千里主持召开大会，宣布建立“鲁东革命第一支队”。起义队伍很快控制了4个区14个村镇，直至广饶、临淄、博兴3县交界一带，发展到700余人，300余支枪。

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使国民党官吏和地主豪绅惊恐万状，纷纷外逃，博兴县城城门昼夜紧闭。8月7日，韩复榘驻周村的第29师副师长许文耀率近千人赶赴博兴，与博兴民团武装联合镇压起义农军。8日前后，起义农军被迫解散，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中共博兴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永晋起义

1932年8月6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和蒲城县委的领导下，蒲城县永丰、晋王两个村镇的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8年至1932年，蒲城县连遭5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为摆脱贫困，农民群众多次自发与当地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中共陕西省委为加强对农民斗争的领导，于1930年6月制定了《对蒲城工作决议案》。派出共产党员和干部积极领导灾区的农民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斗争。1932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蒲城县委开展游击战争，夺取敌人的枪械，摧毁蒲城县反动政权。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焦仲明（化名赵仪三）赴蒲城县领导农民起义。蒲城县永丰、晋王两个村镇的共产党员数量多，掌握了一部分国民党武装，如共产党曹录生、曹木海、刘良海分别担任晋王村民团的副团长、队长、排长，刘立升、冯德财分别担任永丰村民团的文书和民团长的护兵。在这种情况下，焦仲明于8月4日召开了晋王村共产党员会议，认为永丰、晋王两村具备了起义条件，决定6日起义。6日晨，永丰起义武装小组利用在永丰民团担任团长护兵的地下工作人员作内应，趁永丰民团团长赵振南与第14民团团长就餐的机会开枪举事，一举歼灭了敌人。但永丰起义很快遭永丰附近反动民团的围攻而失败。与此同时，王村起义武装因起义计划不周，走漏起义消息，被王村的两个反动民团镇压下去。在永晋起义中，焦仲明等11名共产党员和群众被反动民团杀害。

薛湖白湾起义

1932年8月13日，中共徐州特委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组织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薛湖、白湾举行武装起义。

薛湖位于徐州东部地区，当时属铜山县第六区。由于连年旱涝灾害，地主逼租逼债，农民困苦万状。1932年麦收时，中共薛湖支部领导20多名党员和500多名短工开展怠工斗争。为发动群众，徐州特委派张六多次与薛湖支部书记薛景宣等秘密联系，号召团结起来，准备起义。8月初的一个夜晚，在薛湖村西头的寺庙里，张六、薛景宣和中共党员薛长永、薛景桃、李朝纲等人秘密研究了起义计划。

8月13日晚，薛景宣等以“保护青苗”为由召集二三百名农民在薛湖庙里召开“护青会议”。地主薛汉宣、薛汉周等听说召开保护青苗会，也积极前来参加。薛景宣待全村地主都已到齐，遂命令起义队长李朝纲率20多名手执木棍、梭标的队员一拥而上，把十几个地主捆绑起来。薛景宣历数地主罪恶，勒令他们交出枪支。地主们惊恐地叫家人交出20多支步枪和子弹。8月14日晨，正当起义队员忙着扒粮分粮之际，被关押的1名地主逃跑，并向单集保卫团报警，敌人立即派兵包围薛湖。薛景宣带领起义队员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而溃散。国民党保卫团到处搜枪抓人。四五天后，铜山、睢宁、宿县的国民党军队联合发动了三县大围剿，许多起义队员的家被抄、房子被烧。

薛湖起义的第二天，铜山的白湾（现属睢宁县双沟地区）也发生了起义。白湾，又名大白湾，位于双沟镇西北五华里，当时隶属铜山县第八区。这里临近丘陵山区，交通不便，反动统治薄弱。中共铜山县委很早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1932年6月，中共徐州特委派张六到白湾附近的文庄村指导起义。7月31日夜，张六在文家老林召集白湾、文庄、后小楼三村50多名党员开会，传达徐州特委组织发动八区白湾、六区薛湖起义的计划，布置党员设法筹集枪支。会议决定在8月21日举行起义。8月13日，薛湖提前起义。张六决定积极策应薛湖，起义日期提前至8月14日。会后，全体党员迅速行动起来。安福畴在文庄等村筹集了15支步枪，焦玉瓚在李庄筹集了3支步枪。14日拂晓，100多名起义队员，肩扛30多支步枪和大刀梭标，汇集白湾小学，成立了起义大队。安福畴任大队长，下编3个中队。安福畴在村南盘王方向布置了岗哨后，即带领队员冲入村里，抓获大地主墨运量、白秀宜，令其交出铜元两抬筐以及仓库钥匙。随即召集群众大会，宣读地主罪行。之后，带领群众分粮。

起义震惊了邻村地主，他们仓皇外逃报警。上午10时左右，国民党驻房村、双沟保卫团以及第八区区队和盘王的地主武装联合前来镇压。安福畴带领30多名起义队员迎头阻击，掩护张六带领余部和群众撤退。天黑后，安福畴与张六带着30多名起义队员向南与萧县农民起义队伍会合，并准备到九顶山区打游击。不料萧县张家寨、洪河集两处起义均遭镇压而失败，只得在萧县辗转数日，终因人地生疏不易隐蔽，在地主武装袭击下，张六不幸牺牲，起义队伍纷纷失散。至此，薛湖、白湾农民起义失败。

益都起义

1932年8月18日，中共山东省益都县委在该县郑母地区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

益都县（今青州市）是烟（台）、青（岛）、潍（县）通达省会济南的重要驿站。1930年初，军阀征战，官府苛捐杂税浩繁，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阶级矛盾极其尖锐。1931年春，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到益都恢复党的组织。是年秋，建立了中共益都特别支部，段亦民任书记，王经奎（王济生）负责组织兼工运，曹金言负责宣传兼兵运。1932年5月，县委恢复，段亦民任书记，王经奎任组织部长，郑心亭（郑云岫）任宣传部长。县委重建后，党团组织很快得到发展，在城区和郑母、圣水等地建立了区委，同时建立了“赤卫队”、“互济会”、“农民协会”、“士兵联合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士兵运动都很活跃。5月至7月间，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多次到益都，指示益都县委迅速作好准备，举行武装起义。7月上旬，县委书记改由郑心亭担任并任起义总指挥。

8月14日、16日，县委书记郑心亭曾两次与中共郑母区委书记冀虎臣研究起义计划，决定于8月18日7时，一区与十区同时发动起义，并部署：一区负责进攻国民党县政府，占领城区；十区负责解除民团武装，占领郑母区公所。

8月18日7时，中共吉林村支部书记赵文光带领3名中共党员与驻郑母东村的区民团3分队队长陈佃治（中共区委组织委员）里应外合，解除了3分队的武装，缴步枪11支、手枪1支和部分子弹。与此同时，中共郑母区委书记冀虎臣带领共产党员赵焕礼（太平乡乡长）、程心田（报馆主任）以行政身份进入区公所。此时，崇家庄的起义群众在支部书记崇学闵的带领下，打着联庄会大旗，带着七八支土枪，伪装成押送偷高粱贼来到区公所门前；官家庄的起义队伍也进入区公所附近的谷地里隐蔽。冀虎臣、程心田进入区公所后，即与区公所助理员贾希尧、民团分队长张官云协商解除民团武装之事，贾希尧动摇，冀、程见事有变，当场击毙贾、张两人。守候在区公所大门外的崇家庄的起义农民听到枪声，立即夺下门岗的枪，冲入院内。30多名团丁与起义农民展开了搏斗。由于敌强我弱，又无战斗经验，起义队伍2人负伤，其余队员很快撤退。在谷地里隐蔽的官家庄起义队伍见此情景，也迅速撤走。崇家庄、官家庄起义农民撤离区公所后，郑母镇、山前李、山前后、关帝庙、国王庄、丁夏许、状元桥等村的农民80多人仍按计划向区公所集结，接近区公所时遭到民团的突然袭击，起义队伍很快被打散。冀虎臣、程心田率领被打散的起义人员近30人先后上了吉林村南的太平岭，随后，冀虎臣等率余部寻找城区的起义队伍和县委领导，后得知城区起义未行动，与县委也未联系上，遂将起义队伍解散，队员下山分散隐蔽。

起义的当天，国民党益都县当局派出300多名军警和民团到郑母一带搜捕起义人员，先后有30多人被捕，郑心亭、段亦民等10余人被杀。至此，起义失败。

高蠡起义

1932年8月27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领导下，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的农民举行了起义。

1930年秋，高阳、蠡县的农民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残酷统治，举行过起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在这一带发展较快，有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3500多人。中共河北省委于1932年7月下旬召开会议，要求保属、京东等地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8月初，中共河北省委在北平（今北京）开会，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李之道）和秘书长赵典模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组织高蠡起义。会后成立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第1师，下设3个大队。27日，首先在蠡县宋家庄一带举行起义，缴获长、短枪28支，物资弹药一批，并张贴布告，宣传游击队的十大纲领。29日，河北省军委书记湘农、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带领起义队伍由宋家庄奔向南玉田村，成立了红军游击队第2大队，连同第3大队，共160余人，50多支枪。30日，红军游击队冒雨向高阳进发，活捉公安分局局长及其分局全部人员，缴枪30多支。当天晚上，湘农在北辛庄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湘农任主席，宋洛曙任副主席。同时整编起义队伍，成立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湘农任支队长，有300多人，长短枪120多支。31日，该支队第3大队留北辛庄，第1、2大队到安家庄、西演等村打游击，领导农民进行分粮斗争。这时，驻安国的国民党军骑兵第6旅一部包围了北辛庄，游击队奋起抵抗，激战两个多小时，高阳东南区委书记蔡书林、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和游击队员等17人壮烈牺牲，其余队员大部失散。之后，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等惨遭国民党军警杀害，中共保属地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致使起义失败。

东明起义

1932年8月29日，中共山东省濮阳中心县委在东明县发动和领导了盐民武装起义。

东明县地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五县交界处，土地百分之十五属盐碱地，许多农民靠做小盐（取地下盐碱水熬盐）谋生。1931年，国民党新委任的县长高保均为维护盐业资本家的利益，明令“严禁做小盐”，逼得盐民生路断绝。盐民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下，各村相继建立了一些群众性组织。1932年，月中旬，东明县各村盐民代表在东明支寨开会，成立了东明盐民协会（俗称盐池子会）。大会推选支悦刚为会长，组成了以支悦刚、支心坡、李文斗为首的理事会，会员达1.5万余人。盐民协会成立后，将各村的盐民组织作了统一调整，成立了钉耙队、刮刀队、红枪队，规定了联络信号。六七月间，清丰、滑县、濮阳、内黄、南乐、浚0县、大名、东明、长垣、朝城、濮县、观城、范县等13个县盐民在清丰县古城集乡集会，成立了两河（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县盐民总会，选举中共濮阳中心县委书记王从吾为盐民总会主席，东明的支心坡（中共党员）、支悦刚当选为总会委员。8月27日上午，支悦刚、支心坡召集各村1600多名盐民代表齐集支寨，庆祝盐民总会成立，并调集万余名精壮盐民手执红缨枪、钉耙、刮刀、铁锨等武器，警戒会场。大会进行中，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县保安队、盐务队（盐巡队）闯进支寨，逼近会场。支悦刚等指挥盐民武装队伍迅速将这伙反动武装包围，当场打死3个盐巡，迫使保安队、盐务队逃回东明县城。

为反击官府对盐民的压迫与剥削，决定以盐民协会领导成员组成起义指挥部，支悦刚为总指挥，支心坡为副总指挥，通知各村盐民于8月29日齐集东明县城举行起义。同时，报告盐民总会，向13县盐民协会请求支援。

8月29日凌晨，起义指挥部率盐民代表及支寨一带的盐民团队千余人，从东明县城北门开入城内，砸了盐务局。拂晓，周围各县盐民万余人也陆续涌进城内。指挥部组织起义队伍游行示威，向县政府驻地挺进。9时许，县政府门前红缨枪、钉耙、刮刀林立，人头攒动。东明县县长任傅藻见盐民万众一心，势不可挡，无奈接受了盐民的全部要求：盐巡退出东明县，取消盐税，准许盐民做小盐；唱大戏一台，放鞭炮万挂，摆酒席一百桌向盐民赔礼道歉。

东明盐民起义的胜利，锻炼了盐民队伍，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了党的组织。

渔沟起义

1932年9月4日，在中共江苏淮盐特委和淮阴县北乡区委领导下，淮阴县渔沟附近农民举行了起义。

1932年夏，中共淮阴北区区委成立后，即大力发展党员和农会会员，先后成立了蒋小圩、横沟、张巷、五里、萧荡、尹庵等支部。8月下旬，中共淮盐特委和淮阴北区区委在省委巡视员陈伯扬的指导下，在蒋小圩蒋兴泉家召开了有淮盐特委书记兼淮阴县委书记王伯谦、特委军事部长王葆华、共青团淮盐特委书记宋振鼎、淮阴北区区委书记吴希才、区委委员蒋翠芳及淮阴北乡团的负责人夏如爱等人参加的会议。决定蒋小圩、张巷、涧桥等地同时举行起义，并成立起义大队，吴希才任大队长，张业兴任副大队长，宋振鼎为党代表，夏如爱为文书。起义成功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省淮阴县游击队”，开赴涟水加入红军部队。

9月4日清晨，吴希才、张业兴等带领地下党员和群众100余人，分3个中队在渔沟附近的蒋小圩、张巷等地收缴了当地地主、富农的三四十支枪和部分大刀。随后起义队伍按计划到吴小桥东、丁大庄南的一条南北大路上集合。队员打起镰刀斧头的红旗，佩戴红袖章，接着召开大会。之后，吴希才命令起义队伍向五里庄进发，沿途散发传单。由于涧桥起义人员未行动，下午4时左右，王伯谦决定队伍开到五里庄南的孟善元家。下午5时左右，国民党淮阴县常备队配合五里保安队、渔沟警备队对起义队伍进行武装镇压，情况非常紧急。王伯谦、宋振鼎、吴希才等人当即决定向涧桥方向突围。当队伍到达五里庄西面时，敌发觉起义队伍的意图，便紧紧追赶并开枪射击，起义队员边撤边还击。到涧桥附近时，天色已黑，敌不敢恋战，无目标地打了一阵子枪，即全部撤回。随后，起义队伍经涧桥绕道转移到郑洼郑连魁家，只剩下宋振鼎、吴希才、庄业胜、夏如爱等10几个人，只得分散隐蔽。

次日，敌人又调动大批武装围剿起义人员。9月中下旬，宋振鼎、王葆华、方超、陈伯尘等40多人先后被捕。不久，沈友富、蒋同江被敌杀害。至此，淮阴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转入低潮。

沁济起义

1932年9月6日，中共河南省焦作中心县委在沁阳、济源两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沁、济两县，位于豫、晋交界。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共产党人在开展革命活动。至1932年春，济源成立了9个党支部、1个区委、4个团支部，共有党员百余人；同时还建立了14个乡的贫民委员会，有会员300余人。沁阳县也建立了党和团的小组。为了统一两县的领导，193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原济源县委书记党继新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焦作，组成焦作中心县委，党继新任书记，领导、组织和发动豫北各地的起义，开展游击战争。5月，党继新回到济源，成立了中共济源流动县委，由张景禄任书记。接着党继新又到济、沁交界的化村。不久成立了沁阳县党支部。6月，中共河南省委派郭晓棠到沁阳协助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

7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遭到失败后，集中强大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两根据地发动了“围剿”。为了支援和配合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牵制国民党军调兵南下，中共河南省委依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豫北的沁阳、济源、焦作、武涉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开展豫晋边区游击战争。沁、济两县党组织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精神，加紧进行准备工作。不料，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变化，沁、济两县党组织决定提前发动起义。

9月6日夜，党继新、郭大佛率领秘密集合的几十名青年农民，手持砍刀、木棒，捣毁沁阳义庄六区公所，缴获了民团的枪支，宣布成立“豫晋边红军游击队”。接着，按照预定计划，起义队伍沿着太行山脉向西挺进，7日中午到达沁、济交界的遼寨村，分了该村地主的财物，缴获了其家丁枪支。7日下午，沁阳反动民团倾巢出动，向遼寨村合围而来。起义队伍当即转移到村北的太行山中隐蔽。党继新、郭大佛等5人，西去济源发动起义。

8日拂晓，党继新等5人来到济源西北乡的新庄村，决定利用这一带民团已调往遼寨“剿匪”之机举行起义。9日下午，党继新、郭大佛等率领人员奇袭济源武山镇的五区公所和民团，击毙国民党保长李传兴等7人，解决了留守团丁，缴枪10余支、子弹300余发、现洋300余元。然后，起义队伍又到附近的北社村、勋掌村等，将地主的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中共焦作中心县委决定扩大整编两县起义队伍，统称豫晋边红军游击队。由党继新任政治主任，郭大佛任军事主任。下设两个大队，沁阳方面为第4大队，济源方面为第7大队。

晋豫边红军游击队以济源县西北部太行山区的原大寨为根据地，横扫沁济交界地带的反动政权及土豪劣绅，坚持游击战争达3个多月。同年11月底，国民党河南省绥靖公署调集正规军及沁阳、济源、孟县民团、枪会、河防队、保安队等1000余人，分两路向原大寨豫晋边红军游击队发起大规模围攻。游击队在激战4天4夜，几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突围转移。在突围中，部分队员牺牲、被捕，大部分失散，仅郭大佛率30余人突破包围转移至山西阳城境内，后转入隐蔽活动。

兰田起义

1932年9月14日，中共福建省福安县委在该县西北洋的兰田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1年春，中共福安县委建立了一支秘密游击队，队长占如柏。为推动闽东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中共福州市委于1932年5月15日召开扩大会议，指示福安、连江两县的共产党组织立即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维埃区域。6月，福州市委书记陶铸在马立峰陪同下，到福安传达福州市委扩大会议精神，并着手筹建福安游击队。7月，在秘密游击队的基础上，吸收部分农民协会会员骨干参加，成立了闽东北工农游击队第1支队，支队长占如柏，政治委员马立峰，队员30多人，在福安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9月13日，占如柏、马立峰参加了中共福安县委扩大会，县委书记丘小村分析了形势，指示要趁兰田民团头子外出看戏的机会举行起义。14日，在占如柏、马立峰带领下，30多名游击队员冲进兰田民团团部，20多名团丁多数外出看戏，只有少数人守卫团部，经战斗，缴获18支步枪和一批子弹，取得胜利。15日凌晨，起义队伍转移至山区密林中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海满起义

1932年9月27日，中东铁路哈满线护路司令苏炳文率部，在黑龙江省海拉尔、满洲里地区举行了起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势力加紧了对坚守在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以西的哈（尔滨）满（洲里）线护路司令、步兵第2旅旅长苏炳文的诱降活动。苏炳文由于势孤力单，无力公开抗拒，暂时同意悬挂伪满国旗，但不执行伪令，部队也不听日伪调遣。由于这一地区临近中苏边境，日军害怕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也不敢向这一地区进攻。为了反抗日军侵略，苏炳文从6月起开始秘密扩充军队，建立兵工厂，扣留由哈尔滨开来的火车。8月26日，苏炳文又派团长张玉挺率全团进驻富拉尔基，并在防区内戒严，同时，又同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朴炳珊、李海青、张竞渡等部建立了联系。

9月22日，刚被日军从狱中放出，又到苏炳文处进行“劝降”的谢珂到达呼伦（今海拉尔），随即帮助苏炳文拟定了起义计划。26日，苏炳文下达了行动部署。27日晨，护路军官兵突然佩带“铁血救国军”臂章，宣布起义抗日，并以迅速动作占领了胙滨（今满洲里）、呼伦、博克图、富拉尔基等车站，禁止列车行驶，切断通往东方的所有电线，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扯掉伪满国旗，升起了中国国旗。同日，胙滨中国驻军两个营围攻伪国境警察队，毙伤30余人，俘90余人，全歼机场日军警备队，击毙10余人，还逮捕了日本驻该地特务。在博克图，当地驻军处决了日本间谍4人，将所有日伪人员收监看押。在扎兰屯，将日本和白俄间谍一网打尽。当天，日军少佐渡边秀人、大尉井上辰雄、胜目真等乘飞机到呼伦、胙滨收集情况，因受中国军队射击被迫返回。途中油料耗尽迫降于碾子山。当地农民闻声赶到，击毙全部日军，将飞机拆卸后运往呼伦。至此，海满起义取得完全胜利。10月1日，呼伦军民4000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就任总司令，张殿九任副司令，谢珂任参谋长。

藁店起义

1932年10月初，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驻甘肃省国民党军第17路军教导队在该省平凉藁店举行了起义。

1932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刘杰三、樊世荣到甘肃侦察陇东地区国民党驻军情况，弄清了第17路军有1个旅的建制驻陇东地区。4月，该路军第17师改为第38军，驻平凉、静宁、泾川一带，少数下级军官参谋人员，是杨虎城教导团毕业的学生，有的秘密加入共产党。中共陕西省委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建立中共陇东军事特别委员会，指定刘杰三任书记，王杰、樊世荣任委员，他们积极开展兵运工作。这时，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控制西北地区，遏制陕军在甘势力，委任邵力子为国民政府甘肃省主席，邓宝珊为驻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行署成立后，四处招兵买马，但缺少枪支弹药，蒋介石答应从西安向兰州运送一部分。中共陕西省委责成陇东特委周密计划，并派省委常委李良组织起义。李良等3人到平凉，与陇东军事特委书记刘杰三商量起义事宜。10月初的一天，当从兰州到平凉接枪的教导队250多人到达平凉藁店时，教导队中的共产党员带领部分进步官兵举行起义，当即带出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34人，40多支枪。起义后，成立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7支队，李华锋任队长，李良任政治委员。后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下，起义人员仅剩13人，转入地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李良遇害，刘杰三调渭北红军游击队指挥部工作。

日照起义

1932年10月13日，中共山东省日照县委在该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4月，中共日照县委建立，安哲任书记。县委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还在农村建立了各种农民群众组织，进行抗捐抗税斗争。1932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诸城、沂水、莒县一带的工作。6月初，日照中心县委接到省委关于组织农民起义、建立北方游击区的指示后，于8、9、10月召开了3次会议，部署和检查各地起义准备工作，并决定秋后举行起义，成立“鲁南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安哲为总指挥。确定起义分南北两路同时进行，南路以山字河、牟家小庄、邵疃为中心，由牟春霖、郑天九、杨德玉指挥，进攻目标是涛雒镇；北路以安家村、于家村为中心，由安哲、于共方（后叛变）指挥，进攻目标是王家滩、两城镇；最后南北两路会师攻打日照县城、石臼所，最终挺进五莲山。

10月13日晚7时，南北两路起义同时爆发。北路起义农民在安哲指挥下，手执镰刀、锄头、大刀和长矛包围了安家村，将地主扣押，并收缴其枪支、弹药，当众焚烧地契文书，开仓分粮。后起义队伍开往于家村。此时，于家村的起义队伍在于共方等人的领导下，捉住了反动乡长于淑卿，收缴了地主的枪支弹药。14日，安哲率领安家村、于家村和河山店3处起义队伍攻占了日照东北部的重镇王家滩。当晚，与附近的殷家庙、吴家台、安家岭、秦家楼等20余村庄的起义农民在县城以北的两城镇会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辖2个大队，6个中队，共700余人，安哲任总指挥，于共方任副总指挥。

南路起义农民由郑天九、牟春霖率领，于13日晚分两股同时起义。东股以牟家小庄为中心，牟春霖指挥300余人，攻打夹仓未克，遂攻涛雒镇。西股以山字河为中心，郑天九指挥400余人，攻下申家庄，14日拂晓到达涛雒镇围子外与东股会合，共同攻打涛雒镇。涛雒是日照南部的重镇，驻有日照县警察分所、商团、民团、盐巡等反动武装400余人。由于“内线”人员被捕泄密，敌人遂加强了防范措施。当起义队伍汇集镇外发出攻城信号时，即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射击。危急之机，中共涛滩区委书记丁原澄向起义队伍报告了内情。起义队伍当即改变计划，向西南进发，先后攻占了平家村、苗家村、卜落子、沟洼、山口等村。15日，起义队伍攻打丁家庄未克，进驻沟洼村宿营。此时，山口村李沛卿带部分起义军叛变，勾结地主武装连夜攻打沟洼，使起义队伍受到较大损失。16日，起义队伍开到邵疃，进行了整编。牟春霖、郑天九决定北上，以期与北路会合。

日照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日照县长杨锦标与城内豪绅、地主联名电告驻山东军阀韩复榘，并强令城内青壮年登城站岗，将四道门用土屯封，禁止出入。韩复榘急令第81师展书堂调运其昌旅前来镇压，同时指令日照、莒县、诸城等县县长调集地主武装配合。在此情况下，南路起义队伍决定停止北上，复回西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他们先后袭击了沈疃乡公所、丁家园的民团，击溃了宅科乡的地主武装。北路起义队伍于16日黄昏从两城镇出发，进驻潮河镇。18日拂晓，驻在黄埠岭和河山店的反动武装企图两面夹击起义队伍。安哲派两股精锐武装分头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转移。当北路起

义军继续西进时，在魏家山与运其昌旅的搜索部队陈延年团遭遇，经激战，迫使敌人退至魏家南山一带。起义军顺利西进到五莲山、九仙山之间的老君堂。22日，各路敌人联结起来对起义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安哲遂率队伍抢先占领五莲山庙，控制制高点与敌形成对峙。23日，起义军决定西进沂蒙山区。当晚，沿五莲山北麓西进的起义军，在大王口被运其昌部所阻，遂退至九仙山主峰。24日，起义军沿九仙山北麓西进到三关口一带时，被运其昌部及地主武装包围。安哲率部突围后，转至寨山后涧隐蔽，后部队疏散，转入地下斗争。南路起义军转战十几日，最后在灵山堡陷入敌人包围。后得知北路起义军已分散隐蔽，也于25日将队伍分散，转入地下斗争。

孝泉起义

1932年10月20日，在中共四川省绵竹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驻德阳孝泉镇国民党军田颂尧部第26团3个连的士兵发动兵变，举行起义。

1931年春，中共四川省委派省委执委委员曾海云任绵竹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省委派刘逸仙任中心县委军委书记，领导兵运工作。驻绵竹的国民党军田颂尧第29军第13旅第26团，共产党的兵运工作开展比较好，共产党员赵秉贤任该团第3营副营长，王敬德任第2营见习排长。他们在该团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及外围组织，至1932年4月，有共产党员30多人，外围组织成员120多人，基本控制了第26团。10月初，田颂尧部与刘文辉部酝酿在成都作战，第26团奉命开往德阳新店待命。在共产党支部的宣传教育下，士兵反战情绪高昂，公开提出“反对军阀混战”、“不为军阀卖命”等口号。绵竹中心县委认为该团发动起义的条件业已成熟。对此田颂尧十分恐惧，下令第13旅调往德阳孝泉镇，准备加以整肃，并密令该旅第25团严密监视。在此情况下，中心县委决定立即举行起义，并派王敬德为该部特派员。19日夜，第3营第10连党支部在田坝开会，被敌人发现，王敬德召开党支部紧急会议，决定第2天举行起义。20日晚，第3营3个连未按统一部署率先起义冲出营门。由于起义时间提前，其他2个营来不及行动。起义的部队离开营房后，经绵竹向安县山区开进。23日，起义军到达安县沸水山区，遭田部重兵“围剿”，后失败。

桂北瑶民起义

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广西北部 and 湖南南部17个县的瑶族人民，自发地举行了一次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

1932年夏秋，位于广西省兴安、全县、灌阳3县交界处的桐木江，在瑶民中广泛出现了“盘王转世”的传说。瑶民纷纷前往桐木江朝拜瑶王。瑶民领袖凤福林、凤福山等人，利用这个机会，号召瑶民“同心协力，保驾瑶王”，杀尽官僚地主和一切坏人。并利用民间习俗活动为掩护，积极准备起义。1932年10月，他们在桐木江畔搭起高坛，打“开天醮”，参加活动者2万余人。起义准备工作被灌阳县汉族地主姜超民察觉，立即密报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动民团副司令秦仲刚，调派灌阳县民团，由大队长马易候带领，前往黄牛市和罗家坪镇压。凤福林等人当机立断，于1932年10月24日，在五岭山下的五龙庙宣布起义。10月25日，起义军进攻并占领罗家坪。接着在牛湾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一场血战。起义军声东击西，一面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火力，一面由凤福林率领1支敢死队，在夜幕掩护下，从侧后冲进敌军阵地，占领了黄牛市。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部署军事“围剿”的同时，玩弄政治阴谋手腕，12月4日，国民党桂林区民团指挥张淦来到灌阳县，以“造成瑶变之祸首”的罪名，处决了地主姜超民。之后，又派人到瑶族区“调解”。起义领袖没有识破敌人的阴谋，下令退兵。

1933年春节，瑶族群众正准备欢渡节日，反动派撕掉假面具，杀害了下山谈判的起义领袖凤福林。这一突发事件使广大瑶族群众认清了反动派的真面目。于同年2月，各地瑶民再次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大的革命风暴。兴安、全县、灌阳、龙胜、义宁各县，会同湖南的永明、江华、道州等地起义军6万多人，在各路大元帅、大将军、大部督、军师、司令、总指挥的率领下，占乡镇，围县城，烧炮楼，断交通。各地民团和地方武装，无法阻挡这场来势凶猛的革命运动，惊呼：“祸乱日益扩大，几至不可收拾。”国民党反动当局，急调桂系军长廖磊，率正规军1个师，由各地民团、警察配合，共4万多人，飞机3架，对起义军进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各地瑶民毫不屈服，与反动军队进行了30多天的浴血奋战。

这是一次自发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下，起义者提出了诸如“杀官家、杀财主”、“分田地”、“办共产”等口号。但是，由于缺乏正确领导，组织涣散，指挥不当，起义终于1933年4月失败了。

升钟寺起义

1932年11月25日，在中共四川省南充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南部县升钟寺的农民举行了起义。

南部县地处四川北部山区，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第29军的防区。田部在防区内委官设卡，巧取豪夺，使广大农民走投无路。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回到家乡南部，于1928年1月，领导建立了南部第1个共产党支部。同年夏，利用国民党南部县党部指导委员会成立之机，四川省委派杨永盛、赵世忠、罗星樵等一批人回到南部，参加该委员会，并以县指导委员会委员名义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举办城乡青年、妇女、农会等训练班，建立农民协会。不久，中共南部县委成立，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的支部，至起义前夕，全县建立区委4个，党支部27个，有共产党员250多人。1930年10月，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先派共产党员干部到升钟寺帮助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至1932年秋，升钟寺发展共产党员6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1200多人。11月中旬，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分析了升钟寺的政治形势，群众苦大仇深，共产党的领导坚强有力，起义条件已成熟。中共四川省委派视察员覃文、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罗敏到升钟寺加强领导。23日晚，覃文在升钟寺召开升钟区委会，决定25日举行起义。25日晚，区公所内正大摆宴席，为团总何义普之子举行婚礼，当地的地主豪绅全部赶来参加，几个游击队员潜入区公所偷运出4支步枪，随即鸣枪为号，已潜伏在周围的200多名游击队员听到枪声，立即冲进场内，打开民团的枪械库，缴获全部枪支弹药，击毙民团团团长伏蕴山、大队长杜廷直、豪绅敬道周和部分民团士兵，起义取得胜利。第2天拂晓，起义队伍开到铁罗寺，整编为“川北工农红军”。同时，成立了总指挥部，张友民任总指挥，覃文任政治委员，下设3个中队，共200多人。田颂尧对此十分震惊，急令所部罗乃琼师2个营和阆中、剑阁、苍溪等县的保卫团进行“围剿”，因敌人兵多武器装备精良，起义队伍被打散，伤亡大。12月初，起义队伍退出铁罗寺，仅剩几十人。总指部决定分散隐蔽，覃文和罗敏回四川省委，张友民到南江任炜章部做兵运工作。

同安起义

1932年12月至1934年春，中共福建省同安县委在该县发动和领导了3次农民武装起义。

1928年春，在中共同安支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同安县委。同安县委成立后，即全力领导农民展开斗争。1932年12月21日，为解决安南永德游击队的吃盐问题，中共同安县委发动巷东、巷南、沙美、霞悟、莲河、前坂等村群众300多人，前往珩厝村抢夺分保长、地头蛇王德桥的盐堆。在县委陈先查、洪宗涂的指挥下，起义群众浩浩荡荡地将红旗插上王的盐堆。起义群众遭到土匪的伏击，在游击队员的掩护下，起义群众撤退。

1933年1月19日，为解决群众的冬衣问题，同安县委领导人陈先查、洪宗涂、黄永妙等在市头村后山岩召集马巷东、西、南、北四个区委、游击队长联席会议，部署分布斗争。21日凌晨4时许，参加起义的4个区共1500多名群众，分两路进入后村，包围郭铃亮的顺利布店。在游击队员的带领下，数百群众冲进布店。驻村民团急出截击，游击队因势单力薄，撤出战斗。

1934年春，为解决群众度春荒问题，同安县委领导陈先查、陈剑鞋、洪宗涂等发动群众，哄抢新圩陈锵匡的“源隆”米店，结果也因遭到民团的追击而失败。区委书记和县委通讯员被捕牺牲。

中共同安县委领导的这3次斗争，都因准备不足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川北起义

1933年1月19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策动和协助下，川北民军在南江桃源举行了起义。

曾任国民党军杨森部旅长、渠县县长的任炜章，系四川南部县人。在共产党的影响与帮助下，任炜章于1932年毅然脱离杨森部，率少数亲信到西充县西禅寺组织武装，并派人去南江县与当地抗捐势力联系。10月，任率部到达南江北部的桃源，将队伍命名为“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简称川北民军。南江属国民党田颂尧第29军罗乃琼师防区。罗为扩张势力，设法拉拢任，派人送去“29军第3师川陕边防军”关防。任炜章在强敌面前，为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留下了关防，以麻痹罗乃琼。任炜章在南江时得到共产党员李载浦、张友民（升钟寺起义总指挥，失败后去南江）的鼎力匡助，在内部开展革命启蒙教育，提高群众觉悟，加强纪律性。对外，以“打富济贫”作号召，替群众办好事，支持群众抗捐、抗税斗争，深受群众拥护。1932年冬天，民军队伍扩大到2000多人。1933年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第73师向南江发展时，任炜章率部从桃源向赶场方向运动，并派李载浦、张友民前去联系参加红军，得到同意。1月19日，任正式宣布起义，并率川北民军加入红军，被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任炜章任师长，张友民任参谋长，李载浦任政治部主任。全师辖2个团，1个特务营，红军派来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加强对该师的领导。改编后，独立师配合红73师主力参加了解放南江城的战斗，立下战功。随后，由于张国焘的宗派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解散了这支部队，士兵编到第73师各团，任炜章、张友民、李载浦先后被杀。

水泉起义

1933年3月12日，在中共河北省曲阳、阜平、行唐3县联合委员会的领导下，行唐县水泉村一带的农民举行了起义。

水泉村地处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是行唐县的一个小山庄。由于官府横征暴敛，地主的压榨剥削，加之连年的严重灾荒，农民生活苦不堪言。1932年春，中共曲阳县委派共产党员张金福回故乡水泉村，宣传教育群众，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至1932年下半年，以水泉村为中心，周围几十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有共产党员200多名。1933年2月9日，中共行唐县委书记孙来恒在水泉、东西石臼等十几个村庄的党支部负责人会议上，要求全力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后，组织农民群众收集了20多支枪和一批手榴弹、土炮、大刀、红缨枪，分发给200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将起义队伍编为大队、中队、分队和班。3月12日下午，起义正式举行。起义队伍在水泉一带与行唐县国民党保卫团300多名团丁展开激烈战斗，打垮保卫团，缴获一批枪支弹药。14日，国民党当局纠集行唐、曲阳、阜平、定县等4县的保卫团，分3路进攻水泉村，起义领导人孙来恒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将起义人员转移到北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苇河起义

1933年3月13日，在中共珠河（今尚志）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驻吉林省苇河（今属黑龙江省）的伪军120余名官兵举行了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驻吉林省苇河县的伪军温秀峰团，因团长温秀峰依靠日军，压迫士兵，克扣军饷和伙食金，引起士兵强烈不满。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派遣9名中共党员打入该团从事兵运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共党员争取、团结了军官队队长于洪泽和宋连长等一批官兵。

1933年3月13日，中共党员和于洪泽领导120余名官兵发动起义，击毙团长温秀峰等数名反动军官和士兵，把起义队伍拉到距一面坡30多公里的苇沙岭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不久，起

半村起义

1933年3月13日，中共福建省寿宁县特别支部在该县未溪乡半村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3年初，半村的贫苦农民徐应拾由中共寿宁特支书记叶秀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寿宁特支的领导下，徐应拾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农会，成立贫农团。寿宁特支着手组织革命武装。在此之前，百丘村的徐应增、徐应满兄弟，自发建立了一支号称“国民革命军游击自卫队”的农民武装，有36人、长短枪20余支。经中共寿宁特支与徐应拾的工作，使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成为红军的队伍，整编为闽东北工农红军第3支队，队长徐应增，政治委员徐应拾，是半村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接着，中共寿宁特支在毛竹坪的桐山庵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半村起义计划，决定镇压寿宁“五虎”中的“南路第一虎”许海南。

为使起义获得成功，徐应拾暗中发展了许奶炯为地下交通员，秘密监视许海南的活动；中共寿宁特支派范义生协同许应拾指挥起义。3月12日晚，范义生、徐应拾带领第3支队的武装分队15人，潜伏在许奶炯家，派部分队员在外面接应。13日晨，徐应拾带领武装分队冲进许海南的家及乡公所和民团团部所在地。经激烈战斗，击毙了许海南等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烧毁了乡公所的房子，成立了半村苏维埃政府，徐应拾为主席。

西原起义

1933年3月下旬，在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下，西北抗日义勇军于甘肃省靖远县西原举行起义。

1932年12月，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委员有孙作宾（兼特委军委书记）、李慕愚、常黎夫、马豫章等。待委一成立，就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将5月靖远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活动的起义人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定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并通知曾参加过靖远起义失败后隐蔽在宁夏的王儒林回兰州负责组建这支队伍。特委为王儒林在国民党邓宝珊部谋得“绥靖公署招募专员”职务，以合法身份，公开到靖远招募新兵。

1933年2月，王儒林、李慕愚、吕明成、史悟亭等10多人，在靖远北湾设立了招募办事处。曾与游击队有过联系的薛宝山、张子明、杨得胜（藏族）等各率人马前来参加，1个多月招募了100多人。3月中旬，西原起义开始，西北抗日义勇军正式成立，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张子明任参谋长。初建时，义勇军编为1个大队，杨得胜任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三、四百人，扩编为2个大队：骑兵大队，大队长杨得胜；步兵大队，大队长吕振华。他们没收了西原两家地主的粮仓，不仅解决了义勇军的口粮，还解决了附近群众的饥荒和春耕所需种籽。4月初，驻守兰州水北门的甘肃行署特务营第2连1个班，在贺晋年、崔仰亭等率领下举行起义，离开兰州到后长川与义勇军会合。这时，起义队伍发展到400多人，贺晋年被增补为大队长。部队转到红沙岷驻扎。

义勇军的不断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蒋介石命令兰州驻军和青海、宁夏驻军组成“联军”进行围剿。4月下旬，宁夏马鸿宾部的冶成章骑兵旅、青海马步青部的马二虎黑马队和兰州东路交通司令部的袁福昌骑兵团等，从南、西、北三面对义勇军驻地红沙岷形成包围。义勇军同装备精良、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血战。从清晨到下午，消灭了许多敌人，但最终被敌兵冲散，除少数突围外，200多名义勇军队员英勇牺牲。王儒林、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史悟亭、郝新亚、贺晋年等30多人被俘。王儒林、贺晋年等在押送途中乘机逃脱；史悟亭、吕振华、郝新亚、崔仰亭等人在兰州英勇就义；孙作宾、李慕愚等经营救脱险。

西北抗日义勇军起义虽然被敌人镇压下去，但反蒋抗日的正义之举，在西北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苟英寨起义

1933年4月4日，在中共三台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苍溪苟英寨农民举行了起义。

苍溪位于大巴山南麓，山高地瘠，自然灾害频繁，加上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人民生计十分困难。1930年，苍溪北部的苟英寨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1932年冬，中共三台中心县委派少共书记陈子谦到苟英寨加强领导，决定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2月，成立了苟英寨游击队，陈子谦任队长，陈洪钧任指导员，共70多人。反动派对此很恐慌，准备进行镇压。苟英寨党支部把分散的游击队员集中起来。4月4日，陈子谦、陈洪钧等带领游击队举行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财物，农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队伍，很快扩大到500多人。在此基础上，游击队进行整编，成立了有150多人的基干队伍，其余人员编为赤卫军。此后，这支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多次斗争。1933年6月，游击队在配合红军作战和解放苍溪全县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并编入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

三堆石起义

1933年4月22日，在中共苍溪县三堆石党支部的领导下，三堆石乡的农民武装举行了起义。

1931年，三堆石乡（今中土乡）就有共产党的活动。1932年，建立了中共三堆石中心支部，有共产党员30多名。还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组织了游击队。1933年春，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孟晓川、陈子谦、陈洪钧等到三堆石地区工作，将中心支部扩建为区委，孟晓川任书记，赵鲁平、陈子谦任副书记。区委下设5个共产党支部，有40多名共产党员。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解放南江县，积极支持区委关于在三堆石起义的决定。4月22日晚，起义爆发，区委正式成立三堆石游击队，车云海任队长，黄维德任副队长，孟晓川任指导员，打出“红军三堆石游击队”的旗帜，镇压了恶霸苟大树等3个反动分子。三堆石农民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周围地区的敌人。国民党军第29军派1个营和部分民团，“清剿”游击队。游击队与敌人展开激战，取得反“清剿”的胜利，队伍扩大到200多人。不久，三堆石游击队扩建为独立团，发展到1200多人，由车云游任团长，赵鲁平任政委。成立了三堆石乡苏维埃政府。6月下旬，红军进入苍溪境内，该独立团被改编为正规红军，参加了保卫和建设川陕苏区的斗争。

寿宁起义

1933年4月，中共福建省寿宁县特别支部在该县西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0年10月，受中共福州市委的派遣，中共党员范浚、叶秀蕃先后回寿宁从事农民运动，发展共产党员，组织农民协会。1932年春，叶秀蕃、范浚根据中共福州市委的部署，着手组织农民武装，准备发动起义。4月，在寿宁大安建立了闽东第一支农民群众乐意接受的红带会，有2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参加。10月，中共寿宁特支成立，叶秀蕃任书记兼组织委员，范浚为宣传委员，范式人为交通委员。红带会组织迅速发展到大安周围的亭溪等10多个乡村，并由西区发展到南区、东区。接着，红带会组织又发展到福安、霞浦、宁德等县，会员达10万人。红带会在闽东游击队第1支队的支持配合下，在寿宁县西区和南区镇压了土豪劣绅。

1933年春，中共寿宁特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原计划的秋收起义提前举行。4月，国民党寿宁县县长罗华夫派出地主武装到大安、温洋下乡“清剿”。中共寿宁特支领导的红带会和部分农民群众，在大安与竹毛洋之间的桥头垄伏击，击毙敌10余人，俘3人，缴枪7支，国民党地主武装被迫退回县城。

竹毛洋战斗后，农民起义便在东、西区及全县范围内展开。起义群众在西区、东区没收地主的稻谷1800余担。5月，成立了寿宁县革命委员会，范铁民任主席。接着，东区、西区、南区各乡村也陆续成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达64个之多。各乡村还同时成立了贫农团、少年先锋队和劳动童子团等革命群众组织。10月中旬，建立了寿宁游击第7支队，支队长赖金标。1934年1月4日，第7支队在千余名东区红带会的配合下，攻占南阳。寿宁县农民起义震动很大，迫使县长叶鼎文离职。

1月中下旬，国民党军第84师1个团、福建省保安第3团及寿宁全县40多个民团，共计4000余人，分5路向寿宁县东区、西区进攻。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下，寿宁起义失败。

王店起义

1933年5月24日，在中共邛（崃）大（邑）特别支部的领导下，邛崃王店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0年初，中共组织在邛崃王店地区开展工作，尤其是在民团开展兵运工作成绩突出，共产党员孟光远担任了民团王店侦缉队队长，掌握了30多人枪。1933年，中共邛崃特别支部根据四川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区、支持川东北红军的指示，决定以王店为中心，以抗捐税入手，举行武装起义。5月24日，王店逢赶场，郑店、王店团总在场上茶馆商议加派捐款。中共当地组织获此消息后，指示孟光远带领所属举事。是日，孟率数十人枪封锁了场头场尾，活捉2个团总和一批反动骨干分子。接着，召开了群众大会，打出“川南抗捐军”红旗，成立了“川南抗捐军总司令部”。孟光远在会上宣读了抗捐军文告，公审、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团总孟仲道、郑佐清、孟朝和、孟彩丰等人。抗捐军打退邛崃、蒲江、名山等6县清乡司令兼县长的陈少夔所率反动武装，攻占驻夹关镇的王营长的所在地，处决恶霸地主多人。抗捐军发展到600多人。为加强领导，中共四川省委派上川南特支书记余宏文到总司令部任政治委员。其后，在刘湘、李家钰、邓锡侯、刘文辉等军阀部队的“围剿”下，抗捐军损失很大，由盛时的千余人锐减至数十人。1934年春天，抗捐军在政委陈伯峦、省特派员曾海云、省委军委秘书朱建文等的领导下有了较大发展。同年8月，根据省委指示，抗捐军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陈济民任司令，共800多人，活动于邓、大、蒲、名、芦（山）等县境内。1934年冬，国民党反动派集中总岗山附近15个县的驻军、民团，疯狂围攻抗捐军，陈伯峦、朱建文等被杀害。为保存实力，抗捐军剩余人员转入隐蔽活动，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

霍童起义

1933年5月28日，中共福建省宁德县特别支部在该县西北部的霍童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1年春，霍童建立了第一个宁德县中共党小组，负责人颜阿兰。经党小组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霍童的文湖、兴贤等17个乡村都秘密建立了贫农团组织。5月20日，颜阿兰召集20多个农民骨干在郑厝后门山召开贫农代表会议，明确提出组织贫民团，成立农民自卫队和开展抗租反霸斗争等项任务。会后，颜阿兰率领30多名贫农团成员在九都长潭村收缴税警5支短枪，100多发子弹，并争取了霍童大刀会20余人。1932年5月，已是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委员的颜阿兰根据县委指示，先后在兴贤、文湖、半岭、梅坑、桃坑、樟头岔、库山等村组织建立工农自卫队。10月，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叶飞来到霍童，与颜阿兰共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33年4月，中共宁德特支成立。5月，特支分析了形势，决定在霍童举行起义，攻占霍童民团团部，夺取枪支，壮大农民自卫队。5月28日夜，叶飞、颜阿兰率领50多名自卫队队员包围霍童民团团部，在民团内部人员的接应下，迅速冲进团部，经1个多小时战斗，打垮了民团，俘团丁10余人，缴获民团26支枪和一批弹药。此后的1个月，工农自卫队乘胜攻占了坑仔里、赤溪、黄田、半岭和周宁等乡村，缴获民团和地主80余支枪。6月底，宁德县游击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大刀会在半岭进行改编，建立了闽东游击队第3支队，100余人，颜阿兰任队长。此后，宁德县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到1934年，宁德县共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40余个，苏区人口达2万余人，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

烟筒山起义

1933年5月2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驻吉林省盘石县烟筒山的伪吉林警备第5旅第14团迫击炮连举行了起义。

1932年底，在辽宁省东边道和吉林省南部盘石地区活动的辽宁省民众自卫军失败后，全部散在各地继续抗日。在同一地区活动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简称盘石游击队）、第37军第1大队（简称海龙游击队）却异军突起。从1933的2月至5月，日伪军集中兵力对盘石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进行“讨伐”，其中盘石游击队奋战30余次，歼灭日伪军100余人。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很快扩大到230余人，声誉迅速提高。在这一有利形势的推动下，在伪吉林警备第5旅第14团迫击炮连做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曹国安、宋铁岩、张瑞麟，在部队中秘密串联，酝酿起义。

5月21日，伪军第14团进攻盘石游击队玻璃河套根据地遭到惨败之后，士兵反战情绪高涨。此时，日本侵略者对一些不被信任的伪军时常予以缴械遣散，使得伪军第14团人心浮动。29日，正值农历端午节，曹国安等利用节日活动方便的机会向早已联络好的抗日心切的士兵进行紧急动员，准备起义。当晚，第14团官兵酒醉早睡，准备起义的士兵也多装酒醉和衣上床。临近午夜，曹国安等鸣枪，高喊：“日本鬼子来缴械了！”兵营马上大乱。在混乱中，曹国安等开枪击毙伪军连长，击伤排长2人，并带领50余名起义的士兵冲出营门至烟筒山下。此次起义，共带出迫击炮1门、步枪40余支、迫击炮弹80余枚、枪弹8000余粒。

起义部队后由曹国安等率领迅速转移到玻璃河套，加入盘石游击队，被编为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治委员。

沂水起义

1933年5月29日，中共山东省沂水县委在该县组织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3年春，中共沂水县委书记谢梅林等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各级党组织要大力开展游击运动，创造北方苏维埃的指示，派人参与领导大刀会（一种农民联合自卫的群众组织）的工作，掌握农民武装。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许多中共党员进入了大刀会下属组织的各级机构，有的领导权已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1933年4月上旬，沙沟村青旗会（大刀会下属组织）队长、中共党员李成谦带领20余名会员，手持大刀，闹了沐水盐行，在当地震动很大。沙沟村恶霸地主李金刚上告国民党沂水县政府，县长范筑先带警备队于5月10日来到沙沟，逮捕了沙沟村、九岭坡村、张马庄村、崖庄村的9名中共党员和大刀会骨干。次日，又在下古村逮捕了省委派到沂水工作的中共党员马德隆及会员群众13人。谢梅林闻讯后，于当晚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大刀会起义，进攻沂水县城，营救被捕人员。计划于5月18日举行起义，后因下暴雨集合人员过少而改期。5月29日晚，旗会会首李德、赵玉瑞带领会员400余人攻打沂水七区第一甲设在崖庄村的联庄训练处，杀死教练及庄员3人，随后起义队伍转移到盖家顶。31日，国民党县府派张海亭、李金刚带领警备队和民团70余人，进攻盖家顶，途中遭起义队伍伏击，张海亭、李金刚等20余人被砍死。尔后，起义队伍又在高桥围困了前来镇压起义军的国民党军第81师运其昌旅。第81师师长展书堂派兵前来解围，在沂水县城附近遭到起义队伍的拦击，退回临沂城。

展书堂回临沂后，亲自率领第241旅2个团来到沂水，与运其昌的第242旅会合，镇压起义队伍。与此同时，山东军阀韩复榘一面派省民政厅长李树椿到沂水调停，一面以换防为名向沂水调集军队，阴谋血洗旗会。中共沂水县委得知此事，即转告青旗会总首领张恒远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展书堂见张恒远没有上钩，即开始血洗旗会。7月1日，运其昌“围剿”了东营庄，2日攻下宝泉山，接着“围剿”黄石山，杀死旗会会员及群众3000余人，造成了山东历史上骇人听闻的黄石山大惨案。3日，谢梅林、陈善、王富春和吴宝仁带领余部150余人进入沂山，坚持了3个多月的游击战争。后因沂水县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游击队人员大部走散，游击活动难以坚持，至10月，沂水农民武装起义即告失败。

老观起义

1933年6月6日，在中共阆中老观支部的领导下，老观地区的农民武装举行了起义。

1930年，共产党员彭蕴山在老观地区建立了共产党小组。1932年7月，建立了中共老观支部，彭蕴山任书记，王仕福任组织干事，张兴帮任宣传干事，由打入民团任队长的侯正方负责军运工作。老观党支部成立后，即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积极发展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建立游击队，发动更多的农民参加抗捐、抗税斗争，做好老观附近民团的工作，争取掌握更多的民团武装力量。1933年6月初，红四方面军进至老观附近时，老观党支部认为起义条件已成熟，即成立了起义指挥部，彭蕴山任总指挥，侯正方、王仕福任副总指挥，红军派师组织科长冯伦奎任参谋长。6月6日晚，起义开始。起义队伍与老观地区的反动民团展开激战，打垮了民团，冲进区公所，击毙民团及土豪劣绅40多人，缴获40多支枪和一批物资，烧毁了文书档案。红四方面军派代表祝贺起义取得胜利，送来总指挥徐向前亲自题写的“曙光在前”锦旗。后由侯正方带领100多名起义人员参加红军，其余人员组建了“川陕省游击队独立营”，为保卫和建设苏区作出了贡献。

驼腰子起义

1933年6月下旬，吉林省桦川县驼腰子金矿工人举行了反日武装起义。

1933年2月，日军占领吉林省桦川县驼腰子金矿（今属黑龙江省桦南县）后，残酷地压迫剥削工人，掠夺中国的黄金资源。为了反抗日军的压迫，怀有爱国热忱的工人祁宝堂（后名祁明山、祁致中）经过秘密串联，同张仲祥、龙成禄、吕景其、赵喜儒、孙继武、韩忠礼6人结拜为异姓兄弟，用私藏的沙金买了2支手枪，准备夺枪起义。6月下旬，祁宝堂等乘驻矿日军架枪吃午饭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毙日军7人，夺取轻机枪1挺、步枪6支、手枪2支、子弹700余发，起义成功。接着，吸收20余名工人参加起义队伍，迅速转移到20公里以外的大梨树沟，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对外报号“明山”，推举祁宝堂为首领，在桦川山区开展游击活动。

苍山起义

1933年7月6日，中共山东省临（沂）郯（城）县委在苍山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起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

郯城、苍山地处山东省最南部，是当时的临（沂）、费（县）、峄（县）、邳（县）等县的边联县。当地地主豪绅勾结国民党反动军队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阶级对立十分尖锐。1927年以来，中共山东和江苏的党组织都派人来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1929年10月，成立了鲁南第一个党支部，刘之言任书记。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中共临沂特别支部。到1932年5月，已建立涝沟、码头、城关3个中共区委和13个党支部，成立了中共临郯县委，刘之言任书记。临郯县委成立后，决定于6月25日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郯城四区的四哨（今属苍山）起义，后因泄密，起义计划停止执行。6月底，县委转移至邳县孟家楼，决定组织樊家堰起义，后因3名党员被捕，起义再次推迟。

1933年初，刘之言等决定以苍山为中心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并将起义队伍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县委军事部长郭云航任司令，县委书记刘之言任政委。公路南的起义队伍编为一个大队，徐腾蛟、凌云志、张鲁峰任正副大队长；公路北的起义队伍编为一个大队，田英任大队长。公路南北统一行动，到苍山会合。5月下旬，沂水起义的消息传到临郯，加之驻尚岩、向城的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军队正逢换防去枣庄，接防部队还未到来，县委于6月中旬研究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7月10日举行起义。这一计划得到了正在临郯巡视检查工作的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张北华（张恩堂）的同意。7月2日上午，赵家楼的地下交通员不慎被捕，沂武河区起义负责人凌云志得知后，于当晚集合150多人，收缴了赵家楼、滩头村地主武装的枪支40余支，并和徐腾蛟一起组成了临时指挥部。刘之言得知公路南提前行动的消息后，于7月5日在西大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起义时间提前到7月6日。

6日清晨，刘之言、郭云航、杨冠五等率领西大埠、迷龙、苍山一带的暴动队伍30多人枪，到达苍山及附近大圩子、周庄、马巷等村，占领地主刘翔臣的大院作为起义司令部。随后在大围于西头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刘之言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会后镇压了恶霸地主，开仓分粮，没收其土地归农民所有。当天起义队伍就扩大到200余人，130余支枪，并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的大旗。

7日、8日，苍山周围地主武装纠集反动民团向起义队伍反扑，多次进攻苍山，均被起义队伍击退。9日，国民党军第81师唐邦植旅包围了苍山。经1天激战，游击总队伤亡50余人。在突围中刘之言牺牲，郭云航被俘。杨冠五、田英、田杰、张星等率余部突出重围后，因弹尽粮绝，分散转入地下斗争。

龙须崮起义

1933年7月16日，中共山东省新泰县委在该县龙须崮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2年10月，中共新泰党组织在几经破坏和周折下，恢复了县委，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70余人，成立了农民协会。年底，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张北华到新泰巡视，传达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的指示。中共新泰县委根据省委指示，于1933年3月在新泰县委委员王德一家里召开扩大会议，对组织农民起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定于7月20日举行起义。会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全县有900多人报名参加，筹备了300多支长短枪和部分弹药，并选择了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且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龙须崮作为起义队伍的落脚点。尽管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但因消息走漏，县委决定提前起义。

7月16日黎明，县委成员李银彬、崔全法领导东乡一支110人、80多支枪的农民武装宣布起义，娄家因任指挥，当天将队伍拉上了龙须崮山顶。起义队伍沿途写下了“打倒军阀雪国耻”、“建立人民自己的天下”等标语口号。之后，起义队伍先后袭击了蒙阴县的张庄镇和坡里镇，缴获了部分枪支，并在附近村庄没收了地主的粮食，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号召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等。

起义震惊了反动当局，蒙阴县张庄镇镇长房旭东、坡里镇镇长王子莲急忙要求国民党县政府“速派人剿办”。国民党蒙阴县县长张尊孟闻讯后，立即令县大队副大队长黄永周带一排人赴龙须崮，连同豪绅地主武装共300余人“围剿”龙须崮。起义队伍凭险据守，“围剿队”未敢贸然行动。新泰县委得知东乡的几个县委成员已举行起义的消息后，仓促发动西乡、西南乡农民响应，组织了部分力量向龙须崮增援，但被驻扎在新泰的国民党军谢书贤部两个营兵力截击，未能前往。龙须崮山上的起义队伍得知蒙阴县政府将组织更大规模“围剿”的消息后，于7月23日夜由娄家因带领20余人向鲁山转移，余部下山分散隐蔽。起义队伍占领鲁山后，又遭到国民党县大队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之后，在弹尽粮绝、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起义队伍于7月28日突围后解散。

耀县起义

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和策动下，国民党军西北军杨虎城部骑兵团在陕西省耀县举行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1933年夏，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中共党员）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率部脱离杨虎城关系，建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指示，率骑兵团1200多人，于7月21日举行起义，并解除了当地反动民团武装。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司令员，刘映胜任政治委员，谈国帆任参谋长，下辖9个大队。22日，中共耀县县委决定成立耀县革命委员会，耀县游击队也同时宣告成立，陈学鼎任队长。该游击队共70多人，50多支枪。27日，杨虎城任命刘文伯为“剿匪”总司令，并令其嫡系赵玉亭、孙友仁分路进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由于敌人势力强大，义勇军大部溃散，仅剩100多人，在王泰吉率领下退至照金根据地。不久，中共陕甘特别委员会将该部队加以整编，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一直战斗在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为陕甘地区的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兴山镇起义

1933年7月，驻黑龙江省汤原县兴山镇的伪军第5团第4营士兵举行了反日武装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散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境内的一部分士兵，被日军改编为伪军第5团第4营，驻扎在汤原县兴山镇（今鹤岗市）。1933年夏，第4营士兵因不堪日军的歧视和压迫，暗中酝酿哗变。7月25日，日军发现第4营士兵的反日情绪，立即派兵围缴该营枪械，并开枪镇压不愿缴枪的士兵。第4营士兵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当场击毙日军大佐2人、士兵10余人，第4营阵亡20余人。随后，起义士兵转移到附近山区，报号“忠厚”。不久，该部又参加“占中央”山林队，开展游击活动，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的一部分。

祥泰裕屯垦队起义

1933年9月6日，驻绥远省临河县祥泰裕（今临河市狼山镇）附近的阎锡山屯垦队，在中共临河县委和屯垦队第410团第11连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

1932年4月，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扩大晋军势力范围，派其部属王靖国师的田树梅旅以屯田垦荒名义驻扎河套地区，时称晋军屯垦队。该旅第410团驻临河。由于屯垦队内施行变相的农奴制，屯垦队官兵终年垦荒耕耘，苦如牛马，加之军官克扣士兵粮饷，官兵矛盾异常尖锐。中共临河党组织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发展第410团第3营第11连第3排排长徐政权为共产党员，并通过徐政权在该连发展共产党员，使该连的共产党员占全连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正副班长中共党员占一半。1933年7月中旬，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收复察哈尔以北重镇多伦，消息传到第11连后，人心振奋，受到很大鼓舞。该连中共秘密党支部委员李占海向士兵宣讲察北抗日斗争的胜利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不料被第2排排长窃听。迫于形势，该连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王奇山未来得及征得中共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情况下，即于9月6日举行起义。李占海带领部分起义士兵冲进祥泰裕营部，处决了第3营营长和第2排排长等反动军官。随后，将全连近80名士兵改编为“红军塞北支队”，李占海任总指挥，谢映堂任参谋，徐政权任党代表。该支队准备占据西北方向的狼山，开展游击战争。在撤往狼山途中，遭到临河县反动民团和屯垦队刘良湘骑兵营的围攻，终因寡不敌众，除个别人脱险外，其余起义人员大部牺牲。

甘棠起义

1933年10月23日，中共福建省福安中心县委在该县甘棠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3年夏，甘棠地区建立了中共甘棠中心支部，书记周玉春，下辖东西南北4个支部，还建立了共青团甘棠支部和农会组织，有会员800多人。为领导农民抗租，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委员、南区区委书记施霖和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来的曾志一道，从农会中挑选200多人成立抗租会，陈洪妹为抗租会主席，组织开展抗租斗争，并在福安各地建立群众易于接受的农民武装红带会。到七八月间，南区300多个村子包括甘棠镇内都建立了红带会，推动了抗租斗争的开展。

抗租斗争引起地主豪绅的不安，他们勾结驻当地的国民党军海军陆战队进驻甘棠，大肆捕抓抗租、拖租的农民。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立即调任连江游击队政治委员的任铁锋往福安，与施霖、陈洪妹等召集红带会和贫农团骨干会议，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策略，在甘棠举行起义，解除驻扎在刘祠的海军陆战队1个排的武装。

10月21日夜，由于泄密，海军陆战队突然包围漳港村，村党支部书记阮春弟等7人被捕，

押往赛岐。随之甘棠起义计划改变，决定攻打赛岐，救出被捕同志。由于力量集中不够，加之赛岐陆战队又增派1个连的兵力，指挥部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将队伍折回甘棠，再次实施攻打甘棠刘祠的计划。

10月23日凌晨，起义队伍在总指挥任铁锋指挥下，完成对刘祠的包围后，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冲进海军陆战队驻地。经1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击毙陆战排士兵6人，缴长短枪13支。起义队伍牺牲10余人，撤出甘棠镇，向倪下山区转移。当天，在倪下村宣布成立游击队，队长任铁锋，副队长曾志，政委陈洪妹。几天后，占如柏、叶飞等率闽东工农游击队第1支队由北区南下，与游击队会合。接着，中心县委在霞浦兰下村召开会议，决定把这支100多人枪的游击队正式编为闽东北工农游击队第5支队，队长任铁锋，政委叶飞。第5支队乘胜出击，仅10余天，先后消灭了虎岩、财塘、斑竹、犬获和宁德的赤溪、班宣等地地主民团，缴获长短枪40多支，打开了南区斗争局面。

仙游起义

1933年10月24日，中共福建省仙游县委在该县发动和领导农民群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1932年夏，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邱荣泉来仙游接任县委书记（前任县委书记被杀害）后，立即恢复了县委和共青团组织，建立了进步的群众组织，并组成一支20余人的精悍的游击小分队，作为县委的武装力量。10月上旬，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会后，向全县印发了《为秋收斗争告农民书》，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加入抗租团和农会，共同反抗地主收租、债主逼债、官府逼税，要求各村组织农民自卫队，积极参加工农游击队，打击国民党地方势力。

10月23日，中共仙游县委在白马宫（今赖店）召开20余乡、数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动员大会，号召广大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和苛捐杂税。24日，全县各区农民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起义，驱赶捐棍，砸烂税所，散发传单，砍电杆，割电线，挖公路，拆桥梁。一时间，全县农民斗争热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仙游县委不失时机将斗争引向深入，至11月，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阶层的民众纷纷加入起义行列。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19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之反动政府决裂。

12月1日，驻仙游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在城关前埔广场召开庆祝“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仙游县委发动群众参加，并积极促进福建人民政府撤消了国民党仙游县党部，逮捕并通缉国民党仙游党部的所有委员。庆祝大会后，仙游县委又组织农会会员游行，队伍途经县城南门时，农会会员和群众乘机包围并捣毁南门税局。几天后，县委又发动群众将城关内的税局捣毁。与此同时，全县各区的党组织也发动群众全面摧毁了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

仙游起义取得一定胜利，但随着第19路军反蒋斗争的失败，仙游的反动势力又卷土重来，仙游人民的斗争再度陷入低潮。

吉阳起义

1933年10月，中共福建省建瓯县委在该县吉阳镇领导农民游击队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2年初，中共建瓯县委委员张沐、江文烈来到吉阳，协助吉阳中共党支部书记张启恩，发展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经过宣传发动，宅墩、亭下、岩下、曹墩、溪放、八洋塘等地的“岩下农民协会”成立，共有会员100余人。7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决定将中共建瓯县委改为中共建瓯中心县委，并派市委候补执行委员庄又陵和前建瓯县委书记黄可英到吉阳指导，并以西区区委为领导，建立吉阳游击大队，李高年为大队长，张启恩为大队书记。12月，中心县委决定在吉阳游击大队的基础上扩大建瓯、松溪、政和3县的武装队伍，建立闽北工农游击队第1支队，队员20余人，由中心县委委员张沐、黄可英分别任队长、政治委员。游击队成立后，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打土豪和抗捐抗粮斗争。

1933年9月，在入闽的红军的支援下，游击队发展到40余人，枪20余支。10月的一天晚上，游击队员30余人，在溪放后门山田坪厂集会，准备举行起义。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军第56师1个团和吉阳民团突然包围了田坪厂。江文烈、张沐率游击队在突围中先后牺牲，游击队被打散。

突围出去的黄可英等游击队员转移到政和东平，与在政和一带活动的杨则仕会合，重新组成一支游击队，战斗在政和、松溪、建瓯一带，后发展为红军建松独立营。

霞浦起义

1933年11月上旬，中共福建省福安中心县委在霞浦县的青皎、陈墩、杯溪地区发动和领导4000多名农民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3年3月，中共霞浦支部成立。7月和9月，中共青皎和里学支部相继成立。党的组织建立后，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共产党员，组织农民协会。同年秋，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向青皎、陈墩、杯溪等地派出县委委员施霖、詹建忠、邓怪康、刘招道等人，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捐斗争，并在青皎、陈墩、杯溪地区的260多个村成立红带会这一农民乐意接受的群众组织。

11月上旬的一天，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红带会的700多人举行起义，杀死恶霸地主周树左、林顺灿，焚烧了田契、债据，分了土地、粮食和财物，农民群众深受鼓舞。到是月中旬，青皎地区就有2000多农民自觉加入起义队伍，占领了国民党盐田海关和镇公所，摧毁国民党军两座炮楼，镇压地主恶霸、反动分子30多人。在陈墩，起义波及三洋100多个村庄，参加起义的农民1200多人。在杯溪，波及36个村，1000多人一举推翻了当地的封建政权。

1934年1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2团在霞浦西胜寺成立，团长任铁锋，政治委员叶飞，并于当天率福（安）霞（浦）红带队和基本群众2000多人首次围攻霞浦县城，因部分红带队队员提前行动，攻城未果。1月18日，再次围攻霞浦县城，因敌早有准备，独立团遂撤出战斗，伤亡30余人。

2月至3月，陈墩、青皎的富积岭先后遭到各地反动组织大刀会和国民党军新编第10师1个营的袭击，红带队受到很大损失。3月，福安中心县委派闽东红军独立第3团第16连来霞浦，配合霞浦红带队，先后消灭下坪岗、大岭、黄岭、阮洋等20多个村庄的大刀会。在霞浦西洋岛成立了闽东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营长柯成贵，全营200余人，100多支枪。4月，在柏洋、杯溪两地成立霞浦上西区和下西区苏维埃政府，并在柏洋的陈罗洋村建立中共霞浦县委。6月，闽东工农红军第10独立团成立，全团200余人，40余支枪。

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

1933年12月11日，河北省兴隆县黄花川农民，在孙家勤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承德、兴隆等地，国民党军政官员闻风而逃。日军委任王海澄为兴隆办事处处长，网罗当地地主豪绅维持局面。当时担任黄花川村自卫团团总的孙永勤，怀着强烈的抗日爱国心，决心率领本村的自卫团和农民群众同日伪势力斗争到底。中共京东特委王平路，这时也从迁安县来到黄花川一带活动。他向孙永勤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更进一步坚定了孙的抗日决心。伪地方官员为了防止农民反抗，决定没收全县农民手里的枪支弹药。伪上板城警察署和东河堡警察队几次派人找孙勤，要他缴出自卫团的50多支枪，遭到孙的拒绝。孙永勤还领导黄花川农民拒绝日伪摊派的苛捐杂税。12月上旬，伪兴隆办事处处长王海澄派伪军200多人到黄花川逮捕孙永勤，收缴枪支和捐税。伪军在黄花川奸淫烧杀，抢掠民财，无恶不作。12月11日，孙永勤率17人起义。起义队伍命名为民众军，并制作了一面上书“关外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红旗。黄花川起义后，贫苦农民200多人参加了起义队伍。汉奸李海山得知孙永勤起义后，率伪军进驻张杖子村企图镇压。12月下旬的一天夜晚，孙永勤率200多民众军冲进张杖子村，毙俘伪军百余人，缴枪百余支，子弹5000多发。李海山率残部狼狈逃窜。民众军打开了大成兴商号股东张如增的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张如增被处决。随后，民众军百余人在关元有率领下，在大彭杖子南山歼灭李海山部50多人。

1934年1月，民众军发展到500余人，并进行了整编，孙永勤任民众军团长，下设3个队，关元有、王殿臣（中共党员）、赵四川分任队长。2月初的一天夜间，民众军突袭东河口，全歼守敌50余人。之后，民众军转战于承德县乌龙矶一带，收缴地主枪支百余支。这时，柳河南岸八卦岭村农民张福义，组织农民百余人，收缴柳河沿岸反动武装的枪械，赶到乌龙矶与民众军会合。中共京东特派刘玉堂、刘俊岳等20多名中共党员参加民众军，还在遵化、迁西等地动员大批物资，给民众军以有力地支援。3月，伪军千余人向黄花川一带扫荡。民众军在黄花川设伏，击毙伪上板城警察署长马扒皮，毙伤敌300多人。3月下旬，孙永勤率兵包围敌东河口据点，全歼伪警队长以下官兵百余人，枪决汉奸岳荫臣、任凤阁。以后，民众军又向承德境内的铁路沿线进军，一举攻破敌上谷车站，歼敌30多人，毁铁路，炸桥梁，使敌人的铁路运输中断。之后，又有苇子峪村自卫团总李连贵和蓝旗营村年焕兴率贫苦农民四、五十人前来会合，声势越来越大。4月下旬，民众军在五凤楼山附近，狙击新上任的兴隆县办事处处长吕俊福率领的伪军，毙伤敌250多人，并击溃了前来合击的上板城警察署孙荣圃率领的伪军。5月，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近5000人。孙永勤任抗日救国军军长，赵四川任副军长，王殿臣任参谋长，下设4个总队，每队800—1200人。活动在兴隆、承德、宽城、平泉、迁西和遵化等县的山区。不久，孙永勤、张福义率第1总队攻打佛爷来伪警署，毙伤敌50多名。年焕兴、李连贵率第2、4总队攻克了罗文峪、孤子山敌据点，活捉日税关总长佐藤，毙俘敌70多人。随后，第2、4总队在鞍子岭村与日骑兵队遭遇，击毙日军70多名，打死军马60多匹。王殿臣、关元有率第3总队，攻克敌山口、龙井关、二堂等据点。9月间，

抗日救国军第3总队在瀑河旁的九虎山毙伤日军500余人。10月,赵四川、王殿臣率千余人包围宽城镇,歼敌300多人,敌弃城向青龙方向逃窜。

1935年2月,上万名日伪军开赴黄花川“围剿”抗日救国军。日伪军2000多人在承德县老岭一带将孙永勤、张福义所率第1总队包围。双方激战一天,日伪军伤亡近千人。抗日救国军伤亡600多人,后来,突围转移到黄花川一带深山中去。由于山区供给困难,孙永勤与王殿臣等错误地设想放弃山区根据地,将部队开往平原地区与日寇展开大兵团决战。3月,4000多人的抗日救国军开赴遵化县茅山一带。暗藏在内部的汉奸商佩璋,将部队行迹密告兴隆、遵化县的日伪机关。30日,日军调集日伪军15000余人将茅山团团包围。孙永勤组织部队突围。但由于敌众我寡,激战一天未能奏效。到31日下午4时,抗日救国军领导人孙永勤、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赵来子等人以及大部官兵英勇牺牲。只有张福义、李连贵、刘俊岳、刘玉堂等率领少数战士从茅山北面突围出来,重返黄花川根据地,坚持斗争到抗战胜利。

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坚持斗争一年多,袭击敌据点百余座,毙伤敌人5000余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中央热情称赞孙永勤为抗日民族英雄。

马鼻起义

1934年1月1日，在中共福建省连江县委的领导下，闽东工农游击第13总队和农民群众在连江县马鼻镇发动了武装起义。

马鼻镇，是连江县东北部的一个重镇，国民党政府在这里设有区署，驻有海军陆战队。

1933年9月，中共连江县委领导的闽中工农游击第1支队夺取了透堡，建立了全县第一个红色政权——透堡乡苏维埃政府。随后，县委机关也进驻透堡。在县委的领导下，透堡建立贫农团等各种革命组织，发展农业生产及进行苏区各项建设。游击队也发展壮大到500余人，扩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第13总队，杨而菴任总队长兼政委，下设3个支队和特务队。13总队还乘胜攻克了筱埕、官坂等地，缴枪几十支，子弹几千发。在透堡、马鼻附近的坑园、颜岐、下屿、前屿、龙头、拱头、东川、鲤溪等乡村，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或减租、抗债斗争，苏维埃运动在全县迅速发展。透堡及附近乡村解放后，周围逃亡的地主都躲进与透堡仅六七公里的马鼻镇，马鼻镇成了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11月下旬，国民党第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并派兵驻连江，也驱走了驻马鼻镇的海军陆战队。马鼻镇各处碉堡、阵地由第19路军接管。连江县委根据局势变化，决定趁着海军陆战队撤走，第19路军打着反蒋抗日旗号与我求和的有利时机，尽快拔掉马鼻这颗在连江苏区腹地的“钉子”。县委重点做了以下工作：一、通过福州中心市委与第19路军交涉，使第19路军所部撤出马鼻回县城驻防；二，第13游击总队由杨而菴带领集中在山面区和透堡一带，加紧训练；三，事先打入马鼻镇民团内部的地下党员迅速摸清了民团实力；四，派人向第19路军购买了10万发子弹。12月底，准备工作就绪，县委即从苏维埃各乡抽调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数百人，配合游击总队，由杨而菴带领，分水陆两路，向马鼻进发。

12月31日夜，第13总队和由群众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到达马鼻镇外。这时在民团的内应已拆卸了部分团丁的步枪枪栓，策动几个团丁投诚，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1934年1月1日凌晨2点，第13总队在赤卫队的配合下，在内应和投诚团丁的接应下，迅速攻占了马鼻镇外围的北分山、关帝庙等山头阵地，接着冲进民团团部，击毙民团团总。经过2个小时的战斗，全镇仅横厝街的厚裕米厂尚未攻克，10多个地主、团丁依伏高楼厚墙进行顽抗。杨而菴率队进攻，不幸中弹牺牲，愤怒的战士们冒着弹雨冲进米厂，击毙了马鼻区长和恶霸等6人。

1月3日，连江县工农会代表大会在透堡召开，成立了连江县苏维埃政府。全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有6个区、174个乡、296个村，在143个乡村实行了土地改革，近20万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到了田地。革命队伍也迅速扩大，1月7日，游击第13总队在透堡扩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第13独立团。

赛岐起义

1934年1月1日，在中共福建省福安县委的领导下和闽东北工农游击第5支队的支援下，福安县农民5000余人，在该县赛岐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2年9月，成立了中共赛岐特支。中共党的组织建立后，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1933年12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攻打赛岐。遵照县委部署，赛岐特支组织张贴标语，并争取了赛岐民团的教练，加上民团的一个排长也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使民团的指挥权基本掌握在赛岐特支手中。12月31日晚8时，赛岐沿江的一家杂货店失火。这场意外大火使赛岐守敌坐立不安，驻赛岐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1个连和民团，决定连夜撤往三都澳。赛岐特支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以保护镇民财产为由，发动商人和社会名流，留下民团的人枪，为赛岐起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4年1月1日，赛岐起义正式开始。闽东北工农游击队第5支队以及上南、下南、东区、西区等区组织的5000余人，手持枪支、梭标及大刀等武器，在叶飞、任铁锋、曾志等率领下，兵分数路开进赛岐，街头巷尾到处张贴庆祝赛岐解放、歌颂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标语。以商人和社会名流组成的赛岐维持会，献出民团的枪支83支。起义队伍占领赛岐后，在赛江拦截了一些逃亡地主、资本家的船支，缴获一批银元和财物，并打开国民党福安当局设在赛岐的粮仓、盐仓，将收缴的粮、盐分给群众。第2天，在赛岐王厝祠堂边的田坪上召开赛岐方圆几十里的贫苦农民及部分红带会、游击队员参加的祝捷大会。会后，叶飞、占如柏率部分游击队和舟阳、溪潭等地赤卫队1000余人到西区活动，收缴了溪潭、凤林等地5个民团40多支枪。

赛岐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壮大了中共在闽东的武装力量。不到20天，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北独立第2团。同时，促进了土地革命的开展，福安建立了上下南区的苏维埃政府和东区的革命委员会。

迁安起义

1934年1月23日，在中共河北省京东特委和迁安县委的发动和领导下，该县农民在迁安上、下梨树峪举行了起义。

早在1929年6月，迁安农民群众在中共迁安县委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获得了取消新增杂税斗争的胜利。共产党的影响在人民群众中越来越大。此后，中共迁安县委抓紧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组织。至1933年底，全县建立区委4个，党支部40个，有250多名共产党员。次年1月23日，迁安县委领导该县西部上、下梨树峪的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500多人举行起义，与警察局和地主武装展开激烈战斗，俘获警察局长和5名警察，缴枪20多支。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京东游击队，下辖2个大队，1个中队，共500多人，24支枪。24日，起义队伍上李口，缴枪9支。在准备向青山口警察局发起进攻时，被迁安、遵化、丰润、青龙、兴隆等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1000多人包围，起义队伍被打散，起义失败。

木头峪起义

1934年2月3日，在中共陕西省佳县县委的领导下，佳县木头峪的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

木头峪地处黄河岸边，距佳县县城20公里，有居民300多户。起义前，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在这里已经有相当的基础。到1933年6月，已建立起中共木头峪中心支部，有党员20多人，其中有七、八个党员已经打入了乡团当团丁，刘子义还取得了乡团教练的职位。1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马佩勋来到木头峪与刘子义等联系，准备发动起义。这时，和佳县相邻的吴堡县宋家川有一些贫苦群众，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走投无路，要求参加红军。他们中间有些人曾参加过冯玉祥的五原誓师。特委派马佩勋去宋家川联络了14人，成立了抗日义勇队，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

1934年1月中旬，已担任中共佳县县委组织委员的刘子义和县委书记高长久，得知国民党将于2月2日左右在木头峪召开全县各区绅士代表会议，研究捕杀共产党人和催收年终捐税欠款。陕北特委和佳县县委决定采取行动，举行起义，粉碎敌人的阴谋。特委派人到吴堡与马佩勋商定，将隐蔽在宋家川的抗日义勇队迅速集中起来，连夜赶到佳县，集结在木头峪附近待命。高长久等和木头峪中心支部成员一起，研究了起义的计划和部署：刘子义以乡团教练的合法身份接待各区绅士和民团头目，观察敌人的行动；木头峪中心支部书记张鹏图负责领导本村党员，配合义勇队行动；派人监视几个主要敌头目的动静；马佩勋指挥义勇队，收缴民团武器，捕捉反动绅士。

2月3日晚，敌人的会议开始举行。义勇队队员在本村党员的引导下，首先奔向民团队长杜庆甫的住处，缴了杜的枪械。然后，来到开会代表住宿的聚丰厚商号，收缴了民团的枪支弹药，将团丁和大部分绅士集中管押起来。敌县教育局长和聚丰厚商号老板及一名绅士被义勇队员处死。随后，义勇队又转向民团队长张东郊家，处决了这个恶霸。拂晓，义勇队完成了任务，撤出木头峪，向吴堡方向前进。5日，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4支队，支队长薛俊山，政治委员马佩勋，刘子义任支队经济委员兼支队党支部书记，下设两个分队。

安康起义

1934年2月22日，在中共陕南特委和安康特别支部的领导下，驻陕西省安康县的国民党军张飞生旅部分官兵举行了起义。

1931年秋，中共陕西省委为加强陕南兵运工作的领导，在张飞生旅建立了中共安康特支，并在其炮兵营、特务连发展共产党员。炮兵营营长黎民觉同情共产党，愿跟共产党走。中共陕南特委和安康特支决定以炮兵营和特务连为主，影响并推动该营机枪连、手枪连同时起义，并决定起义后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巴山游击队，袁作舟任司令员，王建英任政治委员。因泄密，中共安康特支决定提前于2月22日起义，起义开始后，即遭国民党重兵包围。这时，安康特支和巴山游击队指挥部率起义队伍主力突出重围，沿汉水向紫阳县前进。部队沿途英勇作战，消灭追击的国民党军一部，但由于准备工作不足，追击的兵力强大，起义部队在紫阳县茅坝关失利，大部伤亡或被打散，小部退至镇巴县山中，继续坚持斗争。巴山游击队副司令员王太诚在战斗中阵亡，司令员袁作舟、政治委员王建英等40多人被捕，惨遭杀害。

土地坡起义

1934年2月28日，在中共四川省涪陵县委的领导下，土地坡农民举行了起义。1930年，涪陵罗云坝第2次武装起义及所建立的四川红军第2路游击队失败后，刘湘的第21军在涪陵地区进行疯狂镇压，使当地中共组织受到严重破坏。1932年，中共中央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从上海派田鹤鸣回四川组织游击队，牵制川军东下。田鹤鸣回四川到涪陵后，与共产党员黄尔宜、秦培吾等筹建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恢复了共产党组织。当地群众已发动起来，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情绪高涨。据此，田鹤鸣等决定于1934年2月28日发动土地坡起义，利用打入团防队并任队长的共产党员王伯瑜，将其掌握的武装争取过来，武装农民。王伯瑜根据共产党组织的起义计划，在元宵节晚上盛宴“犒劳”团丁，趁团丁酩酊大醉，田鹤鸣带领起义队员冲进团防驻地，在王伯瑜的策应下，打死乡长何庆余，缴获20余支枪。起义胜利后，起义队伍开到丰都、涪陵交界的弹子山，开展游击战争。不久，起义队伍遭到丰都、涪陵民团的“围剿”，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将剩余的起义队员分散隐蔽。

勐先起义

1934年3月1日，在中共云南宁洱（今普洱）县委的领导下，勐先农民武装举行了起义。

1929年，中共宁洱县委成立。同时，在宁洱县还建立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有会员数千人。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宁洱县委遭破坏后，仍有部分共产党员分散在各地继续坚持斗争。1932年秋，共产党员罗有祯在宁洱德循乡以教书作掩护，在勐先、普义、同心、黎明等地宣传群众，联络共产党员，并争取了李保田、者兆发等彝族的“绿林”武装。1934年春节，罗有祯等趁当地连遭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农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之机，召开党员骨干会议，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罗有祯任总指挥，李保田任副总指挥，下辖7个大队，共500多人。3月1日，在勐先举行起义。4月16日，起义队伍向勐野井（今属江城）开进，在盐场击毙盐场经理及护场武装人员多名，缴获30多支枪。国民党地方当局十分震惊，调集大批地方武装“围剿”起义队伍。起义队伍冲出重围，转战于宁洱、江城、墨江县边境，队伍扩大到1000多人，多次挫败反动武装的进攻。6月，国民党地方当局调集重兵“围剿”起义队伍，罗有祯、李保田等被杀害，起义队伍被打散。

土龙山起义

1934年3月9日，吉林省依兰县土龙山（今属黑龙江省）农民武装举行了反日起义。

1934年3月初，吉林省勃利县（今属黑龙江省）连珠岗农民起义被镇压的消息传到依兰县土龙山，当地农民群众更加痛恨日伪当局。土龙山五保甲长景振卿立即开始联络二保保董曹子恒等人，积极准备反日起义。依兰县日伪当局察觉后，于3月8日派出1个连进驻太平镇，准备镇压。9日，土龙山各路农民2000余人拥到太平镇，攻入伪警察署，将伪警察缴械，并袭击伪军骑兵连，击毙10余人，缴枪15支。10日，驻依兰的日军第10师团第63联队联队长、大佐饭冢朝吾、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率日军1个小队和伪警察共45人前往太平镇，在镇西白家沟遭农民武装伏击，饭冢等18人被当场击毙，其余人全部被俘。起义军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数十支，起义军牺牲1人。11日，日军第10师团参谋长加纳由哈尔滨赶到依兰，指挥吉川曾木部和横山部向土龙山进攻；农民起义军先在卡伦阻击，后由景振卿率部在太平镇北门同日军激战，毙伤其28人，起义军牺牲3人。12日，起义队伍由太平镇转移到半截河子，编为东北民众救国军，景振卿任前敌总指挥。土龙山农民起义在松花江下游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县的日本参事官不敢在县内任职，纷纷离任或逃跑。

冷城起义

1934年3月19日，中共福建省福鼎县委在该县南区冷城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3年，中共福鼎县委书记黄淑宗与福安中心县委委员叶秀藩等分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使冷城及附近各乡的抗捐、抗税、抗租、抗粮及抗债斗争迅速开展。以上南区、沿海区赤卫队为主体的福鼎县委独立营，在营长陈宝鼎的指挥下，经常在冷城一带打土豪，袭击催逼捐债税兵，有力地支持了农民的“五抗”斗争。1933年11月，中共福鼎县委遵照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指示，迅速制定武装起义计划，分头组织农民队伍。黄淑宗、叶秀藩、陈宝鼎等分别深入冷城、彭坑、万堡等10多个乡村，以各乡村赤卫队、抗租团等群众武装团体为主要力量，带动民众准备起义。1934年2月7日，叶秀藩、陈宝鼎等率领冷城赤卫队和屯头、日奥等村群众400多人，在岗亭打土豪，分田地，为起义队伍筹粮筹款。

3月19日傍晚，陈宝鼎、陈建安、叶秀藩等率领各乡起义队伍1000余人，肩扛鸟铳、土炮、梭标、大刀等武器，在冷城举行起义。起义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除捐灭税、分田分粮”等口号，并缴获部分枪支弹药，革命武装队伍得到发展。20日凌晨1时多，陈建安、叶秀藩、蔡加城、陈建云、陈宝鼎等率领800多名队员向青坑、福安塘一带进发，中共福鼎县委妇女协会主任蔡爱凤组织30余名妇女参加救护工作。

3月20日，驻秦屿、店下的国民党军分3路“进剿”冷城地区，起义队伍虽经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打散。起义失败后，叶秀藩返回闽东。陈宝鼎等人将参加起义的赤卫队独立营70余人转移到番溪大洋、海洋及霞浦十一萝等地，与霞（浦）（福）鼎游击队伍会合后，成立霞鼎独立营，并发展扩充为闽东工农红军第5团，后又改编为鼎平独立团。

小源起义

1934年4月24日，中共赣北特委在浮梁县小源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1年冬，中共赣东北省委为实现恢复浮梁苏区的计划，曾派高明亮等到浮梁小源一带进行秘密活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33年，中共浮乐婺中心县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共对小源地区的领导，在群众中加紧训练武装力量，为小源起义作准备。1934年4月初，中共赣北特委机关移驻浮梁小源石村里。15日，特委主持召开了党员和群众骨干参加的工作汇报会，分析形势，确定行动计划。会后，全体骨干分别到桃岭、斗岭、江峰、烁山等地进行发动工作。特委领导成员周成龙等先后到荣山岭、桥溪，处决了反动民团头目潘致中和民愤极大的国民党区长李能珠，鼓舞了群众斗志。

4月24日晚，小源农民举行起义，当即镇压了与反动派相互勾结、一贯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大恶霸朱养桥、朱步青父子。接着，又在东埠街及附近各村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打土豪斗争，没收了大批物资。然后，起义群众又配合赣北红军游击大队摧毁了牛家项、铁索桥、锦溪、曹村4个敌军据点，使起义进入高潮。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中共赣北特委和在浮梁县境的中共河东县委在小源召开大会，600多贫苦农民携带土铳、大刀、梭标等武器参加。特委领导号召农民群众拿起武器，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平债分田等。并宣布在小源正式成立中共河东县第4区委员会，书记高明亮；建立河东第4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朱裕新。

越西起义

1934年5月10日，西康省（今属四川省）越西县彝、汉族的农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军阀的残酷统治和压榨剥削，自发地举行了起义。

越西县主要居住着彝、汉两族人民，在军阀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下，彝、汉人民对军阀切齿痛恨，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川工农武装斗争的影响下，王义芳、蒋明远等人开始在越西发动群众，秘密酝酿武装起义。不久，便在王家屯、大瑞、保安、海棠等地发展了一大批彝、汉族贫苦农民武装。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争取了王家屯驻军两个排长及部分士兵对起义的支持。王义芳等人还对当地彝族头领、很有名望的兹木达曲开展工作，争取他参加起义。

1934年5月10日，以王家屯为中心的越西起义开始了。这天，正是王家屯东岳庙庙会的日子，起义部队夹在群众当中进入王家屯。正好敌驻军连长去了越西县城，支持起义的排长以种菜为名将士兵带出营房。王义芳、蒋明远带领起义部队从后墙进入敌连部，夺取枪支30多支，正待去库房夺取弹药时，被敌发现，遂发生激烈枪战。敌人组织全连兵力向起义部队反扑，并调来1个连的兵力增援。起义部队英勇作战，击毙了前来增援的敌连长，使敌不敢贸然前进。为了摆脱越来越多的敌兵，当夜，起义部队向河东高桥方向撤退。

在王家屯起义的同时，文登朝等人领导彝、汉起义军在保安、廖坪、梅子营等地响应。12日，各路起义部队在王家屯汇合后，由蒋明远等人带领向越西县城进军。沿途群众纷纷加入起义行列，起义部队越来越大。当晚，起义部队包围县城，发动猛烈进攻。由于敌人顽固抵抗，起义军火力不济，久攻不下。15日，驻西昌的刘元琮旅1个团向越西开来，在敌人的夹击下，攻城战斗失败。

越西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刘文辉的统治，在彝汉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越西时，分散隐蔽下来的起义人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游击队，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南西亭起义

1934年6月28日，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福清县委在该县南西亭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2年7月，中共福清县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后，遵照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指示，把革命重点由城镇转向农村。1933年春，福清特支书记何文成到龙田地区建立了中共龙田支部，发展共产党员，组织农民协会，准备武装起义。1934年1月，中共福清县委成立。3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会后，县委书记何文成、委员何胥陶等到龙高地区活动，在江镜、玉沁、玉瑶等村组织农会，发展武装，为起义做准备。6月，中共福清县委在南西亭召开筹备会，研究确定起义时间、地点和武器配备等问题。

6月28日上午，何文成将参加起义的1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编成1个连3个排，陈吓顺任连长，池金銓任副连长，何文成任总指挥。下午2时多，南西亭起义开始。起义队伍高举红旗和“中国工农红军福建游击队闽南第2支队”的队旗，扛着大刀、长矛和各式枪支出发，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不断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等口号。斗争进行3天。起义队伍先后在观元、塔石、山兜、蟹屿、海头5个村庄斗地主、斗土豪、斗高利贷者，收缴长短枪20余支，子弹1000多发，分粮分钱分财物，焚烧田契、债据，起义取得胜利。

国民党福清县县长得知南西亭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火速纠集五六十名军警和部分地主武装包围了南西亭。何文成等带领队伍冲破包围，分散隐蔽。几天后，何文成、何胥陶等人集中队伍正准备举行北西亭起义时，何文成、何胥陶不幸被捕牺牲。为保存实力，部分队员分散隐蔽，转入地下从事秘密活动。

际村起义

1934年8月2日，中共安徽黟县县委根据闽浙赣省委书记方志敏给皖南特委的指示，在黟县际村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1931年，黟县已有共产党的组织。1932年12月，成立中共黟县县委，书记余纪一。1933年春，县委已组织了一支游击队，队长吴根应，政委余纪一。不久，游击队袭击了关麓团防局，缴枪10余支。之后，又组织了第二支游击队。同年6月，县委决定把各村70余名农民游击队员编成第三支游击队，号称“皖南第一游击大队”，陈天生为队长（后叛变），余纪一兼政委。

1934年3月1日晚，中共皖南特委军事部长宁月生和特委交通储集祥来到黟县际村，带来闽浙赣省委书记方志敏给皖南特委的指示信，指示余纪一等在8月1日举行武装起义，与省委即将派出的以宁春生为政委的300余人的挺进师会合夺取祁门，以积极配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由于指示信8月1日晚才送到，起义难以按预定时间进行，余纪一和宁月生当即召集当时在际村的舒政海、王子成、陈天生、储集祥等负责人会议，决定2日晚上在际村举行起义，夺取国民党驻际村保安中队的武器，起义后游击大队与挺进师会合，去攻打祁门县城，起义由余纪一总负责，军事上由宁月生指挥。

8月2日傍晚，宁月生带领游击队假装纳凉闲逛，三三两两地分布在保安中队及区公所周围。余纪一发出行动信号，宁月生立即派队员佯装找同乡刘班长，卸掉了保安中队哨兵的枪。分布在四周的游击队员乘势冲进保安中队的住房，一枪未发，解除了保安中队30多人武装，缴获步枪23支，短枪3支，中队长毛勋见势不妙逃跑，其余被俘士兵经教育后遣散回家。

由于游击队疏忽联络，各部失去联系，未能执行在际村岭头伏击敌人和攻打石亭区公所的计划，队伍撤到黄梓坑一带。起义后，余纪一按计划一面邀集地方乡绅汪松涛等人连夜联名致函国民党黟县政府报告枪支被劫一事，一面派人去县城察看敌人动态。黟县县长庄继先获报，和保安队大队长陈兴周率两个连的兵力，于次日拂晓前到达际村。他们先怀疑这是太平县观音堂土匪所为，围剿了这股土匪，后又怀疑是游击队干的，但查不出结果，第三天便收兵回城。

中共黟县县委派储集祥向皖南特委报告起义情况，不料储在途中被捕，供出了游击队、特委及暴动情况。庄继先一面再次派兵，由储集祥带路返回际村，准备向游击队活动地区黄梓坑等地进剿，一面密报南昌行营和安徽省政府求援。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余纪一派人去黄梓坑报警，使游击队安全转移，打入区公所内部的共产党员也都奉党组织指示撤离。

柯村起义

1934年8月21日，中共皖南特委和太平中心县委领导和发动了以柯村（今属黟县）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

柯村原属石埭县，位于黟县、祁门、石埭、太平四县边陲。1930年9月，柯村即有了共产党的活动。1934年初，建立了中共太平县委，书记韩锦侯；同年6月，中共皖南特委派刘毓标到太平，随后成立了中共太平中心县委，书记刘毓标，隶属于中共皖南特委，工作范围包括太平、黟县、祁门、石埭、泾县等地。

1934年皖南遇到大干旱，眼看秋收无望，地主仍要农民交现钱代租谷。面对地主逼租逼债，各地党组织纷纷提出武装起义，解决农民疾苦。7月，中共太平中心县委召开会议，决定因势利导，在抗租平债的基础上，准备武装起义。会后，中心县委向皖南特委和闽浙赣省委作了关于举行起义的报告，并要求省委派武装和干部支持。省委很快指示中心县委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心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对起义的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之后，各地纷纷准备起义工作。柯村一带搞得轰轰烈烈，引起了敌人的注意。8月中旬，中心县委地下交通曹丫头在送信途中不幸遇难，被敌搜去密信，走漏了起义的消息。中心县委得知后，立即召开会议。恰好此时宁月生带着际村起义的游击队赶到，中心县委决定提前起义，并成立起义指挥部，韩锦侯为总指挥。

8月21日深夜，起义全面举行。柯村、杨家墩、乌头坑、新棚一带3200多农民在100余名党员的带领下，向地主、豪绅发动进攻。起义队伍手持大刀、长矛和土枪，先后镇压了黟县自卫团团总汪晓堂和豪绅胡炳希等，缴获地主枪械300余件，推翻了当地国民党基层政权。9月初，闽浙赣省委派出红军游击大队在攻打祁门县城之后，由游击大队政委宁春生带领进入柯村地区，在茅山岭击溃了国民党太平县保安队，壮大了起义声势。中心县委机关也迁到柯村，下辖太平、石埭、黟祁、泾县、青阳五个县委、18个区委、68个支部，党员300余名。游击大队迅速扩充为4个中队，农民团、地方游击队由秘密转向公开。中共石埭县委在柯村召开群众大会，有400余人参加，成立了柯村农民团。以柯村为中心的黟、祁、石、太边的56个村庄也相继组建农民团，有4000余农民参加。地方游击队发展到600余人。10月，皖南苏维埃政府在柯村成立，宁春生为主席，方再兴为副主席，下设财政、供给、土地等八个部。接着，各县、区、乡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同时，以宁春生带来的红军游击大队为主体，吸收一批地方游击骨干，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皖南游击大队，县、区、乡也建立了游击武装。此外，还建立和发展了农民团、赤卫队等群众性军事组织。

柯村起义后，国民党地方武装多次派兵清剿，宁春生、刘毓标等率领皖南红军游击大队在农民团、赤卫队的密切配合下，与敌进行了10余次战斗，毙敌70余人，俘敌60多人，缴各种武器600余件；创建了东起黟县方家岭，西至石埭赤岭（今属祁门县），南到祁门历口，北抵石埭七都，方圆百余里的红色区域。

周墩起义

1934年10月30日，在中共闽东特委的领导和闽东红军独立师的支援下，福建省宁德县周墩地区的游击队员和农民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1932年，闽东各地特别是与周墩相邻的福安县，掀起了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抗债的斗争热潮，周墩地区的农民深受鼓舞与教育。在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下，王大尧、李宏伦、肖安轩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中共周墩党小组。1933年春，福安中心县委委员占如柏到周墩指导工作。受周墩共产党组织的影响，附近的浦源、紫云、端源、萌源、江源、七步、溪头、李墩等村庄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组织。1934年2月，周墩游击队成立，中共党员凌福顺、吴少安分任队长、政治指导员。此外，周墩区的萱园坪、黄家山、溪头等地有福安中心县委领导的闽东游击队第4、第5、第7支队。附近村庄也相继成立贫农团、分粮队、工农联盟队和工农赤卫队等革命团体和武装队伍。4月，中共周墩县委在周墩成立，负责人肖安轩。

7月，中共闽东特委委员占如柏再次到周墩指导工作，研究部署了如何进一步建立武装，筹备经费，把握时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接着，周墩游击队改编为闽东工农游击队第11支队，队长凌福顺，政治委员王大尧。到9月，游击队发展至80余人。

为在周墩举行武装起义，周墩党组织很早就注意在驻周墩的警察所和后备中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了一批贫苦士兵作为兵运骨干，为里应外合创造了重要条件。

9月，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控制了周墩地区至宁德县城联络的通道。10月27日，闽东红军独立师攻占咸村，收缴了民团的枪支，处决了土豪劣绅中的首恶分子。28日夜，闽东工农游击队第11支队召开骨干会议，决定10月30日举行武装起义。29日夜，凌福顺带领游击队在内线的接应下，解除驻周墩警察所和后备中队的武装。

30日凌晨，周墩起义开始。凌福顺率领的第11支队以及来自各村的1000余名游击队员和群众，在闽东红军独立师和闽东游击队第4、第5、第7支队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各交通要道，攻进周墩城内。为进一步打击反动势力，各游击队乘胜开赴浦源、七步、洋头、李墩、贡川、礼门等地，收缴了地主民团部分枪支。第11支队还配合闽东独立师清剿后门山山厂里的敌后备队第2排，俘缴30余人枪。周墩武装起义，摧毁了国民党宁德县第5区公所和警察所，解除了后备中队武装，缴获长短枪110余支，子弹数千发。11月1日，在叶飞主持下，在周氏宗祠成立了周墩苏维埃政府，推选周愚弟为主席。

怀远起义

1934年10月，在中共川南特别支部的组织发动下，国民党军第28军第2路驻崇庆县怀远镇第5团的1个营发动兵变，举行了起义。

1932年底，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利用红四方面军入川的大好时机，积极发展农民武装斗争和策动士兵起义。1934年2、3月间，中共川南特支派共产党员严景鸿、孟鹤松等先后到崇庆县怀远第28军第2路第5团组织发动士兵起义。他们在该团第2营开展兵运工作，发展该营8连班长李杰、士兵王汉等人入党，建立了2个共产党支部，孟鹤松、李杰分别担任支部书记。9月，中共川南特支分析了形势，认为第5团的兵运工作很有基础，具备了起义条件，决定以驻毛郎镇第1营第3连为突破口，成功后，再返县城接应其他连队。10月的1天，第3连举行起义，镇压了连长邓从文及其他反动军官、军士多人，缴获了该连的枪支弹药。起义胜利后，召开士兵大会，宣布成立红军，开往怀远镇。翌日凌晨到达北门，直奔第1营营部和1、3连驻地。营长陈敬能、第2连排长白殿帆等逃跑。第1营起义进展顺利。但在进攻第3营和团部时受阻。为保存实力，起义队伍转向邛崃，遭敌重兵围堵，在撤往大邑山区途中，党支部书记李杰被捕，起义队伍被打散，余部进入芦山、宝兴一带，因弹尽粮绝，大部被敌人收编，少数人转移到邛崃地区参加抗捐斗争。

青神西山起义

1934年12月14日，在中共四川省青神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青神、夹江边境的西山地区举行了起义。

1927年春，中共青神特支建立，1928年下半年扩建为县委。之后，县委大力发动群众，在各乡建立农民协会，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游击队、赤卫队。1934年，全县有共产党员183名。9月，建立了中共青神中心县委，许本达任书记，刘怀、邱骏、毛慈影、邹望、段玉章任委员，决定在群众较好的西山地区举行农民起义。12月13日晚，中心县委召开骨干会议，决定趁梧凤乡团正罗明山建房宴客之机举事。14日晚，300多名农民武装在西山起义，包围了罗明山的家，镇压了罗明山，缴了团丁的枪支弹药。接着，捣毁了3个乡公所，击毙团正、冬防队长等4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没收了9户土豪劣绅的粮食和财产。后起义队伍遭到青神、夹江、眉山民团和驻军2个连兵力的“围剿”，许本达、段兆麟等7人牺牲。毛慈影、邱骏等20多人被捕后遭杀害。

宛西起义

1934年至1936年间，共产党员张明河、吴怀三等人河南省西峡、邓县、内乡等地相继发动宛西4县民众自卫团的部分成员和农民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

宛西指南阳的西峡、内乡、浙川、邓县广大地区。1934年初，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河南南阳籍共产党员张明河、曹云阁、王正朔、王正今、张书超等人相继回到家乡南阳，开展革命活动。在南阳、内乡、镇平、浙川、南召、唐河等地，先后联络和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群众骨干，并在当地地方民团中争取了一些头目，掌握了部分武装。同年秋，张明河等人决定在宛（南阳的简称）西的西峡、邓县、内乡发动起义。首先决定在西峡除掉宛西民团司令别廷芳等，夺取民团武装，成立“红军独立师”，开辟豫西南伏牛山区革命根据地。同时，成立起义委员会，并分头进行准备。11月上旬，当起义准备实施时，因叛徒告密，10多名主要起义成员被别廷芳逮捕杀害。张明河等人决定改变斗争方式，于1935年初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武装便衣队，由吴怀三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为了能尽快地与邻近的鄂豫皖或陕南红军取得联系，他们又决定在鄂豫边界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的邓县西部地区发动武装起义。1936年3月，张明河、吴怀三率领便衣队员袭击了邓西九重堰区公所，击毙区长陈约生等3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接着，收编了土匪朱建波的百余人枪，使队伍迅速壮大。3月底，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保安处急调保安第2团到邓县“清剿”，起义队伍趁敌分散之机，集中兵力伏击了第2团1个营，当场毙敌百余名，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轻机枪1挺。战斗结束后，起义队伍公开打出了“抗日救国军豫鄂陕独立大队”的旗帜。当地群众纷纷参加起义队伍，很快使起义队伍壮大到2000余人、上千条枪。

起义队伍壮大以后，在鄂豫边界开展游击战争达半年多，牵制了国民党军的一个正规师（第95师）和大批保安团与民团武装，有效地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和陕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11月中旬，起义队伍遭到国民党军第95师李铁军部和国民党河南省保安第2、第3团的突然包围。起义队伍据寨坚守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伤亡惨重，被迫突围。突围出来的少数部队在转移途中，又多次遭到敌军的追杀。为了保存实力，待机再举，吴怀三将部队化整为零，起义队伍解体。

高石坎起义

1935年1月8日，在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的组织发动下，驻剑阁的国民党军1个连举行了，起义。

1933年，为配合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共四川省委派军委委员侯伯英打入驻崇宁（今并郫县）的第28军第8混成旅从事兵运工作。侯伯英发展该旅第2团第6连连长李奇柱等为共产党员。是年冬天，省委派叶伯刚接替侯的工作。10月，发展该连士兵吴建初、郭林森等为共产党员。1934年春，省军委派共产党员阮自强、熊子祥、王云武等到6连当兵，帮助该连成立了共产党支部，阮自强任书记，吴建初任组织委员，熊子祥任宣传委员。10月，第8混成旅由崇宁调防剑阁嘉陵江西岸张王庙。第2营驻高石坎、帽盒山一带。这时，第2团第2营对第6连连长产生怀疑。该连共产党支部决定于1935年1月8日晚举行起义，方案是李奇柱率领第1排攻打第5连，吴建初指挥第2排向第3营警戒，李钰焯带领第3排协同攻打营部，挟持第7连，阮自强坚守渡口，联系信号为连响3枪。1月8日后半夜，起义开始。吴建初杀死第2排排长，但遭该排第5班班长开枪阻止，原定不响枪的计划落空。李奇柱和熊子祥打死2名反动士兵，第3排和第1排也分别在郭林森、李钰焯等的带领下开始行动。次日凌晨3时许，团长汪良调动第1、第3营从南北两路向起义队伍逼近，因当天雾大，敌人不敢冒然进攻。李奇柱、阮自强等率50多起义士兵渡江后到达川陕苏区，被编入红军，开始新的战斗历程。

冀南起义

1935年1月13日，在中共赵（县）、冀（城）、栾（城）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冀南农民举行了起义。

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统治与压榨，九一八事变后，赵、冀、栾中心县委发动共产党员和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租、分粮吃大户、增加雇工工资等斗争。广大群众踊跃参加共产党和革命队伍。至1934年12月，冀城就有79个村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有400多名共产党员。赵县和栾城两县也有130多名共产党员。12月3日，赵、冀、栾中心县委决定将参加起义的300多名成员分为东刘村，南、北楼贾村，马庄、岗上、力羊3个战斗区，中心县委书记朱诚任总指挥，程熙任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东刘村战区共产党员刘老振家。指挥部要求各战区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1935年1月13日，冀南农民举行起义，各个战区在马成安、李小车带领下，冲进保卫团驻地，夺取了部分枪支、粮食和财物，打死地主刘老顺。但因寡不敌众，起义人员伤亡较大。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更大损失，总指挥部决定撤出战斗，转入隐蔽斗争。

云阳起义

1935年1月19日，中共四川省云阳县委领导和发动工农群众在该县城关举行了武装起义。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在上海读书的革命青年赵唯等回到云阳，积极组织革命活动。1932年，在云阳建立了第1个中共支部，并建立了“三友社”、民团指挥部及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1933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派共产党员谭林、邓友民、孔繁祜等人回到云阳组织工农武装起义，先后在盘石、云阳城关镇建立了中共支部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云阳青年反帝大同盟。共产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建立了10个党支部，有近百名共产党员。1934年秋天，谭林、陶闾、赵唯等成立了中共云阳工作委员会。通过做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和派人打进民团等方式，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掌握了一部分武装。云阳工委成立了“云阳工农武装暴动委员会”，制定了起义计划。1935年1月19日上午，100多名起义人员在城关镇集合，晚9时，在赵唯、张建武的率领下，攻打县团防局。但因参加起义的人员军事素质差、武器不好等原因，伤亡很大，起义领导人被杀害，几十人被敌人逮捕。为保存革命力量，云阳工农武装暴动委员会决定停止进攻，剩余人员分散隐蔽。

郑家村起义

1935年1月29日，中共安徽贵秋（贵）东中心县委领导以贵池郑家村为中心的农民武装起义。

1934年底，中共贵秋东中心县委决定在土豪绅士忙于过年的时机举行起义，并在贵池的留田开办骨干训练班，为举行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935年1月下旬，贵秋东中心县委书记夏金良到钱坑区，与区委书记闻宗周商定，在农历大年除夕（公历2月3日）晚上举行起义，夺取枪支武装自己。不料叛徒泄密，夏金良等决定立即起义。

1935年1月29日，一支800多人的农民团队伍，携带土枪和刀、矛等武器聚集在郑家村祠堂宣布起义。他们竖起大旗，砍断电话杆，接着捉获了土豪柯茂林，收缴了2支手枪。第二天，农民起义队伍在郑家村召开几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闻宗周在会上号召大家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2月1日，农民团与皖南红军独立团在大井边会合。这一天，农民团约2000人以郑家村为中心，包括虎山胡家、东岗、洪水潭、高山、九步岭、石岭等地同时举行起义，将这些地区的地主豪绅及乡、保长统统抓了起来，把他们的粮食和年货分给贫苦农民。高宝山地区（今属石台县）也召开动员大会，举行起义，两次到桐坑（今属石台县）打土豪，分了他们15000斤粮食。起义还波及到贵池南部的龙池、许桥、刘街、梅村、留田一带，处决了一些地主、恶霸，分了他们的粮食和衣布。以郑家村为中心的起义举行后，在贵池留田苗竹柯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2月5日，丁香树、牌楼、高坦等地的反动武装和贵池县中队，在安庆国民党军独立营的支持下，对起义队伍进行镇压。此时，北上抗日先遣队已在太平县谭家桥受挫，红军主力撤回赣东北，农民起义队伍失去红军的支持，与敌周旋9天，最后在贵池县湖山失败。

天宝山起义

1935年2月23日，在中共凤村支部的领导下，四川屏山县天宝山的农民武装举行了起义。

屏山是川南边缘的一个山区县，这里的贫苦农民在军阀、地主豪绅的压榨剥削下，生活极为困难，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非常欢迎共产党在这一带的革命活动。1935年初，中共凤村党支部书记刘本昭，为贯彻执行上级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牵制敌人，迎接在黔北作战的中央红军的指示，与共产党员胡立本研究决定在天宝山举行起义。2月23日，国民党利店区公所的两名团丁到凤村催交捐税，与农民发生冲突，这两名团丁被农民捆绑。刘本昭趁机号召农民群众起来抗捐抗税，宣布举行起义，打出了“川南工农游击队第4纵队第5小队”的旗帜。凤村乡乡长肖善之闻讯后，即组织民团连夜向天宝山农民起义队伍进行围攻。24日晨，起义队伍在刘本昭和胡立本的带领下与民团展开激战。起义人员由于未经过训练，军事素质差，加之武器低劣，在撤退中被打散，起义失败。

石鼎山起义

1935年3月10日，在中共泸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四川合江石鼎山农民举行了起义。

1935年1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常委李清泉为特派员，去合江和赤水（属贵州）相机组织武装起义，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入川。李清泉秘密到达合江县石鼎山共产党组织的联络站红岩子后，便以教书作掩护，秘密发动群众，与当地的共产党员袁崇杰、贾审修接上了关系，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李清泉利用倾向革命的民团中队长余德章、分队长冯吉的关系，积极在民团开展兵运工作。3月上旬，民团和赤卫队在共产党关于“破仓分粮，迎接红军”的号召下，已充分发动起来。李清泉等决定立即起义。10日晚，余德章率民团第1分队举行起义，前往黄大桥与第2分队会合。第1、2分队会合后连夜向石鼎山挺进。泸县中心县委特派员杨其生和冯吉率第3分队和赤卫队一部前往赤水大同镇，夜袭区公所，全歼民团1个区队后返回石鼎山。李清泉、袁崇杰率赤卫队一部打土豪、分田地。11日午后，各支起义队伍在石鼎山胜利会师。12日上午，公审枪决了恶霸地主刘丕平，宣布成立“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有200多人。杨其生任队长，李清泉任政治委员，余德章任政治部主任。后在敌重兵“追剿”下，游击队转战于石鼎山崇山峻岭中。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损失很重，人员锐减，4月上旬，游击队在马草坪遭敌包围，杨其生牺牲，队伍被冲散。李清泉等决定将游击队解散，自行隐蔽。

直南起义

1935年春至1936年4月，在中共河北省委和直南特委的领导下，直南20余县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通称直南起义。

河北省直南地区辖任县、巨鹿、平乡、威县、广宗等20余县，这些地区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化，当地人民主要以淋硝盐为生，国民党当局成立盐巡缉队对农民敲诈勒索，实施苛捐杂税，广大农民生活极为困苦。1934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指直南特别委员会）领导直南各县人民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直南特委书记李菁玉，委员张霖之、马国瑞、刘子厚、王伯华等多次召开会议，决定动员群众，筹措枪支，建立武装。至1935年7月，仅滏阳河以西地区就建立了有100余人、60余支枪的革命武装。同年秋，直南地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共300多人。10月，全歼曹家庄民团局，缴枪8支，子弹一批。不久，又袭击了南宫县王道寨警察局，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至11月，全部拔掉南宫、巨鹿一带国民军的据点，并相继建立了几个游击支队和盐民游击队。1936年1月28日，直南特委根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的指示，将各支游击队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1军第1师，刘子厚任师长，王光华任副师长，有近千人、800多支枪。国民党当局对此极为震惊，蒋介石令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派3个师，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疯狂地围攻捕杀起义人员。直南特委根据河北省委指示，在巨鹿县召开会议，决定暂时隐藏起来。会后，直南特委领导人李华生、刘子厚、张霖之、马国瑞等分别在直南各县隐蔽起来，其余起义人员或投靠亲友或到外地谋生。起义失败。

高笋起义

1935年5月10日，在中共嘉定（今乐山）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四川省屏山县高笋乡（今属沐川县）的农民武装举行了起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转战云贵川边境。为配合中央红军入川作战，中共嘉定中心县委决定在高笋乡举行起义。之后，派领导过青神西乡农民起义的共产党员赵启民、段玉章到高笋乡加强领导。同时，发展农民张玉清和炭厂职员钟福兴为共产党员，建立了农民协会和炭厂煤业工会。4月下旬，赵启民、段玉章成立了“川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四川第4路红军游击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前者有委员25名，张玉清任主席，钟福兴、费熙延任副主席；后者由张啸涛任主席，王正海任副主席，段玉章任政治部主任。为培养武装骨干，举办了训练班，张啸涛任教员。还争取了少数民团团丁，掌握六七支枪，作好了起义的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5月10日拂晓，起义队伍100多人分两路行动：一路60多人在张玉清率领下进攻高笋场，占领了乡公所，解救了被关押的农民协会负责人刘世友，没收了乡长莫明的财产；另一路约40人在张子林带领下包围了团总李如珍家，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和土炮，没收了部分财物。两路队伍会合后，遭到民团的镇压，队伍边打边撤。不久，分散隐蔽到深山密林开展游击活动。

平关起义

1935年6月1日，在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策动下，驻安顺国民党军第121师第4团第12连一部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后，在贵州成立了省工委。不久，建立了贵州省工委军事小组。省工委根据中央“面向贵阳、遵义，背靠云南”，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在驻安顺黔军中策动兵变，建立游击队，开辟革命根据地，以策应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4月，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到安顺，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不久，该支部扩大为工委，主要任务是策动兵变。驻安顺第121师第4团第12连连长丁沛生，是共产党员、省工委军事小组成员。省工委指示下达后，安顺工委书记谢速航与丁沛生商量制定了起义计划。丁沛生向骨干进行动员，使广大士兵认识起义的意义，不久，丁沛生奉命率两个排去盘县押送军饷，于6月1日完成任务部队途经关岭县关索岭和贞丰县平街时宣布兵变。丁沛生提出在盘县地区所属的8个县，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受到士兵拥护。同时打出了“中共黔西游击纵队第7支队”旗帜，丁沛生任大队长，王芸生任指导员。遵照省工委指示，丁沛生、王芸生率起义部队，在滇黔公路两侧和北盘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打击土豪劣绅，把没收的粮食、钱物分给贫民。这些斗争活动深受当地群众拥护，青壮年踊跃参加游击队，队伍发展到500多人。第121师对此十分惊恐，派1个正规团兵力，在当地民团配合下对游击队进行“围剿”，丁率部转战黔西，遭受重大损失。1936年初，当第7支队在关岭县一个小镇宿营时，被国民党军包围，丁沛生在战斗中负伤后获救，游击队伤亡很大，余部溃散。

蔡小庄起义

1935年7月1日，在中共直鲁豫边特委的领导下，河北省大名县蔡小庄农民举行了起义。

1929年，蔡小庄建立了共产党小组，1930年5月建立了中共党支部。1933年，中共直南特委特派员王从吾到蔡小庄、西代固等村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发展共产党员。至1935年春，蔡小庄一带村庄建立了10多个中共支部，有120多名共产党员。1935年，这一地区遇到严重旱灾，地主豪绅乘机掠夺农民的土地，国民党当局派了拉夫，派款加税，广大农民生活极为困苦，迫切要求抗租、抗债，反对压榨剥削。6月底，直南特委会特派员王从吾在蔡小庄召开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1日，蔡小庄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农民，在特派员王从吾和蔡小庄党支部书记王学林的领导下举行起义，缴地主枪20多支，并开仓分粮、分财物，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队伍的积极性，起义队伍扩大到六七十人。次日，双庙村、西代固村的共产党支部派30多人支援蔡小庄起义，起义队伍扩大到100多人。当日晚成立起工农北上抗日游击队，王学林任队长，杜均任政治指导员。5日，国民党当局派一部分骑兵并纠集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围攻游击队，因寡不敌众，起义队伍在突围中被打散。

金竹起义

1935年8月13日，在中共淳安县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在安徽歙县南部的金竹地区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起义。

金竹村，位于安徽歙县南乡，东南与浙江淳安毗邻。1933年，中共闽浙赣省委派江西红军干部到安徽歙县南乡的竹筒坦、三阳、瓦上、金竹和浙江淳安的闻家、合富等地开展革命斗争活动。1934年8月初，皖南特委决定成立歙县中心县委，把歙县划为歙南、歙西县委，陈直斋为歙南县委书记。1935年初，中共淳安县委成立，隶属歙县中心县委领导。到1935年4月，歙县、淳西地区建立了100多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2000多名，普遍建立了红军组织，红军游击队达3000余人，对敌斗争由原来的秘密活动逐步转入公开。

1935年8月8日，歙县和淳安县委领导及游击队领导在歙南汪祖山村召开了会议，决定8月13日在金竹举行武装起义，李春海为总指挥。8月11日，徐樟顺、方志雪等人率领淳西游击队280多人，翻山越岭赶到歙南朱村，与李春海、张达、方忠正等人率领的队伍会合。翌日，召开誓师大会。李春海报告武装起义的意义，宣布了起义队伍的组织领导。整个起义队伍编为一个连，方忠正任连长，李春海任指导员，张达任副连长。同时还成立了宣传队，张和顺任队长。

8月13日，金竹起义正式开始。400多名起义队员佩戴符号，高擎红旗，攻进金竹村，活捉大土豪方大坤，烧毁方大坤霸占的祠堂、帐册，缴获祠堂租谷300多担。金竹起义初战告捷，四乡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队伍采用长途奔袭的战术，进攻杭（州）徽（州）公路干线上的三阳坑，占领了乡公所，击垮了壮丁队，砸开了“洪顺泰”、“洪裕泰”、“歙星公司”三家土豪商店。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壮丁队员数名，缴获黑灰布几十匹，白洋2000多块，砍断电线杆10多根，缴获电话机一部。8月16日，起义队伍开进福泉山边休整边训练，赶制了军衣、军帽、旗帜、符号，制作和筹备武器弹药。同时，对起义队进行了整编。除留120多名青壮年队员按正规红军编制编为一个连外，其余队员每人发一顶军帽作纪念，让其各自回家。

8月19日，国民党歙县保安队的两个中队向福泉山围攻。李春海为避强敌，率领部队向浙江淳西方向挺进，打了金竹岭脚村的土豪，烧了祠堂的地契、帐册，收缴鸟铳10余支，开仓分粮，将100多担稻谷及衣物分给穷苦农民。8月21日，起义队伍击退国民党淳安县两个基干中队，按原计划前往庄坞与木壳枪游击队会合，但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负责人被捕，游击队已转移它地活动。李春海决定起义队伍向河村、水碓山（今属浙江淳安县妙石乡）方向进发，继续打土豪，帮助贫苦农民度过灾荒。

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各地兵力继续“清剿”。歙县保安队、淳安县保安队和浙江保安第八大队共近千人分三路围攻驻水碓山的起义队伍。8月25日凌晨，保安第八大队两个连及河村壮丁队200余人向水碓山围攻。李春海率领起义队伍利用山高林密的险要地形，诱敌深入，击退敌人的围攻，并乘机向南方向撤退。李春海等领导根据敌强我弱，兵力悬殊过大，起义队伍缺乏枪支弹药的严峻形势，为保存革命力量，等待时机，作出了立即撤出阵地，化整为零，疏散隐蔽，由公开的武装暴动转入隐蔽分散的游击斗争的决定。当晚，起义队分散隐蔽。随后，国民党保安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清剿，李春海、

徐樟顺等 23 名起义队员惨遭杀害，张达等 53 名起义队员被捕。致使起义队伍最后失败。

高山起义

1935年9月12日，中共江南特委在红军独立团的配合下，发动了以安徽东至县高山地区为中心的联合大起义，起义群众达5万人。

1935年6月，中共江南特委在东至县高山成立。江南特委成立后，即成立了中共贵秋、贵东、贵祁三个县委，余文先兼贵秋县委书记，县委地址设在高山。在成立江南特委的同时，皖赣红军独立师留下部分兵力和皖赣游击大队、皖赣边区的红军长江游击大队整编为红军独立团。

为做好高山起义的准备工作，江南特委在谢坂乡、红溪乡、红桥乡、冯坝乡等分别建立了一支10至30人左右的农民游击队，还建立了5个赤卫中队和农民团。之后，特委举办了区委负责人、支部书记和积极分子的训练班；对广大农民进行宣传和教育，号召穷苦农民打倒土豪、分田地。与此同时，在高山地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斗争豪绅地主，没收财产，收缴枪支弹药，焚烧田契、借据。高山地区的土地改革对周围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也产生很大的影响，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在东到源头李家、过王田、占波、大堰、栗阳街、沙山、波里、洪水团，南到姚黄、麻石岗、白水张家，西到高低岭、马田、张溪镇、八都，北到青峰岭、贛田、湖田铺、殷家汇的广大乡村都实行了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的风暴席卷整个贵秋东地区。江南特委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领导贵秋东人民举行中秋起义。

1935年9月12日起义开始。贵秋县委领导的秋浦北山欧村2000多人，携带土枪、刀、矛、叉、棍等武器，进行示威游行。这个县第二区公所辖三个乡，拥有武器的千名群众队伍，也开始了打地主豪绅的行动。贵东县委领导的牌楼八一大南冲、东冲、烈山等地都召开了较大规模的会议，特委、县委负责人在会上号召打倒土豪劣绅。这一天，以高山为中心，东自贵池的狮茅岭，西至东流的白水张家，南起秋浦的鸡头岭，北至贵池的鸡公岗的纵横七八十里的区域内，起义的群众达五万人以上，该地的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均被摧毁。

起义胜利后，成立了江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欧阳斌。同时，成立贵秋县苏维埃政府，欧阳斌兼主席；贵东县苏维埃政府，张士其任主席。在特委拿起武器武装保卫根据地的号召下，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加江南红军独立团。贵东、贵秋、贵祁三县都成立了游击大队，区、乡都成立了游击队和赤卫队。为了更有效地与地方反动武装作斗争，特委又从红军独立团中抽调50余人，作为军事骨干分配到三县游击大队中，各游击大队又统称江南红军第1、第2、第3游击大队。共140多人。

起义后形成了东起丁香树，南达雁落坡，西到高低岭，北抵殷家汇，纵横百余里，人口数万，横跨贵（他）、至（德）、东（流）、祁（门）、石（台）五县的红色根据地。

胶东起义

1935年11月29日，中共山东省胶东特委在该省东部的文登、荣城、威海、牟平、海阳等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胶东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自发的农民斗争此起彼伏。为领导胶东人民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共胶东特委对胶东的土地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发动。1934年8月15日，山东省团工委（山东省委遭破坏后由团工委暂时主持省委工作）指示胶东特委，应立即组织武装起义，建立游击队和胶东苏区。10月25日，胶东特委分析了胶东各县的客观条件，部署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35年夏，胶东特委在荣城石岛举办军政训练班，培养起义骨干。8月至11月，特委在牟平县、文登县和烟台市多次举行会议，酝酿起义计划。

1935年11月18日，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天寿宫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连珠、程伦、曹云章、张修巳、于得水等领导人。会议决定于11月26日发动起义。并组成起义指挥部，特委书记张连珠任总指挥，程伦任副总指挥。起义队伍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天寿宫会议后，因未按时准备好，特委临时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3天，改为11月29日举行。

11月28日清晨，东路第3大队大队长于得水按原定计划，率起义队伍开始由文登县孔格庄向百里以外的石岛奔袭。黄昏时分，起义队伍到达石岛西南蚰巴子窝。后得知石岛敌人已察觉，且戒备森严，遂改变计划，于29日先后袭击了鹊岛、宋村监备局和黄山区公所，共缴获长短枪50余支，子弹2500余发。晚9时许，于得水率起义队伍返回孔格庄。29日早晨，东路第1大队（大队长丁树杰、政委王亮）、第2大队（大队长王良粥、政委张修巳）按预定计划在孔格庄集结，等候第3大队送来武器。傍晚时还不见第3大队归来，总指挥张连珠决定改变计划，第1、第2大队转赴离文登县城敌人较远，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昆崙山区分头活动，打击敌人。第1大队直奔郭格庄，活捉国民党镇长丛连顺，接着进入昆崙山前的南王暄。第2大队直接北上，接连袭击了郝家屯、截山、底湾头村的地主武装，缴枪50余支。12月6日，国民党军第81师一部和反动地主武装2000余人包围了底湾头村。张连珠、张修巳指挥第2大队与敌人展开激战。第1、第3大队闻讯后赶去援助。第3大队行至伴格庄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保安队以及盐警300余人的阻击，增援未成，遂转移到昆崙山。底湾头战斗异常激烈，第1、第2大队在张连珠、张修巳、王亮等指挥下，打退敌人数次冲锋。战至下午一时半，张连珠率队突围。突围中，起义队伍遭受严重损失，第1大队大队长丁树杰等6人牺牲，张连珠等16人被捕。

西路起义分别在海阳、牟平举行。11月28日晚6时许，海阳起义队伍由程伦率领集合在小管村南山。原定计划是由打入海阳第3区（夏村区）民团任分队长的唐维兴（中共党员）发动兵变，然后与集结在小管村南山的起义队伍会合共同攻打夏村。但因情况突变，程伦当即率队转移到海阳、牟平交界的南西屋村。29日，起义队伍焚毁了南西屋村三家地主兼资本家的契约、账目，开仓分粮济贫，并缴获长短枪5支。接着，起义队伍又到乳山河东曲水村，分了大地主施恩堂的粮食和财产。牟平起义队伍300余人，由曹云章、张贤和带领，于11月29日在柳树村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先后在房

家村、午极村、白石村等地，收缴土豪劣绅的枪支 10 余支及一批土枪、大刀、长矛等，分发其财物，并火烧了通海区公所。12 月 1 日，牟平起义队伍在松椒村与程伦带领的海阳起义队伍会合。2 日，起义队伍举行誓师大会后，决定到青山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时，国民党军第 81 师一部 1000 余人将松椒村团团包围。程伦、曹云章、张贤和率起义队伍英勇反击，组织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武器低劣，队伍被打散。张贤和等 14 人牺牲，程伦、曹云章等 150 余人被捕。

胶东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保留下来的一支 30 多人的游击队，在于得水、王亮的带领下，辗转昆崙山区，继续坚持斗争。

百灵庙起义

1936年2月21日，在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策动下，驻内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保安队部分官兵在百灵庙举行了起义。

百灵庙（今属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起义之前，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深入驻守在内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的保安队开展兵运工作，进行起义的准备和部署。2月21日22时，蒙政会保安队1000多名官兵在共产党员云继光、朱实夫、云蔚等人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冲进军械库，夺取一批枪支弹药，破坏了电台，打死蒙政会稽察处长李凤诚。打开看守所，解救了一批被蒙政会秘书长德王关押的士兵。这些被解救的士兵多数参加了起义队伍。23日凌晨2时许，起义队伍与驻守乌拉特中旗的保安队第2中队会合，合编为1个总队，下辖6个中队，2个特务队。但驻绥远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第35军第421团包围并解除了起义部队的武装。乌兰夫得悉后，立即与傅作义进行说理斗争，傅遂同意恢复起义部队的武装。之后，傅又以威胁、利诱等手段，在起义部队中制造哗变，杀害云继先，控制了起义部队的一部分，一部分投往德王。剩下的100多名骨干，在中共西蒙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的声援，国民党军才未能消灭坚持斗争的起义队伍，多次想改编也未达目的，当地国民党政府企图控制这支起义队伍也未成功。1937年春，中共西蒙工委决定以这部分起义队伍为基础，协助绥远省政府重建了保安总队。中共西蒙工委派乌兰夫任保安总队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派一批共产党员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在官兵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使这支部队成为内蒙古地区最大的抗日军队。

下奎洋起义

1936年3月30日，在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策动下，南靖县下奎洋庄吉亨民团举行了武装起义，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讨蒋军。

南靖奎洋属山区贫谷，分上、下奎洋，西靠永定，北邻龙岩。奎洋人民苦大仇深，渴望革命。但奎洋历来为封建势力所割据，至1933年，下奎洋民团已拥兵近300人，有机枪两挺，长短枪300余支，势力范围扩张到松峰、霞峰、金山、梧宅一带。中共党组织通过对民团内部情况的调查了解，获悉民团内部争斗激烈，其中以庄吉亨为首的一股势力有一定的正义感。但庄吉亨仅持兵七八十人枪，因而倍受挟制、排挤。于是党组织决定分化改造下奎洋民团，以此打破下奎洋封建割据的局面。

1935年3月，中共永东县委书记马发贤指示秘密活动在永定高头一带的共产党员江岩前往南溪。不久，江岩发展了与庄吉亨有过联系的绿林兄弟张阿林和在下奎洋做工的泥水匠江振环为游击队员，指派他们继续与庄吉亨保持联系，并将南溪小部分游击队员安插在民团中，为争取改造庄吉亨民团作准备。该年冬，在张阿林与江振环已取得庄吉亨信任的基础上，江岩派

出6名游击队员，从南溪投奔下奎洋，加入庄吉亨民团。

1936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闽西南地区广泛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运动，争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讨蒋。此时，江岩因受伤，遂化名由张阿林介绍假以庄吉亨妻舅关系，转移至庄吉亨家中医治。养伤期间，江岩不失时机地向庄吉亨灌输抗日反蒋的道理，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同时张阿林等游击队员在民团中也逐渐站稳了脚跟。此时，国民党南靖县政府拟将庄吉亨民团收改为县保安队，庄吉亨颇为顾虑。在此关键时刻，江岩对庄吉亨晓明大义，并指明只有投奔红军才有出路，从而坚定了庄吉亨摆脱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决心。

1936年春，（龙）岩、永（定）、（南）靖工作团团长罗桂华在上奎洋九云墩、合福坑、小溪内，下奎洋的溪坎头、罗坑等地频繁活动，为促成庄吉亨民团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时，庄吉亨民团已基本摆脱了国民党南靖县政府的控制。为了让庄吉亨自觉参加红军，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江岩继续住在下奎洋作庄吉亨的工作，向庄吉亨亮明自己的身份，打消他的顾虑，并引导他投奔红军。

3月30日，庄吉亨决心起义。这天，他假称请当地反动联保主任到顶圩商谈要事，诱骗其单身前往途中将其击毙。与此同时，江岩前往龙岩联系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3支队（简称红3支队）前来收编。稍后，红3支队参谋长郑树昌奉命率一个排的兵力来到下奎洋接收了庄吉亨民团起义军，并将其改编为抗日讨蒋军。为便于应付复杂的斗争环境，起义军暂不公开红军的旗号，表面上仍称民团。

是年夏，下奎洋探珠楼驻扎了部分国民党自卫队。为严惩敌人，庄吉亨接受（龙）岩、永（定）、（南）靖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率部配合红3支队乘圩日敌驻地防守空虚，一举攻取了探珠楼，歼灭了这股反动武装。此次战斗后，庄吉亨公开打出了红军的旗号，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讨蒋军。

下奎洋民团起义，是共产党组织在南靖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为红军游击队开辟奎洋游击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适中新祠起义

1936年6月8日，在中共适中特区区委的策动下，驻福建省龙岩县适中新祠的国民党士兵发动了起义。

新祠是龙岩象山区较大的山村，位于莒州和适中之间，距龙岩城15公里。龙（岩）漳（平）公路贯穿新祠村。1936年3月，国民党军第3、第80、第75、第52师和新编第10师（原独立第37旅）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对闽西红军游击队进行第3期“清剿”。新10师为控制龙潭公路，派第710团第10营驻扎在新祠南北两侧的碉堡内，营部带1个连驻莒州。

驻守新祠碉堡的国民党军第1营第2连第1排，有两个广东籍士兵——陈祺和叶礼。他俩的家乡曾经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红军的帮助下，农民分到了田地，取消了田租债务。因而深受共产党的影响。他俩原在国民党第19路军，参加福建事变后，被迫加入独立第37旅，为此倍受排长歧视，经常挨饿受辱。他俩为此常偷摸出营区钓鱼，尔后到村头谢大娘家煮了吃。谢大娘是红军烈士家属，十分同情他俩，并经常开导他们，同时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共适中特区区委。特区委书记肖振中决定争取陈、叶，瓦解敌军。在谢大娘的安排下，肖振中多次与他们接触，并宣讲革命道理。陈、叶在肖振中的帮助下，决定投奔红军。他们和肖振中结拜为兄弟，并按肖振中指示，很快又争取了几位贫苦出身的士兵准备投奔红军。

肖振中将策动士兵起义的情况报告了第3支队。政委伍洪祥决定里应外合，见机拔除新祠南侧碉堡这个钉子。

6月8日晨，第3支队第3大队潜伏在新祠村后山林中。午时，山后枪响，在碉堡中的陈祺听到信号后，当场将排长击毙。叶礼和另外几个士兵控制了碉堡，打开大门迎接第3大队，俘虏敌人20多，陈祺等人当即加入了第3支队。当日，陈祺等6人以驻新祠堡垒起义同仁名义公布了告独37旅官兵书，呼吁国民党军官兵为救中国而斗争。

岱山起义

1936年7月13日，浙江省岱山岛的盐渔民在共产党员黄国光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岱山岛位于舟山群岛北部。岱山本岛大约有四五千家专业盐户，辛勤地经营着15000亩盐田和20万块盐板，年产盐50万担左右，是闻名浙东的鱼盐之乡。

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颁发了“鱼盐变色”和“产盐归堆”的命令。岱山盐政当局宣布从1936年元旦起试行这一政令，强迫盐民用红粉拌白盐，作为鱼盐标志，致使加工鱼货有悠久历史的东沙角加工厂腌制的海货质量下降，价格大减。同时，强制盐民把每天生产的盐在下午三四点钟之前，挑到指定地点集中归堆，不许留放在家里隔夜。在盛夏时节，下午三四点正是晒盐的好时光，但为了赶上归堆时间，盐民只好提早收盐。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晒盐的时间，使产量降低，影响盐民生计。此外，盐务当局还调集大批盐警，以东沙角秤放局为大本营，在念母吞、剪刀头和宫门、泥峙、南浦、北峰山等地，布满了盐警哨卡，凡是遇到挑白盐的盐民就抓，并以偷漏“国税”的罪名给予惩处。

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定海县盐民运销信用合作社”指导员合法身份、在岱山从事盐民运动的共产党员黄国光和盐民代表冯天宝，通过办“盐民合作社”的形式，团结广大盐民同

国民党当局进行公开斗争。他们以“盐民合作社”的名义，向岱山场公署、秤放局提出了3点要求：第1，要求改革盐务，产盐由盐民自己运销；第2，要求提高盐价，降低税率；第3，废除“产盐

归堆”、“鱼盐变色”的命令。而岱山场公署及秤放局无视广大盐民的强烈反对和正义要求，一方面加紧推行鱼盐变色的政令，另一方面派出人员丈量勘察，在南浦的三叉浦、八叉浦和宫门、泥峙、板井潭等地，圈田100多亩，建造官仓宅基，这样就更加激起了广大盐民的不满和进行反抗的决心。

1936年7月，黄国光、冯天宝以岱山盐业合作社的名义，组织盐民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盐务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0日晚上，由黄国光主持，在玄坛庙召开了合作社理事会紧急会议，商讨扛板罢晒的具体办法。次日一早，又在桥头资福寺召集各乡分社主席及小组长以上骨干分子，部署“扛板罢晒”的具体行动。

12日，岱山盐民，鸣锣扛板罢晒。大家把晒的板一块块扛拢，并打开溜碗，放掉卤水，纵火烧掉溜草。顿时，扛板烧草形成燎原之势，从宫门、泥峙、北峰山、板井潭、南浦、茶前山、摇星浦、塘墩、剪刀头一直烧到青黑山下。与此同时，黄国光、冯天宝还决定召开盐、渔民联合大会，组织游行请愿，向秤放局示威。

13日，司基东岳宫里里外外、人山人海，来自各地的3000余名盐民在这里集会抗晒。冯天宝及盐民代表先后登台讲话，揭露盐务当局的种种罪行，提出了反对拌红、反对归堆、提高盐价的斗争目标，并号召渔盐民团结一心，坚持斗争，不达目的，决不开晒。并处决了秤放局派来混在盐民中的1名测量员和1名司秤员。会后，几千名盐、渔民结成请愿队伍，向东沙角行进，当队伍行至龙眼时与盐警相遇，盐警鸣枪恫吓，盐渔民毫不畏惧，并向盐警夺枪。凶恶的盐警当场打死了泥峙盐民刘阿来和南峰渔民刘光兴。盐警的暴

行激怒了盐渔民群众，大家奋起与盐警搏斗。盐警向秤放局逃去。盐渔民奋力追击，包围了秤放局。这时停泊在东沙角一带船上的外地渔民和一些奉化渔民也一起缴了驻守在念母吞玄坛庙的 10 名盐警的枪支，并打死了全部盐警。接着，队伍疾奔东沙角秤放局。

下午 3 时，盐渔民向秤放局发起了进攻。盐警队慌了手脚，凭借高大的围墙和铁窗向外射击。盐渔民几次越墙虽未能攻入，但此时的秤放局已处于广大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秤放局局长缪光惶急万分，勒令死守，妄图在黑夜中拖延时间。但盐渔民们背来几十把柴草在秤放局门口点燃，并把着火的柴草塞进窗口，再用火油喷洒。顿时，秤放局内冒出浓浓黑烟，燃起熊熊大火。盐渔民乘机砸破铁栅，撬开铁丝网，攻入院内。院内盐警纷纷逃命，局长缪光也从后门逃到新道头汤悦卿家中，盐渔民深夜追踪，包围了汤家。

7 月 14 日拂晓，缪光扮作拾泥螺人从汤家后门钻出，被群众发觉，盐民张阿生、刘阿东将其处死。

岱山盐渔民起义，国民党反动政府及盐务当局大为震惊。两浙盐务总署署长张中立率“绥南舰”来岱，并调遣外地盐警到岱山大肆抓人，先后抓捕杀害了刘阿东、沈阿云等 3 人。暴动领导人黄国光、冯天宝等被通缉，岱山联合社被查封。但岱山盐渔民起义迫使国民党政府取消了“产盐归堆”和“鱼盐变色”的政策。

陕南起义

1936年8月10日，在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驻陕南的“商州专署特务大队”举行了起义。

商州专署特务大队原属国民党军驻陕西警备第2旅第4团第9连。该连100多人在第9连第2排排长何振亚（共产党员）的率领下，曾于1935年12月11日在陕西长安县起义，并成立了陕南游击纵队。1936年5月，该游击纵队被国民党安康专署收编，何振亚极力反对并设法解救，以期脱离安康专署。中共西北特支得悉此情况后，即派共产党员杨江、杜瑜华、沈敏到陕南帮助何振亚，指示何要把这支部队解救出来并改造成共产党领导的武装。8月9日，西北特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决定组织起义，建立陕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为此，何振亚、杨江等积极做好兵运工作，教育该部官兵脱离特务大队，参加革命队伍。10日，特务队官兵在何振亚、杨江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处决了特务大队的反动军官数名，收缴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13日，正式成立了“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何振亚任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杜瑜华任参谋长，杨江任组织科科长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该军的成立，为后来配合红第74师对敌作战和抗击日军作出了贡献。

三街起义

1936年10月，中共云南省楚雄党支部在该县三街组织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

1936年4月，红军第2、第6军团进入云南后，中共楚雄党支部曾积极配合红军顺利攻克楚雄的军事行动。此后，楚雄县县长李毓萱按照云南省当局“在红军过往各县后，各县常备队和各乡镇长要入山搜查红军留下的伤员和弹药”的命令进行部署。7月，中共楚雄党支部决定利用该支部委员陈世昌是县常备队分队长的合法身份适时组织起义。这一起义计划得到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的批准。此间，楚雄县三街区区长马玉章与恶霸地主唐立功等勾结，借追剿红军通过楚雄之机，拉夫派款，横征暴敛，民怨很深。10月，陈世昌带领秘密组织起来的12人的武装骨干，以进入山区“搜查红军”为名到达三街。晚10时，陈世昌等进入区公所，适逢区长马玉章不在，便集合全体人员，宣布起义。镇丁周仕政顽抗逃跑被立即处决。起义军共缴枪9支，然后向易门方向转移。这支起义队伍为后来建立“滇南易门游击大队”打下了基础。

湘西“革屯”起义

1937年1月下旬，湖南西部苗、汉、土家等族人民为废除屯田制度、进行抗日救国，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

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北部为苗族聚居地区。1795年，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便在这一地区没收民田为官有，租给农民耕种，榨取高额“屯租”，养活“屯兵”、“屯官”，用以镇压苗族人民，称为“屯田”制度。民国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和当地军阀承袭了这一封建制度。1936年，永绥一带欠收，龙潭“屯官”不顾人民的死活，照旧催租，龙潭苗民要求官府减免屯租，官府不但不允，反而杀了苗民代表石春六、张巴柱，激起广大苗民的强烈愤慨。

1937年1月下旬，永顺各乡苗民纷纷起来烧屯仓、杀屯官，摧毁屯田制度。邻近的凤凰、乾城（今吉首市）等县的苗民继起响应，使起义迅速扩大到湘西整个苗族聚居地区，并组成了革屯军，梁明元任大队长，石维珍任副大队长。湖南省主席何健派兵进行镇压，革屯军利用熟悉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采取游击战术和国民党军进行周旋。

卢沟桥事变后，革屯斗争很快和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是年秋，在革屯军的基础上，湘西人民以苗民为主体，正式成立川黔湘革屯抗日军，明确提出“废除屯田”和“抗日救国”的口号，并统一建制，将全军编为6个团，共5000余人，不久，参加这一个斗争的群众竟达10余万人。革屯抗日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在永顺、凤凰、保靖、乾城等地屡次战胜国民党军队，迫使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不得不于1938年宣布废除屯田制度，改屯租为田赋。后因窃取起义军领导权的一部分地主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当局实行妥协，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改编，致使革屯抗日起义遭到失败，起义主要领导人梁明元等惨遭杀害。

三道河子起义

1937年7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部的争取和策动下，驻吉林宁安三道河子的伪森林警察大队举行了爱国抗日武装起义。

卢沟桥事变中，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在此形势下，伪“满洲国”的伪军、伪警察的动摇情绪和爱国思想在普遍滋长。三道河子（今属黑龙江省海林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李文彬对当时的抗日救亡形势有所认识，兼之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共吉林省委和抗联第5军曾派第1师参谋长张镇华等与李文彬等接触，进行争取和策动工作，促使李文彬决意率部举行抗日起义。

1937年7月初，日伪方面由五河林派出50余名武装到达三道河子，对该地伪军、伪警察进行监视，从而加速了该部起义的进程。12日，该部150余人在大队长李文彬的率领下，乘全国抗日高涨的大好时机，按照事先与抗联第5军军部的约定，毅然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当场击毙准备进行反抗的日军指挥官津村昌、日本教官加藤直秋等8人，并将50余名武装监视队全部缴械，宣布参加抗联第5军。15日，在牡丹江畔的三道河举行誓师大会，起义部队改编为抗联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任政治部主任。

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间，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而举行了大小数十次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平津地区后，沿几条主要交通线开展战略进攻，夺取华北冀、察、晋、绥、鲁五省，其中一路沿津浦路南侵山东。10月初占领德州后，继续占领了平原、禹城、齐河等地。日军为了诱迫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投降，在黄河北岸停留了一个多月，后来发现韩准备逃跑，遂调集第5师团（该部由平型关地区转来）、第10师团及特种部队共3万余人，于12月23日分两路渡过黄河：一路由济阳以东曲堤至榆林镇一线渡河，25日侵占周村，继沿胶济路东侵，于次年1月10日侵占潍县；一路由齐河渡河，27日占领济南，继沿津浦路南侵，31日侵占泰安，于次年1月4日侵占曲阜、兖州，5日侵占邹县。日军海军一部于10日侵占青岛。这时，韩复榘的部队和驻防于山东境内其他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至陇海路附近。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司令、第3战区副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在日军渡过黄河时，早已率部逃往徐州。日军所向，地方官吏闻风而逃。国民党在山东的统治垮台。与此同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各种民族败类，出面组织“维持会”，依靠日本侵略者“维持”其统治。日军到处大肆奸淫烧杀，汉奸土匪蜂起，社会秩序混乱已极，山东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山东人民，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高潮，自发地组织起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军。但是，一些汉奸地痞流氓、封建会道门头子，也趁机以“抗日”为名，占山为王，一时“司令”、“指挥”如牛毛，要款要粮、欺压人民，更加增加了山东人民的灾难。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解救山东人民出苦难的历史重任。

早在1936年3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即派黎玉以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身份到山东工作，组织了由黎玉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以后相继建立了直属省委领导的鲁西北、鲁北、胶东等特委，鲁东、鲁西南等工委，淄川矿区区委、济南市委和泰安、莱芜、新泰、博山、费县、沂水、益都等县县委或工委，以及长山、青岛等支部或小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山东的发展，为领导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人民抗战》的指示；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向山东派了一批干部（内有红军干部数十人），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1937年10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在济南秘密召开会议，制订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动组织群众，抓紧在日军入侵、国民党党政军逃跑、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及时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起义；要团结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收容国民党军队的溃兵参加起义部队；大力搜集民间枪支、以及争取改造一些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的地方武装。起义部队可称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要积极打击敌人，加强政治工作，严格部队纪律，以提高部队的威信，扩大影响，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会后，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抗日武装起义如火如荼，遍及山东全省。其中较大者有10起。

中共冀鲁边工委在盐山等地领导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人民抗日救国军第1军；中共鲁西北特委与国民党山东第6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统战关系，实现了共同抗战，并发展了抗日武装，组成了第10支队；中共胶东特委组织领导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组成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中共清河地区党组织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组成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中共鲁东工委领导包括寿光县牛头镇和潍县、昌邑等地人民的鲁东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7、第8支队；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了鲁中地区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中共山东省委部分干部在泰（山）西组织领导了泰西夏张抗日武装起义，组成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中共鲁东南（后称滨海）沂水和莒县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2支队；中共苏鲁特委在鲁南地区组织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中共苏鲁特委和中共鲁西南工委在微山湖西地区组织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到1938年夏，起义武装发展到4万多人，分别在鲁中、鲁南、滨海、清河、冀鲁边、胶东、泰西、湖西、鲁西北等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为了统一领导，1939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正式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坚持山东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

冀鲁边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9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冀鲁边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和山东边界地区，组织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

冀鲁边区主要包括河北省东部的盐山、南皮、东光、沧县和山东省东北部的无棣、庆云、乐陵、宁津等县。日军的铁蹄首先踏上了冀鲁边广大平原，这里的人民最先遭到摧残，因之，武装起义也最早。早在1937年春，乐陵一带就有中共派遣的红军干部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组建了抗日游击队。1937年9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鲁北特委，于文彬任书记，马振华、邸玉栋分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领导冀鲁边抗日武装斗争。很快，在各个地方建立起几支抗日救国武装力量。在乐陵县以杜步舟、周凯东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于当月在黄夹镇率先举行起义，树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6团”的大旗。10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秘密会议后，中共冀鲁边工委书记于文彬、马振华等在盐山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救国会，指示各地建立了分会，号召抗日救亡，设法搜集武器，加快组织抗日武装步伐。11月，日军占领冀东的盐山县城，冀鲁边的国民党党政要员纷纷携眷逃跑。与此同时，冀鲁边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共冀鲁边工委关于武装起义的号召，纷纷参加华北人民抗日救国会，青壮年们踊跃参加抗日武装。一时间，盐山旧城、乐陵的黄夹镇、宁津、庆云、无棣等地，都建立了抗日武装。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人民抗日救国军第1军，一度攻克盐山、无棣、乐陵、和庆云等县城，并在李家铺（庆云至盐山的公路上）伏击由天津南下的大股伪军刘佩忱部，毙伤其一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激发和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部队一度发展到7000余人，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日局面。

随着抗日救国军的迅速发展，组织领导和部队管理任务的日益繁重，由于该地区的共产党人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起义时曾推举国民党分子、土匪头子刘景良任司令。刘利用职权进行分裂活动，拉走了一部分部队，有些接受人民抗日救国军番号的土匪部队也先后离去，加上在整顿纪律中又清洗了一些坏分子，部队一度缩减到300余人。

遭受挫折的人民抗日救国军第1军，在中共冀鲁边工委的领导下，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斗争，从1938年1月到4月，先后收复了盐山、无棣、乐陵、庆云等县城，从伍又发展到2000余人，建立了乐陵、庆云、南皮三县抗日民主政权。9月，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率第343旅机关部分人员进抵冀鲁边的乐陵城。萧到后，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并将边区部队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1939年上半年，部队发展到2万余人，又先后建立了宁津、盐山、东光、沧县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初步形成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鲁西北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1月至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鲁西北特别委员会在山东西北部地区，联合国民党军爱国武装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

鲁西北是指山东境内的黄河以北、津浦路以西以聊城为中心的地区。主要包括聊城、冠县、馆陶等县。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与聊城一带国民党山东第6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先后派组织部部长张霖之等70余名共产党员和平津学生（多系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去鲁西北，一面加强对中共鲁西北特委的领导，一面协助范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日军侵入山东境内后，范部曾根据山东省政府主席、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的命令率部南退。中共鲁西北特委主张在鲁西北坚持抗战，反对逃跑，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部分政训人员以28支破枪镇压了汉奸活动，守住了专员公署所在地聊城，从而以实际行动影响和争取了范筑先率部回到聊城坚持抗战。这就为鲁西北抗日武装起义的发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1月间，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领导下，堂邑的一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凤凰集发动起义，组成了堂邑第1支游击大队，由洪涛任大队长。堂邑起义得到了各地的响应，冠县一个营的地方武装和馆陶县的一部分民团先后起义，与堂邑起义的游击大队合编为范筑先部第10支队，张维翰任司令，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初，中共鲁西南工委发动组织的汶上县抗日救国自卫队和以后中共博平党组织领导的抗日第7团，先后编入第10支队，从而使第10支队大为增强，活动在鲁西北平原和肥城附近的大峰山区，积极打击日军，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另外，中共鲁西南工委在曹县组织了一支300余人的武装，使用范筑先部第35支队的名义，活动于曹县、菏泽一带。濮县等地的中共地方党组织也组织了武装，编入河北中共党组织所领导的部队里。

经过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和帮助，范筑先收编了散布在鲁西北区的各种杂牌武装，组成了30多个抗日支队，其中一半以上的支队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形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抗日武装。与此同时，在鲁西北的10多个县中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一批共产党人被委派为县长，初步形成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15日，日军进攻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在聊城战斗中，范筑先身先士卒，不幸阵亡，队伍也受到一些损失。不久，一些成分复杂的部队分裂出去。后来，中国共产党以第10支队为核心，组成了以范筑先的名字命名的“筑先支队”，继续在肥城大峰山地区和鲁西北平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2月24日至1938年4月，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别委员会领导胶东地区人民从天福山开始的大小近10次抗日武装起义，历史上又称胶东抗日武装起义。

天福山位于文登县东20多公里处，是中共胶东特委机关所在地。中共胶东特委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的秘密会议精神，召开特别扩大会议，决定以1935年胶东起义保存下来的、在昆嵛山开展游击战争的队伍为骨干，在天福山举行起义，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1937年12月，日军沿胶济路和从海上登陆向胶东进犯。占领了青岛、烟台等地。中共胶东特委决定立即举行起义。24日，特委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并命名聚集在天福山的抗日武装为第3军第1大队。31日，第1大队遭国民党文登县长率领的军队的突然袭击，受到很大损失。1938年1月中旬，在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祺的领导下，国民党第2区政训处的部分武装和威海郊区农民武装在威海举行起义，夺取威海专员公署军械库，武装了自己，正式成立了第3军军政委员会，理祺任司令员兼主席，吕志恒任副主席，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2月，日军侵占烟台后，继又侵占了牟平。第3军为展开抗日工作，扩大军队的影响，于13日拂晓以100余人的兵力，突然袭入牟平县城，将日军刚刚扶植起来的伪县长、伪公安局长、伪商会会长和维持会长等170余人全部俘获，缴获枪支100余支。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到城外休息。第3军的领导20余人在城南1.5公里的雷神庙内开会。此时，烟台日军100余人乘汽车5辆，在4架飞机掩护下，将雷神庙包围，部队依托围墙顽强抵抗，连续打垮日军4次冲击，打死打伤日军四五十人，击毁汽车2辆，击落飞机1架。第3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司令员理祺阵亡。3月，第3军一部又收复福山县城，摧毁了该县的伪组织，部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在天福山、威海起义的同时，中共胶东特委还组织领导蓬莱、黄县、莱阳、即墨、掖县等县的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分别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第2路、第3大队、第9大队、第7大队和胶东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先后收复掖县、蓬莱、黄县等县城，并建立了掖县、蓬莱抗日政权。3月18日，日军200余人由平度向莱阳进犯，经过莱阳城西花园头村，莱阳起义武装一个班协同该村300余群众对日军进行英勇抗击，他们扼守有利地形，用土枪土炮打击日军，并用铁锹、铡刀等与日军肉搏，经过6小时激战，毙伤日军75人，起义部队和群众阵亡67人，负伤33人。此战，显示了胶东人民英勇不屈的顽强精神。

4月，为了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第3军军政委员会对胶东起义武装进行整编，分别编为第1、第2、第3、第4路，各路设指挥部，每路下辖若干大队。共计7000余人。另有由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人士在即墨一带发展了一个团的武装，于是年冬亦正式编入第3军。这支部队一直战斗在蓬莱、黄县、掖县等地，创建了以蓬黄掖为中心的胶东抗日根据地。

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在黑铁山地区，组织领导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黑铁山位于胶济路北侧长山（今邹平县）、临淄之间。1937年秋，为开展长山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山东省委派姚仲明和红军干部廖容标到长山中学校任教员。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是进步人士（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威信较高，与姚、廖等密切配合，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建立了救亡组织，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作好了起义的准备。12月下旬，日军向胶济铁路两侧发动进攻，占领周村。26日，姚仲明等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率领群众在黑铁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织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马耀南任司令员，姚仲明任政治委员，廖容标任副司令员，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

起义部队为打击日军的气焰，于1938年1月7日袭入长山县城（今为邹平县长山镇），消灭日军刚刚扶植起来的伪政权和伪军。19日，起义部队在当地自卫团的配合下，于陶塘口、安家庄（邹平城北）夹小清河两岸设伏，并利用民船构成拦河障碍，以步枪、手榴弹、土炮击沉日军汽艇一艘，击毙日军12人（含旅团、联队长、参谋各1）。这一胜利，大大提高了第5军的声威，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许多地方武装接受了第5军的领导。此后，部队到长山城西南的山区开展工作。日军为了报复，由周村纠集日伪军400余人向长山地区进攻，第5军在群众的配合和支援下，扼守有利地形，与日伪军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100余人后安全撤走。以后第5军又开辟了邹平地区，并进驻邹平城。

与此同时，淄川矿区的中共党组织以及章丘等地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相继组织了武装，先后与第5军会合；在益都的中共党组织组织了益都独立大队，活动在胶济路淄河流域。此外，临淄的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与国民党分子王尚志等合作，组织了1000多人武装（1月底王阴谋消灭进步力量败露被驱逐），以后这支部队与中共临朐党组织建立的武装会合，编入第5军。第5军为扩大活动区域，一部进入胶济路南淄河流域活动，并与淄川矿区的武装共同攻克淄川城。到春末，第5军发展到6000余人，在胶济路南北两侧开展游击战争，给日军的后方

鲁东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鲁东工作委员会在山东东部地区领导人民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历史上又称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也称潍北抗日武装起义。

鲁东包括潍坊以北的寿光、昌邑和潍县等县。12月，日军沿胶济路东犯。29日，中共寿光县委负责人马保三和红军干部韩明柱以及王云生等在寿光县牛头镇利用中共党员掌握的几条枪，发动人民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8支队，马保三任司令员，韩明柱任副司令员，张文通任政治委员。第8支队组成后积极搜集民间枪支，驻羊角的国民党部队撤退时遗弃的数十支枪，也为第8支队接收。1938年1月25日，第8支队在寿光城南的三里庄设伏，摧毁日军汽车3辆，击毙日军2人、俘虏1人。与此同时，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等人，领导昌邑县北部瓦城和潍县北部蔡家秧子一带的人民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组成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7支队，冯国祥任司令员，鹿省三任政治委员，孙汉三任参谋长。第7支队成立后，屡遭国民党潍县县长厉文礼部和日军的袭击，蒙受重大损失。3月，第8支队由寿光来援。30日，第7、第8支队共同袭击了昌邑以北日军据点——柳疃，毙伤日军一部，壮大了部队的声威。为加强斗争力量，经中共鲁东工委决定，成立11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支游击队。

这时，国民党顽军厉文礼、张景月部又策应日军向两支游击队围攻。因此，游击队向胶东的掖县、黄县转移。部队正准备东进的时候，鹿省三不幸被内部的反动分子暗杀。第7、第8支队到达黄县后，接收了龙口海关的武装，帮助黄县起义部队解除了当地国民党顽军的压迫，并与由牟平西进的第3军指挥部会师。随后又在掖县帮助第3军第3支队打退了平度国民党顽军张金铭部的进攻。部队在胶东进行整顿和补充后，发展到5000余人。7月，奉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西返潍坊地区，开始了新的斗争。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在泰安市徂徕山地区，领导人民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起义地区包括泰安的徂徕山、莱芜的莲花山和新泰的观山。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前夕，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转移到泰安，与中共泰安县委会合。日军侵占济南后，省委又转移到泰安城东南的徂徕山。这时，中共泰安县委已在徂徕山南麓的山阳村、楼德一带掌握了部分武装，组建起民兵自卫团。中共山东省委即以此为基础，加上从济南来的一批党员、青年知识分子和争取的5个带枪的国民党军溃兵，于1938年1月1日，在省委书记黎玉、宣传部长林浩和红军干部洪涛、赵杰等领导下，在徂徕山光华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洪涛任支队长、黎玉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支队长。下辖第1、第2两个中队。与此同时，中共莱芜县委和刘居英、程绪润、秦云川等人，领导人民武装在莲花山举行起义；中共新泰县委和孙汉卿、董琰、单昭洪等人，领导群众武装在观山举行起义。两地起义后，所建立的抗日武装均到达徂徕山，分别编为第3、第4中队。起义部队会师后，即主动袭击日军。1月中旬，在大汶口至新泰公路上的寺岭伏击日军马车，毙伤日军4人；接着又在泰安至新泰公路上的四槐树村用地雷炸毁两辆汽车，歼灭日军40余人。后来部队为了扩大地区，壮大自己，分为南北两路：南路向新泰、蒙阴、费县、泗水方向活动；北路向莱芜、淄川、博山一带活动。活动到博山一带的部队与黑铁山起义的第5军一部会师，协同中共博山县委发动组织武装，一度攻克博山县城，歼灭守城伪军。不久，博山、泗水中共党组织所组建的武装先后编入第4支队。中共临沂党组织在临沂西南的兰陵和莒县以南的十字路组建的一支武装北上博山，与第4支队会合。到4月，第4支队发展到4000余人，编为3个团。

徂徕山起义，对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建立以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泰西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人民群众在泰山以西的夏张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此次起义又称泰西夏张抗日武装起义。

泰西主要指泰山以西、大汶河以北地区。1937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张北华等到泰西地区开展工作，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保卫家乡，并很快搜集了一部分民间枪支，动员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组成了一支群众武装。日军占领泰安县城后，中共泰西党组织于1938年1月1日在夏张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与新泰、莱芜等地起义遥相呼应。当日，部队进至肥城山区活动，在肥城东南二起楼一带进行整顿，组成山东西区人民抗日救国自卫团。张北华任主席，袁静沦任副主席，下辖3个大队。

泰西人民武装起义后，连续给津浦路的日军以重大打击。1月中旬，自卫团与中共肥城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互相配合，一举攻克肥城，歼灭城内伪军，摧毁伪组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之后，起义部队积极活动于津浦路附近。1月28日，一部摸入津浦路边泰安以北的界首镇内，用大刀砍死日军8人；接着毙伤由界首车站前来增援的日军10余人。3月底，又在泰安以南的黑虎泉颠覆日军一列弹药车，击毙押车的日军20余人，弹药车的爆炸声持续五六个小时，此段铁路七八天未能通车。继而，起义部队又将泰安城北的万德车站附近的铁路、公路桥梁炸毁，并派部队打击日军的修桥部队，致使津浦路10余天未能通车。对此，日军一部迅速由泰安、界首和万德车站分途出动，对泰肥山区实行报复性进攻。日军一路100余人在泰安至肥城公路上的道郎镇遭起义部队顽强阻击，激战终日，毙伤日军40余人。战斗中自卫团副主席袁静沦阵亡。

在此期间，中共长清、肥城党组织所组建的一部武装，先后与自卫团会合；泰安一部分地方武装也编入了自卫团。部队进行整顿，由张北华任司令员，董君毅（即段君毅）任政治委员，下辖16个大队，共2000余人。在起义部队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争取了肥城保安队参加起义军，同时争取了当地国民党政权委任共产党人分任肥城、东平、平阴3县县长，时间虽不长，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鲁东南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1月上旬，中国共产党沂水县委和中国共产党莒县党组织领导沂水公家疃和莒县浮来山人民举行两次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1月上旬，中共沂水县委在沂水以西的公家疃一带组织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第6大队；与此同时，中共莒县党组织也在莒县西部的浮来山一带，在所掌握的高房乡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团的基础上，组织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4月，这支抗日武装开到沂水西北的泉庄与第4支队的第6大队合编，共编为4个连。由于内部坏分子的破坏，部队受到很大损失。6月，中共山东省委增派了一些干部加强第6大队的领导，并指示该部向莒县、日照一带发展，以开辟鲁东南（后称滨海）地区的工作。部队先后在莒县以南的十字路、良店、日照西南的碑廊，歼灭了随日军侵入山东的伪军刘桂棠部200余人；以后又在临沂、莒县间的汤头歼灭伪军和土匪武装100余人。起义部队在莒县一带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8月，第6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2支队，刘勇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营。第2支队组成后，英勇战斗，到处打击日伪军，积极开展了滨海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鲁南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苏鲁特别委员会在山东南部地区，组织领导人民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鲁南地区，包括滕县、峄县、临沂、郯城、费县和沛县（属江苏）等县。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苏鲁特委在徐州一带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驻徐州的国民党第5战区李宗仁部以及附近地区一些上层人士、地方武装建立了联系，因而取得了进行公开活动的条件。中共苏鲁特委书记郭子化和许多共产党员在第5战区动员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通过该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广泛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团结了广大群众。3月，日军沿津浦路大举南侵，国民党军与日军在台儿庄展开激战。中共苏鲁特委转入敌后，分别在沛县、滕县、峄县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成了3支抗日武装。5月1日，3支抗日武装在枣庄以西的墓山会合后，合编为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委员。辖3个大队，很快发展到600多人，活动于滕峰边的南塘一带。这时，中共临郯中心县委和由上级派的红军干部，在临沂、郯城地区组成了临郯青年抗日义勇队，以后与第1总队合并。共产党所掌握的费县南部大炉一带的民团武装活动于临、郯、费、峄边区的抱犊崮山区，编为义勇队第4大队。

鲁南起义武装，为保卫徐州，策应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进行了英勇的战斗。5月，在临（城）枣（庄）公路上的邹坞伏击日军的辎重队，毙日军10余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和军需品一部。以后又在这条公路上的大甘林设伏，击毙日军一部。此后，还数次破坏津浦路上的临城、滕县段的铁路。

7月，驻鲁南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向起义部队进攻，战斗中何一萍政委阵亡。以后中共山东省委率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主力增援，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4支队北返，起义部队转向抱犊崮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湖西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苏鲁特别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鲁西南工作委员会，在微山湖西部地区组织领导人民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微山湖西部地区，包括苏鲁豫皖4省交界地区的铜山、沛县、丰县、单县、金乡、永城、肖县、砀山、宿县等县，简称湖西地区。是年春，中共苏鲁特委部分领导人通过在国民党第5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的合法地位，在肖县召开各县联防会议，布置起义工作，并分发了部分枪支。在沛县地区组织的武装参加鲁南地区的起义部队后，中共苏鲁特委负责人王文彬等，又在铜山、沛县，肖县、丰县、砀山、永城、宿县等地分别组织抗日武装，正式树起“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的大旗，由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任政治委员，张如任参谋长，郭影新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中共鲁西南工委也在单县、金乡一带建立了抗日武装。5月19日，徐州沦陷，湖西地区完全处于敌后。6月中旬，上述武装在丰县东南的华山镇会合，组成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部队随即搜集国民党军撤退时丢弃的大量武器，收编了许多地方武装，第2总队迅速发展成31个大队，人数一度达到5000余人。

第2总队成立不久，即在砀山东北的马良集截击日军，毙伤日军一部；8月，4名义勇队队员化装成农民，以“送礼”为名，进入肖县西北的黄庙日军据点，里应配合，经激战，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7支及军用物资一批。此外，义勇队还在华山镇、河口（丰县东南）等战斗中，多次打击日军。这时，盘踞在丰县以北十字河地区的地主武装与日军勾结，屡向义勇队进攻。9月间，义勇队集中2000余人，并联合丰县、沛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讨伐，连续战斗21天，予以重大打击。由于国民党部队观望消极，以致未能取得完全胜利。战后，义勇队即分散行动，开展游击战争。

冀东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7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领导下，在河北省东北部地区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国民党军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历史上又称冀东起义。

冀东，指河北省东北部，北到长城，南到天津，东临渤海，西到昌平之间的地区。按当时行政区划，此地区有22县。

卢沟桥事变后，冀东被日军占领。1937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建立以冀东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决定。9月，中共冀东党组织领导人李运昌等，同天津教育界爱国人士洪麟阁等以及滦县民团，协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即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发动冀东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派李运昌到冀东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还成立了由胡锡奎任书记的中共平东特委。他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发展中共党的组织，领导冀东人民开展斗争，11月初，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在聂荣臻领导下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开辟了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责成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队准备挺进冀东。12月，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在滦县多鱼屯召开冀东10县人民抗日代表会议，决定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组织华北抗日联军第1支队，卫平任司令员。1938年5月，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日武装。6月，中共中央为迅速开展冀东敌后的游击战争，支援即将举行的抗日武装大起义，派邓华支队和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由平西挺进到冀东。下旬，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在田家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7月16日为冀东全区大起义日，组织抗日联军，推翻冀东伪政权，惩办汉奸卖国贼等。因起义日期为日军发觉，中共冀东特委决定于7月6日提前举行。

这天，一场震撼日军后方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起义爆发了。李运昌、苏林晏等首先在丰（润）、滦（县）、迁（安）地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在几天之内就发展到4000余人，组织了抗日联军第4总队；周文彬、节振国等领导开滦煤矿工人起义队伍，组织了一支3000余人的武装；李润民、高培之等在滦县组织了第5总队和第9总队；闫达开等在乐亭组织了第10总队、第39总队；高敬之在卢龙组织爱国青年组建的抗日武装，后来编为第23总队。此外，开滦民团和国民党军第7路军、第9路军共约三四万人也参加了这次起义。到8月底，参加起义的群众和部队约20多万人，抗日武装扩大到24个总队和区队，共10万余人。起义部队积极配合八路军第4纵队对日作战，先后攻克了7座县城，摧毁了冀东农村的伪政权，切断了北宁铁路，给北平、天津的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8月中旬，八路军第4纵队与冀东起义的抗日武装在遵化铁厂镇胜利会师。随后，中共冀东党组织和军队的负责人在铁厂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冀热辽军区和冀热辽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冀东军政领导，推选宋时轮为军区司令员、邓华为军区副司令员。下设5个军分区。中共中央还指示在延安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姚依林前往冀东，以加强领导。从而把冀东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唐山工人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7月18日，在冀东抗日武装起义中，中国共产党冀东特别委员会组织领导唐山开滦煤矿工人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

冀东沦陷后，唐山开滦煤矿工人，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们的欺凌，曾于1938年3月16日举行了有3.5万人参加的大罢工。7月18日，在中共冀东特委的统一领导下，由中共党员周文彬、节振国等组织唐山开滦煤矿马家沟、林西、唐庄子矿区的矿工举行抗日武装起义。随即组织了一支由工人参加的抗日武装。起义武装攻占了赵各庄矿区警察局，攻入了唐庄子矿，给伪警察、民团等反动武装以严重的打击，队伍迅速扩大到3000多人。日本侵略军曾调集大量兵力进行镇压，之后，部分起义工人继续在矿区周围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安阳起义

1938年8月7日，伪皇协军第1军第3师在河南安阳西曲沟举行抗日起义。

伪皇协军第1军原为国民党领导的河北独立第3游击支队，领导人为李福和。1938年3月，李投降日寇，所部编为皇协军第1军，李任军长，徐清远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全军3000余人，辖3个师。第1师师长是李福和的亲侄李英，第2师师长吴朝翰，第3师师长黄宇宙。徐清远为中共党员，是一位东北抗日将领，卢沟桥事变后，在河北一带组织抗日力量，并在林县成立了太行军民抗敌联防委员会；黄宇宙，河南人，是一位爱国军人，曾在吉林从事抗日工作，后与徐清远一起在河北组织抗日武装；吴朝翰虽为李福和的部下，对李福和的投敌买国之事甚为不满。李福和为扩充实力，将徐清远、黄宇宙拉入自己的部队。徐、黄决定以伪职为掩护，秘密掌握武装力量，待机起义。李福和得到日本人的赏识，日方许诺李担任河南省省长，以维持其殖民统治。因此，李同其侄李英更加反动，严重危害着安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此情况下，徐清远、黄宇宙联合吴朝翰共同商定起义事项。一方面慎重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派人与八路军进行联系，争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配合。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对此非常重视，刘伯承师长和陈赓旅长曾几次会见其联络人员，并对起义作具体指示，第129师敌工部还派张宏义到伪皇协军第1军负责联络和指导工作。8月6日，获悉李福和将和日军高级参谋长川等顾问及部分教官前来检阅部队，徐、黄、吴等决定趁机解决李福和以及日军顾问、教官等，率部起义。7日早上，驻安阳西沟的黄宇宙领导的第3师列队“恭候贵宾”。李福和对此甚为高兴，便和长川等日军顾问和教官下车检阅部队。黄宇宙骑马作为先导，李福和等随后，当走到队列中部时，黄宇宙举左手为信号，事先准备好的行动人员，从队列中突然开枪，当场击毙李福和、长川以及李的随从副官与几名日军教官。随同长川来的卫队经仓惶应战后逃回安阳。

第3师起义后，编入了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救国军。起义的成功，震惊了日本侵略者，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海固回民第一次武装起义

1939年1月15日，甘肃海原和固原地区的回民不堪国民党政府的压迫，自发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地处六盘山区的海原县和固原县（今均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国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格底目、胡佛爷、伊赫瓦尼和嘎德耶与大分支中哲赫忍耶派回民聚居的地区。1938年初，国民党第8战区司令长官、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以抗日为名，行反共之实，在海固地区大规模修筑所谓“国防工事”，大抓民夫，无休止地摊派各种劳役，加捐增税，兼之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使山区人民更加困苦，人民怨声四起。尤其是国民党当局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回民群众无法忍受。海原县在撰修《县志》时，公开侮辱回族人民。把回民的“回字”写成“ ”字，回民联名上告，反诬为“异党”、“叛国逆贼”，扬言不服从，定要“血洗”。国民党士兵还将猪肉挂在清真寺里，加上强奸妇女，抓走抗兵抗粮的回族农民，使回族人民的愤怒到达极点，从而被逼举行武装起义。

沙沟哲赫忍耶派第8代门宦教主马振武之侄马国瑞、马国琳，阿訇马银贵，回族青年马少净，回族农民马喜春等，分别在海原的沙沟、白崖、石坡底，固原的中河等地以讲经传教的形式联络群众准备起义。起义准备消息泄露后，马国瑞虽被朱绍良派人抓到兰州治罪，马喜春仍带人打死国民党军士兵数人，救回因抗兵抗粮被抓走的群众。不久，身陷囹圄的马国瑞托人带给马少净“大事闹起，有进无退”的“口唤”。1939年1月15日凌晨，马国琳、马银贵、马少净、马喜春等，率领哲赫忍耶教派为骨干的广大回民，在海原县沙沟、白崖，固原县的红崖堡3处同时发动武装起义。提出“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打倒欺回灭教，把回民当狗看待的国民党政府”、“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贫”、“自己武装自己”等口号。起义群众手持棍棒、刀斧，首先指向白崖红套村，攻下民团团总、联保主任、恶霸地主王国义的堡子，打死王的儿子，将财物分给贫苦群众。起义武装随即北上，攻占了李俊堡联保主任穆生春的堡子，穆被击毙，全歼其自卫队。这些行动得到海固地区的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纷纷参加起义队伍，到下旬，起义军达八九千人。马国琳为海原地区起义部队司令；马银贵为固原地区起义部队司令。起义告捷后，国民党第8战区急调4个师分由中宁、静宁、平凉3面包围起义军。起义军分两路行动。一路5000余人在马国琳率领下由海原南下攻打隆德县城，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又一个连，缴获步枪100余支，后被国民党军包围在隆德、固原交界的套马庄山梁上，经激战后突出重围，回到偏城。另一路3000余人在马银贵的率领下由固原挥师东进，在硝口利用夜晚击溃国民党军1个团。因进攻固原城未克，部队回到偏城与马国琳会师。

两路起义队伍会师后，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周围近100里内的土豪劣绅、保甲长纷纷外逃，使海、固、隆3县国民党政府的基层组织陷于瘫痪。国民党看到武力镇压不能奏效，便采用政治手段，组织所谓“宣抚慰问团”，配合军事行动收降起义军。由于起义军领导人未能识破国民党的阴谋，派代表与其谈判。国民党假惺惺地答应了起义军的条件，并利用回族人民虔诚的宗教信仰，高举《古兰经》起誓，以欺骗起义军。谈判后，起义军渐渐自动解散，国民党军进入海固地区，并诱杀了起义领导人马银贵。经过1个多月的斗争，第1次海固回民起义失败了。

海固回民第二次武装起义

1939年4月29日，甘肃省海原和固原地区的回民不堪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

1939年1月，海原和固原（今均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民第1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各路军队、地方保安队、民团及逃亡地主、豪绅、保甲长等卷土重来，大肆搜捕、迫害参加过起义的人员，激起了海固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4月，被国民党第8战区司令长官、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派人抓到兰州治罪的原起义领导者马国瑞逃回海原沙沟艾壕湾村，立即召集马喜春、马思义（马喜春的大儿子、原在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当兵，海固回民第1次起义时曾率领10多名士兵参加起义军）、马正荣、马凤歧、王文杰等人商议，决定再次举行起义。

29日凌晨，在“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回民报仇”、“救国救民，受压迫的回汉人民是一家”、“回回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等口号下，海固回民第二次起义爆发。起义分别在海原县的小坡庄、艾壕湾、固原县的红崖等5个地方同时举行。小坡庄的起义军在马国瑞、马喜春的亲自指挥下，全歼国民党军两个连，缴获其全部枪支弹药。各地的起义军根据马国瑞的命令到艾壕湾进行整编。4000多名起义军编为1个旅。马国瑞任司令、马喜春任旅长。下辖4个团，马正荣、咸成华，马凤歧、王文杰分任团长。马思义任旅司令部特务连排长。

31日晚，起义军从艾壕湾南下张家川，拟在该地区大麻子山一带深山密林中活动。6月4日晚，在固原县和尚铺与国民党军1个团遭遇，经过1昼夜的苦战，将国民党军大部歼灭。起义军声势大震，很快扩大到万余人。对此，朱绍良一面急令重兵前后围追堵截，一面组织甘肃省代表团赶到北面河进行诱降活动。起义领导人想利用谈判使部队有一个休整时间，同意与国民党代表团进行谈判。谁知国民党军利用10多天的谈判时间，完成了对起义军的合围，便拒绝了全部谈判条件（在陇东成立回民自治政府、给起义军配发装备给养、撤走包围起义军的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动用大炮和几百挺轻重机枪，组织重兵向起义军坚守的北面河两岸山头阵地发动猛烈进攻。起义军进行英勇抵抗，激战13个昼夜，伤亡3000余人。起义领导人马国瑞、马喜春、马凤歧阵亡。起义军在马思义等人的指挥下，趁天黑从老龙潭方面仅1000余人突出了重围。后来由于起义军内部意见分歧，逐渐自行解散，海固回民第二次武装起义遂告失败。

阿山起义

1940年2月—1943年初，新疆哈萨克族人民为反抗盛世才的独裁统治，在阿山地区举行了3次起义。

卢沟桥事变后，新疆临时边防督办兼省政府主席盛世才逐步撕掉了亲苏、联共、反帝的伪装，投靠国民党。政治上对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实行最野蛮的迫害，经济上对各族劳动人民也敲骨吸髓地进行剥削和掠夺，迫使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哈萨克族人民起来反抗、斗争。其主要形式是武装起义。

抗战初期，盛世才为了镇压各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曾发布了收缴枪械的命令，于1939年12月组织了“阿山（阿尔泰山）视察委员会”，在阿勒泰强迫牧民交枪，曾诱发了反抗收枪的斗争。后来，这种反抗收缴枪械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1940年2月，起义在富蕴县（柯克托海）爆发，富蕴县的牧民杀了“清枪委员会”的人员及富蕴县县长，并进攻县政府。由于众寡力量悬殊和组织领导者没有经验，起义遭到失败。1941年在富蕴县爆发了第2次武装起义。青河的哈萨克人民大都参加了这次起义。盛世才当即成立镇（西）阿（山）军区总指挥部，派遣大批军队进行镇压，起义群众曾给盛军以沉重打击，但还是由于力量悬殊而失败了。为了继续进行反盛斗争，富、青两县起义人民转移至额尔齐斯河上游，并于1942年在柯山建立了“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提出“打倒盛世才政府”的口号。由于接受了前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加强了组织纪律性。起义军作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后，于1943年初进攻乌河盛军总指挥部，几乎全歼盛军。4月，起义军攻克青河，接着南下向阜康、奇台、吉木萨尔（孚远）、米泉（乾德）、昌吉等县发起进攻，各地哈族人民纷纷起来响应，给盛军以很大打击。参加这次起义的哈萨克人，仅承化、吉木乃、哈巴河、福海等县就有2万多人，参加起义的哈萨克部落，奇台县有8部4500余人；阜康县有4部900余人；沙湾1部300余人。

阿山哈族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发展，以及和其他各族人民武装斗争的会合，为后来新疆北部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山的革命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海固回民第三次武装起义

1941年5月3日，甘肃省海原和固原地区的回族人民不堪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剥削，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1939年4月，海原和固原（今均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民第2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对海固人民的镇压更加野蛮，到处烧杀抢掠，财产损失和人员死亡无数，其中一次就杀死起义人员500多名，整个海固地区村村皆戴孝，家家闻哭声。这更进一步加深了人民对国民党当局的深仇大恨。1940年底，原起义领导者之一的马思义和冶老九、王登云等秘密商议准备第3次武装起义。他们以打零工、做买卖为掩护，走乡串户发动群众，并在白崖、红套、沙沟等地先后秘密惩处罪大恶极的地主和反动自卫队长等30多人，消灭了一批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零星部队。对此，国民党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急派第42军军长杨德亮率部到海固地区进行镇压。1941年5月3日，第42军和自卫队各一部偷袭马思义等活动的白崖子村。马思义、冶老九、王德利等3路人马正集中在该村，于是乘机起义，向前来偷袭之国民党军发动反攻，当场击毙第42军团长1名，余部被迫后撤。起义军乘胜追击，攻占穆家营，救出被囚群众。海固回民第3次起义首战告捷，部队迅速扩大到六七千人，编为一个团，马思义任团长，辖24个营。

为坚持斗争，起义军决定向张家川进军。中旬，起义军到达隆德（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时已扩大到2万余人（包括汉族人民在内）。15日，到达清水县的张棉驿时，避开了胡宗南部第191师到达张家川。因该地区回民起义条件尚未成熟，起义军不得已继续向南进军。16日，起义军在大麻子山设伏，一举全歼尾追而来的第42军黄初飞团，击溃191师1个团又1个营，缴枪1000余支。起义军在作战上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南下道路被国民党军截断，被迫回师北上，回到西吉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月底，起义军决定投奔陕甘宁边区。6月6日，部队开始北上，行至石蛤蟆时，被国民党军的2个师及地主武装包围。经20余次反复冲杀，到8日上午才冲出重围。此时，部队减员1000余人。由于起义的原领导马国琳对投奔陕甘宁边区发生动摇，起义军大部随马国琳返回海固（马本人1942年4月被国民党诱杀于兰州）。马思义率500余名起义军继续前进。几经周折，于7月初仅200余人到达陕甘宁边区，受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欢迎。后来经过联防司令部的批准，该部回族起义军改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任命马思义为团长。回民骑兵团在抗日战争和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七峪村起义

1941年8月，国民党军第5军第11团官兵为反对国民党顽军的反共磨擦政策和实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河南淇县七峪村举行了武装起义。

第11团团团长王金祥，早年曾在察北抗日同盟军中任职，参加过平地泉战役，后来在北平（今北京）被国民党以参与政治活动的罪名投入监狱。在狱中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5军军长孙殿英借抗战之机，扩大军事势力，派王金祥到河北沙河、武安一带组织武装。1941年前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4集团军新编第5军，王金祥部编为该军第11团。第11团中有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中共党组织派以张磐山为首的一批人任第11团的团、营、连各级政工干部，并秘密发展了一些中共党员。经过共产党人的宣传教育，该团广大官兵赞同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孙殿英等人制造反共磨擦极为不满。王金祥主张仿效八路军，反对打骂士兵、克扣军饷，注意群众纪律，重视和地方上层人士搞统战工作，并和安阳、汤阴、淇县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开展贸易活动，为八路军护送干部。王的行动引起孙殿英的怀疑。孙曾派特务企图收买王的炊食员毒害王，未遂。国民党军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又密电孙殿英将王“就地正法”，解决第11团。

在此严峻形势下，第11团官兵决定举行反顽磨擦政策和实行抗日救国的革命起义，并派军官乔世美（中共地下党员）到八路军总部联络。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派中共党员、王金祥部原军需处氏董自诩回到王部商讨起义具体事宜。1941年8月，王率第11团在淇县七峪村起义。起义部队东出太行塔岗、邢门两山头，计划越过平汉路到安阳以东地区活动。部队向东转移中，孙殿英与汤阴的伪军路朝元（原为孙部旅长）相互勾结，截击起义军。起义军在地方武装程道合部的配合下，在辛村集打退了日伪军的追击，俘虏了安阳伪道尹顾问福田利等5名日军。以后，起义军又在吕村集同日伪军作战。由于日军进行大“扫荡”，起义军计划在沙区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会合，但未能实现；加上部队在滑县牡丹街与日军苦战，供给困难，一些官兵思想波动，成批离开队伍。后来起义部队被国民党军新8军高树勋部编散，团长王金祥被软禁，七峪村起义终告失败。

基诺山起义

1941年11月下旬，云南省基诺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暴政，在基诺山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基诺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人口万余。聚居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区（旧称攸乐山），以农业为主，辅以狩猎和采集，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由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傣族封建领主的双重剥削，基诺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11月下旬，基诺山乡长飘白因无法完成反动当局800多名壮丁的任务，被逼服毒自杀，群情激怒。基诺族群众公推搓约为领袖，在搓约的领导下，联合哈尼、拉祜、布朗、崩龙及汉族等兄弟民族举行起义。

起义后，各族成年男子编成4个大队，大队以下以寨为单位设小队。妇女担任运输和后勤工作。并派出各族代表赴西双版纳各地，联络群众，协同作战。同时赶制武器，修筑工事，储备粮食、弹药，做好抗击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准备。12月，按照基诺族的习惯，在特制的木片上拴上铅巴、老姜和苦子果，派人送给县长王字鹅，以示宣战。次年1月，搓约、阿四、波杰率领曼卡、曼空、曼别、曼海和茨通等5寨的400多名起义军，在石干子击溃了县常备队和傣族土司兵。8月，起义军又在曼卡打败了县常备队、土司兵以及国民党思普独立营。11月，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暂编第1、第2大队及县常备队和地方团丁3000多人分路进剿基诺山。起义军在阿四、郭兴发、波杰、张伯三率领下，经过两天激战，重创国民党军。12月，暂编第2大队又从基诺山北部进攻起义军，起义军退守曼雅，在各寨人民的援助下，经过5天战斗，暂编第2大队几乎全军覆灭。1943年1月初，起义军2000多人在冷尼河设伏，又重创暂编第2大队和土司兵1000余人的进攻，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取得基诺山起义最大的一次胜利。

国民党军的进剿遭到失败后，云南省政府和滇黔绥靖公署当局，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一面派第93师3000余人分两路进剿；一面派人与起义军谈判。双方经过3次谈判，国民党军同意撤出基诺山并撤换民愤很大的景洪县县长。新的县政府也采取一些有利缓和矛盾的措施。1943年7月，搓约、阿四又率曼卡、曼海和曼贵等地的基诺族起义军将继续为非作歹的国民党军赶出了整个起义军活动的地区。从而沉重地打击与动摇了国民党和傣族封建领主在西双版纳的反动统治。从起义结束到解放前夕，无形中废止了傣族封建领主的贡赋、罚款和劳役。

湘桂黔少数民族起义

1942年4月，湖南、广西、贵州三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人民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剥削举行了多次起义。

1937年1月，湖南西部苗、汉、土家族等人民举行的革屯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对起义地区人民的苛捐杂税增加了50余种。1941年又在凤凰县实行所谓“食盐公卖”，垄断食盐销售，任意从中剥削，弄得人民无盐下饭。同时，又在抗日的幌子下四处抓丁。苗民有一曲山歌说：“国民党来了大抓丁，无钱死，有钱生，开到前方去打仗，不打日本打共军”。激起了苗民极大的愤慨。1942年4月，湘西苗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掀起了抗兵役、抗食盐公卖、抗租、抗税的“跳仙会起义”。起义首先由凤凰县发动，很快发展到永绥、乾城和贵州的松桃。起义群众高举各式原始武器，围攻乡公所、警察所，并进而围攻凤凰、乾城、松桃3个县城。在湘西苗族起义斗争的影响下，是年秋冬之交，贵州的苗、水、布依族人民，在铜仁、江口、玉屏、三穗、镇远、施秉、黄平、炉山、麻江、台江、剑河等县举行抗丁、抗粮、抗捐、抗税的武装起义。10月，起义武装先后攻占清溪、三穗、镇远、台江、剑河等五座县城。1943年，三都、水龙爆发了水族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强征民工的起义，都匀的水、苗、布依族也爆发了以“消灭贪官享太平”为口号的万人大起义。同年春，广西瑶族人民斗争的烽火也以大瑶山为中心燃烧起来，他们攻打大瑶山中心区的金秀（今瑶族自治县），捣毁了“设治局”（国民党政府为镇压瑶族人民在金秀设的军事单位，相当干警备区、署），击溃了国民党军，一度将国民党势力逐出了大瑶山区。

上述起义虽然先后归于失败，但它震撼了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并为中国共产党在当地领导的游击队发展创造了条件。

茅家岭起义

1942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的20余名党员和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军俘虏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部分战士，在国民党江西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举行了暴动。

茅家岭监狱，位于上饶以南5公里处，是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的一部分，其周围遍布国民党军政机关，戒备森严。在这里设置监狱，国民党当局认为是十分放心，万无一失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将被捕的部分中共党员和新四军部分战士关押在茅家岭监狱，进行迫害。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共产党人，组成党的支部、小组或核心组，领导大家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42年1月4日，皖南事变一周年前夕，他们高唱新四军军歌，举行纪念活动，并取得了3天绝食斗争的胜利。但他们强烈向往自由，渴望重新奔赴抗日前线。狱中中共党组织于是作出越狱暴动的决定，组成了以王传馥、李胜、陈子谷、吴越、宿士平5人的暴动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暴动。暴动委员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暴动后国民党特务可能采取的措施，制定了暴动计划，并找到了与狱外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渠道。为了保证暴动取得胜利，他们制造了种种假象蒙骗国民党特务，甚至连国民党特务打入被监禁人员中侦察情况的奸细也未察觉。直到暴动发动，特务们竟一无所知。

5月25日，日军沿浙赣铁路大举进攻，其前锋逼近上饶，国民党第3战区军政机关进行撤退的准备，担任监狱警卫的班排长以上人员均前往团部开会，狱中看守任务只由一名下士副班长负责。暴动委员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李胜等指挥下立即发动暴动。首先由杨灿、李维贡等人以洗衣为名在院内活动，突然关闭监狱大门、断绝门外特务同狱内的联系。此时，早已作好准备的暴动队员们突然冲出牢房，迅速占领两个卫士室及管理员室，缴了两挺机枪、9支步枪和数十枚手榴弹，武装了暴动队员，占领了茅家岭监狱。暴动取得初步胜利后，开始突围。门外的卫兵用火封锁了大门，大家沉着战斗，炸死了卫兵，冲出了大门。战斗中，钟表平牺牲，王传馥因负伤再次被俘，后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暴动队员们冲出茅家岭后，很快找到了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们在武夷山区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后来又返回了新四军，开始了新的战斗。

赤石起义

1942年6月17日，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军俘虏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部分指战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在中共狱中支部的领导下，于福建省崇安县赤石镇举行了暴动。

1942年5月，日军沿浙赣铁路大举进攻，其前锋逼近上饶。驻上饶的国民党第3战区机关匆忙向闽北撤退。当时，国民党江西上饶集中营里关押着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700多名干部战士和其他爱国志士。国民党当局调来大量军队和宪兵，押解他们向福建建阳转移。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被俘人士和其他爱国志士共分6个大队，每队100多人。其中第6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最“顽固”的队，戒备异常森严。但第6队的被俘人员在秘密的中共狱中支部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并积极酝酿进行暴动。5月25日茅家岭监狱暴动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在中共狱中支部的领导下，被押人员，集思广益，想尽办法，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规定了暴动的各种信号。为了麻痹押解人员，在转移途中，不许个别逃跑，并决定原新四军教导队军事教员王羲亭担任军事指挥。3个分队也分别指定了1名军事指挥。6月5日，开始向闽北转移。6日晚，到达铅山石塘镇后，国民党押解人员突然将组织暴动的主要领导人、第6队中共狱中党支部书记沈韬及支部委员周清和、黄纲培（伍国才）、王铁夫、唐金彪等5人抓走（后被杀害于福建大安），给暴动一次重大的打击。但被押难友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很快又形成了以陈念棣、王羲亭、赵天野、阮世炯、李铁飞、天征野、陈慰慈等组成的新的暴动领导核心。

6月17日下午，一行到达离崇安县7.5公里的赤石镇，押解人员准备渡过崇溪河赶到下梅宿营。崇溪河宽约100米，渡河工具很少，每次只能渡过1个分队，1个队3次才能渡过去。由于渡河速度慢，押解人员怕天晚出事，采取渡完一个队就走一个队。次序是第1、第2、第3、第5、第6队，最后是第4队。按时间计算，第6队渡河时间已是黄昏时候。河的对面是稻田，越过稻田，便可摆脱押解人员的控制，进入和五夷山支脉相连的丘陵地带。中共狱中党支部决定抓住这一时机，率领第6队渡河后举行集体暴动，便分别暗示大家作好暴动准备。第6队渡河的次序是第3、第1、第2分队。1小时过去了，第3、第1分队已渡过河，在岸边等候第2分队。当第2分队渡河过半时，军事指挥王羲亭低声哼起了暴动信号《义勇军进行曲》。大家紧张而又镇静地暗自进行准备。第2分队刚一上岸，王把手一挥，大声喊道：“同志们冲啊！”第6队立即散开，飞腾似地越过稻田，向丘陵地带跑去。暴动来得这样突然，组织得如此严密，使押解人员无所措手足，一时连打枪都忘了。国民党特务队队长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要跑啊……”。押解人员的枪响了，许多参加暴动的人已越过稻田，进入丘陵的森林中。40多名脱险者编成4个小组向五夷山深处前进。后来在该山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开始了新的战斗。

小勐宋起义

1942年6月中旬，云南西双版纳哈尼族人民，在基诺山起义的影响下，为反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举行了起义。

哈尼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内部有“和尼”、“布都”、“碧约”、“卡多”、“僂尼”等不同的自称，人口50余万。主要居住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墨江县、元江县、澜沧柱枯族自治县等地，主要从事农业。他们的居住区大部分土地为封建领主、地主所占有。长期以来，哈尼族人民曾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进行反对法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2年6月中旬，居住在西双版纳自治州小勐宋的哈尼族人民，在基诺山起义的影响下，举行反对国民党地方当局长期压迫和剥削的起义，并公推曹着、党阿2人为首领。小勐宋附近的大勐宋、布朗山、格朗和巴家村一带的哈尼族及缅甸境内的南店勐科的哈尼族，也纷纷到小勐宋联络，响应起义。

起义后，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6月底，起义军缴了国民党军一个排的枪支。8月初，国民党军第93师派一个连进占小勐宋的蛮家富罕寨，曹着、党阿带领起义军400余人，给国民党军以重创。11月下旬，起义军与第93师第279团发生激战，在打退第279团的多次进攻后主动撤退。不久，又利用夜战收复了小勐宋。1943年4月中旬，日泰侵略军1个加强营侵入小勐宋的老帕、麻卖窑寨子进行骚扰。起义军在上述地区设伏，沉重地打击并赶走了入侵者，从而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琼崖白沙起义

1942 年秋至 1943 年，海南黎族同胞为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压迫和屠杀，在白沙地区自发地举行了几次起义。

白沙位于海南中部的五指山区，是黎族、苗族集聚的地方。由于长期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这里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生活非常困苦。1939 年 2 月，日军 5000 余人登陆海南岛，国民党驻军 6000 余人一触即溃。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率部从海口、文昌、琼东等地一直退到白沙，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也逃到白沙，更加加重了黎、苗群众的负担，仅一个红毛乡，每保（国民党保甲制度中规定：10 户为甲，10 甲为保）每月必须上缴猪肉 70 斤、牛肉 70 斤、鸡 40 只、笋干 70 斤、酒 30 斤、木耳 40 斤，蜂蜜、蜂蜡、烟叶各 120 斤，银元 200 个，其它如粮食、蔬菜、草、柴草等物，随时索要。士兵们还经常下乡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有时将一村男人全部赶上山，留下妇女奸淫污辱。1942 年 4 月，日伪军向王毅部的驻地思河村一带进攻，将守备司令部隐藏的粮食以及王的私人财物掠去。王疑是当地苗胞给日伪军带的路。5 月 13 日，王以发公民证为名，将苗民集中到指定地点，一次就集体屠杀 1000 余人，激起了黎、苗同胞的极大愤怒。从而引发了白沙起义。

是年秋，起义在白沙县什阳峒爆发。起义群众与白沙县派去镇压的 100 余名武装相持 9 昼夜，也未能使 1 名武装分子进村。战争的初步胜利增加了起义群众的信心，一致推选王国兴为起义总指挥，人数增加到 3 万左右。1943 年 8 月 12 日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是年农历 7 月 12 日（公历 8 月 12 日），白沙一区群众 2000 余人袭击国民党自卫队，接着白沙各区起义全面发动，起义群众主要以土枪、长茅、弓箭、木棍等原始武装英勇地痛击国民党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一度解放了五指山区。一个月后，国民党纠集大量军队分 3 路向五指山“围剿”，起义队伍经过英勇抗击后，被迫撤至深山。接着，国民党军对黎、苗同胞进行残酷镇压；被杀害者达万余人。起义主要领导者王国兴的家乡红毛乡原有 2000 户居民，经过国民党军屠杀后不足 200 户。但是，起义群众在国民党当局血腥屠杀面前并没有被吓倒。王国兴、王玉锦、王家充、王高定、王家芳等率领一批起义群众，在深山老林中艰苦斗争，留下了革命火种。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争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几经周折，于是年 11 月，找到了儋临抗日民主政府，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委员会和琼崖独立纵队对黎、苗人民的斗争表示深切地同情和关怀，派遣干部和部队进入白沙开展工作。不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白沙抗日民主根据地便逐步建立起来。

甘南起义

1943年1月，甘肃南部地区的汉、回、藏、东乡等各族农民10万余人，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假抗战之名，对人民采取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人民生活贫困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甘肃南部广大地区的汉、回、藏、东乡等各族人民，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又受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日和实行民主制度的政治影响，揭竿而起，同国民党统治者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1941年和1942年，进步人士史鼎新（国民党西安行营少将参议）、王仲甲、肖焕章等人，在兰州、临洮多次密商发动武装起义，并与卓尼县水磨川寺活佛、藏族领袖肋巴佛、康乐县回民领袖马善福、以及马子祥、李耀山、范大、王作宾、毛克让、王得一、毛得功等联系，积极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3年1月10日前后，马福善等率回汉农民数百人，在临洮卧龙寺打响了甘南农民起义第1枪。2月中旬，卓尼县水磨川一带汉、藏群众100余人在肋巴佛的领导下，在临潭县以北的冶力关起义，攻进临潭城。27日，临洮北乡毛克让率领100余农民在马卿山起义，袭击了什家坪飞机场。3月，安华雄在皋兰率部起义，袭击皋兰县西果园汽车站，缴获一批枪支、手榴弹，使兰（州）临（洮）公路交通中断。同月，洮沙（今属临洮）杨华如率部起义，并与安华雄相配合，在七道岭截击国民党军押送壮丁的部队，缴枪100余支，释放壮丁数百人。在此期间，临洮尧甸的刘化一、南乡的李德旺、紫松乡的刘鸣，通渭的王子元，陇西、渭源的毛得功、郭化如，榆中的黄作宾、王作宾、水振东等先后率领群众举行起义。

从1月到3月，甘南农民起义席卷临洮、康乐、武山、陇西、宕昌、会川、通渭、渭源、临潭、卓尼、定西、榆中、武都、岷县、礼县、和政、洮沙、皋兰、西固等20多个县，波及兰州近郊的西果园、夏官营、阿干镇等地。

各地起义后，大部相继在临洮漫山、榆中新营镇、陇西首阳等地会师，推举毛克让为总司令，王仲甲、马继祖为副总司令，人数达3.7万人，枪支2000余支。4月初，各地起义首领100余人在岷县申都、阎井（一说在皋兰马牧）举行会议。决定起义部队番号统一为甘南抗日救国义勇军，并设总司令部，司令部下设路、旅（团）、营、连，佩戴红色臂章，提出：“开展抗兵抗粮”、“分粮食”、“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同时决定主力南下，在松潘茂州地区割据，待机而动；一部向会宁、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进军，向陇东发展，与陕甘宁边区沟通联系。不久，南下的起义军在岷县蒲麻与肋巴佛率领的藏族起义军会师，公推肋巴佛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后继续南下，在武都境内又与刘鸣和张英杰部会师，重新选举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参谋长。部队改名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辖4个路军1个番兵师。

6月，义勇军按计划两次攻打武都，未克，撤回草川崖一带。向陇东发展的部队也南下了。各路大军齐聚陇南，总数达12万余人。

蒋介石政府得悉甘南农民起义的消息后，极为震惊，先后调集主力部队2万多人、地方部队8000多人和1个空军中队前往镇压。

各路起义军先后在武山滩歌镇一带与国民党军接触，经过激战，起义军撤退。后来起义军各部分别又同国民党军作战，先后失败。起义军领导人刘

鸣、张英杰、黄作宾、王作宾、赵寿山、张守礼、董含贞等人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起义失败后，许多人仍然坚持战斗。1944年，肖焕章与毛得功、郭若如、杨友柏、肋巴佛等人会合，领导数十人的地下武装一直坚持到194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陇右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地下游击队。其领导成员肖焕章、刘余生、马继祖、肋巴佛、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吴建伟、王子元、夏尚忠、史鼎新、任谦等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解放甘肃、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出了贡献。

卧龙寺起义

1943年1月，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配合甘南农民起义，马福善等在甘南南部临洮县卧龙寺率回汉农民举行起义。

马福善是康乐县回民领袖，甘南农民武装起义领导者之一。1月10日前后，马福善根据甘南起义准备工作情况，首先率回汉农民数百人在“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反，免粮免款”的口号下，在卧龙寺举行起义，打响了甘南农民武装起义的第1枪。起义后，临洮县立即派一个保安中队前往镇压。起义部队从边家湾主动撤退，把保安中队吸引到西坪，利用有利地形向保安队发起反攻。此时，在临洮牙下集一带活动的王仲甲、肖焕章等人闻讯后当即集合60余人前来支援。两支部队在西坪相互配合作战，一举将60余人的保安中队歼灭，其中大部被俘虏，该中队中队长跳入洮河才得以逃脱性命。西坪战斗胜利后，起义部队在马福善、马继祖、肖焕章等人率领下，相继到临洮下集、庙家山等地消灭恶霸地主，夺取反动地主枪支，开仓济贫，受到广大群众的热切拥护，劳动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并在巴二山进行整编，成立了西北农民抗日义勇军，马继祖任司令员，下辖两个团。一个回民团，由刘财旺任团长；一个汉民团，由肖焕章任团长。

由于义勇军的发展壮大，临洮县县长张德熙向甘肃省政府告急。甘肃省保安司令部急调第12师一部于27日赶到临洮，兵分3路向义勇军进行“围剿”，义勇军集中全部力量，追击“围剿”军，双方经过激烈战斗，义勇军击溃“围剿”军6个连后，主动转移到岷县、陇西、渭源、漳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冶力关起义

1943年2月中旬，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配合甘南农民起义，肋巴佛等在甘肃南部临潭以北的冶力关率藏族群众举行起义。

肋巴佛是甘肃卓尼县水磨川寺的活佛、藏族人民的领袖、甘南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2月中旬，肋巴佛根据甘南起义准备工作的情况和在卧龙寺起义的鼓舞下，率卓尼县水磨川一带百余名藏、汉群众，举起“饥饿团”的旗帜，在临潭县的冶力关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率部进攻临潭县城，经过与县保安队反复冲杀，攻进县城，当即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临潭县县长、国民党临潭县县党部书记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起义军迅速扩大到8000多人。不久，与南下的甘肃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岷县蒲麻会师。会师后，公推肋巴佛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后来部队几经改编，肋巴佛改任番兵师师长。

马唧山起义

1943年2月27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配合甘肃农民起义，毛克让在甘肃南部临洮北乡的马唧乡率领农民举行起义。

毛克让，系甘南农民起义领导人之一。2月27日，毛根据甘南起义的准备工作和部分地区已经发动起义的情况，率临洮北乡100多农民在马唧山举行起义。起义后，率部袭击叶家坪国民党飞机场，击溃守卫机场的保安中队，打死其中队长；接着在新添镇击溃押运军火的40多名国民党军，缴获两车军火；以后在另一支甘南起义部队的支援下，进攻青天镇保安大队，击毙其大队长，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100余支。

3月，甘南各地农民起义军相继在临洮漫山、榆中新营镇、陇西首阳等地会师，公推毛克让为总司令。

伊盟起义

1943年3月26日，蒙古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在伊克昭盟扎萨克旗举行了起义，历史上又称伊盟事变或三二六事变。

1937年10月16日，包头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退守伊克昭盟。1941年间，国民党军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部第26师控制了伊克昭盟最高行政机关——绥境蒙政会。他们推行“反共灭蒙”的反动政策，解散抗日组织，派遣和训练反共干部，压制和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同时，国民党政府还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削弱旗政，肆意掠夺牧民的粮草和牛羊，甚至杀害蒙族群众和上层人士；国民党军还以开荒为名大肆圈占牧场，连成吉思汗陵都未能幸免。对此，伊盟盟长扎萨克旗王爷沙格林尔扎布（简称沙王）提出抗议，陈长捷不但拒绝，反而以武力相威胁，激起伊盟蒙族群众的极大愤怒，刺杀了国民党的帮凶白音仓和国民党特务数十人，陈长捷派兵报复，因而诱发了起义。

3月26日凌晨，扎萨克旗保安队在司令鄂其尔巴图、沙王长子额其尔呼雅图克、次子葛拉曾意喜、排长老赖等人率领下，举行起义。不久，起义军退出扎萨克旗，与乌审旗保安队奇金山部会合，在乌审旗中下层蒙民群众的支持下，起义军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失利，沙王被迫出走。国民党军进入扎萨克旗和乌审旗大肆烧杀抢掠，几天之内，仅被打死打伤的牧民就有180人之多。对陈部所犯罪行，连国民党军官兵也不得不说：陈部几近疯狂，军纪荡然，吊打烧杀，割身割首之残暴行为，中外罕见，古今少有。

对伊盟起义的正义行动，中国共产党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帮助。起义后，毛泽东接见了沙王的代表，成立了沙王接待处，将部分起义军接到安全地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迫使蒋介石接受沙王提出的要求，撤销了陈长捷的职务，派员“慰问”沙王。以后，伊盟蒙族各阶层人民日益倾向中国共产党，乌审旗有5个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小块抗日根据地。

伊犁起义

1944年9月2日，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等各族人民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暴政，在伊犁地区自发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1943年3月，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对牧民区居民发布给国民党军队捐献军马1万匹的命令，并规定，牧民如不缴马，每匹马可折缴新疆币700元。这个价格比市场价格高二分之一。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在伊犁、塔城、阿山3个地区，因而激起了三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在阿山武装起义的鼓舞下，掀起了反对献马斗争，并逐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1944年9月2日，伊犁地区的尼勒克县（巩恰）的哈萨克和维吾尔等族人民，在县西南的乌拉斯台举行武装起义。10月8日，起义部队攻入尼勒克县城，占领警察局，歼灭驻县城的所有国民党的部队。接着，向喀什河以南进攻，21日，逼近精河。起义爆发后，迅速得到伊犁地区维、哈等各族人民的支援和响应，纷纷参加起义军。11月7日，伊宁市也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迅速包围和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专员公署和专区警察局。9日，起义部队占领发电厂和国民党军重要据点，并切断了通往伊犁的要道，控制了整个伊宁市。国民党残余部队退守艾林巴克、空军教导队和机场等9个据点，继续顽抗。11日，起义部队占领伊宁市以西的绥定、霍城等县。12日，起义部队代表在伊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一方面着手恢复社会秩序；一方面继续进行解放全伊犁地区的斗争。截至1945年1月31日，起义部队先后攻占博乐、温泉、昭苏、惠远等县，并将在伊宁市郊飞机场等据点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全部消灭，起义部队控制了伊犁地区。

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后，即颁布施政纲领。3月8日，成立正规的革命武装部队——民族军，并制定解放伊犁、塔城、阿山3个区的军事计划。民族军根据临时革命政府的命令，从5月开始，分3步开展军事活动。9月，民族军先后占领额敏、塔城、阿山3个专区。与此同时，各地代表在伊宁市召开会议，将临时革命政府改组为伊塔阿三区革命政府，并颁布新的纲领。

三区革命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三区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但和全国日益高涨的人民民主运动相互配合，而且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公岛起义

1944年11月5日，南京伪政府所属海军练兵营一部，在渤海海峡口的刘公岛举行了抗日起义。

刘公岛，位于山东省威海以东约5公里的海上，与旅顺口遥遥相对，成为扼守渤海的咽喉。1940年3月，南京伪政府成立海军部，刘公岛成为其华北、华中、华南3个海军要港司令部中实力最强的华北要港司令部驻地。海军练兵营是南京伪政府训练海军新兵的机构，驻刘公岛。由于日伪军官的剥削和压迫，练兵营的学兵们吃不饱、穿不暖，遭受歧视和侮辱，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激起了学兵们和下级军官们的强烈不满；加上1944年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的大好形势，激起了他们弃暗投明、举义反正的决心。富有正义感的少尉队长郑道济、班长连城、毕昆山等，决心发动官兵举行武装起义，打出刘公岛，参加抗日斗争。他们以练兵营第9期士兵为主，联络和团结大批爱国官兵，秘密制定起义计划，决定利用11月5日星期天放假之机举行起义。

是日晨，日伪军官纷纷带着家属乘班船到威海游玩。下午1时，岛上的士兵开始放假。1时30分起义开始，参加起义的100多名士兵在总指挥郑道济的指挥下分3路投入战斗。第1路由毕昆山、刘国璋率领占领日军辅导站，砍断海底电缆，破坏电话总机和电报局，使岛内外联系中断。第2路由连城、崔大伟率领，迅速占领伪威海卫基地队司令部，司令部许多守兵也参加了起义。第3路由郑道济、柯柏毕率领，轻取西炮台。随后，又缴获了“同春”舰。不到两个小时将刘公岛上的所有日伪机关及5个派遣队全部解决。下午5时，乘船回岛的日伪军十几名军官刚走上栈桥，便被击毙。当晚12时，参加起义官兵600余人，分乘“同春”号运输舰和“日生利”、“东海”等4艘舰船驶离刘公岛，于6日晨在双岛港西岸登陆后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前进，受到八路军东海军分区的热烈欢迎。22日，经山东军区批准，起义部队命名为山东胶东军区海防支队，郑道济为支队长。从此，刘公岛起义的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转战南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海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融水起义

1944年12月2日，广西融水县苗族、侗族同胞，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剥削，在融水中部地区举行起义。

1944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融水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4万余国民党军和大批难民向融水县山区苗、侗等民族聚居区撤退。国民党军所到村寨抓兵拉夫，强派粮饷，增加捐税，抢劫财物、粮食、猪羊，使本来就很不贫苦的山区人民，更加痛苦不堪，激起苗、侗同胞的愤怒。一次国民党军一个排的士兵到侗族聚居区荣地寨催缴粮款，因一无所获，砸了7户侗民的锅灶，该寨80多名侗族同胞义愤地缴了该排的武器。国民党军为了报复，调集700余人向荣地寨进攻。侗民一面赶制刀枪，准备战斗，一面派人分赴翁中、高王、良双、良垅、乌杏、杏梦、茅坪、寨劳等苗寨求援。苗族人民正因寨劳寨老贾老喜的儿子被国民党抓兵而敲诈银两、高基寨两个苗民被国民党士兵无端殴打事件酝酿暴动，于是纷纷响应。

12月2日（农历10月17日），以高王寨贾建忠（苗民波兄）为首，翁中寨的梁志连（苗民戈粼）、梁老祥（苗民戈梭）、良双寨的李宏志（苗民戈彭）、培秀寨的梁汉忠（苗民银桑）、杏蔓寨的梁戈叟、寨劳寨的贾老喜（苗民果杰）等苗民寨老和荣地寨侗族潘戈挺巡、潘永安，在荣地与翁牛之间的老山冲里召开会议，以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为目的而制定起义计划，要求各村寨团结一致，将老弱人口转移到深山老林，各村寨赶制刀枪、深设陷阱，以土炮为号，抢占各山头坳口，以待国民党军的进攻。各村寨随即分别“埋岩”（饮血酒盟誓）。7日，集结到荣地寨的苗族暴动队伍达700多人，分布在荣地寨周围的8个苗寨村寨的暴动队伍达3000余人。整个荣地寨地区刀枪林立，鼓角阵阵，一场苗族、侗族同胞参加的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起义从此开始。

国民党军得知两族群众联合起义，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掘壕据守，相持10多天后向贵州方向撤去。从此，起义队伍完全控制了融水中部地区，国民党当时的县长也被撤职。苗、侗聚居区的征兵、征粮、征税暂时无人追收。起义的领导者们见反“三征”目的已基本达到，兼之为时两月，粮食已成问题，决定起义队伍各撤回本寨，寨老们保持联系，以防不测。1945年6月，国民党新任融水县县长吴一峰派4名便衣特务偷闯苗区，逮捕了高王寨寨老贾建忠，幸被翁牛寨寨老梁志连发现，聚集群众救出贾建忠，并将前来接应的30多名武装警察全部缴械。7月底，吴一峰派人与起义的寨老们“谈判”，企图将寨老们一网打尽，其武装警察反被7个苗寨的群众反包围。8月，接替吴一峰任县长的刘毅，对苗、侗人民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到1946年秋，部分寨老出席了刘毅召开的关于由县政府出资修建土地拗鱼塘的座谈会，至此，苗侗两族群众起义才告结束。

这次起义，不仅取得了反“三征”的胜利，而且为1949年柳（州）北（部）游击解放总队第4大队开进苗族侗族聚居的山区，开辟游击新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

1944年12月，广西东南地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

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一败再败。11月，日军沿湘桂铁路南下，攻占桂林、柳州、南宁后，又分路向桂东、桂西和桂东南进犯，整个广西被分割成几块，桂东南孤悬敌后。早在5月，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将成敌占区，党应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向我们的无理进攻，应适当进行自卫。8月，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了“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开展游击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八月决定”。并决定由省工委书记钱兴和副书记黄彰分别在桂东北、桂东南开展工作。10月上旬，黄彰在木格社塘召开桂东南各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八月决定”，并成立以黄彰为主任的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对抗日武装起义作了部署，随即掌握了部分乡、村自卫队。

12月11日，日军侵入贵县，国民党保安队闻风而逃。此时120多名日伪军乘船从贵县逆江而上，进犯香江乡。黄彰调集乡自卫队和谭村、赖村、姚村等自卫队，在郁江最险急的大角滩两岸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大队长渡边一郎中佐以下官兵32人，生俘日军横山小二郎，缴获木船18艘及大批武器弹药。从而打响了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的第1枪。

大名起义

1945年1月16日，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突击团在冀鲁豫军区八路军的配合下，在河北省大名城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

1941年8月，国民党军新编第5军第11团团长王金祥，率官兵在河南省淇县七峪村起义失败后，王被国民党军新8军高树勋部软禁。同年12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部队将王营救出来。王被营救后，到回隆一带执行改编地方武装程道合、李成华等部的计划。1942年夏，王利用日军扩编伪军的机会，组织伪东亚同盟自治军，自任军长，程希亚任副军长，张履亭任军部突击团团团长。自治军下辖3个旅，每旅辖两个团。从1942年冬到1944年8月，王以军长身份，经常掩护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在日军占领区开展工作，中共的力量在王部特别是在突击团中的力量逐步壮大。八路军总部曾派靖任秋到王部协助整顿部队，准备配合反攻，举行起义。王、靖的行动引起日军的怀疑，于1944年8月免去王的军长职务，靖脱险回到八路军总部。随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人到北平将王金祥接到抗日根据地，并让王担任策动驻在大名城的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突击团的起义工作。王金祥受命后，派张蔚林、任玉功（女）潜入大名，与突击团团团长张履亭取得联系。张同意率全团起义，参加八路军，并派联络人员参与张蔚林等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八路军派陈中民为团长的第23团到大名城东门外策应。

1945年1月16日黄昏，张履亭根据王金祥下达的命令，于零点发出起义信号，南城首先被起义军打开。东城门起义军一个排消灭了专门在大名城监视突击团的日军一个中队的一部，俘虏了守门的伪警备队，控制了城门。在城外策应起义部队的八路军第23团当即入城，分别向各自的目标攻击。第8连包围张小街伪军长公馆，处决了中将伪军长刘昆；第2连处决了伪军参谋长檀松甫和参谋处主任、日本特务吴寿彭；另一部和突击团歼灭了上尉中队长滕本和角谷小队率领的20多名日军。至此，除城东南角日军据点未拔除外，城内伪军警、伪政府及其它伪组织均被解决。

参加起义的部队除突击团全部外，还有伪自治军军部及该教导团部分人员、伪警备队一部。起义部队奉命撤出大名到河南清丰县杨楼一带，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抗日游击队第1纵队第1团，王金祥任纵队司令员。起义部队在对日反攻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贡献。

广四起义

1945年2月20日，广东省广宁、四会两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

广宁、四会两县位于西江下游北岸，地处粤桂边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群众基础较好。1944年秋，日军占领四会后，又沿西江北岸向广宁、怀集推进，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西江人民纷纷自发地进行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决定由欧新、唐章等负责成立西江临时工作委员会，尽快恢复各地中共党组织，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45年2月16日，欧新在广宁县排沙三角村小学召开广宁、四会两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成立武装委员会，欧新任主任，陈瑞琮为副主任，并决定于23日在广宁的排沙、荷木、四会的黄岗等9个地区同时举行起义。因高誉铃、陈应燊两位共产党人被人告密杀害，武装起义委员会决定于20、21日提前举行起义。

20日，以国民党排沙荆绥乡副乡长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党员陈瑞琮率30名武装群众，智取国民党顽固派肇清师管区驻排沙补充营营部，缴获武器弹药一部，正式宣布广宁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欧新在石涧、扶罗带领20多人化装成国民党便衣“护航队”，在白天袭击顽军扶罗炮台。当晚，起义武装在紫荆坑与排沙起义武装会合后，一起西渡绥江，在罗汶一带活动。江屯的中共党人熊奕轩、练秀文等率30多人的武装进攻阿公坑山区，并宣布起义。坑洞口的中共党员伍学桢、江进生也把起义武装拉进山区。21日，中共四会县委书记陈德率50多人秘密向广宁进发，23日与广宁起义武装在罗汶会师，成立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共200多人，分广宁和四会两个大队。陈瑞琮、黄中分任大队长，分散活动于绥江两岸地区。

1945年3月，中共西江临时工委撤销，成立中共广宁中心县委，王炎光任书记。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起义武装进行了多次“围剿”，起义武装奋力抵抗，取得了许多胜利。5月，珠江纵队在梁嘉、谢斌、刘向东率领下于19日在罗汶与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湘赣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实施，把西江地区的抗日斗争推向新阶段，并为解放战争时期粤桂湘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基础。

桂东南抗日反顽武装起义

1945年2月26日，为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在中共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的领导下，桂东南人民举行了抗日反顽的武装起义。

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广西后，国民党军纷纷溃逃，国民党广西当局躲到黔桂边境的乐业一带。广西人民受尽日本侵略者的蹂躏，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抗日。在桂东南地区成为孤悬日军后方的艰苦条件下，中共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担负起领导桂东南人民抗击日军的艰巨任务。在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的组织领导下，桂东南人民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不断打击日军，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

但是不久，闻风而逃、躲入木樟山中的国民党贵县副县长兼保安大队大队长钟鼎，却回过头来毫无道理地命令桂东南游击自卫队将起义武装的一切缴获品交给他们，并扣押了中国共产党派往贵县负责军事的干部，杀害3名自卫队员。以后又将著名抗日将领张炎将军杀害。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桂东南人民的坚决反对。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发动人民起来抗日，并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黄彰以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号召各界爱国抗日人士起来制止反共内战，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并号召国民党内的爱国官兵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2月26日桂东南各地人民抗日反顽的武装起义全面爆发。在办事处领导下，贵县、博白、陆川等县先后成立了人民抗日自卫队等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2500余人。3月2日，黄彰率起义武装与谭留科、谭镇邦、赖志廉率领的木格地区、香江地区的起义队伍在香江乡赖村集中，先后攻下六永、东平、亭子、大江、思怀、龙塘、仁厚、蔡阳、城隍等20多个乡公所，镇压了伪、顽特务和反动地主、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起义在桂东南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3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调集正规军、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对抗日起义部队进行“围剿”。起义部队进行了20多天英勇反击，取得了一些胜利，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了。黄彰、吴家宜、李云蒿、张熙和、谭留科等200多名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阵亡，数十个村庄被国民党顽固派烧毁和洗劫一空。

洛宁起义

1945年7月17日，国民党军第38军第17师师附刘威诚率部3000余名官兵在河南省洛宁县起义。

国民党军第38军渊源于杨虎城1908年在陕西蒲城县组织的反清抗暴兄弟会，1914年被编为蒲城县民团，开始列入军队序列。此后，部队逐步发展，番号几经更迭。1930年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后又改编为第38军。1935年前，中共地方组织、红军有关部队和中共党员个人就开始与杨虎城交往共事，1935年以后，中共中央与杨虎城取得了直接联系，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采取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军地结合的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部的工作。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等倾注了大量心血，八路军总部、中共西北局、华北局、晋冀鲁豫中央局、陕西省委和其他一些组织也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使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一直拥护中共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团结合作，在参加北伐、参与发动西安事变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毛泽东主席曾称誉这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这支部队痛恨万分，采取种种阴险手段，进行分化吞并，打击迫害，企图消灭部队中的进步力量。1944年初，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第38军军长赵寿山调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反共干将张耀明担任军长。张耀明一到任，就公开叫嚷“38军有共产党”，开展所谓“自首”运动，接着又采取种种阴险狠毒的手段，妄图彻底搞垮这支爱国武装。

中共中央了解到第38军的艰难处境后，委派当时在中共中央学校学习、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周仲英、张西鼎前往第38军了解情况，帮助工作。行前，毛泽东主席亲自同他们谈了话，指出：第38军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你们去后，要肯定他们的成绩，和他们一起工作。毛泽东主席还对如何帮助第38军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周仲英和张西鼎到达第38军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整顿了地下党组织，稳定了思想，促进了内部团结。

第17师组建于1930年，首任师长杨虎城，一直是杨部的主力，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较多、工作基础较好的一个师。张耀明任第38军军长后，首先向第17师开刀。1944年5月，他以第50团营长尤继贤在一次紧急集合中迟到5分钟为借口，撤了尤继贤的职；1945年初，又以第51团团团长刘威诚在电话里顶撞师长为由，说要处决刘威诚，编散第51团；6月，蒋介石决定派大批军校生接替第17师连以上军官。7月初，蒋介石调孙蔚如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张耀明也将刘威诚调离第51团，任命刘威诚为第17师师附，并准备编散第51团。

7月13日，第38军地下工委召开了第17师地下党员紧急会议。认为第17师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不能坐以待毙，应当立即起义。会议还研究决定成立起义行动委员会，指定刘威诚为行动总指挥，梁励生负责党的全面工作，并指定了各团负责人，决定7月17日利用编散第51团归还新建制的机会举行起义。7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河南军区政委戴季英、河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韩钧和周仲英，指示：“为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消灭进步势力、

准备内战的阴谋，必须将我党能掌握的第 38 军部队坚决拉到你们地区。” 15 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鱼化龙向第 17 师地下党员传达中央指示。同一天，第 17 师代师长李维民召集营、团长会议，正式传达国民党编散第 51 团的命令。

17 日，第 17 师以编散第 51 团归还新建制为掩护，开始了起义行动。第 50 团一部配合师特务连，扣捕了代师长李维民，解决了由反动军官任连长的师直工兵连、搜索连；第 51 团迅速解决了师直辎重营和师政工人员等；同时，切断通信线路，控制渡口，准备渡船，加强交通要道警戒，准备携行装备物资，组织家眷随行等工作也都按预定计划展开。

18 日凌晨，除第 49 团团部和 1、2 两个营因个别负责人犹豫动摇未能参加起义外，全师 3000 余名官兵集结师部。刘威诚宣布由他和张复振、梁励生、徐又彬组成指挥部，部署了行军序列、行进路线和当晚宿营地，并对起义部队强调了纪律，提出了要求。临行前，他们研究决定释放了被扣押的代师长李维民。在起义指挥部的指挥率领下，第 17 师起义官兵迎着晨曦，踏上了向解放区开进的征程。根据地下工委决定，新第 35 师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军官，也在当天赶来加入第 17 师起义的行列。起义部队饥食干粮，渴饮溪水，夜宿山巅，机警地通过了友军阵地、民团防地和日军占领区，隐蔽地躲过了国民党军飞机的盘旋侦察，于 22 日顺利到达八路军河南军区第 2 军分区驻地，受到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7 月 25 日，中共中央致电起义的国民党军第 17 师，对起义官兵表示慰问，使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

1946 年 9 月 13 日，第 17 师与第 38 军的其他起义部队合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 38 军，孔从周任军长，汪锋任政委，刘威诚、陈先瑞任副军长，王汝昭任参谋长，张复振任第 17 师师长，杨健任第 55 师师长。

蔡云翔等驾机起义

1945年8月20日，伪汪精卫政府空军航校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蔡云翔）等6人驾驶一架汪伪立川99式双引擎单翼运输机“建国号”从扬州起飞直抵延安机场。之后，又有一批汪伪空军人员连同家属，先后离开扬州到达苏北解放区。此举即轰动全国的汪伪空军扬州起义。

汪伪空军始建于1941年。是年6月，汪伪于江苏常州成立空军军官学校，招训飞行学员，后改为空军教导总队，1945年7月迁搬扬州。教导总队有由日本海军供给的93式、95式、99式教练机20余架，飞行人员和教官30余名。汪伪空军实际上是汪伪政权的一个装饰品，无战斗力。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部分误入歧途的汪伪航空人员，厌憎汪精卫的卖国行径，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决心谋求一条光明正道。

1944年底，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汪伪空军上校参赞何健生、上尉飞行教官吉翔一起商议前途和出路，他们都是从国民党空军误入汪伪空军的，感到汪伪政权垮台后，国民党那边不能回去了，只有投靠共产党。与此同时，少尉飞行员黄哲夫（于飞）由于对现实不满，被汪伪空军以“思想不良”开除，也决心起义。1945年3月，黄哲夫在南京找到周致和，密议起义之事，并分工由周致和寻飞机、黄哲夫去与共产党联系。

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和周折，起义准备工作日臻成熟。周致和积极争取汪伪航空训练处高级教官室少将主任白景丰（白起）起义，因为扬州有机场，有飞机，空地勤人员都集中在那里。黄哲夫在安徽宣城找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然后经引荐，7月到达浙江长兴县天目山的苏浙军区，受到军区司令员粟裕接见。粟裕将汪伪空军人员准备起义的重大情况，立即电告新四军军部和延安党中央。3天后，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

7月底，周致和、黄哲夫、白景丰、何健生、吉翔和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炸员秦传家等人在南京珠江饭店秘密开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争取更多汪伪空军人员参加起义的方案，分空中与地面行动：空中，由周致和、黄哲夫等负责，从南京或扬州机场驾机直飞延安；地面，由白景丰、何健生等负责，从扬州率领地面人员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8月中旬，汪伪湖北省省长、原汪伪陆军部部长叶蓬接到蒋介石的“电谕”，要其从南京急飞回汉口，上任国民党第7路先遣军总司令职，指名要周致和驾驶“建国号”座机担任飞行任务。这是一架日本99式双发动机单翼运输机，具有容油多，续航时间长等优点。周致和、黄哲夫等决定抓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运送叶蓬之机举行起义。8月19日上午，周致和等机组人员将叶蓬送到武昌后，当日立即返航，但没回南京，而是着陆扬州。他一面派人与去杨家庙解放区的黄哲夫联系，通过江北新四军向延安中共中央发电：“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一面贿赂汪伪空军上校航空队长彭鹏，为“建国号”作了检查并加足油料。20日，正好是星期一，按国民党的惯例，上午8时要举行孙中山“纪念周”，扬州汪伪空军的“纪念周”由彭鹏主持进行。这时，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黄哲夫、赵乃强（张华）、管序东（顾青）、空勤机械士沈时槐（陈明秋）、黄文星（田杰）等6人登上飞机，旋即马达轰鸣，“建国号”腾空而起，展翼北飞。机上，周致和任正驾驶，赵乃强任副驾驶，黄哲夫负责领航，沈时槐、黄文星负责机械，在没有地面导航的情况下，凭借指南针和航空图，靠惊人的毅力和熟练

的技术，经过 6 个多小时的艰难航行，终于在当日下午顺利降落延安机场。21 日晚，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领导接见了机组人员，28 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等同志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起飞前，特地在机场接见了周致和机组全体人员。为了纪念周致和机组的正义之举，八路军总部把这架飞机编为“820”号。

“建国号”起义后，紧接着在两个月内，有汪伪空军上校参赞何健生、上尉飞行教官吉翔、机械士陈静山、扬州航空处少将白景丰、国民党空军第 8 大队轰炸员秦传家和部分家属近 20 人，先后分别从南京、扬州分 3 批到达苏北解放区。

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蒋介石蓄谋打内战的重要时刻，周致和机组及白景丰、何健生等人的起义行动，开创了从敌人营垒中驾机起义、率领敌伪航空人员投奔革命的先例，加速了汪伪政权的崩溃。不久，这批汪伪起义人员按中共中央安排，奔赴东北解放区筹建中国共产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为人民空军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柳林起义

1945年8月20日，国民党军第3路军第56师师长魏凤楼率领官兵3000余人在河南省淮阳柳林举行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和削弱了国民党军在豫东的势力。

豫东，位于豫、皖、苏、鲁4省结合部，东靠津浦路，西临平汉线，北跨陇海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中共豫皖苏、冀鲁豫根据地，同时也是国民党第3路军的驻防地。该路军第56师驻扎在河南淮阳柳林，师长魏凤楼原属西北军，1926年3月被冯玉祥作为青年军官第一批送到苏联学习军事，归国后随冯玉祥参加北伐。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魏凤楼不愿投蒋，解甲在北平闲居。“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派魏凤楼到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系，商讨抗日事宜，北方局建议他回河南原籍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回到河南，魏凤楼在许昌、商丘、西华、扶沟组织了近3000人的抗日武装，遭到河南省主席刘峙的反对和刁难，只好跑到泰山与冯玉祥一起过隐居生活。

1937年底，魏凤楼回到豫东西华县，与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取得了联系，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以国民党身份组织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团”进行抗日。1939年被卫立煌授予第一战区游击第1纵队番号。1944年在豫西陕州被日军包围受伤被俘，交送开封伪军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当年9月，在开封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魏凤楼逃离开封，重返西华，加入了伪军第4方面军张岚峰的军队。1945年被张岚峰提升为国民党第3路军第56师师长。

中共党组织对魏凤楼十分关注，派人协助他巩固和发展部队，并安排冀鲁豫军区地下党李苏波和淮阳县敌工部长叶本瑞亲自做魏凤楼的争取工作。8月1日，中共冀鲁豫党委敌工部副部长魏克仁亲自到西华，代表党组织向魏凤楼宣布恢复他的党籍。从此，魏凤楼开始精心策划和实施起义工作。

为了扫除起义障碍，魏凤楼安排心腹将张岚峰派来的军法处处长张冠五秘密处死，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商定起义方案和日期。8月20日凌晨，魏凤楼以演习为名，紧急集合全师部队。接着，将营以上军官集中起来，宣布起义计划，指出起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了部队纪律。魏凤楼起义的号召，得到了军官们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冀鲁豫军区和第12军分区派出的部队也秘密开进柳林。在师长魏凤楼的指挥率领和八路军接应部队的掩护下，第56师3000官兵从淮阳柳林出发，昼夜兼程，顺利开进解放区，起义获得成功。

起义后不久，第56师被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豫东支队，魏凤楼任司令员。

鄆城起义

1945年9月20日，国民党军第3路军第18师师长杜新民率部5000余名官兵在河南省永城县鄆城举行起义。

杜新民，1923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在西北军将领、中共党员吉鸿昌的影响下，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1939年经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九的介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抗日战争初期，杜新民在国民党第26路军第27师第80团任团长，1940年5月到张岚峰部任教导团团长。1941年2月，中共豫东特委指派在教导团的地下党员王飞霄和杜新民接上关系，要求他“积蓄力量，长期隐伏，待机起义”。由于杜新民才能出众，得到了张岚峰的器重，1944年3月升任第18师师长，率部驻防鄆城。

杜新民掌握了兵权之后，中共中原局、冀鲁豫区党委和豫东工委，先后派胡贵民、陈振声、姜士平等人打入第13师，在第18师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杜新民任书记。为了充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杜新民逐步将所属第69、第70、第71、第72团团团长调换成共产党员或亲信，将一些思想反动的军官提升外调，并从教导团选调一批进步力量充任基层军官。1944年秋，新四军第4师到达津浦路西后，又派出刘鲁民、李杰、郭英等20多名得力干部打入第18师，为该部队起义进一步创造了良好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张岚峰部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第3路军。日本投降后，新四军派第4师敌工部部长王子光到第18师，向杜新民传达中央关于“准备起义”的指示。经过认真策划，杜新民制定了起义方案。

9月20日正逢中秋节，杜新民利用这一传统佳节邀请全师营以上军官饮酒赏月，并安排张岚峰的亲信、副师长刘文耀外出办事。深夜12时，新四军接应部队发出信号，杜新民立刻下令拆除电台，切断了与张岚峰总部的联络。接着，马上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宣布新四军已兵临城下，现在唯有弃暗投明、跟着共产党走，才能一洗当伪军的耻辱，号召部队举行起义。第70团团团长、共产党员邢剑五立即带头响应，其余官兵也纷纷响应。杜新民立即派出便衣队长李杰，请新四军全权代表王子光当众宣布第18师起义，改编为“豫东人民自卫军”，杜新民任指挥官。在杜新民的指挥和新四军接应下，第18师所属4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共5000余人，星夜出发，井然有序地向解放区开进，第2天，按计划顺利到达永城，起义获得成功。

23日，新四军第4师师长张爱萍、政委邓子恢、副师长韦国清和参谋长张震等联名发来贺信，祝贺杜新民率部起义成功。不久，豫东人民自卫军改编为解放第二军，杜新民任军长，后与华东人民野战军第9纵队合并，杜新民任纵队副司令员。

安边起义

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新编第11旅代旅长曹又参率领2000余官兵在陕北安边起义，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次较大规模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

陕西北部的安边、定边和靖边三城，是蒙、回、汉三个民族聚居区，是陕北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也是北方的军事要镇。其中定边、靖边属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安边则由国民党新编第11旅驻守。该旅的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当初，谢子长、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该部任职，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这支部队改编为新编第11旅，1932年春与新编第10旅合编为新1军，邓宝珊任军长，陈国宾任第11旅旅长，曹又参任第11旅第1团团长。新11旅1937年6月驻防安边，由于邓宝珊对中国共产党态度友好，第11旅与八路军友好相处，共同抗日，不少官兵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第1团团长曹又参、参谋主任王子庄等就是进步势力的代表。

1944年4月5日，第11旅旅长陈国宾病故，邓宝珊决定由曹又参任代理旅长。曹又参任代旅长后，积极调整干部，安排共产党员李树林为第1团第1营营长，同时，在13个连队中安排了11个共产党员任连长，使第1团基本上为共产党所掌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一面指示阎锡山、傅作义、孙连仲对绥远、上党、邯郸解放区发动进攻，同时指示第一战区胡宗南做好进攻延安的准备。胡宗南对驻防安边的第11旅不放心，决定将该旅调往包头接受改编。曹又参得到调防改编的消息后，亲自到榆林向邓宝珊请示。曹离队后，胡宗南密谋将第11旅第2团从宁条梁调进安边城，企图以武力解决倾向革命的第1团，并派复兴社分子张鼎臣、任怀义率卫士10余人窜入第1团防区，采取封官许愿、造谣惑众等手段，对第1团内部实施分化瓦解活动。中共定边地委获悉这些情况后，认为形势紧迫，立即请示中共中央，决定10月25日策动新11旅举行起义，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了加强对起义的领导，中共定边地委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科长葛申和前来定边汇报情况的新11旅地下党员冯世光、王子庄奔赴安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并派八路军警备第3旅参谋长张文舟率边区2个团、1个营赶赴安边支援起义。

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葛申等召集地下党员会议，制定了起义方案，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由第1团团附牛化东担任起义总指挥，旅部参谋主任王子庄为副总指挥。

10月25日拂晓，由旅部和第1团2000余官兵组成的起义军开始行动。首先，起义军向旅部发起进攻，扣押了副旅长吴棻、参谋长石佩玖以及安边县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公安局局长等人。接着，起义军占领并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当日下午，八路军警3旅4个连进入安边，与起义军共同占领城关4个大门，城内秩序井然，秋毫无犯。27日，起义军与八路军警3旅在安边召开了会师大会，王子庄宣布，新11旅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举行武装起义，并宣读了坚决消灭第2团反动势力的命令。为了让代旅长曹又参返回部队参加领导起义，牛化东急向榆林邓宝珊致电称：“第2团以武力解决第1团，正在对峙中”。邓宝珊接电后，急令曹又参星夜返回安边处理

“冲突”。曹又参回安边后，高举起义的旗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新 11 旅起义的通电，向全国宣告起义。

新 11 旅第 2 团团团长史舫城得知第 1 团起义的消息后，一面急电胡宗南派部队增援，一面在宁条梁部署顽抗。为了巩固新 11 旅的起义，八路军警 3 旅决定歼灭第 2 团。10 月 28 日，八路军在起义部队一个营的配合下，分三路向第 2 团发起进攻。第 2 团凭借暗堡和外壕等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战斗持续了 4 天，11 月 31 日拂晓，宁条梁终于被攻破，第 2 团团团长史舫城等 100 余人被击毙，800 多人被俘，400 余人仓皇溃逃。

战斗结束后，起义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 11 旅，曹又参任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任参谋长，部队仍驻防安边、宁条梁一带。起义后不久，中共中央领导在延安接见了曹又参，毛泽东主席握着曹又参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你们是火车头。”为此，《解放日报》发表了《11 旅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火车头》的社论，充分肯定了起义的巨大意义和历史功绩，指出这次起义不但巩固了陕北三边的防务，而且为反蒋反内战树立了一面旗帜。

1947 年，曹又参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解放军一名优秀指挥员。在解放战争中，新 11 旅官兵英勇战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贡献。

察素齐起义

1945年10月27日，在绥远战役中，国民党军第10路军第9师300余官兵在察素齐举行起义。

国民党第10路军第9师，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傅作义收编的伪蒙古军防卫第16师的一部分。师长云继珍，李秀山任该师上校参谋长。李秀山是蒙古族，呼和浩特市人，北平蒙藏学校毕业，曾任伪蒙古军游击2大队代理团长。1938年夏，日本人把蒙古游击第2大队整编为第18团，1939年3月归属伪蒙古军骑兵第6师，李秀山先任团长，后任师副官长。当时中共绥西地委民族工委就派地下党员李森打入该团做争取李秀山的工作。直到1940年李森任大青山蒙古游击队队长后才离开蒙古军第6师18团。抗战胜利后，蒙古军四分五裂，各自寻找出路。李秀山决定把部队从包头带回归绥蒙古军总部。1945年8月18日，中共部队从包头出发，途中意见分歧，被土默特旗总管荣祥部殷石林拉走一大部分。李秀山等带残部到归绥后，蒙古军总部即令其到防卫第16师任师代参谋长。后又被傅作义改编成国民党第10路军第9师，师长云继珍，李秀山任参谋长，云麟是副官长，荣景贤在师部任参谋。由于傅作义对伪蒙古军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政策，使李秀山和云继珍等人决定另找出路。

194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察冀军区郭天民、杨成武、陈正湘3个纵队，晋绥军区之第358旅、独立第1、2、3旅，绥蒙军区骑兵旅，共5.3万人，由贺龙、聂荣臻两司令员统一指挥，发起了绥远战役，迅速歼灭了敌伪有生力量1.2万余人，解放了广大地区。与此同时，在部队开展了关于党的民族政策和瓦解敌军方针的教育。

当八路军准备向西推进，围攻归绥的消息传开后，云继珍、李秀山等几人经过商量，决定去投靠八路军，并派出荣景贤到八路军第120师联系部队起义问题。荣景贤去120师后受到了接待和教育，认清了形势、出路与前途。荣回到部队，把联系的情况向云、李等人介绍后，他们当即决定第二天率部队向萨县进发。随后召集4个连长开会，讲明了情况，都愿意投奔八路军。次日出发时，云万胜连长说他们的人带不定，云继珍当即表示“投靠共产党八路军，走的是革命路，不强迫，谁愿意谁就走，谁不愿意谁别走。”遂同意云万胜留下，即率其余部队300余人从三间房村出发。当走到公布村时，碰到了李森派去的送信人，信的主要内容是奉劝第9师官兵认清形势，赶快弃暗投明，指出唯一出路就是武装起义。看完信，云、李等人研究决定，直接去找李森。他们认为，李森是八路军，又是蒙古人，有话好说。于是就派荣景贤去联系。荣到察素齐与李森商量后，李也将此事向察素齐市委书记罗中群作了汇报，罗同意接受这支部队起义。

10月20日，李森领着云、李、杨（原伪蒙军总部汽车队中校队长杨德兴）去毕克齐晋见绥蒙军区姚喆司令员。姚司令员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更坚定了他们起义决心。

10月27日，云、李、杨部正式宣布起义，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2支队”，云继珍为支队司令员，李秀山为参谋长。驻当地的八路军和地方革命政府对他们表示了热烈欢迎。这次起义对于绥远战役的胜利和团结各民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有着重要作用。

邯郸起义

1945年10月30日，在邯郸战役中，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1.3万余人在邯郸马头镇举行起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在美军援助下调集军队抢占华北、华东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准备向解放区进攻；一面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举行谈判。8月15日，蒋介石命令第一战区所辖之新8军，占领河南省新乡、安阳一带各要点；9月19日，又将新8军编入第11战区，并任命原新8军军长高树勋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10月，国共两党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却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先后调集了4路大军进犯华北解放区。其中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由郑州沿平汉路北进，妄图打通平汉路，进入平津，抢占东北。10月14日，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奉令率领所辖第30军、新40军、新8军与河北民军等共4万余兵力，从新乡出发，于25日进至河北省之磁县马头镇一带，严重威胁着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城市邯郸的安全。

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下，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调集主力3个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约6万余人，在10万民兵的支援下，对进犯的国民党军形成包围之势。

高树勋是一位爱国将领。1989年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高全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十几岁就外出当学徒工，后投奔到冯玉祥西北军当兵，从士兵升任到师长。1926年9月参加北伐战争时，曾在冯玉祥国民联军中任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将军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骑兵军军长，举行察绥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冀鲁豫边区一带进行抗日活动，与八路军相互支援合作抗日；并于1940年12月处决了大汉奸石友三。

1945年8月，高树勋给彭德怀写信，希望同解放军建立联系，并派在该部工作的幕僚王定南前往解放区送信。他对蒋介石企图通过内战既消灭共产党，又兼并非嫡系杂牌军的阴谋十分不满。在奉命北上进攻解放区的紧要关头，他说：“抗战刚刚胜利，亿万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建国，我怎能再造内战孽端；抗战八年，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民族浴血奋战，我怎么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去向八路军进攻。”高树勋的进步表现引起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的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陈毅和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都表示要努力争取高树勋转变到革命人民一边来。为加强对高树勋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批准组成了由王定南任组长、田树青、周树一、唐宏强等参加的中共在高部的工作小组，以促进高树勋举行起义。

当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及新8军被包围后，高树勋曾两次派王定南与晋冀鲁豫军区联系起义事宜。刘伯承、邓小平在接见王定南时，要他转告高树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从大局出发，当机立断，配合解放军行动，率部起义，对革命做出贡献，同时周密部署了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电告陈毅派人前往徐州将高的家属接到解放区；还派军区参谋长李达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国军部干部靖任秋等先后潜入新8军军部，对高树勋作了大量思想工作。在强大的军事攻势和强有力的政治争取下，经过谈判协商，高树勋决定10月30日举行起义。

10月30日下午，高树勋召集总部科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了起义的决定。

同时，又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揭露了蒋介石内战的阴谋，提出了坚决反对内战，“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实现民主政治的主张，接着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在邯郸市南的马头镇举行起义。11月1日，起义部队离开马头镇，开赴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晋冀鲁豫军区解放军乘机对拒绝起义陷于混乱之中的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发起全线攻击。至11月2日，解放军共毙伤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以下1.7万余人，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沿平汉路北进的计划。

高树勋率部起义的壮举，受到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刘伯承司令员和薄一波副政治委员亲往新8军驻地，对起义官兵表示亲切慰问。毛泽东、朱德致电高树勋，指出：“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毛泽东还在电报中说：“马头镇距邯郸很近，邯郸系历史名城，因此可称为‘邯郸起义’。”

11月10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命令，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邢肇棠为副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民主建国军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

11月13日，由邓小平、薄一波同志介绍，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高树勋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高树勋率部在战场起义，是全国解放战争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率部起义的首例。这在国民党军队中为有爱国心正义感的官兵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12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斗紧急关头，仿效高树勋将军，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采取正义之举，站到人民方面来。从而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1947年，民主建国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序列。高树勋将军在解放战争中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陶林保安团起义

1945年11月1日，在绥远战役中，国民党陶林保安团官兵300余人举行起义。

陶林（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后旗）位于绥远东部地区，抗日战争时期，是绥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伪蒙古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十分混乱。原镶蓝旗队队长华林泰，将镶红旗、镶蓝旗队、陶林保安队、凉城保安队收拢在一起，约300余人，大家推举华林泰任团长，部队就叫“华团”，开到陶林驻防，待机行事。

华林泰，蒙古族，1909年4月生于绥远省镶蓝旗四苏木村。1932年入张家口西北军官学校，1933年毕业后到准格尔旗当教官。后曾任伪蒙军连长、副官长。1943年10月任镶蓝旗政府实业科长兼旗保安队队长。1944年编为巴盟防卫第16师，华任少校团长。这次他把4个保安队收拢担任团长，开到陶林，但走向何处难以选择。正在这时，被从武川过来的国民党军鄂友三骑兵第12旅的郭喜智强迫收编为陶林保安团，任命华林泰为团长，韩宝华为参谋长，原4个保安队分别编为第1—4连，任务是在这一地区“维持治安和防共”。

在陶林地区，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及民族政策，不仅深入蒙汉人民群众心中，而且在地方保安队官兵中也有影响。华林泰和部分官兵曾受过中共政治影响较深，有心找机会投靠八路军，也曾商议过与八路军联系，并让一连排长白彦写了一封联络信派人送给八路军。

1945年10月，绥远战役开始了。10月24日，晋绥独立第2旅在南下途中解放了陶林。国民党军队西撤后，鄂友三骑兵第12旅郭喜智派人送信，让陶林保安团马上向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集结，并威胁说：“不走后果不好”。这时保安团官兵思想混乱，意见不一。华林泰和一连长云根元、白彦等人主张不走。于是由华集合部队讲了反对内战，争取内蒙古自治，民族解放的道理。决定部队不走，派人去陶林找八路军联系。

华林泰亲自带着白彦和护兵共4人到了陶林，受到绥东专员靳崇智和阎明生县长的热情接待，称赞他们主动找八路军联系起义的义举。经过商谈，决定把陶林保安团先带到旗下营，然后去集宁。华林泰一行4人，在陶林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赶回部队。

华林泰快马加鞭赶回部队驻地，立即召集连长们开会，介绍了见到八路军的情形。接着集合部队，讲了当时的形势和少数民族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的道理。之后，部队开往旗下营，再乘火车开赴集宁。全团官兵到达集宁后，受到当地驻军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随后开始进行学习、整训，由老部队派20多名政治辅导员分到各连排开展工作。

11月1日，陶林保安团正式宣布起义，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支队”。11月11日，集宁驻军和政府又在平地泉隆重地举行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支队”成立大会，军、政、民各界派代表到会祝贺。军、政首长在会上讲了话，宣布了起义部队改编后的新番号和支队及连排长的命令。任命原团长华林泰为支队司令员，原参谋长韩宝华为支队参谋长。华司令员讲了话；大会通过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成立宣言》。新华社晋察冀分社于11月17日在《晋察冀日报》上发了消息。这次起义对于绥远战役的胜利，对于团结各民族人民解放内蒙古，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盟保安第二旅一团起义

1945年11月4日，在绥远战役中，国民党军第新10路军伊克昭盟暂编保安师第2旅第1团部分官兵150余人举行起义。

1945年9月30日，原国民党军伊盟防卫第12师5大队改编为国民党军新10路军伊克昭盟暂编保安师，5大队按两个旅建制整编，第2旅1团团团长林国梁，副团长马云江，副官林国栋，军需副官图布升宝。下属3个连，共300来人，在达拉特旗大树湾东城一带驻防。林国梁，原名胡不庆必力格，蒙古族，内蒙古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人，1928年至1938年，先在达拉特旗伪保安队当兵、副官、大队长；后在伊盟防卫12师5大队当连长、大队长。当时部队缺吃少穿、生活困难，加之国民党军第26师何文鼎部对保安师官兵也凌辱欺负，引起保安师官兵的强烈不满。

此时，八路军第120师派联络参谋都布信巴彦尔，乘机打入保安师内部进行争取工作。都布信巴彦尔是伊盟乌审旗人，经常在1团驻地周围活动，遇见上尉军需副官图布升宝，互相间谈得很投机成了好朋友，就向图提出了在他们部队当兵的要求。图爽快答应补了个“辎重兵”。此后，图布升宝经常去包头领粮，几乎每次都带着都布信巴彦尔，每次到包头后，都布信巴彦尔都以“上街转游”为由向图请假，找组织汇报工作请示问题。这期间，都还通过图结识了林国梁、奇·德布胜，并和他俩交上了朋友。后来，他们4个人经常一起谈论战局和军队的事情。时间久了，都布信巴彦尔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动员他们带上部队起义。由于他们思想上还处于犹豫不定状态，未置可否。后因绥远战役即将开始，都布信巴彦尔进包头城向组织汇报时，未让他再回去。

1945年10月下旬，贺龙率第120师西进，准备围攻绥远重镇包头。傅作义亲临包头，调集大批正规军和地方保安队，企图顽抗。10月底，伊盟暂编保安师司令部参谋长德胜巴雅尔传傅作义命令，调保安师立即开赴包头协同作战。11月1日，林国梁带团部和第2连共170余人暂驻包头南门外薛家营子。这时傅作义、何文鼎下令把包头各城门用麻袋装土堵死，不准军队进出。林部被隔在城外孤军受围，在这险恶形势逼迫下，图布升宝，奇·德布胜等受过中共政治影响的部分官兵，开始活动起义。

林国梁仍摇摆不定，打算一是派人进城联系成功可归附“国军”；二是突围撤回原驻地，保存实力；三是两条路都不通时才起义投靠八路军。11月3日夜间，林派人进城联系的人被赶回，他和副团长马云江乘马进城，又遭32师机枪扫射，副团长中弹负伤。林返回驻地后，经研究，决定突围回达拉特旗。由奇·德布胜连打头阵。部队刚跑到二里半东边的五孔桥，不料迎头碰上八路军第104团。奇·德布胜联想起都布信巴彦尔向他们说的话，觉得起义时机已到，便决心起义。遂来到第104团团部联系起义事宜，最后双方商定的起义条件是：一是起义后不收缴枪支；二是不进行改编；三是部队要归绥蒙自治政府主席乌兰夫管辖。

11月4日晨，林国梁宣布起义。林部官兵150余人，机枪6挺，全部归顺了八路军，第120师358旅旅长王尚荣和李维仲（萨县土哈齐人，解放后拟任包头市长）和宣传科长赵家声等人热情接待了起义部队官兵，讲话中指出他们选择了一条光明道路，并号召他们给附近伪蒙古军中认识的人写信，动员他们也起义投诚。林国梁等给第1旅森盖旅长的部下白团长和奇文山写

了信，动员他们起义。 11月6日，奇文山带领一个连150余人武装起义，投向八路军。

11月9日，起义部队随第120师东进，开到萨拉齐进行休整，八路军派李明、苏青到部队做联络工作。此后，林国梁、图布升宝、奇文山、扎拉嘎等4人，正式写了起义声明，表示彻底脱离国民党，坚决跟共产党八路军干革命。不久部队奉命开往集宁进行整编。这次起义对绥远地区巴蒙汉民族团结反蒋起了积极作用。

盐城起义

1945年11月11日，国民党军新编第2路军第1军军长赵云祥和该军第40师师长戴心宽率部万余人，在江苏省盐城举行起义。

赵云祥部原系冯玉祥西北军旧部。1941年12月，赵率部在山东省曹县叛蒋投汪，改为“和平救国军”第2方面军第4军，赵任该军军长，下辖两个师：第39师，师长潘子明；第40师，师长戴心宽。1944年底，伪第2方面军移防苏北，总部驻扬州，第4军驻盐城、伍佑一带。抗战胜利后，遵照朱德总司令关于“对汪伪就地受降”的命令，中共苏北区党委“大股伪军工作委员会”以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的名义，对赵云祥部发出劝降信。赵拒绝向新四军投降，而接受蒋介石的收编，任新编第2路军第1军军长。

新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先后收复了两淮、兴化、东台、泰兴、海安、如皋等城镇，盘踞在盐城的第1军既怕被新四军围歼，又不愿投诚，企图固守该城。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命令苏中军区抽调主力部队和苏北部队共同发起盐城战役。苏中军区和盐阜军分区调集苏中三个旅与苏北四五个团的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两万余人，包围了盐城及其附近的据点，并于10月31日子夜1时发起总攻。由于伍佑地堡多，火力强，打了两天，未能攻下。于是决定把潘子明部引出来，在运动中歼灭。为此，新四军将俘获赵云祥部下一个连长派往伍佑送信，冒充赵云祥的信使，面交师长亲自。潘一向忠于赵云祥，对来信向北突围一事毫不怀疑，立即制订突围计划。

第39师潘子明部突围出来后，向北逃跑。事先埋伏在两侧的新四军部队四面合围，将逃敌全歼。尔后，新四军乘胜攻下了蔡家祠、二墩、三墩、郡河边、北新河桥等十多个据点。伍佑等地的解放，使盐城失去了外围屏障。驻守该城的赵云祥既不能固守，又无路可逃，完全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抗日战争时期打入该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郭鑫和、路耀林利用有利时机，劝说第40师师长戴心宽和赵云祥起义。同时，新四军把被俘的第39师第153团团团长王发祥释放，让其进城以现身说法劝说大家放下武器。此时，戴心宽积极建议赵云祥派人与新四军联系。此时，赵仍幻想总司令孙良诚会派兵救援，当其收到孙从扬州发来电示，要赵固守盐城时，戴乘此进一步劝说赵，若坚持到底则城亡人亡，不如派人出城联系新四军，找一条出路。赵同意戴派人联系。于是，戴单独召见郭鑫和，要其去联系新四军。郭出城后，到盐阜军分区司令部，向谢祥军司令员汇报了城防情况和伪军内部动向。谢偕郭连夜赶到围攻盐城前线最高指挥部——苏中军区司令部。管文蔚司令员、吉洛（姬鹏飞）副政治委员接见了他们。同时，与苏北区党委城工部部长薛尚实部长及政治交通员左如桂见了面。

郭鑫和回城后，先向戴心宽，接着向赵云祥汇报了出城联系的经过，说明新四军欢迎驻盐城部队起义。赵云祥当即决定，派第40师参谋隋昆亭为代表出城进一步谈判。郭鑫和陪同隋昆亭到苏中军区后，管文蔚司令员、吉洛副政治委员接见了他们，并讲明了新四军对待起义部队的政策，明确表示赵云祥部起义后可以保留军的番号。隋昆亭回城汇报后，赵决定再派代理参谋长张伴农出城，谈判起义条件。张回城后，赵又决定由戴心宽作为全权代表出城作最后谈判。11月10日上午，赵云祥在路耀林陪同下，亲自出城与新四军代表、苏北区党委城工部部长薛尚实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一、赵云祥部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即日撤出盐城整编；二、起义部队保持军的建制，

各级干部保留原职；三、不得保护地方伪军；四、不得阻挠公安人员进城捉拿地方伪军中的罪犯；五、立即拆除盐城内外的一切工事；六、在新四军进城接管之前，起义部队对地方伪军、保安队、伪政府机关负有监管责任，不得遣散任何人员；七、部队撤离盐城时，不准携带盐城当地的眷属；八、部队撤离盐城之前，负责维护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九、双方签字之后，协议立即生效。协议达成后，赵云祥仍不放心，要求同攻城部队最高负责人见面。当日晚，管文蔚、吉洛会见了赵云祥。

11日上午，赵云祥、戴心宽在第40师师部召开处、营以上军官会议，由戴通报谈判情况，宣布反蒋起义。赵、戴联名签发通电，决心与八路军新四军合作到底，为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伟大事业而奋斗。当天下午，薛尚实等率领工作组进城接管。12日，新四军举行入城式。16日，戴心宽带着军直机关和第40师到东坎整编。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下辖第11、第12师，赵云祥任军长，吉洛任政治委员，戴心宽任副军长兼第11师师长。后赵云祥去扬州劝说孙良诚起义未归，由戴代军长。1946年，根据整个形势的变化，该部整编为3个团，为华中军区第10纵队建制，后又编入华中第7纵队，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等战斗中，建立了功勋，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史村起义

1945年11月23日，国民党山西省防第4军第12师第36团部分官兵，在第3营营长苏文、副营长郑耀庭等率领下，在山西省襄汾县史村举行起义。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率部在邯郸内战前线举行起义，此消息震撼全国。为了瓦解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开展“高树勋运动”。中共太岳区第十九地委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决定由在抗战初期就打入敌伪内部的地下党员、阎锡山省防军第4军第12师第36团团团长吉蔼元率部起义。

第36团是原曲沃伪自卫团改编过来的。此时该团驻扎在史村车站一带，这个车站同时还驻有阎军的另一个团。为保证起义成功，人民解放军太岳军区第19军分区司令员张作令、政治部主任王中青带领三个团来接应起义。并由襄汾（太岳边区一个县）县委书记姚登山、城工部长张浩、曲沃敌工站负责人王益民组成策动起义小组，派王益民直接找吉蔼元商定起义事项。

吉蔼元自打入敌伪内部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生活腐化，日渐蜕化，组织上曾多次批评过他，但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当王益民在第36团第3营营部（苏文任营长）向吉蔼元交待任务时，吉称临汾阎军即将发给36团60门迫击炮和60挺重机枪，等领回这批武器后再行动也不迟。王益民指出：要从政治上考虑这次起义的重要性，时机一定不能错过，不能推后。吉出于无奈勉强同意。王益民根据吉的表现与态度，便让地下党员、机炮连连长郭玉莲暗中注意吉的动向。吉回去后，根本不着手起义的准备，而是蒙头大睡。王益民随即向张作令等首长汇报了这些情况，大家研究决定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起义计划不能受影响。果然不出所料，吉蔼元于当晚骑马投奔临汾阎军去了。

11月23日，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由地下党员、第3营营长苏文、副营长郑耀庭率领第3营三个连和另一个营的一个连约240余人，按照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史村起义。起义后，改编为太岳区民主建国军第1支队，苏文任该支队团长。

一个多月后，随队撤回临汾的第36团第2营第6连副连长祁英杰，在营长王炳发的默许下，率领一个排约20余人举行起义，并携带全部武器装备，到达曲沃解放军驻地。祁英杰由王益民安排去民主建国军中任职。

王凯率部起义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山西省防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第1营营长王凯，率部160余人在曲沃乔麓山举行起义。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在邯郸战役前线举行起义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开展“高树勋运动”，以瓦解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打击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为此，解放军太岳军区和中共曲沃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让打入敌伪内部的地下党员王凯率部起义。

王凯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冬，他在山西省翼城中心县委领导下，曾组织建立抗日青年游击队，并任队长。1940年11月，王凯遵照曲沃县委的指示，利用伪警备队从各村抓壮丁的机会，以壮丁身份打入伪警备队。仅两年多的时间，便从士兵升任班、排、连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伪警备队改为爱乡团，不久又改编为省防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王凯任第35团第1营营长。该营地下党员力量较强，在全营230多人中占1/10，而且经常与中共曲沃县委敌工站站站长王益民保持联系，接受党组织的指示。

1945年11月，第35团奉命到临汾城北待命。一个星期后，解放军太岳纵队第10旅和第11旅围攻曲沃县城，驻临汾之敌首王靖国命令第12师增援曲沃。根据形势需要和上级指示，王凯在临行前召集地下党员开会，决定利用此次到曲沃这一时机即举行起义，并将此决定传达到各班、排的所有人员。当解放军太岳纵队在蒙城一带进行阻击时，王凯带领全营驻扎在曲沃境内乔麓山上。由于各连驻地分散，彼此不好联系，起义便分别举行。首先是第1连一个排先行起义；接着第2连连长带20多人起义后到达解放军第11旅驻地；第3连连长带领30余人直接下山到解放军第10旅驻地举行了起义。这样王凯便与第36团机炮连连长、地下党员郭玉莲一道，带领包括营部和机炮连在内的剩余100余人撤离阵地，下山到了乔麓庄，让几十个想回家的士兵放下枪支弹药离队，王凯和郭玉莲带着剩下的五、六十人宣布起义，随后到达中共曲沃县委及敌工站驻地薪庄。

部队起义后，根据去向自愿的政策，共有160余名起义人员补充到了曲沃县大队。王凯分配到县委城工部工作，后又转到武委会。

阿拉庙起义

1945年12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部分武装约500人在阿拉庙举行起义，使鄂托克旗的蒙汉人民得到了解放。

鄂托克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中部，北临河套土默川平原，南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东去京、晋、绥，西达甘、宁、青，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采取反革命两手，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一面加紧战争准备，并更加严厉地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取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封锁。而掌握伊克昭盟大权的国民党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更是蒋介石反动政策的忠实推行者。他与宁夏军阀马鸿逵相勾结，不仅在军事上封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而且在经济上采取了武装禁盐的措施，企图断绝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食盐供应，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军民制造困难。

中国共产党对章文轩曾以极大的诚意进行劝阻、教育，期望其改恶从善，开放盐禁。中共三边（即陕西定边、安边、靖边）地委曾派周仁山等人作为代表，本着团结、争取的态度多次与章文轩会谈，但是，章文轩竟不听忠告，积极追随蒋介石，顽固采取了反共反人民的态度。据此，中共三边地委派田万生、周仁山等人前往鄂托克旗工作，团结争取了军队中的下级军官马富刚、马良诚、顾寿山等人，开始了起义的准备。

1945年12月11日，顾寿山等人在大池召集了起义动员大会，向参加起义的300多名骑兵宣布了起义的决定。马富刚作了动员，宣布了章文轩的罪状。随后，起义部队从大池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于12月12日凌晨到达阿拉庙兵营，与马良诚率领的200余名起义骑兵会合，占领了司令部，解除了警卫分队的武装，然后继续乘胜向阿拉庙进军，在天亮前包围了阿拉庙。这时，章文轩还毫无所知，起义军在顾寿山的带领下，冲入庙内，将章文轩等俘获，起义获得成功。

阿拉庙起义的成功，不仅使鄂托克旗的蒙汉人民获得了解放，而且缓和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北线的军事压力，解除了国民党在这里的经济封锁。

商丘起义

1946年1月6日，国民党军第3路军第55师副师长王继贤率领4000余名官兵在河南省商丘举行起义，一举获得成功。

王继贤，1928年考入西北军军官学校，1929年和张公干一起在冯玉祥身边任随从副官，1931年3月，由张公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第68军任中校副团长期间，王继贤目睹国民党军抗日不积极、常常与共产党作对的情景，加上父亲遭日军杀害，愤然弃职，离开了第68军。1940年10月，王继贤来到商丘，凭借与张岚峰的师生关系，在特务团第1营任营长，后升任第2路军第1团团长，调防太康。

1944年秋，中共豫东工委书记李苏波以八路军总部代表身份，亲自赴商丘和张岚峰谈判。张岚峰派王继贤为联络员，到冀鲁豫军区进行联络和访问，受到军区司令员杨勇亲切接见和教诲。不久，王继贤调防商丘的坞墙、徐楼一带，与中共淮北第8军分区取得联系，新四军第4师派出敌工站副站长刘廷良与王继贤保持联络。魏凤楼、杜新民率部起义后，张岚峰加强了对部队的控制，派他的副参谋长施仲达兼任第55师师长，任命王继贤为副师长，部队驻防商丘的夏邑城，但施仲达常住商丘，王继贤仍能控制实权。

1945年底，中共冀鲁豫边区陇海办事处主任李苏波、地下党员张公干到第55师策动王继贤起义。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他们决定在1946年1月7日举行起义。1月6日凌晨，张岚峰突然命令第54师刘子仁部到夏邑换防。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王继贤、李苏波和张公干镇静自如，决定提前起义。他们一方面迅速派人通知八路军接应部队提前行动，另一方面，王继贤以传达换防命令为由，紧急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在深刻分析形势、阐述理由的基础上，宣布起义。与此同时，八路军淮北第8军分区派出的接应部队也及时到达夏邑。天刚亮，王继贤率领两个团、1个特务营和师部共4000余名官兵，顺利开进解放区，起义一举获得成功。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王继贤全身心地投入组织起义，以至于顾不上安排自己的家属孩子。两天以后，在中共地下党和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王继贤的家眷几经周折，也终于安全到达解放区。起义后，部队编入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王继贤任纵队副司令员。

郝鹏举部从起义到叛变

1946年1月9日，国民党军新编第6路军总司令郝鹏举率部2万余人，在山东省南部台儿庄附近的马兰屯举行起义。但在一年之后，郝又背叛人民，率部投靠蒋介石，充当内战先锋。郝鹏举，1903年出生于河南省阌乡县（今灵宝县）；1922年5月参加冯玉祥的部队；1927年秋受冯派遣进入莫斯科炮校学习；1929年回冯部任第25师炮兵团长。1930年爆发了蒋、冯、阎大战，郝叛冯投蒋；1937年到西安投奔胡宗南；1941年2月投靠汪精卫。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郝鹏举为前途着想，召集亲信幕僚，密商出路问题。郝左顾右盼，举棋不定。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收编伪军，正式委任郝鹏举为国民党军新编第6路军总司令。但郝暗中仍同共产党联系。为争取郝鹏举，中国共产党和华东党政军领导机关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新四军第4师第9旅参谋长冯文华（冯玉祥侄子，20年代同郝共过事）化装到徐州，劝郝认清形势，走光荣起义之路。

1945年12月中、下旬，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命令国民党军10个师从徐州北上进攻山东解放区，其中第19集团军为西路，第33集团军为中路，郝鹏举的第6路军为东路，企图同共产党主力决战。郝认为国民党此举是让杂牌军打头阵当炮灰，借共产党之手剪除异己。于是既进行作战动员，又将国民党军的行动计划、作战方案、郝部的行动路线、战斗序列、武器装备等情况，通报给共产党的联络人员，让解放军早作准备。12月，郝鹏举率部进抵涧头集地区，就地待命。顾祝同下令郝部打头阵，向新四军发起进攻。郝止步不前，西路、中路亦停止前进。此时，郝已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处境十分困难。为寻找出路，郝秘密与人民解放军联系，并写信给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陈毅司令员，要求派人同他当面会谈。12月29日，陈毅派华东军区参谋长宋时轮为全权代表前往郝部会谈。宋向郝分析了时局和军事形势，希望郝识破蒋介石、顾祝同借刀杀人、消灭杂牌的险恶用心，要郝当机立断率部起义。郝当时借条件不成熟予以推延，并提出要面谒陈毅，听候赐教，并希望新四军派代表常驻该部，以经常保持联系。

1946年1月4日，陈毅在峰县城会见了郝鹏举。会谈中，郝着重讲了当前的处境，表示愿意起义，但又提出了一些疑虑。陈毅在分析了时局并给郝指明出路后，着重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同时回答了郝提出起义后部队番号、编制、人员、给养等问题。郝回到驻地后，向新四军联络工作人员赵卓如提出：能不能参加共产党？赵向陈毅作了汇报。7日，陈毅于高皇庙再次会见郝，陪同陈前来的还有张克侠。陈表扬了郝要求参加革命的进步表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革命不分先后”的一贯政策。郝当即表示了率部起义的决心。当日晚，陈毅、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领导再次约见郝，向其传达了中共中央电报的精神，欢迎率部起义。郝当即表示，回去立即率部起义。9日晚，郝赶回马兰屯后，在团以上军官会议上讲了当前时局，部队处境，蒋、顾借刀杀人的阴谋，并郑重宣布，经与陈毅将军多次联系，决定效法高树勋，走光荣起义的道路。同时，郝发布命令：各师、团长立即返回部队准备，听候向解放区开拔的命令。第二天，郝部各师、团按指定路线向解放区开进，沿途受到热烈欢迎。至此，国民党新编第6路军两万余人，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争取，在强大军事压力下，终于走上了光荣的道路。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了国共两党共同签订的停战协议，发动了全国性的内战。8月8日，郝鹏举发表反对内战通电。9月9日，郝发表“本军现为人民之武装，当为人民而牺牲”的通电。然而，郝反复无常，本性难移。当国民党军大举向山东解放区进攻之际，新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派人给郝送来了国民党第42集团军司令兼鲁南“绥靖”区司令的头衔，还许以管辖鲁南3县的诺言，引诱郝投蒋。1947年1月26日上午，郝以新四军来电话叫他去谈话又将其扣押为借口，召集毕书文、刘伯阳密谋，决定立即叛变，并派人通知国民党军。当晚18时许，郝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宣布行动命令，各部队于当夜12时出动，天亮到达指定地点。接着，郝以开会为名，将在该部的共产党代表朱克清诱骗前来，立即予以扣押，朱的警卫员当即被打死。郝还下令逮捕刘述周等全体共产党方面的联络代表，但遭到了顽强阻击。经过激烈战斗，十几名联络干部除几名牺牲外，大部都先后脱险。一师师长包庭宾、二师师长张奇、国民党新编第6路军副司令李泽洲，均被郝下令扣押，后来，将朱克清和李泽洲押送到南京，向蒋介石献功。10月，朱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陈毅得悉郝鹏举叛变后，立即去电规劝，同时制订了作战计划，决定“郝部北进时予以歼灭”。2月6日，人民解放军第2纵队等部隐蔽前进，突然向郝部及所属的第1、第3师驻地白塔埠等处发起自卫反击，至7日下午，战役结束，全歼两个师，生俘郝以下6000余人。后郝鹏举被处决。

巩县起义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军整编第38师副师长孔从周和整编第55旅旅长孙子坤率领第55旅官兵3000余人在河南巩县举行起义。

国民党军整编第38师原系国民党军第38军，下辖第17师、第55师和第117师，是一支由杨虎城创建、长期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来往与合作的爱国武装，深受国民党蒋介石的痛恨与迫害。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排斥异己，消灭进步力量，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帮助第38军摆脱被肢解、被消灭的厄运，从抗战后期开始，中共西北局、华北局、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加紧对第38军的工作，经过大量的联络策动和组织工作，第38军所辖的第17师于1945年7月17日在河南洛宁举行起义，光荣地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第17师起义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紧了对第55师的迫害和控制。胡宗南怀疑第17师起义与第55师师长孔从周有关，将孔调至卢氏县杜关镇进行“整训”。1945年8月，胡宗南派特务分子徐幼常任第55师副师长，将第55师先后调防郑州、商丘、开封、原阳、新乡等地，以此来切断孔从周部与中共的联系。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晋冀鲁豫军区对第38军的艰难处境十分关注。11月，晋冀鲁豫军区组成新的第38军工作委员会，派刘威诚、李慕愚率一个连的兵力和部分工作人员，携带电台，深入国民党军驻防区，与第55师、第177师取得了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使该部队做好了伺机组织起义的准备。12月，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要求他们做好第38军的工作。西北局又派王国、沙夫、杨信潜入商丘、开封，向第55师、第177师地下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组织第38军起义的指示。沙夫曾先后两次与孔从周面谈，孔反映了第55师的困难处境和要求起义的迫切愿望。但此时正值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定不久，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决定“暂停起义”。

1946年5月，国民党蒋介石下令把第38军改编为整编第38师，原所辖师均改为旅，孔从周调任整编第38师副师长，整编第55旅旅长由孙子坤担任，下辖第163、第164两个团。

5月14日清晨，整编第38师师长张耀明接到国民党西安绥署郑州指挥所主任裴昌会转来的胡宗南的急电，命令第55旅于5月15日凌晨由巩县乘火车开赴新乡“剿匪”。实际上这是一个阴谋，胡宗南已调集国民党嫡系部队设置了包围圈，待第55旅进入包围圈后即迫其缴械编散。孔从周得知这一情况后，匆匆赶到第164团1营营部驻地，召集旅长孙子坤、第163团团团长杨健、第164团团团长陈日新、旅参谋主任武靖宇等中共党员一起研究对策。会上，孔从周讲了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准备消灭这支爱国武装的罪恶阴谋，谈了起义的计划和想法。与会人员一致赞成立即举行反迫害、反内战起义，同时对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也作了分析，认为第55旅处于国民党嫡系部队包围之中，离解放区较远，接应困难。对此，大家都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会上还确定了组织领导和行军路线，决定15日凌晨行动。

15日晨，第55旅在孔从周和孙子坤的率领下，按预定计划开进，途中向全国发表了起义通电。由于起义有些突然和仓促，准备不足，也来不及与解放区联系，加上国民党军对第55旅防范严密，通电发出不久，即发现驻洛阳、郑州、南阳和巩县回郭镇的国民党军先后出动，有包抄合围起义部队的

迹象。起义部队立即用无线电与解放区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上，只好边行进边处置临时发生的情况。16日，起义部队被国民党军包围。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第164团团团长陈日新率少数人叛变，使起义部队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18日，国民党军整编第27师、整编第90师和整编第38师的177旅、交警总队，在空军支援下，向被围在嵩山五支岭的起义部队发动一次又一次猛攻。孔从周与孙子坤决定突围。孙子坤率部分军队向东突围未能成功，被国民党第27师缴械，孙子坤和中共党员孙乃华被押解南京后遭到杀害。孔从周、杨健率部分军队向南突围，被国民党军击溃打散，部分官兵被俘，分散突出重围的中共党员、进步官兵，经过化装后，利用各种关系，暂时在各地隐蔽。

中共中央、西北局、华北局、晋冀鲁豫军区获悉第55旅起义被打散的情况后，立即派出大批联络员，秘密潜入巩县寻找打散的起义官兵和孔从周将军。经多方联络，5月下旬，中共地下党终于和孔从周取得联系，找到了部分起义官兵。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8月23日，孔从周等安全抵达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邯郸。在这前后，隐蔽各地的起义官兵，也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来到解放区，受到晋冀鲁豫边区部队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

1946年9月，第38军先后起义的部队合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孔从周任军长，杨健任第55师师长。

海城起义

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参谋长马逸飞率师部及1个团共2700余人在海城、营口举行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反蒋反内战的第一枪。

第184师隶属滇军第60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要求各省军政长官出兵出省抗战，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回云南后，仅用28天时间就将滇军6个旅编成了3个师，蒋介石授予陆军第60军番号，下辖第182、第183、第184师。日本投降后，滇军进入越南接收日本投降，1946年6月由越南海防乘美军海军舰船开赴东北，参加内战。

第60军到达东北后，第184师归新6军指挥，在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一带布防。第184师师长潘朔端，云南威信人，1925年从云南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加入了国民党，系左派。

1926年底潘毕业后留校任第6期入伍生队排长，1927年春参加北伐，调到国民革命军朱培德第3军第8师任政治部科员兼工兵营党代表。“4·12”政变后，共产党人被清出第3军，潘朔端因受嫌疑也被清出第3军，流落上海。后来，在同乡的资助下回到云南。1929年潘到云南军官侯补生队任中队长，后连任第3旅第5团营长、第183师团长、滇军第6旅旅长、第23师师长，1946年12月任第184师师长。

第184师在东北处境很不妙，潘朔端率师部和第552团驻防海城，第550团驻防营口、大石桥，第551团驻防鞍山，部队非常分散，随时都有被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吃掉的危险，而且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还专门派出两个少将高参，带着一支30人的别动队和一部电台，监视第184师的行动。

5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鞍山，歼灭了第184师第551团，只有团长张秉昌逃跑，多数官兵被俘。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副司令韩先楚接见了第551团被俘的马营长，让他回海城给师长潘朔端带去一封信，劝他放下武器，走光明之路。26日，第4纵队开始向海城进攻，同时，韩先楚副司令又释放了30多名俘虏，让他们携带传单进入海城散发，并再次给潘朔端写信，促其早日起义。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强大攻势下，第184师面临着是顽抗到底还是起义革命两种选择，潘朔端认识到，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便与参谋长马逸飞、团长魏英商讨第184师的前途问题。马逸飞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党，但对共产党仍感情深厚；魏英长期受着共产党的影响，从思想和心理上不排斥共产党。经过协商讨论，他们很快统一思想，决定立即起义。27日，魏英派出机枪连连长高汝松、运输连连长陈正道持信与民主联军秘密联系，受到韩先楚的热情欢迎。接着，潘朔端又派马逸飞与韩先楚和蔡正国会谈，双方达成了起义的协定，制定了起义计划。29日，潘朔端以海城城防司令名义召开了驻海城校官以上人员开会，命令警卫队拘留了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派来的2名少将高参，收缴了督战队的枪支和电台。30日凌晨，潘朔端率领第184师师部和第552团撤出海城，并与郑祖志、马逸飞、魏英联名向全国通电宣布反内战起义。这是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第一次起义，它打响了东北战场反蒋反内战的第一枪。6月6日，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发来贺电，庆贺并赞扬第184师起义。

6月上旬，第184师改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1军，潘朔端任军长，徐文烈任政治委员，马逸飞任参谋长，魏英任师长。后来，该军参加了人民解

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解放全中国和保卫祖国建立了功勋。

刘善本等驾机起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中央航空第8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内战，率领机组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在从成都去昆明执行任务途中起义，飞到延安。

刘善本早年在北平（今北京）大学附属高中就学期间，就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1935年秋，他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投笔从戎，考入杭州览桥国民党航空学校。在校期间，刘刻苦钻研飞行技术和航空理论，学会驾驶驱逐机（歼击机）、轰炸机。1938年12月他毕业后，任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飞行员。部队几经转场兰州、嘉峪关、西安等地，使他目睹了蒋军消极抗战，节节败退，大片国土丧失沦落，民不聊生的情景，为此对国民党深感失望。1943年，刘奉派赴美国学习驾驶B—24型轰炸机。在海外，他时刻关心着国内的抗日战争，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并与当时参加八路军的亲属通了消息，了解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他敬佩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1945年10月，他奉调回国，驻防上海。当他踏上国土，看到的不是和平建国的景象，而是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准备发动内战的情景。对国民党当局强令他们参与内战，打共产党的行径愤怒至极，怒火满腔。他想：“八年抗战，人民涂炭。现在美蒋又要把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我堂堂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人民效力于抗击侵略者的疆场之上，却要被人驱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向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投掷炸弹，杀害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我决不能！决不能为美帝国主义开拓市场，奴役中国人民，用外国的武器屠杀自己的同胞！”于是，他下决心跟随时代的潮流，顺应人民的愿望，在苦干与中共地下党无法联系的情况下，准备自己寻找机会驾机起义。

1946年6月，刘善本所在的空军第8大队奉命赴昆明执行运送无线电器材的任务。时任大队作训科上尉飞行参谋的他，看到机会来了。借口需要掌握气象情况和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到了参加这次飞行。6月22日，他带着机组驾驶B—24型轰炸机530号从上海飞到昆明，24日，从昆明起飞返航，原准备途中起义，将装满飞机的器材带去延安，可起飞后正赶上陕西、山西、绥远一带下大雨，又加上无线电罗盘没有找到延安导航台，只好忍痛放弃这次机会，循原定航线降落成都新津机场。6月26日，再次赴昆明航运器材。飞机上共有11人，驾驶舱里是机长刘善本、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士唐世耀、通讯士唐玉文和领航员李彭秀等6人；后舱里是搭机的国民党通信学校实习工厂的副厂长陈泰楷和通校毕业生李荣琛、何辉庭、江焕章等5人。530号飞机穿入云霄后，刘善本立即实施预先想好的方案，即利用机组人员与搭乘人员互不相识，前后舱彼此不见面的有利条件，在空中机智巧妙地发动了起义。他先到后舱对搭乘人员说，前舱机组人员反对内战，已决定将飞机飞往延安，告诫他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到前舱去，以免发生危险，并说保证飞机到延安后，再送他们返回国民党统治区。然后，他又装作惊慌地回到前舱，说后舱的人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就和我们同归于尽。

事出突然，机组人员十分震惊。刘善本趁大家乱哄哄的时候，将他们的手枪都掌握在手，并借机征求大家的意见，事已至此，怎么办？张受益站起来，要到后舱跟他们讲理去，但大家怕他毛躁把事惹坏，不让他去。张受益

坐下后，想到共产党是专和国民党官僚财主作对的，他是一个无钱无势的飞行员，怕什么！眼看内战就要打起来，如若死于内战那太不值得了，于是首先表示了意见：“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刘善本趁机打开窘境，稳定了其他人的不安心绪，扭转自动驾驶仪，把飞机对准了延安航向。途中，天气十分恶劣，飞机在云中，没有无线电导航，也看不见地标。浓云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领航员李彭秀不愿去延安，一再向刘善本提供整治后舱人的坏点子，都被刘善本及时顶回去了。为了战胜恶劣气候飞抵延安，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人与刘善本密切配合。刘善本由于精神极度紧张，握驾驶盘的手有些颤抖，张受益就替换他驾驶。当国民党空军不时询问飞机的所在位置时，唐玉文就告以“等待”的讯号迷惑他们。经6小时的长途飞行，刘善本机组终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险情，驾驶的B—24型530号飞机，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

刘善本等驾机起义到达延安，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6月2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亲切地接见了刘善本机组人员，并出席了延安军民召开的欢迎大会。7月9日，刘善本在延安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赶快退出内战漩涡》的讲话，指出：“我参加空军，原来是为了打日本的，现在抗战胜利以后，却叫我驾驶飞机，去轰炸中国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同胞，这完全违反我的良心”，“我不赞成中国人自相残杀，更不赞成用外国武器去屠杀自己的同胞。当我驾驶着美国飞机间接地运送军火，去屠杀自己的兄弟时，良心和正义不断地谴责我，使我不退出内战，飞到延安来”。他希望空军的同事们拒绝内战，拒绝运军火，拒绝替少数好战分子当内战的工具，这样，使战争没法子打下去，和平才能有希望。

刘善本机组的起义，正值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际，是内战中国国民党空军的首次起义，周恩来同志称赞刘善本是国民党起义的带头人。这一义举，对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瓦解国民党军队参加内战，鼓舞全国人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起了重要作用。起义不久，刘善本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校长。

辉县起义

1946年8月7日，国民党军整编第177旅第530团第1营连长吕元壁、薛生荣率领2个连在河南辉县举行起义。

国民党军整编第177旅原系国民党军第38军第177师，1946年5月被改编为整编第38师第177旅，下辖第529团、第530团和第531团。这支军队原系爱国将领杨虎城创建的一支爱国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影响和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团结合作，积极抗日，反对内战，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国民党蒋介石对这支爱国部队痛恨万分，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分化瓦解和打击迫害。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当局对这支部队的打击迫害尤为突出。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消灭进步力量和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帮助第38军摆脱被消灭的厄运，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央西北局、华北局、晋冀鲁豫军区加强了对第38军的工作。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组织下，第38军第17师于1945年7月17日在洛宁起义，整编第55旅于1946年5月15日在巩县举行起义，先后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

就在第55旅举行起义的同一时间里，中共西北局派杨信潜入第177旅驻地，向该旅地下党组织传达上级党组织关于要求该旅做好准备、伺机举行起义的指示。6月底，趁第177旅奉命开赴辉县参加进攻解放区的机会，杨信、刘威诚潜入第177旅策动起义。8月初，刘威诚奉命来到辉县，与第529团团团长张玉亭商谈起义问题。张玉亭表示，解放军攻打辉县时，他一定配合行动，率部起义，但解放军围攻辉县的战斗打响后，张玉亭背信弃义，刘威诚、杨信几次与他联系，他始终按兵不动。加上第530团团团长王汝昭、第531团第3营营长姜树德等掌握兵权的中共党员军官被调离，中国共产党在该旅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组织策动更多的部队起义已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员、第530团1营连长吕元壁、薛生荣决定单独行动，率部起义。

8月6日晚，第2连连长吕元壁与副连长丁剑一起研究起义行动计划，决定采取不杀人、不打枪，以紧急集合的方式把部队秘密带走；时间定在8日凌晨2时；整装枪弹全部带走，确定了行动路线。并将计划通告3连连长薛生荣。7日，吕连长派丁剑到解放区联系，自己分别找1、2、3排长谈话，布置任务，提出要求。晚上10点钟，起义工作一切准备就绪。8日凌晨2时，吕元壁将部队紧急集合，并按计划秘密向解放区开进。刚出城门不久，城上就响起了枪声，到封锁线不远的地方，起义部队的前后左右枪声响成一片，不时还有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吕元壁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快速通过了封锁线，一直向北走了二三里路，与前来接应的丁剑会合，顺利进入了解放区。

与此同时，第3连连长薛生荣也立即集合部队，准备将部队拉走。正在集合时，第1营营长左登云突然来到了第3连。此时，前沿炮楼上的枪声越来越激烈，左登云命令薛连长带领第3连赶赴前沿出事地点查明情况。薛生荣立即整理好队伍，下令道：副连长徐振中带领1个班到辉县城东北方向1500米处，在2连设防的炮楼占领阵地，向前方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撤离阵地，立即出发。接着，宣布了行进序列，明确了各排的任务，然后就率领全连按照事先确定和侦察好的路线前进。8月8日黎明，第3连除副连长徐振中（反动军官）及其带领的一个班外，全部抵达解放军太行第3军分区驻地林县杨柳川。吕元壁带领的第2连已先期到达。在这同时，第529团的一个

机枪排也相机起义，进入解放区。起义部队受到太行第3军分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和晋冀鲁豫军区首长的嘉奖。

部队起义后，按照上级指示到解放区腹地接受整训，沿途受到了军民的热烈欢迎，使起义部队官兵深受感动和教育。8月下旬，组织决定，第177旅起义部队组成独立营，薛生荣任营长，吕元壁任政委，丁剑任第2连连长，邓子玉任第3连连长。1946年9月，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成立，独立营番号被撤销，所属部队编为第38军第55师第164团第1营。不久，这支部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南泉起义

1946年8月10日，国民党交通警察第15总队第1大队大队长王一藩率部400余名官兵在胶东南泉起义，这是国民党特务武装反蒋反内战的首次起义。

国民党交通警察是由军统头子戴笠直接指挥，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全部美式装备，专门维护后方交通秩序并负责监视非嫡系部队的一支特务武装。第15总队第1大队上校大队长王一藩，河北蓟县人，青年时期有过抱负，看过一些进步书籍。1946年7月，交警总队由常州开赴山东参加内战，王一藩被推到内战的第一线，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深感不安。想投奔光明，又苦于找不到共产党。他的妹夫李华仆在国民党上海警察总队工作，参加过进步组织“东北旅沪同乡会”，接触进步人士较多。李华仆很了解王一藩的心思。当王到达山东后，他便在上海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顾开极取得了联系。在顾开极的安排下，李华仆和侈子君等人将王一藩家属从常州送往解放区，并向淮阴的中共华中分局领导人谭震山汇报了王一藩的情况，华中分局遂派李华仆赶赴山东临沂，向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刘贯一汇报情况，刘部长当即决定派工作人员朱进陪同李华仆到胶东与王一藩联络。朱进与李华仆到达胶东时，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已经领受了接应王一藩起义的任务。

8月10日，李华仆与朱进到达南泉，李华仆单独与王一藩会面，传达了华东军区联络部对王一藩起义的部署与安排，王一藩喜出望外，欣然同意，并在华东军区起义部署的基础上，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安排。当夜，王一藩以“配合友军”奔袭解放军为名，将全大队集合拉出了驻地。就在这时，总队长徐肇明来电话询问将部队拉出的原因，正巧当天有一辆护路的火车出了问题，王一藩以此为借口做了回答。当总队长挂断电话后，王一藩继续对电话说：“什么，需要我亲自带队伍去？”，“谁留在家中呢？”“要副大队长留下，好！好！我马上去”。这样，王一藩巧妙地把专门负责监视自己的军统特务、副大队长朱超平留在了军营，带着手下人马向部队集合的地方赶去。

王一藩赶到部队集合点时，没想到第2大队也赶来了，王一藩灵机一动，对着2大队长说，“总队长命令你们在此掩护火车上轨，要我们到南泉以北执行值勤任务”。然后率第1大队400名官兵沿铁路向联络地点进发。在前进途中，负责接应的解放军北泉联络组与国民党第54军巡逻队发生遭遇战，听到枪声后，王一藩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同时，安排了亲信到各中队监视几个反动军官的动向，负责处置突发事变。11日拂晓，第1大队安全抵达原定位置程哥庄。部队宿营后，王一藩召集3个中队长宣布起义计划，大家都表示听从大队长安排，然后由各中队长向分队长、班长、士兵逐级传达起义命令，其中有几个班、排长听到起义命令后，妄图拉走部队，被及时发现和处理。傍晚，王一藩向部队训话，宣布退出内战，全队起义。

王一藩的起义，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和慰问。8月18日，起义部队在莱阳正式成立“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王一藩任司令。当天下午胶东解放区2万多军民隆重集会莱阳，庆祝这支部队的诞生。陈毅、张云逸贺电称赞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反动派特务以有力打击，更为今后爱国军人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后来，王一藩升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

海福龙率部起义

1946年8月14日，在大同战役中，国民党军东北挺进军骑兵第15团团团长海福龙率部300余人在大同前线举行起义。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解放军向同浦路北段发动攻势，至8月上旬，先后解放了朔县、山阴、崞县、代县、五台，定襄等县城，晋绥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瓦解国民党军，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决定争取东北挺进军骑兵第15团团团长海福龙起义。

海福龙，原名海万有，辽宁省阜新县人，生于1911年1月。抗日时期，海部是伪蒙疆军第6师的一个骑兵团。在包头大树湾换防到固阳县的途中，因受不了日本军事教官的压迫，海福龙和齐广武打死日本教官，部队哗变后把队伍拉到大青山。不久，被编为国民党傅作义部队游击第五纵队别动第3团，海福龙任团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自任蒙边游击骑兵第1师师长；同年10月，又编入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部，成为其中一个师。后该师在归绥收编了伪蒙疆的警察部队等散兵，扩大成三个团，海福龙任少将司令。在回东北的途中，所属主力第1团叛逃，另两个团行军至河北张家口，又遭到解放军阻击，海福龙只好带着残兵折回山西大同北郊白马城一带驻扎，仍编为东北挺进军骑兵第15团，海自任团长。

为了争取海福龙起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先后多次派人与海福龙联系，劝其归顺解放军。1946年7月，大同战役开始后，晋察冀军区敌工部派叶修直科长、蒙族干部巴音巴图和张伯骞等去大同北郊白马城对海福龙进行争取工作。巴音巴图认识海福龙的参谋长塔宝福，又同是蒙古族人，巴音巴图进入白马城找到塔宝福，与其谈了有关争取海福龙在解放军总攻大同时率部起义，通电全国反蒋反内战。塔宝福将此事向海福龙密报以后，海当即表示同意，并派联络副官跟随巴音巴图到大同以北约30华里的孤山村，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康健生、科长叶修直及张伯骞等具体研究起义办法。起义方案初步商定后，拟请海福龙夜间到孤山村研究决定，但因受骑兵第5师师长监视，无法脱身前往。

叶修直科长对海福龙的处境有所预料，同大家商量后认为，张伯骞认识海福龙的副团长齐广武，二人早在东北义勇军抗日时就认识，后在抗战时期又有过联系，于是商定由张伯骞给齐广武写信，约齐广武到孤山村接头。海福龙因难以离开，只好派齐广武代表他去孤山村，双方进一步商定了起义计划。

1946年7月14日，解放军总攻大同前夕，海福龙将国民党守军口令及时报告给巴音巴图，使解放军冀晋纵队第11旅、第12旅顺利进入进击地区，一举歼灭了马占山的骑兵第5师和第6师，扫清了大同城外的国民党守军据点。

8月14日，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康健生部长、叶科长、张伯骞等来到海福龙团部，认为时机已到，动员海福龙即刻起义。海福龙当即决定连夜行动，毅然率领全体官兵300余人在大同前线起义，撤离白马城迅速转移到解放军驻地阳高县的八里台一带。

1946年8月22日，起义部队以原东北挺进军先遣军第一路全体官兵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文中说：福龙虽供职蒋伪阵营，早已厌恶其虚伪欺诈、卑鄙丑恶行为，屡有起义之心，苦无机缘可乘。幸得内

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云主席（云泽，即乌兰夫）指导与当地八路军支援，乃于8月14日率全体官兵脱离蒋、阎、伪、日、匪棍集团，脱离晋北反动巢穴之大同，毅然来归。接着又致电全国同胞反内战起义。8月25日《晋察冀日报》号外刊登关于海福龙通电起义退出内战的消息，他的部队和家属到达解放区后，受到当地军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优待。

海福龙部在阳高经过一个月的整训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5支队，下辖3个团、一个警卫连，海福龙任司令员，齐广武任副司令员。海福龙在叶修直、巴音巴图的陪同下到张家口，受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的接见，并开了欢迎会，乌兰夫讲话中赞扬海福龙光荣起义，参加革命，调转枪口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正义之举。当天下午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他们时，也赞扬他们光荣起义，参加革命的正义行动。为了加强对第5支队的政治教育改造工作，派出10名政治指导员到支队各连开展政治工作。中共巴、乌工委又任命巴音巴图为支队政治部主任。此后，起义部队开往商都，投入到巴、乌、锡、察四盟的解放斗争。海福龙率部在大同前线起义，在同蒲路北段打响了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枪声，对晋绥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是一个有力打击。

横山起义

1946年10月13日，国民党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率第22军第86师、新编第11旅各一部及榆林保安第9团共5000余人在陕北横山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计划。

横山，地处陕甘宁解放区腹地，是延安通向榆林、靖边的咽喉要道，为国民党军胡景铎部所控制。1946年初，国民党破坏了停战协定，频繁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驻横山的国民党军严重威胁陕甘宁边区北线的安全。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要加强陕甘宁边区北线的工作，拿下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边区在自卫战争中取得一块回旋的余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西北局决定派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同志到横山做争取胡景铎的工作。

胡景铎，陕西省富平人，在中学时参加过中共领导的前卫社和革命互济会等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回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师源是胡景铎的同学和亲戚，二人自幼相依为伴，交情颇深。1945年3月，胡景铎被国民党任命为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4月，师源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以谈判边界问题为由来到榆林，得悉胡景铎在横山波罗堡驻防，便安排武启政化装为小商人，潜入波罗堡与胡景铎取得了联系，然后，师源以边界谈判为名，亲自到波罗堡会见胡景铎。二人相见，亲密无间，也感慨万千，通过4个晚上的秘密会谈，胡景铎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率领部队起义，并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掌握部队，准备起义。

根据胡景铎的要求和当时形势，中共西北局决定派出30余名干部，调拨一批枪支弹药及活动经费支援胡景铎举行起义。6月底，派遣干部和武器、经费陆陆续续秘密地进入胡景铎部，他们分头下到各个连队，掌握部队动态，策动下层官兵准备起义，培养起义骨干。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7月1日，中共西北局在延安花石砭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分析了形势，决定组织横山起义，并派中共西北局国军工作处处长范明去横山直接与胡景铎协商起义的具体事项，习仲勋还亲自给胡景铎写了一封信。9月，范明化装为富平县城中学教员，几经危险和周折，秘密进入波罗堡，会见了胡景铎，转交了习仲勋同志的亲笔信，传达了中共西北局关于横山起义的决定与安排。然后，二人议定了起义行动时间和具体方案，提出了10条起义计划。第二天，范明返回边区向习仲勋、张德生汇报了胡景铎决心起义的情况。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由王世泰为指挥、张仲良为政委，调陕甘宁绥联防军教导旅、新编第4旅和警备第3旅在武镇、绥德一线集结，策应横山起义。10月13日，在解放军接应部队的配合下，胡景铎率领保安指挥部、保9团、第22军第86师、新11旅分别于石湾、高镇、波罗堡、海流兔庙发动起义。

由于这次起义东起镇川，西至横山，涉及地域广，战线长，参与部队多，为了便于组织指挥，起义分为东、西两线进行。10月12日晚，西线石湾起义首先开始，在保安第9团团附张子亚、少校军需主任范止英、机枪中队长许秀歧等人率领和解放军绥德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包围了保9团团部，迫使团长张子亚决定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西线石湾起义成功。13日，在解放军新11旅、教导旅和警3旅的配合下，胡景铎率领保安指挥部、第86师和新11旅，分别在波罗堡、高镇、海流兔庙举行东线起义。胡景铎亲自指挥，

首先把波罗堡的部队集中控制，将妨碍起义的反动分子逐个召集到指挥部，缴了他们的枪并软禁起来，把地方所有反动头子全部抓获，然后在波罗堡城外迎接解放军进城。一举获得起义成功。当天，胡景铎发表了《反对蒋胡卖国、内战、消灭异己，拥护邓宝珊将军等和平建国奋斗》的通电，宣布退出内战。

10月14日，起义部队被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师，胡景铎任师长，李振华任参谋长，姚绍文任副参谋长，范明任政治部主任，师源任副主任，张子亚任第1团团长，魏茂臣任第2团团长，杨汉三任第3团团长。

横山起义的成功，使解放军解放了无定河以南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了榆横新解放区，打乱了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反动计划。

远 襄 起 义

1947年1月27日，国民党保安第3纵队独立团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程培兆率领400余人在河南省柘城县远襄举行起义。

程培兆，早年毕业于西北军军官学校，曾在冯玉祥部工作。1944年在张岚峰部任教育团学生队队长时，参加了冀鲁豫军区敌工办事处在张岚峰部秘密组织的“共产党同情小组”。1945年春，程培兆在张岚峰部任独立团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

10月，冀鲁豫军区第12军分区派敌工科王洽惠打入程培兆部，被程安置在营部任军需上士。从此，程、王二人开始了一系列起义的准备工作。程培兆利用调整任命等办法，将思想落后的6名班长调离本营，将思想进步的士兵、骨干提升为班、排长，为起义做了很好的组织准备。1946年8月，冀鲁豫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王乐亭奉命到商丘执行任务，又专程到远襄，当面与程培兆一起研究起义计划，要求程培兆加紧做好起义准备工作。

1947年1月16日，张岚峰在山东曹县太杨庄被俘，冀鲁豫军区第12军分区领导认为，这是组织程培兆举行起义的大好时机。1月24日，第12军分区司令员王其梅亲自率领第29团前往远襄接应和动员程培兆起义。1月27日凌晨，程培兆集合部队，先请王其梅司令员进行动员讲话，然后，程培兆宣布起义，并命令部队与接应部队一起开赴解放区，顺利到达睢县白楼，与宁柘商支队合编为豫皖苏第1军分区独立团，程培兆任团长。

1949年，该团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参加了解放西藏的战斗。

台湾二二八起义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50年的台湾宝岛回到祖国怀抱。10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援助下，接收台湾后成立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委任陈仪为行政长官兼省警备司令，并建立了特务机关，对台湾人民加强了独裁统治，实行统制经济和与内地隔离的政策。在美蒋反动派的双重压迫下，台湾人民生活陷入绝境。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台湾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举行两次大规模的反美示威。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德根，率查缉员、警员9人，以查私为名抢走在台北市万里红酒店附近卖烟妇女林江迈6000元现金和几十条香烟，并用枪托将其头部击破。国民党的暴行引起围观群众的极大愤怒，将查缉员赵子健、警员张启祥打了一顿。此时，查缉员傅学通竟开枪射击，市民陈文溪被当场打死。群众更加愤怒，将专卖局的一辆大卡车烧毁。接着，千余名群众涌向台北市警察局，彻夜不散，要求严惩凶手。

2月28日一早，台北市民涌上街头，揭露流血事件真相，并捣毁延平路派出所、专卖局，焚毁专卖局存货。12时，数千市民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台湾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口号，向长官公署请愿，提出了“惩凶”、“赔偿”和“取消专卖局”等5项要求。长官公署不但拒绝市民要求，而且调集军警特务，向徒手群众开枪镇压，结果打死3人，打伤多人，造成流血惨案。

国民党的暴行没有吓倒台北市人民，各界群众同仇敌忾，迅速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商人罢市。愤怒的群众夺取军警武器，围缴海军军械库，几次冲进长官公署，烧毁车辆，捣毁台湾银行、省盐政局台北办事处，包围专卖局、省贸易公司、日产处理委员会，占领广播电台、邮电通讯机关等。手持武器的群众和军警展开搏斗，打死打伤军警和公务人员1000多人。28日下午，台北市民通过电台宣布起义，号召全省人民起来斗争。

二·二八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岛，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台北市铁路工人在3月1日占领了铁路警察署，切断台北与外界的交通。3月2日5000多名大中学生在中山堂集会决定组织学生军，3月5日将近2000多名台籍退伍兵参加起义，起义者相继占领了一些重要机关和军事要地；基隆市人民2月28日发动起义，占领政府机关，缴获反动军警武器；台南市3月2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起义，支持台北人民的正义斗争；台中市3月2日上午1000多市民召开大会，宣布起义，并成立了人民政府，3月3日又成立了“作战本部”，组成人民军；彰化市3月3日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府和警察局。短短几天，北起基隆，南到高雄、屏东，东自花莲，西至新竹，起义的烈火燃遍台湾全岛，国民党反动派在台湾的统治陷入瘫痪。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台湾当局，一面表示“和平解决”，一面又呈电南京政府疾调“援军”帮助。蒋介石于3月2日电令驻江苏的第21军，限期赴台。3月8日，大批军队相继入台，立即开始大屠杀。几天之中，全岛各地的起义领袖、工人、学生、市民、儿童及部分爱国士绅，被惨杀者达3万多人。

二二八起义是台湾人民进行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伟

大斗争。这次起义，推动了蒋管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直接配合了祖国大陆正在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凌源起义

1947年5月1日，国民党东北保安第3支队少将司令韩梅村率领近千名官兵在热河（现辽宁省）省凌源县毅然起义，反对内战，归向人民。

凌源是热河省军事重镇，位于锦州、朝阳至承德铁路的要冲，是东北与华北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东北解放区通向关内的一条战略要道。国民党为了加强凌源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凌源原有的地主武装为基础，组建东北保安第3支队，由韩梅村任司令，刘清霖任副司令，驻防阜新、凌源两地。

韩梅村，湖南省华容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和南京中央军官训练团，在杜聿明部由排长升任师参谋长，1938年任第52军第195师第566旅旅长，1941年任第195师参谋长。日本投降后，韩梅村随杜聿明到东北接收日军投降，任阜新市市长，杨明清为市政府秘书长。在阜新，韩梅村寻求光明，向往进步，私下安排自己的机要秘书邓钧洪和杨明清积极设法与热河地区中共党组织、东北民主联军进行联络，待机起义。

邓钧洪是地下共产党员，为了加强对第3支队的争取工作，化装成商人到解放区，在王爷庙找到了东北民主联军人员，同时，写信回湖南，请求中共湖南工委周里再派人到阜新协助工作。周里接信后，派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周太暄和妻子陶涛前往东北。

1947年2月，周太暄、陶涛和胡良杰、邓敏捷等人离开湖南到达阜新。周太暄夫妇等人的到来，进一步增进了韩梅村起义的信心，他分配周太暄担任秘书，安排陶涛为家庭教师。不久，韩梅村率部移驻凌源，担任锦承铁路的护路任务。

3月下旬，周太暄以侦察“敌情”为名，秘密潜入解放区，在冀察热辽军区第16旅旅部，受到旅长张德发、副政委曹德连的接见。周太暄汇报了他受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到凌源策反韩梅村的情况，经向中共冀热辽分局和军区司令程子华请示批准，解放军第16旅司令部派出通信科长戴平和几名侦察员，化装后随周太暄回到凌源。韩梅村亲切接待了戴平及随行人员，并亲自与邓钧洪、周太暄一起陪同戴平等视察了所属部队的设施、布防等情况。摸清情况后，戴平返回向旅首长和军区汇报了情况，然后又只身到达凌源传达起义精神，与韩梅村研究起义的具体事项。

4月30日，根据整体部署，解放军第16旅分3路接近凌源县城，破坏了铁路，以一个营的兵力监视车站，其他部队全力接应起义部队。同时，韩梅村以点名发饷为名，命令部队到凌源车站集中，同时检查了通信联络设施，派出部队严密监控军用仓库等重要军事部位。当解放军第16旅一个连队到达第3支队司令部门口时，韩梅村下令警卫连不准抵抗。等到第16旅领导张德发、曹德连来到韩的司令部接应时，韩梅村立即召集官兵，在司令部门口宣布第3支队起义。宣布起义后，多数官兵积极响应，愿随韩梅村起义，但副司令刘清霖蛊惑少数人逃离了凌源。

5月1日，起义官兵近千人和百余辆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在韩梅村的指挥和解放军接应部队的配合下，离开凌源，浩浩荡荡向宁城县八里罕解放区开拔。到达解放区后，韩梅村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保安第3支队反蒋反内战起义。5月7日，解放军第16旅在八里罕召开了两万人的欢迎大会。5月9日，第3支队改编为热河民主救国军独立第1旅，韩梅村任旅长。随后，该部队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曹瑞民率部起义

1947年7月10日，国民党军阎锡山省防军第61军第66师第197团副团长曹瑞民率部400余人在山西祁县举行起义。

曹瑞民，原名曹熹，1914年生，河北省隆尧县人。由于家贫，为谋生什，于1937年2月参加了阎锡山军队第61军当二等兵。为了表示要当一名好兵，为人民办点好事，就把曹熹改为曹瑞民。

曹瑞民当兵后，在思想上信守“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国家太平矣”。由于他有文化，肯用功学习，在教导队训练结业考试时名列全队前茅，加上对阎锡山及长官的忠顺，很快得到了信任与重用。1938年3月，曹瑞民报名考入国民政府河北民军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河北民军任中尉参谋，后逐步升为连长、营长、副团长。1945年调任阎军省防第2军第6师第18团任团长。1946年因阎军缩编被降为营长，不久又提升为第66师第197团副团长。

为了争取曹瑞民弃暗投明，中共地下党员李振海经常与曹瑞民进行谈话。李振海与曹瑞民是同班同学，以后一起当教员，关系密切。二人经常来往。李在与曹谈话中，不断谈到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一些道理，对曹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影响。曹逐步认识到，阎锡山反动统治不得人心，不会长久，阎的军队也是没有前途的。只有脱离阎军，参加革命队伍才有前途，如果随波逐流地混下去，势必遭到身败名裂。从而产生了率部投奔解放区的想法。由于阎锡山在军队中搞了各种特务组织，对内部人员进行秘密监视，只要发现有反阎的言行，便以各种罪名立即处决，使军队内部互存戒心，人人自畏。因此曹瑞民在言行上也都十分谨慎小心。

当时阎锡山军队内部的思想十分混乱。对政治形势和对共产党的看法各不相同。曹瑞民由于出身贫寒，亲眼看到在抗战期间，阎军总向后撤，而八路军总是向前线开。国民党处处作威作福，而共产党处处为穷人。他了解到广大士兵对阎锡山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厌战情绪，正是向部下做争取工作的思想基础。曹用事实向身边可靠的人说明，只有弃暗投明才有出路。同时也向平时比较接近的上级进行试探性争取工作。

1947年7月，阎军第66师奉命由山西文水出发，开往临汾换防。当部队路经祁县的下申谷村时，曹看到当时行军队伍前后拉得很长，驻地也很分散，认为这正是把部队拉出来的好机会。7月7日的晚上，曹把第1营的三个连长和第2营营长李元琦召集到一个破庙里，告诉他们在今晚12点带队在村南大路上集合，执行紧急任务，一切行动要听我的指挥。为了保证行动计划顺利进行，在部队临出发前，处死了反对起义的第1营营长姚希哲等三名军官。

大约在夜里12点，第1营按计划全部到齐，而第2营却按兵不动，当派人去督促时，发现第2营营长李元琦思想变卦，并已把行动计划报告了师长许其昌，部队也已布置开了。这时曹瑞民感到情况不妙，便立即率领第1营向祁县的南山方向解放区游击队和民主政府所在地开发。阎锡山很快获悉了曹部的行动后，认为跑掉曹部对其军心影响很大，便立即派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率三个师的兵力尾追，起义部队在祁县上八洞、下八洞一带时被包围。这时中共祁县县委接到二区关于曹部起义的情况报告后，立即决定由县委书记杨成江和独立营参谋长，率领全营和太行第2分区第14团赶赴现场，与曹

部接头后，认为情况紧急，如不立即把部队撤走，就有被阎军吃掉的危险。于是由民政股长杨小克带领，在解放军掩护下，于天亮前把部队带到了祁县来远镇。

7月10日，祁县人民政府召开了欢迎曹瑞民率部起义大会。曹部起义部队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小炮排，共计400余人。携带武器弹药计有重机枪4挺、轻机枪27挺，小炮6门，各种步枪约300余支。接着，起义部队开往左权县丈八村，由太行第2分区进行改编。

曹瑞民经过三个月学习，被分配到太行军区补充团任副团长；1948年调任第13纵队任补充团副团长。随后参加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解放太原时编入人民解放军第61军，又任该军补充团副团长，1949年部队开赴西安时因病退伍。

新中国成立后，曹瑞民一直受到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怀。几十年来，一直被选为山西榆次市第一至第六届政协委员，第二至第六届人大代表，榆次市第七届人大常委和第八届政协委员。

鄆城起义

1947年9月13日，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第119旅第356团团团长张公干率全团2000余名官兵在山东省鄆城前线起义。

张公干，安徽宿县人，1928年夏参加西北军，1929年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副官，1931年在西北军汾阳军官学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宋哲元第29军独立第31旅任团附。

1941年，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张公干利用与第68军军长刘汝珍曾一起是冯玉祥随从副官的关系，打入第68军做统战工作。同他一起打入该军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暂编第36师参谋长邹桂五，以及张公干的夫人赵先旭和邹桂五的夫人纪清瀛。邹桂五也是刘汝珍的老熟人，他们曾一起在苏联学习军事，相互了解，关系密切。赵先旭和纪清瀛与刘汝珍的夫人王兴洲是好友，在张公干和邹桂五做好刘汝珍的工作的同时，她们也千方百计做好王兴洲的工作，然后再通过她做好丈夫刘汝珍的工作。从1941年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张公干和邹桂五及两位夫人，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在第68军上层军官中积极开展团结抗日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四年间，第68军在随县天河口、信阳、明港、南召、方城及浙川等地，多次对日作战，与八路军、新四军和睦相处，没发生过任何摩擦。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第68军由浙川开到开封、陈留一带，军部设在陈留。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该军的策反工作，晋冀鲁豫军区和汴郑工委派出王凡、范毅、刘鸿文和林恒等同志打入第68军，与张公干、邹桂五一起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团结和教育了部分国民党军官兵，1945年冬，第68军与黄河北岸的解放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定。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第68军被改编为整编第68师，卷入了内战的洪流之中。是年冬，刘汝珍任命张公干为第68师第119旅第356团团团长，担任开封城防和警备任务。张公干掌握兵权后，经常深入部队，加强训练，同时注意搞好部队思想教育，采取比较隐蔽的方法，揭露国民党抓兵加税，不打日本，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只有停止内战，和平建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整编第68师被调往菏泽一带，阻止解放军北渡黄河。第356团奉命在鄆城及其以北，沿黄河南岸设防，同时担负所谓“清剿”任务。第356团到达鄆城后，张公干只安排一小部分部队驻城南，大部分驻扎城内，尽量防止和避免与中共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发生冲突。每次上级指派的“清剿”任务，张公干都要派人提前通知中共地方武装，来不及通知的，就采取离得很远就开枪开炮等办法，让对方有充足的时间撤离，以避免冲突和流血牺牲。但是，由于部队长期驻扎在前线，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发生，稍有不慎，就会伤害自己的同志，或者暴露，使多年统战工作的成果毁于一旦。应该怎样开展工作呢？经研究，张公干决定派范毅同志到冀鲁豫军区请示。

9月11日下午，范毅回到团部，传达了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指示，决定第356团当晚12点举行起义，届时由解放军三野第1纵队第3师刘亨云师长率部队接应。这时，距起义只有几个小时了，张公干立即打电话，把驻城南十几里的一个营调回城内，以防止和接应部队发生冲突。晚上10时，张公干在城东南的城墙下召集各营营长开会。会上，张公干痛斥蒋介石发动内

战，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指出蒋介石已面临全线崩溃、即将覆灭的命运。并宣布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决定起义参加解放军。第3营营长米德山当即表示坚决拥护，第1营营长吴海珠和第2营营长徐继业，开始犹豫不决，经说服教育，最后表示说：我们听团长的。张公干要求他们回去掌握好部队，绝对不许走漏消息，等接应部队一到便立即行动。同时，吩咐话务员严格控制电话，对外一律停止通话，上级来的电话全部由团长直接处理。

由于时间太仓促，全团思想和组织准备不够充分，加上接应部队临时有紧急战斗任务，当晚没能赶赴郟城，第356团未能按计划当晚举行起义。这时，张公干要求各营长沉住气，继续掌握好部队，听候命令。12日早饭后，第119旅旅长张勋庭来电话说：徐州总部派来两个谍报参谋，要到郟城检查、督促和监视。两个谍报参谋来到团部，张公干对他们说：你们来，我欢迎，可是前方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请你们多加小心，好自为之。并让副官好好招待，严加监控。

9月12日，对于张公干和范毅他们来说，是非常紧张的一天。由于部队没有建立中共地下组织，长期以来受的都是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几年来，虽然他们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成效，但到关键时刻，有的可能动摇，有的可能告密，有的可能逃跑，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当时，团部和旅部直通电话，谍报参谋又突然来团了解情况，万一走漏风声，就会酿成大祸。张公干和范毅昼夜不停地到连队观察，以随时掌握和了解部队情况，并伺机做工作，以稳定军心。一天过去了，一夜又过去了。13日上午八九点钟，他们终于在城楼上远远看见解放军浩浩荡荡向郟城急进，顿时，心花怒放，总算把接应部队盼来了。

解放军三野第1纵队第3师的部队开到郟城城下，即派参谋长冯少白进城，与张公干接头，并传达了陈毅同志关于第356团起义的指示，一起研究了起义的有关问题。接着，张公干集合全团官兵讲话，痛斥蒋介石投靠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的罪行，讲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全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道理。最后，张公干宣布：为了全团官兵弟兄们的光明前途，现在我们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团官兵热烈鼓掌。随后，张公干下令打开城门，迎接解放军进城。

13日晚，起义部队奉命北渡黄河到观城一带休整。14日，第356团全体官兵进入解放区，受到沿途村庄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送来许多慰问品，官兵深受感动。17日，部队到达观城，张公干代表全团官兵，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通电。不久，第356团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6师，张公干任师长，秦玉珊任副师长，阎学增任政治部主任。

郟城起义，使解放军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占领了这一黄河重要渡口，打开了进入中原的通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弥勒起义

1947年11月中旬，在中共弥勒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云南弥勒县农民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

弥勒县位于昆明市东南，是汉、彝两族杂居的地区，群众基础很好，从1940年起，中共弥勒县党组织就在该县秘密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先后建立了活动据点，争取阿细族的头人，筹集购买枪支弹药。经过多年准备，弥勒县西山、东山、五山、圭山等地区地下武装的人数和装备日益发展和增强，进行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947年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中共弥勒县党组织掌握的西山地区竹园镇公所武装，携带轻机枪1挺、长短枪40多支，子弹4000余发，到达弥勒西山，宣布起义。张贴了《竹园镇公所起义告民众书》。

竹园起义后，在国民党弥勒县政府任政警队长的起义骨干昂天学，将20支步枪和1挺轻机枪秘密送往西山。起义武装在西山的华荣、滇胜两乡分别建立了中共支部，发展党员，领导武装斗争；组织行政村，民主选举正副村长，宣布废除保甲制度；成立了民兵组织，对民兵基干队分两批进行了集训。西山地区的200多人的民兵武装，经训练后在杨治廷的率领下，打垮了弥勒县联防大队长鲁国祥带领的民团。此间，弥勒县圭山、东山、五山等地起义武装组织都先后发动了起义。

1948年初，朱家壁、张子斋等人从缅甸回到了西山后，成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朱家壁任司令员，张子斋任政委。弥勒县几个山区的武装力量参加了该军，被整编成5个大队。之后，弥勒县起义武装坚持斗争，不断发展，迎来云南全省的解放。

营 口 起 义

1948年2月25日，国民党军第52军暂编第58师师长王家善率部8000余人在东北营口举行起义，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东北战场国民党军的一次重大起义。

王家善，黑龙江省巴彦县人，1928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九·一八”事变后，率部抗日，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松北地区总指挥等职，1933年，投靠日军，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参谋，同年12月，再次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这期间，王家善利用假期，秘密潜往南京，何应钦委他为中校，令他视机在东北活动。学习期满后，回东北任伪满治安部科长，1943年任伪满军第7旅旅长。日本投降后，王任国民党松江地区指挥官，1946年任东北行辕少将高参，1947年任第52军暂编第58师师长，驻防营口。

为了争取王家善，瓦解暂编第58师，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派石迪到瓦房店主持辽南情报站工作，对外称辽南军区政治部联络处。在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教育和培训的基础上，石迪将被俘的东北保安第4总队上校参谋廉荣春释放回营口。廉荣春在暂编第58师，首先发展了独立第9师第3团少校团附刘凤卓为地下工作人员，接着又发展了上尉连长赵百禄、上尉副官张海涛、吴国璋和其他外围关系6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把重点放在做好争取王家善率部起义的工作上，并利用多种形式，暗中发展进步势力。

1947年10月初，第52军副军长郑明新在营口设立前进指挥所，王家善的城防司令被架空，在粮食供应等方面，暂编第58师经常缺粮，士兵吃不饱饭。地下工作组廉荣春等，利用暂编第58师的困难，加紧了对王家善的策反工作。11月，廉荣春、张海涛、吴国璋因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出营口，工作留给未暴露身份的刘凤卓继续进行。

1948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辽阳，围攻鞍山。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经过多方的争取工作，王家善终于定下了起义决心。2月23日、24日，王家善派第3团团附刘凤卓、作战科科长王文祥为代表到大石桥与中共东北局辽南军区司令吴瑞林等代表会谈。经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确定25日上午，在解放军向营口发起佯攻的时候，由王家善举行起义。2月25日拂晓，解放军对营口发起佯攻，王家善命令副官韩光、特务连长李殿儒做好逮捕营口军政要人的准备。9时，王家善邀请国民党第52军副军长郑明新到辽河沿线视察阵地。郑明新到达后，王家善报告解放军已向营口发起猛烈进攻，建议召开紧急城防会议，郑明新同意。下午2时，会议按时开始，正当郑明新布置营口防务之时，各军政首脑带来的20多名警卫人员在另一间房内被王家善的副官赵玉珊和特务连卫士全部缴械，关进了地下指挥所。下午3时，特务连卫士冲进会议室，把与会的38名营口市党政军头目全部逮捕，其中包括第52军少将副军长郑明新、交警第3总队少将总队长李安、营口市党部书记长王惠久、营口市市长袁鸿逵、营口三青团主任陈修实、警察局局长曹起麟等。接着，王家善指挥部队配合解放军解放营口。下午5时，辽南军区独立师第3团团团长苏克文率部进入市区，包围了交警第3总队。晚7时，辽南军区独立师在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向国民党第3总队和第52军前进指挥所发起攻击，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少数部队逃往锦州，营口解放。晚10时，在石迪陪同下，王家善、唐仕林离开营口。起义部队各团按计划撤出营口，向大石桥方向前进，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5月16日，起义部队被命

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 5 师，王家善任师长，谢甫生任政治委员，唐仕林任副师长，张翮任参谋长。 1949 年 3 月，独立第 5 师改编为解放军第 167 师，编入第 50 军建制，以新的战斗姿态投身于解放战争，为人民立了新功。

张寿芳起义

1948年7月6日，在晋中战役中，驻防东阳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主力第8总队第2团团团长张寿芳，拟率部举行战场起义，因情况发生突然变化，迫不得已，仅带一卫士投向解放军。晋中战役前，阎锡山为控制晋中至太原的咽喉要道，急调其主力赵瑞的第8总队驻防榆次，所辖两个团，第一团驻防修文，张寿芳任团长的第2团驻守东阳。

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晋中战役，华北军区第1兵团将阎锡山的赵承绥部队围困于晋中平川介休、平遥、太谷地区。为全歼该敌，切断其逃向平原的归路，晋中前线指挥部决定利用党的地下关系，争取张寿芳起义，夺取东阳。

张寿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和共产党敌工部门建立了联系。榆北敌工站工作人员张蔚文和张寿芳是同乡，张蔚文利用这个关系，把张寿芳的父亲张长海接到太行军区第2分区第30团驻地，向老人讲明争取张寿芳起义的意图和共产党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张长海表示要尽力争取动员儿子为共产党服务。张蔚文曾在1943年秋，以送张长海到长治张寿芳公馆名义，与张寿芳进行过面谈，张寿芳当即表示一定尽力协助，并提供了日军情报。1944年三、四月间，张寿芳奉命率部配合日伪军扫荡榆北时，将剿共团捕获的和在看守所关押的共产党方面的20余人全部释放。1945年，张任敌伪保安司令部军械处长期间，张蔚文到太原张寿芳处时，张寿芳将日伪军的布防、装备、工事结构等情况一一相告，并亲自将张蔚文安全送出城至榆次。1946年张寿芳应中共北线情报站要求，数次掩护中共派遣的地下工作人员。

1948年6月，晋中战役开始后，张蔚文向晋中前线指挥部汇报了张寿芳的情况，指挥部决定利用这一关系，策动张寿芳起义，以控制东阳。7月初，前线指挥部在写给张寿芳的信中指出：阎军必败无疑，应即刻起义，为人民立功。张寿芳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在解放军进攻包围东阳后动员起义。

7月4日，解放军进抵东阳。5日，张寿芳召开连以上军官开会。他说：解放军非常强大，我们一个团无论如何守不住；东阳地盘小，部队展不开，无法防守；铁路若被解放军破坏，铁甲车动弹不得只有挨打，应把部队撤回东阳村再进行抵抗。大家同意了张的分析与办法。于是，下令迅速挖好东阳通往东阳村的交通壕，为解放军包围东阳作了准备。当晚11时，解放军发出了进抵东阳的信号弹，张下令各营按计划撤至东阳村，但驻守在东阳和铁甲车上的两个营误认为是攻击他们的信号，吓得不打自乱，纷纷向修文方向逃窜。

7月6日晨，张寿芳把在东阳的第3营集合起来投向解放军。在行军途中，营长发觉路线不对命令停止前进。张考虑到第3营有阎锡山的特务政卫人员和铁军骨干，活动很猖狂，弄不好会引起大的麻烦，于是向副团长说，我一个人带个卫士走，你们愿到哪里自己决定好了。当时，张寿芳投向了解放军太岳第二分区。

张寿芳战场起义归来，使解放军一枪未发迅速占领东阳，切断了赵承绥部企图沿铁路逃回太原的退路，为日后全歼该敌于晋中创造了条件。1948年8月5日《人民日报》曾为张寿芳起义发了专讯。

介休起义

1948年7月17日，在晋中战役中，驻介休县城内的国民党民卫军副司令郭晋武率部1000余人举行起义。

1948年5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临汾战役胜利后，挥戈北上，发起了歼灭阎锡山军队主力的晋中战役。在介休县城附近一举歼灭阎锡山的王牌第61军第72师1万余人，介休城处在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介休县城位于山西省南部同蒲铁路线上，是阎锡山在晋中地带的重要地点。盘踞在介休城内的蒋阎军，除少量正规军外，其他为地方部队3个中队和警察队、特警队，以及县政府武装人员等五、六千人。7月间一天下午，阎锡山给介休城防司令李子清和县长侯卿斋空投手令，要他们率领正规部队和部分地方武装突围逃回太原。当李子清和侯卿斋率部突围逃跑时，受到解放军的堵截，大部分又返回介休城内顽抗固守。

中共介休县委领导平遥、介休县大队、公安队区中队、民兵数千人，乘城内敌人处于一片混乱之时，将城紧紧围住，并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各村群众通过写信和阵地喊话的形式劝降。敌工人员还打入敌内部，向国民党民卫军副司令郭晋武和介休县城县长李炳宣传党的政策。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郭晋武与李炳开始有了起义的想法。郭晋武在抗战时期，曾在决死队当过排长，和共产党有过接触，受到一些革命影响。鉴于目前的处境，他把率部起义的想法告诉了总队长陈玺堂、副总队长郑玉权、郭宗汾和副大队长郭洪，并宣布了凡事必须听命令指挥的纪律。阎锡山对郭晋武想起义的言行已有觉察，派人对他进行监视，更激起郭对阎的不满，坚定了起义决心。几天后，就向他指派的政治部主任、县长杨巨潮公开说明自己对政治形势的看法，说明他准备率部起义的意图，得到了曾在决死队工作过的杨巨潮的支持。此后两人共同动员一些部下准备一起弃暗投明。7月12日早晨，郭晋武以城防司令名义，在体育场向民卫军官兵和当地军政人员讲了当前政治形势和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接着下令停止构筑城防工事，全部释放被押的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在组织民卫军举行的两次游行中，当场让人们验看了郭壁乡几个农民因交不起粮款，被阎军爪牙捆绑吊打身上留下的伤痕，更激起人们对阎匪的愤恨，喊出了“不到太原当炮灰”等口号，群众的正义呼声，表明起义时机成熟了。

7月16日晚，郭晋武在事先分别做了一些工作之后，召开了有县长杨巨潮，国民兵团、保安团、以及留在介休的第34军73师、警察队等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郭晋武首先说，解放军即将攻打太原，已调来了大兵团，太原难守，我们介休该怎么办？国民兵团少校团附张耀先说，形势我们也清楚，司令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服从命令。其他人也表示服从命令。会议决定翌日5点半在体育场集合，宣布起义。最后，郭晋武在会上念了一遍与杨巨潮事先写好的起义宣言，大意是：中国抗战胜利，本应休养生息，但蒋介石背信弃义，挑起内战，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阎匪酷吏遍地，逼粮逼款；穷苦百姓，卖儿卖女者村村皆有；我们要起义！念完后，全体一致赞同。

7月17日早晨，起义队伍集合到体育场，郭晋武上台控诉蒋阎匪帮的种种罪行，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阎锡山！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我们要起义，我们起义了！他号召民卫军把武器放到县政府大堂上，其他各部队

武器放到体育场，人员回原单位听候安排，接着进行了游行。随后，郭晋武骑马赶到解放军驻地，向太岳第一分区司令员苏鲁报告了城内已经起义，急待解放军进行接管。

太岳一分区司令部，中共介休县委、县政府、县大队、独立营和民众轮战队等武装，浩浩荡荡开进县城，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整个县城里鞭炮齐鸣，呈现出一片欢乐气氛，介休县城宣告解放，经清点，参加介休城起义的有郭晋武、杨巨潮以下 1000 余人，各种枪支 1000 余支，大小炮 200 余门。郭晋武率部起义，使介休县城得到和平解放，有力配合和加速了晋中战役的胜利。

济南起义

1948年9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中将军长兼第84师师长吴化文率部3个旅及其他部队2万余人在济南起义，宣布退出内战，从而敞开了解放军进攻济南的大门，缩短了战役时间，减少了部队伤亡和城市破坏，为济南的解放做出了一定贡献。

吴化文，山东掖县人，1920年投奔冯玉祥部当兵，1928年在冯玉祥部洛阳初级军校任教育长，后在张自忠的第25师任参谋长兼特务团团长。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吴化文投靠韩复榘，任高级教导团副团长，1938年1月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在武汉枪决了韩复榘，吴化文又投向蒋介石，任国民党第3集团军独立第28旅旅长，由郸城、东阿转向鲁南山区，12月改编为新编第4师，吴化文任师长。1943年春，日军在鲁南扫荡时，戴笠密令吴化文搞“曲线救国”，投靠了南京汪精卫政府，被任命为“和平救国军”第3方面军上将总司令，下辖第6、第7两个军。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任命吴化文为新编第5路军总司令，驻防蚌埠、徐州一带。1948年8月，任国民党整编第96军军长兼整编第84师师长，蒋介石还给他增拨了部队，补充了武器弹药，调往济南前线参与内战。

中共华东局为争取吴化文，1947年2月，由中共胶东区西海地委派敌工干部李昌言，利用吴化文夫人姨表姐林世英的关系，打入吴化文部开展工作。经过周密细致的安排和说服教育，李昌言争取了林世英的二哥林世德、三弟林世勋，再通过吴化文表弟班绍真做通了吴化文父亲的工作。1948年，华东野战军联络部长刘贯一通过吴化文的老师刘子衡、好友王道的关系，再派敌工干部李勇烈打入吴化文部配合开展工作。同年9月，中共济南市委根据中共华东局和山东兵团首长谭震林、王建安的指示，成立了争取吴化文领导小组，增派敌工干部黄志平、辛光打入吴化文部开展工作。这样，在吴化文周围形成了一个争取和促其走向光明道路的人数众多的亲友工作网络。在林世英的大力协助下，李昌言终于和吴化文进行了谈判，促使吴化文克服了犹豫、动摇和投机心理，初步定下起义决心。

1948年9月中旬，华东解放军发动了济南战役，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率3个师、9个旅及5个保安旅10万余人，分东西两个守备区进行防守，委任吴化文为西区指挥官，率第2师、第84师、独立旅共约2万余人，防守商埠和机场的西区。

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争取吴化文的工作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当日，吴化文致电解放军，明确表示17日起义。17日，当解放军消灭了长清、古城一线之敌，接近吴化文部阵地时，吴化文发生了动摇，他借故拖延，迟迟不令部队撤出阵地，企图保存实力，坐观成败。对此，解放军西线司令员宋时轮向吴部发出了“迅速集结撤退”的命令，要求吴部按解放军指定路线撤军。可是，吴化文仍然按兵不动。18日，解放军对吴部进行了有限的军事打击，全歼了簸箕山守军1个营。对此，吴化文恼羞成怒，命令炮兵还击，企图顽抗，这时，其部下也有人乘机挑唆，企图杀害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面对严峻形势，李昌言、黄志平、辛光等向吴化文严正指出，冲突是由吴化文不履行起义诺言和拒不撤军造成的，如果继续拖延，必遭解放军彻底消灭，并表示，可以要求解放军暂停进攻。吴化文经过冷静思考后，表示同意。随后，经内线工作人员往返联络，促使吴化文最终下定起义决心。

19日上午，吴化文发出了请解放军接收防地的电报，并派参谋长李章携带电台到解放军西线指挥部移交防地。当晚9时许，在中共内线人员的参与下，吴化文在第96军司令部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在征得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后，正式下达了起义命令。当晚10时，起义部队2万余官兵开始按计划撤出阵地，解放军顺利接收了飞机场和西线防区。

防守济南的西部门户打开后，4天之内，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歼灭济南国民党守军8万4千余人，俘获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副司令牟中珩、参谋长罗辛理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庞敬塘等旅以上军政官员23名。

9月25日，吴化文和第155旅旅长杨友柏，第161旅旅长赵广兴等联名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10月22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吴化文等指出：“贵军长等此次义举，符合人民的希望，深堪庆贺。”10月29日，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35军，任命吴化文为军长，杨友柏为第103师师长，赵广兴为第104师师长，何志斌为第105师师长。

吴化文部的起义，在军事上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加速了济南解放，同时在政治上加剧了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促使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有所醒悟，为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军官兵示明了出路。

靖江起义

1948年9月28日，国民党军暂编第23师第46旅旅长包庭宾率部110余人在江苏省靖江县城举行起义。

包庭宾，1905年出生，河北省人。1920年投身于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1929年升任西北军第5方面军骑兵第11旅少将旅长。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包被国民党任命为收编后的第26军高级副官长。1931年12月，包参加了第26军举行的宁都起义，进入苏区。尔后，包受红5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及赵博生的指派，秘密返回国民党军彭振山部做兵运工作，后因事机不密，被迫离开该部，投奔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的抗日同盟军，被任命为该军独立第4旅旅长。抗日同盟失败后，包所在部队被宋哲元第29军收编，包当了高级副官，后任该军副军长佟麟阁的副官主任。1938年，第29军改编为第1集团军，包任司令部副官主任，1940年被编余回乡。包回乡后，自发地参加抗日活动，被人告密后，赴开封投奔郝鹏举。1943年，包随伪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郝鹏举到徐州，先后任总队长、旅长、师长等职。1945年9月，包经中共徐州工委书记赵卓如和柏寒（敌工干部）教育、考察，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做策动郝部起义的工作。

1947年5月，时任暂编第23师第46旅旅长的包庭宾秘密派出人员，到苏北解放区寻找党组织未成。7月，包又派警卫副官齐照样（中共特别党员）装扮成商贩，潜入淮北解放区，寻找党组织。齐在淮泗县裴圩子找到了华中七地委联络部长姚克，又遇上柏寒。齐向姚、柏汇报了郝鹏举叛变的情况，包被扣押和释放的经过以及要求回解放区的强烈愿望。姚、柏充分肯定了包是党的忠诚同志，并指出，从目前形势和斗争的需要看，包应继续留在国民党军内部，争取重新掌握兵权，待机起义。8月12日，华东野战军发起盐城战役，一举攻克盐城，歼灭国民党第42集团军第1师8000余人，生俘师长李铁民，击毙副师长彭定一。不久，国民党当局将第42集团军残部改编为暂编第23师，毕书文任师长，辖第45、第46旅。包被任命为第46旅旅长，张奇被任命为第45旅副旅长。

1948年初，中共华中工委选派公安处联络科科长周晓江化名李应成秘密进入包庭宾、张奇部，策动该两部起义。6月初，周晓江到达靖江城包的旅部，向其传达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指出人民解放军将挥师南下，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暂编第23师驻沿江一线，如第45、第46旅能及时起义，对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将起重大的作用。包当即表示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过了些时日，包派人将周陪送到泰兴张奇处。周向张传达了党组织要他策动部队起义的指示。张表示要坚决完成任务。周回到靖江县城后，继续与包一起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27日上午，包庭宾派齐照祥赶赴泰兴，通知张奇立即起义。随即，包在第46旅旅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会上，包以自己的经历揭露了国民党当局黑暗腐败，严重脱离人民，只有弃暗投明，顺应历史潮流，才是部队的唯一出路。会后，团长崔凤鸣密告毕书文之侄毕世恩，毕当即向毕书文报告。28日上午，毕书文调动部队乘车赶赴靖江，妄图将起义一举扑灭。

包庭宾闻讯后，命令参谋长卞超通知直属搜索连和手枪排迅速集合待命。副师长吴纪瑞告知包，说毕书文已来了，他已知道你们要干的事，并带部队把靖江城包围起来。尔后，包和卞超冲出旅部，拉起搜索连和手枪排，

直奔东门而去。吴纪瑞对空鸣枪，装作追击的样子。乜带领部队出了东门，发现周晓江还在城内，于是命令手枪排长李树明立即返回城内，营救周出城。李返城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周，两人一起奔出城外。周与乜会合后，带领部队直奔解放区，并对追击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还击。不久，起义队伍与前来迎接的军分区部队胜利会师。乜率第46旅起义，由于机密泄露，最后抵达解放区的只有一个搜索连和一个手枪排，共110人。被派往泰兴联络张奇的齐照祥，返回靖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英勇殉难。四个月后，由该旅改编的国民党第282师在师长张奇率领下，全师5000余人在安徽芜湖再次举行起义，渡过长江到达江北，被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独立师。

长 春 起 义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军部和所属第182师、暂编第21师、暂编第52师官兵2.6万余人在吉林省长春起义。这次起义迫使东北“剿总”第1兵团部、新编第7军在长春投诚，为解放长春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民党第60军，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云南省主席龙云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组建起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好的合作。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把滇军分割、编散，推向内战第一线。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争取滇军的工作，专门从延安中央党校等单位抽调刘浩、刘惠云、苏民、左仲平、徐克、李兢、司维、禄时英等云南籍的干部，到东北开展策反第60军的工作。1946年7月，刘浩化装成农民到达抚顺，与第60军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杨重接上了关系，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滇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指示，研究了今后的工作部署。两个军中共地下组织，按照统一布置，积极开展工作。他们首先把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迅速发展为地下党员，然后，大家分头行动，广泛交友，团结更多中、下级军官，利用国民党内部和官兵的不满情绪，适时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分子。同时，他们还积极搜集军事情报，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系，内外配合工作。

1947年冬，东北军区成立了政治部前方办事处，由刘浩任处长，杨滨任副处长，下设敌工、宣传、俘管、总务4个科，一个武工队，一个设诚军官招待所，对第60军官兵展开猛烈的政治攻势，直接组织和领导第60军中共地下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8年10月14日，解放军向锦州发动总攻，全歼守军10万人。此时，第60军在长春被解放军久困重围，处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境地。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第60军军长曾泽生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突围还是死守，都是死路一条，唯有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才有生路。考虑到长春几十万百姓和几万官兵的性命，曾泽生于9月22日召集陇耀、白肇学两位师长共商前途和出路。经反复讨论研究，他们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起义反蒋，投奔解放军。

10月15日，陇耀派出张秉昌、李峥先带着曾泽生、陇耀和白肇学共同签名请示起义的信，出城与解放军前方办事处联络。信很快转到解放军第1兵团，兵团领导和前方办事处分析认为，国民党第60军请求起义比较真诚、可靠，便立即向中共东北局、东北军区请示。16日，东北局、东北军区电告第1兵团：中央同意东北局争取第60军起义的方针。当天午夜，曾泽生派第182师师长李佐、暂编第21师副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到解放军第1兵团部与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会谈，商定起义方案，报请东北局、东北军区同意后，派刘浩为代表，进长春与曾泽生共同组织起义。

10月17日，下午6时，曾泽生、刘浩开始组织起义，他们首先给陇耀、白肇学打电话，要求他们迅速做好起义准备，按时把防地交给解放军接防。当晚12时，曾泽生率领军部、第182师、暂编第21师和暂编第52师3万余名官兵举行起义，按计划将防区移交给解放军第1兵团接管，率领起义部队向解放区开进。第二天，起义部队先后到达卡伦，受到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萧劲光、政委萧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和潘朔端等人的热烈欢迎。

随后，起义部队被安排到九台进行休整。

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60军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叶长庚任副军长，王振乾任政治部主任，白肇学任第148师师长，陇耀任第149师师长，李佐任第150师师长。后来，这支部队加入第四野战军序列南下，参加了解放鄂西、进军大西南等战斗，然后回师湖北参加生产，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参加新中国建设，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李佩膺率部起义

1948年10月19日，在太原战役中，阎军“雪耻奋斗团”少将团长李佩膺率部1000余人在阵前举行起义。

1948年10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1兵团经过10余天的战斗，全歼阎锡山第44、第45两个整师及其他师、团各一部，占领了武宿飞机场，打开了东山碉堡防线的东南门户。为了控制东山，创造攻城条件，10月17日，解放军避开罕山，直插东山腹地。阎锡山及东山守敌大为震惊，驻罕山一带之敌大部撤逃太原，只剩下李佩膺的“雪耻奋斗团”驻守罕山阵地。

罕山位于太原城东50里，海拔1591米，地势险要。是太原东山的屏障和门户。阎锡山企图凭借东山固守太原，在罕山构筑了大量碉堡群，派他的“雪耻奋斗团”驻守。

“雪耻奋斗团”成立于1948年3月。各支队正副支队长，都是在历次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的人员，其中也有被派遣回来的。阎锡山称这些部队为“雪耻奋斗团”，即雪洗耻辱继续奋斗之意。

李佩膺原为阎军第66师少将师长，1945年10月在上党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曾在教导团受训2年，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邓小平政委、李达参谋长的接见，于1947年2月被释放回太原。阎锡山把他送进被俘人员办的“反干团”受训审查。直到1948年3月，阎锡山认为这些人有了“雪耻奋斗”的决心，就把“反干团”编为“雪耻奋斗团”。李佩膺被阎委任为“雪耻奋斗”108团（即第6团）少将团长。

1948年10月17日，解放军华北第1兵团领导指挥攻击东山的部队，出敌不意从敌防守薄弱部位，直插东山纵深，一举袭取牛驼寨、榆林坪、庄子上，打乱了阎军东山的防御体系。“雪耻奋斗团指挥部”总指挥史泽波见势不妙，向太原告急。阎锡山命令第1至第5团夺路撤回城内，只留李佩膺第6团在罕山继续防守。李佩膺也打电话请求撤回，遭到阎的拒绝。这样使李佩膺打消了对阎锡山的幻想，该团千余官兵也看到罕山被解放军团团包围，惶恐不安，无心再战，加之他们亲身感受过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便产生了起义念头。

10月17日晚上，李佩膺和副团长王致烈、第3营营长李志远和参谋陈朝斌等人进行商谈。一致感到大势已去，形势严重，只有弃暗投明，才是良策，并讨论了防范措施。决定第二天派陈朝斌和便衣队长苗秀山下山同解放军联系起义问题。10月18日晚，2人秘密下山，到解放军阵地同第8纵队24旅接头商谈。19日晨，第1兵团政治部敌工部委派与李佩膺素有深交的原阎军将领李维岳来参加商谈。陈朝斌介绍李佩膺的起义条件是：名义上叫起义；过来后人枪不动，保持原编制；保护私有财产和照顾家属；解放军布置好，不使一人漏网，避免回去通风报信，家属受害；由解放军负责人上山商谈具体办法。解放军基本同意，并派旅部参谋杨奇和李维岳一起同陈朝斌上山。到达阵地前沿碉堡后，用电话向李佩膺通报了商谈结果后，李又下来同他们面谈，确定当晚行动，并明确了联络信号、到达地点和接替阵地等事项。

李佩膺在李维岳、杨奇陪同下下山后，即刻召集支队长宣布假突围的行动命令。接着全团集合于指挥碉前，除重火器留下不动外，其余武器均携带下山。为使起义能顺利进行，李佩膺对阎锡山实施了蒙蔽政策，他给太原绥署

连发三次电报告急，“处境危险”、“准备突围”，不等回电，即将电台拆散。

10月19日夜，起义部队按预定计划向榆次方向行军大半夜，于20日拂晓到达指定地点。李佩膺率部起义，受到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等领导人的欢迎。李佩膺被分配到第18兵团敌工部工作，部队开往祁县整训。李佩膺率部起义，给阎锡山一个沉重打击，使他的“雪耻奋斗”成为泡影。

暂编第五十三师沈阳起义

1948年10月31日，国民党军新编第1军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率领8000余名官兵在辽宁省沈阳市起义。

暂编第53师由原东北第5保安区改编。1947年8月，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同时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原东北9个保安区、11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部队扩编为4个军。第5保安区少将许赓扬接到命令后，将所属4个保安团改编为暂编第53师，许赓扬任师长，徐继章任副师长，划归国民党新1军指挥。1948年，新1军参加西进兵团增援锦州，暂编第53师留守沈阳，担任东北方向的城防任务。许赓扬，吉林四平人，1924年参加东北军，任过排长至副团长职务，日本投降后在重庆兵役部任视察专员，1946年1月派往东北收编伪满军，编成东北保安第4总队，任总队长，后任第5保安区司令，1947年8月任暂编53师师长。

正当东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一股股被歼灭、许赓扬深为自己和部队的前途担忧之时，原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团长潘桂生被解放军俘虏后又释放回来，他们私下告诉许赓扬，中共东北局社会部期望他明辨是非利害，弃暗投明，伺机起义。国民党第58师师长王家善和许赓扬都是东北军的老人，二人关系甚笃。王家善起义后，也派专人到沈阳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告诉许赓扬，忠告他一定要把握时机，相机起义。同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邹大鹏还派遣富平女士到沈阳做策反暂第53师的工作。富平的丈夫是国民党沈阳第2守备总队副总队长，富平利用丈夫的关系结识了许多国民党沈阳守军的要人，后经第53师第1团团团长韦人倡介绍，结识了许赓扬，并多次在沈阳洞庭春饭店等地请许赓扬吃饭，转达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邹大鹏、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吕正操等人对许赓扬的期望，希望他掌握好部队，不要做出对不起东北父老兄弟的事来。经多方开展工作，许赓扬逐步定下了弃暗投明的决心，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8年10月29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第1师逼近沈阳城东北郊，与暂编第53师形成对峙状态，许赓扬决心趁机起义。10月30日，许赓扬派特务连连长张光在东山咀子与解放军侦察人员取得联系，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副司令赵杰、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一起认真研究了国民党第53师要求起义的问题，决定接受许赓扬率部队起义的要求。10月31日，许赓扬又派作战科科长张社民为正式代表，来到辽北军区前线，与解放军代表赵杰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当天，许赓扬听到了张社民的汇报后，派副师长徐继章到辽北军区指挥所参与工作，解放军辽北军区指挥所也派联络科副科长银于申为代表到暂第53师指挥所工作。就在此时，国民党第8兵团司令察觉了许赓扬的行动，打电话要许到兵团开会。对此，许赓扬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一面下令部队封锁了东北方向的所有交通，一面安排对可疑人员进行严密监视。当晚8时，许赓扬召集军官紧急会议，宣布起义计划。会上，许赓扬还专门征求了副师长谢树辉和配属该师的第207师第2旅第5团团团长陶毅的意见，当时，两人都表示服从命令，拥护起义。当晚10时，起义部队让解放军通过自己的防区向沈阳发动进攻。正当起义工作进行顺利时，国民党第207师第5团团团长陶毅突然打电话大骂许赓扬是“背叛党国”，并开始组织本团部队阻击解放军攻城部队，许赓扬立即下令第2团团团长李培根用炮火压制陶毅第5团，解放军辽北军区也组织部队一举将陶毅部队歼

灭，并活捉了团长陶毅，起义获得成功。不久，起义部队进行整训后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 53 师。由于国民党军暂编第 53 师的起义，使解放军顺利攻占沈阳，为沈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黄樵松准备起义

1948年11月2日，在太原战役中，国民党军第30军军长黄樵松将军在太原发动起义，由于被人出卖，起义未能成功。

黄樵松，原名黄德元，河南尉氏县人。1922年参加冯玉祥西北军学兵团。后在冯部第43军高树勋部下任团长、旅长、师长。他同情百姓疾苦，曾自编一首《吃饭歌》：“一粥一饭，人民血汗，细米白面，劳动所换……。”命令士兵开饭前歌唱。黄樵松是一位抗日爱国将领，七七事变后，他率部在北京琉璃河、山西娘子关、山东台儿庄、安徽大别山、河南南阳等地对日作战。

抗战胜利后，黄樵松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不满。1946年春任国民党第30军副军长，奉命率部在山西运城一带与解放军作战，伤亡惨重。1948年临汾战役，该军第30旅参战，几乎全旅覆没。为此，他极为厌战，以有病借故推托赴太原作战的命令。1948年7月下旬，黄樵松奉命率部由陕西空运到太原，驻太原北郊新城、皇后园一带。是年10月，黄被任命为第30军军长。

黄樵松第30军空运太原前后，人民解放军尚未对太原作全线攻击，但济南战役对黄震惊很大，听到消息后曾写出“济南噩耗，大势去矣”八个大字。10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对太原城外防线的总攻击，相继攻占东山“四大要塞”，对太原这座孤城团团包围。解放军太原前指政治部为做好瓦解敌军工作，将邯郸起义的高树勋接来做争取黄樵松的工作。高与黄原同为西北军将领，有多年的交谊。高致黄信数封，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在千钧一发之际，还不早下决心，更待何时？……共产党不论对任何人，只要站到人民方面来，就特别给予爱护欢迎。……以弟等之智勇果断必能当机立断，毅然举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创造自己的前途。”太原前线总指挥徐向前亲自致函黄樵松，说明共产党、解放军历来有关起义投诚的宽大政策。黄接到徐向前和高树勋的信以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心弃暗投明，举行阵前起义，走和平解决太原问题的光明大道。

1948年10月31日，黄樵松派第30军少校谍报队长王正中、谍报员王玉甲，持他的亲笔信到华北第1兵团第8纵队司令部。徐向前得此消息后十分高兴，即派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办理此事。王正中把黄的信交给他们。黄在给徐向前的信中表示：“为了拯救太原30万父老兄弟姐妹出水火，我决心起义，站到人民和正义这方面来，……”黄在给高树勋的信中写道：“我决定遵循你的教导和栽培，在你爱国爱民的精神感召下，坚决听从你和贵军首长的指导，万死不辞。”王正中向胡耀邦、王新亭（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转达了黄提出的条件。胡、王表示全部答应。胡耀邦让王回去转达，“只要黄军长愿意脱离蒋阎顽固派，我们表示欢迎，人民对于他的这种爱国行动，是不会忘记的。”王将这些意见带回去向黄汇报后，于11月3日，王正中、王玉甲再次来到第8纵队司令部会商起义计划。经过协商最后议定：解放军攻取太原时，第30军交出他防守的大小东门，迎接解放军入城后，撤出城外集结整编。解放军派代表入城直接同黄军长商量起义计划。

胡耀邦和王新亭经过商议，经请示徐向前同意，决定派第8纵队司令部参谋处长晋夫和侦察队副队长翟许友一同前往，晋夫公开身份是纵队宣传部长，翟以警卫员身份。晋夫，原名吕守成，河南洛阳市人，曾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历任连指导员，营

教导员、参谋科长、军分区参谋主任、纵队参谋处长等职。翟许友是山西稷山县人，1938年参加抗日决死纵队，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随王正中、王玉甲入太原城，出发时，胡耀邦、王新亭等送到路口，并派纵队警卫连将他们护送到前沿防线。

黄樵松为发动起义，也向有些老朋友和部下做思想工作。1948年11月3日晨7时许，黄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老朋友戴炳南师长找来，把徐向前和高树勋的两封信让他看，并将全部计划告诉了戴，并命他向所属各团长传令行动。戴炳南是山东即墨人，从1932年起即同黄樵松在一个师共事近20年，黄当团长，戴当营长；黄当旅长，戴当团长，故黄对戴深信不疑。没料到，戴回到家中，苦思一天，盘算出卖老朋友。至下午6时许，他乘车到27师师部，找他的亲信副师长件德厚经过密商后，驱车直奔太原绥署。

戴走进绥署阎锡山的卧室，阎已睡下，戴双膝跪倒在阎的床前，流着眼泪，将黄樵松准备起义的计划全部告说一遍。阎听后，大惊失色，不相信黄有此事，又让戴重说一遍，并说亲眼见到徐向前、高树勋的来信，就在黄的口袋。戴当场表示：我是军人，一定要效忠党国，决心以头颅报效钧座，与太原共存亡！戴的这一反动愚忠受到阎的夸奖。阎锡山当即把太原绥署副主任兼第15兵团司令官孙楚和太原守备司令兼第10兵团司令官王靖国找来，研究如何诱捕黄樵松，并以换防名义将第30军全部撤出阵地休整。

当晚12时左右，阎以召集紧急军事会议的名义，令第30军参谋长全学文给黄樵松打电话，黄接电话后毫无警觉，驱车到绥署后，被早已四处设伏的保卫队员们蜂拥而上捆绑起来。从黄身上搜出了徐向前、高树勋给他的信件。阎锡山当夜公布戴炳南升任30军代理军长、副师长许德厚升任27师代理师长，南京批示取消代二字。11月4日上午8时，阎锡山把第30军军直各部队长、各团团长召集到绥署训话。戴炳南表示好好招呼部队。11月5日，阎发布一封告第30军官兵公开信，吹捧第30军官兵与戴炳南。太原战役开始后，阎锡山逃往南京之前，把第30军全部调进城内，重新装备补充，给戴炳南以兵团司令职权，统一指挥城内作战。

第30军的起义，由于戴炳南出卖告密而未成。当11月4日拂晓，晋夫、翟许友和王正中、王玉甲穿过双方阵地到达太原东山第30军阵地时，被阎军抓捕起来。然后阎锡山把黄樵松、晋夫等5人空运到南京陆军监狱。黄等人在狱中和法庭上斗志顽强，宁死不屈，表现了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气节。11月17日，国民党军事法庭判处黄樵松、晋夫、王正中死刑。王玉甲、翟许友另案处理。11月27日夜，黄等3人在狱中英勇就义。

1949年4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后，经搜查将罪大恶极的戴炳南捕获，经太原市军官会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根据太原人民要求，判处戴死刑，7月28日游街示众后执行枪决。

黄樵松将军高举义旗而英勇献身的业绩，彪炳史册，虽死犹荣。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人民政府将黄樵松葬于雨花台烈士陵园，1979年11月，又由南京移到山西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

贾汪起义

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三个师2.3万余人在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于江苏省徐州东北之贾汪地区举行战场起义。

第三“绥靖”区的前身是冯玉祥将军领导的西北军。1930年，冯玉祥部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9军，抗日战争胜利后，该部被调到徐州一线，改为第三“绥靖”区，辖第59、第77军。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极大的精力对该部进行教育和争取工作，并在该部发展了秘密党员，该部副司令张克侠和何基沣就是其中的代表。张克侠，1900年10月生于河北省献县，上中学时投笔从戎，考入陆军清河军官预备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张在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任少校科员及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和队长；1925年任北伐军学生营长；1927年春至1928年冬，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在上海经张存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何基沣是河北省藁城县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31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率部迎战，参加了喜峰口战役。1937年，他任国民党第29军旅长，驻守卢沟桥地区，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1938年，他秘密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接见和教诲。1939年1月被中共中央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仍回原部队。

1948年，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电示，华东局派人与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张克侠和何基沣联系，共商其所在部队于淮海战役关键时刻举行战场起义事宜。中共华东局社会部交通巡视员朱林到达徐州后，与张克侠同室居住。张及时向何通报情况，并安排与朱林见面。张、何向朱表示，条件已经成熟，待机起义。朱返回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曲阜后，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作了汇报。尔后，华野第13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杨斯德潜入第三“绥靖”区，先后见到了何、张两将军，分别向他们转达了陈毅司令员的问候和指示，并同他们研究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0月底，杨返回曲阜，向粟裕代司令员、陈士榘代参谋长汇报了情况。粟、陈听取汇报后指示：战役于11月8日发起，届时，华野第7、第10、第13纵队从第三“绥靖”区正面渡河南下，切断徐州同黄百韬兵团的联系，要求何基沣、张克侠所部按计划战役发起时起义，让开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梁，确保华野部队顺利过河。

可是，第59军领导层对起义的认识还没有统一。该军第38师师长杨干三、第130师师长崔振伦犹豫不决，参谋长刘景岳则执意不从。为了给第59军以军事上压力，解放军正面部队决定，在万年闸方向实施突破，迫其就范。7日，解放军山东兵团一部突破了万年闸，全歼守桥部队。刘景岳向何基沣报告万年闸失守，何向刘转达国民党徐州地区守备指挥官冯治安的命令：限天亮之前夺回失地，否则军法从事，团长、师长也不能姑息，参谋长也要以贻误战机问罪。刘听了何传达的命令，惊恐万状，请求何想办法。何让其找孟副军长商量个一致意见告我，再行定夺。当日午夜，孟绍濂电告何基沣：意见已经统一，但他们希望见何一面。何随即赶到第59军军部，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解释，打消了顾虑，并告诉大家，张克侠副司令很快会来第59军，同部队一起行动。何当即签署了部队向解放区开拔的命令，并让孟绍濂、崔振伦、杨干三在命令上签名副署。

7日，张克侠还住在徐州。为设法脱身，尽快赶到贾汪，他向冯治安提出去贾汪参加作战指挥被拒绝。当晚，张回到办公室，次日凌晨4时左右，

张叫醒司机何悌修，即同侍从副官一起驾车向徐州郊外冲去。张一出城，监视其行动的陈继淹即向冯治安报告：张副司令开小差了。冯听后，叫尹心田备车去徐州“剿总”报告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尹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同张是同学，平时关系甚好，有意成全他的行动，即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去报告，万一错了，刘峙一定会批评你过于慌张。冯点头称是，为张的脱险争取了时间。张在去贾汪途中，首先到了第132师师部，同该师师长过家芳见了面，并打电话给何基沣。上午8时，张赶到贾汪。为防不测，张克侠、何基沣同杨斯德商定，将原定8日12时起义的时间提前两小时。杨去万年闸向解放军通报了这一情况，并约定，为防止起义部队中不坚定分子集中逃跑，请解放军继续前进。起义开始后，张、孟率第59军向台儿庄集结，过家芳率第132师到峄县以北集结，李连城率第37师第111团北上峄县，何基沣在争取刘自珍干训团起义后，随前线指挥所和直属部队向沭塘转移。至此，何、张率第59军两个师、第77军1个师和第111团全部共2.3万余人，高举义旗，投向人民怀抱。10日拂晓，各起义部队先后到达运河北指定地点。

18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指出：“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28日，何基沣、张克侠、孟绍濂、过家芳、崔振伦、杨干三联名通电全国。何、张率部起义，为解放军开放了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使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突破不老河防线，迅速插到徐州以东，截断了黄百韬兵团向徐州的退路，并控制了徐州国民党军东援的有利阵地，从而为歼灭黄百韬兵团，顺利实现中共中央军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意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9年春，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起义的第59军与渤海纵队合组成第33军，第77军与江淮军区部队合组成第34军，张克侠、何基沣分任两军军长。在他们的带领下，这两个军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赵瑞率部起义

1948年11月12日，在太原战役中，阎锡山部第8总队总队长赵瑞率部400余人举行阵前起义。

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后，阎锡山为固守太原，将其主力第8总队急调太原东山，守备淖马要塞。

太原东山山峰险峻，是太原古城的天然屏障，历来为兵家重视。因此，阎锡山不惜人力、物力，在日伪军设防工事的基础上，构筑了五道防线的防御体系。明堡暗碉成群，交通沟纵横交错，铁丝网密如蜘蛛网，构成了险要的防御阵地。其中又以淖马、牛驼寨、小窑头、山头四个碉堡群体构成太原东山的“四大要塞”。

淖马要塞位于太原城东外围第二道防线正中，又居“四大要塞”之中，如淖马阵地被攻破，将会直冲太原东门。阎军总部十分重视淖马要塞的安危。在淖马阵地周围各山头构成集团阵地，并分为淖马主阵地和第1至9号碉堡等10余个阵地。淖马阵地由第8总队总队长赵瑞率领下防守。

阎军第8总队属师级建制。总队机关有五大处，有特务连、通信连等直属部队600余人。总队下辖3个步兵团，第1团驻守淖马村，第2团驻守峪村，第3团驻守小窑头村；另配保安第17团驻守淖马村周围的碉堡中；太原战役开始后，又将第40师的一个团配属该部队。总兵力达6000余人。

赵瑞，1909年生，山西沁县樊村人，1927年9月入阎锡山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商震教导师任见习官，日本投降后任阎军军长，后为阎军第8总队少将总队长。赵瑞与赵承绥、杨诚关系密切。赵瑞与杨诚同为赵承绥部下，二人是太原北方军官学校同学，毕业后同任见习官、排长、参谋。抗战时期，赵任骑兵第1师师长，杨任骑兵第4师师长。1945年日军投降后，各任先遣第1军、第2军军长。1946年整编时，赵杨又各任第8、第9总队总队长。阎军中有人说他们是：“包公用的是王朝马汉，杨六郎用的是孟良焦赞，赵承绥用的是杨诚赵瑞。”解放军请赵承绥、杨诚做争取赵瑞的工作，他们信心十足。

杨诚身带赵承绥的手章，随同解放军华北第1兵团敌工部科长赵世枢来到前沿阵地，与赵瑞淖马阵地相距不足10里。杨诚以赵承绥和他个人名义给赵瑞写了两封信，内容讲述了全国各战场与山西战场形势，以亲身经历与感受，介绍共产党解放军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宽大政策，劝他弃暗投明，才是唯一出路。数日后，杨诚又以他个人名义给赵瑞写了信，在信中特别提到1946年俩人说过的一段私情话：“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要谋求自力的存在，到了必要的时候，八路军这条路也不能排除。”以旧话重提来促使赵瑞早下决心脱离阎锡山。并于当夜将信交给刚被俘的阎军第8总队副官王栋送进去。

王栋进去后即被捕，当夜押送太原受审。在被押送途中，将信转交给押解他的第8总队特务连二等兵范务德，对范说：这是封重要信件，是赵承绥总司令和杨诚总队长写给赵瑞的，让赵瑞总队长赶快带部队起义！千万把信交给总队长。次日，范即将信交给赵瑞的卫士李荣富转交给赵瑞。但赵看信后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

1948年10月26日，解放军依照太原前线总指挥部的命令，发起对东山“四大要塞”的总攻击。激战至11月11日，淖马主阵地与1至7号碉堡均

被解放军攻克掌握在手，其他三个要塞激战半个月，反复争夺。赵瑞率残部在阎军第30师和第40师增援下组织反扑，伤亡惨重。赵瑞丢掉淖马阵地，受到阎锡山派来参谋长的训斥，阎锡山勒令赵瑞连夜夺回淖马，否则提头来见！这时，赵瑞想起赵承绶、杨诚等人来信，决心弃暗投明。并派跟随自己多年的少校参谋王可到解放军阵地秘密联系。

解放军第1兵团第15纵队第45旅敌工干事和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长张一琦，同王可进行了商谈。提出赵瑞部起义后原人马不动，撤出阵地前排除沿途地雷、障碍物，便于解放军接替；要大量携带重火器与弹药；要当夜行动，防止中途有变。

王可返回后将联系情况报告了赵瑞，赵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作了布置，安排当夜紧急行动。第8总队参谋长曹振宗和军官们悄悄集合队伍，命令士兵全副武装，以反扑淖马阵地，向东出击，悄悄奔向解放军阵地。

赵瑞率第8总队司令部、3个直属连和1个营的部队进入解放军阵地后，后续部队被阎军发现后切断，赵瑞带出的400余人于11月12日拂晓到达指定地域，受到解放军第15纵队第43旅的热情欢迎，第1兵团有关部门首长对赵瑞率部起义表示欢迎与赞扬。赵瑞起义部队在榆次龙田村休整10余天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第1独立支队”任命赵瑞为支队司令员，韩培义为支队政治委员；下辖三个直属连队和两个营，共1500余人。赵瑞甚为感动，当即宣誓就职。

1949年6月，该支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2军（即原第15纵队），后参加了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战斗。之后赵瑞到解放军高级步校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55年转业到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双堆集起义

1948年11月27日，国民党军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5500余人在安徽省宿县双堆集地区举行战场起义。

第110师的前身是西北军第2师。廖运周原为黄埔军校毕业学员，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3月，在武汉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由靖任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秋，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军事部书记朱瑞了解到廖是长期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时，于11月代表北方局向其布置任务：长期隐蔽，掌握部队，团结军内进步人士，坚持抗日，并派刘浩为联系人。从此，廖一直以特殊身份在第110师为共产党工作。

1945年10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了国军工作部。1946年3月，负责领导国军工作部的薄一波和该部第一室主任靖任秋等同志，就有关廖运周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可以派人去其部工作。4月，徐仁带着靖任秋给廖的亲笔信到新乡第110师驻地见到廖。经其夫人傅书岚介绍，认识廖宜民。廖宜民早在中学时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第110师副官处主任。6月，徐仁同廖宜民秘密返回邯郸，将了解的情况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作了汇报。尔后，成立了第110师工作组，刘浩为组长，成员有廖运周、廖宜民、徐仁、刘扬，以后又派了李俊成、张士瑞、金克等人前往。廖运周把中共地下党员大都安排在副官处当副官，这既不需要蒋介石的委任，活动起来又比较方便。

1947年2月，第110师奉命开赴山东。是年夏，经华东局批准，在第110师成立了地下党委，廖任书记，刘为副书记，李俊成、徐仁和廖宜民等为委员。该师地下党委成立后，委员按分工积极展开各项工作。首先，积极向解放军提供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其次，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将两名反动的副师长向胡宗南推荐“升官”走了，同时调整了各团团长，培养党外积极分子，为起义作准备工作。是年秋，第110师地下党组织关系转到中原军区。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指示：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1948年7月中旬，第110师地下党委在汉口召开会议，李俊成在会上传达了刘、邓首长指示，即解放军在进军江南之前要打一场大仗。第110师中共地下党委要做好一切准备，在解放军接应下完成起义任务。8月，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果断地命令中原野战军东出徐蚌，会同华东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联合发起淮海战役。战役第一阶段，人民解放军决心全歼黄百韬兵团。蒋介石闻讯后，急令黄维、李延年兵团驰援徐州。淮海战役总前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以中原野战军为主，歼灭黄维兵团。11月下旬，中原野战军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将该兵团12万人马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十几里的狭窄地带。黄维第一次转移部署被打乱后，又在筹划新的突围计划，决定每军挑选1个师，以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并指令廖运周师打头阵，当开路先锋。廖反复琢磨着当前的形势，把黄维的突围计划与利用突围起义的设想，同李俊成、廖宜民、刘协侯、杨振海等交换了意见，尔后作出决定，利用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并决定，师直属队在黄昏前做好准备，午夜开始行动。

为了尽快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廖运周派张振海将黄维准备于27日上午采取突围行动和第110师乘此举行起义的计划，上报解放军前线最高指挥员，并请求解放军前沿部队在突围处的左翼闪开一个口子，待第110师通过

后再把口子封上。第 110 师的正面是中原野战军第 6 纵队。该纵队接到报告后，认为廖部突围时开一个口子，问题很严重。如黄维发觉这一行动，乘放第 110 师之机，倾全力突围，防守正面只有 4 个旅的兵力，很难堵住。如果让黄维兵团跑了，对整个战局将产生严重后果，于是将这一情况向刘、邓首长作了报告。刘、邓当即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粉碎黄维的突围，同时要严密组织，保证第 110 师起义成功。第 6 纵队根据上述指示，及时调整兵力部署，并确定起义部队从解放军第 17 旅和第 12 旅阵地通过，到罗集附近的吴大庄、西张庄汇合，要求天亮之前全部通过。

27 日早晨 6 点钟，第 110 师（欠第 328 团）5000 余人，准时开出双堆集附近的周庄、赵庄，按照拟定的路线，在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上迅速前进。黄维对第 110 师的起义行动并未察觉，只是不断地询问进展情况。廖不断地报告：突围顺利。两小时后，全师通过解放军阵地，解放军又立即将口子封了起来，并给跟进的国民党军第 18 军的一个师以迎头痛击。此时，四架国民党飞机飞到第 110 师头上来回盘旋。为继续迷惑黄维，廖命令各连按预先的联系信号，把布板架好，告诉他们一切“正常”。第 110 师沿着解放军为他们布置的高梁杆路标的道路继续前进，上午八点半到达目的地吴大庄。黄维和吴绍周还在报话机里询问情况。廖下令全师报话机关闭并一律上交，师部电台也停止使用，中断了与黄的联系。这一义举，使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顷刻瓦解，为全歼黄维兵团和加速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9 日晚，廖运周与第 6 纵队联络部长卢耀武研究拟就了《廖运周将军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和《廖运周将军告第 12 兵团全体官兵书》。待徐仁将后方留守处的廖师长和其他军官家属妥善安排后，新华社和大众日报接连发表专稿，报道了起义消息和文电。12 月 24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贺电，赞扬了第 110 师的义举，鼓励他们在人民解放军战争的战火中将这支部队锻炼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淮海战役胜利后，第 110 师正式编为人民解放军第 4 兵团第 14 军第 42 师，廖任师长，李俊成任副政委，廖宜民任参谋长。以后，第 42 师参加了渡江作战，进军江西、广东、云南和西藏等地。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这支队伍锻炼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俞渤等驾机起义

1943年12月16日晚，当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空军俱乐部慰问和嘉奖飞行人员大会时，俞渤等人果断抓住这一时机，驾驶B-24型514号轰炸机起义，于次日凌晨两点多钟顺利地降落在解放区石家庄机场。

俞渤是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1944年，他在桂林中山大学读书时，就曾接受过中共地下人员的影响。是年8月，俞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年去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此间，他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从延安归来》、《华侨日报》等进步书报，萌发了回国后寻找共产党，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念头。1948年初，已回国的俞渤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同寝室的飞行员陈九英说：“我们不打内战，我们不能用手中炸弹炸死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在被迫执行任务时，他与机组的领航轰炸员周作舟将炸弹仍到空旷的雪地上。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地下组织掌握这一情况后，积极抓紧策动俞渤起义的准备工作。8月，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俞渤为中共党员；通过俞渤的介绍，10月、11月先后又发展中尉领航轰炸员周作舟、中尉飞行员郝桂桥为中共党员，并在第8大队成立了中共临时支部，俞渤任支部书记。淮海战役前夕，他们从上海调驻南京大校场机场。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策动起义的指示，他们联络团结了中尉飞行员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张祖礼等思想进步的人员。11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指示他们抓紧时机争取起义，并强调起义时最好选择轰炸机，将炸弹投到国民党总统府和大校场机场。

12月上旬，淮海战役正处于人民解放军以围歼黄维兵团为主的第2阶段，杜聿明集团的20多万人马也被围困在永城东北地区。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进行垂死挣扎，妄图用犒赏等笼络手段激励士气，于12月16日晚在南京国民党空军俱乐部举行“慰问”和“嘉奖”飞行人员大会。俞渤等5人果断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立即驾机起义。当晚8时许，第8大队的官兵都去参加慰问会了，驻地异常寂静，空旷无人。俞渤、陈九英、张祖礼3人有意留在宿舍，郝桂桥和周作舟在乘车时也悄悄地溜了回来。5人快速整点各自飞行装备，分别带上自己手枪和地图，俞渤提醒大家“如被发现，就弄响炸弹，与飞机同亡”。然后分成两组，拉开距离，直奔机场，机智地闯过了机场哨兵的盘查、询问。他们急速找到一架加了油、挂有5颗吨级炸弹的B-24型514号轰炸机，周作舟立即拧开机舱锁，推开挡板，招呼大家迅即上机。9时稍过，飞机腾空起飞，直插夜空。

飞机在南京上空稍作盘旋，执行轰炸总统府和大校场机场的决定，投下炸弹，由于机械故障未能实现，弹落京郊燕子矶附近。几声巨响，石头城震动，蒋介石和参加会议的官员不欢而散。然后，俞渤机组驾机越过长江北飞。由于油量不够，不能按原计划飞安东机场降落，而当时北京和天津尚未解放，唯一能降落的只有石家庄机场。云层越来越厚，又是黑夜，无法依靠地标导航，飞机方位不明，航行困难重重。17日零时，飞机艰难飞抵石家庄上空。不断遭到地面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的射击，飞机只好在空中盘旋。2个小时后，当飞机油料快耗尽的时候，地面部队才判明是起义飞机，停止了射击。但因看不清跑道，飞机仍无法降落。俞渤等考虑飞机已是人民财产了，不能弃机跳伞，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在紧要关头地面燃起火堆，显示出机场跑道。17日凌晨两点多钟，飞机终于顺利地降落在石家庄机

场。

俞渤等 5 人走出机舱，被人山人海的欢迎群众高高举起。中共中央社会部的罗青长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命令，于 17 日深夜兼程赶到石家庄，代表党中央向俞渤机组表示慰问和欢迎。 12 月 20 日，俞渤等根据组织决定，驾驶该机飞赴沈阳，加入了建设人民空军的行列。

广东保安第十团起义

1948年12月19日，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10团团团长陈一林率部1300余人在广东省遂溪县城举行起义。

陈一林为广东省蕉岭县人，就任团长前为广州行营上校情报科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但广东兵力空虚。1946年10月，国民党广东省当局将驻灵山的省独立第1营、驻海口的省工兵部队及从省内征集的新兵合编组成保安第10团，隶属于省保安司令部，归广东省第10“清剿区”司令部指挥。该团组建后，分散驻扎在广州、海口、灵山等地，同年11月调广东湛江地区，次年五六月后，逐步转移到遂溪、廉江两县。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行营主任后，对原属张发奎、罗卓英体系的干部不信任，先后撤换了几个团长。陈一林系张发奎老部下，深有唇亡齿寒之感。粤桂南“清剿”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10“清剿区”司令张君嵩曾在宋子文手下任财政部税警总团团长，被宋派到湛江，带了一个警卫营上任，另调保10团1个营为自己直接指挥。他把危险、困难的任务交保10团去干，使该团官兵整天疲于奔命，且给养供应不足，粮饷欠发，而张对警卫营则多方面予以照顾，引起保10团官兵不满，厌战情绪日益增长。

1948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袭击湛江市，给驻守该市保10团1个营部和2个连以歼灭性的打击。陈一林在重重压力下，对前途感到失望。为了了解形势和寻找出路，他先后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一批中共文件、游击队宣传品及进步报刊，秘密进行阅读和研究。抗战期间，邹思勉曾在陈一林部下任情报组长，抗战后改行从商，对多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陈委托邹到香港行商时找中共联系。邹向陈介绍同乡同学王克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到延安学习，后被派到广东工作，建议他通过王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陈接受建议，决定先由邹找王联系。邹和王反复秘密商议后，经王请示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同意后，决定由陈一林出面向张君嵩请调王克到保安团任副团长，作为起义行动的第一步计划。张君嵩对王克不放心，在陈一林再三要求并保证不会出事的情况下，张才表示可以考虑将王调到保10团。

1948年9月，中共地下组织在湛江市区的工作站被破坏，王克的身份暴露，被迫撤回游击区。王克暴露后，陈一林唯恐涉嫌卷入。不久，陈一林得悉张君嵩、邓伯涵及颜伟青等率点验组于12月19日到保10团点验，并召开第10团“清剿区”部队长官会议。陈感到张、颜等人来者不善，遂决心把握时机，弃暗投明，率全团反戈一击，举行起义。12月18日下午，保10团3个营以迎接点验为名，在遂溪县集结完毕。当晚，陈在家中召集起义骨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营代表1连长邹元浩、2营代表7连长郭丹清、3营副营长黄琪以及连长陈宗清、叶炳钧、陈观福、秘书潘竹等人。会上，陈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及对张、颜等人来意的判断，宣布起义的决心，与会者一致同意起义，并制订了行动计划，决心消灭张君嵩，吃掉警卫营。会后，陈一林派兵扣押靠拢张君嵩的副团长刘雄标（军统特务）和6连连长黄忠，并把起义态度暧昧的第1营营长古冷之、第3营营长冯志坚、副营长吴杰文等人分别看管。

19日上午7时，陈一林接到湛江电话，得知张君嵩等人已启程来遂，即命令部队按计划行动。10时许，张君嵩及副司令邓伯涵、点验组长官颜伟青和点验组成员、卫队一行数十人，与士兵一起分乘6辆卡车到达遂溪。当

车辆进入操场停下后，埋伏在周围的保 10 团立即向车上猛烈开火。经 20 分钟战斗，起义部队当场击毙粤桂南“清剿”指挥部中将副总指挥、广东第 10 清剿区司令张君嵩、少将副司令邓伯函、绥靖点验组长官、视导颜伟青、科长周光尧、警卫营营长潘耀基等官兵共计 50 人，伤、俘 100 余人。尔后起义部队又攻占了驻遂溪的第 10“清剿区”机关等单位。参加起义行动的保 10 团官兵及地方游击武装共 1300 多人。当日下午 14 时，起义部队分乘 10 余辆卡车向湛江进发。出发前，陈一林命令枪毙原副团长刘雄标，派秘书潘竹携函到游击区，向中共粤桂边区组织报告起义情况，希望火速派人前来接应。15 时许，起义部队进入敌“粤桂南总指挥部”，歼灭驻海关楼的保 18 团 2 个连，释放被关押“政治犯”20 余人。战斗于 24 时结束。20 日凌晨，陈一林率部返回遂溪县城。由于部队出现叛逃现象，陈一林于当晚又派三路寻找中共党组织联系。

21 日，粤桂边区党委发电向华南分局报告了陈一林起义的情况。当日，边区领导机关到达遂溪县城西南郊外开设指挥所，边区部队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中共粤桂边区领导成员杨应彬和王克策马入城会见陈一林，随后陈应邀出城同梁广会面，决定将陈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8 支队，陈一林任司令员，何文任政委，王克任副司令员。

保安第 10 团的起义，是解放战争中国国民党大后方广东的第 1 个建制团的起义。这次起义削弱了广东国民党军的力量，动摇了敌人的信心和士气，牵制了广东敌人的一部分兵力，为粤桂边区根据地和当地革命武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很有意义。

胶东警备旅起义

1948年12月26日，国民党胶东警备旅少将旅长顾正光率部1500人在山东即墨起义；1949年1月27日，国民党第32军第252师第745团团长方本壮、副团长张德文率部在青岛市郊惜福镇起义，为即墨和青岛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青岛，地处黄海要冲，港阔水深，地势险要，军事上可以南援江浙、北顾旅大、内蔽中原，历来是海防军事要地。日本投降后，青岛成为国民党海军和美国海军西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之一。驻守青岛、即墨地区的国民党军是由第11绥靖区司令兼行政长官刘安琪指挥的第32军、第50军以及直属队和海空军，共7万余人。

1948年9月，华东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后，相继攻占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年底，对青岛、即墨地区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围困。同时，中共胶东区党委、青岛市委和解放军胶东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守军开展了多路、多头、多层次、多渠道的政治争取工作。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一些国民党部队先后起义，投奔解放军。驻守即墨地区的胶东警备旅，是一支由地方保安团改编成的国民党武装部队，隶属第32军指挥。少将旅长顾正光，与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是同乡同学，又是世交。当年，顾正光参加国民党军，是由陈锐霆介绍的，而且曾在陈锐霆的部下任职。1941年，陈锐霆率部参加新四军，顾正光仍留在国民党军内。淮海战役期间，陈锐霆通过第三野战军联络部给顾正光写信，要顾正光认清形势，待机起义。1948年冬，中共即墨县和汤鳌武工队对顾正光直接开展工作，进行争取，做通了顾正光的思想工作，使他定下了起义的决心。12月初，刘安琪和第32军军长赵琳派亲信李昌言接任第1团团团长，并准备将第1团调往市区，由军特务团接替。由于时间紧迫，顾正光立即召集第1团3个营长密商，经过一夜长谈，大家终于统一思想，决定投奔解放军。12月26日，顾正光率旅部和第1团1500余官兵，开赴解放区，宣布起义，受到解放区官兵的欢迎。1949年1月1日，该起义部队被改编为南海军分区独立团，顾正光任南海军分区副司令员。

顾正光率部起义1个月后，1949年1月27日，国民党第32军第252师第745团，在团长方本壮、副团长张德文率领下于青岛市郊惜福镇起义。济南解放后，进出青岛地区的人员，一般要在平度县南村落脚，南村位于青岛、平度、即墨的交界处。为此，中共青岛市委在南村设立了工作站进行情报和策反工作。南村公安分局干部高扬的好友刘子恒与第745团团长方本壮相识，在高扬的安排下，刘子恒利用商人身份，多次出入青岛，对方本壮进行工作。方本壮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八路军有过接触，解放战争中，自己经常收听新华社广播，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经刘子恒的多次密谈，方本壮决心投奔解放军。1949年1月，中共青岛市委提出请方本壮到解放区会谈。18日，方本壮派副团长张德文前往南村，与中共南村工作站社会组负责人衣光明谈判。第二天，又再次会面，商谈具体起义方案。正在此时，国民党第32军军长赵琳要将方本壮调军部任副参谋长，另派亲信担任第745团团团长。情况突变，方本壮和张德文立即召集第3营营长丁友孚、原第2营营长于成志密商，决定提前起义。接着，又对5个直属连连长做工作，统一了大家起义的思想和决心。1949年1月26日晚10时半，第745团官兵在方本壮和

张德文的率领下，宣布起义，开赴解放区。由于情况复杂，起义部队仓促行动，没来得及通知解放军部队接应，起义后 3 小时，国民党第 32 军派部队对他们进行阻击。起义部队组织突围，除担任掩护的第 2 营没有冲出包围圈外，其余 1100 余人安全到达解放区。不久，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胶东军区独立团，方本壮任团长，张德文任副团长。

在顾正光、方本壮率部起义的影响下，1949 年 5 月 24 日，国民党第 50 军第 270 师第 810 团团团长杨瑞基率部在胶州湾向解放军投诚；5 月 25 日，国民党第 11 绥区警备旅第 2 团团团长韩福德率 800 余人在即墨城北营上据点起义；5 月 27 日，国民党山东保安第 2 旅 6 团团团长蔡晋康率 2000 余人在薛家岛投奔解放区。这些部队的起义投诚，为青岛和即墨地区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谢派芬等驾机起义

1949年1月3日，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策动下，国民党空军飞行教官谢派芬、蒋声翰等成功地从杭州笕桥驾机起义，飞抵郑州。

国民党笕桥空军官校是国民党培养空军飞行人员的重要训练基地。1947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将中共党员吕云荪（又名吕明）安排进官校当飞行教官；以后又派杨德成（江浩然）、谢林立（谢筱乃）、林诚等直接做飞行教官的争取工作，并发展飞行教官邢文卓（邢海帆）、赵立品（赵大海）为中共党员，随后建立了由邢、赵和吕云荪组成的官校中的第一个中共临时支部。该校上尉飞行教官谢派芬，厌恶内战，崇尚光明，经吕云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底，空军官校忙于迁往台湾，因运输工具不足，学校派谢派芬到上海接回了一架刚修好的C-46型运输机。起初，中共地下组织决定让谢派芬随官校去台，继续隐蔽工作。但不久，党组织改变决定，指示谢派芬驾机起义，打击一下官校当局的嚣张气焰，并安排思想倾向革命的中尉飞行教官蒋声翰参与起义准备工作。1949年元旦，官校放假3天。1月3日，谢派芬了解到飞机情况良好，油已加足，当即决定利用放假最后一天的有利时机起义。他立刻找到专机组组长李肇华借口试飞，并以假期中人员外出未归为由，建议由他和蒋声翰试飞，得到李的准允。他立即找到蒋，回宿舍拿了航行图，丢下一封骂国民党的信，锁好门直奔机场。飞机顺利起飞，机上除谢、蒋外，后舱还有李葆华、田维初、荀富贵3名机务人员，他们一点不知此次飞行的内情。飞机径直向北越过长江，进入解放区上空，谢派芬才到后舱告诉他们：“我谢派芬是共产党员，现在要飞往解放区，希望你们赞成此举，如不乐意，到了目的地，保证把你们送回。”他们3人听后当即心领神会，共同配合了这次起义行动。经过一段时间飞行，谢派芬、蒋声翰驾驶的C-46型运输机在解放区郑州机场着陆。

郑州警备区司令员孔从周和市委领导人对谢派芬、蒋声翰等正义之举表示热烈欢迎。不久，他们被分到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1949年10月1日，谢派芬参加了开国大典，驾驶上海选送的一架C-46型运输机编队飞行，飞越天安门，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北平起义

1949年1月31日，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领北平驻军20余万人宣布起义，接受和平改编，人民解放军开入城内，使古都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接着开始，华北的国民党军陷于惶恐不安、和战不定状态。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估计，东北的人民解放军至少需休整3个月才能入关作战，如抓紧这段时间，争取美援，扩军到100万，可在平津地区与共军对抗；如讲和就成立联合政府，在华北与共产党平分秋色；如平津守不住，再西退绥远或南撤。为此，傅作义在调整军事部署准备固守的同时，通过女儿傅冬菊（中共党员）联系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致电毛泽东，要求举行谈判。还通过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传递和谈、主张搞成联合政府的信息。

傅作义，山西临漪县人，1918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在晋军由排长升任到师长，1931年任第35军军长，代理绥远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后，傅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是一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却跟随蒋介石打内战，被任命为国民党华北剿共总司令。针对傅作义既准备战，又想和谈，还要保存实力的心理，中国共产党认为，傅有争取过来的可能，他统帅着60万人的军队，非到不得已时是不会接受和谈的。因此，确定的方针是：在立足打的同时，力争傅作义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北平。

中共中央决定以军事打击作为主要斗争手段，兵临城下，促使傅作义进行谈判。1948年1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前发动了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秘密入关，进至冀东地区；华北第3兵团实行毛泽东从“西线开刀”战略，突然包围张家口、新保安，然后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一起，切断了平绥路东段，断其西退之路；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夜行晓宿秘密入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平、津、塘、唐实行战略包围，切断其从海上南撤之路。于12月21日完成了对华北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使其完全陷入收不拢、跑不掉的境地。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促使傅作义和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领导下，北平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北平地下组织有党员3000人，党的外围组织有5000人。他们发动各界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解放北平运动和护厂、护校斗争。尤其是利用各种关系开展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由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崔月梨和地下党员杜任之、刘学周等和傅作义的同乡、密友、老师刘厚同经常保持联系，由刘厚同对傅作义做劝说工作；由学委书记余涤清和王汉斌确定把在天津《大公报》当记者的傅冬菊同其爱人周毅之（地下党员）调来北平。当傅冬菊劝说其父傅作义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问题时，傅作义问：你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回答是毛泽东派来的。傅表示可以考虑。之后，傅冬菊就留在傅作义身边，一边照顾傅作义的生活，一边劝说傅不要跟蒋介石走，并及时将傅作义每天的动态，通过周毅之向王汉斌与崔月梨汇报，他们及时写成电文由地下电台报告刘仁，刘仁及时转报平津战役指挥部。北平地下党组织还派李炳泉通过其堂兄华北“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找傅作义几次进言；还通过马占山等人做傅的工作。

在强大军事压力和北平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傅作义于12月14日派《平

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采访部主任记者李炳泉携带电台，前往三河县平津前线司令部与解放军代表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苏静进行谈判。傅方代表提出组成有傅作义参加的华北联合政府，其军队受联合政府指挥；要解放军放出新保安被围的第35军回北平。12月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与崔载之进行谈判时指出，不同意建立所谓的华北联合政府，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则，是敌人必须放下武器。

针对傅作义的动摇不定态度，12月22日华北第19兵团向新保安发起攻击，激战10小时，全歼第35军军部及两个师等1.6万余人。24日，第20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等部，又将企图向绥远方向突围的国民党军5.4万余人歼灭于张家口，至此，傅系主力基本丧失殆尽，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25日，中共中央宣布了包括傅作义在内的43名战犯名单。这样，傅作义在军事惨败和政治打击下，陷入了极度苦闷矛盾之中。

蒋介石对傅作义同解放军秘密进行谈判有所觉察，连续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军统二厅厅长兼国防部次长郑介民飞北平，劝傅从塘沽和青岛分路南撤。随后又派其次子蒋纬国携他的亲笔信到北平。信上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要傅南撤，蒋要任命傅为华东南军政长官。这些都被傅婉言拒绝。但是傅作义仍顾虑国民党中央军在北平力量太大，难以控制局势，同时继续进行战争准备，在天坛、东单修建了两个临时飞机场，还在城内修筑环城马路，幻想加强同南京联系，借空援死守北平。

针对傅作义的思想，中共中央通过北平地下党向傅作义指出，所以将其列入战犯的真实目的，一是因其追随蒋介石反共，二是加强其在蒋系军队中地位，以便配合和平解放北平；希望能派能负责的代表前来谈判。这样，傅作义又派其少将民事处长周北峰与民盟中央常委张东荪为代表，前往蓟县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中共平津总前委书记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参加了谈判。傅方代表提出，军队不以投降方式，而以团为单位以整编方式解决等条件；释放新保安、张家口作战被俘人员等要求。

解放军方面答复对方：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此前提下，对傅部起义人员不咎既往，对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释放，对其高级干部一律予以安排等。傅方代表对此表示完全接受，并在《谈判纪要》上签了字。明确限定1月14日午夜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1月14日，傅作义派邓宝珊、周北峰为代表，前往通县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此时，解放军已下达进攻天津的命令，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于15日全歼守敌13万人。天津解放，使傅作义抛弃了幻想，教育了国民党北平驻军，促进了北平和平解放。

1月15日，双方在通县举行第三次谈判。很快就守军出城改编、军官安排和机构接收等问题达成协议。在谈判过程中，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北平人民加紧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各项工作。1月16日，由北平各界人士组成的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前国民党北平市长何思源等，走访驻北平的各兵团、军部及各单位负责人，呼吁他们以北平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和文化古都历史文物为重，和平解决。为此蒋介石责成毛人凤电令军统特务北平站站长王蒲臣暗杀何思源。1月18日凌晨，在何宅屋顶安放炸弹，将何及其夫人和两个女儿炸伤，一女炸死。当日，何思源带伤同康同璧（康有为之女）等10名代表出城与解放军接洽。

1月17日，邓宝珊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一同到达北平。双

方草拟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1月21日，由苏静、崔载之和华北“剿总”政治部主任王克俊代表双方签字生效。

1月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要点。22日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条文，得到了大部分将领和广大市民的拥护。根据协议和中共中央指示，组成了由叶剑英任主任的北平联合办事处。并和傅作义一起研究了部队整编计划。22日开始，国民党北平驻军20余万人，按照指定地点陆续开出城外，听候改编。傅作义由中南海回到西郊原总部驻地。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2月下旬，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消除了傅作义心中的疑虑。4月1日，傅向全国发出北平和平解放通电。

傅作义率部北平起义，接受和平改编，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将这种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称之为“北平方式”，对傅作义的义举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芜湖繁昌起义

1949年2月7日，国民党军第106军第282师师长张奇率部5000余人，在安徽省芜湖至繁昌荻港150里的江防线上举行起义。

张奇，河南宜阳县人，1923年考入陕西陆军讲武堂；北伐期间任冯玉祥部第4军第7师上校参谋长；中原大战失败后，第4军被蒋介石改编为第15军，张先后任该军第65师参谋长、第386团团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因中条山抗战失败被挟嫌迫害，愤而离军出走，后辗转投奔赤鹏举，经郝举荐，历任将校团高等军事研究班少将班附、淮海地区副专员、淮海省保安处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此间，张目睹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深感救国无门，抗日无力，忧心忡忡，异常苦闷。1945年10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考察、帮助和教育，经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授权批准，张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8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大部被歼灭，但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他一方面收集残部，部署长江防线，另一方面伪装和平，妄图以和平烟幕为掩护，争取时间，扩编军队，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暂编第23师被调往芜湖、繁昌一线驻防，部队扩编为第106军，毕书文任军长，张奇任第282师师长，部队移防前，时任暂编第23师第46旅旅长的卮庭宾曾和张奇（第45旅副旅长）商定于9月28日在靖江—泰兴起义，这一计划因团长崔凤鸣向毕书文告密而遭到破坏，包仅带一个搜索连和一个手枪排共110人突围到解放区。因卮庭宾派去给张奇送信的人为毕书文捕获，张奇的身份已经暴露。毕怕连累自己，授意军法官将送信人杀害以灭口，并力保张奇当了第282师师长。张对起义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首先有目的地对部队进行政治、军事、形势教育，用小座谈会、个别谈话、妥善安排家眷、老同学老同学联络感情等办法，统一认识，坚定参加起义、投向光明的思想；其次，积极地在师、团、营、连各级组织培养一批起义骨干，在团、营、连分别组织了以团长（或副团长）、营长（或副营长）、连长（或副连长）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具体统管起义工作，然后吸收士兵中的骨干，使之从上到下形成一个完整的起义指挥系统，规定从接到起义命令时起，由“三人小组”掌权，以张奇手谕为令；另外，对渡江行船路线和周围的环境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横渡一次需要的时间、多少次才能渡完等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以过江清剿为名，派出一个连队到江北，实地检查准备工作的完善程度，并借机了解对岸周围环境。

经过周密的准备，张奇认为率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立即起义。1949年2月7日晨，张奇在横山镇师指挥中心下达了起义的命令。各部队官兵迅速向江边渡口开进。在师部，张奇指挥师部参谋和警卫营官兵当面拘捕了该师副师长、参谋长、政工处长等六人，立即捆绑上路，强迫渡江。与此同时，张奇下令炸毁离芜湖15华里的鲁港大桥，切断了通往繁昌县城、军部和南京国防部的电话线和断绝了一切对外联系。起义部队5000余官兵，在东起芜湖，西至荻港的150里长的江面上，分从二坝、鸭坊咀、头棚、营坊咀、黑沙洲、永州圩、荻港等7个渡口渡过长江，向北开进。张奇怀着游子还乡一般的心情，坐在船头，遥望长空，无限兴奋。起义被发觉后，遭到从芜湖开来的巡逻舰艇炮击渡船、渡口，天空又有飞机低空扫射、轰炸，营坊咀渡口桥头堡接连中弹起火。张奇沉着指挥部队顽强抗击。

起义部队到达无为县后，师团两级干部联名发了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全国人民的通电。电文表示：誓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和中原军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诸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为人民效忠，为革命服务，为实现全国的真正的和平与解放而努力。3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复电慰勉起义的全体官兵。尔后，第282师在无为召开了起义官兵渡江庆功大会。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独立师，张奇任师长，鲁大东任政委。这一义举，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御部署，震惊了国民党政府，给已经四分五裂、濒临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沉重的打击。

骑兵第六团起义

1949年2月初，在绥北战役中，国民党军骑兵第12旅第6团团长期那银泰率领210余人举行了起义。

1948年12月26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张家口，国民党军第11兵团残部在其司令孙兰峰带领下，溃逃绥北地区。孙兰峰任命鄂友三为绥东、察北的“剿匪总司令”。鄂遂将其骑兵第12旅的3个团扩编为3个指挥部，各连均编为团，那银泰的第2团第4连改编为骑兵第12旅第6团，那银泰由连长升任团长，全团共400多名官兵。

那银泰，原名德宝拉胡，蒙古族，1920年9月生，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人。1936年7月因生活所迫参加了蒙古军。1945年日本投降时曾在海福龙部任团长。是年底，海福龙归顺马占山部开赴东北，那银泰不愿随行。为找出路，他派连长韩峰林去找苏蒙军联系。途中被八路军俘获。那亲自去找八路军交涉，见到张达志司令员。张向那讲了八路军的性质、宗旨和民族政策，动员那与八路军合作。那当时同意合作，但后又反悔，遂被鄂友三收编为绥远保安师第3补训支队。1946年鄂部整编为国民党骑兵12旅，那银泰在第2团第4连任连长。

1949年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发起绥北战役。鄂友三骑兵第12旅闻风而逃。驻扎在四十顷地周围的第6团团长期那银泰，因对鄂友三推行大汉族主义不满，又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经再三考虑，感到只有投奔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1师才有生路。时值鄂友三令那团收缴驻四十顷地的多伦县保安总队的枪支，那下令枪毙了多伦县长杨华、保安总队副队长等人，闯下大祸。孙兰峰、鄂友三要收缴那团的枪支，缉拿那银泰问罪。那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商量怎么办，大家都表示去找人民解放军。那银泰当即决定会找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锡察军区司令员乌力吉敖喜尔去，认为乌曾是他在伪蒙古军时的上级，乌部里有他过去许多同事，一定会欢迎。

那银泰率全团400余人从四十顷地出发，寻找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1师。鄂友三得悉后，即派李存英团追截。双方遭遇后激战两小时。那团因寡不敌众，撤出土木尔台一带。这时那团有两名士兵逃跑回来；行至陶林县宏盘村时，被解放军骑兵第11师抓获。经审问，得知那银泰带部队正寻找乌力吉敖喜尔部队。于是经锡察军区司令员乌力吉敖喜尔、副司令员吴广义、副政委苏克勤和骑兵第11师师长兼政委毕力格巴特尔等共同研究，决定派侦察参谋特木乐等二人送信与那银泰联络。他俩到土木尔台找到那银泰，即把信交给那。信中说：我们希望你快把部队带过来。你们弃暗投明，脱离了国民党部队，这是革命行动，我们非常欢迎。那看信后非常高兴，遂集合队伍向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1师驻地宏盘村开进。第二天便到达宏盘村附近驻下。

锡察军区和骑兵第11师的领导亲切地接见了那银泰团长。2月8日上午，锡察军区组织骑兵第11师和当地群众300余人，在陶林县宏盘村夹道欢迎起义部队，还派入送去很多慰问品和慰问信。决定将起义部队编为锡察军区独立团，那银泰为团长，隶属骑兵第11师指挥。起义部队经过一周的教育整训，于2月15日奉命参加了绥北战役，为解放绥北做出了贡献。

黄安号舰起义

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海军黄安号舰65名官兵，在中共山东胶东地区军、政党组织的策动下举行了起义。该舰起义后从青岛港起航，驶抵江苏解放区连云港（当时为新海连特区）。

黄安号舰是1945年国民党在青岛接收日本的8艘军舰之一，该舰的排水量是745吨。从1946年开始，中共山东胶东地区各级党委统战部门和人民解放军胶东军区的联络部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先后分别对黄安号舰进行了长期的策反争取工作。

1946年初，中共胶东地区东海地委统战部从本区党员登记表中，发现鞠庆璞（化名曲永昌）有两个哥哥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组织上便将鞠庆璞调来培训后派往青岛，从南京、重庆两地函召他的大哥鞠庆玺、二哥鞠庆珍，进入国民党青岛海军进行地下革命活动。鞠庆璞经二哥鞠庆珍介绍，打入国民党海军5号炮艇任上士文书。1948年8月，鞠庆玺被坏人告密遭到国民党海军逮捕。9月，鞠庆珍主动找门路调到黄安号舰任中尉舰务官，积极筹划起义活动。

与此同时：中共牟平县统战部、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政治部联络科争取了在青岛国民党海军任职的刘增厚。后来刘被国民党以“通匪嫌疑”革职后，又通过关系于1948年7月调黄安号舰任少尉枪炮官；中共青岛市委派出中共党员陈坤全（化名周永祥）潜入市区，做通了黄安号舰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起义工作；中共华东局社会部下属潍坊特别市公安局派出人员，策动国民党海军接29号舰代舰长刘建胜起义。刘除筹划准备该舰起义外，还积极推动和协助黄安号舰起义。由于上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策动，黄安号舰的军官鞠庆珍、刘增厚、王子良以及他们串联发展的士兵孙露山、张杰等人，相互联络结合，组成了该舰起义领导核心小组。

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2月初，青岛周围地区大部解放，驻青岛的国民党海军当局命令黄安号舰加紧抢修，准备南逃。同时，还往黄安号舰装载了枪支弹药、通信器材、大米等物资，约300余吨。2月9日，黄安号舰抢修和装载完毕，驶离造船厂码头到前海（“小青岛”西侧）抛锚待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2月12日，舰长刘广超回家过元宵节。鞠庆珍、张杰等下舰去接家属，王子良的家属袁丽峰于上午陪同轮机长刘彦纯的未婚妻潘素娟上舰，下午3时左右王子良和袁丽峰突击动员刘彦纯参加起义。晚8时10分，起义正式开始。鞠庆珍夺取了卫兵的枪支，负责驾驶；王子良、刘增厚临时拘禁了副舰长等军官；孙露山警戒前甲板；王德隆、田秉吉把守前士兵舱口；刘彦纯发动物器；袁丽峰看管被临时关押的人员。起义人员迅速控制了全舰。

晚8时50分左右，黄安号舰启航，从美国军舰停泊的空隙中穿行驶出。美舰旗舰曾发信号询问去哪里？黄安号舰谎称找地方避风。当时海面上正好刮起七八级大风，天气阴沉，美舰也就没再过问。黄安号舰航行到竹岔岛附近，鞠庆珍命令全舰灯火管制，全速前进，驶向解放区。

2月13日晨4时，黄安号舰满载着起义的65名官兵、1名临时上舰的解放区民兵、6名随舰行动家属以及弹药、粮食，冲破惊涛骇浪，胜利抵达解放区连云港。因岸上驻军刚刚换防不了解起义联络信号，曾向黄安号舰开枪开炮。王子良、张金诺冒着炮火驾驶汽艇送王子良、孙露山上岸联系。受

到连云港驻军领导的欢迎。 14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等同志接见了黄安号舰起义领导人员，随后又召开军民大会热烈欢迎全体起义官兵。为避免敌机破坏轰炸，黄安号舰转移到苏北燕尾港堆沟（即陈家港）伪装隐蔽。

黄安号舰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海军第一艘大型军舰起义，开创了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先声。3月，黄安号舰奉命调回青岛，归属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2军、胶东军区和海军青岛基地领导。 1950年6月，黄安号舰奉命与大行山舰编队航行至上海，改归华东军区海军，黄安号舰被重新命名为沈阳舰。从此，正式编入了人民海军的行列。

第二 一号招雷艇起义

1949年2月17日，国民党海军第201号扫雷艇，在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的策动下举行起义，从山东长山岛驶抵解放区烟台港。

第201号扫雷艇系日造钢壳艇，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海军接收。该舰排水量215吨，装备有美制、日制机关炮、重机枪等火力武器。全艇编制45人，起义时仅有官兵22人。1948年4月，该艇从青岛移防长山岛，隶属国民党海军长山岛巡防处领导，与同型艇第202号、第203号扫雷艇一起，共同担负渤海湾的近海巡逻任务。该艇艇长蒋德，思想反动，骄横跋扈，官兵矛盾非常尖锐。

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派经培训的李云修潜入第201号艇当上了轮机兵，并指示其在艇上发展力量，伺机把艇开到解放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就博得官兵的信任和好感，很快与帆缆兵王文礼（王卓奋）、舵手兵万成歧串通起来，义结兄弟，共同策划起义。接着，他们分头发展起义人员：李云修发展了帆缆上士慈唯富、轮机兵赵悦学；王文礼和万成歧发展了侯玉辉、黄四旗、童祥等5名台湾籍士兵以及宋元达、程秉盛、葛裕源等人。

1949年1月，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与长山岛毗邻的烟台、塘沽等港口也相继回到人民手中。2月16日，第201号艇到庙岛海区打捞失落的铁锚，因风浪很大，海水浑浊，没有打捞成，返航停泊在南长山岛鹊嘴港码头。当晚，艇长蒋德、轮机长等主要军官都下艇回家过夜。李云修、王文礼、万成歧想到之前曾有两次起义机会都没能实现，这次时机再不能错过。李云修3人立即秘密商议，决定当晚行事。行动前，王文礼从蒋德住舱偷取了他的手枪；李云修借喝酒之机灌醉了枪炮长杨云晓、副轮机长王宝华、帆缆长王绍三。晚11时30分，他又把侯玉辉、黄四旗等5名台湾兵找来，打开艇中部弹药舱，给起义人员配备了武器，分配了任务。

2月17日零点30分，起义正式开始。王文礼手握匣子枪，万成歧手持水手刀，同李云修一起突然冲进军官舱，把灌醉的几名军官喝醒，缴了他们的手枪，关进士兵舱。很快，起义人员控制了全艇。为避免过早暴露意图，使港内国民党军发觉，他们先未开动电机起锚，想用钢锯锯断锚链，但没有成功。王文礼等只好急令轮机班长朱华德发动电机起锚，又因过于紧张，没能启动电机。最后，又叫轮机兵赵悦学、葛裕源帮助，才将电机启动，把锚提起。

2月17日凌晨1时，第201号扫雷艇顺利启航了。万成歧、程秉盛驾驶着扫雷艇，假称继续出海捞锚，从容镇定地绕过其他艇船，迅速离开南长山岛的鹊嘴港，快速驶出庙岛海区的珍珠门、宝塔门，全速驶向通往烟台的航道。拂晓5时许，第201号艇驶达烟台港外的芝罘岛附近，电讯员宋元达从无线电报话机听到艇长蒋德正声嘶力竭地呼叫扫雷艇赶快回去。

2月17日晨7时左右，第201号艇经过6个小时的紧张航行，胜利抵达解放区烟台港。李云修换乘舢板上岸与人民解放军联系，受到驻军第5旅的军政首长的欢迎。当天，又召开了欢迎大会，接见并宴请了22名起义人员。不久，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胶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分别发来贺电、贺信，慰勉第201号艇起义人员。6月，第201号艇参加了解放青岛、长山岛的战斗。次年，调归华东海军，重新命名为秋风艇。

海子起义

1949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海子临时支队，在贵州省兴仁县鲁础营举行了反对反动土司和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

鲁础营是一个回、彝、苗、汉、布依族杂居的地方，广大人民群众受到反动土司和反动官府的双重压迫，生活极为困苦。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路过此地后，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40年，由进步青年李景荣、叶万均、叶万益等人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后与盘县祭山村罗波领导的反霸武装联络策应，多次举行了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和袭击国民党保安部队的战斗。1948年10月，按照中共滇桂黔边罗盘区委指示，将鲁础营武装部队等组成了海子临时支队，制定了以反对恶霸土司和国民党统治为斗争目标的海子暴动计划。

1949年初，国民党确定坚守大西南（川、康、滇、黔、桂）的方针，在南北盘江地区集中了大量部队，企图消灭该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游击队和根据地。中共罗盘地委为粉碎国民党的阴谋，于2月批准了海子暴动计划。

1949年2月18日清晨，海子临时支队整齐雄壮地开进土司龙家大院，按照计划正式开始了暴动。暴动队伍召集了群众大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会后，起义队伍开仓分粮。附近农民热烈拥护，拍手称快。

海子暴动使国民党当局非常恼怒。2月29日调集兴仁县两个保警中队，由县长亲自率领进攻鲁础营。海子临时支队在鲁础营设下埋伏，突袭进攻之敌，使之大败，并乘胜追击，连克雨樟、格沙屯两地。5月初，中共罗盘地委又将海子临时支队扩大改编为海子游击大队，开辟了大二海子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49年11月贵州解放。

接二十九号舰起义

1949年2月22日，国民党海军接29号炮舰在代舰长刘建胜率领下，于青岛港举行起义。

接29号舰与黄安号舰一样，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海军接收日本的一艘炮舰，排水量430吨。舰上原装备的火炮全被日军拆除，国民党海军接收后，被送进青岛海军船厂修理。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刘建胜，由于家贫15岁被迫参加国民党海军，1948年调至接29号肌任副舰长，因无舰长，实际是代舰长。同年7月，刘建胜的胞妹刘俊英，经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领导批准，只身从潍坊潜进青岛，与其兄刘建胜接上联系。8月，华东局社会部又派刘建范去青岛，秘密会见刘建胜，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布置工作任务，并代表党组织委任刘建胜为策反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地下工作小组组长。接着，刘俊英的丈夫、中共潍坊特别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刘兆洪，被安插到接29号舰上当舰长的勤务兵，协助刘建胜进行起义工作；刘建胜把其妹刘俊英安排在他的发展对象、青岛海军机关中校参谋胡孝义家当保姆，担任联络员与交通员。

刘建胜接受中共党组织指示后，积极物色人员，发展关系，紧张进行起义准备。并与黄安号舰的王子良、刘增厚、鞠庆珍等建立联系，支援对方3支手枪和一些子弹，作为起义武器，原准备两舰共同行动，后因接29号舰没能同时批准试航，黄安号舰只好单独先行起义。

1949年2月12日白天，黄安号舰中尉舰务官鞠庆珍派人通知刘建胜，如果接29号舰走不了，约他上黄安号舰同行。刘建胜表示如果舰不能带走，准备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黄安号舰当晚起义成功后，美国第7舰队对青岛港实行了严密封锁，还派特务人员上接29号舰监视。因此，刘建胜不得不推迟行动。

一星期后，刘建胜召集刘俊英、刘兆洪、胡孝义等起义人员秘密开会，宣布近日起义。并决定留下刘俊英、胡孝义等人，负责转移起义人员的家属。2月22日晚，刘建胜、刘兆洪等率舰起义。

22日午夜，接29号舰秘密驶出青岛港，向连云港方向驶去。当驶至青岛对面的薛家岛附近海面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岸炮猛烈轰击。这时，刘建胜一面组织还击，一面指挥前进。不一会，刘建胜头部负伤，刘兆洪右腿也受伤，军舰失去指挥，舰上出现混乱。刘建胜、刘兆洪等立即换乘救生艇向解放区驶去。在国民党军舰的追击下，小艇多处中弹、进水，刘建胜、刘兆洪等起义人员均被捕，被关押进国民党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审讯。虽遭严刑拷打，他们拒不招供，3月，他们又被押往上海，同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海军当局残酷杀害。

接29号舰起义虽遭失败，但刘建胜、刘兆洪等人向往光明，为民献身的精神受到人们的敬仰。解放后，刘建胜、刘兆洪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轻巡洋舰“重庆号”，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策动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全舰近600名官兵于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将舰驶向山东解放区烟台港。

“重庆号”原名“AURORA（黎明女神）”，是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的旗舰，排水量5270吨，主辅机总功率6.4万匹马力，最高航速可达每小时30余海里，续航能力4000海里，有双联装150毫米口径主炮6门，100毫米口径高平射两用副炮8门，40毫米口径高射机关炮8门，双联装高射机关枪8挺，53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6座。舰首设有防水雷的扫雷具两套和磁水雷防卫电网；舰尾设有攻击潜艇用的深水炸弹发射架两具，还有海对空雷达，1部声纳，61部无线电台。舰上编有10个中队，官兵574人。这艘武装精良、设备先进的巡洋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舰队参加过大西洋、地中海的多次海战，并参加过登陆西西里岛和攻取土伦的战役。1948年5月19日，英国政府为抵偿香港英国当局代为保管中丢失了的中国6艘港湾巡逻艇将该舰移交国民党政府，遂改名“重庆号”。经近3个月的航行，于8月回国，停泊上海，准备参加内战。

“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王牌”军舰，不仅军政要员登舰参观，连蒋介石都在舰上召开东北战区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10月10日，“重庆号”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指挥下，用舰炮从葫芦岛向解放军占领的塔山、高桥阵地猛烈轰击，“重庆号”被推上内战的第一线。国民党政府将此舰当成阻止解放军南下渡江作战的江上武库。

在舰上服役的近600名官兵，都是1946年初冬前，抱着建设中国强大海军志愿，前往英国受训2年后，于1948年8月随舰归来的。舰上的一些爱国青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形势的推动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策动和中共政策的感召下，通过潜伏在“重庆号”上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官兵的秘密串联，相互联络，逐步形成两个大的秘密组织：一个是以王颐桢、毕重远、陈鸿源、武定国、洪进先、张启钰等27名士兵组成的“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其中毕重远是中共南京市委的地下党员，张启钰是中共四川省眉山县的地下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另一个是以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王继挺等16人组成的起义组织，其中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郑光模、王淇是基层军官。这两个起义组织分别按照各自的计划平行活动，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彼此缺乏信任一直没有建立横向联系。

“重庆号”回国时，正是战略决战的前夕。中共南京市委派陈良与毕重远取得联系，指示他采取各种方式，把进步士兵团结起来，遇有时机，就可以组织起义；曾祥福、莫香传等组成的起义组织，与中共南京市负责策反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及史永取得联系，后来因“重庆号”常驻上海，为联系方便，南京市将关系转到中共上海局领导。起义准备工作进展很快。中共上海局还通过各种渠道，对“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和官兵进行策反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

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从高昌庙启航开到吴淞口，突然抛锚停下，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可能要逆长江而上，配合江阴海防第二舰队，阻止解放军渡江。如果军舰驶进长江，因江面狭窄掉头困难，又处于江阴和吴淞口两地炮火威胁之下，处境将会对起义十分不利。“解委会”当机立断，改

变原来海上航行中起义的计划，决定在停泊中起义。

2月25日凌晨1时30分，在“解委会”的集体领导和组织下发动了起义。王洛切断电话电源，洪进先关闭、控制了所有无线电台，毕重远和于家欣诱引上甲板哨兵和司令走廊的值更士兵至雷达室缴了械，迅速打开枪架和弹柜的锁，武装了全体“解委会”成员。接着，“解委会”成员立即按照分工到达各自指定位置，行动组分舱逐段地拘禁了所有军官和上士，王颐桢并马上通知另一起义组织的王继挺，由他叫醒其起义组织的人员一同参加了起义。“解委会”作了最坏的准备，分工陈鸿源、周正负责炸舰任务。陈鸿源将三四十发4英寸炮弹垒在弹药库走道上，引信露在外面，一旦起义失败，引爆弹药库，炸沉军舰，同归于尽。

“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两次赴英留学，是一个正直爱国的老海军军官。“解委会”希望邓舰长深明大义，和士兵们一同起义，由他领航开船。邓舰长在事先不知道舰上酝酿起义之情的情况下，考虑到“重庆号”的命运和舰上几百名官兵的生命安全，毅然加入了起义的行列。亲自制定航线，下令开航，指挥航行。25日凌晨5时45分，“重庆号”正式开航，快速顺利地驶出航道复杂的长江口，转向北上，以每小时24海里的速度驶向解放区烟台港。

25日早晨，“解委会”发布了《重庆军舰起义告全体同学书》和《重庆军舰起义告海员同志及技工同志书》。王颐桢通过舰上广播向全舰宣告军舰已经起义，动员全体舰员拥护起义，号召大家：“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将他们交给我们的武器，把他们消灭掉！”

2月26日清晨，“重庆号”经过25小时的持续航行，行程520海里，胜利到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受到烟台市军政机关领导人的热烈欢迎。3月24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邓兆祥舰长和全体官兵发了慰勉电，热烈祝贺他们英勇起义，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重庆号”的起义，粉碎了国民党调舰入江，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企图。为此，蒋介石撤掉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职务，于3月18、19两日，派出B-29型轰炸机对“重庆号”轮番轰炸，舰上官兵进行了英勇还击，“重庆号”舰体严重受伤，6名士兵壮烈牺牲，近20人受伤。根据中共中央保全“重庆号”的指示，拆除舰上重要设备，3月20日打开海底闸门自沉于葫芦岛，5月，中央决定以重庆舰起义官兵为基础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人民海军学校——安东（今丹东）海军学校，邓兆祥舰长任校长。1951年6月4日，“重庆号”被打捞后修复。

陈仪准备起义被杀害

1949年2月27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达成在浙江起义的协定，被汤恩伯出卖而被捕，起义未成。

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曾于1902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11年11月参加了浙江光复会新军起义，任军务部部长；1917年，再赴日本，在陆军大学学习；1924年9月，任孙传芳部陆军第1师师长兼浙江省主席；1926年率部响应北伐，被蒋介石任命为第19军军长；1928年赴欧洲考察兵工，回国后任兵工署署长；1933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1938年11月发表声明，声讨汪精卫，拥护抗日；1941年9月任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后调任陆军大学教育长；1945年9月任台湾行政长官；1947年4月因“二·二八”事件被撤职查办。

陈仪回到上海家中，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当他读了《台湾真相》一文后，万分感慨，认为此文比较公正，揭露了台湾“二·二八”事变完全是CC分子造成的，挨门挨户大杀台湾同胞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没有加罪于陈仪头上。陈仪文章的作者胡允恭（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谈了话。这次谈话成了陈仪思想转变的转折点。从此，他对蒋介石不再称“总裁”、“委座”，而直叫老蒋。以后，他又看了一些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反蒋的态度日益明朗和坚定。

1948年3月，蒋介石把陈仪请到南京，让其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以年老多病辞谢。不久，蒋经国到上海再次劝说，陈仍未同意。胡允恭知道此事后，让陈仪接受任务，并说明有了地盘和实力，才能多为家乡父老作些好事。在地下党反复进行工作和浙江人士再三请求下，陈仪于6月接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并邀请胡允恭去杭州共事。胡到杭州后，多次同陈仪谈论时局，指出蒋介石的军队损失惨重，无法再战。陈仪则表示要通过同共产党建立联系，才能有力量反蒋。胡向党组织汇报了陈的态度后，决定由胡代表中国共产党直接同陈仪、沈仲九谈判。陈仪同意在浙江起义，并达成口头协议，大体内容是：陈保证在浙江不逮捕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进步学生；尽可能释放在押政治犯；在浙江不作“勘乱”准备。胡表示，协议实施后，对其以前为蒋介石效力的行为不予追究，其他起义人员享受相应待遇，按民主原则改编。陈忠实地履行了协议。

1949年1月27日，陈仪派外甥丁名捕携带亲笔信去上海会见他的亲信京（南京）沪（上海）杭（杭州）警备区总司令汤恩伯，策动其起义。丁名捕到上海后，当面把信交给了汤恩伯。汤当面表示，他左右蒋的耳目很多，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背后又将陈给他的亲笔信直送蒋介石处，并摄影复制件报国民党行政院，同时派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去奉化向蒋介石报告。汤恩伯无耻地背叛了恩师陈仪。胡允恭获悉此情况后，火速赶赴杭州告诉陈仪。陈受封建旧观念的束缚，识不破汤的险恶之心。汤还向蒋建议说，为了不让陈仪在上海煽动人心，影响大局，请求立即将他押起来，解往衢州。5日，汤报请蒋介石批准，将陈仪转解至台湾，后押至基隆警备司令部。

1950年3月，何应钦、张群、吴信忠奉蒋介石之命，向陈仪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陈仪写悔过书，在台湾报纸上公开发表，并认罪过，要求减轻处分；二要陈仪发电给傅作义和张治中，痛斥他们背叛“党国”，忘恩负义。陈仪严辞拒绝。以后，蒋介石的参谋长林蔚、财政部长俞大维，以陈仪故旧的关

系劝说陈向蒋介石认错，说写一悔过书，蒋允许恢复自由，在台湾居住。陈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6月9日，国民党国务部军事法庭正式审讯陈仪，庭长顾祝同问陈仪为什么勾结共产党，背叛党国。陈仪说：“我和共产党联合，是为了保境安民，使浙江人民免受兵灾。蒋家的军纪败坏，什么祸国殃民的事都做得出来！我一生只做这一件好事，因汤恩伯中途出卖，尚未达到目的，有什么罪！”顾祝同让汤恩伯指证。汤说：“我一生受陈仪恩遇深重，正图报答，实不忍心检举。只因我爱党爱国情深，不能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到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随后，法庭判处陈仪死刑，问陈有什么话说，陈坦然地说：“死得其所，没有话讲！”18日，陈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悲壮地就义。1980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调查部、统战部《关于陈仪问题的报告》，认定陈仪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第九十七师南京起义

1949年3月24日，国民党军“首都警卫师”第45军第97师师长王晏清率部100余人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近郊举行起义投奔解放区。

王晏清系黄埔军校毕业生，长期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第18军任职。1948年8月，王被任命为第97师师长。该师三个团，其中第289团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第290团是陈诚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第291团是顾祝同的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全师13000余人，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王晏清的母舅邓昊明曾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专员，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民主人士，对王有着深刻的影响。王曾向邓提出：寻觅一位引路人，以早日摆脱苦境。

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通过邓昊明做王晏清的工作。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陆平经常到邓家，同邓及其夫人纵谈天下大事。同时，陆平还正面与王接触，试探虚实。第一次交谈，两人从个人经历到国内形势，从上层新闻到军人趣事，无所不谈，并打动了王晏清的心。事后，王向舅父打听陆平到底是什么人？邓告诉他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种人。王了解到陆的身份后，遂与其谈了自己的想法：辞去军务，投奔解放区。南京地下党组织对王的态度作了研究，认为王弃暗投明的表白是可信的，但他只身行动，不如在关键时刻率部倒戈作用大。陆平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连续几个月围绕着究竟是一人反正好还是全师起义好，同王晏清频繁交谈，终于统一了率部起义的认识，同时，研究了整个行动计划。为坚定王晏清起义的决心，地下党负责人史永还专门会见了王，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他的赞誉和期待。王表示起义是要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只要对人民有利，个人的得失可以置之度外。

1948年11月中旬，第97师奉命调往沿长江一线布防，3个团分别驻防板桥、江宁和铜井三镇，师司令部居于三镇之中的江宁，与第289团靠拢。王晏清在与第289团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健中接触中，发现他们之间的观点总是不谋而合。杨、邓表示，坚决跟师座走。王晏清还找了中校参谋黄克栗、赵昌然、政治部主任肖汉杰、警卫营长叶宏昌等人，推心置腹地作了深谈，彼此心照不宣。南京地下党组织始终关怀着王晏清和他的挚友，并同他们具体研究了有关起义的事宜。

淮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直逼国民党长江防线。李宗仁代总统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磋商，同时，也加紧了备战活动。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几十艘炮舰在长江中下游游弋，无数江防工事加紧施工。在此种时局下，南京地下党组织及时派陆平向王晏清传达了党组织的决定：起义准备工作照常进行，并约定了与人民解放军第5野战军联络的密码。王晏清接受党组织的指令后，连续办了三件欠虑之事：一是在全师连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出了心里话，“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接着又打内战，真是无意义”；二是起义骨干赵昌然，自告奋勇地去做守卫机场宪兵队的工作，王表示同意了；三是从军部转接陆平的电话，寻问电台呼叫，难免被监听。这三件事引起事态发生了急剧变化。

3月23日上午，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召集第45军营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突然宣布撤销军长赵霞的职务，同时令王师长到他家谈话。24日，王晏清准时到达卫戍总司令部，张耀明把一张写有王晏清被“共匪”用金条收买，拉拢部下，密谋叛变的纸条放在王面前，并说他散布流言，扰乱军心，

派参谋赵昌然发动宪兵叛乱，欲占领机场，拦捕高级将领。王据证反驳无效被软禁。王正苦于难以摆脱困境的时刻，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突然来了。王向覃诉说苦衷，请求主持公道。覃于当日下午5时放王回家，并说要随传随到。

王晏清离开卫戍总司令部后，在家停了五分钟，即飞车去江宁镇司令部。几十分钟后，就在张耀明责怪覃异之不该放王晏清的时候，王正召集杨镇洲、邓健中等骨干商谈，不能再同地下党联系，也不能等解放军渡江战役了，必须提前起义，并由邓健中负责封锁江面，如国民党第二舰队拦截，则用重迫击炮密集炮火还击，完全可以将其轰沉。同时，王晏清下令搜集船只，准备渡江，并在南岸设置迫击炮阵地。尔后，王又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芜湖以东、丹阳以西沿江地区，国民党在短时间内无法抽调一个师的兵力来进攻，即使能纠集一些部队，最快也得在明天拂晓以后才能到达第97师防区。因此，今晚渡江，形势非常有利。当晚8点30分，王下达了渡江命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首先开拔，第289团随后开进。25日凌晨2时，王晏清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了江北，在桥集镇集结完毕后，派出4个联络组寻找解放军。凌晨4时，4个联络组均无回音。王心急如焚，两个团及师直属部队共8000余人屯集在桥集镇附近，距江边仅5公里，且部队多数还不知道此次行动的真相。王同杨镇洲、邓健中商量后，即命令部队向前方10公里处的新店庙前进。

天亮，张耀明奉蒋介石命令，派战斗机飞抵部队头顶疯狂扫射，同时散发传单，称王晏清背叛党国，有击毙王者赏银5万元，并连升三级。顿时，第290团大乱，大多数士兵跟着团长黄子安往回跑，其余丢下枪支四处落荒而去。据此，王同杨、邓商议后决定：由杨严密掌握第289团，由叶宏昌掌握师直属队，原地待命，由王和邓带参谋、警卫人员和第289团一个排共100多人，由黄克栗打头站同解放军取得联系。就在他们离开不久，留在桥林的部队就出现了“师长不管我们了，后面部队追上来”的谣言，致使部队成为无法控制的乱军。杨镇洲拼命阻拦也无济于事，只身赶往新店庙。25日中午，黄克栗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人民解放军三野第8兵团第25军张师长会见王晏清，对他们投奔革命，走向光明的正义之举表示热诚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没有忘记王晏清和他的战友们的历史功绩。解放后，王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在南京安度晚年。邓昊明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杨镇洲在上海银行部门供职。邓健中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赵昌然在华东交通大学任教授。

白家庄要塞起义

1949年3月下旬，太原战役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第3大队180余人在太原河西白家庄要塞举行起义。

1948年9月，晋中战役结束后，阎锡山为固守太原，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其保安第12团第2营改编为白家庄要塞第3大队，原第2营营长李凤翥被委任为大队长，副营长蔡贵忠被委任为副大队长。并将改编后的第3大队从山西寿阳调至太原河西白家庄要塞，担任太原守备任务。

在阎军整编中，原保安12团团副王维俊被编余，住在太原西北郊区的新城，但仍佩带白家庄要塞部队的符号。王维俊是山西省寿阳县人。此地抗战时期属解放区，当时，王曾在其家乡解愁村任小学教员，后任中心校长等职，因其违法乱纪问题被查出，王怕受处分，于1946年10月逃离解放区，投奔阎军，曾任审讯员、副支队长、参谋等职，1948年升任保安第12团中校团附。1948年初冬，阎军第76师第3营营长樊英才和士兵陈子清同王维俊一起，来到阳曲县东青善村找到中共太原西北工委第七区区长黄明道，表示愿意起义和为解放军服务。第七区区长黄明道、政委刘良金给王维俊布置了任务，王决心戴罪立功，即参加了工委的内线工作，直接受太原市委第七区区委领导。

王维俊接受为解放军收集情报和策动阎军起义投诚的任务后，及时向解放军提供了阎军每周的口令、临时口令、敌炮楼工事分布、工事内的武器、弹药、兵力配备等情况，并将解放军印制的传单带进太原市内散发。同时，王维俊准备策动他指挥过的部队白家庄要塞第3大队起义，因为这个大队的副大队长蔡贵忠是他的同乡与同学，私人关系很密切。

蔡贵忠所部自1948年9月由寿阳调到白家庄要塞以后，其中一个碉堡离解放军前沿阵地很近，晚上双方都在阵地前喊话。1949年初，蔡贵忠看到晋中已经解放，太原城也将解放，当他不断听到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后，经过思想上的斗争，决定走立功赎罪的活路。

1949年2月，王维俊两次到蔡贵忠家中，在交谈中向蔡说明自己已成为解放军的内线工作人员，并让蔡看了随身带去的解放军司令部的“给阎匪军官书”和“阎匪士兵遣返回家路证”，蔡贵忠明确表示愿意和解放军联系。于是王维俊对蔡传达了黄明道区长的指示：假如蔡能把队伍带过来，我军既往不咎，还安排适当职位；如果眼下不成熟，可为我军提供一些前线阎军的情报。当时掏出一封黄明道写给蔡的亲笔信，信中要蔡绘制太原西山碉堡群图，各碉堡的兵力、武器配备、部队番号等，并交给他三个任务：一是解放军攻打碉堡时，你们在其上级的指使下不能不打枪，但要向高处或不瞄准地乱打；二是如果你们撤进城内，解放军攻城时要进行里应外合；三是如果难以撤退，可先不要走，等待交枪。蔡当即表示要将白家庄的全部军情和作战计划、布防地图派人送到接近第32号碉堡的解放军阵地上，等条件成熟后就办。

3月下旬，蔡贵忠找来与自己非常要好的大队部书记阎在成，说明有关情况，阎表示愿意共同行动。为防止泄密，巩固与阎在成的私人关系，蔡与阎两人拜了结义弟兄。晚上两人一起到了蔡的家中，按照黄明道区长的要求，将白家庄兵力武器配备，碉堡位置，作战计划分别绘制成图，又写了一份情报和一张决心书一并包成小包，找了两个可靠人送到了解放军阵地上。

为能使起义计划顺利进行，蔡贵忠决定让阎在成去试探大队长李凤翥的态度。李表示不反对也不干涉，愿意提供方便。如果直接参加恐怕危险，假如走露了风声出了意外，他可想办法保护蔡和阎。于是蔡贵忠与阎在成便分头和下边各中队一些熟悉的老乡接近交谈，为下一步起义行动做准备。

太原战役进入攻坚阶段后，解放军包围圈日益缩小，阎军想死守太原城，便调回驻在城外的部队。阎军白家庄要塞司令部要随同第3大队撤离西山，准备靠近城防。蔡贵忠对李凤翥说，我们不能进城，这时候不回头还等什么？并决定先到附近的南寒村再说。在此紧急时刻，随同撤离的要塞司令部什么也顾不上而先逃走，第3大队按蔡的意见开进了南寒村，这时李凤翥也正式表示愿意起义。于是，蔡贵忠亲笔写了起义信，派分队长陈玉壁等二人去找解放军联系。

解放军第19兵团第190师第568团得知情况后，立即派第1营第2连去接收起义部队。该连张指导员和蔡贵忠接头商谈后，蔡即命令号兵吹号集合，全大队180余人站好队架起枪。张指导员向起义的全体官兵讲了话，号召大家参战立功。随后，带领起义官兵从桃杏山爬上去，晚上拉到了晋源县城的大庙里住宿了一夜。当晚第568团首长让蔡贵忠画了太原山西省政府的地形图。第二天，蔡贵忠和李凤翥被送到阳泉华北军区大岳教导团集训。起义部队一部分去平遥接受整编训练，一部分去了榆次张庆受训，还有一部分根据其自愿要求开了路条回家。

王维俊在起义前将一切起义事项安排好后就交与蔡贵忠负责办理，由于太原当时还没有解放，王维俊在城内还有其他任务，不便于暴露身份，因此起义时并不在现场。太原解放后，王维俊协助第七区工作人员，在城内外识别溃散隐藏的阎匪军官，先后抓住了几人，还交给黄明道两支缴获的手枪。王维俊为第3大队起义做出了应有贡献。

昆仑号舰起义

1949年4月4日，国民党海军昆仑号舰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策动下，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未成，部分官兵离舰起义。

昆仑号舰原系英国一艘货轮，1948年10月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改装成运输舰，担任军运任务。该舰排水量3000多吨，编制舰员110多人。1948年9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派中共党员陈健藩打入昆仑舰任文书上士，同年12月，又被委任为昆仑舰中尉书记官。

当时，陈健藩领受的任务是“长期埋伏”，以昆仑舰为基础，在国民党海军中“撒豆成兵”。为此，陈健藩介绍昆仑舰舰长沈彝懋的儿子、原初中同学沈勋与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王正结识，不久沈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接着，又争取了舰长沈彝懋、军需上士何礼汶等10余名士兵参加起义。陈健藩的外甥刘用群，也随舰任代理文书上士。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王锡珍对陈健藩布置任务时说：“重庆号起义之后，国民党监视很严。海军军区把没有任务的军舰都抽了油。有的军舰上的策反关系情绪动摇，怕飞机炸，怕军舰追，现在只有昆仑号是运输舰，未被敌人注意，又有自己的同志在上边，所以上级党委决定组织昆仑号起义，给其他兵舰打气。”同时，把派入台湾左营海军军士学校的沈勋召回昆仑舰协助陈健藩组织昆仑舰起义。

4月初，昆仑号舰执行装载上海海军机械学校的师生员工200多人撤往福州的任务，陈健藩、沈勋等准备一开出长江口即起义北上。不料，开航之前舰上临时搭乘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一个陆战队警卫排约40人，随舰南撤浙江。4月3日晚，陈健藩、沈勋分别召集起义士兵和军官会议，宣布第二天开航后起义。

4月4日上午，轮机长和航海官忽然态度改变，他们向舰队提出到福州把人和货卸光后，舰回吴淞口再起义。下午2时，舰开到吴淞口抛锚，几个官员又提出推迟起义的要求。晚8时30分左右，由轮机长出面，约集十几名军官再次强硬地要求陈健藩下次起义，陈虽做了说服工作，但双方一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陈健藩决定马上行动，找来何礼汶布置岗位，又找来钥匙打开武器库。晚10时30分，陈健藩和沈勋带着起义士兵准备去缴警卫排的械。这时有人提醒附近有灯船，应先开船，后缴械，才免得惊动对方。陈健藩立即去叫轮机长发动机器开船，轮机长推说应直接找值班轮机士兵开；而找到值班轮机士兵，又推说要轮机长下命令。陈气得想开枪强行开船，又怕惊动舰上警卫排人员。他回到驾驶台，看到起义士兵的枪支被枪炮官收去了，实在无可奈何。这次已经宣布了的起义，由于情况变化，军官们的动摇而遭失败。

4月4日晚12时，昆仑号舰仍按原命令起锚南驶。4月6日下午4时，到福州马尾罗星塔停泊。陈健藩立即组织全体起义士兵离舰转移，让他们各自先回家乡暂避，随后他也上岸隐蔽下来，直到福州解放。沈彝懋和沈勋父子没离舰隐蔽，4月19日被抓去马尾，后来又被押往台湾，国民党海军当局将他们杀害于高雄左营桃子园刑场。

预干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

1949年4月7日，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训练团团长、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率所属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3000余人，在浙江省嘉兴举行起义。

贾亦斌，湖北省阳新县人，1946年在国民党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习，结业后，由彭位仁推荐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第一组少将组长，著有《论预备干部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一书，深得蒋经国的赏识。1947年，国防部成立预干局，蒋经国任局长，贾任副局长，后任代局长。1948年，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中将找贾商议补充兵员，在江南组建30个新军，以应付战事急需。并决定成立预干总队，要贾负责征召和训练干部。贾接受了此项任务，并草拟计划，报蒋介石批准，预干总队于11月初成立，全队约1000人，贾兼任总队长。此间，贾亦斌目睹国民党的腐朽政权和摇摇欲坠的统治，并受到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策动，曾联络打入国民党政府军务局工作的段伯宇及伞兵总队第3团团长刘农峻等在南京起义，经反复讨论，他们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决定掌握军队，等待时机。

1949年初，国民党国防部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把预干总队迁到嘉兴，扩充为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下设三个总队，嘉兴为第1总队，贾任训练团团团长兼第一总队总队长，下编四个大队。为带领这支队伍待机起义，贾将第一总队各级领导职务都安排自己的老部下，有目的地组织起义骨干。是年三四月间，经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批准，贾亦斌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李正文与其单线联系。以后，贾亦斌根据策反委员会的指示，在张文藻（委员会派往第一总队担任秘书）的协助下，积极开展起义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副总队长林勉新、总队附文承山、祁宗汉、辅导组长刘异、大队长李恺寅、邓道三、兰弼、李仕廉、杨锦枫以及一些中队领导、总队部干部和学员中骨干杨今、胡岳宣、李达祥、张若虚等积极响应，表示愿随贾亦斌行动，通过他们，利用同乡、好友等关系，分别进行单线联系，扩大了骨干力量。

贾亦斌准备起义的工作，被国民党溪口方面察觉，并派出特务在驻地门口附近摆设货摊，侦察贾的言行。3月初，蒋经国电话命贾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贾请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冒险去溪口。12日，贾安全返沪，向李正文、段伯宇汇报溪口之行后，决定在预干总队内部以同乡会、读书会、研究会等形式，把起义骨干和学员组织起来，加强对宁、沪国民党部队和保安旅的策反工作。

4月2日，李正文向贾亦斌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决定预干总队在嘉兴起义，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起义后可用“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的番号进行活动。4日深夜，贾赶回嘉兴召集起义骨干开会，进一步了解组织发动情况，讲明起义的意义，指出近期可能举事，要求分头抓紧做好准备。5日夜，李正文赶回嘉兴，与贾在南湖游艇上研究起义问题。贾汇报了情况，提出抓住时机组织起义。李正文代表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同意贾的行动计划。6日，贾视情况紧急，决定立即起义行动。大队长李恺寅把贾接到西大营。此时，干部学员已拿起武器，整装待发。贾和起义骨干到黎天铎（已被任命为总队长）办公室同其谈判。黎视情况不利，便下令“行军演习两天”，于是西大营两个大队集合起来，东大营多数中队亦带到西大营。贾下令起义部队

迅速离开嘉兴，向天目山方向开进。7日下午5时，部队抵进乌镇，贾亦斌集合部队讲话，正式宣布起义。

起义部队刚离开嘉兴，京沪杭附近的国民党部队和保安团队立即出动，赶到乌镇，包围了起义部队，起义部队进行还击，战斗异常激烈。当日夜，起义部队在贾亦斌组织指挥下，分三路突出包围。9日晨，贾亦斌和李恺寅率领起义部队在双林镇附近会合，决定立即突过京杭国道进入天目山，与中共游击队取得联系。11日黎明，起义部队从吴兴城南平安渡河，当日下午4时许到达妙西山良村。此时，追兵越来越多，起义队伍越来越少。走到安吉附近，贾亦斌和李恺寅换上便衣，走在前面探路，让部队随后跟进。入夜，贾上山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爬，不慎从十来丈高的山崖上滑下，摔得不省人事，破晓才醒过来，在深山里呆了三天，以生竹笋充饥。14日，贾才寻路到达游击区。此次起义，是在国民党心脏地区爆发的，它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当头一棒，震惊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京沪杭总后方。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派李恺寅携贾亦斌的亲笔信，到杭州等地寻找和收容流散的嘉兴起义人员，把他们送去上海市公安部门学习和安排工作。开学那天，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市委书记、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等亲临参加，陈毅还讲了话。结业后都分配了工作，有的参加了青年团，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伞兵第三团起义

1949年4月15日，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第3团官兵2500余人，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从上海经海路南撤福州途中，在团长刘农峻率领下于黄海胜利地举行了起义，到达苏北解放区。

国民党军伞兵1942年建于昆明，始称突击总队，直接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1945年底，突击总队扩编为伞兵总队，3年后又编为空军总部的伞兵司令部，由黄埔7期生张绪滋少将任司令，下辖3个伞兵团和4个直属营，每团官兵2500人。由于该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机动性强，因而深受蒋介石的宠信，被作为一支机动力量使用，视为“掌上明珠”。1948年秋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和华北大部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伞兵第3团从南京调到上海，驻防远郊安亭、三林塘一带，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戒任务。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十分重视对这支部队的争取工作，在该团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团长刘农峻上校，毕业于国民党通信兵学校。1943年，他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段伯宇。1949年初，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李正文，通过段伯宇与刘农峻接上联系。之后发展刘农峻为中共党员。2月派中共党员周其昌到第3团担任刘农峻的联络员，3月上旬，中共上海局党组织得知第3团即将南撤福建去台湾的消息后，决定利用南撤时机，刘农峻以团长的身份，领导该部全体官兵于海上起义，然后前往苏北解放区。

南撤行军序列是：第1梯队为司令部、第1团及部分直属部队；第2梯队为第2团及部分直属部队；第3梯队为第3团和伞兵司令部的军械处。每个梯队出发时间相隔5至7天，预定3月份撤完。本来这个南撤行军序列对起义非常有利，可第1梯队撤离不久，3月20日左右，伞兵司令部突然临时改变南撤行军序列，决定将第3团和军械处并入第2梯队同时南撤。这一突变，打乱了原定起义计划。刘农峻心急如焚，火速找段伯宇商定对策后，决定拖延第3团的南撤时间，争取按原行动序列不变。

中共上海局在刘农峻向司令部力争原定行军计划不便更改的同时，由地下党员、国民党上海军运司令段仲宇（段伯宇的弟弟）向伞兵司令部提出意见，说上海铁路警戒任务是国防部确定的，在汤恩伯没有派部队接防前，伞兵第3团不能撤走为由，迫使伞兵司令部放弃了目前计划，仍按原计划伞兵第3团单独南下。

4月13日，伞兵第3团集结完毕。下午2时左右，国民党军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艇满载着第3团2500多名官兵鸣笛启锚，离开了黄浦码头，驶向吴淞口。为保证起义成功，行前成立了以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其昌、共产党员孟虎为正副队长的纠察队，统一存放了各营、连枪枝弹药，遗留下部分反动军官，架设了临时电台。晚8时许，登陆艇行驶到嵎泗列岛东北部花鸟山岛以东海面上，这里是南下北上的转折点。按预订的起义计划，舰艇应在此转向北上。在此关键时刻，共产党员、伞兵第3团团附兼航行指挥官李贵田，以国防部命令伞兵第3团北上青岛待命为名，命令船长改航北上。刘农峻立即召开全团营以上军官会议，传达所谓国防部令伞兵第3团北上的电报，并宣布转航青岛的命令。散会后刘又到驾驶室指令船长，由于沿线海区有共军活

动，要灯火管制，全速前进。14日下午4时，伞兵第3团经过26小时的海上航行，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地下党支部决定向全团宣布起义的决定。刘农峻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了起义的决定，中共党代表、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分析全国解放的形势，要大家跟上历史的潮流，投入人民怀抱，并宣布共产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消除了部分军官的疑虑。最后，通过了全团连以上军官一致起义的决定。下午6时以后，又接着召开了船员会议，宣布了要求和政策。晚上8时，船只折向西北，朝连云港开去。

4月15日晨8时，登陆艇经过40多个小时的劈波斩浪，满载着伞兵第3团2500多名起义官兵，胜利到达苏北解放区连云港，受到中共新海连市特委和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5月18日，毛泽东、朱德给伞兵第3团发了慰勉电。同年6月，经过整训的伞兵第3团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伞兵训练总队，成为我军第一支伞兵部队，为后来创建共和国的伞兵部队作出了贡献。

第七十一师太原起义

1949年4月20日，在太原战役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第71师2000余官兵在战场起义，为保护城北工业区和解放太原做出了贡献。

1948年10月，太原战役帷幕拉开后，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部考虑到城北一带工业集中，为使这一工业区减少损失或免遭战火破坏，决定分化瓦解敌人，策动驻防太原城北的阎锡山部第71师举行起义。太原前线指挥部敌工部长刘玉衡、科长赵世枢等人，召集在晋中战役中被解放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赵承绶、沈瑞和曹近谦等，一起研究如何策动第71师起义问题。

第71师驻守太原城北马坡、陈家窑、郭家窑一线。控制着由太原通往忻县、大同的唯一通道。如能打开这一通道，就能像一把钢刀从背后刺向阎锡山的巢穴太原城。第71师属阎部第33军统辖，师长韩春生、副师长张忠、参谋长卫立功。该师下辖第211团（团长尤世定、副团长李景春），212团（团长冯文亮），213团（团长齐国勋）。沈瑞、曹近谦和韩春生，尤世定等人在33军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又是山西应县同乡，策反工作容易下手。于是解放军第18兵团敌工部派在晋中战役中被俘获的原71师少尉军需董董品，身带赵承绶、沈瑞和曹近谦等6人签名给韩春生的信到太原。

韩春生从信中内容看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太原不久就要解放，劝他不要再为阎锡山卖命，望他策动阵前起义，为人民立功，当他正思考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接到调他任第34军副军长的命令。紧接着师团军官大变动，原副师长张忠升任师长，211团团团长尤世定升任副师长等。韩春生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失去信任。促使他认真考虑起义之事。他也已看到国民党的天下大势已去，不如听从老上级的话，弃暗投明举行阵前起义。

韩下定起义决心后，便以有病为名住进医院，利用机会进行发动工作。11月9日，韩派卫士把尤世定、冯文亮找来，开诚公布地说，太原城破是个早晚问题，咱们不能再给阎锡山当牺牲品了，官兵们跟咱们多年，咱们要对得起他们，要给他们留条活路。尤、冯二人表示，“一切听从师长的，你叫我们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共同分析了第71师的情况后，商定首先要串通所属部队官兵，沟通思想，争取行动统一。并派人同城外解放军敌工部门联系；同时对新任师长张忠和213团及各级政工人员封锁消息严格保守秘密。尤、冯回部队后，逐级做发动工作。

12月初，韩春生觉得起义工作基本成熟，便派跟随他多年胆大心细并当过沈瑞军长副官的赵喜才到解放军驻地，通过赵承绶等人和解放军敌工部门联系，表示要马上起义，请派部队接应。解放军第18兵团敌工部很快复信让赵喜才带回。信中说：对他们起义表示欢迎，但暂不要行动。“我们有个总的行动计划，你们将来让出阵地，为我军开辟通道，扫除障碍也就行了，你们只要带过两个团来，保证你们原建制不动。”在此期间，韩春生又曾4次派赵喜才与解放军敌工部门联系，解放军方面的刘玉衡、赵世枢、沈瑞、曹近谦等人与尤世定、冯文亮、李景春等人多次在两军阵地之间的山沟里会面，共商起义事宜。

1949年4月19日下午，接到解放军敌工部门通知信，要他们在当晚12时派人到阵前司土窑村开会。于是71师在城外的几个人商定，由冯文亮团长去参加会议，尤世定、卫立功带信马上回城。晚10时许，将信送到韩春生手中，韩与尤等人决定赶快出城去掌握部队，准备指挥起义。

冯文亮开会回来后，马上通知 211 团副团长李景春会面，研究了当夜撤出阵地，由解放军第 20 兵团部队接防的问题。冯、李二人各向本团下达命令，以换防名义，将第 211 团、212 团的 4 个营 2000 余人，按指定时间与路线，撤出防御阵地，开到阳曲湾。并派出参谋人员给解放军第 20 兵团部队当向导，使解放军一枪未放，迅速占领了正面 30 余里宽的阵地。并将驻马坡村的第 71 师师部包围，活捉了师长张忠。第 71 师部队在阵前起义宣告成功。

根据事先安排，第 71 师起义官兵连夜开赴忻县田村休整。军官去教导大队学习，士兵愿回家者发给路费，愿当解放军者补入第 20 兵团部队。4 月 24 日解放军攻入城内，敌工部长刘玉衡见到韩春生、尤世定、卫立功、孟壁等人后，对他们率部起义功绩给予了赞扬。

国民党阎锡山部第 71 师官兵在战场起义，使解放军很快占领并通过第 71 师阵地，直插太原城，使阎军城北防线很快瓦解，有效地保护了城北钢铁厂、发电厂、兵工厂、飞机场、铁路等重要工业设施，为最后解放太原创造了条件。

剪子湾要塞起义

1949年4月20日,太原战役中阎军剪子湾要塞司令梁象恒上校率部500余人举行起义。

剪子湾要塞位于太原东山脚下,是阎军在太原城外最后一道防线。其范围东至剪子湾仓库,西抵太原东城墙,北达东北城角,南到大东门。阎军在这一带构筑了碉堡群,共43个碉堡。司令梁象恒率领要塞司令部500余人担负守碉任务。太原外围作战开始后,解放军华北第1兵团及配属的兄弟部队,迅猛突破阎军太原东山的第一、二道防线,使太原城外围据点包括剪子湾要塞,完全暴露在解放军强大的火力面前。这时,潜伏在要塞中的梁象蒙,感到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策动其兄梁象恒起义。梁象蒙于1947年受太行军区社会部北线情报站的派遣,以谋生为名投奔当时任营长的梁象恒,在梁部当了传令兵。当梁象蒙说明了他的真实身份之后,梁象恒大力震惊,不知所措。梁象蒙趁机开导他说:“你冷静想一下,东北已全部解放,北平也已和平解放,华北就留下太原这个钉子了,解放军不拔掉它能行吗?把你这全部人马牺牲了,也无济于事,你好好考虑一下吧。”梁象恒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说:“战争形势我已经看明白了,但我是个军人,按照军人的本分,应该是不成功便成仁,我不能落一个投降别人的名声。”梁象蒙进一步劝导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不是从前的改朝换代。你看傅作义,职位比你高,权力比你大,他们今天为何起义,不是很明白的吗?你应当赶紧弃暗投明,率全团投奔解放军才是上策。”梁象恒听后心有所动,但仍顾虑解放军如何处置他,梁象蒙又宣传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劝他放心。这样,才坚定了梁象恒的起义决心。

剪子湾要塞副司令狄毓庭中校也已认识到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愿再为阎锡山卖命了。梁象恒让梁象蒙把对自己讲的内容给狄毓庭谈后,狄当即表示同意起义;随后又征求了第2营营长谢德汉和第5连连长段昌德的意见,大家最后商定,由梁象蒙带谢德汉和段昌德于当天夜晚到东山找解放军联系。双方商定,梁象恒带部队东撤,解放军派两个连在剪子湾接应,其碉堡由解放军部队进入。

1949年4月20日凌晨3点多钟,梁象恒让狄毓庭告诉要塞司令部参谋任宗奎,以有作战任务为名下命令,拂晓前,部队携带全部武器、弹药集中到赛马场以西指挥碉附近。梁象恒、梁象蒙等带领部队,分路由交通壕东进,约半个多小时后顺利到达预定地点。当天中午,剪子湾要塞司令部部分勤杂士兵,由打入要塞的共产党员敌工人员中尉军需宁大率领下也起义归来,前后起义共500余人。

解放军接收部队对梁象恒、狄毓庭率部起义表示热情欢迎,并同几个主要起义军官进行了座谈。梁、狄等又提供了阎军在太原东城防御的薄弱部位及炮兵群阵地的部署情况。当天,解放军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

江阴要塞起义

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在吴铭、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率领下，于江苏省江阴附近举行反蒋战场起义。

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为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并为渡江作战做好准备，中共华中工委决定把江阴要塞列为策反工作的重点，同时指定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宋学武、科长江华和唐君照，对唐秉琳（江阴要塞上校参谋处长）、唐秉煜（国民党国防部三厅分管要塞业务）和吴广文（国民党国防部一厅上校参谋）进行全面考察，条件成熟时可吸收他们入党。同年11月，管文蔚代表党组织正式批准他们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三位地下党员开始投入争取上层的工作。首先支持戴戎光就任要塞司令，因其与唐君照是同学，其弟是共产党员，支持其上任对地下党开展工作十分有利。其次在司令身边安插人员，吴广文放弃国民党国防部安逸的工作，征得戴同意后，当上了要塞守备总队队长；吴的同学和至友王德容辞去陆军总部军械处副处长，当上了要塞参谋长；唐秉煜当了“挂名”的工兵营长，仍在国民党国防部任职，充当上层“耳目”。1948年11月，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华中工委指示，加强中间力量的争取工作，把重点引向基层。炮兵总台观察员孟怀高是唐秉煜在黄埔军校的同学，经多次接触和谈心，使其坚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并担任了第一大台台长。第二大台台长邱作霖以及毛介平，在地下党做了工作后表示“听从调遣”。地下党通过吴广文之父吴兆山利用师徒关系做守备第三大队副曹炳山的工作，将其争取过来。至此，第一大台长孟怀高、第三中台长毛介平、第二中台长丁佩基、第六中台长吴仲琪、第二大台长傅仲山、工兵营副营长龙浒、通讯连副连长李容有等一大批中间力量皆归心于地下党组织，为江阴要塞适时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军政要员纷纷向广州撤退，准备逃往台湾。唐秉煜乘“国防部”南逃之际，获得了国民党长江防务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并于农历年初二黄昏过江到达新港，即日赶至盐城，见到了唐君照，受到中共工委书记陈丕显、司令员管文蔚的接见，当面呈报了“要图”，接受了指令。3月，唐返回江阴要塞，向地下党传达了华中工委和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领导的指示和决定：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由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直接掌握，以利于整个渡江作战。三野粟裕副司令员派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科长王微明到华中工委，协助做好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接见了王微明，并指出要塞地下党的任务是在30公里防区内控制三到四个渡口，迎接渡江部队登陆。为充实党的领导力量，确保控制要害部门，王微明和吴铭提议由第10兵团派干部打入要塞内部。第10兵团领导同意从第29军选拔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和王刚，并由吴铭带领先后化装过江到了江阴。在同地下党的同志研究后，把李干安插在唐秉琳身边当“卫士”，王刚到特务连当兵。

4月，王微明正欲赴江阴检查起义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接到叶飞司令员来信，说明人民解放军渡江行动推迟到20日以后，告吴铭并要求不要心急，不要松懈。18日，王到达江阴，19日同唐秉琳、唐秉煜等人见面时，获知发生了两个情况：一是游击炮团的阵地被第21军接管，二是守备总队队

长吴广文被免职。在此紧急情况下，王当机立断，作出如下部署：由陆德荣、徐以逊潜伏江边，接应渡江先头部队登陆；找回吴广文，协助刚任命的李云葵控制守备总队，唐秉琳、李干负责控制炮台；王刚和李容有控制对内对外通讯联系；王微明以团长王德容“卫士”身份担任内部联络。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国共和谈宣告破裂。当晚，人民解放军炮击江阴对岸的八圩港守军桥头阵地。国民党第21军第145师参谋长电告要塞炮台台长唐秉琳“炮火支援”。唐即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减缩400米火力实施射击。结果，12发急速射，炮弹全部落到国民党军第145师阵地上，师长气得破口大骂，可唐却说：“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

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对全军指战员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20日晚及21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开始了举世震惊的渡江战役。22时零时刚过，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即在长山北麓悄然登陆，很快控制了长江渡口。与此同时，徐以逊在肖山登陆点同渡江先头部队接头，夺取肖山。当戴戎光发现解放军渡江时，即令唐秉琳开炮射击。唐用电话命令第二中台长丁佩基“执行佯动射击计划”，一发发不卸保险、不装引信的炮弹，开始了漫无目标的射击。戴戎光十分恼火，当他找不到贴身卫士，打电话又不通时，顿觉事态严重，即走进指挥所，不知所措。人民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向纵深发展。王微明通知唐秉琳立即掉转所有炮口，向国民党第21军阵地射击。唐秉琳立即作了部署，并由吴铭找到唐秉煜和李干，率领已挑选的一个班的兵力，用两挺机枪封锁了指挥所的进出口。唐秉琳控制外边局势，吴铭、李干提枪冲进了指挥所。面对枪口，戴戎光惊恐未定，把手枪和子弹袋交给了唐秉煜，像一滩烂泥似的倒在地上。

晨7时，江阴要塞召开全体官兵大会，宣布起义，正式由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接管。会后，由唐秉琳、王德容、李云葵、吴广文署名发出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通电。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派唐君照到江阴要塞进行整编工作，将要塞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阴要塞。此次起义，打开了国民党军长江下游防线的重大缺口，使渡江部队切断了京沪线。

南京“两台”起义

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空军南京大校场机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简称“两台”)20余人,在中共南京市委策反委员会的领导与策动下,在江苏省南京举行起义。

1949年初,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撤逃广州,在南京成立一个临时指挥所,以继续实施对前线作战的指挥。该所所需人员和器材,以国民党空军431电台和南京大校场机场指挥塔台为基础,由正在迁台的空军406通信大队负责抽调组配。中共南京市策反委员会空军组张荣甫组长,指示中央地下党员罗贤朴通过同学关系打入431电台担任了代理台长,3月,又将隐蔽在国民党空军406通信大队中的中共党员、少尉机要员李基厚调入了431电台。与此同时,还在电台和塔台中积极活动,先后争取了20多名积极分子,并发展了电台的少尉报务员傅秉一为中共党员。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从江阴至湖口突破了长江天险,国民党守军仓皇南逃。国民党空军令“两台”人员在22日最后一批从空中撤逃,并专门调配了一架C—46型飞机。罗贤朴、李基厚等根据中共南京地下组织的部署,当即决定策动“两台”起义。21日晚,罗贤朴组织积极分子,把一些日本产的旧机子和旧器材装箱,贴上了431电台的标签,一箱一箱运到停机坪,以此迷惑国民党空军上司。22日晨,罗贤朴召集了“两台”人员会议,动员大家不要跟国民党走,弃暗投明,回到人民怀抱。由于平时加强了策反宣传工作,当即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然后,罗宣布了分批潜出大门,到光华门外石门坎16号等地集中的行动方案。随即又组织人员把电台、塔台以及所有机器的重要部件和真空管卸下,装上一辆中吉普,开张假证明运出大门。中午10时左右,“两台”全部停止工作,致使机场通讯联络中断,国民党当局被迫终止空中撤逃计划。混乱中,罗贤朴带领“两台”的起义人员,携带全套密码本撤出机场,隐蔽到达指定地点,并向张荣甫汇报了起义经过。当日下午5时左右,在国民党当局逃离南京后,罗贤朴带领廖松健、徐佩新、王鹏等人返回机场,进行巡逻警卫,保护器材和航油。

4月23日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机场。罗贤朴向解放军报告了国民党空军将于25日空袭机场的计划,并率领起义人员与解放军一起将机场40多部电台、2万多桶汽油及许多器材、弹药抢运疏散到中山陵一带,并伪装了跑道,使后来国民党飞机轰炸时免遭损失和破坏。罗贤朴1950年被华东空军授予“护场模范”的光荣称号。“两台”起义人员大多数参加了人民空军工作。

海防第二舰队起义

1949年4月23日，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争取，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的30艘舰艇、1271名官兵，由少将司令林遵率领，毅然脱离国民党统治阵营，在南京笆斗山江面举行起义。

海防第2舰队成立于1947年，原担负长江口以南至广东沿海的海防任务。1948年二三月间调进长江，担负江苏江阴以上至江西湖口以下长达500余公里的江防任务，企图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该舰队司令林遵，早期参加过爱国进步组织“新海军社”，1937年任国民党政府驻德国海军联络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主动要求回国作战。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美国任驻美大使馆海军副武官。1946年调任国民党海军驻美接舰指挥官，奉命率领8艘军舰回国。1948年1月，林调任海防第2舰队司令，1949年二三月份奉命率舰队进入长江。

林遵对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上腐败无能，组织上排除异己，早就不满和愤慨。特别是看到自己率领接回祖国的艘艘军舰，被调到黄海、渤海打内战，他气愤地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因此，他看出唯有投向共产党，才是光明正道。1948秋，中共中央社会部指示中共上海党组织，要争取林遵率舰起义。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受任务后，派共产党员林亨元找到国民党海军杂志《中国海军》月刊社社长郭寿生，要他去动员林遵。郭寿生是林遵的同乡好友，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一直在设法找党。林亨元对郭说：“我是中共党员，今天奉组织的命令来跟你谈话，周恩来同志叫你归队。”郭寿生接受任务后，马上从上海赶往第2舰队司令部所在地镇江，以游览名胜金山寺为掩护，郭向林遵传达了中共中央希望他率领舰队起义的意见。彷徨苦闷之中的林遵，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甚为高兴，当即表示应允，并指派舰队总轮机长阙晓钟担任联络，着手进行起义准备。

1949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选派第29军第85师政委孙克骥和华中（即苏北）指挥部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杨进，作为陈毅司令员的代表，两次化妆渡江前往镇江，准备协助林遵组织起义。林遵仍由阙晓钟等联络，与之保持联系。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还派吴平、曹一飞潜回上海，与阙晓钟联系，林遵安排二人专门去江北给“三野”递送军事情报。此外，中共上海地下工作人员何友恪通过第2舰队参谋组长欧阳晋，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已有联系的国民党海军少将署长曾国晨通过永绥舰舰长邵仑，对林遵都做了争取工作。

林遵积极进行起义准备。首先选配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军官到身边当助手，借沿江巡视部队的机会争取广大官兵参加起义；同时，还以缩短战线为由，请准将第2舰队的舰艇由长江各渡口撤防集中到安庆、芜湖、南京、镇江几个大港口，为解放军渡江留下空隙。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率部分政府官员慌忙于23日逃往广州，命令所有部队撤向沪杭浙赣一线。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召正在芜湖奉命支援作战的林遵回到南京，令其立即率领第2舰队东下到上海，并封官许愿说：“只要你一人能带一艘军舰到上海，我马上保荐你升任海军中将副总司令，

授你‘青天白日勋章’。”同时，也以轰炸威胁林遵：“着你率队于23日傍晚驶离南京。江阴炮台已于21日易手，已命空军轰炸，并派空军掩护你们下驶。你们务必于23日夜间驶离此地，以免空军发生误会。”对于桂永清的引诱威胁，林遵不屑一顾，在返舰途中，感到起义的时机已到。

4月23日清晨，林遵回到南京以东的笆斗山锚地，立即在“永嘉”舰上召开了舰长和艇队长会议。他向大家介绍目前舰队的处境时指出，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于21日晚向共产党投靠，东下之路已被切断。如果执意沿江东撤上海，不但水道狭窄，而且岸上人民解放军的许多炮台、要塞，都将对舰艇造成重大威胁，后果不堪设想。他提议就地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经过大半天的激烈争论，最后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留下与撤走的问题，参加投票的16名舰长中8票赞成、2票反对、6票空白。下午3时半左右，林遵当即宣布海防第2舰队集体留下起义，让开江防，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

当日傍晚，以“永嘉”为首的7艘舰背信弃义，执意逃走。其中“永绩”、“兴安”两舰在镇江附近受人民解放军炮击，“永绩”舰搁浅，“兴安”舰沉没，均被解放军俘虏。晚10时许，林遵令副官王熙华和参谋戴熙愉冒着危险乘艇前往江北浦口与解放军联系，当夜人民解放军第35军联络部副部长张普生一同与其返回笆斗山。24日凌晨，张普生在“惠安”舰上同林遵司令和各舰长、艇队长见了面，代表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首长欢迎和接受第2舰队起义。25日下午，林遵进南京城内受到第35军军政领导的接见。27日上午，第2舰队起义留下的30艘舰艇、官兵，1271人集中到南京下关海军码头，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的检阅，然后分散疏泊。国民党军从26日起，不断派轰炸机对起义舰艇进行猛烈轰炸，相继有6艘军舰被炸沉，6名官兵被炸牺牲。

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起义，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国民党海军集群起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第2舰队的起义，加速了渡江战役的胜利，为南京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久，起义完好的舰艇列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制序列，起义官兵都投入了人民海军的建设工作。

第三机动艇队起义

1949年4月23日拂晓，正当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之际，国民党海军第3机动艇队23艘艇只、300余名官兵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动下，于江苏镇江举行起义。

第3机动艇队前身属国民党海军第2炮艇队，原驻防苏北兴化。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当局为了封锁长江，固守江南，将艇队调至南京草鞋峡驻防。不久，该艇队又调至镇江，负责镇江到江阴的长江防务。该艇队辖25吨级的炮艇10艘、登陆艇10艘、巡逻艇4艘，官兵300余人。由于艇只机动性好，是江河湖泊中巡防作战的重要力量。

中共地下党组织对第3机动艇队进行了积极的策动工作。中共苏北第1分区公安局长江直属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姚世雄，争取了第104号炮艇中士轮机长杨岳（原名杨春生），通过杨又发展第318号登陆艇的信号兵程健培，之后杨还秘密串联了李斌、毛东海、彭西航、杨孝惠等人；中共苏南行政公署地下党组织派工作人员林士毅，争取了第3机动艇队中尉军医彭楚材，彭又发展了译电员陈叔辛、第1号炮艇艇长陈永奎等人；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毛世昌争取第318号登陆艇艇长朱铭尧，朱又串联了第313号登陆艇艇长陈秉枢、第314号登陆艇艇长梁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第3机动艇队准尉副官苏子庆早有联系，1949年4月上旬，苏与彭楚材公开身分，共同行动。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布置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开展工作，保护艇只，组织起义。

1949年4月22日下午，人民解放军东线渡江部队逼近镇江。艇队部下达紧急备航命令，要全艇队撤离镇江，开往上海。杨岳等起义人员借口机器损坏、长江航道标灯不亮等理由，迟滞撤离行动。译电员陈叔辛根据彭楚材、苏子庆的指示，将国民党海军总部电令“急命撤退”改译成“待命撤退”。最后，只有第67号炮艇从内河逃走。第3机动艇队查良煦队长、朱叔豪副队长，得不到南京最新电令，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晚上11时左右，召开了参谋、分队长以上人员紧急会议。会后，朱叔豪慌慌张张地向大家宣布：“立即破坏所有艇只装备、全体人员带上轻武器到镇江火车站集合，坐火车去上海报到”。说完他带几个随从向火车站奔去。查良煦也夹着皮包偷偷逃往火车站。

当正、副艇队长逃走后，起义人员正式推举苏子庆、彭楚材为总负责人。23日凌晨左右，起义正式开始。彭楚材见有的艇长临时躲起来了，找不着，马上急中生智提出“谁能保护炮艇，谁就当艇长”。杨岳自告奋勇和程健培、彭西航、苏子庆等人驾驶第104号炮艇，冲破江面的迷雾，向江北方向驶去。大家正担心炮艇过江可能会遭国民党焦山炮台开炮拦击，想不到这时炮台的王副官带着20多名士兵赶来，要求同海军艇队一起行动。第104号炮艇胜利抵达江北六圩，受到人民解放军苏北守备第7旅吴光明旅长的欢迎，当即决定他亲自率领1个连兵力过江，接收起义的艇队。

23日清晨6时许，镇江码头第3机动艇队官兵一片欢腾，高呼“第104艇回来了！解放军来了！”吴旅长向起义官兵致意，赞扬了大家的革命行动。当天清晨，国民党联勤总部后勤署的8艘运输艇、船及其人员，也随同第3机动艇队起义。接着，遵照吴旅长的指示，第1号、第104号炮艇和第313号、第317号、第318号登陆艇以及联勤总部的艇、船等，投入了接运解放

军大部队渡江的任务。

第3机动艇队的起义，加快了解放军渡江的进程，镇江市和平地得了解放。不久，起义的官兵到镇江市谏壁镇华东海军学校短期学习后，编入华东海防第1纵队。

大同国民党军和平改编

1949年5月1日，国民党军大同守军1万余人在于镇河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使大同得到和平解放。

大同地处山西省北端，位于平绥线与同蒲铁路交汇处，交通便利，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辛亥革命后一直为阎锡山把持，抗战胜利后，大同是阎的嫡系部队于镇河部驻守。于镇河是国民党军第15兵团副总司令兼大同守备总指挥。曾在阎锡山部队中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等职。他在大同主要依靠田尚志的暂编第38师3个团等正规军1.2万余人。还有国民党大同行署主任孟祥祉网罗的地方武装势力约4000余人，总计达1.7万余兵力。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时，国民党大同守军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加强特务统治，企图依据一座土城负隅顽抗。

1948年12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张家口后，晋绥军区和华北军区部队从东西两面直逼大同，拉开了解放大同的序幕。纪亭榭旅部署在大同的东面和北面；姚喆率领的晋绥部队部署在大同城西的云岗方向；雁北军分区司令员赖富率领的独立第1团、2团分别部署在南面和西面；绥蒙骑兵部署在丰镇、集宁一线。其战略意图是：将大同国民党守军围困起来，待主力兵团到达后，协同歼灭之；如敌向绥远方向突围逃窜，立即堵截歼灭。同时采取了长围久困和政治争取的方针，兵临城下、围而不打，加速国民党军军心的动摇瓦解，争取能和平解放大同。

华北军区派遣敌工部科长叶修直，带领工作组来到大同东面聚乐堡村，在北岳军区大同前线指挥部和中共大同市委领导下，展开对敌军的争取工作。各部队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向城内守军宣传全国形势，宣传共产党解放军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宽大政策，并印制宣传品贴进城内墙上。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造成城内严重缺粮，使大同城内人心惶惶，人心思变，人民盼解放。

人民解放军大同前线指挥部经过分析，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于镇河、田尚志身上，争取他们转变态度，使极端反动者孟祥祉孤掌难鸣。1949年1月下旬，解放军华北第1兵团敌工部派遣被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第33军中将军长沈瑞、少将参谋长张西柱、隰县专员孙海丞、第19军副参谋长李又唐、第80师副师长秦炯等人，来到大同驾遇皂村，利用老同事、老部下等昔日交情，或写信，或进城面谈。沈瑞给他的老部下田尚志写信，劝其投诚或起义，和平解决大同问题。

从田尚志那里得知，影响于镇河、孟祥祉行动的主要顾虑是，怕清算他们的历史罪恶帐，不相信共产党解放军既往不咎的政策。孟祥祉残杀过中共雁北敌工部副部长舒宏等14名共产党员。于镇河有三怕：一怕和解放军作战多年，共产党不会轻易饶恕他；二怕他在浑源县家乡残害过20余人，群众让他偿还血债；三怕内部复杂，部队不听他的指挥，反以投敌变节名义加害于他。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解放军在派人去信中，明确表示只要他们放下武器，既往不咎，共产党人说话算数。

这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北平有两名原国民党人刘仪亭和王达三自告奋勇，愿前往大同劝说于镇河、孟祥祉起义投诚。刘仪亭是雁北怀仁县人，曾任应县匪首乔日成的秘书长；王达三是大同市人，曾任雁北朔县专员。他们请求在解放大同问题上立功赎罪。通过关系转告给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

子和。戎子和经请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同意后，商定了三个条件：第一是大同和平起义后，国民党军队人员和行政人员可以依照北平方式由共产党选择录用；第二是保证起义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第三是保证居住自由等。3月中旬，由在北平上学的于镇河长子于润沧和孟祥祉的兄弟孟祥祚同刘仪亭、王达三一块去大同。戎子和把写给于镇河、孟祥祉的信让4人转交给他们。信中说：现在长江以北除个别地方外已全部解放，大同已是一座孤城，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包围之中，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应看清形势，效法北平傅作义先生，举行大同和平起义。经过一系列工作，于镇河对共产党政策信多于疑了，想放下武器。而孟祥祉却不着急，想再观察一下。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24日，太原解放。人民解放军华北第3兵团从太原挥师北上，前来解放大同。原包围大同的各部队也迅速向大同集结。解放军大兵压境，大同守敌更加惊慌。于镇河电告戎子和，愿意放下武器，走和平解放大同的道路。人民解放军大同前线指挥部同意于镇河关于双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4月25日，田尚志和副师长王元令骑马出城和解放军进行两天连续谈判。4月27日，孟祥祉、田尚志及于镇河的参谋长陈津喜等出城进行了第三次谈判。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中共大同市委书记兼雁北军分区政委赵汉等向他们严正指出，大同守敌迟迟不放下武器，拖延时间，企图顽抗，解放军已做到了仁至义尽，如再不投降，必将被彻底歼灭！并要敌军总指挥于镇河亲自出城谈判。29日，于镇河等人出城进行了第四次谈判。解放军察哈尔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等领导人根据华北军区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大同守军全体人员应一律就地待命，不许遣散，放下武器出城改编，同时表示，共产党一定履行自己的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一贯政策。于镇河等表示回去立即向全城宣布双方拟订的关于和平解放大同的条款，并保证执行。

5月1日，于镇河遵奉解放军的命令，率部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入解放军验收地点，放下武器经清点后即出城外接受改编。接受和平改编的军队有：田尚志的暂编第38师，于镇河的指挥部，保安第2团、7团、11团、13团、报警大队、教导总队、坦克车队及田尚志系统之第883团、S84团、885团，雁北支队、师直属队、特务连、山炮营，军医院等共10000余人。

由于孟、于、田等人罪恶累累，许多受害人纷纷向人民政府控告他们的罪行，但他们在大同的和平解放中有功，因此，解放军经过向群众进行解释和教育，取得了群众的谅解。为保证3人的安全，派人把他们送到张家口。后来，于镇河担任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孟祥祉因本性不改，潜往绥远，图谋组织叛乱，被解放军抓获枪决。

永兴号舰起义失败

1949年5月1日，国民党海军护卫舰永兴号舰受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策动，在长江下游江苏省太仓县白苑沙江面举行起义。

永兴号舰是1946年7月从美国接收回国的“八舰”之一，该舰排水量900吨，舰员编制110人，装有3英寸高平两用炮1门，40毫米炮3门，20毫米机关炮6门，航速每小时15海里。该舰10月曾由林遵、姚汝钰率领，偕同太平、中建、中业3舰，前往中国南海西沙、南沙群岛驻防，即以永兴岛“永兴”二字命名。

1948年底，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地下工作人员林城、何友烙动员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旗舰长治号舰副舰长郭成森组织起义。郭接收任务后，在长治舰上难以下手，转而动员在青岛海军官校当教官时熟识的学生伺机起义。1949年春，郭成森在上海姐姐家中召集聚会，永兴舰航海官陈万邦等人出席。郭向与会人员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启发大家审时度势，顺应形势，投到共产党方面来。大家同意郭成森的看法，尤其陈万邦、王熙华最为积极、活跃。回去后立即分头进行起义准备。

王熙华回去后参与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的起义。陈万邦在永兴舰上联络了书记官、医官等人，其中有枪炮中士，轮机下士，电讯手和枪炮兵，研究了具体分工：陈万邦负责航海、轮机下士负责轮机，枪炮中士负责舱面。

1949年4月底，永兴舰奉命从上海吴淞口沿长江上行去江阴一带巡逻警戒。5月1日凌晨，永兴舰航行至江苏省太仓县浏河口外白茆沙时，陈万邦认为时机已到，突然发动起义。枪炮中士将轻武器分发给起义骨干，多余的武器锁进枪房。起义人员很快控制了指挥台、驾驶室、电讯室、前后轮机舱，并将其他官兵集中到舰尾舱临时拘禁起来，派起义人员持枪看守。军舰依旧照常航行。

这时，航海官和书记官在指挥台上用手枪胁迫舰长陆维源用广播向全舰宣布“永兴舰起义”。但顽固反动的陆维源却对广播破口大骂，反对起义。航海官开枪击毙陆维源。可是，接着轮机下士又发生动摇，欺骗杀死枪炮中士，打开了枪房，武装了反对起义分子，杀害了舰尾舱看守士兵，放出被拘禁的官兵。很快敌对分子控制了全舰内舱，并由舰尾舱口钻到后甲板上，迅速占领了舰尾的后炮，砍掉炮位护架档板，压低射角，用后机关炮疯狂地向指挥台扫射。起义领导人之中医官当场牺牲，书记官受伤，航海官陈万邦负伤后被迫跳入江中，想泅水过江，被反动分子用冲锋枪扫死。他牺牲前还在水里高喊：“你们杀死不了全中国人民！”

参加起义的几个电讯兵仍坚守在电讯室里，进行英勇斗争。舰被开回上海黄浦江后，海军当局调来警察局的警车，施放毒气将电讯室里的人们全部薰死。至此，这起准备充分的起义遂告失败。国民党海军当局还从陈万邦的日记中找线索，逮捕了永宁舰航海官吴伟荣、永泰舰航海官邓国法，将2人杀害于上海龙华。

指1946年林遵率队从美国接收的太平、太康、水兴、永顺、永宁、水泰、永胜、永定8艘军舰。

雷达研究所起义

1949年5月3日，国民党国防部第6厅雷达研究所南撤至杭州后，在中共南京、杭州地下组织的策动下，该所100余人在浙江杭州起义，并带回大批雷达器材。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国防部第6厅分别在台湾和南京设立了“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接收及修理日、美军留下的雷达。1947年底，两所在南京合并。1948年九十月间，该所改编为“雷达研究所”，全所共120余人，国民党任命物理学博士葛正权中将为所长、任命军统特务叶彦世为副所长。它集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日两国在远东的雷达，技术装备比较先进。

雷达研究所改编前，就成为中共南京市委争取起义的对象。1948年3月，市委地下党员吕东明授意进步青年、浙江大学毕业生张叶明，利用关系打入该所，并与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施雅凤取得联系，一同做雷达研究所起义的争取工作。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南京老巢岌岌可危，不少机关纷纷撤逃。12月，国防部命令雷达研究所撤迁台湾。张叶明根据中共南京市委提出的“团结中青年技术人员，防止国民党破坏，保护器材，阻止南逃”的指示，同该所进步科技人员程嘉钩等人，在青年技术人员中宣传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利用该所大部分人员留恋乡土情绪，采取拖延办法拒绝撤台。具有爱国心的葛正权所长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有意拖延迁台工作。后来，为应付国民党的撤台命令，防止抗命不动遭致镇压与破坏，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张叶明和程嘉钩直接向施雅凤汇报了先撤到杭州滞留下来的主张。施代表地下党组织同意这一作法。

12月底，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后，张叶明即与中共杭州地下组织的谷超豪取得联系。这时，国民党国防部仍频繁督促继续南撤，并允拨3万银元作为撤迁费，指明由宁波的银行支付，该所未去领取。1949年4月，国防部第6厅厅长钱昌祚亲赴杭督迁，但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该所又无南迁之意，只好作罢。然而，副所长叶彦世仍策划南逃，他说即使逃不走，也要把车子开过钱塘江，好向上面交代，他的企图遭到反对，终未得逞。中共杭州市委根据解放战争胜利发展，为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提出了开展护厂、护校运动。张叶明、范复礼、程嘉钩通过所里进步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员，做好护所工作。他们提出了“只要这个所存在，大家就有饭吃”、“保护好机器设备，我们就有工做”等为广大员工所接受的口号，从而团结了大家，防止了逃散。并且，成立了护所队，把仓库加固，器材装箱造册，取出仓库枪支，进行巡逻警戒。另外，还动员葛正权所长把公款购买的黄金、银元拿出来，去附近郊区购回粮食，发给大家，安定人心。

5月3日，杭州解放了。雷达研究所120余人除个别人员逃走外，绝大部分留了下来。该所全部雷达、器材、物资、车辆都没有遭受破坏，当日人民解放军接收了该所，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10月，雷达研究所仍然迁回南京。参加起义的许多同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雷达兵的早期创建工作。

第一—— 师义乌起义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军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升将军率部8000余人在浙江省义乌举行起义。

廖运升，安徽省凤台县人，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后，参加过反蒋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党军营长、团长、师长等职。1948年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以后，战争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广招兵员，又启用廖运升。廖亦乘机重拉队伍，掌握兵权，待机投向人民。是年6月底，廖运升担任了暂编第1纵队副司令。1949年1月中旬，暂编第1纵队改编为暂编第1师，廖任师长，4月上旬，暂1师又改编为第110师，廖仍任师长。廖的堂兄弟廖运周于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即密令驻阜阳特务组组长刘惠生查明廖运升与廖运周及时任国民党衢州编练处副司令的廖运泽他们之间的联系，并监视其行动。廖运升与廖运周、廖运泽为三个堂兄弟。他们的父辈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反蒋等战役。廖运周于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是长期隐藏在国民党军内部的中共党员。廖运泽于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是中共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后脱党，长期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由于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毅然辞去骑2军军长之职，挂着国民党国防部部员的空头衔。据此，廖运升感到再跟蒋介石走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决心弃暗投明。他一面派人找廖运周联系，一面派张明诚去淮北游击区找共产党组织。恰在此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联络部派往淮南、寿县、正阳关一带搞策反工作的朱怀明，通过廖运升的好友常持青与其见面，共商起义的时机问题。

1949年1月，国民党国防部令廖运升部开赴南陵、泾县一带驻防。中共中央华东局芜湖地下工作组组长方向明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转告廖担任适当时机起义，以防被蒋介石军队吃掉，并告之与皖浙地区中共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络的方法。4月1日，第110师奉汤恩伯之令开往浙江临安，担负徽杭线防务；中旬，又奉命经杭州、萧山开往义乌归建第85军。其间国民党芜湖第15“绥靖”区副司令廖运泽专程来杭与其商议起义，并拟与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联合行动。由于联系中断，未能成功。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陈赓司令员见到廖运周，当谈到他与廖运泽是黄埔第1期同学，仍有联系时，嘱其再给廖运升写信并派人去做工作。廖运周派该师敌工科长杨振海前去，并亲笔写了“希望早日响应南下大军，及时起义”的密函。4月25日，杨振海在萧山正赶上向义乌开拔的第110师。廖运升见信后，即将杨秘密接到萧山，下决心在义乌率部起义。

5月2日，第110师到达义乌。此时，第85军军长吴求剑派高参李英伯向廖运升传达了吴的命令，要第110师将家属全部运往福建。廖明白吴是企图以家属作人质，牵着第110师为蒋介石卖命。于是以无钱、无粮、需作准备等理由为借口，坚持不让家属上车，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下午，国民党第9兵团司令李延年急电，令第110师迅速开往金华，归他指挥。廖感到事态严重，经与杨振海研究，决定立即行动。当晚，廖在义乌召开各团团长及高参赵继武等6人秘密会议。廖开门见山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只有起义，才有出路。廖的话刚讲完，与会的第330团团团长张普庆立即响应，其他人员亦表示拥护起义。会后即派随军记者胡明理去浙江游击区，寻找游击支队司令季洪业与之联系。胡进入游击区后，季洪业派区长吴逊和为代表与

胡会谈，达成四条协议：1. 起义部队可以拉进山里，即义乌以西的黄宅地区；2. 随时相互交换情报；3. 有情况协同作战；4. 起义部队的给养由当地政府供应。吴向季报告后，派出4名向导，随胡返回廖部。

3日凌晨，国民党飞机在义乌上空盘旋，义乌四周皆是国民党军。为此，廖认为义乌不是久留之地，遂决定入暮后即将部队拉进义乌西北黄宅一带山区。当晚，廖指定由高参赵继武负责指挥部队，在游击队向导的带领下，向山区进发，并令张普庆派部队砍电线、扒铁路，并包围收缴了当地专署一个自卫大队的武器。4日凌晨，在杨振海的建议下，廖运升在黄宅召开全师官兵大会，并宣布“我们决定起义了，投向人民解放军，走光明大道”。会后发了通电。几天后，第110师3个团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第12军三个师，其师直属队亦编入第12军直属队。从此，原国民党第110师全体起义官兵，跨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29日，第110师起义的团以上干部调南京参加学习，结束后大多数安排了工作。廖运升先后担任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局长、南京市民革主委、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江苏省委员会常委、民革中央候补委员等职，1981年病逝。

第四十军新乡和平改编

1949年5月5日，驻守河南省新乡的国民党军第40军1.6万余人，在副军长李辰熙的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使新乡和平解放。

国民党第40军，原系冯玉祥部第14军，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为第40军，庞炳勋任军长，驻扎在察哈尔省。1938年2月，庞炳勋升任第3军团长兼第40军军长，不久又升任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马法五担任第40军军长。1945年10月，马法五升任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1946年2月，第40军改编为整编第40师，李振清任师长，下辖第39和第106旅，驻守新乡、南阳一带。1948年10月，整编第40师又改为第40军，李振清任军长，李辰熙任副军长，下辖第106、第39师和两个独立团，继续驻守新乡。

新乡是一个有近10万人口的城市，位于平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处，地理位置特殊，是豫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国民党在华北的重要据点，一直派重兵把守。当时，这里除驻有国民党第40军外，还有装备美制大口径新式火炮的国民党国防部炮兵一部和其它土杂武装。城市外围构筑了大量钢筋混凝土工事，无数明碉暗堡，战壕纵横交错，并配置了强大的火力，防御体系非常坚固。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郑州、开封先后解放，新乡国民党守军的退路被切断，处境岌岌可危。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14纵队在太行和冀鲁豫地方武装的配合协同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歼灭了新乡外围的一股股残敌，解放了新乡外围的所有城镇，形成了对新乡国民党守军的四面包围，新乡之敌成了瓮中之鳖。

在军事围困过程中，中共晋冀鲁豫地区各局、委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针对新乡国民党军和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矛盾，抓住时机，采取各种手段，对国民党守军和其它各界人士，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多层次的分化瓦解，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中共地方组织和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国民党第40军第316团团团长庞庆振于1949年1月25日，在道口镇率领部下2500余人举行起义。接着，河南省保安第3团团团长王国然带领700余人在封丘起义；第40军补训第2团3名营长也率部起义。同时，新乡城内不少政界要员、商界富户以及其他各界头面人物，也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纷纷靠向共产党，主动派人与中共组织和解放军联系，提供情况，表示愿意为解放新乡出力。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第40军的内部更加动摇、混乱，官兵思乡厌战情绪蔓延，逃兵一天天增多，部队士气低沉。这时，国民党第40军军长李振清以治伤为名，乘飞机逃往武汉，把烂摊子丢给副军长李辰熙收拾。

1949年2月开始，解放军就和平解放新乡问题多次与第40军交涉谈判，但是，由于第40军李辰熙等首领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仍抱有幻想，加上自以为强大，对谈判没有诚意，谈判一直无结果。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第13兵团第47军接受了南下途中解放新乡的任务。军首长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新乡的情况，确定对新乡守军实行“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第47军炮兵团副团长冉影，是国民党第40军副军长李辰熙的表弟。军里决定派冉影前往新乡做劝降工作。4月中旬，冉影与军部侦察科长李希才一起前往新乡，在华北第14纵队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通过关

系与第40军取得了联系,李辰熙派副官将冉影和扮作警卫员的李希才接进城里。与李辰熙相见后,冉影直截了当地告诉李辰熙说:“我这次来见你,不是个人访问,而是带有任务来的。我们第47军南下是来解放新乡,我来这里,是为了避免流血,给你们指条出路。”接着,冉影认真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新乡守军只有接受改编才是出路。首次谈话,李辰熙没有明确表态,但口气不硬,态度也不坏。冉影和李希才经研究,决定加紧做好李辰熙的工作。在此后的几次谈话中,针对李辰熙犹豫不决的思想,冉影以坚定的口气反复向他指明,“第40军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接受和平改编”,并对李辰熙和部下所担心的诸如改编后能否保持原有地位?不愿留下的能否回乡?家眷如何安置?私人财产能否留下等等,按照解放军的政策一一作了解释,渐渐消除了他的担心和疑虑。

就在冉影、李希才对李辰熙紧张地进行劝降工作时,人民解放军第47军于4月下旬陆续抵达新乡外围,对新乡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包围和进攻态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解放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第40军的李辰熙等上层人物失去了精神上的重要支柱,在冉影的一再指点和敦促下,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和前途,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走光明之路。5月2日,李辰熙派副军长赵天兴出城,与解放军接洽,请求和平改编。

根据国民党第40军的意愿和解放军的有关政策,5月3日,解放军第47军草拟了《关于处理新乡国民党守军的协定》,并定于5月5日在新乡城北解放军第47军军部驻地陈堡镇举行“协定”签字仪式。

5月5日早晨,李辰熙把新乡各界代表人物召集到一起,陈述了第40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和无路可退”的困境,宣布走和平解决的道路,并要求大家跟他一起到陈堡镇参加和谈签字仪式。李辰熙一行到陈堡镇后,看了“协定”内容,对所列条款皆表示同意,接着,双方代表在“协定”上签了字。当天下午,李辰熙回城后即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接受和平改编的决定。随后,有关接受和平改编的精神迅速传达到全体士兵。入夜,城内的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试图制造暴乱,扰乱军心民心,被李辰熙制止。

5月6日,解放军进驻新乡城,从7日开始,国民党第40军等守军共1万6千5百余名官兵接受了和平改编,其中军官2176名,士兵14374名。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接受改编的人员编为独立师,柴世烈任师长,李毅任政治委员。李辰熙等上层军官,有的休息养病,有的到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其他排以上军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志愿,有的参加解放军,有的则发给《新乡和平解放证明书》和3个月的薪饷后,回返原籍。

新乡的和平解放,使双方避免了流血牺牲,保护了城市设施建设和人民群众利益,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5月6日,解放军第42军歼灭了国民党安阳守军,解放了安阳,至此,国民党留在华北的两个据点被拔除,实现了华北全境解放,华北、华东、中原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

第二 师温州起义

1949年5月7日，国民党陆军第200师师长叶芳将军率部约3000人在浙江省温州举行反蒋起义。

叶芳，浙江省永嘉人，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日本投降后，叶芳在国民党军第5军邱清泉部任过挺进纵队司令、骑兵团长等职。1948年7月豫东战役后，邱清泉回到温州，在温州成立第5军新兵征兵处，派叶芳等一批温州籍军官到温州招兵买马。叶芳目睹国民党内部的明争暗斗，考虑个人前途，深感彷徨痛苦。叶此次奉命去温州招兵途经上海时，专程拜望了温州同乡胡公冕，并住在胡家中。胡曾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随周恩来创建黄埔军校，曾任政治大队长，参加过东征、北伐。“四、一二”后，胡回浙江家乡组织农民暴动，担任红13军军长。后受周恩来委托，在上海搞秘密统战和策反工作。当叶向胡试探寻找出路时，胡鼓励叶为家乡、为人民多做好事。叶表示愿意弃暗投明，为共产党出力。胡当即要叶乘此良机，扩充实力，掌握部队，伺机起义。

1948年9月，叶芳被委任为浙南“绥靖”区少将指挥官，同年12月又经浙江省主席陈仪推荐，兼任第五区（温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叶根据胡公冕的意见，挑选愿意同自己合作的人担任专署各部门的领导，分掌军、政、商、文等大权。特别注意抓军队，征募新兵，编成新兵团，任命族侄叶圣尘为团长，将区保安司令部所属独立大队扩充为保安独立团，派结拜兄弟吴昭征兼团政工室主任，派亲信林毅任第3营营长，他争取永嘉县各自卫中队，编成3个大队，组建永嘉自卫团，由结拜弟兄罗道南任团长。先后组建的这些部队，成了第200师的基础。

1949年初，浙江省主席陈仪因准备起义泄密被逮捕，新任省主席周晷以有人控告叶芳“通匪”而将其免职。此后，叶找到国民党第5军军长熊笑三、第70军军长高吉人，要求委以职务。熊、高考虑到第200师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而叶芳说他有3个团，正可补充该师，即电请国民党国防部委任叶芳为第5军第200师师长。4月初，叶以原新兵征募处为基础组成师部，新兵团编为第600团，保安团编为第599团，自卫团编为第598团。王思本任师政治部主任、金天然任主任秘书，叶圣尘、林毅、罗道南、卓力文、吴昭征、徐勉分别在各团任职。

在此之前，胡公冕已将叶芳的情况向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吴克坚作了汇报。吴表示同意派人联系，开展工作。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叶请上海地下党代表能早日抵温领导起义。由于交通不便，上海地下党派的代表逾期未到。叶感到起义行动已逐渐为外界察觉，形势紧迫，急于与地下党联系，即派卓力文通过民主人士陈达人及退伍将领张千里牵线，向浙南地委、游击纵队表示要弃暗投明，反正起义。浙南游击纵队领导立即指派第2支队政委曾绍文和吴文达两人与叶芳的代表卓力文在巨溪岙底会晤。通过接洽，对有关起义中的主要问题协商了原则意见，还商定由吴文达、卓力文作为各自的联络员到对方工作，以便及时联系。

4月中旬，国民党联勤总部派东南号轮船，装运一个师的被装和两个步兵团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由沪驶往福州。中央社会部上海地下党获悉后即密告叶芳。当船途经温州时，叶芳当机立断，下令扣留，将部分武器装备新兵团及其他部队。这一行动，表明了叶芳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决裂和

率部起义的决心。

4月30日，浙南游击纵队为配合解放军渡江南进，由纵队副司令员郑丹甫率部于当日到达周岙，立即通知叶芳派代表谈判。叶派出王思本、卓力文、金天然、吴昭征四人为代表，于5月1日秘密到陈达人家中，天黑后至谈判地点郭溪山上的景德寺。浙江游击纵队派出政治部主任胡景斌和曾绍文、郑梅欣、程美兴四人为全权代表。经过反复倾谈，双方签订了《关于叶芳将军率部反正起义的协定》、《具体任务与作战步骤以及联络办法》。主要内容是：起义部队改编为浙南游击纵队之一部，原有官兵一律原职任用，享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物资待遇；起义部队必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绝对接受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的指挥，并决定5月6日夜为叶芳部队起义、浙南游击纵队进入温州城的时间。5月4日，双方代表再次会晤谈判。叶部代表带来了叶芳同意2日协议内容的意见。经商定，签订了几条具体协议，主要是浙南游击纵队于6日进驻温州城。

5月6日下午，叶芳在营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说，为了保护地方安全，免遭破坏，已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签订了起义协定，和平解放温州。接着，叶芳发布起义命令：当晚8时全城戒严，各部集中在驻地，严守纪律，严密封锁港口，保护物资，维护正常生产和社会秩序。当日晚，浙南游击纵队按协议接防莲花心、翠微山、松台山等制高点，兵分三路进入市区。7日晨，温州全城解放。叶芳将军率部起义成功，被任命为浙南游击纵队第二副司令员，第599团改编为第7支队，第600团改编为第8支队，第598团系永嘉自卫团改编，该团建制撤销。

粤东起义

1949年5月14日，国民党广东爱国将领、爱国人士吴奇伟、李洁之、曾天节、肖文、魏鉴贤、魏汉新、蓝举初、张苏奎在广东省联名发表起义宣言。曾天节的省保安第13团、蓝举初的保安独立第1营、魏汉新的保安第12团、李洁之的第9行政区专署等部8000余人，于14日至17日先后在龙川老隆、蕉岭、梅县、兴宁等地举行起义。

此次起义，主要靠曾天节、魏鉴贤奔走串联。曾天节系广东五华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失去联系。魏鉴贤系广东五华人，大革命时期与曾有过联系，后长期在旧4军任职。抗战胜利后，魏随国民党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到湖南。1946年魏退休在家，与中共湖南地下党有联系。1948年春，曾天节任保13团团团长，让魏设法与中共广东地下组织联系，争取早日率部起义。10月，魏在广州将曾的决心告诉了广州绥署中将高参肖文，并通过肖的朋友翁向东介绍，于11月赴香港会见中共香港分局统战组组长饶彩凤。魏向饶转达了曾的决心，并表示无条件接受中共的领导。1949年3月初，曾偕魏到达香港，会见了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统战组长饶彩凤。方方对曾准备率部起义表示欢迎，并指出起义时机选在解放军接近广东时为宜，同时策动保12团一起行动。曾、魏谈到争取吴奇伟作为此次起义的领衔人，方方表示同意。

曾天节、魏鉴贤返回广州后，向肖文传达了中共华南分局的指示，并作了分工：曾、魏、肖一起劝说吴奇伟；然后曾回龙川老隆组织保13团起义，同时联系李洁之；魏赴梅县策动保12团；肖负责联系闽西专员李汉冲。吴奇伟系广东大埔人，北伐时任第4军团参谋长、团长、师长、军长，1937年“八一三”爆发后，吴奉命率第4军赴上海抗战；抗战胜利后，任湖南省主席，徐州绥署、广州绥署副主任等职；1949年3月，在曾、魏、肖的劝说下，毅然决心与大家一起行动，领衔发表起义宣言。国民党广东省第9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早年任孙中山先生的侍卫长，在旧4军任过营长、独立旅旅长、虎门要塞司令、第4战区兵站中将总监；他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感到失望，于1947年5日离职到汕头市开办中国渔业公司；1949年2月，中共华南分局统战组副组长谭大度在香港会见了李，鼓励他在国民党政府中抓一部分实力，迎接解放军南下解放广东。李通过广州绥署参谋长梁世骥谋得梅州专区专员一职；赴任前，再次赴香港会见中共华南分局饶彩凤、黄声，并约定黄于5月20日前后赶到兴宁，协助起义。4月9日，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约见李，作了四点指示，起义时间安排在大军压境时行动，并指定地下党员陈汉欣（李的侄婿）随李到兴宁协助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5月3日下午，曾天节、魏鉴贤、李洁之、保12团代表魏正明、保独立第1营代表李昌庆、兴宁县县长陈郁萍、解放军边纵部队驻保13团联络员刘云在兴宁秘密开会，通过了《我们的宣言》。5月4日，广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薛岳电令保13团归保5师建制，速开往东莞石龙广九线驻防。曾天节从综合情报中证实，敌已得知保13团准备起义的意图，随即召开有刘勉、张增培、团副谢永珍、军需主任余甫君和边纵联络员刘云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了起义的作战方针。根据会议精神，保13团于10日改编完附近武装自卫队，并于当日分批向老隆推进。11日晚，粤赣湘边纵队第2支队林镜秋、梁钧到兰口保13团团部，协助领导起义。13

日，第2支队与保13团会师于距老隆10公里的莲塘。晚上，严尚民召开阵前会议，确定采取围点打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围攻老隆保4师师部，阻击敌援兵。至此，保13团在第2支队的协助下，完成了起义作战部署。

14日凌晨，保13团与第2支队会集于老隆车站附近，迅速包围保1师师部。第2支队司令员郑群指挥保13团搜索连占领乌石坝阵地，准备伏击增援老隆之敌；保13团第1营担任监视河源方向来犯之敌；第3营、突击大队、学兵连为预备队。中午12时，保13团发起攻击，用火药猛烈轰击老隆寨顶保4师师部。此时，保4师副师长兼保5团团团长刘应佳率该团两个营千余人从和平沿东江直下增援。下午15时率部到达乌石坝时，被保13团搜索连拦腰截击，将该敌切成两段。此时，第2支队队长路沙带珠江队增援，激战4小时，将敌两个营打垮。老隆被围之敌于15日晨举白旗投降。围攻老隆的起义部队毙敌百余人，俘保4师副师长彭健龙以下官兵500余人。至此，保13团起义战斗初战告捷，龙川县老隆宣告解放。老隆战斗打响后，保13团发表了吴奇伟、曾天节、李浩之、肖文、魏鉴贤、魏汉新、蓝举初、张苏奎8人联名的起义宣言和保13团全体官兵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旋即复电嘉勉。

5月6日，魏鉴贤回到松口，将兴宁集会的情况告诉了保12团团团长魏汉新。7日，魏鉴贤带魏鉴巨前往阴那坑会见边纵党代表陈明，介绍了兴宁集会和魏汉新、保12团的情况，继续商讨协助保12团起义的问题。9日，中共粤东地委策反小组陈柏麟与松口武工队长梁世群、原独立第1营连长张爱群同保独立第1营连长李昌庆在桃培坑会晤。10日晚，陈通过李昌庆在神庙约见并劝说保独立第1营营长蓝举初，坚定了其率部起义的决心。11日凌晨，陈在蓝、李的陪同下前往松口保12团。当日上午八时，陈、魏鉴贤同魏汉新见面，希望魏汉新及早下决心率部起义。魏汉新仍犹豫不决，而独立第1营表现坚决。12日，陈向蓝谈了希望保独立第1营领先起义的意见，蓝当即写了起义书面指令交给李昌庆。14日上午，驻蕉岭的保独立第1营，在闽粤赣边纵队第1支队第2团、杭武蕉梅独7大队和蕉岭武工队的协助下开赴蕉岭县城，中午占领国民党蕉岭县政府等机关，该县解放。

在魏鉴贤的动员下，魏汉新于16日率部开往梅县。17日，魏鉴贤、魏汉新在梅县县长张君燮和民主人士杨凡的协助下，以召开“梅县各界反共勘乱大会”为名，召集梅县各机关团体数百人宣布起义。在保12团的军事压力下，该县城内国民党驻军均放下武器投诚。驻守该县城郊的两个保安营600余人，经梅县县长张君燮和闽粤边区“剿匪”指挥部高参张光前做工作，也放下武器听候改编。梅县县城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5月17日，李洁之在兴宁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宣布第9行政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8日上午，魏汉新率一个营由梅县到达兴宁接应。李当即以专员李洁之、县长陈郁萍名义发布兴宁和平解放布告，率领专保公署机关和兴宁县政府机关人员及广东省保安独立第9营、专保公署直属连、兴宁县保安营1100人举行起义。与此同时，五华县保安营长、警察局长钟凯在保4师第10团第1营营长张润进劝说下于17日晨一起签署了起义布告，宣布参加粤东起义，五华县城和平解放。26日，平远县保安营2连连长卓明辉经营长魏清同意率2连和营独立排百余人县城起义。30日，魏清率30余人到达兴宁参加起义。至此，粤东起义行动胜利结束。粤东起义打乱了白崇禧、余汉谋的粤桂联防计划，加速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整个华南地区的进程。

6月21日，起义各单位收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粤东起义部队嘉勉电，遵照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各起义部队相继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黄石起义

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军第126军第305师第915团团长沙郭坚、第913团团长沙马祥雅率本部5个营2000余人，在湖北省汉口附近的黄石港地区举行起义。

1949年2月，第305师由安徽省地方保安团队组编而成，下辖3个团：第913团由保安第8团组成，第915团由保安第10团组成，另有第914团。该师组编后隶属于白崇禧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所属张湘泽的第126军。是月，新组编的第305师奉命开赴湖北省黄石港地区整编；第913团驻铁山，团长马祥雅；第914团驻江北兰溪；第915团驻黄石港，团长郭坚；师部驻石灰窑，师长郭鉴淮，副师长朱慈辉。

郭坚系广西桂林军校第6期毕业生，曾任阜阳县县长，1947年任安徽保安第10团团长沙，驻防凤台、正阳关地区。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由合肥迁往安庆，保10团亦随迁至此。在合肥时，郭坚通过省参议会参与中共安徽地下党组织有过间接联系。保10团从安庆调到黄石港后改编为第126军第305师第915团。省参议员陶若存从安庆给郭坚的电报中称有事我军长沙张湘泽。一次，张湘泽由安徽到黄石港，郭坚单独找张长谈，由于文不对题，话不投机，漫无边际地谈到半夜，最后，张湘泽表示：江南“可保无虞”。郭坚没有敢提起义的事。没过几天，张湘泽的妻子王帅信带领副官处长肖洁全传达白崇禧的命令：将第126军的眷属全部集中到武昌，然后运往柳州。郭坚获悉后，立即让军医张葆钧以看病为名，将全团家属送到家乡躲藏起来。

5月上旬，第305师师长郭鉴淮下令，扣留江边所有机帆船只，将江北船员全部扣留在兰溪。郭坚据此认为，时局已经到了人民解放军要过江的时候了。此时，郭坚自感第915团单独起义，力量单薄，遂决定找第913团团长沙马祥雅密谈。马当即同意和郭坚配合行动。郭坚立即在亲信中进行工作，对把握不大的副团长任德卿给半年薪俸50块银元，让其送家属回湖南；将全团政工人员进行大换班；对外省籍军官加以控制。11日，驻兰溪的第914团已同解放军交火，要求增援。郭坚让第914团立即撤回江南。12日，郭鉴淮师长命令第915团炸船，堵实港口，并掩护第914团向湖南撤退。不久，师工兵连连长沙带1排工兵协助炸船。郭坚立即令运输连连长沙缴了工兵的枪，押到团部，同时集合全团军官，宣布“调转枪口，赶走广西军，迎接解放军，消灭反动派，走向光明”。郭坚宣布起义后，派团附王宾洪将副团长陈桂升等10名外省籍军官全部解除武装，看管起来，并由王宾洪代理副团长。同时，部队向石灰窑师部、大冶县军部和桂系韦介伯师放出警戒。

13日下午，军长沙张湘泽未带武器一人乘车赶到第915团团部。张到郭房间后，顺手关上门说：“在芜湖时已和陶若存、王贯之等人谈过，也和共产党谈过，我们打算起义，但要全军聚齐后一致行动”。郭问在什么地方，张答到湖南。郭说：军长沙要起义，现在就带我们走。张说，要服从命令，把部队带到湖南，你的安全我负责。此时，起义部队的军官在门外大喊“军长沙要于就别走了，不干就请离开！”张湘泽立即离开团部。郭坚命令部队让张军长沙出警戒线。不久师警卫连、教导队由黄石港开来，被第915团阻击，尔后向部队喊话：“安徽人不打安徽人！”不少士兵纷纷投诚过来。第915团乘势控制了石灰窑。14日晨，马祥雅率两个营起义，另一个营被郭鉴淮拉走

了。上午，郭坚派连长张伯英、搜索排长张永豪等3人带上郭坚的亲笔信过江我解放军联系起义。

14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3军第128师第383团抵达黄石港对岸小渔村，团长孙干卿、侦察股长杜士德率侦察员正向老乡宣传政策，寻找渡江船只。当晚，第383团第2营将张伯英等2人带到团部。孙立即向正在团部视察工作的第43军军长洪学智作了报告。洪学智接见了他们，当即派第383团通讯参谋张志诚带1名通讯员随张伯英等过江。当夜过江后，郭坚在团部会见了张志诚，宣布第915、第913团5个营2000余人起义，并告诉起义部队正对军部师部实行警戒。随后一起到礼堂会见了起义官兵，接着又会见了第913团团团长马祥雅及营长。半夜，郭坚请马祥雅随同张志诚一起乘小舟回江北。在第43军前指，洪学智军长、赖传珠政委、黄一干参谋长、孙干卿团长会见了郭坚、马祥雅团长。洪学智欢迎郭坚、马祥雅率部起义，并要求尽快组织船只，按应解放军过江。此时，郭坚已派部队将黄石港的一只小火轮和上百只民船驶出港外。

15日凌晨3时，郭坚随第一批船只到达江北。第128师第382、第383团陆续乘这批船过江控制了黄石港。第328团直奔大冶，国民党军第126军已弃城向湖南逃窜。第913团的家眷由刘长钺副营长护送江北后，受到热情的接待。16日，第43军副军长杨国夫看望了郭坚、马祥雅。17日，副政委张池明、参谋长黄一增也看望了他们。郭坚当即请示看押的10名外省籍军官如何处理，回答是：愿意干革命的留下，不愿意的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不久，起义部队由第43军联络部长李由带往江北蕲春进行改编。

金口起义

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张轸，率第128军3个师、第127军1个师共2.5万多人，在湖北省武昌以南的金口、贺胜桥一带举行起义。

张轸青年时代就学于保定军官学校，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总教官。北伐战争时期，张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6团团长，该部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骨干作用，连战皆捷，张升任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张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升任第13军军长。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张与人民解放军作战，连战皆输。中原战局急剧变化，张逐渐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开始考虑改弦更张，另寻出路。

1947年底至1948年初，中共中原局城工部开封工委对争取张轸起义的可能性作了研究分析，认为张早年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属国民党左派，目前正处于徘徊苦恼寻找出路之际，是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时机。于是决定由工委常委、宣传部长方敬之负责在张轸周围寻找争取工作线索。方先后通过张轸的女婿张尹人、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徐开敏（张第三夫人）等人对张轸作了许多工作，1948年9月，张奉命赴开封，就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此时，辽沈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克锦州，生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60军军长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放下武器。张轸认为是表态的时候了，于是将省政府迁至信阳，尔后秘密到上海，同老朋友李世璋（原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8师党代表）谈了起义的打算，并委托其通过中共华东局直接报告毛泽东主席，请求对他的行动作指示。张回信阳后，利用省政府主席和绥靖区司令官的名义，收编地方团队，壮大势力。到1949年1月止，张已编成10个绥保旅4万余人。在此期间，张把起义的打算告诉了原任南京国防部少将部员、现已投奔其属下的辛少亭。

但是，张轸的主要助手朱其平、范绍尧反对起义。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后台是苏联，国民党的后台是美国。美国比苏联强大，一旦美苏交战，美国必胜。但人民战争形势的发展，与朱、范的愿望相反。淮海战役的胜利，形势的变化，使张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其间，李世璋派人到信阳，向张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回复。张约方敬之见面，表达起义的决心。不久，周恩来通过民主党派人士周士观与罗震的关系，催促张轸起义。与此同时，陈赓兵团亦通过廖运周派遣共产党员桑玉生等人到其部队开展下层争取工作，促张走光明之路。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55万大军被歼灭。此时，信阳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为争取张轸，方敬之再度前往与其晤谈。张派张尹人作为代表前往中共中原局商谈。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会见了张尹人，对张轸将军起义的地点和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张尹人在开封还拜见了张轸的几位老友，著名民主人士嵇文甫、王毅斋等，他们都希望张轸“早日过来”。23日，在张尹人的陪同下，中原军区政治部联络处处长陈协一到达信阳，与张轸见面，向其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此时，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张笑平已打入张轸部队，搜集情报，开展宣传和联络工作。张轸阅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后，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坚定了起义信心。

2月底，张轸奉命率部从信阳撤退，集结在湖北孝感祁家湾火车站南北一带。3月，张部全部渡过长江，执行武昌至嘉鱼之间的江防任务。4月初，

张报请白崇禧批准，成立第 19 兵团，张为司令官，赵子立、朱其平为副司令官，下辖 2 个军，赵子立兼任第 127 军军长，辛少亭任第 128 军军长，两军各辖 3 个师，另加独立师，共 7 个师，兵团部设在贺胜桥车站。其间，张轸两次去长沙，同程潜密商。程对其在武昌起义表示支持。白崇禧对张起义早有所闻。经鲁道源告密，并由赵子立证实，张正在进行起义准备。于是，白命令南撤的桂系第 7 军在贺胜桥以北停下来，同时以“点验”为名，监视第 128 军的行动。张轸、辛少亭对此决定将计就计，借机将张玉龙师和张伟烈师调到马鞍山内，以便起义时向金口集中。4 月 20 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 日解放南京。张轸立即召集辛少亭、涂建堂、鲍汝澧、张玉龙、张伟烈等商议，决定就地起义。在金口接应解放军渡江，截断白的退路，迎接武汉解放。起义计划由地下工作人员赵子平送往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四野先遣兵团表示同意，要赵携带密码和电台呼号速返金口。但由于情况变化，起义计划未能实现。此时，张轸心急如焚，立即同辛少亭、涂建堂、鲍汝澧、张了旦等人商定，为了打乱白的撤退计划，将涂建堂的第 309 师从土地堂调往贺胜桥以东的湖泗桥一带，东西夹击南逃的鲁道源第 58 军，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武汉，张尹人将计划送往江北解放区。江汉军区同意，张轸的起义方案，约定张兵团起义时代号为“55555”部队，撤掉国民党帽徽，左臂缠上白毛巾。

14 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以东的团风至武穴一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此时，白从广州飞往武昌，要张轸到总司令部开会。张到武汉后白先拿出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电报给张看：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反，请将师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张看完电报，方如梦初醒。白即要张在他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军师长，要他们来开会。张借口办事处有直通电话，去一趟就回来。白同意张快去快回。张逃出总司令部，坐上吉普车直奔金口，立即用电话通知辛少亭、张继烈、张玉龙等到金口共商大计。参加会议的军师长们听了张脱险经过后，都无比愤慨，决心脱离国民党统治集团，投向人民。15 日拂晓，张玉龙、张伟烈 2 个师与桂系第 7 军的 2 个团在马鞍山一带发生激战。辛少亭指挥部队阻击第 7 军的 1 个师以及国民党湖北省保安旅约 2 个团向金口的进攻。此时，张兰平、张尹人从江汉军区赶回。张听完汇报，立即向部队发出“55555”代号的起义通令，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16 日下午，人民解放军四野先遣兵团解放汉口。17 日解放武昌。20 日，张轸发表起义通电。21 日，张轸受到人民解放军第 12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和副政委唐天际的热烈欢迎。

不久，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给张转发了贺电。5 月下旬，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复张轸部队改编问题”的电报。6 月初，起义部队开到汉川，在人民解放军第 12 兵团的协助下，进行了全面整编。8 月 1 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张轸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1 军，张轸任军长，杨春圃任政治委员。张轸将军率部起义，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统治政权，打击了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势力，加速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苏南的进程。从此，张轸同全军将士一道，前进在解放祖国大陆和保卫、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光明大道上。

张权起义未成被杀害

曾任国民党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联勤总部视察员的张权中将接受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委派，任上海市起义军司令，决定于1949年5月16日率部起义。后因被国民党军第132师中校参谋科长出卖，张将军被捕入狱，于21日在南京光荣就义，起义未获成功。

张权，1899年9月生于河北省武强县，1917年考入河北省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攻读炮科，1923年回国后，在孙传芳部任职，1925年投奔程潜，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9师副师长、师长，其间受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影响很深。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张权积极赞成讨蒋主张。1929年10月，张任第46师上校参谋处长。此时，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慕书田受中共地下党委派打入陈部，与张来往甚密。1932年，慕书田策动第46师一些军官投奔红军，并让张长期隐蔽。1933年6月，张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研究委员兼机关炮训练班主任。抗战爆发后，张任国民党第一战区河南战地警卫副司令，坚持抗日游击战，1938年，张受令组建炮兵第51团，后又组建了8个炮兵团，任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是中国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创始人。1941年3月，张晋升为中将总队长，辖8个摩托化团。1944年，张率战车总队驻四川。周恩来通过张治中介绍中共党员王亚文任张的上校秘书，从此张经常与周恩来、董必武接触，阅读了不少马列著作。以后，张向王亚文提出入党的要求。董必武让王亚文告诉张，共产党是了解你的，不入党的作用比入了党更大。张愉快地服从了决定。1945年抗战结束后，张被调往重庆陆军大学学习，1946年12月结业后被分配到国防部当部员。张在任部员期间，目睹国民党上层分子高官厚禄，中饱私囊，腐败无能，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全面内战爆发后，他曾面蒋直谏，希望停止内战。后来，张对王亚文说，蒋介石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内战是一定要打到底的。

1947年3月，王亚文从长沙调到上海，由中共中央上海局统战部部长沙文汉领导，陈约珥作党的联系人，开展对国民党的策反工作。这期间，张权经常往返南京与上海，与王亚文保持联系，接受了策动国民党起义，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的任务。1948年底，张权携带家眷来到上海，利用公谊私情，向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郭忏、副总司令张秉钧申请组织检查团获准，并以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身份，到前线检查军需补给调度等后勤保障工作。张权到济南后，仔细观察了解前线各地的兵力配备、武器装备等情况，接着又到徐州、南京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然后将获得的军事情报迅速送给王亚文，转送解放军领导机关。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张权接受了解长江沿线国民党军事部署的任务，以“视察”为名，从芜湖乘车沿江堤西行，亲临江防前沿了解情况，从整体部署到各个据点，甚至各种炮位的数量、位置、方位都一清二楚，然后将获得的情报综合分析，绘制成国民党军《长江沿线布防图》。图中标明了防线的薄弱地带，并建议解放军先头部队可先从安徽采石矶出击，渡江后可在当涂、铜陵、繁昌一带突破，然后集中兵力挥师东下，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这份珍贵的“布防图”绘好后，立即转送解放军领导机关。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国民党在上海集结了9个军、24个师、6个交警总队，加上特种兵，共约23万人，构筑了各种坚固的防御工事，碉堡、地雷、电网、

壕沟星罗棋布，妄图决一死战。此时，张权受党的委托，在驻上海的国民党军队中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准备武装起义。张权在京沪国民党军队中的策反对象有：暂编第1纵队少将司令李锡祐、第51军军长王秉钺、第182师师长王挽危、青年军第230师师长方懋楷、摩托化团钟勉、炮兵第51团团团长刘仲权、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机械化炮兵团，还有吴淞炮兵司令部邵百昌。张权利用各种机会与他们讲形势，谈出路，促使他们参加起义。张权力策反国民党军所做的工作，赢得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高度赞赏。

不久，沙文汉传达了党组织的起义计划，并任命张权为上海市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郑振华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经过一番艰苦工作，起义准备工作就绪。党组织决定：第一，起义时间定为5月16日上午10时，司令部设在吉祥路121号，以四川北路底施高塔大楼为基地。第二，第51团刘仲权的部队，沿西体育会路向蕴藻浜、张华浜打出去迎接解放军入城，卡住吴淞口；当解放军进攻浦东时，驻该地方懋楷师即竖起白旗，让出缺口，让解放军长驱直入；第51军王秉钺军和驻市区的钟勉机械化团及时响应，配合出击；李锡祐控制的第132军进行接应。各部队所需枪支弹药均由张权侄女婿秦泰轩负责供应。第三，刚从青岛开到上海的军舰由陈舰长负责于吴淞口狭窄处炸船设障，封锁吴淞口，使国民党军舰驶不出去。第四，由郑振华组织力量破坏机场，使国民党飞机不能起飞。第五，张权率精兵一部，强攻北四川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并配合解放军活捉在复兴岛指挥的蒋介石。第六，由郑振华及伍正怡（地下党员）负责收录新华社电讯稿，油印成传单，投寄到国民党军政人员家中，瓦解敌军，促进投诚。第七，如遇外国干涉，则遵照中央命令，坚决予以还击。张权又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弄到六张“战时通行证”，使各路起义队伍届时能畅通无阻。为了使起义计划能顺利实施，张权对上海城外围的军事情况作了侦察。13日，秦泰轩按规定时间向张权汇报了仓库动态；14日，张权将母亲转移，本人迁居到秦泰轩家中；15日8时许，王亚文与张权按约在外滩公园见面，进一步研究了次日起义的未尽事宜。就在积极准备起义的关键时刻，被李锡祐视为最可靠的第132师情报科长张贤告密了。张权于当日下午16时被捕，李锡祐亦被捕。

张权从被捕的当晚24时起，数次被审。张正义凛然，意志坚定，掩护组织，保护同志。他开始对起义矢口否认，当看到李锡祐的供词，张贤的出面揭发时，他怒目以视，激昂地说：“真理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我接受了人民的委托与信任，负起了这个使命，并没有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这次审讯回来，张对秦泰轩说：“文天祥在狱中写了《正气歌》，历史书上记载着历代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人物，‘鼎镬甘为如饴，求之不可得’的精神，给后人以极大的教益。……我现在无纸无笔，无法表达自己的心声，但只要我活着，就要跟共产党走。”21日18时，张权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奋力高呼：“胜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成功万岁！”张权将军光荣就义，壮烈成仁，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张牺牲五天后，上海回到人民手中，经党组织四处寻找，在普善山庄找到了张权将军的遗体。7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出具公函证明，追认张权将军为革命烈士，并于8月17日成立了治丧委员会，24日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追悼会后，张权将军的灵柩葬于虹桥公墓，后又移葬于上海市烈士陵园。

西安民众自卫总队起义

1949年5月20日，国民党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继騫率领部下2000余人在西安起义，有力地配合解放军解放西安，对保护西安市发电厂、纺织厂和文物古迹不遭破坏起了重要作用，为西安市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西安是西北重要城市，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将第1战区长官部由洛阳迁至西安，派胡宗南率20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

国民党西安民众自卫队，原是由西安各区工商户抽调店员、经过简单训练组成的基干队。1948年9月，国民党行政院电令将各区基干队扩编为西安市民众自卫队，下辖12个大队，23个中队，大队长由备区区长担任，总队长由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兼任。

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得知西安扩编民众自卫总队的消息后，经陕西工委同意，决定争取这支武装，以配合解放军解放西安，选派西安情报处负责人王超北做策反王友直的工作。王友直1947年7月任西安市长，1948年9月组织西安民众自卫总队时，他已认识到国民党即将崩溃，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和希望。王超北找到王友直，给他指出组织自卫队起义的光明之路。对此，王友直欣然同意，决心组织起义，以便将功折罪，并说明，自己是文化人，不懂军事，请求解放军安排适当的人来掌握这支武装。经考虑和研究，王超北推荐国民党第7军分校西安办事处主任闵继騫担任副总队长，直接指挥这支武装。闵继騫是陕西渭南人，1930年和王超北同在陕西省委共过事，与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烈、副参谋长冯龙、幕僚张卓、刘剑铭都比较熟悉，并长期为中共陕西情报处王超北提供情报。经王友直大力推荐和多方面的活动，闵继騫取得了副总队长的职务。接着，又将王超北派来的4名地下工作人员安排在总队任副大队长和副官，协助闵继騫掌握部队。他们对12个大队长分别对待，凡愿靠近共产党的就大胆使用，凡持反共态度的则严加控制。

1949年4月，解放军在西北发起强大攻势，迅速解放铜川、耀县、富平、三原、高陵等渭北地区，向陇海铁路，西兰公路的咸阳、礼泉挺进，逼进西安，胡宗南不得不将主力向宝鸡和渭河以南的秦岭地区撤退，以确保汉中地区。

5月18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召集西安市警察局长萧绍文、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继騫开会，宣布西安市市长王友直随胡宗南去汉中，由萧绍文代理市长，并命令西安民众自卫总队接管城防，要求工兵准备炸毁西安火车站、发电厂和纺织厂。随后，杨德亮率部向南山一线逃窜。

杨德亮逃走后，王超北立即移驻端履门第7分校办事处，与闵继騫一起直接指挥自卫总队的“防务”，派出专门的队伍保护发电厂、纺织厂、文物古迹和其它重要的城市设施。

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6军强渡渭河，兵分3路直逼西安，其中第49团直逼西关，第46团直插南关，第48团占领飞机场，缴获4架飞机，俘虏了机场所有的地勤人员和警卫部队，第50团则乘火车直插火车站，歼灭了正在抢运物资的几百名国民党兵，占领了北关，整个西安城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与此同时，闵继騫率领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城，闵继騫和副大队长雷振山和解放军第49团政委于春山会面后，一起视察西安东、西、南、北各防守要地，并在当天正式交由人民解放军防守，西安宣布

解放，市内的工厂、文物古迹和重要设施完好无损。

后来，西安自卫总队被编为解放军第6军16师补充团。

西安团管区起义

1949年5月20日，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司令王子伟率领400余官兵在西安起义，为保护西安城市设施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西安团管区，下辖3个大队，15个中队，第1大队驻防宝鸡，第2、第3大队驻防西安。团管区司令王子伟是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曾在杨虎城部警1旅任副旅长兼第2团团团长，参加过“西安事变”，早年在第17路军时就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过往来。

1948年开始，中共西安市工委决定派工委委员崔一民策动王子伟起义。起初，崔一民通过王子伟的亲信崔鸮做王的工作，条件成熟后，崔一民直接与他接触，千方百计策动他组织起义。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反工作，王子伟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深深感到，只有共产党和解放军才是中国的希望。最终，接受了崔一民关于率军起义、投奔光明的建议，决定待机而动，准备起义。

5月20日，解放军第6军向西安进军，崔一民将一批地下党员送到王子伟团管区司令部帮助起义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西安。为了防止国民党溃散的军警破坏，王子民派出部队保卫邮电局、粮食局、省立医院、书院门和仓库等，在维护西安稳定、保证城市设施建设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解放军进城前宣布起义。解放军第6军进城后，该军第17师政治部魏主任率队接受了团管区官兵400余人和300余件枪支。

后来，团管区起义的军官，按照自愿的原则，有的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有的被资遣回家。大部分士兵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

灵甫号舰部分人员香港起义 1949年5月21日起，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地下党组织策动下，国民党海军灵甫号舰70余名官兵在香港离舰起义，分三批回到解放区天津。

灵甫号舰原为英国海军“亨特级”护航驱逐舰曼狄甫号，排水量1000吨，舰配有现代化的枪炮、雷达、电讯、防潜等装备，曾编属英海军第21驱逐舰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次护航作战，并参加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1948年5月，英国将其“租借”给国民党政府，租期5年，与重庆舰同时在英国朴茨茅斯军港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代表，国民党政府为“纪念”被人民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将该舰命名为灵甫号。回国后两次送进上海江南造船厂修理。

从1949年1月起，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地下党组织即开始对灵甫舰官兵进行策动工作，在舰上发展了上尉防潜官兼枪炮官陈克和防潜中士尚镭两人为中共地下党员，秘密进行起义活动。

中共地下党组织对上尉军官陈克的争取工作，是通过地下工作人员、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人事处参谋何友情进行的。何与陈克是福州同乡和中学同学，又一起在马尾海校第9届航海班同窗七八年，并于1942年底一同参加了海军进步组织“新海军社”。1949年1月底，何友情上舰访陈克，在谈到形势发展时问陈：“愿不愿意帮共产党办事？”陈克本不想去台湾，立即表示同意。后陈克经何引见，由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林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克在军官中发展了电务员何鹤年、轮机长王民彝、枪炮官鲁德恩等人为起义骨干。

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士兵尚镭的争取工作，是通过重庆舰离舰士兵边矢正

的亲戚联系进行的。尚镭与边矢正是在英国培训接舰时结识。1948年10月，尚镭、边矢正主动找到边的嫂嫂刘桂馥，托人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林城取得联系，后经林介绍，2人同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尚镭很快在灵甫舰串联了高冲天、柏铭、黄杰等10人，组成了“灵甫军舰起义核心小组”。

1949年3月23日中午，灵甫舰舰长郑天杰向全舰军官传达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令该舰于24日开往广州的命令。23日晚，林城、何友恪、陈克等秘密开会研究，林城代表中共党组织指示陈克，在灵甫舰此次南下航行途中发动起义，将舰开往北方解放区港口，并示陈克回舰与尚镭联系，共同行动。陈克在会上提出，这次航行有火力较强的英国驱逐舰随航，起义难以举行。最后确定：让陈克根据情况相机起义；如实在有困难，等到广州再说，但不能暴露。

3月24日上午，灵甫舰离开上海码头启航。果然一艘2500吨英国军舰尾随航行，灵甫舰已被英舰监控，在航行中发动起义已不可能。3月28日，灵甫舰抵达广州抛锚待命。4月中旬，陈克转告尚镭，灵甫舰将开往香港加油，然后送海军第4军区司令杨元忠去海南岛巡视。尚镭马上在广州体育场召集了士兵起义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会议决定：待舰在香港加油后即举行起义。尚镭回舰后将会议精神告知陈克，陈表示同意，然后分头进行准备。4月21日，杨元忠上舰后，灵甫舰开往香港加油，到香港后英国海军当局宣布提前将灵甫舰收回。至此，灵甫舰武装起义计划完全被打破，组织军舰起义已不可能。

英方收回灵甫舰后，国民党海军当局立即对舰上官兵进行威胁利诱，拉拢他们全部去台湾。陈克和尚镭商议，立即找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组织灵甫舰人员起义到解放区。陈克以探家为由，4月25日乘飞机回上海向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情况，之后陈被组织决定留沪工作。尚镭在香港与中央驻港新华社分社负责人乔冠华取得联系，乔指示他设法组织舰上人员起义返回解放区。

这时，摆在灵甫舰全体官兵面前有3条路可供选择：第一是去台湾，可以升官发财，受到国民党重用；第二是留香港，上外轮当水手，待遇优厚；第三是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灵甫舰半数以上官兵选择了弃暗投明的革命道路，变卖贵重的手表、照相机、西服等物和准备结婚的戒指作路费，秘密办理出港手续和离港船票。5月21日，由尚镭、高光负责组织的第一批起义人员31名，乘坐英船“北海轮”，途经南朝鲜仁川港转赴天津；5月28日，由曹助雁、舒起谟负责组织的第二批起义人员22名，乘坐英船“湖南轮”到达天津；6月4日，由陈淇川、冯广林负责带队的第三批起义人员20名，乘坐英船“湖北轮”回到天津；此外，单独起义回大陆的除陈克外，还有何鹤年、王维、刘铺彝。

灵甫舰与重庆舰一样，被国民党视为王牌舰之一，77名官兵的起义，使国民党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949年6月10日，灵甫舰3批起义人员齐集辽宁安东（今丹东）海校，与先期到达的重庆舰起义官兵一起学习。6月20日，这些入校起义官兵又联名发表了《灵甫舰官兵起义宣言》。半年后，大部分人员又转入大连海校继续学习，其余人员分配到海军各单位去工作。

汉口巡防处炮艇队起义

1949年5月24日清晨，在中国共产党的策动和影响下，国民党海军汉口巡防处炮艇队5艘艇、59名官兵，在从武汉撤至湖南洞庭湖口岳阳时举行起义。

汉口巡防处炮艇队编配炮艇、巡逻艇12艘，驻防湖北武汉。1949年5月10日，武汉即将解放前夕，炮艇队奉令撤离武汉，沿长江上驶。内部矛盾尖锐的炮艇队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海军从汪精卫伪政权海军接收改编组建的，官兵多数非福建籍人，因此受到国民党中央海军闽系接收军官的歧视和压迫。士兵们薪饷被克扣，常受体罚，饱尝了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苦头，不少人都渴望脱离国民党海军的牢笼。

1948年11月下旬，中共沔东县委城工部驻汉口“精诚新闻社”地下小组工作人员黄少华，发展了国民党海军退伍人员熊志伟（后名熊涛）；熊又发展了他的好友、原国民党海军第2炮艇队开小差的士兵吴诗孝（后名吴净秋）；吴找到好友、汉口巡防处炮艇队炮64号艇轮机兵徐甫庭密谈，动员徐组织海军炮艇队起义。徐甫庭经考虑后同意了，便在艇队与巡70号艇枪炮下士张慎平、炮65号艇枪机中士胡营、炮64号艇驾驶兵曹学海等一起，分别串联，进行起义准备；张慎平首先利用自己发起成立的业余足球队的人员作为发展起义对象。同时，艇队不少人还通过偷听解放区广播，从江北解放区来队亲属和舰只到外巡逻途中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坚定了起义的决心和信心，积极进行准备，伺机行事。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国民党老巢南京顷刻覆亡。华中地区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准备弃守南逃。汉口巡防处也作了应变部署：一是将巡防处的人员分别插到炮艇队各艇上；二是动员官兵将眷属接上眷属船准备随艇队撤走。5月上旬开始，巡防处炮艇队已陆续撤离；5月13日，巡防处处长陈文惠率领炮64号和巡70号两艇最后撤离汉口。已到了湖南洞庭湖口岳阳的巡防处炮艇队，除5艇先行南下外，尚有7艇1船（运载眷属的民船）集此待命。其中炮64号、65号，巡50号、66号、70号5艇集中一处，由陈文惠处长亲自坐镇炮64号艇指挥；登55号、巡69号2艇和1艘眷属船集中一处，由汉口巡防处炮艇队少校队长柳家森带队指挥。

5月22日晨，眷属船在登55号艇和巡69号艇“护送”下撤离岳阳。眷属船一走，艇队也将很快撤离岳阳。如果艇队进了洞庭湖内，航道曲折，没有航图，若是湖口再被国民党军舰封锁，艇队起义将非常困难，弄不好就会成“瓮中之鳖”。张慎平立即进行串联，23日下午又以踢足球为名上岸在岳阳城郊召开了一次起义人员会议，宣布了次日进行起义的方案和分工。

5月24日晨6时，炮65号艇枪炮下士徐大光等提前换岗，取得武器；曹学海从炮64号艇右舷、胡营从左舷，各持手枪向陈文惠靠近，炮65号艇水兵陈燕明堵截后舱。胡营举枪伸进陈文惠住舱的舷窗击发，子弹歇火未响，曹学海立即向舱内连开数枪，陈文惠和预算员殷平、勤务兵宋宪文中弹受伤。陈文惠出舱窥视，企图反扑，正好被跟进支援的张慎平撞见，端起冲锋枪一个扫射，陈当场被击毙。其他各艇起义人员，也迅速控制本艇。

在“陈文惠死了！我们要把艇开回武汉去啦！”的欢呼声中，炮64号、65号，巡50号、66号、70号5艇在张慎平指挥下，全速向武汉方向驶去。5月25日，5艇胜利驶达武昌白沙洲，张慎平、徐甫庭等乘民船过江到汉口

与人民解放军联系。受到第四野战军第 12 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接见、欢迎，派了一条武装船将 5 艇引靠到汉口码头。后来，以 5 艇为基础，成立了人民解放军华中海军管理处。

当汉口巡防处炮艇队 5 艇在岳阳起义后，其余巡 53 号、59 号、69 号、74 号、81 号和登 55 号 7 艘艇以及江防舰队的威宁舰，先后由洞庭湖撤到湖南长沙。6 月，炮艇队改编为国民党海军第 2 机动艇队，由原汉口巡防处炮艇队少校队长柳家森任艇队长，威宁舰少校舰长马世炳任副艇队长。不久，湖南形势告急，第 2 机动艇队又由长沙沿水路南逃衡阳（威宁舰在长沙自沉）。巡 81 号艇较大吊装不便，在衡阳自行炸毁，其余 6 艇吊装火车运到广西柳州下水。11 月 25 日，巡 53 号、74 号、登 55 号 3 艇随国民党海军驻柳州的部队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投诚，由柳州市军管会交通接管部接收。第 2 机动艇队驻柳州期间，派出驻防梧州的巡 59 号、69 号、79 号 3 艇，柳州解放后，撤至南宁。12 月 4 日，南宁解放，3 艇集体在南宁市邕江江面就地起义。

汉口巡防处炮艇队的 12 艘艇只，除 1 艘自毁外，其余 11 艘，先后分 3 批 3 地起义，回到人民怀抱。

联勤总部第十补给区起义

1949年5月26日，国民党联勤总部第10补给区卫生处长袁重山少将等率部200余人在上海举行起义。

袁重山于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因组织被破坏而自首。在国民党溃败之时不愿去台湾，而想乘此带罪立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了解到袁的这种思想状况，决定分工石小平、张沛负责，由齐树铭出面，利用老乡关系，做袁的工作，争取其起义。1949年二三月间，齐树铭约见袁重山，劝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同时将解放军印发的约法八章、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等送给他。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齐树铭与袁重山商定，把散布在郊外的各医疗单位逐步调集到市区，将卫生器材仓库的物资转移到市区，不能搬运的派人严加看管。

5月初，联勤总部第10补给区接到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命令，限三天之内把联勤总部在沪所有医药、医疗设备全部装上船只运往台湾。袁重山接到命令后，立即同齐树铭商量对策，决定将重要药品器材先转移到南市靠黄浦江的一个仓库，储存好半个月的粮食，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将仓库封闭起来，以保护仓库里的医药器材。同时，袁重山在军医处内部及下属单位加紧活动，要求大家做好准备，迎接解放。袁对副处长李紫衡说，上海即将解放，我已接受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领导，以后我负责对外联系，你负责内部日常工作。随后，袁找到三科科长张非文，要他将所属单位的清册收集一份，准备向共产党移交。接着，袁又找到第64医院院长储存秋等，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怕，解放军里面我有熟人。你们要把物资、文件准备好，人员集中，移交给解放军。24日，袁重山电话通知军医处从即日起在姐妹花舞厅底下的医院办公，并召集各院负责人开会。袁在会上说：上海即将完全解放，大家不要怕，要坚守工作岗位，造好清册，把人员、物资管理保护好。

5月25日，中共地下党小组成员张松和、石小平找到正在市区指挥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第23军军长陶勇，汇报了吴淞炮台的情报，介绍了策反第10补给区的经过。陶军长肯定了这些情况的重要价值，并介绍他们去人民解放军三野第9兵团。26日，第9兵团军法处长瞿道文和二科科长杨于接待了张松和、齐树铭。张、齐汇报对联勤总部第10补给区的策反情况，重点谈了少将军医处长袁重山的态度及其下属24个单位、30多吨药品器材处置问题。当时，杨干认为这些物资数量巨大，应交由市军管会后勤部负责接收。于是，杨给市军管会写了一张条子。齐将条子交给袁重山，让其直接去找军管会联系移交事项。28日上午，袁重山应约去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后勤部第四处，该处领导接待了他，并确定国民党驻沪各卫生单位的药品、器材及人员，由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后勤部第四处负责接管。同时，还采纳了袁重山的建议，为加快速度，减少损失，对各单位先实行军事管制，再逐个移交；其他各处未离沪人员由袁负责找回，一并集中办理移交；移交地点设在汇山大楼，当天下午，人民解放军派代表进驻各卫生单位。此后，袁一方面将军医处工作人员集中整理案卷清册，各医院卫材库员仍在原单位听候移交；另一方面则先去找参谋处长曾毅，由其陪同找到高星垣少将副司令以及各处正副处长，动员他们出来向军管会办理好移交手续。29日至6月10日，第10补给区司令部的各处在高星垣副司令的率领下和卫生处处长袁重山的奔走联系下，终于在大连路上的汇山大楼向市军管会办理移交。11日，在移交结束大会

上，市军管会后勤部长刘瑞龙讲话指出：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因为你们的行动对人民有利，留下了巨大数量的物资，对人民是有功的。

国民党招商局护产起义

1949年5至9月，国民党招商局中的进步人士，在南京、上海、香港等地，举行护产起义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招商局是由1873年清政府建立的招商局演变来的，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招商局本部设于上海，沿长江南京、汉口、重庆等地各埠和沿海的青岛、福州、广州等城市都设有分公司，国外的新加坡、缅甸、印度、日本等地也有办事处或代理人，共有轮船吨位50万吨。其中海轮50只，长江大轮10多只，拖船、铁驳150只，小火轮约50只。拥有船员、职工1.7万多人。1948年，国民党由于在军事上失利，便计划将招商局的财产及人员陆续运往台湾。1948年底和1949年初，国民党内政部、交通部多次催促招商局尽快疏散，不久又对其实行军管，形势十分紧张。招商局原副总经理胡时渊，于1949年3月出任总经理后，经招商局客运部经理俞大纲介绍，与中共香港党组织取得联系。他决定发动群众进行反疏散斗争，保护财产不被掠去台湾。此间，胡时渊两次密电各地分公司负责人，严守工作岗位，保护财产安全。保护江轮是护产的重点，他们有目的地将在长江口附近的船只调往中、上游。1949年2月，招商局以整修船只为由，将“江顺”、“江安”、“江泰”3艘船只秘密开至汉口附近的长江抛锚，以没有燃料为借口拖延去台行程。3月20日，芜湖、安庆间的华洋镇解放，这3艘船只终被保护下来；与此同时，又把“江平”、“江建”、“江华”3艘船只调作短程航行。后来南京解放，这些船只便顺利回到人民手中；还采用明搬暗留的手法，把许多拖轮、铁驳、修理船、仓库船截留下来。

1949年3月，国民党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准备撤退，打算高价雇用临时船员，将所属的40多艘、价值500万美元的船只撤往台湾，胡时渊等人以日后到台湾结算的方式将这些船全部买下被保留。5月中旬，胡时渊等人将运往台湾制造武器的4000吨铜元和1万吨棉布滞留到上海解放。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招商局起义人员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正、副代表于眉和邓寅冬作了移交，大批物资和船舶回到人民的手中。

上海解放后，香港分公司还有一批将开往台湾的海轮，按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由于眉、胡时渊、黄慕宗3人联名致信招商局香港分局经理汤传箴、副经理陈天骏，希望他们率船起义，回归大陆。同时，由船长陈帮达前往香港开展工作。经过争取，香港分局有13只海轮的船员职工800多人冲破国民党控制，参加了起义。

国民党招商局的护产起义，保护下来的一大批船舶和物资，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人员起义

1949年5至9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人员，在南京、上海、香港等地，举行护产起义，把大批技术人员、美援资材、档案、完整地移交给新中国人民政权。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抗战期间属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抗战胜利后，改为行政院直属的部级政府部门。该部曾几易其负责人，抗战时期，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兼主任，钱昌照任副主任；解放前夕，改由孙越崎任委员长，吴兆洪为副委员长。该委员会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一个经济机构，经办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化工、造纸等行业。1949年，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矿共有职员约3万人，其中，赴外国留学回国和本国大学毕业的各种技术管理人员约占60%，另有各种技工、工人六七十万人。

解放战争开始后，资源委员会中一些有识之士，不满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独裁统治，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1947年9月，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就曾和前任委员长钱昌照等，暗地商议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之事。1948年10月，孙越崎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之机，召集资源委员会所属单位负责人会议，向大家表明要维护财产，伺机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这次会议奠定了后来护产起义的基础。

会后，孙越崎和吴兆洪与本部各方面负责人秘密协商，确定了护产起义的一些原则。并先后与中共上海、香港党组织取得联系，有计划地把一些美援器材从沿海运往内地保存，有意识地将本部主要人员滞留上海等地不随行政院南迁。

护产斗争首先取得拒迁5厂斗争的胜利。1948年冬，蒋介石亲自命令将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电器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等5厂限期迁往台湾，并着南京卫戍司令汤恩伯多次催促。孙越崎等先以运输困难和经费不足为由，一再拖延搬迁，后遇蒋介石下野并又利用其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使搬迁之事搁置起来，而且还得到130亿元的搬迁费。

迁沪的资源委员会主要人员，在吴兆洪率领下，将文书档案及财务帐册妥加保存，设立了电台，把委员会历年所得外汇五、六百万美元调集到上海管理。由于委员会掌握了足够的现金，保证了所属单位工资等必要开支，稳定了人心。上海解放后，他们在移交文书档案、财务帐册及人员的同时，将剩余的100多万现金，两万枚银元，500两黄金及数万元美金全部移交华东军政委员会。1949年5月29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同志亲临资源大楼，亲切地接见了该会留沪的200多人。

上海解放后，滞留广州的孙越崎，于6月自动辞职前往香港与中共党组织联系准备回北平，四川财阀刘航琛接任委员长职务。此时，国民党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库存不少钨、锑、锡等矿产品，总数约值五六百万美元，刘航琛企图将这笔财产攫为己有。孙越崎在中共香港党组织领导下，和贸易处副处长吴志翔以及进步人士龚家麟、孟颂南、李新民等人决定，和刘航琛进行斗争，保护这笔财产不被盗卖，于是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资源委员会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保护矿产品委员会。

1949年10月至11月上旬，刘航琛几次假借各种名义，企图提走这批矿产品，都一一被护产委员会识破、阻止。11月9日，国民党“中航”、“中航”起义后，中共香港党组织罗哲明同志建议护产委员会公开起义。11月

11日晚，委员会召集贸易处和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开会，全体签名，一致同意与国民党政权决裂，公开起义。11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起义宣言和起义人员致毛泽东主席电。11月19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起义员工，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给予起义人员极大鼓舞。起义人员继续坚持斗争，派人日夜监视仓库。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接收了这批财产。

这次起义保护下来的财产，包括钨、锑、锡等矿产品3376.3吨和工矿电业生产器材等物资，其价值约550多万美元，还有美国银行存款53.6万美元，全部移交给新中国人民政权。资源委员会人员起义不仅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榆林起义

1949年6月1日,国民党军第22军军长左协中率领军部和第86师4000余人在陕北榆林起义,与人民解放军就和平解放榆林达成协议。

榆林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驻防地,主要由国民党第22军驻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1946年重点进攻中共陕北根据地,邓宝珊和第22军也不得不卷入对陕北进攻的内战漩涡之中。不久,新编第11旅曹又参部在三边起义,陕北保安副总指挥官胡景铎在横山起义,极大的削弱了西北的反共力量,而且在第22军官兵中产生了极大影响。1947年4月,胡宗南将整编第28旅的两个团空运到榆林,并派出大批特务到榆林,监视邓宝珊和第22军的行动。

1947年以来,西北人民解放军曾几度给国民党第22军以军事打击。8月5日,西北解放军集中7个旅,分3路突然向榆林驻军发起攻击。两天后,解放军攻占榆林飞机场和三义唐、东岳庙、官井滩等阵地,消灭了部分守军和胡宗南派来的增援部队。11月2日,解放军又发动了第2次围攻榆林战役,向榆林凌霄塔等据点进攻,以后,每天早晚两次向南城和北关实施攻击,使榆林守军成为笼中之鸟。第22军只能困守孤城,不敢轻举妄动。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面前,在全国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第22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起义。在广大官兵的强烈要求下,1949年2月12日,第22军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谈判,并很快与解放军达成和平解放榆林的初步协议。但由于顽固分子和特务的阻挠破坏,加上该军部分上层人物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协议未能实施。4月下旬,榆林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5月,又传来西安被和平解放的消息,第22军广大官兵要求和平解放榆林的呼声更加强烈,该军上层人物也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抛却了幻想。这时,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曹力如、胡景铎、李含芳到榆林进行策反。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坚定了重要人物起义的决心和信心,达成了和平解放榆林的协议。

6月1日,第22军军长左协中、军参谋长张之因和第86师师长高凌云率部在榆林宣布起义,人民解放军进驻榆林城,榆林和平解放。6月14日,第22军军长左协中等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接着,第22军直属队及第86师4000余官兵,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2师,高凌云任师长,黄罗斌任政治委员。独立第2师经过短期训练,于7月20日进驻三边,后转战宁夏。全国解放后,左协中曾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灵宝起义

1949年6月10日，国民党军第19绥靖区副司令兼第3纵队司令刘希程率部1000余人在河南省灵宝县举行起义。

国民党军第3纵队，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1948年12月组建的。1947年3至8月，胡宗南先后动用20多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损失3万余人。为了补充后备部队，充实豫西兵力，胡宗南委任刘希程为第19绥靖区豫西分区司令官兼第3纵队司令，负责在豫西组建第3纵队。

刘希程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军长，抗战时期曾立过功，但后来被撤了军职。面对国内政局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他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决心寻找机会，弃暗投明。他接受胡宗南的委任后，就张罗骨干人员，和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李文定、李连庆等人组成了领导核心。

1948年底，刘希程、李文定和李连庆，赴河南灵宝县建立了豫西分区司令部及河南省政府豫西行署。接着，将豫西绥靖区改编为豫西第3纵队。该纵队相当于军的编制，共有1万余人。共辖8个团，除第7团外，其他各团都是由豫西地区各县的土匪恶霸反动武装组成的。第7团由刘希程直接掌握，团长赵振岐是李文定的旧部。1947年元旦，赵在山东被华东解放军俘获，经教育后释放。

第3纵队建立后，刘希程设法与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进行联系，得到了解放区第7区专员、开封市副市长王晓舟的大力帮助。1949年5月，西安解放以后，任西安市军管会主任的贺龙，也曾写信给刘希程，鼓励他尽早起义，投靠人民。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给刘希程等人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为了更多地掌握部队，并取得地方势力的拥护，刘希程等在1949年3月初，开办了豫绥靖分区干部训练班，分批抽调连长以下的干部学习，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在各县选调了部分知识青年受训，陆续替换旧的乡、保长。对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刘希程等利用各种办法将其清除，完全掌握了领导权。

西安解放后，灵宝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刘希程等加紧起义准备。6月初，刘希程召集全纵队团长以上人员在灵宝城内举行军事会议，号召大家选择光明的前途，投奔共产党，举行起义。会后，经刘希程、李文定、赵振岐、曹靖华等商定，将第7团和警卫营，布防于灵宝县城的要害部位，做好了战斗准备。

6月10日早晨，该部第1团团长李子奎反对起义，率该团和灵宝乡保队共约5000余人袭击县城，炮击司令部与行署，第7团进行反击，战斗十分激烈。刘希程和王晓舟会商后，率第7团和警卫营撤出县城，边战边撤，并派人赴陕州军分区请解放军支援。陕州军分区的援军赶到灵宝，夺回了县城。李子奎等仓惶逃走，后被解放军俘获。豫西第三纵队1000余名起义官兵经整训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永和、龙广起义

1949年6月24日、贵州省安龙县（今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永和、龙广两地，在中共滇桂黔边罗盘区委的领导下，爆发了一次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

永和地处广西和贵州兴义县巴结地区的交界地带，反动统治比较薄弱，地形条件复杂，具有良好的开展武装斗争的地理环境；龙广地区从1946年夏秋始，从事革命活动的布依族青年王秉祐，就组织了以扶风社为名的群众组织，专门对付国民党军警拉兵抓丁的斗争活动。1949年3月，王秉祐等3人辗转到中共滇桂黔边区地委接受培训，然后奉中共罗盘地委指示回到龙广开展活动。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国民党反动派退守西南，为解决兵源枯竭到处拉兵抓丁，进一步激化了龙广人民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矛盾。根据斗争需要，成立了王秉祐、王雄、贺明亮等人为成员的武装斗争领导小组，制定了以永和地区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接着，派王雄到永和、巴结一带去开展工作，很快就在永和、巴结成立了一支由韦万坤领导的精干武装力量。同时，吴静等在龙广领导一批青年，打入国民党兴仁专署独立营和保安第5团，积极策动起义准备。这样，以永和、龙广为中心的武装力量初步形成。

1949年夏，龙广一带的革命活动为反动派觉察，国民党安龙县政府派遣一个保警分队进驻永和镇压人民革命斗争。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武装斗争领导小组将巴结地区韦万坤的武装、永和等地游击武装及广西地区反蒋武装方季森部共100余人秘密集结，举行起义。6月24

日夜，王雄等率领游击队袭击永和。经过两小时激战，击毙保警2人，生俘7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永和乡乡长率乡丁仓皇逃命，永和暴动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兴仁专署调兴仁独立营和保安第5团以及安龙保警大队的两个中队共约千余人，

由国民党安龙县县长统一指挥扑向永和。起义队伍兵分两路，一路以广西方季森部为主，永和游击队配合，迎击来犯之敌；一路以韦万坤部为主力，从小路奔袭龙广，乘敌保5团开赴永和后龙广敌人兵力空虚之机，攻打敌镇公所，夺取弹药，然后反击敌独立营，实行前后夹击。夹击成功后，乘胜攻取国民党兴仁专署。

后来，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起义队伍没能打破前来围剿之敌。为保存革命力量，王秉祐等人令韦万坤部向云南罗平转移，永和游击队分散隐蔽。这支游击队一直坚持斗争到贵州全省解放。

长沙起义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7.7万余人，在湖南省长沙举行起义。

程潜，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县，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同年12月和黄兴、宋教仁等组织革命同志会，次年8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转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后回国入川训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武汉前线指挥官；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后，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护法战争中，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后任孙中山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校长。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历任过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国民党中有“元老”之称。

1947年，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为稳住中南阵脚，又防桂系势力扩张，利用程潜与桂系之间的矛盾，于是年6月20日任命程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江西、湖南两省，兼任湖南省主席。7月17日，程赴长沙就任，尔后又兼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程回湖南前，请准南京国民党中央，在湖南成立5个国防师。程回到湖南后，在短期内实现了扩充5个师的目标，还超额扩编了3个旅的兵力。

程潜回湖南后，中共湖南省工委对程及其省政府班底作了分析，认为程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战争与林伯渠合作，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率部抗击日军，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程与蒋介石有矛盾，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亦有矛盾。程这次回湖南，蒋介石随即委任了湘籍黄埔系亲信李默庵为绥署副主任兼第17绥靖区司令，驻常德；黄杰为绥署副主任兼第5编练司令驻衡阳。还委任刘嘉树为绥署参谋长，军统分子杨继荣为绥署高参，跟随程左右。而白崇禧又拥重兵驻武汉，常常对其施加压力。因此，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之际，程本人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基于上述分析，省工委决定成立军事策反小组，先从争取程周围的重要同僚做起，逐步影响他，一旦时机成熟，即派人直接见面，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及程周围人细致深入的工作，程表示同意与共产党联系，并委托程星龄（程潜的族弟，进步民主人士）为全权代表与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宣告引退。24日，李宗仁正式宣誓就任代总统，表示愿意与中共开展和谈。此时，国内一片和平气氛。程潜下令停止征兵，减少征粮，开释政治犯。但对新华社播发的中共提出的关于国民党第一批战犯名单43人中程潜名列第26，深感不安。省工委派人向其作了解释和许诺后，方才打消了顾虑，并决定调他所信赖的陈明仁将军回湖南执掌兵权。陈明仁系湖南醴陵县人，1924年入程任校长的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毕业后任排长；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战；1942年任第71军军长参加中、英、美联军对日本的滇西反攻作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陈奉命率部开赴东北，因在据守四平之战中成功而升任兵团司令；1948年陈赴武汉，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武汉警备司令、第29军军长。1949年2月，陈率第29军、第71军到湖南整编。陈到长沙后，将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的手令交给程看，并表示听程的

指挥。

3月初，程潜赴南京与李宗仁“商量国事”。章士钊受中共委托，向程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他本人的殷切期望，使其进一步打消顾虑，坚定信心。下旬，白崇禧以程潜年事已高照顾元老为名，请他赴南京出任考试院长。程当即回绝。4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湖南省参议会、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等联衔于22日成立“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邀请唐生智担任主任委员，主持各界联合会务，共商湖南和平解放大计。29日，唐抵达长沙，程亲去车站迎接。唐晋省倡导和平，程积极支持。5月3日，程召集唐生智、仇鳌、唐伯球、席楚霖、唐星、李默庵等军政要人筹谋自救之道。程下令，统一规定各县（市）建立自救组织，以编练地方武装，实行自保自救。

人民解放军逼近武汉时，程潜要求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会见。地下党负责人周礼委派余志宏前往，并答应转达程的起义要求。据此，省工委认为策动程起义已经成熟，应因势利导，动员程、陈写个《备忘录》，向党中央、毛主席正式表个态。6月30日，毛泽东收到了程的《备忘录》，立即电示人民解放军四野陈兵湘鄂边境，并选调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和华北军大总队李明灏两人前往武汉，参加和平解决湖南的工作。7月4日，毛泽东亲笔复程潜。程接到毛泽东的复信后表示：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陈明仁拒绝在《备忘录》上签字有三怕：一怕泄密，二怕算旧帐，三怕戴投降主义的帽子和把起义官兵当俘虏看待。余志宏针对陈的思想顾虑，反复讲明党的政策。同时，程星龄受章士钊之托从香港回来，向陈转达了毛泽东的谈话。陈获知毛泽东的谈话后，明确表示愿随程潜一起起义，造福桑梓。

21日，程潜离开长沙到达邵阳，同唐生智共商起义大计。23日、25日，程会见了省工委派到邵阳联络起义的张立武，就起义通电发表的时机、地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此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兵分两路进入湖南，逼近长沙。24日，程派往汉口催请解放军尽快入湘的刘纯正返回长沙，转达了中共武汉负责人王首道请程潜主任组织谈判代表团的事宜。陈明仁得悉后，于26日，通知程星龄回长沙，并交待由他和李君九去平江，迎接李仲贤（李明灏）先生，并于27日用密电给程，请他速回长沙。29日，程秘密回到长沙。与此同时，李明灏在程星龄、李君九及欧阳方陪同下，秘密来到长沙。李到达长沙后，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与程、陈两将军会见，并作了許多解释工作，对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初步达成协议，主要是起义通电的内容及发表、起义部队驻防交接及解放军入城时间。陈希望保留其兵团司令职务。鉴于白崇禧有调兵向邵阳进攻的企图，程、陈提出解放军应迅速向邵阳抵进，以减轻桂军对邵阳的压力，第1兵团除留第232师维持秩序外，其余部队于3日撤完，望解放军于4日进城。李将这些情况电告四野，四野当即答应可以按此办理。8月2日，中央军委正式电复：可答应陈明仁将军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3日，人民解放军四野和谈代表团通过地下党转告程潜、陈明仁，请派代表团进行协商。下午，陈令参谋主任郑克林、参谋处长罗文浪与省工委联络员欧阳方前往，在春华山第138师驻地，与四野和谈代表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等会见。当晚，双方达成六点协议。4日下午，程、陈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由程、陈两将军领衔，30多名国民党湖南军政委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

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程、陈两将军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震惊了苏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加速了国民党集团的最后覆灭，宣告了国民党集团对湖南人民 20 多年反动统治的结束，是湖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一页。

程、陈率部光荣起义后，一直受到共产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和重用。程曾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领导职务，他还是民革中央副主席，1968 年 4 月 19 日病逝。陈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 兵团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委员、第 55 军军长，并授予上将军衔，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74 年病逝。

唐生智东安起义

1949年8月4日，原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率原湘军将领周斓、刘兴等106人，在湖南省东安县举行起义。

唐生智、字孟萧，湖南省东安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在宁汉、宁粤对抗期间，唐生智三次兴兵反蒋；1930年流亡香港、澳门、新加坡；1931年由新加坡回国；1937年11月20日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12月13日南京失守；1939年辞职回乡，后到重庆赋闲，自称“重庆雀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唐生智不愿为蒋介石打内战，带领全家回湖南东安家乡，以办学自乐。此时，唐生智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还常去自办的耀祥中学作报告，宣传民主与和平。他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白崇禧的注意，不久学校被封闭。1948年秋，蒋介石邀请唐生智到南京晤谈。他一到上海就找到总统府参军李觉和刘建绪陪同他去南京见蒋介石。当李觉问唐为何去见蒋时，唐说：“现在不光是大局危机，而且是国民党整个垮台。我是去为蒋介石送终的。临终前有个把朋友去看看，总是好的，说不定还会给我一个什么名义回湖南去活动活动哩！”唐与蒋见面后，蒋要其出任衡州绥署主任，被唐当即拒绝。唐生智在南京时会见了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并劝其谋求和平，才是正道。此后，唐生智又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人员进行了秘密接触，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唐返回长沙后，公开呼吁“湖南人民走湖南人的路”，“湖南是湖南人民的湖南”，号召湖南人民反对蒋介石。唐回到东安后，又约老部下周斓、刘兴等晤谈，提出走和平自救的道路，并让他们回去抓起义，筹措活动经费。

中共湖南工委为了利用唐生智的声望，组织社会进步力量，壮大和平运动，促使程潜、陈明仁早下起义决心，决定通过程星龄、马子谷出面，委托李觉到东安动员唐生智到长沙参加和平工作。李觉是唐生智的老部下，曾任第14绥靖区司令，1948年被解除职务后，闲居在长沙。李觉在长沙、东安之间做了许多工作。唐生智表示，尽弃前嫌，和程潜一道倡导和平。4月25日，陈云章以省人民团体身份和省参议会副议长楚霖到东安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唐于29日到达长沙。程潜亲到车站迎接，共商湖南和平解放大计。“湖南省自救委员会”成立时，推举唐生智为主任委员，仇鳌为副主任委员。“自救会”成立后，编练地方武装，走和平解放道路，声势越来越大。

5月，在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下，白崇禧率部撤至长沙。白对唐伯球、仇鳌说：“由孟萧先生领导湖南‘自救会’，本来是件好事，但容易被共产党的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为好”。此时，唐生智已预感到再留在长沙，是不会为白崇禧所容的，于5月24日深夜与李觉一起乘车秘密离开长沙，回到东安。唐到东安后，与中共领导的湖南游击队取得联系，发展地方武装。6月11日，白崇禧正式宣布取缔“自救会”，并派国民党第126军军长张湘泽到东安找唐生智，唐拒不相见。唐对家人说：“他们几次找上门来，威胁利诱，手段用尽，我没有依他们，看来，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唐于当晚离家出走躲避。第二天，白又派第126军第305师师长谭奇率部进驻唐所在地，实施层层包围，企图逮捕唐生智，半个多月也没有抓到唐本人，却将唐生智夫人霍福克及6个孩子押往广西桂林，作为人质，后又转到香港。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同日，唐生智领衔，和周斓、刘兴等106

人发表《湖南各界人士响应通电》，举行起义，并呼吁西南、西北速采一致行动。

解放后，唐生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湖南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其夫人和孩子，经中共派人去香港营救，直到 1951 年才回到湖南，全家团圆。唐于 1970 年 4 月 6 日，因病在长沙逝世。

伊盟第三警备区筹部起义

1949年8月7日，国民党伊克昭盟第3警备区和郡王旗保安部队440余人举行起义。

郡王旗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南部，是蒙汉族杂居地区。该旗王爷图布升格尔格勒任伊克昭盟盟长，又称盟长旗。国民党在该旗统治势力比较强大。1947年下半年，傅作义、董其武组建了伊克昭盟第3警备区，任命伊盟国民党特派员、原郡王旗保安师第2团团团长奇全禧为警备区少将司令。不久拼凑起警备区司令部，下辖5个处，2个大队，总人数400人。该旗地方武装保安部队司令奇宝玺，人数近300人，郡王旗名义上有警备、保安两个师的架子和王府的一个特务营，实际上兵力约五、六百人。

抗日战争时期，伊盟盟长图布升格尔格勒同奇全禧去重庆路经延安时，曾受到中共方面的欢迎。因此郡王旗王公对中国共产党有较深印象。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伊盟支队解放了准格尔旗，打开了解放伊东地区的新局面。中共伊东工委即派云北峰带领10多名干部、战士深入郡王旗东部地区开辟工作。郡王旗警备司令奇全禧派其舅父安占祥给伊东神木县委书记李子川送信，表示愿意友好联络，竭诚合作。中共伊东工委对奇全禧来信表示欢迎态度，并和安占祥先生谈了共产党对蒙古族的政策，表明了与郡王旗武装不发生冲突的态度，希望双方今后保持友好往来，欢迎奇全禧联络各旗上层建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同时，人民解放军绥德前方司令部张达志司令员等也给奇全禧司令写了回信，鼓励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即举行起义”。

1948年9月，绥远战役前，在国民党派遣特务的唆使下，郡王旗部队几次袭扰解放区，曾包围中共东郡武工队，打死武工队长及管理员。奇全禧这几次行动，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中共伊东支队除给来犯之敌以严重地打击外，还写信郑重告诫郡王旗官府及奇全禧：要认清全国的形势，应当向人民靠拢，如再继续与人民为敌，将会被消灭。11月初，解放军解放包头时，国民党包头警备总司令陈玉甲令郡王旗军队西退。郡王旗派人与中共东郡工委商量，表示不敢抗命，但要求解放军不要进郡王旗。东郡工委指出：郡王旗目前成为伊盟政治上藏垢纳污的场所，不要再继续下去，希望郡王旗起义脱离国民党。

1949年1月，奇全禧亲自去归绥了解形势，后急忙返回，了解到北平解放已成定局，绥远解放为期不远，看来只有投奔共产党才有出路。于是决定举行起义。刚过春节，奇全禧就于2月3日向中共中央拟好了表示起义的电报，表示“愿集体反正，参加解放阵营”。并派人带电报去见东郡工委书记云北峰，磋商关于郡王旗部队起义的问题。

中共伊东工委接到奇全禧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即召开工委会，听取了云北峰汇报情况，研究分析了郡王旗的形势和奇全禧等的思想动态，认为郡王旗和平解放是有可能的。会后，即将会议讨论的《争取和平解放郡王旗的初步方案》和奇全禧的电报一并请示西北局。

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回复：“同意你们和平解放伊盟问题”。并指明了解决的方法步骤。双方商定进行谈判。

1949年2月21日，奇全禧率副司令奇林宝、保安司令部的团长奇兆禄等谈判代表一行26人，到达伊东工委所在地准格尔旗沙圪堵，受到了中共当

地党政军民 300 余人的热情欢迎接待。

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的有伊东支队司令员王悦丰、政委高增培、副司令员高平、马富纲、工委军事部长韩是今、东郡工委书记云北峰等。从 2 月 24 日开始，双方经过三次谈判，于 2 月 28 日达成初步协议，即“沙圪堵协议”。主要内容：（一）彻底摧毁蒋匪集团特务组织；（二）集中全旗部队，服从解放军指挥；（三）为开展各旗联络，促进全盟解放和处理过渡期间的各项问题，特决定建立伊盟共同委员会，由王悦丰、马富纲、云北峰、韩峰、奇全禧、奇兆禄 6 人任委员，以王悦丰为主任。

“沙圪堵协议”签订后，郡王旗部队内部有了分化。以参谋长王瑞森等一些特务形成反对“协议”的反动势力；以 2 大队副大队长白英杰等结成拥护“协议”的进步力量；奇全禧、奇兆禄等上层王公贵族摇摆不定。围绕着郡王旗部队何去何从进行了尖锐斗争。

3 月 20 日，解放军伊东支队在包头警备区 1 中队长贾善文带领一个连配合下攻克东胜。4 月上旬，国民党 111 军刘万春派兵进犯准格尔旗解放区，遭到伊盟支队迎头痛击后窜回包头。国民党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勒令奇全禧把进攻东胜“首犯”贾善文押解包头。奇全禧左右为难，最后让贾善文带全连投奔解放军。4 月 16 日，贾带 80 余人到中共东郡工委投诚。奇全禧向陈玉甲报告了假情况了事。为敦促奇全禧执行“沙圪堵协议”，中共东郡工委书记云北峰于 4 月 26 日到大营盘会见奇等军政要员。奇全禧一方面表示执行“协议”，派 10 多名军政人员到沙圪堵学习训练；一方面表示还要应付国民党。此后，奇全禧一面摸共产党对关于起义部队编制、番号等问题的底，一面又向国民党要钱。于 6 月下旬派参谋长王瑞森赴归绥晋见董其武，要给养经费等。

7 月 2 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扎萨克旗。7 日，经西北局批准，成立了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和伊盟军区。针对郡王旗上层人员动摇观望，两面应付的态度，中共依照盟委和军区确定武装接受郡王旗。

1949 年 8 月 4 日，解放军伊克昭盟军区负责人高增培、高平和榆林军区副司令员王仁法等率伊盟支队和榆林第 39 团从扎萨克旗出发，前往郡王旗接收起义部队。在重兵压境之下，奇全禧表示执行“沙圪堵协议”，立即举行起义。8 月 7 日，伊盟第 3 警备区、保安司令部和解放军双方军队集结于王府前的空场上，约有 1000 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高平副司令员代表讲话，欢迎郡王旗部队弃暗投明，武装起义，加入到人民解放军里来。奇全禧代表全旗讲话，欢迎解放军接收起义部队。

郡王旗解放后，当东胜之敌进犯时，奇全禧又投敌叛变，跑到绥远。8 月 17 日，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进入郡王旗，重新组织了郡王旗指挥部，奇兆禄为总指挥，云北峰为政委。9 月 5 日，又将收编的起义部队编为伊盟军区第 6 支队。奇兆禄任支队长，武尔图任副支队长、云北峰为政委，随即对部队进行整训。郡王旗部队起义，使郡王旗获得和平解放，从此结束了该旗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历史。

武山起义

1949年8月8日，国民党军第119军第247师骑兵团、甘肃师管区补充第2团3营、第30军245师罗子英营、第119军第244师杨尚岑营、武山县自卫大队和警察队等1700余人，在甘肃武山县境内举行起义。

1947年初，中共武山支部成立。共产党员韩耀武、杨荣贤、赵西武等潜入武山县自卫大队、武山警察队、驻武山的甘肃师管区补充第2团3营及一些乡镇政府中任职，以等待时机，举行起义。1949年5月，中共武山工委正式成立。经过积极工作，至7月，武山工委已掌握了驻武山的补第2团3营（营长为中共党员赵西武）、武山县自卫大队（大队长为中共党员陶行之）、武山警察队及洛门、四门、马力、鸳鸯等乡镇的政权和武装。同时，工委还乘国民党天水专署组建地方武装之机，利用合法名义组织了王武烈、杜友华领导的两支游击队。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动了扶眉战役，关中地区完全解放。国民党溃兵纷纷向天水、武山一带西逃。8月初，国民党军第119军第247师骑兵团退驻武山城中。该团勤务连的司务长邓品珊（中共党员）和地下党员康丙衡一起劝连长汪鉴反戈，汪鉴表示同意。骑兵团驻武山后，中共武山工委委员苏星、补第2团3营营长赵西武及汪鉴等人一起劝说骑兵团长赵玉亭解除思想顾虑，举行起义。赵玉亭即表示愿意率部起义，并写信给已离开武山西退的国民党军第30军第245师营长罗子英、第119军第244师营长杨尚岑等人，动员他们率部回武山一同起义。

8月4日，国民党军第120军第173师骑兵团、第517步兵团退驻武山。起义部队在中共武山工委领导下，将该两团紧紧包围在城内，并用迫击炮轰击，当晚这两团被迫交械投降。

8月7日，人民解放军第2军第5师侦察队到达武山。国民党军第30军第245师罗子英营在接到赵玉亭的联系信后，也于同日下午从陇西四十里铺返回武山城，准备参加起义。

8日晨，国民党军第119军第247师骑兵团、甘肃师管区补第2团3营、第30军第245师罗子英营、武山县自卫大队和警察队共1700余人，在武山城召开大会。会上举行了隆重的起义仪式。

8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2军第14团同中共西北局派来接管武山的干部到达武山，宣布成立中共武山县委、武山县人民政府。9日，县政府将原来的“合法”游击队组成县大队，由王廷杰任大队长兼政委，王武烈任副大队长。

10日，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员王震及第2军首长郭鹏、王恩茂等到达武山，高度赞扬了武山起义。

起义部队经过整编。骑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军第12师骑兵团，团长赵玉亭，政委邓品珊，补充第3营、县自卫大队和部分游击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军独立团，团长赵西武，韩耀武、陶行之、任林为营长。罗子英营与14日到达武山城的国民党军第119军第244师杨尚岑营合编为人民解放军补充团，团长罗子英。整编后的3个团，即随解放大军西进，为解放西北作出了贡献。

阿拉庙办事处官兵起义

1949年8月9日，国民党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阿拉庙办事处300余名官兵，在办事处处长升济秘图和保安团团团长吴敬业率领下举行了起义。

阿拉庙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南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鄂托克旗工作委员会很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主张抗日和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保持中立态度的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做了团结争取工作。中共三边（即陕西定边、安边、靖边的总称）地委曾派人同章文轩进行过谈判，以改善双方关系。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加紧进行内战准备。章文轩积极推行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顽固采取反共反人民的态度。与宁夏军阀马鸿逵相勾结，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封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1946年1月12日，伊南游击副司令奇恩诚和参谋长韩裕如策划了“阿拉庙事变”，将司令章文轩勒死，掌握了兵权。为稳定鄂旗局势，防止国民党插手，中共伊盟工委负责人赵通儒、赵文献、田万生、周仁山团结争取了鄂旗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马富纲、顾寿山、马良诚和升济秘图等人，共同研究商定了15条具体办法，推选升济秘图代理司令落实“办法”。然而由于他们思想上不够坚定，造成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当年春天，国民党为利用鄂旗武装与陕甘宁边区对峙，绥远省遂任命杨森扎布为司令，奇恩诚为副司令，韩裕如为参谋长。杨等3人组织起了伊南边防司令部，下辖两个团（10个连）和宁夏、包头、阿拉庙3个办事处，兵力共计600余人。

1946年2月21日，中共西北局请伊盟工委负责人赵通儒前去开会讨论伊盟的工作。明确指出伊盟工作的方针是：“广泛开展上层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团结蒙人、巩固和平，统一内部，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运动、反对国民党压迫政策。”伊盟工委遵照中共西北局的指示，派人和写信做伊南边防司令部杨森扎布司令、奇恩诚副司令的团结争取工作。杨、奇不但不听，仍然不断向陕甘宁边区袭扰，诱捕杀害伊盟工委干部，并扬言要全面进攻边区。因此，中共三边地委经中共西北局批准，调集警备旅，于1947年2月10日，在蒙汉支队的配合下，向奇恩诚盘踞的乌替发起了进攻。经过激战，歼灭了这股反动势力。击毙奇恩诚，杨森扎布被调回归绥。

1947年底，中共三边地委决定伊盟的部队全部集中到吴旗县进行三查整军。1948年春，三查整军结束后，中共西北局决定将伊盟工委分为伊东、伊西两个工委；部队编为伊盟支队，下辖3个大队。人员调整后，部队分为两路分别随两个工委向伊东、伊西进发。与此同时，国民党伊克昭盟警备司令陈玉甲为阻击伊盟支队的进攻，又将伊南边防司令部改名为保安司令部，任命代王爷奇门肯为司令，刘宝财为副司令，兵力不足400人。保安司令部设在阿拉庙的办事处，代表该旗王府行使军政权力。

1948年秋，中共方面通过阿拉庙办事处处长升济秘图给奇门肯做工作，奇慑于解放军的威力，表示愿意弃暗投明。1949年3月，奇门肯派特务营长巴特特肯主动联系起义问题，中共伊盟方面即派人包仁旺吉拉随同巴一起到该司令部所在地桑庙商谈起义的有关事宜。这时奇门肯口头上表示“愿意起义”，实际上就在与中共方面商谈接受改编起义部队时，他指示副司令刘宝财去与德王进行勾结。但阿拉庙办事处处长升济密图等坚持走起义之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暗中进行起义的准备。

1949年8月7日，升济秘图与团长吴敬业将在鄂南的4名特务扣捕。9

日，在阿拉庙召开军人大会，当场宣布起义。欢迎中共方面派至该旗的工作人员，并表示会后愿在中共领导下，建设新的鄂托克旗。 11 日，向全旗发表了欢迎共产党和惩处特务分子的“布告”。

8 月 30 日，中共伊盟军区副司令马富纲带领直属队去阿拉庙接受起义部队，计 300 余人。不久，除留少数编入人民解放军外，其余大部分官兵都做了妥善安置。9 月 5 日，成立了该旗临时指挥部，马富纲任司令兼指挥，吴敬业任副指挥。遵照中共西北局指示，组成了临时政务委员会，以升济秘图为主任。 1950 年春，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成立，升济秘图任旗长和伊盟政协常委。顽固不化的奇门肯后来在发动叛乱时被剿匪部队击毙。

阿拉庙办事处官兵起义成功，不仅促使鄂托克旗蒙汉人民获得了解放，而且缓和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北线的军事压力，解除了国民党在这里的经济封锁。

国民党立法委员 香港起义

1949年8月13日，国民党留驻香港的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等44人，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政治声明，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决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后，又有数十人响应。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一脱离蒋政权运动，被称之为“香港起义”。

参加起义的立法委员，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卖国、内战政策不满，形成一个主和派。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深得这些主和派的赞同。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参加和谈。立委主和派但懋辛、张潜华等数十人发表了《我们对于和谈的认识与态度》的声明，主张应与中共诚实地谋取和平。然而，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渡江战役。

4月22日，国民党政府将所有立法委员撤离南京，分别送往广州各地。立委主和派通过和谈谋求和平的希望落空，决定脱离反动政权。5月中旬，张潜华、黄统、谌小岑等一批人先后到达香港，与中共香港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得到支持和帮助。此时，原国民党和谈代表、立法委员黄绍竑也来到香港，经与张潜华、谌小岑、金绍先等一起，出面组织联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脱离蒋反动政权的运动，开展了“周三座谈会”的政治活动。

8月13日，上海抗战纪念日这天，黄绍竑、贺耀组、罗翼群、刘斐、周一志、张潜华等6人，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竑住处，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书面声明。声明指出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完全叛弃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走向法西斯的暴力独裁，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才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声明号召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立刻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决绝，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在声明上签字的有黄绍竑、贺耀组、龙云等44人。

声明在国民党内产生强烈反响，之后又有邓召荫、李翰园等11人和王普涵、席尚谦等13人参加这一起义活动。9月上旬，黄绍竑等人又联名发表了号召国民党海陆空人员弃暗投明的《告国民党陆海空全体将士书》。

不久，香港起义的主要负责人黄绍竑、刘斐应中共邀请，前往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0月中旬后，谌小岑、李荐廷等人相继离港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至此，香港起义结束。

第三一八师福州起义

1949年8月17日，国民党陆军第106军第318师副师长赖惕安率师部及所属第935团官兵1000余人，在福建省福州市东郊举行起义。

1948年10月，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报请国民党国防部批准，将其所属第92军第21、第142师和暂编第56师分辖的三个补充团编为第318师，任命兵团部作战处长赖惕安兼任该师副师长。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妄图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将残部沿长江天堑布防。第17兵团移驻安徽徽州地区，第318师一个团随兵团行动，其余留杭州担任警备。1949年4月初，侯镜如率兵团直属队及第318师第953团前往徽州。中旬，国民党第110师准备起义，随同该师行动的廖运泽从杭州打电话给侯镜如，请他转告第318师师长彭淮霖同第110师一起相机起义。侯即令赖惕安离兵团到第318师就任，在营、团军官中进行起义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准备。20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强渡长江，国民党防线土崩瓦解。彭淮霖率领第318师师部及第952、第954团逃至浙江东阳县时，向解放军缴械投降。

5月下旬，国民党军残部退集福州地区后重新整编，以第318师第953团、第17兵团特务团和第106军输送团合编为第318师，归第106军建制，原兵团副参谋长介景和任师长，赖惕安任副师长，全师官兵不足3500人。整编后，第318师师部和第953团驻马尾镇，第952团驻长乐县，第954团驻马尾以西魁岐一带。此时，侯镜如和赖惕安感到国民党政权快要灭亡，决心抓住时机率部起义。该师第953团靠近师部，且团长陈怀德表示听赖的安排。尔后，赖派政工处长楚子英找中共福州地下党联系起义。

第17兵团撤销后，侯镜如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任华东军官教导总团团长，负责集训各兵团、军、师编余军官。但他借口治病及探望母病去香港，为第318师起义寻找关系。侯离福州前，私下嘱咐赖等，要掌握好部队，听候消息。侯赴港后，廖运泽介绍其与中共香港工委干部范剑涯见面。侯谈了福建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表示要做些策反工作。谈妥后，侯以处理第17兵团善后工作为名，电召第318师副师长曹仁风来港商谈起义事宜。曹到港后，向侯及范剑涯介绍了福州地区国民党军事部署、动态和第318师的情况，讨论了起义方案。范根据工委的意见，提出第318师要保存实力，伺机在福州或沿海岛屿起义，由赖惕安、曹仁风等人组成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起义的联系和组织。

7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向福建进军。此时，国民党从长江防线溃逃下来的残兵败将猬集福建。蒋介石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强调“无福州即无台湾”。8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对福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第318师起义的时机已到，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联络员未到，师政工处长楚子英寻找福州地下党未果，使赖惕安和曹仁风心绪不宁。15日，国民党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令第318师第953团掩护一线部队撤退。当晚，曹仁风赶赴第953团驻地，召开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第318师的处境，说明只有起义才是出路；接着，他宣读了侯镜如的亲笔信，信中要第318师留在福州，走起义的光明道路。16日，人民解放军逼近福州城郊。赖惕安令译电员编了个第一线掩护部队要求支援的电报，随即率师部全体人员及直属队乘车向驻东郊东岳庙地区的第953团靠拢，同时派补给处长张申铮、参谋张淦和附员张斌、刘千里两次出动，与解放军一线部队联系。当部

队行至市区闽江万寿桥头，获悉第 96 军工兵营拟在部队撤退后炸毁大桥，阻挡解放军前进。赖当即警告工兵营长：市东北尚有掩护部队，他们最后撤退必经这座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炸桥。这时，人民解放军第 28 军先头部队迅猛向市区进攻，夺取了万寿桥，保证了后续部队顺利通过，向闽南追击逃跑的国民党军。

17 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 31 军第 92 师第 274 团第 1 营第 1 连沿岭头门、溪口向福州市区前进，当到达溪口时，与第 953 团第 1 营联系起义的联络员相遇。联络员当即要求解放军派代表同他们的指挥官谈判起义事宜。团长陈怀德即与解放军代表丁绍奎会谈。丁宣传了“约法八章”。陈说明他们的起义早与中共上层组织联系认可，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行动。丁请他们集合部队待命，旋即返回报告。与此同时，解放军第 92 师第 274 团第 1 营进至福州东北部，与第 953 团第 2 营因双方情况不明，发生了一场冲突。当第 1 营接到师部通知，该部确系起义后，即停止冲突。陈怀德立即向官兵宣布起义成功。当日，解放军第 92 师首长会见了赖惕安和曹仁风。赖、曹向陈梓于副师长报告了起义经过。陈副师长祝贺第 318 师光荣起义，并指定起义部队暂集结在东部一带，等候上级指示再作安置。8 月 24 日，第 318 师师部及第 953 团官兵 1000 余人前往福清县整训，10 月底按兵种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第 28 军直属队及第 83 师。赖惕安、曹仁风等赴华东军区学习。

第三二五师晋江起义

1949年8月19日，国民党陆军第22兵团第121军第325师副师长陈言廉率师部、直属警卫营及第973、第974团部分官兵共900余人，在福建省晋江县安海镇举行起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蒋介石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拟定了在江南新编200万军队的计划，并授意福建省主席李良荣在闽编练一支“新军”。李于是年1月报请批准，在泉州成立了第325师，下辖第973、第974、第975个团，师长吕省吾，副师长陈言廉、参谋长张成仁。吕、陈上任后，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言行谨慎，不发表反共言论，尽量避免与泉州中共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福建第四行政区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林梦飞还利用职权之便，以准予保释、保外就医等形式，掩护在押的泉州中心县委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营救各县捕送专署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但是，他们一时找不到中共高层组织挂钩。当时，在厦门的“民联”（三民主主义同志会）会员张圣才与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潘汉年有联系，他奉命在闽南从事策反和情报工作，把林、吕、陈作为争取的对象。专署主任秘书刘浑生早已加入“民联”组织，秘密参与革命活动。当他觉察到林、吕、陈的心思，征得他们同意后，通过张圣才与中共华南分局挂上了钩。潘汉年指出，他们起义仅在酝酿中，暂不要与当地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后因林到厦门警备司令部任职，吕升任第121军副军长，策划去台湾，起义遇到了困难。

中共泉州工委一直在做第325师起义的工作。该师成立后，泉州工委认为，该师组建仓促，战斗力不强，官兵多系闽南人，可通过地方关系分化瓦解。工委物色许子杰做陈言廉的工作。许与当地地下党有联系，也是陈尊敬的中学老师。泉州工委书记许集美的胞兄许书纪以老同学的身份陆续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约法八章》等进步书刊给陈言廉阅读，使其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表示愿意与泉州地下党联系，从长计议。

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结束后，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陈言廉丢掉了“隔江分治”的幻想，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于是，他要求直接与地下党联系。中共泉州工委决定派晋江县安海镇工委委员黄书麟以解放军泉州团队联络员的身份同陈建立联系。黄带着许子杰的亲笔信去见陈言廉。陈对共产党的政策表示接受，但对起义态度不坚决。黄遵照解放军泉州团队领导的指示，经常走访陈，帮助其认清形势，了解共产党的政策。陈向泉州团队介绍了第325师内部的情况，表示有顾虑。泉州团队认为，陈对起义犹豫不决，久拖下去恐生变异，必须及早商谈起义的具体问题。黄向陈传达了团队的意见。陈要求派代表去团队面谈。六七月间，陈派参谋洪应百前往晋江安海前埔村同许集美、郑种植（团队前政委）会谈。许等人听了洪的情况介绍后认为，既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也有陈的思想顾虑，于是一方面强调形势逼人，第325师在福州解放之前起义，意义和作用大；另一方面说明人民群众支持起义的正义行动，游击队有力量配合，尽力提供军需、给养等。他们请洪向陈传达泉州团队的意见，希望陈抓紧准备，争取早日起义。

8月17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从东、北、西三面攻入福州，宣告福建省省会解放。19日凌晨，第325师接到国民党国防部的命令，该师全部开赴晋江东石登船，搬往厦门、金门。陈言廉意识到上头已对他不

放心，如果率部撤往厦门、金门，起义更困难，有可能就地被歼。在关键时刻，陈横下一条心，决定以执行命令为掩护，把部队带到安海，同时将命令和立即起义的行动通知泉州团队，请游击队配合行动。当天下午，陈率部到达安海后，派郭崇山，罗凉群前往泉州团队接谈，双方就起义达成协议。是日晚，泉州团队派 100 多名群众前来搬运军用物资。陈集合队伍宣布从现在起，第 325 师与国民党决裂，走上起义的光明大道，加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同时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了起义电文。起义部队由向导带路，连夜开进官桥，并自行在此进行整编，成立了“闽南地区起义部队司令部”，陈任司令，郭崇山任副司令，洪应百任参谋长。泉州团队派陈文任起义部队的政治代表，黄书麟任副代表；许祖义任军事代表，郭昆山为副代表。

9 月 5 日，人民解放军第 29 军接受改编第 325 师的任务。中旬，第 325 师开至南安丰州，在军政治委员黄火星主持下，由第 87 师负责改编整训。21 日，正式编入第 29 军第 87 师第 261 团，陈言廉任团长。此后，该团参加了解放福建永安、大田、明溪等县和清剿闽西南国民党残匪的战斗，在清流、宁化一带清剿残匪中，战绩显著，受到嘉奖。

准格尔旗保安师起义

1949年8月28日，国民党准格尔旗保安师司令官奇天祥率部1250余人举行起义，到达解放区。

准格尔旗位于原绥远伊克昭盟东部。1948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绥蒙军区姚喆司令员指挥下，发起河西战役，解放了河曲县黄河西岸地区。3月，又解放了准格尔旗的纳林、沙圪堵，迫使纳林守敌国民党伊盟第1警备区退守神山；驻军沙圪堵的准格尔旗保安司令部逃往黄河北岸老三窑子（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4月，解放军攻克神山，俘获伊克昭盟第1警备区少将司令奇涌泉和少将参谋长陈有明以下官兵450余人，其残部逃往达拉特旗。至此，准格尔旗黄河南岸的广大地区全部解放，建立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第一个蒙旗自治政府。

为了宣传和推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伊东工委根据西北局城工委指示精神，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伊盟支队司令部名义发表布告与宣言；以支队司令王悦丰和支队副司令马富纲名义，向伊东各旗王公地方武装写信，争取联合；对在神山战斗中被俘的少将司令奇涌泉给予优待与安排。这些举措促进了伊东几个旗的官府和地方武装与中共伊东工委和解放军内蒙古部队的友好往来。逃往黄河北岸的准格尔旗保安司令奇致中表示“愿意投诚解放军”，并于11月5日发表起义通电。后因其部队军心动摇和内部发生内讧，奇致中被国民党绥远当局扣押查办。12月奇天祥被委任为准格尔旗保安师司令。

奇天祥，蒙古族，1919年8月生。抗日战争时期，奇天祥任旗保安总队上尉参谋。后投靠日军，1943年任伪蒙古军第12师第3旅旅长。1945年10月，傅作义将伪蒙古军收编，委任奇天祥为国民党暂编骑兵第2旅少将旅长兼河防司令。在解放军进行绥远战役期间，奇天祥未作抵抗，并给解放军送烟酒表示慰问。1948年12月，董其武委任奇天祥为准旗保安司令部少将司令。不久，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为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的方针，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奇天祥预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将得天下，对保安部队何去何从，正在犹豫之时，中共伊东工委工作人员浩帆（奇天祥小学同学），为争取奇率部起义，托奇的姐夫捎口信动员奇认清形势，选择光明道路。带部队到解放区来。奇天祥听后很高兴，随即给中共伊东工委负责人写信，表示愿意率部反正。7月下旬，奇派人持信去解放区准格尔旗沙圪堵。中共伊盟盟委指示给奇天祥写了回信。要求将部队人员、装备造表册选送中共准格尔旗人民政府，再确定起义的日期。奇天祥接信后决心率部起义，投向解放区。

正当双方联系有关起义事宜时，被副司令庄重三侦知后密报董其武，董便令奇天祥去归绥参加军事会议，待奇到达归绥后即将其予以软禁。此时，绥远解放已成定局，奇天祥为急于脱身，借口有病住进医院。8月下旬，奇天祥秘密派人调了30多名骑兵，暗伏城外，约好时间，将奇从医院接走。奇回驻地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举行起义。

1949年8月28日，奇天祥率准格尔旗保安部队分头从高龙、七卜尔窑渡口过了黄河，到达了解放区。11月5日，奇天祥还正式发表了起义通电。电文最后说明：“今我率同全体官兵1250名，向全国郑重宣布：自即日起，脱离国民党压迫下之关系，誓愿参加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与内蒙古自治区

云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努力迈进。”保安师起义后不久即奉命参加了伊西地区的剿匪战斗，部队受到了锻炼，许多官兵荣立了战功。1950年9月，伊盟军区在达拉特旗召开了各旗起义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伊盟原有部队进行了整编。准格尔旗保安师与警备师、3支队（准1团）合编为伊盟军分区1支队。奇天祥为支队长，王生前为政治委员，支队下属3个大队，全支队共计1400余人。

准格尔旗保安部队起义，打击了阻碍绥远和平解放的顽固分子；参加剿匪战斗，为巩固伊盟人民政权做出了一定贡献。奇天祥率部起义后，曾先后担任内蒙古民政厅民政处副处长、内蒙古军事室参事、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等职。

岷县起义

1949年9月11日，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第120军第173师师长陈叔钵、代理第一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孙伯泉、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等率部6000余人在甘肃省岷县通电起义，促使岷县和平解放。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甘肃，直逼兰州。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于8月11日率领部属南逃，到达岷县，与国民党第一行政督察区代理专员、原岷县县长孙伯泉会合。后来，国民党第120军第173师师长陈叔钵也带领5个营的部队来到岷县，一时间，岷县集中有各种番号的国民党军队六、七千人。为统一指挥这些部队，周祥初和孙伯泉牵头，成立了甘肃自卫军总司令部，周祥初任总司令、孙伯泉任参谋长，所有部队编为2个师，陈叔钵任第1师师长，原师管区参谋主任雍国栋任第2师师长。

周祥初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军军长，1942年在湖南与日军作战中，因与上司发生争执，被调任第6战区教导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察哈尔省民政厅长，在此期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回甘肃渭源县，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郭寄峤因与周祥初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于1947年委派周到平凉任专员兼保安司令。保安副司令任谦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来往密切，周也受到一定影响，曾与任谦一起进行民主活动。1948年6月，因叛徒告密，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任谦。在周祥初的掩护下，任谦脱险，去了延安。后来，双方仍一直保持联系。

1949年8月12日，在天水地区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康君实、李般木到达岷县，与周祥初取得联系，以王震司令员派遣的身份，和周祥初进行谈话，传达了解放军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劝说周祥初顺应时势，以人民利益为重，早举义旗，为解放西北立功。经过长时间谈话，双方相互取得信任后，周祥初说：“我对时势已经看清楚，对国民党不抱幻想，感谢王震司令员的好意，我同意起义。”后来，根据周祥初的要求，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专门派出甘肃省军管会主任任谦到岷县协助组织起义，使周祥初消除了各种疑虑，更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与周祥初一样，参谋长孙伯泉等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人民解放军解放甘肃指日可待，只有举行起义，才是走向光明的唯一道路。周祥初和孙伯泉统一了起义的思想后，积极做好驻守岷县各级军政要人的思想工作，逐步统一了大家走和平起义道路的思想，并决定联络临潭县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生华和卓尼地区大土司兼国民党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一起共同起义，积极做好联合起义的组织工作。随后，周祥初、孙伯泉召集各部队连以上军官和地方行政机关负责人开会。在深入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光明出路，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9月11日，周祥初、孙伯泉、陈叔钵、杨复兴等率领国民党甘肃省保安第2团、第5团、第173师、师管区补充第1团、第2团、补训第4团、甘肃省骑兵大队、第1行政区保安大队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共6千余官兵，发出了《接受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待命接受改编》的通电，宣布起义。9月14日，彭德怀等电贺周祥初、孙伯泉、杨复兴说：“你等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行列，前途光明，殊堪庆贺。”接着，根据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首长的指示，驻岷县的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1军，周祥初任军长，

孙伯泉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师，陈叔钵任第 1 师师长，雍国栋任第 2 师师长。

岷县起义，从政治上促进了甘肃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分化瓦解，为加速甘肃的最后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带动了驻武都第 119 军王治歧、蒋云台的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开辟了通道。

绥远起义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率部9万余人在绥远省（今内蒙古）举行起义。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西安、兰州也先后解放，使绥远之国民党军处于四面被围无路可逃的境地。

绥远董其武部，属华北“剿总”建制，董其武为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等将领都是傅作义的老部下。因此，北平和平解放直接决定着绥远问题的解决。早在北平和平谈判中，傅方代表即提出了“平津塘绥一齐解决”的方案，中共中央考虑到平津处于双方军事对峙形势下，面临各种复杂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一齐解决，困难很大，故决定先解决平津问题。后来在谈判中，又向傅方代表说明，解决绥远问题可采用更缓和的方式。1月22日，董其武飞往北平，傅作义向董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展情况，并指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该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1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对绥远可以双方停止战斗，维持现状。2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时，第一次提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临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依照“绥远方式”，双方派代表进行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中共方面代表是李井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张友渔（华北人民政府秘书长）、潘纪文（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长）；傅方代表为王克俊（原华北“剿总”秘书长）、周北峰（原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绥远省政府厅长）、阎又文（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谈判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治委员薄一波直接领导下进行，并经常向周恩来副主席报告。双方经过多次谈判，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我方作出让步，等待他们的觉悟。这样，双方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5月28日，双方代表在北平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俱乐部华北局会议室举行了签字仪式。6月5日，双方在北平市人民政府举行最后一次会谈。6月8日，双方正式签定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内容大体是：双方同意停止一切冲突；撤退沿线驻军，和平共处；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商业贸易往来；由华北人民政府派出驻归绥联络机构。6月20日，中共华北局批准，建立以潘纪文为书记的党的归绥工作委员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傅作义也于6月14日派王克俊等人前往绥远，协助董其武实施起义。

董其武和大多数绥远军队及地方首脑虽然对《绥远和平协议》是赞同和拥护的，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和艰苦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在绥远的驻军有8.6万余人，其中董其武、邓宝珊部共5万人，是起义的主要力量；地方杂牌军约2万余人，军纪涣散，内部复杂；还有国民党中央军1万余人，其领导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反对起义，是起义的障碍。为组织

这样一批军队起义，董其武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绥远开展了革新运动；解除了一些思想反动的国民党官员的职务；将在绥远的 100 余名国民党特务集中到革新学院学习；同时对部队官兵加强思想工作。这一系列的举措促进了大多数人思想认识的转变。

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企图阻止绥远起义。蒋介石为动摇董其武起义的决心，先采取压的手段，命令绥远国民党军队西撤，并停发绥远的补给，以迫使董其武就范。接着用拉拢的办法，先后多次派遣军政大员，如国防部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等前往绥远，封官许愿，要董其武任西北军政副长官，拨发黄金 1900 两，以明升暗降来架空董其武，但都遭到董其武等拒绝。与此同时，一小部分国民党反动势力四处进行破坏和捣乱。有的袭击解放军和杀害中共驻绥远联络处的工作人员；有的组织“华北反共救国军”，企图制造混乱，破坏和平局面；还有的煽风点火，张贴反动标语等，对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董其武采取了坚决措施，对一些反动军官和特务进行了惩办和镇压。

8 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等，希望傅作义和邓宝珊亲自到绥远促成起义。8 月 24 日，傅作义和邓宝珊等一行多人，在潘纪文陪同下，由解放军一个营护卫，前往绥远。薄一波、聂荣臻到车站送行，绥远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和省政府杨植霖，在丰镇同傅、邓二位将军一起畅谈了当时的战争形势以及董其武部队的情况等。董其武派人到丰镇迎接傅将军，并派一个营乘铁甲车到旗下营车站迎接。8 月 25 日下午 5 时，傅作义的列车临近归绥车站时，董其武等省府军队将领在车站迎候。

8 月 26 日至 9 月 10 日，傅作义、邓宝珊分别接见了驻归绥、包头等部队的高级将领和各界知名人士及工农代表。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对绥远的方针政策，颁发了中共赠送的慰问品慰问金，并对军政干部进行了耐心说服教育工作，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坚定了走和平起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这样，起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9 月 16 日，董其武让李忠孚（原绥远省办公厅主任）和阎又文合拟了为绥远起义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通电稿，送呈傅作义审阅，并电发北平呈毛泽东主席阅示。9 月 18 日，傅作义、董其武、王克俊派人将起义通电和签名名单送到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负责人鲁志浩待电稿回丰镇向省委作了汇报。

9 月 19 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 39 人，发出起义通电。电文说：“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绥远起义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9 月 20 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董其武等发出贺电，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董其武率部起义后，部队编为人民解放军两个军、一个骑兵师。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绥远不再用军事管制方式，而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任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 23 兵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

董其武率部起义，使绥远得以和平解放，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用“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开始，也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战略决策。董其武将军及其部属受到了共产党的信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长治号舰起义

1949年9月19日，在中共上海局地下党组织策动下，国民党海军海防第1舰队旗舰长治号舰，由帆缆中士陈仁珊、枪炮上士林寿安和帆缆中士李春官等组织、领导和发动，全舰167名官兵于长江口外的大戡山海面起义，胜利驶抵上海黄浦江外滩武昌路码头。

长治舰原系日本海军宇治号驱逐舰，排水量1350吨，最高航速每小时24海里，配有120毫米主炮3门，40毫米机关炮1门，25毫米机关炮8门。抗战胜利后，该舰被国民党海军接收。轻巡洋舰重庆舰起义后，长治舰便是当时国民党海军中航速最高、火力最强的一艘主力军舰。促成长治舰起义的主要原因：一是官兵关系紧张，派系矛盾尖锐。舰上的主要军官多为汪精卫伪海军留下的，保留了一套日本的军阀作风，随意打骂士兵；二是陆军出身的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后，提拔重用雷系、青岛系海军人员，排斥、打击马尾系官兵，更加剧了内部的派系矛盾。复杂尖锐的内部矛盾，使广大士兵产生强烈的摆脱国民党统治的愿望。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策动长治舰的起义工作。1949年1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派地下党员陈健藩通过原昆仑舰军需上士何礼坟，对长治舰陈仁珊进行争取工作，并给其布置任务相机率舰起义。3月下旬，陈健藩随昆仑舰行动，长治舰陈仁珊等策反关系移交给王锡珍，改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林城直接联系和领导。

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长治舰撤往舟山群岛定海驻泊。在军舰远离上海、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陈仁珊、林寿安、李春官等根据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指示。秘密进行串联，积极发展人员，到9月初表示起义人员已发展到43人。这些人员分布在轮机、航海、枪炮、通信等重要部门，是“清一色”的福建籍士兵，起义决心大，保守秘密好。他们抱着起义如果失败，就炸毁军舰，与国民党反动军官同归于尽的坚强信念。

9月中旬，长治舰接到开往长江口外封锁上海吴淞口的任务。陈仁珊等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动起义的机会，立即作了周密布置和具体分工。15日上午，长治舰驶出定海港。17日，在长江口外，舰上反动军官指挥士兵抢劫一批民船，晚上和第二天军官们都忙于分脏，大吃大喝；18日晚天下大雨，在甲板上纳凉露宿的士兵都回舰舱睡觉，又给起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9日凌晨2时零5分，长治舰士兵起义组织按照预定计划敲钟为号发动了起义。听到舰钟，起义人员迅速各就各位。陈仁珊、李春官先到军官住舱打死了反动的枪炮官和睡在那里的一名特务士兵。林寿安、陈世忠、林迪标等在驾驶台打死了人人痛恨的副舰长孔祥栋。舰长胡敬端，刚调上舰不久，罪行未彰，本想留下他开船，但因其反抗，也将其击毙。随后，王祖朝又打死航海官，陈仁珊去支援电讯房战斗，协助打死了电讯官，命起义士兵王绳武、吴世恭控制了电讯房。这时，前甲板有八九名反动士兵在夺起义士兵的枪，正争夺间，陈仁珊赶到，喝叫反动士兵松手，起义士兵趁势将夺枪的士兵击毙，其余反动士兵均被押下，关进了第一士兵舱。此时，堆放在前甲板的120毫米炮弹中弹爆炸，引起大火，随时都有再次爆炸的危险，险情非常严重。陈仁珊、翁玉禧、郑则祥、严增祺、王祖朝等不顾生命安危，奋勇将大火扑灭。陈仁珊独自一人，从火中搬起11发灼热烫手的炮弹投入海中，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保全了舰只。董须望控制了一挺重机枪，封锁着通道，并不停地对海射击，鸣枪助威，鼓舞起义士兵的斗志。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的浴血战斗，起义人员控制了全舰。经验丰富的老舵工郑宝德亲自领航，将长治舰驶进航道复杂的长江口，拂晓5时，安全停靠上海外滩武昌路码头。全舰178名官兵，除反抗起义被击毙11人外，其余167人全部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

长治舰起义，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华东地区最后一艘军舰起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荣誉。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复电长治舰官兵时写到，“庆祝

指江阴电雷学校毕业的军官。

指青岛海军官校毕业的军官。

指福建马尾海军官校毕业的军官。你们的英勇的起义行动。由于国民党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10月底，长治舰全体起义人员编成“长治中队”参加南京海校学习。

国民党当局对长治舰起义，大为恼火。多次派据守舟山群岛的空军轰炸长治舰。起义人员利用舰上火炮进行英勇还击。最后，上级决定长治舰驶靠南京下关码头，拆去舰上主要仪器、火炮、电台后，打开海底门自沉燕子矶以东江面。1949年底，长治舰打捞出水修复。1950年，中央军委将长治舰命名为“南昌舰”，正式编入中国人民海军序列，担任东海舰队旗舰，曾多次参加解放沿海地区的战斗，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八十一军中卫起义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第81军军长马惇靖与父亲马鸿宾一起率领军部和第35师、第294师、第358师共约1.6万余人在宁夏中卫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以后，9月中旬，解放军第19兵团进军宁夏，在中宁县黄河南岸的常乐、枣林一带歼灭了国民党第81军两个团，随后，经过学习教育，将被俘官兵释放回中宁，让他们对第81军下层官兵开展瓦解工作。与此同时，解放军第19兵团联络部长甄华在兰州邀请郭南浦、马宏道、马凤图、马季康、马元风、马忠汉、白连升、杨思等，组成一个“和平代表团”，以彭德怀的名义，从兰州到达银川，重点做争取马鸿宾的工作。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和协商，马鸿宾表示同意请代表到中宁石空渡口与马惇靖谈判起义问题。郭南浦等和谈代表到达石空渡口与马惇靖见了面，双方谈判十分顺利，马惇靖说：“我们军人的职责是保国卫民，毛泽东主席比蒋介石好，人民解放军比国民党军好，我们就跟随毛主席，跟随解放军。”随后，郭南浦等一起到中宁向甄华汇报了情况，马惇靖也派出代表马培清与解放军具体协商起义条件。这时，国民党派徐永昌乘飞机经银川到包头去劝阻傅作义和董其武在绥远起义，马鸿宾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存有疑虑，对起义后的前途放心不下，便搭乘徐永昌的飞机到包头分别向傅作义和邓宝珊讨教，傅作义告诉马鸿宾说：“和有利，战不利”；邓宝珊力劝马鸿宾：“既要起义，就要打消不必要的顾虑，不要轻信谣言，以免误入歧途。共产党的政策是欢迎起义的，也是优待起义人员的，将来对起义人员，不论是官是兵，一定给予妥善安排。前面已经有不少起义的例子，你要解除怀疑。”通过与傅作义和邓宝珊密谈，马鸿宾心中有了数，坚定了起义的思想。18日，又随徐永昌的飞机返回银川，连夜做儿子马惇靖的工作，鼓励他坚定走起义的路。

9月19日，国民党第81军军长马惇靖与解放军第64军军长曾思玉在中宁经过正式谈判，下午5时，双方代表两军签订了《解放军第19兵团与国民党第81军和平协定》。至此，马鸿宾、马惇靖父子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率领第81军16000余官兵起义，并按协定组织黄河以北船只，迎接解放军渡河，然后将部队集中在中宁地区，等待解放军改编。随后，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国民党第81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2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委。第81军的起义，减少了宁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对宁夏全省的解放起了积极作用。9月26日，银川成立军管会，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任副主任。12月，马鸿宾任宁夏省副主席，1950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甘肃人民政府副主席，3月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3年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民族委员会委员，1958年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民族委员会委员。

夏河起义

1949年9月20日，国民党甘肃藏区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率部于夏河举行起义。

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同中共党员宣侠父有过接触，并得到过共产党的帮助，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所了解。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期间，中共陇右工委曾指示中共党员常秋英，督促她的丈夫、拉卜楞保安副司令张子丰劝说黄正清起义。8月下旬，甘肃临夏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员王震，派国民党起义军官李福林、商人杨贯一前往夏河，劝说黄正清率部起义，受到该部第2团团团长黄祥及数千群众欢迎。随即夏河县推选韩志华、苏贵仁、尹景之3人为代表，前往临夏迎接人民解放军。这期间，黄正清派兰州办事处处长王次辰从兰州撤退途中，遇到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某部，该部负责人委托王次辰将王恩茂政委的信转交给黄正清，信中敦促其派人到临夏商谈和平解放夏河事宜。这时，黄正清已于8月底率警卫队300多人撤到夏河东南100里的阿木去乎。黄接到信后，即派张子丰及副官长黄立中、拉卜楞寺院代表俄顷，于9月初前往临夏联系。他们带回王震司令员给黄正清的信，黄见信后即决定起义，并率部返回夏河。

9月20日，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牙含章、人民解放军第186师第556团团长刘光奇率1个营前往夏河进行接管工作。在夏河，他们受到了黄正清、黄祥、达吉等上层人士及各族群众2万多人的夹道欢迎，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后，黄正清前往兰州，受到解放军第1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亲切接见。随即，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改编为夏河民兵司令部，黄祥为司令员，受中共夏河工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

达理扎雅率部起义

1949年9月23日，阿拉善旗扎萨克（“扎萨克”，相当于旗长，俗称“王爷”）兼区防司令部司令达理扎雅中将率部1300余人在内蒙古阿拉善旗举行了起义。

原阿拉善旗（包括今阿拉善左、右旗和磴口县），位于内蒙古西部贺兰山西麓，从清朝康熙皇帝批准建旗起，至1950年废除封建制度止，共有九代10位王爷在这里统治了250余年。1931年，该旗第八代第9位王爷塔旺布里扎拉病逝，同年7月由其长子达理扎雅继承了硕亲王王位（以下简称达王）。193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政部组建了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达王被任命为少将司令。1938年初，宁夏军阀马鸿逵为霸占阿拉善旗，以达王私通日本的莫须有罪名上报南京政府，并以武力将达王挟持到兰州软禁，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自由。1946年7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致函达王，请他加入国民党，并加封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大代表、蒙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顾问、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议及宁夏省政府参议等头衔。同年9月1日，又恢复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建制，晋升达王为中将司令。司令部下设办公室，参谋处、副官处，骑兵保安总队等部队。

1949年1月1日，当北平即将解放时，被蒋介石保护而隐居北平达3年之久的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乘南京派来的专机逃离北平。抗日战争时期，德王积极配合日军进占绥远地区，大搞民族分裂，组织“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次南京政府接德王到南京，就是为派他到内蒙古西部去搞“蒙古自治”，以与共产党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相对立。4月初，德王由兰州到了定远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在定远营积极筹备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于1949年8月10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达王任副主席、吴鹤龄任参议会议长。会后以大会名义向李宗仁代总统、行政院长阎锡山发了电报。8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进逼兰州，德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还未得到批准，官员们预感到大事不妙，便纷纷逃散。

此时的阿拉善旗政府，虽然处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但又面临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形势。对于阿拉善旗的出路何在，达王决定召开秘密会议共同商讨。在会上，达王分析了国共两党的战局，总的认为“是‘国军’失利，共军胜利。”大家在商讨中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走和平解放的路，有的主张逃跑。最后逐渐明确了准备效仿傅作义将军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会议结束时达王说：“北京的和平解放，是人民意料不到的事，非常受重用的傅作义将军与共产党作战多年，如今竟投靠共产党了。……共产党对傅作义都能宽容，象我们这样的人，共产党恐怕是不会杀害的。和，看来是我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当解放军向兰州进军的时候，达王密派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朱子馨上校前往兰州做联络工作。9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宁夏和绥远活动，会见达王时再三动员规劝达王离大陆去台湾，达王婉言拒绝。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兰州，被达王派去兰州做联络工作的朱子馨上校，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并随同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官员和社会名流晋见了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解放军第19兵团联络部长甄华同朱子馨谈过三次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朱接受了向达王转达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任务后返旗，促进了达王率部起义。

在中共地下党的争取下，达王长婿，原国民党整编骑兵第1旅少将旅长

张钦武，于 9 月 15 日率部投诚。当夜他派副官宋来善乘马到定远营给夫人达蒨芬送信，信中主要讲了他投诚后，解放军对他的优待和保护，并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等，达王接见了宋副官，详细询问了投诚前后的情况。宋副官对共产党的优待政策一一陈述后，更稳定了达王的情绪，消除了他对共产党的疑虑。

9 月 20 日，德王带随员 20 余人逃往边境的图克木庙去了。达王便立即决定将“蒙古自治政府”改名为“西蒙自治政府”，以避免同乌兰浩特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相对立。9 月 22 日夜，达王召开了决定通电起义的会议。会议通过了通电起义的提案，同时决定派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等 3 人为代表，赶赴宁夏向人民解放军面陈起义事宜。9 月 23 日，达王签署通电起义代电文件。

罗代表一行 3 人抵达银川后，将起义代电呈给了人民解放军 19 兵团政治机关。第 19 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等首长接见并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9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追剿宁马残敌的第 188 师 564 团在徐成功团长率领下，到达阿拉善旗地区。9 月 29 日，徐团长应邀代表解放军赴定远营，首先拜见了达王等上层人士，然后视察了起义部队，向他们讲解了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受到了热烈欢迎。

10 月 3 日，杨得志司令员对达王高举义旗，脱离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曾复电嘉勉。10 月 10 日，达王在朱子馨等人陪同下，前往银川，晋见兵团首长后于 16 日返回定远营。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原区防司令部和旗政府的军政官员，依旧在原工作岗位上执事供职。达理扎雅中将起义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阿拉善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蒙古自治州州长、原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彦淖尔盟盟长等职。1968 年 11 月 18 日逝世。起义人员都为内蒙古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酒泉起义

1949年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部、第8补给司令部、第91军、第120军、第231师骑兵第9旅等2万余人，由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陶峙岳领衔通电起义，加速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的进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撤销了兰州第8战区长官部，改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治中任军政长官。1949年春，张治中赴南京参加北平和谈，离开兰州，由副长官陶峙岳代理长官。4月20日，北平国共谈判破裂，张治中留在北平不归，并于6月26日向全国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7月27日，国民党正式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8月26日，解放军解放兰州，马步芳逃离西北到重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带着第91军和第120军5个师的残兵败将向河西走廊逃窜，逃至酒泉。没过多久，刘任也丢下部队，带着几个部下乘飞机逃往重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实权落在了副参谋长彭铭鼎手中。

此时，驻守新疆的部队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领导下已经酝酿和平起义。驻酒泉的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四面包围，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驻新疆的陶峙岳多次打电话催促彭铭鼎直接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商量和平起义问题。

9月21日，陶峙岳派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由酒泉到兰州会见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取得了新疆、酒泉同时起义的指示。曾震五路过高台时，与国民党第91军第246师师长沈芝生会晤，曾向沈出示了张治中、陶峙岳关于有关起义的电报和亲笔信件，并劝沈芝生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组织起义。沈芝生师长在曾震五的劝说下，坚定了起义的决心，分别时，还专门派兵护送曾震五到张掖与解放军第1兵团王震司令员见面。

9月21日，解放军第1兵团派第2军第5师副参谋长刘振世赴高台，做驻守高台的国民党第91军第246师的起义工作，并与彭铭鼎取得了联系。彭铭鼎与刘振世在高台西数十里的一个村庄会面。刘振世转达了第1兵团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要求驻酒泉的国民党部队原地待命，准备起义，并负责保护玉门油田的安全。

9月22日，彭铭鼎在酒泉卫生街21号住处召集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第246师师长沈芝生、第173师师长李焕南、第91军参谋长郑壮怀、第120军参谋长宋耀华、宪兵团长曹叔希等开会，商讨起义问题。经过两天一夜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决定组织部队起义。

9月24日，驻酒泉的国民党部队2万余人，由陶峙岳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部、第8补给区、第91军、第120军残部、骆驼兵团、通信第7团、工兵第7团、宪兵第22团等。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将领有：公署少将副参谋长彭铭鼎、彭月翔、公署中将高参拜佛、河西警备总部少将参谋长汤祖坛、第8补给区司令部中将司令曾震五、第91军少将参谋长郑壮环、第120军少将参谋长宋耀华、第245师中将师长刘漫天、第175师少将师长李焕南、第246师少将师长沈芝生、第191师少将师长冯济安、第231师上校师长田子梅、骑兵学校少将教育长粟鼎、宪兵第16团上校团长曹叔希等，还有其他少将军官24名，上校军官101名和大批中校、少校军官。

25日，解放军第2军在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率领下，进入酒泉。同日，

解放军第2兵团派出快速部队解放玉门油矿。26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给陶峙岳复电，对他率部起义表示热烈欢迎。

10月中旬，起义部队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第3、第4军及第2兵团直属队，彭铭鼎任第2兵团副参谋长，彭月翔任第4军副参谋长，汤祖坛任第3军副参谋长。其他起义将领、军官和士兵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国民党部队在酒泉起义，不仅加速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的进程，而且使人民财产特别是玉门油矿免受战火破坏，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疆起义

1949年9月25日、26日，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和地方政府，分别由新疆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通电起义，促使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进行谈判，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磋商，拟定了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国民党代表团委派黄绍竑和屈武回南京，请求南京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屈武是新疆迪化市市长，抗战时期曾接受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岳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关系，影响国民党上层，多次受领和完成共产党所交给的任务。临行前，周恩来找到屈武，询问新疆部队将领情况，特别是陶峙岳的政治态度。屈武说：“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新疆起义，只要是张治中的意思，他完全会同意的。”周恩来还对屈武说：“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黄绍竑和屈武到达南京，国民党行政院召集会议，否决了《国内和平协定》，国共和平谈判破裂。黄绍竑去了香港，屈武先到上海看望岳父于右任一家，然后搭乘甘肃省主席郭寄峤的飞机，经兰州回到新疆迪化。

屈武回到迪化以后，立即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商谈新疆实现和平问题，在两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他们一起向陶峙岳汇报了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解放的意见。由于当时新疆的兵力主要控制在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和骑兵第1师师长马呈祥手中，陶峙岳只能控制四分之一的兵力，所以，他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明确表示要积极努力地争取走和平起义之路。

6月26日，张治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时局的声明》，态度非常明确。8月下旬至9月初，兰州、西宁相继解放，马步芳集团被歼灭，胡宗南退守汉中，新疆通往内地的陆路通道已被切断。此时，新疆一些领导人赞成和反对新疆起义的态度已十分明朗。赞成新疆和平解放的，军界方面以陶峙岳、赵锡光、陶晋初为主；政界方面以刘孟纯、包尔汉、屈武、刘泽荣等为主。反对起义的，军界方面以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为主；政界方面以麦斯武德、伊敏、艾沙、贾尼木汗、乌斯满等为主。起义和反起义之间斗争仍然激烈。

为了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陶峙岳、包尔汉等一面大量制造舆论，通过《新疆日报》开辟专栏，登载《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大力宣传和解放新疆的意义；一面派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人事室主任努斯热提为代表，到绥来玛纳斯河前线，和三区民族军代表谈判，达成双方互不进犯的口头协定。陶峙岳分别于5月和8月两次亲自约会驻在喀什的国民党警备副总司令兼第42军军长赵锡光，对新疆和平起义进行了详细研究，商定南疆的起义由赵锡光负责，北疆由陶峙岳负责。8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力群由伊宁到达迪化，住在包尔汉家，转交了张治中劝说新疆军政人员起义的电文，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以及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期望，加速了新疆起义准备的进程。

9月14日，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在迪化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家属、物资转移，并准备把部队开往内地，还根据胡宗南密电，准备秘密捕杀赞成新疆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逼迫陶峙岳率部撤往南疆，破坏新疆和

平解放。但他们对陶峙岳很尊重，因为陶峙岳在胡宗南手下工作多年，任过第38集团军总司令、第1战区政治部主任，是他们德高望重的老上级。所以，他们在行动之前找到陶峙岳，陶峙岳也乘机做他们的工作。9月23日，胡宗南又分别给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发电，要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进军和陶峙岳、包尔汉等各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后，叶成、马呈祥和罗恕人向陶峙岳等表示，如果能将他们的财产折合金银付给，放他们出国，他们就愿意交出部队，循南疆去印度。为了避免起义节外生枝，陶峙岳等经商议研究后，同意他们的要求，准其携带家属及个人财产于9月24日离开迪化南行，经南疆到了巴基斯坦。叶成、马呈祥、罗恕人一走，新疆起义的障碍扫除。

9月25日，陶峙岳将军率领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所属整编第42师、整编第78师、整编骑兵第1师及驻新疆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空军地勤人员等近10万官兵，通电起义。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及所属单位，也在包尔汉、刘孟纯、屈武等率领下，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至此，新疆和平解放。

10月8日，陶峙岳带着供应局局长郝宗俊到酒泉会见了彭德怀、王震，商定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10月13日，彭德怀、王震到达迪化，宣布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下辖第9军和5个师，主官均由起义军官担任。

新疆起义，对巩固西北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平起义

1949年9月25日，在中共金平特支的领导发动下，云南省金平县农民8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

金平地处云南边疆，南与越南接壤。这里居住着9种民族、9万多人口。由于深受国民党势力、世袭土司、地主恶霸等勾结欺榨，人民生活极端艰难。1948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在金平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全国解放战争。是年冬，中共个别旧党组织派马子培、王平曾等一批党员和进步分子到金平协助金平特支发动群众，秘密成立了地下农会——“弟兄会”，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组织，积极进行起义准备。

1949年9月25日，根据中共金平特支决定，武装起义正式在该县各地举行。在铜厂镇，王平曾于是日晚饭后，召集了中共党员、“民青”团员和“弟兄会”会员进行紧急动员会，会后，六、七十名起义人员分3路，高举镰刀、斧头、扁担等武器进攻镇公所，活捉镇长，击毙一个武装师爷，缴获步枪三、四十支，迫使10多个武装镇警投降；在新建镇，马子培、陈维庆等率领起义农民攻打镇公所，打死镇长刘吉和，俘获镇公所的全部武装人员，缴获步枪五、六十支、轻机枪一挺；金河乡起义后收缴步枪10多支，该乡乡长率武装逃走；在县城，原计划新建镇、金河乡起义后，支援县城里应外合进攻县政府，活捉县长，消灭县主力，由于准备不足没有成功。

全县起义后，队伍达三、四百人，编成4个大队，汇合到十里村、白马河、保山寨一带，积极准备攻打金平县城。10月3日，第一次攻打未克；10月9日，在争取到同国民党保安团交战的“民革”万保邦所属赵汝慕部300多人的配合下，起义队伍一举攻克县城，金平县城获得解放。后来，起义武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10支队护9团。

塔旺嘉在率部起义

1949年9月27日，国民党额济纳旗扎萨克兼防守司令部司令塔旺嘉布中将率部170余人举行起义。

塔旺嘉布1899年出生于蒙古王公贵族世家，1929年开始任旗府官员，1938年继任王位，所以这次起义亦称“塔王起义”。

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该旗于1731年（清雍正九年）额济纳正式建旗，清朝封该部王爷丹忠为“多罗贝勒”（仅次于亲王、郡王的爵号）。传至第10位王爷达什时，晋为郡王加亲王衔。该旗最后一位王爷即是塔旺嘉布中将。从建旗至解放，共有12位王爷在此地统治了200余年。该旗的民族部队，也只是由王爷兼防守司令的一个170余人的骑兵大队，执行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兵员也是沿袭蒙旗兵役制度——换班义务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周仁山等赴额济纳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团结教育蒙古族青年走革命道路。同时还与蒙古王公贵族的上层人士有较长时间接触，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当时塔王就曾说：“共产党的政策比国民党的政策好。”当周仁山遭国民党特务搜捕时，塔王曾给周提供护照、乘骑及蒙古族服装，并派专人护送，安全转移脱险。

1949年8月26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9月23日解放银川。额旗东、南、西邻都已解放，它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时一贯保持中立的额济纳旗扎萨克兼防守司令塔旺嘉布中将，认为此时应是顺乎国情民意，立即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投向共产党的好时机。于是，他召集本旗几位重要官员和心腹，紧急磋商举行起义重大问题。经过商讨，一致同意立即通电起义。

9月27日，以塔旺嘉布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宣布与广州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接受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同时，塔王又派代表前往甘肃酒泉与人民解放军接洽，受到了酒泉党政军首长的亲切接见和嘉勉。

10月上旬，甘肃省酒泉军分区，根据第1野战军首长和领导机关关于迅速改编原额济纳旗骑兵大队的指示，很快将起义部队改编为额济纳旗人民骑兵大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10月中旬，经过协商，建立了额济纳旗临时人民政府，塔旺嘉布任旗长。

10月15日，刚刚完成整编任务的额济纳旗人民骑兵大队，奉命参加剿匪肃特的战斗任务，在截击企图东逃的200余匪军作战中，除毙伤敌人多人，还俘敌19名，受到酒泉军分区首长的表扬。不久，随着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编制体制的变化，起义部队最后改编为该旗的人民武装部。起义官兵，大都先后转业或复员到地方工作，为内蒙古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塔旺嘉布中将率部起义后，历任额济纳旗临时人民政府旗长、额济纳自治旗人民政府主席、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及政协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委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副盟长等职。于1960年病逝，他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人员起义

1949年10月10日，在孟鞠如、凌其翰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馆的部分外交人员举行起义，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

国民党驻法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思想倾向革命，不满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曾于1947年就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来往。1948年8月，凌其翰以公使身份到了巴黎，同他的好友孟鞠如、钱能欣等一起，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10日，起义人员得知国民党政府已觉察其行动，决定调孟鞠如、凌其翰回国，并派段茂澜、董霖等人到巴黎企图瓦解起义的关键时刻，及时与法、英、美等国的通讯社、报社联系，发出了起义消息，并召开了各国驻巴黎记者的招待会，宣布了起义的消息和主张。10月1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给孟鞠如等人发来指示，要求他们坚守岗位，把驻外使馆交还给人民，同时号召其他使馆人员向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学习。

11月初，段茂澜通知法国外交部，关闭国民党驻法大使馆，同时指使一帮打手殴打起义人员。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受到侨胞、进步留学生、旅法参战华工总会等进步团体的谴责、反对。并声援起义人员坚持斗争。

国民党驻法使馆起义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在它的影响下，国民党驻马达加斯加领事馆、驻英国利物浦领事馆、驻缅甸大使馆等先后起义，有100多名外交人员陆续回到了大陆。1950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孟鞠如、钱能欣继续留在巴黎，坚持斗争，其他起义人员回国工作。

第六十二军直属队湛江起义

1949年10月15日，国民党军第62军军部直属队警卫营、辎重团第1、第2营和工兵连、军部连、炮兵营第2连和弹药队等单位官兵1500余人，在警卫营营长邱德明等人率领下于广东省湛江市西营（现霞山）举行起义。

1949年1月，国民党第62军在平津战役中，除第157师外，全部被歼；2月在广州重建；6月，军部由广州调驻湛江市西营，原惠阳专员兼清剿司令张光琼任军长。在民主同盟盟员何中行、包浚明的劝导下，张光琼表示愿意起义，但调防后发生动摇，并于7月下旬弃官出走香港。此时，第62军已动摇的军心，因张的出走更趋不稳。针对这种变化，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决定加紧对该军中下层官兵的策反工作。粤桂边纵队情报参谋赵世尧以商人身份常住西营，负责策反工作。共产党员和民盟干部何中行、伍旭等在第62军内部分头活动，先后联络了军部警卫营营长邱德明、辎重团第1营营长彭智浚和第2营营长杨海球、军部连连长林青良、炮兵营第2连连长郭赞坚和该营弹药队队长方向，并与第151师第451团团团长张泰煜、第453团团团长张涤海取得联系。二张于年初曾通过同乡关系在香港与民盟联系要求起义。邱德明行伍出身，在第62军直属部队中资历较深，但职务上不得志，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不甘心为国民党卖命，很想另寻出路。中共党组织与他联系后，邱同意起义。

10月初，人民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粤桂边纵队政治部主任温焯华、第6支队司令员陈一林赴湛江市郊，召集赵世尧、何中行开会，听取起义准备工作汇报，决定第62军直属队和第451、第453团于19日夜同时起义占领湛江。后因情况变化，根据粤桂边纵队司令部传达中共华南分局急电，决定第62军准备起义的部队配合广州的解放，于14日晚就地起义。当日晚22时，邱德明令1个排由赵、何安排到郊外接应中共派来指导起义的干部和武装人员进城，同时通知直属队参加起义的人员到警卫营营部开会。会上决定：警卫营营部所在地“中正中学”为起义指挥部；以武力挟持副军长张一中，动员他参加起义，扩大声势；扣押副参谋长谭毓伦，逮捕军统特务、军部参谋处2科科长黄绍德和情报参谋骆华胄。任务区分：警卫营、辎重团第1、第2营分头解决国民党第50军留守处、联勤总部工兵第2营、自卫总队、联防大队、市府保安中队、税警中队等驻西营的武装单位；工兵连负责控制第62军军部；炮兵2连和弹药队负责监视炮兵营营部及其两个炮连的行动；军部连驻守起义指挥部。15日凌晨2时，起义部队开始行动。3时许，人民解放军代表、粤桂边纵队第6支队副司令员王克和中共地方组织代表、湛江市工委书记黎江一行30多人，到达起义指挥部。上午8时，起义部队顺利占领西营。驻西营之国民党10多个单位、21个据点全部投降。第62军副军长张一中在离家逃跑中被士兵乱枪击毙。俘虏官兵625人。营救释放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群众600多人。第453团团团长张涤海在共产党地方干部钟平等协助下，于当日下午率部在湛江湖光岩驻地响应起义，并解除了驻地附近联防队的武装。

16日，驻赤坎之国民党军第151、第153师向西营起义部队进犯。凌晨4时，进犯之敌在霞山村与邱营第2连交火，攻势不断加强。拂晓，海南岛之敌军派飞机、炮舰对起义部队阵地进行轰炸扫射，激战至下午15时，西营起义部队除作为指挥部的中正中学和彭智浚退守的东方银行两处阵地外，其

余阵地全部失守。在战斗失利、情况十分危机的时刻，驻中正中学和东方银行的两支起义部队各自为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并处决了被关押的两名军统特务。此时，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第6支队3个团兼程赶到湛江，第6支队第18团猛插西营西北的海头墟和录塘村，从背后向围攻起义部队之敌展开攻击，第17团切断西营至赤坎的公路，阻击赤坎方面援军；第16团部署在湖光岩、志满一线，担任翼侧警戒。与此同时，粤桂边纵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5团分别在廉江、遂溪阻击来自化州、吴川方面增援之敌。下午16时，起义指挥部与边纵司令部取得联系。经研究，起义指挥部决定由中共湛江市工委武工队的同志带路，于当晚20时向遂县方向撤退，靠拢边纵司令部。黄昏后，起义部队利用敌军惧怕夜战收缩兵力之机，在武工队带领下，从敌阵地间隙穿过，越过两坎公路，一枪未发顺利地撤出西营。起义部队突围到达解放区的共有600余人。

10月18日，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在遂溪县洋青村召开欢迎大会。起义部队在会上宣读了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22日，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暂编2团，邱德明任团长，叶超任政委，彭浩（彭智浚）任副团长，下辖3个营，直接受边纵司令部领导。随后，根据中共华南分局的指示，暂编2团改为新16团，归粤桂边纵队第6支队指挥。新16团先后随边纵主力参加了解放廉江和湛江西营的战斗。

第一 三师三水起义

1949年10月15日，国民党军第39军第103师师长曾元三率部5000余人在广东省三水县城举行了起义。

第103师是第39军的主力，美械装备，师长曾元三。该师于1925年组建，系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底子，后属何应钦系统。1949年1月，该师调至广东，驻粤北曲江一带，归余汉谋第21兵团指挥。该师驻粤北后，中国共产党和民革组织多次派人到该师做争取工作。是年5月，第103师参谋长牟龙光在与师长曾元三、第91师师长刘体仁商议后，前往香港与共产党干部张彤和民革干部余确（李济深的秘书）联系，商谈有关起义事宜。牟龙光等人在驻地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虽有接触，但由于曾元三还没有下决心起义，牟的活动没有实质性进展。

9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陈兵粤赣边境，待机发起广东战役。为瓦解粤北国民党军防线，第4兵团联络部秘密派出范子明、吕永祯前往国民党军防区，化妆成商人向国民党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争取他们起义或投诚。由于解放军大军压境，国民党在粤北防线顷刻瓦解，纷纷向后撤退。范、吕跟随到达三水县，遇上解放军第4兵团第14军第40师部队，经请示，决定做当面之国民党军第103师起义的工作。10月7日，第103师开始向湛江方向撤退。8日，该师第307团在广州市北佛冈县被解放军追击部队和当地游击队歼灭，团长王家祯被俘。9日，该师到达三水县城西南镇，13日，由县城武庙头码头渡过西江，准备向海南岛撤退。该师大多数军官的眷属在大陆，不愿去海南岛，又惧怕被解放军追歼，军心浮动。在此种情况下，曾元三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派参谋处科长侯祖松、参谋林松基过江找解放军，二是派第309团作前卫团，向湛江方向撤退。

14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40师第118、第119团到达三水县，与第103师后卫部队展开战斗，于当天下午16时解放三水县城。不久，第103师联络人员侯、林过江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并陪同第4兵团联络部工作人员范、吕二人返抵第103师师部谈判。解放军提出：1.第103师通电起义；2.把已出发的第309团调回来；3.夹住国民党第23军；4.通话联系动员第91师、第147师一同起义；5.第103师起义后部队过江集结。经过双方协商，删去“夹住国民党第23军”一条后达成协议。15日上午，第103师师长曾元三按照起义条件，乘船率队渡江，中午13时许，第309团在副师长陈一匡带领下亦渡过西江，全师官兵5000余人集结于三水县城西南镇地区休息待命。当晚，解放军第14军军长李成芳设宴欢迎起义的团以上军官。18日，第4兵团首长发布命令，第103师起义官兵由第40师接收，连以下官兵编入第14军战斗序列，营以上军官成立学习班，师级军官随兵团政治部行动。牟龙光奉命前往云南昆明做策反国民党军的工作。

江富考等驾机起义

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江富考及机械士周震南、陈尚明、石健儒等4人，从台湾国民党空军嘉义机场驾驶C—47型248号运输机起义，飞回祖国大陆，在南京机场安全首陆。

江富考原是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1947年夏，他在上海结识了空军官校的同学叶昭的哥哥中共地下党员叶文津，使他对国共两党时局看法获益不少。后来，国民党从沈阳、北平、上海败退时，他都被指派为最后一架撤退飞机的飞行员，饱尝了隆隆炮声的滋味。他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欺压老百姓，野蛮地轰炸解放区，深为失望。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炮火连天。一天夜间，江富考和副大队长杨道古从上海大场机场仓皇起飞，飞回台北后，飞机进厂大修。6月上旬，他请假回广州探望母亲，却先去了香港住在叶昭家，阅读了许多台湾看不到的进步报刊。同时，他还与老友叶文津重逢，经叶推荐江阅读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并常终日叙谈，心情顿时豁亮。打消了原想脱离国民党到香港谋生的念头，逐步认识到只有回到祖国，投奔共产党，才是光明大道。8月下旬，江富考又一次从嘉义到了香港，经叶文津介绍认识了中共东江游击队负责人。该负责人说明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赞扬他的起义想法，消除了他的种种顾虑，坚定了起义决心。于是，他很快回到了嘉义。

江富考原计划窃飞机起义。但机场加强了防逃措施，天一黑就增加了卫兵，放光飞机汽油，跑道中间堆放空油桶，每天有两架P—51型驱逐机值班，随时追击逃跑的飞机，窃机难度相当大。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发现戒备森严的机场也有有机可乘，只要在P—51型飞机下午空中巡逻停止之后，跑道堆放空油桶之前行动就可安然无恙。关键是如何拿到开飞机舱门的钥匙，如何将飞机加够航油。不久，他终于找到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有过接触的大队机械士周震南，周答应与其合作。数日后，周震南又在本大队物色了两名可靠的机械兵石健儒、陈尚明作他的帮手。10月14日，周震南借飞行值班室命令给任务加油的机会，让石健儒给C—47型248号飞机加满了油。

10月16日下午6时许，江富考、周震南、石健儒、陈尚明先后潜进机场，寻机行动。恰逢蒋介石和宋美龄访菲回台，乘C—54型“中美号”客机于机场降落，顿时人群、车辆均拥向蒋座机下，于是，他们4人立即奔向C—47型248号运输机，解开系绳，踢开轮档，取下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的夹板，打开机舱门，摆上大舷梯。他们进舱后，立即发动了两部引擎，开始滑行。飞机被塔台发现，追问干什么，他们谎称试车蒙骗。当飞机滑出停机线，正要转弯进入跑道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这架检修完后尚未试飞的飞机尾轮失灵，任凭怎样操纵，飞机就是转不了弯，而塔台又在继续查问。在这紧急情况下，别无选择，江富考使用大马力起飞的动作，推满两边油门，踩死刹车，同时用力推头，使尾部浮离地面，然后稍稍慢松一边刹车。这样踩一下，松一下，飞机转弯成功，冲上跑道，腾空而起，这时正好是傍晚18点40分。他们飞到海边时，天完全黑了，飞机关闭了所有灯光设备，不顾危险贴着海面超低空飞行。约半小时后，有2架P—51型驱逐机追赶。因为他们飞得很低，天又黑，无法发现他们。只好返航。江富考在福州上空拉起高度，直飞北平。飞越长江后，天气变坏，机身颠簸，身边无地图，又恐油料不足，他们决定折返南京降落。当飞机下降高度时，遭到地面炮火对空猛烈

射击；加之，天已很晚，无法辨定大校场机场跑道。此时，他们处境十分危机，但他们不愿跳伞，决心保全这架飞机，献给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他们继续保持低空盘旋，寻觅跑道。 23 点 40 分，机场终于判明是起义飞机，并在跑道上用两辆汽车的灯光指示跑道，飞机得以安全着陆。

江富考、周震南等 4 人驾机飞回祖国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后的第一架献礼机，受到南京人民欢迎。当晚，粟裕等南京党、政、军首长设宴欢迎。17 日凌晨，为防国民党飞机追击轰炸，又将飞机转飞到济南机场。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到机场迎接。不久，起义机组全体同志飞赴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

美颂号舰香港起义失败

1949年10月18日，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华东海军司令部情报处的策动，国民党海军美颂舰在舰长毛却非的率领下，决定于次日上午8时在香港正式宣布起义，但是由于警惕不够，组织不力，被舰上的反动分子当夜抢先破坏，致使起义失败。

美颂舰是一艘中型登陆舰。发动起义前驻泊广州黄埔岛军港。

1948年秋，中共中央地下工作人员郭春涛争取了国民党海军第1巡防艇队少校副队长杨沧活，杨在上海串联了原青岛海校第5期同学毛却非、王显琼、张企良等6人，组成了海军反蒋地下核心小组，酝酿和策划起义。1949年4月，毛却非被调往广州接任美颂舰舰长，相约在广州继续接头联系。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华东海军司令部情报处在张爱萍司令员亲自主持下，于6月28日在上海成立了情报策反机构“628”小组，由原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地下工作人员罗柳溪任组长，杨沧活任副组长。8月杨沧活被派往香港组建“628”小组工作站并任该站负责人，他马上派宋平和张君然先后赴广州与毛却非恢复联系。毛却非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情报策反机构的领导下，积极进行起义准备，发展起义骨干30余人。

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夕，美颂舰奉命从广州开往香港加油，然后载运卫生器材去台湾。毛却非一到香港，找到策反机构“628”小组工作站负责人杨沧活，在中共驻港地下党组织的的的安排和协助下，决定美颂舰在港就地起义，然后将舰开往上海。起义时间定于10月19日上午8时正，18日下午，毛却非和妻子马健瑛一道到杨沧活住处，拿回一大一小两面五星红旗和一些宣传品，准备第二天起义时使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等进步报纸都做了准备，到时发表美颂舰起义消息和起义宣言。18日傍晚，毛却非在舰上再次秘密召集参加起义的轮机长谢恒、枪炮官张纪君、医官彭修竹、帆缆班长申功庆和随舰警卫连李副连长等开会，传达了华东海军驻港“628”小组关于美颂舰就地起义的指示，检查了准备工作情况。散会后，毛却非独自一人留在官厅内起草《起义宣言》和《告全舰官兵书》。

大约午夜时分，谢恒、申功庆等伪装分子，经过暗地串连，纠集了20多名反动官兵，突然抢先下手，冲进官厅逮捕了舰长毛却非。警卫连李副连长见风转舵也立刻倒向，亲手将毛妻马健瑛捆绑起来。同时，还逮捕了毛却非的四弟毛富正和其他起义官兵近30人。结果，一起酝酿和准备比较成熟的起义因此功败垂成。

10月19日清晨，美颂舰在国民党海军大昭舰的接应下驶往澳门。10月30日，美颂舰抵达台湾高雄。毛却非等起义人员均被关进凤山监狱。1950年2月4日，国民党海军当局将毛却非舰长和枪炮官张纪君杀害于台湾左营。

舞凤号等三艇起义

1949年10月22日晨，国民党海军第4军区（广州基地）第4巡防艇队的舞风艇、炮38号艇和巡40号艇，在广东新会市珠江江面举行起义。尔后，3艇胜利驶回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黄埔岛港。

舞风艇是一艘内河浅水炮艇，排水量200吨，装备有57毫米炮2门、重机枪2挺；炮38号艇，排水量25吨，装备有13.5毫米机枪2挺；巡40号艇，排水量15吨，装备步枪4支。起义时，3艇只有官兵46人。

是年9月，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下两广。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登上舞风艇“训话”，令军官们将家属先撤台湾。这种用家属作人质的做法，引起军官们的反感。10月14日，华南最大门户广州市解放。当日下午6点国民党军工兵部队炸毁了海珠大桥。停靠在黄埔岛码头的国民党海军第4巡防艇队，奉令立即启航，顺着珠江三角洲的水系向澳门方向撤退，15日早晨驶抵新会市北街口江面停泊。艇队官兵们目睹国民党军纷纷败逃的狼狈相，感到再跟国民党走已是穷途末路了。

当时，舞风艇艇长李皋，身体有病，家属住广州，不愿离家越来越远，遂产生起义回广州的念头。他考虑一人无法把艇开回广州，因此先后串连了副艇长梁魁庭、轮机长左世云参加组织起义，得到同意。遂研究了起义的行动方案。

10月19日晚，艇队宣布决定，10月21日启航，第一步先到澳门口前山，第二步到珠江口垃圾尾岛（今桂山岛）。为摆脱其他舰艇监视，李皋、左世云以舞风艇航速慢，并还要拖带炮38号艇和巡40号艇为由要求提前3小时开航，得到巡防艇队队长柳炳镕的准许。20日夜，李皋秘密召集舞风、炮38号、巡40号3艇艇长和轮机长开会，宣布了起义的具体分工和要求。会后，给舞风艇两广籍的官兵每人1支手枪，其余的武器都实行统一保管。

10月21日凌晨3时，舞风艇按照计划拖着炮38号、巡40号艇提前启航，先佯装南驶约1个半小时后，突然改变航向，沿珠江一条支流航道北上广州。这时，梁魁庭向全体艇员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一些不知情的外省籍艇员虽感突然，但都没有反抗。当晚22时抵达广州黄埔岛附近的伦头乡。为防国民党飞机轰炸，三艇靠岸进行了伪装。同时，李皋、梁魁庭分头上岸与解放军联系。广州市军管会接见了李皋，对三艇起义表示热烈欢迎。

10月22日早晨，舞风艇悬挂一面自制五星红旗，载着起义的46名官兵，拖带着炮38号艇和巡40号艇驶进了广州黄埔岛港。广州市军管会派曹志友为军代表，带领一个班战士登艇，正式接收了3艇起义。

11月15日，起义人员奉令全部返回本艇。次日，巡40号艇留下作为交通艇，舞风艇和炮38号艇立即启航开往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县执行清剿残匪和缉私任务。1950年3月下旬，舞风艇大部分艇员分派到别的舰艇，参加了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的战斗。

联荣号舰起义

1949年10月26日，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地下工作人员林城、何友恪、李作健的策动和组织下，国民党海军第4军区第4巡防艇队联荣号舰和炮25号艇于澳门海面举行起义，约70名起义官兵随舰胜利驶返广州。

联荣舰系第4巡防艇队指挥舰，排水量38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16海里，装备有20毫米高射机关枪4挺、25毫米双联装高射机关炮1门、13毫米机关枪2挺、轻机枪2挺。广州解放前夕，该舰随第4巡防艇队一起，奉命掩护陆军部队撤退后撤至澳门海面锚泊，准备驶往台湾。

是年9月中旬，在香港准备候船返回上海的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地下工作人员李作健，得知联荣舰在广州担任指挥舰后，主动向中共驻港地下党组织请战，前往广州策动第4巡防艇队中校艇队长柳炳镕、联荣舰舰长张孟率舰起义。9月27日，李作健以香港某厂高级职员作掩护，乘机到了广州约见柳炳镕、张孟，因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正在广州视察无法脱身，未能赴约。李作健只好留下与柳、张联系的办法，按期返回香港。

10月23日下午，柳炳镕突然到香港找到李作健，告之张孟在广州解放前夕调离联荣舰。当晚，李作健陪同在港的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地下工作人员林城、何友恪一起，请柳炳镕吃饭，动员他起义。柳表示同意，但提出他在舰上没有心腹之人可以依靠，希望派人帮助。林城当场指派李作健去协助。第二天上午，李作健与马尾海校的学友李后贤提出同往澳门帮助工作。24日下午，他们3人乘佛山号客轮秘密到达澳门。25日上午，李作健从柳炳镕提供的花名册上发现，他熟悉的枪帆兵刘景龙、张孟的亲信枪帆兵李振华、曲振华，都还在联荣舰上。他立即分别的见了刘景龙、李振华、曲振华以及刘景龙推荐福建籍枪帆兵杨成德4人，制定了起义的行动方案，决定10月27日凌晨3时起义。起义计划刚制订完毕，李后贤突然告诉，柳炳镕已接到26日早晨要联荣舰驶靠太昭舰的通知。李作健等怕情况变化，马上改变计划，将起义时间提前到26日凌晨3时举行。

10月26日凌晨2时30分，七八个起义骨干悄悄聚到甲板上。3时正，起义正式开始。李振华假称替值更人员站岗，缴了对方的手枪，令其回舱睡觉。接着，李振华手持手枪，带着刘景龙和杨成德直奔舰长室，一脚踢开舱门，叫醒舰长缴了手枪，将其拘押在舱内。然后，立即打开小武器库取出枪支，武装了全体起义人员。一名军士长手持日本战刀反抗，被曲振华等人用枪制服。很快，起义人员就控制了全舰。起义人员马上让巡防艇队长柳炳镕上了驾驶台，下令所属炮艇启锚，跟随联荣舰进珠江执行任务。

夜空一片漆黑，海上波涛翻滚。联荣舰离开澳门海面不久，突然掉转航向朝广州方向快速驶去。停泊澳门的旗舰太昭舰发电追问联荣舰：“你们去哪里？赶快回来，一同驶往台湾，否则就要开炮！”李振华、曲振华2人指示回电假称：“我舰搁浅，不能行动，现正在抢救。”应敷衍了过去。10月28日早晨8时，联荣舰胜利驶抵广州沙面，受到广州市军管会和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随舰起义到广州的还有炮25号艇。

11月9日晚，广州军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舞风艇和联荣舰等舰艇先后起义回到人民怀抱。陈赓、邓华、洪学智、云广英、王作尧等军政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后来，联荣舰重新命名为“勇敢号”，起义官兵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江防司令部，参加了清剿珠江三角洲残匪的战斗和

解放海南岛战役。

永明号舰人员香港起义

1949年10月29日，在中共华东海军司令部情报处派驻香港工作站（代号628小组）的策动和中共驻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国民党海军扫雷护航舰永明号30多名官兵在香港起义，10月31日安全回到广州深圳。

永明舰是一艘美制千吨级的扫雷护航舰，舰长谢克武，起义时约有官兵100余人。是年10月，国民党海军当局指派该舰由台湾开赴厦门担负撤退任务。经过台湾海峡时，遇到12级台风，主机严重损坏，不能自航。国民党海军先未及时进行援救，后又撒手不管，致使永明舰在海上漂泊近半个月之久，舰上的淡水、食物均已耗尽，舰员生活苦不堪言，情况非常危机。在此种情况下，该舰发出国际呼救信号，被香港当局派出拖船太平洋号拖至香港。该舰官兵经受了这场危险与苦难，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凶残，愈益增强摆脱国民党海军的决心。

永明舰拖泊香港后，华东海军司令部情报处驻香港工作站的负责人杨沧活，立即派工作人员宋平去做争取工作。宋平当即联络了在香港工作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吴良达（又名甘志明）和田国光一起前往争取永明舰的准尉电机军士长陈立辉、轮机上士苏云飞起义。陈、苏当即表示同意，并说要多争取一些舰员脱离国民党海军。经过两三天的积极活动，该舰有31名官兵愿意离舰起义，并组成了由陈立辉、苏云飞、航海上士袁光庭、枪帆班长高炳文和电机上士张绍白5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选举陈立辉任总领队、苏云飞任联络员。

华东海军司令部情报处驻香港工作站原计划争取永明舰全体人员带舰起义，但由于舰长谢克武的家属已去台湾，他本人坚持返回台湾。据国际法及香港的有关法规，凡舰船起义，必须舰、船长同意，香港政府才予支持与保护；另外，永明舰因严重损坏不能自航而被港方拖到香港，其产权归属问题也与港方存在争议。因此，争取人舰一起起义工作无法着手，只好争取部分人员离舰起义。

10月29日，起义人员按照计划秘密离舰。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大力协助，在香港租了旅馆接待他们，接着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深圳军管会取得联系，10月31日即将这批起义官兵送往广东深圳。当列车抵达罗湖车站，起义人员一过界桥，就受到深圳军管会及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永明舰人员起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台湾归来的第一艘舰艇部分人员集体起义。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1949年11月2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永明舰离舰官兵起义宣言》和《永明舰离舰官兵起义》的通讯。1949年12月底，起义官兵被华东海军接回南京，参加了人民海军行列。

六邑起义

1949年10月下旬，广东第10区保安司令部所属保安队一部，在广东省六邑地区举行了起义，该地区得以和平解放。

1947年7月，广东第10区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彭秋平，决心弃暗投明，与中共香港华南分局取得联系，接受了策动六邑地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汉铃部起义的任务。

彭秋平与周汉铃曾是挚友。周汉铃由于不是国民党部队嫡系，经常受到排挤，因而盼望扩充军队，增强实力。彭秋平趁此机会将分散在各地的老部下召集回来，组成了3个独立中队（群众称为周家军），作为将来起义的骨干力量。1948年10月中旬，彭秋平在单水口的黑山召开骨干分子会议，明确提出反蒋起义的主张。1949年3月，中共粤中纵队派谭行为代表，长驻江门，加强对起义的领导。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逼广东境内。周家军等六邑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寻找出路。10月5日，广州解放前夕，彭秋平准备趁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省主席薛岳等弃城逃跑，将到江门北街河面会见周汉铃等人之机举行起义，因会见地点变故没能成功。10月15日，广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挺进。粤中纵队与南下的第4兵团在鹤山会师后，向六邑境内进击。10月下旬，周汉铃带家携眷，满载财物，乘船沿潭江东逃至新会县亭姚旗。周家军封锁河面，实行兵谏。周汉铃看到众叛亲离，大势已去，被迫宣布起义，交出兵权，隐居乡间。

六邑各乡自卫队、政警队、联防队纷纷起义响应。吕南、恩平联防队起义后投奔了人民军队，开平基城政警队苏桂南部和长沙自卫队周的部起义后，收缴了乡公所枪械，长江汽车站聂仲先策动广东交通局汽车工人起义控制了公路和车辆。

六邑起义使六邑全境解放。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独立第1团，后改为第19团，参加了解放广东，追歼残敌的斗争。

湄潭起义

1949年10月下旬，在中共黔东北特委领导、发动下，国民党军第49军第275师第825团第3营400余名官兵于贵州省湄潭举行起义。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败退西南的国民党军到处抓兵拉夫，拼凑“预备兵团”。中共黔东北特委利用农民群众的抗兵斗争，派遣大批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在德江、凤冈、思南等县许多地方组织抗兵小组，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反动派推行“谁招兵委谁当官”的政策，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这一机会，将各地抗兵小组共400余人集中起来成立了1个营，打入国民党的“预备兵团”，开到湄潭后编为国民党第49军第275师第825团第3营，营长李明节，副营长吴卫群。接着，中共地下党又发动全体士兵向团部请愿，要求配发武器装备，结果争取到50支长枪5000发子弹。

10月底，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这支部队即将开拔遵义后，立即召集秘密会议，决定当晚发动起义。晚10点整，各连按原定计划向各自的目标进攻。敌团部和当地国民党政府在遭到突然袭击下，被打得晕头转向。

部队起义后顺利拉出了湄潭。然后，按原定路线向北撤到德江，整编成立为“黔东北游击纵队”，在德江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到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挺进云贵高原，黔东北得以解放。

国民党“两航”香港起义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员工2000余人、飞机80余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香港宣布起义。

“中航”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与美国商人合办的；“央航”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对方财产接收过来，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抗战胜利后，两个航空公司的总公司均设在上海。当时，“中航”总经理为刘敬宜，“央航”总经理为陈卓林、副总经理为陈文宽。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员工大部分是有技术专业的知识分子，有爱国心和民族正义感，解放战争后期，目睹了国民党政府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崩溃和军事上瓦解，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希望有一天建设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要将“两航”的飞行基地迁往台湾，但“两航”上层人员为摆脱国民党直接控制，以台湾缺乏维修设备和住房为由，将基地匆匆迁往香港。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争取“两航”的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李克农负责策动“两航”员工的起义，把在香港的飞机和工厂迁返祖国大陆，具体办理由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负责。1949年8月底，周恩来派中共党员吕明（吕云荪）和“中航”已退休的副总经理查夷平（查一平）赴香港。行前，周恩来找他俩到北平，亲自向他们布置任务，指示动员“两航”员工全部起义，欢迎他们回到大陆参加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民航建设事业。吕、查2人到港后，得到中共香港地下党和在“两航”中的党员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等以及广东省工会领导的十人小组的协助。一方面，由吕明与陈达礼、李培槐、邓重煌、郑家琼等人研究开展联系起义对象的工作；另一方面，由查夷平出面做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的工作。经过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串连发动，起义条件日趋成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国民党当局加紧逼迫“两航”搬迁。刘敬宜为拖延搬迁提出400万美元的庞大迁台预算，但国民党竟一口答应拨予。鉴于上述情况，起义势在必行。10月25日，起义成立了指挥部。“两航”分别成立了起义领导机构，“中航”叫起义委员会，“央航”叫非常委员会。10月30日，“两航”分别开会，将起义的日期定在11月10日。

11月7日，指挥部发觉起义机密可能泄露，决定提前到9日起义。根据当时情况，指挥部决定先飞走12架飞机，除乘载部分起义人员外，尽量多装运各种设备、零配件等必备物质；其余人员和飞机、设备留港坚持。原定起义飞机直飞北京，但由于北京的机场已另有任务，周恩来决定一架直飞北京，其他飞机在天津机场降落。

11月8日，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白天，完成国民党指派的运输任务。晚上，秘密进行第二天起义的准备。“中航”起义的10架飞机和“央航”起义的2架飞机，公司照例派好9日飞往海口、台北、昆明、桂林、重庆等地，照常售票。当晚，“两航”指挥部召开全体起义北飞的飞行员会议，突击装运上各种物质。为防止空中遭受国民党空军追击，他们研究循两条航线北上：一批经汉口上空北飞，另一批取道南昌北飞，在飞至长江以前，尽量保持云中或贴云顶隐蔽飞行。

11月9日清晨，香港启德机场寂静清爽，朝雾袅袅。12个机组的人员准时到达机场，迅速完成起飞准备工作。由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宫”号巨型客机率先升空，接着，每隔几分钟飞一架，7点前全部升空，编队北飞。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邓士章（央航营运组主任）、陈文惠（央航机航组副主任）等人乘由潘国定驾驶直飞北京的“史航”XT610“空中行宫”号；其后11架飞机有C—47型机8架、C—46型机3架，分别由陈达礼、张镒、杨积、黄雄畏、蔡觉沧、卢开周、边任耕、秦永棠、邓重煌、徐作诰、林雨水等驾驶飞往天津。为了防止国民党的无线电窃听到飞行情况，遭到其空军拦截，飞机飞行在9500英尺云层之上，并不断向机场发回到达目的地的假电报迷惑对方。

中午12时15分，“空中行宫”在北京机场安全降落。刘敬宜、陈卓林带着“两航”2000员工的重托，带着起义的通电，走下飞机，受到了李克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的热烈欢迎。下午1时10分左右，其后的11架飞机也在天津着陆，受到天津市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当晚，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切接见并宴请了刘敬礼、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及其机组、随从人员。12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向“两航”起义人员发电祝贺：“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的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同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政务院发电接受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的请求，公开宣布“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并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对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管辖。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并宴请天津降落的起义机组40余人。希望“两航”公司留港和待解放地区的全体员工，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

“两航”宣布起义后，在港的“两航”员工绝大多数参加起义宣言的签名，全部航线班机停航。国民党当局派民航局局长戴安国和沈德燮到香港，分别向“两航”员工进行收买活动，要他们去台湾。绝大部分员工均不为所动。戴、沈便向香港法院要求冻结“两航”在港资财，香港法院循其所请，颁发了临时禁制令；同时，中国政府亦向香港法院申请到临时禁制令，这样，双方都不能移动飞机和资产。“两航”员工面对复杂的斗争局面，粉碎了国民党分化、引诱和威胁，成立几百人的纠察队，保护了70多架飞机及价值3500多万美元的“两航”工厂财产，后来部分护运回祖国大陆。

“两航”起义的胜利，是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它切断了蒋介石对西南的空中运输，使残留在西南各省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失去空中接济，使残留在大陆的许多反革命分子不得漏网，加速了国民党的崩溃。“两航”起义的飞机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西北和进军西藏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并成为发展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基础。同时，在“两航”起义的影响带动下，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招商局轮船公司、粤汉铁路员工等相继起义。

光国号炮艇起义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海军汕头巡防处光国号炮艇，在副艇长吴高远和电讯上士黄维鸿、信号上士杨朝顺、文书上士施德贤等人的领导和发动下，在广东南澳岛举行武装起义，并由该岛海面驶回汕头港，光荣回归人民的怀抱。

光国号炮艇系一艘日造炮艇，排水量90吨，装备有日式高平两用13毫米双、单管机关炮各1门，7.7毫米重机枪2挺，长短轻武器数支。1948年6月，由国民党海军第3军区（台湾左营基地）第3巡防艇队调归第4军区（广州基地）汕头巡防处，担负汕头沿海一带的巡防任务。

1949年10月21日，光国、洪泽、美乐等舰艇完成了掩护陆军胡璉兵团的撤逃任务奉命撤至南澳岛待命。这时，官兵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离乡背井，继续逃往台湾；一是伺机起义，设法驶回已解放的汕头。光国艇大多数士兵家都在大陆，不愿去台；即使有少数台湾籍士兵，由于已在汕头结婚成家，也不想去台；又由于艇长袁福厚思想反动，经常指使抢劫渔船，杀人越货，克扣军饷，打骂部属，广大士兵对他极为痛恨。

电讯上士黄维鸿、信号上士杨朝顺和文书上士施德贤三人，早就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汕头期间就开始酝酿起义。光国艇来到南澳岛后，他们加快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几天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了枪帆中士周树清、轮机上士黄国云等七八名士兵。10月30日上午9时，光国艇随大舰离开南澳岛开往台湾。黄维鸿等起义骨干见无法下手起义，便故意制造机器故障，迫使光国艇停机停航，后被国民党海军登陆舰中兴号拖口南澳岛修理。

在光国艇修理期间，黄维鸿、杨朝顺和施德贤等起义领导人一边抓紧修艇，一边继续发展人员。11月7日，在该艇即将启航前，又争取了副艇长吴高远参加起义。11月8日，光国艇修竣。黄维鸿等利用放假上岸的机会，在岛上中山公园抗日烈士纪念塔前召开了最后一次起义会议，通过了起义决议和行动方案。

11月9日拂晓4时许，全艇人员起床，发动主机，副艇长吴高远按惯例集合全体人员在甲板“训话”。黄维鸿担任岗哨带班，立即和施德贤一起将士兵住舱里的轻武器都收集起来，除留出一部分起义用外，多余的部分藏到蓄电池舱室的底板下面。光国艇启航后，听完“训话”的艇员又都回住舱休息，起义人员马上持枪把住舱口。黄国云在机舱里负责看管机器，薛亦忠在舱房负责操舵，杨朝顺、施贤德和枪帆兵吴正连在驾驶台负责监视艇长。5时50分，黄维鸿立即向施德贤示意开始行动，施在杨朝顺的配合下，抓起一块压海图的铜板突然向艇长的头部猛击过去，艇长正注视着海面毫无防备，脑袋顿时鲜血直流，他一边挣扎，一边拔枪企图顽抗。黄维鸿、杨朝顺立即冲上前去，持枪缴了他手中的武器，并叫吴正连用预先准备好的绳索将他捆绑起来。

制服艇长后，光国艇立即改变航向，高速朝汕头方向驶去。黄维鸿马上向大家宣布：“我们起义了！艇长已被我们捆起来了，我们要开回汕头投奔共产党去！”舱内一阵骚动，杨朝顺举枪命令不准乱动。袁福厚躺在驾驶台的甲板上，仍拼命挣扎叫喊，大多数艇员要求处死他，黄维鸿等起义领导人按照大家的意愿，将其抛到海里，用枪击毙。11月10日早晨，光国艇升起五星红旗，胜利驶靠汕头港码头，32名起义艇员一齐登岸，受到了汕头军

民的热烈欢迎。当晚，潮汕军分区的首长在永平大酒家接见并宴请了全体起义官兵。

1949年底，光国艇参加了解放南澳岛战斗。1950年初，广东省军区潮汕军分区以光国艇为主成立了海防巡逻大队，光国艇改名为“十月号”艇。1950年春夏之交，光国艇调属广东省军区江防司令部，参加了解放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战斗。不久，该艇又归属中南军区海军（南海舰队前身），正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海军序列。

郝穴号、永安号舰起义

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郝穴、永安2舰160余人，在郝穴舰副舰长王内修、军医杨元礼、轮机长丁永才、枪炮官梁子绮和永安舰舰长聂锡禹、副长严志馨、轮机员殷秀坤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在四川省忠县举行起义，并冲破国民党陆军沿途拦截，激战近10个小时，航程800里，30日上午胜利驶抵湖北省巴东县解放区。

郝穴舰和永安舰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海军接收日本的两艘浅水炮舰。郝穴舰排水量800吨，装备有40毫米炮1门、25毫米机关炮3门，编制人数80人；永安舰排水量370吨，装备有40毫米双联装炮1门、40毫米炮1门、25毫米双联装机关炮1门，编制人数80人。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郝穴、永安两舰随江防舰队司令部溯长江而上，6月撤至宜昌，7月撤至四川万县，配属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作战指挥，后来，奉命驻守巫江峡一带担任警戒任务。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郝穴、永安两舰一些下层士兵自武汉撤至宜昌后，就纷纷考虑出路问题，有的开始秘密酝酿起义。郝穴舰副舰长王内修，家庭出身贫苦，思想进步，加之其妻从山东荣成解放区来舰介绍解放区的情况，促其下决心脱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并在舰上串连了军医杨元礼、轮机长丁永才、枪炮官梁子绮等人组成了起义领导集体；永安舰福建籍士兵郭功惠、蔡菁等人，先后串连了舱面下士李子雷、航海下士刘国彬等20余人，起义前夕又争取了舰长聂锡禹、副舰长严志馨、轮机员殷秀坤。11月，人民解放军大举入川，国民党陆军部队龟缩在川江两岸，企图利用水上补给进行垂死挣扎。郝穴、永安两舰起义领导人加紧准备，伺机起义。

11月28日，郝穴、永安两舰奉47军军长严翊、副军长陈克非之命，从万县启航护送民生公司8艘载运陆军部队和弹药的商船增援重庆，当日下午驶抵忠县抛锚停泊。这时，重庆以东的涪陵已被解放军控制，居高临下地扼守着这段狭窄的长江航道。如果继续上驶，必遭解放军炮击以至被歼；如不上驶，又会触犯国民党军以违抗军令治罪。在这进退维谷的关键时刻，永安舰以福建籍官兵为主、郝穴舰以山东籍等北方军官为主，决定抗命起义。

29日晨7时许，永安舰舰长聂锡禹与郝穴舰舰长李世鲁、副舰长王内修联络商定：上午8时两舰同时行动，以旗为号，挂旗起锚，落旗鸣笛，掉头东下。王内修回到郝穴舰，和枪炮官梁子绮等，把两名押运弹药的陆军军官缴了械，锁进军官舱，然后又叫其他押运的陆军士兵把堆放在甲板上的炮弹箱搬进舰舱，趁机将其锁进舱里。永安舰张增富、黄依才等4名起义士兵，持枪将陆军第47军参谋长陈维舟及其随行人员解除武装，关押在舰上浴室里。

8时整，两舰按照约定信号，发动机器，起锚开航，同时掉头，向下游驶去。永安舰导前，郝穴舰跟后。国民党军发觉两舰起义，立即令沿途两岸陆军拦截。两舰冒着密集的炮火和枪弹，边驶边反击。激战中，郝穴舰炊事兵王阿五和永安舰理发兵洪茂官，不幸中弹牺牲；永安舰副舰长严志馨、郝穴舰枪炮官梁子绮、班长邵祥俊、上士炮手林学述、士兵林木香以及王内修的妻子曲泽芬等，都负了伤。郝穴舰、永安舰战斗近10个小时，途经忠县、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巴东6县，航程800里，11月30日上午10时胜

利驶抵湖北巴东县解放区。舰一靠岸，近 160 名起义官兵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1949 年 12 月 1 日，郝穴舰、永安舰驶达湖北宜昌，担负载运 4 辆卡车和 800 吨大米等军需物资到巴东支援解放军前方作战的任务。1950 年 1 月，郝穴、永安两舰奉命开到汉口，华东军区海军派员接收两舰，加入人民海军的行列。同年 4 月，两舰驶至南京，郝穴舰重新命名为湘江舰，永安舰重新命名为珠江舰。

江防舰队起义

1949年11月30日，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少将司令叶裕和、上校参谋长程法侃率领民权、常德、英山、英德、水平5舰，加上驻渝海军陆上单位官兵共400余人，于四川省重庆举行起义。

江防舰队的前身系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最多时曾辖军舰22艘，排水量大者3000吨，小者300吨。1948年底，国民党为阻拦解放军渡江，将江防舰队的部分舰只拨归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此时，江防舰队负责湖口至宜昌一带长江中游防务。1949年5月，江防舰队的民权、常德、英山、英德、永平、永安、郝穴7舰溯江而上，从湖北汉口西撤四川。

江防舰队入川后，郝穴、永安二舰布防万县；常德、永平二舰布防长寿县；民权、英山、英德三舰驻防重庆。舰队官兵多数系福建籍人，早就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派系的压制，撤到人生地疏的四川后，思乡厌战情绪更为严重。舰队司令叶裕和、参谋长兼旗舰民权舰舰长程法侃，思想开明，反对内战，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认为弃暗投明才是出路。

11月29日，驻防万县的郝穴、永安二舰在忠县举行起义。当日，国民党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即令重庆江面的各舰开往上游江津待命。江防舰队以燃料缺乏为借口，没有执行。同日中午，蒋介石在重庆亲自召见叶裕和，满脸杀气怒斥叶“应负全责”，并令叶裕和从旗舰搬到岸上，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联合办公。当日傍晚，叶裕和返舰途中，目睹到处都是国民党军争相逃命的狼狈景象，遂与程法侃商定“抗命起义”，决定：立即与国民党政府断绝联系，摆脱陆军的箝制；尽快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并请解放军立即过江维持地方秩序；保护所有军舰上的武器、弹药、装备，不得稍有损坏遗失；宣布紧急戒严，严防内外反动分子纵火破坏或偷盗。晚11时，叶裕和派舰队中校主任参谋倪锡龄，带少校训练参谋林康藩去重庆南岸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取得联系。倪等连夜冒雨返舰报告：“已与解放军联系好，军舰原地不动，集中待命。”

11月30日，江防舰队的民权、常德、英山、永平、英德5舰在重庆江面扯下国民党海军旗，宣布起义。12月1日，起义5舰改悬“重庆人民海军军舰”旗帜。人民解放军从南岸渡江时，各舰汽笛齐鸣，表示欢迎。并将各舰及陆上单位共400余人名册、物资、器材、无线电、密码本、轻武器、械弹等，连同11月29日晚海军第9供应站托交的17箱银元（每箱2000枚）和司令部保管的2500枚银元，悉数列单造册移交给重庆军管会。

1950年元旦，重庆市举行人民解放军武装游行，江防舰队起义官兵选出120名代表奉命登岸，参加解放军的游行。4月下旬，华东海军派舰械科科长韩钟同志等人到重庆接收了江防舰队。起义5舰先后驶抵南京，加入华东海军序列。后来，5舰被重新命名：民权舰为长江舰，常德舰为闽江舰，英山舰为怒江舰，水平舰为乌江舰，英德舰为嫩江舰。

国民党陆军大学重庆起义

1949年12月1日，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职学员在教务处处长杭鸿志等率领下，在重庆举行起义，迎接重庆解放。

国民党陆军大学在抗日战争中由南京迁往重庆；1947年由重庆迁回南京孝陵卫中央军官训练团旧址；1948年淮海战役中迁往广州黄埔；广州解放前夕撤退至台湾新竹，但在重庆歌乐山一直留着一个分部。从南京、广州撤退时，有一部分教职员不愿去台湾，又来到重庆。这时陆军大学在重庆还办有第8期特别班。

陆军大学的几次搬迁，使陆大教职员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普遍存在各自寻找出路的思想。1948年底，陆大教务处处长杭鸿志曾派装甲系主任章培潜密赴解放区找他弟弟章乃器，要求和共产党联系，请求明示陆大今后的行动方向。1949年4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联络部科长派杭洪模到广州会见其兄杭鸿志，希望杭鸿志策动陆大教职员待机起义，并传达了今后陆大起义工作将由中共华南局就近领导。杭鸿志要求解放军派人指导帮助组织起义。

杭鸿志，1937年毕业于陆大，留校任研究员，后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1949年4月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联络员杭洪模进行联系之后，在陆大教职员中开展工作，准备起义。5月1日，陆大教育长徐培根在广州派杭鸿志和方仲吾到重庆工作，分别担任教务处长和第8期特别班主任。为了统一教职员思想，他们通过教官联谊会与教职员进行座谈等形式开展工作。此后，他们还邀请原陆大教育长杨杰在联谊会上讲形势，请杨杰在全校教职员、学员中做报告。杨杰在报告中运用离心力与亲和力的道理，讲了国民党的军事已由优势变为劣势，败局已定，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军队纪律不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好，兵源困难，士气低落，情报工作搞得不好等，是离心力在起作用的结果。而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搞得好，人民解放军力量发展越来越强，由劣势变优势，情报工作搞得好，士气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这是亲和力在起作用。杨杰的报告在陆大教职学员们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决不能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只有起义投奔革命，在重庆迎接解放军才是唯一的出路。11月19日，陆大校长徐永昌决定提前举行第8期生毕业典礼，特请蒋介石亲临讲话，并和学员照像，这一举措仍没有引起教职学员们的多大兴趣。

在人民解放军对大西南进行大迂回包围的强大攻势下，11月27日，国民党国防部下令重庆各机关部队撤退，决定陆大编余人员就地遣散，撤退人员发给迁移费，造成陆大师生的极大混乱。11月29日，重庆的国民党部队纷纷撤退，各处交通经常阻塞。当晚，第8期主任方仲吾约请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派来的陈济生，在学员张醒家中与方仲吾、杭鸿志和情报业务主任曹耀祖会见。陈济生原是陆大毕业的学员，曾任傅作义部副师长，随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改编后，受李明颖的派遣到重庆策反国民党第15兵团罗广文第110军参谋长贾应华起义的。会见中，陈济生对陆大起义问题提出三条：

准备一个起义通电稿；保护学校的财产不受损失和破坏；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校接管。方、杭、曹表示按这三条照办。11月30日，陆大召开校务会议，决定武装护校，防止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撞进学校，防止坏人破坏和盗窃学校财产。准备工作一切就序，起义时机已经成熟。

12月1日，方仲吾、杭鸿志等召开全体教职学员大会，会上介绍了陈济生和大家见面，并宣布陆大起义，打出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语。接着二野司令部作战处处长魏锦国到陆大视察。随后二野派来以白珂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到达陆军大学，由陆大教职学员组成了“原陆军大学接管委员会”，由白珂为主任，杭鸿志为副主任，仅用10天时间完成了接管工作。1950年1月19日，正式发表了由方仲吾、杭鸿志、曹耀祖、陈济生、张醒等于1949年12月1日签名的起义通电。不久，大部分教职学员都分配了工作。陆军大学的义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培养高级军事人员的一个重要基地的彻底垮台，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沉重打击。

同心号运输舰起义

1949年12月7日，在中共奉节县和万县县委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国民党军联勤总部运输署借调海军的同心号舰，由中校舰长江涂三率部官兵约80人在四川万县江面举行起义。

同心号舰原是国民党海军电雷学校供布雷训练用的快速浅水炮舰，排水量500吨，装备有13.5毫米高射机关炮1门、重机枪2挺。1946年4月，由国民党海军借调给联勤总部作为长江航道军用运输舰。1949年夏，撤至奉节县县城小南门外江中停泊。

是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介石反动派在大陆的彻底溃败已成定局。中共奉节县委地下党组织为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正面军事攻势，争取大西南的早日解放，指派地下党员孙明义，开展对同心舰的策反工作。孙明义的姐夫李杰是同心舰中尉报务员唐志隆的妻舅，孙明义便通过约李杰同去同心舰上玩，首先争取了唐志隆。接着，唐志隆又以与舰长江涂三是同乡的关系，争取其起义得到同意。在此之前，江涂三还受到思想进步、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5厅海军处处长杨之光“对出路要有所考虑”的启发。从此，江涂三便和唐志隆秘密策划起义事宜，并默许舰上官兵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为起义作思想准备。

11月底，退缩在大西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下，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随着四川境内长江两岸许多城镇，都次第解放，滞留在长江上游的国民党军舰艇，已陷入进退无路的窘境。这时，同心舰停在忠县江面，等候装运国民党陆军部队和一些军需品去丰都。11月29日永安、郝穴两舰起义成功，这给同心舰带来鼓舞，也引起国民党当局对其他舰艇的严格控制。装毕货物启航时，国民党陆军临时增派数十名官兵上舰武装押运。驶至丰都后，国民党陆军部队又将同心舰的副长叶春华扣押在军部作人质，几经交涉，才放其回舰。对此，同心舰官兵非常气愤。

12月2日天还未亮，同心舰为摆脱国民党陆军的监控，江涂三舰长利用押运的陆军官兵进丰都县城尚未返舰之机，下令紧急起航，直驶万县。途中，国民党江防司令部发来急电，令立即沉船，全舰官兵改乘飞机会台湾。唐志隆和江涂三商定，抗令行事，继续前驶。当晚，舰泊万县。12月5日，江防司令部再次发来急电，令立即将同心舰沉江。江涂三、唐志隆认为起义已经刻不容缓，当即下令全舰戒备，不准陆军及其他无关人员上舰。晚上，又在舰的前舱召开一次全舰官兵动员大会。会上，江涂三首先讲明面临的形势和困境，唐志隆作了起义的动员。会议进行比较顺利，最后一致同意马上起义。翌晨，即派出报务员唐志隆和二领江向全德上岸，到万县城里找中共地下党组织接洽。不巧，没有找到联络人，但唐志隆碰到了他的妻舅李杰，李带他们会见了一位姓王的人。王告知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在城内，请他们回舰明天等候回话。第二天一早，王果然来到同心舰告诉唐志隆，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对同心舰官兵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并决定派地下工作人员陈义、胡世安上舰协助工作。陈义还通知民生轮船公司万县电台的报务员吴太鸿（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给同心舰补充了燃煤。

12月7日黎明，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指派的工作人员陈义、胡世安、吴太鸿三人一同登上同心舰。江涂三、唐志隆将他们请进驾驶室，待起义工作全部就绪，江涂三舰长立即下令开航，向下游云阳驶去。随同心舰起义的还

有民生公司的 4 艘轮船。为避免两岸解放军的误会，5 艘舰、船都在桅杆顶上悬挂白旗，示意起义。就在舰、船驶往云阳途中，接到人民解放军驻宜昌第 42 军急电，要同心舰到云阳后马上靠岸，装载该部第 124 师千余人去解放万县。当日下午 4 时舰到云阳，江涂三立即上岸与第 124 师商定装载事宜。8 日晨，同心舰和 4 艘轮船装载着第 124 师官兵返回万县。下午 3 时抵达万县码头。解放军上岸，和平解放了万县县城。两天后，同心舰奉命开赴湖北宜昌，人民解放军第 42 军军长吴瑞林和政委刘兴元以及政治部主任丁国钰上舰欢迎、慰问。当天晚上，军部首长宴请了起义的约 80 名官兵。

同心舰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艘军舰起义。1950 年春节后，第 42 军将舰和起义官兵移交中南军区后勤部船舶大队，同心舰改名为“长江 9 号”，仍作军需运输船用。1953 年 5 月，又由部队移交给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改名为“江丰号”，后又改名为“东方红 202 号”，航行在武汉至重庆的长江上，参加了新中国的航运事业。

昆明起义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云南省保安司令卢汉率部5万余人在昆明举行起义。

卢汉（1895—1974）字永衡、彝族，卢汉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头号人物龙云（1887—1962）都出生云南昭通，均系云南陆军讲武堂第4期步兵科毕业。抗战胜利后，龙云因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被蒋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被迫到重庆任职。蒋就委任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同时调卢汉所属的第1方面军主力第60、第93军去东北，实际上使卢汉失去兵权，卢因此与蒋的矛盾逐渐加深。龙云在重庆仍秘密策动滇军将领卢汉等反对蒋介石调滇军去东北作战，要滇军保存实力，等待时机。1948年秋，龙云得知蒋介石要挟持他到台湾的情报后，设法秘密到了香港。龙在香港仍十分关注云南局势，并多次派人回云南劝说卢汉早日起义。

1948年10月，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2.6万人在辽沈战役前线长春起义，第93军在锦州被歼，第6兵团司令、卢汉之叔卢浚泉被俘。卢汉得知这些消息后，仍在犹豫观望，未下定起义决心。1949年1月，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卢汉认识到共产党必定胜利，云南的解放也为期不远，只有脱离国民党、率部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时共产党也加快了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

早在1941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派遣党员训练班云南籍干事朱家壁回滇军开展工作，到了第60军卢汉部任聘，先后任特务团团长、第1军方面军司令部科长、滇军奉调东北时，朱离开滇军到边境创建地下游击武装（即滇桂黔边纵队）开展武装斗争，继续做争取滇军的工作。1949年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指定由李剑秋、任灿光、费炳3人组成一个中共党小组，由李剑秋任组长，专门从事促进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西南局派杨维浚（民盟成员）前往昆明，会见了卢汉等人，卢汉表示同意起义。1949年5月，中共中央又从曾在东北参加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60军起义军官中选派了张秉昌等28名团以上军官返回云南，到滇军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张秉昌曾是卢汉的老部下，共事20多载，张回到昆明即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对卢汉的3条意见：解放军进军西南后，要立即表明态度；对蒋要敷衍；要支援“边纵”一些武器，利用朱家壁的电台与解放军联络。卢汉听从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定了起义的决心。一方面加强与中共华南局、云南地下党组织和“边纵”的联系，支援了“边纵”大量武器和物资。同时派人到西康、四川，相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届时共同起义反蒋。不久，卢汉还派宋一痕秘密到北平联系，周恩来接见并做了指示，在解放军进军西南以前，最好不轻举妄动。

9月，卢汉在重庆以答应蒋介石在昆明进行整肃为条件，换取了蒋介石答应他在云南建立两个军的要求，他就加紧扩编保安部队，猛增至17个团，加上滇军184师3个团3个直属总队，已拥兵4万余人。

正当卢汉加紧与中共云南地下党和“边纵”联系，准备起义的时候，香港发生了一起重大惨案：国民党军事理论家杨杰被蒋介石派特务刺杀。这一事件对卢汉震动很大，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兵权的重要。于是，更加快了扩军步伐，迅速扩编为18个团的兵力，组成第93、第74两个军，

也进一步增强了起义的决心。

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川、黔边界进军，很快突破蒋介石苦心经营布防的大西南防线。11月15日，贵阳解放；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企图把云南做为反攻的基地，负隅顽抗，将其残余部队及部分军事指挥机构迁入云南。关麟征的陆军总司令部，黄镇球的联勤总司令部，张镇的宪兵5个团等等，均由西南公路运输司令部的汽车部队连日赶运，业已到达滇东的沾益、曲靖一带。蒋介石还命令第8军军长李弥的部队进驻昆明；并准备将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由重庆迁至昆明，让云南省府和绥署等军政机关迁到滇西。卢汉心里很清楚，如果把昆明让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起义势必障碍重重，或者会出现更坏的结果。因此，卢汉总是巧妙地运用各种借口、拖延时间，迟滞南迁。

1949年11月中旬，卢汉突然宣布：休假半月，戒烟治病，省府事务由杨文清代理。其实卢汉闭门拒客，深居公馆，主要是以戒烟治病为名，障人耳目，暗地里策划着起义大举。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迫近云南；云南境内的“边纵”已先后解放了30多座县城和全省1/3的地区；云南各地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在此局势下，卢汉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对起义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首先，卢汉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8军、第26军调往离昆明较远的沾益、曲靖和蒙自、开远一带；而将比较可靠的第93军、第74军调到昆明及其附近地区。

12月1日，卢汉为把昆明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下令成立了昆明警备司令部。卢汉授权昆明警备司令部统一指挥昆明市区的军队宪兵、警察，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加强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12月2日，昆明警备区司令部便发布实行戒严布告，以控制特务人员行动。

12月3日，卢汉派林毓棠、周体仁前往香港，与中共华南局驻港负责人张铁生联系起义问题。他们转达了卢汉准备于近期内率部起义，希望中共予以支持等要求。张铁生明确回答说，目前云南形势非常紧急，希望卢汉争取时间，见诸行动，共产党是重行动、不重宣言，起义以后的许多问题，已有湖南程潜起义的先例，只要卢先生见诸行动，中共中央一定对云南大力支援。12月7日，林毓棠由香港乘飞机赶回昆明向卢汉汇报后，卢汉当即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起义。

12月8日晚11时，卢汉临时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出席的有杨文清、马瑛、佘晓清和龙泽汇等5人。卢汉说：“时机紧迫，如果解放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会前卢汉已派人与中共云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经与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等商议决定即日举行起义。

12月9日，卢汉在自己家中宴请美、英、法等国驻滇领事。汽车盈门，宾主尽欢，以此场面迷惑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特务耳目。同时按事先布置的“兵变”开始行动，以张群抵达昆明的名义，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9时在卢公馆开会。李弥、余程万、沈醉、沈延世、李楚藩、童鹤龄、石补天等7人及其随从到后，被全部缴械扣留。事后卢汉前往五华山光复楼指挥起义。

当晚10时整，卢汉向各部队发布命令，宣布正式起义。接着向全省发表了广播讲话，宣布云南全境解放。随后向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

理及全国人民与云南军民发表了起义通电。

另外，在当天响应起义的还有国民党军、警、宪、特单位及部分人员。在昆明起义中，值得一提的有两个比较典型单位的起义：一个是国民党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不仅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而且于12月10日起草了一份按特务书写方式的手令，劝说部属停止抵抗，缴出武器，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一个是联勤总部汽车第17团五连一排，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排长马保即单独率部举行起义，带领30余人和20辆汽车及满载着武器弹药军用物资，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将人员及车辆物资缴给了人民解放军“边纵”沾益支队。

昆明起义后，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革命权力机关，以处理起义后和接管前非常时期的全省军政大事。将原第74军、93军分别改编为第12、13两个军。

12月10日和11日，毛泽东、朱德两次给卢汉发来嘉勉电，祝贺昆明起义。12月13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也电贺起义成功。昆明起义也受到当地多方面的热烈拥护。

蒋介石为扼杀昆明起义，于12月12日派飞机轰炸昆明，并命令国民党第8军和第26军进攻昆明。12月16日，敌军主力到达昆明近郊，在外围发生了激烈战斗。19日，国民党军发起全线总攻。起义部队在昆明人民的支持下进行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发动的一次次猛攻。21日，人民解放军增援部队驰援昆明，加之被扣压的原第26军军长余程万劝该军撤退，使敌人第26军和第8军先后撤退。昆明保卫战遂告结束。

1950年1月初，人民解放军“边纵”进驻昆明。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部从南宁挥戈入滇。2月25日，昆明各族各界人民30万人举行了欢迎解放大军的入城式，并举行了欢迎大会。3月4日，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成立，由卢汉任主任，宋任穷、周保中任副主任。同时成立了以陈赓为主任、周保中为副主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起义部队也进行了整训改编。卢汉昆明起义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取得胜利，使云南得以和平解放，配合人民解放军关闭国民党军南逃国外的大门，起了重要作用。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率部6万余人在四川省彭县举行起义。

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协同下，向西南胜利进军。11月15日攻克贵州省会贵阳，11月30日解放重庆。人民解放军已从东、南、北3面完成了对四川省会成都的包围，成都和四川全境的解放已指日可待。蒋介石为进行垂死挣扎，将其嫡系胡宗南部调集于川陕边，并且拉拢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共同反共，阻止人民解放军入川。

刘文辉，四川大邑县人，曾任第24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川康边防军总指挥。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西康时，他曾派兵堵击过红军。刘文辉同蒋介石长期明争暗斗，抗拒图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接触，又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使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由反共到联共的道路。

邓锡侯，四川营山县人，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7年任第28军军长。抗日战争中升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5军军长率部出川抗日。1938年后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对蒋介石排斥地方势力极为不满。潘文华，四川仁寿县人，曾在川军中历任排、连、营、团、旅长、师长等职。抗战时期任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3军军长。率部出川抗战。1946年后，调潘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10月又被蒋介石撤去绥靖公署主任职务，潘孤身回重庆，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也是虚名。

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三人在抗战时期就对蒋十分不满，特别在他们率川军出川抗战后，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不同程度的了解。邓锡侯多次请朱德总司令给第22集团军团以上军官讲抗日形势和八路军的游击战术。邓还派人到延安抗大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重视做川康地方实力派和高级将领的争取、团结工作。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和周恩来同志先后在武汉、成都、重庆多次会见刘、邓、潘，给他们讲共产党抗日救国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1949年解放大西南的形势下，中共四川党组织的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川东、川西、川康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及一些地下党员，都积极加紧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的争取工作，以配合西南的解放。1949年9月，刘文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联合西南实力派准备一道举行起义，并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即回电：大军行将西指，希望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这一指示精神，更坚定了刘、邓、潘起义的决心，同时进行准备与蒋介石周旋，等待起义时机的到来。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重庆。当天下午，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军校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熊克武等人谈话。极力掩盖惨败的真相，声称这次川东战场是有计划的战略转移。接着吹嘘“川西决战”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把希望寄托在胡宗南部，要求刘、邓、潘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组织川西决战。还要将刘、邓、潘等人家眷送到台湾，企图以此为人质、逼迫刘等人为他卖命。面对蒋介石的阴谋，刘与邓等商量对策，决定采取“一推二拖”的办法抵制，虚与委蛇，以摆脱蒋介石的圈套。

控制。同时刘、邓、潘认为成都即将解放，起义时机已经到来，决定举行起义，并把起义地点选择在彭县。因为彭县距成都较远，可进可退，又便于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

12月5日，蒋介石逼潘文华乘飞机到海南岛，潘立即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又与邓锡侯联系，便决定以抱病为名离开成都前往邓部驻地灌县。12月7日，刘文辉等已得到蒋介石要召见并要加害于他们的消息后，遂决定于当日秘密出走。刘文辉和邓锡侯2人设法混出成都北门，来到约定地点会合后，立即登车疾驶，8日上午到达成都以北的邓锡侯部驻地新繁县龙桥，并命所属部队全部进入战备状态。蒋介石得知刘、邓出走消息后，派王瓚绪到龙桥劝说刘、邓返回成都，并转达蒋介石的话，说同你们过去一切都是出于误会，无论如何要回成都去，一切都好商量，如不信，他可以叫蒋经国来作质。还转达张群的话威胁刘、邓说，如不回成都，蒋介石就要命令胡宗南先解决他们。但刘、邓拒不从命，任何利诱和威吓已无济于事。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到达彭县龙兴寺，与前一天到达这里的中共川西地下党，川康地下党、川东地下党、二野派遣人员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会合，准备起义。潘文华也随后两日赶到龙兴寺，参加起义工作。此时，彭县龙兴寺成了川康起义中心。在刘文辉最紧张的一周时间里，周恩来曾连发几次电报促其行动，时机已到不必再作等待。当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正式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派。

接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部中、上级军官黄隐、谢无圻、杨晒轩、伍培英、马毓智、潘清洲、陈离、刘元瑄、刘元琮及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保安第二指挥官兼第8团团团长吴宗国，前绥署副官长黄骥、副参谋长万里等川军将领和民主人士黄慕颜等，由邓锡侯部95军军长黄隐领衔，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拥护刘、邓、潘起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随即3部官兵在彭县、新都、新繁、郫县、灌县等地起义。

在酝酿川西起义的时候，刘文辉也加紧西康省地方政府的起义的准备工作。刘文辉及第24军军长刘元瑄宣布起义，标志着西康起义成功，西康省获得和平解放。12月12日，刘元瑄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在雅安召开了隆重的起义誓师大会。14日，宣布西康起义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改为军政会议），由刘元瑄等负责，作为指导全省起义的最高机构。西康省民政厅长代行省主席张为炯，亦于12日通电全省各县宣布起义。

西康起义后，胡宗南部和王陵基的保安团，在人民解放军日渐逼近，即将被歼的情况下，企图攻占西康，打开一条退往云南、逃往国外的生路，于12月中旬向西康发动攻击。起义部队进行了英勇的阻击战，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后进入雅安，西康彻底解放。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贺龙司令员亲自主持改造整编起义部队的工作。起义的24军与解放军第62军合编，起义之95军与解放军第60军合编。对起义官兵分别进行了妥善安排。

1950年1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刘文辉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邓锡侯、潘文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邓后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等职。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部起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苟延大西南，以川康为基地，等待反攻的梦想，加速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最后覆灭。川西和西康起义，为后来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武都起义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王治岐、第119军军长蒋云台、省政府代理秘书长李永瑞等率部8700余人在武都联名通电起义。

国民党第119军是在蒋家王朝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于1949年4月在甘肃天水成立的，由原国民党第244师和甘肃保安团改编的第247师合编而成，军长王治岐、副军长蒋云台，全军2万余人。该军军部设在武都城内，第244师由副军长蒋云台率领驻守甘泉、安化、柳林一带，第247师驻防西固（现舟曲）、两河口一带。10月29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王治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省会”设在武都，蒋云台升任第119军军长。

6月下旬，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韩练成（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派人到甘泉争取蒋云台，劝他早举义旗，归向人民。当时，蒋云台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处在向三面看的心理状态，一面看汉中的胡宗南；一面看兰州的马步芳；一面看西安的共产党。对于自己何去何从，仍犹豫不决。在这期间，国民党汉南绥署、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先后在双石铺和静宁召开会议，查找扶眉战役贻误战机的责任，最后把战役失败的罪责全部归罪于第119军的王治岐和蒋云台，并打算惩治他们俩人。从此，蒋云台开始感到胡宗南和马步芳靠不住，倒戈之念油然而升。

7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解放西安、榆林等地后，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长驱直入，向西推进。国民党守军似惊弓之鸟，节节败退。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中共甘肃省地下党组织，紧紧抓住蒋云台开始倾向于共产党的心理状态展开政治攻势，利用各种渠道，派遣策反人员打入第119军，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策反工作。解放军第1兵团王震司令员还通过李般木、康君实转递给王治岐蒋云台的信，用扶眉战役后的现实进行说服教育，指出他们继续跟着国民党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只有归向人民才会前途光明，促使王治岐和蒋云台初步定下了弃暗投明的决心。

10月26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为了配合第二野战军围歼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队，向陇南、陕南残敌展开猛烈进攻。到12月初，先后解放两当、成县、徽县、西和、康县等县城，解放军第62军从岷县进军武都，兵临武都城下。这时，国民党第119军副军长蒋云台会见王治岐，说明人民解放军已大军逼境，如果不马上起义，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王治岐也认识到，重庆、川东及川南已经解放，第119军进退无路，只有和平起义才是唯一出路。便立即与中共地下党员康君实和李般木联络，一起制定了起义方案。然后派出陆进贤为代表，向解放军第62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汇报第119军的起义方案和部署，得到第62军领导的同意。为确保起义的顺利进行，王治岐和蒋云台下令收缴了武都地区警察局的枪械，并扣押了袁耀宸等一批思想反动的军政要人。

12月9日，王治岐、蒋云台和李永瑞联名通电全国，率领8700余官兵起义，并以省政府代理秘书长李永瑞的身份，电话通知当时住武都的各级政府，一律随第119军共同起义。同时，安排马锡玉、陆进贤、章士魁、王东才等军政领导人员迎接解放军第62军接管城防。这天，武都山城四门大开，各界人士和广大军民夹道欢迎解放军进驻武都，庆祝武都解放。

12月中旬，武都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3军，蒋云台任军长，黄学忠任政委，孙超群任副军长，康维汉任司令部参谋长，陆进贤任

参谋处长，张汉民任政治部主任。王治岐等其他起义将领和骨干也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武都起义，打通了甘川门户，对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成都，扫荡残敌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十九兵团普安起义

1949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19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率部3.1万余人在黔西普安举行起义。

1949年11月11日，国民党贵州绥署主任谷正伦在贵阳召开师长以上军政人员应变会，部署撤退。会议一结束，第19兵团司令何绍周就给在花溪的副司令王伯勋打电话，要王同兵团部一起撤离贵阳。11月13日到达黔西毕节。

王伯勋到毕节后，见到了老部下，毕节地区督察专员兼保安第1旅旅长刘鹤鸣。两人关系密切，志同道合，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也谈了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认识和态度。因此，相约通过毕节当地名士周素园先生，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周素园是贵州毕节人，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曾担任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等职。1936年2月，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长征到毕节时，周老应邀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随后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周素园先生的革命精神深受毛泽东、任弼时、贺龙等中共领导人的赞扬。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被委任为八路军高级参议，离开延安回到西南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949年11月20日，王伯勋通过周老的侄子周雅九会见了周素园老先生。谈论时局时，王坦率地说“国民党完了，我们的处境，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周老指出：“国民党从中兴到衰败，也非偶然，北伐能成功、抗日能成功、国共分裂就失败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是作将领的人，现在更应审时度势，为众多官兵着想，为人民着想。”王伯勋担心地说：“我和共产党打了十几年仗，我任39军军长时进攻过山东、扫荡过苏北，去年徐州会战，为援救黄伯韬兵团，死拚硬杀，他们能不记帐吗？”周老指出，傅作义、程潜、董振堂等起义的壮举就是很好的借鉴。为王伯勋指明了出路。

于是，王伯勋要第49军军长王景渊从黔西来毕节相商要事。王景渊乘车于次日赶到毕节。两人经过一番商议，不谋而合，决心走起义道路，商定了具体办法。并与驻普安的89军军长张涛联系。不料张涛已于12月7日发出了起义通电，并决定派人策动王伯勋举行起义。

12月10日，王伯勋到普安，原想来说服张涛起义，殊不知张涛和王先到普安的黔西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2人已走在前头，早与共产党有了联系。于是都欣然同意联名起义，当即草拟了一份和平协议。王伯勋、张涛、谭本良、魏锡龄、王光炜、蔡世康都分别在上面签了字。随后，王景渊和黔西北绥靖区司令兼第271师师长刘鹤鸣等相继到达普安，也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第272师师长余启佑到普安后开始犹豫不高兴，在王、谭、张等军政长官一再劝说下，才勉强同意签了名。接着张涛便让他的秘书李克勋草拟起义通电。由于第89军起义通电已由张涛领衔单独发出，因此除张涛之外的各起义将领即署名发出了通电。

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分别复电王伯勋、张涛，对他们率部起义，归向人民，表示欢迎和嘉勉。23日，新华社播发了由王伯勋、张涛领衔签发的两份起义通电和刘邓首长的复电。王伯勋等率第19兵团起义，加速了贵州的解放。

郭汝瑰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11日,国民党军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郭汝瑰率部1.5万余人在四川省宜宾举行起义。

郭汝瑰,四川人,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后,在川军郭汝栋部任连、营长,1929年经袁镜铭介绍加入共产党。后在国民党“清共”的压力下,东渡日本,企求读书救国,从此脱离了中共党组织。七七事变后,郭汝瑰逐渐受到陈诚、蒋介石的器重,先后任师参谋长、国防部厅长、军长、兵团司令等职。

郭汝瑰在国民党上层目击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期望早日脱离国民党,回到共产党怀抱。因此,到处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1945年5月的一天,郭在重庆意外地遇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从事地下工作的老朋友任廉儒。二人重逢,格外高兴,共论时局,忧国忧民。在多次接触中,任廉儒了解到郭汝瑰对国民党的看法,并有要求恢复党籍的愿望时,即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作了汇报。1945年12月和1946年初,董必武在任廉儒的安排和陪同下,在重庆先后两次对郭汝瑰进行面谈做工作,要郭今后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利用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机会,好好为共产党做些有益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郭汝瑰做为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3人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的助手,同周恩来有一定接触。在随小组活动期间,先后见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对郭的思想转变有一定影响。

1948年11月,郭汝瑰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作战会议。会后,郭将“1948年12月江防计划及国军京沪地区江防配备图”等9份绝密件冒险交给了任廉儒,请他设法转交中共党组织。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郭汝瑰曾多次请求任廉儒帮助他去解放区。任向党组织汇报后,中共党组织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占据西南,在那里必有一场恶战,希望郭汝瑰争取带兵到西南去举行起义。这比他去解放区的作用和影响更大。郭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意见,趁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之机,向顾祝同提出了不当厅长,去带兵打仗的请求,几经周折,1949年1月,蒋介石才任郭为18军军长,2月改任72军军长,让他去重建72军。随即到上海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任廉儒。郭汝瑰在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了原72军残部官兵,保荐师长,委任团、营、连长,很快搭起了军部架子,又到第四厅和联勤总部,要足枪械装备粮饱等军需物资。从上海飞往重庆后,迅速扩充部队。一面号召谁征集一连人谁就当连长;谁能征集一营人就当营长。一面举办军官教导队。这样一来部队很快发展到两个师。加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拨给的一个师,共3个师的人马,于是年5月份由重庆开赴川南泸州、宜宾一带驻防。

1949年2月,郭汝瑰和任廉儒在上海分手时,郭要求任回四川帮助他联系起义。任廉儒到达重庆后,不断与郭汝瑰保持联系。郭也经常向中共党组织汇报自己部队情况及蒋军的兵力部署。为了做好郭汝瑰的工作,第二野战军情报处决定派赵力钧、屠云剑二人秘密入川。10月8日到达重庆,与任廉儒接上头。15日,任同赵力钧一同去宜宾在教导师师长家中会见了郭汝瑰。商谈了把握时机举行起义问题。郭汝瑰委任赵力钧为72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员,便于赵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

11月14日,国民党军国防部命令郭汝瑰组织第22兵团,由郭任兵团司

令，辖第 21、第 44、第 72 军和 3 个独立师，实际当时郭只能指挥第 72 军。在重庆、贵阳相继解放后，解放军南路大军接着解放了遵义，很快又解放了川南的古宋、叙永、纳溪等县城。解放军第 10 军先遣部队已抵达泸州罗汉场一带。

12 月 3 日，解放军第 10 军先遣部队打电话给郭汝瑰，让郭派人接洽起义。郭汝瑰同代理参谋长徐孔嘉分析研究后，认为起义时机已到，决心收拢部队，集结宜宾，准备起义。郭汝瑰到达宜宾后，于 12 月 9 日上午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大多数都赞成起义，对个别师、团长进行了诱导，取得一致意见。郭汝瑰将早已写好的给二野刘、邓首长关于率部起义的信，派徐孔嘉及地方进步人士一道去找解放军联系起义。徐以军参谋长的身份于 10 日到达南溪县城，与解放军第 16 军政治部主任吴实汇报了 72 军部署情况，面交了郭汝瑰的两封亲笔信，受到了 16 军首长的欢迎。吴实主任亲笔给郭汝瑰写了回信，同时将徐孔嘉联络起义事上报了二野和第 5 兵团，通报了第 18 军。

二野刘、邓首长对郭汝瑰部起义非常重视，立即给第 5 兵团、第 16 军、18 军和 10 军发了接受郭部起义的具体指示。10 日中午，第 16 军军政处长傅学楷同徐孔嘉等人，由南溪登船溯江而上，当晚到达了宜宾城，受到郭汝瑰的热烈欢迎。夜间，傅学楷处长帮助郭汝瑰拟好了起义通电。

12 月 11 日，第 72 军官兵举行起义大会。会上，郭汝瑰首先宣读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电及起义通电。庄严宣告：“72 军起义了！由反动反人民的军队，今天成为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由歧途走上了光明正路。”至此，郭汝瑰率部 1.5 万余人在四川宜宾正式起义。

12 月 12 日，解放军第 18 军相继到达宜宾。郭汝瑰率起义将领过江迎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并汇报了部队起义情况。接着 18 军在宜宾城召开了欢迎 72 军起义大会。为了支援解放军早日解放乐山地区的人民，72 军以炮兵营调归 18 军指挥。14 日，第 5 兵团杨勇司令员派川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郭影秋及代表陈竟波到达宜宾，帮助整训起义部队。

12 月 16 日，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通电嘉勉 72 军全体官兵，对郭汝瑰等部毅然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站到人民方面来，甚为欣慰。接着二野首长派任廉儒赶赴宜宾看望了郭汝瑰并慰问了起义部队。

12 月 19 日，新华社发布了郭汝瑰率部起义的消息。这一消息发布后，震撼了尚未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引起了国民党军内部的进一步分化。蒋介石在台湾听到消息后，气得捶胸顿足。

1950 年开始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改编，到 6 月结束，各级军官都作了妥善安排。郭汝瑰后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1970 年后任重庆市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同学会理事等职。1980 年 4 月 9 日，总政治部党委批准了郭汝瑰为中共党员。

国民党空军昆明起义

1949年12月12日，国民党空军留昆人员1000余人、飞机10余架响应卢汉起义的通电就地起义。

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是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卢汉，在中国共产党的策动下，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的号召率部在昆明通电起义。当日下午，卢汉命令所属保安部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解除了机场国民党空军警卫连的武装，扣留了停在机场的10多架飞机，查封了汽油。晚上10时，卢汉派人到招待所收缴了空勤人员的手枪。12日，卢汉为稳定机场人心，任命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张有谷为昆明机场司令员。12日下午，张有谷到巫家坝机场召集机场的官佐讲话，宣布起义，要求共同维护机场秩序，保护国家财产。空军第5路司令部供给处处长张俊位，当即代表全体官兵表态支持起义。

为迅速开展工作，会后张有谷组织成立机场司令部。中共地下党员郭佩珊任副司令员，张俊位任参谋长。下设4个组：熊心吾为防空作战组组长，张丕兹为人事组组长，刘人淑为总务组组长，郝绍连为补给组组长，王秉立为副组长。司令部发出通知，要求住在机场外和昆明城内的空军官佐限期报到，参加起义。同时研究制定防敌轰炸的措施。

昆明空军起义后，住在海南岛的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先是派飞机到昆明上空散发传单，威吓起义人员；紧接着派飞机轰炸，主要目标是昆明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北门外营房和被扣下来的9架C—46型运输机。时，国民党驻云南沾益的第8军和驻蒙自的第26军两个机场，还被国民党控制利用。为了减轻昆明压力，机场司令部于12月17日、18日出动运输机，以木板滑动投掷炸弹，破坏了沾益、蒙自机场的跑道，阻止国民党空军配合国民党军反扑昆明的阴谋。12月28日，机场司令部又决定由飞行员李加谊、古江，报务员徐峰，机械员林国权，联络、投弹员刘汝用、周盛麟、刘光汉、陆建航等人组成机组，驾驶C—46飞机飞临西昌上空，炸毁了西昌机场跑道，国民党在大陆所剩的唯一机场瘫痪，加速其在大陆统治的彻底崩溃。此期间，机场司令部还组织部分飞行人员进行飞行训练，对围攻昆明的国民党军队实施空中侦察，有力地配合了粉碎国民党军破坏云南起义的种种阴谋。

1950年3月4日，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接管了国民党空军起义的空地勤人员1000余人、机场6处、飞机13架、汽车200余辆及航材、航油、枪弹、被服等数十吨。不久，起义的部分人员与飞机参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任务。

范绍增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12日，国民党军川东挺进军总指挥范绍增率部4万余人在四川省大竹县三汇镇举行起义。

范绍增，号海亭，1895年生，四川大竹县人，曾在护国军中任排长、连长；讨伐袁世凯战争结束后被靖国军收编，任营长、团长；1924年投靠扬森，先后任旅长、师长。1927年，投靠刘湘后，曾破坏中共长寿县委的地下组织；1930年在鄂西洪湖地区围剿红军时被打伤，后被提升为副军长。1935年随刘湘在川北和川康地区进攻、阻击长征中的红军。1936年投靠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被利用来反刘湘，刘发觉后范逃往上海。1937年川军整编时，蒋介石任命范绍增为川军第21军副军长，次年任第3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88军军长。抗战后期任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1946年，范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赋居上海。

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对范绍增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时指出，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很快就会取得全国胜利，劝范回川相机拉起队伍，迎接解放。范绍增利用1949年1月任川东绥靖司令部副司令之机，筹划组织一个兵团、下编2个军6个师的招兵方案。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解放贵阳，进占川东、重庆解放在即。蒋介石为阻挡解放军，于11月26日委任范绍增为川东挺进军总指挥，柏良、孟浩然为副总指挥。范很快招募兵员，搜罗旧属约4万人，总指挥部设重庆，下编10个纵队、10个独立支队和一个警卫团，分驻大竹、渠县、达县、巴中、开江等地。

范绍增拉起队伍后，即着手进行起义的准备。第2野战军派遣入川的敌工人员积极争取西南国民党军的工作。在此之前，受二野派遣早期回川的杨震东经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推荐，已在范部当了副参谋长。10月，杨震东对挺进军警卫团团团长黄行伦介绍了自己在二野的学习情况及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对黄的思想影响较大，表示同意一道做范绍增的工作。10月19日，黄与杨便去见范绍增商议起义事宜。与此同时，二野政治部敌工部派回四川做策反工作的曾伟澜（原刘湘特从室主任）返川途经川东时，与范绍增和柏良会面时，欢迎范率部起义。中共大竹地下党也通过各种渠道，加紧对范的争取工作。

范绍增为了便于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于1949年10月20日将总指挥部移驻大竹。积极进行各种准备，召集各纵队、支队长会议，编列各纵队、支队番号和纵队长、支队长名单，部署各纵队、支队驻防位置及防区任务。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9日，范绍增撤往渠县，后将部队集中在三汇镇。此时，人民解放军第50军第149师政治委员金振钟打电话给范绍增，敦促他立即起义。这时范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请杨震东、曾伟澜赶到渠县，代范向金振钟表示率部起义的意愿。

12月12日，范绍增召集所属部队正式宣布起义。14日，范将所部武器集中运往渠县交给解放军。刘伯承获悉后，打电话告诉范，贵部诚意归顺人民，自动起义，可以不集中武器，转告官兵就地整训，维持治安。1950年元旦，解放军第50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楨在广安会见了范绍增和柏良。随后又派出一部分师、团干部去范部帮助整训部队。不久，奉中央军委命令，该部调中南军区进行整编，范绍增被调任解放军第50军高参。

范绍增率部起义，对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四川起了一定作用。范绍增于

1952年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河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和平改编

1949年12月13日，国民党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周祖晃率部5000余人在广西百寿县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实施战略追击。白崇禧败退广西，将全省划分为桂北、桂东、桂中、桂南、桂西和黔桂边六个军政区，强化对广西的统治，以此作为最后负隅顽抗的基地。国民党桂北区司令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0月25日在桂林仓促组建的。桂北军政区主要领导是：司令官周祖晃中将、副司令官兼参谋长霍冠南少将、副司令官蒋雄少将、莫敌少将、秘书长马炯少将。该区统辖：第八行政专区（桂林区），下辖临桂、永福、资源、兴安、全县、灌阳、灵川、义宁八个县，专员蒋雄兼；第15行政专区（长安区），下辖融县、三江、罗城、龙胜、百寿、中渡六个县，专员蒋晃；第7军第172师师长刘维楷少将；桂林警备司令部及所属部队，司令莫敌兼；桂林警察局及所属警察部队。

桂北军政区成立后，根据白崇禧的旨意着手组编“广西反共救国军”第13军，其兵员以区、县、乡成立的团、队为基础，根据“总体战方案”推行“一甲出一兵一枪”，即一甲出一兵买一支枪编组成立，司令官周祖晃兼任军长，下辖3个师，第八专区所属各县合编为新编第37师，蒋雄兼师长；第十五专区所属各县合编为新编第38师，蒋晃兼任师长；桂林警备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桂北纵队、临桂县自卫队合编为新编第39师，莫敌兼任师长；桂林市自卫总队、广西省会警察部队编为直属独立第1团，桂林市长韦瑞霖兼团长。此时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第四野战军第41军于11月22日解放桂林，迫使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尚未部署就绪，便于当日仓卒撤出桂林，经西江圩至山口村附近集结，撤至百寿。司令官周祖晃鉴于战局急剧变化，感到国民党倒行逆施，败局已定。因此，在撤离时，他作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留下广西省府上校参谋、桂林中北旅馆经理龙建云，察看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的动态和政策，待机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为弃暗投明作准备；二是派上校参谋马行粹前往中渡县找恶霸地主覃正明到百寿，筹划撤退到四十八主山区建立据点。桂林市长韦瑞霖亦有投靠人民的打算，撤退时留下银行协理唐理陵，与人民解放军联系。

桂林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广西联络站站长齐一夫，在中共地下党的介绍下，认识了“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会员张显龙。不久，龙建云在张显龙的帮助下，与齐一夫取得联系。由龙建云、张显龙向齐一夫转述了国民党桂北军政区的起义要求。齐一夫让其派员来桂林商谈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事宜。龙建云于11月29日向周祖晃汇报了与解放军接头和解放军进城后的情况。周与霍冠南商量起义的打算，得到霍的支持。周即派霍作为全权代表，随龙建云到桂林与解放军接洽，12月4日到达桂林。解放军第13兵团确定由齐一夫具体负责与桂北军政区代表的谈判工作。12月6日，齐一夫、张显龙与霍冠南、龙建云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对桂北军政区“和平解决方案”，由霍带回百寿。8日，周祖晃召开军政区司令部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正式宣布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并宣读了和平解决方案。会议过程中接到白崇禧急电令，周表示不予理采。10日，桂北军政区前进指挥所到达里旺后，周给白发了告别电报：因大势已去，为使地方免受战争破坏，决定效法北平傅作义将军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11日晨，前进指挥所无线电台

报告，白要与周通话，遭周拒绝。同时，周在里旺召开各部队长开会，讨论接受和平改编问题。12日，周在里旺正式宣布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复派霍冠南、余葆森（政务处上校处长）、马益坚（上校秘书）代表桂北区全体官兵前往桂林。13日，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副司令员李天佑与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全权代表霍冠南在“和平解放方案”上签字。

14日，桂北军政区所属部队先后到达西江、山口、茶岭、狭口等地，听候改编。同日，人民解放军第49军第147师师长郑贵卿、政委王建中、副师长李光汉到达两江参加接收仪式。17日，在两江正式办理交接手续。接收和平改编的有桂林绥署副主任兼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周祖晃以下5000余人。国民党桂北军政区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对加速广西解放的进程，减少桂北地区的战争破坏，顺利开展以后的清匪反霸斗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靖西起义

1949年12月13日，国民党靖西行政专区（即第6行政区）警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赖慧鹏率部3400余人在广西靖西举行起义。

赖慧鹏系广东省梅县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后因“六一”事变（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等于1936年6月间假借“抗日救国”的口号联合反蒋。同年8月这个事变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所瓦解）时反蒋而投奔广西桂系任职多年。1941年6月，赖辞去博白县县长职务后去广州居住。是年冬和1948年春，赖再次去香港会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并参加了民革。李济深曾向他指出，蒋介石卖国集团已摇摇欲坠，不久将被人民所推翻，要他回广西后找个工作，以后共产党打到湘桂边境时予以配合。是年6月下旬，赖谋得国民党靖西行政区警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一职，并于7月带张鹤龄、温庭榜等到靖西上任。赖上任后，结交开明士绅，保护进步分子，扩大武装力量。1949年春，赖将专署直属营扩大为保安第6团。为加快起义准备，赖于8月以搞好全区治安为名，报省批准成立了“广西第6区保安协进委员会”，由专员、保安副司令、专职军官、各县县长、县参议长、县党部书记长、地方士绅、各界代表共30人组成，赖自兼主任委员。这个“协进会”实际上是准备起义的机构，并形成以赖慧鹏、张鹤龄、卓锦湖、梁辑五、陈根才、韦高振、王达汉等为核心的起义秘密组织。为早日起义，赖派潘锡启、童杰飞为代表，分别进入游击区，同游击队秘密接触。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赖慧鹏将白崇禧派驻靖西的“总体战督导团”20余名官兵扣留起来后，遂于12月11日召开了由各县县长、各单位头头及军政要员等数十人参加的决策性的秘密会议。会上，赖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百色、田东等地，我们已到了最后关头，只有起义投靠人民，才是唯一出路。与会人员一致拥护起义，并成立了“桂西南和平解放运动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赖担任主任。会议还讨论了起义通电、起义宣言的内容，并在起义宣言上签了字，同时决定13日召开民众大会，宣布起义。12日下午，赖召开专署全体官员和职员大会，宣布脱离国民党，明天举行起义大会，愿意参加的欢迎，不愿参加的也不勉强，但不许捣乱，谁捣乱按军法处置。当日晚，各机关、团体、学校的职员、师生和居民，根据“桂西南和平解放运动委员会”的通知，纷纷涌上街头，把所有反动标语刷掉，写上新标语：欢迎中国共产党来解放靖西、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靖西地区、拥护和平解放等革命标语口号，整个靖西城气象为之一新。

13日上午，在靖西中山公园广场召开了起义大会，到会的有职员、官兵、师生和各界民众数千人。大会升起了五星红旗。赖主持大会并发表讲话，庄严宣布靖西专区（还有百色专署部份人员和田东县）自即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会上，宣读了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起义通电、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通电和桂西南和平解放运动委员会的《起义宣言》。会后，赖向广西各行政专员公署发了通电。中旬末，赖和陈汉流联名向张光玮发了电报，劝其顺应时势，率部起义。

赖慧鹏宣布起义后，立即分批派代表寻找解放军和游击队联系，要求迅速派兵进驻和接收。起义当天，赖派李如杰、李国固（靖西税务处长）、许

献之（天保县参议长）三人去田东，受到人民解放军第114师和游击队领导人周仲平、何科明等的接见。李如杰汇报靖西和平起义的情况。经过几天谈判，双方达成如下一致看法：第一，参加起义的官员，自起义之日起，一律以革命干部待遇，不咎既往；第二，起义人员愿工作者量才录用；第三，不愿留下而要求回家的，发给证明和路费遣散回原籍；第四，愿意去学习的人员，由政府送去学习。20日，李如杰返靖西。赖听取代表汇报后，同意上述意见，交枪事宜待解放军进驻靖西后再办理。下旬末，解放军仍未进驻靖西，赖心急如焚，于28日又派李如杰前往南宁，向省人民政府和广西军区请示汇报。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嘱李在南宁候命。

1950年1月9日，接管靖西地区起义部队的会议在南宁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副司令员李天佑，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雷经天，南宁市军管会主任莫文骅，省政府副秘书长杨德华，解放军第134师师长黄鹄显，还有李如杰等。会议决定派第134师师长黄鹄显为全权代表，处理靖西起义部队接收事宜。会后，李如杰拟一份电报稿，连同原靖西专署的电台呼号、密码本一同交给李天佑，于当天代为拍发。为迅速处理张光玮部改编问题，李天佑副司令员要李如杰同杨德华立即去靖西。11日，杨到达靖西。13日，第134师师长黄鹄显率一个团进驻靖西，主持接收靖西地区起义部队的各项工作。中旬，靖西军政委员会派出接管组，开始接收原靖西专区的武装、公物、钱粮、档案。靖西地区所属各县由军政委员会指定当地共产党游击队就地接管。整个接收工作进展顺利，未放一枪一炮，人民群众得以各安生业。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有：保安第6团、第3团第1营，专区所属7个县的县自卫队、警察局、禁烟督导处、护商队，下雷警备区署和陈汉流带来的原百色专署1个连等，共约3470人。

靖西地区和平解放，遵照共产党的政策，国民党军政人员全部妥善安排。3月上旬，赖慧鹏调省政府安排工作；4月间，参加广西省人民政府组织的参观团到北京、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同年8月，省人民政府送赖去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赖历任广西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农业厅副厅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还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董宋珩、曾苏元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1日，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等将领率部6万余人在四川省什邡举行起义。

国民党军第16兵团原是邓锡侯、孙震的老部队。1948年淮海战役中，第16兵团2个军约3万余人被解放军歼灭。当时任川鄂边区绥署主任的孙震派人四处联系，在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点收容逃散的官兵，重整残部。到1949年夏，才又收拢残部组成第16兵团，孙元良仍任兵团司令，曾苏元任副司令，但来到职。

董宋珩和曾苏元，一个是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一个是兵团副司令，但因都对绥署主任孙震和兵团司令孙元良不满，故一直未到职视事，长期居住成都赋闲。该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歼，对董、曾震动很大，常与一些老朋友谈论时势和前途，有些朋友劝他们应尽早返回部队策动16兵团起义。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第16兵团也于12月初撤离川东向西逃窜，经大竹、南充到达绵阳集结。

1949年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震动了国民党军一些将领。这时仍在成都的董宋珩、曾苏元再也不能坐视时局的变化，决定尽快返回部队，做好将领的工作，适时率部起义。董宋珩还请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一道去部队协同工作。中共川西党组织派出了中共党员杨叔明随同前往，争取16兵团早日起义。12月12日，董、曾随到成都办事的孙震一同赶到绵阳。

董宋珩与孙震不仅是老同事，还是同乡、同学，只因各自都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们之间也有不少矛盾。但在时局紧张，人才缺少之时，孙对董、曾回部随军行动仍表示欢迎。并由董继续任绥署副主任，曾苏元继续任兵团副司令。二人为能顺利返部有机会策动部队起义而感到高兴。13日早晨，董宋珩同中共地下人员杨叔明等一起分析了孙震的情况，认为必须抓紧时机做孙震的工作。经过与孙谈话，孙沉思不语，不表示态度。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14日，刘、邓、潘派人送信，邀请杨森和孙震去彭县开会议事，孙、杨都推辞不去，要董宋珩代为赴会。董与刘、邓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素知他们逆蒋亲共，如有机会去彭县听听他们的意见，对策动16兵团起义定有帮助。刘、邓、潘等都会见了董宋珩，向董介绍了彭县起义的情况，指出：“现在局势已很明朗，只有脱离蒋介石，举旗起义，投向人民才是光明大道。我们已正式通电起义了。事不宜迟，越快越好。”董宋珩去彭县后，第16兵团各部陆续向绵竹，广汉、金堂集结。曾苏元、杨叔明也相继返回广汉。董也于16日乘车返回广汉，得知次日孙震杨森将去成都。

12月17日，董宋珩、曾苏元、杨叔明在一起分析孙震与杨森这次去成都的动向。蒋介石对胡宗南必有保全实力、撤退西昌的密令，并让地方杂牌部队掩护胡宗南嫡系部队向西撤退。另外孙震、杨森公开宣布绥署及兵团要务，由孙元良全权代职，可能要逃跑。董宋珩还向孙、杨详述了去彭县的情况。是日下午，董宋珩把彭县起义通电递给孙震后接着说：“刘文辉、邓锡侯均望我部与其统一行动，脱离蒋介石，以保全全军安全，以使百姓免遭祸害。”杨森在一旁一把抢过起义通电，愤愤扔在地下，孙震支吾两句，未置可否。18日，孙、杨去成都，即伺机逃往台湾去。

这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杨叔明同董宋珩等分析了形势，认为人民解放军已分路向川西挺进，对成都形成包围；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坐飞机逃往台湾和香港，部队失去指挥已溃不成军；第 16 兵团各部已陆续到达广汉附近，孙震弃职逃走，将兵权交给孙元良，而部队官兵对孙元良又不信任，当前正是积极策动部队起义的大好时机。因此，确定工作重点应立即转向两军各师。团长，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起义政策。于是，董宋珩和曾苏元向第 41 军、47 军各军、师长们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是“战”，死守成都，这样地方百姓和官兵必受伤亡之苦。第二条路是“走”，跟着胡宗南败退西康，而后经云南逃往国外，路途遥远，会把部队拖垮。第三条路是“和”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可使地方百姓和广大官兵少受磨难，这是最好的一条路。董接着指出，我们多年来倍受蒋介石嫡系的排挤、打击，现在胡宗南仍妄图以我们作替罪羊，为其卖命当炮灰，依我之见，我们联合起来，早日投向人民解放军！经过几天的宣传教导工作，各师长们都拥护起义，取得了一致意见，请董、曾主持起义，至此，第 16 兵团起义已成定局。

12 月 18 日，胡宗南电令第 16 兵团“开赴成都接任城防”，孙元良召集第 41 军团以上官佐传达，大家反对而不去成都；19 日，胡宗南又急电第 16 兵团“在德阳、广汉一线，沿川陕公路重叠配备，以阻止解放军向成都迫近，并掩护裴昌会第 7 兵团在成都集结。”孙元良召开会议设宴招待各军、师长传达命令，却没有几个人来参加，拒不接受胡宗南的命令。出席会者把事先董、曾商议好的计划说出来：“为避免与解放军作战，离开川陕大路，把部队摆在什邡、绵竹一带，视机观变。”孙元良无可奈何，只好命令兵团各部向绵竹、德阳一带集结。

12 月 19 日，董宋珩、曾苏元、杨叔明了解到孙元良召开会议情况后，决定加紧工作，统一行动，成立“起义指挥所”，由董宋珩、曾苏元、杨叔明、董用威、杜庸（刚由成都到广汉）组成，并通知各部随“起义指挥所”离开广汉，向什邡、绵竹转移。孙元良得知各部队离开广汉向什邡移动，心知有异。于是在 20 日清晨派警卫部队包围了董、曾住所，可是董、曾等已于 3 小时前离开广汉、到什邡去了。

12 月 21 日，董宋珩等到什邡后，立即召集各部队师、团长开会，董宋珩说明了准备起义的情况，公开介绍了地下党员杨叔明的身份，请杨讲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首领已逃奔台湾，孙元良已陷于孤立，请大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走起义的光明大道。与会师、团长们一致表示赞同。董宋珩决定立即通电宣告起义。在通电上签字者有董宋珩、曾苏元，第 41 军军长张宣武，122 师师长熊顺义，124 师师长蔡钰，301 师师长张则荪，第 47 军军长严翎，123 师师长裴元俊，127 师师长袁国驯，302 师师长张子完，235 师师长潘清洲，绥署独立纵队司令刘景素等。第 79 军军长龚传文及其官佐也签了名，送到彭县拍发。

12 月 26 日，在什邡城关召集了第 16 兵团所有部队的军官大会，正式宣读了向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向重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等写的《起义通电》，宣布所部 6 万余名官兵起义。

1950 年 4 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第 16 兵团开赴华东整训。10 月，进行了整编。士兵和少数初级军官编入解放军第 9 兵团，不久即参加抗美援朝。大部分军官编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

王缙绪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2日，在人民解放军的重兵压境和政治争取下，国民党军西南第1路游击总司令王缙绪率部4.3万余人在四川成都举行起义。

王缙绪，字治易，1885年生，四川西充人。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第5师师长。1928年改任第2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1935年投靠蒋介石后，即被委任为第44军军长兼四川第6路“剿匪”总指挥。曾率5个旅15个团的兵力，先后在四川绵阳、江油和大邑等地堵击红军长征北上抗日。1938年3月，王缙绪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川抗日。4月，回川代理四川省主席。7月，云南龙云去武汉路过成都时，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王缙绪等签订了一个川、康、滇3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向蒋告密此事，蒋任命王为四川省主席。此事引起川康将领不满，刘、邓、潘部下7个师长联名列举王缙绪10大罪状，呈报蒋介石，声言要以武力驱逐王。蒋接电后，令王到抗日前线，由蒋兼任四川省主席。在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变中，王缙绪表现很卖力。1942年，被蒋介石提升任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次年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胜利后，王于1947年任重庆市卫戍总司令，1948年任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一举解放贵州省会贵阳，后又解放重庆。蒋介石要到成都召集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王缙绪等，部署川西大决战。王乘机组织西南第1路游击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编组了6个军和6个纵队，约有4.3万余人。蒋介石坐镇成都，威逼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在川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一场。刘、邓、潘一面与蒋周旋，一面加紧做起义准备工作。在此关键时刻，王缙绪仍继续跟着蒋介石跑，于12月8日按蒋的旨意对刘、邓进行拉拢与分化。劝说刘、邓跟蒋走，放弃起义。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彭县正式通电起义。王缙绪西南第1路游击总司令部所辖第5、第9军也随刘文辉第24军在雅安起义，第44军第150师在隆昌起义。这时在成都的进步人士也劝王缙绪率部起义；朱德总司令也致信王，要他赶快起义，机不可失。王部下一些将领在刘、邓、潘率部起义的影响下，也要求起义弃暗投明。蒋介石早已逃往台湾，王缙绪见大势已去，只有起义。于是于12月22日宣布所部在成都起义。

王缙绪起义后，1950年1月，才将部队武器移交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第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后王缙绪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

陈克非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4日，国民党军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率部1.2万余人在四川省郫县举行起义。

陈克非系浙江省天台人，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陈克非所率第20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一。该兵团于1949年9月在湖北以第2军为基础扩编组建的，辖第2、第124军，属宋希濂指挥。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政权即将结束在大陆的统治。国民党军一些高级将领面临此境纷纷寻求自己的前途和出路。陈克非直率地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30年完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权快30年了，看来也快完蛋了，30年一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

11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起进军川黔的作战，由鄂西、湘西地区对宋希濂集团发起钳形合击，迅速突破了其防线两翼。国民党第20兵团第124军第223师和第60师大部被歼，第2军即从鄂西退至川东黔江、彭水一带。陈克非率残部退至綦江。月底，人民解放军进至万盛场。陈克非率残部沿綦江、江津向璧山转移，于12月初溃退到成都，被胡宗南部署在成都外围。中旬，陈克非去成都向蒋介石禀报收容部队的情况。但陈没有料到，几天前还激励将士“同心同德，再接再厉”的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去了。此时，国民党军第15军第243师师长段国杰与张钊先生谈起了起义的事，后又约陈一同谈。张对陈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联名通电起义，共产党的军队由西北到东北，进关解放了北平，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席卷两湖、两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政府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了。陈克非听了张钊的话，心里越来越不安宁。他既考虑到当前的时局，也考虑到与共产党为敌快20年了，怨恨很深，心有顾虑，举旗不定。在第15军参谋长廖传枢和段国杰的建议下，陈下决心派人去彭县与人民解放军联系。

21日，陈克非去参加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返回郫县后，被派往彭县作试探性联系的第2军副军长段成涛也已返回，段向陈汇报了彭县的情况，还介绍在那里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朱德钦及陈离、牛范九等一起谈话的内容，并说，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都已逼近了，如举行起义，限三天之内作出答复。陈听了段成涛的报告后，决定22日上午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传达胡宗南关于部队向东转移的命令，同时，嘱段成涛与彭县方面保持联系。23日，陈按规定时间向胡宗南总部报告准备情况时，发现电话已拆，胡已乘飞机从广汉逃跑了。此时，陈的思想发生了急转，他说：顶在我头上的上司都飞跑了，剩下的只有我和罗广文两个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己作主张了。于是打电话给第15兵团第108军参谋长张荣宪，要他到第20兵团共商今后的行动，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也来了。在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后，决定通知第一线部队，自即日起停止战斗行动，以表示我们起义的诚意。尔后，各兵团先疏通师以上将领，开始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同时陈克非再次派段成涛去彭县向朱德钦、陈离表示两兵团决定起义，提出双方部队立即停止战斗行动。与此同时，陈在各军军长参加的会上讲了部队已处于四面被包围的形势，也讲了为挽救全部队，为顾全随军家属，为全体官兵的前途，决定举行起义。各军军长听了陈的讲话都表示赞同，决心同陈一起走起义的道路。当日午后，段成涛从彭县返回兵团部向陈面报：人民解放军对我们起义表示欢迎，时间越快越好，限24日作最后答复。陈于当日夜草拟了起义通电稿，内容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我率第20兵团全体官兵于1949年12月24日脱离国民党建制和指挥，站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旗帜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交迥于邛县”。

24日上午，各军长、师长在兵团司令部开会，陈克非讲了起义的意义后，要求大家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下午，陈请牛范九将起义通电草稿连同签名原件送往彭县。第15兵团罗广文在通电上签了字。至此，第20兵团正式起义。部队起义后，分住在安岳、乐至及宜宾等地集训。1950年4月，中央军委命令该兵团官兵暂编为1个师，即解放军第167师，归第50军指挥。是月，又奉命由四川调往中南军区，于5月1日改编。部队到达湖北省天门县即开始整编，陈克非任中南军区高参兼第50军副军长，方墩任第50军第167师师长，段国杰任副师长，傅碧人任参谋长，全师1238人。9月，该师并入第150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彭斌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4日,国民党内政部第2警察总队总队长彭斌率残部6000余人,在四川省灌县(今都江堰市)石羊场举行了起义。

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简称内二警)是在蒋介石发动内战节节失败的形势下,为保住西南半壁河山,营造重庆反革命营地,以原刘湘的新25师和新18师为基础,于1947年组建的一支特务警察部队。国民党内政部部长张励生委任彭斌为总队长,麦征甫为副总队长兼直属大队大队长,张佐斌为第1支队队长兼重庆警备司令部江北地区指挥官,徐蓬来为第2支队长。内二警刚组建时只有2个支队,每个支队下编4个大队,总队部驻重庆。其任务是守护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市的兵工厂、武器仓库和飞机场等重要军事设施。1949年3月,蒋介石命令内二警再扩编3个支队,时有兵力2万余人。该部队内部关系复杂,相互多为亲友、同乡、同学。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控制这支部队,派进了不少军统、中统特务,官兵受毒害特别深。

1949年8月28日,蒋介石随其政府部分机关到达重庆,部署所谓西南防务,妄图割据西南,负隅顽抗。此时,内二警担负蒋介石的外线警卫,其部队分驻于南温泉至土桥、南温泉至黄桶垭、黄山至大兴场诸要点;宪兵第24团担任蒋介石的内线警卫。11月26日,蒋介石获悉人民解放军正向重庆开进,又急调胡宗南第1军第1师至重庆为其保驾。此举在内二警官兵中引起强烈不满,尤以彭斌、张佐斌等为突出,认为蒋介石如此使用内二警,放到第一线去阻挡解放军,是借解放军之手铲除杂牌部队。28日,内二警在重庆南岸设防的一线部队遭到人民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一触即溃,在向市区撤逃途中,又遭到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罗君彤第361师机关枪的射击。此时,部队思想极其混乱。

彭斌在重庆时,中共荣昌中心县委一直与其保持联系,做争取工作,并利用其亲戚、同乡等关系,派地下党员到其部队任职,进行策反工作。中共川东特委和川西地下党先遣工作组,也通过七条线开展对彭等人的争取工作。这对彭的思想转变有一定的影响,为其决定脱离国民党集团,反对蒋介石起了推动作用。在内二警遭到解放军攻击、特别是受到罗君彤机枪射击后,彭等在形势十分严峻的处境下,感到再不能跟着蒋介石走了,只有择机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彭斌决定扣留蒋介石,举行兵变。为此,他先将部队撤到了市区牛角沱、曾家岩、上清寺等要点后,再向山洞林园开进,活捉蒋介石,率部起义。30日中午,部队进入山洞时,发觉蒋介石已于凌晨飞逃成都,使扣蒋兵变计划落空。

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后,内二警奉命撤退到崇庆、大邑一带,受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指挥。至12月中旬,西南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云南卢汉、川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将领已率部起义,川、黔、滇、康大部地区已获解放。此时,王陵基跑到大邑,要内二警参加决战。不久,人民解放军进占大邑城南,王慌忙乘车向邛崃逃跑,内二警向北往灌县撤逃,几千人驻在方圆不到20里的石羊场。彭斌目睹部队的处境,想到自己受到中共的教育,感到只有率部起义,投向人民才是上策,于是与麦征甫、张佐斌副总队长商议,决定派总队部总务处长杨震华、参谋长卢涤生去彭县找刘、邓、潘起义指挥部联系。杨、卢到彭县会见了彭斌的同学黄慕颜,尔后又会见了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敌工人员朱德钦。朱要杨、卢速告彭做好部队的工作,立

即宣布起义。彭获悉后，于 23 日起草起义通电，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全总队官兵于 24 日在灌县南区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通电发出后，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电复彭斌等起义部队领导人，希原地待命。

1950 年 1 月 19 日，人民解放军第 16 军以第 48 师副师长张培荣、参谋长赵青组成军事代表团到该部开展整训工作。4 月，起义部队奉命调往贵州遵义鸭溪继续进行改造学习，10 月完成整训。部队分别编入遵义军分区和第 16 军，大多数官兵参加了贵州的剿匪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人民为革命立了新功。

罗广文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军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率部2.2万余人在四川郫县安德铺举行起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尚未解放的蒋管区进军。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一隅，作最后挣扎，再次由台湾飞到重庆进行部署。决定以第7编练司令部为主组成第15兵团，任命罗广文任兵团司令兼108军军长，向敏思任兵团副司令兼110军军长。并做出“确保重庆、保卫四川”为核心的部署。命令罗广文率部向贵州桐梓进发，布防娄山关一线，妄图阻截解放军由黔入川。

11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一野和四野各一部配合下，发动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很快解放了川东地区一些县城及军事要点。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调部队到重庆南郊布防，又令罗广文率部迅速由贵州之娄山关折向南川地区，企图迟滞解放军进占重庆。罗部于11月中旬到达南川并在城内设兵团指挥所，第108军司令部设在重庆南温泉，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已进击至重庆外围。对罗广文第15兵团部队给予沉重打击，俘罗部5000余人。11月28日，罗偕同兵团参谋长贾应华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蒋命令第15兵团归杨森指挥，罗快快不乐，率残部由重庆向成都西撤。

为了争取罗广文起义，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派遣陈济生前往四川策动罗广文起义。陈济生与罗广文、贾应华有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曾在一个部队任职，是罗、贾的下级。1949年初陈济生调任傅作义部副师长时，随傅作义将军在北平起义。1949年9月，陈主动要求受领策动罗广文起义的任务。11月初，陈济生到重庆见到贾应华后，回答了贾提出的为什么国军打不过共军等问题，提出这是新制度打倒旧制度，人心向背国军必败，共军必胜。同时劝说贾不要误信共产共妻及傅作义将军起义被扣等骗人的宣传，应尽早弃暗投明。不久罗调贾应华任兵团副参谋长。贾约陈同往南川见罗，因故而未成行，贾只好把陈济生致罗的信转交给罗广文，罗看完信后对贾说了要绝对保密、等待时机的想法。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不断争取罗广文，罗广文的胞弟罗广斌系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长期在重庆地区从事地下宣传活动，也经常向罗广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罗广文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心狠手毒早有认识。因此，两相比较使罗坚定了起义的信心。

12月8日，罗广文同贾应华到达成都后，即以探亲为名，秘密乘车去灌县邓锡侯部的防地，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情报处联络商谈了有关起义问题。13日前后，第15兵团所属各部队陆续到达成都一带，罗开始整理部队，重新组建108军。第110军也与兵团部取得了联系。16日，胡宗南命令罗广文指挥15兵团和20兵团向彭县、灌县刚举行起义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队进攻。罗广文不仅拒不执行，而且向刘文辉、邓锡侯通报了情况。

重庆解放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5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分别沿成渝公路和由贵州西北部向北进击，解放了许多城镇，对成都胡宗南集团形成了钳形攻势。此时贺龙率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及一野第7军一部，分别自陕南及甘南出动，迅速分路南下，连克广元、剑阁、绵阳，到达了成都外围。至12月20日，解放军自东南北从三面围歼成都胡宗南部队的部署最后形成。

12月21日，胡宗南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要罗广文率第15、20兵团向东突围，再折向贵州毕节，最后向云南边境前进，以掩护胡宗南部向西康突围的行动。会后罗广文向将领们传达后，大家都不同意胡宗南的部署，认为胡一贯牺牲他人，保全自己。于是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12月22日上午，罗广文派兵团参谋长贾应华，第108军参谋长张荣宪去郫县，联络陈克非第20兵团一致行动，准备起义。

12月23日晨，胡宗南由成都飞逃海南岛。罗广文感到起义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正在这时，邓锡侯的秘书杨永浚从彭县来电话，劝说罗迅速起义，罗即派人赴彭县与二野工作人员朱德钦联络起义。

12月24日上午，罗广文、贾应华、张荣宪在郫县安德铺会见了邓亚民、杨永浚等，决定即日宣布起义。当场由杨永浚草拟了起义通电稿。罗广文看了通电稿后表示同意随即签了名，接着第110军军长向敏思在通电上签了名，所属5个师长也签了名。同日下午，罗等赴彭县拜访刘文辉、邓锡侯，受到热烈欢迎。并会见了二野工作人员朱德钦、章浩然等人。

12月25日，贾应华偕同朱德钦到郫县两路口第15兵团驻地，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请朱德钦讲了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接着召集兵团所属连以上军官大会，由罗广文宣读了起义通电。从此，第15兵团所属2.2万余名官兵在罗广文将军率领下，脱离了反动阵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走上了光明大道。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将军对罗广文率部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复电嘉勉。罗广文率15兵团在川西安德起义，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大反动力量的灭亡和成都的解放。

1950年5月，这支起义部队由四川开往浙江余杭，进行了4个多月的学习整训。于10月进行了整编，第108军，第110军分别与人民解放军第21、22军合编，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罗广文后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裴昌会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军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2.9万余人，在四川省德阳孝泉举行起义。

裴昌会，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之后的30年间由排长升到中将兵团司令。裴任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时，在人民解放军发起的扶眉战役中，他指挥的4个军大部被歼。1949年9月，裴被胡宗南调任第7兵团司令，所属第17军在四川通江、南江一线，第76军在宁强东南，第30军第27师在牢固关、白水街一线，第69军第114师在碧口、青川一线，第119师在甘肃武都，第98军在巴中，第38军由秦岭撤到广元归建。

1949年12月初，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等部由北向南进军四川。国民党军第7兵团第119军军部及第244师被迫于武都起义。由于解放军神速南下紧追不舍，裴率第7兵团被迫南逃。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重大胜利，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迫使裴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统治已不会很久，终要被人民解放军所歼灭。从此，裴在思想上产生了不再为蒋介石卖力的念头，而为官兵的前途、自己的未来忧虑。正在此时，解放军第18兵团政治部派与裴有特殊关系的李希三去劝导、启发。裴对李说，国民党虽然兵多将广，实力雄厚，但蒋介石偏听偏信，用人失策，屡战受挫。李顺势开导裴说，蒋介石独裁专制，欺压百姓，剥削工农，得不到民众支持，国民党内部互相倾轧，内战不止，外战不御，如此下去前途不堪设想。裴听后感叹不已，心情很沉闷。李接着讲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根本原因是依靠群众，团结工农，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支持。裴点头称“言之有理”。李进一步说，共产党必定要推翻蒋介石政权，取而代之，望三思后择光明，弃黑暗，不可遗恨千古。过后，李再次会见裴时，裴委托李设法与解放军联系，以便直接得到共产党的教诲，早日改弦更张。不久，李希三由天水来到凤县双石铺，向裴传达了解放军欢迎起义。裴听后当即召集可靠人员，商讨具体办法，认为没有可靠的部队，时机、条件都不成熟。

12月8日，李希三随第38军归建，见到了裴昌会司令官和参谋长李竹亭。他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国民党部队阻止解放军进攻，迟滞解放全中国的步伐是不可能的。同时分析了部队的情况认为，第7兵团只有第38军系西北军旧部，军长李振西长期与裴在一起，感情较深，比较可靠。于是把部队起义的希望寄托在第38军李振西身上，并决定让李竹亭再同李振西商讨，疏通思想。李振西表示，考虑考虑，态度不明朗。15日，裴由广元撤退到剑阁，急电李振西来兵团商讨起义的事。经李竹亭、裴昌会开导，李当面表示“绝对服从”，实际上，李于当晚率部沿川陕公路经中坝、安县等地逃往茂县山区。

23日，裴昌会率第7兵团部撤退到德阳孝泉镇，所属部队先后到达。25日，李希三陪同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敌工部所派人员杜绍先到孝泉镇。裴急问解放军一野有何指示。李劝导裴说，解放军进展神速，蒋介石各部即将崩溃，望裴将军抓住时机，在德阳一带起义。裴听后深感有负解放军一野总部的重托，先是在凤县准备起义，后来又准备在广元、剑阁起义，都因没有做好准备而失去机会。于是当即将呈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通电交给李希三和杜绍先，请他们代为转发，并明令各部队立即停止抵抗，就地起义。与

此同时，裴昌会急电第 76 军军长薛敏泉、第 98 军军长刘劲持、第 17 军军长周文韬，要他们速派代表向就近的解放军接洽，表明态度。各军、师长闻讯后，立即派代表寻找解放军，表达心意。26 日，第 18 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电邀裴昌会会面。27 日上午，贺龙司令员与裴进行了亲切的交谈。30 日，裴随贺龙参加了解放军在成都举行的入城式。

1950 年 1 月，第 7 兵团开赴中江、盐亭集结整训。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圆满完成了改造整编任务。8 月 1 日，在四川省中山县隆重召开纪念大会，正式宣布，原国民党第 7 兵团所属部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调属西北军区整编。

振、鲁崇义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军第18兵团中将司令官兼第65军军长李振和第30军军长鲁崇义率所部2.4万余人，在四川省成都举行起义。

国民党第18兵团主力第65军原属余汉谋的粤系部队。1936年7月，余倒陈（济棠）投蒋，被蒋委任为第4军总指挥兼广东绥靖主任，李振时任该路军第151师第451旅旅长。1937年，第4路军编为5个军，其中就有第65军。次年，该路军改称第12集团军，李振任第186师师长，1940年5月调任第65军副军长，1945年升任军长。1946年5月，蒋介石将第65军调往江西、改为整编第65师，李任师长。1946年6月，蒋介石电令暂整65师移防京、沪沿线。8月下旬，在苏中黄桥战役中，该师第187旅被解放军歼灭。1947年3月，整编第65师调往山东，协助整编第74师向解放区重点进攻。1948年，整编第65师恢复第65军番号，7月调河南，9月奉蒋介石电令空运西安；10月参加陕西荔北战役，伤亡5000余人。12月，李振被蒋介石提升为第18兵团司令官（辖第65军和第90军）兼第65军军长。

1949年5月，第18兵团辖第65、第90军，并指挥第38军，先后在凤翔、宝鸡及渭水两岸设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南下。7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迅速突破李振的第18兵团防线。此时，其左翼第119军第177师先后远逃，右翼第38军迅速后撤，第90军向五丈原撤退，第65军陷入人民解放军东、西、北三面重围之中。在此危机时刻，胡宗南电令死守，致使第65军在7月12日扶眉战役中损失惨重。此次战斗，使李振看清了胡宗南保存嫡系、剪除异己的阴谋。是年10月，叶剑英在广州了解到李振的处境后，即派人通过李振的老上司莫希德和同乡张醴村转话给李，要其及时起义，再后就没有机会了。李早在20年代与叶就有同事之谊，听到叶对他如此关心并寄予希望，当即表示：以前就是因为力量不集中，未能立即行动，现在要行动，就要团结力量。当时进军西南的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也很重视李的起义，并于中旬派陈定去做李振等人的工作。陈定是李的同乡，原在第65军任少将书记长，后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经教育后，愿随军南下，参加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工作。陈定抵第18兵团后，同李振及兵团参谋长何沧浪、第187师师长钟定天等联系，做劝导工作。与此同时，蒋介石、胡宗南也竭力为其部下打气，以图稳定阵脚。面对现实，李经过反复思考，并同何沧浪、副参谋长王杰、钟定天等人商谈对时局的看法，最后下决心起义，立即找陈定商量起草起义通电，规定电台的波长和呼长，让陈定带第187师的古参谋、曾团副于12月13日晨去广元同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联系起义。然而，由于何沧浪的变卦，遂决定推迟同解放军的联系。12月15日，李振奉胡宗南的命令，率第18兵团向成都转移。出发前，陈定转告李振：第30军鲁崇义与解放军有联系，有机会可以找他。李到达成都后，立即带人去找鲁崇义商讨起义。21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向西突围，23日便飞往海南岛。24日晨，第90军按计划西进。9时许，李振乘机率兵团部及第187师由双流进至成都东部大面铺一带，向鲁崇义的第30军靠拢。尔后，李通过参谋长肖健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系，并将第5兵团和第18兵团共同下达的作战计划交郭勋模（陆大校友）转送中共党的负责人，要求派员联系。25日，中共川西临时工作组派易野源会见李振，祝贺第18兵团起义。次日，李振前往简阳县贾家场同人民解放军二野第3兵团

第 11 军第 32 师接头，在前沿阵地石桥河受到该师第 94 团作战参谋宋添锦的迎接。李到达第 94 团后，受到第 32 师副师长涂学忠等人的接待。李将他同第 30 军军长鲁崇义、第 30 师师长谢锡昌、第 187 师师长钟定天、第 90 军副军长兼第 61 师师长陈华等人于 25 日联名签署的起义通电交涂副师长代为拍发。此时，李要求见刘伯承司令员，刘委托参谋长李达同其通了话。当日 17 时，李返回成都市郊大面铺兵团部。李振和鲁崇义联合率部起义成功。

起义后的第 18 兵团和第 30 军，由人民解放军川东军区负责整编。李振调任川东军区副司令，鲁崇义调任川东军区第三副司令，陈华调任川东军区万县军分区第二副司令，钟定天调任西南军区第二步兵学校军事研究室主任，第 30 师师长谢锡昌调任解放军第 31 师副师长，其他官兵经过学习改造后，分别作了妥善安置。

联勤第四补给区起义

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陆海空军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4补给区副司令兼第44补给分区司令曾庆集及参谋长王杰、第41补给分区司令欧阳家清、第3运输司令部副司令熊志等，率联勤80多个单位1.4万余人，在四川省成都举行起义。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已无力与人民解放军抗衡。但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妄图凭借西南一隅作为根据地，继续同人民解放军对抗。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国民党军联勤系统根据蒋介石的反人民战略意图，将川、康、云、贵4省的联勤机构合并为西南补给区司令部，即第4补给区司令部，邱渊任司令，上海联勤总部副参谋长兼上海港口司令曾庆集任副司令兼第44补给分区司令。重庆解放前夕，邱渊逃往台湾，该司令部遂解散。第44补给分区司令部驻成都市东较场，负责川西及西康的后勤补给工作。司令部约有2500余人，下辖监护营、汽车连、军械库、汽油库、粮服库、汽车修理厂，在锦阳、遂宁、泸州设有支部，在内江、广汉、广元、剑阁、雅安、西昌等地设有粮服、油料等库。胡宗南由陕溃退入川后，第7补给区也随之逃至成都。此时，第44补给分区并入第7补给区，司令程开椿，副司令由曾庆集兼。

8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一部积极准备进军西南。此时，摆在曾庆集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继续跟随蒋介石顽抗下去，二是把握时机投向人民。中旬，曾庆集约请他的一个本家长辈曾学圃（早期参加共产党，在川西从事地下工作）和他的旧交好友邓作楷商谈今后的出路问题。经交谈，曾下决心在成都起义。为便于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争取支持，曾将曾学圃安排在司令部任秘书。为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又在司令部物色足资信任的参谋长王杰为助手。10月底，曾约曾学圃与王杰见面，向王谈了他与曾学圃的关系及弃暗投明的意图。王听后感到彼此信任，目标一致。这时，王杰将在上海与裴沼容接触的情况，告诉了曾庆集和曾学圃。是年2月，裴沼容持其父的信找到陈毅，被留在华东野战军，在京沪地区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王杰在裴沼容处接受了与邓锡侯部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密切合作，相机起义的任务。从此，三人经常在一起商谈起义和武装保卫成都等事宜。

曾学圃按照中共川西临时工作小组的要求，住成都市中共地下秘密联络处，协助曾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鼓励支持王杰掌握部队，迎接解放。曾庆集、王杰等则利用第44补给分区司令部的有利条件，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相机配合人民解放军扩大战果。11月，蒋介石在重庆急令第44补给分区司令部调汽车300辆，运送胡宗南部一军陈鞠旅部自成都向重庆增援。曾将此军事命令向中共地下党组织报告后，地下党组织指示设法推迟派车，或尽量少派车，结果重庆宣告解放，援兵还未运到。重庆解放后，蒋介石、阎锡山等逃到成都，委王瓚绪为西南第1游击总司令。此时，成都城防总司令、胡宗南部第3军军长盛文严格限制驻城部队，命令除西南第1路游击总司令部外，其他部队一律移驻城外。曾庆集、王杰根据中共川西临时工作小组保护成都文化古城的要求，为使联勤扩编的部队不调出城外，由徐震球去找国防部员王公亮出面、向王瓚绪请准，将曾、王扩编的部队编入西南第1路游击总司令部第6纵队第1总队，由王公亮出任纵队司令，王杰、徐

震球任纵队副司令兼第1总队长、副司令。这样有了西南第1路的番号，也就可以驻扎市区，为保卫成都创造了条件。

12月7日，中共川西临时工作小组召开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的部分领导和代表会议。会上，根据成都周围胡宗南部队的部署情况，决定刘文辉第24军置于成都至雅安一线，邓锡侯第95军置成都至彭县、灌县地区，联勤的部队在城内维持社会治安，准备接管城防。10日，蒋介石从成都出逃大陆。23日，胡宗南逃离成都。次日深夜，城防司令盛文率部逃出成都。曾庆集，王杰获此消息后，感到起义的条件已完全成熟，遂立即命令联勤各部队迅速占领市内各城门、要点，维护城内治安。25日，中共川西临时工作小组积极促使各界人士，并由市长冷寅东主持，约请成都市军、政、工、商、绅、学界的代表参加的治安紧急会议。会上推举曾庆集率部接管城防，维护治安，迎接解放。当天下午，在联勤第44补给分区司令部正式成立了城防司令部，曾庆集兼任城防司令部司令，陈德林、杨良勋兼任副司令，王杰兼任参谋长，宣布联勤部队起义，公布了维护市区治安的约法。27日，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参谋长张经武和杨尚高先遣部队进入成都。29日，张经武等会见曾庆集、王杰等，商谈成都城防移交事宜。30日，成都市城防由第60军军长张祖谅部接管。当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和平解放成都入城式，贺龙司令员等参加了入城式。下午17时，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城防。

曾庆集等率联勤第4补给区在成都起义，为保护成都文化古迹、军用物资不被抢劫破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做出了贡献。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决定，在成都起义的联勤部队，由西南军区后勤部负责改造整编。1950年1月，曾庆集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第二副司令，后调南京军事学院任研究员，1955年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王杰先后在重庆、成都工作，后任四川省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委员、省参事室参事，四川黄埔同学会组长；徐震球任四川省文史馆员、省参事室参事、省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委员、省民革成员。

朱鼎卿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军第3兵团司令官朱鼎卿率兵团部、暂编第8、第9军共7000余人，在四川省金堂县举行起义。

朱鼎卿曾任国民党军第9补给区司令官、湖北省主席。在人民解放军大举向西南进军，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情势下，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向朱鼎卿转达了国民党国防部的命令，将所有以湖北军政名义的机构一律撤销，改为第3兵团，由朱任兵团司令官。绥靖总司令部及保安部队编入第3兵团暂编第8、第9军，李朗星任暂8军军长，杨达任暂9军军长，驻防万县以东、长江西岸的龙驹堤。

是年11月下旬，孙震命令第3兵团担任万县以东至忠县的江防守备，然后再逐次退到渠县附近，对东作战，防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但是，刚组建的第3兵团大都是由文职人员和保安团队组成的，在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面前无力抵抗。朱见机行事，命令各部停止作战，立即从江防线上撤下来，分别向垫江、梁平撤退，一路上班不成班，连不成连，与解放军先头部队稍一接触就缴械投降。朱见此状况，命令部队一直向西奔逃，于12月23日到达新都县附近。经与成都国民党驻军联系，得知孙震、顾祝同、胡宗南等都逃走了。这时，朱召集李超君等人商议，决定派人到成都与王瓚绪联系。兵团副司令彭旷高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王的参谋长，利用彭与王的关系，派其前往联系。25日上午，朱没有得到彭的回报，十分焦急。因兵团正处要冲，为避免同沿公路前进的解放军发生冲突，命令部队避开新都，向金堂西北转移，等待成都方面的消息。下午16时许，部队行至金堂赵镇附近时，探知前有解放军部队向该地急进。此时，朱接到暂编第9军军长杨达送来的报告：还是起义好。朱看后在报告上批示：已派人赴成都接洽。此时，第3兵团先头部队已被人民解放军发现，双方展开枪战。该部派第1营副营长同解放军联系，申明已派人去成都接洽起义。暂编第9军军长杨达也亲赴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并下令第3兵团的部队立即停火，一场枪战结束了。

朱鼎卿面对第3兵团装备缺乏，补给无源，官兵疲怨的情况，委派李超君和副师长刘巷霖赶赴赵镇，找到解放军第60军第180师，该师政委张其善、政治部主任朱向璃接待了他们。李和杨向张、朱表明了谋求和平道路的态度，以及已经采取的措施。朱向璃当即称赞了他们的义举，解除了李和杨的顾虑。张其善政委、朱向璃主任要求李和杨回去后转告朱鼎卿：将金堂附近的部队集中到大面铺，听候整编，生活供应由解放军负责发给。26日，李超君、杨达将解放军第180师师长、政委联合签发的信带给朱鼎卿。朱阅后，立即命令部队经赵镇向石板滩集中。部队到达石板滩后，兵团部即召集官兵大会，朱宣布全军起义。

第3兵团起义后，分别集中在石板滩和大面铺一带，听候整编。1950年1月1日，贺龙司令员在住处会见了朱鼎卿，当他得知朱曾在他部下当过参谋时，鼓励说：起义就好，从头来。解放后，朱先后任过西南军区高参、湖北省文史馆馆员、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李超君先后任解放军重庆炮校教学组组长、战术教员。杨达先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山东省民政厅福利处处长、山东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杨汉烈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军第20军军长兼第79师师长杨汉烈率军部及所属第79、第349师和一个独立师共1.5万余名官兵，在四川省金堂县赵家渡举行起义。

1949年2月5日，国民党第20军奉命调往江南之芜湖、鲁港、三山街担任防务。4月22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第20军大部被歼，军长杨干才、炮兵团长刘润珊被击毙，第133师师长李介立、副师长朱泰安、参谋长吴文光被俘。该军被歼后，国民党国防部电令杨森重建该军，于是杨森令芜湖等地逃回的第134师师长景嘉谟、副师长肖传伦收拾残兵败将，重建第20军，杨汉烈（杨森之子）为第79师师长、景为第133师师长、肖为第134师师长，并由景代行军长之职。但杨森意欲自兼军长，等待时机传位其子。10月上旬，蒋介石再次由台北飞到重庆，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作出“确保重庆，保卫四川”为核心的部署。会上，蒋介石决定成立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杨森任总司令。此时的杨森于重庆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大肆招兵买马，成立起“反共保民军”5个军，将重庆市及附近的18个县、区划入卫戍区，每县建一常备师。把第20军第133、第134师布防于重庆长江南岸，第79师布防于大竹、涪陵地区，扼守长江，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溯江而上，进逼重庆市。

1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向重庆挺进。中共川东特委为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积极组织工人和群众保护工厂和城市设施，同时派出地下党员做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争取工作。中共地下党员苏之受命去做杨森的争取工作。他通过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发起组织人之一鲜英，与杨森在成都陆军学堂同学的关系，派其子鲜彦昭向杨转达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提出的四项条件，即：所属部队撤离重庆时保证不破坏山城建设，尤其不得破坏大溪沟发电厂，不骚扰抢劫，保证山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尽一切努力营救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志士；不随蒋介石去台湾，率所部第20军起义；在可能条件下活捉蒋介石，为新中国立功受奖。杨森在国民党兵败势去的情况下，谈了能办到和无法办到的具体情况，并说，尊特生（鲜英）嘱咐，在我去台湾后，由杨汉烈、喻孟群率部起义。

10月28日，人民解放军直逼重庆。蒋介石决定杨森的卫戍总司令部撤离重庆。30日晨，蒋介石仓皇飞逃成都。杨森于当日下午带卫戍总部及重庆市政府部分人员逃离重庆，并命令罗君彤师、彭斌内二警部队及向文彬保警部队同时向川西撤退，第20军亦向川西撤退。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从江津下游渡江，截断了重庆到成都的大道，堵击西逃的国民党军，杨森所属部队则由东大道折向从北路逃窜。12月8日，杨森率部逃至广汉，将向文彬重庆保卫总队和陈亮重庆自卫队合编第20军独立师，向任师长，陈任副师长。10日，第20军代军长景嘉谟率第133、第134师到达金堂，第79师尚在撤退途中。此时，蒋介石令杨森、孙震二人速回锦阳开设指挥所，指挥罗广文第20兵团、孙元良第16兵团及第20军各部开辟川北战场，阻止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从北面南下。

9日，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将领在彭县起义。15日，他们派专人送信到广汉，劝杨、孙率部起义。杨见信后，即派代表喻孟群、孙派代表董宋珩前往。14日，喻、董去彭县会见刘文辉、邓锡候，一同商谈了杨、孙

部起义的事宜，草拟了起义通电。15日上午，喻返回广汉，时杨森接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的电话，说去台湾的飞机票已准备好，请速去成都。下午，杨森即带喻孟群等人匆忙赶到成都，商谈他去台湾后第20军的起义事宜。17日中午，杨汉烈接电：18日早晨其父在成都北门驷马桥看“地形”，要其务于9时前赶到。结果10时才到，杨森已于9时乘飞机逃台湾，临行留下手令：第20军军长由杨汉烈继任，并要他率第20军起义。

杨汉烈受命后，第二野战军敌工部即派地下党员刘叔度和四川民革成员曹惠元做杨率部起义的争取工作，向杨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四项忠告”和对他的态度，讲了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杨听后百感交集，决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选择走起义的道路。23日，杨即派刘叔度、罗士瞿持他的亲笔信，由金堂沿川陕路北上，迎接贺龙司令员的部队。当日中午，刘、罗抵德阳罗江，遇见解放军率部正向成都进军的第60军军长张祖谅。张军长听了刘、罗说明来意并看了杨的信后说，欢迎你们率第20军弃暗投明。并当即确定用白色的“杨”字小旗为识别第20军的信号，就地起义。

24日，杨汉烈在军部召集团以上军官动员起义，以“国父谆谆教导我们，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启发部队，认清形势。警卫团团团长李茂实，独立师师长向文彬当即表示：拥护军长领衔起义。26日，杨见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集合部队官兵，宣布第20军光荣起义。会上宣读了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杨汉烈率第20军起义后，受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热烈欢迎，并对起义部队广大官兵作了妥善安置。杨汉烈本人曾任西北军区参议室副主任，1956年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甘肃省委副主任委员、西北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西安黄埔军校同学会甘肃省联络组长。

赵子立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军第127军军长赵子立率军直属部队及第309、第310、第311、第312师共1.2万余官兵，在四川省巴中地区举行起义。

赵子立与在金口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19兵团司令张咎都是河南人，既是同乡，又长期一起共事，过从甚密，相交莫逆。抗日战争时期，张轸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赵子立任绥署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张轸任第5绥靖区司令官，赵子立任副司令官；后张任第19兵团司令官，赵任副司令官兼第127军军长。是年春，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对张轸失去信任，杨言要杀掉他。面对危机时局，张轸决定起义，投向人民，赵不愿随张起义，并收容了不愿起义的部队，从此分道而行。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武汉、沙市、宜昌和湘东、湘南大部地区。8月，程潜、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桂系部队向广西撤退。此时，白崇禧对赵子立不信任，决定让其率所部第127军到河南西南部伏牛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并给了赵一个河南省政府主席兼豫陕边区游击总司令的官衔。赵受命后，率部于8月上旬逃到鄂西房县大九湖，驻房县至巴东一线，军直及直属队驻神农架，第399师驻兴山，第311师驻巴东，配合孙元良第16兵团防守川东门户。这时，该军受白崇禧遥控指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川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孙震，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也在指挥，但都不管供应补给，致使部队困守大巴山，粮饷无着，只好就地搜刮抢劫，或是以野菜充饥。赵子立面对上头要受白崇禧、张群、孙震、孙元良的气，下头广大官兵不得温饱，怨声载道的艰难处境，日夜思考着部队的出路在哪里？个人的前途在哪里？

1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直逼扼守川东门户之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集团望风而逃。赵子立奉命率部层随孙部撤退到川东万县、忠县一带驻防。为了全军万余名官兵的生命安全，为了给自己找一条光明道路，赵决定效法老上级张轸，走起义道路。赵将此意向副军长、参谋长通了气，得到他们的支持；继又说服了第309师师长刘子仁，对第310师师长田敬堂也做了工作。同时派人与人民解放军联络。12月中旬，与人民解放军第42军接上了关系，并开始电台联络；尔后又与起义的刘文辉、邓锡侯部联络，以取得他们及在那里的第二野战军敌工人员的支持。为了便于率部起义，赵将独立第2旅并入第309师，独立第1、第3旅编入第312师，全军4个师12个团。16日，赵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师、团长会议，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会上，赵分析了时局，决心效法张轸，走起义的道路。经赵反复做工作，争取到3个师9个团参加起义。当赵子立获悉军部政工处少校秘书陈慈源、警卫营长王俊山与第310师第930团团团长田中田暗中勾结，妄图杀害支持起义的副军长姚江岭、参谋长姚少一，架走赵子立后，立即将警卫营长扣押，派其弟赵子久担任警卫营长，派人监视军统骨干分子侯亚南，从而粉碎了陈慈源、田中田的阴谋。

21日，赵子立接到人民解放军第42军发来欢迎第127军起义的电报后，立即通知各师率部改向南下至达县集结。25日下午，第127军行至巴中县北镇子堤，与人民解放军第61军第183师遭遇。赵即派参谋向志轩与第183师联络。该师政委杨绍增即请赵子立在镇子堤面谈。赵一再声明早有心起义，

并与第 42 军有联络。杨当即对赵说，你们部队目前很不稳，你掌握部队有困难，不如放下武器好些。赵欣然同意，就地起义， 26 日，赵子立在巴中镇子堤召开全军大会，正式宣布起义，投向人民怀抱，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会后，赵立即发了起义通电。 1950 年 1 月 11 日，贺龙司令员在成都会见了赵子立将军，勉励他认真学习，改造思想，把部队管好，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久，赵子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第一教研组组长，以后又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起义

1949年12月27日，国民党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官张光玮率部1300余人在广西省隆县（现为隆桂壮族自治区）县城举行起义。

1949年2月，白崇禧向国民党行政院建议成立滇、黔、桂三省边区绥靖司令部。行政院同意了白的建议，委任原第6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张光玮为司令官。该司令部于6月底由原第6绥靖司令部组建，并由湖北省孝感迁至广西百色。云南省主席卢汉反对成立该司令部，后将绥靖区的范围改为黔桂边区，11月29日，张在百色召开所属民团司令、保安团长、专员、县长及司令部处以上军官30多人参加的军政会议，研商落实白崇禧“总体战”的措施。此时，人民解放军第38军已由万岗（今巴马县）向田阳县田州镇进军。由于解放军逼近，迫使张光玮于12月2日凌晨，率部4000余人撤离百色，向田西方向的乐县（今田村）、旧州转移。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百色，张部又于22日后撤至西隆县新州镇。

张光玮进入西隆后，白崇禧要其组织一个精干的建制团，以最快的速度，向越南方向前进。张发电给靖西专员赖慧鹏，寻问能否通过入越南境。赖和百色专员陈汉流联名复电告知越边无法通行，同时告知他们已通电起义，望张认清形势，下决心率部起义。张犹豫不决时，又收到赖受解放军之托给张的电报：“民心向背，了如指掌，你屈之地，谅有同感。兄如亦愿共同行动，希复电，以便我们向解放军商谈”。张是个老军人，广西讲武堂毕业后，历任团长、师长、军长、兵团副司令等职，一直跟随白崇禧，很受信任。在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下，张经常同参谋长林科连、副参谋长朱丽泉交谈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张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指示以林科连的名义给赖去电，寻问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及起义的作法。赖回电介绍了他率部起义的情况及与解放军接头的经过，劝他“幸勿迟疑而自误”。张立即给赖回电，表示接受建议，决定起义，并委托赖为全权代表，电告广西省人民政府、广西军区，请示改编方法。

20日，张光玮召集林科连、朱丽泉、肖若夫等人，研究和决定召开起义大会的日期和开法，商议起义通电的内容及口号、标语的提法。27日上午，起义大会在西隆县体育场举行。大会由张主持，并宣读了起义通电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感电”。司令部主要官员及西隆县县长朱敬久、县府各机关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表示了态。会场四周和全城各处都贴满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欢迎解放军进城”、“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等标语口号。当天，即把起义通电、感电及会议情况通过赖慧鹏的电台向党中央、毛主席、解放军第38军发出。从即日起，张强令各部队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防止破坏及违犯纪律的事情发生，要求各部队按规定的路线和指定的地区集结，听候解放军改编和接收。

1950年1月8日，张光玮请示广西省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第38军同意后，派政务处长梁侃、司令部上校参谋章典、政务处办事员孙建勇、西隆县府科员朱尚文为代表，前往百色向解放军请示及商谈改编事宜，但没有接上头。1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杨德华、第38军第114师参谋长高放等从百色直赴旧州。当晚，双方代表进行了正式谈判。杨、高说明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和对张部改编的意见。张光玮再次表示了起义的诚意和决心，并将其部队情况作了介绍。会谈中，双方商定了三条协议：（1）保证

起义人员的安全，（2）对起义人员量才使用，（3）协助解放军搞好筹粮工作。谈判结束后，张、林科连随同杨德华、高放于20日至百色。高放到百色后即奉命率部进军云南，改编张部任务交百色军分区司令员覃同翰、政委区镇、参谋长贾力夫。22日，覃、区与张商定成立改编委员会，并制订了方案。27日，根据改编委员会的决定，张光玮部副参谋长朱丽泉、新编48师师长肖若夫将原驻扎在西隆的司令部机关、刘清凡督导团、新编48师、司令部特务营共600余人带到百色接受改编。原驻田西县浪平一带的张部新编46师，除团长屠占廷及少部分不愿接受改编外（后被歼灭），其余700余人由师长邓兴带到百色接受改编。驻安龙指挥所副司令官万式炯率其部数百人到贵州贵阳市接受改编。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张光玮一直很信任和重用，安排其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历任广西一、二、三届政协委员。张光玮晚年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努力，直到1971年1月12日病逝。

莫树杰部和平改编

1950年1月22日，国民党桂西军政区千余人在广西金城江镇（今河池）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

1949年11月2日，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中将奉白崇禧之命，在宜山正式成立桂西军政区司令部，莫任司令官，周竞少将任参谋长，何作柏少将任秘书长，下辖宜山、风山两个行政专区及六个县。该军政区执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关于国民党党务整理的指示，组成骨干核心，加强反共组织，效忠李宗仁、白崇禧。

是月7日，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第38军由洪江出发，奔袭靖县之敌，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经黔东楔入广西，占领思恩、河池，继向桂西南前进；另一路于10日解放靖县，13日占领黎平，14日占领榕江。国民党第13军慌忙由黔桂边境西逃。中旬，国民党桂西军政区司令部被迫由宜山逃至南丹县城。不久，国民党刘嘉树兵团之第100军和第103军亦从贵州境溃退到南丹。20日，人民解放军第38军解放了宜北，25日逼近南丹县城；另一路占领了东江车站，继而占领金城江（今河池）。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桂西军政区司令部于26日向南丹城西北约60公里的黄江乡罗腾村转移。2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兰县城，12月1日解放万岗；2日，都宜忻人民游击队进入宜山县城，与第38军会师。此时，桂西军政区司令部已被解放军包围，到了穷途末路的困境。

为了尽量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损害，中共桂北区委员会书记何伟和第13兵团政委莫文骅利用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汉昭和宋厚祜（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司令部政务处长）、郭炳棋（原国民党柳州警备队少将参谋长）等人与莫树杰的私人关系，在给莫部以军事压力的同时，对其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宋厚祜、郭炳棋到宜山后，与王汉昭一起用明码电报与莫联络，并分别给莫及其它主要幕僚人员写信，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劝莫认清形势，早日弃暗投明，接受和平改编。桂西军政区黑湖联防区主任黄翰庭收到信后，电告总务处长邝世芳。邝将黄电转告莫树杰。莫当即令黄派人将宜山来信务于23日前送达罗腾。莫看完信后，即让邝世芳通知周竞、何作柏、李彩光（新任副参谋长）、参谋处陈浙民、经济处莫谦业、秘书室主任王简临等到莫的房间阅看宜山来信。大家看后均未敢表态。莫最后说，情况既然如此，原计划于24日向天峨县甲板转移的行动暂停止，至于接受和平改编的问题，需慎重考虑。上述人员从莫的房间出来，又集中到周竞房间商量，并推何作柏草拟一个建议书，说明大势已去，要莫以南丹、天峨数十万民众为重，以莫家全族百数十人为重，乘此机会，及时接受和平改编。建议书写好后，都在上面签了字。莫树杰看完建议书后，思想斗争激烈，明知不投靠人民是自走绝路，但又想对白崇禧要“尽忠”到底。25日晚，莫接到白崇禧自海南岛发来的电报，令其率部向越南撤退。莫接电后，于27日在黄江乡开会讨论白的电文。会上，绝大多数人不愿去越南，莫树杰要大家对王汉昭、宋厚祜等人的来信和司令部主要人员的建议书再考虑一下。当天下午，莫从黄江回到罗腾后，经反复考虑，决心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29日，莫派参谋长周竞、秘书室主任王简临前往宜山与解放军商谈。

1950年1月2日晚，周竞、王简临到达宜山，3日上午与第38军联络部长吕本支和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汉昭商谈。经双方协商，原则上达成协议，

唯有集中改编的地点意见不统一：桂西军政区代表主张在南丹，第 38 军代表主张在金城江，以便改编后利用火车运输。8 日上午，周、王回到罗腾后，将会谈情况向莫树杰作了汇报。莫对达成的协议全部同意，亦同意在金城江集中部队改编。当晚，莫电召新任副司令官黄翰庭于 9 日到罗腾，决定以黄为全权代表，由周竞协同前往河池与解放军签署协议书。黄等于 12 日到达河池县城，待宜山军分区政治委员张伟烈、副司令员王汉昭及原桂西军政区司令部政务处长宋厚祁等到达后，于 14 日上午举行签字仪式。解放军代表、第 38 军第 112 师政治部主任李际泰，桂西军政区全权代表、副司令长官黄翰庭分别在《和平改编决议案》上签字。决议案签字后，解放军成立了改编委员会，由李际泰、吕本支、张伟烈、王汉昭组成。桂西军政区代表起程回南丹前，电告莫将部队集中到南丹准备接受和平改编。16 日，莫通电接受和平改编，并将接受改编的部队集中完毕。18 日，桂西军政区司令部及接受和平改编的部队，由黄翰庭率领前往金城江，莫回家中休养，治疗眼疾。20 日，改编部队到达金城江时，受到第 38 军代表和宜山军分区政治委员张伟烈、副司令员王汉昭等领导热烈欢迎。22 日，桂西军政区官兵正式接受了和平改编，计有 1000 余人。按照《和平改编决议案》的原则，愿学习者保送桂林军政大学学习，愿回乡者计程资遣，愿参军者编入人民解放军。至此，改编工作遂告结束。

国民党步兵学校教导师第一团起义

1950年4月22日，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新编教导师第1团官兵千余人，在步校总务处少将处长李湘武、人事行政处少将处长何素凡和第1团团长沙瑞麟等人率领下，于海南岛琼山县城举行起义。

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于1930年春在南京成立，直属于国民党国防部，负责训练在职军官。1948年秋，步校由南京迁到广州，同年12月迁到海南岛府城镇，校长温鸣剑兼任海南警备副总司令。为加强海南岛的防卫力量，教导总队改编为陆军教导师，下辖两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属步校管辖，驻守海口白沙门和琼山县城、塔市、迈德一带。步校在南迁期间，校长温鸣剑大量贪污军饷，盗卖公物，引起全校军官不满，联名向上控告。当温得知控告材料来自总务处，便利用兼任海南岛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之职，借口李湘武企图逃离海南岛将其扣押。

1949年6月底，李湘武被关押进府城监狱，和先前因暗藏共产党传单而被关押的宪兵连长陈庶仁同住一牢房。当时，中共府城特区北插村党支部书记王海也被捕入狱。王海从陈庶江口中得知李湘武落狱的原因后，决定对李开展争取工作。王海利用放风的机会，多次与李湘武交谈，启发他弃暗投明，使其逐渐定下了投向人民的决心。步校人事行政处处长何素凡与李湘武共事多年，是至好故交，他来狱探望时，李便把同陈庶仁、王海交谈的情况与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何素凡，何表示赞同，并愿与李一起投向革命。在王海的争取下，李湘武写了表态信，表示“愿投向真理，愿为实现真理而奋斗”。不久，国民党监察院追查温鸣剑的贪污问题，李湘武获释出狱，官复原职。李出狱时，王海告诉他，今后将有人继续同他联系，希望他履行自己的诺言。

9月上旬，城镇理发业支部书记何文庄根据狱中王海提供有关李湘武的相貌特征及住地，带上理发工具，假装上门理发，到海口找到李湘武，接上了关系。几天后，李湘武与何素凡随何文庄到北插村，同中共特区溪东工作组组长吴关戚接上关系，谈了一些有关起义情况。下旬，中共府海特区负责人王健民在琼山县永秀乡巷东村会见了李与何。他们二人向王汇报了海南警备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国民党步兵学校和教导师的情况后，王健民代表中共府海特区对他弃暗投明，参加革命表示欢迎，并交给他们两个任务：一是广泛收集情报，二是积极策反教导师部队起义。李、何从巷东村回来后，对如何策反教导师部队起义进行了分析研究。根据情况分析，决定吸收步校训练处少校教官康昭文、行政处少校科员刘文礼、总务处中校科员聂仕景、副官张兴明和教导师第1团上尉军需官曾熙等人参加活动，布置他们收集情报，广交朋友，从中物色对象，相机开展工作。

11月中旬，李湘武、何素凡第4次进入游击区，向中共特区书记祝菊芬汇报第32军兵力部署和策反教导师的情况。祝与他们进行了具体研究，决定把策反重点放在第1团起义上，并给李与何以“十一”工作队的名称进行活动。11月间，温鸣剑畏罪潜逃澳门，训练处少将处长杨莫提升为步校代理校长。杨是李湘武的老同事，交情颇好，杨给李开展工作带来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李、何利用同乡关系多次与教导师第1团团长沙瑞麟、副团长石勋通电话，反复做工作，他们终于同意伺机率部起义。

1950年1月，国民党决定将步校迁往台湾。根据这一情况变化，李湘武、何素凡第五次进入羊山游击区，向祝菊芬汇报情况，提出准备辞去步校职务

留在海南岛参加革命。祝代表中共特区委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指示他们加紧策反教导师第1团，在没有职务的情况下要加倍小心，伺机行事。李、何回校后，向校长杨莫提出辞职。起初杨不同意，在李、何坚持下才批准，但要李办妥船运后再离职。在步校准备迁台期间，他们利用筹备船运工作的机会，争取了平时与他要好的步校修械所所长瞿星剑参加起义活动，并以修械所机器设备笨重难以装运，须暂交第2路军司令部接管为借口，留下了修械所及步校一部分物资，不让搬往台湾。

3月，人民解放军渡海先遣队登陆成功，孤岛残敌恐惧万分，集中主力加强正面海防，以防止解放军大举渡海登陆。为尽快策动教导师第1团起义，配合大军渡海作战，李湘武和何素凡第六次进入羊山游击区，向祝菊芬和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先遣队汇报步校走后的情况。经研究决定，由他们伺机率教导师第1团起义，如情况紧急，可由三民乡撤进游击区，配合解放区保卫、接管好海口。李、何返回海口后，立即约瞿星剑商谈起义问题。瞿考虑到修械所机器设备笨重，难以转移，便约定起义时间定在解放军大举登陆后举行，并商定了保护机器设备的措施。尔后，他们又赶往第1团驻地与谢瑞麟团长、石勋副团长商定起义方案。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教导师第1团的情况后，认为起义条件已经具备。但考虑到该团附近驻有国民党第32军两个团、第64军1个团和教导师其他部队，行动不便。经过商谈确定，在解放军登陆时，将部队撤回府城起义。

4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海登陆，迅速摧毁了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吹捧的“伯陵防线”。薛于22日下令总撤退。当日上午，李湘武与何素凡分工：由何去府城掌握修械所，李负责接应第1团起义。此时，第1团已接到师部关于向榆林港撤退的命令，部队正向府城方向开进，请李湘武速去组织起义。李立即随同谢赶往府城。时第1团正在府城郊区公路旁休息，谢当即集合第1团部分军官和班长约50余人，动员大家弃暗投明。正在这时，传令兵报告：第2营正在向南前进。谢立即命令第2营停止前进，尔后召见第2营营长，劝他留下起义。该营营长以“全营家眷都以前往文昌，等到了文昌再说”为由予以拒绝。第2营走后，部队正准备向靠近游击区的桂林洋出发。教导师知道了他们的意图，立即派两名作战参谋赶往阻止。在此关键时刻，李和第1营营长端起枪，要把该两名参谋连人带车扣起来，两名参谋见势不妙，开车逃跑。教导师第1团团部、第1营及第3营两个连共千余人就地宣布起义，向桂林洋开进。与此同时，步校修械所在何素凡、瞿星剑的组织下在府城宣布起义。这次起义为人民解放军加快解放海南全岛的进程作出了贡献。

4月23日上午，人民解放军攻占海口市。李湘武、何素凡、谢瑞麟等人第40军军部取得联系，向军部汇报第1团及修械所起义情况，然后组织人员协助维护治安、保护物资、筹集粮食等工作。24日，第40军派部队到桂林洋和府城接受教导师第1团和修械所全体起义官员；25

日，起义部队移住海口南门市。5月上旬，全体起义官兵随第40军军部开往广州接受整训，后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作了妥善安置。

德格·格桑旺堆宁静起义

1950年10月11日,西藏地方政府军第9团代本(相当于团长)德格·格桑旺堆率部400余人在西藏宁静举行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解放川、黔、滇、康以后,中共中央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因西藏上层亲帝国主义的阻挠而未成功。于是,中央同意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在继续进行政治争取的同时,拟于1950年10月发起昌都战役,以粉碎西藏地方政府以武力遏拒人民解放军进藏的计划。并由新疆进藏部队进驻和田,云南进藏部队进驻德钦,青海骑兵支队进抵玉树,第18集团军集结于甘孜,达成对西藏的钳击态势,争取整个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针对西藏人民普遍信仰宗教,藏军官兵以神佛为精神支柱的情况,中共中央要求进藏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紧密团结广大藏族同胞。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制订的入藏守则中,处处以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逐步消除了藏胞和藏军的疑虑。与此同时,“藏东青年自治同盟”领导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平措旺阶(闵志成)随军进入巴塘、金沙江沿岸,在巴塘先遣队党委领导下,开展争取瓦解藏军的工作,主要争取对象是驻宁静的藏军第9团代本德格·格桑旺堆。平措旺阶先通过第9团代本的好友、巴塘医生强曲向德格·格桑旺堆寄去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各项政策,以及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单和布告。

10月6日19时,解放军各部队分别向藏军6个据点发起攻击,8日由牛古渡、角登、竹巴笼渡口强渡金沙江,9日消灭竹巴笼守军20余人后,沿空子顶、莽岭,经古树林向宁静县城逼近。格桑旺堆获悉后,立即传令各点守军向代本部收缩,固守宁静。当晚传来基松岗失守的消息,代本秘书侠吾多杰劝其赶快逃跑。格桑旺堆故作镇静,指示马上发报给阿沛总督,等他回电再说。翌日晨,侠吾多杰逃跑,当晚宁静县长玛恰出逃。接着,盐井贡嘎拉庄总管阿曲让报告多卡守军被歼,基松岗驻军连长贡嘎赞吉带着一群士兵和家属赶到,进门扒倒便拜,要代本为死伤的兄弟和家属做主。在场的第1营营长贡布连忙为连长说情,并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格桑旺堆思忖良久,想到前段时间曾在该部当外科医生的强曲先生来信说:共产党的军队保护宗教寺庙,只要放下武器,不与解放军为敌,他们决不会伤害人。尔后格说,我们能不能与对方议和。经过商议,一致同意由格桑旺堆前去议和。

11日下午15时许,藏军第9团代本德格·格桑旺堆带着心腹侍从拉扎、尼马、次仁、士兵俄罗白马、第1营营长贡布和英文翻译在宁静城外70里处遇见解放军先遣小分队。当晚引领他们到古树村同团政委冉宪生进行谈判。格桑旺堆首先表示:眼下贵军已渡过金沙江进入这一带,我本人是奉命驻守该地,既没有同国家开战的能力,也没有同贵军交战的念头,因此,特来商量和解。冉宪生政委对九代本深明大义表示欢迎,格桑旺堆还提出:1.保证属下全体官兵的人身安全,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2.保送我的三个子女到内地学习,并关照他们未来的前途,3.允许我做一普通百姓。冉宪生当即作了答复,并约定次日进驻宁静。第二天,洛桑旺堆率部迎接人民解放军开进宁静,宁静县城宣告解放。之后,格桑旺堆派人四处寻找失散的藏军官兵,解放军接收起义人员343人。18日,格桑旺堆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

表示脱离反动阵营，与解放军携手合作，为解放西藏人民而奋斗。两天后，人民解放军第 53 师副政委苗丕一到九代本驻地，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他的爱国主义行动的表彰。班禅行辕计晋美·夏格刀登·巴圻格桑益西等发来贺电、贺信，并邀卡果活佛访问宁静，会见解放军第 53 师领导，使得察雅民兵 500 余人于 24 日全部投诚。

中共中央对起义的第 9 团代本官兵十分关怀。西藏工委具体规定：起义部队番号不变，享受与解放军同等的待遇。进藏主力部队抵达昌都时，还为第 9 团代本起义官兵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大会。1951 年 4 月 8 日，德格·格桑旺堆作为西藏致敬代表团昌都地区的团长，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德格·格桑旺堆二级解放勋章一枚。1956 年 5 月，西藏军区授予德格·格桑旺堆大校军衔。

